

上海三联书店

# 二十世纪

## 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

ERSHI SHIJI XIFANG XIANDAIHUA LILUN WENXUAN

● 谢立中 孙立平 主编

ERSHI SHIJI XIFANG XIANDAIHUA LILUN WENXUAN





# 二十世纪

## 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

---

● 谢立中 孙立平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谢立中,孙立平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ISBN 7-5426-1629-3

I.2... II.①谢...②孙... III.现代化理论—西方国家—文集 IV.D0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6904 号

## 20 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

---

主 编/谢立中 孙立平

特约编辑/刘可儿

责任编辑/倪为国 邱 红

装帧设计/范峤青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 @ online.sh.cn

印 刷/上海市印刷十厂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780 千字

印 张/38.25

印 数/1—3100

---

**ISBN 7-5426-1629-3**

**C·19 定价 75.00 元**

# 目 录

## 第一篇 现代化的一般理论

现代化理论的社会学基础 .....	胡格韦尔特	3
现代化问题的社会学理论 .....	B.瓦玛	45
模式变项与社会系统的结构分析 .....	T.帕森斯	62
关于变迁的功能理论 .....	T.帕森斯	86
现代化与社会结构 .....	M.列维	102
现代化的社会模式(结构)和问题 .....	M.列维	109
相对非工业化社会对高度工业化社会结构		
弱点的某些根源 .....	M.列维	134
走向一种现代化的理论 .....	N.斯梅尔瑟	145
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	S.艾森斯塔德	164
现代化的整体转型 .....	G.哥迈尼	184
对现代化学派的批评 .....	苏耀昌	195

关于现代化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	S. 亨廷顿	201
现代化理论与社会比较研究的批判 .....	迪恩·C. 蒂普斯	217
依附论的主要欠缺 .....	J. W. 斯隆	251
评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 .....	H. C. 曼西利亚	258
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	P. 伊文斯 J. 斯蒂芬	268
新现代化研究 .....	苏耀昌	282
“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		
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 .....	富永健一	305
传统与现代性:社会变迁研究中误置的两极		
.....	J. 古斯费尔德	319
结构分化的方式、精英结构与文化观 .....	S. 艾森斯塔德	328
历史传统、现代化与发展 .....	S. 艾森斯塔德	357
现代性、“共同参照”与现代化 .....	F. 布利考	370
工业社会的趋同问题:对当前理论的批判 .....	伊恩·温伯格	384
现代化理论与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向 .....	W. 茨阿波夫	402

## 第二篇 现代化的不同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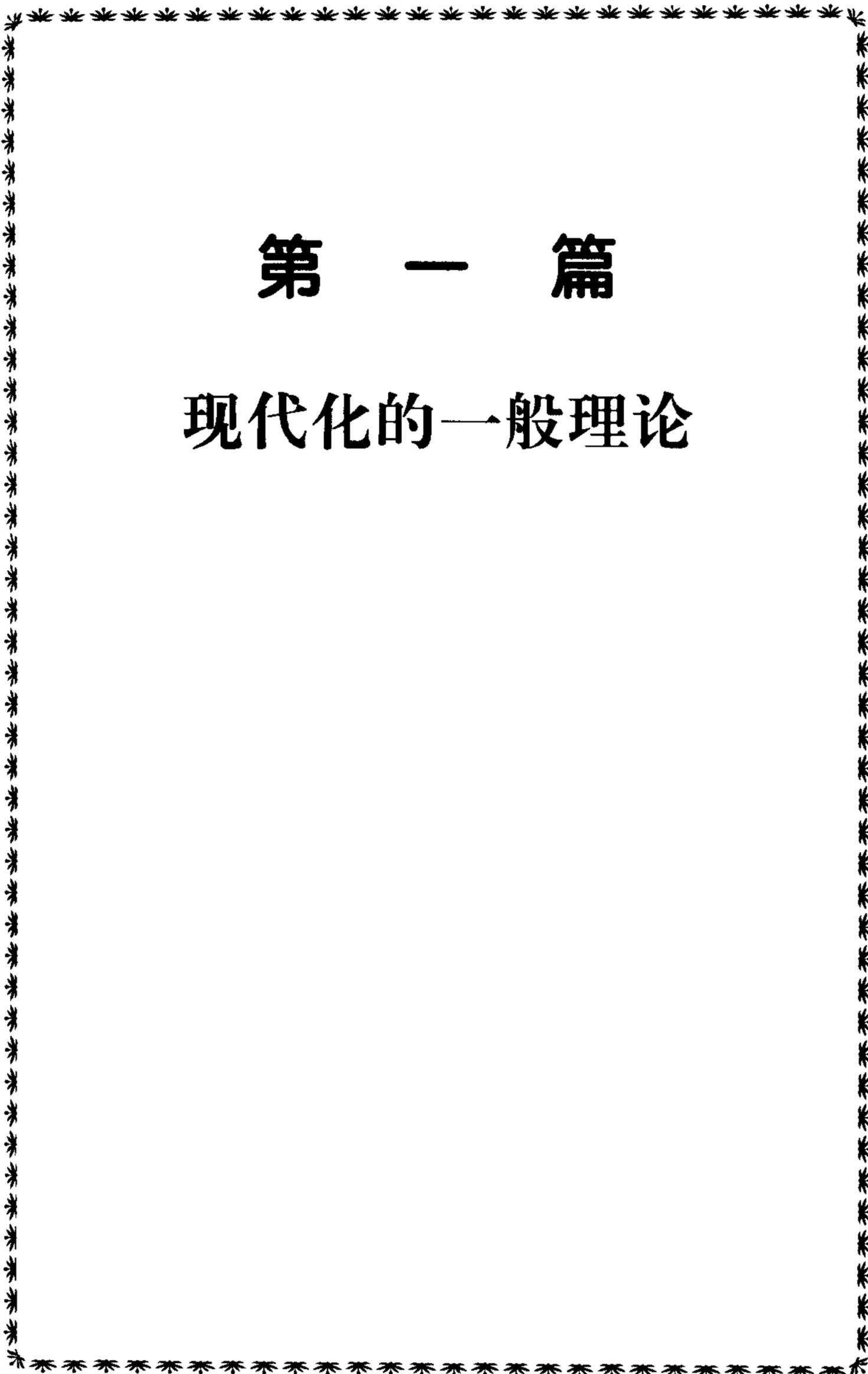
由起飞进入持续增长 .....	W. 罗斯托	421
现代的经济增长:发现和思考 .....	西蒙·库兹涅茨	437
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 .....	K. 沙尔玛	453
政治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 .....	S. 亨廷顿	462
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多变量分析 .....	M. 欧尔森	490
政治发展的阶段 .....	A. 奥甘斯基	513
政治发展的速度和代价 .....	M. 哈尔伯恩	522
民主过渡与受挫中的精英变项 .....	J. 西格利 M. 波顿	533

政治现代化的受挫 .....	S. 艾森斯塔德	554
分析技术变迁之社会影响的主要概念 .....	B.F. 霍塞利兹	568
文化因素与新专门技术的获取之间的相互关系 .....	W.R. 哥尔德夏米德	590
对文化和社会变革的思考 .....	罗纳德·多尔	605
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和人格因素 .....	拉尔夫·林顿	621
工业化、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 .....	R. 本迪克斯	636
商业动机和国家成就 .....	D. 麦克莱兰	646
人格与经济增长 .....	E. 哈根	661
发展的动机 .....	W. 摩尔	678
有关个人现代性的了解与误解 .....	A. 英克尔斯	687
发展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	A. 巴洛齐齐	711
外国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巴巴拉·斯托林斯	743
工业发展战略和类型的解析 .....		
.....	克里斯托弗·埃里森 加里·杰里菲	774

### 第三篇 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现代化的后来者 .....	M. 列维	811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落后 .....	亚历山大·格申科伦	828
几个国家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	沙尔玛	849
法国现代化的道路 .....	伯纳德·E. 布朗	856
16、17 世纪英法两国的精英冲突与国家形成 .....	R. 莱克曼	879
土耳其的经济与政治现代化 .....	P.F. 苏加	913
日本的经济与政治现代化 .....	W.W. 洛克伍德	945
欧洲工业革命是发展中国家效法的模式吗?		

.....	鲁道夫·哈曼	977
发展中地区 and 新兴国家中的科层系统形成问题		
.....	S. 艾森斯塔德	998
作为工业化模式的美国和日本 .....		
.....	费尔南多·法哈恩西尔维尔	1015
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索 .....	萧新煌	1043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帝国主义影响的		
延续还是迎头赶上的实例? .....	乌尔里希·门泽尔	1056
东亚优势的源泉 .....	R. 霍夫汉 K. 卡尔德	1074
传统、变革与现代性——对中国经验的反思		
.....	S. 艾森斯塔德	1087
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之比较 .....	依田熹家	1110
“中日现代化因素之比较”再探讨 .....	M. 列维	1146
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的危机 .....	T. 斯科克波尔	1157
隙缝经济和中国的现代化 .....	何梦笔	1177



# 第 一 篇

## 现代化的一般理论



胡格韦尔特

## 现代化理论的社会学基础<sup>\*</sup>

### 一、进化论与新进化论的观点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主要探讨作为社会增长和社会变迁的独立过程的社会发展。狭义地理解发展,则发展与“进化”是 synonym。在这里不讨论受到人为计划控制的社会增长和社会变迁,从历史上看,这仅仅是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同时,在这一部分中也不分析使一些社会得以发展或使一些社会停滞不前的某些特殊的历史背景。这里首先介绍的是社会进化研究中抽象的和定型的范例。

#### 1. 社会变迁与社会进化的概念

在社会学家所感兴趣的现象中,社会变迁是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因而也就最容易引起各种纯理论的争议。浏览有关社会变迁的定义和研究就会发现,即使在诸如“哪些因素构成了社会变迁的逻辑对象”,“什么是社会变迁的时间维和空间维”这类形式的问题上,学者之间也早已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些人根据社会生活是一种生活因而会产生变迁这样的论点,将社会变迁的主题拓展到社会

---

<sup>\*</sup> 选自胡格韦尔特《发展社会学》一书,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学研究的整个领域；而有些人则只在分析社会组织的更迭时才使用这个词，他们甚至将文化变迁从社会变迁的定义中排除出去；还有一些理论家用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来表示各种社会现象的显著差异，例如，在职业流动、人口密度、入学率以及在社会政治组织中产生的变化（如从君主政体向民主议会制的转变）。另一方面，有些人仅仅用“社会变迁”一词来形容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些关于社会变迁的研究描述了“在地方社区中世代衍化”的详细过程，而另一些研究则勾勒出了整个文明发展的宏观轮廓。不难想象，社会变迁这一主题在形式上的混乱已经导致了对社会变迁实质问题的混淆。这些实质问题包括：

（1）微观变迁与宏观变迁的区别和联系。什么是与大规模变迁相对应的小规模变迁？仅仅是大规模的变迁才是“真正的”社会变迁吗？小规模变迁的总和是否意味着大规模的变迁？

（2）社会变迁的连续性和间断性。人类社会总体结构的大规模变迁是由一系列小规模变迁渐次展开，还是种种危机或突变所导致的结果？

（3）社会变迁的原因。什么是社会变迁的原因？这些小规模变迁或大规模变迁是连续性的还是非连续性的？社会变迁的原因是社会内生的还是外生的？换句话说，其原因是与社会结构本身密切相联的还是外部作用力加之于上的？社会变迁的推动力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产生变化的原因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即社会变迁是由于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变化引起的还是由于新的观念形态产生而引起的？

（4）社会变迁的方向性。无论人们把社会变迁看作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人们总希望了解人类社会的存在时间进程中是否存在着有意义的顺序。历史是否有意义？历史是有始有终的过程还是循着某种规律发展？如果是有规律的，那么规律是什么？是进步还是倒退？抑或是一个循环往复的闭环？

在后面，尤其是第三章，我们将要讨论这些有关社会变迁的棘

手的问题。研究发展和增长比研究社会变迁要简单一些,因为作为独立过程的发展和进化一样,只构成社会变迁的一种形式,我们可以为这种形式给出一个界域狭窄的定义。同时,“发展”和“进化”在对变化的描述中引进了“增长”的含义。“发展”一词把变迁和增长连在一起,此外,它还意味着两者之间有逻辑上的联系。我们将要看到,发展根据变迁来解释增长,反过来,又根据增长来解释变迁。

增长只是一个量的概念,它涉及到扩大、增加,所谓“多了一点”就是增长。它可以是物质客体、生物机体,也可以是社会形态。但是,变迁一词是一个质的概念,它指的是人们称之为变化主体的任何特征上的差异。从“增长”和“变迁”意义上的“发展”与“进化”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可以推论,在某种情况下,社会生活在量上的增长要求社会生活发生质的变迁,以便维持和推动社会生活量上的进一步增长和变迁。

## 2. 新的与旧的社会进化理论

社会生活的发展是社会生活持续增长、变迁的过程,这个观点要追溯到早期社会学和哲学中的进化主义流派。早期的经典理论家如斯宾塞(Spencer)、迪尔凯姆(Durkheim)、滕尼斯(Tonnies)、摩尔根(Morgan)和其他理论家致力于详细阐述进化的主要特征,即某些阶段社会生活量的增长以及社会生活方式质的变迁。

斯宾塞的进化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基本的命题。

(1) 有机体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多样化的过程,很多社会生活方式来源于极少的几个原始的模式。这是进化理论关于量的表述。

(2) 发展的总趋势是:较复杂的结构和组织形式产生于较简单的形式之中。如斯宾塞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进化过程是从无凝聚力的同质变为整合的异质的过程。这一命题承认质变是作为量变的必然伴随物而出现的。

在迪尔凯姆的著作中,我们也能找到如下观点,即随着社会生

活量的增加和扩张,必然产生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这种观点。迪尔凯姆论证道,由于人口的膨胀而导致社会分工(这是量的方面),社会生活质的特征也会变迁:从社会整合的“机械”形式变为社会整合的“有机”形式。与此相类似,滕尼斯也谈到社会关系量的增加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在性质和组织上的变迁,即从社区转变为协作的组织形式。

这些旧的进化模式具有两方面的理论缺陷:第一,进化途径的单一方向性和连续性的假设。所有的人类社会都被假定为在两极的理想类型中循着单独的路线——从简单的“原始”到复杂的“现代”。在摩尔根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对这一定理所做的明确的论述:“由于人类是同一起源,因而他们的经历也基本相同。尽管发展不同,但在所有大陆上发展的渠道是一样的,人类所有部落和民族都发展成极为相似的进步形态。北美印第安部落与我们远在欧洲大陆上在相应条件下生活的祖先的历史和经历或多或少有些近似”。

旧进化模式的第二个理论缺陷是缺少从“原始”到“现代”过程的中间进化阶段。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斯宾塞试图系统地阐述在进化过程中简单的、复合的、二或三重复合的几个主要社会类型的特征,但是早期进化论者的注意力是集中在进化过程最初阶段与最终阶段的比较上。遗憾的是,此种研究方法只不过是在纠缠几代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构造的概念,并将这些概念放进原始人和现代人的固定框架里加以区别,直到现在,这一点继续造成发展问题研究中的混乱。事实上,早期进化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开始没落,但是,人们对这些理论缺陷的认识远比对这一理论意识形态倾向的认识更模糊。因为旧进化理论的思想核心表现了对进步的信任,即认为“人类已经、正在和将要向着一个满足伦理要求的方向迈进”,如莫里斯·金斯伯格(Morris Ginsberg)从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中摘录的一段话中所说的:“理想人的终极发展具有逻辑上的必然”。

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原子弹以及冷酷无情的种族灭

绝,18、19世纪的进化论所阐述的人类进步的乐观思想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

毋庸置疑,旧进化理论的主要概念如特殊性、整合性理论,发展和变迁的理论作为知识的工具是有价值的,但新进化理论很快出现并得到迅速传播。新进化论之所以受到欢迎首先而且主要的是它避开了与进步的“道义”直接有关的争端。新进化论使用“社会”、“文化”代替“人类”、“人性”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进化和进步的逻辑主题。它所强调的不再是人性的进步而是“社会总体适应能力的提高”——如我们在帕森斯(Parsons)的理论中所看到的;以及萨林斯(Sahlins)和塞维斯(Service)所谈到的“文化上全面能力的提高”的理论。他们认为,对人类进步的评价是主观意见,而社会全面的适应能力这一提法能够作为客观事实被人们接受。正如帕森斯观察了现代西方社会之后所说的,现代西方社会比迄今为止的任何社会都具有更高的、普遍的适应能力。接着他又补充道:“社会的适应能力并非人类价值的至高目标……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诸如人性、文化、组织的健全或特殊的社会形态也许具有更高的价值”。

那么,什么是“全面适应能力”的评价标准?新进化论者没有将这个问题限制在具体细节上,但是他们的很多观点都是相似的,因此我们可以统而观之。所有这些观点都强调进化过程的主要结果是社会在制约性的条件下表现出的相对独立性。帕森斯认为进化的优点就是具有广泛适应能力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但这些具有广泛性特征的组织形式,势必会逐渐游离于那种在狭隘的特殊化的与特定物质环境或个体或人格的差异交互作用的条件下的主要变迁的主题之外。与帕森斯属于同一学派的贝拉(Bellah)对此给出了相似的定义:“在任何系统的水平,进化都是增进组织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这些组织是具有很强的适应环境能力的生物有机体、社会系统或任何一个单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组织比起最初的简单形式来更独立于它的环境。”

结构功能主义者与其他新进化论学派没有很大差别,他们把

社会进化当作社会分化的过程加以论述。他们认为社会分化,一方面加强了社会主要结构的独立性(如宗教、政治形态、政府行政管理、司法制度和经济),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社会整合的新方式的出现。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上?是否回到了旧进化论学派关于发展和变迁的两个进化原则上?并非如此。旧进化论学派的主要概念已经被“分化”和“整合”所替代,用以描绘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的日益复杂化以及社会生活组织中相关的变迁。正如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指出的那样,这不仅仅是词语上的替换,而且反映了社会研究中重大的理论进展。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用社会分化的程度和伴随着每一新的分化程度的整合来对社会进化的不同阶段、进化的程度或进化的停滞时期进行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新进化论者与早期进化论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至少他们已经克服了前辈们理论上的一个不足。新进化论现在已经拥有对社会进化不同阶段进行分析的工具。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分化“首先是一个分类的概念,它描述了一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将主要的社会领域诸如宗教、政治体制、政府机构、经济等相互分离,将其隶属于特定的集团和角色,并在同一制度体系的相对特殊和相对独立的框架内组织它们。”由此可以以这些社会分化的状态来代表社会进化的新阶段。但是只谈论分化是不够的。因为,如果分化必然导致“适应的升级”——毕竟进化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应该找到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以便协调那些新分化了的子结构,使这些子结构相互协调和整合或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协调和整合,使每一个分化了的子结构“为履行其主要的功能不断提高适应能力。与先前的功能相比较,其功能的结构更为复杂”。

换句话说,社会分化的每一个新阶段都需要具有新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具有新的共同的信仰和对形势看法一致的整体社会。例如,在社会进化的早期阶段政治权力集中在统治者手中,继而这些结构的分化使社会产生了适应的能力(指按照社会能力动员和

组织更有效的对策,如公众事务,军事目标等等)。政治权力的集中和社会结构的等级制度——与之俱来的是不平等程度的增强——被那些不再享受政治权力而仅仅隶属于其下的人们当做合法的事物所接受。这就是社会分化的每一相继阶段上的整合的意义。因而,正如我们在第二章将要详细描述的那样,早期社会阶段的整合是通过“君权神授”的文化模式来实现的。统治者宣称自己的统治权是从那些在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祖先那里直接承继下来的,从而使自己的权威合法化并使其王室世袭制和家臣制合法化。

在社会进化较后的阶段里经济领域的分化要求完全不同的整合。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分离,生产不再在家族内进行,而是转移到特定的车间、工厂或进行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农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专业化分工的增加——需要将新的规范的综合形式制度化,如交换媒介的普遍应用,即货币与市场相结合,财产和契约的基本原则的建立等等。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新进化论分化和整合的概念比旧进化论特殊化和整合的概念前进了一步,因为这些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对进化过程中各阶段进行分析的工具。

旧进化模式的另一个理论缺陷是关于进化过程的单一方向性和连续性的假说。新进化论者提出了一个相当诱人的变通办法:通过传播产生进化。新进化论者严格区分一般的进化过程和特殊社会的进化。一般的进化过程描述了进化的层次或阶段,被看作是特殊社会进化阶段中全面的、间断的、突破性的进化积累的结果。按照帕森斯的理论,这些突破性的进化或被帕森斯称之为“一般的进化”,可以通过进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向进化程度较低的社会所进行的文化传播过程加以传播。由于这种传播,在那些进化程度较低的社会内部可以产生强大的进化力量,其进化甚至可能超过最先产生进化的特殊社会或社会集团已经达到的阶段。如在社会进化的最初阶段文字是进化的一个重要的普遍特征,因为它促进了宗教与文化的分化并促进了知识阶层的出现,知识阶层具有独立于血缘关系和世袭统治的政治权威之外的特权,因而文字促进了文化

的合法权威。由此将权威从神授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作为与个人权威相对立的行政科层制——它的早期特征是公职权威的制度化——是另一个进化的普遍特征。正如韦伯(weber)论证的一样,行政科层制可以通过更有效的方法组织,诸如水利控制、税收管理、大军团作战以及大规模生产等大规模行动。货币的出现也是进化的另一个普遍特征。作为一般的交换媒介,货币把物质资源从神授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允许它自由流动并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因此,正如经济的分化促使货币成为整合的规范化的工具参与其中一样,货币的参与又促进了经济的分化。

对文化形态传播的认识已经使新进化论者对人类社会一般的进化过程产生了概念化的模式。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一般进化过程是间断性的、呈“之”字形或跳跃式前进的过程,而不是单一的、均匀的、有限的线性发展过程。

帕森斯对新进化论作了最清晰的表述。他把分化的五个连续的阶段和整合区分开来,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许多特殊的社会形态:

- (1) 原始社会(澳大利亚土著居民)
- (2) 古代社会(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
- (3) 历史社会(古代中国、古印度、伊斯兰教国家)
- (4) 温床社会(犹太民族、古希腊)
- (5) 现代社会(美国、苏联、欧洲、日本)

每一阶段的社会都显示了相似程度的社会分化,这些社会有些已经自行进化,有些已经人为地促成了进化,有些则是通过模仿其他社会完成了相类似的整合。可以用进化普遍性来表述社会分化方式的相似性和在特殊社会整合过程中的相似性。帕森斯的理论是,进化的普遍性“对任何组织发展的进一步进化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仅出现一次而是能够在不同条件下的各类运行机制里出现”。

属于较高进化阶段的某种进化的普遍特征被处于低级进化水

平的社会所采纳,产生了特殊社会历史发展的跳跃,它可以跃过一个或更多的阶段。同现代欧洲、古印度或古代中国相比较,中世纪欧洲的采邑制是社会进化的低级阶段,封建时期的欧洲与一些起源于古罗马、古希腊和犹太文明的重要的文化形态(或者说是进化的普遍特征)相结合,直接进化成现代的高级社会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建立在非宗教的、理性的文化基础之上。例如,“超验的神”的概念严格地将教会与政府区分开来;“公民”的概念在罗马法中得到了发展,在希腊城邦中仍保持不变。这两个文化概念的结合为建立正式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反过来,法律制度又为契约和财产的制度化了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是经济分化的必然结果,货币参与经济之中并推动了它的发展。

社会的一般进化被看作是发展的关键阶段的产物,它发生在不同的特殊的进化过程中,而且文化传播贯穿其中。区分社会特殊的进化和一般的进化有助于理解,尽管特殊的社会和文明时起时落,但历史总是向着高级阶段进化。进化本身并不能解释文明、特殊社会的“低落”及进步过程中的“失败”。萨林斯和塞维斯使用了大量篇幅论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们用“文化恒定法则”来解释特殊的文明在推动社会向前进化之后的衰落。“文化”一词在表述中与他们常用的“社会”一词在语义上毫无区别,萨林斯和塞维斯认为社会结构和观念适用于由自然界或由文化提出的人类生存问题。

文化恒定法则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古代中国文明的历史。古代中国的行政科层制是为适应特殊的技术需要——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而产生的组织形式,而这一组织形式成了向更高阶段进化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尤其对经济发展来说更是如此。

最后,从新进化论者关于“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的区别中可以看到一个理论上的优点,这就是它解决了有关社会进化的原因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争议。对于进化模式中的传播问题的认识可以使人们避免用机械决定论解释一般的社会进化过

程,同时又不否认在产生突破性进化的特殊社会中物质条件的重要作用。

## 二、社会的分化、整合与适应的升级

在第一节中我们介绍了新进化主义理论的许多观点和主要特征,并将新进化论与旧进化论流派进行了比较。这一节的目的是分析在新进化论中占统治地位的或曰从新进化论中生成的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基本原理。

新进化主义理论是艾森斯塔德和贝拉1963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有关进化理论的讨论会上首次提出的。新进化主义理论简洁地概括了在很长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西欧人对社会和进化的认识,这些认识又通过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总结而形成了20世纪社会科学家公认的巨大知识遗产。如果想挑帕森斯的毛病,人们可以很有理由地说,他的关于进化的著作,只不过是企图把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改造成为较为规范的分析框架。然而帕森斯所构造的分析框架最大的优点是使人们可以用一种逻辑严谨的、简洁的方法抓住这一理论的关键。

帕森斯的《现代社会系统》是新进化论最优秀的著作之一。由于有人批评他的著作晦涩难懂,因而人们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分析帕森斯进化理论之前,有必要先对他的一般行动理论和社会理论作一简短的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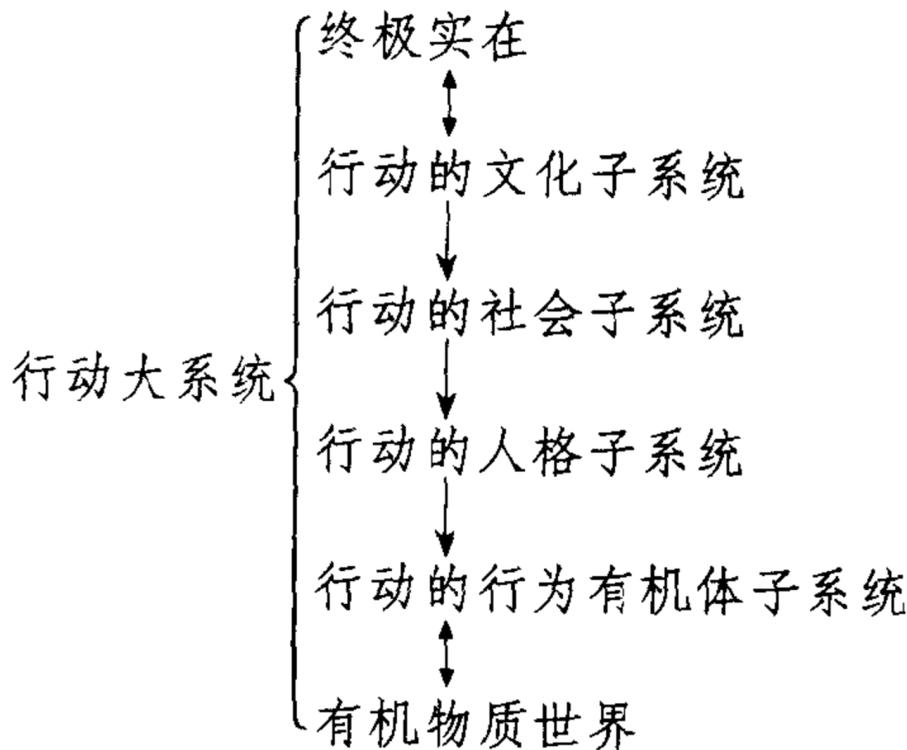
### 1. 帕森斯的行动理论与社会理论

帕森斯认为,人类行动的大系统有四个子系统:行为有机体、人格、社会和文化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相互联系并制约人类的行动。在每一个子系统中,生理需要、心理活动、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分别引导和控制人们的行动。帕森斯行动系统的关键理论是,这些制约人类行动的子系统有序排列,在人类行动的大系统中,位于顶

端的子系统信息流量大,能量较小,它们可以制约那些信息量小能量大的位于底部的子系统。如仅仅包括符号要素——知识、思想、信仰等抽象概念的文化子系统信息流量较大但能量较低,它能够通过信息引导和调整在较低的系统中被丰富的,但却无意识的能量扰乱的行动,尤其是位于控制论等级系统最低层的行为有机体。社会子系统可以将文化子系统的信息转达或翻译成社会成员的人格和行动指令(即社会规范),反过来,社会成员又将社会规范内在化,控制自身的行动。

社会学家最关心的是社会子系统。社会子系统是人类个人相互作用的系统。其他三个人类行动的子系统作为主要的环境因素与社会系统相关联,社会系统分别与每一子系统相连并在系统内部实现自组织。因而,尽管社会系统在控制论序列中不是位于最高等级,但它却是人类行动大系统的中心环节,负有将其他三个子系统整合在自己周围的任务。

除了上面提到的与社会子系统相关的三个主要环境因素之外,从社会子系统地位的角度观察还有两个次级环境因素:终极实在和有机物质世界。它们分别为文化子系统和行为有机体子系统的直接环境因素,并通过文化子系统和行为有机体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相联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下:



社会是社会系统的一个类型。与其他人类相互影响的子系统不同的是,社会子系统具有更高程度的自我满足能力。换句话说,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类型,它具有更高的管理和整合社会中文化子系统、人格子系统和行为有机体子系统的功能,这种能力是其他子系统无法达到的。当社会总体被分割为很多单位时,这些单位通常依靠相同的社会总体中的单位而不是依靠其他社会总体中的单位。

社会系统即社会,它具有四个功能:

(1) 维持模式的功能。这个功能体现了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社会与文化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它负责维持建立在终极实在取向基础上的社会的最高指导原则。

(2) 整合的功能。这一功能的目的是确保社会子系统中各个部分或各个单位与整个社会必要的协调一致,尤其是社会的整体组织和整体运行。

(3) 完成目标的功能。这一功能主要指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社会与人格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它包括确定社会的总体目标和动员社会成员完成这一目标。

(4) 适应的功能。适应的功能是指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社会与行为有机体子系统,并通过行为有机体子系统与有机物质世界的联系。具体来说,就是社会对各种环境条件的普遍适应。

下面我们将讨论每一功能在一般的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发展趋势。帕森斯将社会进化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原始阶段、中间阶段和现代阶段。同时他又进一步细分为五个阶段:原始阶段、原始后期和古代阶段、中间阶段、温床社会和现代社会。帕森斯的分类有助于判断进化过程中的发展突破点。

新进化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是,除了原始社会之外,其他四个进化阶段都各自与某一功能的社会分化相联系。

然而,我们的分析不能停在这一简单结论上。因为在每一功能内部及其从社会总体中的最初分化过程中都会随之产生更进一步

的内部分化,这种内部分化又影响到社会其他功能的分化。所以,在以后的讨论中,我们将把社会特殊功能的分化及其进一步的内部分化区分开来。整合功能是一个重要的但又极为复杂的社会功能,它在社会进化的任何阶段中都处于社会组织的中心地位。这便是帕森斯在将社会进化分为五个阶段之前首先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的原因。这种分类是以整合功能的发展为标准的。如果将社会子系统排列在人类行动大系统的中心位置上,那么,那些具有很强的整合功能的社会团体就是社会子系统的核心,即文字和正规司法制度是一般社会进化的时间分界线。文字标志着最初阶段向中间阶段的转变,正规司法制度标志着从中间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关心的是作为普遍现象的社会进化,而不是特殊的社会进化,更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的进化。应强调的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具体的社会曾经经历了一般社会进化的全部阶段。作为进化最终结果的社会是这样的社会:它们把由历代社会进化和通过文化传播所取得的关键性的发展融合到自己的组织中去。一般的社会进化使“现代”类型社会的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个具有一般道德准则的文化概念——它为正规司法制度和政治形态的独立性奠定了基础——它起源于一些由于某种历史原因从未使自己的文化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这就是帕森斯所说的希腊和犹太民族的“温床”社会。

## 2. 社会的整合功能

社会系统作为人类相互作用的系统比作为社会中个人相互作用的系统具有更深远的理论含义。至少从人需要生存而且常常由生存导出许多问题这一点来讲,社会区别于和独立于它的成员。还有一些抽象的提法,如社会是一个特殊的实体,因而不能把它降低到相互作用的社会成员这个层次上来进行分析,这是帕森斯理论分析框架的又一个核心问题。在帕森斯的模式中,社会可以分为:(1)在个人层次上,社会是个人行动和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2)在

集团层次上,社会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个人行动和相互作用层次上的社会需要在“集团”社会层次上协调和整合。从这个双重命题出发,分化和整合的概念可以在个人或集团层次上对进化的描述中找到解释:在个人层次上的分化标志着“解放”。就个人行动和相互作用来说,由于人们的角色和利益不同而分成不同的集团,随后在社会集团的层次上实现整合。在那些并未随着分化产生整合的地方,出现了分裂,社会分成许多小的子集团,并常常回复到进化的较低水平上。

帕森斯的“作为集团的社会”是指社会团体,即社会的核心结构,它的主要功能是整合。具体来说,它包括了:第一,对社会认同和社会成员标准的界定;第二,对社会成员之间或在较后的进化阶段里对分化了的小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次序标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讲到的,在大系统的等级中,社会子系统位于文化子系统之下,也就是说社会子系统从文化子系统中获得全部的社会准则和规范,其中包括社会成员的标准。简言之,社会认同总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的共同文化上,社会团体规定了谁是“我们”,谁是“他们”,文化子系统则对为什么这样规定加以解释。

#### 原始阶段:先赋的扩散性

社会进化的原始阶段的特征是缺乏分化功能。社会团体仅仅包括一个亲属集团,集团中的成员是依据两个原则中的任何一个决定的: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世系或姻亲。因而社会团体与家族是重合的。

在家族组织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次序标准完全是先赋。这是以性别、年龄、世系和姻亲或这几个内容结合为基础而产生的不同的职责和特权。除了次序标准这种明显的生物原则之外,家族组织产生的另一个基本原则是禁止乱伦和对婚姻习俗的规定。

家族和社会被称为“简单的”和“散漫的”社会,这并不是因为在家族内没有复杂的和细微的分工——实际上,在家族内有相当多的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劳作分工——而是因为并没有独立于家族之

外的功能上的分化,没有功能性的特殊群体,如君主、王权、僧侣阶层、行政官员、法庭和法官以及专门的经济群体。个人并不因为不同的社会关系和不同的角色地位而产生不同的行为,家族社会里个人的全部活动都是在由不变的人群组成的相同的社会关系下产生的。因而,传播功能的逻辑的必然结果是:习俗就是社会规范。个人在家族组织中的归属及其地位决定其在生产活动、宗教活动和消遣等许多具体活动中的行为。人们常常用“唯一可行性”来形容这种家族社会的生活。

迪尔凯姆认为,缺乏社会分化将产生呆滞的社会,这种社会类型是从同一社会的全体成员的共同意识形态中衍化出来的。“作为个人”的社会和“作为集团”的社会几乎是一样的。在原始社会,整合功能是社会所有功能中最重要的功能,其他功能是在社会一致性控制下起作用。宗教礼仪、政治权威、法律,甚至物质资料的供给都被组织起来促进社会一致性。作为整合的工具,家族组织是人类社会走向进步的第一个普遍的进化。如前所述,社会认同是在社会共同的文化、宗教取向上建立起来的,在社会进化这一阶段的宗教体系中反映着原始人的家族组织形式。原始人的宗教就是祖先的神话世界,其中一部分是人,一部分是动物。人物中英雄多于普通人,但英雄又不完全超凡脱俗。神话世界展现了一个古代的现实社会,描绘了许多原始人日常的生活以及在家庭组织中人类具体的社会关系。在宗教活动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祖先的世界并与这一世界融合在一起。在这样一种信仰体系中,不需要划分宗教组织、僧侣或崇拜者。而在宗教和现实世界之间没有很大差别则反映了家族组织内部缺乏分化的功能。

整合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成员、文字、正规的司法制度

在社会进化的后期阶段,随着社会分化的展开,社会发展成为具有许多阶层的多元性社会结构。这一结构由许多处于不同地位、有不同权力和责任的社会集团组成。社会发展对社会分层提出了新的要求:(1)对社会认同的重新定义;(2)确立一套更加复杂的标

准体系来协调不同集团之间的关系。在进化过程中,社会成员的特殊地位被较先进的社会参与和社会成员的普遍标准所代替,社会成员的契约关系从家族到权威最后到公民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两个进化的关键——文字和正规的司法制度——在社会各个阶段中调整和维持社会秩序。乍看起来,把文字当成社会活动专门化的“整合”工具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文字的主要效能的确如此。因为文字使得社会领域中的社会和文化相分离,使文化系统相对独立,并使文化传统得以在社会中占据一定地位并世代相传。因此历代学者始终把文字看作是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区分标准。文字出现以后,人类不再依靠记忆传播文化,而使那些相互隔绝的环境产生交流,调节社会各集团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社会进化的初级阶段,文字是一小部分宗教上层集团和政治权贵的特权,用来帮助这些人统治没有文化的大众。但是在现代社会,文字已经被社会全体成员掌握,促进了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这便是文字被称为获取民主权利的重要工具的原因。

如果说文字是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分界线,那么,正规的法律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的建立便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它使社会的整合功能从政治权威中分化出来。在社会进化的中间阶段,它使经济领域从政治和宗教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变为政治和宗教的隶属物。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不依靠宗教和政治权威解释法律。法律制度是普遍的社会价值,它适用于社会的所有成员而不考虑他们的社会背景。社会只有具备独立的、普遍的和正规的法律制度,“契约”、“财产”等法律才能有效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达到经济领域的全面解放。

### 3. 社会的目标完成功能

完成目标的功能体现了社会团体和社会成员的人格之间的关系。首先,社会需要维持和发展社会成员遵从社会规范和制约活动

方式的动力因素,这一功能在社会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具体。在所有的社会的所有阶段中,社会化的进程都是未完成的,因而需要强化社会控制机制。第二,社会需要组织集体行动去完成集体的目标,包括抵御其他社会的进犯,保卫国土;还需要组织集体行动与自然环境抗衡以求得生存,因此,从社会政治角度看,社会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

政体的结构分化——垂直分化——原始后期阶段和古代社会在普遍的社会进化的历史中,政治功能,包括强制,是打破原始家族组织垄断的主要力量。许多不同的进化原因都可以导致社会向前发展,但重要的一条是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的改变。例如,人口密度,从游牧部落向定居农业转变,重视永久性的居住地。由此要求不同的土地产生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在垂直分化的过程中,较大家族世系之间的不同社会声望与他们的经济状况直接联系起来。

垂直分化过程再发展便和政治功能从社会核心中分化出去的结构分化联系起来:经济条件较优越的集团企图夺得政治上的权力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家族的垄断就分裂成两个统治阶层。帕森斯认为这是社会从先赋的世袭家族组织形式向前进化的第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这一社会分化引起了新的整合,即具有两个统治阶层的新的社会等级制度需要对社会认同重新定义并制定新的社会成员标准。两个统治阶层分裂成为两个独立的家族社会。在社会进化的这一阶段,这种分裂是经常的现象。分裂后的社会需待地缘渐渐取代以血缘和姻缘划分的社会范围之后才能最终稳定下来。新的社会团体的特点是,它的社会成员构成既有家族又有地域这两个因素。同时,新的社会认同又为上层阶级优越地位的合法化奠定了基础。垄断政治和社会的控制权的上层阶级常常宣称自己的权力是从原始神话中的祖先那里沿袭下来的。地位的合法化使上层阶级有权成为祖先和普通人之间沟通的媒介。宗教政治活动从主要的核心中分离出来,成为由上层僧侣集团单独进行的社会

和文化的活动。

上层僧侣集团与祖先的特殊关系使祖先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远比原始社会宗教中这两者的距离大得多。原始宗教中的祖先变成了神,而神与普通人根本不同,比普通人更强有力,统治着世间万物,为所欲为。人们必须崇拜神,向他们贡奉牺牲以获得他们的仁慈和保佑。由此,在神与人之间产生了一条鸿沟,一些人就成了神与人之间的桥梁。

这时,社会已经分化并形成两个统治集团,社会的整合在神权统治的文化形态中渐趋稳定。握有神权的人虽然很少,但却统治着世上芸芸众生。原始后期和社会进化的中间阶段中的主要子类型——古代社会里的家族统治形式中宗教与政治领域分离的程度很高,以至于两者完全区别开来。文字的发展和僧侣阶层将文学工艺化而促进了古代社会宗教与政治的进一步分化。实际上,古代社会具有三个等级制度:国王和王族、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国王的神授权力的僧侣阶层,以及不识字的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 政治形态的进一步分化:科层政体—民主联盟

随着古代社会向中间阶段的转变,政治领域中产生了更进一步的分化,尤其是政治权力与权威的分化。科层政体使公务职权制度化,明确区分“公职的”和个人权势的差异。这是社会政治发展的第二个普遍进化。因为需要许多人共同行使职权,科层组织极大地提高了政体的组织效能,这些人既不必使个人的权势地位合法化,又不能从中谋取利益(当然,这是理想的政体)。因而权力成为谋求集团共同利益的中介因素。科层政体是具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和一定的环境条件的社会必不可少的力量,因为社会要求科层政体动员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文化从政治领域中分化出来是科层机构产生的先决条件。

最后,在现代社会中各个功能领域的社会分化,包括经济、职业领域的分化,建立起了多层的多元性社会系统。在社会所有的子系统中,政策和政治权力都不能够在没有舆论调节的情况下有效

地实施。社会成员可以行使公民权和选举权的民主联盟的出现是最后的普遍进化,也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这意味着政体再一次分化——权力重又还给人民。

#### 4. 社会的维持模式功能

这一社会功能体现了社会系统中社会与文化系统的关系。文化系统的存在是为了解答人类最基本的有关生存意义的问题,诸如:我是谁,出生以前我在哪儿,哪里是我死后的归宿,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幻,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总之,这些都是关于人类现实和终极实在的思考。

为了协调一致地行动,人们对自己、对环境必须有一定的认识,包括行动的正当理由和正确方法。事实上,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曾提出过这类问题。帕森斯认为终极实在是人类行动大系统的外部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物质有机世界是相似的,两者都是人类行动的外部环境因素。但是,物质有机世界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条件,而对终极实在的取向则是人类社会生活高度组织化的产物,人类在物质有机世界的约束条件中的自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终极实在的重新取向。

尽管社会历史各阶段都提出过近似的有关生存意义的问题,但答案却各不相同,这进一步说明了人类历史上文化系统的多样性。每一历史时期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终极实在的追求都确立了那个社会的基本形态和人们在物质有机世界中行动的准则。

帕森斯的文化的概念混淆了社会内部和社会外部的文化系统。当然,细想一下,这个双重含义的概念却也不无道理。因为文化系统将许多社会组成了一个整体,为模式的标准化秩序找寻合理依据并为社会成员的行为制定统一规范。如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自然科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都是超越社会界限的文化系统。人们可以认同那些不再与现实社会相整合的文化系统,比如

早已没落的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也可以认同那些仅仅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某些观念、社会中某些人格以及某些子集团等这样一些不能形成新的社会秩序的文化系统。但是，只有当社会系统中的文化系统制度化时，我们才可以称之为社会内部的文化系统。

社会把对终极实在的信念和认识变为文化价值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指导人们在物质有机世界中的行为，这便是帕森斯把文化系统置于人类行动大系统的控制论等级的最高位置上的主要原因，也是他的进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提醒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系统上，以便找出普遍的社会进化的诱因。

在普遍的文化进化中，从原始社会的习俗法规发展到现代社会抽象的、高度概括的、引导社会行为、整合多元性社会秩序的价值形态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例如，“平等”、“自由”、“博爱”的价值观念；美国宪法上关于人人都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宣言等等。一位美国哲学家曾说：“宪法是为持有不同的基本观点的人们制定的。”正是由于在纷繁复杂的现代化社会中人们之间存在着差异，才使得那些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规范高度概括化。

文化系统的价值观念是从对终极实在的信仰和认识得来的，所以，这些概括化的价值观念也要体现出对终极实在的基本思考。正如贝拉所说，对文化进化和对宗教的反思包括了终极实在与人类现实的距离日益增大这一概念。

通过对原始宗教的考察可以看到，终极实在是人神合一的“神话世界”，神话世界也即原始人的理想和蓝图。在原始宗教中，人类世界和神话世界（原始人的终极实在）之间无清晰的界限，而仅有的一点差异也消逝在宗教活动中了。在进化的这一阶段上，宗教活动并不是僧侣阶层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参与的共同活动。

随着社会分化的第一个过程——独立的政治、宗教阶层的出现，神话世界变成了神所独踞的超自然世界。神不再是人的样板，

而是能够控制人的神奇的力量。此外,神也多了起来,几乎有多少宗教集团就有多少神。神对人的控制是专横的、荒诞的和难以预料的,因而需要特殊的沟通渠道——祭祀和礼拜。僧侣阶层声称自己是可以沟通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在这些古代宗教里,人与超自然的世界之间有明显的联系,人类社会被看作是神主宰的宇宙的一部分,神制定的秩序即是传统的社会秩序,社会形态在各个方面受到教会法令的强制性的约束。

#### 文化系统的结构分化——中后期阶段的历史文明

历史上的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和犹太教的出现是终极实在的和人类经验现实的结合点。这些宗教的共同特点是都信仰超越人类社会的超自然世界。

“超验的上帝”,“超自然的世界”的概念是普遍的价值形态的基础。从这些宗教的教义看,根本不存在这个人是谁,属于什么种族、哪一个社会集团、哪一个家族,是否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等问题,因为在上帝眼里人都是平等的,原则上都可以得到拯救。现世和彼世的二元主义具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发现彼世对现世有无限的统治权力,必须贬低现实世界及其事物。这些宗教重精神而抑物质;第二,人人平等的观念为宗教拯救和惩罚提供了理论前提,在社会领域中由此产生了双重的结果:一方面产生了独立于政治权贵之外的宗教权贵,这是进化过程中向前迈出的一步;另一方面抑制了物质领域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因为在任何社会里社会结构都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遁世”的观念占据统治地位,阻碍了商业、贸易、手工业的发展,在这些行业工作的人被认为是第二等级的公民,很少有人能摆脱这一社会地位,也很少有人愿意加入这一阶层。

终极实在和人类现实之间的冲突也表现在古代中国儒教、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辨哲学中。当然,这些文明社会之间有差异,差异的大小取决于“遁世”和“平等”在社会秩序中制度化的程度。印度的“达摩”法规中遁世的制度化程度最高,而在罗马法典的“公

民”概念中平等的制度化程度最高。除了希腊和犹太民族以外，帕森斯将古中国、古印度、古罗马和伊斯兰国家归为社会进化的中后期阶段。因为在这四个社会中终极实在和人类现实的尖锐冲突导致了社会等级制度的两极分化。

古代社会的上层阶级不再宣称自己的地位是神授的和先天赋予的，相反却依照宗教或文化规定社会地位和权威。

对终极真理和终极实在的认识以及据此产生的活动属于“上等人”阶级的特权。古代中国的文化合法化是最突出的例证。古代中国科举制度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社会地位文化决定论比社会等级制度向前进化了一步。因为，通过制定一致的社会成就评价标准而拓宽了进入上层社会的途径，并使合法的世袭权势与权力执行相分离。这种由竞争获取文职和官位的制度极为适合中国的理性科层体制，原因主要是理性管理的原则需要专门知识；专家雇佣制要求尽可能广泛的社会人选。当然，古代中国社会等级制度并未成功地产生新的分化因素，即并未促进城市贸易和工厂制造业的出现。由于社会各阶层都未得到充分的公民权利，这一体制阻碍了有志之士实现其抱负和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人们被剥夺了合法的权利之后就成了统治者剥削和敲诈的对象。同时由于这一制度的普遍化，每一个通过受教育谋取文职和官职的人都会因此而放弃对商业和工业的志向及兴趣。上层社会集团的地位是由文化决定的，因而从整个制度看，根本不允许经济领域大范围的分化和发展。这种文化稳定性不仅阻碍了社会向不同方向的发展，而且最终将导致发展停滞和社会腐化，因为不论经济如何增长都担负不起重视精神生活的官僚在教育上的大笔开支。古代中国历史的后期生成了大批官僚，这些人只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是平民和掌权者之间的过渡性集团。一旦在政治上遇到挫折，他们又会成为反叛的根源。同样，这一体制中产生的大批薪俸较低的雇佣官僚，又加速了制度的腐败。正是由于这些寄生虫的生活远远高于普通农民才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经常发生。

### 司法制度的结构分化——犹太和古希腊的温床社会

按照文化发展顺序,由于社会内部价值观念较为接近而把古希腊和犹太民族一并称为温床社会。这两个社会里公民一体化的概念包容了所有阶层和社会集团,制约人们的行为的道德标准完全独立于任何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使得在法律面前人人拥有平等的公民权和其他基本权利的正规的、独立的司法制度发展起来。希腊和罗马文明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其他历史文明的制约因素一样,相对平等的社区、公民团体等概念仅仅体现在上层特权阶级中,而大多数人如奴隶、侨民、不同种族、“野蛮人”等被剥夺了作为社会成员的所有权利。犹太文明则更前进了一步:社会成员应该自觉地遵从上帝的意愿,也就是自觉地服从社会统一的道德标准。因此,在社会进化历史的初期阶段中社会成员的义务与个人意愿是一致的。由于战争和国民失散等特殊的历史原因,犹太人未能实现其宗教教义,但是随着基督教风靡西欧,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协助完成了对终极实在的重新取向。

### 文化系统的进一步发展——世俗化

正是由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才成为标准化的社会观念。虽然宗教改革仍旧保留了超验的上帝和现世与彼世冲突等概念,但却摒弃了作为洗涤罪孽的条件的遁世思想。相反,为上帝服务则成为拯救灵魂的方法。宗教改革运动强调把信仰当作衡量个人品质的标准,而不再以宗教仪式或参与宗教活动判断人们虔诚与否。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灵魂拯救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而是切切实实的事情。工匠、屠夫、商人、农民以及僧侣、学者都能以他们的工作表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西欧,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各行各业的人都合法地成为第一等级的公民,这意味着占据唯一受人尊敬的位置的宗教功能逐渐减弱。宗教改革运动还重视为上帝进行工作的各种活动,从而从根本上促进了社会“适应”功能的分化和发展。

### 5. 社会的适应功能

这一功能体现了作为社会系统的社会与行为有机体系统并通过行为有机体系统与物质有机世界的联系。

对于社会的人来说,人类生存的地理位置、生理特性和生物需求等构成的物质有机世界是最直接最实际的环境因素。人们不得不去适应环境以求得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物质有机世界组成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

对于人类生活来说,外部环境仅仅是条件而非决定因素。人的生活需求和生理特性仅仅是限制行为反应范围的有机的基础,并不能决定人的行为的实际内容,实际上,行为的实际内容取决于人的文化和人的社会组织。

不可否认,人类具有某些与生俱来的人类共通的需要,如对食物、住所、异性、感情和避免痛苦等的需要。但是,这些需要不能决定人的行为反应而只能刺激行为并规定行为的一般等级的初始倾向。例如,不同文化的社会对食物的理解不同。在与我们文化不同的社会里人们吃的东西我们并不认为是食物,这些所谓的食物并不能使我们产生饥饿感也不能使我们对之垂涎。反过来,饮食习惯又影响到人的生理机制尤其是消化系统。社会不仅形成了人的生物需要,而且还通过生物器官改变人的机体特征,欧洲人和近些年日本人平均摄取的卡路里增加很多。同时,医疗条件的改善普遍增强了人们的身体素质,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行为有机体构成了社会的“环境”。而当社会成员的行为有机体具有较多的满足需求的方法而资源有限时,就产生了在社会水平上的整合和管理的问题。这恰恰是现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与“期望值过高”的问题是相关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与欧洲人有长达几个世纪的接触,在独立之后便竭力追求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方式,其结果是导致了这些国家自给自足经济的全面崩溃。

对人类有机体基础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居住的地理位置只是

人类生存的一个条件而不是决定因素。社会地理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特殊的人类活动,反过来产生了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组织的独特形式。人类学家研究了早期人类社会后发现,一个社会居住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最初的兴趣进而影响到它的词汇特点和社会系统的形式。爱斯基摩人用了7个不同的词形容“雪”;而在沙漠地带,如北非的柏柏尔人对骆驼有不下40种的表达方式。此外,人类的社会—文化系统也能够重新改变人的生存环境,削弱作为人类生存条件的环境因素的重要意义。农业的发展使人类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于植物自然生长,定居在相对固定的环境中,而工业化又使人类可以在自然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到达很远的地方。

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和改造的功能是由社会和文化组织起来的人类的一种能力,我们称之为技术。在帕森斯的分析中,技术发展包括了人类从原始狩猎和捕鱼的工具到现代电子计算机以及各种技能和工艺的发展。所有这些技术都控制和改变了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新进化论依据社会全面适应能力的提高判断普遍的社会进化。相对外部环境来说,社会全面适应能力的提高主要指技术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人类对外部环境的依赖越来越小。发达社会较之不发达社会对外部环境有更多的自治能力,技术水平较高的社会可以改造环境而技术落后的社会则要受到环境的制约。因此,爱斯基摩人的社会和文化与北极的恶劣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而荷兰社会的发展却不受靠海的低地地理位置的影响。

不仅帕森斯这样认为,而且几乎所有的社会学的理论模式都把技术列为社会—文化系统的最低层次,社会依靠技术摆脱物质有机世界对人的束缚。“技术”一词只是指社会的适应功能中手段和行为的方式,而社会的适应功能则包含了资源配置、工作角色的分派、生产活动的协调以及消费品分配等概念,习惯上又把这些统称为经济。

在普遍的社会进化过程中,社会的适应功能与其他三个社会功能——整合功能、完成目标的功能和维持模式的功能一样,也可

以分化成两个独立的子系统,即经济和技术子系统。

社会进化的历史表明,经济和技术的完全分离仅仅发生在社会的整合、完成目标和维持模式的功能达到相对独立之后——三者既相互独立、又独立于社会核心之外。换句话说,政治、文化和法律的发展先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新进化论认为,政治、文化和法律机构的先行发展不仅仅从历史上看是前提条件,而且从逻辑上看也是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观点对于现代化理论来说有着深远的意义。

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功能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技术进步是现代社会全面适应能力的最重要的标志,因而,对技术进步应单独加以分析。

#### 科学和技术的结构分化——社会发展的现代阶段

技术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人们却常常把现代社会称为技术社会。首先因为现代社会复杂和先进的技术提高了社会的适应能力,其次因为现代社会的技术在社会中占据了首要位置,并且相对独立于社会的其他领域。

产生控制和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愿望并提高实现这一愿望的能力是现代技术的突出特点。从现代社会的初期到目前,人类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近乎直线上升,人的期望寿命、信息传播的速度、卡路里的平均摄入量、人口规模,甚至人类残杀的能力都奇迹般地提高了。

可以把这些能力的提高看成是人类社会技术水平快速增长的结果。因为,首先技术水平是通过发明和发明的传播而增长;其次,每一个发明都是两个或更多的现存的技术要素相结合的结果,即现存的技术要素越多,新发明出现的可能性则越大,同时,新发明出现的快慢也影响到技术增长的速度。

有人荒谬地认为中世纪缺乏尖端技术、忽视中世纪人尽量缩短劳动时间而用大量时间从事宗教活动的愿望刺激了劳动工具的发展这一事实,同样,忽视古代中国人对现代科学和技术所作的巨

大贡献也是荒谬的。实际上,使欧洲人长期引为骄傲的许多发明现在都已经被证实是古代中国人发明的,只不过在12到13世纪被欧洲商人传到了欧洲。例如,火药、纸、印刷术、马轭、独轮车、指南针、机械钟、水车和水力磨以及一些蒸汽机的雏形等。

不少历史学家花费大量精力研究中国人应用自然知识的能力,他们认为上溯到17世纪,欧洲辉煌而短暂的技术上升趋势只不过是对全人类知识的综合,只不过表明现代社会的开端。

现代科学的特点是把对自然的假设数学化,伽利略(Galileo)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现代社会的起点常常被认为是1600年(伽利略生活在1564—1642年之间)。按照帕森斯的行动理论,伽利略确定了“终极实在”的基本行为取向和全新的社会文化体系。因为,伽利略的科学观是建立在把宇宙作为人的计算能力与被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宇宙的概念上。物理原理被当作研究行星运行、地球变化和昆虫生存的法则。宇宙的概念的形成表明科学的世界观改变了从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对世界的认识——宇宙的结构是不变的,性质是唯一的;在君权神授的社会制度下,所有的人都有自己固定的社会地位;物质与精神是合一的,物质世界可以由精神意志来安排;因而教会的权势凌驾于科学和知识之上。相反,随着伽利略科学的世界观的深入产生了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中的自然现象之间的分化,一个世纪以后,这一分化在牛顿的工作中得到了最终完成。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分化常常被称为世俗化过程,世俗化体现在社会结构中便是教会与国家的完全分离。从那时起,物质世界被当作从属于客观规律的、能够通过逻辑推论和仔细观察而了解的世界。

现代科学的发展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发明创造成为独立的、制度化的、可以依据其内部规律进行活动的过程。发明不再是碰巧或凭运气能够成功的事情,而是通过有目的的实验来检验发明者对自然事物所作的逻辑假设的一项复杂的工作。学者和工匠合二为一,以便正确认识自然规律,这样,技术变成了科学研究的工具。将

物质与精神相区别的新的科学观表明科学既不依赖于教会的权势也不依赖于任何人的权势。在科学研究的最初阶段中技术是重要的,因为技术可以帮助人们进行系统的观察和实验,随后技术便成了进行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分支力量。视觉仪器如望远镜、显微镜、各种镜片,以及钟摆都是应科学实验的要求而产生的。同时,科学和技术成为特殊的社会集团所从事的专门活动,这一集团中的人——科学家们——彼此有独立的交流方式、特殊的信条、独特的社会化的过程以及高于个人原则之上的独特的伦理标准。

#### 经济结构的分化——社会发展的现代阶段

如同技术一样,经济也是向着功能不断分化、作用日益独立的方向发展,在功能实现和社会整体进化过程中的适应的升级是这一分化的结果。帕森斯说,这是因为经济的分化导致了更有效的经营管理,同时也增强了资源、人口、物质和技术的流动。

社会进化的早期阶段,经济活动被限制在家族组织的社会基质中,仅仅用一些范围很小的、先赋的社会义务和契约就可以解放劳动生产力。原始的和传统的农社中的生产活动和产品交换的方式由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所决定。人类学家雷蒙德(Raymond)曾经指出原始经济的原则包括了“人们在社会系统中应尽的义务以及人们所拥有的权利”。不仅自然资源对原始社会的发展有约束力,而且宗教、社会和政治的取向也决定了如何使用土地和在土地上种植什么。一些地区被指定专门种植供祭祀用的庄稼,而某些庄稼被认为是当然的祭品。其结果必然是,生产和分配不是纯经济的生产活动,经济服务于社会整合、宗教和政治的目的。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描绘了这一阶段物品交换方式的总体特征:“这一活动是法律、经济、宗教、艺术和政治的综合。说它具有法律特征是因为每个个人和集团都拥有自己的权利,同时又是有组织的、有共同的道德观念的;政治特征是指这些活动协调了各阶级与各个部落、家族的利益;宗教特征意味着这一活动自始至终充满宗教气息;这些活动还使用了价值、利益、奢侈、财富、积累和消费等观念;

此外,这一切都具有浓厚的艺术色彩。”

物品交换活动的如上特征表明经济并未从社会或其他功能中分化出来,这便是社会学家在研究原始社会的经济现象时要结合社会总体来考察,而研究现代社会复杂的经济现象则用相对单一的思路的原因。

在其后的社会进化阶段中,尽管经济从君权神授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仍然依附于政治领域。经济管理要在政体的制约下展开。古代文明的宗教—政治体制和历史文明的官僚政府中,资源的管理和流动不可避免地反映并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这些特点使官僚政府既呆滞又不稳定。官僚政府抑制了经济以及由经济带来的政治上的活跃,窒息了私人经济,任何官僚政府都毫无例外地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毫不奇怪,马克斯·韦伯以及他的门徒帕森斯把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看作是历史的倒退,并经常用社会主义社会与古罗马和古埃及的呆滞的奴隶制和科层体制相比较。

依据帕森斯的观点,社会只有具备了自治的原则,经济才能从社会、宗教和政治领域中分化出去。自治的原则指的是交换的普遍媒介——货币与市场相结合,其最大的优点是使资源最有效地进行流动和受到管理;使每一类型的商品和劳务都可以依照其他类型的商品和劳务表示。

当然,在社会进化的早期阶段,货币和市场就已经得到发展。货币最早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货币的两个功能——支付和交换的功能几乎在进化的中间阶段的每一个社会里都可以看到。但是,在这两个阶段中市场都不很发达。现代社会与以前的社会相比无论是货币还是市场都显示出范围和程度两方面的巨大不同:货币作为物质交换的媒介,不仅用于商品而且用于劳动力的交换甚至用于货币自身的交换。欧洲直到中世纪才形成完整的货币制度,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才发展起来。

随着货币和市场的普遍发展,所有的资源——劳动力、土地、技能、工艺以及货币自身都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流动到

能够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地方。这里避开了社会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的价值取向,因为货币对于社会和文化来说只不过是必要的物质表达形式。经济规律在于最大限度地扩大利润,这一原则在现代社会初期就已经成为普遍的、占主导地位的人类行为动机。韦伯和帕森斯都认为这个规律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剥夺。货币和市场的扩张是资本主义成为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必要条件之一,而社会的法律制度确认货币为所有产品进行交换的一般媒介,同时使私有财产和契约制度化。韦伯把货币称为私有财产的根源,因为货币可以分配经济资源,所有的物质生产资料——工具、机器、原料和土地都成了个人或经济集团随意处置的财产。这同样适用于劳动力,个人只有在法律上是自由的才能够任意安排自己的工作。资本主义协调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社会上存在着法律上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而在经济上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人。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自由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自愿”结合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分化:生产活动摆脱了以家庭为劳动单位的生产格局,其结果是,在家庭劳动中规定生产角色的身份责任被自由的代理人自愿协商的契约责任所代替。

私有财产和契约的新结合以及独立、正规的司法体制的制度化,必然要求对社会团体重新定义,法律上包含所有成年人在内的公民这一概念就是新的定义。

文化系统不仅能够使社会秩序合法化,而且还能指导个人在自然环境中的行动。经济规律——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不能成为决定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它只不过是广义文化价值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和技术也是如此。

我们已经看到,宗教改革运动确立了终极实在和人类现实的两重概念,摒弃了遁世和宗教礼仪作为灵魂拯救的方法。宗教改革运动以及通过这一运动影响到现代社会的民族精神的关键是消除了通过某种中介拯救灵魂这一概念。新教从根本上反对教会通过对上帝和未来的途径的垄断并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取

消了只能在教堂和寺院进行宗教活动的戒律。新教还宣称,在日常生活的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可以依照上帝的旨意工作并为上帝服务,只有艰苦地工作才能增加“天国的荣耀”,而这正是人的生存的意义。消费时间是最大的罪过。艰苦劳动不仅是禁欲的办法也是防止邪念的有效手段。因此,新教的箴言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穷人也应该获取财富,那些不劳动仅仅依靠自己的财产生活的人是有罪的。同时,新教还传播宿命观点:上帝为每一个人安排了他的职业和他的社会地位,他应该艰苦地工作履行自己的职责;上帝不仅为人们安排了生活也安排了未来的命运。

加尔文教的两个主要原则是禁欲和宿命:人们应该为上帝工作,应该禁欲并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人永远不能获得灵魂拯救,因为人的命运是前世注定的。这一教义令人难以忍受,所以作为规定基督徒行为的原则难以实行。加尔文的信徒们在教义里又加进了第三个原则:尽管人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至少能够了解自己的命运,即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摆脱下地狱的厄运。上帝施恩于某人是要根据他对上帝信仰的程度,反过来说,信仰是可见的、有形的禁欲主义。尽管追求财富本身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作为劳动果实的财富则被认为是上帝的恩典。

新教的原则通过提倡资本积累而间接地服务于经济的发展。因为,除了坚持把财富用到事业投资上去,别的方法都不能使新教徒获得更多财富。他既不能享受劳动果实,也不能将钱财浪费在“罪恶的情欲”上,更不能把财富分给穷人和游手好闲的人,因为穷人和懒汉是上帝惩罚入地狱的对象。由于禁欲主义强制地实行节俭使消费受到限制,因而增加了资本积累,并通过资本的生产性投资使财富不断增多。

经济技术的分化:工业化——现代阶段的适应升级

在这里,我们把技术当作社会适应性功能的行为和手段,把经济当作技术的组织环境,为了清楚地进行分析,因而分别考察它们各自的分化和发展的过程。

18世纪以来,经济、技术的分化过程和发展过程开始汇聚到一点产生了经济组织和生产体系。社会进化中现代阶段的适应升级就是工业化。因为在工业化社会里科学和技术应用于经济,即为降低每一产品的单位成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服务。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非人力的生产动力(如蒸汽机)的应用成为可能,而这一应用又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相融合的结果。难怪一些学者依据动力资源在生产中应用的程度来定义“现代化”,至少它是工业化的最大特点。经济分化还导出了工业化的其他特征:劳动力的专业分工;生产三要素——劳动力、原料和生产工具在工厂的特殊生产环境下而非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相结合。工业化是研究和应用科学知识而使生产稳步发展的过程,它依赖于劳动力分工和专业化,依赖于将物理的、化学的、动力传动的以及知识的成果应用于生产。这种把经济组织起来的方法主要目的是:降低产品和劳务的成本,增加单位工作时间内的产量。

广义的工业化也应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的商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内容有:运用科学技术保持土壤肥力,消灭虫害,采用高产良种和在生产中使用机械动力。农业商业化意味着以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为目的的专门化的市场机制作用其中。

适应的升级是作为经济和技术分化综合后果的工业化的产物,即单位工作时间内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提高有着显著的物质效益,因而最能引起不发达国家的兴趣。这些国家关注的是:增加人均收入;控制人口规模;加大投资比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既不采用与社会、文化、政治相联系的西方的经济组织方法,又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力。

### 三、新进化论、结构功能主义与现代化理论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新进化论的特点之一是缺乏对社

社会变迁的详细解释。新进化论仅只描述社会进化的不同阶段上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并对此加以分类。而且,除了一个含糊不清的“文化传播”的概念以外,没有对社会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实际的历史过程加以分析,也没有对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变迁以及如何变迁的分析。新进化论几乎从未涉及过产生社会特殊的结构特征的历史条件。

帕森斯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认为这并不是理论上的缺陷,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学知识还不能够对社会进行系统动态分析。他说:“对结构的分析应该超过对社会进化过程和社会变迁的分析。人们不需要因构造进化理论而去分析社会变迁的主要过程。事实上,这些都已经是在生物学中得到了阐述,而生物学对结构和形态的研究包括解剖学在内都是进化论的基础。”换句话说来解释就是,如果把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社会和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社会与社会普遍的适应能力这一进化标准并列起来进行分析,就会产生结构类型的顺序,如果把这些结构类型之间的差异综合起来,就可以系统地阐述进化一词的概念。

姑且不论这一理论方法本身如何,新进化论者是用历史学的理论来分析社会变迁。他们用特殊的社会形态——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代中国、古印度、古罗马、古希腊、犹太民族和宗教改革运动作为社会进化各个阶段的例证,并据此得出一些并未被历史学研究所证实的结论来。帕森斯的新进化论不过是把欧洲的传统知识融进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模式重新铸造出来的理论。在他的有关结构功能主义的著作中对社会结构特征的研究超过了对社会变迁的研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同样很少分析社会变迁。

然而,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现代化理论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了。现代化理论是关于现代发展中国家社会变迁的最流行、最丰富的理论。恰恰是这样一个极少研究社会变迁的结构功能主义却产生出重点研究社会变迁的理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至少有以下三个因素与这一矛盾状况有关:(1)结

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前提；(2)文化传播的观念；(3)持种族中心主义观点的西方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国的专家、世界银行组织的顾问以及所有这类西方学者的主要工作都是为不发达国家如何迈向发达提出建议。

### 1. 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前提

作为规范的社会学理论，结构功能主义具有四个基本理论前提：(1)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包括了相互依存的各个部分；(2)系统总体的出现早于各部分，只有把各个组成部分纳入社会大系统才能正确认识这些单一部分——文化信仰、法律制度、家庭组织的社会形式、政体以及经济技术组织；(3)部分具有保持整体平衡的功能。社会各部分与整体系统之间的联系是功能上的联系；(4)第四点是最重要的，也是由第一点和第三点的逻辑衍生的。社会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功能上的依存，各部分互为基础、相互一致、和谐共存、为维持整体服务。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这种功能一致性的原则，即被人类学派称之为“功能相关性”的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对原因和结果的研究降到第二位。例如，在现代社会里，一致性原则表现为：经济领域中完整的货币制度与私有财产、契约的法律制度是一致的；工业的职业组成与核心家庭形式的普遍化是一致的；工业的职业组成对相对开放的社会结构——其中包括较高程度的社会流动性是一致的；职业专门化和教育正规化与随之而来的较高的成人识字率相一致；主要制度领域的分化和普遍的职业专门化与竞争的多重性结构相一致；而竞争的多重性结构又与公民拥有广泛的公民权利、多党制的民主政体是一致的。所有这些结构特征又是和谐共存的。

在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中，有关社会发展意义的研究占据了重要地位，这是因为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现代化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结构一致性原则的应用取代了对

社会变迁的动态分析时,对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就更少了。现代化理论并不重点研究普遍的社会变迁,而是主要研究不发达国家变迁和发展的过程,或者说,现代化理论从目的上关心社会变迁。不发达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上,看起来,正是由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才显示出发达国家高度的社会适应能力。不论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如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所有这些国家毫无例外地面对经济发展这样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此外,现代化理论通过结构一致性的原则趋向于分析那些与经济技术相一致、和谐共存的结构特征。

在这一章里,主要对现代化理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这一研究领域中的贡献作一全面的介绍。不论进行综合还是进行分析,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或者进行策略性的调整时,现代化理论都明确地或暗含地采用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前提。如观察不发达的社会在西方技术制度的引进、冲击下产生的社会变迁;基于结构一致性的原则预测社会变迁的方向。

当然这些方法之间也存在差异,最大的差异是在研究的重点、研究的领域、理论推测与实际研究相结合的程度,以及对现代化过程产生的后果上都存在认识上的差异。

一些理论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现代化过程的结构断裂上,比如,主要研究在旧的社会秩序已经瓦解而新的“和谐共存”的社会秩序逐渐形成的过渡阶段上产生的问题。另外一些理论家鼓吹种族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政策,如用西方经济技术传播的同时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改造的方法促进社会发展。这恰好是联合国机构和世界银行组织专家们的研究领域。他们的任务不仅是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提出建设性意见,同时要保证其机构所进行的“援助”获取最大的经济成果。这些学者大多是西方经济学家,他们致力于把“资本构成”、“劳动力”、“市场机制”等概念移植到不发达社会中去。他们意识到经济必须与社会、文化制度一致起来,经济增长首先需要改组作为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的社会、文化制度——

即社会文化制度西方化。还有一些专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精英分子身上,组织培训经济管理人才,培养他们适于现代经济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动机。一些理论家认为现代性是极为有益的事情,是人类进化的最高成就。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十分幸运地避免走西方社会所经历的长期的和痛苦的发展道路。但是,不论有什么差异,所有的现代化理论都坚信:由于西方经济、技术的传播和社会结构趋于一致性,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发达国家现在已有的一切社会特征。

## 2. 行为模式变项

现代化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受到的西方经济、技术的传播当作不可避免的全面变革,即发展中国家的西方化。从方法论角度看,持这种观点的人假设在经济和技术的综合体中还包含了西方发达社会的其他非经济的但一致的结构因素。尽管几代人类学家都持这种观点,但直到帕森斯提出模式变项的理论,这一假设才从方法论上得到论证。

帕森斯在写作新进化著作以前就已经在他的结构功能理论中提出了“模式变项”的概念。模式变项是指任一社会内行动者角色期望中价值取向的选择模式,也就是把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征贯穿于个人行动者的角色期望之中。按照这种观点,模式变项是社会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社会的结构特征则反映在社会中个人行动者的角色关系上。

帕森斯提出了五对相互对应的价值取向,它们的不同组合反映了社会中角色关系的性质,由此反映了社会结构的特征。角色关系中的五对对应的价值取向是:

(1) 行动动机。帕森斯区分了角色期望的两种模式。一种是角色实现期望情感的酬赏,或情感的满足;另一种是角色的实现期望非情感的酬赏。例如,孩子服从母亲,他们所期望的酬赏是赞赏地点点头、拥抱或亲吻,这些都是情感的酬赏;但是,人们工作得到的

工资则是非情感的酬赏。

(2) 选择取向。角色的责任是否允许角色在其实现的过程中谋求个人的利益,或者说,除了团体的利益以外是否允许掺杂个人的利益。这种选择被称为自我取向和团体取向。如,公务人员的个人利益在角色实现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即为角色的团体取向;企业家则在角色实现过程中合法地谋求个人利益。

(3) 价值标准。这是对角色职责的直接定义。当按照普遍的、规范的准则定义角色时,便超越了特殊的角色关系的界限,因而可以称之为角色职责的普遍定义。而当角色职责的定义来自对特殊社会客体的估价时,称之为角色职责的特殊定义。例如,现代社会经济机构的角色职责来自普遍的道德准则——“恪守合同”、“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先来者优先服务”,“人尽其能”等,这些就是角色职责的普遍定义。相反,如果角色这样对待自己的职责:“因为他是我的同伙,我必须尽力帮助他”,“因为他是我的亲戚,我一定要优先照顾他”,那么,这便是角色职责的特殊定义。因为角色的活动被限制在独特的社会客体或特殊的社会阶层里。

(4) 角色评价。角色任职者的评价是指如果把看重角色任职者的角色实现,评价的标准是成就,如果看重角色的社会和物质特征时,评价的标准则是“先赋”。前者注重于角色职责的运用或运用的能力,如角色任职者的资格、水平、经历;后者则注重角色的社会背景,如家庭出身、性别、财产等等。

(5) 角色关系。角色关系中的参与者可以分为功能独立的角色关系和功能混合的角色关系。前者的例子是现代工业中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后者可以以中世纪手工业行会为例,行会老板不仅是雇主,而且也是师傅或监护人;徒弟不仅是雇员,同时也是门徒或义子。

在这五对模式中变项的不同组合可以产生不同类型的角色关系,由此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构。帕森斯指出,现代经济技术与高度的职业专门化以及经济、技术的理性原则的应用,使社会重视功能

独立的、成就取向的、普遍价值标准的、非情感酬赏的角色。很明显,在社会结构同质性较强的原始社会和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对角色的要求则相反。

有关现代发展中国家社会变迁的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是:现代的经济、技术制度是不发达国家竭力要采用的、或在殖民时期被宗主国强加于上的一种制度,在这种经济、技术制度中产生的与西方社会一致的行为模式又会反过来影响不发达国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

这些影响社会结构的行为模式主要有:

(1) 所有的经济资源(土地、劳动力、资本)都是有利可图的观念普遍应用于社会。这意味着资源可以经常从经济效益较低的部门向较高的部门流动。这种流动对社会结构的广泛影响是社会流动性增强。而这一切都以产权、消费品、劳动力从传统的生产关系束缚下解放出来为前提。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投入到固定资产和原料集中使用的工厂,由于工业集中可以降低成本,因而产生了劳动力集中于工厂以及工厂的集中,随之产生了城市化。

(2) 劳动力地区性流动与现代社会功能独立的经济角色相联系,即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工作场所脱离家庭相联系,打破了家庭组织的传统家庭模式而转向婚姻家庭模式,婚姻家庭则意味着亲戚之间很少家族纽带的核心家庭。这一切都要求重新调整夫妻关系。

然而,核心家庭形式并不能够消除人们在支离破碎、冷漠无情的城市生活和大工业生产中所产生的迷惘。休戚与共的乡村组织和家族团体渐渐被具有新功能的城市团体——教会、工会、俱乐部、各类团体所代替。这些自愿组织是联系紧密却规模很小的婚姻家庭与现代城市社会之间感情上的桥梁。一个有争议的论点是:城市和工业化过程要求全民族的团结一致,因为人们从传统的社会制度下走出来,继而又迷失在为经济利益相竞争的错综复杂的社会中,迫切需要新的社会认同和新的归属感。民族感是全民协调统一的关键力量。

(3) 经济原则的应用标志着人们通过自己的成就而不是通过先天赋予获取社会地位。大工业要求高效率的生产,并希望从付给工人的工资报酬中获取最大限度的补偿,因而能够做到人尽其才,这就是依据个人能力而不依据人际关系为选择人的标准。工业化使人的社会地位分类原则由先赋转向成就,促进了社会中个人的流动,与之相关联的是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发展,以便提高人的工作能力并使社会成就的标准统一化。

(4) 生产要素——土地和资本的流动使公有和私有财产买卖权制度化。产权的转移不可避免地打破了土地公有制以及所有权与使用权相结合的形式;农业商业化使土地较易转移到生产能力较强的人手中,土地重新组合,即土地大面积集中,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如富裕农民从经济规模和现代技术的应用中获利甚多,而小农和佃农则成为没有土地的无产者。现代化又将这些无产者吸收到工业经济的第二和第三产业中去。

概括地说,现代化理论阐述了私有财产权的制度化包括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是社会结构全面分化,即分化成为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只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阶级,又由这些不同的阶级构成多元性社会秩序。现代化理论常常苛责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他方法,如生产资料国有化,或称国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社会化、违反经济规律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5) 追求利润的原则在现代工业组织中广泛应用,这意味着对生产内容、生产时间、生产方式、生产场所以及生产者的选择都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为前提。经济需求决定了铁路的修建,也决定了车站建造位置;钢铁厂厂址的选择、生产工艺的选择全都取决于生产者期望的生产力水平。这种经济原则最容易普遍应用于科层体制中,因为科层体制是建立在严格遵循规则、个人利益与公务严格分离的基础上的。这就是现代企业里的科层组织最适合于现代经济生产活动的原因。

(6) 在现代经济机制中契约是社会角色关系的基础。契约规定工作角色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条件,不看重角色的社会职责。现代经济结构中角色关系的契约化特征具有一定的弊端,因而需要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进行有利于经济结构的变革。与经济发展无关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大量的不确定因素。例如,当一个人与另一个和自己毫无社会关系的人建立工作上的契约联系时,他怎样才能肯定那个人会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在前工业化社会里,经济交往受到社会关系的羁绊,几乎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生产和贸易中,人们与之交往的常常是陌生人,因而需要超越个人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社会的契约制度和监督经济关系的发展。简言之,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要求区域集中的国家形式。为使国家更有效地实行控制,需要由一个合法的政府来代表国家,而这个政府应该被所有的经济团体所认可。正如美国学者特别指出的那样,它必须是被民主政体从法律上承认的、可以通过公民投票将舆论传达给领导阶层的、体现社会秩序的多元性特征的多党制来实现的国家政府。政治多元化的进一步发展是“言论自由”和独立的传播体制——新闻自由的制度化。而成人识字是新闻自由和公民参政的基础条件。

(7) 非情感的酬赏模式在现代社会中的实施要求扩张消费品市场,因为工资和商品是人们工作的唯一动机形式。这种模式变化的困难性由欧洲殖民地早期工业化阶段劳动力供应曲线下降的事实得到证实。殖民地的工人对工资的刺激毫无反应,他们并不因为工资的增长而努力工作。事实上,付给的工资越多,干的活越少。在前几个世纪,欧洲曾出现过的这种“不合理”、“不经济”的行为促进了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即工资应该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用以防止“懒惰、酗酒、赌博和不道德”的行为,这样的办法也同样应用于殖民地。人类学家指出了殖民地工人的消费极限,从需求上和从消费品供应上看,与欧洲早期的工人一样,殖民地工人还不具备高消费的能力。非情感的物质刺激的效果应该与消费市场的扩张

相联系,同时也应该与把消费者的文化取向调整到追求商品和服务上来相联系。

### 3. 现代化理论与发展政策

这里我们介绍不发达国家发展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植根于影响现代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和进化的西方传统。

这一理论使“结构一致性”的理论方法和对社会变迁的“原因”分析陷入混乱。因为,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变革,即西方化,是西方经济技术传播的必然结果。而从方法论上,又提出了相反的论点:与西方经济技术传播同时进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形态的重新组建加速了传播的进程。这一巨大的理论错误已经铸成,又得到现代化政策的制定者——受雇于西方政府、联合国、世界银行组织的专家的继续发展。下面列出了一些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指标”,从下面可以看出社会、政治和文化成了经济发展的条件:

#### 国家发展的指标

- (1) 城市化
- (2) 成人识字率和职业培训
- (3) 报纸发行量
- (4) 政治民主(多党制及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的定期的政府更迭)
- (5) 创业自由
- (6) 世俗化(理性化作为占主导地位的行为准则)
- (7) 社会流动
- (8) 职业分化
- (9) 自愿团体的数量
- (10) 民族统一
- (11) 核心家庭模式
- (12) 独立的司法制度

这些指标对制定政策会产生如下后果:

经济援助常常引起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并且带来更多的问

题;把工业化狭义地理解为从农业向工业生产的过渡阶段,认为工业化是国家发展的标志,是解决因工业化和农业无产者大批涌进城市而引起的过度城市化的问题的应急计划;花费大笔的经费对无工作的人进行正规教育;世界银行的贷款鼓励执行有益于“创业自由”和产生资产阶级的货币政策,美国的一些商学院开设课程培训商业资本家,使其变成适应企业管理和创业的人才;西方的援助计划严格地限制在那些与西方模式一致的民主议会制国家。

现代化理论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是文饰西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征的最重要的思想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使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进行扩张,它的触角越伸越远,遍布全球。但是,成功地进行扩张依赖于再生产的能力,因而西方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问题的基本方法。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论的长处是:第一,并未把发达社会或不发达社会当作自我封闭的社会系统,而是看作全球社会系统中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第二,研究不发达国家社会变迁的历史原因,但并没有把结构一致性与变迁的因果混淆起来。同时,不承认现代化是西方经济技术传播的必然结果,相反,却认为落后国家长期处于不发展状态是这种传播的必然结果,现代化等同于“独立发展”。

(白桦、丁一凡 译)

B. 瓦玛

## 现代化问题的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家把“现代化”看作是社会变革这一巨大进程中的一个特例。在有的文献中，他们对现代化问题的概况作了介绍。例如在经济发展领域里，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只是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体制与其他体制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国家的领导阶层、教育制度的发展、工会的作用和企业家的职能是他们所关心的主要议题。在政治发展领域里，他们强调国家建设的难处，讨论诸如大众传播工具（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的发展、平民参政、执法、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发展、国家法制的扩大以及和国家政体有关的其他种种问题。

讨论社会复兴问题的文献也是洋洋大观。这部分文献涉及的问题有：官僚阶层的发展；规划和行动纲领的可行性；乡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阶级结构不断变化；城市变态；人口压力；等等。在搞现代化的国家中，有些敢于直言的利益集团毫无顾忌地讲出了老百姓的要求，经常与上层掌权者发生利益上的冲突。我们的模式中所强调的平等、博爱、基本自由和机会均等问题，是与意识形态的推陈出新和改良运动的蓬勃兴起联系在一起的。有不少理论和纯理论著作涉及上述这些课题。

---

\* 选自 B. 瓦玛《现代化问题探索》一书。

本章不打算集中讨论这些课题,因为如果这样做,必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不能专心评价现代化问题理论家们的大量著作。我们要分析研究的是这些理论家自己所选择讨论的问题。但是在描述他们的理论中那些有说服力的论点和不足之处时,我们将不断地探索他们对上述课题的论述。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系统地分析这些论题,现在则综合地介绍一下各界人士对现代化问题各个方面的看法。

### 社会变革与现代化

自从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社会改革需经历形而上学、神学、科学(即实证)阶段的观念以来,社会学家们对大规模社会变革发生兴趣。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形象化地设想了从军事类型到工业类型的社会发展。费迪南德·特尼(Ferdinand Tönnies)提出的“社团—社会分类”、亨利·S·梅恩(Henry S. Maine)提出的“地位—契约”、霍华德·贝克(Howard Becker)提出的“神—世俗关系”,一直到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的“民间—城市连续统一体”,学者们试图说明和预言社会变革而作的尝试都带有创新性。可是,直到马克思划分了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世界各国才开始给予社会发展问题以更多的关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后面我们还要谈到他。现在让我们先谈谈马克思·维贝尔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它对于社会学家阐明现代化理论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我们曾经提出过工业资本主义是现代化的主要模式之一,是现代化社会的同义词。维贝尔选出下列因素作为现代化社会的组成: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美术方面的发展;合理的法制与行政体制;现代化的国家;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但是当代的学者对于维贝尔理论的另一面,即他关于新教派在创

造现代化社会时所起作用的说法,日益表示怀疑。

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维贝尔在观点上的主要差异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前者强调“经济决定论”,认为它是所有社会演变的关键性因素;后者则认为思想意识(宗教道德观)至少在西方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基本因素。其二是,前者坚信历史演变的力量(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起作用)将不可抗拒地导致共产主义的诞生;后者强调西方社会的结构和制度,并在理论上分析那些构成西方社会的要素。

我们认为,就当前的这个论题来说,很有必要分析讨论一下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观点。帕森斯是马克斯·维贝尔思想的杰出表达者,而且他还可能是社会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其大量的著作中,描述了表现整体的系统性模式,分析了现代化的过程。我们在非常简略的介绍中,当然不可能完整地评价帕森斯对社会科学理论作出的多方面贡献。我们只是希望能借此阐明一下他关于社会演变的思想。在涉及到模式时,我们将描述他那独特的图式。他的图式,影响了大部分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家,即现代化是一种“制度”与“价值”的综合体系。

帕森斯在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年)中,批判并抛弃了社会演变的假设。可是30年之后,他在1966年发表的《社会》一书中却又接受了关于“社会演变和比较”的观点。在50年代和60年代,非欧美国家开始搞现代化了,在这一事业中起推波助澜作用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越来越多地采纳帕森斯的各种解释来说明他们自己的范例。帕森斯当然看到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也看到了他作为一个理论家所起到的作用。

什么是帕森斯本人的立场?他说:如同组织的演变一样,应当根据社会从原来的简单形式演变到后来更加复杂的形式变异来分析社会文化的演变。演变遵循的原则是:从分化、专门化到更高级的一体化。例如,在发展中的社会里,劳动从家庭转移到了企业或工厂,通过企业或工厂的一体化结构而不是原来以家庭为单位

的结构产生了一体化的经济作用。

帕森斯将社会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原始阶段、中间阶段和现代阶段。他也谈到了古代社会(例如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王朝)、“先进”的原始社会(例如非洲的一些王国)和中间社会或“先进”的中间社会(例如印度,皇帝统治下的中国,伊斯兰王国和罗马帝国)。帕森斯认为,17世纪西欧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当时社会上宗教的作用以及18世纪西方国家朝民主和工业化方面的发展,使得现代化社会的制度脱颖而出。他说,现代化的过程是在西方开始的,并通过移民或扩散而传播到世界各地。他称古以色列和古希腊为“策源地”,从而酿成了“先验论”、“普遍条理性”和“实践性”这些向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性因素。

### 现代化的变项

对当代的现代化社会,帕森斯强调下列各组“变项”:市场体制和市场体制中合同、财产和职业构成的“经济复合”形式;摆脱宗教和种族控制,并起那种具有领导能力、权威性和条理性的“政治复合体”形式的作用的民族国;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法制;社团与利益集团;公民权;有代表性的政府;能胜任的行政机关;民族主义。这些变项均出自他的《现代社会的体制》一书。他指出:“民众教育”是文化上朝着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创举。

其他社会学家(包括帕森斯在他另外的一些著作中)还为现代化社会添加了一些特性;社会规模的扩大;都市化;代表国家一级的机构和集团(如工会和商会)权力集中的中央集权化;种族集团在国家事务中的权力削弱;大众传播工具(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作用的扩展;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上层人士;不受约束的知识界;论功行赏式的评级;宗教和社会的世俗化趋向;核心家庭;人口控制。在这些特性之外,还应当加上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这一条。

## 现代化的模式

### 模式变项

帕森斯列举了阐明价值观念的模式变项,并提出了他认为最全面的现代化社会模式。他所列出的模式变项如下:

- (1) 特殊性对普遍性;
- (2) 广泛性对专一性;
- (3) 品质对行为;
- (4) 易感性对冷漠性;
- (5) 自我倾向性对集体倾向性。

帕森斯及其追随者就是用每组变项中的后者(即普遍性、专一性、行为、冷漠性和集体倾向性)合并而成的变项组合体来描述现代化社会的。例如,评价现代化社会中的行动,应根据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一个人的情感应当专一而不应该见异思迁;评价一个人时,应当注重他的行为而不是先天的品质;个人应当养成对一般的社会对象持冷漠态度(冷漠性)而不应当感情冲动(易感性);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相比,后者应当优先加以考虑。帕森斯声称,这种以范例形式表示的变项组合体,将可用来对社会进行分类。但是必须指出,这些模式变项的参考价值,比直接从社会所能体验到的大些。

### 社会文化体系模式

帕森斯的第二个范例,与他那关于社会文化体系的生物学假设有关。他假设的社会文化体系是处于均衡状态,其职能是“维持模式”、“适应”、“达到目标”和“一体化”。“维持模式”是指社会化等问题,也包括保持制度和文化上的模式。“适应”是指经济方面,如资源的分配方面对环境的适应。“达到目标”是指提出目标并为达到目标而努力,这方面的主要目标是国家的政体。“一体化”是指

社会制度与社会准则的全面协调,即在整体上的一致。帕森斯曾多次阐述上述程序。赞同帕森斯观点的学者都试图套用帕森斯的模式,并在自己以经验为依据的探索中对帕森斯的模式作出种种解释。

帕森斯还进一步描述了任何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向更高水平的演化。所谓更高水平,是指与上述社会文化体系的职能作比较而言。帕森斯关于这方面的描述非常抽象,采用帕森斯总纲的一般都按自己的思路各抒己见。

### 模 式 评 注

在以下各节中,首先将进一步介绍现代化的社会学模式。通过介绍,可以看出上述各种模式是如何用来解释一个特定的现代化社会(这里指的是美国;就现代化这一意义来讲,西方世界公认美国是最成熟的现代化社会)各方面情况的。然后将模式套用到那些正在搞现代化的社会,以论证这类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中央集权化;独裁主义;专家治国论;社会舆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社会的官僚化;大众传播工具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兴趣爱好与社会准则的标准化;平民参政以及知识分子在搞现代化的国家中的作用。最后将阐明某些制度方面的模式,如社会的等级化、变动性、宗教、家庭等。

#### 现代化概论

大多数社会学家的探讨都是有系统性的。帕森斯的纲要,对于要进行分析的社会学家来说显得非常实用。帕森斯的得意门生列维(Marion J. Levy Jr.)写了一本名为《社会结构》(1953)的书和一篇题为《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0)的论文。他在那本书中最先解释了帕森斯的模式,并称帕森斯的模式为“结构—功能”分析,而在那篇论文中再次强调要对“比较现代化的社会”和“比

较非现代化的社会”进行有系统的分析和探讨。同大多数研究现代化理论的作家一样,列维在写作时大量使用各种定义,这也许是因为其著作的读者是以行政事务和国际问题专业的学生为对象的缘故吧!他的著作还描述了社会学理论领域内的主要争论。可是,他的假设也和帕森斯的一样,往往很抽象,叫人吃不准所涉及的对象,而且这些假设是否经过检验也不得而知。例如他在一处写道:

当前美国社会远比苏联社会现代化(这里,列维仅按能源和技术的利用阐明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美国的独裁现象也远远不如苏联……除了政府的职权这一因素外,美国社会比苏联更加中央集权化。

上述引文中他所指的中央集权化,其唯一标准就是通讯技术。尽管他只是想说明现代化的水平高低同独裁主义无关,但在他的论文里论据尚嫌不足,因而评价他的主要论点就很困难。我们认为中央集权化是一种现象,它既要从政治角度,又要从技术角度来衡量;上述引文中的论述似乎过于简单化。如果我们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就大可怀疑美国是否比苏联更加中央集权化。列维后来对日本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也未能弥补他对苏联和其他国家所持的这种观点上的缺陷。

有人对列维的某些论述感到怀疑:他是在谈论发展过程呢,还是在为发展过程提供准则?比如,他认为“现代化进程越是向前发展,中央集权化程度就越高;而要求得安定,就应中央集权化”。他的这个观点使人大惑不解:为何要把安定和现代化的发展等同起来?尤其是埃兹奥尼(Amitai Etzioni),他所持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现代化……似乎在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容易进行,其他的事情也一样(当然不是指分崩离析的地区)。”列维强调搞现代化要靠中央集权化,而埃兹奥尼却认为尚未

完全一体化(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央集权化程度不足)的地区对现代化的进程更为合适。可以认为埃兹奥尼是在谈论“战略问题”,而列维却意在“目标”。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安定”(列维认为“安定”取决于“中央集权”)会是目的。赞同“要安定”的论点则指责社会学是在为英国国教服务。而我们讨论这一争端的主要目的是要表明:列维等人的现代化设想中,否定或者低估了我们所举范例中的一个重要成分——社团的自主和发展。

埃兹奥尼的《积极行动的社会》是一次旨在用控制论原理和系统分析来指导社会的重要尝试。这本书中,定义泛滥,读起来令人费解。埃兹奥尼有意识地将他的术语运筹化,并为他的假设提供了进行实验的基础。可是,他将功能上的探索同遗传上的探索结合起来,这种做法看来不怎么对头。尽管埃兹奥尼反对他人的见解,人们还是觉察到:在他提出的“积极行动的社会”纲领中,既有抽象概念的具体化,又有社会技术管理上的指导方针。在回答“为什么要积极行动”这一问题时,埃兹奥尼说:

(1) 社会能对所有问题采取一致行动,它具有将其成员的要求汇集起来转换成“集体指令”的机制……

(2) 社会的价值在于:只要它关心其全体成员的需求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欲望,不同成员就会提出相互冲突的,甚至是互不相容的要求。

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了。然而,有关政体形成的机制、确定和评价全体成员需求的方式等重大问题,还有许多地方需加说明。政治学家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在这个问题上也赞成诉诸权力结构。下面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

我们在谈到制度的作用时必须小心,勿使制度本身具体化。我们必须记住,为了使行动尽可能地集体化,所

有的制度常常都会有以制度的名义说话的人,我们不妨称之为权威人士。

即使解决了“向公认的权威挑战”、“新领导阶层的合法性”等问题,也提不出埃兹奥尼和伊斯顿所企求的那种控制论指导方针,何况他们两位也未能提供解决国家领导和社团领导间冲突的理论基础。

埃兹奥尼的著作,基本上是用以指导西方世界“后期现代化社会”的未来的。根据埃兹奥尼的说法,这个“后期现代化社会”起始于1945年;帕森斯则认为,说这一阶段是现代化发展的“顶峰”阶段较为合适,这一阶段可能要持续一个世纪,而“后期现代化社会”的说法未免言之过早。

### 成熟的现代化社会分析

贝尔(Bell)抱怨埃兹奥尼除了指出技术、知识、能源在“后期现代化社会”中的作用以外,实际上没有阐明“后期现代化社会”的定义。贝尔经过自己的分析之后,认为:称“后期现代化社会”为“正在到来的后期工业化社会”更合适些。他说,今日世界上最成熟的工业化社会(即美国)正在出现专家控制社会的局面。他的著作中,有许多是论述发展着的后期工业化社会中专家与科学家的能量结构基础材料。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技术人材和科学家在未来社会的新型阶级关系中将处于社会阶层的最高点。他的著作还提供了用于讨论现代化进程中未竟事业的材料,特别是在追求现代化社会中的平等这一问题上;帕森斯也有过这方面的提示。贝尔仔细讨论了两种意义的平等,即“机会方面的平等”和“成果方面的平等”。他认为这两种平等之间有冲突,这是一种不利于高级知识阶层的情况。贝尔说,成果方面的平等是苏联式社会主义性质的伦理,而且为了成功,可以通过改变政治哲学来寻找政治上的出路。

利普塞特(Seymour Mastin Lipset)的著作,其主要价值在于论述

了像美国那样的现代化社会中的民主问题。在社会学界,他受到的抨击比谁都多,特别是左翼对他抨击得更厉害,这是因为他敢于并试图去做力所不及之事。利普塞特对社会上的政治行为进行比较分析时,使用了选举统计数据和其他辅助材料。在某些分析中,他还使用了模式变项。但是奇怪得很,帕森斯却将利普塞特的著作划归“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范畴”。

利氏认为民主是一种能“和平地”行使权力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上层政界人士可以进行竞选,统治、统治地位和舆论都是合法的,在野党常赞许执政党作出的决策,而执政党也承认在野党的权利。他认为,民主制度中还会存有冲突。他在《第一个新兴国家》一书中,说明了上述原则在美国是怎样起作用的,并将美国与西欧各国加以比较。利普塞特将对立双方的意见和第三者的意见汇集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说明他自己的观点。我们检查了他的观点,发现他对现代化社会所作的分析中,在因果关系、相互关系等方面显得有点杂乱无章。

利普塞特基本上接受马克斯·维贝尔关于“民主只能产生在资本主义工业化之中”的论点,这样做似乎也为他本人增添了“光彩”,于是他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来看待了。他对现代化进程的分析,大部分是针对欧洲的,对第三世界的情况他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利普塞特认为拉丁美洲和亚洲那些正在搞现代化的国家中的统治阶层和民族主义者都有左倾思想,而且其意识形态一般都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化或观点上的冲突是这些国家政体不稳的根子。我们认为:利普塞特在研究一些国家,特别是那些正视独立后各种问题的国家时,不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概括,而是生搬硬套。

利普塞特的研究中,有许多经过验证或可验证的假设,如假设“一般说来,在一个国家中,地位的划分越是呆板,就越是会产生一个阶级成分清一色的政党”。又如假设“在社会上,强调地位划分就容易产生有阶级意识的集团”。在印度,地位的划分十分严格,但并

没有出现利普塞特所假设的情况。于是这两条假设也就不攻自破。

利普塞特认为“官吏”和“政党”在美国起了相当有益的作用，但是在分析美国边远地区的“平等主义”时，却又将社会准则与权力结构混为一谈。因此在决定接受还是抛弃利普塞特对现代化进程所提供的这些有实用价值的假设之前，还得进行有条不紊的详细调查。利氏对于发展中国家变革过程的一些想法，显然是从西方世界的经验中推断而出的。

本斯曼(Joseph Bensman)和维迪奇(Arthur J. Vidich)在《新兴的美国社会》一书中，对利普塞特关于“美国现代化进程”的观点作了某些修正。作者在书中讨论了美国自新政以来，特别是在凯恩斯经济学说影响下的情况。他们指出了权力关系是怎样用民主的花言巧语来掩饰的，而行政官员的权力主义又是怎样在使用民主的词藻。他们的分析很注意社会结构(贝尔用该词是指经济、技术、职业)对政治修养的关系。此关系其实是贝尔提出的，但是他没能作充分的论述。本斯曼和维迪奇还指出，经济机缘的增长和专业机构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怎样侵蚀了知识阶层的自主性，但又认为要同化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相当困难和复杂的事。本斯曼和维迪奇坚决认为个人需要自主，并应保障个人的自主，这也是我们的现代化模式予以关注的问题之一。

### 大众文化和大众社会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早先出自哲学家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Gasset)的《民众的反抗》一书。先进的工业主义使美国产生了大众文化。伯纳德·罗森贝格(Bernard Rosenberg)是大众文化的评论家，他认为大众社会的不足之处是单调、平淡、庸俗、失去人性以及在富裕生活中所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他认为，“由于神圣和亵渎、实事求是和似是而非、晋升和降级这些对抗性因素的混合”，大众传播工具在这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

在美国，关于大众文化的辩论是最富有生气的辩论之一。罗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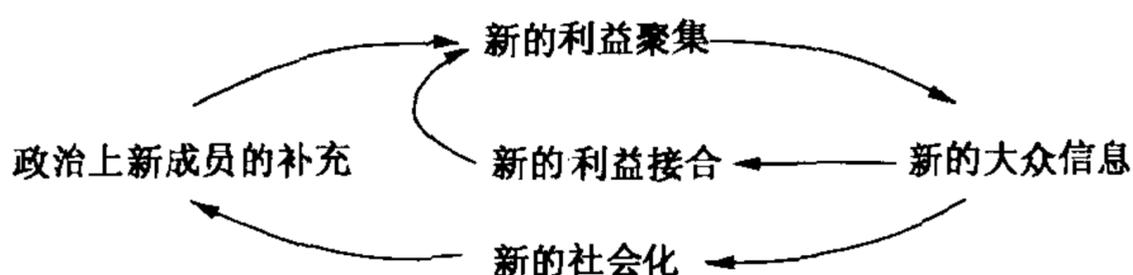
贝格在与大卫·曼宁·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合编的《大众文化》(1957年)一书中,同其他的作者一起为美国的民间艺术辩护。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在美国,对广告的崇拜大大降低了人类的文化水准。1951年,当时关于大众文化的辩论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美国在广告上花费了65亿美元,比教育经费还多15亿美元。道理很清楚:广告是为其主人服务的,教育则是为大众服务的。

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产物,大众社会往往受大众传播工具的支配。这样就需要调查一下大众传播工具对“个人自主”和“集团利益”所起的作用。有些理论家声称:美国社会中,个人已变成了相互之间完全脱离的原子,这些原子只对大众传播工具输送的信息起反应。另一些理论家则指出:利益集团的扩展传递了大众传播工具带来的信息,使个人作出反应或者作出决定。威廉·科恩豪泽尔(William Kornhauser)认为,由于利益集团能对国家权力施加影响,它当然可以使个人介入政治。由此可见,大众传播工具既能为民主服务,又能降低民主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操纵者对它们的使用。

### 信息理论

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都仔细调查过大众传播工具传播信息和社会准则(生活的理想,道德的标准)的作用。没有大众传播工具,便不能宣传有关现代化的发展纲领。不少学者都赶时髦,竞相创建信息理论。早先在这方面虽未取得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但是有些学者如派伊、勒纳等人,并不为此气馁,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与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关系密切之故。

我们发现,信息理论是建立在信念和定义的基础上,而不是以验证过的假设为依据的。派伊起初假设“信息包含着大量的社会行为”,希望将信息作为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因素来加以检验。这种尝试因为没有定出“变项”,结果是劳而无功。在创建现代化信息理论的工作中,勒纳所能提供的只是下列描述现代化社会的示意图:



至于信息理论这个名词配合有关术语加以使用的问题,将在涉及政治学的那一章中加以讨论;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上面那张图中的信息交流,只是作为政治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新概念来看待的,未经理论方面的深入研究。

### “世界主义者”和“地方主义者”

也许,默顿(Robert K. Merton)在论证具有影响力的民族时所使用的两个术语“世界主义者”和“地方主义者”,对理解如何影响现代化的进程是最有用的概念。“地方主义者”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他了解他周围人们的需求;而“世界主义者”所以有影响力,则是因为他懂得超越地方范围的问题之性质,并能运用他的技能和专门知识来对付这些问题。“地方主义者”扎根于社团之中,“世界主义者”则将自己与国家与世界联系起来。至于这两者同信息、领导阶层、个人和国家间的沟通问题等概念的联系,目前在继续探索,而且取得了一些成果。

### 正在搞现代化的国家

至此,我们讨论了现代化社会的问题和说明这些问题的模式。下面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主要的社会学模式应用于正在搞现代化的国家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艾森施塔德(S. N. Eisenstadt)的现代化观点是不折不扣的帕森斯式。他要求拉平现代社会中城乡、地区、集团间的差别。他论述了正在搞现代化的社会中发生的战争、抗议、衰退等问题。他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消除这些社会结构上的二重性。

我们认为,他的想法纯属理想主义,实际上是要使所有集团都

“城市化”。众所周知,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过度城市化的情况。这些国家为此而采取的解决办法,恰与艾森施塔德的想法背道而驰。

帕森斯的学生斯梅尔塞(Neil J. Smelser)与他人合作,写了《经济与社会》(1956)一书,发展了经济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在他的《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革》(1959)及近期著作中充斥着大量新的定义,对社会学家来说,却没有任何新内容。他对现代化进程的分析,都是从帕森斯那里搬来的概念。斯梅尔塞非常坦率地承认,他的系统分析既不能说明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也无法预测社会变革中的因果关系。

斯梅尔塞的有些分析虽不够精确,却合乎情理。比如他说:“如果教育制度造就了一大批有文化、有技能、却得不到雇佣的人,就应该要求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调整。”为什么不是革命性的变革而仅仅是调整呢?为什么不是对这种情况麻木不仁或者认为是命中注定的呢?他在另一个例子中又说:“在某些情况下,城市一体化可能因为季节性工人来来回回的迁移流动而推迟……而工人来到城市是分化,回到乡村则是一体化。”由此可见,难怪人们常认为功能分析既是在玩弄词藻,又是多么普通的常识。

### 知识分子

爱德华·希尔斯论述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社会和正在搞现代化的社会中的作用。他说现代的知识阶层:

是现代化社会的产物,也就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工业化社会的特征是:国家和经济生活方面合理的行政管理;文化普及;高生活水平;耗资巨大、涉及面广的教育体制;用以培植科学和学术方面的真理、传播文化遗产的大学体系。

希尔斯把独立自主的文人、纯理论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学者、大学教授、记者、受过高等教育的行政人员、法官和议员都看作是知识分子。希尔斯所说的知识分子包括了贝尔所说的那些专家，这些知识分子也是所有在搞现代化的社会中的中产阶级。

希尔斯的研究几乎未触及知识分子阶层的发展问题。他对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描述是规范性多于科学性；他对正在搞现代化的国家中另一类知识分子，即那些不懂西方语言而用本民族语言工作的知识分子的重要贡献也一无所知。近年来，希尔斯和帕森斯合作写过一些理论方面的著作，但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却尽量不照帕森斯的图式依样画葫芦。

### 阶层的形成

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学家调查了现代化国家和正在搞现代化的国家中阶层的形成问题，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现。例如，他们指出了人才流通问题，即在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和日本等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有30%的工人阶级和其他下层社会成员子女取得了“白领”阶层或者地位更高的工作待遇。他们还发现：在美国，有三分之一专业人员和其他同等地位人员的子女在从事体力劳动。杰出人物纵向和横向的流动，可以说是现代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他们进行分析时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城市中心论。他们忽视和曲解了乡村地区的差异，而将城市模式应用于整个国家，却置乡村社会的准则和价值观念于不顾。

### 宗 教

贝拉(Robert Bellah)仔细研究了现代化国家和正在搞现代化的国家的宗教，并且指出帕森斯所论证的“分化和一体化逻辑范畴”对探讨世界宗教事务非常有用。贝拉认为：宗教有个演变过程，宗教团体越来越意识到它们与环境 and 日常生活格格不入。他认为

宗教发展要经历五个阶段,即原始、古代、历史、近代和现代阶段。他注意到:每到一个阶段,个性和社会的自由相对于环境条件而言都增加了。因此,在“现代阶段,人人都得考虑自己的结局”。贝拉对宗教发展的阶段分类和帕森斯关于社会演变的阶段分类大致相同。贝拉在论述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宗教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是令人折服的,但我们认为他在说明美国国内的宗教生活时,似乎遗漏了宗教的一个要点,即宗教保护人类不致对未知世界产生恐惧心理。

## 家 庭

古德(William J. Goode)是少数几位目光敏锐的学者之一,他没有完全信服帕森斯、列维、艾森施塔德和斯梅尔塞等人所阐述的现代化过程的单一模式。他在对家庭的研究中,提供了与工业化有关的“配偶家庭”发展情况的数据,指出“家庭变项”和“工业化变项”之间并无明确的关系。他还强调作为预测家庭变化基础的准则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他不认为那种所谓的现代化进程将自动造成“核心家庭”。

古德清楚地指出: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中,上层社会家庭的数目增加了,而中下层社会家庭的开支也增加了。他泄露了现代化世界中“配偶家庭”的思想,并要求:

进一步调查多世纪来,西方的家庭体制是否比其他地方的家庭体制组织得更好些?西方家庭体制是否更好地发挥了个人的机缘?家庭态度的变化是不是与工业化关系密切的清教徒所引起的?

## 人口:人口统计过渡理论

在转向其他学科之前,我们再来讨论一个问题,即“人口控制”。西方的工业革命说明了人口统计过渡理论:人口变化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变为中等出生率和死亡率。在西方工业化以前,人

口增长缓慢；在工业化早期，人口剧增，毫无节制；在后阶段却又减退到中等水平。于是，人口统计家断言，同样情况将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重演。但是，尽管控制了人类的大批死亡（在今日世界上表现为根除了天花、霍乱、鼠疫和其他瘟疫）并且还采取了自然和人工手段控制出生率，本世纪人口增长率还是高得惊人。除了日本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之外，那些在搞现代化的国家都未能减低人口的增长速度。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等人口统计学家认为：那些在搞现代化的国家，如政府不采取控制人口增长的果断措施，就挣脱不了人口剧增的枷锁。于是著名的人口统计学理论——人口统计过渡理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就不攻自破了。

### 评 判

回顾现代化社会学分析的主要模式时发现，系统性的探讨虽有助于把问题分理集中，但它不能替代命题调查和因果关系研究分析。全面性的探讨和系统性分析中所规定的先决条件仍然无法核实。全面性探讨虽有启发性，却不能武断地把它当作现代化问题的解决方法。关于维贝尔的模式，有许多争论尚待解决。

系统性分析中，理论家们有这样一种倾向，即社会分为传统社会、过渡性社会和现代化社会三种，并想象传统社会中，什么都是落后的；过渡性社会则问题成堆；因此指望能借助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方式，把它们带到现代化社会的水平。这样一种变革的代价是惊人的。有人对这种代价视而不见，有人则认为这样的代价是必不可少的。所有指望变革的社会，都曾把向城市发展的工业化社会作为理想社会的楷模。而现在，这种态度可能正在改变，因为世界上自然资源 and 人力资源大量浪费、环境严重污染等问题一望可知。

大规模城市化中的社团自主问题和全社会官僚化中的个人自主问题，是我们的模式中两个最主要的问题。而人们在创立现代化的理论时却往往疏忽了这两个问题。

(周志伟、严炬新 译)

T. 帕森斯

## 模式变项与社会系统的结构分析\*

### 行动取向、文化模式和制度的方式和 类型一览表

#### A. 行动之动机取向方式

1. 认知的; 2. 情感的; 3. 评价的。

#### B. 行动之价值取向方式

1. 认知的; 2. 鉴赏的; 3. 道德的(系统整合的)

a. 自我整合的(个人的);

b. 集体整合的(社会关系的)。

#### C. 文化模式的类型

1. 信念系统(以认知作用为主);

2. 表达符号系统(情感为主);

3. 价值取向标准系统(评价为主)。

#### D. 行动——兴趣类型(一种主导的动机方式与相应文化模 式的组合)

1. 认知兴趣(在于“了解”);

---

\* 选自 T. 帕森斯《社会系统》一书。

2. 调整兴趣(在于确保从对象中获得满足);

3. 整合兴趣(在于使冲突最少并解决冲突)。

**E. 评价行动取向的类型(评价或整合取向与一种主导兴趣的组合)**

1. 工具性评价行动取向(对一个目标的情感已定,认知为主)

a. 探索型(以认知问题的解决为目标);

b. 创造型(以新表达符号形式为目标);

c. 应用型(应用知识——因而是认知兴趣为主,以 a、b 未作规定的其他目标为目标);

2. 表达性评价行动取向(根据表达符号模式“体现”出一种需求意愿);

3. 道德评价行动取向

a. 自我整合型;

b. 集体整合型。

**F. 制度类型(体现价值取向模式)**

1. 关系制度(规定相互的角色期望,与兴趣内容无关);

2. 规则制度(从目标和手段上规定追求“私人”兴趣的合法限度);

a. 工具型(整合私人目标与共同价值观并规定合法的手段);

b. 表达型(规定得到许可的表达行动、环境、人物、场合、欣赏口味);

c. 道德型(规定个人典范[code]或亚群体道德责任的许可范围)。

3. 文化制度(规定接受文化模式的责任——变个人接受为制度化的承诺)。

### 价值取向之模式变项,一种关系 角色期望的定义

在社会关系中,角色伙伴(rolepartner)就是一个社会对象。为了分析角色中的取向,形成一种参照点的系统框架,首要的一步是分

析那些选择的基本变项,它们在规定与角色伙伴的关系特征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而且构成它们的或是关系模式本身的特征,而不是其兴趣方面的“内容”,是其变化或动机方面(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而不是构成关系模式的那些方面。换言之,对社会结构分化的分析必须从进入关系制度的模式开始。下面的讨论所依据的观点是,在一定的概括层次上,这类变换极其有限而且十分明确,而且,对它们的选择之相对主次关系可看成是由关系制度的模式化构成的。

下面,我们即将讨论的对象是评价行动取向中道德型集体整合亚型的模式化(前一一览表中的 E-3-b)。我们将分析一个行动者与其社会对象的关系结构,其目的在于阐明一些参照点,从而确定这类取向变化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范围。最简单地说来,这个变化范围可简述为各种可能的取向—选择的两极变项,定义这些变项的依据是各种可能取向类型的相对主从关系。

需要再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关系制度的模式化,即我们探讨的是各种可能的行动取向与价值取向的相关方式之间的主从关系,而不是其他,诸如兴趣(interest)类型式文化模式类型。这样,第一个出现的问题就是:工具取向、表达取向和道德取向(包括其子类型)之间的主从关系问题。从动机方面来看,可以假设:任何行动者的“终极”兴趣是满足的最大化。在一种有组织的行动系统中,通向满足的最直接途径是表达取向。因此,相对于表达取向而言,工具取向和道德取向方式则放弃或限制满足。某种程度上,社会对象总是实际或潜在的情感对象。因而在确定对社会对象的取向模式时,总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某些相关的方面,是根据相对直接的满足兴趣而选择表达取向呢,还是某类评价兴趣而选择工具取向或道德取向呢?前一种变项可称为“情感”(affectivity),后一种可称为“情感中立”(affective neutrality)。没有满足,行动者就不可能永久存在,同时,若不放弃某一既定情境有可能性的某些满足,行动系统也就不会是有组织的或整合的。情感与情感中立

这两极,从这个基本变项上表述了行动中出现的模式。

第一对变项(即情感—情感中立)表示是否允许行动者通过表达活动立即满足其调适兴趣。第二对变项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方面关注同样的问题,即是允许行动者追求任何“私人”兴趣,还是要求他服从他与集体(他在其中扮演着角色)中的其他成员共有的兴趣。因此,只要是与集体所规定的取向和兴趣不相一致,不论行动者的表达取向,还是他的工具取向、自我整合的取向及其相应的兴趣,都可以说是“私人的”。这样,某个角色就可能会在某些方面规定行动者追求私人兴趣是合法的,而在其他方面则要求他必须追求集体共同的兴趣。在前者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变项可称为“自我取向”,后者则可称为“集体取向”。

第三对变项并不关注行动者是否遵从某些价值标准(无论它们的内容是什么),而是关注那些被认为是与角色期望有关的价值标准的类型。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价值取向方式自身之间的主从关系,因为是它们规定了评价行动取向的标准类型。就现在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忽略道德类型,因为它不具有“自主性”。如果行动者对所含标准的承诺已经给定时,我们就应该关注他对行动系统整合的取向。因而,基本变项就是认知标准和鉴赏标准之间的主从关系。在这里,这意味着什么呢?

认知取向本质上是对对象世界普遍要素的取向,而情感取向是对特定对象及其有序组合的取向,它本身是特殊化的。如果普遍性是认知取向的首要特征,那么,在认知占主导地位的任何特定系统(包括行动者)中,特殊化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标准,相反,其准则应超越种种具体关系情境之外。原则上讲,它的取向是普遍有效的一般标准。

在情感取向,以及同类方式的行动取向和价值取向中,满足的作用内在地具有一种“主观参照”。然而,一种取向的满足作用绝不可能超越它所在的特定关系系统之上。其标准一定是根据与这些特定对象所具有的这些特定关系的这个特定行动者的意义而表达

的。因此可以说，认知价值的主导性暗含着角色期望的普遍主义标准，而鉴赏价值的主导性则暗含着一种特殊主义标准……因此，根据普遍有效的道德准则而定义的角色期望是普遍主义的角色定义；相反，根据成员隶属关系而定义的角色期望则是特殊主义的。

一种特殊主义的“角色—责任”可以用一种普遍的规则来描述，因为它用普通名词表示所有相关角色特殊的责任。“尊敬您的父母”是一条普遍主义的道德规范，但只有它的形式才是普遍主义的，责任的内容是特殊主义的。相反，“可怜天下父母心”却是一条普遍主义的规范。所有规范都具有陈述和应用的普遍性（只是普遍性的程度不同）。关键在于，是否在与自我有特殊关系的对象和具有同样属性的其他对象之间作了区分，这样一种区分是与“普遍主义规范”的概念不相容的。这个问题常常被人混淆，因而有必要加以澄清。

对这三对变项的定义的依据，都是行动取向成分之间的相对主次关系，即是以自我（作为行动者）为参照点的。在同一概括层次上，从对角色—取向模式形成的主要功能作用来看，这三对变项已经穷尽了主要的可能性，但它们没有考察整个参照系。从社会对象自身的特征来看，仍存在变项，即从自我对他者（处于互补的角色—期望结构之中）或自己（作为一种社会对象）的观点看，以及从相关的他者的范围来看。这两种背景引出了另外两对变项。

在涉及对象的特征时，一个两难选择是：我们是关注对象的性质或属性呢；还是关注它的表现（performance）？在这种意义上，根据定义，“表现”是我们赋予某类社会对象的一个特征。但是，由于他者是互补的角色—取向系统中的对应成员，根据定义，他也是一个社会对象，因而他也是由表现而形成自己的特征的。

以行动者表现为取向（既可以是自者的表现，亦可以是他者的表现，或者是双方的表现）意味着我们所关注的是其成就。

另一方面，所有社会对象都具有属性。他们不仅做这做那，而

且,他们也是如此这般;他们具有年龄、性别、智力、身体特征、关系系统中的地位(如集体成员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讲,取向的焦点就可能是:“对象是什么人。”虽然这类属性或性质可能是一系列表现的条件(因为身体或社会的原因),但是,取向焦点仍是属性本身。这可能是区分“对行动者的行为反应”与“对其行动期望”的标准。

以成就为取向的角色是强调当事人表现的角色,而先赋角色则是强调其性质或属性的角色,它不考虑当事人的特定角色期望表现。以角色期望为参照点,属性与表现之间的变项之引入,包含着更多的含义,这已经超出了先赋与成就的区分。这牵涉到如何把这种区分应用到对“理想”状态(不同于一个既定的初始状态)的定义。当表现成为价值取向的焦点时,目标成为重点;目标实际上被看作是受人看重的成就过程的“表达”。然而,对这类目标的看重可能会导致对目标性质的强调,而目标实现的过程则被忽视。

前文已叙述过,对行动取向方式的区别以及根据主次关系对取向类型的区分,是至关重要的。不过,这种区分的参照点是行动者的取向,有个问题尚未涉及到:当与不同的社会对象形成关系时,不同的取向方式会不会分离?或者,当以同一对象为取向时,不同取向方式会不会组合?就社会结构的分析来说,行动取向类型“组合”和“分离”的相对发生是非常重要的。

考虑到众多的经验差异时,可以证明,在这方面有可能推导出异常复杂的排列与组合。但在现在的概括层次上,我们的出发点仍应当是评价类型的行动取向。在这里,一个特定的工具或表达取向(或兴趣)具有某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能使我们在分析上把它与其他取向区别开来。因此,困难之一就将是:如何从**特定的**方面把角色定义为对社会对象的取向;特定的方面就是一种特定的工具兴趣或表达兴趣。注意,这是规定对自者有影响的对象(他者)的范围。由于这种定义的依据是一种道德价值模式,这意味着行动者被认为“**有权**”甚至有责任在这一限度内(即合乎道德)规定一个对象

或一组对象的相关性。

这一变项是在无明确确定数的多个特殊取向情境中把某一对象看作是相关的(significant)。这总暗含着一种道德因素,因为,根据定义,它包含对一个对象之总体取向的不同成分进行评价整合的问题。相反,把如此众多的特定兴趣综合成一种对象—关系,总意味着在取向中存在一个道德成分。因此,特定的、兴趣分离的取向类型的明确对立面是弥散方式(diffuse),此时,需要证明的是,把一种兴趣或取向方式排除在由角色期望所规定的责任范围之外,例如,诉诸一种在评价排行表上位置更高的责任,就可完成这种证明。

如果从行动系统之基本成分组合的可能性中推导出的这五个变项正确的话,如果它们实质上都处在同样的概括层次上,而且穷尽了该层次上所有相关的逻辑可能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们组成了一个体系。这样,在相关的层次上(这是**唯一**需要加以考察的层次),它们的排列与组合应当产生一个由可能的角色期望模式所组成的体系,在关系层次上,这就是规定对行动者(处在角色关系中)的取向的模式。这个体系包括32种类型,这些类型相应地又可分成数目更少、更基础的类别。

上面所讨论的,可列表如下:

#### 价值取向的模式变项

- I. 满足——自律(discipline)的两难选择  
情感与情感中立
- II. 私人兴趣与集体兴趣的两难选择  
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
- III. 在价值取向标准类型之间的选择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
- IV. 在社会对象的“样态”(modalities)之间的选择  
成就与先赋
- V. 对社会对象的兴趣范围的定义  
针对性(specificity)与弥散性(diffuseness)

这五个模式变项以社会系统之角色结构的关系方面为中心,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与规范制度模式或文化制度模式的定义无关。只要“模式一致”,这个因素必然贯彻在一个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系统之中,它们就不可能是无关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关系制度系统是社会结构的核心。从这个核心出发,并由此着手进行研究,分析就会得到发展。

当在一般行动框架的背景下看模式变项时,它们就呈现一种相互关联的模式,即它们并不仅仅只是一张一览表,而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系统性相互关系。其中存在着一个围绕某个轴的对称关系,该轴的两个主要方面很重要:一端是动机取向,另一端为文化取向。从与现在的讨论相关的意义上讲,文化的价值取向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一般说来,行动系统参照点的两极性在其具体结构即模式变项有所反映,其中有两对变项与参照系统的一端有特别联系,另两对变项与另一端相连,而第五对变项实际上是中立的。这些关系简要地表示在图1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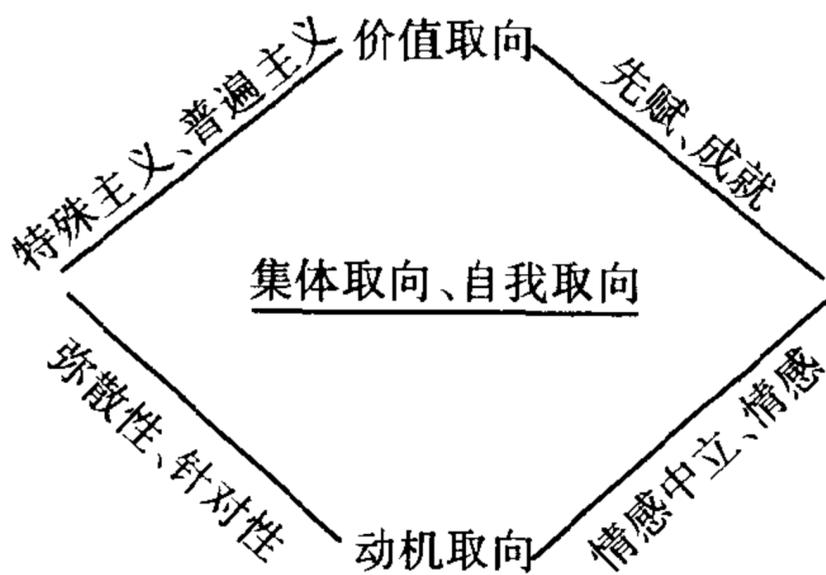


图1 模式变项分组

现从动机取向一端开始分析。这种分析并不是在需求要素层次上进行,而是在所谓“评价行动取向的组织”层次上进行的。在此层次上,情感—情感中立与针对性—弥散性与该动机取向具有最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是关键点。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变项加入进

来,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些取向的组织,因为一旦目标已定,它就与工具取向中的认知要素的主导性发生联系。

综上所述,加上它们与人格结构的相关性,我们有理由把这对变项放在一起讨论。就人格需要而言,即在社会系统功能必要条件问题(霍布斯氏秩序问题)的第一背景中,可以认为,它们是行动组织的主轴。它们在两个基本方面表达了平衡的必要性。一方面,行动者必须得到报偿,缺乏满足,行动者要么不能生存,要么没有充足的动力来承担社会角色;另一方面,他也必须接受约束,这种约束不仅出现在他自己较长期的“满足——损失”平衡的个人利益之中,而且也出现在他所扮演的角色的社会价值之中。再次,在心理参照对象上,针对性—弥散性变项首先表示了广泛忠诚的意义,同时也表达了对这种忠诚加以限制的必要性(就工具行为和不能与归属相联系的满足而言)。就集体而言,以对集体责任的弥散性为特征的团结是没有制度化的个人之间的忠诚的制度化的对应物。

因此,这两对变项涉及到协调人格需要和能力(作为行动者,是他们构成社会系统)与社会系统本身结构之间的机制。

另外两对变项是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和先赋—成就。与前两对变项比较而言,它们对社会系统具有参照作用,它们分别涉及到进入社会系统结构中的价值—规范类型以及选择过程(社会系统结构由此形成)“考察”行动者(作为行动取向的对象)特征的方式。这四对变项都是关系系统结构的组成部分。但第二对变项更关注于功能参照的社会系统一端,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忽略它们,第一对变项也几乎完全能够解释一个社会系统对个人需要的动机是否恰当。但就社会系统的结构分化和变异的基础而言,这就不正确了。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在分析社会系统(作为结构类型)的变异时,第二对变项占主导地位,与第一对变项的结合实质上已是下列事实的结果:某个特定的社会总是以某种方式依据第二对变项而加以组织的。另一方面,在分析调适和人格问题以及在分析某一既

定社会结构背景下该现象的变异时,第一对变项占主导地位。

最后,第五个变项,“自我取向—集体取向”位居“中间”。这是因为,它并不起主要的结构作用,它的作用是整合的,当然,与其他变项一样,它也是社会系统结构的成分之一。但这个变项的参照点“内在于”社会系统本身,实质上,这些参照只是关系的;而其他四个变项的参照点是“外在的”,因为指征行动组分的特征,这些组分在逻辑上是先于它们在社会系统中的组织。

由于上述原因,在下表中,以变项“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先赋—成就”为主,形成了一个以四种社会价值取向为主要类型的分类表。但其中每一格并非简单的一类,而是完全展开的表中(包括32种可能的组合)八个格的总结性表达。不过,就社会结构分类的大多数目的而言,把这32个格看成是四个主类型的子类型,似乎比较合理。但不能过分强调这一点,最主要的是分类本身,以及对行动结构及其在社会系统中的深化进行最一般的考察中推导出一个系统性分类的可能性。这是对社会结构的可能类型进行分类以及最终对社会进行分类的根本出发点。很明显,下表并非这样一种分类,因为它只包括价值取向要素,并未考察社会系统的其他成分。

价值取向成分组合的类型主要的社会价值取向

		普遍主义	特殊主义
成就		普遍主义的成就模式 A	特殊主义的成就模式 B
		期待服从普遍主义的标准和通用规则(与其他行动者相联系的)的主动成就。	期待与行动者所处的特定关系背景有联系,或者(和)代表这种背景的主动成就。
先赋		普遍主义的先赋模式 C	特殊主义的先赋模式 D
		期待遵循一种普遍主义规范的行动取向,这种规范要么定义为一种理想状态,要么体现在现存社会中的地位结构中。	期待符合一个既定关系背景中的一个先赋地位的行动取向。

### 1. 普遍主义的成就模式

这种价值模式的组合,在某些方面,完全对立于主要由血缘、社区、种族和阶级等关系性先赋团结所组成之社会结构的价值。实际上,普遍主义自身具有两个主要的应用类型。首先,它崇尚在通用规则的基础上决定地位和处理角色,如分配人员、分配设施和奖励;这些规则与独立于关系视点之外的分类属性和表现有联系。其次,在文化层次上,它崇尚认知兴趣而非表达兴趣。在大多数社会情境(如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既定”的情况下,这种强调已经包含某种“张力”(tension)。

然而,它与成就价值的结合,更强调了实现目标与导致实现目标的工具行动的价值。对目标的选择必须符合普遍主义的价值标准。因而诸如提高集体的福利等目标一般都已形成文字。只要集体是实现具有内在价值的目标所必需的,它就会受到重视。在这种价值体系中,这是某些“个人主义”趋势的基础。

成就要素对目标选择的问题还具有更进一步的影响。如果任一目标已定,那么,就存在某种压力使之得以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就取向实际上<sup>1</sup>是任何行动系统的一个内在方面,部分地、也是它的一个实际的方面。但是,成就取向,本身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模式,而不仅仅只是作为其他价值的手段,暗含着目标的选择应当体现这种价值观:目标的选择应当被看作是行动者成就价值观的一种表达,而不仅仅只是从其他价值考虑中所推导出来的目标的实现才是这种价值观的表达。首先,这就摒弃了作为一个目标选择的标准的传统主义。而且,由普遍主义所规定的**绝对的目标体系**似乎也遭摒弃,因为这种目标本身的实现可以是一劳永逸的,那么,从此以后,这种一劳永逸的实现,在其本身意义上就剥夺了价值体系中的成就成分。只有在**这种绝对的目标**被规定为即使已经实现也会受到挑战的地方,才符合成就取向的本意。

无论如何,与普遍主义一成就复合体更类同的是目标的多元性,这些多元目标的方向是统一的,而目标状态的特定内容是非统

一的。尤其相类同的是经具有内在动力的文化模式的整合,如科学文化模式,它并不承认一种终极的完善状态。

因此,可以说,当人们通过工具行动把一个多元的或(和)个人主义的目标成就的系统珍视为其主要的天职时,他们就拥有这样一种价值取向模式。这种模式会导致对与关系团结相分离的活动的重视——因此,这种社会系统的主要关注点就将是分化的工具复合体(*instrumental complex*),是职业角色,是交换的生态网络(*ecological nexi*),是所有权,是工具取向的组织。成就兴趣与认知主导性的结合意味着: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在一定的可被人接受的范围内,它总是鼓励定义新目标的冲动以及鼓励对提高手段效率的兴趣。这意味着,工具复合体将会是一个逐渐发展和分化的劳动分工体系,因而也是分化的职业角色系统。这是我们所谓的“工业”社会的中心结构类型。

本质上,这样一种结构会具有许多适应性方面。首先,简单地说来,职业志向的目标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是成就价值的直接体现,更不用说实际的角色活动,因为它们必须现实地适应于实际职业机会系统的各种情况,一旦完善的劳动分工在这种系统中得以建立,许多“本身”并无多大价值的事情需要有人去做,尽管完成这些事情是具有高度价值的成就成果的必要条件。在分工不太完善的系统中,这些事情可能连成一条通向个人所看重的目标的手段性步骤链,如果这全部是由一个既定个人来完成的,那么,他做这一切的动机问题就变得很尖锐。这种情况的最明显例子出在劳动角色中。但在其他两类职业角色中,即包含集体责任的角色和包含交换功能设施化的角色(它们的中心任务是对交换伙伴的劝诱),也存在这类重要的成分。因而,经理的销售员角色都包含接受那些对个人的成就价值没有直接意义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其奖励是:这种张力并不十分严重。但即使这样,这种张力也可能是造成“成功”(作为一种目标)与其重视内在成就的基础相分离的趋势中的一个因素。

那么,这种系统的一个适应问题就是:把实际职业结构中的现实主义成就取向与所谓内在成就价值整合起来。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相当的差距,但可由补偿性奖励的制度化(如缩短工作时间)和责任的制度化(如即使一位男性所做的工作“非常无聊”,他还是必须拥有一个固定职业挣工资)来连接。应当提到的第二个适应背景是有关应用普遍主义标准来判断行为属性和成就时的困难,以此标准,每个人都应被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其报酬恰与其实际成就呈比例。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发现,有些制度似乎直接与从主要价值取向模式推衍下来的原则相矛盾,例如,作为一种地位标准的长者优势、大多数工业中的提升和特权、学术界和公众服务中的“世袭”(tenure)体系。可以把这些看作是适应性结构,它的功能是缓和人们处在相互竞争的压力下而又不能实施详细的普遍主义鉴别时的结构张力。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系统服从一种细致平衡。一方面,它必须拥有与其主要价值模式相矛盾的适应性结构,因为,若把这些模式推到其“逻辑结论”,则会使张力上升到崩溃点。另一方面,它也必须防止适应性结构变得太重要了,以免喧宾夺主,从而主要社会结构自身转变成另外一种类型。

伴随职业角色的制度化,很明显,这种社会结构也十分依赖于所有权(即财产)和某个范围内的交换模式的制度化。这里的功能要求是:所有权和交换关系应充分地避免限制一个用于工具成就的设施系统的最优发展以及避免限制“按成就分配”的报酬灵活性。

然后,报酬系统必须与这样一种职业结构相整合。如上所述,这种整合的形式是:在系统内部,成就应当受到重视,而这种重视应表达达到称赞和尊敬的态度中,其反面亦应在系统内得到适当分布。相应地,非关系报酬必须在符号上与这些态度及其满足相整合。这暗含着总存在某些最低限度的不平等,尽管它的程度和确切内容会随着特定的成就目标、报酬符号以及职业系统分化程度的不同而异。最一般地说,这种系统中的最基本的报酬是“成功”,可

把成功看成是对有价值成就的欣赏水准。但是,有关这种奖励系统的整合之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更不用说各种表达符号与主要价值态度整合的方式问题。

赞赏和尊敬是直接满足的源泉,不过,具有其独特的特征。首先,它们排除了需求意愿的直接满足(无论是有针对性的需求,或是弥散性的归属),而只留下对赞赏的尊敬的需求本身。考虑到这一点以及其他情况,我们可以预测,在这种社会系统中,各种模式将会制度化,作为适应结构,它们将随着主要的普遍主义成功模式的不同而异。第一个例子就是亲缘团体,它是围绕着先赋地位和弥散性情感归属而建立起来的。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部分,血缘关系尚没有被任何一种工业社会所废除。对能够与工业职业系统形成最佳整合的血缘系统,我们或许可以指出两点。第一,它的团结程度必须是有限的,这样,身处职业角色中的个人才不至于与其血缘角色发生太激烈的冲突。一般地说,把最迫切的血缘责任规定为婚姻家庭的生育,并相对地把它与更广泛的血缘单位隔离开来,是可以满足这一要求的。第二,血缘系统与职业系统的结合主要集中于男性成人身上。尤其是借助于正式教育系统,职业系统对年幼儿童的相对排除是比较容易;教育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对职业角色的技术培训,就其主要方面来看,它也是一种预演的职业角色系统。主要的困难和冲突都集中在“妻子和母亲”这一角色上。就她而言,“容易”的解决途径是把她排除在职业系统之外,使她囿于“家庭主妇”的角色之中。然而,在大多数工业社会中,相对于这种解决途径,还有许多适应和妥协。第二个重要特征是血缘系统对情感的强调。一方面,对某些威胁个人主义类型的职业系统的血缘模式,它具有阻止其发展的功能;而另一方面,它又是对职业系统强调“情感中立”的抗衡者,因为它为在职业王国遭禁止的弥散性情感归属提供了一方天地。

因此,站在普遍主义成就价值系统之制度化的角度上,血缘结构及性别角色的模式化首先应被看作是适应性结构。但是,有许多

指标说明,它们对职业系统本身的经济动机具有至关重要的功能意义,它们的制度化具有战略地位;不能放任不管,而必须以某种方式将它们与工具系统整合起来。不过,由于模式的根本性差异,这两种结构之间的关系注定要成为工业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焦点。

正如这种社会系统的迫力(imperatives)对血缘模式的变异施加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样,在该社会系统中,比较小的地域社区亦受到限制。这种限制的主要基础是职业系统对自由流动的要求,这意味着,社区团结之过分紧密的联系(它不可避免地是弥散性而非针对性的联系)对主系统可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相类似的还有地区分化。在这种背景下,或许是部分地作为一种补偿机制,这种社会总是以最大的社区单位(即国家)来大量发展团结的弥散性情感态度。工业主义发展和民族主义发展之间的联系已得到详尽的阐述。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苏联似乎并非另外,除了它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之外。另一方面,对“美国家庭”情感的强化可能是另一种补偿机制。其原因是,主干家庭**既是血缘单位又是社区单位**(作为居所)。在某些方面,社会流动的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较之以比较大的社区单位的团结以及血缘团结,主干家庭的团结对普遍主义和成就价值的威胁较小。

在这种社会中,种族分化与其主要的结构模式并不协调,因而产生了矛盾。然而,种族分化仍常常存在,不仅是因为“历史的偶然”(如移民),而且,它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下去,说明它们具有功能。一方面,就某个种族群体的成员而言,种族构成了家庭单位以外的安全感中心,在某些方面,较之社区团结,它对社会的反功能要小;另一方面,对局外人而言,他们常常扮演了一种替罪羊的角色,成为被错置的侵略性的靶子。民族主义不仅吸收了社区大多数动机力量,而且也吸收了种族团结的大多数动机力量,因为民族(nation)通常既是一个社区单位又是一个种族单位。

一个开放阶级系统下的分层似乎是这种社会的内在特征。为

了与主要价值模式相一致,阶级结构必须是开放的。但是,某种形式的阶级分化(就对个人的不同报酬而言)和某些形式的整合(就血缘单位的所有成员的生活风格而言)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其基础是:家庭必须被整合在报酬系统之中,因而报酬系统的分化必须表现在作为一个单位的家庭(包括妇女和儿童,而不仅仅只是指职业地位的获得者)的生活风格中。因此,在这种社会中,机会的绝对平等具有内在的局限。

最后,在这种社会中,一种整合得太紧密的宗教系统可能起反功能。如果这种宗教的取向是强烈的彼世,那么,它就会降低中心角色系统的动机——如果不是,那么,就像马克思主义作为“宗教”一样,它就会超越平衡点,转向普遍主义的先赋类型。宗教忍容性和多种教派(如在美国的情形)是破坏性最小的结构。在这样一种系统中,政府只是一种集体,只有从它对受人重视的目标成就的服务中,才能找到其存在的理由。因而,集体性政治责任的制度化很可能是这个系统最严重的张力点之一。因此,这样一个社会的主要弥散性团结是家庭、阶级、社区、种族群体、宗教教会和民族。弥散性情感归属的生态系统也有活动空间,它们主要是在“约会”期间的异性关系之中,身处其境的人具有浪漫的爱的情结,但通过婚姻,它们被吸收进血缘单位之中。同性间的友谊(作为弥散性归属)不太流行,很可能是因为它比较容易偏离出成就团体(complex)。在男性中间,这种友谊更倾向于作为一种弥散性“半影”(penumbra)归属到职业关系上,其形式是,要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把职业伙伴也当作是一种朋友,这是一种责任。这样,它就流行开来,但并非形成结构的一个主要独立点。亲密的身体接触在美国社会的男性之间几乎完全是一种禁忌,这一事实可能是上述情形的表现,因为它严格限制了情感归属。

可以说,在家庭之外,针对性而非弥散性的表达取向并不太危险,而且它与工业社会中“娱乐”的繁荣有关系。在针对性表达中,行动者零零碎碎地获得其满足,而没有招致弥散性归属中所含的

责任。

一般来说,“情感的表达取向所居何处”构成这种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适应问题。弥散性的位置问题是这类问题的另一个焦点。我们已经讨论了弥散性与情感的联系,但这次我们将讨论它与“政治”功能(组织中和作为整体的社会中)的联系。在十分强调针对性的地方,禁令就会存在,从而阻止赞赏十分容易地变成尊敬、阻止把“总上级”(general superiority)贴在任何个人、角色或阶级身上。这是该社会中影响阶级系统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的最重要因素。自然,对待“总下属”(general inferiority)也是类似的。这样,在这种社会中,领导角色是不太稳定的,是大量的焦虑和攻击行为的焦点。这是导致反权威态度和在个人主义方向上起平衡作用的因素。

从价值取向的角度看,这种社会的潮流是对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的强调。特别是,它似乎又与普遍主义、成就和针对性之间的联系结合在一起。弥散性包含着一般先赋地位的联合式情感归属的联合,与这种联合的决裂似乎是人员与设施流动以及按成就分配报酬的基本条件(这种条件是该模式所必需的)。例如,在组织具有针对性成就目标时,领导角色很少受到指责;而在组织具有弥散性目标时(如政治组织),领导角色则易受指责。因此,这种种考虑都可以归结在美国社会的“经济”偏见以及政治责任是一个张力点的名下。

因此,若强调集体主义方向,该模式就转向普遍主义的先赋模式。不过,这里有必要对该模式的某些变异方向再作一点说明。首先,目标成就可以是非经验的。但是,除非这经验的目标具有直接的经验含义(地球上的天国,如加尔文教),可被当作是直接目标,否则,整个强调重心会偏离职业成就复合体,这个结果会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特征。以主要成就为导向的活动将不再是理性—工具性的,而具有象征仪式的特征。这种可能性,在天主教会中几乎已被完全实现了。该教会是一种为了实现非经验目标的组织,它的主要重心已不再是世俗的工具复合体,它更重视借助于传统主义和

(或)权威主义的稳定,而不是持续不断的发展。同样的理由,它反对情感和弥散性占主导地位的压力下降。这点可能与下列事实具有某种关系:拉丁国家,因其天主教背景,已经表明它们相对不敏感于工业模式的发展,而且在某些方面,尽管它们具有宗教先验论,但它们已滑向“享乐主义”的方向。

## 2. 普遍主义的先赋模式

普遍主义要素在此模式中与在上一模式中一样,具有同样的效应。但它与先赋的结合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孪生子。首先,强调重心变成了**分类**。可能存在一种**附属**的成就取向,因为行动所取向的事物理想状态可能不在此时此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有责任努力使之实现。相反,如果理想状态已经存在,人们就有责任捍卫它,使之免受威胁。不过,成就受到重视的原因是其工具性而非其本身。由于对理想状态定义的普遍主义性质,二元论的趋势就很强大,即在服从理想和违背理想之间划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绝对界线,在行动上,就是“拥护理想”还是“反对理想”。

这种二元论的表现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刚刚提到的,即对特定个人、集体等态度的二元论;另一条是应用价值模式本身的位点的二元论。一方面,现在的制度结构(或其中的一部分)可能被认为是体现了一种理想状态,并由这种理想状态所调节。另一方面,理想状态亦可以被用来反对现存模式——一种理想状态反对一种腐败现实。无论哪一种情况下,二元论趋势都是存在的。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现象:同一种价值模式,既存在于某些类型的极端保守主义之中,也存在于极端激进主义之中。

由于普遍主义要素,该模式亦同样强调职业和组织领域以及它对亲缘或狭义社区的独立性。但是,有几点重要的差异。第一,从社会结构上讲,对分类性质的过分强调会转向对地位(而非成就)的强调。因此,在各种角色中,具体的成就具有极高的重要性,而且也符合普遍主义的标准,但这些角色不可避免的深入分化却常产生一种“地位等级”,它所强调的是某个特定行动者是什么人,而不

是他做过什么。<sup>①</sup>

其次,由于对成就之具体化(particularization)缺乏重视,集体主义趋势极其强烈。理想状态常被定义为一种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所享有或由社会来实现的状态;而且,一种有待实现的理想状态很容易滑向把理想属性归诸集体身上。

第三,存在权威主义的趋势。因为,当“何为理想”是人人都清楚明白的时候,承担集体责任角色的人就很自然地“审视”着:人人都应严守理想,要么直接信奉,要么对集体成就作出适当贡献。

更一般地说,“弥散性为主、针对性为辅”是一种强烈的趋势。例如,地位并非为一个特定职业角色所特有,而非常容易地与一个普遍声望尺度形成普遍联系。地位的这种普遍化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性质归因到个人所属集体的趋势。因为普遍主义排除了对特殊主义要素的坦白承认,群体(如宗教或阶级)被认为是具有内在的属性。因而,“贵族”、“种族性”,尤其是“民族性”等概念是符合这种取向的。在报酬系统中,尊敬高于赞赏。

或许可以说,这种模式具有其独特的、激烈的内在冲突。在此模式中,成就、普遍主义和针对性的内在联系已被打破。实际成就必须起重要作用,其作用愈大,社会结构就愈分化。但是,成就并非因其本身而受重视,这已是冲突的一个来源。在某一方面,对集体主义的强调可能是这种冲突的一种表现,因为集体主义旨在禁止对成就强调的个人主义趋势。而且,禁止情感的趋势尤其强烈,尤其当情感集中在社会上或一般成员的地位“荣誉”上时。因而,与前一模式相比,情感表达已降低到更加次要的位置。特别是,特殊主义的归属极不受重视,因而,德国人从来没有美国人相应的真正浪漫爱情。

这种社会对职业体系十分强调,因而,与前一模式相似,它也

---

<sup>①</sup> 这是保守主义的情形。在革命的情形中,同类的地位等级亦出现在革命运动本身,即政党之中。

限制血缘单位的规模和构成,但二者对家庭角色的定义仍有重要差异。从弥散性上讲,这些差异的主要焦点是“地位范畴化”(status-categorization)的重要性,这首先表现性别和年龄(它们对家庭内在结构具有影响)范畴的泾渭分明,特别是,女性角色的定义总是以男性作鲜明对照的。在政治—职业结构,约束和情感要求都非常重要,因而,这种社会似乎很可能特别强调女性是被爱的对象、是被动的,而不是更高的工具能力或道德能力。再加上这个社会对等级和权威的强调,这一切似乎都提示着:存在一种权威型的家庭结构,妻子们须“安分守己”。这是德意志传统家庭结构的阴暗特征。

实际上,“保守的”德国社会似乎是这种模式的最佳例子,它强调的是现状。另一方面,纳粹主义是把理想状态投射进未来的一种政治理想,曾被人们误认为是德国民风(Volk)之神秘、理想品性的散发。在某些方面,苏俄亦近似于这种模式。共产主义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状态,有待于通过集体行动来加以实现,党是实现这种理想的精英先锋队,党是主要地位的轴心。

与美国的经济中心不同,这种理想模式容易形成政治中心,这一点与它的弥散性和为了集体理想动员一切力量的趋势有关。政治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这种结合与这类社会的侵略性趋势有关联,而内部冲突的严重性以及参与者把焦虑和攻击性投射到局外人身上的趋势,又加重了社会的侵略趋势。采用权威措施消除内部对立的极端有效性,也可能强化这一趋势,因为权威措施不会在人民内部寻找“替罪羊”,尽管这些“替罪羊”是相对“安全”也足够重要,完全“值得”成为攻击的对象;若内部冲突的程度如此低,那么,低水平、随处漂移的侵略似乎是毫无疑问的。

从这种模式的一般特征可得出:作为实现或维持集体事务理想状态的机构,政府将会受到特别的重视。从相应的角度说,集体道德(不同于个人道德)尤其处在中心的位置上。在前一种模式中,对私人利益开放的广大领域,在这里则被认为是“低水平的道德”,其公式是:私利与公利相对立。

### 3. 特殊主义的成就模式

成就取向的中心是,对社会对象的评价是据其所为而非据其所是。但当联系到是什么成就内容受到评价,以及另一方面,在何种社会关系背景下进行评价时,有些问题就出现了。

从普遍主义转向特殊主义,排除了“评价成就的主要标准应当是普遍主义标准(如效率,或符合某个一般理想)”这一可能性。相反,主要标准应集中在关系系统本身的某些参照点上,或集中在关系系统所处情境的某些内在参照点上。可以假定,这些参照点首先是对对象范畴化(即血缘关系、空间和时间位置)的关系基础,如定义角色期望那样。然后,才是社会关系结构本身的某些“附属”参照点,诸如团结集体中的成员资格和主从关系。

成就要素与这些特殊主义重点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对这些重点的取向不可能是被动的。因而,成就重点就引出了适应之“恰当”模式的概念,它是人们成就的产物,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保持;而一旦失去,又必须重新获得。同时,以关系为着眼点也使得这种成就取向不可能树立超越于系统以外的目标。

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似乎非常符合这种模式。可以说,组织中国社会的主要关系参照点是血缘、地方社区、祖业绵延、等级关系的排序以及对集体道德强调对集体活动的责任,从天子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到父亲对家庭的责任,无所不包的一般取向。在该社会系统中,工具取向和“自发的”表达取向一般都是从属的。包含这两种取向之一的活动一般都是在广泛的团结单位(由之构成社会主结构)中进行的,如工具性活动。

首先,这种整体结构符合众所周知的中国社会的“家族观”(familism)。对主干家庭之外的血缘单位的团结,强调得很厉害。把家庭扩大开来主要发生在时间维度上,祖业绵延、对祖宗的责任,都受到重视。但绵延香火的迫切要求使得母系血缘完全奉献了父系血缘,因而,妇女的从属地位则主要是一种适应性结构。兄弟地位的平等问题似乎包含着除血缘所包含的紧急情况以外的紧急情

况,如工具复合体中的意外情况。

中国的血缘单位与地域社区密切相连,这是土地之所以具有如此绝对的重要性的原因之一。首先它包括家庭在村庄中所拥有的土地,也包括象征香火绵延的家族墓地。在较高的地位层次上,作为该镇上众多士绅家庭的一员,它还包括亲缘群体在城镇的居所。

在极端地方主义层次之上,该社会系统分化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权力整合的危机,一是通过地区间文化统一性的问题。这种分化也包含一种等级分化。无论就拥有土地的士绅对农民家长式的统治而言,还是就更加个人主义的成就优势和政治权威而言,这一等级分化都倾向于直接制度化于与血缘模式相同的模式之中。

中国社会的封建关系一直是组织起来的,这一事实似乎与基本价值取向中的成就要素有联系,而成就要素的来源是:地位之遗传完全与成就价值相对立。无论如何,皇帝以下的高层地位都是根据成就通过科举制度以及官吏委任而加以组织的。这些包含一种流动要素,可象征地摆在每一位中国男青年面前,成为他个人成就目标。但是,一般价值取向中的普遍主义的相对衰弱与下列事实有关:这是一种弥散性而非针对性成就模式,是获得“优越性”而非能力。可见,士绅阶级是一种适应性结构,他们在政治组织与其他社会之间承担功能。

相应地,该弥散性使得地位优越性与责任密切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既是集体主义的,又是权威型的。普遍主义的弱小加上针对性,使得成就很难变成个人主义取向。在严格集体的意义上,优越地位与责任同时产生。特殊主义在关系系统中的固定也有助于对传统主义的强调。这种传统主义是一种仪式模式,它具有永久的约束力,而且由于它过去曾经被实现过,因而人们也认为它会被重新实现。

较之于普遍主义的任一模式,这种模式更加明确地接受血缘纽带。在团结集体的整个等级网络中,血缘起中心作用,在某种意

义上,它也是所有集体的原型。但是,在某些方向上,血缘单位中的取向依然是有结构的。很明显,这是因为自发情感受到限制,而为了整体责任的“道德家”态度却受到赞扬,这一系列的事实打消了美国式的浪漫的爱。实际上,只有当自发情感是零星的时,人们才会容忍它,而且自发情感构成了越轨的主要焦点之一。

工具趋向要么被控制,要么被禁止;因为其个人主义趋势容易破坏中心集体的团结。把成就引向集体方向的,正是这一点。但对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强烈禁止所引起的后果是,象征行动的某种主导性得到发展,这种“礼仪法典”仪式性的成分高于工具性。实际上,儒家道德,除了其集体主义倾向之外,更倾向于是一种仪式性的礼仪,而不是西方人心目中对善事的“伦理”取向。

因为特殊主义取消了成就取向的个人主义含义,正如先赋性又取消了普遍主义的含义一样,因此,该模式因其模式变项的对立组合而具有一种集体主义特征。另外,较之于两种普遍主义模式的理性主义,该模式更倾向于传统主义,因为其特殊主义使得主要成就目标不可能置于既定关系系统之外。

#### 4. 特殊主义的先赋模式

该模式与上一模式有某种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差异。因其特殊主义,它也具有围绕关系参照点(如血缘关系和地方社区的关系)而组织社会结构的趋势。但是,因其对先赋的强调,这些关系就被认为是既定的,是只能被动“适应”而不能主动加以组织的系统参照点。

在这种趋向下,存在这样一种偏好:除了人类情境中基本给定的一切外,分化愈少愈好。但是,由于权力问题等带来的各种意外,这一点几乎做不到。从权力和文化上讲,地方社区以上的某种整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这种比较大的整合和生态结构易被人们接受为既定情境的一个部分,当秩序受到威胁时,它们具有正功能,否则,人们就把它们当作是天经地义的。为了主动地组织一个系统而把这种结构用作一种政治结构的动机从不存在。这些结构

首先是一种既定的事实,其次是防止不稳定的保障。

与上一模式不同,对成就缺乏强调甚至更进一步阻止了工具取向及其相关结构的发展。工作基本上是一件推脱不掉的麻烦事。因而,强调的重心就落在表达方向上,这完全是一个艺术取向的社会。这种社会倾向于传统主义,原因有二:第一,不存在打破传统的动机,相反,对传统的稳定却存在强烈的既得兴趣;第二,存在一套高度完善的表达符号。事实上,这是一套惯例体系,只有当符号意义高度稳定时,它才能行使其功能。因而,人们的道德是倾向于对既定标准和安排的传统式的接受。

道德和责任集中在两个方向上,第一,涉及到预测未加调节的表达取向中可能具有高度破坏力的危险,这种危险既可能是侵略性,也可能是与既定秩序相冲突的归属。第二,涉及到破坏既定秩序的环境危险。

这种社会容易成为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的社会,如果不是反权威的社会,至少也是非权威的社会。在这两方面,这些概念在该模式中与在普遍主义模式的含义大不相同。此时,个人主义主要关注于表达兴趣,对能够通过成就而改变情境的机会关注较少。除非比较细微的社会构架受到威胁,否则,不会关注它们。同样,只要权威不是过多地干涉表达自由,权威就不会受到应有的反对,实际上,作为稳定的一种因素,它甚至还可能受到欢迎。但是,像在权威主义那种情形里那样,把权威看作是应有的,这种主动的动机在该模式中亦不存在。对较大社会问题的冷淡,使得形成权威的阻力比较小。因此,在这种社会中,对“领袖”的一种敏感并非不常见。西班牙美洲似乎是这种模式的极好例子。

(陈义平 译)

T. 帕森斯

## 关于变迁的功能理论\*

### 结构和过程

一般来讲,将这一主题放在一篇简短的论文中来加以讨论显得过大,除非一个人将自己限定在最高的概括水平上。所以,我乐于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系统变迁的一种主要模式上,这种模式与生物有机体增长过程的模式极其相似。这通常包括系统“体积”数量上的增长;在社会系统中即是人口的增长,而且也包括具有重要意义的性质或“结构”上的变迁。我想集中加以探讨的结构变迁类型是结构分化过程以及伴随而来的对分化部分进行整合的机制与模式的发展。

科学方法的真谛之一就是,不可能同时研究每件事情,既然科学概括总是以变化过程中各种相关性的证明为基础的,那么在被观察到的处于各种时间与范围限制内,以及在我们为了当下目的将其定义为具有重要性的各个方面发生变迁和不发生变迁的现象的各种特征之间,就必然总存在着一种差别。如果没有与其相联的

---

\* 选自 E. 爱兹奥尼主编的《社会变迁》一书。

不变的背景,有意义的变迁的各种特性就不能确认。

对我而言结构概念就是这一基本观点的简要陈述。一个系统的结构就是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集和它们的关系或结合,这种结合为了特定的分析目的,在可定义的限制内从逻辑上和经验上都可以看作是不变的,但是如果建立了强有力的经验证据,证明为了一些特殊的系统类型把这样一些要素看成是不变的常量对于理解其他要素的变化模式很有帮助的话,那么这种结构就不单是一种武断的方法论的假设,关于它和其经验稳定性之限制的各种命题应成为和“动态”概括同样重要的经济概括。

所以,任何普通的系统,一方面都可以为了方便的目的而描述成一种结构、一组带有稳定特征的单位或成分的集合,这些特征当然是理性的;另一方面,也可以描述成“发生了某事”以改变某些特征和某些关系之过程中的一组事件,一组进程。

稳定性的概念在这里一直被明显地用作结构的一种定义性特征。前一术语(必须和结构区分开来)的意义在于,它被用来刻画一个系统整体或它的亚系统的特征。在这种意义上,它等同于稳定的均衡这类更为特殊的概念——稳定的均衡在其他参照系中也可以指“静止的”或“流动的”。当结构和在其内部进行的过程之间的关系、结构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以至于使我们为了方便的目的而称之为结构的那些特征和关系维持不变时系统就是稳定的或处于相对均衡状态的。非常普遍地且总是在“动态”系统内,这种维持依赖于持续的修正过程,这种持续的修正过程“抵消”了变异的内生或外生来源,这些变异如果得到足够的发展的话,将会改变结构。在这种意义上均衡的一个经典例证就是哺乳动物和鸟类面对环境温度不断变化,通过要么产生热量(包括放慢热量损失的速度),要么放慢热量产生的速度或者加速其扩散这样一些机制的运行,对几乎不变的体温的维持。

与稳定性或均衡过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引起结构变迁的过

程。存在着这样的一些过程：它们具有基本的科学重要性，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甚至在物理学中（在这里一种特定元素的原子团一直是稳定的结构参照物的典型）现代核物理的各种发现都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变迁理论，这种变迁理论认为，通过核聚变或裂变，“原子同一”的结构会改变成其他形式。坚持保持结构和过程的概念、稳定和变迁的概念分析性区别的重要性，其原因不是由于偏好于每一对概念中的某一个，而是由于偏好科学分析的秩序性程序。

就我所知，两对概念之间的区别是一种系统参照层次上的区别。系统的结构及其环境的结构必须与系统内部的过程和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交换过程区别开来。但是，本质上通过结构和过程、与其环境的交换来维持系统稳定性的过程，即系统的均衡状态一定要与这样的过程区别开来，通过这种过程，结构和更为“基本的”过程之间的平衡以一定方式发生改变，导致系统新的不同“状态”的产生，这种状态必须依照前一结构的改变来加以描述。毫无疑问，这种区别是相对的，但它是一种本质的、秩序上的相对性。我一直在讲的就是，在变化中的恒常性问题上至少两种系统上相关的视角对于理论分析的任何复杂层次都是本质性的。

这些考虑构成了我准备进行的社会系统变迁分析的主要框架。我试图讨论在意义上与稳定性正相对照的一种变迁类型，因此假定存在与均衡概念相关联的一个系统或一组系统，但是这个（组）系统被看作是正在经历倾覆最初的均衡状态，然后进入新的均衡状态这样一类变迁过程。

让我们从社会系统的结构问题开始，并引入形式性的和实质性的两种考虑。形式性的考虑就是任何经验系统的结构都可以看作包括：（1）单位，如微粒或细胞；（2）单位之间模式化的关系，诸如相对距离，进入器官或结构的“组织”。对于社会系统而言，最小的单位就是个体行动者所参与的角色（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是地位角色），最小的关系就是那种模式化的互惠性互动关系，依照这种关

系每一参与者作为行动者与其他人相联系或者说取向于他人,反过来讲,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所有其他人的目标。社会系统更高层次的单位是集体,即许多人类个体角色扮演的有组织的行动系统。也许当他们被看作行动者时,最好把每一层次的单位都说成是取向单位;当他们被看作目标时,则最好都说成是模式单位。

在社会结构中“模式化关系”的因素部分说来确实是“规范的”。也就是说,从特定单位的观点看来,在适用的或不适用的,适当的或不适当的,正确的或不正确的轴线上,它包括对于它的或它的行为的一套“期望”。从其他与参照单位相互作用的单位的观点来看,这是一套根据它肯定的或否定的约束能够被合法化的标准。与单位情形中角色和集体之间的区别相对应的是关系模式的规范和价值之间的区别。价值是一种规范性模式,它在单位间的功能或其特定环境之间的功能不存在着差别的情况下为一个与环境相联系的系统定义合理的行为,另一方面,规范是在特定方面为一个单位或一群单位定义合法行为的模式,这个或这群单位与其他群体在责任上有所区别。

认为社会系统的关系模式是规范性的,因而也即是认为它们存在于制度化的规范文化之中,这样一种假设事实上也可以延伸到单位的结构上去。使这一点变得清晰的方式之一就是指出,在一种参照层次上是单位的结构,在另一层次上就是系统。所以我们所说的单位的结构特征就是下一层次上规定组成其亚单位之间关系的关系模式。因此有理由声称,在更广泛的角度上,社会系统的结构一般说来存在于制度化的规范性文化模式当中。这些当然必须被理解为在我们称之为单位或单位之间关系模式这样两种不同的组织化水平的应用,这一点非常重要。

现在回到以上讨论的稳定系统的范例,系统内的过程必然一方面被看作是系统单位(亚系统)之间输入与输出的相互交换过程,另一方面被看作通过其单位的作用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交换过程。这样,不管关系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都产生了所有单

位种类之间这种输入与输出的“流动”。那么我所说的制约着关系的规范性模式就可被认为是这种流动的控制规划。因为要使稳定的相互交换得以进行,一方面必须有输入与输出在运动上的灵活性,但同时也必须有疏导这个过程以将其变异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各种方式。

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包括各种“有价”事物即商品、服务和货币的交换在内的交易流,它们构成了市场过程。另一方面,规范性模式是定义金钱本身的制度性模式、契约及财产中金钱之外的那些方面的规范(正如杜克海姆在其关于契约中的非契约因素的著名短语中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市场系统的均衡依赖于对上述那些流动的速率在波动上所做限制的维持(相对于一组可定义的条件)。在此意义上市场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则是规范模式系统和制度的稳定性问题。

那么,通过一种制度性合成的稳定性这种说法,我们要表明什么意义呢?首先,它当然意味着规范模式本身的稳定性。单个的术语“规范”,尤其是它被等同于“规则”的时候,也许过于狭,因为它似乎暗示了一种允许以一个单一命题进行描述的简单的层次;这对于财产或契约制度而言是潜在地不真实的。第二,稳定性暗含了行动单位最低程度的责任,即倾向于与相关期望相一致的责任——而不是逃避或违反它们——以及把相关约束(不管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运用到其他单位以此对行为、逃避或侵独作出反应的责任。第三,在理解参照系统是什么的意义上制度化暗含着对于一个经验的、相互理解的“情景定义”的接受。

最后,制度化意味着对出现了问题的、更普遍地从整体上制约系统的规范性合成进行整合的某种秩序。这样,“分离但平等”的教条证明是与在“法律的平等保护”的宪法权力基础上形成美国宪法权体系的其余部分模糊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可以说,1954年最高法院的决定是制度整合的一个步骤,或者至少是法院面临的重要问题。

## 变迁的内生和外生来源

稳定均衡的概念暗示着,通过整合机制,内生的各种变异被限制在与主要结构模式的维持相容的范围内;通过适应机制,系统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波动同样处于一定的限制范围之内。如果我们从惯性原理的观点出发看一看“稳定均衡”的含义,那么它就成为一个说明在这种稳定状态下通过充分数量的干扰来克服稳定或平衡力量或机制的选择问题。一旦一个干扰满足当前的那些标准,问题就成为通过系统追寻其效果,以及确定新的稳定状态能够被预测(或回顾性地说明)的条件。

这种变迁原则上或者是内生的,或者是外生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是在接近这一问题时记住我是在严格的分析性的意义上处理“社会系统”概念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源于社会系统成员的人格,承担那些人格的行为有机体,或者文化系统的变迁可以归类为外生的变迁,尽管从普遍常识上来讲只有源于物理环境(包括其他有机体和社会),也许还有“超自然”的变迁才是真正外生的。

我和许多同事为了进行一般行动系统的分析而一直运用的形式化范式认为,首先,影响社会系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渠道就是文化和人格系统,而且它们影响的方式不同,反过来文化系统的直接影响首先包括经验知识,所以在那一范围内它应该进入知识社会学领域。这虽然很重要,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准备在这里直接讨论它,而只想把自己限制在与人格相对的边界地区。

但是,为什么与人格相对的社会系统的边界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一问题具有双重原因。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它与个体的“动机”有关,因此在分析心理学的意义上,与他的“满意”及其相反物“失意”的水平有关。但是间接地看,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系统在结构上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所说的制度化的价值观,正是通过它在

个体人格中的内化来被制度化的。这就是社会系统“插在”价值观文化状况和其对于个体人格整合的重要性之间的意义。

分析可能存在于文化价值和人格之间的独立变化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也许可以假定诸如气质更新之类的问题至少部分地落在这一范畴内。但是在给定这种联系的相对稳定性的情况下，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它在典型个体的人格中，存在着价值和动机承诺的一种整合，这种整合，出于启发的目的，可以假定它是稳定的，并且反过来也可以假设，它能被用来定义所需角色——相应个体行为者类型的期望——的取向结构。进一步而言，无论是把社会作为整体或者作为亚系统来分析，这都应该是正确的。这种假设清楚地表明，出于分析被考察的特殊变迁过程之目的，制度化价值应该被假定保持不变。

我也假定，用来对考虑中的行动单位种类同他们情景中的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义的规范性模式的结构最初也已经给定，但是同时也假定这是我们重要的独立变量，亦即问题是要在这种规范性结构中，在制度中来说明各种变迁过程。这就使客体的形式留下作为变迁产生的焦点。所以我将假设在社会系统与其环境的关系中产生了变迁，这种变迁首先对系统内部一个或更多的行动单位的情景定义形成冲击，然后产生进一步的反响，对规范化的制度模式形成要求变迁的压力。我特别考虑的压力类型是存在于分化的方向上。

### 分化的一个模式

具备了这些初步的想法，现在让我们尝试以一般性的术语概括一个分化周期中的主要步骤，然后把这种分析应用到家庭和生产集体之间的分化上去。

我们首先假设一个正在经历分化过程的社会系统，例如同时承担着“职业”功能的家庭，在其目标达成边界上出现了输入的赤

字。从功能观点来看,可以说它在目标达成的能力或者完成期望的能力上所受的挫折,可能集中在对它来讲很重要的某一功能层次上,即或者是集中它的生产效率上,或者是集中在履行后来成为家庭“剩余”功能的社会化职责和规范成员人格职责的效率上,或者当然也可以是集中在这两方面的某种结合上。第二,它当然涉及到社会的这个与那个亚系统之间的边界。在这个例子中,重要的边界概念是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以及单位在社会中之地位的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后者可以采取也可以不采取明显的宗教方向。但是其基础是在更为普遍的层次上从个体人格向社会系统的输入问题;在前面的例子中这点特别重要,因为家庭和职业角色对于成人的人格而言,是履行社会功能的最重要的承诺焦点。第三,刚才所提到的挫折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即设备和报酬的条件性结构部分和期望系统的规范性结构部分之间存在着某种平衡。后一部分是导致分化过程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包括在这三种区别之中的复杂性也许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可以认为困难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严重。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这是因为规范性成分很重要。其他两种之间的差异,关系到被探讨的系统变迁的内生和外生来源之间的区别;处于特定社会参照系统各种角色中的人格“直接”作用于那个系统,而不必通过它和其他社会系统之间边界上的相互交换来完成。

这里必须提出的最重要之点是,不管其来源如何,如果一种干扰力量对社会系统的目标达成亚系统造成冲击,其效果首先就向两个方向传播,其中之一关系到获得履行主要职能的设备的功能性问题,即可用设备的种类及其可用的条件。另一方向关系到这样一种整合性支持,通过这种整合性支持,单位在系统内部获得某些意义,据此它可以被说成得到了“干某种工作”的“委托”。反过来,这种说的后面以及在更高的控制层次上,则是它的功能的基本“合法性”。这儿的支持可以被定义为特指对特别的单位或单位群体的支持。另一方面,合法性则更多地涉及到各种功能而不是特殊的单

位,以及更多的涉及到规范模式而不是操作模式。

这三个问题构成控制的等级层次。首先是适应性问题,如果存在着其他的问题解决办法的基础,它必须被首先解决,其他亦然。在这里“解决”指在设备工具问题上为在更高层次上获得该功能而提供机会。这样的机会总是双管的,一方面它有一个具体的资源方面,另一方面它有一个规范性的控制“机制”和标准。

另一个熟悉的社会学概念在这里也应该提到,即“归属”。归属本质上是指同一结构单位中各种内在独立功能的结合。以这种方式来看待问题,分化就是从归属性联系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过程。它本身是从确定的限制中获得“自由”的过程。但同时它也是进入一种规范性秩序的过程,这种规范性秩序使现今独立的单位服从于一种与它们所隶属的更大系统的功能必要性相容的规范性控制。但是,在分化当中,单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选择和行动的自由,这在分化过程发生之前是不对它开放的。进一步说,无论以分化后的哪一边作为参照点,情况都应该是如此。

这种从归属到一种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的解放的正面影响就是提供了可用于交换收入的更大范围的服务的自由。也就是说,劳动力在更高程度上被分化开来,更多的专业化人才可以找到职业。一套新的条件当然也被引进,因为更重要的专业人才经常包括一些训练和经验方面的必要条件,这些必要条件不可能是当然地普遍具备的。

从家庭的观点来看这两点是相对的“条件性”因素。我们可以说它还不足以使分化过程发生,除非这些方面确定的最低限度,如果不是得到保证的话,也应该具有很大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反过来依赖于两种进一步的包括过程在其中发生的更多的分叉关系体系在内的考虑。首先是关于劳动力市场性质的考虑,工资劳动者在这个市场内提供服务;其次是他得到保护以免于接受恶劣条件的压力的程度。在运作层次上,现代劳力市场包括三种主要机制,虽

然其他机制也许以不同的形式得到发展。这当然指潜在的经营者的竞争、雇佣者群体自我保护措施之间的竞争(例如通过集体协商,通过由更高的“权威”如公共机构来建立和加强一种规范秩序)。这些因素结合起来的制约效果就是把单位从特定的压力中解脱出来,这种特定的压力是由供给的任何一种来源如收入所施加的。通过诸如财政机制和信用体制这样的手段,也通过时间上的延伸,受雇佣者也许在财产所有者未达到的程度上从直接的压力中解放出来。

现在让我们回到第二种情景,即对于履行功能的支持。在这种情景中,种地被认为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不是一种“商业”。由于在创造更高生活水平方面这种组织所具有的高效率,典型的职业雇佣被合理化了,但是当它包含着停止“独立”和停止“为自己而不是为经营者工作”时,它也许就存在着问题。另一方面,存在着家庭“功能丧失”的问题,其含义就是已分化的家庭不是在“做有用的工作”,而是已成为一个单纯的消费单位——在女性从事“闲暇”性活动较集中的地区这一问题尤其迫在眉睫。依据自由的程度问题,通过这种情景,我们也许会对以上称之为支持和合法化的两种层次仔细地加以区分。

在我所说的支持的情景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家庭在地区性重要的“公众舆论”中的地位。这种单位的支持归属这样一个概念,即在社区中可接受的地位和财产地位的含义一起受到财产所有权的束缚——被雇佣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二等公民。看上去,正如在可用的工具设备情景中对于正在分化中的单位来说,相关的参照框架或“参照群体”是提供劳动和消费品的市场,在“支持”的情景中它是地方社会,因为典型成人的居住单位和就业单位必定在其内部产生。在未分化的情况下,美国地方社区的核心结构是由财产私有的亲属单位所组成——首先是农场家庭,但是同样的结构模式扩展到市场城镇的小商业组织和职业组织。在已分化的情况下,则一

方面是居住性的亲属单位,另一方面是雇佣组织。

既然居住性亲属单位本身的基本目标在于儿童社会化和成员人格的管理,社区在这方面就在新的层次上和生产性成就多样化方面获得了极为重要的新的自由范围。这些多样化的生产性成就,可以为较高层次的组织所达到,但却超出了亲属单位的能力范围。典型的家庭单位不再需要为获得那些利益而寻求具有自身结构形式的单位,这样它就停留在为这种结构所限定的范围之内,社区的成员可以在没有互相归属于另一种条件的情况下,从家庭王国和生产集体两方面支持社区的功能。

但是,这只有在存在着制约两种功能范畴借以相互关联的那些关系之标准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可能。这部分地涉及到市场关系,但也包括许多其他事物(例如为支持普遍社区利益作贡献的责任),这是通过征税和其他自愿途径来实现的。必须有一套新的“游戏规则”,根据它两套运作单位能够在没有产生过度冲突的情况下生存在同一社区内。那些平衡机制的主要焦点位于分层领域内,这也许首先是因为在已分化的意义上大规模的生产单位组织使维持一种家庭——农场社区型亲属单位的平等的基础成为可能。

这就产生了合法化问题,它关系到依据系统的制度化价值观来对具有社会性重要功能的组织的基本模式进行辩护或质疑。这里问题是要把合法化的形式从在较少分化的情景下组织的特殊性中解脱出来。这些考虑明确地进入了意识形态领域。为了使分化合法化,必须不再相信只有财产所有者才是真正“负责的”人,或者不再相信未受地方望族控制的组织必然只与“自我利益”有关;而不关心真正的“有所贡献”。另一方面,“失去功能”的家庭也许是真的“好的家庭”。

也许这种新的合法化最重要的焦点在于充分的、社会意义上合理的“人”的概念,尤其是作为与一方面在他的职业角色中,另一方面在他的家庭角色中,两个分化的职责和义务领域的平衡有关的人。如果这是事实,那么确实存在着与女性角色变化伴随而来的

极为重要的问题。第一阶段也许涉及一个比以前更为分化的女性特征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化问题,以前甚至在丧失功能的家庭中,妇女把自身首先献给丈夫和子女都是天经地义的。后一阶段则包括社区参与和职业参与的各种形式。

这三点看上去都是主要背景。在那些背景中,促使结构变迁的各种动力的直接影响必然发挥作用,如果它要想导致先前触合的社会产生分化的话。出于论述完整的原因,应该提到,将会存在一定的其他更加间接的问题领域。其中之一就是消费品味的纯粹内容,它包括在生活水平的变化之中,以及它与劳动力职业贡献的关系当中。第二就是不同专业化层次上的价值关系问题,这不仅仅针对系统内各种结构单位种类的合法化问题而言,而且针对制约它们关系的更为普遍的规范和标准问题。最后,最为直接的问题是位于杜克海姆所说的有机团结领域中。我认为它意味着对适应性过程和机制的规范化制约。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这是一方面我所说的支持和另一方面各种单位“利益”的现实作用之间的主要联系。

以上的讨论很匆促地谈到几种不同的“功能”背景,在它们当中,如果我们所定义的分化过程已经完成,新的结构稳定下来,某种新的秩序安排就必须发生。目前观点的实质是,在那些过程的每一个中都包含着输入—输出关系的复杂的平衡。对于任何一种这样的平衡来说,任一方向过多的倾斜都会对分化的成功和失败产生重要影响。但是,这幅图画的忧郁的复杂结构受到控制的等级因素一定程度上的削弱,所以更高层次上“适当的”模式的确立也许可以使在较低层次上控制相当大范围内的变化成为可能。

## 分化的后果

……总而言之,我乐于尝试概括成功分化的某些确定的主要条件,这些条件在一定意义上也构成了相关方面结构的特征。首先,存在着我称之为“机遇”的因素,这是与此类分化过程最直接相

关的情境的结构方面。当然,过程的运作首先假定了一种需要或需求因素,可资参照的干扰力量的来源。分化过程的实施反过来暗含一种领导因素,即一些个人或团体应该承担责任,不仅是常规“管理”的责任而是重组的责任。标准的经济学所讨论的企业家就是其典型例子。

但是为了有真正的分化,还必须有一种过程,通过它,先前归属于较少分化的那些单位的工具设备,能够从这种归属中解脱出来,并且能为了被正在出现的新的更高级的单位类型所利用,通过适当的适应机制,使这些工具设备成为可获得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从家庭单位的归属中解脱出来,但是具有根据市场体系和制度化的雇佣契约而被制度性的加以规范的、对于雇佣组织的可获得性的劳动服务。其对应物当然是对于剩余家庭单位而言的必需品的可接近性,这些必需品是通过购买消费品把收入花在市场上而获得的,那么再看看结构方面,机遇因素本质上是把对设备工具的相互接近制度化的可能性,在上例中它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例如,在另一种条件下,它也许就是通讯机制。

首先从集体组织的观点来看,结构重组的第二个主要情景与两种新的和分化了的单位种类在更广泛系统内相互联系的方式有关。我已经提到,在生产性家庭中,主要包括的是地方社区的重组。后者不再是亲属性财产单位的集合体,它只是得到一些将它与更广泛社会相联结的结构的补充,但是它产生了“居住”单位和“就业”单位之间关系的组合。显然,它使同一个人(首先是典型的成人男性)最重要的分化角色的联结成为必需的。

这可以被称作“方式的重组”,在这些方式下,特定的单位,无论是集体或个人的,都被包括在社会更高层次的集体结构内。由于最初的集体单位(或个体单位)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它应该或不应该被包括在内就不是一个问题,例如,移民宗族群体被吸收进入东道主社会和现在考察就是不同的问题。关键在于必须有一种直接位于最初的单位层次之上的集体组织的重构,或者是在已经有

的较高级单位上将旧的(或“残余的”)和新的单位进行合并,或者是创造一种新的此类单位,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基本之点在于必须确立一种新的集体性结构,两种单位类型在这种新结构中执行基本功能,并且凭其获得上面讨论的那种支持。当然对于新出现的单位或单位种类这一问题尤为尖锐。

结构的规范性成分不得不作为分化过程的一部分而加以重组的第三类情景是制度化规范更为一般的综合体;它不是应用于一种而是应用于许多种集体结构中。对于大范围和高度分化的社会系统来说这种综合体的典型就是法律规范系统,但是并非仅限于此。职责或成就的标准、技术精确的标准以及类似的事物均包括在内。

在我们用作说明的例子中,雇佣集体据以合法化的那些标准特别重要。这里,承认超出私有财产单位的两种不同阶段十分重要,这种私有财产单位是我们最初的参考之点,在其中所有的生产角色均由家庭成员来完成。下一步通常是“家庭企业”,其中经营者和企业家的角色均归属于家族,但“劳动”的角色则不是如此。当然,这一点在美国经济的“小企业”部分和其他领域仍旧十分突出。但是超出这个范围之外,则是组织完全与家族脱离。这种发展最重要的法律方面就企业观念的一般化以及它在许多不同领域内的合法化,在数量方面最明显的当然是经济。

在角色层次上,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在一定的角色种类中作为就业限定条件而被制度化的竞争标准,在它的背面是教育标准。像法律规范一样,这些标准独立于任何特定的雇佣集体或家族集团之外——在这个意义上两者都是普遍主义的。合作组织的规则限定了确定的组织集团所能做的事情以及在组织做这些事情时他们假定的责任;教育的标准限定了一定的就业类型的合法性资格要求的种类,所以对于不同阶级的个人开放的机会的种类和获得这些机会的方式都是有限的。

上面已经提出一个分化的过程(在我们赋予这个术语的意义

上)包括一个具有从它在其中运行的系统来看比它所有分化出来的单位的功能等级更高的主要功能的单位的建立。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制约那些功能执行(包括它的执行与社会结构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的规范,就一定比以前具有更高层次的概括性。这就是我们通过说“它们是更加普遍主义的”而阐释的含义;它们定义了在其恰当性上不能对更低层次的功能和执行该功能的单位加以限定的标准。这个标准直接包含了各种资源从归属关系中的解放。竞争作为角色的一种性质,在某种意义上否认宗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与较少分化的系统相比,更为分化的系统的规范控制标准升高了一级。

整个讨论一直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系统的基本价值模式作为分化过程的一部分不发生变化。但这不是说在价值层次上没有任何变化。这是这里所用的概念框架的一个基本命题,即每个社会系统都具有一个价值系统作为它的结构的最高等级的组成部分。从其成员的观点来看——如果它已被制度化——它的价值观在一个独立于内部结构分化或环境特殊性的层次上构成了系统合理种类的定义。这个“系统”包括模式类型和内容要素,即模式适用于何种系统的定义。在我们的例子中有着家庭活动的价值观和受雇一生产单位的价值观。用我所说的“模式”术语它们可能是相同的,例如,两者都结合了“工具行动主义”的一般美国模式。但是如果这些价值观要在其中的任何一种系统内实现就必须存在着更为一般的系统对于功能种类(不是其特殊性)和对于单位在其中运作的情景的种类而言的详细说明。

当分化已经发生时,这意味着包括新的和残余单位在内的新系统价值观在内容成分上必定与最初的单位不同,虽然在目前的假定下,在模式成分方面并非如此。新的价值观一定更加广泛,在特定意义上它们能在单一形式下(它允许每个人做他所做的,同等重要的是,不允许做其他人所做的)将两种分化单位的功能合法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之为“罗曼蒂克的意识形态”的广泛流行

证明了将更为广泛的价值观加以制度化的困难,宣称“功能丧失”(它是发生分化之后我们称为“残余”单位的不可避免的特征)是测量在贯彻系统的价值模式方面失败的一种尺度。例如,家庭对于从职业组织所获收入的新的依赖性经常被解释为对于独立支持的责任意识的丧失。这确实是意识形态,但它本身是重新构造的价值观的不完全制度化的指标。

更高层次社会体系的价值观和已分化的亚体系的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通过考察功能和情景所施加的限制,相对亚体系的“层次”而言更广泛系统的更普遍模式的含义的一种详细阐述。在这个意义上,一家商业公司可以在构成生产力和偿付能力的情况下高度评价“经济理性”,而对于更为广泛的价值观来说却比一个未分化的家庭更少合理性。在补充的意义上,家庭在经济情景中更能都投入到自身“消费”中去。

以上论述充分地指出了—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领域内少数重要之处。在本文中我阐述的只是社会变迁理论领域的一个方面。我不得不阐述得非常抽象,只有—小部分能够实证说明,但是对我来讲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一领域的问题原则上可以在经验——理论形式上得到解决。毕竟,我们已经尽力具有一种概念体系,它得到充分地发展以至于至少在分类和问题陈述的层次上它接近于终极类型——当然是在逻辑上——这使得对相互依存的系统分析成为可能。我们可以限定对于经验分析来讲很重要的变化的主要范围,能够限定通过它们变异被散布到整个系统的主要机制。我们可以确定标志输入和输出的赤字或剩余的界线,在这里和那里,我们能接近于详细阐明越过它均衡就将被打破的临界价值观……

(吴薇、仲夏 译)

M.列维

## 现代化与社会结构\*

### 相对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化社会

相对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化社会的区分是本书所作的全部区分中最最重要的一个。<sup>①</sup>这一分类实际上与社会间所有差别问题都有关系,尤其是与用来分析国际事务的所有区分有关系。我给出的现代化定义集中在动力的来源以及某个社会的成员使用的工具的性质。虽然这些成分通常被归之为技术的或经济的,但这一方法既不是技术决定论也不是经济决定论的一种特别形态。简单的技术或者经济决定论,像其他一切的一元论一样,总是陷入要么是正确但无意义,要么是有意义却错误的理论范畴中。这里给出的定义,只要谨慎地并且在适合于科学工作的意义上使用,甚至都不会导

---

\* 选自 M.列维《现代化与社会结构》。

① 它代替了相对工业化和相对非工业化社会的区分。对许多情况来说,工业这个词确实只意味着工厂。就我们这里而言,工厂这一概念无论如何也不是工业概念的精髓和灵魂;农业可以像汽车制造一样地高度工业化(例如,美国的许多现代农场几乎与任何工厂生产一样实行了机械化或工业化),娱乐活动可以和通讯系统一样地工业化,甚至大学和学习过程从总的看来也可以高度地工业化。诸如此类的例子不再列举。现代化这个词更容易作为一个概括性强的术语使用。

致技术或经济的偏见。我之所以用这些术语来定义现代化,是因为这样做方便,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分类连续统比较容易理解,也因为根据这样定义的概念进行测量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更重要的是因为使用这样定义的概念对建构假设富有成效。

我探求的是现代化概念的定义,而不是对这一概念所指称的事物作完全或实际的描述。这个定义,像适用于科学领域里的任何定义一样,仅仅是用来作为识别有关现象类别的工具。从科学的眼光看,定义不是用来接近详细的描述。<sup>①</sup>在定义里使用的成分并不必然表现为它们所要识别的现象中的最重要的成分。当然它们也可以那样被构想出来,但它们首先是那些能让人轻松和准确地作出区分——这些区分对于要进行的科学分析目的是有益的——成分。什么是最重要的成分取决于一个人希望使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重要这个词。在今后的大多数讨论中,其他的成分将要比使用在这个定义里的成分“重要”得多。<sup>②</sup>

定义成分的因果意义是与重要性的问题紧密联系的。我不认为定义的成分带来了这些现象的其他成分或方面。例如,所有的高度现代化社会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开放的阶级制度,但这类制度的发展决不必然是由用来定义现代化的动力来源或者工具类别所引起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人们通常可以说一些定义成分实际上是由代表要界定的制度的一些其他成分促使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只要试图避免一元论的观点,就总是存在着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在科学分析里,与那些在定义里使用的成分不同但也代表了所要界定现象的成分不应该从定义中重复产生。这并不是说定义

---

① 我试图给出一个很节省的定义,仅限于对两个成分的关注:动力的来源和工具,后者甚至也可以省略掉。我首先要避免的是一个近似于对所界定的事务进行实际的和完全的描述的定义。我这样做是基于最简单的原因:(1)要想描述的话,是没有止尽的;(2)定义越是具有描述性,分析的正确性就越是决定于定义,也就是说,重复累赘。

② 从某些方面来说,关于蛇的最重要之处是许许多多人都害怕它,但几乎没有任何这样来定义蛇的用法:它是大多数人害怕的东西。

成分是无紧要的。只要知道有这些现象存在的环境,从已经定义的单位中得出高度相关的推论还是可能的。例如,如果某些其他成分不具备,定义的成分也不可能存在,那么我们可以因此在已知定义成分存在的基础上预测那些其他的特征也会存在。<sup>①</sup>

最后,这里使用的现代化定义在两个意义上是武断的。第一,存在着无数其他的可能用一种和我所谈到的事物完全一致的方法来定义这个概念。第二,出于不同的目的,一个人可能希望用完全不同的内容来定义这一概念。任何人,只要他强烈地感到现代化这个词一定意指别的什么,而不是我这里详述过的定义,他就完全可以用任何其他的术语或符号来取代我的定义——只要他始终保持一致。

我的现代化定义的关键在于使用无生命能源和使用工具来增加努力的效果。我把这两个要素中的每一个都当作一个连续统的基础。认定一个社会是较高现代化还是较低现代化,根据的是该社会成员使用无生命能源和(或)使用工具来增加他们努力效果的程度。在任何社会中,这两种成分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完全缺失或完全存在。

我把无生命能源定义为不是由人或其他动物能产生的任何动力源。我把工具定义为通常与使用它的个人身体分离的物质装置,没有它,人们就根本不能或不能很顺利地完成任务。

就无生命能源而言,社会之间最一般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一工作的大部分来说是重要的。没有完全不使用无生命能源的社会,也没有只使用非生命能源的社会。如果重力是果实坠落的一个因素,如果风帆被用来聚风行

---

<sup>①</sup> 如果这些预测不是从定义中重复产生的,它们也许会站不住脚。即使它们是从定义中重复产生的,也得了解一些事情。在某个给定的例子中,一个预测只能是不正确的,如果:(1)关于预测的成分与定义成分之间相关的假设从总体上就是错误的;(2)重要的资料被遗漏了;(3)单位和(或)它的环境与意想之中的情况不同;(4)以上三种情况的某些结合。

船,如果河流被用来漂流树木,如果火被用来炸裂石块或清烧土地——如果这一切都被用来完成某种努力——无生命能源在某种程度上就正在被利用。在另外一种极端型的社会里,使用生物能看来是无足轻重的。我不知道美国所消耗的总能源中有多大一部分实际上是由牲畜或人制造出来的,但以马力和瓦特之类的单位来衡量,它必定是一个小的比例。换个角度看,尽管那是个小比例,但它却是异乎寻常地重要。自动化是无法抗拒的趋势,但大多数决策(从某种意义说它确实包含了能的消耗)仍然是由人来作出的。在其他很多情况下,生物能源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学者们喜欢拿教育和研究作为例子。

我不会对测量这一连续统中的不同得分提供任何明确的说明。我认为这一连续统是根据非生物能源与生物能源的比率建立起来的。就能源的角度而言,这个分数(或者是代表这一比率的绝对数)越大,现代化程度越高,这个分数越小,现代化程度越低。怎么准确地测量这个比率,怎么准确地确定某个社会在这一连续统内的位置,这些事情是我不了解的。就目前的意图来说,大体上可以肯定获得比较准确的测量不是太困难的事就足够了。

在这整个工作中,我对这个连续统高精确水平的依赖是不及我对那些较易求得一致同意的常识概念的依赖的。例如,尽管传统中国社会在灌溉、航海、运河等工程上大量地使用非生物能源,但很少有人会怀疑这样的说法:传统中国人与美国的现代居民相比,非生物能源与生物能源的比率要低得多。不是所有的对比都会像这个一样明显,但原则上它们不会出现比这个对比还要大的问题。

同样,就工具而言,没有一个社会其成员不使用工具,对我来说,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有这样一个社会:它的成员没有了工具就永远不能发挥力量,这些工具没有人的努力就可以自行运作,或者这些工具在某些意义上只要技术许可就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效率。使用掘土棍尽管很原始,但这同样是在使用工具。和最有威力、最有效的现代电动铲一样,掘土棍也是工具。它和电动铲都扩展和增加

了工作的效率,虽然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不一样。这里,我们又得到了一个连续统,它的相对的两端不是对立面,或者实际上不存在,或者也许根本就想象不出来。我还是没有提出衡量某个社会的任何精确的方法。在这里,我必须要比谈动力时更加模糊。我不相信这个特殊的连续统应该以某种方式建立在与卷入其中的人口数相关的数字和工具种类以及对使用这些工具增强效果程度的测量的基础上。

有鉴于在今后的讨论中将逐渐明朗的原因,我感觉到从某些方面看,这个测量应该反映工具之间的一个特别的差别。某些工具在使用时技术方面的微细差别对于产出是否重要,这一点是关系重大的。与常识提供的知识相比,这里我又一次更加依赖于关于工具的不高的准确性。但在这整个工作中,我只进行大致的比较。尽管缺乏测量的精度,但没有人会不同意根据这样一个连续统,现代美国社会一定比传统中国社会更高地现代化,传统中国社会也一定比澳大利亚丛林人社会更加现代化。

尽管我可以对能源和工具使用的连续统的具体测量细节漫不经心,但就连续统而言,一个分界点的问题是绝对重要的。相对非现代化和相对现代化的区别是我整个工作的中心。出于一些原因,我特意建立了这些连续统,这样就不会有人说某个社会完全缺乏现代化的一些或全部成分。

第一,不这样做的话,就得用一个未经证明的重要假定来进行辩论。那个假定是这样的:相对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之间的差别是二元的或者全或无的差别,还是简单的程度性差别,抑或是建立在共同成分的不同结合体及程度和独特成分的差别基础上的本质差别。尽管从不同的角度把相对现代化社会当相对非现代化之间的差别看作本质上的差别是富有成效的,但它容易导致一个很荒谬的推断:所有的或者大多数对相对现代化社会至关紧要的成分在相对非现代化社会里则完全缺乏。因此,定义应该以一种既能促进对共同成分也能促进对不同成分认识的方式建立起来。

第二,虽然我并不认为使用不同的能源和工具引起了相对现代化社会的所有或者哪怕是大多数其他特征,但只要这种社会环境和总体特征存在,能源、工具之类的成分就足以当其他成分联系在一起用来作为定义成分,其理由决不仅仅是较简单和精确测量的可能性。

第三,我希望这些定义在考察现代化过程时是有作用的,自然,我们不去分析重复地自定义本身得出的过程。我相信相对现代化社会的结构中,有某种特殊的東西,一种“太阳下的新事物”。这个新要素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现代化结构。只要它们达到了特定的发展水平,就构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溶媒。假定相对现代化社会的成员与相对非现代化社会的成员保持联系,那么对于后者来说,从中受惠并且理解前者的一些结构和方法总是可能的——甚至是容易的。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的成员从心智上不能够完全理解使用工具和非生物能源,这只是上述事实的部分功能而绝不是全部功能。对于相对非现代化社会的成员来说,一台现代面粉机器的重要意义可能不是那么好理解,但磨消器更容易磨消刀刃这一意义就不难理解了。这同样适用于非生物能源的使用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采用相对现代化社会结构——甚至是采用本身——的独特的溶媒效用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举一个例子来说,两种类型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流的可能性是很不同的,考虑到困难的语言障碍就更是如此。这整个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关键。

除非有站不住脚的理由,否则把能量和工具这两个成分看作是构成某些类连续统就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它们要成为连续统,用来区分相对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化社会的分界点对于分析来说就是必要的。抛开决策和控制的目的,如果设想消除剩余的或者相当多剩余的生物能源比设想在不引起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以生物能源取代现存的非生物能源要容易,那么根据能量连续统,该社会就是相对现代化的社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该社会就不是相对现代化的社会。如果不使用工具,一个社会的稳定所要

求的成就水平根本办不到,或者,如果回到更原始的状况,靠增加劳动力,社会结构会发生灾难性的变化,那么,根据工具连续统,该社会就是相对现代化的社会。否则,就不是相对现代化的社会。<sup>①</sup>

根据这两个连续统的结合得出的分界点是一个比连续统本身更为棘手的问题。这里提出的假设依据的是一个大致的区分,所以分界点的问题不是太严重。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现在的日本,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都远远高于这一分界点而趋近于分级表的相对现代化的一端,而缅甸、印度、锡兰、拉美的一些国家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远远低于这一分界点而趋近于分级表的另一端,这些判断得到公认是并不困难的。但是,在以下这些问题中,确定分界点的位置还是最重要的。如“日本在什么时间变成为一个相对现代化的社会”或“共产主义的中国正以什么样的速度转变为一个相对现代化的社会”。由于更精确地确定这一分界点比较困难,我将试图着重于那些与分界点关系不是很大的说明。

(卢晖临 译)

---

<sup>①</sup> 我还没有面对工具连续统的分界点与能量连续统的分界点迥然不同的理论可能。我也没有提出一些定义来排除以下的可能性:根据工具连续统是相对现代化的社会在能量连续统里却是相对非现代化社会,或者反过来说也是如此。这两个连续统之间互相依赖程度很强,上述的背离情况如果说绝对不可能,也可以说是很少出现的。

M.列维

## 现代化的社会模式(结构)和问题\*

### 一、导 论

#### (一)在社会历史中作为特定问题的现代化

一种普遍的社会溶剂。在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时——不论我们使用何种术语或婉言——我们都处理着社会历史的特殊问题。我们面临着——是否好或坏——一种普遍的社会溶剂。相对现代化的社会模式，一旦发展起来，就展示出能够渗透到任何与之接触的社会背景的普遍趋势。从许多观点来看，这些模式是否至少部分地被相对非现代化人民的意愿与倾向所渗透，或者他们是否具有承受的模式，都没有多大意义。模式总是在渗透；一旦这种渗透开始，先前的本土模式总是发生变化；它们经常朝着相对现代化社会的方向变化。这些变化一旦开始，从局内人或局外人的观点来看都决不是必然成功的，但是缺乏成功与不满几乎都不能阻碍先前模式的崩溃——宁可说是相反。以前曾有过“世界的征服者”，但是即使在所征服的地区，我们在现今世界所看到的那种单方向变化并不存在。蒙古人在其征服过程中更多地是被改变了，

---

\* 选自 W.莫尔和 R.库克主编《社会变迁读本》一书。

而非改变别人。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范围越广,他的影响就更多犹太化,更少地希腊化,直至最终达到印度河时也只是印有希腊雕塑的布匹留下了它的踪迹,而非普遍的社会结构。

**非二元区别。**在这一篇论文中我将指出相对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之间的区别。我把这些范畴看作是连续统一体上的各个位置。为了本文的目的,我希望避免任何只是有关分界点存在于何处的讨论。某些充分地远在这样一点的这边或那边的国家或社会的例子将有助于使讨论的理性清晰化(如果人们坚持那种例子的话)。这样,我将把美国作为相对现代化社会的代表,而把德川时代的日本社会,或传统中国或现代中国或现代印度均当作相对非现代化社会的代表。为了定义之目的——注意,并不是为描述目的或者作为最重要的因果因素——单纯为定义目的,我认为对任何社会而言,现代化程度越高,无生命与有生命能源的比率就越大,人为努力被工具的使用所加强的程度就越大。我认为如果在增加无生命与有生命能源比率方面比较小的变化对于普遍社会结构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这个社会相对而言现代化的程度就比较高。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哪个社会完全缺少现代化因素,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现代化这个词在以上陈述中首次出现时我使用了引号。在这篇文章中所有的符号,除非特定表示反义外,都指示着在这样的连续统一体中任何分界线的一边或另一边的事例。至少我假定如此。我慎重地选择了定义的因素,它是一种连续统一体,即使我把我的注意力限定在相当极端的区别上。我感觉对于发展问题的任何误解都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的作用,即当前社会科学中二元概念的误用通过误置的二分谬误来辩论许多最重要的现代化问题。

**普遍因素和变化。**这里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从最一般的层次上考虑,所有社会均是一致的,所有的变化在最为具体的层次上组成了这些普遍因素的覆盖物,进一步而言,所有相对现代化的社会均是由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些的发展利用了少量来自国外的重要因素。所有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之间在社会结构

上比它与相对现代化社会之间有更多共同点,反之亦然。例如,一种假说认为,尽管现代英国社会是从13世纪英国社会中发展起来的,13世纪英国社会和 Trobriand. Islanders 之间比它和现代英国社会之间有更多共通点。

## (二)某些一般性的考虑

**关于事实的假说。**这一章所做的所有陈述,除了那些通过举例阐释完成的以外,都是在极为一般的层次上做出的,我希望它不会发生极大变化。所做的陈述通常指示如下一般层次:所有社会、所有相对非现代社会、所有相对现代社会、所有相对现代社会模式已被引进的相对非现代社会等等。如果这些陈述具有定义性的证据,也是极少地被集中起来。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以及在通过举例说明而介绍的所有案例中,这些陈述都应该被认定是关于事实的假说。在不相信其可信性的情况下我不会故意地提出任何假说,但我的信仰不应与证据混为一谈。

**一般因素和变化。**正如以上陈述的那样,这是构成此文基本观点的一部分,即所有社会都具有一些共通因素——否则我们就根本不能开展这种讨论。进一步而言,我宣称,由于不必详加讨论的原因,在任何特定社会中我们关心的所有变化总是我所指的一般因素的覆盖物。单是这种考虑就能使误置的二分对立的谬误成为一件危险的事。

**必要条件和先决条件。**考虑一种现象,如果在缺少某些要素的条件下该现象就不能继续存在,那么我将这些要素称为该现象的必要条件。如果缺少某一要素该现象根本就无法存在,那么我将把这一要素称之为该现象的先决条件。把任何要素的存在归于它是一定现象的必要条件或先决条件这样一种事实或假说,这类说法在某虚妄的意义上是一种肤浅的目的论。在最低限度上这总是包括未经证明的和经常无法证明的假设,即现象本身必须存在或即将存在。在最后的分析中,它反过来总是包括一

些本体论问题。

**理想的模式和实际的模式。**在本文中我将阐述理想的模式和现实的模式问题。在这里“理想”一词没有道德方面的含义。我将理想的模式定义为“一些特定的个人认为这些模式是他们所喜好的，是正确的，是恰当的等等”。我将现实的模式定义为“一些理论上全能的科学的观察家发现他们事实上是一些特定个人行为的模式”。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一整套规则都可以从中发展起来。为眼前目的我将归纳出以下五种：

1. 所有的人都能区分理想模式或现实模式。没有人会不懂得在某些方面区分事物是如何与他们希望事物如何。

2. 理想模式和现实模式从来没有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在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和不同。

3. 社会成员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理想模式和现实模式不能完美地一致。

4. 任何社会压力和强制特征的一些来源都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的作用，即理想模式和现实模式不能完美地一致。不仅每个社会成员意识到他们或其他人不能按他们的感觉或意愿行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为此心烦意乱。

5. 整合的可能性本质上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即理想模式和现实模式不能完美地一致。这一规则与前一规则并不矛盾。理想模式与现实模式不能完美地一致的原因之一就是理想模式本身之间并不总是相互一致的。一些理想模式可以接近，只是因为其他一些模式是无法接近的。例如，传统中国人能够接近于在儿子之间平均分配财产的理想模式，只是因为它们不能接近于他们希望每个家庭拥有儿子的数目的理想模式。

### (三)关于现代化问题的某些幼稚看法的来源

**必要条件—先决条件。**大部分不是出于明显的经验错误的、有关人们的风俗习惯的政策程序错误都可以归入以下三类中的一

种：

1. 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相对现代化社会的必要条件和达到这样一个程度的先决条件并非必然一致。你不能只看相对现代化社会的模式,就说为了达到现代化社会怎么样做或者应该怎样做。

2. 这一过程后来者的先决条件和其成员在本土的一定情况下逐渐地达到这些模式(而且这种一定情况在以前未出现过)的那些社会的先决条件并不必然一致,也就是说,你不能只看大不列颠相对现代化发展的先决条件就假定它们构成了现今相对非现代化社会必然构成的部分。例如,在英国发展的初期阶段普遍教育并不是先决条件。在这个例子中,政府控制的逐渐放松也许是一个先决条件。而政府权力集中化的增加是后来者的先决条件。

3. 一些后来者的先决条件并不必然地和另一些后来者的先决条件一致。其间的差异可能是源于变迁借以发生的不同历史基础。因此,你不能简单地看到日本的先决条件而假定,这就是其他后来者必须有或做的。

要纠正没有考虑这三种类型的错误并非难事,如果没有以下事实的话:即相对现代化社会的一些必要条件和成为相对现代化社会的先决条件是一致的。后来者的一些先决条件和本土发展者的先决条件是一致的,并且一部分后来者的先决条件和另一部分的先决条件也是一致的。进一步而言,我们所关注的历史时期越接近,既定现象的必要条件和先决条件一致的可能性就越大。就牵涉到现代化的阶段而言,没有将后来者和本土发展者区分开来,以及一个后来者与另一个后来者之间区别开来,就蕴含着这样一个暗示——现代化过程在所有重要方面对每个社会都是相同的。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部分而言,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后一困难的普遍流行正是这样的事实的作用,即罗斯托教授(Professor Rosfow)在他有名的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各个社会在发展时间起点上存在着差异,但给人一个相当普遍的印象是,各

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上本质上都是相同的。<sup>①</sup>在一定意义上他当然绝对正确。在最普遍的可能的层次上它总是相同的——但是我们的注意力从来都不会只集中于这样一个层次上。

**误置的二元对立的谬误。**二元差异是强大的重要的工具,对于科学家和更为实用的智力方向而言都是如此。只是有必要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存在一些人,他们认为我们只是刚刚进入计算机时代。尤其在关系到社会科学概念的时候,仍存在着对于排斥中间法则的误用,正如也存在着对它的正确应用一样。这样,以下例子就起着误导作用而非有所帮助——这与有关的地域性愚蠢截然不同——即以宗派主义来作为“非西方社会”政府(例如,相对非现代化社会)的特征。其间的隐含意义(或阐释)就是“西方社会政府”(例如,相对现代社会)不以宗派主义为特征。有这样看法的人在头脑中形成一定观点,并且通过一定方式保证它不被他人理解。相对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宗派的存在与否,而是在于宗派模式进入普遍社会结构的方式,在于社会成员对之采取的态度,在于宗派形成的基础等等。差别是各种各样的,例如,实际模式在大多数方面也许是一致的,但理想模式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同。这反过来对于其他现实模式有提示作用。

目前被作为二元差异之一看待的一个最重要的误导性区分就是看待问题的理性和传统方式之间的差异。它在人们是否强调一定模式的持续性问题制造了很大分歧,因为这种强调得到传统的支持,却为科学意义上的知识所反对并推测应受到调整。但是它经常包含以下暗示,即认为传统是非理性的或者随意地在相对性和理性之间变化。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事实。在许多社会背景下,传统判定可行的事物在很高程度上与手段可得条件下理性判定可行的事物相吻合。真的,一个特定的问题也许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传统的东西,与在既定手段条件下人们处理有关问题的

---

<sup>①</sup>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

理性相一致。与依靠传统判断来处理事物的重要情形之一就是,如果手段发生变化,人们倾向于继续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先前是理性的,现今则是非理性的——并且是由于以前相同的原因而继续做。强调理性而非传统,对于“如果可用手段发生变化何事将会发生”的预测,比对于“目前做什么事情才是与非理性相对的理性”之类的预测更为重要。

**与物质取向相对的精神取向。**不同的形容词词尾的使用在这一点上是很有意思的。它已经成为与将那些也许倾向于精神取向的人和那些倾向于物质取向的人进行区分的整个过程相联系的现代批判的陈词滥调之一。这是误置的二分对立的特别错误之一以至于需要分开加以阐述。没有人完全缺乏普遍的精神兴致,而更为明显的是没有人会完全缺乏物质倾向。之所以将这种二元差异的误用在这里专门单列出来,是因为在这个标题下所仔细考虑的问题揭示了相对现代化社会模式吸引力的基本来源。在这里人们可以再次阐述一套规则,它适用于任何人和所有的民族而不管他们的社会模式的变化:

1. 没有哪个民族对于物质因素会不感兴趣。
2. 没有哪个民族会不以一定的方式区别物质上的相对富裕和相对贫穷。
3. 各个民族总是表现出希望物质上富裕的意愿,而不愿在物质上贫穷。
4. 设想达到相对富裕之可能性的眼界,以及与此相联的在既定社会背景下和不同社会背景之间,为了达到相对富裕人们准备付出的代价,各民族差异很大。确实,无能设想进步的可能性也许比精神标准更能解释许多据说的精神品质问题,这种“精神标准”使人们明确地不情愿为物质进步付出代价。

不管人们对于相对现代化社会的模式说些什么,其运转中的物质生产力比相对非现代化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要大得多。这样,就所有民族对物质进步总是拥有某些最低限度的兴趣而言,一旦与

相对现代化社会模式发生联系,对某些人们来说就总有些道理。在某种程度上,许多一般被认为是邪恶的、在“帝国主义”这个标题下归在一起的许多实践大部分也是不相关联的。即使没有我们普遍认为与帝国主义现象相关的那些阴谋,这些模式也将渗透;它们将推翻现状;将引起巨大的不满和心烦意乱。在朝着相对现代化模式运动的过程中,通常总有许多人受到伤害。进一步讲,正如先前指出的那样,无论是运动还是伤害都并不必然地导致想象中的成功。

**合并东西方的精华。**再一次有必要忽略包含在这个想法中的“地域的愚蠢”。这是对于那些问题极为普遍的解决方式,也是现代罗曼蒂克的方式。这种观点有它的官方哲学家,最近报道(也许是错误的)一个现代社会学家在一个非洲专家会议上说“非洲现代化模式不必遵循欧洲模式,它不必包括传统的废除”。当然没有人会足够愚蠢地坚持,在任何既定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中所有以前存在的传统一夜间就应消失殆尽,或者全部都应消除掉。这种罗曼蒂克形式的困难之处在于:通常很难仔细地考虑东西方的精髓何在。在考虑所及的范围内,被认为是东方精华的部分通常都是与被认为是西方精华的部分最不相容的。

**东方和西方。**这二者的区别有几处难点,首先是它保持着对于“神秘的东方”的偏好,这只是对一种困难的语言障碍的委婉用词而已。第二,如果一个人密切注意这种区别,它就会将目前葡萄牙和西德之类的案例弄在一起。第三,它会把类似 Merovingian 法国——毋容置疑的西方——的情况和现代英国归在一起。第四,它暗示,就现代化含义而言,即使在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之间存在差异,也是极小的。如果能对其意义作出专门阐释也许可以认为印度、日本和中国这样一些国家都是具有“未分化的审美的连续谱”成见的国家。但是这些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在相对非现代社会的范畴之内,不管一个人是在日本相对现代化模式完成之前以相对非现代化社会的范畴来考虑它们,还是一个人希望日本成为相对现代化国家,而印度和中国仍处

于相对非现代化状态之下。

**主要的内在压力。**一旦他们与相对现代化社会模式接触,相对非现代化社会成员的那些问题就显得如此独断,以至于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民族在那些接触对它们具有意义之前并非本身没有问题。直到内部成员之间发生争执之前,那些社会并不必然是没有内在压力的适应性强的、高度整合的社会。一些这样的社会处于变化的不同阶段。但是尤为重要的是,一些具有稳定的主要外在特征的社会之所以是稳定的,正是因为先前存在的模式中包括了大量压力和限制因素——而不是因为没有这些因素。

## 二、相对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化社会 之间差异的焦点

### (一)组织的专业化

有一种专业化——在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中并非不存在——但是在相对现代化社会发展得尤为深入。这种专业化相当地独立于生产的产品种类之外,或者独立于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之外。这种专业化在相对现代化前提下得到增长,在这里它指“对于行为的单独一个方面的专业化倾向”,主要是以经济为取向的组织,诸如商业公司或工厂;突出的政治性组织,诸如政府和政党;突出的教育性组织,诸如学校;突出的宗教性组织和娱乐性组织——所有这些在相对现代背景下都得到充分促进。相对非专业化组织,诸如家庭,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未被淘汰,也并非不重要。但是,在相对现代化和非现代化社会之间重要的差别之一在于,当这种专业化组织存在于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中时,普遍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经常或大部分时间是在这样的组织中工作。而除了在其他情景下他们仍继续进行的工作外,任何相对现代化社会成员的大多数都一直在这样的组织中效力。这种组织情景增加的一个方面当然就是在高度现代化社会中有时所指的生活的“分隔”。单是这种变迁就会对在相对非专业化条件

下习惯于承担大多数工作的人来说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这不仅代表一种新的情景,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继续运作的相对非专业化情景下行为的含义。这种情景的增长同时削弱了家庭的稳定性,在某些方面增加了家庭的依赖性。例如,对于习惯在这种专业化情景下永不停息地内外流动的人而言,家庭是他被看作“完整的人”的条件之一——对于现代人而言唯一的“我的城堡”。

## (二)相互依赖性

与组织专业化的增长紧密相关的事物就是相对现代化社会相互依赖性的高程度发展。不存在这样的社会,它的组织的成员能完全实现自给自足,但是自给自足的较高程度可以在诸如家庭、村庄等这类组织中实现。所有组织直至国家其成员自给自足的程度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持续下降。

## (三)关系重点

与相对非现代化社会比较而言,相对现代化社会在理想和现实上都着重强调理性化、普遍主义和功能专业化,而反对强调传统、特殊主义和功能的泛化。在许多前提下都明确强调科学知识的运用(理性化),选择人才和判断他们时明确强调要以他们能做什么为基础而非以他们是谁为基础(普遍主义)以及强调被精确的加以定义和限定的关系(功能专业化),这些都是相对现代化社会的必要条件。误置的二分对立最普遍的谬误形式就是暗示或宣称,在相对现代化前提下,没有或者忽视对于传统、特殊主义和功能泛化的强调。例如,家庭情景正如在以下将要谈到的那样,总是和这些社会相关的。在所有社会中,家庭情景都主要是传统的、特殊主义的和功能泛化的。实际上,在相对非现代化前提下,也经常存在着对理性化、普遍主义和功能专业化的某些强调,有时也存在着此类理想模式——正如中国官僚的考试模式所表明的那样。但是无论在理想上还是在现实中,所有相对非现代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几乎

都是在主要是以传统、特殊主义和功能泛化为基础的组织情景中运作。在上面我已经指出,主要是出于传统而做出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非理性的,它确实经常与给定手段条件下人们处理有关问题的理性相一致。但是,在其他两个方面就不能阐述同样的观点,虽然给出一种情景,在这种情景中它们被强调,它们或许也不能产生人们所想象的差异。例如,对雇佣的明显的特殊主义标准在那些降低参与既定工作的个人效率水平的环境下就并非是必然的。

#### (四)集权化模式

经过相对长时间后所有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仍处于稳定状态,这是集权化和分散化特殊结合的例证。进一步而言,不管集权化模式如何一直被强调,这些体系,如果处于稳定状态,就整体而言也绝不是全部地广泛地集权化的。只是在相对现代化社会模式中,完全集权化的逻辑才要么是可行的要么是节约的——暂不考虑道德因素。在所有的相对现代化情景中,集权化的程度长期以来不断增加。由于我们对于专业化或普遍化情景的成见,我们倾向于认为所有的集权化在政府组织中都是作为主导方向。相对现代化社会的这种例子日益增加,但绝不是没有例外。大部分观察家都会同意,苏联政府的集权化比美国政府的集权化更为深入,但是也有大量这样的感觉,即单是通讯工具的巨大发展就使美国形成了比苏联更加全面的集权化。

关于集权化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一过程的后来者而言,合作和控制的要求总是战略性的,它们在先前存在的合作和控制模式将受根本性削弱这种势不可挡的可能性这点上总是战略性的。在历史上只有德川时代的日本模式在避免这些问题时展示出“高超技巧”。

#### (五)交换的普遍媒介和市场

所有相对现代化社会都要求更多地强调货币体制和市场。交

换中介——钱——在其概括化特性程度上变化很大。也就是说,可用钱来交换或估价的物品数目变化很大。在封建社会,土地不可以自由买卖,所以那时存在的交换媒介的概括水平不包括土地。

钱是学者专家极为羞于启齿的事物,甚至非学者专家似乎都感觉到,对钱的成见是唯物主义最极端的形式之一。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样一种观点,即旅行是广泛的,然而钱的应用亦然,很少事物能像钱的广泛应用这样影响人们的眼界。毕竟它扩大了比较的范围。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它,如果得知伦勃朗的画卖250万美元而凡妮·希尔(Fanny Hill)的最近版本才卖2.50美元——不考虑意识形态——人们就会建立起百万美元的这幅比另一幅花费多得多这样的关系。相应地,你可以告诉一位农民(他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让他儿子得到教育的可能性)教育要花费一定数量的钱——即使这笔钱他认为他没有任何得到的可能性——你可以告诉他,如果积累一定数量的钱,他就可以让儿子受到教育(钱不可以买教育,这点不完全正确)。与任何相对非现代化社会相比,交换媒介和金钱应用的普遍性一般说来总是增长的。直到或者除非在政府赞助下一个用来分配货物和服务的完全制约化、集中化的组织能够出现,它还会继续如此。但是,这样的集中化反过来又隐含其他问题——尤其是充分知识的问题——这个以后会谈到的。

市场在相对非现代化情景下绝不是未知的,但是它总是在相对现代化前提下才得到巨大发展。就定义而言与市场相联系始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由。这种程度的自由,如果足够广泛且如果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数足够多,会扩展开来,所以能最低程度地减少错误问题,并且总是存在控制问题。在缺乏关于货物和服务直接分配的有效的理性的充分知识的情况下,市场机制通过在相对较大和较少有权力的机制中分散它们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判断的错误问题。当然,没有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市场成员个体犯错误的能力和以一些不一定被认为是称心如意的方式使用其分配的可能性,这点是无法达到的。这是现代意识形态争论意想不到的事情之一,即

“资本主义”和与之相关较高级程度的市场自由被设想为增加了为了权力和责任的分配而分配商品和服务的含义。实际上这种模式也许是人们为最大程度地减少这种含义所发现的最为有效的机制。在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社会中,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与商品和货物的分配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依赖,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更为直接。

### (六)适应普遍结构

根据模式如何适应普遍社会结构的方式,一种既定模式的含义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虽然存在许多重要差别,日本和中国对家庭模式的共同强调由于这样一个事实的效果而发生巨大改变,即中国人希望把其最初的和最后的忠诚留给家庭,而同一时期的日本人——如果得到机会——理想地说,则准备为其领主而牺牲家庭利益。与此相应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甚至先前存在的模式得以维持也并不意味着它们与以前具有同样的含义,同样,也不意味着一种既定模式可以被直接接管和有效运用。所有相对现代化社会都是其成员强调社会流动的社会,但是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理想模式,至少最初具有与现代化过程相否定的含义,而日本的对应模式就有肯定的含义。虽然德川时代的公务员服务系统中的地位表面上是固有的,而中国官僚机构中的地位是通过考试过程中的杰出才能而取得,日本人则事实上通过适应而具有一种公务员服务机制,这种适应也许比中国模式能更加有效地、更加坚定地反对腐败。

### (七)官僚政治

这一问题是如此经常地被人们所论及,这儿也没必要推迟讨论。简要地说,相对现代化情景中的官僚机构必然和相对非现代化情景中的官僚机构立于不同的基础之上。在相对现代化条件下,官僚机构的成员不只必须要有设计政府模式和物质机构模式所需的

高度聪慧和技能,而且也要面对迅速过时和在维持上相对较少失败所具有的深远含义这样一对孪生问题。这里涉及到的是这些社会中快速的技术变迁和高度的相互依赖性。

对于所有相对现代化社会的成员而言,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充实和维持这样的组织。存在这种组织的所有社会的成员均分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如何把成员从其他社会情景中分离出来。对于这一过程的后来者来讲,还有着—个特殊问题。不仅过度强调非官僚化标准的先前的情景仍然存在,而且官僚本身构成了不同意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普遍来讲官僚很易感到沮丧,在现代化过程中新官僚首先被作为理想和现实的精英而产生出来,然后又倾向于产生强烈的受挫感。

#### (八) 家庭因素

从理论观点来看,家庭是很有意思的组织。它是我们确信在所有已知社会中都存在的组织。进一步来看,所有已知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包括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在家庭中都担当着一定的角色,有些人的家庭角色还贯串其终生。家庭情景也在其他一些方面令人感到有趣。所有非家庭组织都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那些相对于其而言(理想地说)家庭因素构成一定意义的组织。大多数相对非现代化社会的成员都认为裙带关系是一种优势,而非邪恶。在这种情况下它比坦白的金钱赌注更为有利,有利得多。在理想和现实意义上,一个人在家庭中所发生的事影响着他所活动的非家庭情景中的行为方式。另一种非家庭组织就是在其中家庭因素不被认为会影响个人行为方式的组织。在相对现代化条件下这类组织增长巨大。我们所指的大多数专业化组织就是这类,所有的官僚机构在其理想意义上也属此列。在这些组织情景中(理想地说)一个人在家庭中所发生的事并不影响其行为。但实际上,它极端倾向于在重要方面影响行为的方式。例如,它运用职业客观性技巧使严重的家庭困难不能干扰一个教员对待学生的方式。最后,在

所有已知的社会情景中家庭都要求许多基本技能方面的学习(即学习每个人在其生活周期的某一时点上被要求获得的技能)。甚至在高度现代化社会中(“家庭功能”据说已逐渐削弱)绝大多数个人还是在家庭情景中学习走路、谈话、吃饭、睡觉、控制身体机能、适应权威及商品、服务分配的模式、得到并付出感情等。因此,对于所有已知社会而言,家庭组织都一直存在;大多数个人在其生存历史中都属于一定的这种组织;他们在所有其他组织中所做的(或者现实上或者理想上)都受到在其家庭情景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他们在这种情景中获得他们的基本知识或者相当的分配物。要理解任何社会机制,家庭组织不能忽略。

进一步而言,在所有相对非现代化社会情景中,所有个人的大多数行为实际上都具有家庭倾向,即使这不怎么理想。也就是说,这种社会的普通成员很少在家庭情景之外发挥作用。甚至当他在村庄中工作时也同时是在家庭中发挥功能。进而言之,所有相对非现代化社会的普通成员都是在家庭情景中获得了他一生所获得的技能的大部分——不只是基本技能。在家庭情景中不同的地位基础普遍地互相加强。家庭领袖普遍是最老一代的代表,事实上是最老的男性个人,如果习俗上优先权是以辈分、年龄和性别为基础的话。进一步来讲,在个人所能受到控制的限度内,相对非现代化背景下大多数个人所受到的控制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分散控制的主要形式只是对家庭领袖而言的。这是为什么对于现代化后来者而言社会控制的普遍问题与家庭解体问题紧密相关的原因之一。事实是,随着新兴模式的引进,个人也许第一次从其他人身上而不是从家庭内部长者身上学到一些对于其成人角色的扮演起到重要作用的东西,这也许削弱了对长者控制的尊敬的日常支持。从这类个人的观点来看,缺乏违抗也许更多是由于缺乏可想象的选择余地的结果,而非缺乏对于既存的控制形式的不满。这与其他事物一样,与在现代化的影响下许多社会模式爆炸式的瓦解有关。

### (九) 城镇—乡村相互依存

所有相对非现代化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都在农村而非城市。他们是农民,而不是城镇居民。他们大部分集中从事安静的农业生产。如果社会在成员数目、领土方面规模很大,他们无一例外——不必介意他们怎样如此——习惯于他们所认为是重要的商品和服务从农村到城市单向流动的一定水平。这种流动的主要形式当然是租借、税收、利息和利润。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封建权益或其他机制所取代。普遍而言农民把这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除非税收等在惯常的限制外有所增长他们并不普遍地违抗或抵制。普遍来讲,他们并不认为自身是从城市开始的一系列商品和服务流动的初级阶段。毕竟他们并不习惯于把城市情景看作是商品或设备的来源,或者那些在农村地区系统地提高每亩产量的观念的来源。后一种希望是相对现代化社会最革命性的特征之一,在现代美国社会它已完成了最令人惊奇的发展。在现代化问题上我们的一个重大的比较优势确实是我们有关农业的实际知识和技能。相对而言发展工厂比提高每亩产量更容易些。

## 三、它的意义

### (一) 变迁

一旦与相对现代化社会的成员发生接触,朝那个方向的变迁就将开始——即使从所有相关观点来看这种变迁是一种凄凉的失败。

### (二) 家庭和压力

家庭总是压力的焦点。学习和选择就业形式的新的可能性为那些压力提供了重要的宣泄途径。

### (三) 控制问题

由于大多数控制的基础(尤其是家庭控制的基础)被削弱,控

制问题被扩大到最大限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所有现代化进程,当其实行现代化时,都会产生政治的不稳定。进一步而言,控制上的初期成功并不必然是在这些方面成功的先兆。几乎没有一个例子表明,为了在工厂的形成或通讯设备的改进,在生产率方面取得或多或少特定的增长,不曾存在过最初的充分控制。真正的诀窍在于一旦大量的变迁存在就把它与生产力的增长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进行尝试的后来者比取得成功的后来者要多得多。这也就是日本的例子显得极为突出的原因。

#### (四) 缺席性的个人主义

在所有现代化情景中更趋于存在一种通过缺席而体现出来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by Default),而不是那种通过理想体现出来的个人主义的稳定形式。也就是说,在与人们能做的或尝试的相关范围内,他们更易于逃避约束,而不是拾起我们倾向所认为的那种个人主义模式。这种通过缺席而体现出来的个人主义者,并不是由于他认为普通人“应该自主”,而是因为他作决定的通常情景——最经常的是家庭情景——或者不再对他有用或者毫不相干。缺席性的个人主义总是增加了冷醒行为的可能性。如果它像市场机制一样充分地扩展开来,它能将一定的错误形式的含义减少到最低程度,但是它更倾向于集中在缺席性的个人主义的能手身上。这种集中很大程度上将控制问题复杂化。

#### (五) 后来者的优势和劣势

**优势。**现代化过程的后来者具有明显的确定优势。一则他们不是在未知领域内探索。与这些模式的本土发展者不同,他们具有关于他们行动方向的、正确或错误的概念。第二,在计划、资本积累、技能和组织模式等方面存在着借鉴最初的专业知识的可能性。第三,存在着跳越其他地区的现代化过程所经历过的早期阶段的可能性。第四,后来者之中的领袖——因为问题不属于未知领域——

也许能够通过展示其他地区已达到的成就而加强其领导。第五,在一定程度上后来者总是居于能够获取其他地区成功果实的地位,而不必为发明或先前在过时物付出代价。后来者不仅易于寻求帮助,而且不管动机如何,那些先前在这些方面达到一定成就的人都乐于提供或坚持帮助。

**劣势。**后来者的劣势一般可以分为三种,即范围问题、改变问题和失落问题。为了进入现代化过程,后来者必须一开始就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进行某些事情。从特征上来讲,这些事情都是本土发展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相对小的步伐才能够做到的。在这中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现代通讯和教育机构的发展。例如,普遍识字率就是一种“需要”这些人尽快地达到的事情。问题的范围越大,合作和控制方面任何失败的含义就越广泛。

后来者的劣势之二在于职业转换过程中能源、材料、技术等等的改变问题。对于花了很长时间来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手边的原料和技术可以转变成新的形式。在大不列颠木匠、铁匠以及一段时期内利用手边材料的工人都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创造了原料和技能。对于后来者来说问题则有所不同。没有多少才能和技巧允许一个人利用手头的木匠、铁匠和工匠再加上可获得的原料来创造现代的磨米机。一些要被做出的转变都是以这种秩序发生的。各种所需东西的短缺以这种方式成了来自国外的坦率的礼物,为了积累外国货币或对应物在最低限度内存在着先前形式的生产力的重新取向问题。中国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曾写过一篇引人注目的论文,论述了南中国的一个村庄怎样进入世界经济并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消耗殆尽,产生了许多超过年龄的未婚妇女并且不可控制,这是由于经济衰退对生丝出口市场产生影响而造成的(这是长期以来实行分期付款制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丝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制造像丝质内衣和长统袜这样的奢侈品)。

后来者的劣势之三就是失落感。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人已经卷入到旨在对他们有所帮助的过程中去。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以及他

们的领袖把自身引至一定的期望中,这种期望对于本土发展者而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总有一些人要受到伤害。事情并不总是按照人们自身的意愿或希望发展的。在一些情况下人们会有一种越来越失落的幻觉,即使相对而言他正在获得。世界其他地区的8%或10%资本积累迟早会接管3%或稍多一点的美国所占的比例。但是在绝对数上,后者的3%比前者的8%或10%大得多。后来者极易经历这种跑得越来越困难但结果却发现越来越落后的失落感。

#### (六)原教旨主义的反应

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些人总是受到伤害。有些人总是失望。在旧体制瓦解的过程中人们总是把邪恶看作是引进新机制的产物。认为旧时代事物更好的观点总会得到某些人们的赞成和支持,而某些人总是会以此为标准采取行动。阻止时代前进的尝试并不比超越自身力量推动时代进步的尝试更少激进,其主要差异在于前者是没有目的的激进而后者经常是不可想象的激进。

#### (七)暴民

现今最早的输入品之一总是通讯手段的极大进步——以及大众呼吁可能性的极大增长和利用暴民的可能性的极大增长。利用暴民这种诱惑,应该是被那些已丧失权力但仍寻求重获之的人所迷恋,当权者从来不会作此尝试。对于当权者而言利用暴民意味着不稳定。人们可以给予暴民权力,但是却不能使他们有效地尽责。前者更倾向于被认为是使暴民中的某些领袖结束作用的捷径。

#### (八)充分知识问题

一个既定体系集权化的程度越高,充分知识对于必需的明确计划的层次就越加重要。对于现代化过程的后来者而言,由于存在一定的劣势和特定的合作及控制问题,充分知识却是本质的问题。

通常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对于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都了解不多。的确,对变迁得以发生的基础,已经明确知道的知识比必须完全充分加以考虑的因素要少得多。进一步而言,给定社会科学的状态,以及经济学某些特定领域中值得一提的例外,我们很快获得我们所需知识的前景不容乐观。在大多数这些领域内理论的状态是一种丑闻,与直接展望相比,我们需要更多的关于这些问题的高度有条理的分析。在我们现今生存的世界上,激进主义与左派或右派的意识形态无关。日益增加的激进分子采取了保守主义激进分子的形式,他们乐意不知不觉地将集中化的水平降低到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情景所需要的最低程度以下,自由主义的激进分子则乐于为了在集中化模式中有效地运作而将集中化水平提高到超出充分知识所限制的水平。在社会科学中搜集和评价数据的复杂技术缺乏改进的情况下,高度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化社会的成员同样地由于无知比由于人口爆炸而处于更大的危险境地中。

### (九)适应的变化

一套社会模式对另一套模式的适应力可以被改变——通常是——没有目的地。相互依赖的程度建立在累积性的、加速的方式之上。我已经通过那种削弱一般家庭控制的新技术的教育为例子来试图阐释这一点。也存在着其他的导致这种削弱的方式。它或许不错,在村庄中明显的特定利益之间的平衡已经导致了明显普遍主义的结果。通过努力明确地教导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人所能做什么而不是他是谁更为恰当,先前存在的利益平衡在没有很好学过明显普遍主义评估技术的情况下也可能受到削弱。

## 四、可能的控制途径

### (一)城镇—乡村不平衡的改变

正如以上阐述的那样,这些社会主要以农业为主。过去对于大

多数人民而言“现代化”和“工业化”这些术语被认为几乎是同义的。只是最近,高度现代化农业生产力的革命性含义才得到承认。在所有相对非现代化案例中,当人们谈起资本形成时,谈起控制人民时——不管人们说什么——他所讲的都是与农民打交道的问题。在这些领域通过给予土地使用权的策略已不再可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对于20世纪余下的阶段而言,后来者现代化的主要策略就是不得不首先逐渐系统地、持续地增加提高每亩产量的尝试,使城市地区通常意义上工业生产力的增长不超过为支持农村地区每亩产量提高所必需的速度。目前主要阻碍之一是,对于后来者本身而言,正是工厂、汽车和计算机而不是每亩产量微妙的持续的增长象征着现代化。

## (二)武装力量的创造性使用

学者专家和美国人在武装力量的观点上都是很狭隘的。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们的影响本质上是否定性的,以及它们主要是单纯用来对外的。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和将来越来越多的人而言,武装力量用于维持内部秩序的恰当性,在不大量杀戮的情况下,会比用于对付外在袭击更为重要。这些社会的成员要求保留武装力量——越现代越好。在这方面我们真正的无能主要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一般地考虑武装力量的本来面目。在相对非现代化条件下,武装力量比其他事物更倾向于成为有关理性化、普遍主义、功能专业化等等成见的焦点。进一步讲,在现代化条件下,武装力量提供了一定的优势。首先,有关国家领袖想让武装力量的成员擅长的事情通常可以直接转变为非军事情景。驾驶军用卡车原则上与驾驶民用卡车没什么不同,而且确实驾驶军用坦克原则上与使用重型机械的技术相同。第二,武装力量成员的控制问题通常是很少的。集体叛乱在历史上相对很少,除了在普遍社会解体的条件下它不会发生。武装力量的真正问题是军官或其他派别发动的宫廷政变问题。第三,武装力量倾向于建立在从社会成员中间普遍征募的基础上,这就存在

着为了能在武装力量所给予的训练中达到最好效果,选择体力和精神上最优秀的人的可能性。第四,由于必须注意力集中排除干扰等有关的原因,武装部队中新模式的渗透通常是以“兵营”方式进行的。这就包括,至少潜在地与广大群众高度隔绝,在这方面创造性的思维或许还能提高隔绝的程度。这意味着武装力量与任何其他单纯的社会机制相比,也许能以不可控制的反馈问题的最小化为现代化新因素的最大化提供更加吸引人的前景。从武装力量情景中而来的反馈并不能被排除,但是它比大多数信息更服从于控制。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通过武装力量的不可避免地强调纪律的特性而获得帮助。进一步说,这样的武装力量并不是所能做的唯一调整。修正过的版本,例如,30年代美国的国民保卫军(the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也是可能的。我们对于军事性和准军事性组织的厌恶(在不久以前的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利用了它们的作用),一定不要封闭我们对于这种组织可作多种选择利用的思想。

### (三)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向相对非现代化社会成员开放的特殊主义的主要外在曲线。相互依赖性水平的日益增长成为我们这个行星上生活的特征嘲讽了18世纪所构想的国家主权理论,但是在许多领域内,人们为大部分目的而进行的选择的唯一基础来自于同类的民族中间。这样,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特殊主义与建立在其他基础上的特殊主义因素相比,更不易对效率产生干涉作用。同时,民族主义作为情感的基础是众所周知的,作为一种控制的基础,它有它的用途。与此相关的当然是沙文主义问题。对民族主义不理智的运用导致普遍具有非理性特征的极端爱国者和沙文主义的发展。这些结果在某些情况下也许会超过通过民族主义的呼吁所获得的控制的含义。

### (四) 作为娱乐的政治

美国制度性生活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从事作为娱乐的政治到

作为政治的娱乐的转变。在美国,有一段时间专业化娱乐的选择性形式相对而言几乎未得到发展。进一步而言,这是一个在专业化政治生活中接近大众参与的那些事情还是一种崭新的和令人兴奋的经验时期。在本世纪,政治是广大群众的一种主要娱乐形式。这就是有两至三小时政治演讲的时候,这就是与家庭全体成员坐着马车,带着午饭和野餐来倾听政客演说的时候。今天,除了一些偶尔的激动之外(诸如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辩论、首次电视转播的政党会议等),政治不再是娱乐的重要形式。当每个政党都有自身的好莱坞支持者时,当越来越多拥有闲暇的人们发现在基层作为业余爱好者参与政治比打桥牌更有吸引力时,娱乐就成为政治的特殊形式。随着传播媒介的引进,在所有现代化后来者中间都倾向于产生政治作为娱乐的阶段。意识形态也许极为重要,但是人们几乎不能目睹或者观看反映日本60年代抗议活动及非洲或其他各地的自由宪章运动的电影而不对这些场合的娱乐性方面感到惊讶。如果这是正确的,它就提出了“用其他娱乐形式代替作为娱乐的政治”的前景。为有极大兴趣并在政治阵营中活跃的年青人而设计的形式也许最好是非意识形态性的取向于驾驶学校或约会模式的促进,而不是在一种选择性政治情景中的选择性的意识形态主题。群众参与除劳役外的任何事情在整个社会历史中是很少的,更不用说群众参与专业化的政治生活了。它极端地倾向于成为令人兴奋的职业。考虑到政治参与的娱乐性含义,这并不是轻浮的。

### (五)水滴效果

水滴效果是伴随收入分配单一模式化和生活水平继续提高而产生的逐渐增长的可能性。李洛伊德·法勒斯教授(Professor Liogd Fallers)首先提出了水滴效果的某些含义。<sup>①</sup>相对现代化情景倾向

---

<sup>①</sup> 见L.法勒斯:“关于水滴效应的一个注释”,《公共意见杂志》,1954年,第18卷,第314—321页。

于在比其成员所能达到的水平更高的程度上强调社会流动。如果新的、相对昂贵的消费品不断地产生,如果它们被较高收入的人首先使用,如果为了使它们在变得流行时尚落到收入越来越低的阶层手中而在收入分配上存在着足够的持续性,它们的花费就可以通过有较大的市场而削减,结果使它们渗透得更为迅速。他们会首先获得一种上层阶级用品的光辉和名望。法勒斯认为,如果这种商品通过收入层次持续向下流动,即使在缺乏实际社会流动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从中获得社会流动的幻觉。他推理说,这与当在站台对面的火车出站时,静止地坐在站台另一边火车上的人会产生朝着相反方向运动的幻觉完全同样的方式运作。把水滴效果用作控制手段、用作抵消先前提到的一些失落问题的手段是可能的。如果这是事实,人们的人均分配收入比率日益增长是很重要的,而不仅是人均收入的增加。早期的收入平均化的尝试或者阻断高收入和高名望之间联系的尝试(虽然是微不足道的)都是非常错误的,这也是水滴效果所蕴含的一个启示。这些尝试不可能成功,但确实进行了如此尝试。

## 五、结 论

在本文的前一部分我主要集中在探讨先前一些理论建构所具有的政策含义上。政策观点本身只是一些假说,也许即使这样一些兴趣本身也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这总比理论建构多一点东西。我们和他们都不具有尝试实施现代化的真正选择。我们不能在相关社会的传统模式下先去实现现代化,或者将这些模式保持到相当的程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和我们会逐渐地互相类似——不是必然因为他们将更像我们现在,而是因为现代化的模式就是,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他们就越互相相似。例如我们和日本人,也许1990年比现在更为相像。进一步而言,除了已提到的后来者和相对现代化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充分知识问题之外,我们——我们所有

人——面临着逐渐增长的另一特殊问题,这真的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不可知未来的社会化问题。相对现代化社会和正在实行现代化的社会的社会变迁速度本身就是革命性的。过去世界历史上绝大多数个人都在这样的期待中度过他们的一生,即他们的命运大体上是由父母命运所模塑的,他们子女的命运则是由他们的命运所模塑。既作为理想也作为现实,我们则期望我们的子女作为成人其生活会与我们的生活相脱离。但是一个人怎样教育孩子为不可知的未来作准备呢?一个人为此需要何种充分知识呢?我们把青少年犯罪称之为所有相对现代化和正在实行现代化的社会的特征,这并不是机会的问题。那些年青人的困惑(比对于法律的无知尤为深刻),总是问“我怎么知道?”。

不管一个人对于社会科学的状况感到多么悲观,事情至少并非越来越糟。在一些领域内理论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在大多数其他领域内至少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已经前进了。我们确实具备关于怎样减少生产力的激烈波动的越来越多的知识,甚至具有怎样增加我们借以生存的各种控制模式的观念。在原则上不存在阻挡我们学习如何创造新的控制模式的障碍——尤其是如果我们不坚持首先考虑意识形态问题——或者他们的或者我们的——因为其中任何一个在现今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上都不具有很大意义。也存在着对我们开放的另一种可能性。科学分析的策略已经证明在其发现的应用上是极为有效的,即使是那些人们对其感兴趣时都很少能想象到其应用性的那些发现。对于那些分析策略来说最基本的就是尽可能利用尽可能少的变量在尽可能普遍的层次上进行尝试。我们对于个人案例的迷恋是这种努力中最糟糕的无能。对于负责的政策客观性(而不是富有成果的科学假说)的迷恋,会比我们能做的其他事更能推迟那些负责的政策发现的创造——我的意思是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大多数都有责任提出有成果的思想,而不是正确的思想。

(吴薇、仲夏 译)

M. 列维

## 相对非工业化社会对高度工业化社会 结构弱点的某些根源<sup>\*</sup>

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是变迁领域中的一个特殊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对社会变迁的分析作一概述。首先,这里所用的术语“社会变迁”是指系统的社会结构<sup>①</sup>的改变或所提到的单元的变化。在任何关于社会变迁的讨论中,分析限于由定义给出的一般化水平下单元社会结构,即最一般水平下所涉及的单元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对较低的一般化水平的变迁的系统研究,需要较低水平下的单元的定义。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变迁的例子中,能分辨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即变迁产生的基础);转化的阶段(即所研究的变迁过程中事情的状态),以及结果(即在变迁过程末期单元的结构状态)。显然总是可以任意决定对一个社会变迁问题的陈述,进而分出这样的三个阶段。因为至少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永远看不出经验现象的

---

\* 选自霍塞利茨主编《欠发达地区的进步》。

① 术语“社会结构”在此定义为在社会行为中可观察到的一致性。“社会行为”被定义为一个给定种群的个体的(包含在那个术语里只是坚持)。(1)用经验术语可解释或分析的;(2)用种群的遗传因素和不把那些种群的其他成员算在内的环境因素不能充分解释或分析的全部操作活动。我在我的新书《社会结构》(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2)里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些概念。

变化确实停止。和科学中许多其他的概念一样,那些概念没有必要描述经验现象,但是它们帮助我们建立多少有用的模型来理解经验现象。在科学分析设立的范围内,任何寻找“最终起源”的企图当然都是徒劳的。因为研究本身牵涉到一些不可观察的终极起点的形而上学假设。发现一个既定社会单元的功能的、继而结构的需求以确定在所考虑的水平上,它的最一般的结构是可能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三个阶段中任意两个阶段的结构,我们就可以系统地发现第三个阶段的结构,即使不确切,也至少能在某些可能性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sup>①</sup>

变迁的战略因素(即为初始阶段的变迁所必需且充分的因素)可以是内在因素(即因素是由单元的运行所产生的并没有受到其他单元的新的影响)或外部因素(即因素是由其他单元引进系统),或这两种因素的某种结合。我们在此主要关心战略性外部因素的例子,尽管高度工业化社会发展的最初的例子可以用来对战略性内部因素的模型作有用的研究。然而,不管人们是用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来发展出一套关于变迁的假设,忽略一些内部因素是决不可能的,即使这些是非战略因素。因为变迁发生的起始基础总是相关的。

在这些条件下,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或任何相似的一元论在科学上的不恰当性就暴露出来。首先,引用一个“经济”原因作为任何范围内的战略原因为经济决定论辩护,在“最终起源”的搜寻这一特殊例子里流于失败或至少没有提到由“经济”所引起的“非经济”原因也可以是战略的这一论点。在其他方面,这种理解一样易受攻击。如果“经济”这个术语是按马克思通常所做的那样定义为能够引起变迁的任何因素,经济决定论就完全正确(即经济因素导致所有变迁);但它也完全无意义(即能够导致变迁的唯一因素导

---

<sup>①</sup>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无法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在《社会结构》里对这些问题作了全面讨论。

致了一切变迁)。如果“经济”这个术语与一些更有限的对象(即与商品和服务的分配相关的)联系在一起,这个理论就很有意义了(即能导致任何变迁的所有可能的变量之一)。但它也是错的(即可以找到发生变迁而在所考虑的水平上经济因素没有变化的例子,或经济因素不是战略因素的例子,或两者都有的例子)。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般的一元论在这个方面有困难。面对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那样惊人的社会变迁,集中在有限的外部因素而忽略相关的内部因素的企图是显著的,内部因素即使不是战略因素,也总是相关的。这是因为他们形成了发生变迁的起始基础,所以是在变迁可能的范围上设立的最小限制。给出了这些术语的普遍意义,才可以进行后面的工作,而且在解释这一理论时,起始材料比作用在它们上面的任何外力更相关。在其他情形下起始条件可以是较小的限制,但它们总是某种限制。

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是相对非工业化社会的起始阶段。这类社会工业化程度的高低可以用在商品和服务的分配(即它们的生产、消费和分配)上社会成员应用:(1)无论以如何复杂的方式增加他们能源应用的效果的工具;(2)非生物能源(或能量)的程度来考虑。给定了这个定义,很可能没有一个社会会完全缺乏工业因素。因为即使使用一艘帆船或一辆水车都要组成这样一个因素。无论做得如何粗略,用这些术语可以把高度工业化社会和相对非工业化社会区别开来。有些社会成员利用能使他们自己的能源的产量以及他们利用的其他能源的产量极大增加的工具和在商品和服务分配中非生物能源占绝大多数的工具。在这些方面变化的规模可以是继续的,在某些部分也可以是完全间断的。然而,对不同系统(即现代美国、现代英国、英帝国或甚至当代的中国以及 Trobriand 群岛系统)的大略考查,肯定能显示出在这些方面的巨大不同。此外,其中的一些国家(即现代美国、英国)与其他的国家(英帝国或当代中国和 Trobriand 群岛系统)比较起来是高度工业化的假设似乎是有理的。似乎更合理的假设是,不管在这个量表内其中一个极

端上的各个系统之间在这些方面的差别多么巨大,它们之间的差别小于这个量表两个相反极端上各个系统之间的差别。我的兴趣在于将量表一端的各个系统共同或必需的社会结构引进量表另一端的系统内所具有的社会含义,即将高度工业化的模式引进相对非工业化制度所具有的社会含义。经验地讲,那些“会合”的特殊问题不是出自这些模式本国的(或内部的)发展的情形而是出自把这些模式引进“不发达的”(即工业化程度低或非工业化的)制度时所发生的情形。

在展开关于这些含义的一些假设时,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于与社会成员之间关系模式(或结构)的三个方面有关的三种变量。这些方面包括认识方面、成员标准方面以及关系的本质定义方面。这些变量是成对地描述的。从认识的方面讲,关系分为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根据理性是否为发生在关系内的行动习惯性地所预期来区分它多少是接近于理性的或非理性的。理性行动是指主、客观目的相统一的行为。为了本文的目的,可以忽略区分的复杂性。<sup>①</sup>一种关系,如果其成员可以被习惯性地期望根据批判的科学标准来应用理性,不管这样的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有特殊区别与否,则可认为这种关系是理性的。如果关于行动的推理主要是依据习惯或先验力量来判断,而不是根据这种推理应用的经验效果,则可以认为这种关系是非理性的。

至于一种关系的成员标准,将被考虑为多少近似于普遍主义的或特殊主义的。如果一种关系其成员的挑选是按照这样的标准:(1)按惯例让每一个人都拥有或得到它们;(2)他们与选择的目的

---

<sup>①</sup> 术语“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定义沿用帕累托的逻辑—非逻辑的区分。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无法展开这些概念和它们的次分类(即非理性的,方法论非理性的,最终非理性)。它们在我前面提到的手稿和在我的论文“关于帕累托逻辑的——非逻辑的范畴的注释”(《美国社会学评论》第八卷,第6期(1948年12月),第756—757页)作了详细讨论。

是贴切的,则这种关系是纯粹普遍主义的,如果标准不符合这两个条件之一或两个条件都不符合,<sup>①</sup>就称标准是特殊主义的。为了现在的目的,称关系主要是普遍主义的,如果它们强调一个个体所能做的与挑选的目的是贴切的,如果挑选是基于一个人是谁,而不管他的知识与经验行为是否贴切,则称关系主要是特殊主义的。

至于本质定义,一种关系可以看作或多或少功能特化或功能泛化的。<sup>②</sup>一种功能特化的关系可以被定义为:这种关系所涵盖的活动或思考或权利以及义务被精确定义和界定的关系。一种功能泛化的关系可以被定义为:活动、权利等被模糊的定义和界定的关系。典型的商务合同型的关系至少在理论上是功能特化的。如果发生一场这种关系包含什么的争论,证明的重担就落在称“特别的某事”的那个人身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职能泛化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证明的重担落在拒绝“特别的某事”的那个人身上,这种证明通常包括被争论双方承认的一些过度义务的陈述而不包括提出要求的人不能证明的额外因素的归属。

关于关系模式的这三种类型,高度工业化社会和相对非工业化社会之间似乎有相当分明的界限。像工业界限本身一样,这不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命题。显然不存在理性行动的社会是没有的,而且很可能也没有完全缺乏一些明显普遍主义和功能特化关系的社会。相似地,高度工业化社会也不缺乏非理性行动或一些明显特殊主义和功能泛化的关系。由于篇幅所限,无法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可以举一些相当站得住脚的例子来说明在这三个方面任何一个符合全有或全无命题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然而,特别是在经济结构领域(也就是与商品和服务的配置——包括生产、消费以及分配相关的模式),两种社会的差别程度似乎是根本的。这个观点

---

<sup>①</sup> 这些术语及以下的两个(功能特化和功能泛化)是对帕森斯提出的概念作了些修改后的应用。见他的“职业和社会结构”,《纯粹和应用社会学理论论文集》(格伦科尔,Ⅲ:自由出版社,1950),第185—199页。

<sup>②</sup> 参见前注。

不是经济决定论。为了在这些方面得到启发,才把行为的经济方面集中起来。篇幅的限制又一次使我们无法详细论述为什么这些差别从不只限于经济领域。但至少目前必须把这个陈述当作一个假设。

当一个人观察相对非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时,他在相当高的一致性程度上看到了强调传统思维、特殊主义和功能泛化的关系模式。而且这一模式似乎既成为那些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标志,也成为其他结构的标志。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迁理论很难被正式认为是一种科学理论,但是马克思至少对社会分析的发展作了重要贡献。他使这一发展事实上无法忽略经济因素的相关性。人们没有必要把它们当作唯一相关的因素,但是它们总有一些相关性。因为社会成员可能变化的限制和社会本身的限制决定了没有商品和服务的分配,人们就无法生存。生存还需要其他的因素,但是永远不能忽视这一因素。

本文另一个基本的假设是所有的社会在它们运行时都会产生机能失调——任何一个社会运行时都需要对那些系统的成员施加压力和强制。本文的另一个假设是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不是生来的受虐狂,因而不存在逃避社会和违抗社会的动机。但是我们总是多次看到这样的例子:在一些社会里,虽然压力和强制似乎巨大,但是反抗和逃避并不是大量存在。在有些情形下,稳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中国的古代),使得许多学者下结论说不可能有大的压力和强制而且给出模式稳定的证据。但是这个结论是行不通的。压力和强制,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是巨大的,特别是在那些仍在强调传统思维、高度特殊主义的雇佣准则以及功能泛化关系的社会中仍旧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体通过反抗和逃避来将自己从那些表明他是谁的准则中割离出来。允许进入功能泛化的关系比允许进入功能特化的关系更冒险,因为这种允许可能承担的义务非常模糊。最后,反抗和逃避的人违背传统思维,在别人并没有异议的某些方面立刻成为批评家。无疑,在这样的社会存在着

其他的稳定性原因。社会化过程能使异常行为最小化,而且其他的因素也可以起作用。但是,在异常行为的动机并没有被阻止发展的地方,异常行为本身却可被阻止,因为反叛者在寻找允许他满意地生活的替代性经济角色时经常遇到极大的困难。在相对非工业化社会里,这种那些模式在其中运行时包含巨大压力和强制的情形决不是唯一可能的一种。然而,这种情形在面临高度工业化社会模式的引进时对全社会具有爆炸性的潜在影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我们似乎已目睹了一个又一个本国社会结构崩溃或开始崩溃的例子。有些例子是在长期的稳定之后,既有大规模引进工业因素的例子,也有相对小规模引进工业因素的例子。爆发性的例子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它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一些重要因素的情况。虽然这些因素在不太极端的例子里,缺乏戏剧性的特点。

在这些关系方面,高度工业化社会的要求正好相反。和其他社会一样,压力和强制仍是这些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上述的包含方式并不能如此有效地起作用。在这些社会里,为了一些相当明显的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强调理性、普遍主义以及功能特化。对社会成员来说,对作为进一步技术变革基础的高度复杂技术和科学的需求暗含了在这些方面批判理性的高度强调。此外,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在单独一个领域或行为的一个方面强调这些模式,以及把它们限制在那个领域是不可能的。在现代工业社会里稳定的问题之一又一次产生了。

对普遍主义和功能特化的强调与工业化的要求有同等联系。工业化的发达程度非常强调个体能力差异的重要性,这即使对能力的微小差别也适用。这种强调是产生于机器和生物能源的那些巨大且复杂的多重成就的一种结果。在这些状况下,技术上的微小差异会反映在产品的巨大差异上。一个不熟练的矿工与一个熟练的矿工在运用手工工具时,开采量的区别是很大的。但是应用电动铲操作且技术上有差异的人相互之间的开采量在程度和绝对数量上的差异则更为巨大。此外,技术的差别不仅从产量上看是战略性

的,在否定意义上也是战略性的。高度工业化情形与相对非工业化情形相比,相对技术较差的人造成的损失差异是巨大的。一个丢失了一件工具或一块材料的工匠损失相对小。一个成批生产的人可损失或延滞大量的资金和工作。即使技术进步造成的工作简单化也没有降低技术差异的重要性。假定有可比性,只按机器启动、停止键的一个汽车工人的“技术”比19世纪末期一个马车工人低得多。但是汽车工人之间一刹那反应时间的差异会有数十万美元的影响,而马车工人之间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差异(即使调整了变化了的物价水平)。高度工业化生产可不增加绝对技术量的重要性,但是对技术相对差异意义的强调的增加是不可否认的。

在高度工业化系统中,对功能特化的高度强调与在这一系统中适用的操作规模相联系。对生产单位和商品产量来说,规模都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形下,单是会计问题就会使高度功能泛化的关系在商品生产和服务的雇佣以及产品配置上变得不可能。在高度工业化制度下,只有非常有限的工作职位还使得雇主与雇员之间“旧式家庭主仆”型的关系成为可能,这些工作似乎只是那些数目非常有限的和那些强调手工技术的工作。物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如此巨大使得从大多数生产单位的角度来看,基于个人化合同来对这些商品进行配置是不可能的。一个汽车制造商与汽车消费者之间不可能保持这样的关系,即使是这些商品的零售渠道也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起到必要的效果。每月数十万辆汽车或数百万瓶冷饮的配置只有在高度专一和被界定的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完成。

本文的论点,总的说来,是在经济分配领域,一一强调这些模式。如果人们考虑了关于这些模式的两个事实,它们的战略地位在这种系统中就升高了。第一个事实是那些变量的某些独特的群集被指出。第二个是,不可能把这些模式生硬地限制在经济行为方面。根据第一个事实,这个论点可被简短地展开如下:让我们说,无论何种理由,对一个既定系统来说高度强调普遍主义的雇佣标准是有其正功能的(即有助于维持一个系统)。高度强调理性和功能

特化的可能非常大,如果关系不是功能特化的,要决定使用的恰当标准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强调理性,就无法保持恰当标准基础上的关系的连续性,而且实际上在什么是恰当的问题上都无法做出客观的决定。由于非经验因素的引进,关系也无法特别地界定。非理性、特殊主义以及功能泛化的模式的群集一部分与这些相反,一部分有其他的基础。

已提到的第二点考虑也同样相关。因为它强调这些模式广泛地通过一个适应于其环境的社会系统而得到普遍推广的显著趋势。商品和服务的分配只是从分析上与权力和义务的分配分开。在行为的经济方面高度普遍主义的关系与在行为政治的方面(即权力与义务的分配方面)高度特殊主义的关系在功能上是不相容的。这是因为,总的说来,由于行为的不同领域和方面之间存在着功能上的相互关系,那些模式群集在社会系统中似乎是被广泛扩散而不是被狭隘地加以限制。当它们被狭隘地加以限制时,它们似乎高度不稳定或大多数与系统其他部分、方面的影响隔离。因而,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社会,明显普遍主义的关系,在诸如经济、政治、教育以及娱乐的领域被广泛地制度化了。它们在特殊主义关系的大本营——家庭系统中也起着不寻常的重要作用(如在对待孩子们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古代,除了封建官僚体制外,这样的关系几乎没有制度化。而且朝代的循环(封建官僚的崩溃和更替)最显著的一个方面是特殊主义因素的持续侵扰和消失。

除了以军事手段引进与高度工业化社会相联系的这些模式之外,在非工业化社会里,压力和强制的根源,无论它们是经济需求还是在其他方面逃避不愉快情形的愿望,说明了按照新的模式来参与行动的动机。与相对非工业化社会相联系的廉价劳动力和相对未触动过的市场和资源,刺激了高度工业化社会成员活动的引入。在许多例子中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在这些方面似乎准备停止尝试,而且这种新品味常常刺激非工业化社会的人们试图以本国的方式进行工业化。日本是这种尝试的一个典型例子。

无论动机如何,这两套模式是相互破坏的。然而几乎在每个接触的例子中,尝试新模式的动机(或军事行动的力量)似乎超过了旧模式的破坏性影响。在潜在的爆发式的例子中这种旧模式的影响可以是显著的。中国,在经历了两千年衰落的历史和在大多数主要方面经受住了非工业化模式反复侵扰的一个相对非工业化制度重建的历史之后,如今在社会结构中正显示出真正革命性变迁的变象。尽管存在着如果用现代工业的绝对数量作判断,工业化本身的接触几乎没有触动那个制度的事实,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日本在某些方面的变革不够彻底,但是非常快速、显著。在它的社会结构方面,有着抵挡这些模式向系统的某些领域传播,同时却使其最大程度地传播到另一些领域的可能性。相对而言,中国则缺乏这种有控制的变迁的可能性。

从一个相对非工业化社会向另一个相对非工业化社会引进新的模式通常有些微的变化。它们体现出非理性的、特殊主义的、功能泛化的模式从一个目的向另一个目的的转变或至少是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转变。高度工业化模式打碎了这个模子,并且以最低限度为异常行为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经济基础,而不是提供其他的。在许多例子中,家庭组织、生产单位、权力和义务的初始模式已经崩溃了。在家庭模式领域,多元婚姻模式方向的倾向,青年的“解放”,以及“浪漫的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等等,曾被多次提到。进一步说,在已知的例子中似乎还没有开始这样一个趋势和颠倒这个趋势的例子。现在的极权主义模型以及武器技术效率的补充增长可以颠倒这幅图景。因为可以想象它们会摧毁工业化的物质和社会必需品。但它们还从未如此。

这些可替换的模式类型之间相互不一致性非常明显,在此不需解释。破坏性的净平衡似乎是尝试新模式的动机和压力的一种结果。这里过程似乎是单向的,因为把非工业化模式应用到高度工业化情形的结果是促进原来模式的保留,因为除了许多其它原因之外,生活水平会受到激烈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不是在大

多数情况下)不仅会产生物质的贫乏,甚至还会发生普遍的毁坏。想象一下将美国的交通系统的效率降低一半所发生的影响。另外,在其他方面,过程一旦开始便能产生压力和强制,促使进一步抛弃老的模式,如果只是因为呈现一个功能性的选择作为判断标准的话。

这三种模式类型与相对非工业化社会对高度工业化社会的结构弱点问题的相关性并不是对那些弱点的唯一解释。两种社会类型结构需求的详细比较无疑会显示许多其他的结构性差异,至少与解释这个现象的上述论述是一样有意义的。这里提到的关于这些极端特定变量之间关联的一些假设,如果能站得住脚,并不构成对这个问题的一种答案,而仅仅是用结构术语对之作更为一般性的系统化分析的一个呼吁。

(崔艳泉 译)

N. 斯梅尔瑟

## 走向一种现代化的理论\*

对于伴随着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变化的全面彻底的分析要求极具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和大量可供对比的统计数据。因为我缺乏这两者——即使我具有，我亦缺乏运用它们的空间——我将把这种解释性的论述限定在两个方面：(1)在方法论上，我考虑的只是韦伯主义的理想型结构；我将省略关于发展的任何个别事件的讨论以及关于特定历史概括的对比适用性的讨论。(2)从本质上来讲，我考虑的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我省略了关于因素分配、储蓄和投资、通货膨胀、支出平衡、外援、人口多寡、人口变化率的讨论，即使这些变量自然地 and 结构变化相互影响。这些限制都要求对所讨论的问题进行简单的论述。

马克斯·韦伯将理想型结构定义为“通过大量扩散的、不连续的或多或少存在并偶尔缺乏的具体个别现象的综合而产生的一种‘片面的强调’……这些具体的个别现象被安排进一个统一的分析性结构。就概念的纯洁性来讲，这种理想结构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都是找寻不到的”。<sup>①</sup>分析者利用这样的理论结构来澄清和解释许多实际的历史情况。韦伯明确地提到两种理想型结构——第一，

---

\* 选自 E. 爱兹奥尼主编的《社会变迁》一书。

①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格伦科尔，自由出版社，1949年，第90、93页。

“历史性的独特结构”，例如“理性的资本主义”，“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等等。第二，关于历史进化的论述，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sup>①</sup>虽然第二种是以第一种某些陈述为先决条件，但我的注意力将集中在动态结构之上。

经济发展普遍是指“人口平均产量的增长”。<sup>②</sup>为了便于分析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有必要把经常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些相互关联的技术、经济和生态过程独立开来：(1)在技术领域里，从简单的传统的技术向科学知识应用的变化；(2)在农业上，从生计农业向农业产品的商品性生产的转变，这意味着专供销售的农作物、市场上非农业产品的购买以及农业雇佣劳动力的专业化；(3)在工业上，从使用人力或动物的力量，朝着工业化本身的转变，或者朝着“人们利用大机器生产，通过所生产的产品来达到资金回笼的目的并进入以交换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市场”<sup>③</sup>的转变；(4)在生态结构方面发生了从农场和乡村向城市中心流动这一变化。这四个过程经常同时发生，但并不是说一定如此。确定的技术进步——例如，良种的运用——可以在没有自动地、立刻地产生组织变迁的情况下被引进；农业可以在没有伴随工业化的情况下商业化，例如在许多殖民地国家就是如此；工业化也可以发生在农村；城市在缺乏有效的工业化的情况下也可以繁荣起来。进一步来讲，技术进步、商业化的农业、工厂和城市的各自特定的社会后果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互相削弱。

虽然存在着这样的差异，所有这四个过程都趋向于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社会结构。它们都造成如下的理想类型结构变迁，这种变迁通过社会而发生分叉：(1)结构的分化，或者是更专业化、更具有自主权的社会单位的建立。我将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阐述这一过

①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格伦科尔，自由出版社，1949年，第101—103页。

②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伦敦，阿伦和安文出版公司，1955年，第1页。

③ N.纳什：《关于东南亚村庄工业化的若干评注》，《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1954年第三期，第271页。

程——经济、家庭、宗教和社会阶层。(2)整合过程,它改变了由于分化过程而变得过时的老的社会秩序的特性。国家、法律、政治团体和其他组织在整合过程中极为突出。(3)社会动乱——群众的歇斯底里、暴力事件的发生、宗教和政治运动等等——这些反映着分化和整合过程的不平衡的进展。

很明显,技术进步、农业改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含义随着社会的不同而不同,这些因素所导致的结构改组亦是如此。在这些压力和变迁的理想模式中某些变化的来源如下:

(1) 前现代条件的变化。社会的价值体系和工业化的价值观是和谐的还是互不相容的?社会整合程度如何?财富的标准是什么?财富如何分配?国家是年轻的、人口少的还是老化的、人口稠密的?国家在政治上是依附于别国,最近才独立,还是一直是自主的?这些原来已经存在的条件制约着经济发展力量的影响。

(2) 变迁动力方面的变化。现代化的压力是来自于价值体系的内在含义,是源于国家安全和威信考虑,还是源于物质繁荣的渴望,还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政治的强制手段被用于形成劳动力大军了吗?压力是经济上的吗?就像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或者手工市场由于廉价的进口商品的冲击而造成的损失。政治和经济的压力是合并在一起的吗?就像农民只能以金钱来支付税收所面临的压力一样。压力是社会方面的吗?就像渴望摆脱旧秩序的沉重负荷那样。这许多差异严重影响着现代化的调整。

(3) 向现代化迈进的道路的变化。一连串的事件是以消费品轻工业开始的吗?有过首先引进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尝试吗?政府在形成投资模式方面的作用是什么?技术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率是多少?工业化的普遍速度是多少?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结构变化的本质和由这种变化所引起的混乱的程度。

(4) 现代化高级阶段的变化。在发达经济中工业是如何进行自然分配的?国家和经济、宗教和经济、国家和宗教等等之间的必然联系是什么?虽然所有的先进的工业化社会均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工业

化,国家之间独特的差异仍然存在。例如,美国和英国的社会阶级在其社会意义上有所不同,即使这两个国家都是高度发达的国家。

(5) 现代化过程中戏剧性的事件在内容、时间方面的变化。在战争、革命、大量移民、自然灾害等等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的意义何在?

由于变化的这些来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发现有关社会结构进化的具有说服力的、快捷的经验规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本文中我的目的不是去寻求这样的规则,而是去概括现代化所包含的结构变迁方向的确定的理想模式。在这些理想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分类、描绘和分析不同国家的经验。以上所描述的因素部分地决定了国家对于现代化的这些普遍方面在反应上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无论如何也不能降低其“普遍性”。虽然我的论述是以经济发展的大量文献为基础的,但是我绝不准备尝试彻底的对比研究。

### 发展阶段上的结构分化

结构分化的概念可以被用来分析发展阶段经常提到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已建立模式的明显中止”。<sup>①</sup>结构分化可以简单定义为从一个多功能角色结构向几个更为专业化的结构的演变。以下是其典型例证:(1)在家庭手工业向工场工业转变的过程中,劳动分工增加,先前集中在家庭的经济活动转到企业中。(2)随着正式的教育体系的发展,原来由家庭和教会所承担的教育功能现今则集中在更加专业化的单位——学校。(3)现代政党比部落派系有着更加复杂的结构,更加不受亲属忠诚、争夺宗教领导权等等的束缚。因此结构分化可以更正式地定义为“一个社会角色或组织分化

---

<sup>①</sup> 库兹涅茨:“收入水平的国际分化”,载库兹涅茨等编:《经济增长:巴西、印度和日本》,杜克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23页。

成两个或更多的角色或组织的过程,这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们会更有效率。新的社会单位在结构上互不相同,但合在一起其作用等同于原来单位的作用”。

分化指的只是角色结构的变化。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分化和两个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混淆起来:(1)进入分化角色的原因或动机。例如,雇佣劳动力可以源于经济增长的愿望,也可以源于政治强制手段,或者确实源于履行传统义务的愿望(例如,用工资置办嫁妆)。这些“原因”应该在概念上和结构分化本身区分开来。(2)分化角色的整合。例如,当分化了的雇佣劳动开始出现时,同时也出现了法律规范、劳动交换、工会等等,这些东西制约着劳动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其成功的程度可以变化)。这些再调整,即使有时产生新的社会单位,也应该和在其他功能方面的角色专业化区别考虑。

现在让我们深入探究几个不同社会领域结构分化的过程。

### 1. 经济活动的分化

在典型意义上,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生计农业占统治地位,其他工业处于补充地位但仍依附于家庭和农村。在一些情况下职业位置很大程度上是由像等级这类扩展了的团体来决定的。

同样地,交换和消费也深深地植根于家庭和农村。生计农业中存在着有限的家庭之外的独立交换;这意味着生产和消费发生在同样的社会关系中。交换体系本身仍存在于家庭和社区中(如相互交换)、社会分层体系中(如根据等级实行的再分配)和政治体制中(如税收、贡物、以实物支付、强迫劳力)。在这样的条件下市场体系是不发达的,金钱支配商品和服务流通的独立力量也是极小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经济活动从这种家庭—社区模式中分离出来。在农业方面,专供销售的农作物的引进标志着生产的社会情景和消费之间的分化。农业雇佣劳动有时损害家庭生产单位。在工业方面确定分化的几个层面也是有可能的。家庭手工业,这种最

简单的工业形式在提供“与贸易不相关的工人自己的需要”方面与生计农业是一致的。“手工生产”把生产和消费分离开来,虽然消费经常发生在地方社区。另一方面,“家庭手工业”经常包括消费和社区之间的分化,因为生产是“为市场,为不知名的消费者,是卖给积累库存的批发商的”。<sup>①</sup>最后,制造业和工业体系把工人和他的资本、甚至他的家庭分离开来。

同样的分化同时发生在交换系统中。原来以非经济性基础进行交换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深入到市场中。现在金钱制约着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的流通,这样它开始取代——有时损害——宗教、政治、家庭或者等级的认可,而这些因素曾是经济活动的统治力量。这就是相对自主的经济体系的制度化机制,这种经济体系更多地强调诸如普遍主义、功能专业化和理性之类的价值观。

从经验上来讲我们可以根据其沿着结构分化路线进展的程度对不发达经济进行分类。例如,移民劳动力可以是完全雇佣劳动力和依附于旧式社区生活之间的一种妥协;家庭手工业引进扩展了的市场但是保持着家庭生产的聚合;工厂中的家庭雇佣保留着家庭生产的模式;在诸如嫁妆之类传统项目上的花费也展示出这种半进入更为分化的工业—城市结构的状态。发生这种部分性分化的原因可能存在于对人口放弃传统模式的限制上,存在于对手工产品经济的要求上,存在于反对本土劳动力的种族歧视体制上,以及其他等等。在任何情况下,结构分化的概念都提供了表明经济结构向现代化转变的程度的标准和尺度。

## 2. 家庭活动的分化

经济活动从家庭关系中转移出来的含义之一就是家庭丧失了一部分原有功能,其本身成为更加专业化的机构。家庭不再是生产

---

<sup>①</sup> 那些层次,代表了从结构混合到结构分化连续谱上的不同点,是来自于 J. H. 博克的《荷兰印地安人的经济结构》,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国际秘书处,第90页。

的经济单位；一个或更多的成员离开家庭去劳务市场上找寻职业。家庭活动更加集中在感情和社会化方面。虽然许多不彻底的家庭分化诸如家庭雇佣和移民体制仍然保留着，但是确实存在朝着家庭功能和经济功能分离的趋势。

一些相关过程从其他方面伴随着这种家庭分化：(1)家庭内部的学徒制衰落了。(2)在征募劳动力和经营者的过程中出现了反对任人唯亲的压力。这些压力经常存在于对经济活动理性化的要求上。但是，干扰仍然存在，尤其是在经营层上。在一些情况下（例如日本）家庭纽带继续被作为劳力雇佣的主要基础。(3)长者和旁系亲属对于核心家庭的直接控制削弱了。在结构意义上这表明核心家庭已从扩大的家庭中分离出来。(4)这种直接控制丧失的一个后果就是个人选择和爱以及相关标准作为求婚和婚姻基础的增长。从结构上来讲这是求婚从扩展的亲属中分化出来。(5)这种复杂的过程的一个后果就是妇女地位的变化。妇女和以前相比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较小程度地依附她们的丈夫。

结构分化用以上方式损害了社会整合的古老模式。扩展的家庭和乡村的控制开始溶解在更为广阔的、复杂的由结构分化所引起的社会背景中。这种日益增长的过时性提出了新的整合问题。我们待会儿进一步研究整合的某些问题。

### 3. 价值体系的分化

结构分化的概念也解释了在经济发展中价值观的角色这一复杂问题。很明显价值体系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发展，虽然是在许多不同的方面。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的分析就是解释宗教价值观在鼓励发展方面的力量。除此之外，世俗的民族主义也在工业“起飞”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由于世界已如此形成，民族主义是工业化的绝对必要的条件，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进行痛苦变迁的最主要的、很容易获得的世俗的动机和目的。国家力量或威望成为最高目标，工业化成为主

要方式。各种代价、不便、牺牲和传统价值观的丧失都可以用这种形而上的集体抱负来加以判断。那些倡导这种抱负并从中发展起来的新型集合体、民族国家和工业复杂性的迫切要求是相吻合的；它直接吸引每个公民的忠诚和拥护，并把人民组织成一个社会；它控制着人们、商品和新闻穿越边界的渠道；它详尽地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生活。对于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强大障碍，民族主义必须全力去克服它。”<sup>①</sup>

事实上，民族主义在许多案例中似乎都是摧毁传统的宗教体系的最佳工具——例如在传统的中国或印度——韦伯本人发现这些宗教体系比新教对于经济现代化更加不宽容。然而民族主义也像许多传统的宗教体系一样，通过“对传统倡导的行为和思考模式的再次肯定”，<sup>②</sup>通过它们不再相关之后反殖民态度的滋长，以及更为间接地通过鼓励“现成的繁荣”<sup>③</sup>的消极期望，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看上去通过利用分化的逻辑力量去区分价值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刺激”和“阻碍”这对互相冲突的力量是有可能的。

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为了建立更加分化的制度结构必须对许多传统的附属品加以改变。因为那些已确立的承诺和整合的方法深深扎根于传统社会的组织中，这就要求一种更具概括性和强力的承诺以从这些附属品中“撬出”个人。禁欲的和世俗的宗教信仰、排外的民族情绪以及诸如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都为此提供了这样一个杠杆。有时这些不同种类的价值观合并为单一的合法性系统。在任何情况下，所有这三个类型都具有可以以其为名义去要求和获得广泛范围的牺牲的“终极性”承诺。

---

① K. 戴维斯：《印度经济发展的社会与人口方面》，载库兹涅茨等编：《经济增长：巴西，印度和日本》，第294页。

② B.F. 霍塞利茨：《经济发展的非经济障碍》，《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1952年，第1期，第9页。

③ J. 凡登克罗夫：《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某些社会和文化障碍》，《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1955年，第2期，第116—133页。

但是,这些价值体系的成功却孕育着它们自身衰弱的条件。在颇具洞察力的陈述中,韦伯谈到在20世纪的初期,当资本主义体制已经获得高度发展时,它不再需要禁欲的新教精神的刺激。通过它对许多西方社会的征服,资本主义已经稳固地建立了一种制度性的基础和它自身的世俗性价值体系——“经济理性”。这些世俗的经济价值观不再需要在较新的、较不稳固的经济革命时代所需要的“终极”判断。

我们也许可以加写上,这样一些分化路线构造了宗教价值观的世俗化。在这一过程中,其中的制度领域——经济、政治、科学等等——都建立起了更接近于自身的模式。统治这些领域的价值观不再由宗教信仰直接认可,而是由自主的理性认可。随着这些领域中理性代替了宗教认可,世俗化开始了。

同样地,随着结构分化的发展,民族主义和相关的价值体系也经历了世俗化的过程。当社会朝着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组织迈进的时候,民族主义承诺的环绕性需要让位于更加自主的理性体系。例如苏联,随着社会结构发生越来越大的分化,在某些领域似乎正在引进更加“独立”的市场机制,“更加自由”的社会科学调查等等。这些措施并非直接诉求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价值观的认可。最后,下面的陈述看来是合理的历史归纳,即在发展的早期民族主义是猛烈的、强大的和富有侵略性的,但随着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民族主义趋向处于更加遥远和自我满足的状况,只是在发生危机时它才会有所抬头。

这样就产生了宗教或民族主义信仰体系中角色的矛盾因素。由于它鼓励旧模式的崩溃,它促进了经济现代化;但由于它抵制自身的世俗化,同样的价值体系也可能成为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的障碍。

#### 4. 社会分层体制的分化

在分析分层系统时,我们集中讨论以下两点:

(1) 先赋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阶层的排列?某些地位的先赋性存在于所有社会中,因为在核心家庭中婴儿总是以其

父母的社会地位开始存在的。先赋性的地位排列从家庭扩展到种族、民族等等群体的程度,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我们自身的意识形态中,我们最大程度地限制了阶级和民族的先赋因素,但实际上这种事情仍大范围存在,尤其是对黑人。

(2) 先赋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职业、政治、宗教和其他社会地位?从理论上讲,美国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将社会地位最大限度地与先赋范畴分离开来上了保险,但实际上家庭成员的资格,少数团体的成员资格等冲击着个人的“最终”位置。在许多非工业化社会中先赋因素和社会地位之间的这种联系更加紧密。这样的标准表明了一个体系的“开放”或者社会流的程度。

在经济现代化条件下,结构分化沿着这两个方向发展:

(1) 其他价值标准对先赋因素的干扰。例如,马凯姆·马瑞特指出在印第安帕威尔村:

个人财富、影响力和道德作为地位的有效基础已经超越了亲属群体的传统的等级秩序安排。因为这种新的地位基础不再明确地依附于任何庞大而稳固集团的包容性系统,所以必须根据个人或家庭单位的特征来加以判断。这种判断的个性化导致了更大的分歧。<sup>①</sup>

当然,在现代化过程中等级、民族团体和传统宗教团体的重要性在任何方面都不必然地下降。作为政治利益集团或传播忠诚的顾问团体,它们的显著性甚至会增长。但是作为地位的唯一基础,先赋标准越来越从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标准中分化出来。

(2) 通过职业分层的增加而导致的个人流动。这标志着成人的功能地位与其原初地位的分化。除此之外,个人流动经常代替集

---

<sup>①</sup> M. 马瑞特:《一个印第安村庄的社会变迁》,第35章;J. 科尔曼:《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背景》,加州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70—73页。

体流动。个人,而非整个等级或团体,为了社会上的更高地位而竞争。这种逐渐增长的个人流动性现象,看上去是工业化的普遍结果之一。在整理了工业化国家流动模式的广泛的经验证据之后,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得出结论:“(个人)社会流动的整个模式在不同的西方社会大体相同。”<sup>①</sup>但是,在工业化国家中阶级符号和阶级意识形态仍然不同。

### 对分化了的活动的整合

爱弥尔·杜克海姆的引人注目的论断之一就是有关在逐渐发展的社会差异性条件下整合机制的作用问题。他反对功利主义的观点,即劳动分工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会发展得更好。他表明逐渐发展的劳动分工的伴随物之一就是利用增加的差别利益来联合并巩固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机制的发展。<sup>②</sup>他发现这种整合主要发生在法律结构中,但是人们可以在社会其他地方发现同样类型的整合力量。

所以单有结构分化,对现代化来说是并不充分的。发展是作为结构分化(已确立的社会的分裂)和整合(在新的基础上联合分化了的结构)之间对立的相互作用而前进的。但是自相矛盾的是,整合过程本身产生了分化更大的结构——例如,工会、社会团体、政党和日益发展的州立机构。让我们在一些制度领域内来详细说明整合的这种复杂过程。

#### 1. 经济和家庭

在简单的经济组织种类(生计农业或家庭手工业)之下,经济

---

<sup>①</sup> S.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流动》,加州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13页。

<sup>②</sup> 杜克海姆:《社会劳动分工》,格伦科尔,自由出版社,1949年,第3—8章。

角色和家庭角色没什么不同。所有的都发生在亲族结构中。这些不同但非专业化活动的整合也存在于当地家庭、社区结构和宗教传统中,它们反过来巩固这两个方面。

在存在分化的条件下,生产的社会体系与消费的社会体系相分离,而家庭成员的生产角色亦在地域上、时间上和结构上与其独特的家庭角色分离开来。这种分化立即产生了整合问题。有关就业机会的信息是如何传达给工人的呢?家庭的利益是如何与企业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呢?家庭怎样免于市场波动的影响呢?虽然前现代背景下的家族、邻居和地方捐助均面临着这种整合的迫切需要,但是现代化产生了许多联结那些新的整合问题的制度和组织——劳动力的征募机构和交换机制;工会;政府有关劳动力分配的规章制度;福利和救济措施;合作团体;存款机构,所有这些都具有专门的整合作用。

## 2. 社区

如果工业化只发生在乡村或者如果乡村围绕家长式的工业企业“建立起来”,那么在工业化条件下许多社区和家族的联系都可以保留下来。但是城市化经常创造出更多的匿名者。结果人们在扩展了的城市中经常可以发现自愿组织的增加——教会和教区、联盟、学校、办公大楼、运动俱乐部、酒吧、商店、互助团体等等。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整合组织的生长是缓慢的,这是由于移民工人的来回流动所造成的,这些工人“为了他们的分化而来到城市”,又“为了他们的整合回到乡村”。在城市本身中社会结合的最初标准可能是一般部族、等级或村庄;这种标准可能一直存在,也可能逐渐地被以经济和政治利益为基础的更有效的“功能性”集团所取代。

## 3. 政治结构

在典型的前现代社会体制中,政治整合与家族地位、部落成员、对土地的控制和对未知事物的控制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政治

形式包括首领、国王、元老院、强大的地主、强大的巫师和神职人员等。

随着社会体系日益复杂,政治体系也随之进行了调整。福茨和伊文斯—皮瑞查德详细阐述了三种非洲本土政治体系,它们可以根据其从家族联系分化出来的程度归纳如下:(1)小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最大的政治单位包括的只是那些由家族联系联合起来的团体,这样,政治权威和家族联系达成一致。(2)政治结构是许多家庭联系的整合核心的社会;(3)具有更加正式性质的“行政组织”的社会。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文化差异性的发展这些体系会发生更大的分化。<sup>①</sup>在殖民地和新近获得自由的非洲社会中,随着政党、议会、压力集团甚至“议会”体制的出现,政治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sup>②</sup>在描述印度农村时,马瑞特提到“地方集团和外部集团的更为广泛的整合”。<sup>③</sup>有时这种更为广泛的政治整合像社区整合一样是以旧的整合原则的扩展和调整为基础的。哈里森认为印度的现代发展使等级制度的意义从“联合家庭的传统村落扩展”改变成为“宗族地方单位的地区联盟”。这种改变导致了“新的等级院外活动集团”的形成,这种院外活动集团组成了现代印度最强有力、最具爆发力的政治力量。<sup>④</sup>在以后的文章中我们会提到坚持传统的整合模式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

这些例子说明了社会的变化是如何对整合领域造成冲击的。它所产生的整合结构结合并且巩固了——随着不同的成功——结构分化的力量威胁将之瓦解的社会结构。在许多情况下,整合的组织和政党表现出巨大的不稳定性——工会转向政治或民族党派;

---

① 福茨和 E. 皮瑞查德编:《非洲政治体系》,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0年,第1—25页。

② D. 阿皮特:《转变中的黄金海岸》,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6年;霍德金:《殖民地非洲的民族主义》,纽约大学出版社,1957年;阿蒙和阿尔曼:《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

③ 马瑞特:《一个印地安村庄的社会变迁》,见上述引文。

④ S. 哈里森:《印度:最危险的岁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160页。

宗教派系成为政治俱乐部；足球俱乐部成为宗教派系等等。<sup>①</sup>这种流动性指出了在快速的、不规则和破坏性的分化过程中再度整合的迫切需要。对这种需要的最初回答就是立刻进行探索各种整合模式的反复试验。

我们已经概述了现代化和整合的一些结构性后果。应当记住这些变迁并不是单纯出于工业化的作用。一些影响最为深远的结构变迁已经发生在几乎未经历工业化最初阶段的国家中。例如，殖民主义——或者相关的经济统治形式——不仅引起现金产品和雇佣劳动力的广泛分化而且也引起了商品对于世界价格波动的脆弱性。所以以上所描述的许多结构变迁——和待会儿将描述的它所产生的社会动荡——刻画了两种社会，即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和仍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特征。

### 分化和整合的中断：社会动荡

与现代化相联系的结构变迁由于以下原因对于社会秩序具有破坏性：

(1) 结构分化要求创造新的活动，新的规范、奖励和认可——以职业等为基础的金钱、政治地位和名望。这些经常和旧的社会活动模式相冲突，这些旧模式经常是由传统宗教、部落和家族体系来加以控制的。那些传统的标准是工业化的最不妥协的障碍，当它们受到威胁时，严重的不满情绪和反抗就会滋长。

(2) 毕竟，在工业化阶段结构变迁是不平衡的。例如在殖民地社会，欧洲强国经常将经济、政治和教育结构彻底改变，但同时却在传统宗教、阶级和家庭体制上鼓励或加强保守主义。

“在这些殖民地社会中基本的问题就是本国人民应接受一定的广泛的、现代的制度体系……并在其内履行不同角色……尤其

---

<sup>①</sup> 《殖民地非洲的民族主义》，第85页。

是经济和行政角色的期望……但是同时,他们被剥夺了那些体系固有的一些基本报酬……他们被期望在这样一种动机系统基础上采取行为,这些动机系统源于殖民强国和本国统治者极力维持的不同的社会结构。”<sup>①</sup>在现代化非殖民条件下,同样出现了中断。在经济本身内部,快速的工业化不论多么协调都是不平衡地深入到已确立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中。整个社会,由农业、工业和城市变迁所引起的结构分化总是在和整合相互交替的关系中不断发展;这两种力量不断地滋长延迟和阻碍。现代化的步伐越快,这种中断就越严重。这种中断引起了经典意义上的社会反常状态,因为它引起了生活经验和制约这些经验的规范框架之间的不和谐。

(3) 与传统方式相冲突所引起的不满和由社会反常状态引起的不满在相互发生联系时,有时会互相恶化。社会反常状态可以部分地由诸如联盟、组织、俱乐部和政府规章这类新的整合装置来加以缓解。但是传统性的既得利益经常反对这些新生事物,因为这些新的整合形式和老式的未分化的团结体制相互竞争。新的结果就是传统力量、结构分化力量和新的整合力量三者之间的激烈竞争。这种状况实际上为不受限制的群体冲突提供了条件。

对于这些中断的三种经典性反应就是焦虑、敌意和狂热。当这三种反应集合在一起时,它们就会以不同的社会运动而存在——和平运动、政治暴力、太平盛世、民族主义、革命和地下颠覆活动等等。合理的——虽然并不完全可信的——证据表明,那些最心甘情愿投入到这些运动中的人,正是遭受结构分化所引起的混乱之痛苦最为深重的人。例如,“当农民被迫为了耕作专供销售的作物而放弃生计农业或者当(正如在高度殖民化的爪哇)生计农业不再能够提供生活保障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持久的力量在东南亚出现了。货币经济的引进和村庄作为生活单位的日益衰落伴随着这种

---

<sup>①</sup> 艾森斯塔德:《不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社会学方面》,《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1957年,第4卷,第298页。

发展并最终形成了经济依附性。”<sup>①</sup>其他理论和经验证据表明那些由于结构分化而脱离原有的旧的社会联系,但又无法融入新的社会秩序的人最热衷于社会运动。

许多与这些运动相联系的信仰体系都期待重要的、几乎立刻发生的社会整合。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信仰是高度感情化的,与实际政策不相关联。例如,在民族主义的殖民地运动中,“政治符号趋向于发展新的、终极的、普遍的价值观和基本的忠诚,而不是与殖民地社会中的当前政策争论相关联。”<sup>②</sup>进一步来讲,这样的信仰体系反映出传统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矛盾。民族主义者在仇外和媚外之间进行抉择;他们预测将来他们会超越西方的现代化,同时“恢复”古代文明的真正价值;同时他们就平均主义和等级制的社会组织原则展开争论。<sup>③</sup>在一个大的符号系统之下民族主义和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把这些互相冲突的趋势联合起来;然后,如果这些意识形态是成功的,他们就经常被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手段,以此消除那些产生最初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中断的种类。

当然并不是早期现代化的所有情况都产生了暴力民族主义或其他政治运动。进一步说,当这样的运动出现时,它们也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下面我仅列出社会动乱产生和形成过程中五个决定性的因素:

(1) 由结构变迁引起的社会动乱的范围和程度。“这些变化的速度越快……社会面临的尖锐的分化问题就越严重。”<sup>④</sup>

(2) 当现代化开始时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在最不发达社会中

---

① E.雅可比:《东南亚的农民骚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246页。

② 《政治发展的社会学方面》,第294页。

③ 马托西亚:《延误工业化的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1957年,第3期,第217—228页。

④ 《政治发展的社会学方面》,第294页;柯尔曼:《热带非洲的民族主义》,见L.香农:《不发达地区》,纽约,哈皮尔和罗出版社,1957年,第42页;《殖民地非洲的民族主义》,第56页。

(这些社会“政治语言同时亦是宗教语言”)抗议活动或多或少都采取宗教形式。例如在非洲,乌托邦式的宗教运动看上去在不太发达的地区有相对更大的吸引力,而像工会运动和政党鼓动这些更为世俗的形式则较多地出现在更为发达的地区。当然,随着现代化和结构分化的发展,抗议的世俗化会增加。

(3) 动乱集团影响社会政策的途径和渠道。如果动乱集团有办法联系到那些负责引进改革的人时,骚乱会相对和平而有秩序。如果没有这种办法,或者由于团体的孤立性或者由于统治权威的不妥协性,对改革的要求会更加暴力化、更加乌托邦化,会采取更为古怪的形式。所以在被剥夺继承权、被殖民化和在社会上孤立的移民分子中间易产生狂热和不受约束的暴力倾向。

(4) 利益和分歧的重叠。在许多殖民地社会中,社会秩序或多或少不完全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控制经济企业和政治机关的西方代表,他们经常与地方大土地所有者相联系;第二,广大的本国人口。在进入殖民地经济时,他们是作为雇农、雇佣劳动力等出现的;第三,外国人——中国人、印度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等——他们作为贸易伙伴、贷款者、商人等介于前二者之间。当然,这种分类过于简单化,但是许多殖民地社会都与此相接近。这样一种体制的重要的结构特征就是经济、政治和种族的成员资格互相重合。所以任何一种冲突都倾向于带有种族的色彩,并得到更加广泛的拥护,导致斗争党派之间偏见的产生。许多殖民地的运动确实采取种族的形式。由于独立之后“地震断层”仍然存在,这些社会倾向于被同样的运动所困扰。另一方面,如果断层的不同形式相互交叉,更有可能和平地分离和处理特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5) 外国势力对抗议群体代表的渗透和干预的种类和程度。

### 政府角色的结构性基础

许多人从经济角度认为,在现代化飞速发展的社会中,需要强

有力的中央集权。例如,政府的计划和活动要指导储蓄和投资,制约刺激因素,鼓励企业发展,控制贸易和价格等等。对于这样的看法,我愿意加上几点考虑,这些考虑源于飞速发展过程中对结构变迁的分析:

(1) 未分化的制度结构经常构成现代化的主要社会障碍,个人由于传统的宗教联系、村庄、部落和其他联系的存在而拒绝为获得工资而工作。必须要求有一定的政治压力,使个人摆脱这些联系。当然,这种压力的需要随着期待的现代化的速率的增加而增加。

(2) 结构分化本身的过程创造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要求更大的、更正规的政治行政机关。在快速但不平衡的现代化阶段,关于政府重要性的进一步讨论仍然存在,人们需要容纳逐渐增长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差异性,控制经常变化的权力分配所引起的政治反应,这种权力分配是伴随着广泛的社会重组而产生的。

(3) 现代化早期阶段产生爆发性运动的明显倾向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提出了复杂的政治课题。通过建议何种政府形式在此类麻烦地区最有效,在主要的现代化社会力量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政治领导者会由于对乌托邦式的、排外的民族主义的公开的和强烈的承诺而提高其工作效率。这种承诺作为一种强大的工具能达到他们的三个最主要目标:(a)通过赋予他们创建民族国家的使命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b)从某些人口那里得到一些否则不可能获得的牺牲,这种人在抽象的意义上承诺于现代化,但是却拒绝和传统方式作具体的决裂;(c)运用其合法性镇压抗议活动,禁止诸如共产主义这种普遍性的符号扩展到各种特定的不满情绪之中。然而,这些同样的政治领导者不应过于放纵地宣称其合法性。他们不宜依赖他们的民族主义承诺而忽略或抑制这种不满情绪。为了给不满团体提供到达负责的政治机构的途径,减少产生反对其合法性的条件,政治领导人应给不满分子在通常的意义上共同经营政治的机会。所以,政治稳定的关键之一就是

僵硬的民族使命感表面背后灵活的政治实践。

在这篇文章中我尝试以理想类型的术语来概括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社会结构相联系的方式。我已经围绕三个主要范畴来讨论这一问题——描绘社会朝着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的结构分化；整合，它在确定方面平衡着结构分化的分离特性；社会动荡，它源于结构分化和整合之间的中断。

对于这种分析必须增加四个限定条件：(1)我并没有试图说明经济发展本身的决定因素。实际上，关于结构分化、整合和社会动荡的讨论都是假定存在着确定的经济发展的尝试。然而，一旦发展过程开始，这三种力量都会重塑发展的过程。(2)为便于研究，我是以确定的次序来阐述这三种力量的——结构分化、整合和社会动荡。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假定在社会变迁的分析中任何一种都呈现因果的先后次序。相反，它们形成相互作用机制。例如，社会动荡可能由结构分化带来的不连续性引起，但正是这些动乱可能形成将来的结构分化过程。同样，整合的发展可能由结构分化启动，但反过来它们可能产生新的结构分化形式。(3)即使结构分化、整合和社会动乱在经验意义上紧密相联，我们也不应该“关闭”由三种力量之间的联系所组成的“系统”。结构分化可能不来源于经济发展；整合的要求也可能不来源于结构分化；社会动荡的源泉也并非被结构分化和整合之间的中断耗尽。(4)不应该夸大从低分化到高分化社会转变的“突然性”。从经验上来讲，这种过程是逐渐发展的，并有选择地影响到社会结构。这篇文章中对于各种不彻底的安排和妥协的强调恰恰说明了这种渐进性和不规则性。

(吴薇、仲夏 译)

S. 艾森斯塔德

## 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 背 景

现代化以及追求现代性的热望,或许是当代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特征。今天,大多数国家均陷于这一网络之中——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或延续自己现代性的传统。随着现代化在全世界的扩展,它在不同国家中所具有的异同点便显现出来。而探讨和分析这些异同的特点则是本书的宗旨。

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

现代或现代化社会是从各种不同类型传统的前现代社会发展而来的。在西欧,它们发轫于有着兴盛的都市的封建或专制国家;而在东欧,它们则来自高度独裁而低等都市化的国家与社会。在美国和英属第一批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它们是经由殖民化和移民过程而形成的。其中,有的源于强烈的宗教动机,并由宗教的拓殖团体所组成,而其余的则多半基于大规模的移民,目的在

---

\* 选自 S.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一书。

于寻求经济良机 and 更大的地位平等。

在拉丁美洲,较为支离破碎的现代结构出自寡头政治的殖民征服社会。在该社会中,居征服者和寡头地位的白人与土著臣民之间存在着强烈的隔阂。在日本,现代化过程起源于一个略具独特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而在中国,它则是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帝制,即一种基于特殊类型的“文士—官僚”制度崩溃后形成的。

在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社会,现代化过程始于殖民体系之内。其中一部分(尤其在亚洲)以原有较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社会和完秘的文化宗教传统为基础,而另一部分(特别在非洲)则主要建立在部落的结构与传统之上。

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这些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的起点,极大地影响着这些社会发展的具体面貌及其所遇问题。然而,除了这些差异外,还产生了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或许构成了现代社会“现代化”的主要核心,而对此加以分析则是颇为值得的。

## 社会动员与社会分化

K.道易治(Karl Deutsch)创造了“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sup>①</sup>这一术语,用以表示社会—人口层面的现代化。他对社会动员所下的定义是:“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同时,他还指出了社会动员的某些主要指标,其中包括:由机械、建筑物、消费品等所表现的现代生活层面,对大众媒介的反应,居处的变化,都市化,转离农业,识字率,人均收入的增长,等等(当然,这些指标本身并不表示以此种方式所获得的资源是否确实得到了利用)。

---

<sup>①</sup> 参见 K.W.道易治《社会动员与政治发展》,见《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55号(1961年9月),第495—496页。

就个人活动和制度结构而言,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化和高度专门化的。组织成员的录用在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并非由任何固定和先赋的血缘关系、地方种姓或等级结构所决定。专门人才是“自由流动的”(即角色的获得不决定于个人的先赋特性)。同样,财产和权力也不按先赋的方式来分配——至少不像在非现代社会那样严重。这种现象主要同经济生活中的市场、政治中的选举和政党活动,以及大多数机构所采用的录用式科层组织方式与机制有关。<sup>①</sup>

在所有主要的制度领域,这种角色分化和专门化的最重要方面可能就是个人所扮演的各种角色的分离,尤其是职业角色与政治角色,以及这些角色与家庭和血缘关系角色的分离。这种分离首先(也许是最富戏剧性地)于工业革命时期在家庭与经济职业角色之间产生。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对工业革命与工业制度的研究、滕尼斯在对“社区与社会”的研究,以及齐美尔(G. Simmel)在对都市生活的研究中,都已充分描述过。<sup>②</sup>

首先,这种角色的分离意味着,在一个制度领域内(如在职业领域内)任何一个特定角色的获得并不自动地带来政治和文化领域特定角色的占有。

其次,在任何一个制度领域里(在经济、政体、社会组织等等领域内),环绕着自己特有的目标还会产生各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它们不像在那些比较传统的社会中那样,会与任何以家庭、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另外种类的群体相融合。

在纯粹经济领域,这些演变具有(以牛顿以来的科学为基础

---

① 关于现代化方面的论述参见: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演变》(纽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7年版),第三章和第四章;D.勒拿《传统社会的消失》(纽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9年版);B. F.哈赛利兹《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47号(1957年5月),第28—71页;J. A.凯尔《伴随工业化和都市化而来的若干社会现象》,载《人类组织》,第18号(1957年夏),第53页—75页。

② 参见 G.齐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载 P.哈特和 A.瑞斯合编《城市与社会》(纽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7年版);F.滕尼斯《社区与社会》,英译本(伦敦,1955年版)。

的)高度工艺技术发展的特征,并为知识的系统运用(知识的寻求已成为专门科学机构的活动范围)以及与初级的天然物生产业相区别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工商业和服务业)所推动。换言之,这些演变表现为一种工业体制的发展,而其又是以高度工艺技术、经济角色和经济运行单位——生产、消费、交换的日益专门化,以及产品、劳动力、金融市场的日益扩大和复杂化为基础的。<sup>①</sup>

在政治领域,现代化首先表现为疆域的日益扩展,尤其是表现为社会中心、法律、行政和政治机构的权力之强化。其次,它还表现为潜在的权力不断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内扩展,直至它最终落入所有成年公民之手,从而使社会形成一个和谐的道德秩序。

第三,就某种意义而言,现代社会是民主的社会,或至少是平民主义的社会。其特征是,以社会的外在力量(如神、理性)来使统治者合法化的传统在衰弱,而统治者对那些被认为持有潜在政治权力的被统治者,则负有某种意识形态的,通常也是制度化的责任。

当然,所有这些特征都与下列现象相关:政治支持者有较大的流动性,注重“利益取向”和非意识形态的政治效忠,以及对任一统治者或群体进行先赋性的政治献身急剧减少,或有时几乎是全部消失。因此,为了有效地保持自己的权力和获得对于所宣传的特定目标及意欲推行的政策的支持,统治者自知必须通过选举、公民投票和代表们的欢呼不断地寻求被统治者的政治支持,或至少是大部分人的口头支持。<sup>②</sup>

与传统专制政体的统治者不同,极权主义政体的统治者承认其国民是受益的对象和使政策合法化的主体。现代民主或半民主体制与极权主义体制间的区别,并不一定在于它们对其信仰是否真诚,而在于它们在政治组织的多元化、公民自由和文化、福利政

---

<sup>①</sup> 参见 W. 莫尔《经济发展的社会框架》,载 R. 布雷邦迪和 J. 斯宾格勒合编《传统、价值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达拉谟,杜克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7—82页。

<sup>②</sup> 参见 S. 艾森斯塔德《官僚制与政治发展》,见 J. L. 波拉姆巴哈编《官僚制与政治发展》(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96—120页。

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程度。<sup>①</sup>

在文化领域,现代社会的特色在于宗教、哲学、科学等主要的文化及价值体系之日趋分化,识字和世俗教育的普及,以及以更为复杂的智力组织系统来培养和优化专门的智力角色。<sup>②</sup>

这些发展既同沟通媒介的扩展以及主要沟通媒介日益向广大的社会团体渗透紧密相关,又与这些团体更为广泛地参与居主要地位的文化精英所开创的文化活动和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sup>③</sup>

这些发展的高峰,就是一种新型文化观的形成——这也许是现代化最富有渗透性的一面,尽管这一新文化观在现代社会的扩展和传播是断断续续的,十分不平衡的。新型文化观的特点在于它注重进步、改良、幸福、能力与情感的自然表现,强调个性是一种道德价值,同时也强调个人的尊严,讲求效率。<sup>④</sup>凡此种种均可由某些新的人格取向、品性和特征的形成而表现出来,其中包括:对日益广阔的社交圈有较大的调适能力;“自我”具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兴趣更广泛;与他人和其他境遇移情的潜力不断增强;对自我促进和流动有日增的估价;以及日益强调人生短暂,乐当及时。<sup>⑤</sup>

### 持续的结构分化与变迁

在社会的发展中,向现代性前进需经历若干特定的阶段。以政治领域而言,在现代政治体制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问题将逐次

---

① 参见 S. N. 艾森斯塔德《政治现代化:若干比较评论》,载《国际比较社会学杂志》,(1964年3月)第5号,第3—24页。

② 参见 E. 希尔斯《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载《历史与社会比较研究》(1960春-夏合刊),第265—292页和第379—411页;K. 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伦敦,1940年版)。

③ 参见 K. 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伦敦,1940年版);L. 派伊《沟通与政治发展》(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④ 参见勒拿《传统社会的消失》。

⑤ 参见 E. 希尔斯《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A. 英克尔斯《从事工业的人:身份与经验、感知和价值的关系》,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6号(1966年7月),第1—31页。

在政治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也将逐次出现。在现代化的某些阶段,选举权、新政治共同体的界定及其独立等问题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其他阶段,宗教信仰自由和所谓文化的世俗化就成为最显著的问题。而到了又一其他阶段,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便成了最为切要的方面。在这些问题中,每一个问题的产生都与不同的新群体和阶层登上政治舞台有着必然的联系。

同样,新型的政治组织也在不断地出现。一方面从小的议会派系、各种相对局限但又充分结合的利益集团中,另一方面又从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中产生出更为充分组织化的政党,即大众政党。尔后,特别是在本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的欧洲和美国,这种政党以及为其所左右的立法机构的相对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所降低。这一方面导致了规模庞大、组织完善的利益集团的出现,另一方面又使政府的行政和管理部门,尤其是大规模的科层式管理系统的重要性日益增强。<sup>①</sup>

在经济领域,我们看到较小规模的生产单位,如家庭商行、小工厂和在有限的地方市场上营运的商业和银行业,转变为较集中、较科层化的庞大生产单位,如在更为包罗万象的、大规模的新市场中营运的大公司、托拉斯、卡特尔。同样,对经济发展结构具有特大影响的新型生产技术也不断产生。这一方面导致各单位内的劳动分工日益增加和多样化,另一方面又引起了整个市场结构的不断复杂化。<sup>②</sup>

在职业体系方面,我们首先看到新种类和新群体的不断出现。在现代化的最初阶段,相对而言,职业结构可以说并不复杂,其构成多为各种非技术性和技术性的手工职业,少数为“中产阶级”的职业,如商业和制造业,以及在人口中占有极小比例的较为传统的职

① 参见希尔斯《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艾森斯塔德《官僚制与政治发展》。

② 参见 W. E. 莫尔《工业的影响》(卡利佛斯,1965年版);C. S. 毕尔霍《传统交换与现代市场》(卡利佛斯,1965年版)。

业,如宗教、军事、法律、医疗等方面的职业。以后,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每一种职业又分化出许多工种。此外,还出现和增加了许多新的组织和职业种类,如福利、服务、科技与管理方面的组织和职业。<sup>①</sup>

这种崭新而更为复杂的生产单位的发展(其中每一单位内的不同类型的职业人员,即技术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也在增加),还促进了新的专门职业和机构的兴起。它们不再只限于传统的职业范围,如法律和医疗业等,而是扩展到其他职业种类,如科技研究、护理、社会工作以及公共事业管理等职业。在多数这类职业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日益专业化的趋向,其一方面要求更高的教育资格作为就业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各组织实行自主管理。这些发展都趋于消除或减少不同职业间的许多较为古老的差别。<sup>②</sup>同时,它们还引起了新式工会组织的不断产生和不同模式的劳工关系的形成。从比较简单,多半限于一厂、一地或一个工业部门的工会,逐步发展出以不同联盟形式组成的全国性的工会组织。这种发展也延伸到白领和蓝领职业之中,各自产生了新的问题和要求。于是,不同的生产或消费单位间的关系更与各单位内次群体所组成的新组织间的、日益增加的横向联系和义务交织在一起。

在人口—生态方面,我们亲眼看到,那些小的地方性农村和城市单位,无论其既定人口是多少,本来能够在较狭小的生态环境内基本上自给自足,而今却已有着日渐衰落的趋势。

居住、工作、就学、娱乐等等方面的功能的发挥,越来越分散在不同而相距遥远的生态区域里。同时,许多新的、生态的次级单位所赖以产生的大都会地区也形成了。<sup>③</sup>

---

① 参见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演变》。

② 参见莫尔《工业的影响》。

③ 参见 D. V. 格拉斯《文明变迁中的市镇》(伦敦,1935年版);辛莫尔著作,见前注:L. 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见哈特与瑞斯合编《城市与社会》,第46—63页。

## 组织系统与身份系统

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特征是：第一，具有明确而具体功能的组织众多；第二，此种组织与团结性强或具有文化取向的社团之间分工明确；第三，一方面，在专业组织内血缘关系和狭隘的地缘基础的重要性在减少，另一方面，各类“特殊化的”组织和宽泛的先赋—团结性的群体的重要性也在降低。<sup>①</sup>

这种结构的分化在社会分层方面有诸多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种模糊的身份系统的形成。<sup>②</sup>在许多前现代社会所见到的那种财富、权势和身份关系，在一种颇为严格的等级秩序中结合或分隔的倾向，随着现代化的演进而趋于消失。这种状况首先可在普遍主义与成就这两个标准在所有主要制度领域内占有极高的地位这一点上见到。任何一人在不同的社会领域里所占有的社会地位，不再必然是相同的，其间也没有结合的必要。一个人在政治或“社会”上的地位，不像在许多前现代社会那样，依赖于他在经济或职业上的地位；反之亦然。尽管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那种结合的强烈倾向，但是由于人们在不同领域中的分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些倾向通常遭到抵制。

现代社会里的这种流动，不仅仅是个人或家庭在相对既定和固定的结构性地位之间的流动。由于新型的企业事业单位、劳工组织和政治、行政组织的出现，还产生了新的结构性地位及其评价标准。

---

<sup>①</sup> 参见 M. 韦伯《阶级·身份·政党》，见 H. 格尔兹与 C. W. 米尔斯合编《从马克思到韦伯》（伦敦，1947年版），第180—195页。

<sup>②</sup> 参见 M. 土敏《竞争中的身份系统》，见 W. 莫尔与 A. 费尔德曼编《发展中地区的劳务协定与社会变迁》（纽约，社会科学协会1960年版），第277—288页；L. 费勒斯《新兴国家的平等、现代性和民主》，见 C. 季尔兹编《古老的社会与新兴的国家》（纽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63年版），第158—219页。

与上述特征密切相关的,是调节并分配社会角色与活动的新型机制的产生。<sup>①</sup>首先,这些机制可就其运行的范围,也就是按照调节领域的相对大小来加以分析。其次,它们还可以就其所产生的分配标准的性质加以分析。这包括:第一,由“谁”来分配或整合不同的角色与设施;第二,分配、调节以及随之而来的整合等程序是如何组织或构成的。

就前者而言,人们能够区分出先赋性或非先赋性的分配或调节。先赋性的分配者或调节者的角色是依据他们在某些群体,如血缘、地缘或等级性群体中“既定的”地位(这种地位通常是世袭的)来充当的。非先赋性的调节者所具有的特色则是因其所获得的成就——或作为他人或团体所推选的代表,或因拥有专门的资产或特定的知识专长——而占有其地位。

关于后者,我们可以依据分配者与其“委托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直接程度,来区分出直接和间接的分配。

在现代社会,组织发展的最一般特征始终是先赋而直接性的分配与调节不断减少,而各种非先赋且间接性的分配机制则不断发展。

这种机制具有三种主要类型。一是代议制或公开制,其中分配原则是经由各类选民“代表”共同审议后而制定的。政治代表、自愿结合的组织、专业组织是其最重要的典型。二是各种非人格化的市场系统,如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或商品市场。三是科层制度,其特征是“专家”或具有特定知识(或一般行政管理知识,或较专业的专业技术知识)的人是组织的管理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政治、经济或公共权力的持有者监督,而极少受他们所服务的委托人的直接监督。“理想型”的科层式管理强调“合理地”依据特定形势的需要来进行“合理的”、可计算的分配与决策,但轻视依据由民选代

---

<sup>①</sup> 参见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C.柯尔《工业主义与工业人》(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

表、自治机关通过政治或立法形成决议的程序或“非人格的”市场机制的需要来进行分配。

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而引申的分层体系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层面,就是**精英与广泛的身份群体**(阶层、阶级)之间,以及各种不同的精英本身之间日益产生分离。

在所有上述这些领域,还产生了这样一些群体,其成员在各种制度领域中居领导地位,但同时并不限于一定的阶层或阶级。此种情况适用于官僚、企业家、军人、知识分子以及各种类型的政治精英。<sup>①</sup>

这些卓越的精英群体不仅产生于中央一级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之中,而且还以多少有些不同的方式在地方一级的活动中出现。在城市的中、下等阶层中以及各种乡村环境里,政治、经济和社会(社区)的领导职位不再是完全传统和世袭的。

然而,如果各种精英群体不断地与普通身份的群体相分离而更加独立自主,那么精英本身之间便会产生不断的分化。这类重要的分化之一,就是比较一般性的(集体的或文化的)、离散性的目标和活动为取向的精英与较专门化的精英之间的分化。前者专注于树立各种团结的象征,主要指政治精英和思想家(尤其是文豪和新闻记者);后者则指各类专业技术或管理人才。同样重要的是,在上述每一类精英中也日益发生着分化。<sup>②</sup>

这些各种身处现代化中的精英的相对重要性,随着社会的不同而异,并且在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相对的重要性可以对任何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无论不同的社会有多大差异,以上所概述的共同特征,在所有现代和现代化中的社会内总是不同程度地趋于

---

① 参见 S. N. 艾森斯塔德《官僚制、官僚化、市场和权力结构》,载《比较制度研究文集》(纽约,1965年版),第175—216页。

② 参见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产生。

社会组织领域的这类发展,还与制度化的正式组织机构与较小的初级群体之间的日益分离密切相关。<sup>①</sup>在许多前现代社会内,较为制度化的机构与较非正式但又具有团结性的(常常是生态和血缘的)单位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对高度的结合,尽管这一结合是从来不充分的。乡村自治会和中世纪的行会也许是这种结合的最佳例证。随着现代化的来临,这种结合趋于减弱。在大多数制度范围内,不断地形成许多正式而大规模的组织,它们超越了各种生态、血缘关系以及模式化的群体。而在这些大规模的组织框架中,又倾向于产生许多不同但多为非正式的团结性初级群体,如工厂内的工人团体或偶然形成的邻里圈。它们并没有充分地制度化,或紧密地结合成更为广泛而正式的组织。<sup>②</sup>

在这些变迁中,最为重要的唯一“外在性的”生态表现,便是都市化的演进,其特征是大部分人口密集于都市中心,比较专门化的经济、专业、市政活动和企业也在此集中和扩展。

通常与都市化进程十分密切相关的是:某些较传统而先赋性的身份标准之丧失——无论是部族和等级的,还是地缘关系的;较富有弹性与多样化的社会阶层的产生;借助职业、教育、政治的渠道而形成的社会流动日益增加;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其范围包括从各种功能明确的经济组织直至各种市政的、自愿性的以及专业化的组织与群体。

所有这些过程,即功能明确的组织与较广泛而有团结性的群体之间、各种身份标准之间、社会阶层与精英之间以及社会组织的正式与非正式结构之间的分离过程,最终导致了一种具有高度流动性而意义模糊的身份系统。那种凭借固有的既定地位来占有个

---

<sup>①</sup> 参见 E. 希尔斯《初级群体研究》,载 D. 勒拿与 H. 拉斯威尔编《政策学》(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44—70页。

<sup>②</sup> 参见费勒斯《新兴国家的平等、现代性和民主》。

人所具有的大部分制度化角色的保障,在日益遭到破坏。此种破坏不仅是来自个人或家庭的幸运与否,而且还是由社会组织系统的本质以及持续的变迁和结构的分化所造成的。因此,尽管这些发展通常为提高和改变身份开辟了新的前景,但身份必然仍旧是不安全的、敏感的、政治冲突的集点。<sup>①</sup>

### 政治领域

无论如何,现代化过程并非仅仅表现为主要制度领域中的持续性的结构分化。随着现代化的演进,当各种群体和阶层被引向较统一而共同的制度和社会中心,并且开始冲击中心制度及社会的象征领域时,它们的自给自足性和封闭性便土崩瓦解了。

各种次群体,不论其是地方性的单位、身份群体,还是传统的职业或专业群体,都被纳入一个共同的制度与组织框架之中。在经济领域,它表现为包罗万象的市场和巨大的科层组织的形成。在社会组织和分层领域,它又不仅表现为以上所分析的各个方面组织结构的产生,而且还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依据权力、声望、财富愈来愈意识到彼此的地位,开始按照较相同的价值与标准来衡量自己和其他群体。

无论这种将广泛的群体纳入中心制度领域过程的详情如何,它都集中体现了对平等要求的增加和具体化。由于各类群体被纳入社会的中心制度之中,平等便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理想,而成为一个最为强烈的要求:所有的群体都有权日益具体地参与一切生活领域。<sup>②</sup>

让我们在政治与教育两个方面稍微更加详尽地阐述广大的群体被纳入中心制度领域的过程。正如在所有以往的政治体制中那

<sup>①</sup> 参见 T. 帕森斯《从比较与进化的观点来看社会》(即将出版)。

<sup>②</sup> 参见 E. 希尔斯《中心与边缘》,载《个体认识的逻辑》(伦敦,1961年版)。

样,在现代政治体制中,统治者也必须处理诸如国际关系、经济情况、经济资源的运用等一些“客观的”问题,以及政治支持的动员问题。然而,政治过程的这两层关系在现代政治体制中要比过去更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较广泛的各阶层人民日益参与政治斗争,使这些群体对上述“客观的”问题更为敏感和感兴趣,尽管它们并不一定总能更好地通晓这类问题。

同样,政治要求的表达和政治活动的表现过程与对政治精英提供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政治体制中要比以往更加密切。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地组织起来,这里几乎成了对中央政治机构和制度提供资源的先决条件。有鉴于此,在各个阶层中既能利用资源与政治支持,同时又能明确表达政治要求的精英,对于政治体制的运行则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同样明显的事实是:为统治者表达政治利益及动员政治支持的机关——政党,也就成为制定重大政策和做出决策的重要机构。<sup>①</sup>

在政治要求所借以表达的特定组织类型中,利益集团、社会运动、“舆论”机构,以及政党是特别重要的。<sup>②</sup>在某种程度上,前三者可以被视为后者的组成部分,因为政党是最有表达力的现代政治组织形式。再有,它们之间尽管有许多交叉相似之处,但所有政治组织都有自己一定的自主性和取向。

利益或压力集团通常倾向于获取具体而特定的利益,无论其是经济的、宗教的、文化的,还是政治的;而且,只有在能够直接促进这种利益,或至少在一定的状况下能够确保最满意地促进此种利益时,它们才会对政党或国家这种庞大的政治机器感兴趣。当然,这些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如经济、专业、宗教、种族或部族团体,以及它们的特定利益,随着情况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

<sup>①</sup> 参见艾森斯塔德《政治现代化:若干比较评论》;W.康赫舍《大众社会的政治学》(纽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9年版)。

<sup>②</sup> 参见G.阿尔芒德《导言:关于比较政治学的功能方法》,见G.阿尔芒德,T.S.考来曼编《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64页。

在现代政治体制中,第二种用以表达政治要求和表现政治取向的组织是社会运动。<sup>①</sup>它可以分为几种类型。其一是较有局限性的运动,它专注于获得某些特定的总目标,而这类目标虽然并不直接与任一群体的具体利益相关,但却代表着某些广泛的正义原则的应用,如反对死刑、要求改善大量被剥夺群体与人(未婚母亲、少年犯等等)的命运,以及废除奴隶制等等。其二是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改变某些中央政治制度,如扩大某一群体的参政权。这两种类型的运动经常是构成舆论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将在下文略论。其三是意识形态、集权主义的运动。这也是最为极端而特别的运动。其目的在于产生某种新的极权社会或政体。它试图将各种范围广泛和分散的价值或目标纳入一个特定的制度结构,或依据这些目标和价值来改变这一结构。它通常具有强烈的“未来”取向,趋于认为未来与现在有极大的差别,并且为实现这种变迁而斗争。它经常带有某种启示性、半救世主式的成分,倾向于要求其成员完全地服从或效忠,并严格区分敌友。

在现代政治体制中,政治要求借以表达的第三种因素是所谓“对公共问题和公益的普遍、明智和各式各样的关心”。<sup>②</sup>这意味着,人们或群体不仅对特定的利益而且对“总的”思想和主张都抱有更灵活的态度。他们并不固定地依附于任何特定的利益集团、运动或组织,而他们主要考虑的是一般的公共利益,并且依据普遍的价值和具体的可能性对政治纲领进行合理的评断。

包括运动和利益集团的某些取向在内的许多因素都可以形成舆论。然而,如前所述,零散的舆论却倾向于依其自己的模式来定形。

这类利益体现的每一种形式在各种类型的前现代体制中也存

---

<sup>①</sup> 参见 H.坎垂尔《社会运动心理学》(纽约,1941年版);H.康恩《泛运动》,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33年版),第11卷,第544—554页。

<sup>②</sup> 参见 C.J.费里德里希《立宪政府与民主》(纽约,布雷斯迪尔出版公司1950年版);艾森斯塔德《政治现代化:若干比较评论》。

在过,但又有若干差别。<sup>①</sup>其中一点是:在前现代社会,除了部分利益集团或派系的请愿或恳求外,各种群体的政治活动和取向的表现在中央政治制度中并不是完全合法的,而从现行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社会或社会宗教运动则大多是非政治性或不合法的。

第二个差别是,这些群体多半只是注重向统治者要求各种具体的实惠,而对主要政治目标的制定或统治者的选择并不关心。第三个差别是,尽管仅仅是在很小的程度上,但只有在现代政治体制中,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和运动才有可能被整合进共同、持续的政治活动与组织的框架中,如政党,或其他能够发挥类似动员支持和整合不同政治要求功能的组织。这种整合不仅是政党(或其他类似政党的组织)通过产生专门的政党机关、领导和纲领,依据某些更为普遍而能吸引大众的规则或目标在党内包容了各种具体的利益来达到的,而且似乎还是通过将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包罗万象而又散乱的目标转化为有关具体的政治目标、问题和困境的实际术语,并由某些政党或政党一类的组织和活动表现出来而获得。

正如我们以后将较为详细看到的那样,这些不同形态政治要求之间的确切差距和结合,在不同的现代政体中则是大不相同的。同样,如前所述,在现代政治体制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重要的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各种组织机构都能产生出来。因此,在现代化的某些阶段,选举权、新政治共同体的界定及其独立性的获得是最为重大的问题。在其他阶段,宗教信仰自由或所谓的文化世俗化问题则居于最显著的地位。而在又一其他阶段,经济、社会和组织问题又成为最切要的方面。这每一个问题的产生都必须与不同的新集团和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密切相关。<sup>②</sup>

这种演进过程的最重要方面或许是:在任何一个现代政治体

---

<sup>①</sup> 参见 S.N.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制》(纽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63年版)。

<sup>②</sup> 参见 S.M.李普赛《政治人》(纽约,花园城市,1960年版)。

制中,新问题和新的组织形式趋于不断产生,新群体不断被纳入中央政治的轨道;而且,它们的问题、利益和要求日益冲击中央政治制度,影响对统治者的选择和主要政治象征的塑造与定形,以及各主要政策的抉择和执行。

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也愈来愈趋于冲击中央政治制度。他们不仅对其提出各种要求,而且渴望参与中心领域、中心的象征和中心的外围的定形。伴随现代化的来临而产生的主要社会运动,不论它是民族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都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一种广大阶层日益参与社会中心领域的趋势。

### 现代社会的大众谐同趋向

以上分析或许展现了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基本的大众谐同取向(mass-consensual orientation)。<sup>①</sup>

现代社会的谐同或大众现象,植根于较为广泛的阶层对中央的不断冲击,它们参与形成社会神圣象征的要求,以及以强调这类参与和表现社会各个层面的新象征来取代传统象征的尝试。

当然,这种向广泛的大众谐同演进的趋向在所有不同类型的现代社会中,并非都得到了最充分制度化的表现。在现代化的最初阶段,只要极权主义政权在政治体制中对于这种趋向的最充分表现倾向于压制,这种压制就只能是微弱的或断断续续的。然而,甚至极权主义政权也试图依据此类价值使自己合法化。可是,如果在这些政体内,主要阶层之间并不存在这种为统治者所承认的谐同趋向,那么要想了解它们的政策和创造大众谐同象征的企图则是不可能的。

所有这些发展的最高峰,就是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

---

<sup>①</sup> 参见 E. 希尔斯《大众社会的理论》,原载《提奥奇尼斯》,第39号(1963年),第45—66页。

政治单位的民族或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及作为现代社会主要社会—政治秩序类型的公民秩序的形成。<sup>①</sup>

民族和民族国家是作为最普遍的、独立自主的新型政治单位和共同的政治、文化认同的焦点而出现的。共同的民族、社会、文化认同的象征主要不再是传统的,即不再是依据狭隘的部落、传统或身份群体来界定的。虽然新的民族象征通常具有一个明确的地缘对象并往往带有亲缘关系,但它具有更加抽象、神话性、较少传统的特点,而且还囊括了众多类型的次群体。在许多阶层中,对既不完全限于任一地缘或血缘单位,也不以此做媒介的共同文化象征,产生了若干不同但又并非刻板先赋的认同标准。这与公民秩序形成的趋向密切相关。在此种秩序中,所有的公民,不论其血缘、身份或地缘的归属如何,均参与并共享同一中心制度体系。

广大阶层日益参与社会的中心领域和公民秩序,可以被视为现代国家建立,或新型而广泛的政治社会统一体形成的两个基本特征。这种现代国家或统一体的象征隐含于非传统的语词之中,而其制度框架超越了较为狭隘的地缘单位,强调更为一般性的普遍标准。<sup>②</sup>

## 教育领域

分析现代社会教育制度特征的最佳起点,可能是趋于随现代化而发展的教育供求模式。<sup>③</sup>对此具有极大影响的因素是:各种群体在各社会生活领域获得新目标的尝试,发展中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对人力的需求,各类精英对教育进程施加影响的尝试——不论

---

① 参见 E. 希尔斯《原始的、个人的、宗教的和公民的关系》,载《英国社会学杂志》,第8号(1957年6月),第130—146页。

② 参见 E. 凯杜里《民族主义》(伦敦,1961年版)。

③ 参见 S. N. 艾森斯塔德《教育与政治发展》(达拉谟,杜克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

是作为政治影响和社会控制的方式,还是作为确保经济人才的手段。在需求方面,我们可以将其区分为对教育“产品”的需求和教育“报偿”的需要。首先,最重要的教育产品之一就是各种技能,无论其是一般性的技能,还是更为具体的专业和职业技能。前者,如读书识字,被认为是为获得各种职业提供了良好的准备;而后者则随着经济、技术和科学的日益发展而不断增加和多样化。

第二种主要的教育产品是对各种文化的社会—政治象征及其价值的认同,以及对各类文化、社会、政治群体和组织的较积极的献身。

企业家、经济和行政组织,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精英、政党、群体,以及取向较零散的一般公民和家长,都对教育“产品”和教育“报偿”,如各种经济报酬、就业和业务提高的准备、社会流动或身份地位得到认可的准备以及参与较广泛的社会、政治、文化事务与运动的准备等需求的变化,施加各种不同而持续的影响。

教育事业在供给方面也出现了极大的分化和多样化。一方面,它提供了各种受过教育的人才,以及充分的教育动因和准备;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各种学校教育设施(如包括从幼儿园到大学在内的各种不同层次的学校)、师资(他们主要决定于劳工市场的波动),以及各种维持这些机构与组织的设施。这些均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种精英和企业集团来提供。

从上述这些不同压力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现代社会教育制度或体制的基本结构特征。

就这些特征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教育角色和教育组织的日益专门化,以及在一个共同的系统框架内,不同的教育活动的统一性和相互联系不断加强。教育活动和教育组织日趋普及,不同层次的教育系统,如初等、中等、职业、成人、高等教育之间持续发生分化。每一个这样的“系统”,甚至每一系统内的许多子系统,都在自己的框架之内越发独立自主、专门化和组织化。然而,另一方面,或是通过某种全面的教育计划,或是由于一组织成为升入另一组织的公

认渠道,或是通过它们之间为获得同一人才和资源而展开的竞争,这些不同教育组织间的联系更加密切。<sup>①</sup>

但是,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整合于一个共同的制度框架,并不一定保证教育活动和教育产品在各方面供求过程中的协调与统一。相反,这些不同方面之间存在矛盾的可能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固有属性。这些矛盾不断地把各种群体纳入共同的框架之中,从而一方面增加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则加大了它们对社会中心制度领域的压力。

### 现代化的国际概况

从历史上看,现代化的最初进程,即西欧与中欧的现代化进程,是从一个分享同一种文化遗产而政治单位多元化的社会秩序中产生的。尽管现代化通过多种途径破坏了这一秩序的许多方面,但同时它又通过其他途径加强了对这一共同文化遗产的认同,以及新兴政治单位之间的关系。<sup>②</sup>

从一开始,现代化进程就不局限于个别的民族共同体或“国家”之内。随着现代化的演进而产生的主要经济趋势和发展,以及主要的社会和文化运动,如各类社会,政治运动,都超越了民族或政治的界限。19和20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就其取向而言,本身就是国际性的,尽管这可能有些似是而非。

许多特殊的现代社会群体和精英圈,如宗教组织、知识分子群体,或实业公司,都超越了目前存在和正在形成的政治疆域而发生密切关系。而且,现代化向西欧以外扩展,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一种新型的国际体系的形成。最早的一批现代民族国家,如

---

<sup>①</sup> 参见 J. 费劳德、A. 霍尔塞《教育社会学:动态报告与摘要》,原载《社会学动态》,第7号(1958年),第165—235页。

<sup>②</sup> 参见 D. 汤姆森《拿破仑以来的欧洲》(纽约,1962年版)。

英国、法国、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发展,对中欧、东欧、南欧以及中东地区的较“传统的”统治者构成了挑战,迫使他们着手一项有限的(大都为技术性的)现代化计划,以使他们能够自立于新的国际体系之中。另一方面,这类统治者的尝试以及这些社会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加,又在这些社会中产生了许多新的精英群体,它们倾向于与其他国家类似的组织建立关系,多少形成了它们自己的国际体系,而新的反对统治者的力量就是在这时候产生的。<sup>①</sup>

在现代化的最初阶段,这类国际性的趋向大都集中围绕民族国家及其象征的形成和定形这样的问题而展开。而后,在当代欧洲,以及某种程度上还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随着社会经济分化或政治相互关系的进程开始日益超越旧日的单位,许多新而具体的(不仅仅是象征的)经济和组织框架便趋于产生,而国际一体化的进程和问题也就更为重要。因此伴随现代化的演进而定形的整个政治共同体的疆域不是固定或既定的,这种倾向是随着现代化的时期或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更的。

(张旅平、沈原等 译)

---

<sup>①</sup> 参见 E. 希尔斯《知识分子与权力:若干比较分析方法》,载《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第1期,第1号(1958年),第5—23页。

G. 哥迈尼

## 现代化的整体转型<sup>\*</sup>

变迁的异步性所造成的理论概括上的困难是难以克服的。然而,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区分整体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分支进程,对异步性规律或不平衡规律进行分析。同时,这种区分对于使人们注意到隐藏于多样化的转型形式之下的一些因素是颇有成效的。我将区别三种主要的分支进程:经济发展、社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这些区别目前已在使用,然而由于社会科学家中使用的定义并不总是那么清晰,人们对此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远非一致。鉴于这一原因,本文将简要陈述一下这些区别包含的意义。

其次,为了同样的分析目的,三个主要进程的每一个都应该看作是由一系列的分支进程构成的。尽管我会提到其中的一些分支,但这一系列之间的差别就不再深入论述了。

统计学上的相关分析发现,三个主要进程和组成它们的子进程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然而,正如我在讨论异步性进程所指出的,这种相关远不是完全的,而应该解释为某些有关的解释者一种倾向的表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各种各样的子进程以绝然不同的速率出现,并且各自表现出不同的时序。转型中“转折点”的不同以及内外部条件的差异,可以说明速率和时序的这种多样性。

---

\* 选自哥迈尼《现代化的社会学》一书。

在这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现代化基本可以定义为结构变迁的过程。整体转型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在任何既定的时间里,前一时期的结果结合起来会成为未来转型中决定性的因素。对于每一进程的定义,都是依据最基本的原则需要作出的,这些原则定义了“现代—工业化的复合体”。

经济发展暂且定义为一种结构性的经济转换,功能上需要“自我维持的增长”机制始终伴随其中。一种发达经济的理想类型应该具备这样一系列特征:

(1) 在所有的经济活动中(包括基础的)高能量高效率技术的应用;

(2) 存在着适当的机制(制度的和人力的资源)以确保永久的创造性和/或对技术或组织发明的吸收能力。这些机制必须确保新的有活力的部门不断出现,以补充或者替代那些在经济中地位已经下降,或者已经达到了它们极限的部门的角色;

(3) 工业在基本生产中占有优势;

(4) 较高的国民生产资本投入;

(5) 高的亩产量;

(6) 资金密集型的活动大大超过劳动密集型;

(7) 对外贸易中(在既定的人口水平条件下占 GNP 的比例)国家经济有较高的独立性(或较低的依赖性),在有关物品种类、国家数目方面,为持续增长,多样化而采取的重要战略具有较高的独立性;

(8) 在社会—职业阶层,以及部门活动与地理区域意义上较为平等的 GNP 分配。

上述“理想型”特征,描述的是一种经验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进程就被定义为朝着这个方向的转型。

我们应该将经济扩张与经济发展区别开来。前者指的是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人均 GNP 稳定增长的过程,缺乏我们上一段所列出的经济发展应具有的一些结构性成分。

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扩张不涉及结构性变迁。事实上,它同样是

一种结构变迁的过程,但不是充分的“自我维持”的发展。在现代化和一些特别的基础生产扩张基础上,经济扩张是可以发生的——实际上这是更为频繁的实例。与国际市场的汇合,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商业、金融扩张,在经济上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在社会其它部门也产生了“现代化效应”。经济扩张最终会产生或转化成一种经济发展过程,至少它可能构成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当它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不能得到赞同时,我们可以更为肯定地说它绝不是一个充分的前提条件。事实上,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经济再取向(reorientation)以及结构性变迁的引入,不可能由一定程度的经济扩张自动引发。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经济扩张才会成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步。

政治发展的概念比经济发展的概念更容易引起争论。可以列出三种主要的特征:第一,“国家组织的合理化”(用韦伯的术语),包括工业社会中执行其多样化、专业化和集中化程度不断扩充与增强的国家职能时的高度有效性;第二,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领导和接纳结构变迁的能力,同时又保持一种最低限度的整合;第三,全部或绝大多数成年人口某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其他经常提到的组成成分可以看作是所列举的这三种特征的结果或侧面。这儿有一个例子,如“民族感情”,可以看作是总体参与的一个方面,或者如“稳定性”,这里包括在能吸纳和领导变迁而不打乱社会系统的容量之中。

最后剩下的一类就是社会现代化了。我们最好还是列举一系列组成过程,这样可能比下定义更好一些。

(1) “社会流动”人口增长的比例;<sup>①</sup>

(2) 城市化,即在城市社区中人口的集中增长(通常是流动最

---

<sup>①</sup> 关于这个讨论的最新成果,参见:A.S. 费尔德曼(Feldmann)和W.E. 穆尔《工业化与工业主义》,载于《第五届世界社会学会议记录》I.S.A, 1962, 第二卷。

雷蒙·阿龙(Raymond Aron),《当代的历史解释理论》(“La théorie du et l'interprétation historique de l'époque contemporaine”),载于R.阿龙和B.F.霍塞里兹(Hoselitz)的《发展社会》(巴黎,蒙特,1965),莱因哈德·本迪克斯“传统和现代的再反思”,载于《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Ix(1967),第292—346页。

典型的表现之一)；

(3) 其他一些人口的变化,如出生率、死亡率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年龄结构上的变化；

(4) 家庭结构、核心家庭的内部关系以及亲戚群体关系的变化；

(5) 地方社区的变迁,尤其是它与国家社区的整合(作为社会政治参与的一个方面)；

(6) 传播沟通方面的变迁；

(7) 分层体系的变化: 分层界限的改变(首先是传统的中间阶层的衰落,然后是现代中间阶层的扩张),分层间分化特性的改变——伴随着分层“连续统”的最终产生,“交换”流动的增加,“结构性”(转型的)流动增加,一种通过“增加参与”而造成的永久性流动形式出现(这是建立在一种“自我维持的流动”机制基础之上的,这种机制是由不断的职业上升和不断的由上而下的地位转换形成的)；

(8) 参与规模和形式的变化,尤其是较低阶层公民权利与社会权利的扩大(类似于政治参与的扩大)；

(9) 对同一群体来说,现代消费方式的增加,教育的普及,以及参与感、社区认同感的增强；

(10) 其他一些重要的变化,如教会、自愿者团体这些机构以及闲暇方式的变化;阶层之间、社会群体之间,城市—乡村之间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差别的缩小(差别的缩小会影响到大多数人口,一些较大的分化可能还会持续,甚或在社会上层可能还会增加,尤其是权力的集中,或者至少是某些形式的权力)。<sup>①</sup>

---

<sup>①</sup> 包含在这个定义中的一些因素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如许多经济学家对将工业基础生产的支配当作发展的普遍要求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参见:彼得·T.鲍尔(Peter. T. Bauer)巴锡尔·S.亚梅(Basil S. Yamay)《发达国家的经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第十五章。相反的观点(也是广为接受的一种),可参见W. W. 罗斯托(Rostow)“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载于第一届经济历史的国际会议(巴黎,蒙特,1960),拉美社会科学家在这个领域普遍的观点倾向于认为,工业化是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他们坚持认为物资生产工业占重要地位,是工业化发展较高的必要阶段。这种“拉美论调”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对《迈向有活力的发展》所作的评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统计资料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参见H. B.切纳里(H. B. Cheenery)“工业增长的模式”,载于《美国经济论坛》(1960),第624—654页。

现代社会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在保持相当程度的整合的同时，为创造和吸纳一种持续变迁与适当机制之间永久的联合。这一点，我们可以与经济发展进行类比：社会和政治的现代化是社会结构的一种转型，包括了“自我维持的社会和政治变迁”机制。事实上，既定的转型过程中的最基本单位，“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与“自我维持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在具体的可看到的同一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方式。为适应持续的变迁而建立这类机制的失败会导致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失败；同样，在经济结构中建立相应机制的失败，也会导致经济发展进程的“中断”。最后必须强调的是，现代化定义的本质特征不是不断变迁这一事实而是产生和吸纳变迁的能力。

### 分支进程中速度和顺序的差异

分支进程间的关系应该看作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就是说，它们彼此互相影响。这种交互作用的结果决定了整体转型的方向和速度，而且还可能会对任何一个单独的分支进程形成有利或不利的影晌。换句话说，经济发展进程（以及在既定条件下的经济扩张）制约着社会和政治的现代化进程，反之亦然。还可以说，为达到既定程度的社会和政治现代化，存在着一个最低限度（阈限）的经济发展。反过来说，既定的最低限度的社会和政治现代化，构成了达到特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或经济扩张的必要条件。然而，适合于分析这种交互关系的理论模式，甚至于一种可接受的概念图式都不存在。只能说相互关系的类型和形式以及不同的“阈限”，依照各国转型发生时的历史条件而变化。这些历史条件包括了相当多的因素——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不仅考虑到转型时社会的内部条件，而且考虑到它的外部条件——尤其是与其他社会的关系，这是造成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不同的分支进程中，速度和顺序差异的一个原因。依此类推，经济扩张对社会

结构产生的影响类似于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扩张才有一个“现代化的效应”。

分支进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其性质和效果深受转型发生时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这包括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转折点”时社会文化的差异。正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整体转型所遵循的道路是不同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根源在于分支进程发生时在速度和顺序上的差异。而差异本身应该从不同的情境条件(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在国内的和国际的两个层面上得以说明。前一章所讨论的异步性可以看作是这些速度和顺序差异的一个结果。让我们回到分析一些“综合性效果”方面所使用的例子,我们现在可以把它们当作是速度加快或降低时的副产品,或者是顺序超前或延后时的事例。众所周知的超速和超前实例是城市化增长和死亡率的下降(城市化严格的定义是人口向城市地区的集中),二者都不是伴随着或者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是大大地超前了。虽然不是很普遍,不同国家中却经常出现对社会流动、政治参与以及传播媒介期望过高的实例。这些在西方模式中,趋向于以一种较低的速度进行,并且是在经济发展(尤其是在结构变迁的意义上)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之后开始的。然而,相反的情况,较慢的速度与延缓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必须注意到一定过程中的加速和/或超前,与其他过程中的延缓和/或滞后是同时并存的。

这里简要列举一下其他的因素将会是有益的,这些因素会影响和限定分支进程与整体转型的性质、方向和速度:

- 每一个国家可以利用的人类资源(这是该国依照其资源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与经济发展的可行性)。这些形成了不同的发展和现代化模式,如霍塞里兹(Hoselitz)所说的扩张主义的或内在的发展;或者如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开放空间的经济”(economy of the open space)所反映的那一种特殊的发展史。

- 依据其政治和经济实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和/或经济独立程度,该国在国际等级中所占据的相对位置(在中心—外围范围

内);在转型时和转型过程中由国际形势所决定的特定的(并且是变化的)环境条件。

- 转型发生时该国的历史、文化特点与社会结构,如“转折点”时的社会形态。可以看出“传统社会”这个概念经常是被当作一个残留的类别而使用的。事实上,一种“转折点”的类型学是必要的。

- 转型开始时期以及进一步深入发展时期自然科学知识的状况与实用技术的性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这些变化在别处发生了,它们的外在特征对使用它们的国家的转型形式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 在转型初期和转型过程中社会科学知识的状况,特别是有关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知识。这不仅依赖于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有赖于国际历史经济的积累。

- 形成经济发展与社会现代化分支进程的社会行动的特征,其“自发性”、“自觉性”、“可讨论性”和“计划性”的程度。

- 决定转型的内部与外部因素的比例和性质。

- 转型初期与进一步发展阶段,精英领导,或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的不同类型。

- 较早发展的和现代化了的社会中所发生的变迁,以及发达工业化国家中所表现的类型,这些社会(尤其是“中央集权的”和专制的国家)被当作转型的模式,由此为正在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群提供了选择的目标,而且更为普遍地证实了著名的“示范效应”。应该注意的是发展的不同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它们会转化成为转型扩张中强有力的因素。

还应该加上其他一些常识性的见解。这些因素类别不是截然划分开来的——实际上它们之间是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各种各样的因素不是独立的,而是在不同程度上有着交互关系的。所有的因素都在一个国际系统内,朝着更为协调统一,更加相互依赖的方向运行。当以一个特定的国家为单位分析其进程时,我们应该时刻记住,这样的进程是不可能与全球背景分开的。最后一点,所有

的因素都具有一种动态的特性,就是说,它们时时刻刻都在变化,这样就形成了任何给定时期内都不相同的背景状况,影响着转型的发生。

速度和顺序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后果,一个有趣的例证是经济扩张的“现代化效果”:与经济发展速度相比较,社会现代化某些进程的超前发展(经常伴随着其他方面的滞后)对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来说,这种差异尤为重要。很明显,经济扩张的性质决定了它对现代化的影响。建立于一种初级生产类型基础之上的经济扩张,只需要一小部分的人口流动,与经济其他方方面面的联系亦很有限,不可能对社会结构产生广泛而又深入的影响。如那些矿业或种植园经济,或如其他与本国经济相对来说相脱离的外向型的经济活动,在“古老的”与“现代的”部门之间极易产生强烈的断裂,形成一种典型的“二元”社会与经济。社会现代化会影响到某些限度内的区域和社会群体,他们的行为和制度的某些方面——通常是指城中心区或更为常见的是在“初级”城市中的上层或中等阶层。然而,即使是在这些层面上,一些基本的价值取向依然保留着,与其他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并行不悖。但是,如果经济扩张需要,或者是间接促使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如大范围人口的参与,从事较低或中等的职业,国内市场的膨胀和/或其他一些“扩散的”结果(如同社会现代化的其他进程一样),这些都以一种超速度而发展,并且领先于经济发展的“相应的”或“均衡的”水平。这些不同形式的经济扩张,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统的极端事例,而连续统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中间类型,从相对“封闭的”行为,或多或少与经济和社会的其他方面相隔离,到扩散性的行为,这些行为影响着相当一部分的人口,也影响着一个较大范围的社会群体和机构。

### 转型的阶段

一个基本的问题从理论上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与不同转

型中分支进程的顺序和速度相比较,“均衡”一词的定义还未清楚。为了进行比较,一些独立的标准是必要的,以便衡量不同的分支进程中所达到的“均衡”或“期望的”程度。通常所使用的两种不同的程式是:西方的历史经验的模式,这是进行比较的一个常用的标准或基准(如前一段中给出的例子);或者是在不同的进程中,许多国家的决策者所使用的,根据统计学上的平均和相关得出的“均衡”。两种程式都是有益的,然而却被不恰当地扩大为转型的通用模式。没有理由相信“西方的”模式会被重复;统计学上的程式对于我们发现进程之间的相关关系与合作关系是必要的,然而却不能解释其中的原因,也不能够解释统计学上存在的正态的或偏差的事实。另外,统计学上定义的“均衡”还存在一个问题,即资料通常是从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转型的国家取得的,这些国家当时处于相当隔离的国际环境中,其转型也处于绝然不同的水平上。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一个有关现代化阶段的理论问题。当然,这种想法还不是很成功。<sup>①</sup>事实上,分支进程在速度和顺序上的差异,与前面提到的由于资源差异而引起的那些差异,都会形成这样一种“道路”的多样性,从而也就摈弃了或者说大大限制了任何一种通用的或普通的具有固定发展阶段的成功范式,使其丧失了有效性。或者成功的范式应该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基础之上,即能够整合许多有关的决定性的背景因素,从而形成一套整体转型的类型学(有“分歧的”道路上有“均衡的”阶段),以适应于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这里,社会科学家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至少在目前,他缺少这样的一种理论;另一方面,像“水平”、“程度”这样一些词汇,在任何对转型的分析中都是难以避免的。事实上它们是蕴含其中的,除非将每一个现代化事例都看作是独一无二的,取

---

<sup>①</sup> 这里所使用的这个概念不同于目前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参见 G. 杰默尼(G. Germani)“社会变迁和群体间的冲突”,载于 I. L. 霍罗威茨(I. L. Horowitz)主编的《新社会学》(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

消一切比较(即使是含蓄的),这些词总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重新引入。这就是为什么传统和经验的“外在标准”(如西方模式和统计相关),尽管有其明显的理论缺陷,却富有用处。对于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理论这一点,还有另外一种进行部分补救的可能,我所指的是有关国家中的一个有限群体或一个地区成功的描述性图式,从内部文化和社会结构以及转型发生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些群体和地区相对来说具有较多的同质性。可以说,对有限的地理—文化区域和特定的历史时期来说,更为有效的概括是可以总结出来的。这种图式,而不是理论框架,用来说明一系列相似的(但不是相同的)历史进程是再方便不过的。另一方面,在说明特定的成功类型群和成功特征方面,它还具有一些分析的功用。实际上,阶段性划分的用意,可以与这样一种思想联系起来,即在转型过程中,分支进程在速度和顺序上的差异,其他决定性的和背景因素的影响(国内的与国际的),趋向于沉淀为特定的结构序列。这些反过来又极易渗入过程本身之中,并且转化为解释进一步发展阶段的主要因素。这一点可能会给阶段的选择与转型期的发展提供更为客观的基础。

对于阶段的确认有两个主要标准: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方面表现出一种特征序列,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期和持续期,而且明显地区别于前一阶段的成功的结构排列。第二点,在转型的深入发展时期它的因果影响力。从另一种观点来看,阶段可以看作是转型中的“转折点”。当然,任何一个历史进程都是一个具体的连续的流,“转折点”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传统而又武断的用法,然而却限制了转型的一种纯粹的“决定论”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转折点”可以定义为重新取向极易发生的一个特殊时刻(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持续期)。总而言之,从成功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实际的表现与其性质,无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皆由转型前一阶段所形成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特征,它们之间特定的交互关系,以及社会行动者(处于主要位置的个人和群体)的“决断力”所决定。现代化

的中断、经济的停滞,或者相反,现代化与经济发展朝着更深程度迈进,皆可以由“构形”和“决断力”来解释。这里要注意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要明白构形或特性所指的不仅是社会的“内部”结构,而且有外部的和国际的形势。第二,必须认识到“决断力”这个词在理论上尤其困难和模糊不清,它经常被明确地或含蓄地使用,用来分析历史进程,尤其是经济和政治政策。无论如何,“决断力”一词必须在显然适合于行动者“选择”的范围内进行定义,这个范围在不同的内外部条件下(如特定的结构特征的“构形”)有所变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行动者可适用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前所述,转型发生的“自发性”、“自觉性”、“计划性”程度,是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程度都在加深。从这一点来看,早期转型国家的情势绝然不同于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情势,这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王麦玲 译)

苏耀昌

## 对现代化学派的批评<sup>\*</sup>

在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评之前,我先谈一下主流社会科学家们对现代化学派的各种学术批评(本迪克斯, Bendix 1967; 艾森斯塔德, Eisenstadt, 1974; 古斯非尔德, Gusfield, 1967; 亨廷顿, 1976; 劳尔, Lauer, 1971; 尼斯伯特, Nisbet, 1969; 蒂普斯, 1976)。这些学者对于现代化理论的进化论假设与功能主义假设持保留态度。

首先,批评家们对现代化理论中“单方向发展”的进化论假设提出了挑战。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一定要沿着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发展呢?这些批评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论断,只是因为大多数现代化研究人员都是欧美人。这些研究人员生于斯,长于斯,自然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合情理的。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现在代表着第三世界的将来,由此他们假设第三世界国家将会不断地向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靠拢。这些批评家们认为这种“西方优越论”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例如,为什么把西方国家置于进化路径的较高级阶段,而认为它是“先进”的,“现代”的呢?为什么把第三世界国家放在进化路径的较低级阶段,而认为它是“原始的”和“传统”的呢?

---

\* 选自苏耀昌的《社会变迁和发展》一书。

这些批评家强调,诸如“先进”、“现代”、“传统”、“原始”等这些概念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标签而已,一些研究人员用这些标签来证明西方的优越性。

第二,批评家们指出:因为认为发展是单方向的,一些研究人员忽视了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其余各种发展路途。因为现代化研究人员假设第三世界一定会以西方模式发展,他们实际上排除了第三世界国家选择不同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例如,因为美国是民主制度,所以现代化研究人员就假设民主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经济发展一定不能离开民主吗?难道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其他选择吗?例如,他们能否像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一样选择一条权威主义发展道路吗?他们能否创造出一种自己的发展模式呢?

第三,批评家们认为现代化研究人员过于乐观了。他们错误地假设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发展起来了,所以第三世界也能够发展起来。这些研究人员没有充分考虑不发展的可能性。很多批评家认为第三世界发展的前景是不确定的。现代化过程突然崩溃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就像在埃塞俄比亚一样,人民面临饥饿,民族处于灭绝的边缘。这些批评家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实际上变得更糟糕了。与现代化理论的推断相反,现代化过程似乎能够中止甚至逆转的。

### 消解传统价值的必要性

功能主义假设传统与现代是不相容的,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首先,这些批评家们提出:什么是真正的传统?第三世界国家真的有一套同质性的、和谐的传统价值吗?这些批评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体系是异质性的。例如,雷德非尔德(Redfield)1965年就曾经区分过“大传统”与“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前者是精英们的价值,重视诗歌、绘画、舞蹈、狩猎、闲暇

和哲学；后者是大众的价值，重视田野里的劳作、勤勉、节俭和自食其力。而且，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体系不仅是多种多样，互不相同的，也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功能主义者常常错误地以为过去的社会是和平而且稳定的，其实不然。回顾整个历史，到处都有农民反抗、民族运动、宗教战争这些冲突与动荡。

第二，一些批评家提出，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真的是互相排斥的吗？他们认为：在传统社会里现代价值一直都是存在的。例如，传统中国社会强调特殊性归属，但是那里却差一套重视普遍性成就的非人格化的套试体系。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里，传统价值也是一直都存在的。例如，在现代科层制组织的人员招募与升迁方面，传统价值（如种族、性别、年龄）的影响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总是共存的。

第三，批评家们提出：传统主义价值真的是现代化的障碍吗？我们是否一定要为了推进现代化而消除传统价值的影响呢？一些批评家指出，在推进现代化方面，传统主义价值观有时也许是很有用的。例如，在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对天皇的效忠”被很容易地转换成为“对公司的效忠”。这种“对公司的效忠”对于提高工人的生产率、降低人事变动率是很有帮助的。

最后，一些批评家提出：现代化能够完全取代传统价值吗？他们指出：传统价值将会一直存在于现代化过程之中。正如文化滞后论(cultural lag theory)所说的那样，即使在原来使传统价值产生的初始条件消失之后，传统价值仍然会在一段长时期里继续存在。传统价值不会被现代化简单地、单方面地取代，它必定会继续存在下去，并影响现代价值的发展。例如，中国人对中药的深信不疑改变了他们接受西方医药的态度，一个中国人会早晨吃一片阿司匹林，而晚上又喝一碗中药汤。而且甚至在传统价值看起来似乎正在衰落的时候，它们也可能会在以后的某一时刻卷土重来，影响第三世界的发展过程。传统价值常常在现代化过程的关键转折点上重又兴盛起来。例如，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为了团结整个民族共同奋

斗,就常常很重视民间宗教、民歌、本土语言这些传统价值。所以,传统价值不会消亡。

### 方法论方面的问题

一些批评家认为:现代化研究人员在表述他们的论证时过于抽象,以致很难确切地知道他们讨论的是哪个国家和哪个历史时期。例如在讨论特殊性、先赋性、集体性、扩散性、情感性(particularistic, ascribed, collective, diffused, affective)这些价值时,我们既不知道现代化理论所指的是哪个国家(日本?埃及?秘鲁?),也不知道它讨论的是哪一段历史时期。17世纪?18世纪?19世纪?还是20世纪?现代化研究人员在论证他们的观点时,太概括、太抽象,以致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扔到一边去了。

另外,一些批评家强调:研究现代化的社会科学家们所做的工作中,缺少前后一致的历史研究。他们只是把跨国家的特定时期研究当作历时性的历史研究。例如,在讨论为什么中国在二战后的现代化过程失败时,这些批评家认为正确的研究方法是考察18世纪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从那时以后又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这些历史因素又是如何影响20世纪中国的发展道路的。但是,现代化研究人员并未采取这种历史研究方法,而是仅仅用跨国家研究方法来研究。他们假设20世纪的中国类似于18世纪的英国。如果为了达到经济的起飞阶段,18世纪的英国要把国民收入的10%或更多用来投资的话,那么20世纪的中国也应该这样做。

除了上面的这些学术批评外,现代化学派还受到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评(伯登海默, Bodenheim, 1970; 卡多李, Cardoso; 法力托, Falleto, 1979; 奇尔科特, Chilcote; 艾德耳斯坦, Edelstein, 1974; 弗兰克, Frank, 1969; 波特斯, Porters, 1976; 普拉特, Pratt, 1973; 罗德, Rhodes, 1968)。因为后面将要深入讨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发展研究情况,这里就简单地介绍一下新马克思主义者批评的两个

方面。第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批评,第二是对现代化研究人员忽视外部控制问题的批评。

### 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冷战意识形态,被用来证明美国干预第三世界事务的合理性。弗兰克(Frank)1969年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为:“发展社会学与社会学的不发展”。在这篇文章中,他声称要“审视北美社会科学界的‘皇帝新装’,暴露出在意识形态伪装下的科学的本来面目”。

与他类似的还有伯登海默(Bodenheimer)。他指出:在比较政治学与比较社会学的文献中。到处都充斥着“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他认为这些发展研究有以下四个知识论方面的错误:

- 1) 认为有一种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客观的社会科学;
- 2) 相信知识的累积性;
- 3) 认为存在着一种社会科学的普遍法则;
- 4) 向第三世界贩卖上面三点。

这些知识论方面的错误又导致了以下理论错误:

- 1) 认为发展是持续不断的,在量上是增加的;
- 2) 认为稳定有序的社会变迁是可能的;
- 3) 认为发展会从西方国家向第三世界扩散,还导致了革命意识形态的衰落,以及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的蔓延(见阿尔蒙德 Almodd, 1987, p445)。

### 对于外部控制的忽略

学者们在批评现代化理论时指出:现代化理论忽略了非常重要的外部控制问题。现代化研究人员专注于研究诸如传统价值、缺少生产投资等等这些内部特征,却很少注意研究发展的外部动力

因素,很少讨论殖民统治史、多国公司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控制、西方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国际体系的性质这些问题。尽管现代化研究人员只是假设第三世界国家在殖民统治正式结束后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的自主权,但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依然被西方国家控制着。所以新马克思主义者批评现代化理论忽略了外部控制这一影响第三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

总的说来,对现代化理论的学术批评与政治批评指出了它的进化论假设与功能主义假设的误导性、方法论上的问题和意识形态基础。现在,现代化研究人员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回应这些批评?应该怎样认真地对待这些批评?难道现代化学派真的是一无是处,应该散伙了事吗?现代化学派有无可能把批评中的重要之处整合入自己的理论与研究中呢?

在60年代晚期,理论上的争论正热火朝天时,现代化研究人员一般是以辩护自己的观点为主,而较少注意这些批评。但是,在70年代末期,争论已经平息,现代化研究人员开始认真地考虑这些批评了。现代化学派已经对自己的基本原理作了一些调整,还开始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

(王辉 译,仲夏 校)

S. 亨廷顿

## 关于现代化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sup>\*</sup>

### 一、现代化的一般理论

50年代比较政治学新发展的表现之一,就是其所关注的地理视野由西欧及有关地区扩展到“发展中”国家。确实,再也不能说政治学家们不重视变迁问题了。他们似乎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亚非拉地区所发生的变迁问题上。政治学家们已经接受了现代化理论,人们也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比较政治学的。现代性与传统的概念很有可能会取代过去曾为政治分析家们所珍爱的分类法,如民主、寡头、专制;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极权主义与立宪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等。当然,这些范畴目前还在使用。但到60年代后期,几乎政治学家们每讨论一次像“立宪”与“极权”这样的问题,很可能同时已讨论了十次“现代”与“传统”这样的问题。

当然可以使这对范畴看作是原始社会与先进社会这种伟大的两分法的最新表述,后者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一直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个共同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是帕森斯和

---

\* 选自 C. 布赖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

希尔斯在50年代初期详细阐述了他们提出的模式变项 (pattern variables), 然后是苏顿在1955年发表的《社会理论与比较政治学》一文中将这些由“行动者”面对的“选择”扩展到社会系统的特征上去。<sup>①</sup>苏顿对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用他的术语来说是“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概括涵盖了大部分人们普遍承认的这两种类型的社会所独有的特征:

农业社会	现代工业社会
1. 先赋性的、特殊主义的、扩散性的模式占据支配地位	1. 普遍主义的、专门化的、自治性的规范占据支配地位
2. 稳定的地方群体和有限的空间流动	2. 大量的社会流动(在一般意义上,不一定非得是“垂直流动”)
3. 相对简单而稳定的“职业”分化	3. 发达的职业体系,并独立于其他的社会结构
4. 具有扩散效应的“不得轻易冒犯”的分层系统	4. 以抽象的职业成就模式为基础的“平等的”阶级系统
	5. “团体”的广泛存在,这些团体在功能上是专门化的,其结构是非先赋性的

在大部分现代化理论家们看来,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现代社会能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其自然与社会环境。反过来看,这种控制又是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为基础的。比如,社会学家列维就认为,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其成员使用非生物能源和使用事半功倍的工具的程度”。<sup>②</sup>历史学家布赖克认为,现代社会发端于“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对急剧变化的功能”的适应,“它反映了人类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科学革命,这种知识使人类得以控制他们的环境”。<sup>③</sup>在政治学家当中,拉

① 苏顿(F. Sutton)《社会理论与比较政治学》,收在埃克斯坦和阿普特编的《比较政治学:一个读本》,纽约,1963。

② 列维(M. Levy)《现代化与社会结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第一卷第11页。

③ 布赖克《现代化的动力》,纽约,1966,第7页。

斯托认为,现代化涉及到“通过人们之间更密切的合作急剧扩大对自然的控制”。<sup>①</sup>在所有这些理论家看来,人类对其环境控制程度的差异反映了他们对环境的基本态度和期望的差异。现代人与传统人之间的区别是造成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差异的根本原因。传统人是消极的,对一切持一种默许的态度;他们希望自然和社会的状况不要发生变化,不相信人类有改变或控制自然与社会的能力。相反,现代人则相信变革的可能性,并具有这种愿望,他们也相信人类有能力控制变革,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知识的层面上,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有关人类环境的知识大量积累,并通过文字、大众传播和教育等手段实现知识在全社会的扩散。与传统社会相反,现代社会具有更好的健康状况、更高的预期寿命以及更多的职业与地域流动。占据支配地位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从社会方面来看,在现代社会中,其角色为扩散性的家庭和其他初级群体或是将被人们有意识建立的承担特定功能的次级团体所取代,或是为后者所补充。从经济上来看,随着一些简单的职业让位于更复杂的职业,出现了人们活动的多样化;职业技能的水平和资本与劳动的比率要远远高于传统社会。相对于商业、工业和其他非农业活动来说,农业的地位下降了,商业式的农业取代了生存型农业。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所牵涉的地理范围要远大于传统社会,随着国家市场、国家资本来源以及其他国家经济体制的出现,这些活动不断在国家层次上集中。

从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各不相同的一般性特征中,形成了现代政体和传统政体间的区别。政治学家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以描述这种差异。华德和拉斯托所列的项目也许是最简洁、最详尽的。他们认为,现代政体具有下列为传统政体所缺少的特征:

1. 高度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政府组织制度;
2. 政府结构内的高度整合;

---

<sup>①</sup> 拉斯托(D. Rustow)《国家的世界》,华盛顿,1967,第3页。

3. 理性的、世俗的政治决策程序的广泛存在；
4. 民众对国家历史、疆域、民族实体的广泛认同和亲近感；
5. 政治决策的数量大、范围广、效能高；
6. 民众对政治体系具有广泛的兴趣与投入，尽管并不一定参与决策过程；
7. 政治角色是按成就标准而不是按先赋性标准配置的；
8. 司法和控制手段是以世俗的、资本主义的(impersonal)法律体系为基础的。<sup>①</sup>

从更抽象一些的意义上说，现代政体不同于传统政体的特征是在于它的理性化的权威、分化的结构、大众参与以及随之而来的实现广泛的目标的能力。

在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所架设的桥梁，就是伟大的现代化运动。关于这个过程的基本轮廓和特征，学者们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许多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或明或暗地提到的现代化过程的特征有如下九点：

1. 现代化是一个革命性的过程。这个特征直接与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的差异有关。这两种社会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因而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涉及到人类生活模式的根本性的、总体性的变迁。正如布赖克所说的，可以将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比之为从没有人类的时代到人类时代以及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转变。本迪克斯也同样认为，可以将发生在18世纪的变迁比之为“约10000年以前以游牧为生的人向定居的农民的转变”。<sup>②</sup>

2.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可能将现代化轻易地还原为某种单一的因素或方面。它实际上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方面的变迁。其内容至少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动员、分化、世

---

<sup>①</sup> D.拉斯托和华德(R. Ward)主编《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普林斯顿，1964，导言部分，第6—7页。

<sup>②</sup> 布赖克《现代化与社会结构》，第1—5页；本迪克斯(R. Bendix)《传统与现代性再思考》。见《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9卷(1967年4月)，第292—293页。

俗化、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识字率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政治参与的扩大。

3.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任何一个因素中的变迁都是与其他因素相联系的,并会影响到其他因素的变迁。正如勒纳在他那一段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中所指出的,现代化“的过程具有某些独特的性质,正因为如此,按现代化的规则生活的人们经常感到现代性是一种始终一贯的整体”。现代化中的各种因素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从历史的意义上看,这些因素不得不联成一体。”<sup>①</sup>

4. 现代化是一种全球性的过程。现代化发端于15和16世纪的欧洲,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之所以如此,基本原因是来自欧洲中心的现代观念和技术的传播,部分地也是由于非西方社会的内部发展。所有社会都曾在某个历史时期处于传统状态;而现在,这些社会或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或是处在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进程中。

5. 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代化所涉及的总体性变迁只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才能实现。因此,虽然就现代化为传统社会带来的变革的程度而言它是革命性的,但它在某一段时间里所导致的变迁又是渐进的。西方社会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实现了现代化。当代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可能用不了这样长的时间就可以实现现代化。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化的速度是加快了,但即便如此,这些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6. 现代化是一种阶段性的过程。我们可以辨别出所有社会都将经历的现代化的层次或阶段。很明显,所有的社会都始于传统阶段而终于现代阶段。但中间的转型阶段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若干具体的阶段。这样就可以根据一个社会在现代化之路上已经走了多远来对其进行比较和确定它的发展水平。虽然在这个过程中的

---

<sup>①</sup> 勒纳(D. Lerner)《传统社会的消逝》,Glencoe,1958,第438页。

领导权以及具体的现代化模式在不同的社会中是不同的,但所有的社会都会经历相同的基本阶段。

7. 现代化是一种趋同过程。传统社会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有些人认为,这些传统社会除了都缺少现代性之外,很少有什么其他的共同点。而在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之间则有着一些基本的相似之处。现代化形成了不同社会之间趋同的趋势。现代化涉及到“那些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之间的互相依赖性的增强、并最终会导致社会间的整合”。“现代观念与制度的普遍性先决条件”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的出现,“在这个阶段中,各种社会的同值性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致能够形成一个世界国家……”<sup>①</sup>

8. 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逆过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某些方面的受挫和逆转,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化则是一种根本性的世俗趋势。如果一个社会的城市化、识字率和工业化在一段时间里已经达到一定程度,那么将不太可能在以后的时间里出现水平下降的现象。在不同的社会中,变迁的速度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但变迁的方向则不会有什么不同。

9. 现代化是一种进步过程。现代化所造成的创伤是多方面的,也是很明显的,但从长远来看,现代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人们所期望的。其转变时期,特别是在其初期阶段上,所要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痛苦是很多的,但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所取得的成就表明现代化的过程是利大于弊的。从长远来看,现代化会增进人类的福利,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是如此。

## 二、历史上的现代化思想

50年代出现的现代化理论明显不同于20年代和30年代在西方

<sup>①</sup> 布赖克《现代化与社会结构》,第155、174页。

思想界中流行的有关历史进化和社会变迁的那些理论。当时的社会理论对人类和社会的未来的看法是相当悲观的。可以将这种悲观主义区分为两个学派。第一个学派包括斯本格勒、巴雷托、索罗金和汤因比这样的理论家,他们关注的是特定文明或文化的进化模式。他们想对大型人类社会的起源、生长、成熟和衰落的顺序进行概括。从根本上说,他们是关于历史的循环论者。将其观点应用于当代西方文明,就意味着,它正在达到或已经过了繁荣期,现在正处于衰落的过程中。悲观主义的另一个分支则完全是关注西方社会的。它的代表人物认为,西方社会早就实现了整合、并促进了人类的自我实现。但在过去的某个时刻,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西方的历史已经在走下坡路。人类社区的崩溃、宗教价值的淡漠、异化与失落的严重化以及大众社会的恐怖行为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是世俗化、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的结果。在50年代被人们善意地看作是现代化的过程,在30年代则被看作是解体。有些理论家将衰落开始的时间断在宗教改革;另一些人则将其断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或法国革命。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刻,西方历史已经偏离了轨道,这样一种特殊的过程开始了。这个过程开始于对宗教的排斥和社区的崩溃,并导致不断地、不可挽回地滑向政治、世界战争以及整肃的考验。在某些保守主义者看来,现代自由主义只是这种根本错误的思想的“较温和”的版本,这种错误思想成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正如尼布尔所说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共产主义的罪恶都是根植于为现代自由文化所分享的那种错误观点”。艾利奥特也同意这种观点:“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了(要求绝对崇敬和忠实的上帝),你就可能会将你的尊敬献给希特勒或斯大林。”<sup>①</sup>

还有一些思想家,他们不太强调宗教的衰落,他们讲得更多的

---

<sup>①</sup> 尼布尔(R. Niebuhr)《基督教理想主义与政治问题》,纽约,1953,第5页;艾利奥特(T. Eliot)《基督社会的理想》,纽约,1940,第64页。

是工业化和民主化的解体效应。像曼海姆和阿连德这样的一些人就警告说,大众社会中正在出现一种极权的趋势。<sup>①</sup>有些人不愿将西方走下坡路的起点追溯到16或18世纪,而是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作是转折点。拉斯韦尔认为,正是在那个时候,历史趋势由“朝向自由人的世界联邦(world commonwealth)的进步转向另一种世界秩序,在这种世界秩序中,以集中营为标志的国家再次引进了以种姓为纽带的社会体系”。李普曼在1938年也按照同样的思路形成了他的看法,他认为,1917年确实是革命性的年份,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中,政府在战争和动乱的压力下走向崩溃,西方社会也开始了瘫痪、混乱和极权主义的趋势。<sup>②</sup>两次大战之间的悲观主义反映出人们所感受到的旧工业化、城市化及其他类似过程给西方社会所带来的灾难与混乱。50年代和60年代的现代化的乐观主义则反映出人们所感受到的由同样一些过程为西方社会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成就。

因此,50年代和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与20年代和30年代的世俗悲观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很明显,这种理论更近似于以前半世纪的进化论的乐观主义。与其说20世纪下半期的社会理论近似于20世纪初期的理论倒不如说它更接近于19世纪后期的社会理论。如同维多利亚式的家具一样,维多利亚风格的思想又突然在50年代后期受到尊崇。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这种重要的两分法起源于梅恩1861年形成的身份与契约的区别、滕尼斯于1887年对社区与社会所做的对比以及韦伯对权威的传统来源和理性来源的讨论。<sup>③</sup>同

---

① 曼海姆(K. Mannheim)《复兴年代的人与社会》,伦敦,1940;阿连德(H. Arendt)《极权主义的起源》,纽约,1951。

② 拉斯韦尔(H. Lasswell)《普遍的危急时刻:持续的危机与集中营国家》,收在布里森(L. Bryson)、芬克尔斯坦(L. Finkelstein)和麦基弗(R. MacIver)编《关于动荡年代的观点:科学、哲学与宗教:1939—1949》,纽约,1950,见第323页;李普曼(W. Lippmann)《公共哲学》,波士顿,1955,第3—8页。

③ 梅恩(S. Maine)《古代法:它与社会早期历史的联系及与现代思想的关系》,伦敦,1861;滕尼斯(F. Tönnies)《社区与社会》,莱比锡,1887;韦伯《经济与社会》,Tübingen, 1922。

样,二次后理论家们所描述的伟大的现代化过程的那些特征和结果,也可以见之于19世纪斯宾塞和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这两种理论都认为在经济动因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正在经历若干阶段向更好方向迈进。

20世纪初的世界大战、经济衰退、政治混乱和极权主义令人们对19世纪关于进步的种种理论产生怀疑。无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提出一种关于未来的确切图景。20世纪有关进步的理论能否取得更大的成功还仍然是个问题。20世纪的社会科学家们像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确信第一世界将发生革命那样确信第三世界将实现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历史的延续来预测未来,而20世纪的社会科学家则是通过对历史的改造来预测未来。其中的一种理论的失败可能会预示另一种理论的成功。

19世纪后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乐观主义的根基是西方社会在那个时代正在取得的进步,然后朝前看,就可以看到斯宾塞的工业社会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幸福前景。这是一种关于未来进步的乐观主义。相反,20世纪现代化理论家的乐观主义则是倒溯性的(*retroactive*)乐观主义。对目前现状的满足导致了一种相对过去或其他社会的乐观主义。50年代和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对现代社会的未来很少进行论述,或根本上没有这种论述;假定西方国家“已经实现的”就是未来;所以对过去感兴趣并不是因为过去预示着未来,过去所预示的只是那些为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而斗争的社会的未来。在50年代,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在非西方社会都异乎寻常地接受了现代化理论,这种现象部分地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即这种理论为某一社会中的自足与其他社会中的期望找到了根据。现代化理论使海外的变迁和内部现状合理化了。现代化理论用异乎寻常的办法将对过去的现代性的效能的信念与对现代性潜

在的未来的视而不见结合在一起。<sup>①</sup>

### 三、对现代化理论的修正

如同其他社会理论一样,现代化理论也是发源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形势,这种视野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这种理论。此外,这样理论本身也存在某种固有的逻辑上的弱点。在60年代后期,已经出现了为数不多的矫正性的努力,以解决主流现代化理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修正现代化理论有关的理论家包括:高斯菲尔德<sup>②</sup>、辛格、本迪克斯、L.鲁道夫与S.鲁道夫、艾森斯塔德以及希斯特曼。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学者的经验研究都是有关印度的,因为印度是20世纪的最复杂的传统社会。这些分析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所做的批评主要是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现代性和传统概念的意义与有用性;(2)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关系;(3)现代

---

<sup>①</sup> 在60年代后期,出现了“后现代”(postmodern)理论,但这种理论中有代表性的学者很少去分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些理论产生于对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的关心,而不是产生于对技术对传统社会的影响的关心。见贝尔(D. Bell)《评后工业社会》,《公共利益》第6卷第24—35页和第7卷第102—118页;布热津斯基(Z. Brzezinski)《两个时代之间:电子时代美国的作用》,纽约,1970。布热津斯基和贝尔将我们在上面提及的现代化的九种特征中的一些作为从现代向随后阶段转变过程中的特征。两人都属于乐观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与现代化理论家的共同点多于与20世纪初期的悲观主义的共同点。但与现代化理论家不同的是,这两人都受到那些对后工业社会或电子社会的前景感到担忧的人们的批评。政治学家也阐明了这种历史性转变所包含的深远的政治意义。

<sup>②</sup> 见高斯菲尔德(J. Gusfield)《传统与现代性:研究社会变迁时详置的两极》,《美国社会学杂志》LXXII(1966年1月),第351—362页;本迪克斯《传统与现代性再思考》;L.鲁道夫(L. rudolph)和S.鲁道夫(S. rudolph)《传统中的现代性》,芝加哥,1967;艾森斯塔德(S. Eisenstadt)《现代化的受挫》,《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12卷(1964年7月),第345—367页;以及《传统、变迁与现代性》,希伯来大学;希斯特曼(J. heesterman)《现代印度中的传统》,第119卷(1963),第217—253页;辛格(M. Singer)编《传统的印度:结构与变迁》,费拉德尔菲亚,1959;科塔利(R. Kothari)《传统与现代性修订》,《政府与反对派》,第三卷(1968年夏季号),第273—297页;怀塔克(C. Whitaker)《传统政治学:尼日利亚北部的连续性与变迁:1946—1966》,普林斯顿,1970。

化概念本身的模糊性。

首先,正如许多现代化理论家自己所指出的,现代性与传统从根本上说是一对不对称的概念。现代的理想已经提了出来,所有不是现代的因素都被称之为是传统的。正如拉斯托所说,现代性“是可以明确地加以定义的”,而“传统则仍是一个指除此之外的剩余物的概念。”<sup>①</sup>这种将“确定的”因素与剩余的因素混在一块的两分法对研究工作来说是很危险的。就事实而论,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两分法。这种两分法造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这种剩余概念也具有明确定义的概念的内在联系和精确性。但是,这种剩余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剩余概念所表示的不同现象之间的差别甚至要大于剩余概念所表示的现象与明确规定的概念所表示的现象之间的差别。许多两分法都有这个问题,比如“文职人员与军人”也有同样的问题,这一点对于人们理解一个社会中军人群体与多种多样的非军人群体的关系会有重要的影响,而这些非军人群体之间的差异甚至会超过非军人群体与军人群体之间的差异。<sup>②</sup>传统是高度异质性的,以致很难作为分析概念。人们所描述的传统社会的特征都是与所描述的现代社会的特征恰好相对的。非现代社会中的某些因素往往只能“适用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纯理型(ideal type)的传统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存在,而且是很不准确的。Pigmy 部落、德川时代的日本、中世纪的欧洲以及印度的村庄都是传统的。但除了这个符号之外,人们很难看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传统社会在价值观上是多样化的,在结构上是异质性的。<sup>③</sup>此外,传统的概念把传统看作基本上是不变的,这一点也受到人们的批评。他们

① 拉斯托《国家的世界》,第12页。

② 见亨廷顿《文职人员对军队的控制》,收在尤洛(H. Eulau)等人编《政治行为:理论与研究读本》,Glencoe, 1956,第380—385页;亨廷顿《文职人员与军人的关系》,收在《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纽约,1968,第二卷第487页。

③ 贝辛格《传统的印度》,第X—XVII页;希斯特曼《现代印度中的传统》,第242—243页。

认为,传统社会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认为传统与创新一定是互相冲突的观点是过去抽象也是缺乏根据的。<sup>①</sup>

现代性的概念也有一定的模糊性。这些现代性都是从那些具有某种优点的现代性中抽象出来的。所有好的东西都是现代的,这样,现代性因素就成为互相之间并不协调的优点的混合物。特别是,这个概念无法区分什么是现代的,什么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并没有提出一种关于西方社会——即20世纪后期的西欧和北美社会——的模式,从而可以将这个模式与现代社会的模式加以比较,而这种关于西方社会的模式可能是与现代社会的模式有所不同的。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两种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现代社会不过是西方社会的另一种抽象的称谓。但对非现代社会或非西方社会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过程则是实际上非常不同的。这个问题一直被掩盖着,因为除掉现代与非现代、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外,到目前为止,还不存在现代的非西方社会。但可以认为,日本已经或正在成为这种类型的社会中的一员,这样日本学者理所当然地会带头从正面提出现代性有多少是西方的,西方社会中又有多少因素是现代的问题。<sup>②</sup>如果有两个现代社会,其中的一个是非西方社会,另有两个西方社会,其中一个是非现代社会,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哪些社会会更为相似(也应注意到的是,如同非现代一样,非西方也是一种剩余概念:两个非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大于一个非西方社会与一个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

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的现代化理论实际上意味着这两者是一种总和为零的关系;在一个社会中,现代性的生长会伴随着传统的衰败。但在很多情况下,现代

<sup>①</sup> 高斯菲尔德《误置的两极》,第352页。

<sup>②</sup> 见《东方的现代化与西方化》,第二卷(1963)第871—874页;希斯特曼《现代印度中的传统》,第238页。

性因素是补充而不是取代传统。现代的习惯、信仰和制度只是加在了传统之上。如果认为传统与现代性是“互相排斥的”，那将是错误的。<sup>①</sup>现代社会并不单单是现代的；它既是现代的，也是传统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态度和行为模式是融合在一起的；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们可以和谐地共存，尽管有时也会存在不和谐。甚至有人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不仅共存是可能的，而且现代化还可以强化传统。现代化可以赋予原来的某些文化因素以新的生命力，宗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正如希斯特曼所说的：“现代发展常常会强化传统，赋予其新的内容。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诸如收音机和电影等现代大众传播手段使传统文化的扩展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如梵语咒语或古典印度音乐的广播，有关神话或某种神圣事物的电影）。部落和其他先赋性的“传统”实体可能会以一种在“传统”社会中未曾有过的方式兴盛起来。相反，传统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也可有助于现代化：扩大家庭可以成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企业单位；种姓可以成为有利于民主制度运作的群体。“传统的符号和领导形式可以成为支持现代化框架的价值基础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sup>②</sup>

所有这些模糊性都与现代性和传统的概念有关，但即便如此，这些概念所勾画的大略的轮廓与现代化概念的模糊性相比还是具有一定的作为比较概念的清晰性。一般地说，有关现代化的论著在描述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特征上要比刻画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程上要更为成功。他们关注较多的是从“此”到“彼”的变迁方向，而不是变迁的范围、时点、方式和速度。正因为如此，现代化理论更多地是属于“静态比较”理论而不是关于变迁的理论。<sup>③</sup>因此，他们提出的阶段是历史进化中的实际阶段，还是韦伯式的纯

① 本迪克斯《传统与现代性》，第326页；怀塔克《传统的政治学》，第3—15页。

② 高斯菲尔德《误置的两极》，第352页；希斯特曼《现代印度中的传统》，第243页；鲁道夫《印度种姓团体的政治角色》，《亚洲事务》第33卷（1960年3月），第5—22页。

③ 摩尔（W. Moore）《社会变迁与比较研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15卷（1963），第523页；彭西奥恩（J. Ponsioen）《社会变迁分析再思考》，海牙，第23—25页。

理型意义上的阶段,这种两分法型的发展理论并没有加以说明。如果是一种纯理型的阶段,这就是一种可用于分析任何历史时点上的社会的抽象模式。但如果是作为历史概念,传统这个范畴就越来越失去其意义,而现代这个范畴显得越来越重要。而且这个概念的双重特色也不可避免地会损害这种两分法概念。很明显,任何现实的社会都是将纯理型意义上的传统因素与纯理型意义上的现代因素结合起来的。这样一来,所有的社会都是处于转变的过程中的,都是混合型的。从静态的纯理型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析不会造成任何问题。人们可以使用传统与现代的模式以辨认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传统特征与现代特征,并将其联系起来。如果将其看作是一种变迁理论或历史理论,一个过渡时期的范畴将会把传统与现代阶段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传统社会(一种自然状态)只是遥远的过去时的一个假定性的开始点。而纯粹的现代社会也只有假定在遥远的未来任何传统的残余因素全部消失时才会出现。这样,传统主义与现代性就不再是历史过程中的特定阶段,而成为历史的始点与终点。但是,如果所有现实的社会都是处在过渡阶段,就需要一种可以解释在这种过渡性社会中发生的变迁的形式和过程的理论。这种理论恰恰是两分法的理论无法提供的。

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作为这种初始的、简单化的现代化理论的基础的假设都受到人们的怀疑。与那种将现代化看作是一种革命性的过程的观点相反,有人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并非如此之大。不仅现代社会中包含着许多传统因素,而且传统社会也具有许多像普遍主义、成就取向和科层制这样的人一般认为是现代性的因素。<sup>①</sup>当一个社会历经传统与社会这两个阶段的时候,在文化、心理和行为方面存在的连续性要大于其差异。同样,将现代化看作是一种复杂的过程的观点也受到挑战,有

---

<sup>①</sup> 本迪克斯《传统与现代性》,第313—314页;高斯菲尔德《误置的两极》,第352—353页。

人认为,现代化所涉及的只是某个基本方面的变迁,而其他方面的变迁只不过是这个基本方面变迁的结果。当然,马克思就是这种看法。

勒纳认为现代化具有系统性,与此相反,有人则认为,从历史上看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因素都是互相分离的,虽然这些因素有共同的起因,但其中的一种因素的进展并不一定就是与另一种因素的进展相联系的。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意味着现代性与传统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如果将这些概念看作是纯理型概念的话,“如果我们要在进行准确的描述时避免使用错误的纯理型概念,就必须谨慎地看待假设是相关的而实际上并不是相关的那些特质的集合。”此外,正如本迪克斯所认为的那样,应注意到现代化与现代性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许多现代化的属性,如很高的识字率和现代医药,与现代社会的其他属性并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某些生活领域中的现代化的发生并没有形成‘现代性’”。<sup>①</sup>更进一步说,这种看法也对将现代化看作是一种全球性过程的假设提出了挑战。现代化只是西方文化的一种特例;与发生在西方社会中的变迁相比,非洲和亚洲文化中发生的变迁具有不同的特点和结果。

早期关于现代化的时点和所经历的时间的假设也受到了批评。人们认为,后来者可以利用革命性的手段并通过向早现代化国家借鉴经验和技術迅速地实现现代化。这样,整个过程就会被缩短,那种认为这个过程中存在一种明显的各个社会都要经历的阶段的假设——如前提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等——也是成问题的。许多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同值化或趋同的过程,但也有人认为,现代化会强化每一个社会的不同特点,现代化会加大而不是缩小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与那种将现代化看作是不可逆过程的想法相反,有人认为,现代化是一种有起有伏的循环性过程,当

<sup>①</sup> 本迪克斯《传统与现代性》第315、329页;艾森斯塔德《传统、变迁与现代性》,第27—28页。

现代化的“向上”的世俗化趋势被持续“向下”的解体趋势或原始化(primitivization)取代时,这个过程的转折点就出现了。最后,与那种将现代化看作是一种进步性过程的观点相反,20世纪初期的思想家们认为,现代化毁坏了个人可以在其中充分实现自己的人格的关系密切的社区;实现大规模生产和大众社会的代价是牺牲人类个人的和精神的價值。这种反对变革的思想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是非常流行的。在50年代的时候,由于对现代化的狂热笼罩了精神和政治的氛围,在现代社会的理论家和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的政治家中,这种传统的、浪漫主义的反现代化情绪还不多见。但到60年代后期,在许多发展中社会的知识分子里开始出现来自这方面的对现代化的批评和反对情绪。

(孙立平 译)

迪恩·C·蒂普斯

## 现代化理论与社会比较研究的批判<sup>\*</sup>

具有当前这种含义的“现代化”概念起源不久,但到了60年代,它已经是一个在美国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际社会科学——的语汇中得到确认的词语。尽管它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但是对它的正确含义还远远没有相应地达成普遍一致的意见。关于现代化的各种不同定义的大批出现,实际上已经表明使用这个术语的那些人与使用另外各种定义的人相比,似乎更接近统一。现代化概念的普及决不是因为它作为学术交流的工具而具有的清晰性和准确性,而是因为它有能力揭示那些用来概括18世纪末和19世纪随着工业化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产生的社会生活各种转变的含糊和笼统的想象。诚然,这些想象已被证明有充分的说服力,以致无人否认“现代化”这个概念所表达的现象确实存在。至于应当如何准确地使这些现象概念化,人们见仁见智。有些批评者自己已经提到各种各样概念化的相对优点,但是无论是支持者还是批评者,实际上都往往认为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是有用的,只不过在概念化的方式上存在着问题。

下文试图对此作一番批判性的考察。卡普兰曾经说过:“科学概念的功能是指明一些范畴,这些范畴比其他范畴体系更能说明

---

选自 C. 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

我们的研究对象。”<sup>①</sup>于是,这里要提出一个问题:现代化概念是否能够发挥这一功能?当前对这个概念的各种说法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可能在这个概念的另一种理论体系中得到最好的解决?或者说,是否应当将现代化整个模糊的想法抛弃掉而用另一种研究方法来取代它?如果后一种可能性值得认真的考虑,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着确实可以“告诉我们更多东西”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概念来取代现代化概念呢?

我的目的是想论述前两个问题。以下的讨论将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为第二部分分析的前言,概括地叙述现代化理论的来源和特征。<sup>②</sup>核心论点将在第二部分中提出。为了全面地了解当前由于使用这个概念而产生的问题,在此对过去的各种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作出回顾,并在必要时予以补充和修正,而将修正后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来评价现代化观点的科学功用。

## 初步思考

### 现代化理论的由来

现代化理论的起源大致可以追溯到美国政治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环境的反应,特别是冷战的影响,以及在欧洲殖民帝国解体下第三世界社会的同时出现,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成为杰出的角色,所有这些现象在同一个时期聚合在一起——而且确实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知识界的兴趣和精力越过了美国甚至欧洲的界限,转向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社会进行大量的研究。战后的二十年间,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及其研究生在美国政府和私人团体的慷慨资助下,把越来

<sup>①</sup> 卡普兰:《探索行为》,旧金山,1964年,第52页。

<sup>②</sup> 本文通篇使用的“现代化理论”一词仅指以现代化概念为主要特征的主要文献。

越多的注意力转向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文化变革等问题。

绝大部分注意力致力于详细阐述各种概念系统,并且在许多方面用这些概念系统取代传统的方法来探索这些社会中发生的问题,这种探索在过去几乎是未曾有过的。<sup>①</sup>由于社会科学家在研究中的设计、实施和解释不能再依靠过去积累的文献作为指导,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应当转而求助于西方思想界中他们所熟悉的那些知识传统,即对社会变化的性质所作思考,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公认的传统所产生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在现代化理论中。虽然现代化理论家使用的术语有些新奇,但他们对非西方社会中社会变化进行研究的方法却深深植根于早在19世纪末以前就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牢固确立的进步论。确实,罗伯特·尼斯贝特近来(1969年)论证说,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一种观念,即社会变化可以类比于有机体的生物性成长。这种传统产生于苏格拉底以前的学派,经过18世纪和19世纪的进步论和当代社会科学的社会进化论,从而在西方有关社会变化的思考中占有优势。<sup>②</sup>

在这种思想传统中,进化论和20世纪的功能主义在形成现代化理论过程中特别有影响。它们产生的影响可以现代化理论的许多特征为证,例如:经常使用两极对立类型的结构和概念,诸如“社会差异”和“社会体制”等;强调对渐变和连续变化的适应能力,作为稳定的正常状态;把因果关系作为变化的内在根源以及把社会变化当作一个有方向的过程来分析。应当指出,现代化理论的这些特性与较早各种理论并非简单地呈明显的平行状态,许多现代

---

① 西尔斯:“论新兴国家的比较研究”,见吉尔兹的文章,载《旧社会和新兴国家》,纽约,1963年,第11—12页;施沃茨:“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看‘传统性—现代性’解释范畴的局限性”,载《戴达罗斯》,第102卷(1972年),第74页起;尼斯贝特:《社会变化和历史的西方发展理论》,纽约,1969年,第240页起。

② 参见波克:“进步论和进化论”,载卡恩曼和波斯科夫编:《社会学和历史学》,纽约,1964年。

化理论的主要贡献出于勒纳、列维和埃森斯塔德等属于功能主义学派的人,他们学会了功能主义理论而且是在产生这种理论的知识环境中培养出来的。<sup>①</sup>

### 现代化理论的特征

要从上面罗列的非常一般特性之外去鉴别现代化理论的“特征”,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现代化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包括广泛的兴趣、不同程度的抽象以及对定义问题的不同程度的注意。由于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一个个地批判这种或那种现代化理论的说法,而是把现代化理论本身当作一种理论的发展方向或“思想体系”来评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必须是建立某种使批判得以进行的共同基础。

也许人们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方法论上的两个相似之处。第一个是现代化理论家对定义内涵的探索。用某一作者的话来说,现代化一般是被看作“一个多方面的过程,包括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中的变化”。<sup>②</sup>因此,这个概念是个“概括”的而不是“差别”的概念,也就是使用足够全面的方法去明确说明它的意义,不致使这个“多方面的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可能的部分被遗漏。对现代化下定义的尝试旨在告诉我们现代化是(或者可能是)什么,而不是告诉我们现代化不是什么。<sup>③</sup>

---

① 马兹鲁伊在“从社会进化论到当前的现代化理论”,载《世界政治》,第21卷(1968年),第69—83页。他讨论了现代化理论和进化论的平行发展。他往往强调达尔文主义对社会进化论的影响(见波克:“进步论和进化论”,第35—37页;尼斯贝特:《社会变化和历史》,第161—164页)。关于功能主义理论对当前比较研究的影响,强调现代化的政治方面,见柯林斯:“政治社会学的比较方法”,载本迪克斯等编:《国家与社会》,波士顿,1968年,第42—67页。

②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52页。

③ 参阅艾普特:《现代化政治学》,芝加哥,1965年,第67页;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纽约,1966年,第7页;斯梅尔塞编:《社会学》,纽约,1967年,第717—718页;霍尔:“日本的现代化观念的变化”,载詹森编:《日本对现代化态度的变化》,普林斯顿,1965年。列维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在《现代化和社会结构》一书中仔细地把定义和描述这两种工作区分开来。

方法论上的第二个相似之处是分析的单位。虽然现代化的研究集中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从个人、当地社区到国家和国际等单位,但是,占有某个疆域的民族国家才在理论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这一点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正是在民族这个层次上,现代化过程的各个方面才被看作是集合在一起的。然而,它可能被概念化,无论是工业化、经济增长、合理化、结构差异化、政治发展、社会动员以及(或)世俗化,还有其他一些过程,都是如此。现代化过程中的每个组成部分都被看作是在民族这一层次上起作用的变化根源,虽然对这些组成部分的研究显然也可以在其他的各种层次上进行。因克勒斯对“现代性”的交叉文化中个性的种种表现所进行的研究侧重于个人对现代化的反应,即使如此,这些反应的聚集和比较也是在民族这个层次上进行的。<sup>①</sup>因此,现代化在理论方面基本上是属于民族国家转变的理论(民族国家的疆域含蓄地被视作为与整个社会的疆域是相同的)。

当然,现代化的各种方式的概念化中显然还有其他一些相似之处。但正如本文一开始的导论所提出的怀疑意见一样,最能取得一致看法的方面往往是最表面的那几点。因此,有一种普遍的一致看法,无论现代化还可能用来指其他什么,它归根到底是某种类型的社会变化,这种社会变化在影响上是改革性的,但在效果上则是进步的。还有一个普遍承认的观点认为,就现代化范围之大而论,它是个“多方面的过程”,不仅涉及到社会在某个时间的每一个制度的变化,而且从方式上来看,每个制度内部的转变往往导致另一些制度内部与它有一定关系的转变。<sup>②</sup>

除此之外,要将各种研究方法的异同分门别类,恐怕更加困难。例如,这个术语的多种用法就很难归纳在同一个单一的分类

---

① 因克勒斯:“现代人的形成:六个发展中国家里个人变化的原因和结果”,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75卷(1969年),第208—255页。

② 见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他对现代化的特征作了系统的论述。

框架中。在某种情况下,这个概念原本就是一种分类方法,例如列维按照使用的工具和非生命能源的程度区分“相对现代的社会”和“相对非现代的社会”。<sup>①</sup>对其他学者来说,这个概念乃是鉴别一种特殊的和无止境的社会变化,例如历史学家本杰明·施沃茨应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按照人类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合理控制能力的增强来解释现代化。<sup>②</sup>还有一种对现代化定义的倾向不是把现代化看作变化的一种类型,而是对变化的一种反应,例如阿尔朋所下的定义强调制度对迅速和连续变化的适应或控制能力。<sup>③</sup>然而以上这些用法的不同往往是很微妙的,尤其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倾向往往可以结合在同一个定义之中。例如,艾森斯塔德主张现代化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个是变化的类型(结构的分化),另一个是对变化反应的类型(即制度吸收“不断变化的问题和要求”的能力)。<sup>④</sup>定义方面的这种多样性在人们经常探索更准确的概念时大都可以找到。因此,有些人把现代化同工业化或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而另一些人对它下的定义更广,强调人类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增长的控制能力,还有一些人后来居上,提到了人类存在的一切方面所发生的整个转变,从个人的性格到国际关系。

然而,“现代化”一词的各种用法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区别,这个区别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为下文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奠定了基础。现代化的大多数概念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关键因素”论,意思是把现代化等同于社会变化的一种类型;另一类是“两极对立”理论,这种理论把现代化解释成为这样一种方

---

① 列维:《现代化和社会结构》。

② 施沃茨:“‘传统性—现代化’解释范畴的局限性”,第76页;又见霍尔:“日本对现代化态度的变化”,第21页;拉斯托:《世界大同:政治现代化问题》,华盛顿,1967年。

③ 阿尔朋:“民族和国际社会中的现代化革命”,载弗里德里希编:《革命》,纽约,1966年。

④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的抵制和变化》,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6年,第43页。

式,它概括一个过程,“传统”社会由此获得了“现代性”的属性。前面引用的施沃茨和列维的研究方法代表了“关键因素”论的两个实例。对施沃茨来说“现代化”可以视为合理化的过程,而列维则用衡量工业化的两个技术指标来解释现代化。事实上,在他那部论述现代化的新著问世十年以前,列维已经在一篇文章中使用过同样的定义去解释“工业化”一词,而不是为现代化下定义。另一个用“关键因素”方法来为现代化作出概念的例子是威尔伯特·穆尔的著作。<sup>①</sup>他比列维先生更加坦率一些,认为现代化在绝大多数方面可以等同于工业化,然后以后者的前提、伴随状态、组成部分和后果来讨论前者。这些例子说明,“关键因素”论的重要特点就是可以任意地用其他术语来替代“现代化”。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用“关键因素”来解释现代化的方法没有被现代化理论家广泛采纳。

大多数现代化理论家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宁可将自己的定义纳入“两极对立”所提供的比较广泛的概念框架中。在这方面,19世纪进化论的影响最为明显。现代化理论家把传统性和现代性属性之间的理想类型加以对照,这种方法只不过是人类学的翻版并借助帕森斯的模式来作概念。梅因、特尼斯、涂尔干等在进化论传统方面曾经作出过努力,用地位—契约、共同体—社会等对立类型之间的转变来概括社会的转变。<sup>②</sup>现代化于是成为一种转变或一系列的转变,从初级的自然经济向技术密集的工业化经济转变,从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向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转变,从封闭的选亲体制向开放的选贤体制转变,从扩展型的亲缘单位向核心型的亲缘单位转变,从宗教的意识形态向世俗的意识形态转变。<sup>③</sup>按照这种观

① 穆尔:《社会变化》,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3年,第89—112页。

② 尼斯贝特:《社会变化和历史》,第190—192页。

③ 参阅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第43—75页;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9—26页;艾森斯塔德:《现代化的抵制和变化》,第1—19页;斯梅尔塞:《社会变化过程》,第718页;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32—35页。

念,现代化决不仅仅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应当用它所趋向的目标来下定义的过程。

### 现代化理论之批判

正如本文导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化研究的每一种方法都难免受到人们的批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批判不仅不多,而且范围非常狭窄,异常分散,甚至往往被置之不理。不过,若是把这些批判集中起来便可以构成一个有益的起点。只要把这些批判加以概括,并且在必要时予以补充,便可以为更全面和更彻底的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提供基本的方向。

本节的任务有两个方面:第一,系统整理现代化理论容易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批判;第二,评价这些批判对现代化理论的前景有什么关系。按照现代化理论批判的正确程度,在两个可供选择的做法之间必须选择其中一个做法。一方面,现代化理论可以进行修正。这就需要形成现代化理论的另一种说法,虽然这种说法有希望更能够应付由较早一些说法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反驳。另一方面,现代化观念可以完全抛弃。第二种主张是“激进”的,意味着需要形成另一种研究方法,更适合于分析现代化理论所要注意的那类问题。过去的各种批判在方向上完全是“持修正论的”,而这里的批判,目的在于从这两种可供选择的观点出发对现代化理论的前景加以考虑。

#### 关键因素法

将概括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法和“两极对立”法进行对照的方法招致一些不同的批判。这里之所以首先研究“关键因素”法,不仅是因为这种方法不大被采用,而且还因为可以用比较简单和直接的方法对它进行批判。相反,“两极对立”法则需要作比较详细的涉及面更广的讨论,不仅因为它提出的问题更加复杂,同时也因为它

代表了现代化理论思想中的“主流”。

“关键因素”法虽然不常使用,但并非没有优点。它把现代化概念化作为无止境的过程而不是作为达到目标的过程,并且用比较仔细和具体的方法解释现代化,使这个概念在运用时有较高的明确性,因而避免了“两极对立”法所遇到的许多困难。然而,遗憾的是,“关键因素”法有自己的缺陷。在对一个已经用其自己的独特词语识别的因素下定义时,“现代化”一词的功能不是用作一种理论的词语,而只是用作一个同义词。例如,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或等同于与工业化有关的指标,而对工业化这个概念的用处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反而使“现代化”这个概念成为多余。这种玩弄术语的做法产生的唯一后果是在一个本来比较明确的概念上加上了一个常用语(“现代化”),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精确性。当然,一旦解释清楚,研究工作可以在这样设想的“现代化”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也可能会有很大的好处。但是,这种规定必须说清现代化一词的全部含义,否则便是多余的了,而且只会失去优点。总之,把“现代化”当作已经有明确定义的某种变量因素的同义语来使用,不可能发挥有效的作用,最后当然应被抛弃。因此,相对于“关键因素”理论而言,对于现代化理论的前景的研究,必须采取第二种“激进”的方法。

### 两分法

现代化的概念化,加上传统性和现代性对比的一些说法,是不能不予考虑的。为了充分说明针对这类理论所作的批判中的含义,最好是将这类批判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第二个层次是从经验主义出发的,第三个层次是方法论或“纯理论”方面的。

#### 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

人们在对按两分法传统构成的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中,最常见的一种反对意见,是认为这些理论本质上是种族中心论世界观的

产物。现代化理论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采用了两分法,如同19世纪末这种理论被社会进化论者所发展一样,他们感到必须作某种改变。甚嚣尘上的种族中心论的一些用语,如“文明的”和“野蛮状态”等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而生物进化论者明目张胆鼓吹的种族主义也可休矣。但是,这种改变在许多方面仅仅是装点门面而已。虽然语言改变了,种族论也被抛弃了,但现代化理论家仍然受到马兹鲁伊所说的“对种族中心论的成就所抱有的自信心”的鼓舞。<sup>①</sup>因此,当代现代化理论的术语虽然已经作了一些清理,使它给人一种较为中性的印象——它只谈“现代性”而不谈“文明”,只说“传统性”而不说“野蛮状态”——但是,这种理论像它19世纪的祖宗那样,继续用西方社会的、特别是英美社会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为中心的观点来评价各民族的进步。<sup>②</sup>现代化理论在很多方面作为依据的假设,用某个作者的话来说,“‘现代’是指不负有依附西方责任的西方”。<sup>③</sup>它首先从西方社会的一般形象中获得“现代化”的属性,然后又把这些属性的获得设想为现代化的标准。现代化理论家试图把对非西方社会的分析强行纳入本迪克斯所说的“欧洲经历的普罗克卢斯特床”。<sup>④</sup>

现代化理论家试图把历史上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特殊价值观念和制度普遍化。这种做法至少可以理解为一种方法。50年代和60年

---

① 马兹鲁伊:“从社会进化论到当代的现代化理论”,载《世界政治》,第21卷(1968年),第82页。

② 尼斯贝特写道:“我们在19世纪社会进化论者的著作以及当代相当多的著作中可以发现,比较方法一般地说不过是进步发展观念的支柱。更具体地说,它不过是下述信念的支柱,即西方的近代史可以作为证明整个人类的必然趋向,并且是从这里出发的必然趋向”(尼斯贝特:《社会变化和历史》,第190—191页;参见第201—208、284—287页)。

③ 西尔斯:《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海牙,1965年,第10页。

④ 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9卷(1967年),第323、309—312、316页;鲁道夫夫妇:《传统性中的现代性:印度的政治发展》,芝加哥,1967年,第6—8页。

代刚刚从大学毕业的“不发达地区”的学者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理解一些社会发生大事的过程,而对他们来说,那些社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组织显然是陌生和不熟悉的。这时,他们可以依靠这种方法去解决认识过程中的危机。两极对立法逐渐演变成传统性—现代性对比的形式后,完全可以令人羡慕地适用于填补这种知识上的空白。<sup>①</sup>它为现代化理论家提供了一种认识图式,其中包括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公民直接从经验中获得的熟悉而稳定的一些范畴。按照这个图式,取自“相对非现代化”社会的资料可以汇集起来进行分类,并作出解释。此外,这个图式不仅为排列这些社会现状的次序提供了一系列范畴,而且把现代化描述为朝着“现代”方向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过程,从而也可以窥见自己的未来。这样的观点由于确认这些社会将沿着西方自己熟悉的道路走向现代性,因而使它得到更大的安慰。

不过,这种观点不仅是由于现代化理论家在探索新的研究对象时认识方向不明确所致,也是因为他们意识形态方面的主旨和臆想所致。两分法的传统在19世纪欧洲工业化初期形成的时候,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对工业主义的矛盾心理在充满传统色彩的“失乐园”的怀旧中反映出来,导致对社会的浪漫主义幻想。也就是说,人们在这个社会中虽然在物质上是贫穷的而且缺乏教育,却过着与自然和谐的朴素而满足的生活。他们被强烈的感情纽带与一个集中和凝聚的共同存在联系在一起。<sup>②</sup>

这种传统观点一直有影响,这可从它长期持续的倾向来说明,这种倾向是把现代化对个人造成的所谓伤害性影响——即将个人

---

① 两极对立传统的早期理论也有同样的功能。见波克：“进步论和进化论”，第28—29页。在这一点上，有趣的是要指出，现代化理论在人类学家当中似乎最不受欢迎。人类学对非西方社会进行大量研究的时间较任何社会科学更久。现代化理论家将他们的观点应用于研究自己的社会时广泛地遭到失败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② 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9卷，第294页。

从田园式的传统环境下驱赶出去——加以形象化。<sup>①</sup>但是总的说来,现代化理论家一直受到其他一些原因的激励。到19世纪中叶,那种在许多方面习惯于早期的“传统性—现代性对比”形式而对工业主义产生的矛盾心理已经消失。因此,当代的对比形式所受到的传统怀旧观念的影响比较少。影响较大的倒是现代化理论家自信的乐观主义,在他们看来,“现代性”是善与进步的结合,“传统性”则是实现“现代性”的障碍。用这样的倾向来描述现代性的特征,与过去描述传统性特征的方式相比,其选择性和浪漫主义色彩相差无几。<sup>②</sup>试看下述一段雄辩的叙述:

“现代性”意为:地方纽带和地区性的观点让位于全球观念和普世态度;功利、计算和科学的真理压倒了感情、神圣和非理性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单位不是集体而是个人;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相互联系不是依据出身而是靠选择;他们以主宰者的态度而不是用听天由命的态度去对待物质环境和人类环境;认同是被选择和被获得的,不是被硬性确定和被认定的;工作在行政组织中进行,而不在家庭、住所或社区中进行;成年期被推迟,年轻人准备承担他们的任务和责任;人类的寿命延长,但是即使如此,他们将把很多权力交给年轻人,男人把他们的权力交一些给妇人;人类不再作为种族分开而在社会和政治中认识到共同的人性;政府再也不是超人的权力象征,不让普通人进入,而是以参与、允诺和对公众负责作为它的基础。<sup>③</sup>

---

① 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证明,见因克勒斯:“现代人的形成”,第223—224页;劳埃:“谬误的科学化和合理化:社会变化理论的中立化”,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36卷(1971年),第882—885页。

② 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第884—886页。

③ 鲁道夫夫妇:《现代性中的传统性》,第3—4页。

这一段叙述把理性主义、进步论和自由主义的倾向结合起来了,看上去更像是自由的空想而不是分析的构思。再也看不到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等人的著作中所描述的现代化社会中的那种矛盾心理。<sup>①</sup>

现代化理论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和认识充分反映了产生这种理论的社会和历史条件。现代化的观念主要是美国的观念,是由美国社会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内提出并在60年代中期进入鼎盛时期的。这个时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是广泛地对美国社会抱着自满的态度,第二是美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势力在全世界扩张。人们对美国社会往往抱有基本一致的看法,把它与民主主义框架中无可比拟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结合起来。此外,那些可能存在的社会问题不是被看作流行的弊病,而是当作脱离常轨的暂时现象,可以在现有的制度下用正常的政治手段来解决。在二十年混乱后,战后繁荣和稳定的宁静状态看来并未告终。现代社会的前景现在看来已经获得了保证,似乎只有“发展中地区”的未来才存在着问题。这种自满自得的气氛只可能促使社会科学家想当然地认为“现代性”纯粹是好事,至少在他们的理想中认为美国社会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应当成为另外一些比较不幸的社会模仿的榜样。

不过,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态度本身只是在对美国在国际领域中发挥作用给予了新的关注时才产生出来。当西欧帝国的各个社会面临着国内的重建任务而在国外面临着非殖民地化时,美国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工业和军事力量的高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而这次战争在世界政治中有一种特殊的观念,认为它是善与恶的斗争。如果希特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恶的化

---

<sup>①</sup> 尼斯贝特:《社会学中的传统》,纽约,1966年,第264—312页;休斯:《意识和社  
会:欧洲社会思想的转变》,纽约,1958年;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载《比较政治学》,  
第290—293页;参见尼斯贝特:《社会变化和历史》,第202页起。

身,那么,斯大林就是战后恶的化身。美国在这种信念的刺激下,在欧洲盟国的鼓励下,在国外经济利益的扩张中,僭取了“自由势力”中的领导地位,不仅卷入了国际事务,而且卷入了许多国家的内政,力图从共产主义阴谋的威胁下拯救世界,保证世界稳定,而有利于它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事业。<sup>①</sup>

面临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的崛起,非殖民地化开始向前迈进。第三世界的社会如何默许这些利益集团,越来越成为问题。结果,在美国政府内外的上层政治人物考虑冷战冲突时,这些社会开始占有重要地位。社会科学家对第三世界社会研究的迅速发展在许多方面就是这种新的关注的副产品,因为政府机构和私人基金会鼓励和资助这类研究,以便在美国,特别是在政界扩大有关这些社会的情报交流。

在这样的背景下,带有种族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论大量出现毫不奇怪,特别是只要回想一下,在美国和英国社会史上的早期扩张时期,类似的发展理论也十分普遍,就不足为奇了。<sup>②</sup>总之,这种理论由于隐藏着种族中心论,所以能够偷偷地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不相称的力量提供含糊的辩护。这些理论尽管还有其他

---

① 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一种富有趣味的讨论,见译文:“对美帝国主义的解释”,载《经济史杂志》,第32卷第1期(1972年),第316—360页。他确定,美国的扩张—干涉主义政策有三个来源:相对狭隘的但地理位置优越的私人经济利益集团,军事官僚制以及“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成功做法的延伸”(第358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国际上的扩张反映在军事开支在这个时期占有很高的比重。美国内战后的三十年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内,联邦政府的军事开支在国家预算中降到百分之三十以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十年内,它的军事开支平均占国家预算的一半以上,尽管用于福利事业的支出比早些时期也有上升。见利伯森:“对军事—工业联系的资料研究”,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76卷,第4期(1971年),第574页。

②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进化论最为盛行。而在19世纪末,美国政治界和学术界普遍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与美国的帝国主义情绪相吻合的。见伯罗:《进化与社会: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理论之研究》,伦敦,1966年;霍夫斯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波士顿,1955年。

各种作用,但首先是它们可以指出“现代化”的目标。<sup>①</sup>实际上,这种理论也可用来为欧洲殖民主义作辩护。许多现代化理论家适应时势并用这种理论来进行自由政治的宣传,尽管没有这样公开地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此外,事实也证明,现代化理论正中美国决策者的下怀。他们实际上把“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看作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不稳定和防止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办法。由于这种理论过分强调政治稳定,它必然会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回避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整个问题。有关现代化的各种文献中,没有任何内容会让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决策者们深感不安。

这种分析不应解释为一切现代化理论家必然是美国扩张主义的辩护士。事实上当然并非如此。然而,不管现代化理论家从多么良好的愿望出发,也不管他们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怎样的批评,这一理论在有限的文化范围内必然会使他卷入一种十分微妙的“文化帝国主义”形式中,这是一种价值观念方面的帝国主义,它把美国的或者更广泛地说把西方的文化强加于其他社会,其倾向是要迫使其他一切考虑(也许除了政治稳定性)服从于经济发展的技术需要。另一方面,某些现代化理论家在科学客观性的幌子下用他们的理论来为美国的民族利益服务,这个事实也是不能忽视的。因此,当某个现代化理论家指责人们对越南战争的批评是“无的放矢的说教”时(与美国政府的“难以保证的乐观主义”形成对比),他也能把这种理论用来解释这场战争,提出可以用强迫人口集中在城市地区的方法来回答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这种解决办法显然包含着他们自己的一些道德选择,而故意置事实于不顾。<sup>②</sup>

---

① 尼斯贝特:《社会变化和历史》第201—212页;鲁道夫夫妇:《现代性中的传统性》,第9—12页。

② 见亨廷顿:“适应的基础”,载《外交》季刊,第46卷,第4期(1968年)。又见亨廷顿:“致编辑部并与诺姆·乔姆斯基答辩”,载《纽约书评》,第14卷(1970年2月26日)。

我已经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现代化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过去往往只是简单地提到,甚至完全被忽视。现代化理论以及它所发挥的功能与产生这种理论的特殊背景之间的关系一旦被认识,就有可能把这个理论置于正确的观点和立场上。由于现代化理论目前还远远没有被普遍应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因此,现代化理论的实际情况只反映了某一社会(也就是说美国)在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确实,随着产生现代化理论的条件发生变化——例如,政治暗杀,种族冲突和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冲突以及对外战争和国内暴力行为等的步伐加速,和谐一致已经让位于冲突和自我安慰,对于美国的未来表示关注——许多与“现代性”有关的基本准则,例如理性的准则和进步的准则等,都受到了攻击,而令人感兴趣的是,现代化“理论”的新潮流似乎也已减退。

从意识形态方面对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对于理解现代化理论的性质很有必要,但是,这仅仅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功用进行批判性评价的开端。这种仅局限于对现代化理论中存在的意识形态成分所作的批判,本身还不能提供充分根据来决定现代化概念应该进一步考虑呢,还是应该完全抛弃。在原则上,没有理由认为现代化概念本身与各种形式的种族中心论天生是对立的,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革命的现代化理论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不可能产生。当代的现代化理论大多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但不能说没有产生其他形式的可能。即使有人认为现代化理论应当完全抛弃,因为不能完成它所提出的任务,但是无论用什么研究方法来取代它,也都不会不受制于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对现代化理论作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只就它诞生的动机、认识和目的而言,没有直接讨论这个理论的实际内容。从考察的绝大多数论述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政治偏见而选择出来并加以歪曲的认识是错误的,但是,只能具体地依靠可以利用的证据来证明其虚伪性、不完整性或把人们导入歧途。对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解释和指出它在实证方面的缺

陷,但不能证明这些缺陷。因此,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必须以其他方面的批判来予以补充。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讨论的第二个层次上的批判,即经验主义的批判。

#### 从经验主义出发进行的批判

虽然这个范畴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无所不包,但是归纳在这种范围内的各种批判有某些共同之处。每种批判都注意到现代化理论中资料的不足,它在形式上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引人误入歧途的经验主义陈述,这种陈述已纳入现代化理论的体系中,而有的则批判它忽视了一系列重要现象。由于针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主要是在这个层次上进行,从经验主义来进行批判的主要论点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这里有可能作比较扼要的概括。

同某些传统理论在发展中遇到的情况一样,现代化理论所受到的批判是因为这些理论将社会变化基本上看作是各种内在变化过程的结果。<sup>①</sup>从前面对现代化理论的起源和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分析来看,这种批判并不使人完全感到意外。现代化理论家基本上都集中于讨论有关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内在因素,所以低估或忽视了对社会变化来说十分重要的许多外部根源和影响。勒纳等现代化理论家强调了现代化过程中的“西方影响”,但往往只从某种文化属性的传播所产生的后果来看待这种“影响”,忽视了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机制。当这种观点用于研究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时,它的局限性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并促进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凡是没有把战争、征服、殖民统治、国际政治和军事关系或者国际贸易和国家之间资本流动的冲击等十分显著的因素考虑在内的理论体系,都没有能力解释这些社会现代化的起源,以及它们为政治和经济独立而进行斗争的性质——而

---

<sup>①</sup> 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324—327页;科林斯:《政治社会学比较方法》,第57—61页;尼斯贝特:《社会变化和历史》,第170—174、275—282页。

且在一切社会中都面临着这种斗争,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程度不同,背景也不同。

“传统社会”的概念提出了另一些难题。亨廷顿最近指出,现代性和传统性在本质上是对称的概念。现代的理想一提出,凡不属于现代的一切东西都被贴上了传统的标签。<sup>①</sup>因此,“传统性”概念的形成并不是以观察为依据,而是作为“现代性”假设的对立面。这个事实反映在概念的实证局限性上。例如,从习惯的观点来看,传统社会本质上是静止的。若从传统性—现代性对比的观点来看,历史又是开始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人们一般都认为非西方地区由于接触了欧洲社会而开始了这种转变,这等于暗中否定了这些地区在未接触西方前的经验与它们后来的发展有任何关系。但是,随着对这些地区与欧洲社会接触前的历史了解有所增加,便证明这种把传统社会描述为静止状态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传统社会”好像没有变化,仅仅是因为把它们限定在一种方式中。这种方式认为传统性之间没有区别,除了朝西方经历的方向变化外,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

由于传统性—现代性的对比只集中注意所谓传统社会之间的相似性,因而拒绝承认传统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多样性。于是,类型最不相同的社会结构也被统统纳入了同一个范畴,它们所共有的不过是“传统”的标签和一个事实,即它们不是现代的工业社会。由于这种两分法忽视了传统社会的多样性,也恰恰忽视了那些社会之间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却有助于决定它们发展的特殊性质。列维对中国和日本经济变化的不同道路的对比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sup>②</sup>此外,从传统社会内部和传统社会之间也可以找到这种多样

<sup>①</sup> 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第293—294页;又见拉斯托:《世界大同》,第11—13页。

<sup>②</sup> 列维:“中国和日本现代化因素比较”;又见罗思曼:“英国的现代性和传统性”,载《社会研究》,第28卷,第3期(1961年),第297—320页。

性。克利福德·吉尔兹在一篇关于“整合与革命”的文章中写道：“一个简单的、凝聚的、广义的种族结构，例如在大多数工业社会中发现的那种结构，并不是传统性的残余，而是现代性的标志。”<sup>①</sup>克利福德·吉尔兹也许夸大了工业社会之间的同质性，但他的基本论点仍是对的：许多传统社会并不是高度浑然一体的，也不是在社会和文化上性质相同的共同体，而是包含着多种“传统”。<sup>②</sup>把“传统的”和“现代的”这两个形容词加在同一个名词——“社会”——前面，同样会使人误解，因为它使“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单位向一个拥有领土的国家所保持的民族社会转变含糊不清。确实，传统内部的多样性往往与这一转变过程混在一起，因为有许多这样的“传统”单位融合成了一个单一的民族社会。<sup>③</sup>

新兴国家的殖民地经历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由于通过征服某个“传统”，把尽管是属于“现代”的东西添加在一个或其他好几个“传统”之上，从而产生了一个混合的社会，用现代化理论家惯用的术语来说，它既不是“传统的”，又不是“现代的”社会。把这些经历聚合成为对立的传统性—现代性，只会产生更大的困难。要么，把殖民主义看作现代化的工具——前面已经提到，这种论点往往为殖民统治的合法化辩护——要么，把它当作“传统性”向“现代性”过渡的阶段。这两种解决办法都不恰当。殖民主义像“传统性”一样，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推动“现代化”，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也可能构成现代化的障碍。殖民统治的影响决不能像“传统性”那样可以不予考虑，因为殖民统治影响的范围和时间往往同殖民化以前的范

① 吉尔兹的文章，载《旧社会和新兴国家》，纽约，第155页。

② 本杰明·施沃茨最近主张，在现代性和传统性的两分法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况，见施沃茨：“传统性对现代性作为解释范畴的局限性”。又见劳尔：“谬误的科学正统性”，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36卷，第5期，第884—886页。关于传统社会的补充叙述见古斯菲尔德：“传统性和现代性：社会变化研究中的错位”，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72卷，第4期（1967年），第351—362页；莱文：“传统文化的灵活性”，载《社会问题研究》，第24卷，第4期（1968年），第129—141页；希斯特曼：“现代印度的传统性”。

③ 参见吉尔兹的文章，载《旧社会和新兴国家》；库帕和史密斯编：《非洲的多元性》，伯克利，1969年。

围和时间同样重要,尤其是殖民统治经历了许多世代的地方,更是这样。<sup>①</sup>

还有一系列批判针对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传统性和现代性体现两个相互排斥而在功能上又相互依存的属性。这个观点可以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第一,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属性是相互排斥的;第二,它们各自的属性在功能上是相互依存的。有几种针对第一种说法的批判认为“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在所谓的现代工业社会中会长期存在,并在形成这些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性。而其他一些批判则主张,在“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中,现代化的动力并不是用一套属性取代另一套属性,即不是以“现代性”取代“传统性”,而是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sup>②</sup>主张现代性和传统性是相互排斥的观点,用鲁道夫夫妇这两位批判者的话来说,是强加一种“人为地构筑起来的‘分析差距’,用以否认创新、相互适应和综合的可能性,从而可以硬说有一种在范畴上和历史上可能存在的帝国主义”。<sup>③</sup>一旦这些可能性得到承认,现代化就不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传统的毁灭,因为后者并不是现代化的前提——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不是阻碍而是促进与现代化有关的社会变化——它本身也不是现代化的充分条件——因为“传统”的毁灭,例如被殖民主义统治所毁灭,可能导向“现代性”以外的方向。

这就使我们要谈到第二种说法,它涉及传统和现代性的“系

---

① 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323页;吉尔兹:《旧社会和新兴国家》。

② 关于这些观点的论据,见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316、324、326页;艾森斯塔德:“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思考”,第40—52页;古斯菲尔德:“传统性和现代性”;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第295—296页;劳埃:“谬误的科学化”,第885—886页;惠特克:“政治变化的紊乱过程”,载《世界政治》,第19卷(1967年);罗思曼:“英国的现代性和传统性”,载第28卷,第3期,1961年。

③ 鲁道夫夫妇,《现代性中的传统性》,第6—7页。

统”特征。一般地说,对第一种说法的批判往往也是对第二种说法的批判,因为一旦承认现代性和传统不是相互排斥的,那么,认为它们各自构成一种封闭的、在功能上相互依存的属性系统的见解也会遭到怀疑。具体地说,这种见解的三个含义现在已经受到攻击。第一,从西方社会的转变中观察到的功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将会在别的社会中重现。况且这种见解强烈地主张“趋同论”,即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各个社会在其主要特征上将越来越趋于相似。反对这种观念的人主张,由于它们的起点——即它们“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以及它们转变的时间不同,作为西方社会现代化特征的许多制度上的结构在其他社会后来现代化过程中不大可能重现,在技术水平上也没有必要重复先进社会技术发展的各个阶段,因为最新的技术可以立即供它们采用。而且,现代社会和非现代社会之间的差距以及现代性各种模式的被采取为它们创造了条件,只要把它们同各个社会的独特传统结合起来,西方制度模式在现代化过程中就不可能重现。在现代化的背景中无视这样的差别,便有危险对西方经验的特殊性作出不适当的概括,因而也忽略了寻找趋同中的多样性。<sup>①</sup>

现代化系统特征的主张中的后两种含义有密切联系。它们认为:(1)现代性的属性构成了一个整体,因此看来往往似乎是集合的而不是孤立的;(2)一个领域的现代化必然在其他领域中产生相应的(和谐的)变化。相反,反对这种主张的批判者则认为,现代性的属性不一定表现为一个“整体”。恰恰相反,它的属性可能是“拆开”的,可以有选择地被吸取。本迪克斯曾经说过,这种分散的“现代化”未必导致“现代性”。现代的医疗、晶体管收音机和现代军事

---

<sup>①</sup> 本迪克斯:“比较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和结论”、“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325—327页;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第298页;劳埃:“谬误的科学化”,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884—886页;A.杰申克隆:《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落后现象》,纽约,1962年,第3—51、353—364页;韦因伯格:“工业社会趋同问题的理论批判”,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11卷,第1期(1969年)。

设施都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化”的事例,它们每一种都表示获得现代性的某个迹象或一系列迹象。然而,这样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最终获得“整体”的现代性,仍是个问题。确实,现代医疗由于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可能只会增加贫困,晶体管收音机也可以被利用来加强传统的价值观念,而拥有尖端技术的军队可以为最反动的政权服务。因此,这种有选择的现代化可能会强化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一个领域中迅速的社会变化可能只会用来阻碍其他领域中的变化。<sup>①</sup>

现代化理论的各种批判聚集起来,列举出一系列给人深刻印象的论点和论据,揭示出现代化理论对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性质、动力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方面的观点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此外,这些局限性基本上用经验主义的依据来论证,证实了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批判所作结论的预言,亦即现代化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歪曲反映出它的经验研究的局限性上。因此,对现代化理论的经验主义批判提出的每一点在其历史概念方面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同现代化理论中最基本的种族中心论的某种表现相联系,它把历史视为向“西方”社会那种乌托邦式的现代性发展的、直线的、进步的变化过程。诚然,经验主义的批判强烈地提出,现代化理论用这种态度对待“传统”和“传统的”社会,不仅是种族中心论的,而且也是折衷主义的。

从这些大量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哪些问题将决定现代化理论的未来命运。应当以某种“修正”的形式在新的背景下和资料更加充分的体系中保留现代化的观念呢,还是应当采取一种“激进”的解决办法,将现代化理论全盘推翻?站在经验主义立场上向现代化理论提出异议的批判者在这些问题上莫衷一是,各有各的辩护者。不

---

<sup>①</sup> 前一个注释中提到的那些作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政治学家也越来越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即“现代化”与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是相背的,其中,亨廷顿“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落”,载《世界政治学》,第17卷(1965年),及其《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对这种观点作出了影响最大的辩护。

过,事实证明,第一种观点,即“修正”现代化理论的观点至今仍深得人心。本迪克斯、艾森斯塔德、亨廷顿以及其他一些批判者仍然认为——虽然有时是含蓄地认为——现代化理论以及它的传统性——现代性的对比方法中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因而经过适当修正以后,还可以使用。比较起来,在这些批判者中,只有惠特克明确地主张应当将现代化理论全部抛弃掉。

对于选择修正现代化理论的人们来说,问题仅在于消除现在一些理论中比较明显的错误。于是,他们主张对现代化研究采用一些方法来回避有关传统制度的性质及其对现代化过程的作用这样一些含糊不清的设想,这些设想把“外部刺激”当作重要的因素,把现代化主要看作是多线的发展,既强调现代化过程中的功能联系,又强调它的非连续性。<sup>①</sup>然而,惠特克对现代化理论的前景,却远远不抱乐观态度。在他看来,如果现代化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过程,也就是说,如果它不取代传统性便会失败,那么整个理论应被抛弃。他还主张,假若传统和现代性不属于相互排斥的范畴,那就是“取消这两个词的含义,也就是把类型截然不同的社会混为一谈”。<sup>②</sup>惠特克指出,由于“现在仍然缺乏一些比较成熟的模式”,目前看来在比较有限范围内的,以经验主义为根据的概括比试图构成另一些与现代化理论同样抽象的模式,更实用些。<sup>③</sup>

只要认真思考一下,无论是修正派的观点还是惠特克的观点都是不能接受的。修正派观点的主要困难在于它忽视了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它对现代化理论的用处没有认真地提出问题。在这方面,惠特克的观点比修正派的观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他的观点是否基本合理,也令人怀疑。本迪克斯、艾森斯塔德和其他一

① 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艾森斯塔德：“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思考”。

② 惠特克：“政治变化的紊乱过程”，载《世界政治》，第190—192页。

③ 然而应当指出，虽然有人认为应当将研究工作集中在确立一定范围内的经验主义普遍原理，但这种建议很难构成另一种前途颇有希望的理论来取代现代化理论。仅仅靠概括或积累微观研究的结果，还不能完全解释宏观社会结构的转变。此外，如果没有某种较大的比较准则，也无法“确立”有关各种社会之间转变的普遍原理。

些修正派已经阐明,仅仅证明被纳入现代化理论的某些具体设想或假定是不正确的或令人误解的,还不能否定现代化的概念。意识形态的和经验主义的批判所积累起来的力量,显然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惠特克的结论是正确的,至少不能证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方法的用途是有疑问的。然而,这些批判没有说明它的无用究竟是现代化理论本身固有的呢,还是因为它不能为它的分析找到适当的准则——这个结论会支持修正派的观点。只要对后一种可能性加以认真的考虑,那么现代化的定义、类型结构和“理论”便会像神话中的希德拉一样无限地增加,每一种现代化“理论”受到攻击并被摧毁以后都会增加出两种理论来取代它。

#### 纯理论的批判

最后一种批判是方法论的,或者因为它集中批判包含在现代化理论及其功用的概念中的基本策略,所以是“超理论”的。因此,它把重点放在修正派和其他基本观点之间进行选择而提出的中心问题上。这个层次的批判尽管很重要,但不如前两个层次上的批判所作的探讨彻底。

在任何概念或任何一系列概念的定义中,一直存在着比较性的逻辑要求和诠释性的逻辑要求之间的矛盾。前者力图引向越来越多的普遍性,以便将概念的应用性范围扩大到尽可能多的情况下,后者的方向则相反,力图越来越增加定义的独特性,以加强其辨别力量。前面已经提到,现代化理论家选择了前一种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然而他们竭力想在描述中达到包罗一切时,却依赖两种极为含糊的现代化概念。现代化理论家不是去说明这个词在适当应用时必须具备的最低条件,而是试图把它包含在实际上从17世纪以来的每一个“进步的”社会变化的概念中。此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对现代化所下定义是那么无边无际,以致这个定义几乎不可能准确地鉴定这个概念所要表达的一系列现象。

当人们考虑某种接近于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情况有无可能时,这些困难便非常明显。当现代化的概念被解释为制度要适应

“伴随着科学革命而产生的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的空前增长”时,<sup>①</sup>或者将它解释为“遍布于整个社会和文化的技术、经济及生态变化这一事实”时,<sup>②</sup>便很难说明它的应用范围,因而也无法认定现代化的解释究竟要阐明什么。此外,当现代化被看作是“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中的一种多方面进程”时,<sup>③</sup>这个定义的真正内容所能起的作用只不过使理论陈述变为毫无意义的赘述而已。<sup>④</sup>

此外,不无讽刺意义的是,现代化理论家不厌其烦地想描述得更加全面,但是这个理论提出的所有要求正好相反。这对真正的社会比较研究起不到一点推动和促进作用。其原因不难找到,而且本文的前一节已经提到了。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家着重考虑“传统的”和“现代的”属性区别时,却没有考虑这两个形容词所形容的名词,即“社会”。结果,这个名词所指的实际事物往往按照两极对立法出现了两个极端的变化。前已述及,在“现代的”一端,典型的情况是,民族社会是指拥有领土的国家边界内的社会。在“传统的”一端,这个范畴的残余性质反映在包括文明、文化地区、帝国、王国和部落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有关事物。由于比较分析首先要求将整体放在同一领域中或同一论域中进行比较,<sup>⑤</sup>那么,如果不说明确定“社会”一词的共同标准而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当作可比较的概念来使用,必将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这两个概念都在当前一些论著中使用,不仅这两种类型之间的比较实际上已经被取消,而

①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7页。

② 斯梅尔塞:《社会变化》,第717—718页。

③ 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第32页。

④ 列维在《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第10—11页)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这里还应当提出,修正派观点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使现代化理论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是概念的而不是理论的,因为用更有“争议的”、不确定的论点和假设去取代较早的那些更确定的但在实证方面更含糊的论点和假设。

⑤ 卡勒贝格:“比较的逻辑:政治体制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载《世界政治》,第19卷(1966年),第69—82页;亨佩尔:《科学解释的若干方面》,纽约,1965年,第137页。

且在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概念所使用的“社会”一词的范围本身就缺少一系列共同的实证事物,于是,每个类型内部的比较也被取消了。

然而,现代化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根本缺点并不是定义问题,也不是比较问题,而是把概念误以为事实的倾向;事实上前两个缺点在许多方面不过是后一个缺点的表现而已。这种倾向并非现代化理论所独有。尼斯贝特论证说,这是讨论变化的一切发展理论所共有的特征。<sup>①</sup>这个缺点也不能说是最近才被认识。早在七八十年以前,埃米尔·涂尔干就谴责过这种倾向。他指出,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沉湎于研究自己提出的观念和想象而无视它们与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之间的关系,那是多么容易的事啊。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以特有的笔调讨论了用概念研究代替社会现象研究的倾向:

人们生活在某个环境里不可能不形成对于这种环境的观念,并根据这种观念来规定自己的行为。但是,由于这些观念对我们比较接近,较多存在于我们的精神范围内,而离它所对应的现实却比较远,因此,我们往往自然而然地用它们来代替后者,并且把它们当作我们思考的真正对象。我们不去对事物进行观察、描述和比较,而是满足于集中精力去感知、分析和综合我们的观念。我们产生的不是有关现实的科学,只是一种对意识的分析。

……这些观念或概念,无论我们把它们称作什么,都没有资格取代实际事物。它们是日常经验的产物,它们的首要功能是使我们的行动与环境和谐起来;它们产生于经验,为经验服务。现在,一种表现可能成功地

---

<sup>①</sup> 尼斯贝特:《社会变化和历史》,第240页。

完成这种功能,但在理论上却是谬误的。自从哥白尼对有关天体运行的认识驱散了人们的错觉以来,已经过去好几个世纪了,然而,我们依然习惯于按照这些错觉来规定我们的时间。为了引发某种刺激的性质所需要的反应,并不需要有对性质作如实描述的观念……事实上,[这些观念]常常充满了危险的错误,而且是不适当的。人们通过某种方式详尽阐述的这类观念,永远不可能做到发现事物的规律。相反,它们像是隔在事物和我们之间的一块面纱,我们愈是以为已经认清了它们,它们愈是隐藏得更深。<sup>①</sup>

确实,涂尔干接着就谴责较早的发展理论中的这种错误倾向,这种理论就是奥古斯特·孔德的理论。涂尔干说,孔德的错误在于把“历史的发展与他对历史发展的观念等同起来”。他又说,这个观念“与外行人的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具体地说,按照涂尔干的说法,孔德的错误是他假定存在着一个不断进步的人类进化过程,然后才着手去调查这个进化过程的各个阶段,似乎这个过程已经是个确定的社会事实了。涂尔干虽然承认,要理解简单的、非线性的人类进化的表面现象如何产生,是容易做到的,但是他坚持,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只有依赖已经完善的科学才可能确信这个假设的过程的存在,因此,它不能构成探索的直接对象,而只是思想中的一个概念,却不是事物”。<sup>②</sup>

人们并不需要完全赞同涂尔干的认识论观点,以便评价他在这里所说的话及其对现代化理论所作的批判。毕竟,他的论点是相当基本的。社会科学家研究工作的要素是提出和探索有关具体社会现象中某个方面的问题。如果无视产生他的概念和观念的实际

<sup>①</sup> 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规则》,纽约,1938年,第14—15页。

<sup>②</sup> 同上,第19—20页。

经验的有关事物,如果不再关注他的陈述中的真实内容,社会科学家就不成其为社会科学家了。最终,他的社会观念和想象将同外行人的社会观念和想象无异。当然,这不是说社会科学家已经无事可做了。韦伯曾经指出,社会科学葆有“永恒的青春”,社会科学的历史“是而且依然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试图通过概念的构成去分析性地理顺现实的头绪,通过科学视野的扩大和转移而使这样构成的分析式的概念结构解体,并依据如此转变的基础重新构成概念”。<sup>①</sup>韦伯强调指出,这个辩证过程的必要条件是这种分析式的概念结构与来自经验的事实经常发生互动。因此,虽然涂尔干和韦伯以不同的观点来写作,但他们看来都对社会科学家内在的危险特别敏感,因为他们把自己概念中的来自经验的有关事物看作是已知的因而是不成问题的。

不幸的是,我们不能证明现代化理论家有同样的敏感性。涂尔干的批判虽然是针对着孔德的,但也是针对现代化理论的同样有力的批判。现代化理论家普遍地认为,现代化这个概念“尽管有其含糊性,却是有用的,因为它会引起当代读者的共鸣”。<sup>②</sup>但是,只要对这种“共鸣”的经验主义内容批判地进行一次研究,便立即会明白,现代化概念就是涂尔干所说的那些“日常经验产物”之一。就现代化来说,提供这个概念的基础以及它所引起“共鸣”的“日常经验”可以从人类在近几个世纪里所经历的深刻变化中找到,其中包括民族国家的兴起、群众参政的开始、工业化、城市化、官僚政治化、人类知识的迅速扩展以及文化的日益世俗化。这许多转变不均匀地在各个社会中分布着。现代化理论家试图用可以概括和排列的这些转变的某个单独的有关事物或一系列有关事物来解释现代化。因此它就被解释为某种有形的属性(即理性化或结构差异化),人们认为这些属性是这些转变的共同标准,或者认为是某种属性

<sup>①</sup>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纽约,1949年,第104页起。

<sup>②</sup> 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292页。

或一系列属性(即与传统性—现代性的对比中有关的属性)的获得,就可以把经历过这些转变的社会与尚未经历过这些转变的社会区别开来,或者认为这些转变中的某个方面(例如工业化)与其他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因果关系。

然而,认识那些确实经历过一些深刻转变的社会是一回事,而靠某个科学概念来综合所有这些转变则是另一回事。前者的模糊想象必然会产生后者的同样模糊的定义。不过,这还不是唯一的难题。确实,随着现代化概念的更为精确,问题似乎也更多了。最精确的(而且也是最罕见的)构思是那些集中在某个重要因素上的构思。然而,正如在针对这种方法的批判所指出的,当使用某个单一的因素诸如理性化或工业化等来概括现代化时,它的作用不过是作为已经被解释清楚的其他一些概念的同义词而已,因此不仅是多余的,也是混乱模糊的。另一方面,比较常见的做法是把现代化当作集合名词来解释,它涉及多重的属性和过程,但这种方法也无济于事。经验主义的批判对这种方法的破坏性特别强,其中最具有破坏性的或许是那些对现代化的“系统性”特征提出异议的人。他们证明许多与现代化有关的变化过程可能会孤立地发生,与其他过程无关,这些变化过程中的某些过程与其他过程是不相容的,而且由于现代化开始的时间和起点不同,在某种背景下与现代化有关的制度变化过程并不需要在其他背景下重复。按照这种看法,如果说现代化可以设想为各种因素的集合,那么它确实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集合,因为即使在缺少某些因素的情况下,现代化也可能会发生,显然不会因为某些因素取代了另一些因素而受到影响。

因此,由于定义含糊,现代化的概念不仅缺乏准确的界线,而且对有关它的来自经验的有关事物的性质所作的设想,经过考查,有许多也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令人误解的。现代化理论家试图将本应加以区别的、互不相关的社会变化过程集合在同一个概念之内,结果并没有什么帮助,只会妨碍对经验事实的分

析。本来,用两分法中的与两个极端有关的两三个范畴来研究“社会”的普遍进化过程的具体化形象是最有用的,但实际上也只不过为理解几个世纪的社会转变中人类经验的多样性提供了一种不适当的工具。<sup>①</sup>

总之,与这个概念有关的最重要的事物是标准化的,而不是经验性的。现代化的概念被剥去了科学的伪装,就变成了仅仅能够区分“进步”的社会变化过程和“不进步”的社会变化过程的分类方法而已。它的作用只是用深刻变化的含糊而肤浅的想象——同时也是充满了种族中心论和过去的进化论遗留下来的传统智慧的想象——去取代对这些模糊看到的转变所作的经验主义分析。意识形态方法的批判已经证明,这个概念的功能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和认识上的,也就是涂尔干所说的“把我们的行动和环境和谐起来的”概念。涂尔干还说,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有用的概念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但由于它以一个科学概念面目出现,因而也是更危险的。哎呀!现代化概念完全属于这种情况。

现代化理论的概念化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它的作用显然不能促进我们对人类社会经历过的许多转变作出理解。<sup>②</sup>它鼓励人们专心致志于描述和分类的问题,却忽视或含混了根本性的问题。凡是现代化理论中没有错误或者没有被人误解的地方,往往也是最无关紧要的地方。它几乎没有促进经验主义的研究,对实际社会设想的“现代化”作出解释,更没有推动系统的比较研究。相

---

① 只要一刹那的思考就能揭示这种阐述的原始性质。如果当代化学家不得不在研究中使用古希腊人的四元素法则,他当然不会满意。然而,许多社会科学家却完全满足于使用仅有它一半的范畴去解释三个多世纪的社会变化。这似乎意味着社会世界不如物质世界复杂,更能够容忍教条的概念。但是哪个社会科学家会承认这样一个假设呢?换一种说法也许更适合些,那就是现代化理论与有关人类社会转变的未来研究之间的关系,大致相当于希腊人的元素分类法与当代化学元素周期表之间的关系。

②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没有可能在现代化的全部论著中零散地找到一些有用观点,而是说,这种论著不仅只是偶然涉及现代化观点,而不是依靠它,由于现代化理论不适当,这些论著变得更加含混和不完善了。

反,它在“理论”和探索之间、现代化理论家与从事“地区研究”的实际工作者之间永久留下一道鸿沟。对现代化的概括所作的努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它的内容上均存在很大的缺陷。在现代经济增长已经达到的程度与可能达到的程度之间差距有所扩大,于是这一过程将会变得更加激烈。经济学家可以论证经济增长的某些方面必须出现,因为它们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例如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等等),即使它们的参数必定会变,然而许多特征将取决于社会和政治创新的结果,所以仅仅从过去作出推论是极端危险的。

## 结 论

这里的讨论目的在于概括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并且提出一些对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所设想的某些含义。这样的研究从我们这门学科诞生起就一直在进行着,亚当·斯密那本奠基著作《国富论》的书名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那本书也很可以称为《国民经济增长》。不过,经济增长的计量基础和对这种研究的兴趣在最近三四十年里扩大了很多,过去的经济史和经济分析所积累的研究成果与更加丰富的数据可以结合起来,推动有关经济增长过程的经验研究。以上的概括吸收了许多国家大量而范围甚广的研究成果,这些国家大部分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尽管我的某些解释可能是属于个人的,但这里的讨论反映了广泛的集体努力。

现代经济增长最突出的特征是高速度的总体增长及其破坏性的影响和新产生的“问题”相结合。高速度的持续增长是因为以知识储备的增加为基础的技术革新被大量应用和这种知识储备进一步增加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则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高速度变化所产生的那些影响。新产生的问题是革新的传播所带来的意外和无法预见的结果(革新一词是指新的和未知的东西)。此外还有经济增长向欠发达国家缓慢传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所有的欠发达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它们是分散的,相对地

孤立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发源地区。因此,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现代经济增长取得的显著的积极成就往往伴随着意外的消极后果,而欠发达国家则正在努力地奋斗,力图利用现代技术的巨大潜力,以便在相互依存的一个世界上发挥充分作用(它们即使愿意退出也不可能)。

我们已经着重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中发生问题的几个方面,因为它们指出了这个领域中未来的研究方向。这些方面,即“意外”和解释含糊的“难题”,不仅是指违背愿望(这种情况可能会要求改进政策)的问题,而且指我们的计量数据,特别是我们所作分析性假设,都不能为我们提供充分的见解和解释。前面已经提到,通常用来计算国民产值及其组成部分的方法并不能反映经济和社会结构为开拓重大技术革新的渠道进行调整时付出的巨大代价,而且确实遗漏了某些积极的收益。作为这种衡量基础的旧理论用比较狭隘的方法来为生产因素下定义,在生产力上升方面留下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空白,犹如衡量我们究竟多么无知一样。这种理论上的缺陷与新的发现产生了矛盾,近几年来,这个领域中引起了活跃的讨论,并试图扩大国民经济计算的框架,把至今仍隐藏着而显然是很重要的成本包括进去,例如作为资本投入的教育、向城市生活的转变、环境污染以及大规模生产的其他消极后果等方面的成本纳入计算范围。这种计算方法也会发现迄今尚未测算的某些积极收益,比如说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平均寿命的延长、较大的社会流动、更多的娱乐活动、收入不平等有所缓和等等。在含糊性上,都证明它是徒劳无用的。<sup>①</sup>现代化理论家最大的失败也许就在于他们忽视了解释工作,来解释他们的理论恰恰要解释的东西。现代化理论家显然共同关注对社会转变的变化程度进行分析,然而,他们的“理论”

---

<sup>①</sup> 库恩在1962年提出,某种理论以多种形式出现是表明范例危机的共同迹象。按照这个标准,现代化理论一出现就处于危机之中。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1962年,第69—72页。

往往是含糊的、混乱的、描述的,而且最终是不能比较的,因为他们没有建立以经验为根据的富有成果的问题结构,而这个问题结构却能构成他们研究工作的核心。

也许将来总有一天人们可能发现某种无所不包的社会变化过程可以有用地称之为现代化。但是,上面的批判说明这一天决不会在近期到来。目前,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主义方面的,以及纯理论的批判所积聚的压力加在一起,得出的结论可以引用卡普兰的格言来说,现代化理论的概念结构“能够告诉我们的东西决不会比别的范畴更多”。因此,对现代化理论进行的批判显然支持“激进的”立场。即使不断地对现代化理论加以修正,也不可使现代化的幻觉有什么实质,因此,现代化理论必然要被抛弃。<sup>①</sup>

## 结 束 语

卡普兰提出,我们的概念应当“告诉我们更多东西”。这个标准,显然是相对的标准。如果那种反对现代化理论的论证是决定性的,那就不仅必须证明现代化理论的概念结构是不适当和不起作用的,而且还必须证明存在着一种更可行的其他理论。但是,目前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以取代它的另一种理论。这种状况是由于现代化理论家及其批判者都没有想到或甚至没有考虑到要与现代化理论的知识传统作彻底决裂所造成的。

以上的分析就是要为这样的决裂提供合理的依据,然而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必然又是不够完善的,直到能够证明已经有了一种更富有成果的研究方法时为止。这样的研究方法必须避免现代化理论的错误,却又不能放弃它的有关事物。虽然现代化理论一直

---

<sup>①</sup> 这个结论并不排除纯粹正常使用的“传统的”和“现代的”这两个名词来指某个社会的过去和现在。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只有语言学上的作用,而没有分析的作用。这个结论也不意味着不可以用这些名词以及其他有关的名词来指那些定义比较严格的实在概念。

没有提供一种满意的基础,为民族社会的形成与转变的多样性和趋同性形式中的因果关系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项任务本身就必须放弃,而去迁就专论性的研究或所谓“中层范围的”理论。不过,如果它确实意味着对现代化理论所作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主义方面的和纯理论的批判所提出的种种难题应予避免的话,那么另一种观点必将是深深扎根于以来自经验这一事实为根据的问题结构之上,这种问题结构清楚地说明哪些是需要解释的问题——对于比较研究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还要说明它们之所以成为问题的背景。这样一个问题结构不是企图简单地描述社会的各种转变,而是要以多少可以起到作用的名词去识别出这些转变对它们是一种反应的所有民族社会所共有的基本核心结构问题,即涉及社会界限的形成和维持,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组织和工作,以及资源的社会分配等问题。因此,取代现代化理论的另一理论必须严格地确定分析的单位,对它们进行分类,比较它们对一系列共同问题显示出变化的幅度,用以严格遵循比较分析的逻辑。但是,无论取代现代化理论的另一理论最终可能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我们都需要一种根本的重新思考,想一想怎样才能做到对长期和宏观的社会转变进行分析。现代化理论诞生将近二十年的结果不能证明在第三个十年中能够继续存在。开始为树立另外一种范例而努力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杨豫、陈祖洲 译)

J.W.斯隆

## 依附论的主要欠缺<sup>\*</sup>

依附论是近年出现的解释拉美发展的“秘诀”。依附论者声称，他们的模式能够解释拉美的发展问题，并且还能够在准确无误地开出一整套治疗该地区弊病的政策方子。虽然依附论的著述为拉美发展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它的支持者们大大夸大了这种理论解释问题的能力。而且他们在支持自己的理论的时候完全被宗教狂热般的感情所控制，所以不能发现这种模式的欠缺。本文目的主要是探讨依附论的不足之处。

应该承认，依附论的支持者为拉美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首先，他们迫使拉美研究冲破学院式的清规戒律，这些清规戒律有碍于对拉美的理解。从此，经济学家再也不能忽视政治学和社会学了，政治学家也不能逃避经济学和社会学了，如此等等。其次，依附论者还向我们指出，在拉美，区分国内事件与国际事件的界限是多么困难。自从美国渐渐成了拉美权力结构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任何在国内实现现代化的努力，都势必产生国际磨擦。因为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渗透到了拉美各国社会，所以，拉美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也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了。第三，依附论者迫使研究拉美的学者注意美国的援助、贸易、投资和多国公司的政治、社会和

---

\* 选自美国《泛美经济事务》，第31卷，第3期。

经济后果(而不只是动机)。第四,依附论者还使学者和决策者不仅对经济生产问题而且对社会的经济分配问题也很敏感。简要地说,同50年代的研究相比,依附论者迫使研究拉美的学者涉及多得多的问题。

但是,这一理论和它的支持者也有些值得磋商的地方。首先,该理论的某些创立者对于他们的结论的相信程度超出了社会科学家应有的程度。虽然该理论尚未得到实践的验证,但是许多人却怀着一种宗教狂热接受了这种模式。有些接受依附论的美国学者把自己弄得像是为他们的国家在越南、古巴、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所犯罪行请罪的僧侣。这样的学者忘记了社会科学家的作用就是怀疑,忘记了怀疑的态度是获取更高真实所必需的,忘记了社会科学家永远不能使人们相信,他或她已经发现了终极真理。

依附论者的这种态度使得他们容不得其他学者。在他们生活的分化为两个极端的世界里,谁不接受依附论模式,谁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对劳苦大众,为帝国主义效劳。这种判断对于动员政治积极分子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社会科学家却是有害的,社会科学家要准备发现以至搜寻可能与他们的理论或基本信仰相抵触的材料。由于依附论者沾沾自喜地认为他们的社会理论与他们的基本信仰完全一致,人们怀疑他们像是要谴责任何检验他们的理论并发现不足之处的人。依附论者已经发展了的这种理论,是值得检验、再检验的。

第二,依附论者所以应受批评,还因为他们夸大了他们的模式解释问题的能力。正如威伦所说:“用个别特征来描述整个文化,尤其是不同起源的极为复杂的文化,是近乎幼稚和不负责任的。”就用依附论这一把钥匙,便能同时打开理解海地和巴西、危地马拉和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和秘鲁、乌拉圭及墨西哥的大门,是值得怀疑的。

这一模式因不能被检验而进一步削弱了它解释问题的能力。用迈耶的话说:“可检性的标准是在陈述某一主张时必须能让别

人证明它可能是错误的。更具体地说,这一主张必须划出一个经验的数据资料范围,这些数据资料是与该主张水火不相容的,一经发现便会否定这一主张或使它走向反面。”社会科学家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时常论及的概念不易加以实施或测定。但是,依附论者主要陈述经济现象,这种现象是可以测定的,而且尚未统计研究以证实他们的理论。

已有两项统计研究表明依附论解释问题的能力有限。卡普兰发现美援在拉美的分配(1946—1973年)与人口多少有密切关系。与依附论者的预言不同,卡普兰发现美援和美国的直接投资之间“极少或没有联系”。考夫曼、盖勒和切诺斯基确实发现了依附性(用贸易和资金的数据来测定)和收入不均以及民众参政的低水准有明确的联系。但这些作者“惊讶地”发现,还有许多相互间的联系“与依附论的预言明显地背道而驰。用我们设计的许多方法测定,依附性较强的经济增长较快而不是较慢,它们的土地占有制度是较为公平而不是相反;按照我们对资金依附的测定,它们有更稳定的宪法,而较少黷武主义”。他们的结论是这样的:“依附性和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和有意义的相关性(全部实例,除两例外,相关系数均在40%至61%之间),与弗兰克和博登海姆尔的论断完全相反……要说还有其他什么意义的话,这些发现似乎最有力地支持了‘传统的’经济学家的‘反论’,即事实上对外贸易和资本主义能有良好的经济后果;这些发现还表明卡多索、雅夸里伯和森克尔(他们知道在依附性结构中经济增长是可能的)等依附论者的著作比他们的同事们有明显的改善。就后者坚持依附不仅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而且产生消极的经济影响而言,我们的数据认为这个以不适当的形式炮制出来的结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依附论者解释问题的能力还因一个明显的偏见而削弱了。他们在对美国在危地马拉、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表示强烈愤怒的同时,却闭口不谈苏联对东欧的干涉。而且,他们也不批评古巴在1968年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这个模式的主要缺点,照雷伊所说,或许是“依附论者在形成依附和非依附的概念时,不是将它们作为连续的渐变的状态,而是作为对立的、突变的状态……这个模式的支持者持这一观点,其意思显然是非依附所可能达到的,尽管他们努力不给非依附下明确的定义,也不认真考虑不依附的经济是怎样的”。根据这种对立的观念,拉美国家被分成两种类型:古巴是自主型的一个成员,其他国家都是依附性的成员。于是,依附论者将这第二种类型当作一个整体对待,并且列举了一系列他们认为都是因依附性的欠发展而引起的问题。他们从第二类型的国家中精心挑选了一些事例来支持他们的论点。但是他们没有努力将依附的特征形成概念,然后再系统地检验这两类国家。由于缺乏标准化的尺度,巴西的国债增长受到了谴责,而古巴的国债增长却未被提及。许多国家长久地依赖原料出口被强调,而古巴继续不断地依赖糖的出口却被忽视了。许多拉美国家年复一年的收支问题成了依附性发展无出路的证据,然而对古巴被同样的困难所折磨这一事实却视而不见。

显而易见,依附论者将独立于美国和(或)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之外的好处看得太多了。依附论者因没有给自主发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批评拉美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包括那些社会主义革命后似乎仍存在并妨碍发展的问题。如同社会主义的古巴一直依赖食糖出口一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危地马拉也会依赖咖啡出口的。这里,我们必须弄清两个经济上的基本事实。第一,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国家越小就越要依赖出口商品。概言之,人口的多少和外贸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大小成反比。第二,一个国家只能出口其他国家想买的东西。在这样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上,每个国家都要认真地、抱有希望地对专业化程度作出合理的选择。用雷伊的话说:“那么任何需要出口的国家都必须按世界市场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经济结构,而不管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还是在资本主义市场上活动。按照多斯·桑托斯使用的、并为博登海姆尔所接受的定义,一个欠发展的国家,在根据外国需要确定其经济

结构的时候,就变成依附性的了。那么,按照这一定义,所有欠发展国家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依附性的。这也就是说,非欠发展是不可能达到的。”

现在我们进入对依附论的著述的第三项主要的批评,即对一个或许是不正确的假设的探讨。事实上,所有依附论者都声称,现在“美国对(拉美的)经济和政治的渗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这一假设是依附论者的思想实质,因为他们谴责美国阻止古巴革命在整个拉美传播。但是,如果我们同意依附是一种连续的、渐变的状态,我们就能测定每一个拉美国家依附的程度。此外,由于依附明显地是一个多维概念,所以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从某些方面看,这些国家有较大的依附性,而从另一些方面看,则有较大的自主性。依附论者只是一味地支持自己的论点而不顾检验其理论,以致避开了这样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拉美的依附性是否越来越严重了?如同一些实证的调查显示墨索里尼未能使意大利的火车准时运行一样,对美洲关系的研究也可能暴露类似的概念错误。

由于没有将依附的特征概念化,我们不能回答上面的那个问题。但是有些证据表明——不是证实——至少从某些方面看,一些国家的自主性是加强了。首先,拉美各国制定了许多与依附的模式很不一致的政策。例如,古巴表示愿意派出数千名士兵开赴安哥拉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而与此相比,在拉美只有一个国家——哥伦比亚,愿意出兵支持在朝鲜的美国军队,没有一个国家支持美国的对越(南)政策。大多数拉美国家在领土纠纷和200海里领海权的斗争中激怒了美国。1965年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后,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抵制了美国试图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拉美和平部队的计划。更有意义的或许是,无论文官政府或军人政府都将美国在拉美的数十亿财产国有化了,其中包括外国人在委内瑞拉的全部石油企业。所有这些事实表明,许多拉美政府正在追求本国的利益,对美国的独立性要比依附论者所认为的更强些。

根据统计资料,许多来自拉美的消息不是令人鼓舞的。大多数拉美国家外债不断增长,通货膨胀率很高,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农业生产不足,失业队伍庞大。但是也有材料表明,他们在减轻对美国依附的努力中正取得某些成绩。作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结果,拉美国家已经降低了进口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所占的比例(这是衡量对外脆弱性的重要标准),从大萧条前的约20%降至1970年的10%。拉美在出口产品多样化和贸易对象多样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在1950—1970年之间,有13个国家降低了输往美国的产品(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例,这个指数只在6个国家中是上升的。同样,在1960—1970年,两种主要出口物的外汇收入在全部出口物的外汇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有13个国家降低,6个国家提高。此外,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拉美的产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在全部出口中的比例从1960—1961年的约12.5%发展到1970—1971年的18.1%”。1975年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拉美输出了价值95亿美元的产品,其中三分之一是巴西的。最后,拉美自由贸易协会秘书处在最近的一项普查中发现,截至1974年12月31日,在它的11个成员国及多米尼加共和国中,共有555家银行机构,其中325家为本国私人银行,159家为国营或合营银行,71家为外国银行。在全部存款中,49.7%在本国私人银行,43.5%在国营合营银行,6.7%在外国银行。这些数字表明外国银行并不像依附论者声称的那样强有力。

列举以上数据,并非为了给拉美描绘一幅令人乐观的景象。我个人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搞得不是很好。但是这些数据确实可以表明,拉美国家的政府并非如依附论的著述所形容的那样是套着枷锁的奴隶。它们不断地从美国那里取得某种程度的独立,在取得这种独立的同时,它们对发展政策的成败也越来越负有责任。

我们对依附论者的第四点批判是他们对拉美资产阶级和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态度。依附论认为,虽然拉美各国受依附关系的限

制,资产阶级却一直自由自在地利用这种关系为他们个人(不是为民族)谋利。依附论者的一个十分坚定的信念是:拉美社会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改革,因为改革需要依靠“卖国的”资产阶级。博登海姆尔分析说:“……如经验所示,建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或者‘民族资本主义的’、或者更近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案的努力,最终都必将失败,因为这些方案所依赖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本身受到他们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角色的限制……他们只要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必将继续依靠外国投资,并且必将在本质上迎合外国利益,与他们妥协。”

依附论者认为拉美的资产阶级没有带来现代化,而只产生了依附、停滞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在他们看来,因为拉美的资产阶级不能像美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那样发挥促进发展的作用(许多非依附论学者也这样认为),所以实现现代化的选择就只有社会主义革命了。但是,正如19世纪日本和德国所证明的,除了英国和美国所开辟的道路之外,还有其他现代化道路,拉美也可以像它过去曾做的那样,撇开西方的社会理论和意识,推进自己独特的发展战略。这一道路,无论变好或变坏,可能会导致各阶级的合作。伯利兹的论断或许倒是比依附论者的更为正确:“向美国霸权主义的挑战可能不会来自极左派,而是在广大城市人口的支持下来自国家本身。从拉美情况来看,这很像日本入侵前夜时的新加坡的堡垒,所有的枪炮都对准海上,而对陆上的进攻却毫无准备。”既然过去各国以不同方式实现了现代化,也就有理由假设在今后也可能这样。简言之,我们要避免陷入以下两个假设的泥潭:(1)现代化是自动的;(2)“在当代”只有一条发展道路。

(李建国 译)

H. C. 曼西利亚

## 评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sup>\*</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从发展理论和革命理论的失败中猛醒,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才显示出今天这样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第三世界在这个时期的历史性发展,使得那些有发展倾向和自由民主倾向的社会学家对这一时期寄予的希望落空了。然而,这种发展也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社会革命家的理论格式和预言来发展。近几十年的发展充分表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国际阶级斗争”理论的贫乏,它们都过高地评价了政治,而忽视了经济分析。

另一方面,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同样无法克服某种认识方面的片面性。因此,围绕着发展这个问题,将提出一种新的、更符合第三世界情况的理论,它包括大量的社会经济的改革,并研究社会科学对当代的贡献。

### 现代化理论的概念

近几年来,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反,现代化理论在改变和打破传统秩序的过程中日益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前,这一理论为搞清发

---

<sup>\*</sup> 原载《巴拉圭社会学杂志》1980年第48期。

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复杂而又紧迫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极其特殊的工具。

现代化理论,就其认识论及其原则的历史出处来看,可以说是M.维贝尔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这一理论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有:结构主义人类学(特别是E.迪尔凯姆)、功能主义人类学(英国流派马林诺夫斯基)和结构功能主义(T.帕森斯)。

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概念是:现代化的进程在于把工业化、都市化、打破旧的行为标准和建立一种政治体制结构结合起来。所有这一切活动的特点就是:由人民广泛地参与政治决策、成立民族国家、区分(或确定)政治的作用。

现代化就是从一种保守的、落后的、传统的秩序向一个生气勃勃、工业化的现代化社会过渡。据R.本迪克斯说,现代化这种社会变革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

现代化理论家认为,现代化最初的急剧发展把世界分为发达社会与落后社会,这种分化一直延续到今天。

传统性这一概念是用来说明那些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技术水平又停止不前的国家。在传统社会里,社会的不平等是以亲缘关系、继承权、传统的权力结构为基础的;社会等级与职位的划分是靠世袭地位而不是根据贡献大小。

传统社会在政治上都倾向于发展一种既广泛又权威、没有其他党派和利益组织的多重竞争,却具备政府、军队和官僚政治的超级社会结构。现代化理论确定的就是针对传统性而言的现代化。

在经济技术领域中,拥有高度发展和技术先进的工业生产方式的社会被认为是现代化的社会。现代性是针对非直接人生存的能源的高度的消费而言,现代化技术的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继续增长。

现代化社会的伦理道德具有普遍性:行为和价值的标准旨在摆脱狭隘主义的根基和受限制的有效范围。

在现代化社会中,个人的情况是由他的贡献与成就决定的,而不是取决于那些固有的、指定的和任命的成分。政治上允许互相竞争的党派、团体的存在,保证参与政治权利的有效性。

J.S.科尔曼认为,政治结构与政府结构的高度专业化和明确的分工是政治现代性最重要的特点。那种在竞争中实行的、由可协商的党派和构成的政治体制最终对增加的利益进行调整,并使这种利益的作用付诸实现。

D.E.阿普特认为,现代化社会类似于世俗的无政府主义模式。它允许一种受政体的合法机构控制的自由的竞争的思想活动。同时,这种合法机构还阻止权力的垄断。它的合法性原则就是公平。它的中心任务就是分配社会产品。

几乎所有的现代化理论家都要求现代性与民主的统一。S.N.艾森施塔德认为,现代化的社会就是民主的社会。

### 过渡时期与二元论问题

现代化理论家把传统性的现代性的概念当做最理想的表达形式。这一概念意味着一种二元论的社会结构:在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和经济的传统因素中出现了现代性成分。例如:那些热带地区和农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统治思想,可能同属传统性概念之列;而在这些国家里,大城市、贸易中心、工业设施、企业设施以及某些致力于发动群众和统一群众的政党,则可能被视为现代性因素。

某些现代化理论家把这种经济—技术的二元论看做是整个发展中社会特有的现象,而不把它看成是一种拖延、阻碍前进的因素。

要精确地理解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过渡,须从现代化的进程中去着手研究。

赞同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家们,倾向于缩短在作用的差别与

功能的特性等问题上以及行为与报酬的整个标准方面的现代化过程。因此,现代化被解释为在合适的和统一的机构中,在均衡体制方面所做的一系列修正。在现代化完全实现的时候,这些机构必须保证有效地缓和体制的紧张局势和满足它的政治要求,必须保证社会组织长期的稳定,并保证后者与革新力量、最后与经济持续发展之间有一个权宜之计。

### 评现代化理论

尽管现代化理论的大多数代表把现代化的进程解释为各种相互依赖因素的结合,但他们同时又倾向于肯定普遍主义的总纲。按照 T. 帕森斯的分析,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变革主要是一种规范文明的改革。如果一种有着广泛社会意义的价值体制是决定性的,那么其他的次体制则基本上是一些派生性的。显然,这种理论所表明的是这样一种概念:这种普遍主义的一般标准的改革,通过区别、分化和确定的过程会加快所有其他方面的变化,而这些过程本身也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变革。这就不难看出,这种现代化和社会改革的概念显然是过高地评价了文明——标准、社会心理学以及行为理论等方面。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说来,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概念提供的只是一种非常粗浅的分析,它把各不相同的历史、社会模式置于同一种概念之中。这样,现代化原理的贡献和解释能力就是值得怀疑的了。

强调行为与价值的标准,规范文明的准则意味着在调查的事物中忽视了基本的方面,诸如经济—技术水平与生产的特定方式之间的联系、社会阶级与社会阶层结构、主张社会变革的人、所有制以及国际范围中的外部社会的影响等问题。

现代化理论在分析行为与报酬的标准和区分功能的作用与特殊性的复杂性时,确实有所成就;在寻求现代性与民主化同西方社会的一致性时,也无疑在思想意识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这种理

论把西方社会的表面形式和纲领性的东西视为绝对真理,那它就无法区别哪些是希望和要求,哪些是客观现实了。

改变不发达状态的战略标准本来包括:对于处在变革中的社会体制应该持续地进行改革。因此,使社会结构保持适当的灵活性和特殊性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才能从理论上为技术政治体制和技术管理开辟道路。可是现代化理论中的维贝尔原则,却把现状理解为一个不可逾越的概念范围,这就使改变不发达状态的战略提法成为无足轻重的了。

### 依 附 理 论

大多数的依附理论家认为自己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认为他们自己的观点属于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一部分,是力图从外围(指附属国——译者)的前景来解释问题的。

依附理论所做的基本推论是:对国际市场和外国投资的依赖导致了拉美地区工业化的失败。由此得出如下结论: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仅仅代表着一种世俗的历史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初期,不可能存在一种完全符合拉美发展的形式。同现代化理论的争论,特别是同经济—技术二元论概念的争论,对依附理论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所有依附理论的理论家一致否认拉丁美洲社会具有二元论性质。

1965年 R.斯塔文哈根提出第一种“不发达的发展”理论时指出,在拉丁美洲存在一种“唯一的历史进程”,它大致包括一个在整个社会中,封建传统性因素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因素相适应的过程。在斯塔文哈根看来,所谓传统方面,西班牙殖民时期一开始就完全起着发展殖民地经济的作用。这种称为传统性的因素担负着降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成本的任务。现代化区域的繁荣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情况。A.C.弗兰克则认为,随着时间

的推移,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效地、全面地扩展到不发达世界那些表面看来最孤立的地区。这一思想流派既否认西班牙殖民扩展的封建性质,又否认封建结构从西班牙移植到拉美殖民地。按照这种观点,大地产所有者阶级不是封建贵族,而是“拉美土生的资产阶级”。弗兰克并不把今日的不发达看作是落后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所造成的结果,而认为这是那些不发达的附属国(外围)与资本主义宗主国(中心)之间关系的产物。

F. H. 卡尔多索提出了**统治—依附**关系的模式。他认为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已经不能恰当地解释今日资本积累的形式和资本在世界上的扩大;列宁主义关于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控制的论点已是站不住脚的了。

卡尔多索认为,目前依附国家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用简单的、旧的国际贸易格式(工业产品的进口和原料的出口)来说明,也不能通过这些依附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大部分掌握在外国手中推断来解释。因为,在今天,多国公司财团很赞赏地方资本与国家资本共同参加的混合所有制形式。国际劳动分工造成了外围经济有限工业化的可能性。所以,今天已不能把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看成是一种结构毫无变化的、单纯的发展。卡尔多索把这种过程称为**依附—联合发展**。这种发展产生了依附和内部分化的新形式:经济中最先进的那些成分直接被纳入国际性体系之中,而那些最落后的部分被削弱成了“内部殖民地”。卡尔多索认为,这种结构的两重性并不具备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种二元论性质,因为它并没有妨碍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

以 O. 松卡尔的依附模式为代表的一部分理论家并不认为依附关系与不发达定义仅仅是一种国内与国际斗争的结果,而是一系列不同变革的集中结果。这里,松卡尔比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更强调国家的作用。

松卡尔认为,目前的从属阶段形成了一个民族分化的过程。依附国家的一部分被纳入了受分工决定的国际结构之中;另一部分

则被排挤。在这个过程的基础上,形成了南(美)北(美)对立。

### 评依附理论的思想内容

依附理论的假设是同使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合法化的愿望相联系的。譬如,依附理论家 L. 比塔莱认为,拉丁美洲“资产阶级”的垮台是因为它无力发展一个重工业,而这在文明的现阶段,是任何一个国家进步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依附理论必须有一个革命的决议,它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建立货物资本工业,二是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秩序。

为了克服至今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的局限性,弗兰克向拉美国家推荐了苏联工业化的模式。在那里,是根据国家的需要而不是根据消费者的需要来决定哪些产品应优先生产。

有关依附概念的分歧,是由一些依附理论家对弗兰克等人所进行的批评引起的。弗兰克概念主要的理论错误在于他否定了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并过分地夸大了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拉美各个区域和历史阶段的突出作用。他把外围国家的社会再生产作用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都忽略了。他设想:生产关系完全取决于分配关系,发展中国家社会内部的对抗完全是宗主国—附属国之间国际矛盾的反映。

卡尔多索和松卡尔的更加别出心裁的模式同样不能恰当地解释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社会阶级与阶层制度的差异程度。

总之,依附理论家们忽视了所有经济以外的领域,这对政治战略范畴来讲,将意味着在一种不明确和模糊的概念中依附概念有可能被取消。

### 现代化批评理论的必要性与出发点

为克服对第三世界过渡时期的历史现象的片面解释所进行的

批评是很必要的。这种片面性是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所特有的。

一种现代化批评理论认为,现代化理论提出了只有模仿西欧和美国的模式才可能保证取得合理发展的概念;依附理论总是为整个工业化纲领提供思想依据。依附理论在对国际范围的不发达状态和隶属关系的分析方面确实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贡献,但它却先验地把依附关系看成是阻碍工业化的因素。持这种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派断定,由于帝国主义的插手,依附理论是建立在一种极不相称的国际秩序之上的,并且自发地同世界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发生了联系。因此,消除不发达现象只有在一种社会主义环境中完全工业化时才能实现,到那时,一切依附关系才会消失。

现代化批评理论起点之一是注意到许多的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今天,世界外围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工业发展都没有离开这些模式。现代化理论由于其传统性和现代性概念而构成了一个相当广阔的概念范围,但因对社会经济领域缺乏认识或认识不足,所以这种理论显得很空洞。现代化批评理论则力图充实这个广阔的概念范围,并确定它的理论范围,以对第三世界的不同性质的发展过程进行充分的阐述。为此,现代化批评理论必须研究下列几个方面:

1. 按照今天固有的标准来看,随着一个扩张性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出现而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其他社会想要得到协调发展越来越不可能了。

依附国家的失败只能使模仿西欧发展模式的想法成为泡影;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在各个领域创立了许多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标准,特别是在有关消费的标准与国家的组织形式的合理化过程方面。

2. 针对依附理论,现代化批评理论指出:落后国家要在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摆脱依附关系,就要为建设一个能够赶上或超过西方模式的经济基础和工业而努力。

3. 一切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模式,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

主义的,都具有一种明显的共性:以农业为代价换来工业的发展;对人权和政治权利的限制有利于国家官僚体制的完善和扩展。

4. 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伴随着现代化发展的是依附关系的出现,这种依附关系对真正的发展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它可以引起某些社会的分化和倒退,丧失决定经济政策的主权。总之,现代化批评理论应考虑国际背景。在这种背景里面,确实存在着统治的民族与依附的民族。而分析的重点应该对准主要标志这种背景的不可变性和不对称现象。

5. 在现代化批评的见解中,包括有关起动力量这个问题。起动力量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起动力条件(资源与力量)是否真正达到足以进行一场工业化平衡发展的水平。因此,它必然同下面这样的概念相对立,即认为,原则上一切国家都可以进行这种工业化的平衡发展,只有社会政治形势阻碍它的开始(依附理论这样认为);或者,唯一的障碍就是传统行为标准的继续存在(现代化理论持这种观点)。现在,再也不能否认阻碍发展的自然障碍的存在了,在第三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开始阶段就出现了最不利情况,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 现代化意味着合理化的过程

可以用 M. 维贝尔的合理性概念来说明现代化的过程。这种合理性概念最有意义的实际表现就是一个世界性的、专业化的、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的组织——官僚阶级的出现和巩固。

维贝尔的合理性概念属于资本主义统治和理性的混合,但也仍可被用来认识在这狭隘的范围之外的现代化进程。首先,因为许多依附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企图重复这个进程。第二,迄今为止,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想法主要是满足于使这种形式——工具主义取得合法性,使独立于政治的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社会劳动组织,服从工具主义合法性的“命令”。现代化进程的发

展,不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都允许它们在一种纯工具主义的概念之下并存。

现代化批评理论不应忽视现代化进程中人类与社会的消费问题,特别是资本的强制性积累问题。同时还要对经济增长同自由、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是衡量外围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尺度。现代化批评理论应该坚持社会结构进行根本改革的想法,要保证减少人类的痛苦,而没有必要把更痛苦的冒险作为其实践的一部分。

(戚铁源 译)

P. 伊文斯 J. 斯蒂芬

## 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兴起<sup>\*</sup>

### 一、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崛起与要旨

在本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比较历史分析传统与分析第三世界依附性的“历史—结构”方法相结合,孕育了大量的、各不相同的后裔。在这个过程中,上述两种研究方法都经过了修改与订正。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来自两种研究方法中的各种观点加以综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它用类似的方法,有时是同时地,来研究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发展是很顺利的。其作品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与反批评,而且在内部也充满着歧见,但尽管如此,在80年代中期,他们对发展和世界经济仍进行了大量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虽各有特点,但却有着令人惊异的内在联系。

从方法论上看,这些研究都依赖于将国家作为个案的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并将其中的一些个案研究结合起来,以求从不同的途径得出同一个结论,同时,将有关的因果关系联系起来,以对有关

---

\* 选自 N. 斯福尔塞主编的《社会学手册》,本文的题目为译者所加。

的统计资料进行解释。<sup>①</sup>统计资料已经被广泛用于刻画某一特定国家中社会结构与过程的特征<sup>②</sup>。定量研究也用于论证一些有关跨国现象的命题(如外国的直接投资与不平等是有联系的,发展扩大了民主的前景等),而这种研究中那些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相关关系的“黑箱”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历史和理论观点的运用加以弥补了。

从根本上说,最近所进行的一些研究,其目的并不在于描述那种假定的统一的社会发展道路,而是要揭示、说明和解释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什么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分配与积累模式?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工业化会与很不相同的政治体制相联系<sup>③</sup>。由于关注的是区别,也就不再把不同阶级的相对力量以及这些阶级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决定因素。如同国家的力量和自主性一样,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各自的力量也是在变化着的。这些阶级之间是发生冲突还是进行妥协,既取决于国内政治的历史,同时也受到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强有力制约。

过去有关欧洲的研究已经在两个方面加以扩展。首先,是他们更加关心国家的作用。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批评相一致,斯科克波尔和曼都认为,不能将国家——它的结构、能力以及相对于民众社会的强度——还原为阶级力量的反映,而应将其视为历史发

---

① C. Ragin 在《在复杂性与普遍性之间:定性比较的逻辑》(1987)一书中,富有见地地探讨了在跨国比较研究中使用统计和历史比较分析资料的价值,从而对上述问题加以强调。亦见 C. Ragin 和 D. Zaret《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见《社会力量》第61卷第731—754页;T. Skocpol 和 M. Somers《宏观社会研究中历史比较的用途》,见《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第22卷,第174—197页。

② 如 E. Shorter 和 C. Tilly《法国的罢工:1830—1968》(1985);M. Zeitlin 和 R. Ratcliff《地主与资本家》(1988)。

③ 恰恰是由于对区别及解释差异的关心,使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区别于一些重要的比较历史学著作,如 P. Anderson 的《专制国家体系》(1974)、《从古代到封建制之路》(1974)。正如 M. Fulbrook 和 T. Skocpol 在《命定的道路: P. 安德森的历史社会学》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安德森反感历史比较分析方法中的因果关系概括,他实际上并没有使用这个方法。更确切地说,他的比较研究只是要在他的研究的社会现象中提炼出一些类型来。

展中的独立力量和行动单位。<sup>①</sup>斯科克波尔论证了国家以及国家之间在国际上所进行的竞争是如何影响发展以及三次伟大社会革命的结果的。曼在其最近的一部著作中也认为,前工业社会的社会凝聚力与组织是由一副错综复杂的网络支撑的,这个网络中包括国家、军事组织和宗教社区,同时,作为支撑的,还包括社会阶级关系。<sup>②</sup>

其次,梯利及其同事还把“大众带回分析之中”。他用一些互相关联的词汇表明,<sup>③</sup>农民、店主和工人并不是消极地接受历史,并用他们的抗议行为造成社会解组,相反,这些被统治阶级的作为,将会左右事件变化的方向。因此,随着资本主义与现代国家的发展,纯粹防御性的行为(如暴乱、造反等),将让位于用被统治阶级的愿望来改造社会的努力(如示威和罢工等)。

对于国家以及被统治群体对发展过程的影响的关注,也与有关20世纪发达工业国家的发展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后者主要涉及有关福利国家的观点。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作者认为,<sup>④</sup>福利国家的发展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工人阶级组织的存在以及所进行的斗争。他们把阶级合作主义看作是控制这种斗争,并将工人阶级重新整合进那个体

① C. Tilly《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1975)一书中所选的文章也对欧洲国家的历史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参见 T. Skocpol《对摩尔〈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的批评与评论》,载《政治与社会》第4卷第1—34页;《国家与社会革命》(1979)。

参见 M. Mann《国家:古代与现代》、《国家的自主权:它的起源、机制和结果》,《社会权力的源泉(一):农业社会权力史》(1986),《社会权力的源泉(二):工业社会权力史》(印刷中)。

② M. Mann《社会权力的源泉(一):农业社会权力史》(1986)。

③ 见 E. Shorter 和 C. Tilly《法国的罢工:1830—1968》(1985); C. Tilly《买主》(1964)、《从动员到革命》(1978); C. Tilly、L. Tilly 和 R. Tilly《造反的世纪:1830—1930》(1975)。

④ F. Block《统治阶级并有统治: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评论》,载《社会主义革命》第7卷,第6—28页; I. Gough《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1979); A. Przeworski《作为历史现象的社会民主》,载《新左派评论》第122卷,第27—58页;《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1985)。

系的一种策略<sup>①</sup>。还有一个相近的但又是独立的较为成熟的思想流派,我们将其称之为“社会民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形成了一种韦尔和斯科克波尔称之为“工人阶级力量的研究方法”,<sup>②</sup>以解释福利国家的发展。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是造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差异的主要因素。并用经验资料证明,工人阶级的力量与福利国家的发展水平、它的分配效果、社会对经济的控制、就业水平和罢工活动有密切关系。<sup>③</sup>这种看法在比较政治经济学中是很典型的。与其说是工业化产生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又反过来创造了福利国家,倒不如说是工人阶级组织的力量影响着福利国家的分配效果与开支模式。但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也依赖于其他政治、经济和历史因素。

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所做的尝试性解释,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受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影响,一些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对不同国家工人阶级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从而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到80年代初期,他们的研究已渐趋成熟,对工人阶级的形成、组织程度和政治表达方面的差别的原因,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得出了结论。在卡茨尼尔森和佐尔伯格最近编的一本书中,他们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方面

---

① L. Panitch《近来关于阶级合作主义的理论:对工业增长的反思》,载《英国社会学杂志》第37卷第159—187页。

② M. Weir 和 T. Skocpol《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国家结构及凯恩斯主义在大萧条中起作用的可能性》,见 B. Rueschemeyer 和 T. Skocpol 编的《需要重新研究国家》一书中。

③ 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代表作可见:A. Mardin《用民主来控制资本主义是可能的吗?》,见在 L. Lindberg 等编《现代资本主义的压力与矛盾》一书;W. Korpi《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1978)、《民主式的阶级斗争》(1982);J. Stephens《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79)等。有关福利国家的经验分析,见 A. Hicks 等《阶级力量与国家政策》,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43卷 R. Friedland《城市中的权力与危机:公司、工会和城市政策》(1983);G. Esping-Anderson 等《阶级联盟在形成西欧经济中的作用》,载《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第3卷,第1—52页等。

的差异进行了个案研究,也发现了这些现象在历史上的联系。<sup>①</sup>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各国之间存在的差异的原因,佐尔伯格在他的一篇综合性论文中强调了两组因素,即资本主义工业结构中的差异(工业化开始的时间及速度和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的特征(专制主义的遗产与工人阶级拥有的政治权力)。他的结论与研究工人阶级力量的理论家们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这些理论家们认为,除种族和语言的差异之外,工业结构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异都有助于说明工人运动的差异。<sup>②</sup>

对力图以卡多索—法力图依附论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来说,他们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解释名不相同的发展模式。像他们在欧洲从事研究工作的同事一样,70年代和80年代的依附理论家们认为,虽然国家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但首先要考虑外部因素的作用,然后才能对国家的作用进行研究。在依附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对国际关系,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sup>③</sup>这种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确证对早期依附理论家的怀疑,这些早期依附理论家认为,以全球基础组织起来的资本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目标是相冲突的。但这种观点并不能解释第三世界工业化中的一些重要的实例。而要解释这些事例,就需要探讨第三世界国家机构的目标和能力,需要了解全球国际工业的动态过程。

---

① I. Katznelson 和 A. Zolberg《工人阶级的形成:19世纪西欧和美国的模式》(1986)。

② M. Wallerstein 在《从工会的观点看工会的发展:为什么小国的组织化程度更高?》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理论解释,他强调的是人口数量而不是工业结构。类似观点的经验研究见 J. Stephens《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正文中的观点见 G. Ingham《罢工与工业中的冲突:英国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1974); R. Miller《工业结构、政治权力与工会的发展:用比较观点看美国》(1987)等。

③ 对这些研究的评论见 P. Evans《近来对跨国公司的研究》,载《社会学年评》第7卷,第199—223页; V. Bomschier《跨国公司与不发达》(1985)。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并不只是关于拉美的。除对一些世界范围的样本的研究之外,这种研究几乎涵盖了第三世界的所有地区。对黑非洲的研究就有 T. Biersteker《毁灭还是发展》(1978); P. McGowan 等《黑非洲的经济依附:对对立理论的因果分析》,载《国际组织》第32卷,第179—235页。

比如,伊文斯就发现,巴西之所以能成功地实现依附型发展,原因就在于国家、国内资本和外国资本之间所结成的复杂联盟<sup>①</sup>。

与此同时,有些研究依附性的人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的阶级联盟以及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上。他们的研究方式很类似于欧洲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比如,汉弥尔顿对墨西哥政府的分析虽然也对国际背景给予充分的注意,<sup>②</sup>但他所分析的主要是国内的阶级联盟是如何与国家机构互相作用,从而导致了那种有特点的发展战略的。更明显的是,吉特林对智利的政治发展重新进行了历史分析,他认为,阶级之间以及阶级与国家之间所进行的斗争对智利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的影响,要超过后者对前者的影响。<sup>③</sup>在 R. 克里尔和 D. 克里尔对拉美八国中工人有组织的合作对随之而来的阶级联盟、政党体系和政治过程的影响所做的比较研究中,国内因素也占有突出地位。<sup>④</sup>他们认为,这些随后的发展主要是由劳工运动初期政府与政党介入的程度决定的。

类似的观点也可以见之于对农业所做的研究之中。一些欧洲学者,如梯利、摩尔、布雷纳都试图通过考察农业中的阶级关系来解释欧洲政治经济中的差异,<sup>⑤</sup>而沃尔夫、佩吉、迪詹夫利和其他

---

① 见 P. Evans《依附型发展:巴西的跨国公司、政府及本地资本的联盟》(1979)。正文内所提到的研究,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研究的对象都很不相同,其中包括跨地区的定量研究,如 J. Delacroix 等的《结构性障碍:对经济依附性、政府效率和不发达的跨国研究》,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86卷第1311—1347页;国家个案研究,如 P. B. Evans《依附型发展:巴西的跨国公司、政府及本地资本的联盟》和 T. Gold《台湾奇迹中的政府与社会》(1986);工业研究,如 R. Newfarmer 编《拉丁美洲的利润、进步与贫困》(1985);还有将工业研究与国家研究结合起来的,如 D. Becker《新资产阶级与依附的限制:“革命”秘鲁的矿业、阶级和权力》(1983)等。

② N. Hamilton《政府自主性的限制:革命后的墨西哥》(1983)。

③ M. Zeitlin《智利的内战》(1984)。

④ R. Collier 和 D. Collier《政治舞台的形成:拉美的批判目标、工会与政府》(印刷中)。

⑤ 见 C. Tilly《买主》(1964); B. Moure《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1966)。R. Brenner《前工业欧洲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载《过去与现在》第70卷,第30—75页。

一些人,<sup>①</sup>则试图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同样的研究。佩吉依照在此之前斯丁肯比的观点,认为与工业中的阶级关系不同,农业中的阶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随财产关系、市场体系及生产组织而变化。阶级关系的差异导致了农民不同的政治反应。如果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创造(或加速)了只种植某一种或某几种作物的边缘国家的专业化,那么,在许多边缘国家中,其农业阶级关系的特点则在各个国家中形成了非常不同的国家政治模式。因此对农业社会进行比较分析的要求就更为迫切了。

也许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将对欧洲的经历的重新考察与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比较分析结合起来的研究,正在日益增多。其中最富有挑战性的是中哈斯的《欧洲经验:对发展理论的历史批判》一书,它既包括对“核心”地区工业化的综合性比较研究,也包括一些与边缘国家的一对一的比较(如乌拉圭与荷兰、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等)。他的结论是,迟发展国家的边缘化过程与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是相当类似的,类似的程度远超过以前文献所指出的。

在政治发展方面,明确的比较研究要更为普遍。林茨和斯蒂潘考察了欧洲和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崩溃,莫则利斯则对巴尔干和拉美地区的议会制进行了比较。<sup>②</sup>此外,在奥东尼尔、施密特和怀特洽合编的一部多卷本著作中,他们则考察了南欧和拉美的民主政治。<sup>③</sup>对于研究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关系的人来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以第一世界的过去为基础来设计第三世界的未来。他们认为,下述假定是错误的,即这两个地区的发展过程是很相似的,可以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准确地从理论上理解其中任何一个地区

---

① 见 E. Wolf《20世纪的农民战争》(1969); J. Paige《农业革命》(1975)、《尼加拉瓜的棉花与革命》,见 P. Evans 等编《世界体系中的国家与市场》(1985); A. Deianvry《拉美的农业问题与改革》(1981)。

② N. Mouzelis《准边缘地区的政治:巴尔干和拉美的早期议会主义和后来的工业化》(1986)。

③ G. O' Donnell 等编《专制主义统治的转变》(1986)。

的发展。<sup>①</sup>

正如在这个简单的评论中所表明的,新比较政治经济学是由一些不同的、综合性的研究构成的,因此它包含的思想远比这里概括的要更为丰富。

## 二、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近年来在发展研究方面的进展,已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将目前一些学者的观点与原来的某些理论传统结合起来。结果就是形成一种综合,我们将其称之为“新比较政治经济学”。这种研究法的特点是“结构性”。他们优先加以研究的是形成历史变迁过程的制度和集体:阶级、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可以从社会结构观点确定其利益的群体。<sup>②</sup>他们也历史予以重视,希望探讨由特殊的历史事件所形成的偶然性,但在同时,他们又一直在探寻可以应用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解释框架。他们认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力量、能力及其联合的愿望,都是各不相同的,正是这种差异决定着发展的水平。同样,国内精英与国际精英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与政府的关系也是各不相同的。在这两方面,其间的差异,都是与之如农业生产的性质、工业制造业的特点、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发展的起始点等结构差异相联系的。由于他们的兴趣是在于揭示、说明和解释不同的发展道路,由于他们关心的是综合性因果以及用多种途径达到同一个结果,这方面

---

① 正如 J. Midgal 在《对发展与变迁政治学的研究》一文所指出的,理解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的愿望促使人们对欧洲的历史经验重新进行考察。

② 正由于这种新的研究把国家组织作为行政机构来研究,并关注工会与政党组织,所以 J. March 和 J. Olsen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78卷第734—749页)一文中将其称之为“新制度主义”。但这个称号是不对的,因为它不能反映出比较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特点,即它关注的主要是制度的社会结构基础。

的研究者们做的大量工作都是对若干个案进行分析比较,同时也往往辅之以对大量个案的统计分析,以及对某一单个个案的广泛考察。

这种研究法中的某些成分并不是新的,但作为一种整体,则必须看做是“新的”,如果将其与其脱胎出来的那些研究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它与以前比较历史研究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它的研究结论往往与更一般性的理论框架相联系;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相比,它更加强调国际因素的作用。它与依附理论,甚至历史结构分析也是不同的,它更加注意政治因素、政府及国际上的地缘政治的作用。

从他们的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可以对以前的不同学派的观点进行综合的假设。最早由现代化理论家提出的民主化与发展之间有一种正关系的观点,现在可以用从有关阶级的历史比较分析中抽象出的框架来进行解释。依附理论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会由于参与国际经济而受到损害,将这种观点与现代化理论的相反的观点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假设,即这种参与是否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要取决于第三世界国家左右其外部关系的能力。新比较政治经济学还批驳了下述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工业化与较高级程度的不平等有着内在的联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依附型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加剧不平等的程度,相反,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则认为,积累与分配的关系取决如下两个因素,一是以前农业产权关系的结构,二是国家机构的政治特征。

新比较政治经济学所形成的一些结论要比以前的理论更令人满意一些,也较为符合历史实际,但这种研究还远不是已经完成了的。与其说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研究,倒不如说他们发出了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呼吁。这种呼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他们提出了一个广泛的研究方案。这就需要用更加广泛、更加系统的跨地区比较研究来证实已经得到的结论。第二,他们还提出了一个“精确的研究方案”。这就需要进一步探索那些已经提出来的关

系,以更好地确定那些起作用的机制以及所涉及的偶然因素的性质。

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进行比较分析,是新比较政治经济学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之一。但对多个地区的个案所进行的研究却并不多。除了以一般性的跨国统计资料为基础所进行的研究之外,对单个国家的个案研究还都是一些实地考察,尽管也通过考察有关其他单个国家的文献而进行了一些比较分析。对若干个国家所进行的比较分析往往都限于某些地区之内。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虽然在欧洲和拉美之间的比较研究方面已经获得可观的进展,对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家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比较研究,<sup>①</sup>但是,将非洲、拉美、亚洲和中东都包括在内,甚至内容更广泛的比较研究也还很少。

尽管所比较的个案还是很有限的,但建立一般性解释性的工作仍是很薄弱的。同时,如果将个案的数量增加,就会提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这也是需要加以解决的。对进行比较分析的个案的选择,还远不是很系统的,而是取决于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及研究者的背景。在需要将比较的范围扩大的同时,对米尔斯的划分阶级的标准也不能不给予充分的注意(对于解释中的外在变数以及解释性变数之间的差异也必须给予注意)。

用以补充“广泛性研究<sup>②</sup>方案”的“精确研究方案”中也存在许多困难。这里所提出的大部分假设都需要进一步精确化。比如,有关国家与市场的讨论已经表明,由具有足够行政管理能力的国家所进行的干预可以有效地促进发展,相反,缺乏足够自主性和行政能力的政府所进行的干预则会产生相反的后果。但是,“行政管理能力”这个至关重要的变数还相当不明确。它是指使其更具有“渗透性”的国家行政机构的结构吗?它是使行政机构能追求集体

<sup>①</sup> F. Deyo《新亚洲工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1987)。

<sup>②</sup> G. Gereffi 和 D. Wyman《创造的奇迹》(印刷中)。

目标而不是分裂为寻租集体的特征吗?对这些问题我们还只是有了一些最初步的答案,<sup>①</sup>除非用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对这些概念进行定义,否则这些命题的价值就会由于中心概念的不准确而受到限制。

当然,更确切地说,也正是由于比较政治经济学所做的解释中存在不确切性和反常规性,这才会刺激新的研究工作,这就恰如以前的理论促成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研究一样。在制定进一步研究方案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坚如磐石般的学术阵营。它不是要形成一种正统的思想,而是要在一系列的“小派别”中形成不断的争论,而不是最终倒入其中的某一方。它的力量与生命力取决于工人阶级力量理论的倡导者与强调国家中心模式的倡导者所进行的争论,但这种争论不能堕落为一种宗派之间的互相攻讦。同样,历史结构主义的依附论的捍卫者,也必须面对新韦伯主义的这样一种观点,即不同理论偏好远不如要进行解释的共同信念重要。

只要能保持这种由宽容所形成的生命力,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就将成为发展和世界经济学术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进一步研究的进展,如同我们这里已经讨论过的那些进展一样,只有由在不同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研究法之间的竞争和对话才能实现。与新比较政治经济学相伴随的,还有两种有影响的对立理论,它们在制订发展研究方案上也没有发挥核心作用,但在将来很可能会起这样的作用。第一,文化取向的“广涵理论”(grand theory)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一个重要地位,<sup>②</sup>发展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受其影

---

<sup>①</sup> 关于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见 D. Rueschemeyer 和 P. Zvans《政府与经济改造:有效干预的条件分析》,见 P. Zvans 编的《需要重新研究国家》(1985)一书中。还可参见 R. Wade《公共事务中的市场:印度政府为什么不能更好地促进发展?》,载《世界发展》第13卷,第467—497页。

<sup>②</sup> Q. Skinner《人文科学中广涵理论的转折点》(1985)。

响。第二,使用个人理性行为模式的研究也开始出现,目的也是在于理解政治与经济变迁,它要比以结构和制度的比较分析为基础的研究更为精确。这两种研究法既提出了挑战,也为争论和对话提供了可能。

如果文化研究法仍然像天书那样令人捉摸不透,或是转而采用像“国民性”这样含糊不清的概念,富有成果的对话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将社会结构的前提与文化特征的影响都具体化,这就可以用以补充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案。尽管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法最初的时候曾反对将文化因素置于优先地位,但它也常常以社会结构为基础来解释价值取向与认知因素。对文化因素的进一步分析将会增强这些解释的力量。比如将两次大战期间容克、军队和国家机构联盟的意识形态与德国城乡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看,就有助于澄清我们关于魏玛民主政治崩溃的看法。<sup>①</sup>

在近来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论著中,可以看到引起文化研究法所取得的成果。比如,阿德勒在其对巴西和阿根廷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分析中,就将依附论分析方法与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强调结合起来了。<sup>②</sup>福叶及其同事则认为,当一个社会进入世界体系的时候,就会按照全球文化模式对自己进行重视。<sup>③</sup>比如,各个国家的宪法中对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就是相当类似的,到20世纪中期尤其如此。<sup>④</sup>同样,教育系统的发展、结构与内容也反映了在

---

① 见 E. Stephens《矿业战略与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国家、阶级及铝矾土和铝工业在牙买加和秘鲁的作用》,载《国际发展比较研究》(1987)。

② E. Adler《意识形态斗争与对技术自主性的探求:巴西国内计算机的发展》,载《国际组织》第40卷。

③ J. Mener《世界政体与民族国家的权威》,见 A. Bergesen 编的《现代世界体系研究》(1980)一书中。

④ J. Boli-Bennett《国家宪法中扩大政府权威的意识形态》,见 J. Meyer 等编《国家发展与世界体系》(1979)一书中。

漫长时间形成的世界性教育模式,以及本国的政治经济现状。<sup>①</sup>

理性选择研究法也进行了可观的研究,它足以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相媲美。比如,波普金对越南农民运动的研究就探讨了殖民政府、农村社区及政治改革运动之间的互相影响,<sup>②</sup>这与佩吉对同一过程所做的比较分析是相当一致的。<sup>③</sup>同样,在我们将其作为比较政治经济学代表作的巴梯斯的著作中,<sup>④</sup>也可以看到理性选择观点的应用。

在理性选择研究法和我们所讨论的新比较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互补关系。按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结成集体的个人从事集体行动的愿望,并不作为分析的焦点。但这却一直是理性选择模式的焦点。但理性选择模式往往是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相联系的,它认为“还原论”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优点。<sup>⑤</sup>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争论,可以促使比较政治经济学更认真地研究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条件创造了在历史上有影响的政治经济行动单位。但同时,如果仅仅用理性选择研究法的术语来定义发展问题,也会泯灭比较政治经济研究法所做的重要贡献。

对普遍理性主义模式所拥有的解释力量的信念,要求对这种模式本身加以改进。在全力探讨在原则上个人是否用集体行动来追逐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往往是设计一套同样简单化的动机

---

① A. Inkeles 和 L. Sirowg《国民教育系统中的趋同趋势与趋异趋势》,载《社会力量》,第42卷第303—333页;J. Meyer 等《世界教育革命:1950—1970》,载《教育社会学》,第50卷,第242—258页;F. Ramirez 等《全球性教育制度化模式》,见 P. Albach 等编的《比较教育》(1982)一书中。

② 见 S. Popkin《理性的农民》(1979)。

③ Popkin 的《理性的农民》与 J. Scott 的《农民的道德经济》(1976)之间所进行的讨论,使关于农村社区政治变迁理性选择观点与文化取向解释联系起来。有关对这种争论的分析,以及它对于分析文化价值使不平等和剥削合法性的意义、对农民暴动的分析的意义,见 R. Herring《分析农业变迁的若干方法论与理论问题:结构与合法性》。

④ R. Bates《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1981)。

⑤ J. Elster《马克思理论的意义》(1985)。

并加之于所有的个人之上。由于全力于对个人行动的解释,也就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分析阶级、国家机构和其他历史行动单位之间的复杂的实际互相作用过程。历史个案及对国外实地考察结果的研究曾由某些理性选择理论家们进行过,但都或是由于某种偶然原因,或是由于某种偏好,而理性选择研究法本身的逻辑却恰好相反。

与文化研究法和理性选择研究法的对话,无疑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发展和世界的理解,但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应当注意不能忘记自己的研究方案。这个研究方案会考虑到历史变迁过程的复杂性和差异,同时要继续致力于做概括性解释。它既要恢复19世纪古典社会学关注问题的视野,同时也要关心当代的政策问题。它认为,发展社会学并不应只是研究贫困国家,而是要研究各种长期的、大规模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而不管这些变迁发生的时代和地点。这样的一个研究方案不仅对发展社会学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可以确保不至于回到过去狭隘的视野中去。

(孙立平 译)

苏耀昌

## 新现代化研究\*

### 对批评的回应

至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热潮的降温,现代化研究再度兴起。同传统的现代化研究一样,新的现代化研究仍然将关注焦点集中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这些研究基于国家层面的分析立场,试图说明发展主要是由诸如文化价值、社会体制这样一些内部因素的作用导致的。新现代化研究不仅使用的术语同传统现代化研究极为相似,如都使用“传统”、“现代性”这类词语;而且在理论假设上也同传统现代化研究基本一致,即认为:现代化(以及与西方保持联系)对第三世界国家是普遍有利的。

然而,新旧两种现代化研究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新派研究者目前正处于一种理论态度上的攻势。一方面,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予以反击,说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是一些误读了自己的理论的说教者;另一方面,他们直率地对现代化学派的一些基本假设予以重新审视。他们一方面反思自身,同时果断摒弃传统现代化研究中的一些暧昧的理论假设。这样一来,新现代化研究就在

---

\* 选自苏耀昌《社会变迁和发展》。

以下几个基础上同传统现代化研究产生了分歧。

首先,新现代化研究反对把传统和现代性看作一组互不相干的概念。新现代化研究认为,传统与现代性二者不仅共存,而且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此外,新现代化研究不是把传统看作发展中的障碍,而是力图发掘出传统在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一崭新的传统观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使新现代化研究者比以往更注重传统中的一些特质(如家庭主义和民间宗教)。

第二,研究方法的转向。新现代化研究者不是将研究对象进行类别划分,然后再高度抽象地对问题展开讨论,而是力图将研究立足于具体实例。因而经常通过回溯历史来展现特定国家所特有的发展模式。对实例的深入考察常常要借助于比较研究方法,比如考察为什么同一种体制在不同的国家会起不同的作用。

第三,由于更加注重对历史和具体实例的研究,新现代化研究没有想当然地把西方模式作为唯一的发展途径,而是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最后,新现代化研究比以往更为重视外部(国际间)因素的作用。虽然其着眼点仍然在内部因素方面,但它们没有忽视外部因素在塑造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且,它们更为强调对冲突现象进行研究,常常把阶级冲突,意识形态统治,以及宗教革命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表1: 传统现代化研究与新现代化研究的比较**

	传统现代化研究	新现代化研究
相同点		
·研究重点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	同左
·分析层面	国家层面	同左
·主要变量	内部因素:文化价值与社会法制	同左
·主要概念	传统和现代性	同左
·政策含义	现代化普遍有利	同左
不同点		
·传统方面	传统是发展中的障碍	传统是发展的加性因素
·方法论方面	划分类别,高度抽象	具体实证研究,历史分析
·发展方向方面	美国式的唯一道路	多元取向的发展道路
·外部因素及冲突方面	相对忽视外部因素和冲突	注重外部因素和冲突

(参看表1:对新、旧两种现代化研究异同点的简要概括)

通过修正现代化论者的一些基本理论假设,新现代化研究开启了一片全新的研究领域。在下面几节中,我们将讨论一些新现代化研究者提出来研究的问题,如:家庭主义在香港如何推动企业发展;民间宗教如何影响日本的现代化;伊斯兰教与伊朗革命的关系,以及国际环境如何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进程。

### 黄绍伦:企业家庭主义

黄绍伦(1988)反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家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看法,并把对他们的批判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在传统现代化文献中,中国的家庭制度被视为一种强大的传统力量。它滋生裙带关系,弱化工作纪律约束,妨碍劳动力市场的自由选择,不鼓励个人投资,阻碍理性化,难以形成普遍商业规范。因此,传统现代化研究者主张,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就要抛弃传统的家庭观念。黄指出,这一理论实际上夸大了传统价值观中的消极因素。黄通过研究在香港的中国企业,考察家庭对企业内部组织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通过考察家长制管理的理念和实践,裙带雇佣以及家庭所有制——指出家庭对经济发展确乎存在积极的作用。

首先,关于香港企业中的家长式管理。黄对棉纺织业的调查研究表明:“家长式管理在工业企业中能够强化管理,避免权力分散,在职员中实行福利以资鼓励,企业主充当下属道义上的监护人,从而并不按劳动保护法规办事,也不提倡工会活动。”黄认为,正是家族这一隐喻所固有的文化意蕴起到了将雇佣双方之间的关系合理化为“主客”关系的作用。这种充满仁爱的家长式管理,其所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在于:它使企业家在产业行情急剧动荡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吸引工人留在本企业中。家长制管理的政治后果是它抑制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使工人纵使有不满,也多以个人行为来发泄,比如旷工或辞职,而很少采用集体联合的方式请愿或罢工。

第二,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也可以成为促成香港公司企业成功的要素。黄提出,大多数中国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最后关头才会张口向亲戚谋求一份差使,并且在裙带雇佣的公司中,亲属员工所占的数量比例一般来说也是很小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小公司来说,家庭成员无疑提供了可靠又廉价的劳动力。事实上,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亲属会多劳少得,这将会帮助公司在经济萧条时期提高竞争力。对于位居管理岗位的亲属,中国企业家通常非常注意给他们提供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以及给予职业培训。因此,黄认为,在这些亲属管理人员中绝少有能力低下的不合格职员。

第三,黄研究了家庭所有制形式。1978年,香港近60%的小工厂属于个人所有或家族所有。黄指出,父系继承制形成了离散又持久合作的亲属单元,引导经济资源的分配管理。即使发生分家的情况,也会采取分割利润的方式,而不会强行肢解家族不动产。根据这些特点,黄认为中国的家族公司因而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度比无血亲关系的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度要高得多。在前者之间易于达成共识,相互之间容易沟通,这些因素使家族公司在运作中具有更强的调适能力。由于减少了程序上的繁文缛节,它们能够对外界变化迅速作出反应,并加强了决策的保密性。这就使它们特别适应于在风险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生存和发展。

所以,黄认为家庭并非经济发展的掣肘力量,“企业家长制”的文化特质恰恰提供了经济发展所需的精神动力。这种文化特质将家庭纳为经济竞争基本单位,并提供勇于革新和承担风险的驱动力。黄进一步提出,这一文化特质不仅在企业中,而且在整个香港社会都存在。

企业家长制具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决策上高度集中,而组织机构的形式化程度较低;第二,崇尚自主权,强调自我管理。管理

者和员工奉行同一理念：作自己的老板。但由于对管理人员的忠诚不能想当然，企业家因而以家长式做法、加强监督和减少分权作为对策；第三，家族公司很少一成不变，而是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此外，由于企业自主权得到恪守，家族公司一般不会卷入暗中勾结串通的事端中去。

既然家庭对香港社会具有如此积极的作用，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却一直没有发现它这方面的可能性呢？黄解释说，这是由家庭所处的外部社会政治环境不同所致。尽管家庭从古到今一直是经济上的一支活跃力量，但是在过去，国家所关心的，只是社会整合，以及促成形成“高度平衡带”的特定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所以它容易受到抑制。而在香港，由于是受殖民统治，不存在政府和家庭为了人才而竞争的情况，这样，类似大陆所受的外部压力和外部环境，对于香港来说并不存在，家庭因而也就能够体现出其作为经济发展推动力的可能性。

总之，黄批评了传统现代化理论家忽视家庭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面所发挥的动力作用。他们只看到欧洲普遍主义与中国专一主义之间尖锐的二元对立，这一思维定势使他们不能理解家庭的作用。黄认为，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照搬到中国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同的社会结构模式必然产生不同于欧洲的现代化模式。黄进一步认为，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中国的家庭主义与日本和韩国的家庭制度也是不一样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韩国与日本的家庭在确保个人待遇方面可能起了显著的作用。

### 戴维斯：对日本宗教的重新审视

继黄绍伦对传统现代化研究加以批判之后，戴维斯（Davis, 1987）开始重新考察宗教和发展之间，在一般意义上的复杂关系，同时着重研究日本宗教对于日本的现代化所产生的特殊影响。

#### • 障碍赛跑理论

在戴维斯看来,韦伯(Weber, 1958)提出了一种障碍赛跑理论,即把发展看作一条在起跑线(传统社会)与终点线(现代社会)之间展开的障碍跑道。参加竞赛的选手(发展中国家)当中,谁能成功地跨越跑道上的所有障碍,谁就会成为胜利者,获得“合理性”和“现代文明”的战利品。

那么,这些发展的障碍是什么?首先,是经济上的障碍。发展中国家因此必须要具备资本主义体制所要求的基本特质,如:合理性、禁欲精神、产品和市场紧密挂钩、正规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其次,是社会政治的障碍。这就要求要用合理的行政组织管理和法律体制取代世袭制和家庭经济,划分商业区和居住区,区分法人和个人的财产。第三,要克服心理障碍,获取资本主义文化的精神内核(比如将工作视作为服从上帝的召唤所应尽的天职),摒除迷信,在现世和超越了神性的道德彼岸之间建立起存在的张力。按韦伯的观点,正是新教伦理,特别是清教徒对灵魂救赎的虔诚信仰,为西欧在通向现代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跨越经济、社会、政治和心理障碍提供了推动力。

韦伯的宗教研究引起了一场对日本、韩国、新加坡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研究,以期寻找与新教伦理相对应的精神特质的潮流。前面第三章曾谈到,20世纪50年代,贝拉(Bellah)提出,日本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是来自德川儒教的“核心价值体系”。80年代,莫里西麻(Morishima)沿着贝拉的思路,进一步提出日本的成功应归功于儒家思想的诚信、民族主义和社会集体主义。他还断言,尽管日本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但也正是由于儒家传统的影响,使它无法吸收西方文明中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和个人主义。从而使从前建立并掌管大型商号的武士阶层,将他们自己的儒家忠信观念渗透进日本现代工业企业,形成一套以诚信原则为基础的雇佣制度(包括终身雇佣制、年绩累晋制)。在戴维斯看来,莫里西麻的解释不过是一套流行的日本理论的说法:为了解释日本的经济成功,而夸大日本文化的独特性。

戴维斯认为韦伯和继韦伯之后的一些现代化论者,在解释宗教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犯了以下错误。第一,他们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宗教是某些“精神特质”或“核心价值系统”的源泉,这种精神特质或核心价值系统又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社会各个方面。但是,戴维斯却发现: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有几种不同的“精神”并存,而绝非只存在一种核心价值系统。比方说,在买卖双方间培植起的“信誉至上”的精神;企业家需要一种勇于承担风险的创业精神;投资者需要鼓励远期收益的精神;而厂家管理者则要向工人们灌输纪律约束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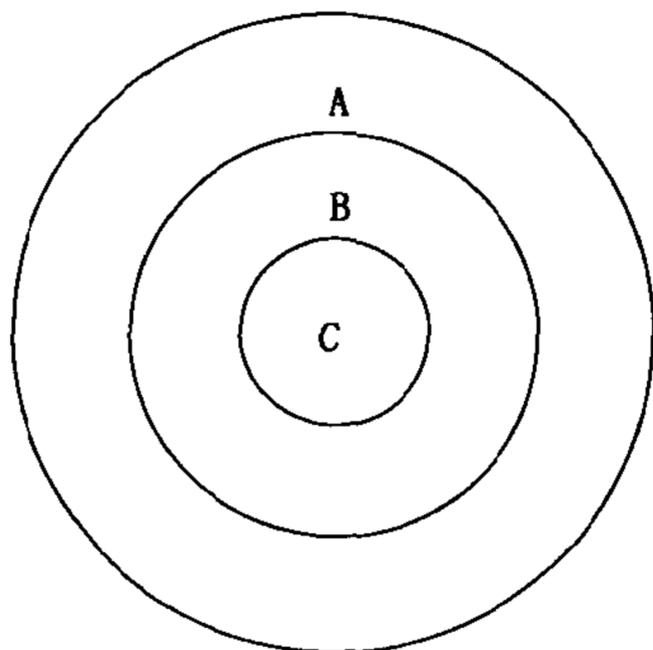
第二,戴维斯批评道,韦伯和他的后继者们认为世俗化或解魅是现代文明必然命运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现代社会中包含着多种不同的“精神”,就不能设想各种精神必然会经由同样的方式完成世俗化。事实上,有些“精神”可能根本就不会被世俗化,而另一些“精神”则可能经历着被不时地“重新神圣化”的过程。就宗教的衰落这一点来说,每个现代社会都应当被重新加以研究。

第三,韦伯的追随者们,试图以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来解释其经济的成功发展,却失之于考虑其它社会关系,譬如个体的利己倾向、竞争、不忠、冲突等因素所起的作用。对莫里西麻的“诚信”理论,戴维斯就提出质疑:如果这一切现象都用精神特质来解释的话,那么政府、银行体系、交通、工业规划、工资和红利应当占多大权重呢?进一步来说,忠诚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总是置身于一个由激励、奖赏、任命权交易、压力和约束等组成的网络之中。在理解日本社会真正的发展动力时,必须将这一物质基础考虑在内。

#### • 路障理论

在批评了韦伯的障碍赛跑理论之后,戴维斯提出自己的新理论——路障理论。障碍赛跑理论是从那些咄咄逼人的现代化论者和发展论者的观点出发来看待宗教,并认为发展过程中的障碍可以在赛程中被轻易地一跃而过。戴维斯站在传统主义立场对同一状况提出另一种观点,即:传统社会如何设置路障来保护自身免受

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破坏性入侵?他认为,传统社会所担心的不是进步,而是无限制的商贸活动导致的社会动荡和道德沦丧。



A—社会 B—路障: 宗教、巫术、道德、民间传统 C—受制约的经济

图1 戴维斯的传统社会模式图[引自戴维斯(1987)作者惠允复制]

为表述其传统路障理论,戴维斯用三个同心圆来刻画传统社会的结构模式(见图1)。

▲ 内环代表经济和它的价值(比如成就和普遍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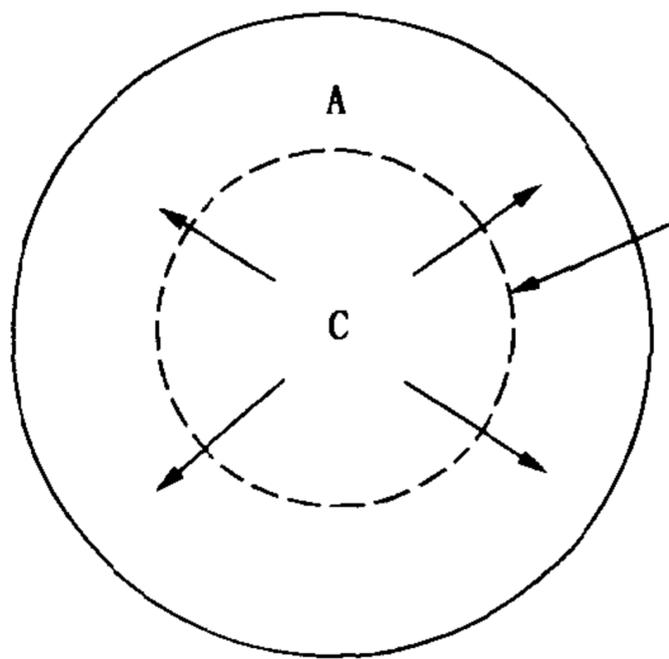
▲ 中环代表“免疫路障”,这是传统社会建立起来用以防御经济力量的工事(由禁忌、巫术、传统宗教、道德、法律、哲学、民间宗教等等组成)。

▲ 外环代表社会及其价值、状况和权力关系。

戴维斯将中环界定为抑制经济的防御屏障。其运作方式就像普兰伊(Polanyi)1944年所讲的“受制约的经济”:用传统的礼仪程式来限制市场的范围,确保市场在现存的有限范围内运作。

在戴维斯的路障模式理论中(1987,232页),“不光在‘敌人’(即现代化论者和发展论者)瓦解传统的堡垒、攻破社会屏障的情况下,而且在屏障本身逐渐老化乃至最后崩溃,或者防守者士气瓦解并缴械投降的情况下,经济都会得到发展。”

戴维斯用图2表明:宗教路障



A—社会 B<sub>1</sub>—先前的路障 C—被解放的成长中的经济

图2 戴维斯的发展与世俗化过程模型[引自戴维斯(1987)作者惠允复制]

(虚线表示)的渗透性使经济及其价值观能够扩展,透入社会领域。他用这一路障理论重新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仅仅以“狂热的新教徒”那种“对上帝的虔诚”,断然不足以形成一个理性经济,理性经济更为主要的成因还在于冷漠的基督徒对经济开发不加阻挡。在英格兰,教会对于那些由于新教徒为主实现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社会苦难(如圈地、贫民院、血汗工厂)实际上置之不理。因此,这一路障模式由于主张对传统宗教捍卫者的行为进行分析,就为检视宗教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条与只强调跨越障碍的现代化论者不同的全新思路。戴维斯指出,在把激进的现代化论者的特点,也一样赋予新的捍卫者之身时,我们一定要十分谨慎: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他们的种种能力:躲避、退缩、伪装、退让、重组、密谋串通、叛变、妥协,甚至向敌人投降……要了解他们如何像那些发展论者一样,也以发展为骄傲;如何使他们的花言巧语和阴谋诡计为胜利者所接受,并成为统治者发展计划中的一部分。

#### • 重写日本的宗教史

应用他的路障理论,戴维斯试图重新解释日本宗教与日本发展之间的关系。他着重做两方面的考察:(1)宗教的负面使能性(日本宗教为什么没能阻止日本社会发生变化?);(2)宗教的正面使能性(日本宗教如何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

**负面使能性:**戴维斯认为日本宗教所以没能阻止变化,有这样几方面原因:

第一,就佛教而言,它没有对日本乡村的迅速发展施加任何阻力。与伊斯兰教不同,佛教不主张将宗教教义强加于社会之上,也就避免了其最终成为社会变革的阻力。比方说,佛教不对人的职业施加限制,大多数僧侣的职责只限于参与葬礼和祭祖等仪式的程序而已。

第二,由于神道教没有共同的主教实施其主张,其在面对现代化力量的冲击时,就更容易让步。戴维斯对此这样形容:“如果一个宗教节日与新的工作安排发生冲突,节日就会要么被推迟或提前,要么被干脆从日历中取消。限制与教外人员交往的古老禁忌也已经被忽略或遗忘了。”

第三,由于儒教、佛教、神道教三者的共存,使日本具有相当的宗教宽容度。日本人甚至形成多种宗教联盟的实用价值观。戴维斯认为正是这种宗教的宽容性使日本能够以极小的心理代价引进了西方的科技和文化。

第四,日本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宗教的世俗化,在城市商人和儒家学者中生成了一种现世精神。戴维斯援引了一名儒教学者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众神、佛陀和鬼怪,也没有任何奇事和神物。”这种世俗化态度也是不会阻挠社会发展的。

第五,戴维斯考察了战后伴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新宗教热潮。领导运动的克利斯玛领袖(或说是萨满式的)人物,在神道教、佛教、基督教和儒教的旧框架里弄出了新花样(253页)。新宗教光大了祖先崇拜、战前的民族中心主义及其它一些传统价值观。其成员是在日本工业化迅速发展进程中受到伤害的那部分人,这些受压迫者由于得不到大企业或工会的保护,转向新宗教寻求生命的奇迹。牧师的疗法总是宗教的或巫术的灵丹,如一个能应付百事的符咒,或者一个模棱两可的许诺——“将来佛陀来了,一切都会解决。”这类新宗教使信徒们能够面对一个急转直下的世界,使他们能够承受社会急剧发展所带来的不平等重负,因而几乎不构成发展路上的阻力。

最后,戴维斯通过考察民间宗教的复兴,指出巫术和超自然神力与工业社会的“合理性”可以十分完美地共存。只要经济取得其社会定位,巫术就能使自身适应现代经济。比如,工人可以在周末或者其它业余时间回守宗教的精神家园来实践他们对工业“召唤”的忠诚。戴维斯说,因此,就巫术的情境性和实用性来说,它对现代

体制不会构成威胁。

**正面使能性:**戴维斯认为,宗教常常用于提高经济生产。甚至在前现代社会,宗教和巫术就往往被用来增加受抑制经济的生产力:当一个平民希望自己的母牛下崽儿,妻子顺产,或祈求躲过瘟疫,结束旱灾时,他常常会转向求之于宗教。

戴维斯(1987,260页)认为,在日本现代化早期,民间宗教已经为老百姓建立起一套职业道德规范。例如,富士教推崇“仁爱、自制、节俭、勤勉”等美德,并且认为,“人应当劳作,不仅为增加个人财富,更是为了养活家人,周济邻里。”20世纪,日本新宗教越来越多地将这种宗教职业道德拿来作为社会教化的内容。戴维斯注意到许多新宗教不断地宣讲“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下的封建道德。”比如高得女士(God.)她教导教友们:“每个人要不断提醒自己对于上帝及其属下所应负的责任,要为之不遗余力。”因此,戴维斯认为,日本民间宗教作为一种推行大众化职业道德的工具,还胜于它的其他任何象征性意义。

然而,戴维斯也注意到,日本工业界为了向员工灌输宗教职业道德,是多么煞费苦心地利用各种传教仪式,培训班,进行思想教育,甚至将之作为日本的莫里西麻工作理论的一部分进行传播。这一工作理论强调日本国民性格的独特性,宣传“要做一个真正的日本人,就必须努力工作,诚实效忠。”在日本政府和工业界的支持下,“工作”成为日本人价值观的一个内在部分。这种价值观主张对家庭、公司和国家的团结、合作、认同,提倡进行忘我的效忠。

日本的世俗宗教和商业理念相结合正是这一世俗宗教与职业道德相结合的产物。戴维斯(1987,262页)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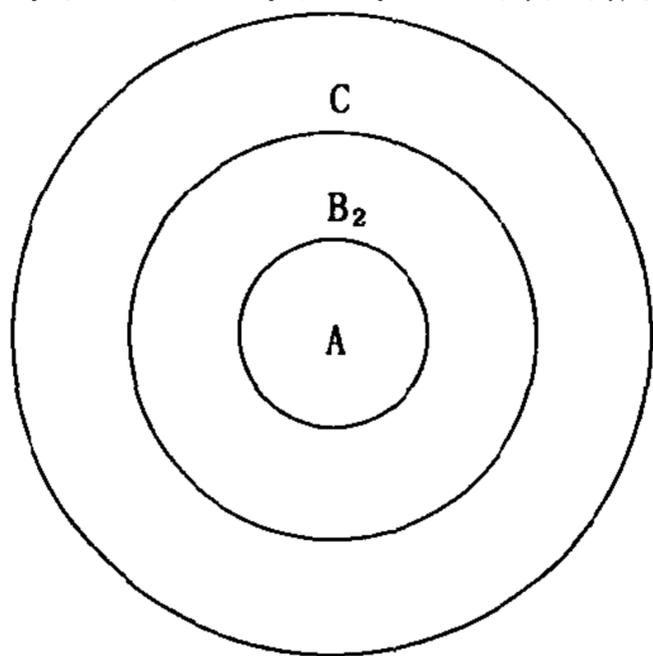
在德川幕府时期,儒家思想的学校旨在将学生培养成为对他们的统治有用的人。后来这一动机以“国家资本主义”之名取得合法化。就像早期的英国企业家把劳动成

果说成是上帝的荣耀和人类财富的进步,日本的工业暴发户也用家族和国家的名义来为自己的财富辩护。

然而,戴维斯认为,这一世俗宗教和商业理念的结合在日本并不成功。20世纪20年代,传统儒教“路障”毫不让步。商业精英不仅没能为资本主义构造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而且还因其自私自利和唯利是图而倍受指摘。这一失败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兴盛,未给西方式民主在日本留下什么发展的空间。

#### • 作为儒家后工业社会的日本

戴维斯称,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用以保卫传统主义的路障几乎已荡然无存。经济在传统社会里不仅没有受到抑制,而且一再扩张,乃至统领了整个现代社会。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工业要求从社会中取得安全地位,并且出现了新的路障以保护经济免受社会的侵扰。根据戴维斯(1987,264—265页)的观点,新的路障包括:“宣讲生财之道的世俗传教士,里根经济政策,行政改革,日本理论等。而与之平起平坐的,是福音传教士、萨满教士、巫师和包括传统



C—经济 B<sub>2</sub>—新路障:日本理论,宗教和道德理论根据,里根经济政策。A—受抑制的社会。

图3 戴维斯的儒教后工业社会模式图[引自戴维斯(1987)]

作者惠允复制]

宗教和现代新宗教在内的高级神职人员,他们一改以往对工业化的诅咒,也转而为之祈祷。”(见图3)

戴维斯最后简要重述他的观点时指出,他的三个示意图(即这里的图1—图3),不应被看作是发展本身的一个分阶段的模式,而仅仅是阐明了宗教净化社会和经济“世俗化”的方式。他还提醒读者注意宗教的功能性和合法化作用,以及宗教为了适应发展过程中新的角色需要,其自身如何经受改造。

戴维斯指出,不应想当然地认为宗教是在衰落,应当看到民间宗教和巫术仍将存在并会与现代社会体制合作。

### 巴努阿兹兹:伊朗的伊斯兰革命

戴维斯致力于考察民间宗教在发展中的作用,而巴努阿兹兹(Banuazizi)则对传统本身更加认同。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潮流之后,巴努阿兹兹(1987)批评传统现代化论者:(1)鼓吹一种当代西方社会的理想图式;(2)把传统说成是一些残余的,消极的东西;(3)主张第三世界要想现代化就必须消除其传统障碍。巴努阿兹兹提倡复归传统,认为传统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对应物一样,能够对个人和集体的需求进行反思、创造和回应,且对于社会动员和变迁具有巨大的潜在影响。

基于这一立场,巴氏研究了旨在复归传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20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哪一个穆斯林国家没有受到这一运动的显著影响——在政治体制及其内容方面,在反对西方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方面,或者在严格奉行伊斯兰教义,执行圣律方面。巴氏特别考察了伊斯兰复兴运动中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暴发事件——1977至1979年间的伊朗革命。这个案例其所以特别值得注意,原因在于:它实际上是唯一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掌权的复兴运动。伊朗革命的起因是什么?这一有意义的案例如何推进我们对新现代化研究的认识?

西方传媒将伊斯兰复兴运动描绘成极端主义的、时代错误和退化的运动。在传统现代化研究看来,这些运动是一种由于群众政治压力和急剧的社会动员而导致的社会体制的“崩溃”。令人担心的是这些运动会导致独裁统治、民族宗教冲突上升和政治解体;而就1977—1979年的伊朗革命本身而言,这一伊斯兰复兴运动通常被认为是一些反动因素(比如一些阿訇,他们对伊朗的现代化持强烈反对态度)的反冲。

巴氏认为这些解释均有失片面,因为它们忽略了对一些因素的考察。这些因素包括社会结构基础,文化分裂,什叶派的特别,以及不同社会力量在此间的复杂结合等,而它们才真正解释了伊朗革命的起因。

首先,巴氏分析了伊朗革命的社会结构基础。20世纪70年代,伊朗经历了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包括重工业化,城市化,普及正规教育,增加大众传媒。但这一现代化浪潮的受益者,主要是那些“西化”的,位居显要的城市中上层,以及在现代工业企业部门中的“劳动贵族”,社会结构性不平等随着现代化进程迅速扩大。国王对美国的屈从和对伊斯兰文化的轻视;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和地方性腐败,这些冲突引发了全体人民对国王统治的愤恨。

其次,在由一小撮西化精英构成的现代派与由广大农民、城市贫民、小商贩、手工业者组成的传统派之间,现代化的作用力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分裂。现代派推崇个人主义、自由、独立、民主等西方价值观,传统派则坚持伊斯兰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

第三,什叶派的独特性推动了这场革命。从思想体系层面上说,伊朗的什叶派从未丧失其作为反叛者的潜在性。巴氏(1987, 304页)解释说:

在什叶派各种十分戏剧性的宗教仪式中,都会看到他们用象征手法强烈表现为追求真理和正义所应付出的坚忍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用宗教教义重新界定的政治冲突的显著才能;用以反抗“压迫者”剥夺群众对传统的继承权的民粹主义的逻辑和语言,以及他们自称是现代的弥塞亚,宣传伊玛目再现,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这些都使什叶教成为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宗教。

另外,什叶派乌理玛(即伊斯兰大阿訇)能够起推动革命发展的政治文化精英作用。他们从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反政府运动的

积极主力,与传统的城市中下层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和人际联系,拥有经济来源,因而几乎不受什么损失,就可以利用寺院、圣地和一些社团组织,公开发表不满,抨击政府。最后,还有一个宗教领袖个人魅力的因素。霍梅尼(Khemeini)正是这样一个广受各种反政府组织拥戴的人物,他的军事武装一致响应革命号召,利用各种传统和现代的通讯形式和煽动手段实现革命的目标。

第四,伊朗革命是一场群众性社会革命,是社会力量和政治思想意识联姻的产物。从思想意识层面上讲,不存在一个单独完整的“伊斯兰思想”,而是许多伊斯兰教式的世俗化理念。它们分别适应于在革命斗争中起一定作用的特定的社会组织。单单就伊斯兰教(徒)方面来看,巴氏指出存在四种不同类型:

激进派:主要包括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主张将伊朗变为无阶级的伊斯兰社会;

好战派:包括乌拉玛、小资产阶级、破产组织,他们希望建立“主”对世界的统治;

开明派:包括中产阶级和社会中间阶层,他们希望通过非暴力途径实现与政府分享权力;

传统派:由现代化以前的社会中间阶层构成。这些人希望社会回到旧体制中去。

巴氏认为,伊斯兰教的价值和理想可以被变通得如此之灵活,以至于能够适应任何特定集团的利益和取向。而阿訇和克利斯玛式领袖人物则通过革命动员,进一步将这些组织的力量联合起来。

以上对伊朗革命的分析给我们以什么启发呢?

第一,同戴维斯一样,巴氏阐明了现代化不一定导致宗教世俗化。像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运动,当社会体制条件和历史条件有利时,会很容易就卷土重来。因而,伊朗革命的发生是与社会中特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尤其是日益显著的社会不平等,文化分裂,国王统治不得民心,以及什叶派不屈不挠的反叛,这些构成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条件。

第二,巴氏认为,传统主义者看来并没有被其“传统主义者”特质束缚住手脚。因此,至少在表达社会变革运动的要求方面,传统理念像它的任何现代世俗对应物一样有效。这不仅适用于什叶派,也适用于以色列的极端正统犹太主义,拉丁美洲的“解放教”,波兰工人运动中的天主教。

第三,传统主义宗教运动不仅能感召位处社会边缘的穷人和破产者,而且也很能吸引那些已经深入到现代社会体系内部的人群(比如新兴的中产阶级)。

最后,自1979年以来,巴氏考察了加入伊朗革命联盟的众多社会力量中,实际上所有其他组织的势力都消亡了,只有传统主义者取得了胜利。有一股伊斯兰革命力量逐渐壮大,影响辐射面渐至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方方面面。给出这一考察以后,巴氏断言,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将重新展开对话,而这一次对话的重点将落在传统这一边。

### 亨廷顿:会有更多的民主化国家吗?

巴努阿兹兹提供了对伊朗革命的复杂情况分析,亨廷顿则就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化进程中至为关键的要素进行了全面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利普塞特(Lipset)乐观地设想经济发展必将带来民主。及至70年代,随着许多民主统治土崩瓦解,现代化理论研究者开始对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前景持悲观态度。但在进入80年代之后,前景似乎又重现光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传统向民主化转向的可能性问题研究。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亨廷顿(1984)提出这样的问题:会有更多的民主国家吗?在就此进行的研究中,他区分出两组因素:(1)有利于民主化进程的先决条件;(2)民主化所依赖的政治进程。

#### • 民主化的先决条件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就民主的前提问题,亨廷顿提出了较之利

普塞特的单变量分析更为缜密的分析。除了研究经济财富和经济平等,他还考察了社会结构、外部环境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经济财富。利普赛特的先驱性研究假设:国家越是富裕,实现民主的机会就越多。文章这样解释财富与民主二者的紧密联系:富足的经济条件为扫盲、教育和大众传媒曝光进入较高水平提供了可能。而这一切就将导向民主。富足的经济同时会为失意的政客提供其他的发展机会,因而缓解了紧张的政治斗争;独裁手段不可能高效地领导先进的、复杂的工业化经济,决策要集思广益,权力要被分享,最终作用于民众的种种法规也必须建立在民意基础之上。此外,富国比穷国有更多的人均国民收入,从而有更少的贫困人口。

但是,亨廷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才可能提出向民主转变的要求?不同国家是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成为民主国家的;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东亚和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反而使之愈发偏离民主的轨道。与利普塞特的富裕民主理论相反,奥唐奈(O'Donnell, 1978)提出了一个官僚独裁主义理论,说明当一个国家面临进口替代品的压力时,会出现新的、强有力的独裁统治形式。

亨廷顿试图调和这些理论中的矛盾证据,提出一个新的“转变区”(或选择区)概念。亨廷顿认为,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会进入一个转变区,传统政治体制在其中越来越难以维持。单凭发展不能决定将由何种政治体系取代现有体制。处于转变区的国家并不必然沿袭西方民主化模式,而是面临着不同发展方向上的多种选择。至于最终走上哪一条道路,将取决于国家政治精英作出的历史选择。总之,经济富裕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研究民主转变问题,必须考虑其他诸多因素。

亨廷顿讨论的第二个因素是社会结构。如果一种既广泛分化又运作自如的社会结构,具有相对自治的组织(如商业、职业、宗教和民族等组织),那么这些组织就将为制约政府权力以及为建立民

主政治体制奠定基础。如果没有自治组织作中介,社会就可能会被各种形式的中央集权所统治:要么是君主专制、东方专制主义,要么是权力主义独裁或极权主义独裁。

亨廷顿强调:在所有的中介组织中,自治性的中产阶级存在与否至关重要。他赞同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观点,认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就在于它们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自治性的中产阶级。虽然第三世界的经济有所增长,但主要是依靠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的运营。当第三世界国家中产阶级的形成滞后于经济发展,就可能意味着民主化的失败。

另一个在推动民主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是市场经济的存在。尽管并非所有市场经济必定有民主政治体制与之相匹配,但确实所有的政治民主都要有市场经济参与其中。亨廷顿解释说,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要求在经济上分割权力,从而导致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因此,市场经济使中产阶级能够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用民主手段为自身谋求利益。此外,市场经济能带来经济富裕,造成更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这些都为民主奠定了基础。

亨廷顿强调的第三个因素是外部环境。他认为,民主是播化而不是发展的结果,这主要是由英美通过移民、殖民统治、战争胜利乃至一定程度的直接掠夺所产生的影响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进军到哪儿,那里的民主运动就开始了。而苏联军队所到之处,则共产主义随至。从这一点来看,民主在全球范围内的盛衰决定于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的盛衰。在19世纪,民主的广泛传播与英国强权统治下的和平密切相关;二战后的民主扩展则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势力的增长。反过来说,20世纪70年代,东亚和拉美的民主衰落,正是美国在这些地区影响力减弱的反映。亨廷顿(1984, 206页)指出,美国政府这种对于民主化的影响,“既可以直接从美国对其他社会政治进程的影响中感受到,也可间接从它成功地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被竞相仿效的民主模式这一事实中感受到。”

亨廷顿还注意到,在一些地区,地方性趋势仍会存在。总体来

说,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拉美国家开始走向民主,但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趋向专制,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民主化进程再次开始。这种地区性演变可能是经济发展、周边国家影响和美国政府推波助澜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亨廷顿讨论的第四个因素是文化背景。通过考察宗教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亨廷顿发现新教与民主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天主教对民主增长有缓和与延滞的作用;印度教和神道教文化不会妨碍民主化,而伊斯兰教、儒教和佛教则易走向专制政体。

如何解释这些差异呢?亨廷顿将宗教文化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完满型宗教文化,在这种宗教文化中,中间结果和最后结果紧密联系,因而对民主不利,如伊斯兰教主张宗教与政治(或说精神与世俗)合一,政治参与历来就是一个外来概念;另一种是工具型宗教文化,其特点是将中间结果与最后结果分开,例如印度教传统主张宽容地对待各集团间的差异和冲突,认可和解的合法性,这样就不会为民主构成任何障碍。

总之,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提条件包括经济富裕、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自治性中产阶级和市场经济);来自现存周边对等民主国家的较大社会影响;以及包容差异、赞许和解的文化。他认为在这些因素中,除市场经济对于产生此种发展不可或缺之外,其他各个前提条件都不属必要。民主政体的出现,需要上述前提条件的某种结合,但结合的性质因具体情况而有很大差异。

#### • 民主化进程

除了关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亨廷顿还研究了民主化得以实现的政治进程。他讨论了三种民主化模式。第一种是总结英国和瑞典情况得出的“线性模式”。在英国,民主化过程持续了一个世纪,经历了从公民权到政治权,再到逐步建立议会至上和内阁政府,最后渐次扩展到普选权;在瑞典,则走了这样一条道路:从国家统一,到无休止的政治斗争,自觉决定采纳民主法规,最后完全习惯于这些法规的实施。

第二种民主化模式是专制和民主交替的循环模式。这种模式在拉美国家最为常见：主要政治精英通常会承认民主形式的合法性，也不时地举行大选，但最终掌权的政府很少是真正经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往往是军事干涉大选的产物。激进党派赢得选举，经济陷于混乱（如高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出现大规模政治动乱，这些时候都会引发军事干涉。一旦军人集团接管政权，它都会宣称不久即还政于民，有时确实也会这样做，但只限于在迫于群众压力或苦于无力治理的时候。亨廷顿指出，在这样一种军人治国的情况下，无论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都不能被有效地确立。一个国家一旦进入这种循环模式，就很难打破这一军事独裁与文职民主交替出现的怪圈。

第三种民主化模式是辩证模式：发展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通过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专制体制不断施加压力。在某个关头，会出现“城市突破”——现存专制体制被民主体制取代。然而这一新兴的中产阶级有时发现自己很难牢固掌权，于是民主体制往往被颠覆，专制体制卷土重来。然而在今后适当时候，专制体制会瓦解，代之以较为持久的民主体制。这一模式刻画了德国、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等国的经历。

除了讨论这三种模式，亨廷顿还表述了民主发展的最佳序列。他觉得可取的整个过程如下：

- (1) 规定国体；
- (2) 建立有效的政治体制；
- (3) 扩大政治参与。

亨廷顿指出，在有效的政治体制（如选举制和政党制度）确立以后，政治参与必须在这个演变序列的最后发生。如果在这一序列中，扩大参与过早出现，就会导致政局动荡和政治暴力。他为此进一步断言，持久性的民主体制很少是靠群众运动确立起来的，而是经由像自下而上一样多的从上而下的途径。正是仅当政治精英权衡自身利益得失之后，决意彼此谈判并达成妥协，此时民主体制才

得以实现。

在民主的杰出人物起源问题上,亨廷顿反对巴林顿·穆尔(1966)关于民主可以通过血腥的暴力革命来开创的观点。尽管所有的游击起义分子和革命党都号称将实行民主,但他们一旦通过暴力取得政权,马上就露出专制的真面目,其政治上的高压,甚至比他们所推翻的旧统治更有过之。亨廷顿强调,民主不是对现存统治的革命颠覆,而是一个具有最少暴力的逐步演变过程的结果。

在探讨民主化的前提和过程之后,亨廷顿应用这些论据具体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的前景。鉴于拉丁美洲现行社会制度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以往的民主经历,社会多元结构,以及精英们效仿欧洲和北美模式的愿望,他对拉美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寄予厚望。但对东亚民主化前景,他不那么乐观。尽管东亚国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的发展,也受到许多来自美国的影响,但它们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民主规范的脆弱性都阻碍其民主化进程。亨廷顿指出,东亚国家提出了经济或文化是否对民主化具有更大影响力的问题。至于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大多数非洲国家,由于它们的宗教、贫困、政治的暴力性等原因,其民主化前景更为黯淡。东欧的民主化可能性实际上不存在。亨廷顿认为,苏联的存在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压倒一切的障碍,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仅由内部原因就实现民主化。

总之,亨廷顿认为,在民主化问题上,美国可以以下述方式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推动经济发展,鼓励市场经济,培育强有力的中产阶级,在世界事务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促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步入朝向民主化的转变区。

### 新现代化理论的威力

阿尔蒙德(Almond, 1987, 454页)认为,“检验任何一种理论研究的标准是它的能产性。它是否为观察客观对象提供了新方法?它

是否增进了我们的知识并使之更为可靠?”按照阿尔蒙德的判据,我们可以看出,新现代化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现代化研究相对粗疏的分析。在摒除传统现代化研究一些不可靠的预设——如把现代化描述为不可逆转的、前进的和漫长的美国式过程,把传统视为现代化的障碍——之后,新现代化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较旧现代化研究更为详实的理论分析。

- 还传统本来面目

在诸如企业家庭主义、路障理论、伊斯兰复兴运动等新概念的指导下,新现代化研究更切近地考察了“传统是什么?”“传统如何与西方势力相互影响?”“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起何种作用?”这样一些问题。传统现代化研究注重传统的负面作用,而新现代化研究则力图揭示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黄绍伦阐释家族式管理、裙带关系和家庭所有制形式等对香港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戴维斯指出日本工业界努力通过思想教育向员工灌输传统宗教的职业道德;巴努阿兹兹分析了什叶派及其乌拉玛在鼓动伊朗革命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亨廷顿则就宗教对民主化的独特影响进行了研究。

- 还历史本来面目

新现代化研究还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论。它们不是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给出类型划分,而是将历史引入研究的视野,着力于研究每个案例的独特性。因而它们是用理论去分析个案,而不是用一些案例去图解理论。比如,黄绍伦指出,他就香港家庭主义得出的结论,并不必然适用于其他地区,如中国大陆、韩国和日本;戴维斯通过强调民间宗教和巫术可以继续存在并与现代工业社会合作,重写日本宗教史;巴努阿兹兹将研究重点放在考察社会、政治、宗教诸因素在1979年的历史性整合如何引发颇具特色的伊朗革命;亨廷顿则注重研究民主化的历史行程和后果的重要理论意义。

- 趋向于更详实的分析

新现代化研究力图避免简单地下结论,或只提供单变量分析,

而注重多元化体制(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综合分析,对发展的多种道路,以及内外部因素的相互影响的研究。比如黄绍伦的研究中引入对香港殖民统治因素的考察,分析东亚国家现代化的多种可能模式;戴维斯的新路障理论比旧的障碍赛跑理论更详实,原因在于他考虑了日本历史中的传统宗教、克利斯玛式领导人,扩张和军国主义等守旧因素的作用;巴努阿兹兹研究伊朗革命得以发生的社会结构基础,文化分裂和宗教因素。亨廷顿则对一系列因素——富裕、社会结构、外部环境、文化背景、政治进程和演变序列——进行详尽分析,旨在探究是否会有更多的国家变得愈益民主。

从本章的讨论可以看到,现代化理论已经摆脱60年代的理论危机,有望在90年代保持充满活力,硕果累累的发展势头。不仅如此,很有可能如波特斯(1986, 224页)所指出的,现代化研究“将会作为克服所谓(依附与世界体系理论)的排它性外部关注的一帖良药,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

(刘晓峰、吴荣荃 译,仲夏 校)

富永健一

## “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

——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

### 一、60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出现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著作……这一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究竟是以什么为主题,是说明什么的理论呢?众所周知,在世界史上,由西欧最先开始的近代化,亦即与西方史上的古代和中世纪相对而言的现代化,对今天来说已成过去。现代化的开端可追溯到相继出现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即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这是一种文化史的思考方法。这一时期的西欧,其先进部分在政治和经济上处在绝对王权的统治之下,其后进部分则处在封建土地阶级的贵族统治之下。由于这一时期自伽利略到牛顿的“科学革命”尚未开始,从工业化的角度看,这种思考方法似乎过早地确定了现代化的起点。“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学派所列举的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从市民革命开始的脱离王权专制的政治变革,即民主

---

\* 选自日本《思想》1985年4月号。

化;另一是由产业革命开始的使用非生物动力资源和高效率工具的这种技术和经济的变革,即工业化。众所周知,市民革命最早出现于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革命和光荣革命,如果把美国的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作为市民革命的高潮,那么,18世纪后半叶就是现代化的中心时期,这与英国的工业革命又是一致的。因此,“现代化理论”所着眼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产生于西方的以18世纪为高峰的、从17世纪开始到19世纪结束的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部剧烈的社会变革。

对上述观点似乎没有特别的异议,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来说,现代化过程已经成了历史。但是,以美国为中心舞台的“现代化理论”之类的东西,在60年代为什么又成为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关注的焦点了呢?很清楚,人们关心的决不是史学课题,而是由对现在事件的兴趣所产生的理论建构。我们决不能认为,“现代化理论”之所以在60年代成了美国关心的焦点,仅仅因为赋予历史现象以现实意义是一种特殊的国民兴趣,这里还有更多的原因。

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一书提供了对这一问题饶有兴味的启发性分析。简单地说,美国作为“最初的新国家,在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中起着英国在17、18世纪中所起的相同作用”(帕森斯)。从世界史角度把现代化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欧洲的西北角(英国、法国、荷兰)为主导,其代表是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第二阶段以欧洲东北角(德国)的急速工业化为主导,由于民主化不平衡的落后状态,这一阶段产生了纳粹的大动乱;第三阶段的主导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民主革命与产业革命结合得更为紧密。

借用帕森斯的三阶段图式,加上以下说明,无疑是有意义的。若把现代化的主要指标归结为工业化和民主化,那么就不能说研究现代化的理论是在60年代的美国首先开始的,可以说起源于启蒙思想的社会科学的产生本身就是“现代化理论”的最初形态。从洛克的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开始,经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和孔多塞的

人类精神进步史观,到圣西门、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工业社会理论这一系列的理论体系,可以说都是与帕森斯所说的在“西北欧”(英国和法国)进行的第一阶段的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化理论”——只是当时没有这种提法而已。而滕尼斯将亚当·斯密开始的古典经济学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结合起来,根据马克思社会学的商品分析所建立起来的“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发展图式,以及被马克斯·韦伯归结为合理化和科层制化的现代社会认识论,就是与帕森斯所说的波及“东北欧”(德国)的第二阶段现代化相适应的又一“现代化理论”。今天在固有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则是以战后成为世界最先进国家的美国为主导,与远远超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第三阶段现代化相适应而产生的理论。

以上考察使我们看到,进入现代化范围的,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西方(西欧及其延伸),已把像日本这样的非西方但进入了工业社会的国家,甚至把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了进去。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是建立在现代化的普遍意义的基础之上的。

问题在于,从西方社会抽象出来的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扩展运用于非西方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将是以下考察的主题。

## 二、从作为历史概念的现代化到作为普遍概念的现代化

滕尼斯在《村社与社会》一书中关于法理社会的考察对象,是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社会。他对于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过渡这一巨大社会变动作了理论上的抽象,并以一般命题的形式进行了论述。但是,他的理论无非是把从西欧历史事件中抽象出来的经验加以一般化。必须说明,滕尼斯本人只考虑了西欧社会,而并没有注意具有与西欧不同的初始条件的其他社会。因此,滕尼斯的“理论”实际上只停留在对18、19世纪西欧所发生的事件的描述上。

与滕尼斯不同,马克斯·韦伯则很重视西欧以外的社会,他吸收了东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写成了《儒教和道教》以及《印度教和佛教》。这些著作成为韦伯庞大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一部分,其主题是说明“给行动以实践的动力”的宗教伦理是如何决定人的社会行动,特别是作为其形态之一的经济行动的。韦伯认为,经济行动的最合理化形态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由合理化的法、合理化的统治方式(现代科层制)、合理化的知识(科学、技术)和合理化的艺术以及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诸要素组成的。因此,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以及法社会学和权威社会学仍然处在第二阶段的“现代化理论”的地位上。当然,以这一思想为出发点的韦伯“现代化理论”的内容,无疑要比滕尼斯广泛得多。正因如此,韦伯经常在对西方社会进行比较时注意东方社会,并反复尝试将他从西方社会的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有关社会各方面的合理命题运用于与西方具有不同的初始条件的东方社会。但是,韦伯从这些尝试中所得出的结论,都归结为一系列“只有西方……”的命题。他说,“我们今天承认的达到‘普遍适当的’发展阶段的‘科学’,只存在于西方”。就是说,在韦伯看来,现代化的论题是不可能一般化到非西方世界的,是西方所特有的。实际上正如韦伯所说的那样,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没有一个国家是自发产生现代的科学技术、专业人员以及资本主义和科层制组织的。日本也不可能自发产生,日本是通过文化传播而成功地接受了现代文化的。但在韦伯时代,日本正处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受西方殖民统治的国家相继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一些推动现代化的杰出人物,他们以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为自己的目标。因此,在第三阶段的“现代化理论”中,即使在分析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时必须以先进国家的历史为对象,已经不能像滕尼斯和韦伯那样,把现代化概念作为固定于欧洲的历史概念来考虑,而应该建立一个可以适用于一切社

会的普遍概念。当然,现实中的许多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则又作别论。因此,可以认为,“现代化理论”的课题在于阐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得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条件,并就此产生的社会变动的性质作出提示。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与上述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现代化理论的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

为了考察这一时期社会学上的“现代化理论”的思考方法,我们引用具有代表性的 W. 穆尔和 M. J. 列维的著作来说明。穆尔认为,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像西方先进国家那样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因此,他把工业化作为这一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始发原因;反之,也可以说现代化是工业化的最终结果。穆尔把工业化得以产生的条件归纳为四个方面:(1)在价值观念上,由亲属优先(任人唯亲)的思想方法过渡到业绩优先(任人唯贤)的思想方法,以及建立在国粹主义基础上的国民统一;(2)在制度上,建立能够为经济生产而动员土地和资本的可转让的所有制,以及使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劳动市场制度和促进流通的商品交换系统;(3)在组织上,建立专业化、金字塔式统制的科层制组织和得当的国家财政组织;(4)在个人的动机上,培养有创造精神的个性、业绩主义志向、向上的积极性以及对教育的渴求和活动热情。穆尔还从经济组织、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三个方面列举了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现象或后果,即现代社会的特点:(1)在经济组织方面,具有高水平的技术和受过高等训练的专家,广阔的市场和相互依存的组织结构;(2)在人口结构方面,首先是由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死亡率降低所引起的人口爆炸,继而是随着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普及了家庭计划,实行人口控制、过渡到了低出生—低死亡—老龄型的人口结构;(3)最后,在社会结构方面,其特点是亲属群体和家庭的功能的缩小和解体,个人主义化的进一步加强,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控制的减弱等。

列维也分析了现代化的伴随现象和结果。他比较了“现代化社

会”与“非现代化社会”在社会结构方面的特点,并把两者的差别归结为以下八个方面:(1)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教育组织等诸单位的专业化程度高,而非现代化社会的专业化程度则比较低;(2)在现代化社会,由于专业化程度比较高,诸单位是相互依存的,功能是非自足的,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亲属群体和近邻共同体的自足性比较强,缺少功能的分化;(3)在现代化社会,伦理具有普遍主义性质,而在非现代化社会,由于家庭、亲属的社会关系比较密切,伦理具有个别的性质;(4)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是集权但不是专制,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如同封建制一样,即使在权力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其性质也仍然是专制的;(5)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和感情中立,而非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传统的、个别的、功能无限和具有感情色彩的;(6)现代化社会有发达的交换媒介和市场,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交换媒介和市场尚未发展起来;(7)现代化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科层制组织,而在非现代化社会,即使有科层制组织也是建立在个别的社会关系之上的;(8)现代化社会的家庭是向小家庭发展,其功能也正在缩小,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家庭结构是多样化的,家庭功能也是多重的。

穆尔和列维关于产业化、现代化的伴随现象和结果的概念化,仍然没有超出“产生于西方先进国家”这一论点,但它们是在为更普遍化的“现代化理论”鸣锣开道。也就是说,如果能对这一命题体系加以适当的完善,就为正在推行现代化政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不久的将来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功提供了预测的依据。因此,“现代化理论”能够成为普遍可行的分析工具。

如果某一国家对其中的任一条件都不能予以满足,那么就可以得知,这一国家连踏上现代化的起跑线都是很困难的。如果某一国家满足了其中的某些条件,但尚未满足的条件还有很多,那么就可以预料,这一国家的现代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但在中途很可能要遇到“中断”。现代化的“中断”(breakdowns)一词,自从艾森

斯塔德在他的论文题目中用过以后,经常被人提起,其意义指的是如在20世纪前半叶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所见到的那样,一度开始的现代化改革停留在初期阶段而未能持续发展,甚至出现倒退现象。

艾森斯塔德关于现代化中断的分析,虽然缺乏穆尔四条件图式那样广阔的视野,但是,它为以分析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先进国家的社会变动为中心内容的以往的“现代化理论”提示了将现代化概念普遍化的方向。因此,70年代以后,“现代化理论”分解为两支,一支是继承60年代的理论,试图从构筑普遍理论的观点出发研究现代化;一支是与关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的看法相汇合,试图对“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并提出新的理论。

### 三、先进国家的现代化与后进国家的现代化

马克思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本论》第1版序言)美国经济史学家格尔申克隆提出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后进国家并不是步先进国家后尘的命题。格尔申克隆援用凡勃伦的“借用技术”这一概念,他认为,后进国家无须自己建立技术,而可以利用“借用技术”;因此,后进国家应当有可能比先进国家更快速地实现工业化并赶上先进国家。许多后进国家之所以未能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是因为存在着缺少资源或缺少实现工业化的必要的制度条件等障碍,而且不能克服这些障碍。由于不能克服这些障碍,后进国家就有必要走与先进国家不同的道路。例如,后进国家的劳动力相当丰富,但实际上这些国家为达到初步产业化所最必需的熟练劳动力都是很少的,这成了后进国家工业化的蜀道。如果后进国家能够利用“借用技术”,即成功地大规模引进先进国家的最尖端、最有效的技术,那么,让先进国家的长处在本国再生,就可以克服工业化的障碍。因为技术是劳动的节约,具有很大的影响力。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以

钢铁业为中心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就是其中一例。

格尔申克隆的理论,虽然在经济史学家中广为知晓,但现代化论者并未将这一思想吸收到他们的理论中去。我认为,后发展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与先进国家是不同的,这一着眼点是“现代化理论”在考察西方先进国家之外的国家的现代化时所必须大力研究的,只是格尔申克隆的理论的说明对象,是在19世纪的欧洲相对落后的“后进国家”德国,这对于不同于经济史理论的、对社会结构和文化条件最感兴趣的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来说,是必须注意的。德国是欧洲国家,从欧洲文明这一大范围来说,从英国开始的工业文明对德国来说并非“外来文明”。而对包括日本的非西方后发展国家来说,工业文明已经是“异质”的东西,因此,工业化和现代化首先是以“西方化”开始的,这一点与欧洲的后进国家不同。

进入70年代以后,通过作为与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的对应物出现的依附理论及与其迥异但在理论上有关联的世界体系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认为发展中国家今日的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与先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是根本不同的主张。这里以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为例,对他们所提出的论题作若干探讨。

弗兰克认为,以往的“现代化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把发展中国家的过去和现在的状态作为相当于先进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来认识的这种理论方法;还在于认为现在的先进国家都曾经有过现在的发展中国家的同样状态。弗兰克认为这种理论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按照弗兰克的理解,现在的先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这一整体的构成要素而存在着。弗兰克把发展中国家对先进国家的依附和并存关系类比为外围与中心的关系。

弗兰克的先进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为一体,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与出身于匈牙利的杰出的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在其大作《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提出的世界体系概念有某

些合拍的地方。帕森斯提出了“整体”社会的概念,他认为现代“国民国家”形成以后,事实上已经基本满足了“国民国家”作为整体社会的条件,并承认了通常以国家为单位的比较社会学分析。与此相反,沃勒斯坦第一次明确地宣称,近代以后的自足系统只有“现代世界体系”一个,主权国家和国民社会不是自足的社会系统。这就阐明了一个概念,即现代资本主义并不是作为以国民经济为单位的自主经济形成的,而是以最初的贸易和国际分工为前提形成的。

在前两节中,我们探索了自60年代到7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代化理论”的内在困难最终在于通过现代化概念的一般化,把非西方后发展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在面向现代化之际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西方先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相提并论。我们看到,格尔申克隆的理论为解决“现代化理论”的难点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格尔申克隆的理论,是以作为工业化的后进国家的德国通过迅速工业化赶上了先进国家的事例为材料的、从后进国家向先进国家过渡的理论,而弗兰克的理论,则是试图以现在仍停留在中等水平的拉丁美洲诸国的事例为材料、阐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脱离低发展状态的理论。弗兰克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等同于先进国家曾经面临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只要不摆脱中心和外围关系的束缚,就永远达不到先进国家的水平。沃勒斯坦的理论原则上也从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中得出了相同结论。这些理论起初是为了论证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现代化的命题而构想出来的。事实上,展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可能性的理论并未建立。

那么,假定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的立场出发,找到了说明例如日本的工业化、现代化得以成功的原因,情况又会如何呢?要论述日本现代化的命题,像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那样,只着眼于与外部关系的方式是不够的,必须有关于日本国内的各种社会状况的系统论述。

#### 四、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条件

在人类的发展阶段史上,由狩猎采集阶段向定居农耕阶段过渡之际的农业革命,是在相互独立的世界诸文明中心独立地进行的。但是,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科学革命、市民革命和产业革命(以下将三者合称为现代化革命),用韦伯的话来说,是“只在西方”进行的。也就是说,无论现代科学、现代产业还是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只要是与现代相关联的,一切都产生于西方,一提到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其意即指在一定的时差之后,通过文化传播而接受这些现代化革命的产物。现代科学、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究竟为什么“只在西方”产生而东方不能自发产生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此不可能作出回答。

现代化革命是产生于西方的事件,对“现代化理论”的考察当然也是由西方人首先开始的,只要现代化还是“属于西方人的、由西方人进行的并为西方人服务的事业”,考察“现代化理论”的势必只能是西方人。但是,一旦通过文化传播使西方现代文明成为与西方以外的人们所共有,这个时候,“现代化理论”便同时成了非西方人的关心对象。如果采用第一节中“现代化理论”三阶段的划分,那么,在前两个阶段,日本还只处在工业化之前的阶段(第一阶段)和现代化的初期阶段(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日本人尚未对“现代化理论”发生兴趣。到了第三阶段,日本正值高度经济成长的最盛期,对日本人来说,现代化成了前所未有的关心课题,日本开始了对“现代化理论”的真正关心。但是不难感到,此时现代化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刚刚传入日本,它看待“现代化理论”的方法同现代化作为自身产生过程的西方是不同的。对于像日本这样的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人们来说,接受和适应这种异质的文化是现代化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这一问题是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所没有的。

人们重复熟识的东西是不需特别的动机的,但是,有意从外部

接纳异质的东西就必须有相应的动机。文化传播并非水往低处流的自然现象,而是由具有意志的人所进行的一种行动,没有足够使大多数人理解的动机是不可能进行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在接受外来物,遇到诸如改变制度、文化、政治、经济等一切原来的东西的国民决策时,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内部对立。也就是说,试图推动现代化的领导者必须使国民理解对自己所熟悉的传统的东西进行省察的必要性,赋予国民以动机,并且还必须有能力和处理可能在此时产生的内部对立。所有这些,使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比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要困难得多。

以下想把这些情况整理为命题的形式,并将非西方后发展社会产生出现代化的条件定型化。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定义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条件,无非就是使现代化得以突破西方—非西方界限的条件定型化。现在还不知道今后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这一界限,只是应当清楚,在考察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理论的时候,能够为这种理论提供经验材料的,目前只有一个,这就是日本。因此,在以下的考察中,我试图作这样一种努力,即向日本寻找直接的例证素材,但并非仅仅只研究日本,而是在展望比西方较迟开始现代化过程的非西方社会——更直接的是把在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与日本相对接近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韩国等作为理论的适用对象来考虑——的同时,尽可能探求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

### **第一命题:输入工业文明而摆脱传统主义**

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通过与本国文明完全异质的、作为外来文明的西方文明的输入,使脱离本国传统主义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支持。这一动机来自对本国的传统社会的极其强烈的危机意识。后发展国之所以成为后发展国,是因为其内部不可能自发产生现代化的原动力——科学革命(现代科学和技术)、市民革命(民主政治)、产业革命(现代产业和资本主

义)。因此,后发展国的现代化必须首先输入这种原动力,否则,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产生。然而这一输入过程就是对本国传统社会的破坏过程,传统社会一旦遭到破坏,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因此,即使勇于作出这样的牺牲,如果没有非破坏传统社会不可的强烈的革新动机,这一过程也不会开始。众所周知,在日本,维新的动机源于幕府、诸藩的财政困难和国防上的危机意识,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财政困难不解决,国防也就不可能强化。

### **第二命题:由推进现代化的杰出人物所承担的工业文明的输入和稳定**

由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而只能由推进现代化的杰出人物主持中央政府,现代化只能“自上而下”地进行。

在日本,初期的明治政府存在着以大久保利通为代表的现代派与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传统派的对立。现代派于1871年参加了岩仓使节团,对欧美先进国家进行为期一年零九个月的考察。在先进国家的国际动向中观察日本,从推行现代化政策的角度考察日本的内政。传统派没有参加使节团而留在国内,代表了企图恢复传统社会的怀有不满的士族的意见。

明治政府在危机中贯彻防止国内分裂、培植工业的方针,对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与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工业化未能进展的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形成鲜明的对照。清朝灭亡后的中国,虽然第一命题得以满足,但第二命题未能得到满足,这导致日本与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决定性分离。

### **第三命题:出现使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承担者**

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第三个条件,是出现学会了外来的工业技术并将作为外来文明的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承担者;再

加上掌握现代技术的工程师；另外还必须具备具有一定资本、一定事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实业家、掌握熟练技术的人；在市场上以工业产品的购买者身份出现的具有一定购买力的消费者，以及对企业家活动的广泛的支持者等各个阶层的人物。这些条件可以被视为趋于工业化的内在成熟。

对于作为现代化一环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化——来说，如果只有政府对工业的援助而国民中却缺乏大量的工业活动的承担者，工业化也不可能开始。当然，政府也可以成为工业化的直接承担者，但这充其量只能是设置官办工厂或将其下放于民间。官办工厂的作用仅仅是过渡，而且多亏损。日本的工业化在短期内得以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从旧武士、农民、市民等各个阶层中毫无例外地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实业家。

#### **第四命题：现代阵营与传统阵营之间对立的消除**

现代阵营与传统阵营这种二重结构的对立也存在于德国和美国这样的欧美先进国家，但是在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尤其不可避免。因为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不得不采取输入外来文明的形式，而输入外来文明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国粹主义的反感。只要这种对立的二重结构不消除，就不可能实现持续而稳定的现代化。

在日本，现代派与传统派的对立从幕末维新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昭和前期（1945年以前）。现代派的领袖大多成为暴力行动的对象（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大久保利通都遭暗杀）就是这种对立的结果。现代派，即西方倾向派，尤其是亲英美派，大多存在于大都市、大企业和知识分子中间。而传统派，也即国粹倾向派、反西方主义派，大多存在于农村、私营企业和非知识分子阶层。传统派后来形成了昭和前期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共鸣盘。特别是“寄生地主制”下的农民贫困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最大的社会问题：高额的地租，狭小的耕地和手工劳动，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贫困的佃农得不到工业化的一点好处，农村成了反工业主义、反西方主义

和反知识主义的温床。来源于贫困农村的陆军,充当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支柱。日本这种现代阵营与传统阵营的二重结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始终未能消除,最终导致日本的全面战争以及战争的失败。战争的失败及战后的改革,终于消除了这种二重结构。很明显,战后日本的高度经济增长以及以此为现代化的成功,在社会结构意义上完全是战败和战后改革的产物。对日本来说,这真是侥幸的历史偶然。但是,对非西方后发展社会来说,这却是一个普遍的结构事实。因此,对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理论来说,最重要的中心问题是第四命题和第三命题,即二重结构不消除,现代化就不可能走上稳定的轨道;现代化必须有趋于工业化的内在成熟条件。以日本以外的最近事件为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伊朗的霍梅尼革命都是由于没有趋于现代化的内在成熟情况下的现代化促进派与国粹派的对立,都以权力斗争为特征,如果不克服这种斗争,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成功。

(严立贤 译)

J. 古斯费尔德

## 传统与现代性： 社会变迁研究中误置的两极\*

“传统”与“现代性”广泛地用于表达社会变迁线性理论中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这种变迁模式中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既定的制度和价值观、传统的内容是变迁的阻碍物 and 现代化的障碍。我们这一章关注的正是这种假设。我们希望引起对于传统形式和新的制度、价值观之间关系的多种变化的关注，这些变化的可能性或者被社会变迁的“传统—现代”两极分化模式加以否认，或者被之隐藏起来。我们想进一步探求新兴国家政治领域中传统和现代性作为明确的意识形态运作的应用。我们的材料大多从现代印度获得，虽然我们同时也考虑其他的亚洲和非洲国家。

社会科学家把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概念归入国家生活的许多领域。现在存在着通讯发展、教育发展和更广泛应用的政治发展的讨论。

与此同时，发展的概念已变得更加概括化。对新兴国家大量的专门研究使我们意识到变迁和持续性在结果和可能性方面的多种多样。这导致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新、旧两方面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的更为批判性的评价。传统与变革必然

---

\* 选自 E. 爱兹奥尼主编的《社会变迁》一书。

处于互相冲突状态的新颖性开始看上去完全是抽象的和不真实的。

在研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韦伯的与理性经济行为相对的传统概念是对许多具体情况现实性的极大扭曲。在研究政治选择性和可能性的过程中,我们敏感地认识到非线性理论的更正效果。它们在新生国家中使盎格鲁——美国政治形式成为或者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政治过程的必然的最高结果。

在探求传统与现代性的概念中我们将讨论有关它们二者之间冲突的一些假定。这些假定与最近的研究是不一致的。最近的研究揭示了广大范围的可能的选择,展示出“传统”是一种比通常所意识到的更为特定、更为模糊的现象。

我们将审视这种理论的一些假定,指出其应用的困难……

### 谬误:传统文明是规范和价值观的统一体

在详细阐明城市中心的“大传统”与乡村社区的“小传统”之间的区别和相互作用时,人类学家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直被认为是始终如一的均质的规则和价值观的多样化和选择性的存在上去。我们一定要避免认为成文的、理性化的文化是共同的信仰和行为模式的唯一形式。(但是)甚至在一种传统的文字形式内,不一致性和对立也是显而易见的;印度的哲学和宗教教育是由对生活的多种多样的取向所构成的。例如,ashram 主义认为善的生活就是人们在生活的不同阶段追求不同的价值观。

这种多样性的重要性在于它为广泛的行为选择模式提供了合法化原则。这一点在印度最近展开的关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价值的讨论中显得十分明显。普通宗教的行为和圣典的教育都不缺乏物质动机的道德基础,也不缺乏对于财富的指导性的、理性追求的道德基础。每个人都不必在任何时候都是圣人。

### 谬误：传统社会是相似社会结构

与其他社会一样，印度在等级制度内外都已将不同集团的不同生活方式制度化。这种劳动分工使得特定社区和阶层作为各种传统的承受者成为可能，这些传统不同于主流，但能使有价值的社会功能运作起来。当韦伯说起“新教的精神”时，带有这种精神的特定部分绝不是所有典型的新教集团。外国人和贱民的社会角色经常被认为是经济增长、革新和企业行为的来源。欧洲的犹太人、西非的穆斯林、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和东非的东印度人都是其典型例子，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能参与非人性化的市场行为，远离本地人口的地位性消费要求。在印度，帕西人和吉恩人都是经济改革和大范围工业增长的强有力的承载者。

关于印度传统的反经济特性的归纳没有认识到某些特定集团的供应，这些集团在道义上能够接受经济增长和变化的原理。在印度教等级制度内部，贱民能够担任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各种被禁止的工作。其他等级则发展了商业和贸易的传统，这在印度教“传统”中虽然是不光彩的，但是对 Marwari the Cheftiar and the Baniya 是允许的，甚至是必要的。正是这种允许他们接受和实施经济改革的现存结构使他们获得了合法性。

### 谬误：新变迁取代旧传统

新旧文化没有冲突甚至相互适应而存在的能力是社会变迁的常有现象，新的并不必然代替旧的。对于新产品、新宗教、新的决策模式的接受并不一定会导致旧形式的消失。新形式也许只是增加选择的范围。巫术和医学可能并列存在，并被同一类人有选择地加以应用。

在宗教运用和信仰的接受上人们长期注意到不一致因素的调和性。在说西班牙语的国家中异教和基督教经常可以达到相互容

忍,并形成新的仪式主义形式。在印度当它们相互接触时,城市的“大传统”绝不会将乡村“小传统”推置一边。相互作用导致融合和相互渗透。我们已经逐渐地意识到现代化进程和传统形式的结果经常是一种混合物,这种混合物源于一定程度的相互支持,而不是对立双方的相互碰撞。

### 谬误:传统与现代形态经常处于相互冲突状态

将“传统社会”作为一种脱离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类型抽象出来,这种做法忽略了特定传统在内容上的多样化,这些特定传统影响着对现代形式的接受、排斥和融合。与西方社会不同,日本的“封建主义”和工业发展一直相互融合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在日本,对于天皇和家庭的责任、集体主义倾向以及垂直隶属性都是支持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因素,同时也是抑制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因素。传统结构可以提供技能,传统价值观可以提供合法性来源,这种合法性能被用来追求新的目标和新的过程。

人类学家在阐述有选择性文化变迁的问题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一种传统文化可以比另一种更加明确地拥有与现代化一致的价值观;另一种则可以比另一种更加固执地坚持老的方式。奥腾伯格(Dttenberg)在研究西非部落时发现他们在尼日利亚时比在其他主要的尼日利亚部落能更大程度地接受和利用英国文化。伊博的志愿者协会系统,与他们的个人主义和成就主义价值互相结合,使他们能很好地适应英国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机遇和要求。相比之下,东非的马赛人是抵御文化变迁的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他们不遗余力地支持现存的方式。

### 谬误:传统与现代是相互排斥的系统

既定的制度或文化系统包含着许多方面或维度。每一方面对

施加于社会的各种新的影响力反应都会不同。传统与现代性经常相互加强,而不是对立冲突。

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扩展的家庭体系和等级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阻碍物。但是现在我们承认,这种关系是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由于没能在其在劳动分工和等级流动中的角色(一方面)与其趋于限制资本积累的地位要求(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取得成功的平衡,等级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被夸大了。各等级为具有流动性、为提高物质和仪式地位所做的努力,对于印度生活来讲绝不是新鲜的。地区性等级范围的扩大、等级间联系的发展和各等级在政治上的重要性都不是经济发展的阻碍物。他们在局部性的、传统的、忠诚的基础上能够使信任、职业倡导和训练以及政治影响成为可能。这就把信任和责任因素引进了经济情境,否则在这种经济情境中怀疑和不信任是未被“纯粹”经济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之间的经常性规则。

有关前工业时代和原始社会时期产业对家庭生活影响的研究同样表明了工业主义与扩大的家庭形式的相容性。在印度经济发展过程中,塔塔斯、伯拉斯和达尔曼斯庞大的扩展了的家庭都是产生于其中并得到传统家庭单位支持的主要工业组织的最为典型的例证。伯纳对于马扎斯企业的研究在小商业中间提供了扩大家庭作为储蓄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的额外资料。

在局部性忠诚的形式下和在合法性权威原则下的传统价值观的角色对于理解一个民族的团结的、稳定的政体产生的可能性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目前的印度政治运作过程就是用等级、村庄和宗教社区作为基本的局部性集团,通过这些集团将个人和家庭吸收入现代政治体制。宗族和宗派的主要纽带正处于融入国家性参与性政治的中心结构的过程中。

印度大部分现代政治“团体”本身产生于先前存在的等级、宗教、地区和经济组织之间的斗争。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印度政治中所出现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冲突都得到了不同等级团体之间为争

夺社会和经济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的推动和支持。

### 谬误：现代化进程削弱了传统基础

有关印度教育的讨论暗示，新旧制度和价值观也许并且经常互相融合和互相渗透。在其关于等级流动的富有影响力的论文中，斯瑞尼沃斯先生(M. N. Sevivas)认为，尽管较高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日渐“西化”，较低的或中间阶层寻求流动时，他们总是通过更加虔诚地信奉印度教、遵循佛教生活方式或梵化其行为而实现的。由独立和民主机制下的政治竞争所引进的流动性利用了更加传统的取向。

日益增长的运输、通讯、识字率和水平流动率，在促进思想传播时，也强化了“大传统”的范围和影响，使之渗透到越来越多的社区和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去。去遥远的圣地朝拜变得更加容易，它能使统一的、民族性的宗教概念获得更深的根基。等级集团现在能够在地区甚至国家的层次上形成，并得到团体生活和传媒的支持。社区发展的传播和教育机构的扩展产生了新的半城市化个体，他们所遵循的梵文传统至少和其所接受的西化影响一样完全(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事实上“小传统”的社区对于这种变迁的传统趋势比对于整个新运动更为开放。圣人和传播源于印度大传统的神圣信息和戏剧的传道者比电影更易于引起注意。

### 传统、意识形态和国家

传统并非是某种等待着自行消亡的东西，而是具有极大的伸缩性物。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它能被相当程度地改变、创造和形塑以适应当前的需求和愿望。人们是在某些合法性原则下基于目前活动而把过去的一些方面作为传统。在这种方式下，传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它作为目标或合法性基础而发挥作用的活动程序。

把对传统的关注作为一种明确的政策并非是对变迁的自动反应,而是一种它本身就是能够分析的运动。

现代化的愿望和保持传统的愿望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作为重要的运动而发挥作用。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这些愿望,作为意识形态,并不总是处于互相冲突状态之中,对于现代化的需求依赖于并常常可以在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找到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可以改变、延伸和调整,但统一的国家化的社会在其追求政治权威和经济发展的合意基础的过程中广泛地利用着传统。

许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本土传统的复活作为民族和独立运动一个阶段的现象,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已在注视其他国家以作为新价值观的基本源泉的地方。这种反应出现在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反对法国、出现在印尼知识分子反对荷兰、出现在日本知识分子反对欧洲的过程中、出现在印度知识分子独立前和独立后反对英国殖民者的过程当中。在文化取向上已经西化和欧化的印度知识分子,接受了传统印度教的复苏,以此作为反对殖民统治斗争的一个方面。不管他们对于现代化的一般承诺如何(经常反对保持民族风俗习惯的英国后塞普伊 post-Sepoy 叛乱政策),印度民族认同感的复苏部分上受到那些传统的和更接近于普通行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明确适应力的推动。甘地倡导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即使他寻求废除那个传统的许多特征。

民族主义运动在其胜利中并未得到削弱。对于新独立国家的新精英分子来说,争论的并非是征服传统,而是发现融合传统和现代化的方式。

那些认为印度精英脱离了本土文明根基的人忽略了印度教和印度家庭生活施加强大推动力作为印度生活持续方面的各种方式,即使印度已高度西化。印度知识分子几乎总是把地方语言作为母语,这种语言深深扎根于古典的梵语文学,并与扩大家庭有着深远的联系。父母之命仍然是婚姻选择的主要方式,男人娶的经常是

极为传统的女性。

独立,甚至在西方化的圈子中,也对印度传说的再现和传统的促进给予持续的支持,以此作为在一个共同文化中的民族团结的源泉。为何印度书籍或期刊中所缺少部分恰恰联系着现代思想或制度与印度圣典中的对应物?在政治民主和经济变革的热情支持者中怎么会经常发生对村庄的浪漫化和对城市的排斥呢?这种印度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经常被看作是“大传统”,而且这种印度的人民党主义在知识分子和城市化精英中经常可以发现,正如在省和农民村落中经常可以发现一样。

民族主义深切地承诺着吹响传统与现代性窘境之号角的责任。以一组持续性传统的形式来定义国家遗产的努力经常是处理精英与群众、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巨大分歧的方式。这是对与统一国家的渴望相关联的现代化过程的一种补充。一种穿过局部和初期忠诚纽带的普遍文化是国家认同感和统一的基础。没有它,以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化就缺乏将其中央权威合法化的基础……

在甘地的影响下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很明显的。甘地是传统主义者还是现代主义者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在将盛行于印度次大陆的各种改革和社会变迁的潮流分离开来方面设置了巨大的困难。的确甘地的天才在于联合不同意见,在于利用倡导社会变革和政治联盟的圣人的传统权威。他领导的独立运动为印度提供了普遍经验,这种经验是独立运动对目前的国家存在和国大党权威所提供的宝贵遗产之一。

诸如维诺巴·伯海姆(Vinoba Bhave)和爪亚哈卡什·那拉仁(Jayaprakash Narayan)这类新甘地分子的甘地主义代表着寻求一种能处理本土文化形式内部民族问题的政治制度过程中重要的意识形态发展。但是甘地的社会主义代表的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趋向融合的动机是很明显的。印度最近朝着地方自治和参与方向发展的运动既依赖于村庄社区逐渐增加的政治权力,亦依赖于再创造印度村庄民主传统的意识形态力量。在对潘查亚策·雷系统的各

种建议中(是朝着村庄阶层经济决策更大的地方权力方向发展的运动),印度政府和政治正在斟酌创造一种发展政策上的一致性,这些发展政策将得到传统的合法支持,即使这些传统是新近才发现的。

### 处于中间地位的精英

在其他方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印度新的、未西化的更加地方化的政治精英和亚精英的逐渐增长的政治权力。这些人,具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源泉,以一定方式处于西化的精英分子和印度社会群众之间,这些方式把传统的责任和风格、把等级制度和其他初级联系在更大程度上带进政治和文化领域。

政治平均主义和现代化的过程包括了传统的新意识形态的种子。印度识字率不仅促进了普及性文化内容的发展,而且导致形成了地区主义的意识形态,且高度赞扬地方语言和文化的价值。这样的运动阻碍了全印文化一致性的发展,它们既不反对现代化也不特别地反对印度。但是,它们预示了与殖民文化影响相关的民族精英的衰落。印度已接近并进入由这样一些人士指导和实施的现代化阶段,这些人的忠诚和意识形态比过去几十年更加传统化……

综上所述,将传统与现代性设置于互相对立状态的一般实践忽视了现实中它们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一面。毕竟,它成为反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否定了可以将过去作为现在与将来的一种必需的与可用的支持方式,尤其是在价值观和政治合法化领域内。

(吴薇、仲夏 译)

S. 艾森斯塔德

## 结构分化的方式、精英结构与文化观<sup>\*</sup>

理论引言：社会劳动分工、分化和精英结构

根据笔者对比较文化的研究,本文旨在进一步分析社会科学中的进化论,扩展“分化”这一概念(艾森斯塔德,1964,1968a)。

60年代,我在两点上批判了结构功能主义所采用的进化论和“分化”概念。第一点,并不是所有社会变迁都必然导致分化。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似乎相似的分化“阶段”上,制度发展可能具有不同的方向。换言之,虽然处在似乎相似的分化阶段上,但整合模式(即对分化所产生的问题的制度反应)在各社会之间可能相当不同。

因而,用当年的一些话来说就是:

整合问题总是随着新的分化层次的出现而出现,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分化”概念的主要理论涵义之所在,而且,正是因为这种涵义所提出的分析性问题,我们才不得不考查并重新评估与社会科学中进化论相关的各种问题……

某一特定社会从一种分化阶段向另一阶段的转化,依赖于该

---

\* 选自亚历山大和柯罗米主编的《分析理论和社会变迁》。

社会某些变迁过程的发展,这些变迁形成某种程度的分化,已不为以前的系统所容纳。不断增长的分化及其随后的结构突破,其发生的途径既可以是一种世俗的分化趋势,也可以是一种(或一组)突然变迁的冲击,或者两者兼有。如果在制度领域中承担战略性角色的人物,试图扩展其领域的范围和潜能,那么,他们就会推动这些趋势。在某个社会中,这些变迁能够被制度化的程度,以及被制度化的具体形式,必然依赖于以前存在的系统的基本制度轮廓和大前提,依赖于系统分化的初始水平,依赖于这个社会的主要冲突和变迁倾向。

我们不必假设:一切社会中的一切变迁都必然增加分化……

即使社会变迁增加了分化,其结局也并不必然是一种更加分化的新社会系统的成功有序的制度化。而且,在社会发展的每一层次上,对分化过程所引发问题的反应也可能采用几种不同形式中的一种。最极端的后果是,对不断增加的分化所引发的新问题,完全没有任何合适的制度解决方案……除了生物性绝种之外,其后果还可能是总体或局部的系统解组,或在另一社会的边缘半寄生性地生存,或完全沉没在另一社会中。

不太极端的反应类型是导致“退化”,即在已经坍塌的比较分化的社会系统中,一个比较不分化的系统得以制度化……大多数这种倒退式发展只是局部的,因为在新制度结构的某些部分,有些更加分化、更富有创造取向的核心可能幸存,甚至得到发展。

对不断增加的分化的另一类反应是(或许也是最多样化的一种类型)由某些结构方案(在总体上它们与相关问题一致)构成的。在这一大类中,具体制度安排的各种类型都有可能。这些不同的方案一般都具有不同的结构结果和影响。每一个方案都表示一种不同的结构,其形成的依据是不同的整合标准,其他主要社会领域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些标准。

最有趣的一种制度方案是一种相对稳定系统的发展,其中,主要制度领域的分化程度不同……在这种非均衡分化中,这类相关

社会的比较分化的单位(例如,封建系统或家族制系统中的教会)常常发展了他们自身的某种国际体系,除了在“母社会”的体系之外。

自然,在分化的不同层次上,整合标准和制度轮廓的变异并不是无限的。在主要的制度领域中,“独立”这一概念否定了这一假定:不同制度领域的几个分化层次可联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在任一领域中,分化层次必然在广泛的范围内构成其他领域某一层次分化的有效制度化的前提。但在互为前提的广泛限制之内,仍有可能出现大量的结构变异……

因此,在任何既定的分化层次上,不同制度结构的形态受主要制度领域的一般结构特征与精英(或企业家)之间互动的影晌。这些精英(或企业家)既可能是这个社会某些制度领域中的精英,也可能是该社会所支配的某些社会中的精英,甚至可能是与该社会具有某种联系的其他社会中的精英。

这种互动在具体成分上的变化有助于解释:在任一既定的分化层次上有可能制度化的大量(但并非无限)的结构和整合形态。尽管从主要的制度和符号领域的分化来看,不同社会可达到大体相近的进化阶段,但是,每一进化阶段上发展的具体制度轮廓,这种制度化的可能后果,如进一步的发展、解体、倒退或停滞,在不同社会可能完全不同(艾森斯塔德,1968a)。

但是,我以前的文章并没有全面地清晰地论述这一问题:不同类型的整合方案是否产生不同程度的分化、是否产生不同类型的非均衡分化、是否产生不同的分化方式、是否产生不同的制度动态。

相似地,那篇文章亦只是点到了不同类型的制度企业家或精英的至关重要性。再引几句:

关键的因素是,是否有一些特殊的“企业家”活跃在一个或几个制度领域里。所谓“企业家”就是有能力为一系列新问题提供方案的精英。在近代的社会学家中,最接近于认清这一点的人物是韦

伯,他强调说,新的制度结构极端依赖于不同“魅力”群体或人物的“推动”,而魅力的常规化是新制度结构的形成和延续的关键。这种“魅力”人物或群体的发展可能是基因突变在社会学最接近的类比物。正是这种突变的可能性解释了:在任一分化层次上,为什么某个特定的社会领域能够包含几个(而非一个)可能的取向(常常是相互竞争的)和发展潜能(艾森斯塔德,1968a)。

我也注意到促进这些企业家成长的几个前提的重要性,特别是国内或国际支持的存在。

但是,我并没有全面研究这些企业家或精英的基本特征、他们之间的差异以及他们在建立制度上努力方式的差异,或者他们的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性。

我早期的文章部分地是为批判古典进化论而写作的。因而,它也接受了(潜在地,但有保留)几个有关制度性质和形态的假设。结构功能派所全面阐释的四个假设指导了五六十年代发表的许多理论文章和比较研究。

第一个假设是,结构分化表现为相对专业化的角色发展,这些角色在所有制度领域中(技术、经济、政治、宗教等)组织资源的流动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劳动分工。

第二,经典流派接受了相对封闭的社会系统观。它过分强调了社会劳动分工,认为它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结构分化、专业化角色和制度领域(有关组织资源的流动)的发展。它的论点是,这些特征解释了任何制度结构的基本特征和动态。

第三,它认为,那些已在制度分化研究中得到应用的类似标准,可以不经修正,就可应用到文化领域的研究。

第四,它假设,存在一种“自然”趋势,使得所有领域中的分化都表现出平行发展。这一趋势的例外,如局部分化或延滞分化,一般被看作是不常见的或有疑问的现象。

因此,“经典”流派和早期的批判,两者都非常强调社会劳动分工的组织方面,这种强调反映了经典社会学分析的一个重要方向,

即分析社会劳动分工的社会结构和机制——例如,不同社会群体、位置、角色、制度的资源分配和分布。

与此同时,这两者还遗漏了古典社会学分析的其他关键的洞察力,这些分析构成了社会学之父们——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学之核心。众所周知,这些社会学之父反对这样一个假设(潜在在实用伦理和古典经济学之中):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机制(尤其是市场)是社会秩序的主要和充分的调节器(艾森斯塔德在1985年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这些问题)。

社会学的奠基者们,尽管没有否认市场作为一种调节机制的重要性,但却论证说,社会劳动分工的组织——一般的,如社会交换;特殊的,如市场——引发了许多问题,使任何具体的社会劳动分工的运行变得困难重重。在不同的程度上,这三位学者每个人都强调了社会秩序的三个方面,而对“组织”机制(如市场)的分析却无法恰当地解释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信任和团结的形成,主要是由涂尔干考察的,滕尼斯亦有所研究。第二个方面是指权力的调节和对随之而来的剥削感的克服,这主要是由马克思和韦伯加以研究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为社会活动提供“意义”和“合法性”,每个奠基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这一点,但韦伯或许特别重视这一点。在他们看来,社会劳动分工的形成给社会秩序的这几方面带来了不确定性,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维持任何一种具体的社会劳动分工都是不可能的。

奠基者们都强调了劳动的组织分工与权力的调节、合法化、信任和意义的构建之间的巨大冲突。对这类冲突的注意是社会学古典时期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社会秩序这些不同方面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被社会学后来的发展忽视了——尤其是在结构功能流派中,对结构分化的强调成为它的中心。

忽视这些冲突,社会学家也就忽视了“社会秩序的每一方面的建构可能是由不同的行动者来承担的,或者可能包含不同类型的

活动”这种可能性。同时,忽视冲突亦造成对下列可能性的一种学术上的迟钝:这类活动不仅通过角色的结构分化来组织社会劳动分工(这甚至不是最主要的途径),而且创造各种特定类型的制度形态,从而影响制度结构的构建和资源的流动。而这些制度形态不能归纳到结构分化的章节之下,因此,它们可能影响分化的组织,不仅引起不同程度的分化而且引起不同方式的分化。因而,这些制度形态可能对各自社会的制度动态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些假设对比较分析的影响,可参照我早期的著作《帝国的政治体系》(艾森斯塔德,1963)来作说明。在这本书中,我潜含的假设是,不同的政治体系可按其专业化的政治角色或子角色的发展程度来加以区分。这本书还假设,这些政治体系的主要动态可由分化及其所带来的问题来加以解释。

而且,尽管我完全认识到不同的帝国体系呈现出不同的动态,并且这些差异也构成我分析的主要焦点,但对不同动态的解释却主要是根据传统的“分化”概念。

最后,尽管我的拙著明确了不同的价值或目标——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等等——极其强烈地影响了政治体系的动态,甚至最终的命运,但这一洞见并未完全展开阐述。

因此,《帝国的政治体系》并没有开发这种可能性:制度整合和总体动态模式(出现在具有相似分化程度的体系中)不仅能够用结构分化的水平来解释,而且能够用这种分化和精英活动之间的关系来加以解释。特别是,集体边界的形成、权力的调节、意义的构建以及那些以构建信任为中心的精英活动并没有得到详细的研究,尽管它们都是制度形态和动态的根本因素。现在必须强调,这些类型的精英活动不能只由结构分化来解释。相反,它们的确影响帝国社会分化的组织,并最终影响其命运。

更一般地说,甚至对功能分化的早期批判也未能恰当地考虑这种可能性:不同制度复合体(它是由主要精英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产生的)的出现,不仅是对随更加复杂的社会劳动分工而

来的困难的反应,而且它构成了制度化了一个自主的方面。这一点与这类精英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取向具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很有可能,这些取向也相应地产生不同类型的社会分化方式和制度动态。

为了克服这些缺陷,我们就必须回到对权力调节、信任和意义的构建等分析之上。研究社会秩序的这些核心方面必须考察它们与社会劳动分工的关系,并探索人类活动的符号方面、权力关系与制度轮廓的成形之间的联系。

“构建社会秩序、制度建设和社会精英行动者”这一观点强调的要点是,制度背景的形成是受几个主要成分的组合影响。第一个主要因素是,社会上各种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布和水平,而这又受分工主要类型的强烈影响。第二个要素是由“制度企业家或精英”组成的,他们能够动员和组织资源(也可能竞争),也能够组织和调节社会劳动分工所产生的群体利益。最后一个要素是指导精英活动的,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一个既定社会所流行的主要文化取向推导而来的概念(或“观点”)的性质。这些观点的制度化规定了社会秩序魅力方面的具体化,或者规定了对一种有意义的社会秩序的追求,而且,这一般是由主要精英的活动促成的。

主要精英有三类。第一类,政治精英,几乎直接致力于社会上的权力调节。第二类创造了文化秩序的模式,主要从事意义的创造。最后一类则调解主要群体之间的团结关系,致力于信任的构建。这些精英的结构与某个社会中占主流的基本文化取向或法典有密切关系,且这些不同的精英也是不同类型取向的携带者,他们对社会中的基本资源也倾向于行使不同方式的控制。通过这些不同方式的控制,他们才能把信任的构建、意义的提供和权力的调节与社会中的劳动分工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社会秩序的魅力方面成为制度。

通过操纵进入主要制度市场(如经济市场、文化市场等)的渠道以及在这些市场之间转换资源的能力,这些精英的联盟就拥有了控制。另外,社会成员的认知度(一般地讲)和特定参照群体的取

向(特殊地讲)的形成都需要信息,而这些信息的生产 and 分配是由精英控制的(这一论点在艾森斯塔德1968b和1982年的文章中得到较完全的阐述)。与此同时,精英还通过组织措施与强迫性措施的结合实施了不同类型的控制。

精英的不同联盟及其不同控制方式塑造了他们各自社会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系统、社会分层和阶级形态系统、宏观社会系统)的特征和边界。不同的控制方式在不同的社会中影响了制度结构的中心方面。精英活动创造了制度结构中的特殊位点,包括不同集体的边界以及社会或部门的中心,它们不能归类于分化的传统章节之中。相反,这些位点对理解各个社会的制度动态(一般地讲)和它对结构分化的影响(具体地讲)是极其重要的。

本文所发展的流派的中心点是,研究社会分化的学者必须区分资源分配的组建、社会劳动分工的组织方面和精英功能的模式(如权力的调节、信任的构建、意义的提供)。这些活动指导着不同社会的制度轮廓和动态,我们应特别注意它们的组合途径。

### 社会分化和文明的比较分析

为了使前面的讨论具体化,我们将把上面设计的概念框架应用到我和同事做过的几个经验调查之中。下面将探讨三个问题:第一,主要是在非洲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考察早期国家的形成问题。(艾森斯塔德、阿贝特鲍和蔡森,1985a);第二,考察社会历史上的城市和城市等级;最后,分析所谓的“轴心代文明”(Axial Age Civilizations)(艾森斯塔德,1986)。

## 国家的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形态

### 对进化论的批判

现在,让我们从分析早期国家形态开始,主要着眼于非洲。首先,我们认为,大多数进化论流派的一个假定,即以不同程度的结

构分化来定义国家,是不恰当的。基于这种定义,近代流派现仍在继续解释许多早期国家的形态。

这类研究可以回溯到古典进化论对国家起源的研究,如马克思和恩格斯、H. 斯宾塞(1925—1929年)或早期人类学家(如奥本海默,1926,洛伊,1927)的著作。当代仍有几位学者沿袭这一传统,包括:新马克思主义者 J. 弗里德曼和 M. J. 罗兰(1977)、M. 戈德列尔(1973),他们的著作与帕森斯框架内的某些著作存在某种令人感兴趣但又有些矛盾的平行性,如 G. 巴兰蒂(1969)和他几十年来更加分化的比较研究,以及更接近当代的著作,如 R. 科恩、H. 克莱森和 P. 斯卡尔尼克(1978)。

后来的这些研究对早期国家形态的分析,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是,古典进化论流派对早期国家的特定特征的研究,并未考虑到社会政治组织的具体形式在每个所谓的国家“发展阶段”上大量变异。所有社会都存在一个一般的发展(或分化)阶段,而在每一阶段上都会出现相似的制度属性,这两个假定极度轻视了各个政体内部结构中的某些因素的重要性,同时,也孕育了这样一种认识:每一发展层次上的变异从属于发展总阶段的主要特征。

例如,在研究非洲的资料时,人们很容易为各种类型的结构突破举出例子,从酋长制到早期国家,从早期国家到国家。不同类型或阶段之间的转变并非必然沿着一个既定的线路而前进,因而,这种转变并不总是产生一致的结果。例如,R. 霍顿(1977)详细说明了,西非的无国家社会(stateless society)怎样通过几条不同的途径获得了酋长制的特征。类似地,早期阿坎(Akan)国家之间彼此也拥有显著的共同点,从这里也可以把它们同其他早期国家[诸如奥尼沙(Onitsha)或豪斯(Hanse)城邦]区别开来。当阿坎国家自己经历了从早期国家向国家的突破时,它们随后的形态也就各不相同了。

与此紧密相联的一个事实是,这类文献中的大多数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早期国家(如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会发展成更加分化的(或古代的)国家,而其他一些(如加纳、马里和桑哈伊的苏丹帝国)

却不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超越比较初级的时期。用从古典进化论推演出来的变量无法解释非洲社会之间的对比,也无法解释非洲大陆之外的其他地区之间的对比,包括地中海的新东亚地区、富饶的伊斯兰地区和远东地区(瑟维斯,1975;科恩和瑟维斯,1978)。

### 社会中心及其各种维度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之间的主要差异根源于它们各自社会中心的结构。这些社会中心的至关重要性说明,任何一种未经修正的进化流派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进化论只是根据相对的结构分化来分析政治制度。

社会中心结构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最明显地表现在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其他文明中,尤其是轴心代文明中)清楚地表明了,考察这类中心的依据绝不能只是政治角色和组织的相对专业化,而且还应看到,这类中心是最重要的制度位点之一,魅力维度就是在此得到完善的(参阅希尔斯,1975a,1975b;艾森斯塔德,1968b)。实际上,这些中心与政治领域、政治统治和权威具有密切联系。中心的这一维度并不等同于政治领域或政治——行政统治的组织分化。当代论述国家起源的文章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的事实,它们忽略了:从一个社会的一个(或多个)中心内部所实施出来的控制过程,不仅处理社会劳动分工的组织方面,而且(或许更为重要)也处理这些方面与社会秩序的魅力维度的联系,如信任的建立、权力的调节、意义的提供;更何况,每一维度都可能在不同的中心里得到不同程度的深入完善,从而出现不同的控制方式。结果,这些程度差异就与某一特定中心里的精英联盟,也与他们所阐述的文化取向发生密切联系。因此,不同的中心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和动态。

结构的和符号的自主性与独特性;中心活动的性质和类型;中心与周缘的关系、精英同盟的模型、不同类型中心所拥有的系统趋势的性质以及变迁能力等,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来区别各类中心。

正如我们将在个案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三个维度不必总是联袂而行,而且在不同的社会中,每一维度的发展程度也可能不同。

首先,中心的自主性表现为,中心在组织上从现在的社会劳动分工中分化出来的程度,特别是从不同先赋单位,诸如地缘单位、亲缘单位中分化出来的程度,以及中心形成其符号自主性的程度。

第二,当遇到不同类型中心时,我们可以根据几个主要维度来判定中心活动的性质。第一个维度是中心活动所集中的社会生活领域。区分这些领域的依据就是上面分析过的社会秩序的主要方面:价值观的形成和社会文化模型;团结和集体身份的完善;权力关系的调节以及社会劳动分工(尤其是经济活动)的调节。

对于这些活动,我们还可以采用另一种区分(与前一种互有交叉),即依据中心活动对周缘里现存社会结构的调节程度和可能的剥削程度或中心在周缘中建立新的结构类型的程度,来加以区分。

与第二种区分紧密相连的区分是(但仍与之有交叉),中心将其活动扩展到原来地域范围之外的程度。

因此,正如我们的个案研究将要表明的那样,不同的中心可依据它们所承担的活动类型来加以区分。这些活动的进行,加上中心的相对独特性,产生了各个中心自身不同类型的轮廓和动态。

### 组织中心与示范中心

在非洲早期国家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上,我们可以断定,不同类型的政治动态与中心的不同结构具有密切关系。不过,只有在国家形成的第二个(更加发达的)时期,这些政治动态才表现得更充分。

第一阶段包括中心功能与其他活动领域出现符号性分离。这种分离一般是以一种社区感的出现为特征的,这种社区感把几个较大的亲缘群体结合在一起;或者(和)是以把几个亲缘群体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神话的明朗化为特征。这两个过程,或单独出现,或共同出现;它的高潮常常是出现一个阐述团结和(或)意义的鲜明

人物。在大多数非洲早期国家或原始国家形态中,如奥尼沙、保罗——曼索、阿旦斯和曼丁·卡夫,在广泛的、先赋性初级关系(一般要么是亲缘关系、要么是年龄关系)背景下,它们的中心相互重叠。

甚至在这个早期阶段,不同类型中心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尽管早期阿坎国家呈现出一种与亲缘分工相联系的社会团结,但在第一个曼丁联合体中,与卡夫(kafu)有关的活动就已经从符号上,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从组织上,与特定的亲缘和经济考虑区别开来。

第二个阶段只在少数中心里得到发展,它的出现时间是在完善的制度安排和特殊中心的建设使得国家的目标从形式上得到巩固的时候。一般地说,正是这种历史的合流,一个具有“不可逆”状态的时期才会到来。

更重要的是,当中心的结构分化开始时,正是在这个第二阶段上,中心的完善才沿着相当不同的道路而发展。这里出现了两种主要类型的国家中心,而在每一类型中,又会出现许多子类。如上所述,每一主要类型的特征在于,它的内部组织具有不同中心,它的精英联盟具有不同类型、它所盛行的不同文化取向以及政治动态的不同类型。“组织”中心(这类中心中的一种)在结构上比周缘里的单位更完善、更有权力,但在符号上并没有明确地与周缘相区别。换言之,它们还没有完善文化秩序的符号模式,或者,它们还没有完善一种团结的符号模式,使之不同于现在流行在周缘主要单位中的符号模式。<sup>①</sup>

伴随着社会分化的不断增强,家庭、宗族和地域结构得到重新组织和巩固,从而为这些中心的成形和重组提供了基础。通过安排广泛的初级标准(尤其是家庭、血缘和地域标准)的先后顺序,同时通过重新定义血缘和地域基础,这些国家中心又得以完善。在这些例子中,宗教中心(或文化中心)和政治(或经济)中心之间几乎没

---

<sup>①</sup> Chazan 和 Abitbol(1985)。论述曼丁的文献,请参阅 Hodge(1971)。论述 Samori 的最好著作是 Person(1968)的大作。

有分离。符号意义、调节性信任、扩张性权力功能,三者的位置也相互重叠。在沙卡(Shaka)时代,阿山特(Asante)、伊巴丹(Ibadan)的城邦、刚果中心和苏罗(Zulu),都把符号安排和制度安排交织在一个核心群体中,它在符号上的独特性水平很低。<sup>①</sup>

这些中心与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趋向于保持相对的一致,这样,就形成了以弥散性符号身份为基础的集体。视亲缘群体目标的组织程度和功能的等级化,这些中心卷入到不同的活动中,其中大多数活动具有扩张的性质。政治精英能够进入含有许多其他社会成分的联盟中,诸如军事精英、经济集团和宗教领袖。不过,他们一般都从属于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君主的领导。所以,周缘对中心的符号依赖被保持在一个最小的程度上,而手段依赖却正好相反。

在这些国家中,联盟的中心成员是各种先赋单位的领袖,他们完善着各自群体的团结,并同时承担其他精英功能,特别是政治(或军事)功能。他们只表现出很小程度上的专业化,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被牢牢地束缚在一个广大的血缘和地缘单位中。在很大程度上,权力和权威以及财富(依据某些标准)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形成对比的是“以示范为基础”的中心,无论其组织紧密程度和力量如何,它的特征都表现在它与周缘的更大程度的符号分化。在这些中心里,某些(甚至大多数)精英功能是在不同的途径上加以组织的,而且精英功能和结构的差异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结果就出现了具有不同结构和重心的国家中心。

在这些例子中,中心和不同精英功能并不是在一个更加广大、更加分化的符号与地域范围内,重新改造原始家庭、氏族或地缘群体;相反,它们是从这种群体的范围中分离出某些(或大多数)精英功能,而且是以相对自主的方式来规定中心的形成,例如,按照周缘单位动员和组织的不同标准和方式来加以规定。在相对比较早

---

<sup>①</sup> Busia(1953)。也请参阅 Wilks(1975, 1977); Quartey(1977); Henderson(1972)和 Gluckman(1975)。

的阶段上,这些中心形成了完善文化秩序模型的某些不同方式。

在以示范为基础的中心里,一般的趋势是,阐述意义的人物是在不同的联盟、血缘和地域背景中组织起来的。这样,权力和权威就不太容易相互转换,而且,目标的专业化、财富的积累也不太容易转换成具有巩固中心作用的符号功能。因此,随着角色分化的增加,各个精英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边缘对中心的依赖也在增加。周缘依赖性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它高度从属于中心的魅力制度。

在这些社会中,社会劳动分工中的目标组织与中心的这种分离,为精英功能的分化、各种魅力人物的随后发展以及他们的多种方式和框架下的制度化,提供了新的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各种可能联盟的范围则十分宽广。但是,在大多数中心里,能够相对自主地完善社会和文化秩序模式的人物仍主要出自统治联盟中。

### 同构社会与异构社会

在结构分化上处于相似阶段的社会中,我们可以见到中心之制度动态中的上述变异。但传统的分化理论却不能恰当地解释这种变异性。

理解这些差异的线索在于:不同的精英、他们所阐述的观点、他们所进入的联盟、这些精英与社会其他群体(或同盟)的关系,特别是他们在更大的先赋单位中的自主性或被埋没的程度(embedment)。换言之,关键的差别在于下列两方面的同构程度:社会劳动分工中目标专业化为一方面,精英活动(如完善权力和政治独特性、创造信任、提供文化秩序的意义模型)为另一方面。只有通过这种区别,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地解释政治动态的一般道路(一般地说)和国家形成的不同模式(具体地说)。

就组织专业化和精英功能的完善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鉴别出两种不同的模式。它们几乎是一种理想型,在非洲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它们之间在自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叠,而且,我们应当注意,这两种模式仍遵循上面分析过的不同类型中心之间的

区分。

第一种模式包括这样一些社会,其社会劳动分工的专业化与精英功能的完善之间,相对同构占主流。第二种模式包括这样一些社会,其精英功能和社会的组织分化不相关,或者,异构占主流。

我们可以在阿山特(Asante)、刚果国家、苏罗和伊巴丹、约罗巴(Ibandan Yoruba)等社会中找到第一种模式的例子。在前两个社会中,同构是在氏族中和在以地缘为基础的社团中发展起来的;在后两个社会中,伴随着氏族的发展,普遍主义发展(年龄或经济成就)占主流。

精英功能和结构分化的重叠,是阿山特的主流(蔡森,1985)。这种重叠也存在于其他非洲早期国家中。刚果国家在氏族的大伞下也出现了一种契约体系:商人和奴隶贩子从属于宗族首领,军事组织是由血缘纽带规定的,而军事功能则按照先赋标准分配给血缘单位的首领。因此,现存的社会分工已扩展到承担新的任务,从而相当于形成新的中心(蔡森,1985)。

在那些普遍主义的先赋标准和成就标准占主导地位并伴有血缘标准的社会中,我们也能在组织专业化和精英功能的完善之间,找到这种普遍同构的一个变异。苏罗即是一例,它异常强大的年龄政体直接从属于国王,同时存在一个相平行的氏族结构。在这两个分离的社会组织中,苏罗表现出对精英团结和权力功能集中的偏爱(贾齐,1965;里特尔,1956;托马斯,1950)。伊巴丹—约罗巴也一样,它的血缘结构和军事组织共同创立了一个中心,其中,团结和权力直接反映了社会的结构分工。在这个社会中,城邦领袖来自那些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的或那些曾经属于国家军事奠基人之列的氏族首领(亨得生,1972)。

在巴姆巴拉(Bambara),我们可以见到这种同构的一个更加复杂的例子(阿普特,1967;洛,1971)。伴随着年龄分化,其他形式的联合会和秘密团体也出现了,例如,狩猎者联合会(donzo-ton),凭

借其成员的军事训练和他们对林地精灵的联系,它在社会政治动荡和自然危机中承担了社会整合的功能。

在竭力强调“要表现不同集体的团结”这一任务的条件下,这些机构成为完善精英团结功能的核心。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基本的精英功能都对应于结构分化的原则,并且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境,其中,精英功能的完善深深地埋在现存社会结构和社会劳动分工的组织之中。

作为强烈的对比,非洲其他社会却表现出一种精英功能的完善与社会的组织分工之间的异构模式。我们可以区分出几种不同的异构类型。第一种出现在那些经历了目标专业化过程的社会中,其特征是出现对以氏族为基础的现存文化秩序模式进行不同阐释的人物,这可能是社会劳动分工的结构分化和精英功能分离的最初类型。

例如,在布干达(Buganda),劳动的组织分工不断地与该社会的社会基础(即氏族)分道扬镳,在国家形成之初,这种分离带有浓厚的种族色彩和先赋色彩。在这个社会中出现了明确的职业群体、显赫的科层官员、经济企业家以及氏族首领(其任务,作为日常生活的关键领域的反映,不断得到专业化)。不过,与“职业”和“阶级”意义的人物和权力的拥有者都集中于皇室氏族一身。这一氏族的领袖,卡巴卡(Kabaka),被认为是从天上下凡的神,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布干达文化秩序的旨意。同时,在平行的等级之外,其他氏族首领把持着团结的完善,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拥有控制权,并向lukiko(议会)派遣代表。

那么,实质上,这里已经出现了团结的完善和文化模式之间的区分,而且,和农民与牧师、商人与生产者、士兵与从事主要活动的平民之间的经济分工形成对照(蔡森和阿比特鲍,1985)。应当注意,在奥约(Oyo)、艾夫(Ife)、艾格巴(Egba)、巴姆巴拉和曼丁,不同的异构模式也很明显(参见注2引征的文献;也参阅阿坦达,1977;蔡森和阿比特鲍,1985)。

小结：中心形态在非洲的模式、精英联盟和文化取向

因此，结构分化和精英功能分化之间的区分，有助于我们解决古典进化论流派所不能恰当解决的某些问题。第一，这种区分使我们能够比较详细地分析社会分化每一阶段上国家形态的变异，以及这种变异与不同阶段之间转变的关系。第二，我们强调了中心形态作为社会结构自主维度的重要性，而且已经考察了不同类型的中心在同构社会和异构社会中的发展，这些不同的中心具有不同类型的制度动态，暗含不同的分化方式。

中心独特性和中心活动类型的不同成形过程，既与在中心里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才盟类型有密切联系，也与主要精英的特征存在密切联系，例如，他们的自主程度，他们是否埋没在先赋单位中，他们是否作为这种单位在整个社会中的代表等等。当然，不同精英所能形成的可能联盟的数量十分庞大。

这些精英结构的关键方面是他们的自主程度，特别是在自我身份和受雇方面。与自主相对的情形是，他们被埋没在或宽或窄的先赋背景中。

精英的相对自主性与不同类型的文化和社会观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本文分析的主要优势在于：它降低了文化取向在影响不同的中心模式和制度动态方面的重要性，这些文化取向是由不同类型的精英及其同盟所“携带”的。我们的思路能特别敏锐地区分先验秩序和市俗秩序之间或高或低的冲突，也能敏锐地区分先验秩序是直接还是间接地被用来改造不同中心的轮廓和动态。

因此，在大多数同构社会中，受约束的精英占多数，最占优势的文化取向会强调先验秩序和世俗秩序之间的冲突是非常低的。而在大多数异构社会中，高强度的冲突常常被认识到。

不过，这种文化取向(或文化观 cultural image)的影响途径并不

是某些直接的“解放运动”，而是携带这些取向的不同精英的活动、他们的结构特征、他们在特定中心里的主要同盟中的位置。因此，伊斯兰本土国家和圣战国家之间的关键差别，至少有一个是伊斯兰精英内部结构的差别，以及他们在其社会统治联盟中所处位置的差别。因而，在伊斯兰国家中，伊斯兰精英是非自主的，在现存联盟中只是一个从属的伙计，而且深深地埋没在社会的先赋社区中。而在圣战国家中，他们是高度自主的，在由相当自主的精英组成的联盟中是一个独立的合伙人。类似地，对先验秩序和市俗秩序之间冲突的知觉只在很低的程度上影响了所罗门埃塞俄比亚(Solomonic Ethiopia)中心的结构和动态。这种减弱了的影响则与埃塞俄比亚教会的自主性以及埃塞俄比亚距基督教中心的距离具有密切联系。

最后，上述因素与不同国家产生和维持不同变迁的能力密切相关。而这些变迁在现阶段上至少可以用两个标准来加以比较。第一，以示范为基础的中心试图改造现存的社会秩序；而组织中心则主要致力于调节现在的社会关系，尽管它们也发展新的活动类型，并且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第二，某些国家发展了自己维持(或吸纳)随时间而产生的变迁的能力，而其他国家则没有表现出相应的能力。

这些不同的中心模式和动态，也与我们在上面接触到的紧密相连的两个分析问题具有密切关系，即在财富、权力和声望这三种主要资源的每一种里发展出来的主要资源互换程度，以及中心吸纳这种变迁的能力。

饶有兴趣的是，中心的自主性愈低(尤其是在结构和符号方面)，能在中心里的各种不同社会单位之间转换不同资源的趋势就愈强，因而，这些社会单位就愈容易把它们所掌握的资源转换成接近中心及其权力的能力。自然，这一点是与下列事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即在这些中心里，只存在少数几个组织和控制资源流动的完全自主的标准或机制。

相反,中心在结构和符号上的自主性愈强,就愈容易发展出一个明确的统治阶级,它为自己设计出自主的标准和机制来组织和控制资源的流动。这种发展使得周缘中不同部门很难把它们资源转换成中心的资源,特别是在权力的声望上。

可转换性的这些不同形式也与不同中心吸纳变迁的方式密切相关。同构社会的组织中心有能力吸纳相对较广范围的新单位或活动,它要么把它们吸纳进现存的单位中,要么把它们孤立在其控制的不同框架中。

中心的自主性愈强,它们愈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标准,致力于重组所谓“潜在的吸纳对象”。结果,在对待这些单位的态度上,它们可能变得更加刻板,而这常常引起更强大的紧张、冲突和对立。

因此,本文分析所得出的总的结论是,国家的起源不仅与结构分化有关,而且也与它和特定社会群体(或社会)世界观变迁的制度化联系在一起。符号变迁和结构变迁的结合不仅导致从前国家到国家形态、从“早期国家”到比较全面发展的古代国家的最初突破,而且影响了符号假设和制度结构的特定内容。相应地,这一切又和同构与异构模式随后显现的程度密切联系在一起。

这些密切相连的文化、社会和生态变迁是通过不同联盟和精英活动而产生的。阐述文化秩序模式和团结模式的人物以及他们与政治精英结成的同盟类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从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的过渡中,这些阐述者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他们的特定特征以及他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便成为理解国家类型以及国家启动、影响、管理不同变迁(这是国家成形时的副产物)能力的关键因素。

### **比较城市结构:康士坦丁堡和伊斯坦布尔**

在对城市和城市等级的一般分析中,以及对历史文化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可以证明下述变量的重要性,如社会劳动分工的分化和精英联盟、文化取向、制度分化与整合的方式等等的完善之间的

区别(艾森斯塔德和沙查尔,1985)。

经典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城市和城市等级的许多分析,都是根据结构分化来描述城市之间的差异,它们把目光集中于各种城市带,主要是从进化阶段来解释这些差异。<sup>①</sup>

康士坦丁堡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对比可能是最迷人的比较个案之一,我们可用它来表明进化观的不恰当之处(具体细节,请参阅艾森斯塔德和沙查尔,1985)。这个比较的魅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我们所考察的两个城市,由于它们处于同一地理位置上,也可以看作是同一个城市:后者是建立在前者之上的,尽管有局部的毁坏;而且,两者处于同一个地理政治带上,面临许多相似的空间和地理政治问题。两个城市都是共有许多特征的农业帝国的首都。在结构分化上,它们的农业结构和城市结构之间的相似性特别显著(艾森斯塔德,1963)。

除了巨大的相似处之外,在城市空间组织的某些方面,它们俩仍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很难纳入传统的结构分化框架之内,这突出地表明了对经典模型进行修正的必要性。

就这种比较而言,城市空间最重要的方面是:(1)城市生活和管理的集中程度;(2)区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性质;(3)居住区和商业区的某些方面(具体细节,请参考艾森斯塔德和沙查尔,1985)。

### “宇宙与帝国”概念和康士坦丁堡的内部结构

康士坦丁堡以及后来的伊斯坦布尔为帝国统治下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富含信息的例子,因为,在许多方面,它是帝国城市的一个理想型。在城市化的所有时期和方面,它的帝国特征都是决定性

---

<sup>①</sup> 例如,参阅 Childe(1950, 1954); Kraeling 和 MacAdams(1958); MacAdams(1966); Park、Burgess 和 McKenzie(1925),以及对这些文献的分析,载 Eisenstadt 和 Schachar(1985)第一章和 Sjoberg(1960)。

的：在其起源上、在影响它发展的力量上、在其规划的生态结构上、在其日常生活中、在其与教会的关系上。

康士坦丁堡的创立、它的外部形状、它的象征性隐喻都源于一种相对特定的宇宙观——一种被认为是包容整个帝国的统一的政治框架。帝国的中心、帝国的首都城市、帝国的缔造者和统治者，无论在肖像上还是在符号上，都统帅着帝国、体现着帝国、代表着帝国。作为人类创造的产物，城市反映了帝国的宇宙模式。因为帝王创造了城市，而帝王又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因而城市就变成了宇宙在地球上的神圣中心。城市的帝国特征主要反映在它的规模和它对城市空间的控制方式上。它的无法比拟的规模，无论是地域还是人口，都是因为城市对帝国物质资源的控制。对城市空间的有效控制在物质上主要是通过城市规划，城市的主要轮廓和地区都是按照帝国意志而得到保留和管理。

康士坦丁堡的内部结构是由城市所完成的各种功能加以规定的。作为帝国首都，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有：保护政体和百姓、供给商品与服务，这既是帝王财富的表达，也是他对臣民福利负责的表达；控制城内交通和活动；最后，扮演组织环境的符号——仪式角色，这里，帝王被刻画成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作为帝国城市，康士坦丁堡的保护功能，既体现于三角地[马尔马拉(Marmara)海为一个顶点，包围着半岛的黄金角(the Golden Horn)为另两个顶点]的物理特征，也体现于它复杂的城墙体系、塔和西边界面上的防御工程。沿城市海边修建的海防城墙为城市的防卫体系提供了额外的力量。城墙也是控制城中百姓的主要力量，通过城门，进出城市的人流就得到疏导和监视，帝国权威也就能够稽查和调节进入首都的旅行者和商人。

只要居住于帝国的首都，居民们就能因帝国的慷慨而获得了满足某些基本需求的特权。慈善家里帝王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加冕典礼之后，分发丰富的礼物；每天在城中的几个地方提供饮水和食物，是这种特征的两个表现。巨大的瓦伦(Valen)水渠是帝国城市

之提供者角色的最显眼的表现,它从西边的安德里路堡(Andrinopl)城门,纵贯整个城市一直延伸到位于城市东端的皇宫,长距离地输送来自思拉斯(Thrace)的水。

类似地,康士坦丁堡的街道模式有两级。高级的街道是由中央当局规划和指导的,它界线分明、得到很好的养护,是行人和车辆行走的主干线。高级主街道从各个城门延伸进来,汇聚在奥古斯德广场(Augusteum)[三角形的一个顶点,位于皇宫与索菲亚大教堂(Hughia Sophia)之间的交叉点上]。这一街道模式,以麦斯(Mese)大街为其脊柱,是由仪仗路、行轮管理轴、专业商业大街、主广场、城里的主要互动地点组成的。这条宽广的大街一直从西城墙的主皇门(金门)贯通整个城市,到达三角形的顶点,即奥古斯德广场。

位于其路途上的几个广场又增强了这条主干道的主要功能作用和符号意义。这些广场是由柱廊围绕着的大型广场,康士坦丁堡因而拥有了希腊——罗马的遗风。这些设计完美的大型广场是城中百姓公共聚会的主要地点。它既保留了古罗马的传统,又是帝国象征地表现权力和权威的最主要的物质背景。凯旋门和高高的廊柱支撑着帝王的地位。广场是交换、互动、贸易的中心地点,也是政治仪式和政治参与的主要焦点。所有这些活动都集中在一个受控制的空间中,处于帝国的符号监督之下。这样,广场就代表着一个特殊类型的政治空间,它把中心地位的功能与公众接近和参与的相对开放结合在一起。正对奥古斯特广场第三面的是大竞技场及其附属公共浴室的入口。作为公共集会、仪式集会、公众示威和各种娱乐的主要中心,这个大竞技场在康士坦丁堡百姓的生活中是一个主角。将军们(demes)在这里给他们的战士授勋,也在这里组织他们的军事演习。

从康士坦丁堡广场,麦斯大街伸向许多公共广场。在城市的公共日常生活中,很多活动都在那里举行。

高级大街分支出为各种邻里服务的小巷,它们构成低级街道体系。为了保护百姓免受恶劣气候和陌生人的骚扰,出于结构的需

要,同时也因为空间奇缺,这些小巷都十分狭窄,迂回曲折,但随形就势,颇能满足当地百姓的需求。这些低级街道并未形成完全的城市网络,因为使用它们的只是本区居民,并没有联结不同的邻里。

### 从康士坦丁堡到伊斯坦布尔

经激烈的战斗和长期的围攻之后,康士坦丁堡终于在1453年被奥斯曼的苏丹·默哈麦德二世(El Fatih——征服者)的军队占领,从而结束了拜占庭帝国长期而辉煌的历史。苏丹·默哈麦德二世把他的王朝从爱迪纳(Edime)[原“安德里路堡”]迁到康士坦丁堡,并把这个城市立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城市的帝国特征因此而得以保存,只不过康士坦丁堡从一个基督教城市转变成一个穆斯林城市。

把伊斯坦布尔立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并重新安置它的百姓,这两者都给城市的结构及其基本设计和建筑带来了变化。

在这些不同变化中,最简单、最自然而且效应最显著的变化是,伊斯兰教的建筑,特别是清真寺,代替了拜占庭教堂。这种变化常常是,把教堂直接改造成清真寺。更常见的是,建造新的清真寺。这种更替,尽管人人可见,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却不只是纯粹的“外部变化”,城市内部结构的主要方面也发生了更加深远的变化,特别是集中程度、对公共空间的控制程度、这些公共领域的结构、它们与私人领域的相互关联及其内外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变化既与伊斯兰基本的宗教和社会政治观念具有密切联系,也与精英结构、他们的控制方式具有密切联系,后者与拜占庭帝国的情形呈鲜明的对照。

同时,对公地和公共机构的整个控制模式也出现了相当深远的变迁。这种变迁完全体现在这一事实中:大多数清真寺和附属小学(madrassas)变成了固定资产[(waqf)公有或私有],为此,还长久地建立了基金会(大多数是由苏丹建立的)。这些基金会脱离了中央当局的直接控制,成为半自主的团体,其管理操纵在特殊的贵族

之手,并以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特有的方式把公共功能和私人功能结合在一起。

因此,随着清真寺和附属小学的成立,城市生活,特别是城市公共生活,不断地偏离中心地带(decentralization);而且,公地和私地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它们之间的区别被削弱了。相反,拜占庭帝国却试图维持这种区别。

同时进行的过程是,城市的功能结构也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交换和贸易活动从广场和麦斯大街转移到带顶篷的集市上。这些集市主要位于前康士坦丁堡广场的北面,聚集着成千上万家店铺和作坊,提供了大量的商品。这种独特的集市是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方,甚至可能是整个世界上都无法比拟的。当统治集团(Suleymaniya)满足了对公共服务的主要需求时,集市便成为商业和经济活动的主要中心。

街道网络的改造是带给城市结构的最后一个变迁。在拜占庭时期,高级街道(主要是麦斯大街和它分支出来的街道)和低级小巷之间存在清晰的区分;而在奥斯曼时期,这种区分变得模糊。建造私人房屋蚕食了公共空间,主干道因而变得狭窄。随着宽阔大街的衰落,城市就失去了它的对称轴。多中心(各种帝国的清真寺和集市)的出现使得可接近性的模式变得更加统一,小巷网络扩大开来,并包围了整个城市。

### 小结性评注:

因此,除了帝国中心和空间位置的延续性之外,从康士坦丁堡向伊斯坦布尔的过渡,引起城市内部结构几个主要方面的重大转型。公共空间结构的变迁、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关系的变迁,就是特别显著的两个方面。

第一,帝国城市的集中模式发生了变迁。这一变迁把康士坦丁堡全面集中和对公共空间的控制转变成一种由几个不同清真寺以及围绕清真寺的社会文化复合体组成的偏中心模式。相应地,帝国

王宫丧失了它作为控制中心的位置。

第二,公共空间的性质有所修正。在拜占庭帝国期间,公共空间的总体特征植根于古代城邦与中央帝国传统的结合,后者在原则上包括各个阶层的百姓,赋予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可能性。这些公共场所获得了更多的社区宗教模式,这是众多穆斯林城市的典型特征。公共空间的这些对比特征最终是与两种文明中政治精英与宗教精英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相联系的。

第三,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表现在街道模式的转变和公共空间的转变上。这种变迁与“偏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一般模式和固定资产的形成,具有密切关系。

这些创新表明了一种“向内转”的普遍趋势,一方面转向封闭的家庭住地,另一方面转向社区——宗教模式,结果,几乎没有空间留给特定的整个城市,即没有市政的(和帝国的)公共空间。

最后,城市贸易模式的结构有所变更。一条主对称轴加上一个明显集中的广场,这一线性模式受到改造,变成几个集市,其位置与各大清真寺具有密切的联系。每一集市包括许多商业和手工业,它们表现出高度的专业化。

总的说来,这些变迁是与形成城市生活的普遍的伊斯兰模式相一致的。同时,在所有的伊斯兰首都中,伊斯坦布尔很可能是以最帝国最集中而与众不同。这很可能是与对乌里玛[(*úlema*)宗教学者]比较严密的控制(这种控制程度是其他伊斯兰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以及对大多数外国商人和艺人团体的控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 轴心代文明

所谓“轴心代文明”(参阅艾森斯塔德,1986)为考察: a)结构分化与精英结构分化之间的差异;b)具有不同文化观或取向的精英之间的可能联盟的种类提供了一个异常引人的经验领域。而且,这些精英同盟对其社会制度结构的影响、对结构分化方式的影响、

对这些社会动态的影响,亦能够得到考察。

“轴心代文明”这一术语(由 K. 贾斯珀斯首创)是指那些出现在下列地区的伟大文明,如古以色列、许多基督教地区、古希腊、部分地也在波斯——伊朗、帝国早期的中国、印度教和佛教下的南亚和东南亚以及比较晚期、实际上已越出轴心代以外的穆斯林世界。这些文明的特征表现在“冲突”(tension)这一基本概念的发展和制度化上,也表现在先验秩序和世俗秩序之间的鸿沟上。

这些基本概念最初是在“学者”这一小群体中发展起来的(当时,这些人构成一种新的社会要素),而且,他们与自主精英(一般地讲)以及社会文化秩序模型的携带者(个别地讲)具有密切联系。最终,这些概念在所有的轴心代文明中都得到制度化,成为统治者和许多附属精英的主导性取向。这些文化观也在它们各自的中心或子中心里得到全面的制度化。这样,在主要联盟中,学者或文化精英便成为相对自主的一方。学者的不同集团转变成更加固定、更加制度化的群体,特别是变成具有职业性质的群体,例如,犹太教的预言家和教士、希腊的伟大哲学家、中国的儒士、印度教的婆罗门、佛教的桑噶(Sangha)、伊斯兰教的乌里玛(ulama,宗教学者)。同时,政治精英也受到改造。

正是这些自主精英构成这些文明制度化过程中新的关键要素。

从我们的分析角度看,轴心代文明最主要的方面是,它们阻止了异构特征的出现,尽管使用的方式不同。其特点是,在社会劳动分工的分化和精英功能完善的分化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

在这方面,轴心代文明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更加“发达”(或古代的)的同构社会,后者存在于许多古代原始社会之中,例如,古埃及(它可能是最好的例证)、城邦(如古腓尼基的城邦)和各种更加偏中心的部落联盟(艾森斯塔德,1972)。在这类同构社会中,政治发展从一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通常是与重构和拓宽亲缘要素和(或)地缘要素、先赋范畴和符号,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与纯粹的

血缘关系相对立,地缘单位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而且,还出现了所谓的“基本宇宙概念的定性扩展和多样化”的现象。过渡的特征也表现在精英的不断专业化(在总体上,他们仍淹没在各种先赋单位中,甚至是复杂、广大的先赋单位中),表现在流行这样一种文化模型和概念,其先验秩序和市俗秩序之间的冲突相对较低。

在这些同构社会中,社会分化方式的特征在于中心的成形,这些中心在生态上和组织上与周缘不同,但在符号上却未能与周缘区分开来。这些世袭中心是围绕一些精英而成形的,而这些精英又处在各种先赋单位(常常是广大的且被重建过的先赋单位)的网络之中。他们携带的文化取向,是以宇宙秩序和世俗秩序之间相对低程度的冲突为特征的(参阅艾森斯塔德,1970)。

形成对比的是,轴心代文明的特征是,社会劳动分工的结构分化和精英功能分化之间不断加大的差别,甚至是鸿沟。而且,这些社会目睹了自主精英的出现,同时也目睹了文化取向的更加激进的发展或突破,特别是在对世俗秩序和先验秩序之间冲突的激进认识的方向上。同时,出现了不同方式的社会分化,它的特征在于重建许多主要的制度形态,包括:特殊的不同的文明或宗教集体;不同于周缘的各种中心以及意识形态的政治学。

### 轴心代文明的变异

同构模式可在许多不同的社会和政体中找到,但是,在轴心代文明中发展起来的异构社会中,却存在更加不同的各种中心,如在完全成熟的帝国(如中国、拜占庭、奥斯曼),在比较脆弱的王国或部落联盟(如古以色列),在融合部落背景的城邦(如古希腊),在具有复杂的偏中心模式的印度文明,在帝国的(或帝国——封建的)复杂形态下的欧洲。

但是,在制度结构、结构分化的方式和制度动态上,许多意义深远的差异却出现在不同的原始背景,特别是轴心代文明中。而且,从我们分析的观点看,这些差异或许更为重要。

尤其是在轴心代文明之间,帝国体系和偏中心体系之间的差异自然是主要的,印度和封建欧洲分别是这两种体系的最重要的例证。但是,这两种体系的内部也出现巨大的差异,表现为结构分化的不同模式、结构分化与精英功能完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分析和文献,请参阅艾森斯塔德,1978)。

在印度出现了高度分化的宗教精英和低度分化的政治精英。作为对比,普通阶层的政治角色分化程度相对比较低。类似地,在农业帝国王朝中,其中心结构和分化方式出现了深远的差异,尽管这些王朝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共同拥有相似程度的结构分化和组织分化,对历史上的社会而言,这些分化的程度是比较高的。

因此,当我们比较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时,它们在中心结构和不同精英功能上的差异就很明显了,虽然就这两个文明而言(作为与世袭王朝不同的王朝),它们的结构分化程度和特定精英的活动程度都很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非常类似。因此,在晚清帝国,行政—科层精英与宗教精英之间不存在区别。在拜占庭帝国,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差异、民间独裁与军事独裁之间的差异、农村群体与某些城市群体之间自主性的差异,都是相对比较大的。在奥斯曼帝国,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工是以不同方式加以组织的;作为一种理想,这种分工并不存在,而在事实上却是非常重要的。

按照占主导地位精英的真正结构,他们所具有的文化取向、他们进行控制的方式,这些中心的具体轮廓及动态,变化相当大。自然,随着组织、技术、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等条件的不同,中心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在轴心代文明的异构社会中(比如印度),我们发现了强大的符号中心,同时也有比较弱小的政治中心,如在非洲,不过,这些社会都具有非常完善的文化秩序模型,而且十分重视维护先赋单位的团结。相似地,多数伊斯兰中心所发展的特征,也类似于我们在非洲某些伊斯兰国家所确定出来的特征。无需说,在整个伊斯兰文明的范围内,中心的变异要比我们在非洲发现的变异多得多。

## 结 论

与60年代的讨论不同,本文讨论的出发点是强调:(1)一般地,制度结构的分析;个别地,社会分析的分析;(2)区分社会劳动分工与精英各种功能的完善的重要性;我们也说明了,这种区分所阐明的不同模式对不同社会的制度形态及其分化方式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表明了:第一,在技术经济发展和结构分化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中,社会劳动分工的这些不同方面与精英的主要活动之间的互动,造成了不同分化模式、中心动态和制度形态。第二,在某一层次或某一类型的分化中,或者在某种社会劳动分工中,随着情形的不同,很可能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模式。第三,这类动态中的差异完全受精英所形成的不同联盟的影响。最后,在社会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的不同层次和类别之间,即使绝不可能出现完全相同,这一动态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对类似。

所有这些思考都与社会劳动分工和精英功能完善具有密切联系。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于文化精英对意义建构的影响。类似的分析也可以在团结的建设、权力的调节及其各自的历程等方面进行尝试。

因此,本文分析的中心论点是,社会秩序建设的每一方面(包括文化)都有走向分化的“符号”趋势,都有走向自主发展的趋势。我们既不能假设这些趋势是与发生在社会劳动分工的趋势相伴随,也不能把它们归到分工过程之内。相反,正如我们所见,制度结构的这些方面既可能引起不同方式的社会分化和不同类型的制度动态,而且也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在社会秩序四个方面各自的领域中,以及在总制度结构中,这些方面还是引起分化的独立原因。虽然这已经超出本文分析的范围,但它应当成为未来社会学理论和比较社会学分析的一个中心问题。

(陈义平 译)

S.艾森斯塔德

## 历史传统、现代化与发展<sup>\*</sup>

### 现代社会历史分析中问题的发展

现代性与现代化、现代技术、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制度、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抗议与参与的各种模式,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但是,缘起于西方的现代化的这些以及其他方面的特征越是在整个世界上扩展,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来对其进行准确的界定就越是困难和令人发生疑问,这种困难特别是表现在难于确定当代的不同的现代社会是怎样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朝着同一方向前进、变得越来越相似,抑或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对他们在意识形态前提和制度轮廓及过程方面存在的根本性差别,如何进行解释?

#### 西欧文明

众所周知,从18和19世纪开始,现代社会历史思想与分析所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一般意义上讲的现代社会独有的特征,从具体的意义上讲第一个现代社会——西欧——的独有的特征。

---

<sup>\*</sup> 选自艾森斯塔德主编的《现代化的模式》一书,伦敦:1987。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人们更加强调的是现代西方社会——相对于其他社会的——独特性,在即使是在那个时候,确定这种独特性的确切性质也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在进化论者看来,这种独特性似乎是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即西欧社会达到了人类潜能进化的最高点,而在其他地方,则没有获得或实现这种进化的程度。在马克思看来,欧洲社会是唯一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可以肯定地说,有时马克思认为所有的社会都要经历同样的进化阶段,但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关注同时也表明,他认识到了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这是一个唯一能产生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正是从这里,资本主义体系扩展到整个世界。

也许关于西方文明独特性的最明确的阐述——以及对此所做的解释——可以见之于 M. 韦伯的著作。同时,也正是在韦伯的著作中,人们可以发现这种探讨途径的最令人发生疑问的方面——特别是将这种研究途径用于研究在欧洲之外的现代化的扩展的时候,就更是如此。韦伯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解释欧洲现代性的独特性和特殊性,如何解释为什么只是在西方文明中——而不是在其他文明中——这种特有的“激进”使世界理性化的趋势性得以形成。

韦伯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成过程中整个社会生活全部理性化的趋势中看到了这种独特性,这种趋势的重要外部特征可以见之于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如社会生活各种形式的科层化;世界观的世俗化;现代科学和所谓科学的世界观的发展等。他认为所有这些过程的根源都存在于新教伦理的潜在理性化趋势之中。

为了理解这种伦理所特有的根本性改造的潜势,韦伯将新教与其他的一些世界性宗教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他的研究中,韦伯努力将对世界性宗教的分析与对这些文明内部动态过程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分析这些宗教中内在的理性化趋势,并将这种动态过程与西方已经发生的动态过程进行比较研究。他强调指出(这也肯定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的理性化模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制度体系是可以大体上辨认出来的,

而每一种宗教理性化的模式都会形成自己的动态过程模式。

但在同时,韦伯并没有将他通过比较发现的隐含的取向充分加以阐述和引申——因为他比较研究的出发点和关心的焦点是西方的独特性,只是兼及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文明并没有在非西方国家中发育出来。他力图尽可能少地将注意力用于这些文明的动态过程,以阐述他对这些文明内部动态过程的想法,他所强调的不是这些文明的不同“传统”的方面,或非动态过程的方面。

这种矛盾——一方面强调西方的独特性并将其看作是世界的模式,另一方面又认为其他文明的动态过程是独特的——在韦伯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并不是很突出的(那时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扩展还没有超出欧洲,而西方本身也处于初期阶段),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现代化研究晚期阶段上,这种矛盾就显得越来越突出了。

有一个普遍的现代文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研究还处在萌芽状态的岁月中——这种萌芽以宏观社会学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的复兴和充分的系统化发展为标志——这种矛盾和问题也并不是很突出的。实际上,这时的矛盾看起来还不如马克思或韦伯的原著中那样明显。这主要是由于下述事实,即在这些现代化与发展研究中其基本的取向——与较早的“经典”研究相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些研究不再去强调欧洲文明与欧洲现代性的独特性,而是假定现代性的发展构成了人类潜能进化的最高点,但这种进化的种子也存在于大部分人类社会。因此,他们要探求的是促进或阻碍原则上可以发生在所有人类社会中的现代化发展的条件是什么。在这同时,他们实际上是将欧洲(也许还有美国)的经历理所当然地看作是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基本范式。这种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工业社会趋同论——最好的例证就是克尔(C. Kerr)的著作。在这方面的所有著作中,都努力将对微观背景的研究,对诸如沟通、城市化、价值转型等各种社会过程的研究与广泛的、宏观的社会框架结

合起来。

最初的现代化与发展研究都是同各种现代性、发展或现代化的指标来评价社会,力图确定所研究的社会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模式,并确定阻碍这些社会进步的指标是什么——许多后来的研究者也沿用了这种做法。他们认识到现代社会秩序可以从不同社会中发育出来的可能性,并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探讨。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这些研究中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对转型社会的差异性的认识,但人们仍然假定这种差异性将会消失,至少在这些社会的现代性达到很高程度的时候,这种差异将会消失。这种假设明显见之于前面提到过的工业社会趋同论。古德托比(J. Goldthorpe)指出:

他(克尔)强调,工业化过程中的差异性在其早期阶段——用罗斯托的话来说就是“与传统决裂”、“起飞”和“趋向成熟”阶段——是很明显的。但当“领路羊”——即已经进步的社会与发展中的社会的差别——的问题提出的时候,克尔的工业主义的逻辑使得他离开多线进化观而走向单线进化观;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他将现在所看到的不同的工业化过程看作是朝向相似的社会—文化方向进步的过程。克尔认为,当工业主义不断进步并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时,有活力的制度结构和有活力的价值与信仰体系的范围必然会缩小。所有的社会将会越来越接近于一种纯粹的工业模式,无论他们进入工业世界的途径是什么。<sup>①</sup>

隐藏在这些理论背后的,是对向现代性方向——政治的、经济

<sup>①</sup> J. 古德托比《关于工业社会的理论》。《欧洲社会学杂志》第12卷,第2号(1971)。

的、文化的——进步以及向普遍的现代文明进步的朦胧的信念,即使这种信念不得不用另外一些认识来调节,如有些社会并没有取得这样的进步,而像英克尔斯(A. Inkeles)和阿尔蒙德(S. Almond)等一些学者则越来越多地关注于共产主义—极权式的现代性模式的独有特征。

### 现代文明动态过程中的可变性

但是正如人们所知道的,正如在有关文献<sup>①</sup>的大量分析中所表明的,当代世界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发展并不能支持这种观点——至少不能支持简单化意义上的这种观点。而且,在不同的现代社会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制度变异的事实已经显得越来越明显——并不只是在转型社会中,而且在更发达的社会中,甚至在高度的工业化社会中也存在这种变异。

对大量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变异的不断增多的认识,对现代文明扩展过程中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动态过程模式的不断增多的认识,要求对此进行系统的解释。这种要求首先产生了两种重要的研究途径,以对最初的现代化研究模式的解体做出反应——第一种或第一组研究途径是强调不同社会中的传统的重要作用,第二种研究途径是强调国际体系,特别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并将其作为解释不同的现代社会或正在现代化的社会的变异的主要因素。<sup>②</sup>

但是,虽然这些研究途径肯定指出了影响现代社会或正在现代化的社会的动态过程的那些根本性的因素,但在他们努力去解释这些新的现代文明动态过程中存在的大量变异时,却遇到了许多问题——已经发生在不同的传统社会中的具体的变迁模式,以及一方面这模式与其各自的历史经历的关系,另一方面这些模式与由现代性的传播所形成的新的情境的关系。

① S. 艾森斯塔德《传统、变迁与现代性》,纽约,约翰·威利,1973。

② 对这种研究途径的更详细的分析,见艾森斯塔德《传统、变迁与现代性》。

## 一些可能的新方向——作为新文明的 现代性与不同的扩展模式

然而从上述争论之中,正在出现一些新的迹象,这些迹象表明了理解当代世界的一种新观点可能正在形成。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将现代化的各种“古典”范式结合起来的基础上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马克思(特别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分析中的启示)、葛兰西,特别是上面提到的韦伯——特别是他对不同文明内部动态过程的洞见——的理论中的一些因素。这种观点是以下面两种认识为基础的,即一方面是对现代性文明及其内部经济发展的独特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对现代性所做反应在象征符号、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差异性的认识,以及对不同文化和社会解释现代性的逻辑前提的不同方式及不同的制度模式和动态过程的认识。

这种观点包括着对现代化及现代文明的重新阐释,它并不是将现代化的过程看作是所有已知社会进化的终点——它将进化的潜势带给所有的社会,而欧洲的经验则是最重要最简明的表现与范式,相反,这种观点将现代性与现代化看作是在欧洲形成的文明的一种特殊类型,这种文明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扩展到整个世界,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笼罩了整个世界。

这种新型文明的定型化与过去时代的宗教扩张或帝国的扩张具有相似之处。但由于文明的扩张几乎总是同时包含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及强迫力量,它对受到扩张社会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历史上的任何扩张。

这种观点也包括下述认识,即历史上一般文明的扩张,特别是现代性的扩张,都会对那些受到扩张的社会中的象征符号和制度的逻辑前提提出挑战,要求这些社会要对之进行反应,以接受新的选择和可能性。正是从这种反应中,形成了有着很大差异的现代社

会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同时在他们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定型化产生于有选择的融合,因此,这也意味着是对原来“西方”文明与他们自己文明中的重要象征逻辑前提和制度形式的重新定型和改造。

### 欧洲现代性的核心特征

这种观点要求首先必须对这种新的、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和逻辑前提——实际上也就是欧洲或西方文明的基本逻辑前提——进行分析。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这种逻辑前提的首要突出之点就是这些形象和取向的“革命性”的起源。这种从根本上造成现代性突破的革命性取向已经导致了社会与文化秩序中心的性质和内容的意义深远的转型,导致了对参与和接近这些中心的规则以及中心和边缘关系的准则的根本性改造。

从这些中心的内容的角度来看,伴随现代性而发生的重要转型包括中心的日益世俗化、对现存的内容和象征符号的不接受以及可以对这些内容和象征符号重新加以考察的假设的普遍流行。这种变化是与政治、文化和社会中心日益增长的独立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与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的变化、与边缘对中心的日益增多的介入相联系的。这种介入既通过边缘对中心的接近,也通过中心对边缘的渗透方式实现的——当这种趋势发展到顶点的时候,中心与边缘的差异就会消失,它形成了一种在中心中参与的集体成员资格。

这些过程也是与对传统和权威的合法性基础的取向的变化密切相联系的。作为社会、政治、文化变迁和革新的主要象征性调节机制的过去状态的神圣性已经让位于对创新的接受和未来取向,这已经成为文化取向的一个基本方面。当然,正如许多文献所强调的那样,在欧洲这也是与这样一种假设相联系的,即通过人和社会的有意识的努力,可以不断扩展人文与自然环境,改变人类的命运和方向,甚至成为主人。实际上,欧洲现代性的核心逻辑前提就是

通过人类有意识的活动与参与能够形成一种积极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秩序。

这种逻辑前提的最充分的——当然不是唯一的——表现可以见之于新教伦理在经济、科学、政治等领域中的改造作用和影响，后来的这种转变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最初影响是相当一致的。据此可以认为，欧洲现代性的独有的特征开始时主要是努力形成一种“理性”的文化、有效的经济、民众（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在这当中，“理性”扩展的趋势越来越清楚，并形成了一种以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因此从这种背景中产生的新的现代性文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是以关于平等、关于公民在中心不断增多的参与的假设为基础的，这种文明清楚地表现在下列趋势之中：普遍的公民权和选举权的形成，某些“参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形式，以及关于参与的意识形态的产生。

这些努力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种以领域内的人口的文化和政治认同高度重合为特征的社会与文化秩序；对中心的较高度度的象征和情感上的承诺，以及这些中心与人类最原始的方面的密切关系；为国家或阶级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确定的在政治上明确规定的共同的集体目标。

欧洲民族国家的许多特征是从他们前现代（pre-modern）的政治—社会传统中产生并传播开来的——从帝国的传统、城市国家和封建社会的传统中产生和传播开来。它们将城市国家中强有力的积极取向、与许多帝国传统中的宇宙观和文化秩序相联系的广泛而积极的政治秩序观念、宗教传统、封建传统中的多元主义因素结合了起来。在欧洲（特别是西欧）的传统中，这些不同的取向都是根植于一种特有社会结构之中，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各种群体和阶层对文化政治秩序和中心的承诺程度是相当高的，其接近这些秩序和他们各自的中心途径的自主性也是相当高的。

作为这个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也

是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从一系列结合在一起的因素中产生出来的,这些因素包括将经济活动神圣化,使之成为使自己得到拯救的舞台,人类控制人文和非人文的环境的观念。这种对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强调已经成为这个文明基本逻辑前提中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

欧洲这些意识形态和象征符号的发展恰恰是与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的——这首先表现在商业的扩张上,后来又表现在工业的扩张上,同时它也是与超乎预料的技术发展和经济扩张相联系的,这导致了自我维持增长的工业体系——即工业资本主义——的成熟。但是,虽然这些方面的发展和现代性——结构性经济和与文化政治领域相联系的象征——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既使是在欧洲,他们之间也不存在一种单一的、一对一的关系。从某种程度来说,它们能够互相独立地发展起来,但这些因素总是对他们所由产生并对此形成冲击的社会构成连续不断的、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挑战。

### 现代文明的扩张

这种在欧洲产生的新文明后来传播到整个世界,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国际关系体系,其中的每一个体系都是以这个文明中的某些逻辑前提为基础的,但在同时,这种文明也造成了一种在这些体系中不断发生变迁的趋势。通过这种扩张,出现了一种形成普遍性的、世界性的制度与象征框架的趋势,从人类历史看,这种框架都是新的,实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只是伴随欧洲的扩张而来的,并不是一种而是几种实际上也是世界性的体系,这些体系并不是来自同一个中心,而是来自于多元的或多极的中心,每一个体系都会形成自己的动态过程和自己对其他体系所做反应的方式。虽然这些不同的体系都是产生于同一个地方,即产生于西欧,虽然它们也是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每一个中心的权力和影响力都是不同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从这些国际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内部来看,对国际经济体系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这里已经形成强有

力的反应,这集中体现在各种各样的革命性的民族和社会意识形态之中。

各种现代意识形态和逻辑前提在整个世界的扩张也是与结构和组织方面的意义深远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与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这种变迁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变迁是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进行的,这些运动与许多其他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变迁和造反运动不同,这些运动趋向于将抗拒运动与强有力的制度建设和中心形成的趋势结合在一起。

由此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将不同的国际体系“分离”开来或使其中的任何体系维持一种持续不断的均衡都是相当困难的。在特定的国际背景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不是静态的或固定不变的。实际上,正是这种背景的动态过程造成了不同体系之间的关系的持续不断的变迁,而且由这种动态过程所造就的力量也在这些体系的内部形成了不同的变迁过程。

当然,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现代性在欧洲以外的地方传播的整个过程背后的历史情境的性质,以及这种历史情境与欧洲现代性发展的历史情境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在西欧,现代性基本上是从内部发展起来的,即“内生型的”——尽管在欧洲的不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换言之,这种发展主要是通过某些群体的内在潜质发扬光大以及通过这些群体持续不断的互动实现的。但是,现代性在欧洲以外的扩展则明显具有外部力量侵入传统社会和文明的性质——实际上西欧社会的逻辑前提已经构成对那些必须做出不同反应的社会严重挑战。

### 一些新迹象:问题与可能

国际体系和运动的持续不断的扩张要求将那些既不具备新文明的象征逻辑前提也不具有这种新文明的特定制度轮廓的社会和文明合并到这些体系和运动中来。当然,这也会瓦解这些社会既有

的象征与制度的逻辑前提,将各种新的选择机会展现在这些社会中的各种群体面前,并在这些社会中形成了意义深远的变迁过程、不同力量之间的互动过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新的象征符号和制度形式的定型化过程。

这种互动和反应模式是由一些基本因素之间的持续不断的互动形成的,这些基本因素包括:第一,一个社会进入新的国际系统的“切入点”、受到这种切入冲击的制度结构的特定方面、由这种切入所造成的选择机会、这些过程中连续不断的发展与变迁。第二,这种互动和反应模式当然会受到这些社会中既有的技术模式和经济体制的重要影响。第三,这种互动和反应模式的形成也受到受冲击的文明和社会的基本逻辑前提的影响,这是指关于宇宙和社会秩序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社会与文化秩序,这些社会中的等级结构和性质,以及这些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精英的结构。第四,这些互动和反应模式的形成也受到历史上对变迁所做反应的传统的的影响,在大多数文明中,特别是在所谓“伟大文明”(或轴心时代的文明)中,都形成了这些传统,在这些文明中,都存在过对内外变迁经验和传统以及对这些变迁所做反应的传统的定型化。

就这一点而言,韦伯对不同文明动态过程中异端的关键性作用的强调是极有意义的,这就意味着,在欧洲那里集中了最多的异端,即使是在天主教和基督教内部也是如此。韦伯特别强调了从不同文明的异端中形成的创新和转型的潜势。

这些群体和运动的差异是很大的,原因即在于他们当中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取向的差异,其各自社会中宗教制度、组织结构和自主性上的差异,以及他们的内部团结和与社会中广泛阶层的关系。正是各种异端相对于他们文明中的正统来说的这些不同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些文明的动态过程、转型能力、他们对变迁的反应以及他们的创新方向——欧洲现代性的发展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这些文明中,由来自正统和异端的基本精英和次级精英承

担并要求创新潜势并不具有唯一的类型。相反,这种潜势是各不相同的,异质性的,并往往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表明,这些不同文明的不同的转型潜势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尽管这种发展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其方向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这种历史条件能有利于或促进某条发展路线,以及有助于潜势的明确化。

### 现代文明定型化的动态过程

正是这些过程的持续不断的互动和反馈造成了现代社会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的不同制度和象征轮廓的定型化,他们的动态过程以及其内部的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这些互动和反馈包括受到新的现代国际体系冲击的那些文明与社会的基本逻辑前提和这些社会进入国际体系的切入点;在这些文明的历史中所形成的异端、造反和创新的传统等。

也正是在这种过程中,不同社会和文明连续不断地将不同的结合方式以及对现代性逻辑前提的重新解释加以定型化;将对此的象征反应方式加以定型化;形成各种现代制度模式和动态过程,或者反过来,将对这些文明的逻辑前提和历史传统的重新解释的方式加以定型化。

不同的象征符号和制度的集聚是相对于下列因素而发生的:首先是对于不同的现代文明的基本象征观念和逻辑前提的解释;其次是按照新的“现代”传统对现代性的基本象征符号和逻辑前提进行选择 and 重新解释的方式;他们关于自己以及自己的过去的看法;他们的新的象征符号和集体认同,以及他们对一般的现代性,特别是西方的现代性的积极或消极的看法。

这种重新解释过程也是与他们关于经济发展的看法相适应的。虽然对于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强调肯定是每一个现代化或正在现代化的文明与社会的组成部分,但在其整个社会与文化逻辑前提中赋予这种发展的意义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首先,这种差异表现在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强调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控制自己的环境的

考虑,多大程度上是出于适应环境的考虑;经济目标在人类总体目标中的相对重要性;不同政体——是专制的、多元的,还是极权的——消费取向和生产取向的相对强度;主要的政治抗拒和参与的模式;关于权威、等级和平等的观念。

与之相类似的是,这些不同发展的定型化——是与象征符号层次上的定型化紧密相联的——也牵涉到现代组织与制度的不同形式。虽然诸如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传播媒介的扩展过程在所有社会中都是共同的,但面对这些问题所形成的具体的制度都会有很大不同,它们也是与其所有发展出来的社会中的社会与文化秩序的基本概念相联系的。

如同历史上所有的变迁和新的社会形式的定型化一样,这种定型化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处在社会结构的不同层次的精英——旧的与新的——和领导群体,他们的理想,他们之间的不同的结盟,当然也包括与新的、不同的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外部”力量的联盟——在对现代化的持续不断的挑战形成的不同反应中,这些群体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如同上面所分析过的异端一样,这些群体也不是同一的;他们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甚至已经形成的新的精英也要在很大程度上受这些社会中对变迁的不同反应传统以及现存的异端和创新传统的影响。

对所有这些过程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的任务已经摆到了我们的面前,而且这个任务也成为对现代化、对现代文明、对当代世界进行社会学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方案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个任务是困难而艰巨的。这本书中所收进的论文是对完成这个研究方案的一个重要贡献。

(孙立平 译)

F. 布利考

## 现代性、“共同参照”与现代化\*

为了澄清首先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又还没有扩展到整个人类这一段现代化(包括城市化、工业化和世俗化)中的不同过程的性质,我们应当首先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现代社会”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序言中,韦伯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但他的分析是相当模棱两可的。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相当于“西方社会”,他强调的是其起源。而非西方社会则都或是主动地或是被动地卷入西方化的过程。西方世界之外的人们能够实现没有西方化的现代性和现代化吗?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尽管我们承认非西方社会对今天的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只有在西方科学的发展才是有“可能”的,现在也不得不接受西方关于科学的观念。韦伯既没有蔑视中国的科学,也没有蔑视印度的天文学。但他关于西方艺术的评论,特别是对音乐和建筑艺术的评论是很值得引用的:

其他民族对音乐的感受力,也许比我们的更发达,至少不亚于我们。但是理性的和谐的音乐,包括配合旋律与和声,在三和弦和三和声基础上形成的音质,我们的管弦

---

\* 选自艾森斯塔德《现代化的模式》一书。

乐,我们的记谱系统,所有这一切都是西方所特有的。<sup>①</sup>

在音乐这个例子中,韦伯所分离出来的西方社会的特点就是形成能更好地进行演奏的系统化的能力,这特别是表现在技术层次上。以和谐的原则为基础制造出来的乐器就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规范性的科学。

将这看作是对专门化能力的颂词也许是合适的。西方的科学家并不是圣哲;他首先是一个专家——尽管他的专长会使他对科学原理进行哲学上的思考。能力也是管理者必须具备的。用韦伯的话来说,在“传统”社会中,最高的地位只能赋予那些有着多方面的威望的个人或群体。而在我们这里,社会等级结构中最高位置只有那些有能力的人才能拥有,他们的权力是与真正的知识相联系的。确实,赋予能力和专门化以很高的价值是我们文化中固有的一些紧张状态的根源。不要说这种特点的全球化,就是扩展到西方以外的地方,其可能性也是令人怀疑的。

西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所做的贡献是被人们逐步认识的,尽管对西方经济的赞誉也远不是一致的。

尤其是由定期选举出的代表组成的议会,以及由群众领袖和政党领袖组阁并向议会负责的政府,更只为我们所独有,尽管政党,即施加影响并要控制政治权力的组织,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实际上,国家本身作为一种理性的、有着成文宪法、理性制定的法律的政治团体,作为一种有着理性的规则和法律、由经过训练的官吏进行管理的行政实体,即所有这些特征的结合,是仅存于西方的,尽管其他各国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sup>②</sup>

① M.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帕森斯译本,伦敦,1976,第14页。

② 同上,第16—17页。

如果不去说民主制的话,现代西方也是宪政国家和法制的发明者。西方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发明者,按韦伯的看法,资本主义依赖于“通过利用交换机会获取利益的期望,也就是说,依赖于和平的(正常的)获取利益的机会”。这种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的应用需以两个重要的制度条件为前提:“对形式上自由的劳动力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理性地加以组织”,“企业与家庭的分离”。这两个条件并不处于同一分析层次。就后者意味着对世袭制的否定来说,它几乎被人们共同看作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凡是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地方,所有者就会像一个靠投资的收入生活的人那样行事。就第一个条件而言,关于利润的看法也会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将其等同于剥削。在天主教的许多教派的传统中,利润也是或多或少令人怀疑的。由于这个结论完全是从企业经营的框架中得出的,利润的标准并不能反映在这个范围之外的消极影响,如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这个标准也不能反映在这个范围之外的积极的影响。因此,西方对现代性的贡献甚至在西方也受到抨击,如来自传统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抨击,而在大部分非西方国家,这种现代性则被粗暴地加以拒绝。他们并不将这些看作是西方对世界性文化或文明形成的贡献,而是将其看作是掩饰西方帝国主义的外衣。

正如整个人类都将现代西方所形成的科学方法和民主制度看作是有全球意义的贡献一样,将我们的经济制度和某些文化价值推向全球的努力却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在技术领域中可以见到最明显的矛盾情绪。技术已经使西方人获得了对自然界的更大程度的控制,他们在这方面所拥有的力量远超过非西方人,就此种意义而言,技术受到了赞扬,因为它使得西方人的地位远高于他们的祖先。但是,技术也形成了对人类的永久性的控制,这样,技术又成为人们憎恶的对象。

我们已经对进化论感到不满意,这种理论要求用一些简单的法则来解释所有社会的发展,并认为在发展的终点上我们的所有理想都会得到实现。但是,现代化——意指现代社会目前的状

态——并不是历史的终点；如果将这种现代性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独具的特质，我们也不能判定现代性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确实，所有这样的社会都共同具有一些独有的特质：与纯科学有着多方面的关系的发达的技术；任务和活动的明显的专业化；对统治者的权力加以限制的控制和调节机制的分离。但是所有这些特征的总和足以定义一个有着内在凝聚力的、有效的和令人满意的社会吗？它能够表明我们的同时代人所拥有的理想吗？对于我们来说，这里所指的是现代社会应当是什么样的，还是现代社会能够是什么样的？

韦伯所列举的特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特征的层次，这些特征是如何组织成一个体系的，却提出了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这些特征的层次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标志。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关于最大利益应放在什么位置上的争论并没有消失。因此，确定一个单一的现代性系统——同样存在于法国、以色列和日本——如果不是实际上不可能的话，也需要无数的比较研究。

与其从所有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中选择其中的一些因素来规定一种现代性的体系，倒不如让我们做出一种假定，构思现代性的方法之一——决不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在理解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他们与其他社会的关系的，即如何看待他们与非西方人的关系。也许我们可以从现代性如何对待“野蛮人”来了解现代的特点。但这种方式有使我们走入死胡同的危险。我们能够说现代人就是使自己进入文化相对论的陷阱的人吗？能够把人性看作是从那些不能互相沟通的单个群体中杂乱无章地抽取出来的东西吗？种族中心主义的信条是逃避现代主义者的相对论的唯一方式吗？

在这里，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的第三十封信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一个叫利卡的波斯人告诉他的朋友伊本，巴黎人是如何对待他的。他一开始就强调，巴黎人“对他的几近奢华的打扮感到惊奇”。这个波斯人说，“所有的巴黎人都来看我”。可见，正是他们之

间的差异引起了人们的好奇感。“那些紧紧拥挤在一起的人们在互相议论：‘你看，他真像一个波斯人’”。在这里，巴黎人是通过确认他是一个陌生人来确定他的身份的，人们一开始就把他看作“仿佛是来自于天堂”。但过了一段时间，这种处处引人注目的情形将利卡搞得疲惫不堪，于是他决定不再穿波斯服装，这时也就没人对他多加注意了。从外表上看，他已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人并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并不相信“血统”是不同人类群体之间存在的客观的差别。巴黎人和波斯人的唯一差别是文化上的，也就是说只是人为造成的。这种差异依据的衣饰，依赖的是孟德斯鸠后来在《风俗与生活方式》中所讨论的那些内容。这样，利卡才回复到不引人注目的状态，回复到他戏称的“不唬人”的状态。但是，当按照其他的一些特征将他看作是一个波斯人，或经原来就知道他是一个外国人的人的指点确认他是一个波斯人的时候，人们都会说：“啊！啊！这个绅士是一个波斯人？这太不可让人理解了！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是波斯人？”

当然，这里对我们的问题并没有提供直接的答案；但如果经过一些引申，我们就会得到一些结论。首先，这里存在着一种对不可理解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惊奇或惊异。这种对于差异的理解将这个波斯人置于整个一个他人的地位。他与我们是不同的。巴黎的观察者对利卡的好奇心很快得到了满足并随之消失：“他真像一个波斯人”。利卡并不超过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不久，人们就不再对他另眼相看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的那些最先被认定为是波斯人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属性只是最通常的外表，即他的衣饰。一方面是针对陌生人及其独特性的好奇，另一方面是陌生人实际上又是很寻常的，两种情形相对照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是波斯人？”

孟德斯鸠预见到了蒙田提出的人种学研究方法的可能性。在蒙田的《散文集》第一卷第31章中——讲食人族，或“这个世纪所发现的另一个世界的居民”那一章中——他提出了现代相对论的理

论基础。“在那个民族中并不存在野蛮或不文明的东西,尽管所有的人都将其称之为‘野蛮’,但实际上那只是人们并不习惯的东西。”这个命题与帕斯卡的著名论断是一致的,帕斯卡说:“在比利牛斯山这一边是真理的,在另一边就可能是错的”。但蒙田提出了第二个命题,这个命题实际上是一种关于高尚的野蛮人的罗曼蒂克的思想:“他们是野的——正如我们称某些水果是野生的是一样的,只是因为他们是自生自长的,而不是人工养殖的”。这些非西方人,这些美洲的食人族都是赤身裸体的,而孟德斯鸠笔下的巴黎人的独特特征则是他们的衣着。但是,这种罗曼蒂克式的“高尚的野蛮人”的说法并不是人种学上相对论中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内容。蒙田并没有将人性降低为纯粹的自然性。但食人族只是在他们所食用的东西在生长的过程中都没有使用过农药和化肥的意义上才不是自然人。而由于他们只服从于自然法则,他们又是自然人。此外,他们的所有道德伦理都可以被减化为两条原则,即在战斗中勇敢和对女人的爱。这里真正有价值的是蒙田从对食人族的描述中抽象出来的结论。也许是他们实际上还是被人们称之为野蛮人。

难道他们不是聚集在一起将俘虏的肉烤熟,然后吃掉吗?但是,他们的野蛮状态并不在于他们的风俗与我们的只杀敌人的风俗是不一致的。我们之所以能将他们称之为野蛮人,是由于某种理性的规则,而不是建立在与我们自己的比较的基础上,我们在每一个方面的野蛮程度上都超过了他们。

用某种原则来取代人种学的相对论,才可以对所有的人进行判断,并赋予人类的理想以意义。

在我看来,这里似乎至少有三种动因使得我们当代人对人种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第一,人种学的相对论可以打破我们对自己的社会所产生的自命不凡的优越感,人种学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一副

清醒剂。第二,人种学反对关于“野蛮人”或“原始人”的自然性的看法,指出了文明人的腐败与做作,从而强化了一种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的魅力,这恰好类似于伏尔泰给卢梭的信中所指出的“回到我们自己的田野中去”的说法。但是在现代文化结构当中,人种学还承担着第三种功能,这第三种功能也许要比前两种功能更为重要,即可以使我们发现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适用的普遍性的原则,尽管它并不能阐明这种原则的性质。

我们认为,可以将任何一个表现出这种普遍意识——这一点是较为含糊的——社会定义为“现代社会”,这样做虽然也有局限性,但可以使得我们去探讨它的意义。这种下定义的方法必然会造成一些问题。确实,在人们讲人性的时候,是假定人性是已经存在着的。我们这里所讲的,是相当于马或驴子的属性的那样一种人类的属性,即一种相当完整的人类理性,一个有着所有的器官、制度和权威的人类社会。普遍主义即是这种现代主义词汇中的一种。但是,“普遍意味着什么?”

当人类学家对人类这个概念进行定义的时候,碰到了许多困难。对这些困难,杜蒙(Louis Dumont)发表了一些有意义的看法。他一开始就对人类的普遍性和不同人类社会的特殊性进行了比较。杜蒙写道,毛斯认为“人类学是以人种的一致性为前提条件的”。但在另一个方面,也不能否认,具体的人都是分属于“特定的社会”的,这种“人种的社会便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杜蒙接着指出,种族中心论的特殊性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特别是现代西方的种族中心论更不能接受,因为现代西方人是与个人主义的变质联系在一起的。现代西方人只知道那种怀有贪欲和野心的“孤立的”个人。因此,现代人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次序感和整体感。今天的人类已被囿于那些小规模自我封闭并极其虚弱的社会的特殊性之中——一群庞然大物的征服性的种族中心主义。杜蒙在人类学的发展中看到了解决这种冲突的可能性(毛斯将其称之为民族学),因为人类学的研究途径中隐含着一种“共同参照”。

这种参照物是由什么构成的?杜蒙认为他已经在赫德尔和莱布尼茨那里找到了答案,但这两个人的理论都不能令我信服。姑且退一步,我们承认杜蒙的说法,即赫德尔最大的贡献是“确定了文化价值社区的起源”,尽管文化社区的“源启”并不一定是总体性的或根本性的。但在我看来,在杜蒙将莱布尼茨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论据时,他是将一种毫无道理的论点与充满争议的类比联系到一起了。“每一种文化都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表现出它们的普遍性”,这句话典型地是将未经证明的论断作为证明论题的论据。在这里,全部的问题是“怎样”。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种类比是软弱无力的。对莱布尼茨的理论中的那些基本的成分可以用这些成分与创造来维持这些成分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加以阐明。但杜蒙所说的维持“文化社区”的上帝又在哪里?这种“普遍参照”也许只是一种修辞学意义上的比喻?

“普遍参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它构成一种标准,舍此之外就不可对我们的活动和座右铭进行充分的判断。康德就曾将道德判断严格限于那些其座右铭是能够加以普遍化的人。这种关于普遍性的标准也是同样与政体的合法性基础相联系的吗?现在激进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自称为政体提供一种共同的道德标准。在这两种情形中,都存在普遍的标准。但是,这种普遍标准是由什么构成的?这种“普遍参照”的内容既难于定义,也不能从经验上加以确定。

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在任何社会中都以同样的形式存在着的。甚至核心家庭也有不同的形式;在过去的50年中,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在从扩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与工业社会的发展之间建立起联系,但这种联系远没有得到确定。为了使我们只面对有限的一些因素:韦伯在上面我们提到的那本书中试图研究的西方社会便有一些共同的制度。但法国的科层体制与普鲁士的就不完全相同。至于瑞士和美国——他们有完全相同的韦伯所讲的那种科层体制吗?同样的道理也可以适用于资本主义企业,比如法国的资本

主义企业与英国就是不同的。

因此，“普遍参照”并不能按照那些所有的社会所共有的制度来定义。它也不可能用某种独一无二的因素来加以定义，即这种因素完全可以决定它们的进化，并使得我们可以由此来解释其各自的历史。首先，“普遍参照”这个概念会牵涉到“人性”这个混淆不清的概念。人们居住在不同的地方，但他们是彼此相同的，因为从总体上来看，他们有着同样的态度和同样的需求。马凌诺斯基及其第一代功能主义理论的支持者们就是按这种思路进行推理的。从传统上来看，人们也愿意支持这种理论，因为这种理论至少可以解释人类的那些与哺乳类动物共有的行为。这样，关于“普遍参照”的这种自然主义的观点就成为关于冲动的经典理论的一种延伸。人们之所以是不同的，只是在于他们通常对饥饿、高温以及由创伤引起的疼痛所做的反应方式的不同。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总是雄心勃勃的。马基亚维利和霍布斯被认为是“现代人”，因为他们的政治理论是以某些冲动为基础的——比如对权力、对女人和对敌人的冲动。这样，现代性被看作是以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为前提的，而世俗化又是与用冷酷无情的眼光来看待法律、宗教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但也有一些观点是将“普遍参照”还原为某些诸如技术的因素，马克思主义者最充分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由人们对自然界的活动而引起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同的。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与自然的这种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基础，因此也是统治的基础——简而言之，统治也是一种劳动分工，而且这也是人类所有冲突和所有的进步的源泉。这样，现代性是与不断强化的劳动分工相联系的。根据这种理解，现代性就是作为进化法则的劳动分工，这种进化法则既表现出人类曾经受到和目前仍在受到的限制，同时也表现出这种进化也在为人类的自由铺平道路，并成为获取这种自由的逻辑前提。

“共同参照”并不仅仅是一种名目吗？在利奇(E. Leach)的《人的统一：思想史》一书中，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

作为一个分类博物学家的林奈在人类的变异置于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来考察方面所做的工作,要比罗素和杰弗逊这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做的工作更富有成果。在林奈看来,人类的变异很类似于狗的驯养,他们的外表和外部行为是不同的,但他们的道德属性却是相同的。我很倾向于那种平等论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只要接受我的观点,所有的人就都是平等的。

也许我们不得不对人类种属变异中的“相互关系”的观点表示赞成的态度;但这能减化像羞怯、侵略、筑巢行为、饮食习惯或者社会性这样一些特质吗?对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距离的减小是不正确的吗?如果不对人类这种特殊的动物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研究者能够从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抽象出某些差异吗?那些被作为参照群体(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群体的独特属性能够说明遍布不同国家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存在过的整个人类的特征吗?

在列举了这些困难之后,能够将现代性的特征看作是文化与社会不可简化的多样性吗?实际上,“普遍参照”不只是这些共同需求和制度的总和或聚合,它要大于这个总和。这种“普遍参照”也不能被简化为整个历史上的劳动所共有的某些假定性因素。但尽管如此,“人的统一”这种表达方式还能具有另外一层含义。正如利奇所指出的,人的统一的概念有两种基本而不同的含义。首先,它意味着等值(equivalence)。从这种观点来看,所有的人类都是平等的,但每个人都被他的同类看作是独立的。在第二种意义上,统一意味着社会联系(social solidarity)。从第一种含义来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他们对像疲劳和饥饿这种生理上的刺激会按同样的方式作出反应;但是这种相同的属性是极为有限的。它甚至与人类需求的类型也不一致,因为由于社会因素的作用,自然需求也具有了某种相对性。而最重要的则是,它抽象地将个人看作是“互相独立”的。但大部分现代人,特别是那些按照“社会联系”来研究人

的统一问题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却将联系等同于同值。除非那些社会都是由同样数量的成员构成的,否则,就不存在互相依赖的社会。同等性只不过是一种概括的可替代性。由于这种可替代性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假如说不是不可能的话,就只有通过否定个人之间的差异来实现这种联系,反过来,这就需要一种具有约束力的甚或一种极权主义的权威来“削平棱角”。但这还不足以说明所有的人都具有某种共同的特质,这种观点与所有的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如欢乐颂中所唱的:“所有的人都是弟兄”)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我们必须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对联系这个概念进行分析,从而使我们不致由极权主义导致一种由外部强加的总体性的概念,并避免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同样的个人,而这些个人由于是互相分离的而处于一种软弱无力的状态。

现代人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在他们的内心中确定他们讲“所有人都是弟兄”时所意味的究竟是什么。这也是启蒙时代人们的抱负。当孟德斯鸠对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波斯人的问题感到惊奇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预见到了由利奇所提出的宽容问题。读一下《风俗与生活方式》就可以发现那里有关于联系的更重要的反思,这种联系将一个社会并将不同这样的社会联结在一起,同时也将构成这些社会的个人联结在一起,最终也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类的思想——人类能够是一种什么样子。然后,在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特定社会的共识中,也就是可以适用于由这些特定社会所构成的普遍社会中,我们可以找到“共同参照”。但在涉及到具体的社会时,我们必须将两种共识区分开来,一种我们可以称为固有的共识(inherent consensus),另一种可以称为沟通共识(consensus of communication)。从第一种共识的意义上来看,人的统一性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生理特质、都拥有某些共同的东西(对这些物品的拥有并不能避免他们在对于其他物品的拥有方面发生冲突)、都拥有某种共同的身份,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之相对照的是,在暴政面前同等的软弱无力。按照孟德斯鸠的看法,我

们可以将沟通共识称为“一个民族的普遍精神”，这种共识在不同的个人之间建立起联系，并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这种“普遍精神”是共同的也是特殊的。在一个群体内部，它是共同的，因为它调节着这个群体成员的互相交往。同时，它也是特殊的，因为它有助于形成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独特性。这种表现出“一个民族普遍精神”的沟通共识或互动共识确保了不同个人之间的联系，而无需去掉个人的那些差异，而且这种共识也为人们之间的某些联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这种共识是经过多种途径形成的，这些途径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环境将一个群体置于一种特定的情境之中——这多少类似于孟德斯鸠所讲的“气候”，而这种情境则对这个群体的成员施加了某种共同的限制。“法律、习俗和生活方式”都在施加和灌输文化的普遍精神方面起着作用。这些规则中的每一种都成为一种独特的心理资源。但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准确无误地发挥作用。有时法律就会因与习俗和生活方式相抵触而不能发挥作用。

说联系是所有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当然是没有错的，但也是很充分的。联系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的实质，而是在于它的形式。我认为，为现代性下定义的方式之一就是我们为联系下定义的方式。我不认为我对他人平等性的认识是依赖于他们分享着我们自己所特有的价值。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对于其他价值的多样性和合法性的认识，对其他价值的承认，都是应受到保障的。而实际上，这种传统上的极端化的自由主义使我们必须反过来看它的两个前提。首先，心智与精神的共存是可能的，就恰如人们（peoples）与个人（individuals）的共存是可能的一样。这种共存并不意味着平等或等同。孟德斯鸠甚至认为，这种共有可能会伴随着征服，伴随着在胜利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建立起来的等级结构。我们将其作为现代性特征的传统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前提是，每一种社会层次结构的效率事实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造成个人和群体的行动与其身份之间的差异的法律、习俗和生活方式，总会时常不断地受到蔑视

或违犯。它们的维持有赖于政治家和法律的制定者,以及个人的服从。其结果就是,个人只是将社会秩序看作是一种较为宽泛的行动可能性的框架。用从天主教神学那里借来的概念来说,世界不仅需要人们对神意的一般性的支持,而且也需要人们按照这种神意进行自己的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说,关于社会的现代观念包括着最低限度的个人主义,即承认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对他在特定条件下的行动负有责任的。

正如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普遍参照”既不是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社会所共有的特质的集合,也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单一的因果因素。它是一种条件系统,这个系统使在某些方面有着不同愿望的人能够形成一种共存的社区。这意味着这种社区是普遍性的,而且是理论上的。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社区既调节着我们对于他人的理解,也调节着我们与他们的合作。用康德的话来说,这种关于社区的思想既是一种纯粹理性原则,同时也是实践理性的一种前提条件。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出发点。毫无疑问,这里存在着许多对现代化下定义的方式;但所有这些方式都会使我们涉及“普遍参照”的问题。现代社会的特征与其说是那些共同的因素或他们的结构,不如说是他们在普遍化问题中的投入。比如,资本主义就对交换的普遍化作出了贡献,并将交换扩展到整个世界。就普遍的国家而言,确实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有了,但其完全形成则是在近代的欧洲。在宗教领域中,各种各样的天主教教派要比其他宗教更加追求信仰普遍化的目标。对“普遍参照”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感到是如此的强烈和急迫。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参照”的含糊不清的性质,特别是在我们试图将其作为现代性的特征时,就更是如此。我们已经看到一种危险的结合,即一方面是人类的不同群体按照一种特殊主义的方式从属于他们的文化与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通过欺骗性的行为使沟通能得以进行,这种沟通并不只是在越来越多的这

样的群体之间,而且也发生在群体成员之中。因此,现代化的过程是来自两方面要求的结果:它是对由自己的偶然性所封闭起来的群体的挑战,以及使自己成为集体对话者的特殊性,使他们成为最有可能交换自己的资源和思想的伙伴。

(孙立平 译)

伊恩·温伯格

## 工业社会的趋同问题： 对当前理论的批判<sup>\*</sup>

### 前 言

各个工业社会是否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这个重大问题自社会科学诞生以来，尽管有时不幸地被当作一种假设来对待，但在理论上已经引起人们的重大兴趣。对进步持有乐观态度的启蒙思想家都赞成趋同论，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全“人类”的完善，而不是社会中某些群体的完善。<sup>①</sup>主张把个人而不是人类看作研究的基本单位，即思考的前提，是一种激进的、反相对论的观点。因为如果世界各地所有的个人都有同样的行动，那么，社会组织的形式必须在本质上有相同的属性，并朝着结构相同的方向发展。从道德上说，善是无处不在的。塞缪尔·约翰逊说过：“暹罗国王向路易十四派遣使者，但路易十四却没有向暹罗国王派遣使者。”可是，约翰逊在《拉塞拉斯》的文学想象中把外交使团派遣到了阿比西尼亚，大概是为了清除自己思想中的种族优越感。对“高尚的野蛮人”的崇拜不仅

---

\* 选自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一书。

① 伯里：《进步的观念》，纽约，1955年；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堂》，纽黑文，1935年；马丁：《18世纪的法国自由思想》，纽约，1963年。

是18世纪浪漫主义的一个成分，它还表明欧洲人，甚至连法国人，也从他们茹毛饮血的同时代人的简朴生活中学到了某些东西。许多人像启蒙思想家那样认为以开明专制君主为形式的国家，能不断改善自己的社会，而且往往把知识分子这样的中间群体看作君主在实现这一伟大事业中的盟友或顾问。各种社会的政治结构的趋同，即都具有强大的国家、知识的精英和成熟的舆论（此词源出18世纪革命以前的法国），看来不是不可能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由于米拉波没有将这种幻想付诸实践，幻想未能成为现实，而革命前的那种乐观主义就变成了孔德和德梅斯特尔的悲观主义。<sup>①</sup>如果说前者还试图保留他的前辈们的某些乐观主义，那么后者看来至少退到了菲尔默的立场，否认成文宪法的有效性，吹捧君权神授的重要性。<sup>②</sup>

实际上，启蒙思想家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激进，他们深受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观点的影响。他们为开明专制君主所作的辩护使两种倾向普遍流行。这两种倾向对后来的现代化理论家和主张工业社会趋同的理论家有深远的影响，而工业社会趋同的理论则构成了现代化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首先，他们利用中世纪分权固定性和哥特人野蛮说的神话，那是一种十分流行的浪漫主义思想。这同以能动的态度看待社会的进步变化和开明专制君主集权力于一身形成对照。第二，他们离开了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所创造的经验主义传统，断言政治制度都具有民主的基础。他们认为，国家与社会成员是互不相关的因素，把它们结合在一个综合体时便形成了一个最高的政治体系。按照这种观点，其中每个因素握有多大权力在理论上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示。每一个因素的力量可以测量出来，其稳定性和效率可以用科学术语来解释，并演变成政治体系应当加以仿效的模式。曾经庇护过君主合法地位的神性已被

① 布拉姆森：《社会学的政治背景》，普林斯顿，1961年。

② 德梅斯特尔：《论上帝与社会》，芝加哥，1959年。该书著于1808—1809年。

漠视,因为上帝的影响据称无法测量,是后来演变成为语言哲学观点的一种象征。

启蒙思想家确实按照体系进行思考,因而有助于把牛顿的机械论引入社会研究的领域。他们认为国家就是按照某种体系所组成的社会。在理论上与自然科学进行类比加强了他们的观点。然而,尽管他们对实际事务感兴趣,但从本质上看却不属于经验论者。

在19世纪,进化的理论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和达尔文的影响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种理论使马克思、斯宾塞和其他学者相信,尽管工业社会的起源不同,却有共同的目标。至于世界上的其余地区,据说由于西方历史和世界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可以期望它们会有相似的发展。<sup>①</sup>马克思预期,所有的生产过程和社会组织最终都将建立在科学原理的基础上。<sup>②</sup>因此,这些原理的相似性意味着社会结构和功能上存在的趋同。马克思、李斯特、赫尔德布兰德和布赫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阶段理论。这些理论中一个共同的方法论的假定是:各个社会都以一种共同的分阶段前进的方式向工业化发展。<sup>③</sup>工业化的成功加强了进步的观念,并为此提供了佐证,费伊说,它被人们当作公理来接受。<sup>④</sup>但是,文化相对论并没有寿终正寝。韦伯把注意力转向新教的伦理,并指出其他任何宗教中都没有与它相对应的成分,以此来解释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出现的原因。这毕竟是韦伯对社会学理论的独特贡献。但是,有关工业社会趋同的解释几乎还没有触及到文化差异,这也许是因为工业化仍局限在欧洲和北美的缘故。这个地区中

---

① 马苏尔:“从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看西方文明的特点”,载《美国历史评论》,第67卷,第3期(1962年4月),第608页。

② 霍塞利茨:“卡尔·马克思论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发展”,载《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第6卷(1964年),第162页。

③ 施皮格尔:“经济发展的理论:历史与分类”,载《思想史杂志》,第16卷,第4期(1955年10月),第520页。

④ 费伊:“进步的观念”,载《美国历史评论》,第52卷(1947年),第232页。

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同它们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相比,就显得比较小。此外,经济学家从他们的前辈启蒙思想家那里借鉴了关于人的观念,因而也就接受了有关人类行为的普遍臆断,至少没有关注这些臆断可能受到文化的限制。从某种观点看,他们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理论在构筑理论模式时,可以不受文化相对论的干扰,因而能够大大超越其他社会科学。然而,重要的是,无论经济科学在诸如价格理论等这样一些领域中取得多大的进展,它都忽视了文化,忽视了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这意味着它永远不可能创立起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理论。当然,已经提出的理论往往在西方的发展问题上显示出一定的解释能力,因为这些理论模式的构筑是以历史学的因素和社会学的因素为前提的。只有当这些理论应用到西方国家以外的地区时,它们的前提才会显得令人讨厌地明显。<sup>①</sup>

这种对知识社会学有限的,因而必然是不完全的侵入,证明趋同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来源于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我们的目的是要证明,现代化理论中仍有趋同的成分。其中的某些因素看上去似曾相识,这使得趋同概念变得模糊,把一些外来的错误和历史上形成的错误以及片面的思想引入了现代化研究。本文试图澄清趋同的概念,使之值得人们予以更多的注意。

### 趋同理论的现状

专门论述趋同可能性的经验性著作和理论性著作都寥寥无几。有关的著作主要论及适应工业社会的需要而出现的职业结构,众所周知的人口转变理论,从扩大了的家庭向核心家庭体制的变

---

<sup>①</sup> 波斯坦在批评当前经济发展的“离土”模式时指出,“人们所提出的大多数理由都有利于十分强调工业,这些理由都是经济方面的,而大部分经济方面的理由又都是历史的。”见波斯坦:“从欧洲农业史看欠发达国家的农业问题”,载《第二届经济史国际会议论文集》,第2集,埃克斯昂普罗旺斯,1962年,第11页。

化,志愿的和正规的劳动力组织的共同方式,人均实际收入的增加和消费市场的出现,高水平的收入和教育与政治民主的相互关系。<sup>①</sup>讨论工业主义和社会变革的许多著作都提出了衡量趋同的一些不明显的标准。这些标准与现代化在技术方面的理论不一定有什么关系。人们往往认为工业化的社会正在朝着共同的方向经历着纯粹的变化,包括分化的不断加强,个人主义,把被传统束缚的人调动到市场、政府机构和其他机构中去,国家权力范围的扩大,对普遍了解的技术原理的依赖及类似的整合机制的发展。<sup>②</sup>我们在往往是有限的和非宏观的目标下进行的社会学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到许多实证。<sup>③</sup>尽管一些对比较研究感兴趣的学者也有可能假定衡量趋同的不明显的标准,但他们常常决定强调少数趋异现象而忽视趋同的广大领域。对于苏联的研究也许是个例外。这项研究似乎只满足于指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趋同现象。<sup>④</sup>

① 英克尔斯和罗西:“全国性的职业声望比较”,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1卷(1956年1月),第329—339页;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伯克利,1959年;戴维斯:“人口转变”,载埃齐奥尼编:《社会变化》,纽约,1964年,第187—194页;尼姆科夫:“联合家庭是工业化的障碍吗?”载《国际比较社会学杂志》,第1卷(1960年),第109—118页;穆尔和费尔德曼:《发展中地区的劳动与社会变革》,纽约,1960年;列维:“现代化与高级现代化的几个结构问题:中国和日本”,载萨齐帕尼克编:《远东经济和社会问题讨论会论文汇编》,香港,1962年,第10页;利普塞特:“经济发展与民主”,载《政治人》,第2章,第27—63页。

② 见艾森斯塔德:“现代化,增长与多样性”,载《印度季刊》,第20卷(1964年1—3月),第17—42页;如想了解某些标准的反面论证,可见他的“现代化的中断”,载《经济发展和文化变化》,第12卷,第4期(1964年7月),第345—367页;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纽约,1966年;斯梅尔塞:“变化机制和对变化的调整”,载霍塞利茨和穆尔编:《工业化和社会》,海牙,1966年,第2章,第32—54页;多伊奇:“社会动员与政治发展”,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55卷,第3期(1961年9月),第493—515页。

③ 有关主张进行有限的比较研究的论点,见本迪克斯:“比较社会学研究中的概念与归纳”,《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8卷(1963年),第533页,他在该文中警告说:“许多概念不是真正的归纳。”

④ 索罗金:“美国和苏联的相互趋同:向混合型的社会文化发展”,载《国际比较社会学期刊》,第1卷(1960年),第143—176页;霍罗威茨:“工业发展的社会学概念和思想概念”,载《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期刊》,第23卷,第4期(1964年10月),第363页;迪莫克:“苏联的企业管理:与美国的比较研究”,载《公共行政评论》,第20卷,第3期(1960年),第139—147页。

也许由于缺乏有关趋同在理论上的可能性的经验研究,尤其是缺乏先进工业社会的经验研究,所以一些学者受到影响,对趋同的概念持怀疑的看法。<sup>①</sup>最近出现了一个批评浪潮,甚至否定有限的趋同。费尔德曼继英克尔斯和鲍尔之后强调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有限的趋同现象。<sup>②</sup>霍奇、西格尔和罗西则发现,从1925年至1963年,尽管美国的劳动力和工业化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结构变化,但是,对职业声望的排列顺序仍保持不变。霍奇、特雷曼和罗西还证明了工业社会和非工业社会在职业声望排列顺序方面的相似性。<sup>③</sup>由于工业社会里发现了家庭体系的多种形态,由于在一些社会里存在的核心家庭体系可能先于工业化,因此,工业化和核心家庭体系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怀疑。<sup>④</sup>布鲁默研究了早期工业化对劳动力的影响,并有意识地驳斥了工业化与社会解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的论点,认为工业化过程对社会的影响“完全是中性的”。<sup>⑤</sup>戈德索普否认社会分层形式上的趋同现象是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固有的现象,他特别提到了美国和苏联。<sup>⑥</sup>德·施韦尼茨对工业化与民主之间存在的联系提出疑问。<sup>⑦</sup>克罗泽在研究先进工业社会的管理组织时,曾强调一些重大的官僚机构模式具有相似

① 有关先进工业社会趋同的现有资料,见温伯格:“现代化、精英和阶级”,载温伯格编:《英国社会》,纽约,即将出版。

② 费尔德曼:“工业社会的性质”,载《世界政治》,第12卷(1960年7月),第618页。

③ 霍奇、西格尔和罗西:“1925—1963年美国的职业声望”,载《美国社会学期刊》,第70卷,第3期(1964年11月),第286—303页;霍奇、特雷曼和罗西:“职业声望的比较研究”,载本迪克斯和利普塞特编:《阶级、地位与权力》,纽约,1966年,第309—321页。

④ 戈德:“工业化与家庭变化”,载霍塞利茨和穆尔编:《工业化和社会》,第237—259页;拉斯莱特:“人口史与社会结构”,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17卷,第4期(1965年),第582—594页;拉斯莱特:《我们失去的世界》,伦敦,1965年。

⑤ 布鲁默:“早期工业化与劳动阶级”,载《社会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60年),第5—14页。

⑥ 戈德索普:“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载哈尔莫斯编:《工业社会的发展》,基尔,1964年,第97—123页。

⑦ 施韦尼茨:《工业化与民主》,纽约,1964年。

的文化由来,而海尔等人则尽管发现了这些一致性,却因文化对于界定管理任务的影响而留下深刻印象。<sup>①</sup>克拉克·凯尔及其同事们在回顾他们在各大学之间对于工业化的研究计划时,发现工业化在进行过程或目的方面,除了意识形态热情有所减退以及对中央政府和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外,几乎不存在一致性。工业社会趋向混乱状态,人们称之为“多元工业主义”,但这并不是一种均衡状态。尽管这种多元性表面上使趋同现象不可能存在,但从逻辑上来说,恰恰揭示了趋同的可能性。然而他们在方法上的假设是,工业化作为一个过程是由不同的上层集团操纵的,具有前工业社会的趋同性,但也自然而然地导致趋异。<sup>②</sup>

费尔德曼和穆尔似乎认为,趋同可能只限于工业制度中的“核心”因素,因此,所有的工业社会在最低限度上都拥有以下成分:

这个核心包括工厂的生产体系,以复杂而广泛的劳动分工和技术等级制为基础的分层体系,商品和服务的广泛商业化和它们通过市场的转换,以及能够在职业和分层体系中充任各种职务的教育体系。<sup>③</sup>

但这两位作者都强调趋异的因素。穆尔曾在其他地方简洁地说:“我们还不是兄弟。”<sup>④</sup>对于社会的迅速变化和预言结构相似性的困难,他比任何当代的工业化理论家都更敏感。<sup>⑤</sup>

---

① 克罗泽:《官僚机构的现象》,芝加哥,1964年;海尔、吉塞利和波特:“经理任务的文化模式”,载《工业关系》,第2卷,第2期(1963年),第95—117页。

② 在凯尔的类型学中,上层分子是指中产阶级、王朝领导人、革命知识分子、殖民地的行政官员和民族主义的领袖。凯尔、邓洛普、哈比森和迈尔斯:《工业化与工业人》,纽约,1964年。

③ 费尔德曼和穆尔:“工业化与工业主义,趋同与趋异”,载《第五届社会学国际会议公报》,华盛顿特区,1962年,第146页。

④ 穆尔:“共同文化的产生”,载《汇流》,第4卷(1955年7月),第238页。

⑤ 见他所著《社会变迁》,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3年。

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似乎是唯一对趋同充满信心的理论家。英克尔斯在他的探索性研究中,把工厂制度和职业结构作为已知的事实,并且运用刺激—反应模式,发现不同国家的人尽管在文化上存在着差异,但对工业化却以一种相似的方式作出反应。<sup>①</sup>大卫·麦克莱兰的信徒们坚持认为,想要取得成就的倾向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高度的成就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前提。<sup>②</sup>

在社会学家中,列维可能是准备承认趋同可能性的唯一理论家。他说,随着现代化程度的增加,“相对地现代化了的社会之间的结构一致性的程度也随之增加,无论这些发生变化的社会原来的基础存在多大的差异”。<sup>③</sup>他用列表的方式来表示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四个工业社会之间的趋同,并表明它们逐渐地“趋向于某种不可能再高的高度现代化”。<sup>④</sup>西奥多森表示从列维那里受益匪浅,认为非西方社会的瓦解和重新整合存在着相似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它们都在模仿西方。<sup>⑤</sup>列维作出的论证十分有力,因为他完全承认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差异或相似。不过,他所说的是,差异或相似都不影响社会沿着什么发展道路前进。应该把眼光放在未来而不是放在过去。此外,需要考虑的是发展中社会和发达社会的

---

① 英克尔斯：“工业人：地位与经验、感性认识和价值观念的关系”，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6卷，第1期（1960年），第1—31页；又见他的“人的现代化”，载韦纳编《现代化》，纽约，1966年，第10章，第138—150页；韦斯科普夫：“工业机制与个性结构”，载《社会问题杂志》，第7卷，第4期（1951年），第1—6页；关于对韦伯的“心理学分析”以及寻找16世纪末期英国清教主义中现代化的心理根源的初步尝试，见巴布“英国人性格的起源”，载《历史心理学问题》，纽约，1960年，第145—218页。

② 麦克莱兰：《重视成就的社会》，普林斯顿，1961年；莱文：《梦想与行为》，芝加哥，1966年；罗森：“巴西的以成就为标准的特征与经济增长”，载《社会力量》，第42卷，第3期（1964年3月），第341—351页；布雷德伯恩和伯卢：“成就需求与英国工业增长”，载《经济发展与文化动态》，第10卷，第1期（1961年），第8—21页。

③ 列维：《现代化与社会结构》，普林斯顿，1966年，第2卷，第709页。

④ 同上，第710页。

⑤ 西奥多森：“对工业化的赞同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非西方社会型式的后果”，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18卷，第5期（1953年10月），第477—484页。

未来,而不是这些社会开始现代化的特定环境。因此,列维表面上承认历史,实际上却完全忽视历史。他的观点与杰申克隆等理论家完全相反。杰申克隆强调他所谓的 D(即一个国家在开始经济增长时的落后程度)是个自变量。它规定了工业化的发展方向,而工业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非均匀性则是因变量。<sup>①</sup>

此外,列维还对政治发展和政治制度趋同可能性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阿普特明白地指出,对于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而言,经济变量是自变量,政治制度是因变量。<sup>②</sup>因此,工业化“或多或少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其中最关键的四种结果是:对信息的需要,科学精英的增长,多元群体的形成,以及科学精英对其他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群体的领导。<sup>③</sup>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拥有重要的群体,它们是民主观念的“载体”,因此,向民主趋同的前景虽然不能肯定,但并非不可能。<sup>④</sup>再也清楚不过,这是圣西门学派和列宁主义关于智人统治这一格言的重新出现。对于那些对群众的迟钝和落后感到失望的分析家和活动家来说,这一格言始终是他们特别喜爱的见解。<sup>⑤</sup>

### 趋同:现代化和进化的功能主义理论

趋同的概念往往与现代化理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反之,

---

① 杰申克隆:“工业发展的类型学:分析的工具”,载《第二届经济史国际会议论文集》,埃克斯昂普罗旺斯,1962年,第487—505页。杰申克隆并不否定西欧工业化进程的相似性,但否认这一模式适用于东欧,他含蓄地否认它适用于 D 程度显然高的当代不发达地区。见他的“用历史观点看经济的落后性”,载霍塞利茨编:《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芝加哥,1951年,第3—29页。

② 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学》,芝加哥,1965年,第460页。

③ 同上,第447页。

④ 同上,第459页。

⑤ 圣西门想建立一个“牛顿委员会”,来处理被法国大革命打乱了正常秩序的世界。见他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他同代人的信”(1803年),载马卡姆翻译与编辑的《圣西门选集》,牛津,1952年,第1—11页。福伊尔认为,这些理论是受经济周期论的影响,见福伊尔:“何谓异化:一个概念的来历”,载《新政治》,第1卷(1962年),第116—134页。

现代化理论又常常借助于帕森斯、穆尔、斯梅尔塞、列维和艾森斯塔德的进化—功能模式。<sup>①</sup>现代化被解释为利用无生命的资源来大量增加人类的成就,从而对相互依赖的社会体系的结构安排产生多重结果。<sup>②</sup>社会于是逐渐从小规模的、传统的、重视亲缘关系的和相对地说无社会分层的单位,向一个有高度分化的组织和任务的大规模工业社会发展。传统的行动体系(诸如家庭等)的范围在收缩,而工业体系(诸如市场等)的范围则在扩大。无生命资源的应用在穆尔的术语中是“强制”社会体系中相互依赖的成分去适应工业化。<sup>③</sup>由于有意识的变革是工业社会的一个共同特征,也由于各社会都要解决各种与工业化有关或无关的问题,工业社会乃是各社会的“目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用各种方式否认各个社会间存在着共同的目的。反对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反对趋同理论:

(1) 有人往往不加鉴别地接受进化理论,以此来解答作为均衡分析的功能分析所长期面临的困境。这种解答是有用的,然而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社会学研究往往同横向分析难以控制地联系在一起,而新进化论对于长期存在的方法论问题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和有限的解决办法。许多现代化理论所固有的观念都重蹈了启

---

① 穆尔说,功能均衡模式“实际上是有关现代化结果的一组给人深刻印象的归纳”。见穆尔:“社会变化与比较研究”,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15卷,第4期(1963年),第524页;又见帕森斯:《社会:进化与比较的观点》,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6年;斯梅尔塞:“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载韦纳编:《现代化》,纽约,1966年,第8章,第110—121页;列维:《现代化与社会结构》;艾森斯塔德:《政治与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学方面的论文集》,海牙,1961年;“社会的变异与分化”,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9卷,第3期(1964年),第375—386页;《现代化,抗议和变迁》,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6年;此外可参见他的其他文章;费尔德曼:“进化理论与社会变迁”,载巴林杰、布兰肯斯坦和麦克:《发展中地区的社会变迁》,波士顿,1965年,第11章,第273—284页;博克:“进化,功能与变化”,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8卷,第2期(1963年4月),第229—237页;马什:《比较社会学》,纽约,1967年,第29页。

② 列维说,“一个社会现代化的程度,多少要视其成员利用无生命能源的程度,以及(或)利用工具来增加其努力的功效。”见列维:《现代化与社会结构》,第1卷,第11页。

③ 穆尔:《工业的冲击》,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5年,第12页。

蒙思想家们非经验的和由思想认识导致的错误。这些观念包括科学精英作为一个整体处于支配地位,国家发挥不可避免的和日益扩大的作用,国家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善意促进,以及人们所向往的现代性与传统社会中僵化的野蛮性之间的对立等等。这在克拉克·凯尔及其合作者所写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并提出了工业化精英的类型学。<sup>①</sup>即使对相互竞争的精英之间的争夺了解得十分透彻的西尔斯,也在他的一些著作中过分强调了知识分子精英的作用。<sup>②</sup>塞利格曼强调精英们为了达到发展的目的,必须进行“整合”(难道是整合为一个铁板一块的阶层吗?)。<sup>③</sup>他的基本设想是,社会发展的工作是把精英从群众中分离出来。精英是最杰出的现代化的人,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国家,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并把群众动员起来。精英分子对现代化的矛盾心理,常常被作为一种残余的反殖民主义而不予考虑。精英分子的权力与国家权力的扩大自然相互交织在一起。艾森斯塔德在其著作中对此非常强调。

有趣的是,对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精英的强调恰恰发生在先进社会的分析家们注意到西方存在着精英的时候。<sup>④</sup>在强调精英时,除了复述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外,还应作一些避免误解的重要说明。如果所有的先进社会确实都出现精英,他们的力量会互相抵消,或者把过多的时间花在谈判上,而不是用于决策上。高水平的教育意味着精英们不能随便以专家自居,因此,他们要付出大部分努力来投身于那些心怀不满和受过教育的外行前面。专门化意味着每个

① 见凯尔、邓洛普、哈比森和迈尔斯:《工业化与工业人》。

② 西尔斯:“新兴国家政治发展中的知识分子”,载《世界政治》,第12卷(1960年4月),第329—368页。

③ 塞利格曼:“精英的招募与政治发展”,载《政治学杂志》,第26卷(1964年),第612—626页。

④ 见凯勒:《在统治阶级之外:现代社会中的战略精英》,纽约,1963年;古尔德:《技术精英》,纽约,1966年;关于不同的观点,见达尔:“对统治精英模式的批判”,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52卷,第2期(1958年6月),第463—470页。

精英——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技术统治的精英——在内部都是四分五裂的。科学精英可能过分依赖政治上的紧迫要求,借以建立一个永久的权力基础。在发展中国家,精英受到国际政治和经济现实的限制,也因不能控制下属而受到限制。<sup>①</sup>他们对现代性的矛盾心理,可能只是他们在认识上难以合理地协调,因为他们既欢迎变革,又希望保留社会的文化。

(2) 有人认为社会体系的相互依赖被夸大了。然而,实际上只有费尔德曼和穆尔提到了这一点。<sup>②</sup>就像工业化的定义基本上就是技术化那样,紧密的相互依赖所产生的结果往往是一种功能—技术—决定的关系。它产生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颇为相似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功能—技术—决定取代了经济基础的推动力。有趣的是,历史学家西里尔·布莱克也非常强调技术的重要作用。作为分析社会在早期阶段对工业化适应的一种手段,这样的强调有其优点,但仍然是一种不高明的预言。尽管它在结论中为差异性论证,但它的前提限制了工业社会的多重方向性。另一方面,穆尔和列维等理论家则非常重视传播的作用,尤其是技术传播,尽管批评他们的人抱怨说,结构—功能主义并不承认这一点。但是,记得下面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技术的传播与政治模式的传播一样,都要通过文化的过滤。技术也不例外,因为技术特别依赖抽象的科学原理,所以,它对社会组织产生的后果是多种多样的。

(3) 进化论设想,社会体系中已经现代化了的各个方面的“幸存”以及那个社会体系朝着工业化和高度现代化的“变化”,能够导致产生“全面转变”的错误观念。趋同理论却相反,认为只要“传统”的行为模式消失,趋同便会发生。理论家有时对帕森斯模式中的变

---

<sup>①</sup> 戴伊鲁普:“欠发达国家政府活动的局限性”,载《社会研究》,第24卷,第2期(1957年),第197页。

<sup>②</sup> 费尔德曼和穆尔:“工业化与工业主义,趋同与趋异”,第166页。

项考虑得过分认真,并为一种从普遍性到特殊性,或者从单一性到普遍性的简单和线性的发展过程辩护。<sup>①</sup>这种趋同似乎排除了与工业化无关的某个部分或某个方面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全面的”社会变化和工业社会的变化往往使人们不假思考地接受波拉尼和罗斯托的理论。他们的理论基本上是社会发展的“阶段”论。<sup>②</sup>例如,泽博特采用了罗斯托的模式,并在对美国、苏联和欠发达国家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说:“人们可以合理地期望世界经济将向某些共同的特征趋同。”<sup>③</sup>根据现代化技术性的定义,没有一个社会能避免这一过程,因为所有的社会至少都要用一点无生命的资源。<sup>④</sup>从长远的观点看,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逃避“全面转变”。阶段论者使用了通常是从西方工业化中推导出来的一些模式,把它们综合成为一套普遍原理。按照其定义,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都在向西方模式趋同。霍奇曾注意到事实上这些理论是中世纪等级思想的再现,它们虽是古物,却未被阻止重新出现。<sup>⑤</sup>人们只是慢慢地认识到,西方工业化的某些方面,例如具有能动作用的城市化,并不会理所当然地在其他地区也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sup>⑥</sup>

意味着功能上紧密相互依赖的朝向“全面转变”的趋同,因此

---

① 霍塞利茨:《经济增长的社会学方面》,格伦科,1960年。社会学理论经常被这种简易的两极对立的划分方法所吸引,见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以及涂尔干的《机械与有机的关联》。

② 波拉尼:《大转变》,纽约,1944年;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纽约,1960年。

③ 泽博特:《竞争共存的经济学:增长引起的趋同》,纽约,1964年,第146页。

④ 列维说:“现代化是一个普遍的过程,它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见列维:《现代化与社会结构》,第31页。

⑤ 霍奇:《16世纪与17世纪的早期人类学》,费城,1964年;据说城市革命导致了埃及在文明顶峰僵化和停滞。霍克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史前根源”,载霍克斯编:《过去的世界》,纽约,1963年,第491页。

⑥ 关于城市化在新兴国家中产生的反面影响,见豪泽:“城市化研究综述”,载豪泽和施诺编:《城市化研究》,纽约,1965年,第1章,第1—47页。

产生了“重视”的谬见。这是指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必定会“重现”先进的、已经现代化了的社会的发展过程,因为它们都通过在相互依赖的社会体系中产生出来的现代化的压力而全面转变。这种模式假定先进的工业社会已经实现了趋同,已经达到了某个极点或某种平衡。这种谬见首先出现于19世纪的胚胎学,当时海克尔论证说,从生理上说,作为存在的个人在他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将重复全人类的一般发展过程。“重现”必须承认两种思想,一种是承认功能上既相互依赖又有分化的机构领域能成功地整合的思想,另一种是承认积累性成长的前提。与任何其他理论家相比,艾森斯塔德更多使用“整合”和积累性成长这两个概念,有时把它们看作希望,有时又似乎把它们看作是“解围者”。

西方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常常会与这些国家中出现西方的结构相混淆。勒纳把现代化主要看作是交流的过程,他坚持认为制度不可能简单地输出并与新的环境融为一体,但它们会产生转变的效果。他说,“传统社会正在从地球表面上消失,因为地球上的人不再希望按照它们的规则生活。”<sup>①</sup>他的意思是说,非西方的社会结构太僵化,是反对工业化的,因此必然会阻碍经济增长。然而,纳什对坎特尔新开办的工厂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工业化并不一定要打破传统的行为模式。<sup>②</sup>无论工业化是土生的还是外来的,从逻辑上说都不一定要摧毁从前存在的一切。工业化往往有助于摧毁旧事物的过程。人们常常会忘记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即英国在19世纪中的结构是保守的,冯·兰克就把英国看作是保留欧洲中世纪残余制度最多的国家。<sup>③</sup>

#### (4) 趋同的必然论,启蒙思想家的乌托邦理论,“全面转变”

① 勒纳:“制度的转变”,载汉密尔顿编:《制度的转变》,达拉姆,1964年,第14页。

② 纳什:《原始经济制度和农民经济制度》,旧金山,1966年,第110—119页。虽然坎特尔作为一个实验环境完善到了几乎与外界十分接近的程度,但是,连纳什都对自己的实验结果感到吃惊。

③ 古奇:《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纽约,1928年,第93页。

论,紧密的功能相互依赖论和“重现”论,所有这些理论往往使现代化理论变成了一种派生的理论和目的论。理论家们有时十分善于预料到这些理论会招致批判。他们为了避免被指责为目的论者,于是用否定趋同论来保全自己。列维由于正确地使用了“结构要素”,便没有被批评为目的论者。因为如果断定这些要素的存在是必需,其结果就是目的论。<sup>①</sup>但是,分析家们往往对发展几乎有一种控制论的观点,把经济因素或政治因素看作是投入,以一种恒定的方式来改变体制,并把它纳入预先规定的轨道。正如凯尔等人那样,为了避开趋同问题,他们陷入了一种本质上属于宿命论或纯机遇的学说,既否定预言的可能性,又否定预言的可靠性。其次,趋同事实上不是作为机遇变化的结果,而是作为纯机遇的结果而产生,此事尚不十分清楚。目的论用预先选定的若干变量因素来解释现象使历史不能得到准确的分析,因此这是以点盖面。

(5) 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认为工业社会里人格的结构是相似的,需要成就的观念是现代经济人似乎都具有的特征。然而,我们所遇到的工业人或企业人都具有普遍的特征。它与19世纪的经济人同样都是文化的反映。<sup>②</sup>这样的一些分析往往忽视了社会结构,甚至设想社会结构具有相当强的适应能力,以至于只要投入一次成就需要值(N Ach)就会引起令人吃惊的连锁反应。因此,企业家精神在发展中国家里不是没有重要意义,但是,正如巴雷特在对伊博人的研究中指出的,企业家精神可能也是结构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一种输入。<sup>③</sup>结构排列在理论上只是一种假设,它们的特殊性和相似性必须根据事实去确定。企业人的理论通常就是精英理论,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这种理论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

① 见列维:“结构功能分析”,载《社会科学国际大百科全书》,纽约,1968年。

② 勒纳:“制度的转变”。

③ 巴雷特:“伊博人在接受工业化中的成就因素”,载《加拿大社会学和人类学评论》,第5卷(1968年5月),第68—83页。

### 趋同的可能性

至此,我们已论证了以下三个观点:第一,专门用实际经验来证明趋同的研究一直很少。第二,趋同的观念由于同进化—功能说的现代化理论联系在一起而受到妨碍。第三,现代化理论家常常否认工业社会的趋同,而进化—功能说的谬见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现代化社会趋同的想法。

还有两个重要意见需要提出。支持趋同论的经验性研究虽然极少,但可以合理地增加。其次,只要人们牢记,由于各个社会在工业化过程开始以前就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它们可能随着工业化而实现趋同,那么,一些从实际经验研究中获得的证据看起来好像是否定了趋同的观点,诸如最近在有关职业声望排列顺序的研究中所获得的证据,实际上可以用来支持趋同论。如果我们把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群体加以比较,如果不把趋同的概念说得那么绝对,那么情况尤其如此。先进社会与欠发达社会之间的差距,以及对这两种社会都做出概括的尝试,掩盖了以下事实,即大规模的工业化即使在西方也只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工业化早期阶段能被观察到的趋同现象十分显著。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化最近才开始,这一事实必然会否定现代性和传统性之间的完全对立,同时却也强调了趋同的相对性。工业社会为什么如此复杂和各不相同,原因之一就是前工业的结构并没有消失。趋同的相对性还必须与年代顺序的认识结合起来。人们常常讨论工业化的先驱国家和较晚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好像它们之间的唯一重要差别就是后者在经历相同的进程时具有某些有利的条件。然而,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在实现工业化的时间上相对地说并不悬殊,这表明在一定的技术和社会结构下工业化进程的方向必定是相似的。今天试图实现工业化的一批国家尽管目标同先驱国家相似,但是可能要经历完全不同的过程。这些国家同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

可能要对传统发动激烈得多的冲击。我们大家都知道,先驱国家所共有的那种结构安排,例如被英克尔斯假定为工业化条件的集中的工厂、工业城市和劳动力等,一些较晚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根本不存在这些特征。

其次,构成理论所使用的演绎方法否定了趋同论,但在逻辑上又引导到趋同论。它忽视来自实际经验的证据,因而难以通过增加新的资料将理论进一步加以发展。应该强调的是,这是对构成理论的这种方法所作的批判,而不是对功能主义的批判。正如贝尔肖所指出的,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中一个反常现象是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机构领域之间缺乏相互依赖性。<sup>①</sup>功能分析是揭示机构之间缺乏相互联系的唯一方法。但功能上的相互依赖从实际经验来看必须是派生出来的,包括各种不同的机构领域之间相互依赖的必要性、时间跨度和强度。如果对各个不同社会的工业化所必需的而且是工业化所带来的相互依赖进行比较,那么,相互依赖的派生性就会成为趋同的实际经验的基础。但是,把社会体系中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看得过于紧密是危险的,应该像穆尔一再强调的那样,适当地允许它们之间有松散的配合。虽然相互依赖的关系会迫使社会体系朝趋同的方向变化,但是,如果工业部门是发生变化的第一因素,那么,配合的松散性意味着某些因素并不会连带发生变化,另外一些与工业部门相距较远或比较无关的因素则有可能不受变化的影响,于是各个社会之间的趋异将在理论上得到承认。这种趋异限制了趋同的可能性,但并没有消除趋同的可能性。

## 结 论

如果进化—功能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在方法上固有的错误得以

---

<sup>①</sup> 贝尔肖:“与经济增长有关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16卷,第2期(1964年),第223页。

避免的话,趋同概念或许可以用来当作比较分析中一种很有用的手段。20世纪较早时期,戈登威泽向他的人类学同行证明趋同在理论上和实际经验上都是可能的。这里所介绍的各种观点与他对趋同所作的辩护有些相似。<sup>①</sup>他认为发展有一种限度。他否认派生性的趋同,而主张“依赖性的趋同”,把这种趋同描述为“从不同的来源中产生出来,但受到共同文化媒介影响的那些相似性”。<sup>②</sup>工业社会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社会之间的趋同也许就是从适应大规模工业化的某些有限可能性中产生出来的相似性,尽管这个过程发生的时间各种各样或工业化过程之间存在着的差异是明显的。这种相似性应当从实际经验中推导出来,不含有目的论,也没有共同的、贯穿其中的或作为基础的对应物。趋同的概念基本上是适应的有限可能性与起源的多样性所形成的对比。趋异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因为有可能发生变化中的变异,虽然并不会发生完全的混乱。但愿我们将进行比较研究,既认识到趋同,也认识到趋异,而不是先在理论上排除其中的任何一种可能性。

(杨豫、陈祖洲 译)

---

<sup>①</sup> 戈登威泽：“文化发展有限可能性的原理”，载《美国民间文学杂志》，第26卷（1913年），第259—290页。

<sup>②</sup> 同上，第269页。

W. 茨阿波夫

## 现代化理论与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向\*

本文涉及到目前再次兴起的关于现代化和现代化理论的争论。在这篇论文中,我建议把趋同性发展的进化观与不同发展路向的观点结合起来。这样,人们也许可以在不对历史目的、进步的必然性和“交往对暴力的胜利”等问题进行本体论的论证情况下,就能理解当今各种变化的“惊人的相似性”(令人困惑的相同结局)。

我认为,现代化是在时间上相关联的三个进程:第一,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百年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各种小的团体发展成为今天的现代社会;第二,是落后者的各式各样的追赶过程;第三,是现代社会自身通过创新和改革来战胜新的挑战的努力过程。

显而易见,自1989年以来的东欧“后共产主义社会”转型的问题,给关于现代化的争论带来了新的推动。因而,我以探讨转型研究中的“理论错误”和转型社会的类型学开始本文。在第二部分中,我将探讨对各种不同的发展路向进行阐明的各式各样的理论观点。在第三部分中,我将勾画出当今全球社会的一个三层级结构模型,以及每一层级的各种可能的变体;最扣人心弦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条与西方道路相异的,也许比它更为优越的亚洲现代化之路?最后,我试图对当今的现代化争论作出一个简

---

\* 选自德国《利维坦》杂志第24卷第1分册。

要的评价。

—

在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1989年的转折前后——社会发展方向问题似乎很明确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解体,和各个地区的权威型社会向民主型社会的令人注目的过渡,被总括地解释为似乎是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胜利,这虽然并不意味着贫乏和冲突的结束,但总是意味着包含有巨大冲突性的发展模式的终结。在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中,在1974—1990年间,约有30个国家开始了向民主体制的过渡。这种情况似乎表明,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发展观中,被作为确定的基础体制而长期形成的那种东西,业已完全实现:按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69, 1971)的说法,是在一个“分化”、“地位提升”、“价值普遍化”和“包涵”等等的过程中进化的共相发展。

R.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提出的现代化的经典定义得到了证实:

对于现代化,我理解的是源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大革命的一种社会变迁模式(……)。它存在于一些领先发展的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政治进步之中,也存在于后来者的追随之于前者的转变进程之中(本迪克斯,1969,第506、510页)。

本迪克斯的扩展论和追赶论,一下子解释了国际社会的分层,解释了由于先进者对自身的捍卫和落后者的自身的追赶所形成的竞争,也解释了在长期过程中先进者和落后者的地位在层级排列中的变动。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来说,在1989—1990年转折时期,与这种观点相吻合的是如下这种信念:在指令性经济和权力集

中型政治消除之后,全面的革新力量将被显露出来,在以前受到阻滞的社会体制的形成过程,将会被加快;同时,许多内在的促进变迁的力量将会被动员起来,从而,经济的增长和政治民主化的成效的迅速产生,将是期待的。因此,以一个虽然痛苦的,但是短暂的过渡为代价,看来也是值得满意的。

在发生这场戏剧性事件的六年以后,我们看到,转型不仅比我们预想的要艰难得多,而且在一些国家中已经成为疑问。关于“现代化的衰败”(Breakdowns of Modernization),在许多的有关现代化理论的论文和小册子中被人们大量地谈论着,而且,这个“衰败”被从19世纪至今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南美的发展史所证实;但没有任何人预料到东欧那些处于“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转型社会的这种崩溃的退化,它甚至使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阶段水平倒退了。在这中间,我们至少可以识别出在1989—1990年间出现的一些理论错误,如果人们要对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向作重新思考的话,就不允许再犯这些错误。

这些理论错误包括:(1)如果说,在旧体制下只有依靠强制的力量才能促成国家和民族的形成的话,那么,对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出现的突然性的退化的意义估计不足;(2)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即创新总是反对惰性的、总是同对革新的恐惧不相容的、总是同既得利益不相容的。换言之,在东欧“后共产主义”的社会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有一部分人,并且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他们反对迅速的民主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变;(3)我们在新的国民经济的开端中学习,即资本、技能、和创新等等的关系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结构是十分棘手的,一个体制的转换会撕破以前长期存在的网络,但这种转换并没有生成,或者很少生成可以构成新的网络的内在力量;(4)要指出动态目标的原则,即在这个混乱的环境中转型社会产生了新的竞争者,但社会并没有时间使他们发展起来,并且在这个环境中,同范式的距离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增大了。动态目标也意味着范式社会失去了它们在冷战时期

曾具有的可靠性,并且因此在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所起的反作用中出现了若干危机征兆。

布热津斯基在其名为《大转变》的论著中表现出了广泛的错误:例如对转型社会的期望过高,而且对资本的作用和改造能力的想象过于天真。人们期望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是在这个进程中,它实际上是各种因素之间多次冲突的结果,在其中,一个领域可以获得的東西,并不能保证其他领域也能够获得,而且,经济改革的政治前提常常不能及时地或者同时地被提出来,以致休克疗法是并不适宜的,而且,一个对改革起巨大的保障作用的国家体制在未来是决不可或缺的。布热津斯基作出了一个清醒的结论:

从今天看来,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成效卓著的自由和民主,并不是可以预计的结果,在27个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大约有5个可能是例外。

这五个国家是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还有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布热津斯基没有提到东德。显然,他认为这些情况都是正常的。

而且从总体上来说,关于转型的社会科学论文证明自己比“大冲击战略”和某些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五百天纲领”要现实得多。据我看来,这就是比较现代化理论作出的贡献。这种观点认为,可以把东欧的发展同那些经历过失败的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早期转型的经验作一比较。

(1) 1945年之后的西德、日本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在战胜国的监督和管理下,也包括给它们以物资支援,开始了它们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过渡。这是一种“强行处置”(imposition)的形势,即是在自上而下的强制下,在外部力量的强制下推行的过渡。在这些国家中,转型虽然有两项任务——实行民主和市场经济——被列入日

程,但没有时间上的压力。它们都是以谨慎的态度、以缓慢增长的期望走出失败的境地的。在这种转型中,被排除的只是旧的精英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的活动又被恢复了。

(2) 1974年之后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在这些国家中的专制体制被推翻,已经出现了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在这些国家中出现的是“按照协议的转变”(卡尔/施米特尔),也就是在旧有的精英和新起的精英之间就权力转移的方式达成某种妥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转型从开始到进入稳定时期,持续了近10年的时间,关于这一点,在1989—1990年间许多研究者都对此做过强调。

(3) 拉丁美洲的转型。对此在这里不能作详尽的考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那里,转型中断的次数很多,专制与民主之间变换的次数也很多,而且,经常在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经济增长之后,又出现经济倒退,这样的次数也很多。文献表明(参见 Lueschemeyer, 1992),拉丁美洲民主化的成功条件之一是保证目前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能够在将来的社会中有牢固的经济地位,而在将来的社会中,下层民众仍是大多数。这种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按照协议的转变”。

(4) 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首先批驳了依附论学派的“不发达的发展”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渗透会造成不发达。首先,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情况表明,处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是可能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属于今天的增长国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居民直至不久前仍然处于贫困状态,而且民主改革迟于、并慢于经济发展。

(5) 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只能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是第一个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投资的社会主义国家,伴随着它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它给予这些投资以广阔的发展活动空间;但同时,执政的共产党对经济活动仍然保持着严格的监督;但是,社会

中出现了较严重的分化,比如暴发户(这是一个特殊的新名词)同一般居民之间的分化,城市同乡村之间的分化等等。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共同地在形成一种强大的潜在的冲突;有一种预测指出,如果对这种潜在的冲突不用民主化的方式加以协调的话,那么,它就将有可能转化为斗争和分裂。两个选择的另一个,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它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说的独立性以及在政治上和宗教上进行扩展的意义,而低估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然而,至少这些国家也使自己通过发展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来接受现代化的重要成果。

(6) 如果把东欧的转型社会同上述的各种情况作一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东欧社会的转型,一方面,缺乏外界的压力,同时也没有如1945年以后占领国提供物资帮助的情况;另一方面,这种转型对民主、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同步发展的需要,要求更大的资本和生产能力,并且表明,地域性的资本短缺和时间的紧迫,使新的精英和新企业家的产生十分困难,而有利于旧有的干部和非社会化的结构。在最关键性的情况下,例如在前南斯拉夫,还有原苏联的部分地区,甚至民族统一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危险的倒退,就如在这些国家处于稳定的那个时期南美和东亚曾出现过的情况那样。

(7) 转型过程的艰难,可以从对“非常顺利的事件”,即东德解体事件的研究中明显地看到。在这里,社会主义体制被纳入到一个按部就班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和市场经济之中,被纳入到一个“现成的国家”之中(Rose 等,1993),它组织了巨大的资本和智力转让,但仍然存在艰难的过渡问题,因为前民主德国的许多社会网络都崩溃了,大量的居民群众必须接受丧失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以及失业的严重痛苦,而且,加入到联邦德国之中的这种行动,常常被认为是对一种异己规定的接受,是一种软弱无能的表现。

我们可以总括地说转型过程是共同的,从原则上讲,发展目标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民主、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人们企图通过

照搬,即对范型社会的基础性的结构的模仿来实现这些目标。这种社会结构就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大众消费。但在这种发展的时间序列中,在精英同居民大众的关系格局中,在精英协调意见使之一致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情况变异。与此相反,从广义上讲,现代化是一个探索过程,它的结果是未知的。在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要解决它们的经济负担、调整行业结构和社会整合等问题的时候,只可能进行改革和创新的尝试,并经受失误。因此,我们把转型理解为在原则上继续开放的现代化的总体性之内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进行“追赶”的现代化进程。但我们同时也看到,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条,而且道路还不是直线、渐进的,对于后进国家来说,也不只有一条卓有成效的实现转型的道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把几个被界定的发展路向区别开来,并且对这些不同路向进行尝试性的阐述。

## 二

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向问题,已经作过许多表述,马克斯·韦伯的表述最为透彻。除了有各种其他的不同表述而外,与此相对的是斯宾塞和迪尔凯姆以及马克思的表述。他们都以一个直线式的前进模式为出发点。韦伯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即西方道路的特殊性问题:为什么只有西方才能在社会、国家和文化等等一切领域中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合理化进程呢?韦伯的答案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主义的理论,他把“资本主义精神”同当时的“新教伦理”联系到了一起。而罗伯特·埃里亚斯(R. Elias)的文明理论,同韦伯学说的结论是相同的。埃里亚斯把西方的发展作为一种“唯一性”的事件加以描述,认为它是产生于传统社会的复杂行为链条中的不可预期的后果:虽然没有独具匠心的计划安排,但从其结果来看,却是被校准过了的进程。

(1) 由于诸多原因,特殊道路理论今天又具有迫切的意义,有

一系列作者如 K. 欧夫那断言:从历史上来说,OECD 诸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组织,其结构和结果对全世界其他国家并不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它们首先把内在的增长界限作为基本理由,这些界限明确地不允许西方的生产方式、能源消耗方式和环境负担方式向全世界扩展。进一步谈到的是由民族瓦解过程、种族冲突和随之发生的大量变化所形成的政治难题,这些难题是更进一步的制约。当然首先要谈到的是富裕的西方现代社会本身,它在世界范围内决定着后发展民族在军事、财政等方面的发展条件。今天,这些后来者们也有了从冷战的竞争中获益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使我们想起依附学派和世界体系学派的理论。

(2) 第二种观点可以被称为“十字路口模式”(crossroad theories)。这是处于批判性的转折点上的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支情况的模式。这种观点大多都在战略联盟的概念中被表达出来,这种联盟在繁荣或者危机的情况下形成,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决定着进一步的发展。

人们也会把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视为批判性的十字路口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存在着对倒退、停滞和转型作出选择的可能性。克劳斯·米勒(Klaus Müller, 1992)在他对苏联形势所作的精辟分析之中,说明了对现代化的阻碍,这样的阻碍在俄罗斯可能造成停滞乃至倒退,并被看作一种通行的转型进程。同现代化理论的期望相反,在苏联没有形成一个普遍公认的、具有明确的现代化目标的精英阶层,而在统一的政党被瓦解之后,却出现了许多竞争群体,他们不能在一个方向上联合起来,这就使得社会居民中的不同部分的集团利己主义重新出现,而且,它使得社会普遍交往的正常发育成为困难,最终,在统一的、合作的转型目标形成之前,出现了民族冲突问题,它促成崩溃和停滞。

(3) 第三种观点强调一个特殊等级的社会内部的各个不同的发展路向。圭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esta Esping-Andersen, 1990)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把现代西方社会内部划分为三

个不同的发展路向。他谈到了有选择性的制度统治,因而也谈到了在不同的初始局势下,即大联合的基础上,对于同类问题来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有选择性的格式塔形式。第一条道路是自由的、富裕的福利国家之路,即福利资本主义之路,其代表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尤其是美国;第二种制度是德国、法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合作式的、保守的福利国家;其次是第三种制度,即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

作为对这些分支的说明,这本书中没有论述工业化、经济增长和民主的或多或少的有共同性的问题,而涉及到了对各个等级的动员、政治上的阶级联盟和由此产生的传统及政策风格的各种不同形式。在一个这样的关系框架内,人们也能够考察每个路向之间的相互接近之处和它们之间的过渡,并作出预测。因而,沃尔夫冈·施特里克基于全球化的压力,猜测到有一种弃离本来就“卓有成效的‘莱茵模式’”而走反标准的盎格鲁-美国之路模式的趋势。与此相反,另外一些观察家则强调内在的、被路向所依赖的复原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使瑞典比其他国家更好地组织起福利国家的某种基本建制。

对于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多种反复出现的发展路向之间是有区别的。密歇尔·布里描述了三个不同路向的特点。民主德国即东德,是“由外部控制着体制发生转变”的特殊情况——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样。在其他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我们发现了一种与其相反的“由内部控制的对体制的引进”。这就是文献中多次描述的对立,即一种他律的、促成转变的张力的加入与自律的、艰难的调整之间的对立,在这种调整中,部分原有的干部甚至被要求重返政府。布里分析的重点主要涉及到俄罗斯,而分析的要点是第三条路向:“紊乱的自发的转变”,这种转变并未被意向所控制,但也并不完全是灾难性的和混乱的。由于人际网络的交错无章,出乎意外地产生了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国家社会主义的要素同黑色经济的要素以某种方式混合在一起,它使得制度的延续成为

可能,但它是否能够促成一个稳当的转型,还是一个问题。

(4) 第四种观点,也是特别现实的观点来自制度经济学。我认为,这种观点令人信服地说明,人们能够怎样把革命式选择的前景同制度延续性的前景联系到一起。进行最优化的选择并不是压倒一切的原则,如果它们是次优的,那么,满意的行为操作方式和对体制的调整也将被继续进行。这一点已经由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的下列阐述表明:

现在我来谈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在时间流程中,是什么决定着社会、政治制度和国民经济的各种不同的进化模式呢?第二,我们如何阐明长期以来不断造成巨大亏空的经济体系呢?(诺斯,1990,第92页)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不同发展路向的决定性基础,而第二个问题要求阐明,在时间的流程中,进化的选择为什么不消除效率很低的、也被人们觉得并不是最好的体制。这两个问题与一个首先是在技术创新的领域内产生的理论模式有关。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传统打字机键盘上的字母安排顺序被卓有成效地推广着:一百多年以来,键盘上的字母的安排顺序一直是固定不变的,而技术人员确认,存在着许多更有效的安排顺序。

经济学家们用“对路向的依存性”原则来解释这样的事实:某种按有效性标准来说并非最好的技术,能够卓有成效地被维持下去。由于那并非最好的技术的在先出现纯属偶然,而且它不停地提供着日益增长的收益,因而竞争者们不再能赶上它,其原因分别是(参见:Werle, 1994):

——通过在对其不断地使用中的学习提高了业绩;

——通过推广各种工艺的可结合性扩展了其用途;

- 降低了其费用；
- 减少了应用者因害怕其产生危险而进行的抵制；
- 将其镶嵌到了一个范围广阔的系统之中。

现在的问题是,按照这个“对路向的依存性”原则,发展方向从不断增长着的变化之中产生出来,而这些变化由一个确定的点限定(lock in)在事物的连续进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路向的依存性”原则是否能够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被普遍化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从本质上说是肯定的。“存在着两种决定体制变迁路向的力量:增长着的收益和具有高额交易费用的不健全市场”(诺斯,1990,第95页)。在收益增长的情况下,组织和体制可以被维持,尽管存在着进行深思熟虑的选择的可能性。在市场不健全、信息反馈受限制、交易费用高昂的情况下,进化论的优胜劣汰受到阻碍,而且,活动者的主观观念的实行,是在意识形态具有优先决定性的情况下进行的。

诺斯举出了大量的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涉及到北美和南美的发展差异:尽管它们二者都通过革命与其过去决裂,尽管在革命后的拉丁美洲也引进了北美式的宪法。但是,“由此产生的是:……在具有不同体制的社会中引进同样类型的规则系统,却导致了不同的后果”(第101页)。这一规则对于剧烈的外部干涉(例如革命、战争或者自然灾害)之后的局势也是有效的。当理论没有能力预言这些外部事件的出现的时候,它就断言,在这些断裂之后,旧的体制仍然在起作用。

对路向的依存性指的就是: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不追溯体制以增加的方式表现出的进化,我们就不能理解当今的选择行为……(第100页)。然而,如果这种描述听起来像关于一个不可避免的、预先规定好的发展的研究报

告的话,那么,它就是错误的。在这条道路的每个阶段上,都存在着政治的和经济的选择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提供着现实的抉择。对路向的依存性是一种手段,它的目的是以概念的方式对大量的选择可能性进行限制,并且使它们与在时间流程中所作的决定联系起来。它不是这样一种历史:似乎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似乎在这种发展中过去直截了当地决定着未来。

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对路向的依存性”的观念和“限定”的观念,也完全可以被批判地应用。可以认为,它们表明了现代的、卓有成效的社会处于这样一条道路上,在这条道路上,它们使更好的(比如强调公正的分配的)道路消失了。而且,它们处于一条表面上成功的道路上,它们忽视了这条道路在长期发展方面的弱点。从原则上来说,这就是现代化批判的论点,就像乌尔里希·贝克在他的“反思的现代化”概念中所提出的论点那样。

### 三

从现代化和转型的经验中,从上面所说的那些理论观点中,我们能够形成什么样的理论学说呢?我认为,在其中存在着进行如下阐明的充足基础,这种阐明把进化的和扩展的原理与不同发展路向的原理结合到一起。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可以从一个明显分层化了的世界社会出发。OECD 各国作为具有“竞争民主”、“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大众消费”的现代化社会,是其中的上层;在进化论的意义上,它们是具有支配性的社会;在扩展理论和追赶理论的意义上,它们是有范式作用的社会。世界体系学派设定了一个主动的支配权(“统治”);我在这里并无意追随这个理论,而是希望为国际范围的非均等性设定一个结构模式。在现代社会的层级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按照“对路向的依存性”的标准,这些差异可

以被理解为制度选择上的差异。这对进行追赶的社会来说,意味着要对范式进行选择,也意味着最低限度的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对各种要素进行综合,寻找到一条特有的、同他们体制的潜在能力相符合的道路。

在转型社会的层级上,我们同样可以发现通向现代化的许多不同道路。对西方现代化的最激进的选择,即苏联和东欧式的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在70年代之后失去了力量,并且由于超过了它的负荷而作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后果,在目前已排除。结构功能主义的预言,如塔尔科特·帕森斯(1969)所作的那样,在这里被证明其目光是十分锐利的。

第三个群体,也即当今世界社会中最大的群体,就是待发展国家,它们仍然在为他们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文明和食物、健康以及教育等基本需求的满足而进行着斗争。这些情况今天同时出现在国际性的、密切交织的网络之中,处于范型社会以及大型国际组织的竞争的影响之下。除此之外,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把中国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看作是两个特例。这两种社会建构,在民主转型和市场经济转型的意义上,可以在理论上成为促成现代化的选择的出发点。围绕是否存在一条独立的、(东方)亚洲的现代化之路的问题,当前正进行着热烈的争论;它是一条这样的现代化道路:它不仅同西方道路在价值上是同等的,而且是更优越的,它将决定下一个世纪。在此我并不想详谈对在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理论本身中潜存的、反对韦伯的公开命题的一个独立的亚洲道路进行揭示的问题。而只是想对一个理论的和政治的争论作一些提示,这个争论当前在亚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由经济成就同亚洲文化的混合产生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主,它虽然形成权力竞争,但并不形成权力更换,因为意见一致和稳定的价值,比竞争和更换的价值更为重要。日本的情况在这里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但在日本自身中存着权力更换。而亚洲的社会科学家指出,科层制的权威国家在

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只对工人,而且也对资本家进行原则性的规范,但这并不能阻止在政治上有很高要求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和“文明社会”的扩展(参见 Han, 1995a)。因此,他们在建设时期允许科层制的权威主义,例如在中国允许它具有领导的职能。但是他们也看到了长此以往将形成的不断增加的政治参与的压力。

第二种争论是在亚洲政治的最高层面上展开的。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表示反对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从规范和整合的角度,提出一条亚洲特有的道路,这种观点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提出,而现在以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为代表。他反对西方的优先性要求,反对西方的享乐主义和个体主义。

当今有成就的国家,是那些在经济中有一个起中心作用的政府、并非完全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第84页)

相对于这种立场,反对派政治家们如韩国的金大中则认为,亚洲的哲学和传统似乎能十分妥善地避免科层制的权威主义而发展文明社会的体制。

在这种争论中,我们不仅对一个独立的亚洲现代化路向的问题获得了一个回答,而且对“继续进行着的现代化”的普遍问题获得了一个亚洲式的回答。

#### 四

在冷战结束之后,我们就曾考虑过所选择的基本目标相似的不同的发展路向,把它们作为对未来构想的基本选择。在这种形势下,70年代末已被认为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完善典范已经死亡的现代化理论,得到了一个新的评价和继续的发展。

如果人们把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领域理解为一种三重阐明,即理解为对现代社会的形成的阐明、对追赶者的奋起过程的阐明和

对现代社会的再创新的阐明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把现代化理论作为在“国家名称和年代”的抽象水平上进行应用的一种理论(参见茨阿波夫,1991,第26页),这种理论并不同社会科学的基本范式相竞争,或者同某个这样的范式(例如结构功能主义的或者进化论的范式)相同一。毋宁说,允许并提供对活动者、体制和系统三者进行综合分析,并对整合与冲突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犹如对精英理论、创新理论、阶级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所进行的综合分析一样,而且也加强了对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强烈的强调进行化解或者同时使它们联结起来的意图。

在我可以看到的范围内,当前并不存在对这种被区分的、历史性的现代化研究的令人信服的反对意见——只有很少人像 H. U. 维勒走得那样远,虽然在许多批判性的保留意见那里,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要素,从市场经济、民主和普遍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革新(由 J. 亚历山大在1994年提出,被称为新现代主义),或者市场组织的社会前提和政治前提的提出,都重新被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E. 蒂里亚坎拟定了一个“现代化 II”或者“新现代化”的纲领,在这个纲领中,社会运动的创新力量和全球发展的影响被包括入一个关于民族国家的内在发展的经典观念之中,可以以广大居民福利的改善程度为根据对这个发展作出评价。同时也承认这样的观点:未被预计的作用能够大大地超过被设计的社会变迁(参见 Rudolph, 1995)。对社会的总体驾驭是(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的方案,而从来就不是现代化诸理论的方案。因此,“混乱自发的行动”(Brie, 1995)和“旧的东西在新的东西之中”的继续存在的现象,完全可以被现代化理论所解释。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同新近的现代化理论的观点一样,都包含着一个乐观主义的基本特征,甚至可能是一个全人类乐观主义。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由此就产生了它不再能够同什么样的世界观相协调的问题。在如此限定的意义上,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1993)中拟定了一个不可调和的、持续的文化冲突的模式。那些

把对环境的毁坏,从而把现代化的后果看作更为重要的问题的文献,是同现代化理论所作的阐明并不一致的;而那些把战争和暴力所造成的牺牲以及不发达和边缘化看得比整合的业绩和福利成就更为重要的文献,也是同现代化理论所作的阐明并不一致的。

如果把(资本和信息的)全球化既理解为埋葬民族国家的行动能力的巨大倾向,又理解为埋葬各个文明的不同力量的巨大倾向(Ciddens, 1990)的话,那么,人们就将拒绝现代化理论所作的如下的“时代诊断”:诸民族国家在21世纪仍将是统治力量,而超民族的联合并不可能丧失其权力,相反,它们将得到巩固加强。对全球化,同时也对均等化的现代化理论持反对态度的强有力的论证,是由圭朗·泰尔本提出的对“走向并经历现代”的四个“入口”或曰四条“道路”进行区分的理论。这四个入口或四条“道路”是:(1)欧洲的革命和改良;(2)美洲和大洋洲的新世界;(3)如日本和埃及那样的由外部促成的现代化;(4)由殖民征服所迫使的开放。

在对这些新文献进行了匆匆简述之后,我想以总结的方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因为其理论上所谓的和继续的不充分而把现代化理论扬弃的话,那么,在这个创造性的、理论竞争的形势下,什么是最根本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借助那些在他们对发展所作的分析中从未接触现代化理论的作者,来对上述思想意图进行审查。迪特尔·兴哈斯在对中国的发展所作的一个重要分析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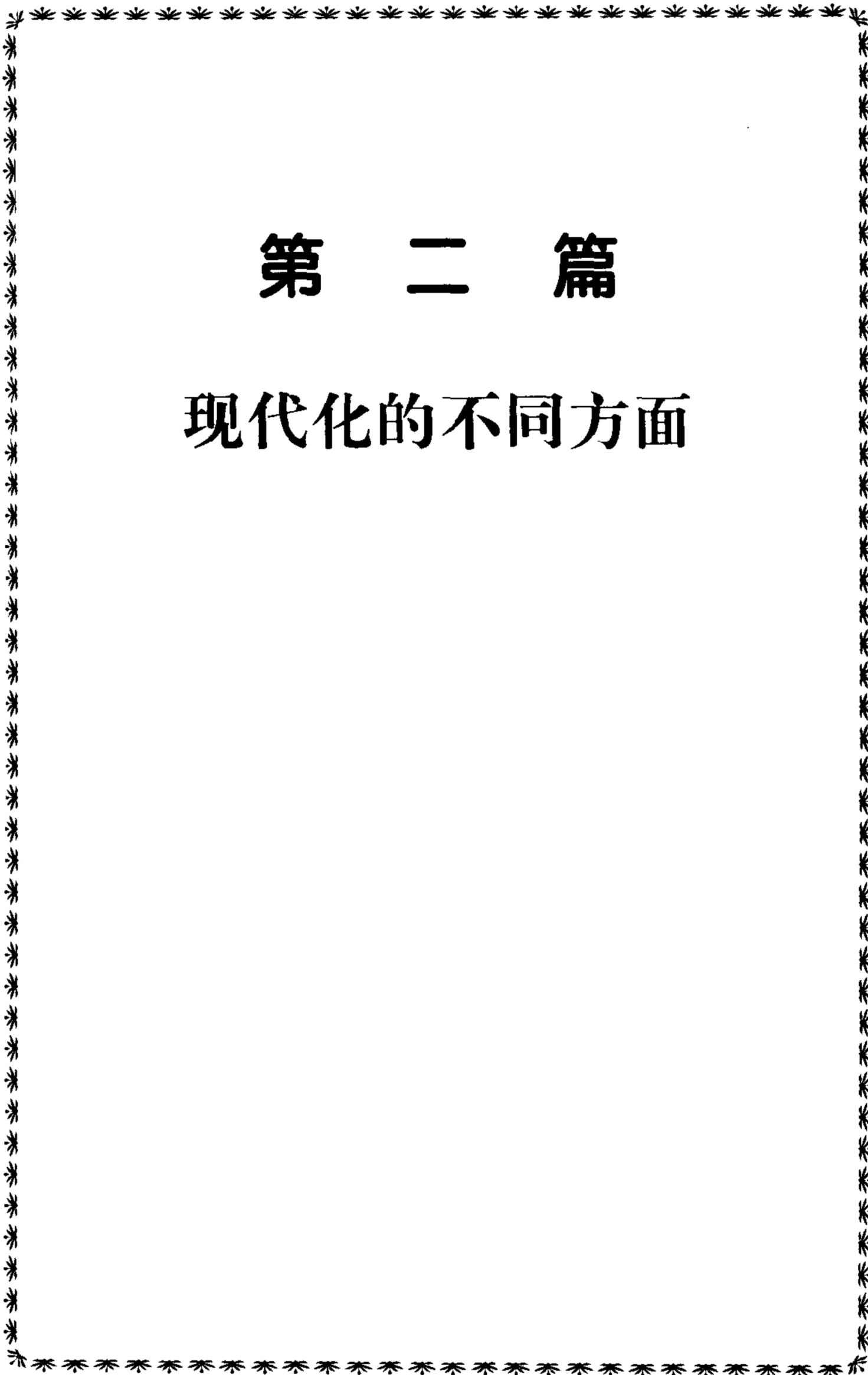
以不可逆转的经济改革过程为依托的社会多元主义将继续是发展的动力。社会有可能将具有更多的开放性,将具有一个在政治上有其清晰表达的文化……可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过程:在民主和国家法制不成熟情况下的一党执政;在法制化和民主化开始之后在党内可能出现不同意见……在民主宪政国家的核心标志出现后多元化继续发展,所有这些都将在15至20年时间之中。

而拉尔夫·达伦多夫在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各国同亚洲权威主义关系的一个探讨中写道：

难道现代社会必须面对没有社会凝聚力的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或者没有政治自由和经济增长的社会凝聚这样一种抉择吗？……我们谈论(在今后一个世纪中世界范围内的)关于在人类一直生活着的地方的一切人的福利、无处不在的文明社会和政治自由(的方案)。这就意味着我们最终并不能只涉及到已特权化了的地区，而必须考虑到整个世界以及同整个世界相适应的各种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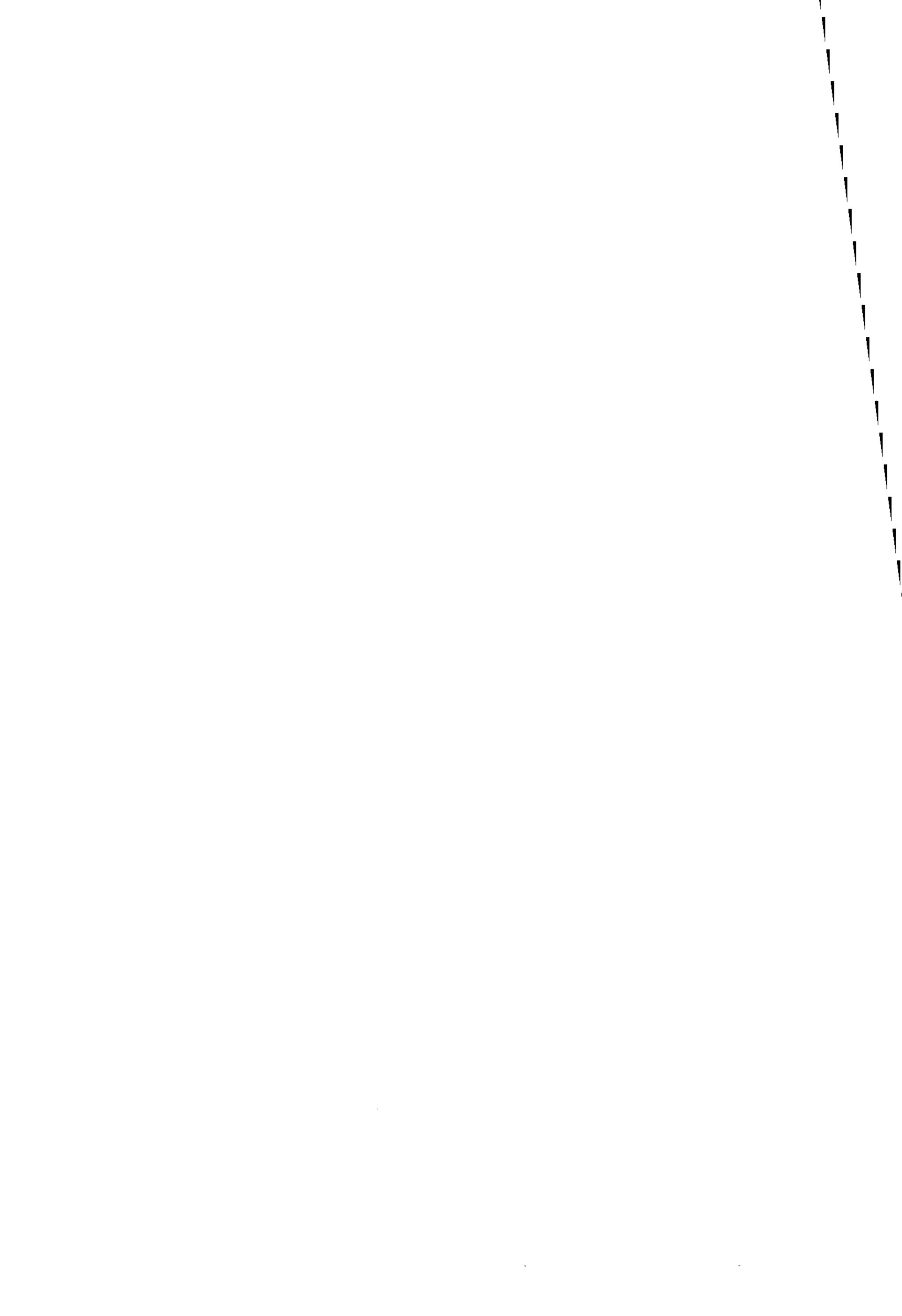
如果现代化理论没有或者也不能继续提供某种解决方案的话，那么，这种方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它将有可能被人们用新的方式所发现。

(李鹏程 译)



## 第 二 篇

### 现代化的不同方面



W. 罗斯托

## 由起飞进入持续增长<sup>\*</sup>

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下面的假设：经济增长的过程主要是集中在比较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社会按照或多或少是自动增长的方式部分地改变自己。这种决定性的改变在这里被称作起飞。

起飞被定义为随着人均产值上升，投资率上涨的那段时间。这种最初的上涨带动生产技术的巨大变化和收入分配的流动，它们保持了新的投资规模，进而保持了人均产值的递增趋势。在方式上的最初变化需要社会上的一些团体有使用和扩散新的生产技术的愿望和权威，并且一种持续的增长过程需要这样一个主导群体威望的扩张以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由这种最初变化带来的冲动的反应，包括外部经济的潜力。最初的变化在规模和资金的流向上很可能暗含了新的群体或机构超出收入流动之外的一种需求。一种持续的增长还需要在起飞时期将高比例的实际收入返还到生产投资上。所以，起飞需要一个社会着手对生产性企业的新的可能性做出积极的反应。它可能还需要许多能使投资规模保持最初的增长和正当地接受和吸收创新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机构上的变化。

简而言之，这篇文章试图确立一种从狭义上看与时间相关从

---

<sup>\*</sup> 选自 E. 爱兹奥尼主编的《社会变迁》一书。

广义上看则与生产函数的变化相关的工业革命的经济学。

### 一、增长过程中的三个阶段

考察特定国家的经济过程的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被一些事件的长期持续性留下深刻印象。同其他历史一样,经济史也是一张无缝的网。18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至少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至少从18世纪90年代就开始为它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工业化作准备;俄罗斯在1914年前20年的飞速发展至少要追溯到1861年;如果不追溯到拿破仑或彼得大帝时期的话,日本明治时期的辉煌腾飞离开德川时代后半期的经济发展的背景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从经济史学家的视角来看,将起飞时期从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具有明显的任意性,就像将商业循环与长期趋势分辨出来的其他任意过程一样,对它的判断取决于它所揭示的经济过程是否要远多于它所隐藏的;如果它能够被接受的话,也只应该被看作是给复杂无序的生物增长问题一个粗略框架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现实的一个恰当的模式。

如同历史学家的遭遇一样,用这套概念对经济发展作统计分析也是有困难的。首先是由于资料的问题,例如克拉克(Clark)、库兹涅茨(Kuznets)、布坎南(Buchanan)和伊里斯(Ellis)等人所用的资料展示了各个国家在长时期内和各国之间在一定时期内发展程度的连续性,不存在给人深刻印象的案例来作为增长过程的显著标志或分水岭。部分是,这种统计结果产生于这种事实:对经济来说,国民产值和它的成分的历史数据是极难获得的,直至它进入了或多或少规则增长的阶段,即在起飞之后。部分地讲,它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即大体而言,这些作者们更关心人均产值(或福利)的不同水平及与其相伴的结构特征而不是增长过程本身。他们所使用的数据不能抓住增长的内在决定要素。这儿提出的不是人均产值水平为什么或者怎么不同的问题,而是特定的经济是如何从萧条运动到缓慢、零碎地进

步,再到增长变成一种正常的经济状态的情况。在这里,我们的标准不是绝对的人均产值的标准,而是它的变化率。

在这种增长中,连续的经济发展由三个阶段组成:建立起飞的前提条件的漫长时期(长至一个世纪或更多);限定在二三十年里的起飞期;以及增长变得正常和相对自动化的长时期。当然,这三种区分不排除在长时期中增长让位于长期停滞或下降的可能性,但是,经历一个简短的急剧扩张随后就不能持续的情况,将从增长经济的概念中排除。如1812年的战争带来的美国工业的繁荣,或某些拉美经济在其现代史的早期阶段充满噩运的腾飞。

起飞发生在两种相当不同的社会中,为起飞建立前提条件的过程也是不同的。在第一种也是最通常的情况中,起飞之前提条件的取得需要在政治、社会结构甚至是有有效的文化价值方面发生重要变化。在第二种情况中,起飞不是为政治、社会和文化障碍所阻碍,而是为开垦土地和自然资源取得的高水准(甚至扩张)的福利所阻碍。在第二种情况中,起飞开始于一个更狭隘的经济过程。例如在美国北部、澳大利亚也许还包括瑞典。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在经济增长的实质性生理领域中,历史既提供混杂的例子也提供纯粹的例子。

在第一种情况下,建立起飞前提条件的过程可用如下的印象主义的术语加以概括:

我们始于一个合理的、稳定的、传统的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使用或多或少不变的生产方式,积蓄、生产性投资不多于折旧所需要的费用。通常是从社会的外部,但有时也来自自身内部的演化过程。萌发经济进步的观点也是可能的。这种观点在精英中传播,或(更通常)是在没有地位的弱势群体当中传播。比这更经常的情况是虚报以求经济进步的动机常常和一些非经济动机结合在一起。诸如增加社会地位和荣誉的愿望,国家的声誉以及政治野心等。至少对一些人来说,教育的拓宽和改变适应了现代经济活动的需求。新的企业人员率先动用资金以及在逐利中冒险,在商业行为中尤

为突出。农产品、国内手工业、消费品进口的市场拓宽了。掌管资金的机构出现了,或者是从最初贷款的规模、信誉以及时限上提高了。基础资本扩展了,特别是在交通和通讯业上,市场上经常有一些外商投资生产的对别的国家有经济利益的原材料。现代制造企业到处都在出现,通常是一些进口替代行业。

既然公共健康措施在其应用的早期阶段上像各种创新一样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在绝大多数文化中没有遇到什么抵制,死亡率便不断下降,人口开始增长,给食品供给和农业的制度性结构增加了压力,从而造成了经济萧条或刺激,这依赖社会的反应。

生产投资率可以上涨至国民收入的5%,但这同人口的高增长率相比算不了什么。并且一般来讲,所有这些活动发生在仍主要是以传统的低效技术和以同它们相关的旧价值观与制度为特征的经济和社会的有限基础上。农业人口的比例约占75%或更多些。

在第二种情况中,拥有自然财富的国家,非常有助于在人口和自然资源之间的平衡、并且拥有从合理进取的文化中移入的人口,建立前提条件的经历上的主要不同在于:不存在克服不适合经济增长的传统价值观念及其相应制度的抵制之类的重要问题,培养一种在投资过程中富有效率的精英方面不存在什么困难;并且也不存在人口问题<sup>①</sup>。从技术上讲,随着人口的扩张性增长以及仍是依靠丰饶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产出的增长,许多同样缓慢的变化过程发生在高的(并且可能是扩张的)水平上。起飞失败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开发具有高生产率的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比较利益延缓了向自我增强的工业增长过程前进的时间。

起飞的开始通常可以被追溯到一种特别尖锐的刺激。这种刺激可以采取直接影响社会权力的平衡和有效价值观念,影响经济机构、收入分配、资金投放模式的特征,以及被实际应用的潜在创

---

<sup>①</sup> 即使在这些案例中,也经常存在着在起飞发生前必须被减少或排除的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约束,例如在加拿大、阿根廷和美国南部。

新的比例的政治革命的形式；也就是说，它通过各种倾向运作。它可以通过一种导致现代部门中一系列次级扩张并且具有社会开发的强大潜在外部经济效果的技术（包括运输）创新而产生。它也可以采取一个新的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形式，诸如19世纪60年代英法对瑞典开放木材市场，或出口价格明显上涨和大量新资本的引入，像在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加拿大和俄国；并且，它也可以来自于一个不利的国际环境的挑战，诸如需要机械进口替代迅速发展的贸易的明显下跌（或外贸的战时受阻），像1930年及二战期间的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例子。

这里的本质不是刺激的形式而是社会的优先发展以及它的经济后果：这种结果不是在生产函数或投资数量上的一晃即逝的变化，而是在或多或少规则流动和更高投资率中被接受的高比例的潜在创新。

简而言之，使行动产生边际性突破的力量扩展了，并以迅捷之势变得很有意义。新工业高速度扩展，产生了能在新生产能力方面再投资的利润；它们的扩展又导致了一种更一般的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展，在这些部门中高比例投资变得很普遍。筹措资金的制度（包括政府财政有时也包括政府的集资活动）在范围和效率上都得到了提高。新技术在工农业上扩展，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它们以及它们给生活方式带来的深刻变化。一个新的商人阶层（通常是私人的，有时是公共的）出现了，并且取得了决定资金使用的控制权。出口的新的可能性发展了。新的进口需求出现了。经济开发了在技术和自然资源上无用的储存。尽管有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所有这些丰碑具有历史意义地吸引了大量的国外资金。

国民收入术语的扩张性使用证据确凿地揭示这一过程的发生。虽然净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值（或净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5%到超过10%，定义性地超过可能的人口压力（因为在假定的起飞环境下，资本与产出的比率是很低的），以及人均产值的明显增长是起飞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人均真实消费的增长与否依赖于收入

分配模式、人口压力,也依赖于生产投资活动本身的力度。

像表1所表明的,我相信至少暂时确定几个国家的由起飞进入增长的阶段是可能的。

当然,第三阶段是长期的、持续波动的经济进步过程。随着经济的成熟,人均资本日益增长,经济结构日益转好。最初点燃起飞之火的主要工业由于按照原来的工业习惯运作以及最初的那批先驱企业家们让位于一些较少诚意的工业领导者,致使收项减少而减速。但由于迅速崛起一些新的部门以及一批新的先锋领导者,平均增长率仍能得以维持。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下降。这个特定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找到了它的位置。社会创造了这样一类条件来满足现代高效生产最大化的需求,促进反对那些根深蒂固的滞后的价值观念的新价值观,或者支持而不是延误增长过程的方式来适应后者。这些社会学积分同基本的自然资源交织在一起决定了递减的速度。

表1 一些近似的起飞期

国 家	起 飞	国 家	起 飞
英国	1783—1802	俄国	1890—1914
法国	1830—1860	加拿大	1896—1914
比利时	1833—1860	阿根廷	1935—
美国	1843—1860	土耳其	1937—
德国	1850—1873	印度	1952—
瑞典	1868—1890	中国	1952—
日本	1878—1900		

第三阶段中的这种增长性经济的问题和变迁(特别是周期波动和慢性失业的威胁),包括许多新近的关于增长模型的形式化命题方面的工作,正是现代理论经济学所关心的。研究历史和当前不发达地区的学生更可能关注经济的前两个时段,也就是说前提阶段和起飞阶段。如果有经济增长理论或关于经济增长的更实用的理论,它们显然必须探寻那两个较早的阶段——尤其是经济起飞阶段。这篇文章力图以一种初步的、尝试性的方式,表明一个

经济史学家能够对起飞经济学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 二、起飞的定义和鉴别

准确地定义起飞包括几个选择问题。我们始于一个武断的定义,简单地考虑两个重要的选择。

按当前的目的,起飞被定义为需要下面相关的三个条件:

(a) 生产投资率从国民收入(或净国民产值)的5%或以下上升至超过10%左右;

(b) 拥有高增长率的一个或几个实质性制造<sup>①</sup>部门的发展。

(c) 一种政治、社会和制度框架的存在和迅速涌现,这种框架开发了刺激现代部门扩张的冲动以及起飞的各种潜在外部经济效果,给增长以持续(on-going)的特征。

第三个条件暗含了从国内筹措资金的极大可能性。一些起飞的发生实质上并没有资金的流入如英国和日本。一些起飞又有高比例的外资成分,如美国、俄罗斯和加拿大。但一些国家长期引进大量的外资,毋庸置疑地为起飞创造了前条件。如上到实际上没有开始起飞的1914年之前的阿根廷,下到现在的委内瑞拉和刚果。简而言之,无论资本输入的角色如何,起飞的前条件包括运筹国内生产储备金的初始能力,也包括随后能容许一个较高的边际储备率的结构。

这个定义是设计用来鉴别工业化发生的早期阶段,而不是工业化变得更大规模、统计上更有影响的后期阶段。例如在英国,工业化在1815—1850年间已经充分发生是确信无疑的。如果起飞选择的标准是最迅速的工业增长期,或大规模的工业成熟

---

<sup>①</sup> 在这个上下文中的“制造业”(“manufacturing”)包括了以现代生产方式进行的农产品或原材料加工。例如:瑞典的木材,澳大利亚的肉产品,丹麦的奶制品。制造部门的双重需求它的发展导致了一连串更进一步的现代部门需要,它的扩展提供了外在经济效果的潜力。

期,我们所有的起飞期都必须后推;如英国是1819—1848,美国是1868—1893,瑞典是1890—1920,日本是1900—1920,俄罗斯是1928—1940。这里选择更早的日期是因为按现有的(经常是不充分的)证据使我们相信决定性的变动(包括在投资率方面的变动)发生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后来的工业成熟期都能被追溯到这些第一阶段的基础。

这个定义也将某一经济在真正自我维持的增长过程开始之前所发生的实质性经济进步排除在起飞期之外。1750到1783年之间英国的经济扩张、1861—1890年俄国的经济扩张、1861—1890年中期加拿大的经济扩张,此类阶段——几乎每一个增长经济性的经济史中都有这么一个阶段——都标志着一个相当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发展时期。运输网络的扩张及与之相伴的内部和外部商业的发展,新的融资机构的发展;商业的或工业企业家阶层开始出现;工业企业在一定的范围(或部门)内成长起来。然而不管这些前起飞阶段对后来的发展具有如何实质性的意义,它们的规模和动力对于剧烈地改变经济、使之超过人口的增长并导致人均产值的增加还是不够的。

尽管对经济史来说或许有点粗暴,我在这里试图辨认出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生产性经济活动的规模达到一个关键的水平,并在它们作为一部分的经济和社会中引发了巨大和进步性的结构转变,这种转变应被看作质的而非量的改变。

### 三、起飞的内部结构

按照起飞定义……我们不仅要考虑供给和需求方面如何带来投资率的增长,而且要考虑制造部门如何迅速涌现并且如何获得刺激经济增长的初级和次级动力。

也许关于起飞的各种历史案例中的那些变量行为要说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它们已经假定了许多不同的形式,不存在单一的

模式。投资率和投资活动会增加,但这种增加的结果却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技术路线,由许多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机构,在广泛而不同的人类动机的驱使下扩散到一个自我促进的一般性增长过程。

下面这段的目的在于简洁地、仅是举例的方式表明其运动着决定内部结构的那些变量中所包含的相同的或不同的因素(elements)。

### 1. 可贷基金的提供

大体而言,为起飞投资的可贷基金有两种来源:来源于收入流动控制方面的转变,包括收入分配变化和资金引入;来源于迅速扩张的特殊部门的利润再投资。

经济发展是作为收入更多地从较少生产性消费的那些人手里转到较多生产性消费的人手里这样一种转变的结果而发生的——这样一种看法实质上是一个最古老和最基本的经济学观点。

历史地讲,导致经济发展的收入变化可以有多种形式。在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俄国的沙皇时期,给要求租金流动的大土地持有者的政府债券的替代物导致了高度的斯密主义收入再分配,使收入更多地转到有着较强的寻找物质利益和接受创新动机倾向的那些人手中。在这两个例子当中,政府债券的真实价值因土地贬值得到交换;并且,一般来讲,封建地主们随着没有吸引力的安排出现,而非被提供。抛开充公效果,土地改革产生了两个积极的动机:国家本身从使用农民缴纳的款项流动现在转为从地主手中缴纳,这项活动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一定数量的具有企业化头脑的地主直接投资于工商业。在当代的印度和中国,我们能够观察到沿着这条路径的不同程度的收入转移。印度仅在非常小的程度上依赖于大地主消费的非生产性收入的,尽管这种因素在这一项目中也占一小部分。中国在一系列没有伪装和缺乏伪装的资本征收中系统地通过非政府的资本联营将其转移到国家手中,并且积极吸收大量的贫下中农的存款作为资本的来源。

除了充公和税收策略之外(当国家比纳税的个体进行更多的生产性消费时,它们能够有效地运作),通货膨胀对起飞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18世纪90年代末期的英国、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都存在辅有物价膨胀的资本形成,这种物价膨胀将资源从消费品转变为利润。

当然,收入流向更具生产性的人手中这类变动不仅是在政府财政措施的辅助下,而且也是在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辅助下产生的。实际上起飞阶段都无一例外地以能够增加工业资本供给的金融机构的扩展为显著特征的,并且在许多案例中也以由集中的、正规组织的金融场所做的长期投资的扩展为标志的。

尽管这些国家和私人机构的资本供给对起飞是相当重要的,在一个封闭的实验中,还是可能证实这样的案例:起飞的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或多个其企业主(私人的或公共的)乐于将利润中的一个较高比例再投资于迅速增长的部门。另一方面,与前条件期和后面的持续增长期不同,起飞的决定性因素可能在投资过程的需求一边而不是在可贷资金的供给的一边。历史地讲有时是难以做出区别的,尤其是当政府同时担当资金供给者和主要企业家两种角色时,更是如此。但是,在经济史上存在着这样一些阶段,在那里资本供给机制方面的实质性进步本身并没有造成起飞,而只是进入了准备起飞的前条件期:例如1783年前期英国银行业的发展,1890年俄国银行业的发展等等。

再投资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是通过外贸产生的。正在发展中的经济已经从他们的自然资源中创造出主要的出口工业;在起飞期间,出口的迅速扩张通常是为引进资本设备进口提供资金和偿还外债。俄国和加拿大的谷物、瑞典的木材和纸浆、日本的蚕丝等完成了这一使命。现在,中国花费巨大的管理和人力代价而从农业部门中挤出来的对共产主义集团的出口,也担当了这一决定性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出口部门的发展本身不能保证加速资本的形成。在许多熟悉的案例中,扩大的外汇

收入被用来作收藏品投资(像著名的印度金条进口的例子)或非制造业消费支出。

应注意的是促使高额资金再投放于生产性投资之中的一个可能的机制是国内制造业消费的有效需求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比重日增的一部分收入流能够直接进入有魄力的企业家手中,使得他们能够扩张自己的实力,提高他们对工业原材料、半制成品和产品零部件的需求。

当然,可贷基金供应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资本输入。在许多经济的起飞阶段,外资担当了重要的角色。诸如美国、俄国、瑞典、加拿大,但英国和日本的例子表明,这并不能看作是本质的条件。当要酝酿修建铁路或其他的大规模的经营费用款项时,外资是非常有用的,在起飞阶段担当了重要的角色。然而无论它担当了这样举足轻重的角色,工业增长所需要的资金比例同发展交通和扩大城市居民的住房相比是相对小量的。外资对于帮助解决这些经营款项的负担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般来讲,在起飞期间关于资金提供我们能说些什么呢?首先,作为前提之一,超出大众消费水平之上的公共剩余没有流入到因囤积、奢侈消费或低效投资而糟蹋了它们的那些人手中。第二,作为另一个前提,能够提供廉价且充足的运作资金的机构的发展也是很必要的。第三,作为一个必要条件,必须有一个或更多包含着某种更一般的工业化进程的经济部门的迅速崛起,并且这些部门的企业家必须将相当大比例的利润再投资于进一步的生产。关于再投资过程的一种可能的周期性的看法是从迅速增长的出口部门获得投资收入。

确保第一和第二个前提实现的充公与财政手段历史性地变化着。并且,像下边所说的服务于启动起飞的主导产业部门的类型也是变动不居的。最后,像某些有特别意义的例子那样外资流向对起飞,特别是当需要筹措长期波动的经营资本时,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基于国内资金来源的经济中也同样发生起飞。

## 2. 企业家的来源

显然,当风险像上面所提到的那样被定义为包括接受创新倾向时,起飞需要在社会中存在一些能够接受借贷风险的群体以及他们的成功活动。在那些主要来自于欧洲西北部移民的富有的农业的有限群体当中,起飞阶段所需的企业家的产生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那里,起飞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并且当导致工业化的经济刺激出现时,商业和金融团体很顺利地就转入工业企业。但在其他的许多国家,企业家的充分发展则是一个不断摸索的社会过程。

在一些人类动机或别的动机的驱使下,某团体必须考察采取某一投资议案的可行性和可获利性。并且,为了使他们的努力获得相当的成功,他们必须尽可能地依照理性来选择他们企业的发展朝向。他们不仅要制造增长,而且要制造相当平衡的增长。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他们必须如此地行动仿佛他们正在试图使利润最大化。因为私人利润最大化的标准同不同部门的最佳利润率和增长模式不存在必然联系。但在一个正在增长的经济当中,在比商业周期更长的时期内,经济史能够合理地忍受对理性化的偏离,在这种意义上,额外能力是最后能付诸生产使用。将最终的人类动机问题放在一边,并且假定重要的经营款项(如果必要可通过国家创制包括补助的形式)已经产生,作为第一个近似,我们可以说在一个生产函数不断变化的动态经济中,某些其行为仿佛是为利润动机驱动的群体必须成功地涌现出来;虽然风险总是变幻莫测的,但正是在这种假定下,凯恩斯的下述格言应牢记于心:“如果人类本性中没有想抓住一个机会的欲望,没有对建造工厂、铁路、煤矿或农场上的满足感(淡泊名利),而仅仅作为冷静计算的结果是不会有这么多投资的。”<sup>①</sup>

在这种联系中,对经济学家来讲,对新教伦理给予尊重日渐成

<sup>①</sup> J.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纽约:1936年版,第150页。

为老生常谈<sup>①</sup>。历史学家不应对投向形式化增长模式灰暗地平线上的这点亮光置若罔闻。但是,我们的理论必须加以解释的那些众所周知的例子带着我们超越新教主义的轨道。在世界上武士阶级、祆<sup>②</sup>教徒、犹太人、北意大利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和中国的内仆(也包括法国新教徒、苏格兰人和英国北村人)在经济增长中担当了主导精英角色的那些地方。约翰·开尔文(John Calvin)不必承担这项重负。更为基本的是,促使利润最大化的积极的宗教的或其他价值观的引喻是这种重要现象的不充分的社会基础。这些精英的出现不只需要适宜的价值体系,而且需要两个更进一步的条件:第一,新的精英必须自己感到要否定由传统的较少进取的社会所提供的获取社会名誉和地位的通常形式;第二,传统社会必定是足够变通(或软弱的),能容许他的成员去寻找物质利益(或政治地位)作为一种可选择的合乎社会习俗的腾达之路。

尽管能够拥有聚集收入流向和工业投资决策权力的精英企业家阶层的出现是起飞所需要,但绝大多数的起飞或伴有农业技术或市场组织方面的激进变化。大体而言,农业企业家是个人拥有土地的农场主。因而,起飞需要一个愿意和能够对向他们开放的新技术、地权安排、交通设备以及市场和信用组织形式等所产生的可能性做出反应的农场主阶层。小批的有目的的精英能够在最初的经济增长期遥遥领先,但是,尤其是在农业以及某种程度上在工业劳动力中一种基础广阔的革命必须出现。<sup>③</sup>

① 例如,见卡尔多:《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经济月刊,1954年5月,第67页。

② 祆,音掀(xiān),古代波斯人的一种宗教——译者注。

③ 像人口问题一样,因考虑起飞而不是整个发展过程,农业被从这项分析中排除。但也应注意,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农业革命伴随着起飞过程。理论上我们可以设想不需要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起飞:例如,工业部门的增长和生产率允许传统农业萎缩并且用进口替代它。实际上,农业革命往往是为了满足迅速增长(和城市化)的人口吃饱肚子同时又因进口食品而消耗过多的外汇资源这样一种需求而发生的。并且,正如在本文中已多次指出的那样,农业革命实际上担当了一个基本的积极的角色,不仅释放劳动力进入城市并且养活他们,而且为一般的资本形成赚取了外汇。

无论更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将会对在起飞阶段上导引人们采取建设性企业行为的动机揭示些什么,比较清楚的是:这些动机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是变动无常的,并且他们很少是一种无混杂物质的纯物质特征的动机。

### 3. 起飞中的主导部门

一种经济的压倒一切的增长率必须首先被看成是各种特殊的经济部门不同增长率的结果,这种部门增长率部分被看作是起源于某种需求参数(如人口、消费者的收入和口味等),部分来自那些被有效开发的变化中的各种供给因素的初级和次级效果。

按照这种观点,各个经济部门可以归入以下三类部门:

(a) 初级增长部门,在这里创新或新的可获利的开发或者迄今未开辟的资源造成了一种高增长率并且在别处的经济中产生了扩张力。

(b) 补充增长部门,在这里迅速的进步是作为初级增长部门进步的直接反应或者是作为其需要而发生的。例如,与铁路相关的煤炭、钢铁和机械部门。这些部门不得不像莱昂替夫(Leontief)的投入—产出模型所表明的那样,要追溯到经济发展的许多阶段。

(c) 派生增长部门,在这里进步发生在与实际总收入、人口工业生产或一些其它的全面适度增长的参数有稳定关系的增长上。与人口相关的食品生产,与家庭组成相关的住房是这种派生关系的典型。

粗略地讲,初级和补充的增长部门产生的高动量本质上是来自供求环境变化的引进或扩散(当然,反过来也部分受到需求变化的影响);与此同时,派生增长部门则同需求的变化发生本质的联系,其生产函数上的持续变化也少有戏剧性特征。

在任何一个阶段,即使是在一个成熟且处于增长过程的经济当中,向前的动力也是作为在那些有着重大的外部经济和其它次级效果的数量有限的初级增长部门迅速扩张的结果。从这方面讲,起飞期间的部门行为只是一般增长过程的一个特殊的翻版,或者,

在另一方面,增长是出于不同的主导部门在不同的模式当中重复起飞的经验。像起飞一样,长期增长不仅需要社会产生非常大量的资金以备贬值和维持,用作住房和用作其他费用的平衡补充,而且需要一定量的基于新的生产函数之上的高速增长和高生产率的初级部门。只有这样才能使得资本/产出的边际比率保持很低。

那么,关于这些主导产业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历史地讲,它们包括从棉纺织、基于铁路和军事末端产品的重工业,木材、纸浆、奶制品最后到各种不同的消费品。很清楚的是,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单独造就出魔力钥匙。增长中的社会不需要摘要重述英国、美国或俄罗斯的结构序列和模式。但它必须具有的四个基本要素是:

(1) 必须扩大在产出上能为高速增长基础的那些部门的产品有效需求。历史地讲,这最初是通过收入从消费或收藏转向生产性投资的转变,通过资本输入,通过现有投资品生产率水平的快速增长,或者是通过这些路线的组合而导致可以用来购买国内制成品的消费者实际收入的上涨来实现的。

(2) 必须向这些部门引进新的生产函数同时扩展生产能力。

(3) 社会必须能提供在这些主要部门产生起飞最初所需要的资金,并且特别需要在私人或国有企业部门及其刺激扩张的补充增长部门中控制着生产能力和技术的企业主们的高额再投资。

(4) 最后,主导部门必须是这样的,即他们的扩展和技术转变导致了一连串的莱昂替夫投入——产出链,在其他部门引发了增加生产能力的需要和产生新生产函数的潜力。事实上,这是社会所做的进步性的反应。

#### 四、结 论

这个假说是向以旧式方式看待经济发展的一个复归。起飞被定义为在一段相当短的时期内,直接与生产方式上的激进变化相关并且有其决定性结果的一场工业革命。

这种观点没有否认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长期的、缓慢变化的作用。相反,起飞需要在社会经济组织的核心及其有效的价值尺度中具备整套前提条件。但为了使起飞能够成功,它必须能够导致持续性的增长。这暗含了经济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更深入且经常是更缓慢的进一步变化。

这种观点力图证明的是一个或多个新产业部门的迅速增长是经济转型的根本的强有力的发动机。它的力量来自于当一个社会要对某一影响积极反应时,影响形式的多样性。具有高生产率之新生产功能在某种部门的增长,使其本身趋向于提交人均产量。它将收入放到那些不仅积蓄了高比例的扩展收入而且愿意将其投入到高获利的投资当中去的人手中;它为其它制成品建立了一系列有效需求。它为扩大的城市地区制造了需求,在那里,资本费用可能很高,但那里的人口和市场组织有助于使工业化成为一种发展过程。最后,它拓宽了外在经济效果的范围,这最终将有利于在起飞的主导部门最初的冲力开始增减时形成新的主导部门。

我们可以观察历史和现代世界中对整个社会有强有力影响的非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上的重要变化。如果自然资源是够充足的,或者新的农业技术能够生产充足的粮食,这种变化甚至能超过人口的增长,导致人均产值的增长。但是,他们只能是起飞的必要的前提条件或者是必要的伴随物。在这个分析中没有什么能看作是降低了农业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的生产变化中的重要性。但在起飞的末期需要社会找到一种有效地应用自己的特殊资源办法,D.H. 罗伯逊(Robertson)曾将其称作制造技巧(tricks of manufacture);并且持续的增长需要它将自身如此组织起来以至于能在结构变迁的无底的流动中应用他们。只有这样,像我们都正确地教导过的那样那只逐渐变小的老魔鬼才能够在海湾被捉住。

(刘晓君 译)

西蒙·库兹涅茨

## 现代的经济增长：发现和思考<sup>\*</sup>

### 定 义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解释为在一个长时期内提高为其居民提供种类越来越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这种日益提高的能力基于不断进步的技术以及它所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这一定义中包含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产品供应的持续上升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并由此而使经济增长得到证明。有一些小国能够向本国居民提供越来越多的收入，因为它们正好拥有能够为更发达的国家所利用的资源（矿产品、场所，等等），从而获得大量的、日益增加的经济收益。这些极少数幸运的国家产生了令人感兴趣、足供分析的问题，但我们这里所关心的并不是那些向别人出售幸蒙天赐之物而致富的国家，而只关注那些利用当代的先进技术而致富的国家。进步的技术是经济增长可以选择的缘由，但它只是一个潜在的必要条件，光靠本身还是不足的。如果技术要得到有效和广泛的利用，而且确实由于对它的利用而促使它本身的进步，那么，制度和意识形态必须进行调整，使之通过人类知识的大量增多而产生

---

<sup>\*</sup> 选自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一书。

的创造发明得到合理的利用。从现代经济增长中举几个例子来说：蒸汽动力和电力以及需要它们的大型工厂与家庭企业、无知愚昧和奴隶制都是不相容的。后者即使在发达世界的许多地区过去也曾经广泛地存在过，因此必须用更合适的制度和社会观念去取代它们。同样，现代技术与农村的生活方式、庞大的扩展型家庭以及崇敬不受干扰的自然也是不相容的。

技术进步的缘由、最受其影响的具体生产部门，以及它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数百年来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各不相同，因此，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也有差别。它们的调整通过日益增长的经济引进和传播的技术变化相互发生作用。人类知识进步中的重大突破，即那些构成长期以来持续增长并且传播到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主要来源，可以称之为划时代的革新。经济史上的变化过程也许可以划分为几个经济时期，每个经济时期都以划时代的革新来识别，这些划时代的革新产生了经济增长的明显特征。<sup>①</sup>如果不考虑这样一些经济时期的辨别并确定其时间是否合适的话，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即现代经济增长指的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时间从18世纪末开始，范围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不考虑其重大的空间作用）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分类是因为这些国家设法充分利用现代技术的潜力，其中包括欧洲的大多数国家，西欧的海外分支，还有日本，它们只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sup>②</sup>本文将集中讨论现代经济增长，但显然也需要注意到它对全世界的影响。

目前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许多观察得到的共同特征与各个较早时代经济增长的特征有所不同，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可能用数字来表达这些特征。但我们可以列举出其中一些特征，因为这有

---

<sup>①</sup> 关于经济时期概念的讨论，见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纽黑文，1966年，第1—16页。

<sup>②</sup> 关于目前对非共产主义发达国家的分类，见《联合国年鉴》，第156页，表5注。这些分类时有变化，与其他国际机构所作分类也略有不同。

助于我们去理解今天世界经济生活中具有特殊性的问题。既然这些特征是选择出来的，因此难免有遗漏之憾，它只包括可以观察到的并由经验得出的特征，所以将把我们引回到只能用肤浅的观察和推测去了解一些基本因素和条件上去，至于这些特征所包含的意义，至今仍难衡量。

## 六个特征

以国民总产值及其组成部分、人口、劳动力等常规衡量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第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很高，至少到最近的10年或20年内，可以观察到这些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增长率比过去的增长率要提高数倍。<sup>①</sup>第二，生产力提高的速度快，也就是说，产出高于对每个单位的所有投入的比例，即使我们把劳动这个主要生产力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包括在投入中，情况也一样。在这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速度也是过去的数倍。<sup>②</sup>第三，经济结构转变的速度快。结构变化主要包括从农业生产转向非农业生产，现在则是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生产单位的规模发生变化，与此有关的从

---

① 非共产主义发达国家在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每年的人均生产增长率为2%，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国民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这样的增长率大致上意味着是一个世纪前的人均生产率的5倍，人口增长率的3倍，总产值增长率的15倍以上，远远大于前现代的增长率。对于后者，只能加以推测。但据合情合理的估计，从中世纪初期到19世纪中叶这个时期里，西欧的人均产值增长率只有现代经济增长率的十分之一。见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剑桥，1971年，第10—27页。1850—1960年欧洲和欧洲移民地（即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人口增长率是1000—1850年的4倍到5倍。见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第35、38页，表2—1和表2—2。这说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提高40倍和50倍。

② 利用常规的国民经济核算，我们会发现生产力提高的速度是十分快的，（在统计的意义上说）约等于人均产值的全部增长。即使将无形成本和投入计算在内作一些调整，生产力的提高仍然约等于人均产值增长率的一半以上。

个体企业向非个体经营组织的转变,劳动的职业地位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sup>①</sup>此外还可以加上经济结构的其他方面发生的几种变化(消费结构的转变、国内供应和国外供应所占的比例等等)。第四,有紧密联系而且极为重要的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也迅速变化。人们很容易想到社会学家把城市化和世俗化视为现代化过程的组成部分。第五,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利用技术力量的增强,尤其是运输和交通方面已经增强了的技术力量(包括和平的和战争的),有扩展到世界上其余地区的倾向——从而形成了一个前现代的任何时候都未曾有过的世界。<sup>②</sup>第六,现代经济增长的传播,尽管在全世界产生部分效果,但仍然是有限的,因为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国家中,经济状况仍未达到现代技术潜力可能达到的最低水平。<sup>③</sup>

这里简要地概括了现代经济增长的两个数量方面的特征,它们与增长速度有关,也与结构的转变和国际传播有关,为我们提出的假设提供证据,即现代经济增长标志着一个特殊的经济时代。如果总体增长的速度以及在经济、制度,甚或意识观念体系内的结构转变速度比过去高到足以标志一种革命性的加速,如果世界上各个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样紧密地结合起来以致成为一体,那么,

---

① 现代结构转变之迅速可以很容易地用劳动力在农业(及其有关工业)和非农业生产部门的分配变化来说明。1870年,美国农业部门占劳动力的比例仍为53.5%,1960年已下降到7%以下。在比利时这样一个古老的欧洲国家中,农业部门在1846年占劳动力的比例为51%,1947年下降至12.5%,1961年再降至7.5%(见科罗赫等:《劳动人口及其结构:国际历史统计》,第1卷,布鲁塞尔,1968年,表D—4和C—4)。任何国家,不论大小(飞地除外),农业部门占劳动力的比例下降50%都用了好几个世纪的时间。相比之下,下降30%到40%只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应当说是极快的结构变化了。

② 源出欧洲的发达国家的向外扩张可以追溯到现代经济增长以前的一个很长的时间,的确,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但是,19世纪发达国家的交通运输能力的增长使它们有可能对殖民地施加大得多而且是更直接的政治统治,使过去封闭的地区(例如日本)“打开大门”,以及“瓜分”过去未曾瓜分过的地区(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③ 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下文第四节,我们将讨论欠发达国家。

某种新的、重要的增长缘由，某种新的划时代革新，必定产生出这些根本不同的模式。人们也许会说，这个缘由便是把现代科学作为先进技术的基础，那是科学发展中的一个突破，为技术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得多的潜在力。

然而，现代经济增长继续存在着过去的许多趋势，只不过是加速的形式出现。我们发现，除了日本，也许还应当除了前苏联，所有现在的发达国家在现代经济增长之前和工业化开始之前都比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远为进步，它们由于前现代的趋势而得到比较有利的条件，于是这种连续性便特别重要了。它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强调各种经济时代之间的区别是复杂的知识选择，强调过去趋势的连续性以及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变化的方式应当列为最需要关注的课题。过去20年来许多发达国家的生产和生产能力都加速增长，这是反映以适应科学的技术所提供的潜在能力发生了重大变化呢，还是反映社会抓住那种潜力的能力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在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损失的国家来说，这是不是一种补偿其声望所受损失的方法呢？最后，这是否仅仅是美国对外政策暂时有利的气候的一种反映呢？向空间发展是发达国家过去对外扩张趋势的延续呢，还是预示新的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些问题可以清楚地予以说明，但是由于把现代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特殊时代来观察，因而它们暗示有一些范围更广而需要分析的问题。

上述的六个特征是互有联系的。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极其重要的。在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当稳定的情况下，人均产量的高速度增长意味着每个工人的生产率有高速度的增长；如果平均劳动时间减少，那它便意味着每人每小时平均产量以更高的速度增长。即使我们承认最广泛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大有增加，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仍然很高，而且确实反映了人均产量和人均纯消费的巨大增长。由于后者反映技术进步的实际效用，因此，生产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技术革新对若干生产部门的影响不同，国内对各

种消费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同,对外贸易的可比利益在变化之中,情况也是如此。正如前文指出的,技术进步改变了生产厂家的规模和经济企业单位的性质。结果,劳动力有效地参与现代经济系统,必然带来它的位置和结构的迅速变化、职业群体关系的迅速变化,甚至导致劳动力与整个人口之间关系的迅速变化(然而,最后一种变化处在受到全面限制的狭窄的范围内)。于是,不仅高速度的总体增长与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有联系,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同社会中其他方面的迅速变化也有联系,其中包括家庭的形成、城市化、人类对其作用的想法,以及衡量人类在社会中取得成就的标准等等。在先于其他国家进入这一过程的国家中,现代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意味着地理上的延伸;这一过程的继续传播,在运输和交通方面迅速变化的促进下,意味着向欠发达地区的不断扩张。与此同时,制度和意识形态转变的困难需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现代技术新的巨大潜力转为经济增长,因为十八世纪末限制了这种体系的传播。此外,发达国家的政策对这种转变造成的障碍,过去强加在欠发达地区,现在仍然强加在这些地区。

如果现代经济增长的这些特征是相互联系的,即相互之间外于一种特征引起另一种特征的因果关系之中,或者说,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都在同时产生影响,那就应当注意到另一种似乎有可能而且是重要的联系。技术革新的大量应用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特殊内容,它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有紧密联系的,反过来又成为技术更加进步的基础。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但有一点看来十分清楚,技术革新(许多是以当代的科学发现为基础)的大量应用,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反馈作用。它们不仅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大量的经济盈余,使这些费时很长又需要大量资金的研究工作得以进行下去,而且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作用,在经济生产改革的压力下,它们使有效的新工具发展为科学所用,并为研究自然过程的行为提供了新的资料。换句话说,发达国家中的许多生产厂家可以看作是探索自然过程的实验室和研究新工具的中心,两者都

可以在科学和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过去的两个世纪,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极大地加速了对有用知识的积累作出了贡献,而这些应用研究又进一步刺激了新的技术革新。这决不是偶然的。因此,现代经济增长反映了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它通过大量应用的反馈,保持了知识的进一步高速度发展。除非有什么障碍来干扰,否则它就为自我持续的技术进展提供一种机制,由于宇宙(相对于地球上的人类来说)之广大,技术进展显然也是无止境的。

### 经济增长的某些含义<sup>①</sup>

现在我要简要地讨论现代经济增长的某些社会含义,讨论它对有关国家中的各种群体的生活状况所产生的影响。许多这样的影响是人们特别关注的,因为它们不以当前对经济增长的衡量反映出来,而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衡量经济增长存在着这种缺陷,因此对衡量经济增长的限度及其局限性展开热烈的讨论。

对生活条件的影响一部分来自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革新的重大作用,一部分来自基本生产结构的迅速转变。先从后者谈起,它产生的一些重大影响,例如城市化、国内人口迁移、雇员地位转变,以及可以称之为根据才能进行职业选择的原则等等,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这些特征已经引起了注意。尽管如此,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变所造成的两组重要影响仍应该明确地提到。

第一,“城市化”造成的生活条件的变化显然含有各种各样的损失和收益,而在目前衡量经济时却没有把它们包括在内,其中一些得失甚至从未考虑过应当加以计算。从乡村往城市的迁移(一个

---

<sup>①</sup> 本节提到的许多论点,在库兹涅茨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一书中作了详细讨论,尤其是第2章(第75—98页)讨论了经济增长的非一般成本。第7章(第314—354页)讨论了整体变化与社会结构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转变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家之内的迁移,以及往往也有国际之间的迁移),要承受巨大的损失,因为要拔掉老根而去适应城市生活的毫无特色和较高的开支。学习新的技能并失去过去所掌握的技能的价值,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而言,显然都是一种浪费。如果说这些耗费仍以通常的衡量方法而不考虑进去,那么,一些收益也同样被疏忽了。人口密集的城市生活提供的快乐和精神财富是“单调和粗野”的农村生活无法提供的;人们一旦学会了新的技能,往往就获得了可以比过去生活得更富裕的适当基础。在考虑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其他转变时,对从乡村向城市生活转变所包含的得失同样也可应用,例如参与经济活动的性质、社会的价值观念,以及对社会中一些越轨成员施加的新压力等。

结构变化中第二个令人感到兴趣的方面是它显示出参与具体生产部门的那批具体人口在经济中所占相对比例的变化。由于从事经济活动是对人民生活的主要影响,某个生产部门在经济中所占比例发生了变动便会影响到从事那一部门活动的一批人,影响到他们的特征,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增长势必使一个又一个人口群体的相对地位下降,例如农民、小生产者和土地所有者地位的下降。这是一种不易被接受的变化,而且事实上也像历史告诉我们那样往往受到拒绝。一些经济群体过去存在的相对地位如果持续地处于动荡之中,便孕育着冲突——尽管各个群体的绝对收入和绝对产量都有上升。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冲突会导致公开的内战,美国内战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和现在的某些欠发达国家中,类似的例子也不少。

只有在不付出太高的代价,而且肯定不至于造成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构长期被削弱的情况下解决这种冲突,现代的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实现。主权国家具有以忠诚和感情一致为基础的权力,简而言之,即现代民族国家,在和平解决由于经济增长而引起的冲突时起着关键作用。但是,民族国家用各种方式发挥这种或那种作用时,可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强烈的民族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它造

成的影响已为人们所熟知，无须赘述了。许多发达国家的记载揭示出解决经济增长引起的冲突以及为了克服对经济增长的抵制和障碍而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在后几代人肩上添加了沉重的负担（在德国和日本很明显）。当然，这并不是国家的唯一经济功能，它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若要提出与国家有密切关系的任务，那就是它可以鉴定、选择或抛弃法律和制度方面的革新，而这些革新措施是为了有效地组织和沟通新的生产潜力而提出来的。这种情况也可能引起冲突，因为法律和制度的不同处理会给社会上不同的经济群体造成不同的影响。

既然为了现代经济增长不得不把由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而不断产生的冲突在萌发状态中就加以解决，那么，现代的经济增长便可以说成是有控制的革命过程。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特征以及提供必要调整的社会革新，都是影响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因素。但这些革新还有其他的影响应该提到，而我们在下文以技术革新的影响来讨论时，得出的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法律形式、制度结构，乃至意识观念的革新。

一项技术革新，尤其是以新的重大发明为基础的技术革新，都体现出一场向部分未知情况进行的冒险，在革新的大量传播揭示出全部的直接和有关的效果之前，有些事情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认识。如果某项发明可以为广泛应用或改进提供基础，那就是一项重大的发明（例如主要由詹姆斯·瓦特发明的台式蒸汽机）。它的积累效果是全新的，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有效，并且引起经济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巨大转变。但是，这些新的效果几乎难以充分预测或事先作出恰当的估价（有时甚至在事后也做不到）。标志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事物，诸如电力、内燃机、原子能、微波通讯和计算机，由于新工业材料钢、铝和塑料而产生的发明等等，情况也是如此。即使在技术革新只是一些仿效的国家采用已知的技术时，结果也可能完全难以预料，因为它们是把技术这种已知的东西与过去从未结合在一起的某些新东西——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框架结合起来。不

用说,即使在现代以前的各个时代里,标新立异和探索未知的要素同样是非常突出的,因为知识和技术上的创新是任何重大经济增长的前提。但是在现代的经济增长中,这种创新的频率显然快得多了,并且为速度更高的总体增长提供了基础。

对新事物和部分未知的事物所冒的风险,产生了许多影响。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意外,即料想不到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事实证明,一项发明或革新如果具有大得多的生产能力,可能引起远远比发明家或首先应用这种发明的那一批企业家所想象的广泛得多的应用,产生许多更具积累性的改进。或者,一项重大发明的广泛应用可能在传播的前几个阶段造成无法预料的成本增加。正面和负面的惊奇都很多。主张熊彼特经济学说的许多企业家就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所推动的,并且最终使他们名利双收的那些革新所包含的广大范围和意义。我们大多数人也都能指出许多最初看来好像会造福无穷的技术革新或社会革新却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消极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观点是不能把意外看作是偶然:它们是在技术(或社会)革新过程中固有的,因为其中包含着一个未知的成分。此外,重大革新的推广是一个无法准确预料的长期和复杂的过程,它的最初经济效果可能在其他过程中引起反应。这反过来又会改变这种革新对人类幸福产生影响的条件,并且进一步提出调整的问题。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很容易找到下述的先后关系,从小汽车成为大众交通工具后,接着是城市郊区的发展,富有者从市中心迁出,收入较低的和失业的居民迁移和集中到市中心的贫民区,出现了尖锐的城市问题、财政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然后是大都市不断巩固的趋势。但是,在20年代,当小汽车在美国开始发挥它们为大众服务的功能时,这种先后关系的性质和内容肯定不明显。

确实,按照这条线索再向前推进,人们就可以论证说,一切经济增长都会随之带来一些意外的后果,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随

着重大革新的巨大影响被感觉到,随着要求满足的需要得到解决,负面的后果便更显得重要。如果这个论点成立的话,那么,现代的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迅速发生的革新和这些革新推广的时间的缩短,必定会带来消极后果较高的发生率。但是不能忘记,现代以前的经济增长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于技术较差,这些问题更具有隐蔽性。即使我们不像古典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不考虑即将来临的自然资源的枯竭问题,只讨论早期的城市化,也会看到一个重大的负面后果,那就是随着人口从更有益于健康的农村向更能传染疾病的不卫生城市转移时,人口死亡率大大地上升。这里有两点是有重大关系的。第一,不管对经济增长做什么样粗略的计算,它的消极后果从未被认为超过了积极贡献,因而导致对经济增长的否定。第二,人们可以假定,一旦出现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意外消极后果时,各种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的潜力都是被用来减轻或排除这样的后果。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消极后果会积累成严重的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因为这些后果很难预测,不可能尽早地采取有效的预防或改进措施。即使一开始就采取行动,在有效的技术或政策处理上也会出现拖延。即使如此,从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这样的意外消极后果曾不断被克服,因而人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虽然摆脱不了这些问题,但不管经济发展到达什么程度,由此产生的任何具体问题都是暂时性。

## 欠发达国家

有两组重要因素似乎限制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扩大。第一,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样的经济增长需要一个稳定和灵活的政治和社会框架,它能适应迅速的结构变化,并解决由此产生的冲突,同时又能鼓励社会中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些群体。这样的框架并不是那么容易或迅速建立的,即使现在的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也为此作了长期的斗争。日本是那些植根于欧洲文明之外的国家

中迄今为止加入了发达国家集团的唯一国家。如果说现代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这种框架包含着欧洲文明特有的成分而又难以找到替代的话,那么,这种现代框架的出现可能非常困难。其次,发达国家的组织在制订对外政策上有越来越强烈的民族倾向,即使在许多地区出现了某些现代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但是显然受到了阻碍。这些政策从强加殖民地的地位起,一直到限制它们的政治自由,结果使政治独立和使本地社会成员摆脱其次等地位而不是经济发展成为了首要任务。

欠发达国家没有能够利用现代经济增长的潜力,对此可以用几种因素来解释。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本地经济以及社会制度落后这个问题本身引起激烈和有倾向性的争论。不管解释上述情况的因素如何重要,发现的事实是清楚的。目前世界上大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在经济方面属于欠发达集团。更重要的是人口集中在人均产值低的一端。从我们掌握的世界各国可比产值来估计,去年,即1965年的人均生产总值(按市场价格)来看,在世界上32.7亿总人口中,人均产值低于120美元的占17.2亿人,经济发达国家的人口为8.6亿人,人均产值为1900美元左右。即使对欠发达国家作狭义的定义,位于中间的国家人口不到7亿,即占世界总人口的20%弱。<sup>①</sup>因此,绝大多数人口的划分是这样的,要么处在人均经济成就极低的水平上,要么处在比较高的水平上。显然,现代经济增长中的这个方面应当引起最大的注意。事实上我们当前掌握的有关欠发达国家的数据和对制度结构的知识远不如我们对发达地区的认识,但它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这个问题的理由。

---

<sup>①</sup> 以上的基本数据引自哈根和霍里利欣的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是联合国的出版物,还以其他辅助资料来源(共产党国家的数据)加以补充。这里使用的是1965年的一般美元兑换率。对共产党国家的估计,已作一些调整,以与国际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吻合。发达国家中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的大多数国家,还有日本。不过,有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的小国家(例如荷属安的列斯、波多黎各、科威特、卡塔尔)由于特殊的自然资源而有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不包括在内。

这里可以提到一些初步发现,或者还不如说是似乎有理的印象。第一,如果我们考察一批欠发达国家,特别是把范围扩大到(应当如此)人均产值略高于120美元的国家(按1965年价格计算),那么,这些国家在疆域大小上,在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上,在主要的传统制度上,以及在发达国家过去对它们施加的影响上(这些影响在不同的时间,产生于不同的来源),变动范围极大。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例如在人口数量上,有中国大陆和印度那样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有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小国;西方对非洲的直接冲击与对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冲击在时间上也不相同。此外,中国和印度的文明产生了独特制度,产生了统一和庞大的社会,直至今日都使起源于欧洲的任何社会在规模上相形见绌,它们同构成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制度不相同,与非洲形成许多部落社会的制度也不相同。

对欠发达国家进行概括必须谨慎小心,必须根据它们的条件和制度的多样性谨慎地详细研究。它们在利用现代经济增长的潜力上都遭到失败,肯定意味着它们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人均产值较低,农业或采掘工业占有较大的比重,生产规模一般比较小。但是,具体参数却有很大的差别,而且由于经济增长的阻力有重大的差异,它们也可能提出不同的政策方向。

其次,今天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境况与现在发达国家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之前所处的境况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日本也许算是一个例外,但也不能肯定这样说)。与工业化前夕的发达国家相比,占世界人口最多的欠发达国家人均产值的水平要低得多。当时这些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就比世界上其余国家先进,从未处于人均产值低的一端上。这些国家的大小以及某些基本条件颇不相同;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俄国除外)都没有印度或中国那样大,甚至连巴基斯坦或印度尼西亚那样大的也没有。现在的发达国家没有必要根据极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去进行调整,而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恰恰是近二三十年来许多欠发达国家的特征。尤其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老的欧洲国家通过大量对外移民,把过剩人口迁移到机会更好的地方去,从而缓解了工业化的某些紧张状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日本也是如此。对今天人口众多的欠发达国家来说,这条道路已被堵塞。当然今天的欠发达国家能够获得的物质和社会技术大大超过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所能获得的。然而,正是因为较严重的落后状态和表面上看来较强的技术储备结合起来,才使得今天的欠发达国家与当时刚刚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的发达国家的处境有显著的不同。

最后,情况很可能是:尽管物质和社会技术的积累是巨大的,但适用于欠发达国家的革新措施却积累得并不多。即使有人认为基础科学的进步不一定同产生这种科学的国家的技术需要有密切关系(即使这可能有争议),但科学的应用、发明和工具的进步无疑是对发明国的具体需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英国工业革命的几项重大发明确实如此,说明广泛的需要是发明之母。发达国家的生产条件与今天的欠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别,发达国家使用的物质技术也许并不能满足革新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事实。发达国家拥有的社会技术未必能为在制度和人口数量背景上差异很大的欠发达国家提供适用的制度或办法。因此,强调节省劳动力的发明的现代技术可能并不适用于劳力过剩而其他因素例如土地和水源不足的国家。强调个人责任和追求经济利益的现代制度也可能不适用于许多欠发达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区的较传统的生活方式。这样说不应被解释为否定现代技术中许多可以转化的部分的价值,只是想要着重指出,能够具体适应欠发达国家不同需要的物质和社会工具可能会短缺。

如果以上的观察是正确的话,我们可以接着讨论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问题中的几种意义。对它作详细而明确的阐述,我还有些踌躇,因为观察所依据的资料和我们的知识有限。不过,至少有一种意义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看来它可以解释这个领域中目前发生的许多事情,只要简单说明一下就可以了。欠发达国家的大幅度

经济增长可能需要在现有的物质技术,甚至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作出较大的改变。这并不仅仅是个借用现成的物质工具和社会工具的问题,也不是直接运用过去的增长模式的问题,而是在参数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对社会和政治结构的革新要求可能特别强烈。在共产党领导下推进高度强制性工业化的那些国家里,出现了这些结构的剧烈变化。最早的变化可以追溯到40年以前(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它们充分说明这些变化可能包含着一种社会创新和革新。这里姑且不谈民主主义和非共产党的专制主义组织之间存在的差异,即使共产党的组织也有各种各样,这是人们熟悉的。如果认为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中,这些革新主要是对经济落后与现代经济增长的潜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作出的反应,那就过分简单化了,或者说这些革新是过去历史的无情后果,那也过分简单化了。但是不管为建立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而进行的斗争是不是一种反应,一旦得到解决,它的结果就会明显地形成经济增长能够出现的一些条件。对于今天的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看来很有可能的是,它们还要为建立与充分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有效的政治体制进行长期的试验,与此相关的努力还包括在经济分析体系中加上知识的增加,更加注意时间的利用,并且注意到家庭,不仅把它们作为消费方面而且也要把它们作为投资方面成为经济决策的中心。这些努力都是向同一方向迈出的步骤。有关发达国家本身经济增长的理论和估价依然存在着某些分析和计算方面的问题,看来这是颇为明显的。但是同样明显的是,人们可以期望所分析的若干方面、国民经济的计算以及凭经验而作的研究成果的积累也会有重大变化。这些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任务。

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有些不同。它迫切需要更广泛地提供检验过的数据,主要是指用在经济分析程序中经过仔细考查的数据。前面已经提到,有关欠发达国家的数据和经济分析在数量上比发达国家少得多——这与物质资本的供应

比较少相类似。但是,近年来有关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数据已经迅速地积累起来,只有大陆中国等少数国家例外,它们把数据看作是可能被(国内外)敌人利用的情报,因此政府不予公布,甚至无法搜集。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在分析这些数据时也有着差距,因为这样的学者人数很少,不能在欠发达国家内部抽出时间来研究,同时也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首先关心的是他们自己国家中的问题。人们可以期望(但是不能无限期期望)发达国家在完成提高分析能力和计量方法时,不要排斥或忽视欠发达国家迫切需要的研究,这些研究工作除了讨论那些看来是重大的障碍和似乎是理想的政策方案外,还应当讨论它们经济表现的数量基础和制度条件。

(杨豫、陈祖洲 译)

K.沙尔玛

## 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

### 一、政治现代化\*

在一些国家中,政治领域中的现代性特征是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

首先,是理性主义导致了权威的合法化,而同时,它也伴随着世俗化的过程。人们在其政治活动中变得更为理性,更多地采取经验分析的态度。随着世俗化的过程,承担不同功能的社会制度开始不再从属于宗教,并获得自己的自主性。对被强加的政治体系的反抗也会发生,人们要蔑视甚或打碎世袭的权威。人们所追求的是,权威应当以某些理性原则为基础。人们要寻找和确立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权威来源。这种权威是来自于被统治者,即国家进行管理的权威是从人民中产生的。

“现代化的政治框架基本上是根植于权威合法性来源的变迁之中。”<sup>①</sup>

“(现代化)的特征是,传统精英及统治者的传统合法性的弱

---

\* 选自[印]K. Sharma《印度的政治现代化》,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① Y. Singh《印度传统的现代化》, Thomson Press Delhi, 1973. pp. 158—159。

化,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确立可以说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原则。”<sup>①</sup>

简而言之,国家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不是来源于超自然的认可,而是来自于世俗的认可。权威逐步以人民的意志以及对公民可以说得通的理由为基础。因此,政治现代化首先涉及的就是权威来源的转换。宗教的、传统的、种族的权威将被单一的、世俗的国家政治权威取代。同时,出现了权威的集中化,这包括政治整合和国家整合。

由于世俗主义证明了政治事件必须基于人的意志的重要性,也就会更加强调理性、科学和世俗的决策技能。这就意味着,人民有权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并有权参与政治系统的决策过程。因此,现代国家不可避免地是民主国家。在这当中,就会存在一种参与决策过程的竞争。“竞争是政治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sup>②</sup>人民只有在他们获取权力之后才有可能参与决策过程。因此,这里就存在一种对权力的竞争。政府不再是孤立于老百姓的权力的代表,相反,它必须以人民的参与、同意为基础。因此,“政治权力会不断扩散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去——最后扩散到所有成年公民,并由他们形成一致性的道德秩序。”<sup>③</sup>“权力不再具有封闭的等级特征;政治活动的范围扩展到大众参与的水平,并对人民的希望做出反应,而人民的希望是通过各种利益群体来表达的。”<sup>④</sup>

由此,人民成为政治共同体中的积极参与者。这也意味着政治意识的增长和大众的政治化。“如果说现代化是我们时代的主要趋势,那么,恰恰是这种政治化为其提供了驱动力。”<sup>⑤</sup>在政治过程

① S. N. Eisenstadt《现代化:增长与差异》,载《印度季刊》Vol. XX No. 1, pp. 17—18。

② Allnond 和 coleman(编)《发展中地区的政治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533页。

③ S. P. Aiyar(编)《传统社会的现代化》,1973, pp. 5—6。

④ Y. Singh《印度传统的现代化》,第158—159页。

⑤ R. Kothari《印度政治》,1970,第1页。

中、越来越广泛的原先被排斥于公众参与之外的阶层被动员起来。这个过程是通过两个阶段完成的。在一开始,民主政治主要是精英政治,而当群众具有了政治意识,并认识到自己作为政体中的公民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时,精英政治开始转变为大众政治。这种状况无疑有利于代议性制度的发展。“问题还不仅如此,现代国家通过扩大人民在政治中的参与程度,并使大量的政治单位对政治产生影响而使自己有别于传统国家”。<sup>①</sup>

就参与来说,现代政治是与传统政治不同的。勒纳认为,“传统社会是一种没有参与的社会……它使人们由亲属关系形成社区,这些社区不仅互相是隔离的,而且也独立于中心之外……相反,现代社会则是一种参与社会”。<sup>②</sup>甚至在非民主国家,某些形式的政治参与也是允许的,目的在于为政治系统增加合法性。

恩格斯也认为,“政治发展是指政治化的过程;公民在国家事务以及权力运用及其结果中的参与或投入的增加”。<sup>③</sup>阿尔蒙德和韦巴则说,“新世界的政治文化将是政治参与的文化”。<sup>④</sup>

这种参与既可以民主的形式进行,也可以全能主义的动员(tptalitarian mobilization)的形式进行。它也可以采取大众对精英的操纵做出反应的形式。但关键的问题是,主体应该是积极的公民。政治中的大众参与会提高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及其效能。因此弗雷将政治现代性定义为“权力分配和交互性方向的变化”。<sup>⑤</sup>

这种过程的顶点,是人民对选举统治者和政策形成过程的参与。在选举过程中,人们找到了正式表达的方式。公民在政治选举中的参与或投入,有助于民主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建立。“掌握权力

① S. Huntington《变革中社会的政治秩序》。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第36页。

② D. Lerner《传统社会的消逝》,1958,第48—50页。

③ F. W. Riggs《科层制与政治发展》,见拉巴龙巴拉(编)《科层制与政治发展》,1963,第139页。

④ A. Almond 和 S. Verba《公民文化》,1963,第4页。

⑤ F. W. Frey(编)《沟通与政治发展》,1972,第301页。

的人的合法性将不断受到检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将通过选举而不断更新。”<sup>①</sup>

由此可见,理性化、世俗主义和民主是政治现代化的三个基本特征。因此,在政治领域中盛行的将是成就取向。既有的特权和先赋地位将不再为现代政治所接受。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平等的价值观将取代等级的价值观。这就意味着封建的和中世纪的结构终结,封建残余将逐步消失。“典型的特征是传统精英的被削弱。”<sup>②</sup>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个人性将成为与之相伴随的道德价值,在政治领域中,个人将会受到维护。政治结构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不是群体。国家和个人将不断地由中介机构或群体联系起来。国家成为公民的团体,进行统治的政府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工具。在这当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联系将会增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社会中人形成各种各样的民主团体、组织和制度。这些不同的团体和组织是以选择而不是以出身为基础的。在现代多元社会中,不同的利益将通过正式的组织来表达。因此,正式组织是现代社会和政治的基本特质之一。而在这些组织中,政党是最重要的,这些组织的特征是理性、效率和效能。政治现代化也意味着人们建立团体的能力增强,并利用这些团体,将公民整合进共同的政治过程。这也可以看作是精英和大众间的整合,即填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价值整合,即对于社会所要追求的目的和目标,以及获得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手段和程序形成最低限度的价值一致性。目标可以是自由、平等和社会公正,手段既可以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是自由民主。

随着功能专门化的发展,政体内的结构和子系统会发生分化。随

---

<sup>①</sup> R. A. Scalapino《战前日本的选举和政治现代化》,见 R. E. Ward(编)《现代日本的政治发展》,1973,第249页。

<sup>②</sup> 见艾森斯塔德《现代化:增长与差异》,第17页。

着这个过程的进一步推进,分化的结构和子实体会越来越多,互相依赖的程度为将提高,最终将会形成一种进行互动的共同框架,并使政治共同体得以巩固。新的共同的象征符号将会形成,社会中的各种群体将会在这些符号中发现个人和集体的意义。这种扩散性的社会最终会转变为一种有中心政治系统的一致性大众社会。因此,在政治领域中,现代化的特征是“领域的扩大,特别是社会中的中央立法、行政和政治机构的权力的加强。”<sup>①</sup>换言之,就是政治整合。

在大部分情况下,权威的集中化可以先行进行,但在某些情况下,则首先要有国家整合和国家建立(nation building)。从理想上说,国家是基本的政治单位。用佩伊的话来说,现代化的其他特征包括“对于公共事务的公正性的感情,但首先是在政治领域中接受这样一种信仰,即民族国家是政治的首要单位。”<sup>②</sup>

在一个国家中形成有效的人口单位,是政治现代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人民将脱离对种族和语言群体的忠诚,而形成对国家的忠诚。部落、种姓和村庄等旧的社会单位将从属于国家政治共同体。从奥干斯基的观点来看,“整合”是政治发展的第一步。他认为,整合过程包括四个方面——“中央对全部领域中的地域和人民建立政治统治;在面临种族冲突和分离主义时维持这种政治统治;实现某种程度的国家经济统一;增强国家观念以获得大多数公民的效忠”。<sup>③</sup>

从艾森斯塔德的观点来看,“在政治领域中,现代化会涉及到一些不同的方面。首先是根据特殊的政治角色和制度实现高度分化的政治结构的发展,政治体制的集中化及特定目标和取向的发展”。

“政治现代化的第二个特征是中央立法、行政和政治活动范围

① A-R. Desai《不发达社会现代化论文集》,1971,第461页。

② L. W. Pye《政治发展的方面》,1965,第8页。

③ A. Organski《政治发展的阶段》,1965,第8—9页。

的扩大,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地区”。<sup>①</sup>

随着自由、平等、基本权利的价值观附着于政治现代性之上,人民的平等权利受到保证,法治开始于各个领域形成。司法的调控手段基本上是以世俗的和事本主义的(impersonal)法律系统为基础的。立宪政体将统治功能看作是一种世俗的过程,但同时也用法律对其加以限制。科层制也是一种现代的政治现象。韦伯把“科层化”看作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

现代化的政治系统是高度复杂的,政治现代化会使官员做决定的数量、范围和效率成倍增加。为了完成被赋予的这些复杂的任务,政府机构将变得“高度分化的”和“功能专门化的”。因此,它必须以现代化的行政管理的发展为条件。

我们可以用威尔齐的话作为结论:“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有三个主要特征:

(1) 国家权力集中化程度的提高,同时伴之以传统的权威来源的弱化。

(2) 政治制度的分化与专门化。

(3) 公众在政治中的参与扩大,个人与作为整体的政治体系的联系加强。”<sup>②</sup>

因此,政治现代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概括如下:

1. 政治整合。
2. 国家整合。
3. 在政治整合过程中形成的价值整合和精英与大众的整合。
4. 封建主义的终结。
5. 民主化。
6. 在政治领域中采纳世俗价值观。
7. 政治角色和结构的分化与专门化。

<sup>①</sup> 见 Eisenstadt,《现代性:增长与差异》,第17—18页。

<sup>②</sup> C. E. Welch(编)《政治现代化》,1967,第7页。

8. 不同类型的组织与制度的发展。
9. 人类资源的理性分配。

## 二、政治发展

佩伊认为：“政治发展涉及的是政治文化、权威结构及一般政治过程之间的关系”。<sup>①</sup>这表明，政治系统有三个方面：结构、过程和文化。这三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对政治现代化起促进作用。

如果说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那么在所有这三个方面的民主化的程度也就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实际状况。

但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又是不同的。政治现代化是与民主化的程序相联系的。现代政治必然是民主政治，它包括与不同形式的整合和权威理性化相伴随的大众的政治化。

发展所涉及的则是，权威变得更为有效，从而使他们能创造出更多的政治和经济产品，以满足政治化的大众不断增长的需求。现代化国家的中央政治制度应当能创造出权威并能运用权威。成功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同时也就意味着政治发展。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两者并不一致。“对政治现代化有益的事物，也可能与政治发展并不一致。(政治现代化)有时会给政治体制加重负担，从而降低创造政治产品的效能或使其垮台。”<sup>②</sup>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大众会被动员起来，这就会提高参与决策过程的要求。权威被迫扩大自己的基础。但随着基础的扩大，权威的能力也必须提高，以便能成功地执行旨在提高人民福利的政策和计划。“政治发展的概念所涉及的是政治系统的能力……而能力则是与政府的工作状况以及影响工作状况的条件紧密相联系的。”<sup>③</sup>

---

① L. Pye《政治发展的概念》，收在 J. Finkle 等编《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1971，第50—51页。

② K. Schweinitz《增长、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世界政治》第22卷第4号，第530页。

③ L. Pye《政治发展的概念》，第50页。

政治意识的增长可以启动政治现代化,它会扩大政治参与并使人民的期望成倍增加。这就要求有有效的、有能力的政治权威,以满足这些要求,同时在处理这些要求时还要动员足够的支持自己的力量。“而对政治现代化的挑战则决不会超过由公众的政治参与扩大而带来的要求增加的挑战。”<sup>①</sup>

发展存在于要求和支持之间的良好的平衡之中。社会必须有能创新政策和吸纳不断增长的政治参与的政治制度。参与的需求会要求权力的分散。而为了政策创新,则要求权力的集中。

政治现代化涉及到政治系统的形式和结构,以及它的主要倾向、即政治文化、伴随着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复杂性、分化、民主化及这些形式和结构的相对自主性,都是政治现代化的特质。但这些分化的结构也可能由于缺乏能力而处于瘫痪状态。发展涉及的是工作状态问题。发展的衡量标准是一个政治系统通过有效的理性政策和决策为其人民带来的福利。现代化会给政治系统增加越来越多的压力和紧张,而政治发展则在于成功地处理这些压力和紧张状态。

现代化所涉及的是政治中的“谁”(who)和“怎样”(how)的问题,发展所涉及的则是政治中的“什么”(what)问题。换言之,发展存在于国家建立之中,而国家建立则是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国家建立无一例外地是与政治系统的调控和提取能力相联系的,而这就必然伴之以集中化的、有渗透力的科层制的发展。”<sup>②</sup>

政治稳定也是政治发展的指标,而现代化则往往意味着不稳定、暴力、暴动、政变和反政变,即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衰退”。<sup>③</sup>

亨廷顿曾提出将“制度化”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特征。因为社会动员的结果往往是在政治过程中不断形成社会压力和暴力,制

① C. E. Welch(编)《政治现代化》,第8页。

② G. Almond 和 G. Powell《比较政治学》,1972,第35—36页。

③ C. E. Welch(编)《政治现代化》,第195—205页。

度化就是处理和控制在这些压力和暴力的一种手段。平等的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性的主要指标之一。发展则在于政治制度的增长,以容纳不断增长的参与。因此,组织技巧是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必须有意识地建立有效的政治组织,以免受由现代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政治衰败及强力的损害……当整合并不完善、政治制度软弱的情况下,政治参与的急剧扩大和社会变迁……似乎会产生不稳定。”<sup>①</sup>

(孙立平 译)

---

<sup>①</sup> G. Almond 和 G. Powell《比较政治学》,1972,第35—36页。

S. 亨廷顿

## 政治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sup>\*</sup>

### 一、政治发展的概念

#### 概念的定义

在60年代,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坚持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坚持现代化是一种伟大历史过程的观点的政治学家们对人们所称的政治现代化或政治发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开始,他们所关注的是传统与现代性的概念,后来这种比较性的、静态的课题让位于动态的、发展取向的问题。这种转变很明显地见之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的比较政治委员会所从事的工作中,特别是阿尔蒙德的著作中,在50和60年代初期,阿尔蒙德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和学术领导人。

在使政治学家关心发展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的第一本书就是由阿尔蒙德和科尔曼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该书是在比较政治委员会和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资助下于1960年出版的。这部巨著的基本内容是描述和分析五个发展中地区的共同政治格局。这本书在学术上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来自阿尔蒙德所写的导

---

<sup>\*</sup> 选自 C. 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一书。纽约,1976年版。

言,其次是科尔曼所写的结论部分。这本书之所以在学术上有很大影响,是在于作者将抽象的政治体系的概念应用于研究非西方国家的政治。阿尔蒙德使用这个框架以将“发达的”政治体系与“不发达的”或“发展中”的政治体系区别开来。发达的政治体系是现代社会的特征,而不发达的政治体系则是传统社会的特征。阿尔蒙德所使用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或他更愿称之为“理性”的概念,都是按主流社会学分析中形成的帕森斯式的术语来加以界定的。但在这方面,阿尔蒙德独特的贡献是在于他认为所有的政治体系在文化上都是混合型的,都是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所有的政治体系——无论是发达的西方社会的政治体系还是不发达的非西方社会的政治体系——都是一种过渡型的体系。”他对一些社会学理论家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批评,因为他们促成了一种不恰当的两极对立的理论,而没有认识到政治体系的“双重”性质。<sup>①</sup>

《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是一部比较政治的著作,而不是一部有关政治发展的著作。这本书提出了分析比较政治的行为研究法和体系研究法;但它并没有提出一种政治发展的概念或理论。人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本书中,就没有“政治发展”这个词。这部著作所关心的是对发展中(或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的政治体系的分析,并将这些体系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体系进行比较。其关键性的范畴是体系、角色、文化、结构、功能及社会化。除了社会化过程之外,这些范畴没有一个是指动态过程。对于政治体系的比较分析来说,这些范畴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些范畴并不是以政治体系中的变化和发展为取向的。阿尔蒙德指出了一些任何政治体系都必须履行的功能,然后依据承担这些功能的结构对这些体系加以比较。他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政治功能与政治结构分离开来。”阿尔蒙德还认为,“如果我们要准确地了解差异和政治变迁的过程,我

<sup>①</sup> 阿尔蒙德(G. Almond)《导言:研究比较政治的功能方法》,见阿尔蒙德与科尔曼(S. Coleman)主编《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普林斯顿,1960,第23—24页。

们所需要的是二元模式而不是一元模式,是发展模式而不是均衡模式。”<sup>①</sup>在这本书中,阿尔蒙德及其助手们指出了有关政治体系二元模式中的一些因素,但却没有指出一种有助于理解“政治变迁过程”的“发展模式”。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阿尔蒙德与鲍威尔合著了另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与上一本书不同,这本书所关注的是政治的动态过程,并明确地将政治发展作为主题和基本概念。阿尔蒙德认为,他前一部著作在政治变迁的问题上是有局限性的。他说,原来提出的框架“主要是适用于分析某一特定时刻的不同的政治体系。它无法使我们去探讨发展模式,去解释政治体系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变迁的。”<sup>②</sup>在原来提出的那些政治功能(现在被称之为“转换”功能)之外,又补充了一些范畴,如在政治体系的“输出”方面起作用的需求与供给,以及政治体系对其环境的“输出”能力(如抽取、调控、分配、象征及反应)。

阿尔蒙德和鲍威尔认为,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对其社会和国际环境中发生的变迁所做的反应,特别是对国家建立、民族形成、参与和分配的挑战所做的反应。他们基本上是从政治现代化的意义上来看待政治发展的。他们提出了政治发展的三个标准:结构分化、子系统的独立性及文化的世俗化。在这里,阿尔蒙德面对着许多其他政治学家在当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什么是政治发展?

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答案的数量远多于提供答案的人的数量。几乎每一个关心发展中地区政治的学者或学术团体都至少提供了一种答案。将所提出的内容一一列举出来是一件劳而无功的事情。幸亏在1965年时佩伊将人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含义所提供的十个答案汇总起来:

---

① 阿尔蒙德(G. Almond)《导言:研究比较政治的功能方法》,见阿尔蒙德与科尔曼(S. Coleman)主编《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普林斯顿,1960,第25页。

② 阿尔蒙德和鲍威尔(G. Powell, Jr)《比较政治学:发展研究法》,波士顿,1966,第13页。

1. 经济发展的政治先决条件；
2. 工业社会中典型的政治；
3. 政治现代化；
4. 民族国家的运作；
5. 行政与法制的发展；
6. 大众动员与参与；
7. 稳定与有秩序的变革；
8. 民主制的建立；
9. 动员与权力；
10. 多向度的社会变迁中的一个方面。

在其所进行的一次著名的综合中,佩伊将政治发展中那些最具共同性的问题概括为下述趋势:政治体系中个人间的平等不断增强,政治体系应对环境的能力不断提高,政治体系中的制度与结构日益分化。佩伊认为,这三个方面可以见之于“发展的核心过程之中”。<sup>①</sup>也有人按同样的思路,将政治发展按如下四个经常出现的概念进行界定,这四个概念是:理性化、国家整合、民主化、动员或参与。<sup>②</sup>

用蒙哥马利的话来说,“对政治发展的探求”<sup>③</sup>使政治学家必须努力设法解决三个一般性的问题。首先,就是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是怎样的?有人认为,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基本上是一致的。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综合体中的一个因素。在什么样类型的变迁才构成政治发展的问题上,政治学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但无论人们选择的是哪些方面,几乎无例外地都将其看作是更抽象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亨

---

① 佩伊(L. Pye)《政治发展的方面》,波士顿,1966,第31—48页。

② 亨廷顿(S. Huntington)《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世界政治》第17卷(1965年4月),第387—388页。

③ 蒙哥马利(J. Montgomery)《对政治发展的探求》,《比较政治学》第1卷(1969年1月),第285—295页。

廷顿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应该将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区别开来。他说,将两者看作是一回事的看法使政治发展这个概念的使用“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应将政治发展限定在特定的历史进化阶段,因此,就不能讲希腊城邦国家或罗马帝国的“政治发展”。此外,如果将政治发展等同于政治现代化,也会使政治发展成为一个意义含混的概念,并将降低对其进行经验研究的可能性,即使这种意义上的逆转现象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也很难讲什么是政治衰败。<sup>①</sup>

政治学家在界定这个概念时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政治发展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还是一个复合概念。由于人们对构成政治发展的内容有许多看法,目前人们倾向于将其看作是一个复合概念。佩伊用下面的看法对这种倾向进行了说明,他认为“政治的多重功能的特征使得人们无法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政治发展的程度。”<sup>②</sup>因此,大部分学者都用几个方面(来表示政治发展):正如上面已经见到的,佩伊是三个方面,阿尔蒙德也是三个方面,华德和拉斯托是八个方面,艾默森是五个方面;艾森斯塔德是四个方面。<sup>③</sup>所有这些看法都是具有道理的,因为很明显,政治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同样明显的是,这种看法会带来一些研究上的困难。政治发展的不同构成因素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尽管佩伊认为,构成发展综合体的是平等、能力和分化三个因素,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因素并不是“很容易结合在一起的”。相反,“从历史上来看,对平等的要求、对能力的要求以及更高分化的三者之间往往存在一种非

① 亨廷顿《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第389—393页。

② 佩伊《导言》,见佩伊编《沟通与政治发展》,普林斯顿,1963,第16页。

③ 佩伊《政治发展的方面》第45—48页;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比较政治学》第299页以下;拉斯托和华德《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第6—7页;艾默森(R. Emerson)《政治现代化:一党制》,丹佛,1963,第7—8页;艾森斯塔德(S. Eisenstadt)《科层制与政治发展》,见拉巴龙巴拉(J. LaPaLombara)编《科层制与政治发展》,普林斯顿,1963,第99页。

常紧张的关系”。阿尔蒙德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存在着一种角色分化、子系统的独立性和世俗化三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的趋势”,但在这三个因素中,每两个因素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sup>①</sup>阿尔蒙德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二维的矩阵,以分化和世俗化为一轴,以子系统的独立性为另一轴。他在这个矩阵中的九个格子里发现了一些不同的政治体系的类型。但问题就提出来了:如果政治发展包括这一切,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另一方面,如果将政治发展定义为单一的概念,又有两种倾向,一是将其界定为很有限的内容——比如亨廷顿严格地将政治发展等同于制度化——这样也就使这个概念本来就包含的丰富的内涵消失掉了,另一种是在很抽象的意义上对其进行界定,正如戴蒙德所做的那样,结果就成了为复合概念加上一个单一概念的标签。<sup>②</sup>

探讨这种定义涉及的第三个问题是,政治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目的论的概念。如果它主要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的话,无论它是指一种单一性的过程,还是指一种复合性的过程,都应依据其内在的特征将其定义为一种过程。相反,如果它主要是一个目的论的概念,就应将其看作是一种达至某种特定目标的运动。这样就应按其方向而不是按其内容来加以界定。正如像较抽象意义上的现代化一样,政治发展的目标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按目标对政治发展加以界定的时候,如果能形成清楚的标准和精确的指标(如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那样的政治指标),就不会造成像上面讨论过的那些困难,就可以衡量达到目标的程度。但是,由于缺少这样的标准和指标,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由于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和他们所研究的政治行动者都

---

① 佩伊《政治发展的方面》,第47页;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比较政治学》,第306页;对这个问题所做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分析,见里格斯(F. Riggs)《发展冲突的辩证法》,《比较政治研究》第1卷(1968年7月),第197页以下。

② 戴蒙德(A. Diamant)《政治发展的性质》,收在芬克尔和伽比勒编《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一书,纽约,1966,第92页。

想实现政治发展,人们往往将正在发生的一切等同于政治发展。结果就是“在‘发展中’国家里所发生的一切——政变、种族斗争和革命战争——都成为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但所有这一切至少在表面上来说是互相矛盾,有的实际上是一种倒退”。<sup>①</sup>

这些有关定义的问题影响到政治发展这个概念的有用性。拉斯托认为,佩伊所罗列的10种定义“很明显至少有9种是多余的”。<sup>②</sup>实际上,人们可以更往前走一步。如果存在10种关于政治发展的定义的话,也许这10种都是多余的,因为这个概念多半是表面化的、不能起什么作用的。在社会科学中,如果一个概念能起到聚合作用,也就是说能成为一种可以涵盖若干在某些方面具有共性的子概念的伞,这个概念就是有用处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化概念就是这样的一把伞。如果一个概念可以起分辨的作用,这个概念也是有用处的,也就是说,它有助于将两种或两种以上别人认为没有什么差别的因素分离开来。在这种意义上,显功能和潜功能就是一对起分辨作用的概念。

较为抽象的政治发展的概念在上述两个方面的有用性都是很模糊的。从前面所讨论过的阿尔蒙德和佩伊的观点来看,政治发展的概念包含着多种不同的过程,就这种意义而言,这个概念好像也是一把伞,但问题是,这些不同的过程除被加上一个共同的标签之外往往很少有什么共同之处。勒纳将许多不同的过程都列在现代化的名目之下,他说,这些过程之所以是同时发生的,是因为“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这些过程不可能不同时发生”,相比之下,却没有人在勒纳所说的那种意义上将各种不同的过程列入到政治发展的名目之下。相反,事情很清楚,包含在政治发展这个复合概念下的各种因素往往并不是同时发生的,相反,往往是不同时发生的。此

<sup>①</sup> 亨廷顿《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第390页。

<sup>②</sup> 拉斯托《作为政治学研究课题的变迁》(向1969年在托里诺召开的国际政治学学会圆桌会议提交的论文),第1—2页。

外,如果像阿尔蒙德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发展涉及分化、子系统的独立性和世俗化的话,那么,就像阿尔蒙德在他的结论部分中所问到的那样,是否存在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有趣而又重要的问题?使用政治发展这个术语将会导致人们的一种误解,即认为这些不同的过程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和谐的,并会使所讨论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相反,如果将政治发展看作是一种单一的、独特的过程,如政治的制度化,这个概念就更是多余的了。本来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名称为什么还要加上第二个名称?简言之,无论是作为一种聚合概念,还是作为一种分辨概念,政治发展这个概念都是多余的。

实际上,对于政治学家来说,政治发展这个概念既不起聚合的作用也不起分辨的作用,但这个概念仍是有用的。它等于向政治学家们说:“嘿,我认为这里有一些有意义的、人们想得到的目标,而且它们也是进行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似乎就是有关政治发展意义的争论所起的主要作用。在下面情况下,这个概念的上述用途似乎更显而易见,一是有关民主化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的争论,二是在讨论“苏联在政治上是否是发达的”这类问题时政治学家所表现出的迷惑。实际上,与其说政治发展的概念是一种进行分析的工具,倒不如说是一种学术偏好的标志。<sup>①</sup>

政治发展概念在政治学家中的广泛流行也许是起源于这样的一种看法,即在政治上应该有一个与经济发展对等的概念。从这方面来看,政治学家发现他们在方法论上处于一种介乎两个相邻学科之间的一种模糊不清的位置上。从研究对象的范围来看,政治学

---

<sup>①</sup> 也许有人会说,在玻璃房子中的人不应该向地面上扔石头,因为在1965年我的那篇《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的文章中,我曾认为应把政治发展定义为政治制度化。我的回答是:确实如此。但一旦我自己已离开那座玻璃房,如果扔石头可以起到有益的作用,或者鼓励别人离开玻璃房,我想没什么不可以的。在我1968年《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那本书中——该书并不是完全以1965年的文章为基础的——我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的至关重要的关系上,但我也没有对人们所称的“政治发展”进行责难。

比社会学窄但却比经济学宽。从学科内部对研究目标的共识来看,政治学共享的价值多于社会学而少于经济学。社会学在研究对象的范围上是综合性的;经济学专注于自己的目标;政治学家则两者都缺乏。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广泛性,社会学理论中的折中主义和扩散性得到了人们的谅解。而由于经济学理论的精确性和构造的精巧,其范围的狭窄和内容的狭隘也得到了人们的宽容。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学家向社会学家采借概念或模仿经济学的概念就是很自然的了。社会学的现代化的概念扩及并应用于政治分析。按经济发展的形象创造了政治发展的概念。从所选择的模式来看,人们一般认为,这个学科通常会复制相邻学科中那些更具有结构性或“科学性”的模式。但这会带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很类似于“误置的有形性”(misplaced concreteness)一词所包含的问题。可以认为,经济学家在什么是经济发展以及如何对经济发展进行量度的问题上也是存在不同的意见的。但相对于政治学家在政治发展这个概念上碰到的困难而言,经济学家中的分歧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政治学家是以社会学家为模式,像讨论社会变迁那样来讨论政治变迁,而不是像讨论经济发展那样来讨论政治发展,他们也许就会避免许多定义上的和目的论的问题。

### 研究政治发展的方法

从严格的意义来说,许多号称的对政治发展的研究实际上并不是对政治发展的研究。并不是对处在任何发展阶段的社会政治所做的研究都是政治发展研究。否则,就没有任何政治研究不是对政治发展的研究了,因为即使人们认为是较发达的政治,也仍是处在发展的过程中。然而人们也常见到这样的情况,即将所有对不发达社会的政治所做的研究都被看作是政治发展研究。比如说,突尼斯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因此它的政体是一种发展中的政体;因此对突尼斯政治的研究就是政治发展研究。这种看法的荒谬之处是在于只看研究的对象而不管研究所使用的概念。比如,对肯尼迪总统的

研究既可以被看作是权力研究、职位的制度化研究,立法与行政关系的研究,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建立共识的研究、领袖心理学的研究及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作用的研究,这要取决于研究时所使用的概念以及所提出的问题。当然这种研究也可能是对政治发展或政治变迁的研究。同样,对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的研究也存在上述各种可能性。但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对后者的研究要对比对前者的研究更应属于“发展”研究。对发展中社会中军人的作用、科层制和政党的研究也同样如此。这些研究大多数只是对特定类型社会中的制度的研究而不是对变迁或发展的研究。对这些对象既可以做政治发展研究,也可以做文职人员与军人关系、组织行为、政治行为的研究,关键是取决于所使用的概念框架。发展研究之所以成为发展研究,在于所使用的范畴是从变迁的角度形成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变迁是广泛存在的,实际上是存在于整个政治之中,因此不能将其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但我们也可以反驳说,确实政治本身是在变化着的,但政治还包括思想、价值、制度、群体、权力结构、冲突、沟通、影响、互动、法律和组织等内容。可以按其中的每一个概念对政治进行研究,而实际上也确是如此。从每一个概念中都可以得到对研究对象的不同的认识,可以涵盖不同的领域,做出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不同的结论。那么,为什么不可以从变迁或发展的角度来对政治进行研究呢?

实际上,在50和60年代,各种各样的学者都在进行这样的研究。他们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各不相同的。如果不苛求涵盖面和系统性的话,我们可以只考察其中的三种方法:体系功能、社会过程和历史比较。

### 体系功能方法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在研究政治发展的时候,系统论与结构功能理论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如果不使用政治体系的概念,就不可能使用功能方法。包含这种抽象概念的那些理论是

与下述名字相联系的：帕森斯、列维、伊斯顿、阿尔蒙德、阿普特、班德和里格斯。这些学者的主要贡献就是形成了一套以“体系”和“功能”为核心的概念和范围，以对不同类型的政治体系进行分析和比较。这些关键性的概念包括：结构、合法性、输入与输出、反馈、环境和均衡。这些概念以及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理论为分析政治体系提供了一个全面性的模式，并为根据履行任何政治体系都要履行的功能的结构来划分不同的政治体系奠定了一个基础。

体系功能方法的明显优势在于这些概念的抽象性，这使得分析可以在广泛的范围中展开。将这种方法用于研究政治变迁带来的缺点之一也就在于它的这个优点本身。这种框架本身不一定是、也不一定就会形成可以进行检验的假设或人们通常所称的“中等层次的概化”，但无论这种概念框架能不能进一步具体化，其提出的问题都是开放性的。这种方法基本上不能促使学者们去进一步发掘经验材料。实际上往往会导致一种与此相反的倾向。理论本身成为了目的。很明显，不但在像列维的那两卷本的抽象性的著作中事实材料很少，甚至在应用体系功能方法对特定社会所做的个案研究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如班德对伊朗的研究。<sup>①</sup>

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是，这种方法本身注定了它不可能将注意力集中于变迁问题。将“体系”的概念用于动态过程、研究滞后、超前和反馈等问题是可能的。但在实际上，许多使用体系功能方法形成的政治发展理论所涉及的主要并不是动态因素。重点是详尽阐述不同政治体系的模式、不同体系中变迁的不同类型。比如，列维在《现代化与社会结构》这部两卷本的大部中，其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书名中的两个因素中的第二个因素上。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是用来讨论抽象的社会的特征，然后才是对“较现代化的社会”与“较不现代化的社会”进行区分。在长达800页的著作中，只有第一

---

<sup>①</sup> 见列维《现代化与社会结构》，班德(L. Binder)《伊朗：一个变化着的社会中的政治发展》，伯克利和洛杉矶，1962。

章和最后一章用来讨论现代化及所伴随的政治上的变化。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阿尔蒙德也多少看到了他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中所使用的框架的局限性。但他和鲍威尔在《比较政治:发展研究方法》中所提出的更详细、更具有变迁取向的框架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在直接关注政治发展的使用体系功能方法的著作中,也许阿普特的《现代化的政治学》是最成功的,他为动态过程提出了变迁的速度、形式和源泉等范畴。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对规范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独有的关心,而这与他所使用的体系功能框架并没有什么关系。正如西尔弗特所指出的、结构功能的方法从一开始就由两种社会科学家使用,一种是对研究原始社会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一种是对研究复杂社会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帕森斯)。这种方法限制了人们对正在经历根本性变迁的社会的理解。可以肯定地说,正当政治学家使用这个方法研究政治变迁的时候,在社会学中,这种方法则由于不能有效地研究变迁问题而受到批评。

正如许多人指出过的,在这种学术背景中研究变迁问题所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均衡”这个概念是与体系功能方法相联系的。均衡这个概念假定任何体系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在功能上互相联系的因素构成的。其中一个因素中的变化会导致另一个因素中的变化。正如伊斯顿所指出的,这个概念与多重因果关系和多元论思想有密切联系。此外,它也意味着体系内的各种因素会倾向于维持“一种特定的互动模式”。<sup>①</sup>这种理论将纯粹的均衡看作是一种静止状态。而在其余的情况下,这种理论假定存在一种最初的条件或理论上的均衡条件不断恢复的趋势。

作为一种探讨政治变迁的框架,均衡理论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指出的,这种理论“并不致力于研究变迁的内

---

<sup>①</sup> 伊斯顿(D. Easton)《社会体系》,纽约,1953,第266—267页及272页以下;拉斯韦尔(H. Lasswell)和卡普兰(A. Kaplan)《权力与社会》,纽黑文,1950,第XIV页。

在原因,也不预测具有一贯性方向的变迁(所关心的只是,在平衡被打破时这种平衡的恢复过程),它实际上也不研究对形成目前的状态有很大影响的过去的变迁”。<sup>①</sup>实际上,变迁被看作是一种由外在原因引起的反常状态,是紧张或张力造成的结果,变迁会形成一种修补性的活动,以降低紧张或张力,恢复原来的状态。变迁是一种“非自然的状态”,而稳定或静止才是“自然状态”。也有些思想家想通过动态均衡这个概念来对均衡和变迁加以协调。但这个概念本身并不足以对变迁进行解释。如果均衡还保持原来的含义,只是作为整体是处在动态过程中,这个概念就无法解释其运动的原因和方向。如果均衡本身是变化着的,那么动态均衡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多重的均衡,这样,这种理论就必须用其中的一个因素的均衡来说明另一个因素的均衡的实现。

### 社会过程方法

研究政治发展的社会过程方法并不是由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的概念派生出来的,它所关注的是社会过程——比如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识字率提高的过程以及职业流动过程等——这些过程都被看作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并会对政治变迁产生影响。与体系功能方法相比,这种方法更侧重于行为和经验研究,这种方法往往会 导致关于与政治变迁有关系的社会过程的资料的不断积累,这些材料往往都是定量的(有的是普查的资料,有的是不同地区的材料的综合)。使用体系功能研究方法的学者关注的是功能,而使用社会过程方法的学者关注的则是相关的过程。他们努力超越相关分析,而尽量去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在进行这种分析时所使用的技术包括因果分析和路径分析等各种分析方法。

在50和60年代,使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政治发展及其有关问题

---

<sup>①</sup> 摩尔(W. Moore)《社会变迁及其比较研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15卷(1963),第524—525页。

的学者主要包括：勒纳、多伊奇、坦特、阿尔克、库特里特和哈德森。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和多伊奇的《社会动员与政治发展》<sup>①</sup>一文这两篇早期的文献对后来这方面的研究起了促进的作用。使用体系方法的学者首先是形成政治体系的概念，然后是区分政治体系的不同类型或模式，最后是说明这些差异的结果和意义。这种研究方法关注的是将行动的模式与作为整体的体系联系起来，而使用社会过程方法的学者所关注的则是将某种行动模式与另一种行动模式联系起来。

社会过程方法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它努力探讨不同变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同变项中的变迁的关系。就这方面而言，它直接关注的就是变迁。这种方法在研究变迁问题上存在的局限性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这种方法所研究的变项大半是集中在发展的水平上而不是发展的速度上。由于要进行经验研究，所研究的变数只能是那些可获得资料的变项。收集同一时刻（即现在）不同社会中识字率水平的资料要比收集一个社会中不同时间里识字率水平变化的资料容易得多。但对于一种纵向的分析来说，必然需要后一种资料，即识字率的变化速度。在研究某些类型的关系时，跨领域的分析是必要的，但这种分析往往达不到研究另一些关系时所进行的纵向分析的水平。在亚非拉的大部分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收集有关某些变项的不同时期的资料是很困难的，这使得许多使用社会过程方法的学者回过头来研究西欧和北美社会。很明显，有关发达社会政治变迁或政治发展的知识要比有关发展中社会政治变迁或政治发展的知识更为发达。与之相联系的问题是，社会过程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用于民族国家的比较研究，因为这样的单位如此之大，以致在很多方面很难用这种方法得到概括的比较性的结论。

---

<sup>①</sup> 多伊奇(K. Daetsch)《社会动员与政治发展》，《美国政治学评论》，第55卷(1961年2月)，第493—514页。有关将阿尔蒙德、亨廷顿和比较政治委员会的政治发展理论与可利用的定量资料联系起来的努力，见霍普金斯(R. Hopkins)《集合资料与政治发展研究》，《政治学杂志》，第31卷(1969年2月)；第71—79页。

社会过程方法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和人口这些自变项与政治这个依变项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一个抽象的方法论问题,即在方法论上如何看待经济或社会变迁(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变迁也是“客观的”)与政治变迁的关系,而后者往往是人类进行的有意识的努力和人类的意态的结果。比如,要解释选举中的投票行为或政变的频率,那么经济增长速度、物价变动和识字率对这些现象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宏观的”社会经济变迁与“宏观的”政治变迁的关系,只有通过个人态度、价值和行为这些“微观的”变迁才能得到解释。但在大部分社会过程分析中,解释这些微观现象的因果链都是很脆弱的。到目前为止,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像“相对剥夺”和“挫折—攻击”这样的假设以将经济社会变迁与政治不稳定联系起来。<sup>①</sup>最后,在因果链中的依变数一边,社会过程分析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这主要表现在政治变项的定义、确定衡量这些变项的指标以及收集有关这些指标的资料等方面。

对社会过程方法提出的另一个普遍性批评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似乎政治变迁是依赖于经济与社会力量。如果人们只单纯地使社会过程方法——实际上人们很少这样做,那么社会结构就没有什么位置了,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和政治领导等因素也必然受到忽视。因此,社会过程方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必须克服这个与生俱来的弱点,找到评估文化、制度和领导等因素所发挥的独立的作用。

### 历史比较方法

与刚刚讨论过的两种方法相比,研究政治发展的第三种方法

---

<sup>①</sup> 戴维斯(J. Davies)《通向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7卷(1962年2月),第5页以下;I. 费尔拉班和 R. 费尔拉班(Feierabend)《政治中的攻击性行为:1948—1962》,《冲突解决杂志》,第10卷(1966年9月),第253—254页;古尔(T. Gurr)《人们为什么造反》,普林斯顿,1970。

内部有着较大的差异,而且更具有折中的特点。使用这些方法的学者虽然有某些共同之处,但他们并不是紧紧抱成一团儿的。这种方法既不是从理论模式着手,也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或更多变项之间的关系上,相反,它是要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的进化过程。如果说对使用体系功能方法的人来说核心是“体系”,对使用社会过程方法的学者来说核心是“过程”,那么,对使用历史比较方法的人来说,核心则是“社会”。但是,他们的兴趣并不是在于某一个社会的历史,而是在于对两个或更多社会的比较研究。如果说使用体系功能方法的学者是要形成概念,使用社会过程方法的学者是要建立相关,那么很自然,使用历史比较方法的人则是要进行比较。在社会科学家当中,属于研究政治发展的这个学派的人是:布赖克、艾森斯塔德、拉斯托、利普赛、摩尔、本迪克斯,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佩伊和社会科学委员会中的比较政治委员会的成员。

这些人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经验研究,但定量的程度并没有如此之高。实际上他们所关心的恰恰是社会过程研究法所难以分析的那些因素:制度、文化和领导。这种研究法对政治发展模式分类的标准一是所有社会都将经历的阶段,二是不同社会所走的独特道路,三是某些“纵向”范畴和“横向”范畴的结合物。比如,摩尔就将现代化的模式分为三种类型,即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英国和美国)、贵族寡头领导的(德国和日本)和由农民促成的(俄国、中国)。虽然他也承认可能存在第三条道路(印度?),但他很怀疑这条道路能否走得通。这样,每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要想获得现代性就必须在自由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主义以及革命的共产主义这三条道路中选择一条。相反,布赖克从一开始就指出了所有社会都要经历现代化的四个阶段:现代性最初的挑战;现代化领导的强固;从乡村农业社会到城市工业社会的经济与社会改造;以及社会整合,即基本社会结构的重组。然后他按照五个标准来确定所研究的那些社会处在哪个阶段,并以这些标准为基础将当今的社会划分为“7种政治现代化的模式”。最后他将这些纵向的范畴

与横向的范畴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历史比较框架,而且他为他的这本书起了一个很恰当的副题:“历史比较研究”。<sup>①</sup>

多少有些不同的,是拉斯托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比较政治委员会所做的努力,他们力图指明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所面对的问题的类型,并依据其解决这些问题的顺序来对这些社会的进化进行比较。拉斯托认为,政治现代化会提出三个关键性的要求:“民族的基本要求是认同,国家的基本要求是权威,现代性的基本要求是平等;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不同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就在于他们是被要求同时解决这些问题,还是按一定顺序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解决这些问题的顺序应当是怎样的。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拉斯托提出,认同—权威—平等的顺序将会导致一种成功的、代价最小的现代化。社会科学委员会的比较政治委员会按类似的想法进行了同样的工作,他们指出在所有社会进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必须解决5个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危机、参与危机和分配危机。这两种理论及阿尔蒙德的理论中所涉及的对应因素如下:

阿尔蒙德——挑战	拉斯托——要求	比较政治委员会——危机
民族形成	认同	认同
国家形成	权威	合法性
		渗透
参与	平等	参与
分配		分配

令人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委员会的比较政治委员会最初时曾提出第6个危机,即整合危机,它涉及到“将民众政治与政府的运作联系起来的问题”。<sup>②</sup>但这个概念是很含糊、很不容易把握的;最

<sup>①</sup> 摩尔(B. Moore, Jr)《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波士顿,1966;布赖克(C. Black)《现代化的动力学:历史比较研究》,纽约,1966。

<sup>②</sup> 佩伊《政治发展的方面》,第62—67页。

终将其从框架中去掉了。

历史比较研究法的最大优点是,它从一开始就将着眼点放在社会的实际进化过程上,将其进化划分为不同的模式,然后形成有关影响模式差异的因素的假设。简而言之,它是从历史的“实际”材料着手,在方法论上它正好处于与体系功能研究法相对立的一端,后者使用的是抽象的体系模式。与社会过程研究法不同,它并不认为可以将像城市化和不稳定这样的过程挑出来,然后对其背景形成概括性的结论。因此,这种研究法明显缺少概括性。实际上,它不得不回过头来,将注意力集中在现代化中那些在历史上互不联系的现象上,而且它所研究的往往是特定社会的特定阶段。与大部分“发展”分析一样,它所使用的概念,与均衡分析相比,概括性的程度是较低的。<sup>①</sup>使用体系功能研究法的人所用的是复合型的概念,使用社会过程研究法的人的分析带有很强的定量化的特征,与之相比,使用历史比较研究法的人看起来是很平凡、很传统的,他们的成果也缺乏理论和科学上的精确性。但是,与上两个方面的人不同,他们一般很容易与那些不喜欢术语和数字的读者沟通。

很明显,这三种研究法都对政治发展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同时,其优点中也包含着缺点。从政治变迁的理論的角度来看,体系功能研究法弱在变迁,社会过程研究法弱在政治,比较历史研究法则弱在理论。如果以这三种研究法为基础,并将三者的长处结合起来,就可以克服其各自的弱点。

## 二、政治变迁理论

对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研究促使人们去关注建立更抽象的社会变迁理论。在60年代后期,对政治变迁的分析已经成为政治学著作的直接关注点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对社会经济文化的

<sup>①</sup> 拉斯韦尔和卡普兰《权力与社会》,第 XV 页。

现代化过程的关心,也脱离了成为许多研究政治发展的著作的基础的目的论。在10年的时间里,政治学家的工作从抽象的政治体系转向对传统和现代政治体系的比较分析,再到具体关注于现代化的独立的历史过程,又转向详细阐述与政治发展有关的概念,然后转向抽象层次较高的有关政治变迁的一般理论。简而言之,是从静态理论过渡到动态理论,这种转变是经过对现代化的历史现象的研究实现的。

新的社会变迁理论在如下几个方面不同于以前的那些研究法。第一,其理论框架可用于研究处于任何发展水平上的社会中的政治变迁。第二,这些框架与现代化过程是不相联系的,至少不是直接相联系的。第三,这些理论中的核心变项和关系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第四,这些框架都是弹性的,可以涵盖政治体系内部和国际环境中所发生的变迁的原因和模式。第五,一般地说,这种理论要比以前的有关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理论更为复杂:它涵盖的变项更多,考察的是这些变数间的更为广泛的关系。

其中的一个过渡性的研究法是由亨廷顿在其1968年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来的。在那本书中,他认为政治变迁的焦点问题就是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关系。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政治体系的稳定性。政治参与扩大的基本原因就是被称之为现代化的那些非政治性的社会经济过程。现代化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是通过社会动员与经济发展、社会挫折与非政治性的流动机会以及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关系实现的。亨廷顿用下面的一套公式来表达这些关系:

1.  $\frac{\text{社会动员}}{\text{经济发展}} = \text{社会挫折}$
2.  $\frac{\text{社会挫折}}{\text{流动机会}} = \text{政治参与}$
3.  $\frac{\text{政治参与}}{\text{政治制度化}} = \text{政治不稳定}$

其着眼点与社会过程研究法是一样的,即现代化,也就是经济社会变迁(城市化、工业化)与政治参与、政治不稳定及暴力之间的关系,这样,这种研究法就将社会结构因素(流动机会)与政治结构因素(政治制度化)引入分析之中。

亨廷顿所关心的是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前者最终的原因是存在于现代化过程之中。那么,后者的原因是什么?他在那本书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但他暗示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有些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制度化程度要比其他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更高一些(也就是说,更具有适应性,更复杂,更具有凝聚性和自主性);这会更有利于进行现代化,更有利于适应广泛的参与模式。此外,亨廷顿也认为,某些类型的政治领导(贵族寡头的、军事的、革命性的)和冲突也会导致制度化。

但明显,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是源自于对现代化的关注。但是,现代化虽说是造成参与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却不是唯一的原因。因此,在处于任何发展水平的社会中,都存在参与与制度化的平衡的问题。对于60年代美国发生的黑人和学生的动乱,都可以用这个框架来进行分析。在中心城市和大学中,现存的结构受到了挑战,那些群体要求提供新的渠道以使他们能够“参与会对他们造成影响的决策”。

这种理论研究法最初只是集中在两个政治变项之间的关系上,但可以将其扩大以将更多不同的变项包括进来。大部分政治发展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对变迁方向的关注要强于对变迁的实体的关注。当然,这是与政治发展的起源有关的,它从一开始就是研究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但正如米切尔所指出的,政治变迁分析的第一步是很简单的,就是辨认出“容易发生变迁的实体(object)”<sup>①</sup>也就是将政治体系的某些组成部分辨认出来,然后确定它们之中所发生的变迁的关系。因此这种研究法所关注的是“组

<sup>①</sup> 米切尔(W. Mitchell)《美国政体》,纽约,1962,第369—370页。

成部分的变迁”。

可以将政治体系看作是组成部分的聚合,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在不断发生变迁,有的速度快些,有的速度慢些。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一个部分中哪些类型的变迁会导致其他部分的变迁,哪些变迁不会导致其他部分的变迁?不同部分的变迁结合在一起对作为整体的体系会有什么影响?可以说,对政治变迁的研究涉及到(1)将注意力集中于政治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2)确定这些部分中变迁的速度、范围和方向;(3)分析不同部分中变迁的关系。可以按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政治体系加以界定,而这个体系是由不同的部分构成的,比如,下面的5个因素即是其中的一些组成部分:

1. 文化,即与政治有关且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态度、取向、神话和信仰;
2. 结构,即做出社会中的权威性决定的组织,如政党、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科层系统;
3. 群体,即社会经济组合,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并对政治制度提出要求;
4. 领导,即政治机构或群体中可以对价值的配量发挥比其他人大影响的个人;
5. 政策,即有意识制订的、旨在影响社会中的利益和处罚的分配的政府活动模式。

对政治变迁的研究如果能从这五个组成部分及这些部分中的变化间的关系入手,就可能会获得富有意义的成果。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变迁是如何与结构中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进入政治舞台的新群体的动员与制度的进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领导人的变换是如何与政策的变迁相联系的?一开始所做的假设就是,无论在任何政治体系中,这五个组成部分都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但在一个政治体系的内部或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之间,组成部分中变迁的速度、范围和方向会有很大不同。在有些情况下,某个部分变化的速度可能会接近于零。没有变化是一种例外的变迁速度,这种

速度在实践中是很少见到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本身都由多种因素集合而成。比如,政治文化可能包括许多子文化;政治结构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制度和程序。对政治变迁既可以依据不同部分的变迁进行分析,也可以依据某一个部分中不同因素的变迁进行分析。

部分和因素都是变迁的实体。但仍需搞清楚的是,对政治变迁研究有重要意义的是哪些类型的变迁。很明显,组成部分或因素中权力的变迁是一种明显有关的变迁。实际上有些人认为,权力变迁是政治分析中唯一应当关注的变迁。但是如果独立地关注于权力,实际上也就是想在政治之外寻找权力的意义。政治分析所关注的是意识形态的权力、制度的权力、群体的权力、领袖的权力和政策的权力。而且它也关心这些组成部分的内容以及内容中变化与权力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各个组成部分中的“权力”对政治分析的意义都差不多<sup>①</sup>。而每个部分的“内容”都多少有些不同。政治文化实质上是指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价值、态度和期望。而社会中的政治制度的内容则由人们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与之相联的利益和价值构成。政治群体的内容是指他们的利益、目标及对政治体系所提出的要求。领导的内容是指领导人在社会、经济和心理上的特征以及他们要达到的目标。当然,政策的内容涉及到政策的实质,即有关利益与惩罚的规定。

对于政治变迁的分析可以先从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或组成部分中的因素里面的权力发生的简单的变迁入手。但更重要的则是组成部分或因素中权力的变迁与内容的变迁之间的关系。如果政

---

<sup>①</sup> 当代社会科学家对权力分析所做的重要贡献包括:拉斯韦尔和卡普兰《权力与社会》,第74页以下;西蒙(H. Simon)《政治权力观察与量度简论》,《政治杂志》第15卷(1953年11月),第500—516页;马奇(J. March)《影响力理论与量度导论》,《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44卷(1955年6月),第431—451页;达尔(R. Dahl)《权力的概念》,《行为科学》第2卷(1957年7月),第201—215页;弗里德里希(C. Friedrich)《人与政府》,纽约,1963,第159—179页;帕森斯(T. Parsons)《论影响力的概念》,《公共舆论季刊》,第26卷(1963年春季号)。

治分析只限于权力的变迁,那就无法把握这种变迁的原因和结果。政治中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权力和内容之间的互相置换。那么,政治意识形态中权力的变化(可按支持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数及支持的强度来衡量)会在何种程度上涉及意识形态实质的变迁?在何种环境中政治领导人权力的变迁会要求其目标发生变化(权力的“中介”效应)以及在何种环境中在不改变其目标的前提下领导人可以增强其权力?比如,历史表明,职业军官只有在放弃或修改其保守主义的价值观的条件才能在自由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或极权主义社会中获取权力。在大部分体系之中,意识形态、制度、群体、领袖及政策的权力<sup>①</sup>的增强都必须以对内容做某些调整为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条一成不变的规律,对不同情况下不同组成部分的权力和内容的互相置换需要形成各不相同的假设。实际上,不同政治体系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为增强某种因素的权力需在内容上付出代价的多少。可以认为,一种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越高,为增强权力而需付出的代价也就越高。

因此可以从在三个层次上对政治变迁进行分析。可以将某一个组成部分中变迁的速度、范围和方向与另一个组成部分中变迁的速度、范围和方向进行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可以了解一个政治体系中的稳定性与不稳定性的模式,一个组成部分中的变迁对其他组成部分中变迁的依赖程度以及两者相联系的程度。比如,可以认为,对政治体系来说,文化和制度比群体、领导和政策更具根本性意义。这样,就可以将稳定性界定为这样一套特定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所有组成部分的变迁都是渐进性的,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变迁速度要慢于其他组成部分中的变迁,可以将政治停滞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形,即在文化和制度方面很少或根本没有发生变迁,而领导和政策方面变迁的速度却很快。可以将政治不稳定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形,即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变迁要远快于领导和政策方面的

---

<sup>①</sup> 亨廷顿《战士与国家》,剑桥,1957,特别见第80—97页。

变迁,而革命则涉及到体系的五个组成部分中同时发生急剧的变革。

第二个层次的分析是指将同一个组成部分中某一个因素在权力和内容方面发生的变迁与另一个因素权力和内容方面发生的变迁进行比较。比如,这涉及到分析意识形态的兴衰、制度与群体的兴衰和领袖与政策的兴衰,以及与权力关系变迁相联系的这些因素的内容方面的变迁。最后,还有一个特殊层次上的分析,即关注于某个因素权力方面的变迁与内容方面的变迁的关系,制定出为增强权力而在目标、利益和价值方面所要付出的代价的公式。

这样一套相对简单的假设和范畴可以充作一个起点,以便可以在此基础上对许多社会中都存在的一般性变迁问题进行比较分析,或者深入分析某一特定社会中的变迁模式。它也可以提供一种将有关态度、制度、参与、群体、精英和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的方式,以增进对政治变迁的理解。

另外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研究法是由阿尔蒙德和拉斯托分别提出来的,他们关注的是“危机变迁”(crisis change),这也为分析政治动态过程提供了一种较为抽象的框架。阿尔蒙德认为,可以按两个标准对以前的比较政治学和发展理论进行分类。这些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与均衡模式或发展模式相联系?它们所做的预测在多大程度上是决定论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选择性的?通过评论理论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观点,阿尔蒙德提出了下列分类:

比较政治研究法

	均衡模式	发展模式
决定论	I 帕森斯 伊斯顿	III 多伊奇 摩尔 利普赛
选择性	II 当斯 达尔 里克	哈桑伊 雷色森

然后他进一步指出,在分析政治变迁时,每一种研究法都有其作用。可以认为,从一种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状态会经历5个阶段。可以假定在第一阶段上预先存在一种均衡,第一种类型和第二种类型的理论最适于对这一阶段进行分析。可以假定变迁是始于政治体系内部环境或国际环境中非政治性的外部因素对均衡的影响发挥作用。第二阶段的发展会导致政治要求结构及政治资源分配方面的变迁,这最适于用第三种类型的理论进行研究。在下一个阶段,政治因素——变化着的政治要求结构和政治资源分配方式——成为独立变项。政治领袖对这些变项加以控制,以形成新的政治联盟和形成新的政策结果。就这种目标而言,第四种理论,即“结盟理论和领袖技巧与个性理论”是最有用的。在下面的第四个阶段上,这些政策和政治联盟会导致文化与结构变迁。对这一阶段所涉及的关系,要求将4种理论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最后,在第五个阶段上,一种新的“均衡”出现了,又可以按第一和第二种类型的理论来进行研究。<sup>①</sup>

由于形成了这种理论框架,阿尔蒙德又一次在改变比较政治学的思维上起了主要作用,并成为代表人物。与他早期的观点不同,这个框架完全是为了研究变迁问题,并可应用于任何历史背景。它并不只是与现代化有关。相反,它是一种分析政治变迁的一种抽象的框架,即可以应用于原始社会、古希腊城邦国家,也可以应用于现代民族国家。它涵盖了政治和非政治这两个方面的变项,并认为每个变项既可以作依变项,也可以作自变项。也许更重要的是,它有效地将领导和选择引入到政治变迁的模型中来。而最重要的则是,它将有关发展的互相冲突的研究法巧妙地综合到一起,并明确了每一种研究法的作用。这种模式特别有利于分析特定时期的变迁强度。因此很自然地,阿尔蒙德及其同事将其应用于研究历

---

<sup>①</sup> 阿尔蒙德《决定论与选择、稳定与变迁:对当代政治理论论争的思考》(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1969年8月)。

史上所有明确确定的危机,如1832年的改革法令、第三共和国的建立、明治维新、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本世纪30年代的卡德纳斯改革。<sup>①</sup>

拉斯托<sup>②</sup>也进行了同样的努力,并提出了一种类似的模式。他认为,政治变迁是由人们对现状的不满造成的。这种不满产生政治行动;而政治行动几乎总是不满的结果。这种行动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成功了,造就这种成功的组织、运动和群体或是形成新的目标,或是不断衰落以至消亡。如果想促使发生的变迁失败了,促进变迁的群体或是解散,或是继续追求原来的目标,但降低了自己的期望值。此外,拉斯托还认为,创立新政府的能力或征服权力的群体与个人与维持政府和维护权力的群体或个人是不同的。政治变迁理论必须对这种差异进行系统的解释。因此,像阿尔蒙德一样,拉斯托更加强调的是政治领导必须做的选择。

分析政治变迁的第三种研究法是由布鲁纳和布雷尔提出来的。<sup>③</sup>在他们对政治方面的现代化所做的研究中,他们提出了涉及到22个变项和20个参数的“复杂变迁”模式。其中有10个变项和8个参数分别分布在城乡两个部门;有3个变项和3个参数涉及人口子系统,有9个变项和6个参数属于经济子系统,有10个变项和11个参数属于政治子系统。然后用12个公式来表示这些变项及参数间的关系,而这些公式都是从抽象的现代化理论以及对40年代到60年代土耳其和菲律宾的发展所做的分析中提炼出来的。这个模式中

---

① 阿尔蒙德模式的早期应用见康尼利斯(W. Cornelius, Jr)《墨西哥革命中的危机、结盟与政治事业:卡德纳斯领导下的社会改革的政治学》(“历史危机与政治发展”研究项目,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1969年7月)。

② 拉斯托《作为政治学研究课题的变迁》,第6—8页;也可见他的《共产主义与变迁》一文,收在约翰逊(C. Johnson)编《共产主义制度中的变迁》,斯坦福,1970,第343—358页;他的《向民主的过渡:走向一种动态的模式》,《比较政治学》,第2卷(1970年4月),第337—363页。

③ 布鲁纳(R. Branner)和布雷尔(G. Brewer)《有组织的复杂性:有关政治发展的经验理论》,纽约,1971。

所包括的有些变项是直接受政府行为的影响的,但也有些因素并不受政府行为的影响。用这个模式可以计算政府政策的变化对人们支持政府的程度(用人口中多大比例的人投执政党的票来度量)和生活水平(用人均消费量来度量)可能产生的影响——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如果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5%,就会使城市税收率发生约5%的变化,也会使政府支出中来自城乡收入的相对比重发生变化。也可以对政策参数——如政府对城乡提供的优惠——进行分析,以说明政策中发生的各种不同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像对政府的支持程度和生活水平这样的因变项的。

布鲁纳和布雷尔的研究法为政治分析开辟了新的视野。从理论上来说,它提供了一种高度简单化但又相当精确的政治体系模式,这个模式涵盖了人口、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重要变项,并可以用公式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从实践上来说,它指出了一种科学探讨的方向,并以此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分析政策选择对与他们的目标直接有关的方面产生的影响的手段。从最终结果来看,这种模式的建立将很久以来在经济学中一直存在的复杂关系分析引进了政治学。但在另一方面,布鲁纳和布雷尔的模式也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存在于其最初的理论假设以及这种假设与这个模式所针对的实际政治体系的关系中。12个公式模型为人们认识50和60年代土耳其与菲律宾各种变项及参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指导。但在有关未来的状况上,其假设则意味着模型的结构和参数的分量在不同时间里是没有变化的。这个模型可以提供一些手段以检验政府政策及其他一些变项的较重要变化所能造成的影响。但在体系中的某些变化导致模型中某些变项发生变化之前,它却不能对体系中的这些重要的变化进行预测。比如,它不能预见到一次军事政变会将权力转移给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官员派系。一旦这样的派系获得权力之后,这个模型也许可以预测其采取的新政策可能造成的某些影响。但这种预测能力取决于原来存在的变项间的关系是否仍然存在。而革命派系的首要目标也许

就是改变这些关系。因此,布鲁纳和布雷尔研究法的有用性受到政治体系的非连续性的限制。

所有这些关于组成部分变迁、危机变迁和复杂变迁的理论都或是用这种方式或是用那种方式以图将政治分析从早期阶段静态假设的局限的后期现代化与发展研究中的目的论的局限中解放出来。这些理论表明,对政治变迁的研究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对于形成关于政治动态过程的一般性理论而言,他们迈出了有意义的第一步,也可以将其看作是对拉斯托提出的下述挑战所做的最初的反应:“除非使进化模型更为精致,并更为熟练地使用历史资料,否则就可能将变迁的观念引入到我们对政治本身的认识中去”。<sup>①</sup>

(孙立平 译)

---

<sup>①</sup> 拉斯托《现代化与比较政治:研究与理论的前景》,《比较政治学》第1卷(1968年10月),第51页。

M. 欧尔森

## 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多变量分析\*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探讨政治发展与社会经济现代化之间的经验性关系,其重点在于这两个过程的多维本质。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可以概念化为由几个互相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可度量的维度组成。来自115个独立国家的数据支持了关于全面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尤其是运输设施对于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论点。国家政治发展的每一方面都可以从社会经济变量的各种组合做出有效预测。研究结果也许可以用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社会动员观点——一个人在非传统模式的集体行为中的投入——来解释。这种观点指出,工业化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是必需的,因为工业化创造了对于社会动员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发展二者都必需的经济基础。

过去的几年里,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对政治发展过程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之间联系的兴趣在明显增加<sup>②</sup>。这项研究的基本思

---

\* 选自《美国社会学评论》第33卷第5期(1968)。本文的修订本曾在美国社会学学会1967年年会上宣读。这个研究中的一些部分是与印第安纳大学比较社会学研究所1966年夏季研讨班合作进行的。

② 这方面的文献有代表性的例子见阿尔蒙德和科尔曼(Almond and Coleman, 1960),阿普特(Apter, 1965),布雷班蒂和施宾格勒(Braibanti and Spengler, 1961),库特里特(Cutright, 1963 and 1967),多伊奇(1961),勒纳(Lerner, 1958),冯德梅登(von der Mehden, 1964),罗斯托(Rostow, 1960)和香农(Shannon, 1958 and 1959)。

想是，“现代化的”所有方面都是互相联系的，因此没有其他许多领域的相应增长，任何一种发展都不可能延续很久——尤其是政治发展[卡普隆和芬斯特布施(Finsterbusch)，无日期]。特别是，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1960:27—63)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迷惑人心的观点，认为政治的民主高度依赖于诸如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等领域中的社会经济发展。

然而，现在的一些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经验研究比李普塞特的观点不确定得多。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探讨这两种形式的社会现代化之间的经验关系，而不是以前的研究中所泛泛地做过的那些，其重点在于这两种过程的多维本质。

构成李普塞特论点的理论依据已经广泛地讨论过了，除了要澄清一点之外，其余的在此不再重复。鉴于李普塞特已经详细地阐明了政治民主的成长，在此我们关注的是更为广泛的国家政治发展过程，而“民主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沿用亨廷顿(Huntington, 1965:386—430)的概念，我们把政治发展定义为“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制度化的水平取决于一个政治体制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内聚力或者统一性。这种组织的或体制的过程在分析上不同于政治动员，或者说是促使民众积极参与该社会的政治体制[内特尔(Nettle), 1967]。虽然这两个过程在经验上是有联系的，但是，政治体制的结构和功能特点能够与个人参与该体制的频率和方法分开加以考察。在一个社会中，一个复杂的政治体制创立之前，民众的参与是非常靠不住的(多伊奇, 1961; 亨廷顿, 1965)。

### 以前的研究

李普塞特搜集了种种数据以支持他的论点，但是这些数据很容易受到批评，因此只是具有启发性而已<sup>①</sup>。首先，他对政治成长

<sup>①</sup> 对李普塞特的方法论和数据的更广泛评述，见库特里特(1963)。

的度量用的是一个简单的、主观的和二分法的国家分类,例如“稳定的民主”或“不稳定的民主和独裁”。<sup>①</sup>他既没有做出努力来建构一个政治民主的量化尺度,也没有从较为狭窄的政治发展过程来详细区分这个概念。结果,后来的学者们经常把这两种现象等同看待,因而使得梅登(1964:9)评论说:“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把西方政府体制作作为政治的发展和‘现代性’(modernity)的标准并不奇怪”。

其次,他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度量完全是独特的。虽然他使用了几个关于国家福利、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等客观测量,但是他既没有把它们综合为一个单一的指标,也没有把它们作为现代化的不同方面对待。反过来,他简单地把它们全部想象为“经济发展”的指示器。第三,在数据分析中他没有使用统计关系或统计控制测量。最后,他的研究范围仅限于欧洲国家、英语国家和拉美国家。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李普塞特的研究仍然清楚地表明了工业化和教育对于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的重要性。而且,它极大地刺激了后来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菲利浦·库特里特(1963)在对李普塞特论点的最初检验中克服了许多这种方法论上的缺陷。他根据为不同类型的立法和行政组织设计的分数推导出了一个指标。<sup>②</sup>虽然这个指标比李普塞特的二分法分类精细得多,但是它最初的名称——“政治发展指标”——仍然沿袭了政治现代化的“西方民主”概念。要获得该指标的最高分,一个国家必须拥有西方的议会式政府,包括(a)至少代表两个政党的立法部门,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完全控制立法机关,(b)一个行政部门,其首脑经过公开的(公众或政党)

---

<sup>①</sup> 这种分类用于欧洲国家。对于拉丁美洲,他在同样的“民主”范畴中包括了“不稳定的独裁”。

<sup>②</sup> 对这个量表的修订库特里特(1965)作了完整的叙述。

竞选产生。在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库特里特(1965)通过把这个指标定名为“政治表现指标”(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dex),从而承认了这一偏见,但是他没有讨论或测量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发展。

防止产生这种“民主偏见”的一个可能办法是把政治成长作为一个多维的而不是一维的过程看待。<sup>①</sup>这些维度中的一些可以包括建立政党体制和竞选,其他可以指政府权力的结构和功能,同时还有另外一些维度可以认为是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功能有效性。因此,诸如民主-专制,集权-分权,稳定-不稳定,有效性-无效性等变量每一个都可以独立地加以分析。

库特里特的是把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多维的来构思的,并且他设计出了经济增长、劳动力配置、教育、城市化和通讯等独立的经验测量指标。其中前4个社会经济指标与政治表现指标之间呈现出大概一致的相关(在0.68和0.74之间),而通讯指标的系数是0.81。根据这些数字,他得出结论,对一个国家内通讯流量的测量——这里指报刊发行量、国内邮政和电话——为政治现代化提供了最好的指示器。综合全部5个社会经济指标与政治表现之间进行多元相关只能把相关系数提高到0.82。库特里特研究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实际上没有包括任何非洲国家。<sup>②</sup>

其他3个研究为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另外的资料,虽然没有一项研究提出过非常重要的新成果。詹姆

---

① 虽然一些学者已经论证过必须把政治发展看作是一个多维过程,但是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一项研究尝试把这种观念操作化。也许是佩伊(Pye, 1963)对政治发展的多维性作了最为直截了当的论述。

② 库特里特以这种根据为其对非洲的忽略辩护,即如果包括非洲国家,其中绝大部分国家集中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全部指标的低点,就会歪曲已经获得的相关关系。问题更大的是他把一个国家1940—1960年的年平均分数作为该国家全面的政治发展分数来使用的同时,而只采用1960年前后一个时期的总的社会经济资料。

斯·科尔曼(见阿尔蒙德和科尔曼,1960:538—544)把75个“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划分为“竞争性的”、“半竞争性的”和“极权主义的”三种类型,然后把它们与11个不同的指标例如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等联系起来。他发现,在拉美和亚非,竞争性的国家在所有这些变量上只有一个变量的平均得分最高,半竞争性的国家得分第二,极权国家得分最低。<sup>①</sup>这些数据证明了李普塞特的论点,但是我们再次发现了在民主问题上的偏见和单维的政治现代化概念,不是多维的研究。科尔曼既没有计算联合测量,也没有对经济增长的各种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加以分析。另外,这项研究没有涉及任何“现代化”国家。

罗伯特·马歇(Robert Marsh)和威廉·帕里什(William Parish)(1965)最初把他们的研究描述为对李普塞特论点的一个检验,但是实际上他们研究的是另一个不同的问题,即共产主义是否在不发达社会中特别流行。他们使用的自变量是对福利和文化水平的四次测量,而共产主义的力量取决于一个社会中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选民的规模。他们的资料来自于126个非共产党国家,结果没有发现任何一种社会经济测量与共产党的力量有重要的关系。<sup>②</sup>虽然这项研究清楚地证明了对共产主义的政治进展作任何直接的经济解释都不合适,但是它并没有推翻关于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假设。由于李普塞特的基本关注点是政治极权主义,不是共产主义本身,所以,马歇和帕里什的研究显然作了这样一个隐含的假定,即共产主义=极权主义=政治不发达。除了任何这种反面推论的有效性要受到怀疑之外,还可以就共产主义是极权主义的一种可能形式——在某些条件下也许根本就不代表极权主义政治——进行讨论。顽固的民主偏见在这个推论中又一次表

---

① 科尔曼把拉美和亚非国家分离开来是因为在这两个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不符合这种模式的一个变量是工会会员比例。

② 在这些社会中共产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也不受诸如收入不平等程度、现代化速度和非共产党的“左翼”选民的规模等复合变量的影响。

现了出来。<sup>①</sup>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个研究是迪克·辛普森(Dick Simpson, 1964)所做的小研究。作为对李普塞特假设的一个检验,他调查了47个不发达国家的福利、文化水平和政治发展。<sup>②</sup>他发现这三个变量是互相联系的,相关系数在0.36和0.52之间。由于这项研究中的测量、样本和分析的局限性,它只能被当作是对进一步研究的启发。

## 方 法 论

可以将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二者都看作是多维过程,由一些在经验上互相联系但在分析上独立的维度组成。每一个理论维度都可以依次用几个不同的经验变量来测量。这些变量和维度常常互相关联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完全相同的或可以互换的。相反,它们是可以共变的独立现象,因而可能互相影响。因此,变量和维度中的一致程度成为调查关注的问题之所在,而不是限定或假定事件。

出于方法上的便利,本研究把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作为“自”变量,而把各种维度的政治发展作为“因”变量。但是,这种设计不应当作理论假设来理解,因为实际上所有形式的现代化在连续的事件螺旋中都无疑是彼此互相影响的。

在本研究中,政治发展的过程由五个维度组成:行政功能,立法功能,政党组织、权力多样化和公民影响力。前两个维度摆脱了

---

① 马歇和帕里什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已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实际上,他们把共产党国家排除在外了),反而只是研究了一些国家共产主义的相对力量。必须把一次政治运动与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区分开来,因为对这两种现象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实际上,在一些“现代的”和至少中等的民主政治中确实存在强大的共产党。

② 政治发展是用由公民的政治参与度、现政权的代表性和志愿社团的利益连接方式综合而成的一个综合指标来测量的。但是,最后一个因素最好把它理解为一个社会特征,而不要理解为一个政治特征。

任何“西方民主”的偏见。相反,最后两个则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决定性方面,而政党组织也许是一个中间类型的过程。采用里格斯(Riggs, 无日期)提出的建议,这些维度中至少前三个(可能是全部)可以被认为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按其排列顺序发展的阶段。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本研究使用的这五个维度并不一定穷尽政治现代化的所有方面,而且相对于其他研究来说也不能认为它是最好的。这些特定的维度是从相应的资料启发中得出的,因此必定只是对整个政治发展过程的一个粗略概括。

以上五个政治现代化维度,每一个都用一个以三个经验变量为依据的指标加以操作化,具体如下:<sup>①</sup>

(1) 行政功能:

- (a) 政府机构的功能有效性,
- (b) 由行政机构进行的利益聚合,<sup>②</sup>
- (c) 政府的稳定程度。

(2) 立法功能:

- (a) 立法机构的功能有效性,
- (b) 由立法机构进行的利益聚合,
- (c) 民间对政治的控制程度,<sup>③</sup>

(3) 政党组织:

- (a) 政党数目,<sup>④</sup>
- (b) 由政党进行的利益聚合,

---

① 精确地定义所有这些变量当然是吸引人的,但是在其出处它们并没有被精确地定义(班克斯和特克斯托尔(Banks and Textor, 1963)。除非用其他方式表示,把每个变量都划分成三个或四个定序分类,一般形式是:“重要的”,“一般的”,“有限的”,“微不足道的”。

② 利益聚合(interest aggregation)的概念来自阿尔蒙德和科尔曼(1960:16)。

③ 划分为“军方中立的政治”,“军方支持的政治”,“军方干预的政治”。

④ 竞争性的两党和多党制二者都被看作是完全发展的。这两个类型与无党派、一党和“一个加半个党”体制相反(最后一个名词是指在一个多党制中一个政党控制政府的情况)。

- (c) 政党的稳定性。
- (4) 权力多样化：
  - (a) 政府的合宪法性，<sup>①</sup>
  - (b) 自治的政府部门个数，
  - (c) 政治领导人的非限制性补充<sup>②</sup>。
- (5) 公民影响：
  - (a) 在政治上选举的代表，<sup>③</sup>
  - (b) 群体对立的自由(free of group opposition)，
  - (c) 新闻报道的自由。

所有这十五个政治变量的资料来源是班克斯和特克斯托尔的跨政体调查(1963)<sup>④</sup>。每一个变量都被他们主观地划分成三个或四个分类的定序量表,利用了所有有关的出版材料,并与地区专家作了多次磋商。正如班克斯和特克斯托尔所细心指出的,这样的主观划分是粗糙的和相对的。然而,它们是目前这种可用资料中包含内容最多的。<sup>⑤</sup>

为了进行比较,分析中也包括了两个政治现代化的复合指标。一个是政治发展综合指标,通过把一个国家在以上五个维度指标的得分全部加起来而获得。另一个是库特里特的政治表现指标,本研究将之扩大到包括所有国家。<sup>⑥</sup>

---

① 划分为“符合宪法的”,“独裁主义的”,“极权主义的”。

② 划分为“选自所有社会阶层”,“大部分选自一个社会阶层”,“完全选自一个阶层”。

③ 划分为“拥有普遍的公民权的多元政治”,“有限制的公民权的有限的多元政治”,“选举有名无实的假多元政治”,“没有选举的非多元政治”。

④ 这些资料来自附录 A 给出的最初原始编码;占这本书大部分篇幅的计算机打印结果本研究没有使用。

⑤ 除了总体上的不精确性,使用这些资料最可能引起的曲解是相关系数的增大,因为每一个所构建的指标都只包括8个种类。

⑥ 库特里特教授非常好心地把他研究中77个国家在经他修订过的量表中的原始得分送给了我(见库特里特,1965)。在我的样本中我使用同样的步骤来获得所有其他国家的分数,资料来源与库特里特相同: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40至今(1968)]。

在本研究中,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由工业化、城市化、运输、通讯和教育五个分析维度组成。每一个维度依次由下面列出的两或三个经验变量组成。由于许多变量的分布明显偏离正态,如回归分析中所假定的,因此,必须对这些数据进行对数转换(或者,就文化水平来说,进行弧正弦转换)。这样转换的变量也在下面加以说明。<sup>①</sup>

(1) 工业化

- (a) GNP——以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log X$ )。
- (b) 能源——以兆瓦/小时计算的人均总能源消费量( $\log X$ )。
- (c) 劳动多样性——劳动力多样化指标。<sup>②</sup>

(2) 城市化<sup>③</sup>

- (a) 城市——居住在20000人以上的城市中的比例。
- (b) 中产阶级——在非体力职业中就业的男性比例。
- (c) 工会——属于工会的人口比例( $\log X + 1$ )。

---

① 关于在社会经济研究中使用转换数据情况下的统计推论讨论见索耶(Sawyer, 1967, 脚注24)。无论在何处使用,决定哪一个变量要转换以及选择哪种合适的转换方式我都援引索耶的先例。

② 对此变量最常用的测量是在非农业职业中进行经济活动的男性比例。但是,这种测量没有考虑非农业劳动力的分布。为了克服这一局限,就需要一个更为复杂的“劳动力多样化指标”。吉布斯和马丁(Gibbs and Martin, 1962)最近设计了一种对“产业多样化”的测量,当劳动力平均地分布在9个主要经济部门时它获得最大值1.00。但是,在任何社会中假定诸如公用事业或采矿业部门中就业的人数与制造业或商业部门中就业的人数相等似乎是非常不现实的。由于缺乏劳动力在一个完全工业化的社会中较好的分布模型,因此我采用美国当前的数字作为本研究中使用这个指标的基础(测量大约的百分比)。在这个指标上要获得最大值1.00,一个社会的劳动力必须如下分布:农业 = 10%,采矿业 = 2.5%,制造业 = 30%,建筑业 = 10%,公用事业 = 2.5%,商业 = 20%,交通运输业 = 10%,服务业 = 15%。如果一个社会的劳动力在任何一个部门的观察值低于这个模型中的值一个百分点,就减去0.01分。因此,完全的农业社会将得到最低分0.10。这个指标的实际社会得分从美国的0.91分到尼泊尔的0.19分。

③ 这里使用的“城市化”指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化和在城市环境中更加高度组织化的整个过程。因此,正如这里所界定的,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只是城市化的一个特征。

## (3) 运输

(a) 运输工具——每千人拥有的机动车数量( $\log X + 1$ )。(b) 铁路——每个地区人均拥有的铁路公里数( $\log X + 1$ )。<sup>①</sup>

## (4) 通讯

(a) 报纸——每天每千人拥有的报纸发行量( $\log X$ )。(b) 广播——每千人拥有的广播电台的数量( $\log X$ )。(c) 电话——每千人拥有的电话机台数( $\log X$ )。

## (5) 教育

(a) 文化水平——15岁及15岁以上有文化的人口比例( $\sin^{-1} \sqrt{0.01X}$ )。(b) 正规学校教育——25岁及25岁以上完成初等教育的人口比例。<sup>②</sup>

(c) 语言——使用主要语言的人口比例。

构成每一个维度的两或三个变量是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而不是通过构建指标进行综合的。

联合国的数据可以用来测量除其中一个之外的所有这些社会经济变量<sup>③</sup>。全部数据尽可能从1960年或前后的资料中采用。虽然联合国数据的局限性尽人皆知,但是这里再重申一下:这些数据都是成员国自己报告的,因此受到无限制的或明或暗的偏见影响。除了这些或多或少有目的的窜改之外,除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其他所有国家数据收集的过程非常粗糙和混乱。但是,我们只能使用这

① 这个变量来自金斯伯格(Ginsburg, 1961),它可以界定为每人拥有的铁路公里数除以以平方公里计的国家面积与其人口之比的平方根 =  $R = (K/p)/(\sqrt{A/p})$ 。

② 目前许多研究使用在校入学人数这个数字,主要是因为这些数据更为完整,可能也更为精确。但是,当前入学人数并不是成年人口教育水平的恰当的指示器,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社会的入学率上升得很快。

③ 所使用的主要的联合国资料汇编在参考资料中列出。联合国数据的第二个有帮助的来源如下:阿尔蒙德和科尔曼(1960:附录),金斯伯格(1961),拉西特等人(Russet et al., 1964)和瓦林斯基(Walinsky, 1963:附录)。

些数据因为它们是目前可以利用的全部东西。

这次研究的样本由班克斯和特克斯托尔提供了资料的115个独立国家(1963年的)组成<sup>①</sup>。但是,实际上所有个案中都至少有一些变量的数据缺失。下面的几个表格中所给出的相关是根据所涉及的变量数据有效的全部国家计算的。因此每一个相关的样本量(N)并不相同。没有迹象表明在每一个相关中采用更可能多的个案的方法与只根据报告了全部变量的个案数目的方法会导致明显不同的结果(在这次研究中,提供全部变量数据的国家非常少)。因此,多元相关、偏回归系数和有关的统计可以从零序相关矩阵而不是从平方和和交叉乘积中推导出来。

## 研究结果

全部7个政治发展指标都有中等程度的相关,这一点从表1所给出的相关系数(肯德尔系数 Tan C)中就可以看出。也许正如所预期的,行政功能只与政党组织、权力多样化和公民影响力有微弱的联系。但是,有些令人吃惊的是这3个变量与立法功能明显相关。政党组织与权力多样化和公民影响有中等相关,而后两者对“民主的测量”则高度相关。由于综合指标是从这5个独立指标中推导出来的,所以它们每一个之间相当密切的联系并不令人惊讶。库特里特指标与其他所有维度中等相关,说明这个指标所发掘的是另外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现代化模式。总的来说,这些数据表明,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各种维度能够被概念化为政治发展的一般过程在分析上不同而在经验上相互关联的几个方面。

---

<sup>①</sup> 他们忽略的国家只有中国的台湾地区(他们不把它看作是一个独立国家)和一些小公国(例如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安道尔、科威特、马斯喀特和阿曼、锡金、不丹、巴林)。1963年以来独立的国家自然不包括在班克斯和特克斯托尔的研究之内。除了新加坡,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在非洲:冈比亚、肯尼亚、莱索托、马拉维、罗得西亚、赞比亚和桑给巴尔(现在坦桑尼亚的一部分)。

表1 7个政治发展指标之间的相关

	肯德尔系数 Tan C (括号中是样本量)					
	B	C	D	E	F	G
A. 行政功能(111)	0.43	0.32	0.33	0.32	0.58	0.39
B. 立法功能(102)	—	0.60	0.75	0.73	0.87	0.53
C. 政党组织(86)	—	—	0.51	0.59	0.68	0.47
D. 权力多样化(105)	—	—	—	0.77	0.74	0.48
E. 公民影响力(103)	—	—	—	—	0.79	0.54
F. 综合指标(100)	—	—	—	—	—	0.55
G. 库特里特指标(115)	—	—	—	—	—	—

表2包括了14个社会经济变量中存在的皮尔森相关(Pearsonian Correlation)。与当前的研究一致,这些因素中大多数一般是高度相关的。让我们来简单地检验一下构成我们这五个理论维度的每一个变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量的相关如此之强(0.95),以至于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对工业化的可互换的测量。这两个指标也与劳动多样性密切关联(0.83)。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测量与电话变量之间的相关(依次是0.91、0.92和0.84),这支持了卡普隆和劳斯特布施(无日期)的观点,即此特点(在可以获得丰富资料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优良的显示器。虽然三个社会结构变量——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会——中等相关(最强的相关是0.71,在城市和中产阶级之间),但是它们都与矩阵中的其他变量——尤其是电话变量和报纸发行量变量——之间都表现出显著的相关。

机动车辆和铁路这两个运输变量只是部分相关(0.52)。而且,它们每一个都同等地或更强地与几乎所有其他社会经济特征相联系。对于后面的结果,要注意虽然机动车辆变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是0.83,但是这个数字与其他几个变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不一样高。电话变量与报纸和广播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都是0.87,而后两个通讯测量之间的相关是0.79。然而,我们再一次发现,其他的相关强度一致:报纸与学校教育之间的相关是

表2 14个社会经济发展变量之间的相关

	皮尔森系数 r (括号中是样本数)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A. 国民生产总值(114)	0.95	0.83	0.84	0.61	0.64	0.83	0.69	0.81	0.84	0.91	0.85	0.77	0.62
B. 能源(91)	—	0.83	0.82	0.68	0.77	0.82	0.73	0.78	0.83	0.92	0.85	0.84	0.52
C. 劳动多样性(75)	—	—	0.76	0.83	0.69	0.74	0.57	0.86	0.75	0.84	0.78	0.73	0.39
D. 城市(108)	—	—	—	0.71	0.61	0.74	0.60	0.75	0.74	0.82	0.75	0.74	0.63
E. 中产阶级(57)	—	—	—	—	0.53	0.59	0.41	0.70	0.55	0.71	0.56	0.59	0.28
F. 工会(100)	—	—	—	—	—	0.58	0.56	0.67	0.69	0.68	0.69	0.67	0.33
G. 机动车辆(109)	—	—	—	—	—	—	0.52	0.76	0.73	0.84	0.66	0.55	0.46
H. 铁路(101)	—	—	—	—	—	—	—	0.60	0.62	0.67	0.75	0.40	0.46
I. 报纸(112)	—	—	—	—	—	—	—	—	0.79	0.87	0.83	0.85	0.64
J. 广播(109)	—	—	—	—	—	—	—	—	—	0.87	0.78	0.72	0.67
K. 电话(101)	—	—	—	—	—	—	—	—	—	—	0.86	0.85	0.70
L. 文化水平(114)	—	—	—	—	—	—	—	—	—	—	—	0.85	0.67
M. 学校教育(45)	—	—	—	—	—	—	—	—	—	—	—	—	0.52
N. 语言(80)	—	—	—	—	—	—	—	—	—	—	—	—	—

0.85,与文化水平之间的相关是0.83;广播与国民生产总值和能源变量之间都有强相关(0.84,0.83);另外,电话与其他绝大多数变量之间的强相关已经检验过了。最后,文化水平和学校教育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0.85),但是它们与语言变量的相关不强(分别是0.67和0.52),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全部变量与文化水平和学校教育之间也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

从表2中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实际上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部变量之间存在着相当强的相关。但是,这一观察结果并不能否定社会经济现代化多维概念在分析上和经验上的重要性。当然,通过工业化的经济扩张并不等同于城市生活、大众传播或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这些数据的确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基本假设,即在一个社会中没有哪一个领域的发展能够远远走在社会其他部分的前面。

在分别检验了本研究的“因变量”和“自变量”之后,现在我们在表3中把它们放在一起,表3给出的是每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维度(用两或三个经验变量加以测量的)和每一个政治发展维度(由一个指标代表)之间的多元相关系数。在表的最后一行还列出了全部14个社会经济变量与每一个政治指标之间的多元相关系数。

表3 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综合维度与政治发展指标之间的多元相关

	多元相关系数 R						
	行政功能	立法功能	政党组织	权力多样化	公民影响力	综合指标	库特里特指标
运输(机动车和铁路)	0.70	0.69	0.63	0.57	0.59	0.71	0.70
工业化(GNP,能源和劳动多样性)	0.70	0.66	0.58	0.48	0.62	0.65	0.68
教育(文化水平、学校教育和语言)	0.59	0.59	0.69	0.38	0.49	0.61	0.69
通讯(电话、报纸和广播)	0.69	0.62	0.52	0.42	0.48	0.60	0.68
城市化(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会)	0.61	0.64	0.61	0.43	0.44	0.59	0.60
全部14个社会经济变量	0.89	0.90	0.84	0.75	0.98	0.83	0.84

也许这些数据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运输与所有政治发展指标,包括综合指标和库特里特测量之间的强相关关系,显然一个社会中的运输网络的广泛程度是大多数政治发展模式最好的单独预测器。除了与政党组织和权力多样化指标之间的相关以外,工业化与其他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几乎同样高。教育是政治发展的第三个最好的总体预测器,虽然它与政党组织和库特里特指标之间的相关明显高于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最后,通讯和城市化似乎是绝大多数政治发展模式最不明显的预测器,虽然它们两者在某种程度上与行政功能和立法功能以及库特里特指标之间的相关都高于与其他政治维度之间的相关。

现在可以得出三个暂时的结论。第一,李普塞特最初对经济增长之于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性的强调由这些数据提供了必要的证明,同时还表明交通工具对于某些模式的政治发展似乎比工业化本身更为重要。后一点使我们不禁要问运输变量的意义是什么。它基本上只是对财富在一个社会中分配和投入的程度的反映呢,还是运输工具本身对于政治发展以某种方式表现出其重要意义呢?当然,一个拥有大量机动车辆和铁路的国家不可能不拥有物质财富,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运输变量中没有一个是与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或劳动力多样性表现出不同寻常的高度相关。正如我们在表2中所看到的,诸如文化水平和电话等变量与所有三个工业化测量之间显示出一致的较高相关,这表明交通运输网络对于政治发展至少具有一些独立的意义。

第二,库特里特最初对通讯设施的强调没有得到这些数据的完全支持。他的政治表现指标和通讯之间的相关强度中等(0.68),而对运输和教育的相关系数略高,对工业化的相关也同样强。这两个研究之间的差异也许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a)在经济发展的指标中只把机动车数量作为四个变量之一包括在内,并且没有对交通运输作独立测量;(b)现在的这项研究包括了库特里特忽略的38个国家(主要在非洲);(c)构成库特里特的通讯指标的四个测量中有两个是关于报纸的印刷和发行的,它们(如在表4中将看到的)与政治表现高度相关,因此,实际上他给了最强的通讯变量双重的权数。

第三,与所期望的相反,在各种社会经济维度与每一个政治指标之间在关系模型上很少存在重要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方面对于所有政治发展模式的重要性至少大概相等。虽然对权力多样化和公民影响指标的独立相关一般来说比对其他政治维度的相关略低,但是在所有情况下整个模型是相同的。而且,在这两个“民主化”指标上的相关是累加的,因此最底栏它们的总和和相关系数大致与其他指标的相关系数相等。所以,它实际上

表明在许多关于国家的政治发展的研究中可以使用一个单独的政治“现代化”指标——例如综合指标或库特里特指标。

### 详细分析

为了加深我们对表3的多元相关的理解,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检验原先的14个社会经济变量和7个政治发展维度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些变量将单独或者以各种组合加以分析。

表4是每一个社会经济变量与每一个政治指标之间的相关。这些变量以它们与综合指标的相关程度递减的顺序排列。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机动车变量是两个运输测量中相关较强的变量,并且事实上除了行政功能和库特里特指标之外也是与所有政治维度相关最强的一个独立的变量(在这两种情况下它的相关系数都位于第二)。铁路变量与所有政治指标的相关相对较弱。相反,全部三个工业化变量——国民生产总值,劳动多样性和能源——与绝大多数政治发展测量的相关都相当高。在教育变量中,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高低所显示出的相关高于初等学校教育或语言的同质性所显示的相关。最后,电话似乎是主要的通讯变量,而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是三个城市化测量中最有意义的。

对这个一般模型的偏离很少有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a)行政功能、电话、报纸和广播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这表明只要政治领导人与他们的人民有适当的沟通工具,他们就能有效地进行统治;(b)对于立法功能,较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似乎比其他因素更重要,这表明支持立法活动的主要是这个社会阶层;(c)对于政党组织,知识水平的广泛提高和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的存在都是值得注意的因素。可以证明,一个可行的政党体制的组织和功能明显取决于这两种现象;(d)对于权力多样化和公民影响力二者,报纸发行量和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似乎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意义,这也许表明政治民主在有知识的城市居民中最能茁壮成长;

表 4 14 个社会经济现代化变量与 7 个政治发展指标之间的相关

	皮 尔 森 相 关 系 数 r						
	行政 功能	立法 功能	政党 组织	权力 多样化	公民 影响力	综合 指标	库特里特 指标
机动车辆	0.68	0.69	0.62	0.57	0.59	0.71	0.68
国民生产总值	0.66	0.60	0.56	0.45	0.51	0.63	0.67
劳动多样化	0.62	0.62	0.54	0.38	0.43	0.59	0.61
能源	0.70	0.54	0.52	0.38	0.38	0.58	0.66
电话	0.68	0.58	0.44	0.38	0.46	0.58	0.65
报纸	0.66	0.59	0.44	0.40	0.46	0.57	0.67
城市	0.54	0.56	0.51	0.42	0.44	0.56	0.59
文化水平	0.59	0.51	0.57	0.30	0.42	0.53	0.67
中产阶级	0.40	0.58	0.55	0.25	0.30	0.50	0.41
广播	0.59	0.46	0.41	0.28	0.39	0.48	0.60
工会	0.55	0.48	0.51	0.27	0.31	0.46	0.46
铁路	0.48	0.38	0.42	0.24	0.26	0.40	0.49
学校教育	0.53	0.36	0.40	0.14	0.24	0.34	0.49
语言	0.36	0.15	0.13	0.15	0.21	0.21	0.39

(e)对于前面提到的库特里特指标,与文化水平一样,报纸所显示的相关系数很高——这两个结果都与库特里特的发现一致。

对社会经济变量作详细分析的第二部分是寻找预测每一个政治发展指标的最佳变量组合。做这项工作使用了逐步多元回归技术,这个过程不同于标准多元回归分析,它在最后的回归方程中加入了“预测”变量,其方法是只有相关最强的预测变量才包括在内。换句话说,根据社会经济变量与被检验的政治指标之间的偏相关强度的高低顺序依次把它们加入每一个总回归方程。而且,指示计算机只加入那些在统计显著性水平 0.05 上有意义的预测变量。但是,正如所显示出的,实际上进入每一个多元相关的所有变量在统计上都是有意义的,没有一个落在在这个水平之下。表 5 给出了 7 个政治发展指标中每一个的逐步多元回归结果。

表5 对7个政治发展指标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步 骤	R
行政功能	1. 加入能源	0.70
	2. 加入机动车辆	0.72
	3. 加入报纸	0.74
	4. 加入学校教育	0.78
	5. 加入劳动多样性	0.89
立法功能	1. 加入机动车辆	0.69
	2. 加入中产阶级	0.73
	3. 加入语言	0.75
	4. 加入文化水平	0.76
	5. 加入能源	0.80
	6. 加入国民生产总值	0.86
	7. 加入劳动多样性	0.90
政党组织	1. 加入机动车辆	0.62
	2. 加入中产阶级	0.66
	3. 加入报纸	0.69
	4. 加入能源	0.77
	5. 加入劳动多样性	0.84
权力多样化	1. 加入机动车辆	0.57
	2. 加入学校教育	0.61
	3. 加入报纸	0.64
	4. 加入能源	0.67
	5. 加入劳动多样性	0.75
公民影响力	1. 加入机动车辆	0.59
	2. 加入能源	0.62
	3. 加入国民生产总值	0.71
	4. 加入工会	0.77
	5. 加入语言	0.80
	6. 加入电话	0.84
	7. 加入劳动多样性	0.93
	8. 加入中产阶级	0.98

(续表)

	步 骤	R
综合指标	1. 加入机动车辆	0.71
	2. 加入语言	0.72
	3. 加入文化水平	0.75
	4. 加入学校教育	0.78
	5. 加入铁路	0.83
库特里特指标	1. 加入机动车辆	0.68
	2. 加入文化水平	0.74
	3. 加入学校教育	0.75
	4. 加入铁路	0.78
	5. 加入电话	0.84

表5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进入每一个多元回归的变量组合的分散性。如所预期的,机动车辆在每一个回归中都是第一个变量(但只在一个回归中是第二个)。但是,剩余的13个社会经济变量中有11个在回归分析中分布得非常均匀,只有广播和城市被完全忽略了(考虑到对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增长在理论上的重要性,最后一个结果十分令人惊讶)。特别有意思的是学校教育和语言变量——它们起初与所有政治测量都显示出十分微弱的相关——两者都进入了三个相关,而工会只包括在其中一个之中。显然,这些相关较强的变量是相对独立地作用于政治发展之上的。

这些数据还为运输变量不是对国家财富唯一的间接测量这种说法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三个工业化测量,国民生产总值、劳动多样性和能源,与机动车辆共同进入了一些多元回归,并且机动车辆和铁路两者都包括在了综合指标和库特里特指标的回归分析之内。

在这些预测变量的组合中同质性最强的是对综合指标的一组,它只由两个运输测量和三个教育测量组成。库特里特指标的变量组合与之也十分相似,除了电话代替了语言之外。

但是,在这些观察结果之外,对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变量组合做一些理论解释似乎是可能的,虽然每一个变量组合都为估计政治发展指标中的变化提供了有用的回归方程,但是构成这些特殊组合的理论原因并非明显来自这些数据。

## 讨 论

虽然本研究中所做的统计分析能提供因果推断的基础,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已有的理论观点尝试着来解释这些结果。

也许最有用的原因解释是卡尔·多伊奇提出的“社会动员”观点(Social mobilization)。<sup>①</sup>他把社会流动设想为使个人参与到新的、非传统模式的集体行为中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社会现代化全过程的一个方面。个人的社会动员可以以许多不同但又互相联系的形式发生,包括大众传播宣传,地理流动性,城市生活,非农业就业,文化水平和教育以及个人财富的增长,所有这些对于政治发展都非常重要。“伴随社会动员而来的是有关的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扩张……(即)所有那些必须在政治上加以考虑的人们”(多伊奇,1961)。他接着指出,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够对政治领导人施加压力以提高和扩大政府的服务,从而导致国家政治体制在规模和范围上的增长。

本研究所使用的全部 14 个社会经济变量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动员的测量,并且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这些变量至少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发展的各种维度相关。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个理论观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表 5 中所看到的两个运输变量和三个教育变量证明是对综合指标最显著的预测变量。机动车辆和铁

---

<sup>①</sup> 一个稍微不同但是可作为补充的理论模式最近已经由库特里特(1967)提出并作了检验。他发现当缺乏政府的社会保障计划时,提高大众文化水平是推动一个国家迈向更高的政治表现的一个主要因素。他的论点和数据可以很容易地作为更广泛的多伊奇理论的一个特例加以解释。

路设施首先把处于隔绝状态的个人带人与其他的个人和社会现代化部门的社会联系中去,同时大众文化水平、初等学校教育和语言同质性使得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成为可能,并在人民中间产生文化和知识的纽带。关于报纸发行量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其数字在库特里特的研究中非常重要。

如果这种推论方法取得了一些成效,那么然后我们就碰到了为什么工业化过程——本研究中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消费量和劳动力的多样化所测量的——也与政治发展有明显的联系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李普塞特最初的论点怎样才能结合到多伊奇的原因讨论之中呢?虽然职业分化确定无疑地起了把个人带入新的社会活动中去的作用,但是这并不必然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和能源变量的本质,因为两者之中没有一个表明了财富在大众中实际分配的程度。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科威特和特鲁西亚(Trucia States)拥有世界上任何社会最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这两个国家都证明是经济极端不平等的。

作为对这个理论问题的一个推测性答案,我提出如下假设:(a)它把个人从传统的农业劳动和农村生活中解放出来;(b)它提供了适当的流动资源,可以投入到运输、教育和其他活动中,使人们得以更积极地参与到整个社会中去;(c)它为政府组织和服务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简单地说,工业化创造了大众的社会动员和促进政治发展两者所必需的经济基础。

虽然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确保这些后继过程一定会发生,因为其他因素,例如政治意识形态,成为这一阶段重要的变量,但是没有适当的经济基础该社会极可能仍然停留在封建的政治发展水平上。<sup>①</sup> 并且,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个假设,可以认为提高政府机构的有效性也许是工业化所带来的比政治民主更为迅速的成果,因

---

<sup>①</sup> 间接地支持这个论点的可以考虑的经验论据是兰斯基(Lenski, 1966: 297—433)提出的。

为政治民主要求全社会全面的社会变迁和个人转变。虽然这种观点以前已经由一些学者提出过了,<sup>①</sup>但是,在这里重复一遍是因为它能够在李普塞特和多伊奇之间的思想鸿沟上架上一座沟通的桥梁。

多伊奇理论模式的最后一个特点在此后要提及。他和亨廷顿(1965)两人都指出,广泛的社会动员及其引起的对扩大政府服务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可以转化为大众政治参与的提高——通过结构化的选举程度或者非结构化的政治运动。如果政治体制的发展跟不上普遍的政治参与(亨廷顿称之为“政治动员”)的步伐,结果可能会是一场“引起破坏的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frustration)(亨廷顿,1965)和明显的政治不稳定。接下来,这些发展会阻碍甚至倒转政治发展的进程,因为它会导致军事专制、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的(克里斯马式的)民粹派领导者或者潜在的极权政党的产生。

虽然对这些深入的结果的研究超出了现在研究的范围,但是在需要更多的另外研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它们显然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但是,就现在而言,这些假设至少使我们想到了政治发展之初——我们这里已经涉及到的——只是整个图景的一部分,任何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完全成功和维护仍然是一个不能预知的目标。

## 结 论

在严格的经验意义上,从这项研究中我们提不出任何最后的结论。但是在更广的意义上,在此我们已经完成的是提出:(a)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可以概念化为由一些互相联系的维度组成,每一个维度都可以单独加以测量;(b)关于全面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对

---

<sup>①</sup> 关于这个论点更广泛的讨论是由德·施万尼兹(de Schweinitz, 1964)提出的。

政治发展的重要性的最初论断得到了 115 个独立国家数据的支持；(c) 运输设施(尤其是机动车辆)似乎是与政治发展的绝大多数方面联系最紧密的社会经济现代化维度；(d) 社会经济变量的各种组合在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维度上都提供了一个强多元相关的预测值；(e) 多伊奇关于大众社会动员的观点, 伴随着对扩大经济基础在一个社会中的重要性的讨论, 提供了与社会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有关的原因力量的暂时解释。

如果这些研究结果和假设成立的话, 它们应该为对现在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革命性的国家政治发展过程的更广泛、更完善的研究提供肥沃的土壤。

(黄东友 译)

A. 奥甘斯基

## 政治发展的阶段\*

### 一、发展的理想

有关“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文献在不断增加,但其中的大部分所涉及的实际是技术与经济变迁。可以认定,伴随工业化而来的社会与政治变迁也属于“发展”的范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人们可以列举出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许多变迁。

但需要做的是,人们应当尽可能搞清楚国家发展、国家增长和现代化这些概念(这些概念常常是可以互换使用的)所指的是什么,并将政治发展置于这个复杂的过程之中。

国家发展的独特特征(但不完全是)是: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地理与社会流动的增加,以及在动员人力和物质资源以用于国家目标方面的政治效能的提高;这三个方面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就这一点而言,经济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农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而获得的,尽管目前的自动化已经带来了第二

---

\* 选自奥甘斯基《政治发展的阶段》。

次工业革命。这样,对最初的经济发展可以大略按照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比重来加以衡量,当一个国家50%以上的劳动力已经脱离农业而进入其他领域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个指标可能并不适用于未来,但在前三个阶段上是可以适用的。在将来,将要求形成一些对经济生产率进行衡量的直接性的指标,这样,“发达”就会像“现代”这个概念一样,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不是指一种绝对的状态。生产率越高,经济就越发达,当我们进入将来的时候,目前的发达国家的情况也会显得很落后。

一般地说,用这种简化的标准来量度的经济发展大体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实际上,人们经常使用的就是这种简化的方法。但确切地说,应该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发展虽然是明显地与经济现代化相联系的,但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顺序上,都可能是与经济现代化不同的。比如,从目前来说,某些方面的政治现代化领先于经济现代化而不是紧随在经济现代化的后面,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模式。

可以将政治发展定义为政府在将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用于国家目标方面的效能的提高。这种效能已经在提高,在将来还将进一步提高,但政治发展还有另一个方面。当一个国家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的时候,国民政府所承担的基本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在达到一个更为“发达的”阶段的时候,国民政府必须履行新的功能,同时还必须巩固以前的那些功能。当还没有一个国家的进步程度超过最初阶段的时候,一个在政治上统一的国家就是一个发达国家。在进步的下一个阶段上,“发达的”政治系统将不仅控制着统一的国家,而且也要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在今天,政治发展包括国家的统一,经济现代化,同时也要使国家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在将来,政治发展不仅要包括所有这些功能,还要包括自动化的经济,而且,这种经济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导致一种负责任的政治。因此,政治发展是很具体的。

## 二、发展的阶段

本书提出的政治发展阶段是：(1)最初统一的政治；(2)工业化的政治；(3)国家福利的政治；(4)富裕的政治。这些概念存在一种顺序上的关系。

### 最初统一的政治

最初统一的政治是指国家的诞生和幼儿期。这个阶段开始于何时,是很难在时间上准确地确定的,因为人类发展的渊源总是在遥远的过去就已经存在了。到16世纪,大部分西欧国家都达到了这种最初统一的阶段。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大部分民族国家是在成为欧洲的殖民地以后开始这个阶段的。最初统一阶段结束的时间更难确定,大体上说,当一个国家开始认真的工业化,或大体处于罗斯托所说的“起飞”阶段的时候,这个阶段就大体结束了。

任何一个国家通过这第一阶段的道路都会是与众不同的,但我们感兴趣的是通过这个阶段的国家共同的条件、共同面对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当时的这些国家,按照今天的话来说,都是“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也就是说,都是前工业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无效能的、不民主的。所有这些国家都不得不为统一的问题而斗争。

在这个阶段上,正如在其他的阶段一样,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的目标以及所关心的问题都是很多的,如强化个人的地位,增强国家的权力等,甚至还会有人在关心经济发展。但政府的基本功能则是一个:国家统一的形成。无论统治者有着什么样不同的想法,他们会发现他们关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国家的统一,因为在他们统治的国家处于分裂之中的时候,这种分裂会妨碍任何国家发展的计划。

这里第一位的基本问题是建立一种对其所有疆域、国家疆界

中所包括的全部人口的中央政治统治问题,这个问题一般是通过不可想象的野蛮的军事征服解决的。

然后的问题就是在面临种族分裂、少数民族的不满和分离主义运动的时候维持这种统治,且不要说还要解决有关地方权威的问题,这种权威可能是军事上的,也可能是文职的,他们力图使自己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中央的控制。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形成某种国家经济以将基本上以生存农业为主体的地区性经济联系起来。此外还有通过创建新的国家科层体制和政党来实现对村庄的控制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会一直延续到未来,这就是扩大国家的观念以及广大公民对国家的效忠。

最初统一时期的政治要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并形成获得成功的手段而斗争,但在这个时期结束的时候,这个任务也不可能彻底完成。一个国家可能是生机勃勃但又没有完全成熟的。实际上,这时的国家还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单位的结构是比较脆弱的、易损的。大量的分歧往往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离开来,因为老百姓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很少有参与国家生活的机会。国家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很少甚或没有,社会中许多成员由于自身的原因没有被动员起来关心国家的目标。简而言之,统一是“初步的”。但尽管如此,重要的是统一形成了,并成为随之而来的发展的基础。

### 工业化的政治

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国家的形式和任务都会发生变化。政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发生在下述这个转变时期中,在这种转变中,一个新的阶级获得了权力,一种新的经济建立起来了,广大的公民被结合进国家中去。

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通过三种不同的政府形式进入这个困难的转变时期,这三种政府形式是:资产阶级的(或西方民主式的)、斯大林主义的(我用这个概念来涉指这个阶段中的

共产主义政府)、法西斯主义的。在目前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国家都面临着一种选择,即是在这三种不同的现代体系中选择一种(第三种也不能排除在外),还是形成一种目前人们还不知道的新的政府形式。

在政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上,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允许和支持经济现代化。所有这三种政府形式——资产阶级的、斯大林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都可以做到这一点,虽然在这三种体系之间差异是巨大的,也是很重要的,但所有这三种政府都能履行有利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三种重要功能。

第一,他们都能将政治权力从传统精英的手中转移到希望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工业管理者手中。斯大林主义体系通过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对旧贵族的淘汰很快做到了这一点。资产阶级政府是逐步实现这种转移的,他们逐步获得对传统贵族的控制权,然后与大众分享这种权力。在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之下,土地贵族会顽固地与新的工业精英一起进行统治,但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他们会失去自己的权力。

第二,所有这三种政府形式都可以允许和支持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是工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他们主要是通过降低大众的消费水平来做到这一点的,这会使得资本积累在那些至少愿意将其中的一部分重新进行投资的人手中。

在这方面,人们会看到斯大林主义的政府能更快地做到这一点,但工人和农民的痛苦也达到了极点,他们的政治权力和在经济上进行讨价还价的权力都被剥夺掉。工资很低,资本投资水平却很高,特别是在重工业中就更是如此。结果就是极快的工业化速度,而这种速度是以人类的巨大苦难和压抑为代价的。

资产阶级政府也是以牺牲大众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来鼓励资本的积累。在这里,群众也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其手段主要是限制选举权以及对工会加以查禁(而不是加以控制)。其结果,工资水平也是很低的,工作条件很艰苦,资本投资的水平相对较高。其工业化

的速度多少会慢于在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国家,这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国家是最早进行工业化的。

法西斯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化速度则最为缓慢,其资本积累的基础是很有限的,因为其经济中的农业部分与工业化是相对分离的,并不想为工业化付出代价。但是,这里的工业化也在向前推进,尽管在速度上要慢于资产阶级和斯大林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化速度。

第三,所有这三种类型的政府都促进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移民。这种移民为连续不断的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同时也有助于旧的农民生活天地的解体。英国的圈地和俄国的集体化都加速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法西斯主义的政府对这种移民的促进作用较小,有时甚至还会阻碍这种移民,但尽管如此,这些国家的移民仍在进行。

在政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上,国家活动的范围在扩大,它首先扩大到工业精英,然后又缓慢地进步到将人民大众包括进来。普通的工人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经济。人民大众日益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利益,政治参与的意识在觉醒——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中,他们开始要求现实的政治权力。

### 国家福利的政治

国家福利的政治也就是充分工业化国家的政治。在整个第二阶段上,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互相依赖在加强;而在这第三个阶段上,这种互相依赖达到极点。国家的权力越来越依赖于老百姓的能力,而老百姓与工业贵族一起也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政府来保护他们免受压迫和战争的苦难。

这时政府的功能已不同于以前的时期。在第二个阶段上,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保护资本,以免人们对较高生活水平的要求会损害资本积累。在这个第三个阶段上,政府的功能则是保护人民,使他们免受艰苦的工业生活的损害: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人们

长期以来所渴望的较高的生活水平,并帮助那些处境不好的人。

在大众民主政治中,老百姓开始运用他们的新的经济权力(通过工会组织的建立获得的)和新的政治权力(通过选举权的扩大获得的)。他们使用这些新的权力以赢得国家政府对他们的保护,而他们的新的要求也促使政府去履行新的功能。

但是,大众民主并不就是福利国家的先决条件。希特勒的德国和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的俄国,都可以看作是国家福利的政治。似乎可以说,所有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必然会进行干预,以保持经济的较平稳的发展,也必然会采取某些福利手段——简而言之,他们必须承担有关老百姓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基本责任。——假如这个政府要不断提高国家的生产率为权力的话。

### 富裕的政治

我们今天正在面临一次新的工业革命——自动化革命——的开端的激荡。其结果将会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充满着震荡,这就要求形成新的政治形式和功能以尽可能地减轻震荡的程度并处理其所带来的结果。我把这个政治发展的新阶段称之为“富裕的政治”。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完全进入这个阶段,但美国、西欧的最发达国家和共同体已经站在了这个阶段的入口处。

富裕是新技术带来的结果,如果计算机和自动调控的机器(以及经过改进的下一代产品)能得到广泛的应用,并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话,就可以获得这种结果。失业也是它所带来的结果之一,许多人担心,由于机器的大量使用,工人中的相当一部分,甚至其中的大部分会被机器所取代。这次革命的结果确实是很难想象的。

摆在面前的转型时期将会是异常困难的,因为在这一时期自动化会扩大它的范围,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大量的错位现象,强有力的既得利益者会充分地施加他们的影响,以阻止自动化的扩展,至少要对这种扩展加以控制,这很像旧的农业制度抵制工业化的扩展一样。但这些反对力量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如果人们展望一下未来,想象一下充分自动化的社会,就会推论出其政治和社会结构将会是什么样子,这是很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的范围是很大的,但富裕社会很可能具有如下特征:

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价格昂贵的机器的使用以及为使这些机器能有效运转而必需的有计划的生产将会促进大的垄断组织的发展,在这些垄断组织中,管理权将凌驾于劳动者的权力之上。

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经济权力的大量集中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调节的强化,甚至导致政府对经济的指导。在西方民主社会中,这也许并不会采取政府所有权的形式,而是形成大企业和大政府之间的互相高度认同和人事交流。

将会出现一个由少数计划精英领导的新的阶级结构,这些精英操纵着经济和政府,他们得到少数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支持。这些群体,以及其他的专业群体和受雇佣的工人将会与有闲的少数群体甚或多数群体形成对立,他们将得不到充分的工作,也许会成为新社会中的“下等阶级”。

在这个新的阶段上,政府的主要功能将是缓和社会重组的冲击,以确保自动化尽可能地实现,并促使自动化经济在政治上是负责任的。

自动化的到来将伤害许多人——小企业家、小农、参加工会的劳动者、职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减轻对这些人的伤害,并使这些人重新适应这个新社会,这也是政府需要做的。更重要的是,政府要为大量的失业者提供一些支持手段,这不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而且还在于,首先,确保他们不去推翻政府,其次,确保他们能够清楚那由自动化经济生产出来的不断增多的产品。我们也许还可以断定,国家政府将会扩大福利设施。

政府的第二种功能也是同样必需的,而且甚至是更难履行的,因为整个自动化的趋势将会使政治制度背离向人民负责的民主政治。今天存在的大众民主是以人民和国家的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但随着自动化的进程,政府将不再依赖于创造经济财富的人民大众。

但在另一方面,人民却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政府。这种单方面的依赖将不会促进公众对社会的控制。

但尽管如此,在这第四个阶段的国家政府仍会找到一些办法,以使高度集中的经济能在政治上负责任,即使不是向人民负责,至少也要向国家负责,因为不能允许如此集中的权力只为私人的目标服务。

事实也将会证明国家政府并不是完成这些任务的最好机构。自动化的工业要求要有保护性的国际市场,保护性的国际和平,自动化最终将会带来民族国家的消亡。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地区集团或以大洲为单位的集团也许是将来的政治组织的形式。

(孙立平 译)

M. 哈尔伯恩

## 政治发展的速度和代价\*

现在我们对于政治发展有5种或10种不同的理解恰恰证明了我们的落后。<sup>①</sup>这些理解方法有着各不相同,但都可以被证明的价值,不过这种价值就好比在仍然落后的社会中也能找到其政治发展的优点一样。问题在于,我们的分析模式至此还没能够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怎样从根本上使一场革命成为必要。我的观点是标志着现代化革命的变化要彻底得多,而且这种政治发展所涉及的变化速度也要比我们通常在分析或行动中所意识到的要快得多。因此我的结论是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很可能会目睹极其可观的政治发展。<sup>②</sup>

### 现代化革命的本质

寻找在现代时期能指导变化速度和道路的能力不仅仅只要求

---

\* 选自 W. 莫尔和 R. 库克主编的《社会变迁读本》。

① 对政治发展的分析可参看 Lucian W. Pye 的论文(《美国政治社会科学院年鉴》358期,1965年3月)以及 Robert A. Packenham 的“政治发展研究方法”(刊于《世界政治》18期,1964年10月,108—120页)。

② 这篇论文反映了作者对现代化革命理论的主要探讨,这一研究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研究中心赞助下进行的。

对个别制度和过程进行改变或扩展。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变化”或“发展”都可以以递增方式发生，但现代化不会。变得摩登并不简单意味着几何意义上的快速地在已有的东西上获得增长——得到更多控制人和思想的权力，办事效率更高，办事更牢靠，使更多的人得到更大的利益。这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后意识形态对现代化的构想。因此至少必须把它看作是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关于政治发展的目标，如果说它不是我们的全部理想的话。但这样的描绘还没有对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及其代价作出分析。而且如果将这种构想当作我们行动的指导，正如我们常做的那样，那将会把人引入歧途。以为一个现代政体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更大程度地去满足对于多而好的不同表现的更多需求，而且仅仅是在某些特殊领域，就是与正在进行的和还很必要的革命走岔了路。现代化并不像扩大和提高那样简单；现代化运动也不是沿着别的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去走一条更直更宽的康庄大路。相反，现代化革命涉及改革——改革人类借之以管理社会的所有体系，也就是政治、社会、经济、智力、宗教和心理体制。

改革并不意味着要在一切方面与过去决裂。相反，许多构成前现代体制的要素和联系将继续保存下来，而且很可能要延续到未来。改革所引起的变化比完全毁掉过去要微妙得多、困难得多，但并不是不彻底。假如现代化需要社会有意志力持续不断地保存其能力，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现代化革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改革着传统体系，不论人们愿不愿意如此。这种能力在鳞翅目动物由毛虫到蝶蛹再到蝴蝶的连续转化过程中是逐渐丧失的。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儿子们也不再能充当与外部世界的主要交易集合单位。感谢他们之间缺乏联系的不同观点，或单看其数量，他们已不再希望能作为一个整体在其社会的传统模式中找到一个位置。他们既不能被包含在这个社会的准则中，也不能被包含在这个社会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政治中。当以现代工薪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来自军队、官僚体制和公司的新兴精英人士掌权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个

人成功并不能带来稳定。为了维护他们的地位、权利和成功,第一次他们必须创立制度来调动整个国家,在意识和物质上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那些希望避免变成现代化革命的受害者、希望避免成为不受控制的社会变化力量的受害者的人们,需要自己有意识地去组织现代化革命。

而现代化革命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是人类对稳定进行重新定价的首场革命——也就是说,社会需要一种持久的能力以引发和承受连续的改革。这种能力同时代表着一旦传统体制的重要因素和联系停止作用时,将稳定和变化合二为一的最小和最大需求。为改革保存这样一种能力就构成了独一无二的现代机会——这是许多精英所想往的——以及独一无二的现代要求——这是许多精英可能无法满足的;而这种机会和要求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获得基本革命的成功是必要的。对比之下,传统的社会没有不断面临制度改革的要求。当它们通常在几个世纪之后遭遇到这样一种特别的挑战时,它们只能通过解体或创造一个新的封闭制度来解决。

现代化要求所有的社会制度具有科学界已有的一种能力:在对新问题、新情况和不完整的解决办法的挑战作出回答的过程中,一种不断坚持的能力,能对已有理论体系进行发展、维持、改变和瓦解。这样的科学革命,即使在最佳情况下也是不连续的、充满分歧的,并包含着相当的间歇期对现存体系进行完善和扩展,这使得科学革命成为现代化革命具有标志性的特例。<sup>①</sup>

为了从与现代化革命的关系上来理解任何政治制度,我们需要了解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于一个社会多个体系之间的不平衡性——例如人口与资源之间的不协调,受过教育的人与能提供给他们的工作之间的矛盾,现代问题和用于理解它们的相关理论之间的差异——以及一个社会改变这些不平衡现象的意志。

---

<sup>①</sup> 参看 Thomas S. Kuhn 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于1962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和能力,这样社会才能引发和承受连续不断的改革。最重要的问题是是否某个特殊政策或事件会使整个制度的改革过程变得容易,或者在社会某个体系与其他体系关系上的改革过程变得容易,以及这需要怎样的代价。<sup>①</sup>

### 变化的速度所造成的不平衡性

如果这些就是政治发展的任务,大多数国家有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至少在本世纪内。因此本论文余下的部分将着重探讨这些失败的原因和对失败可采取的种种不同反应。

在失败的原因中有三个是如此明显,只需指出即可:知识太少、人数太多、过高过早的期望太多。但倘若用一种较陌生的眼光来评价它们对现代化革命的不稳定性影响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像主要社会力量之间在变化速度中迅速产生的不断增长的不平衡性。

没有一个在本世纪经历过最剧烈社会改革的国家,像苏联、中国、土耳其、埃及、以色列、突尼斯、德国、美国,被用作实例以提供我们一种社会变化理论,这种理论基于对必须面对的不平衡现象的考察,以及对形成目前状况的临时政策、计划、代价和被否决的措施的考察。再也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意识不到在世界范围内缺乏一种理解和控制制度化改变过程的完整理论。一种我们的行为和知识之间的差距也从未这样迅速增长过,因为这种差距正影响着—一个内部联系正日益加强的社会。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么多生命的质量要依赖于一个好理论的情况。

尽管在地球历史上有近99.999%都是没有人居住的时期,但

---

<sup>①</sup> 我对这其中一些仍是尝试性的观点在“对国内国际社会现代化革命的说明”一文中进行了扩展。在这之前的一些材料来源于我的另一篇文章“走向进一步的现代化”(《世界政治》18期,1964年10月,157—181页)。

这已经不是人类第一次凭借超凡的意志力来挑起严重的危机,要战胜外部世界,代代繁衍、生生不息。所不同的是在迅速增长的力量之间出现了迅速增长的差距——有更多后传统的人在不断增长的不满中寻找着更多的新目标,因为这些目标不可能由大多数观望的人们去实现。

在伊朗,中东最富足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如今找不到工作。由于缺乏足够的位置,四分之三申请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已在遭受被拒绝的命运。这必然会增加后传统社会求知和求职的压力,而这就使得三分之二没受过基础教育的伊朗儿童被迫处于流动的生活中。如果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成功的话,预计那时候会有比刚开始经济重建时更多的失业人数。这些是说明实际“发展”与所要求的改革之间存在差距的典型例子。P. N. Rosenstein-Rodan 曾这样估计,假如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获得它们在经济上能有效吸收和利用的所有援助,加上它们本身的存储资金,它们的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在25年后从140美元增长到196美元。到那时,美国的人均收入会至少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平均值高20倍。这些大多数国家获得这样小的收益却要花费很大的代价,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在使一支新的发展力量稳定下来之前必然是动荡的,而这又是由于投资不可能具有创造性,甚至不可能安全保险,除非旧的习惯、旧的价值和制度被改革并代之以新的东西。然而每年约200美元的个人股份从相对意义和绝对意义上都达不到如今的期望,而且也不能提供足够的经济力量来克服由现代化革命不受控制的力量所造成的不平衡现象。

关键性的变化速度不是经济生产的增长,也不是文化程度、制度专业化或效率的提高——不论是单独还是把它们作为群体来看。关键性的速度是人类赖以组织社会的各个体系获得一种能力的速度,这种能力足以克服不平衡现象并能永久性地指导现代化革命。因此权力、利润和团结并不是一个国家最终达到目的的标志,而是表明这个国家终于拥有了与改革的持续力量相呼应的手

段。

因此现代化的代价随着时间而增大：这是另外一个阻挠控制这场革命的能力的变化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嘴巴能立即消耗掉更大比例的经济成果；更多的人会脱离传统的环境去提出新的要求；更多起初只是作为特殊转折时期临时调整的兴趣和态度会稳固起来，日趋条理化，并保护自己不受改革变化的威胁；牺牲自己、不计得失的心甘情愿减少了；参加世界市场竞争的主要设备变得更加昂贵，而且仅靠当地人才也更难以维修；与更发达的国家相比，差距变得越发明显，令人痛心；长期郁积起来的挫败感可能会突然剧烈爆发，从而加重了压抑和退却的心态；易受外界干预影响的脆弱状态加剧；在自由方面，稳定 and 变化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尽管我有点怀疑，但是在这些压力下，大多数人可能会仍然对政治保持一种被动的态度。这还不是政治上最主要的一个事实。那些标志着有计划的现代化革命的开端的政变在20世纪大多数例子中所涉及的人都不及50人。不论支持者是包括军队还是参与的政党由工薪（或将成为工薪）的中产阶级成员领导，或包括高级职业人士、学生、工人或农民，这些支持者很少在与社会上其他人的比例中占到大多数，也很少作长期斗争而获得胜利。在社会上的少数人还没有经过反复考虑，感到提高变化速度是非做不可的一件事之前，现代化革命的不受控制的力量不需要让社会上每个人都感觉到。

这一任务之重大是对具体行动的促进。一个国家不能被建造在无成效的若干和褊狭的忠诚上，不能被建造在人民的悲惨境遇上，并且还认为这种痛苦是可补救的不公正状况。摩洛哥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一直稳定地维持在50美元左右；他们大多数都是文盲；1960年的旱灾使他们损失了一半的收成；到目前为止政府几乎没有采取行动对农业实行现代化。一位摩洛哥反对党领导人最近说：“农业革命在西欧花了两个世纪的时间，在苏联造成了800万人死

亡。我们不想等待这样长的时间,也不想采取如此野蛮的行动。”<sup>①</sup>对迅速发展的同一种推动力因此不必是有目的的政治积极性的结果,而是其缺乏的结果。在伊朗,国王将大多数土地交给了农民,但出于对工薪中产阶级的忠诚的怀疑,忽略了合作社、信贷社、训练机构等组织,政治运动就会无可避免地要求领导阶级由新的受过教育的工薪族来担当。结果农民不可能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还会失去土地落入高利贷者的手中,在这种新的失望中,于是城市、乡村的不满情绪大大增加。

如果实行现代化的少数人感到希望破灭,其不足不能被归因于他们要求得太多。而是他们做不到别人已表明凭其意志和能力(或者凭在别人的帮助下获得的能力)所能办到的事情。一旦全世界都意识到了少数几个国家现代化的成功,那么谴责那些刚刚开始的人为乌托邦不仅在政治上无用,理性上也是没有根据的。

### 意识形态作为现代化的工具

为了克服社会指导变化的能力之不足,并缩短自己与更现代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政治领导者需要一种意识形态。<sup>②</sup>然而,至少有三个常见的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这常常成为钻空子的依据。意识形态可以替代传统的宗教,而且它像神话、神秘用语、宗教仪式和药膏一样,可以成为官方为人民大众生产的鸦片。意识形态也可以成为政治教条,使某一特殊时期被冻结在片面的观念中。(甚至连实用主义也可能成为政治教条,如果它拒绝全面看问题,而是仅

---

<sup>①</sup> Mehdi ben Barka 语,引自 I. William Zartman 的《新力量的问题:摩洛哥》(纽约 Atherton 出版社,118页)。

<sup>②</sup> 本论文剩下部分的思想在参加1964年11月由宾夕法尼亚大学主办的政治发展大会的过程中得以进一步明朗。我要感谢的讨论组成员包括 A. U. Ahmed, A. Burks, T. Davy, H. Glickman, F. Haviland, D. Smith, A. Smithies, H. Teune, R. Andrews, D. Kciner, B. L. Maheshwari, B. McAfee 和 D. Williams。但他们与我文中具体的提法无关。

仅抓住个别经历不放的话。)意识形态还可以被看作是通常使人误解的对精英统治权利的合理化。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常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这两个概念对现代化没有作用,但和前三个一样,它们对于维持一种制度比改革一种制度具有更为密切的关系。意识形态在任何特定时期都可被看作信仰和价值观的不明确模式。或者意识形态可被定义为理想模式的明确表达,尽管在与现代化任务的对比中还仅仅表现了大多数现有意识形态的不完全性。

第六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是意识形态作为现代化的工具。这样的意识形态以社会变化理论为其根本,是方法和目的明确框架,它能够激发着重政策方面的分析,激励具体行动,建立起规范的和实际的成果检验标准。它作为工具的目的是帮助尽快创立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来取代正在解体的传统生活方式。它也是用来激发对个人和社会进行新的定位,并刺激与现代化相关的新行为模式的形成。

### 失败与成功不同代价

就政治现代化所需的这个意识形态概念,有人或许会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或以谨慎小心的态度提出反对意见。观察表明,世界上许多政治领导者只关心通过中间商获得的短期收益或对现有股份进行令人反感的积聚。谨慎也可能会促使面临萧条时期的政治家们致力于改变目的去适应现有手段。然而,对这种时尚的满足就是现代化的失败;若考虑到已经讨论过的不受控制的变化速度,这甚至是在保存现有权力或稳定上的失败。

然而,上面这种疑问也许是对的。世界上最主要的不足之一仍然是致力于制度改革的领导人、思想体系和理论的缺乏。所以有人要问:避免现代化可选择的方式是什么?两种选择已经成为完全不可能。想退回到新意识、新要求和新的变化力量形成之前的时代已不再可能。在这样的压力下,想保持稳定、维持状态也不再可能,

除非付出更大的代价。然而以各种方式在政治上“改变”或“发展”，而不必获得持久的能力去激发和承受连续的改革却是可能的。

国家可以选择尽可能地长期维持传统的行为、方针和法律，把它们作为不断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中具有稳定性的组成部分，例如日本工厂的家长政治。然而不是所有的传统社会都具有这种可利用的因素，而且即使在日本和印度，这种成分化也已要求付出一定的代价，并且不可能以其目前的胶着形式长期维持下去。

第二种选择所涉及的不是维持，而是个别传统因素以新形式重新恢复活力。其中一种形式，就像工业化初期的英国卫理会福音传道的发展一样，这种新形式的复活可能使人们脱离对政治的直接关注。然而即使在传统社会，这种向静态的转化也常常为以后的正义反抗准备了更深的感情和道德资助。在现代，不论是英国还是非洲分离基督教派别，这种转变通常来得更为确定，更为迅速。

还有一种不同形式，也就是第三种选择，重新恢复活力的传统因素可能在制度化的恐惧中试图在同现代化激烈而预定会失败的斗争中重新找到个别教条以及与过去的联系。

第四种可能的选择可以看作是对 M. 列维将政治作为娱乐的概念所进行的扩充：也就是官方对私人享乐主义的鼓励。除了马戏、展示以及局限于远足和有惊无险的战争之外，这一模式可由几乎不需要组织投资和资本投资的小团体进行实践。

与享乐主义相反——禁欲主义这种选择恐怕是在严重缺乏时期进行若干的最明显例证了。但同样明显的是，在当今世界，没有一种选择比它更不受欢迎。即使是在清教徒的后代中，或是在最近代的清教徒，情况也都如此。只有当今中国是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例子。在不断增长的负担和对当今世界严重不足情况的强化意识下，中国可能是主动实行计划生育的首例，但并非长期的唯一最好例子。难道中国知道怎样对其准则和习惯作出被迫牺牲吗？当这些东西对满足政府的某些特别期望是必需时？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可能发展一种禁欲主义，它能再一次改变一个民族对时间无价

的看法？

另外一种选择是心甘情愿地容忍没解决的问题、不确定的事情，甚至挫败；容忍温和的期待，以及为了秩序原因而保持默然，目的是去满足政治上更为至关重要的社会部门。这也许是极端中心的人士会鼓吹的完美的不完善论。它可能在世界上较舒适的地方会显得更易让人接受。

还有一种古代的选择：入侵外国以压制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在现在的国际条件下，除了彼此间有规模控制的局部战争外，大多数国家是不让相互宣战的。在以后，另一种形式的侵犯活动会变得更加普遍：暗杀和在国外进行破坏活动。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越高，它就越容易受到对其管理者、机器和通讯的有选择的破坏。如果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继续拉大，同时后者能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显得越发明显，那么这种国际间的战事就不可能被遏止，不论这种战事是有组织的还是由于不恰当的政策自发产生的。

还有最后一个选择可供讨论。它涉及到对待现代化不仅只是一个国家，也包括整个国际能力的改革。我对大多数国家能在无援助的情况下实行现代化表示怀疑，除非它们在自由和苦难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当然，许多国家会持续“发展”——假如我们所关心的只是一些数量上的变化，而与一个社会最终能否完成改革的能力无关。现代化的代价比这些“发展”的代价大得多。担当现代化重任的一国领导阶层不可能说服其人民放弃这个追求，假如失败的决定性原因在于用来解决只有通过国际才能解决的问题的国际系统的落后。没有理由认为世界上较穷的国家就缺乏精明与力量，而是要让现代时期每个国家的穷人更有效地向富人提出他们的迫切要求。

为了满足现代化革命的这个要求，也需要美国做出某些改革。就像对大多数国家一样，这将意味着我们也要远离非道德范畴内家庭主义的阻碍作用。这一点在 Edward C. Banfield 剖析意大利南

部情况时曾被提及,但他在更近的一篇文章中又支持美国,否认在我们国界以外的任何社会群体在道德和政治方面对我们可提出任何要求。<sup>①</sup>这会要求我们对更多的国家给予更多的援助——不只是像现在这样,将我们提供的80%的援助给予20个国家——而是将援助中更多的部分用来为更多的国家提高他们政治的激发和承受能力,不是仅仅提高其经济承受能力。<sup>②</sup>这就意味着放弃我们习以为常的短期实用主义,而要按照对现代化革命所固有的力量和趋势的理论预测来采取相应的行动,或许这对我们目前在外表强硬的外交关系和地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一种冒险。我们将不得不对给予更多援助表示出更强的愿望,并更彻底地参与别国在不吸引人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历史性改革——举例说明这种不吸引人的条件:当领导就职时,变化速度已经引起了社会不平衡现象的恶化,而他们也就不因此被迫动用更多的权力,并表现出我们现在还接受不了的悲观失望情绪。

在未知的将来,也可能会对人类的观念、判断呈现出希望,或人类有希望随时根据创造现代稳定所付出的革命代价采取相应措施。但是在有所预示的最近时期内,最强的表现是政治发展的悲观倾向。

(徐春耘 译)

---

① 前面参考了 Edward C. Banfield 的《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195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后面参看“美国外援政策”(《公共政策》,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64—105页)。

② 在1964年财政年收到我国总共80%经济援助的20个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巴西、越南、朝鲜、哥伦比亚、尼日利亚、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刚果、约旦、玻利维亚、苏丹、秘鲁、老挝、阿富汗、伊朗和突尼斯(David Bell 记录,美国参议院1963年6月26日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577页)。

J. 西格利 M. 波顿

## 民主过渡与受挫中的精英变项\*

过去10年中出乎人们预料的向民主转变的潮流,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南欧,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力。尽管这些新的学术成果有相当的价值,但并不能为人们判断新的民主政体的生存前景提供一种坚实的理论基础。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民主过渡的先兆和过程上,而回避了预测的任务。与60和70年代相比,今天的比较政治社会学并没有朝向形成一种可靠的有关稳定的民主制度的理论方面前进了多少,在60和70年代的时候,许多人们公认的稳定民主政体被专制主义的浪潮席卷而去,而对这次浪潮,人们也没有从理论上预见到。

但尽管如此,在考察稳定的民主政体的决定因素时,学者们的因果逻辑还是发生了变化,即从社会结构因素转向政治因素,主要概念就是强有力的行动者或精英们的行为。这种新的侧重点又引出了一大堆含糊不清的因素。有的学者认为,向民主过渡和民主的崩溃是在历史上精英们偶然所做的选择的产物。因此,这种侧重点的转变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如果不能对这种因果逻辑做进一步的澄清,就会走入死胡同。精英这个概念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将精英的选择看作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这对理论的进步是一个严

---

\* 选自《美国社会学评论》第54卷(1989)。

重的障碍。

我们想从这些以及有关的困境中寻找一条出路。简而言之,我们认为,研究国家精英内部关系中的连续性与变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向民主的转变和民主的崩溃。一种不团结的国家精英会形成一系列介乎于独裁与民主之间的不稳定政体,而这种精英类型是最常见的。如果经济及其他必需的条件允许,共识型团结精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政体,这种政体可能会向现代民主政体演变,但这种类型的精英在历史上是很少的,瑞典、英国和美国即属这一类型。除非在政体变化之前有或伴随着精英的改造,否则这些政体就会是短命的——这种精英改造在向民主转变的情况下是指从不团结型精英转向共识团结型精英,在民主崩溃的情况下则是指从共识团结型精英转向不团结型精英。但是这种精英转变是很少发生的。每一种国家精英类型一旦形成,就很难发生变化,在历史上的欧洲和拉美以及在今天的拉美和非西方国家中,由不团结型精英所建立的共体是广泛存在的。人们称之为向民主转变或民主崩溃的许多政体都可以看作是由精英的持续的不团结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政体不稳定造成的。正是由于看不到这一点,有些学者过分夸大了这种转变和崩溃的长远影响,并不想解释在一种政体后面会紧随另一种相反的政体这种现象。

我们的看法并不是一种新的思想。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国家精英的团结是政体形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这种思想并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不团结型国家精英和共识团结型国家精英的概念都没有加以清楚的界定,其起源和延续性基本上没有加以考察,对其内部组织对政体形式的影响也没有较深入的了解。

在下面的几部分中,我们将以对这些问题的澄清为开端,勾画出一个基本的理论轮廓。接着我们将回顾一下大约1500年以来西方所发生的主要政治变迁,以对我们的理论观点进行检验。我们要证明的是,精英不团结与政体不稳定相联系的情况,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都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普遍。我们的结论将表明,我们

的分析将为有关民主过渡与崩溃的讨论增加一些什么新的内容。

## 一、精英变项及其对政体的影响之界定

我们首先将澄清一下我们的参照框架,并对有关概念加以组织。我们的分析单位是独立的、有牢固地域基础的民族国家,这种民族国家是一种有较为明确的边界将治安和税收等基本事物加以集中的政治实体。我们的主要兴趣就是想说明精英内部的相互关系是如何影响政体的稳定性的。虽然我们也认为有时战争会使精英与政体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虽然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也会对政治产生毋庸置疑的重要影响,但我们认为国际经济力量并不能决定精英与政体的关系。最后,我们还认为,国家内部的以地区为基础的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冲突会影响到精英与政体的关系,从而要求一些不同的概念和模式,但这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矛盾。

按照这种参照框架,我们将精英看作是那些能用一种稳定的方式影响国家的政治局面的人,他们的影响力则是来自于在强有力的组织和运动中所处的权威性地位。学者们一般都承认,精英是指一个社会中最强大、资源最丰富的政治、行政、经济、军事、职业、传播或文化组织与运动中的领导人。我们认为,政体则是政府决策权的组织形式和操作与转移的模式。不同的政体之间存在多方面的差别,但我们这里所强调的则是稳定的政体与不稳定的政体间的区别。

研究国家精英的学者们一般将精英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多元的”或“共识团结”型精英,主要存在于今天的许多西方国家以及历史上的某些西方国家;(2)“意识形态团结”型精英,主要存在于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神权政治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中;(3)“分裂的”或“不团结”型精英,存在于过去和当代的许多民族国家之中。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共识团结型与不团结型两类国

家精英,因为对他们的差异及其变化趋势的认识,可以加深我们对民主转变和民主崩溃的分析。

共识团结型精英是指其成员:(1)对政治行为的规范和规则有一种不约而同的共识,这相当于形成一种“有约束的伙伴关系”;(2)不同程度地参与整合性的互动结构,这就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可靠而有效的渠道,使他们可以互相接触,并能与中心决策者发生接触。这两个方面结合到一起,就使得他们将决策的结果看作是“总和为正数”(positive-sum)的游戏,将“政治看作是一种讨价还价”,而不是将决策看作是“总和为零”的游戏,不是将“政治看作是一场战争”。由于在政治游戏的规则上存在共识,并且接近决策的通道是有保障的,那么不同的、异质性的成员就有可能接受各种各样的决策,尽管这些决策自己并不特别喜欢,因为他们期望在自己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其他问题上对方会做出让步。久而久之,下部分精英会形成他们的基本目标,并倾向于将各种决策的总的结果看作是“总和为正数”的。

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那些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持反对意见的个人和派系要克制自己,不将这些分歧激化到发生暴力冲突的地步。典型的精英个人都有很强的安全感,他们不会由于放弃了某一种看法而被杀害、受到囚禁或其他惩罚。紧接着的就是,一旦这种类型的精英形成了,由一个或另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派别用强力占有政府权力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因此,对国家精英及政治制度中<sup>①</sup>不同派系的不同甚或时常对立的利益,将按代议制民主的形式来加以调适和处理,尽管代议制民主的实施程度还有赖于其他的可以利用的条件。

相反,不团结型国家精英则是指其成员:(1)对政治行为的性质很少或根本没有共同的想法;(2)在不同的派系与部分之间只有

---

<sup>①</sup> G. 萨特里《民主理论再评价》第一卷《当代的争论》,占松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29页。

有限的、偶尔发生的互动。精英个人有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他们凭经验产生一种恐惧感,即如果对方占了上风,自己的一切都会失去。因此,不团结型精英往往采取极端手段以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利益,如暗杀、囚禁或驱逐对手,煽动反对占上风的对手的叛乱,剥夺对手的资源等。在精英不团结的情况下,这些行为往往是最有效的。对对手采取的这种惩罚性行为以及对对方将来也可能采取这种行为的担心,会进一步强化不团结型国家精英成员的恐惧和不安全感。由于这种恐惧和不安全感是如此之深,以至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精英的不团结才能得到克服。

我们对不团结型国家精英所做的综合性经验研究是很少的。精英成员很少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提供合作,因为他们怕对自己不利。一直从事不团结型精英研究的人往往要冒很大的风险。麦克多纳夫曾于1972—1973年对巴西的国家精英进行过调查,但调查对象并不包括控制着政府的军事精英,因为他们拒绝合作。麦克多纳夫将巴西精英划分为军人、行政精英、经济精英、教会精英、城市工会精英,他们的政治规范有霄壤之别,而且是互相孤立的。<sup>①</sup>布朗曾对本世纪60年代法国的精英群体进行过有限的研究——当时正是由于冲突导致第四共和国结束并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引起精英内部冲突的几年以后,他的结论是,法国精英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对国家的最基本的政治制度缺少一致的看法”,而且在主要的精英派系间缺少个人接触。<sup>②</sup>桑菲尔德也用同样的方式对70年代早期的法国精英进行过研究,发现在主要派系的成员内部存在着广泛的个人联系,但在不同的派系之间却缺少这种联系。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派别都蔑视和漠视其他派别。<sup>③</sup>卡德诺夫斯基也按同样

① P. 麦克多纳夫《巴西的权力与意识形态》,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B. 布朗《法国的精英态度与政治合法性》,《政治学杂志》,第31卷,第420—442页。

③ W. 桑菲尔德《社会主义与戴高乐派精英的封闭世界》,收入霍沃斯等编《法国的精英》一书,伦敦,1981年版。

的思路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精英进行过有限的研究,他发现,他不得不设立出一套很复杂的研究策略,以避免引起被研究者间互相的恐惧和敌意。<sup>①</sup>

国家精英不团结的根源似乎是存在于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在原来的分离的、部分自治的领域上建立起一个民族国家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暴力和冲突过程,这个过程会涉及到一些精英群体对另一些精英群体的镇压,因此深刻的、持续不断的精英不团结就是不可避免的。本迪克对西方和日本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就足以证明,无论在什么地方,巩固民族国家的措施都会引起精英的不团结。在19世纪初,当拉丁美洲从西班牙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为了民族国家的形成,不得不再次用武力对地方精英进行镇压。对60和70年代黑非洲和许多其他新兴国家在殖民地时代结束后出现的一些很类似的现象,约翰逊曾做出过生动的解释。<sup>②</sup>

因此,历史资料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精英不团结产生于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换言之,不团结是国家精英的普遍性的特点。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是例外。第一种情况是,在较为仁慈的殖民主义之下有较长的由本国人进行统治的经历,或是在政治上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民族独立运动,这有时会在民族独立实现后形成共识团结型国家精英。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大英帝国的一些海外分枝即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有些国家在战争中被打败,或被占领,在其获得独立后,可能会形成共识团结型精英,因为许多对立的派别已在此前被消灭,如二战期间及战后的奥地利。但尽管有这些例外,历史资料还是强有力地表明,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总会导致民族精英的不团结。

精英不团结在政治上导致的主要结果就是政体的不稳定。政

---

① M. 卡德诺夫斯基《台湾政治精英访谈》,收入莫叶等编《精英研究的方法》,伦敦,1987年版。

② P. 约翰逊《现时代:从20年到80年代的世界》,纽约,1983年版。

体不稳定有不同的含义。桑多斯指出了其中的三种含义：(1)以叛乱、骚乱、罢工、民众示威和个人行为为形式的政治暴力的不断发生；(2)统治联盟和内阁组成部分的频繁变化；(3)政变或用其他形式推翻政府的事情经常发生。<sup>①</sup>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前两种意义并不足以对政治不稳定做出明确的界定，因为如果到一段历史时间里来看，几乎所有的政体都是不稳定的。只有第三层含义才能将不稳定政体明确区分出来，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有意义的。因此，如果一个政体的行政权力被某些力量用不规则的强力手段夺取，或企图夺取，或人们广泛期望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政体是不稳定的。政体不稳定的具体指标就是以改变对政府行政权力的控制为目标的革命、起义或政变。一旦某些不稳定的指标形成了，无论一个政体是“民主的”还是“极权的”，其发挥作用的模式都将发生变化。

用不规则的、强力的手段夺取权力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而且也易于观察，以致研究者很容易据此判断一个政体是否稳定。有些学者发现，玻利维亚从1825年独立以后，发生了大约186次用不规则的方式夺取政府权力的事情。在1920—1966年间，18个拉美国家中发生了80次成功的军事政变。在1963—1968年间，黑非洲国家中发生了64次用不规则的方式夺取权力的事件。在1970—1984年间，16个热带非洲中发生了16次政变。同样，研究政体问题的学者也不难发现用不规则的方式夺取权力的欲望。

但有时候也出现这样的情形，即在有些政体中，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并没有发生用不规则的方式夺取权力的事情或企图，甚至连这种可能性都不存在。从1904年内战到1973年政变前的乌拉圭是一个例子。从1932年伊本尼茨独裁统治被推翻到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前的智利也是一个例子。持续时间很长的(1875—1940)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也是这种情况。许多学者和决策者都错误地将这些

<sup>①</sup> D. 桑德斯《政治不稳定的模式》，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1年版。

政体看作是稳定的。

出现这些不准确评价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看到精英不团结这一根本性的条件。虽然精英和政体是密不可分的,但在分析时可以将民族精英的基本结构与政体的特征区分开,从而使人们可以找到精英与政体间的因果关系,在这种因果关系中,精英结构先于政体的稳定性。这就可以形成一个命题,即为了使民主过渡能持续进行下去,民族精英必须首先从不团结型转变为共识团结型。简而言之,在分析政体变迁的时候,研究者应该集中研究精英结构,并寻找有关精英改造的现实与历史的证据。如果找不到这种证据,分析者就可以假定,精英仍是不团结的,政体仍然是不稳定的。

这种结论假定我们已经知道从不团结到共识型团结这种精英改造意味着什么,以及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这种改造才可能发生。遗憾的是,政治社会学家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我们最近分析了精英改造中的一种类型,即“精英和解”,在精英和解的过程中,互相冲突的精英派系通过就他们的基本分歧进行商谈而突然且慎重地重新组织他们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形成共识型团结,从而为稳定的民主政体奠基础。<sup>①</sup>典型的精英和解过程可以1688—1689年的英国、1808—1809年的瑞典、本世纪50年代后期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为例。我们觉得从不团结到共识型团结的另一种改造形式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其中的某些对立的派系在选举过程中进行持续不断的、心平气和的合作,以赢得选民的多数,他们不断在选举中获胜,并通过支配政府中的行政权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第二步,反对这个联盟的主要敌对派别由于在选举中一再败北而感到疲倦了,而且似乎也找不到别的方法来获取政府的权力,这样他们就可能会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与政策立场,采纳已获胜的联盟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随着这种变化、共识团结型民族精英形成了,稳定的民主政体也就建立了。这样的例子包括过去的1/4世

<sup>①</sup> 波顿和西格利《精英和解》,《美国社会学评论》,1987年,第52卷,第295—307页。

纪的法国和意大利,他们都形成了以右派为中心的联盟,如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然后再加上一些小的派别。这些联盟在选举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并迫使法国社会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为有效地进行竞选而软化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计划。

至此,我们可以大体确定精英和解和“两步”精英改造是实现从不团结型民族精英向共识团结型民族精英转变的必由之路。这也是不稳定的民主政体转向稳定民主政体的内在条件。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种改造是很少发生的。反过来看,从共识型团结转为不团结的情况就更少。至少到目前为止,共识团结型民族精英一旦形成,就很少发生变化。

从共识团结型精英到不团结精英这种变化很少发生这一事实,对我们分析民主崩溃是有意义的。人们对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发生的民主崩溃进行了许多讨论,而所有这些崩溃都是发生在民族国家形成时精英们就明显不团结的民族国家中,如1871年后的德国精英。欧洲在两次大战间民主崩溃不过是更广泛的精英不团结和政体不稳定模式中的一个插曲。由共识团结型精英转为不团结型精英,从而政体由稳定变为不稳定的情况,近年来似乎在菲律宾发生过,在这个国家,从1946年美国的殖民监护结束到80年代几次军事叛乱中达到的精英冲突发生前,有许多指标表明其民族精英中存在着共识型团结,民主政府也是稳定的。

虽然精英改造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大众变项也是重要的。精英总需要得到大众的支持。大众的状况及取向设定了机会与限制,精英们必须对之做出反应。比如,只有在大多数选民依据自己的社会经济及其它条件支持主张维护现状的精英的地方,“两步”精英改造才可能出现。但正如在下面我们将要表明的,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大众状况会必然地导致精英改造。尽管在近代史上大众的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西方近代政治模式却曾经是持续不断的精英不团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政体不稳定。我们现在就概括地对这个模式做一描述。

## 二、西方政治的模式

在从1500年到拿破仑战争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8个西方国家实现了政治独立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这8个国家是丹麦、英格兰、法国、葡萄牙、俄国、苏格兰、西班牙和瑞典(见表一)。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段,按照在领域中政治的巩固来说,可能只有英格兰完全达到了民族国家的标准。丹麦正努力于对瑞典的控制;法国在17世纪末之前则周期性地陷入由宗教和社会问题引起的内战之中;葡萄牙曾于1580年到1640年间被西班牙所征服;在17世纪罗曼诺夫统治之前俄国并没有实现稳固的统治;在1650年之后,苏格兰并没有完全从英格兰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到1707年与英格兰合并,从此不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了;西班牙是属于一个联合王朝的几个国家中的一个,以后逐步获得自己的边界和行政权的集中。荷兰的联合省实际上是9个政治实体,它们于16世纪80年代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在其中的7个省中,从独立的时代开始便逐步形成共识团结型精英,但在拿破仑战争前,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民族国家。在整个18世纪,布兰登堡普鲁士作为欧洲的一个重要力量出现了,但它是由许多半自治性的互不接壤的地域实体构成的。最后,美国也是在这个时代接近结束时才作为一个巩固的民族国家出现的。

### 1. 作为民族精英一般属性的不团结

大约到1600年的时候,最初这8个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城市化和商业化都达到了这样的一种复杂程度,即许多精英所担任的职务都要求他们专职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虽然原来小规模的非闲阶级即有影响的贵族和绅士仍然继续存在,但实际上掌握决策执行权的人主要是能对最重要的科层组织发号施令的人和派别:君主与高级国家官员、老资格的军事官员、高级教职人员、掌握着重要的商业企业的商人和企业家以及地区政治实体的领导人。

表1 几个西方民族国家中民族精英的类型及起源

民族国家形成	精英类型	共识团结型精英的起源
英格兰(中世纪后期)	1689年前: 不团结型 1689—1988年: 共识团结型	精英和解: 1688—1689年
丹麦(中世纪后期)	1901年前: 不团结型 1935—1988年: 共识团结型	两步改造: 1901—1935年
苏格兰(中世纪后期)	1707年前: 不团结型	没有; 1707年与英格兰合并
葡萄牙(中世纪后期)	20世纪80年代之前: 不团结型	没有明确标志
西班牙(16世纪始)	1977年前: 不团结型 1979—1988年: 共识团结型	精英和解: 1977—1979年
瑞典(16世纪始)	1809年前: 不团结型 1809—1988年: 共识团结型	精英和解: 1808—1809年
俄国(17世纪始)	1917年前: 不团结型 1921—1988年: 意识形态团结型	没有; 革命改造: 1917—1921年
法国(17世纪后期)	1960年前: 不团结型 1981—1988年: 共识团结型	两步改造: 1960—1981年
美国(1789年始)	1789—1988年: 共识团结型	殖民时代的“内部统治”与独立斗争
荷兰(1813年始)	1813—1988年: 共识团结型	各省精英的融合
普鲁士(1815年或更早)	1871年前: 不团结型	没有; 1871年与德国合并
比利时(1830年始)	19世纪90年代前: 不团结型 1961—1988年: 共识团结型	两步改造: 1900—1961年
瑞士(1848年始)	1848—1988: 共识团结型	各州精英的融合
意大利(1870年始)	1948年前: 不团结型 1980—1988年: 共识团结型	两步改造: 1948—1980年
德国(1871年始)	1933年前: 不团结型 1933—1945年: 意识形态团结型 1966—1988年: 共识团结型	革命改造: 1933年 两步改造: 1948—1966年
挪威(1884年始)	1935—1988年: 共识团结型	两步改造: 1884—1935年
奥地利(1919年或更早)	1938年前: 不团结型 1948—1988年: 共识团结型	精英和解: 1945—1948年

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这些精英明显是不团结的,因为他们典型的关系就是为取得政治上的优势而进行广泛而尖锐的斗争。与君主或争夺王权的人相联系的精英派系倾向于支持王室的专制主义,而从地方自治中受益的派系则反对专制主义。他们为了扩张或和平而频繁地使用武力,而宗教的分裂则更使为建立国家和抵制建立国家而发生的精英冲突更进一步残酷和复杂化。

所有这些国家的政体都是传统君主制、政府行政权力都是按世袭的原则移交给后继者。由于对这种原则的具体应用缺少广泛一致的看法,行政权的移交总是充满阴谋、挑战和僭取,即使是这种权力移交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时候,精英之间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也会造成不断的抗衡、阴谋或其他剧烈的冲突,其目标则在于实现对君主的控制。

实际上,传统君主制本身就会造成精英的不团结。将权力集中于一人或一个派系之手的努力反映出对权力分享的安排缺少互相认同。按本迪克斯的观点来看,传统的君主制面临着一种无法解决的两难局面——因为皇权的集中与皇权的授予是互相矛盾的,而皇权在很大程度上是独断专行的,这就使得皇权的继替和移交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从而使皇权的作用范围和限制成为很不确定的因素——其结果就是导致政体的不稳定。<sup>①</sup>从这些基本的方面来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统君主制的维持都会强化民族精英的不团结。

## 2. 精英首次和解

在拿破仑战争之前,精英不团结与政体不稳定的关系只有在英格兰和瑞典才被打破了。在英格兰的1688—1689年的“光辉革命”中,以及在瑞典于1808—1809年创立立宪君主制的类似事件中,精英和解发生了,原来互相敌对的精英派别突然而慎重地将他们的关系由不团结变成共识型团结。这种精英和解的原因即在于

<sup>①</sup> R. 本迪克斯《国王还是人民》,加州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8—243页。

不久前发生的代价高昂而又无谓的精英冲突：英国的内战以及由克伦威尔的统治所造成的长达30年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的残酷混战；在整个18世纪的瑞典，则是礼帽派与便帽派的斗争。但戏剧性的政治危机导致了急剧的变化：1688年，詹姆斯二世的儿子出生了，这就出现了一种可能性，即由一个天主教徒来继承一个新教国家的王位；在瑞典则是在1808年惨败于俄国之手，同时经济处于严重混乱状态。而和解的获得则有赖于代表主要派系的少数富有经验和能力的领导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克制并进行秘密接触，他们很快就那些最有爆炸性的问题达成了妥协。而非精英人口则处于未被动员起来的状态，这使得精英们能有充分的自主权以达成妥协。

这种和解形成了新的分享权力的安排，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精英的不安全感。至此之后，大部分精英已经获得了接近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决策权的途径，对政策的抨击不再采取激烈的惩罚手段。在英国和瑞典的精英和解达成不久，一种慎重的、有约束的政治便出现了，定期进行竞选，最终由普选权的形成而导致了民主化，行政权由君主转移到向选民负责的内阁手中。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出现过一些严峻的政治挑战，如英国19世纪30年代的宪章运动以及19世纪末叶两个国家中均出现的激进劳工运动，但这些运动都没有打断依据公众投票的结果在不同的精英派系间权力的和平移交。

我们之所以要对英国和瑞典的精英和解进行描述，是因为在前工业社会中这是由不团结型精英和不稳定的政体向共识团结型精英和稳定的政体——即民主政体的雏形——转变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精英和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精英冲突就会持续下去，政体就仍然是不稳定的。如果考察一下拿破仑战争之前最早形成的其他西方国家，就不难得出这种结论：在那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出现像英国和瑞典那样的精英和解，在整个那个时代，其政体是明显不稳定的。

### 3. 其他地方精英不团结的持续

在丹麦,贵族精英与资产阶级精英间的斗争在1665年之后的王权专制主义时期达到顶峰。上百名地主与君主的联盟的统治持续了一个世纪,但在18世纪70—80年代的宫廷阴谋中被推翻,被用武力夺走了权力,这实际上是一次政变。在法国,在关于等级、特权以及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的观念上,朝廷、教会、军队以及城镇中的精英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极,即传统派与理性派。每一派的精英都有自己的护身符,但在1788—1789年时,革命爆发了。在葡萄牙,在1640年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不久,就发生了几次宫廷阴谋,并在1668年推翻了阿方索六世,正如在其他国家中的情况那样,对君主的专制主义权力的要求导致了不同派系间的连续冲突,他们都想控制君主的权力。

在俄国和西班牙,精英不团结也是显而易见的。在17世纪的俄国,专制主义的统治周期性地被起义所打断,而每次起义都被沙皇残酷地镇压下去。经过彼得大帝35年的“开明专制”统治之后,宫廷阴谋和军人干政使政体继续处于不稳定状态。本迪克斯注意到,在彼得大帝之后的18世纪中,8个君主中只有2个没有通过军事手段而获得皇位,而这两个沙皇后来都被杀害了。17世纪的西班牙先是被反对卡斯蒂里霸权的叛乱所左右,后是被想支配无能的查理二世贵族精英派系所支配。18世纪初,内战和地区性的叛乱导致了全国的分裂。1716年,国家重获统一,但其政治却很类似于法国——反动的贵族和教会官员与以国家官员和小资本家的领袖为代表的主张现代化的精英派别进行着连续不断的斗争。在这个世纪的末叶,西班牙处于另一个无能的国王查理四世的统治之下,宫廷的阴谋使西班牙惨败于法国之手,并由此引起了反对国王的起义,国王被迫退位,拿破仑将他的弟弟约瑟王推上了王位。

### 4. 19世纪的精英不团结

法国革命军和拿破仑军队发起的征服战争将许多小规模但又很危险的独立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公国合并在大规模的地域之中。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认定了这种变化了的格局,并重组了欧洲的政治地图。普鲁士作为一个重要的民族国家出现了,而松散结合在一起的哈布斯堡帝国则控制着意大利、东欧和巴尔干。19世纪60年代所发生的战争,普鲁士将哈布斯堡帝国从讲德语的地区驱逐出去,使其势力范围仅局限于奥地利本土,在1871年,普鲁士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在法国和普鲁士的帮助下,撒丁-皮埃蒙特王国开始扩张,并在1870年成为一个意大利民族国家。同时,一些更小的民族国家也形成了,如荷兰、比利时、瑞士和挪威。

在19世纪,这些国家追随英国、瑞典和丹麦,分别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实现了工业化,其人口的主要构成成分是手工业工人、官员和服务人员。工业职业的发展造就了新型的精英,他们控制着工会、群众性政党、新的商业企业、职业团体、大众传播组织、教育机构、公共事业机构以及由于国家的扩展而出现的其他组织。但在工业化的同时,并没有发生精英结构和政体特点的根本性变革。因此,除英国和瑞典之外,最早形成的其他欧洲民族国家中的精英仍是不团结的。如果说存在区别的话,那应该是指精英不团结的状况更为糟糕,其原因则是法国革命之后造成的震荡、新精英进入政治舞台以及由工业化造成的不同群体间的冲突。因此可以说,19世纪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到处都在引起精英的不团结。在1871年之后的普鲁士、比利时和德国以及1870年之后的意大利,对于新的民族国家所应依赖的宪法和制度,精英们的态度有着根本性的分歧,他们根据自己的狭隘的利益来决定自己对政府是保护还是颠覆。

只有瑞士和挪威的情况有些例外。在1848年的瑞典联邦建立之前,在几乎所有自治性的、地理上又互相隔离的州中,都存在共识团结型精英,这种精英形成于中世纪后期时的“公民社区”。1848年瑞士宪政的确立使这些州里的精英转变为共识团结型民族精英,从此之后,正是由他们来运作一种稳定的代议制政体。挪威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在1814年到1884年之间,挪威处于瑞典的控制

之下,但内部事务主要是由挪威精英来负责的,当时所形成的政体大体属于代议制政治的范畴。在1884年瑞典放弃对挪威的控制时,民族精英的两步改造过程便开始了。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派系动员起了大部分选民,在本世纪30年代放弃激进主义之前,两派有一种共同的态度,即将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系排挤出政府行政权力之外,30年代以后,共识型团结才终于形成。

但在19世纪欧洲的其他地方,精英的不团结则造成了政体形式的频繁的、剧烈的不稳定。在法国,1814—1815年中,传统的君主复辟了;在1830年的一次动乱中,设立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君主;在1848年的暴乱中,则建立了一个共和政体;1851年的政变建立了专制政体;在1870年镇压了巴黎公社起义之后,又建立了一个共和政体。西班牙也同样存在精英不团结和政体不稳定。匈牙利的情况也与之相类似。

在大部分其他的欧洲民族国家中,情况有所不同。在俄国、普鲁士和德国,保守的精英派系用镇压的方式来维护君主制。在这些国家以及丹麦、比利时和意大利,精英的不团结表现为精英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政体的不稳定则表现为君主政体中的宫廷阴谋以及大量的反叛、罢工以及由心怀不满的精英发动的其他形式的对抗。

#### 5. 不团结的精英与不稳定的民主

在19世纪结束的时候,除俄国之外的西方民族国家都建立了代议制的政治制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选举政治。由工业化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使占支配地位的精英能够暂时安抚持不同意见的精英及其追随者,但投票权只限于那些在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中有利害关系的人。因此,选举并没有马上成为导致精英间发生冲突并互相削弱的一个因素。在一段时间里,在一些欧洲民族国家中,尽管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精英改造,但稳定的民主政体似乎也出现了。

我们必须对这种情况做进一步的考察,因为这直接涉及到我

们的观点,即只有在精英中形成共识型团结的时候,民主政体才可能是稳定的。持续时间很长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可能成为一个明显的例外。在65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发生用强力夺取政府行政权力的事情,因而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较重要的现代民主政体。其他的例子情形包括从1870年到墨索里尼时代之前的意大利的君主立宪制、1912年到1930年的阿根廷政权、1905年到60年代后期的乌拉圭政权,以及1933年到1970年阿连德担任总统职务之间的智利政权。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些政府都是过渡性的,即使是其本身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紧接着的仍是精英不团结和政体的不稳定。我们可以通过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考验来说明这个结论。

从法国的历史看,虽然存在着某些有利于精英改造的条件,但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前、之中或之后不团结的精英却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团结。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占据议会大多数席位的君主派中的大多数人欣赏的是英式的君主立宪制,议会中的共和主义者也是相当温和的,其领袖就是梯也尔。因此,君主派和共和派是可以实现妥协的。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激进派处于慌乱之中。在这种环境之中,精英和解是可以实现的。但第三共和国的诞生所伴随的并不是精英和解而是精英对峙。不同的精英派系都在动员商人、教士、军人、文职人员和工人阶级。可以想象,用强力夺取政府权力的想法就成为法国政治的一个常见的特征。在19世纪80年代、在1898和1899年、在1933年、1936—1938年,曾几次出现政变的尝试。

对持续的精英不团结及其使民主政体不稳定的作用的分析也适用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大多数拉美民族国家。两战期间、希特勒上台之前的魏玛共和国和奥地利共和国也提供了清楚的因果关系的例证,同一时期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是如此。

这种模式是否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外,也许还有葡萄牙,所有上面讨论过的不稳定的欧洲国

家都经历了精英改造(见表1)。

### 6. 简要的概括

表1概括了作为我们的看法的基础的各种模式,我们的看法是,像美国那样由于特定的殖民地遗产,像瑞士那样由于特定的历史与地理环境,精英的不团结和政体的不稳定是广而持续地存在的。鉴于精英的不团结是起源于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上表也表明了我们的这样一种看法,即在三种精英改造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发生之前,精英不团结和政体不稳定的关系都会持续下去。这三种精英改造的形式是:(1)突然而有意造成的精英和解;(2)逐渐的精英两步改造;(3)“革命性的精英改造”并形成意识形态型团结的条件。最后,表1也表明,只有在精英和解和两步改造实现之后,以前不稳定的政体才能成为稳定的政体,并沿代议制方向发展,促进民主政治的迅速或逐渐的扩展。简而言之,按照我们特定的参照框架,特定的殖民地遗产、精英和解和两步改造是西方近代史上走向稳定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我们的上述分析对研究目前的民主过渡和崩溃有什么启示。

## 三、民主转变与崩溃再考察

民主、专制、极权政体间的区别曾是比较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但以这种研究为基础来形成有关政治连续性与变迁的一般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却收效甚微。其中的问题之一就在于民主与专制政体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模糊的。虽然林茨和其他一些人对极权政体和专制政体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但只要仍把极权政体看作是早期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的政体,专制与民主政体之间的界限就很难令人信服地勾画出来。大量的将民主与专制政体的因素混合起来的概念就反映出上述状况,这些概念包括:专制的民粹主义政体、一党制政体、革命政体、动员政体、监护政体,甚至还有后专制主义政体。政治变革使这些分析上的两分法接受检

验,因为有大量的国家在各种各样的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徘徊。

鉴于这些政体徘徊于两种政体之间,比较政治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摇动式模式。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已经使民主政体得到了巩固,大部分拉美国家似乎也在向民主政治迈进,因此比较研究者们关心的是有关民主政治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先决条件的理论,有关民主政治扎根于其中的政治文化的理论以及朝向民主政治发展的其他方面的有关理论。但从6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稚嫩的民主政体被推翻,并代之以专制政体。因此,到70年代的时候,比较研究者开始关注“民主的崩溃”,军人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科层专制”和其他既非民主也非极权的政体的性质。从70年代后期开始,有些专制政体,特别是拉丁美洲和南欧专制政体又让位于民主政体。据此,现在的学者们又在关注“民主转变”或“走出专制统治”问题。

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研究政体的形成、维持和变迁的框架,以避免上述的摆动、反应模式。因此,除非有证据表明必须的精英改造已经发生,否则任何政体所发生的重要变迁都不可能成为政体变革的分水岭。林茨和斯蒂潘主编的《民主政体的崩溃》一书中所收集的各项研究虽然为根植于持续的精英不团结政体不稳定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但这些研究却没有看到,如果没有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型团结,导致崩溃的结果就是必然的。同样,对近年来拉美和南欧国家从专制主义向民主政体转变的研究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政体的变革之前或之中是否伴随着精英从不团结到团结的转变。我们需要再一次指出,如果没有这样的精英改造,从政体的稳定性来说,这种向民主的转变就会是短命的。

近年来人们对“精英公约”(Elite Pacts)的关注,也许是认识精英改造的重要性的一个实际步骤。奥登尼尔和施米特为精英公约下的定义是:“在一群行动者中形成的明确共识,以求制定出支配权力运用的规则,而规则的基础则是互相保护制订这种公约的人

的‘至关重要的利益’”。<sup>①</sup>可见,精英公约大体近似于我们的精英和解的概念,尽管后一个概念含义更广,包括的因素更多。精英公约的重要意义可以见之于1957—1958年间的哥伦比亚、1958年的委内瑞拉、1977—1979年间的西班牙。奥登尼尔和施米特曾怀疑,这种公约是否是向稳定民主制转变的必需条件,但他们也认为,这种公约可以提高转变过程的可预测性。比如,他们对三个避免了1964年后的民主崩溃的拉美国家中的两个进行了研究,这两个国家是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他们将这两个国家称之为“公约型民主”。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第三个国家,即哥斯达黎加,之所以能避开民主崩溃,是因为在1948年其精英开始了和解过程,尽管并没有形成一种正式的公约。因此,奥登尼尔与施米特注意到,一些维持时间比较长、但没有“形成公约”的国家,如1933年的智利和1904年之后的乌拉圭都在1973年之后发生了朝向专制的转变。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这些政体之所以是不稳定的,是因为并没有实现精英从不团结到团结的根本性改造。这种政体所依赖的是一种脆弱的联盟和根本不团结的精英中的对峙。它们之所以维持的时间较长,也许靠的是好的运气。在面对政治危机的时候,这样的政体就会崩溃。

虽然对精英公约的研究以及最近其他一些以精英为中心的分析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这些研究也造成了某些含混不清的看法。正因为如此,奥登尼尔和施米特特别强调了“这当中存在的高度不确定性,下列因素严重地损害了研究的结果,如没有预测到的事件、不充分的信息、匆忙而武断的选择、将动机、利益及适应性混为一谈,甚至对政治实体不下定义等”。与汉密尔顿对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崩溃的研究一样,奥登尼尔和施米特也采取了“结构上的不确定性”(structural indeterminacy)的立场,来研究近年来走出专制统

<sup>①</sup> G. 奥登尼尔和 P. 施米特《走向专制统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第37页。

治的趋势。

我们的研究则在于澄清民族精英的基本形式、它的起源及其影响,从而为形成较为有效的理论提供一条道路。

(孙立平 译)

S. 艾森斯塔德

## 政治现代化的受挫\*

指导着大多数对于不发达地区或新生国家的关切和研究的乐观主义——它假定,这些国家正在朝着完全成熟的现代化和持续增长这个方向发展(即使是缓慢的,间歇性的)——最近也被更为谨慎甚至悲观的观点所代替。这种悲观主义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许多新生国家内(这些国家最初的现代化的框架建立在不同的制度领域内,尤其是政治领域),趋向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不仅是缓慢的,而且其宪法政权极不稳固,正在逐渐为独裁政权和半独裁政权所代替。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苏丹也许是这种趋势的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一章的目的就是要分析在这些国家里导致或许可以称之为政治现代化受挫的那些变化的社会过程的本质。

### 现代化受挫的模式

这些国家发展的重要特性并不是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化的“起飞”在其内部没有完全实现。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里都进行了建立现代政治和社会框架以及体制的尝试,这些体制的许多方面或特征——也许是宪法、现代官僚体制、政党或现代经济企业——最初

---

\* 选自 E. 爱兹奥尼主编的《社会变迁》一书。

都已建立了。同样地,许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也许是像城市化、扫除文盲或媒体开放、职业结构的多样化这样的社会人口指标,或像传统模式的衰落、逐渐增加的差异性、利益集团或政党等现代政治组织形式的发展这样的结构性指标——都可以找到,并至今在一定程度上在这些国家中得到持续的扩展。然而,所有这些发展并没有引起能够承受持续的变迁、多样的问题和需要的可行的现代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内。许多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建立的体制框架已经瓦解,不能再继续运转,并逐渐地被缺乏变化,通常更为独裁专制的政权所代替。

换而言之,在这些社会里一些重要的经济现代化指标(主要经济部门产品份额的和人均收入的变化)和政治现代化指标已经发展起来。在这些指标中最重要的首先就是依照专门的政治角色和制度而高度分化的政治结构的发展、政权集中化的发展和特定的政治目标和方向的发展。第二,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政治现代化是以中央立法、行政和政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展以及这些活动向社会各个方面和部分的渗透为特征的。第三,政治现代化的特征是传统精英和统治者传统合法性的衰落、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他们是潜在政治力量的支持者)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且经常也是制度性的责任的确立。这种过程的规范表达就在大多数现代政治体系中以不同的方式已经逐渐发展起来的选举制度。

进一步来讲,这些社会在所有那些方面也发展出了现代化的另一个关键特征即对于持续变迁的结构性倾向。所以,它们都面临着现代化的最为严峻的考验,例如,在主要制度方面保持持久发展的能力和发展一种能够承受这些变化、但相对较少地引起反抗和制度崩溃的体制结构的能力。

但正是在这里我们所研究的国家中的主要问题出现了。尽管各种现代化的社会人口和结构性指标得到了发展,但是在其内部并没有产生能够处理由社会人口和结构变化所引起的问题的制度结构,至少在政治领域内,体制框架变得缺乏变化,不具有弹性,能

够处理的只是小范围内的问题。在像巴基斯坦和苏丹这样的国家里,政治领域内的这些“倒退”并没有损害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也许甚至有助于经济增长。在其它国家内,如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经济的停滞则伴随着宪法政体的崩溃而来。

然而,虽然大部分这些国家已经“倒退”到社会尤其是政治体制的一定层次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后者可被认为比这些社会现代化初期阶段所具有的起点更缺乏弹性、缺乏变化,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倒退到中心社会体制的传统模式。

这以许多相互关联的方式呈现出来。虽然在许多案例中新的独裁政体的精英们好像以传统的(或者是殖民地的如在巴基斯坦,或者说“殖民地前”的如在缅甸)方式进行活动,或者试图利用传统的标准和态度,他们都不能或者也许不情愿完全回到传统的、现代化前的政治结构中去。现代化的一些外在的但仍很重要的标志——诸如广泛的选举权(即使受到怀疑),现代立法框架等至少在官方被保留下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的精英统治者以世俗化的、现代的术语和符号——各种社会运动或合法理性和效率的术语与符号,而不是通过传统价值观——来描述他们自己的合法性。这甚至在巴基斯坦这种相对更为强调伊斯兰传统精神的案例中,或者在印度尼西亚这种强烈地以传统术语来表达对于新符号和意识形态的探索的地方,也都是属实的。

这些国家的新的统治者对于他们的目标所表示的一切义务和责任,都不是通过统治者的古老的“宗教”指令而是主要通过更为现代的价值观来完成的,这些价值观至今从原则上来讲是公民和统治者共同参与或分享的。尽管这些政权试图建立对于政治活动的种种限制,它们并未放弃公民和较早的(传统的或殖民地时期的)主体概念有区别的想法。同样地,不管这些政权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地反西方和反资本主义,他们并未完全否认现代性。相反,他们试图发现或重新发现他们所认为是其传统中“基本的”那些没有被历史偶然事件和实利主义取向所冲淡的价值观及因素和现代性

的价值观及因素二者之间的一些综合物。这样的尝试或表达也许一直是由于没有能力或意愿偿付为实现其诺言所需的任何制度性代价而对虔诚的目标的纯粹乌托邦式的表达。

但是,不管这些国家在政权发生改变以前或以后许多制度框架实际上是多么僵硬和没有效率,他们很少十分强烈地反对社会现代化的各种过程与方面的所有扩张,诸如教育、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或农村发展。这样,我们就缺乏现代化不发展的例证,或者不缺少向现代化“起飞”的实例,而只有一些现代制度崩溃的例子——即使在以上所提到的情况中,这种崩溃发生在现代化相对早期阶段……

所有这些案例的“外部的”故事,在其表面上,都是相对简单明确的,并且,其中绝大多数在轮廓上都是相似的,尽管在细节和机制上有很大不同。这个故事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内部不同集团之间持续性的内部斗争和冲突的发展,缺乏发现任何持续可行的妥协办法之可能性的极端对立和分歧的发展。这些冲突的细节当然随着案例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但通常都和持续的经济危机相关联,和逐渐增长的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相关联。这些危机反过来又被这些持续的冲突、被一致性和任何明确的解决对策的缺乏所加强。

在其他现代化和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中,这些看上去十分重要的冲突或经济问题确实存在并已经得到解决,即使只是部分地解决。所以,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所考虑的国家中,这些冲突还未得到解决,未得到控制。结果,它们演变成一系列恶性循环,损害了国家的稳定性和正在出现的现代化框架的持续性。

### 与现代化受挫相关联的政治的和符号的过程

为了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我们所研究的国家中这些冲突未得到解决,我们可以首先尝试分析在这些社会中尤其是政治领域中一

些主要发展的本质。这些社会在政治领域内发展的最普遍的趋势就是不同集团(政党、派系、官僚、军队、地方集团)的需求和中央统治者处理这些需求的反应和能力之间的矛盾。这些需求的层次或者比中心制度内部聚集和政策制定的层次高,或者更低(比如,或多或少连在一起)。在大多数的各种高度联结的类型(正如在具有高水平的政治强度的各种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的形式中所呈现的那样)和更为原始的、不相关联的、由对官僚机构直接压力作为标志的各种需求(正如在向地方当权者或官僚机构和中央统治者的请愿活动中以及不经常的平民暴动中所表明的那样)之间不断摇摆。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产生这些不同需求的各种集团的权力地位也逐渐提高了。他们不再被压制、被忽略,但同时也没有找到一种把它们有序地整合在一起的方法,也几乎没有发展出能将各类政治要求加以调控并将之转变成具体的政治诉求和政策的中间范围的制度框架。政党或者不同运动的领导未能以某种相对有序的方式联结这些不同的利益和政治取向,也未能制订适当的政策来处理主要集团的不同需求和与这些需求相关的主要问题。适合于这种联结和政策形成的正式机构在这些社会中一方面以中央行政、执行和立法机构的形式存在,另一方面则以不同政党的形式而存在,但是它们并不能够有效地发挥此类联结和政策制订的作用。

然而,在这些政治系统内存在着一些机构(诸如官僚行政机关、地方政府或传统社区单位)它们能够处理各种较少关联的需求类型。伴随着这些政权的推翻,它们再次成为政治过程的联合的非常重要的核心,就像殖民地时代、甚至殖民地前时代那样。但是在前述时期,它们的作用并不十分有效,因为它们服从于更为分化但无效率的机构,纠缠于在这些机构之间所产生的各种不确定性之中。所以,这些机构——尤其是官僚机构——经常是没有效率和腐败的。

这样,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环境的最主要的特征并不仅仅是大

量冲突和不同的需求联接层次的存在,或者那些不同层次间充分合作的缺乏——这在相对稳定的传统政权中很容易发现。但在所研究的社会中,由于现代化的推动力,那些政治要求和活动的不同层次不像在许多现代化前的政权中那样,即使相互连结,也处于相对隔离的分裂状态,而是被带人相对共同的政治过程和决策框架之中。同时,在这个框架内部,联结它们或控制伴随它们的发展而来的各种冲突的适当机制和原则并没有发展起来。换言之,在这些社会中许多人希望实现的价值观要求个人行为相对高层次的协调,但联系这些个人以及新的结合更为紧密的各种要求和活动的权力与组织结构还没有产生——即使更为古老的结构也许已经崩溃了。

如果我们检视一下在这些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被称为抗议和反抗活动的本质和范围,一幅同样的图画就出现了。就这些运动所发展或采用的象征符号的内容而言,它们与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在现代化不同时期或阶段上所产生的此类象征符号的整体并不必然有别。它们在各种民族主义的、反殖民主义的、传统主义的、种族的象征符号和各种社会抗议或经济剥奇的象征符号以及各种以反西方的或宗教的、社区复兴的术语表达的文化复兴的象征符号之间发生变化。它们也许——但并非总是也并非必然——比其他的、更加安静的运动在抗议的强度上更加极端化。但除此之外,这些运动和符号的一些其他更为重要的特征却突显出来。首先就是这些不同运动之间的相对封闭性、分离性和隔离性。其次是它们一方面具有狭隘的本质,另一方面是短时期高强度的抗议活动和长时期的停滞与不活跃之间的间歇性和变化。第三,在这些狭隘的、相互敌对的运动内部,经常存在着不同的、看起来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和社会取向之间的联合——例如传统主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合或传统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合。不仅在暂时情况下,而且在一些持续活动、政策形成和实施的情况下,这些不同的社会取向通常没有以一种能使其更加有意义的方式组织或协调起来。

这是缺乏事先将这些不同的运动联合起来或将之转变成更为广泛的机构、政党或正式舆论组织的安排的最重要的指标,是对这种更为广泛的控制性机构缺乏适应力的指标。这种预先安排的缺乏经常与统治机构吸收不同符号和取向进入自身体制的能力的缺乏相对应。结果,这些国家内部的各种抗议和反对运动经常在无动于衷、较广泛的群体和阶层将其利益从中心制度中撤出和对那些制度提出一些极端性要求,一些要求全面、立即改变政权或改变现政权内部任何既定群体地位的强烈迸发这两种情况之间来回摇摆,举棋不定……

在那些社会里,这种新的整合机制的不充分发展在制度发展和符号定形化的若干方面一直表现得很明显。一个最重要的指标能够在所有制度领域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中,倡导团结的人同工具性任务取向的领导者与行政官员之间的明确分化的发展中找到。

这种差异与政客和行政人员之间的差异并非必然一致,它可以与后者相交错,虽然明显的是,政客更乐于成为“团结的倡导者”而政府官员则更乐于成为工具性任务取向的领导者。宁可说,它们在任何政治和社会系统中的几个与生俱有的基本方面,虽然他们在不同政治结构中的政治取向不尽相同。诚然,在一些新生国家中这种类型之一——尤其是相对现代,更有成效的行政官员——几乎完全没有;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干部是从相对更有技能的人中选拔出来的,这些人能够组织不同的行政机构,发展新的经济企业和机制或者组织活动的机关,能尝试制订基于这些原则的政策。许多这样的集团或干部都来自于殖民地的行政机关;其他的则是经济发展或者教育计划的产物。

但在所研究的大多数案例中,由这些干部、领导者或组织制订的规则、命令和政策并没有被新的共同符号以及支持和发展这些新符号的领导和团体所支持和合法化。在这些国家内发展和得到支持的新的符号体系对于“工具性”干部们制定的规则所处理的那些更为世俗的问题似乎没有效力或者没有什么关联。尽管此类

不同取向之间的矛盾也许在任何政治系统内都是固有的,但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些案例中其程度更加尖锐和极端。这种矛盾在本文所研究的所有国家中都能找到。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我们发现由苏加诺和主要政党所发展的符号和价值取向不仅不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现代化问题,而且否认了自身的存在和意义,虽然同时这些问题正在困扰着政体。在缅甸由吴奈温(U Nu)发展的佛教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物,尤其在第一次军管之后,处理的只是困扰缅甸政治生活的那些具体问题中最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在巴基斯坦,关于一般国家的普遍本质和伊斯兰国家的特殊本质问题上的争论对于许多尖锐的行政、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解决并无较大的助益,而这些问题恰恰在发展初期困扰着这个国家……

在与党派团体或社会部门相关的新的核心符号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同样的问题。各种不同地方、民族、等级或阶级集团的相互分裂的、特殊的“原生性”符号并没有被结合进新的社会中心,它们在新的普遍认同层次上的改革也没有发生。所以,这些符号趋于成为结构分裂的焦点,成为新国家秩序发展的阻碍物。

并非仅仅是坚持这些符号具有极端重要性,而是它们没有被结合进更为核心的符号框架中这一点很重要,这种更为核心的符号框架必须取向于各种更为多变和更加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于现代化的持续过程和内部不同集团之间逐渐增长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或者换言之,在能够提供最低限度的可接受的意义和框架以回答源于新的社会环境的各种问题的中心,新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以及符号系统并没有得到发展。

如果我们尝试去概括以上分析的国家所处的环境,下面两个方面看上去就很突出。首先,在所分析的所有案例中,几乎在所有的制度领域中都倾向于发展一种不同集团和社会阶层之间逐渐增长的相互作用的环境,一种将他们并入新的普遍框架的环境,一种分化逐渐增长,但同时却缺乏处理与这些内部分化以及不同团体之间逐渐发展的相互作用有关的各种问题的充分机制的环境。

这种不同集团结合起来进入普遍性社会框架的进程也许是间歇的,其机会在不同团体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也是不平等的。但是从所有这些视点来看,它是否与其他正在实行现代化的或者处于现代化同等阶段的社会(这些社会在建立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方面是很成功的)在发展程度上有很大差异,这一点极为令人怀疑。

这些社会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并不是现代化的程度相对较低,而是缺乏新的制度性机制的发展,缺乏能够支撑具有战略意义的社会结构领域的各种制约机制和规范强制力以及处理产生于那些领域中的各种问题的能力。杜克海姆(Durkheim)把这种情况描述为社会契约中预约因素的不发展和非制度化。在互动的不同领域中——如在劳动关系、产业关系或行政实践领域内——新的契约和行政安排发展得很快,但是将规范性命令应用于特定环境的适当机制并没有发展起来,许多契约安排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和取向的支持。从杜克海姆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情况都意味着在确立和制度化更新层次的团结方面的失败,从机械到有机团结的转变或者从低层次有机团结向更高层次的有机团结转变的失败,即使不同集团和阶层之间逐渐发展的分化和互动已经损坏了传统的团结框架。

### 对于政治现代化受挫的解释

以上的讨论试图对这些社会内的发展提供一种分析性的描述。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解释缺乏充分整合性机制发展的原因。现在我们尝试分析这个问题。

这种缺乏并不是由于统治者或试图发展这种机制和政策的精英人物缺乏这方面的尝试而引起的,也不是由于社会不同集团缺乏对于富有远见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需求而引起的。旨在建立政体内制约原则和实现各种集体目标的各种政策被政治精英们发展和实施——经常是对于社会内代表更广泛集团的各种需求的反

应。但是这些政策和要求无助于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内部的协调。

为了能够理解这些发展的原因,有必要把其放入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的社会和政治取向以及他们与精英分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更加宽阔的背景中去。所有这些社会都以其内部持续的社会动员过程的发展为特征。但是这些社会动员过程的结构还假定了一些特殊性质。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比较广泛的社会集团和阶层——可能是农村或城市集团、生态或职业团体——展示了很高程度的社会和文化的“封闭(closeness)性”以及自我中心性,不管它们对于其他集团的依赖性有多大。

这种封闭性最重要的方面是对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机制的单纯“适应性”态度,但同时对之并没有积极的一致性倾向和认同感。这种适应性倾向以两种不同的看上去互相对立但经常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呈现出来。第一种方式是以对于较广泛社会机制相对被动的态度为特征,以在一般意义上对他们的“社会”概念在特殊意义对他们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概念的更大程度的执着为特征,这种方式在各种“传统”的较低级的有时中等的农村和城市集团中经常可以发现。当这些群体受到推动进入到新的现代化的分化了的的城市、工业和半工业化机制中时,上述特征对这些集团的结构和活动会产生很多影响和作用。它们导致以前的各种传统的关系类型,即工业体制中家长式安排下的关系,以及和官员、政客或教会领导者打交道的关系类型的永恒化;导致在新体制下缺乏承担责任或主动创新的意愿;导致普遍更大的被动性以及小范围的利益。

第二种主要方式就是那种可称为夸大的、不受限制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并在不考虑社会其他团体以及实际的可能性的情况下,试图获得新机制内部的各种利益、报酬和地位。

在这些社会内部只有相对很少的集团显示出更广泛的、更现实的内部和外部灵活性。在它们中间最重要的是—些经济商业团体或新兴职业集团,相对分化了的农村领袖和某些改革性宗教团体。但是在这里所研究的大部分社会中,这些团体很脆弱,相对而

言既和社会中央机构相脱离,又和广泛的社会阶层相隔绝。

这些趋势最重要的结构性后果就是,即使新的专业化的、分化的社会组织、工会或职业组织在已进入新机制的精英分子和广泛的社会集团内部产生,也不会导致可行的分化的新制度结构的出现。这些集团不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因为它们不得不在所谓的“错误”前提下,即在这些机制中它们有效运作的先决条件并未发展起来的情况下运转。它们经常显示出“失职社团”的特征,正如一个法语学生称之为“迟钝”或“传统主义”那样,这些社团不以达到其显著目标为目的(这类目标可以是经济增长、社区发展或类似目标),而是在现存机制中保持其确定地位和维持其成员的利益。

进一步来讲,即使在某些制度领域内部——如教育、经济领域或职业领域内——通过传播,或者通过特殊的活动集团的发展而倾向于发展出某些更为稳定的分化的团体和组织,它们在更为广泛的机制内保持和发展组织及活动的的能力也会是极其有限的。它们经常屈从于环境的压力而被迫解散。

这些结构性特征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那些政治活动和取向的本质,这些政治活动和取向是在较广泛的集团之间的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试图指导和控制其内部所有的社会发展和所有社会与职业流动途径以及垄断所有权力地位和名望分配的巨大渴望中发展起来的……政治领袖的政治自觉和合法性也在不小的程度上集中于使许多利益通过政治框架来达成这一点上,集中于此类的集合体——主要的社会阶层,尤其是那些起源于在以前阶段分享这些利益的社会阶层之上。

结果,这些社会中的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以一方面试图控制社会中所有主要权力地位和集团以及垄断所有有效控制的地位,另一方面不断屈从于不同集团的需求这两者之间的不断摇摆为特征。一般来讲,所有那些领域中各种更为限制性的政策能在像巴基斯坦或苏丹这样更为“传统”的国家中被发现,而“屈服”于不同集团的夸大性的需求这种政策则尤其能在像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这样

更为现代的国家中找到,虽然这两种趋势,一定程度上在所有国家均可发现。

毋庸讳言,许多这样的政策——尤其是更为压制性和限制性政策——在许多其他“新兴的”和古老的国家中均可找到;印度尼西亚、缅甸、或巴基斯坦所采取的每一具体政策,在更为稳定的政权中均可找到其对应物。但是在我们所分析的上述国家中所发展起来的这些政策的最重要特征,并非在于其细节上、内容上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在于它在压制性倾向和屈从于许多社会集团的不同需求之间的持续摆动,或者在于缺乏任何稳定的或持续性的次序标准的发展。

因此,就可以在那些社会内部发现新精英人士的取向和活动与广泛的集团和阶层中大部分成员的取向与活动之间的极为重要的平行。两者均以在新的现代制度机制内部维持和发展相对严厉和受到限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取向为特征,这些取向是通过先前社会结构或者“灵活的”但不可达到的目标而进行构想的。所以,在那些国家中趋于产生一种既存资源方面压力的恶性循环,这些压力与这些社会集团的欲望迫切性紧密相连,并经常通过统治者的最终必然耗尽这些资源的政策和活动得到发展和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政策的一个普遍后果就是减少可用资源并挥霍它们。这种资源挥霍由于“符号的”或意识形态的原因,由于统治者利用这种方式证明其统治合法式的尝试而经常发生。它通常最大程度地减少了统治者可行的控制能力的范围。同时,由于缺少任何规则或次序的清晰原则,在经济总产品保持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随着其欲望膨胀它们使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趋于恶化。……

为什么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土耳其、日本、墨西哥和俄罗斯出现了以变迁为取向并有能力实现相对有效政策的精英分子,而在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或缅甸并未出现,或者为什么存在着类似差异的精英人物在现代化后期也出现,回答这一问题极端困难,并在比较性社会学分析中形成最令人困惑的难点之一。处理这一问题可

行的指示物虽然有,但极少。它也许可以试探性地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与先前社会结构中精英的存在有关,与他们内在凝聚力的程度有关,与他们自身价值取向的内在转变有关。

这里所分析的大部分国家中,新的精英分子大多由知识分子组成,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形成初期唯一的现代精英。但是他们与先前存在的各种传统的承受者或者社会的更为广泛集团都没有内在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联系或认同。这些精英分子的现代化倾向更多地集中体现在政治方面而非经济领域。令人惊讶的是,在他们对自身基本的内在价值取向的再定义和改革中,他们也很少集中在文化领域。结果,他们不能与其他潜在的现代化集团和阶层之间形成强烈的内在凝聚力和建立稳定的意识形态及价值上的认同和联系。

另一方面,土耳其、日本和墨西哥的精英人物或者处于现代化后期阶段国家中的某些更具有凝聚力的精英人士,不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可资对照的特征。通常他们不仅由与先前精英和社会广泛集团完全脱离的知识分子组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在先前结构中被置于次要位置上,与许多活跃的、广泛的集团之间存在着一定密切联系。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内,他们旨在发展新的更为灵活的符号机制和集体认同机制而不否定传统,这些新的符号机制与集体认同机制也为新的变迁过程提供某些新的意义。所以,他们一方面更有凝聚力,同时影响着广泛集团和阶层内部内在价值观的转变。

在没有适当整合的情况下社会动员过程的发展,“工具性的”和“制造团结”的领导人之间分歧的发展以及社会象征的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各种分歧的发展,在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受挫的国家中均得到推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们在以上列举的国家的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均得到发展。

这些过程的一个普遍结果在大部分先前的分析中是很含蓄的——即,这些政体倒退到政治和社会分化的更低、更加僵化的阶

段,这在它们能够处理的问题的范围中可以看到。但是,另一方面,(这在上面已经指出)大部分缺乏分化的政体在一定程度上都保持着现代化的一些符号、目标和制度安排,即使他们意图发展新的意识形态和符号。

这种结合必然产生潜在的冲突,在原则上这些冲突可以向几个不同方向发展。一种可能的后果就是相对性现代体系的制度化和较低水平的分化,尽管这种后果也存在对于变迁的有限的制度性承受的可能性,有助于一定的经济增长。另一可能性就是停滞性政体的发展,这种政体缺乏吸收变化的能力、它或者保持相对稳定状态或者发展成社会叛乱、封锁和暴力的恶性循环系统。不过,对于导致这些方向的条件分析不在本文阐释的范围之内。

(吴薇、仲夏 译)

**B.F.霍塞利兹**

## 分析技术变迁之社会影响的主要概念<sup>\*</sup>

最近25年来,社会科学日渐成熟与复杂。它带来的结果是术语的激剧增加及大量的新定义和概念化。虽然多数术语已经有了专门化的用途,但也有一些术语终于被用来研究社会变迁中最常见的现象;许多研究经济和技术变迁及其社会影响进程的学者业已发现在描述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普遍现象时,对共同使用的概念而不仅仅是理论进行整理会大有裨益。新近出版的由“技术进步之社会影响国际研究部”(International Research Office on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主持的一本书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尝试<sup>①</sup>;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计划于最近出版的《社会科学名词词典》则是同一思路下的另外一个努力。本文不是为了重复“国际研究部”的成就或从即将出版的《词典》中作些摘录,也不打算提出关于工业化之社会经济后果的精致理论。

看来,可以采取的最佳途径也许是先对一个还未进入工业化发展过程的社会与一个已经经历了这一过程的社会之间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关系上的根本差别作一些描述;然后,在讨论了它们的一

---

\* 选自 B.F.霍塞利兹和 W.莫尔主编的《工业化与社会》。

<sup>①</sup> 参阅《社会经济和技术变迁:一种理论探讨》(巴黎:技术进步之社会影响国际研究部,1985)。

些对立特征之后,把注意力转到那些看来是变迁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上去。<sup>①</sup>

人们开始这项工作的一个便利的方法就是提出那些不同类型社会在社会和文化特征方面的广为人知的对立——例如,民俗文化 with 都市文化;“社区”与“社会”(Gemeinschaft 与 Gesellschaft);传统导向的社会行为与工具和实用理性导性的社会行为<sup>②</sup>。我们不必详细进述这种最初由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或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ennies)提出的两分法,因为无论这种两分法对于文化比较研究有什么优点,在技术和经济变迁研究中毕竟是很少提到它们的。传统和理性行为的区分(这一区分源于马克斯·韦伯)是相当重要的。我们经常发现人们把那些技术和经济较落后的社会里的行动和行为模式称作“传统的”,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这些行为模式效率低下,技术简单,而且对革新具有强烈抵制的倾向。

在我们对传统行为这一概念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之前,将注意力放在曾经为雷德菲尔德和滕尼斯及其门徒深切关注的非工业社会的两个特征上是不无益处的。雷德菲尔德一再重申在民俗或民俗性质的社会里,社会行为明显不是“单一利益”的行为,而是“多重利益”的行为。这意味着生产行为不仅有一个经济的目的;而且在民俗社会成员那里,它还包含有仪式的成分,适合于社会凝聚力或结构的成分,以及“政治目标”与其他的東西。民俗社会中所有的社会行为越是“多维”,它就越是容易产生变迁。如果社会行为是

---

① 这一探讨也在 Charles P. Loomis 最近一篇文章中使用过。文章题目是《朝向系统社会变迁的理论》,载于《出国人员技术援助的职业训练目标》一书中165—198页(纽约:社会工作教育顾问,1959年)。

② 这一性质几个其它的两分法在 Loomis 的文章中也被提到过。至于乡村——城市两分法的最早陈述则可参阅 Robert Redfield 的《民俗社会》,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1947年1月,第 LII 期中293—308页。社区——社会两分法可参见费迪南·滕尼斯《社区与社会》(东莱辛,密执根 east Lansing, 1957年)至于理性主义——传统主义两分法,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与经济组织理论》115页(纽约,1947年)。

单维的,变迁则要容易一些。然而,人们认为,一个特定的行为除了满足一个专门的目的外,同时还满足其他的目的。因此,只有在能够说明一种新的行为方式包含了所有相联系的目的时,变迁才是可解的。简言之,诸如耕作、收获、交换之类的行为应看作不仅只是生产性的活动,同时也是维护个人在文化中的稳定性和相应的适当位置的行为。所以,如果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不同形式的生产活动,只有在它们也能以一种或其他种形式达到这一被取代的活动过去完成的全部或大多数其他目的时,才是可行的。在非工业化社会里,民俗成分大量盛行于生产关系中,它是给这些国家经济和技术变迁造成严重障碍的部分原因<sup>①</sup>。

滕尼斯及其门徒强调社区的重要意义,这在研究技术变迁和经济革新的外部环境时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要的一点是对于许多非工业化的社会,小群体是社会凝聚的相应单位。这种小群体通常有其部落或氏族的根源。它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成员资格通常是严格限定的——只限于那些有长期的面对面关系的人,或者当不具备前面这个因素,而有另外某种紧密的互相认同感的人。所有的外人——例如所有不属于这一小社区的人——都是陌生人,因而常常遭到怀疑。这个小群体和这块内部保持相互接触的地区,构成了一个被认为是与外在世界相对立的他们自己的世界。每个人的忠诚仅限于他的群体内部的成员,外部的任何人都都是陌生人——无论他是否也享有相似的或密切相关的文化。

在许多不发达国家,这些高度特殊化的群体依然存在;在一些情况下,它们具有相当强的力量。它们通常是部落;但它们也可能构成村庄社区或等级制社会以及其他建立在亲属或准亲属纽带或者小范围共有财产基础上的联盟。这种群体通常生活在一个封闭

---

<sup>①</sup> 大量实际例子可以从关于非工业化民族内部经济联系的文献中找到。例如,读者可以参阅 F. G. Bailey 的《种姓与经济领域》(曼彻斯特,1957年)、Cyril S. Belshaw 的《寻找财富》(载于《美国人类学家》1955年2月第 LIII 期)中第二部分《美国人类学协会学术论文》,(80号)、Manning Nash《机器时代的玛雅》(maya)(格兰科,TP 利诺斯,1958年)。

的地区,其成员由血缘或婚姻纽带联结起来。这样,居住格局与亲密的接触二者互相强化,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下,小的社区就以一种僵硬的单位出现了。在这一单位里,社会互动的主要形式只发生于内部,它与外界的关系不仅是紧张的,而且还常常与怀疑和恐惧联系在一起。在发展过程中,打破这种社区的孤立并使得其成员与外界结成一种多维度社会关系的趋势是强然的。而且,这种社区中地位较低的那些人通常是最易穿越围墙与社会中其他人接触的人。这就破坏了小社区内部的结构,因而常常导致地位高的成员与外界孤立的程度反而增强。

因此,小社区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以下两个方面:(1)它对于被同化到“大社会”中的抗拒;(2)在对小群体的忠诚逐渐为对大社会的忠诚取代的过程中,小社区成为个人和社会层面上冲突发生的根源。此外,许多在小社区内有意义的制度在大社会中就丧失了意义。在已经发生工业化的社会中,家庭失去了作为生产和经济保障单位的职能,因为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超出了亲属群体,经济上的保障通过政府或其他保险制度也得以实现。同样,对于那些进入了更大社会里的人来说,与部落或村庄神祇的密切关系完全失去了意义;小社区内部遵从和权威的模式在外面的世界中也丧失了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在小社区内部和外部产生冲突。譬如印度,冲突发生在种姓内部以及种姓之间;在非洲,它们以部落首领和中央权力之间的斗争表现出来;在其他的地方,还有很多不同的形式<sup>①</sup>。

把无处不在的特殊主义的小社区引导到更正规、结构更分化,但又更加相互依赖的社会中,这一社会变迁过程的主要思想基础就是弥漫于很多正在进行工业化国家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工业发展有关的,而较少受到鼓动家和知识分子支配的其他过程也支

---

<sup>①</sup> 民俗社会和小社区的联合特性在 Roert Redfield 的著作《小社区》里得到了经典的表达(芝加哥,1955年)。

持了这个趋势,其中有城市化,行政和生产过程的科层化。所以,对小社区的冲击来自所有的方面;看来,它不可能经受得住这些力量的共同影响。

从对小社区和民俗社会以及社会互动的多方面特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概念主要只是同一社会类型的不同称号而已。第三种从总体上看也是更为流行的描述这一社会类型的方式是指出它的传统主义——或者,也许更准确的是把它看作一个传统形式的行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事实上,可以用最普通的方式来描述尚未工业化和在生产过程中只运用有限的科学技术的社会,那就是如 W. W. 罗斯托所做的那样简单地称它们为“传统社会”<sup>①</sup>。我们已经知道,传统性社会行为的概念最终得追溯到马克斯·韦伯,他将它与不同形式的理性行为进行了对比。由于传统性或传统导向性的行为这一概念已经被如此广泛地运用,更详细地探讨它也许是一件值得做的工作。对传统和传统性行为作彻底的分析并不是我的目的,特别是因为我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经陈述了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sup>②</sup>。

这一讨论的关键是传统性行为的定义以及它与传统主义行为的区别。虽然马克斯·韦伯没有作出明晰的区分,但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已经有所表现。在一切社会中,都可以发现传统性或传统导向的社会行为。韦伯把它描述为一种建立在“安于日常事物的心理态度和……把常规作为不可违反之规则的信仰<sup>③</sup>基础上的行为,但除此以外,传统行为的概念也包括从祖先那里承继过来的社会行为模式,因为所有的人都对自己的历史有意识,对行为规范的连续性有要求,而且还因为这些承继的社会行为模式可以恰如其分

① 参见 W. W. Rostow《经济增长的阶段》(剑桥,1960年)4—6页。

② 参见 Bert. F. Hoselitz 的《传统和经济增长》,收于 Ralph Brailbanti 和 Joseph J Spengler 编的《传统、价值和社会经济发展》(德海姆 N. C 1961年)一书中83—113页。

③ 见马克斯·韦伯《世界宗教的社会心理》,载于 H. H. Gerth 和 C. W. mills 所编《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选》(纽约,1946年)296页。

地融合进一个社会的行为体系中去。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性行为完全拒斥变迁。传统不是存在于行为外部面貌的老一套中；相反，它是建立在态度和思想状态的连续性基础上的。在现代高工业化社会中，许多行为都是建立在传统和传统性规范基础上的。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日常待人接物的方式和规则上，而且也反映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更为复杂的行为中。要以社会成员表现出来的传统导向性行为的相对“数量”为标准来区分不同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恐怕是困难的。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传统主义定义为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行为：“在充分意识到传统规范的传统本质的情况下还对它进行自觉的和审慎的肯定；宣称传统规范的优点来源于一个神圣的起源。”<sup>①</sup>换句话说，传统主义行为是对过去事物的有意识的回归——向过去荣耀时代或过去的神圣经验的有意识的复归，这种思想认为，昔日黄金时代的伟大成就提供了一套规范，只要恢复这套规范，就能重新走向繁荣和成功。在很多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的民族主义中——尤其是那些有着光荣历史的国家——我们能够发现强烈的传统主义的混合物。它们的思想要比单纯的拒绝西方价值走得更远：必须使已经死去很长时间的旧价值复活并重新获得活力；它们赞许的是那些与这些规范协调一致的外在行为。

虽然传统性行为有时会与现代化和技术变迁的需求冲突，但它经常成为迅速变迁时期维持或支持稳定的重要强化因素。总的说来，在社会行为中保存传统也许是减轻经常伴随快速工业化和技术变迁而来的许多混乱和瓦解的一个重要因素。可在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主义行为试图把过时的行为和价值抬高到现时的行为规范水平上，它就常常带有强烈的反动成分，因而成为阻碍经济变迁

---

<sup>①</sup> 参阅 Edward A. Shils《传统与自由：矛盾与依赖》一文，载于《伦理》LXVIII(1958年4月)第 LXVII 期160—161页。

的因素。<sup>①</sup>

简言之,我们需要考查和研究那些被归于人们通常称为传统性或传统导向性行为的特征。韦伯本人专注于分析理性行为,他把理性行为看作是经济和政治进步社会的主要动力。因此,作为理性主义对立面的传统就成了一切静态的、停滞的和落后的东西的代名词。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传统既有消极的影响,也有积极的影响;要是不考察围绕传统分析的各种观点,我们就遗漏了一个领域,因此我们必须对那些有助于经济和技术进步和那些会阻碍这些进步的传统的各层面作一个更加认真和细致的研究。

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了模式变项,用来描述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社会。这是进一步详尽阐述传统导向性社会特征的一个尝试,事实上它也是打破“理性主义——传统”两分法的一个企图。虽然帕森斯发展的整体框架不常被用来分析工业化的社会影响,但在他描述的主要模式变项中,有许多——例如先赋性或特殊主义——则常常可以在文献中发现。因此,陈述帕森斯理论中的有关部分,尤其是把它运用于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之中是大有裨益的。

在帕森斯提出的五对模式变项中,有三对更加直接地适用于我们的问题。它们包括社会对象形式之选择(成就与先赋性);价值导向标准类型之选择(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对于对象利益范围的界定(特化与普化)。在使用这三对模式变项来区分工业化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时,我们发现前者有以下特征:成就标准在经济角色和对象的分配中占支配地位;它们在分配过程中运用的是普遍主义的标准;而且这些社会中的经济角色是典型的功能特化型。另一方面,原始社会和其他非工业化社会在相应的社会行为领域里却主要呈现出先赋性的、特殊主义的和功能普化的特征。现在让我们更细致地考察每对变项。

<sup>①</sup> 参阅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系统》(格兰科,伊利诺斯,1951年)。

我们首先应该指出,我们关心的是社会行为的规范。当然,实际的社会行为常常并不符合这些规范;在有些情况下,人们甚至以破坏社会规范为光荣。换句话说,用来描述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的模式变项复合体构成了一个理想型;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当我们运用理想型来分析现实社会时,也会发现现实所呈现的特征总是与理想型构造多多少少有些背离。<sup>①</sup>但是,模式变项可以用来估计任何特定社会中的实际行为与“纯粹”状态(假定与模式变项复合体相应的规范真正得到了实行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制度所呈现的状态)偏离的程度。因而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社会变迁的因素。举例来说,在某个社会里,先赋性被认为是分配经济角色的规范。然而,我们发现这些角色实际上是按照成就或表现的标准来分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觉察出一个初露端倪的社会变迁过程,其更深的细节则需通过经验研究来探索。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讨论模式变项。成就——先赋性的两分法虽然不完全等同于身份取向和契约取向的对照<sup>②</sup>,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密切联系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两分法运用于经济事物上,我们会发现在一个把先赋性作为规范的社会里,经济角色完全是根据对象是什么人而不是他有什么能力而分配的。举一个建立在先赋性基础上的社会的实例。那就是“理想的”种姓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种姓都为特定的职业群体所控制——也就是说,只有特定种姓的成员才可以从事那种职业。现在的种姓制度——虽然在某些时期的某些地方,种姓制度可能确实与这种理想接近——从总体上说已经永远不会呈现出完全的先赋性特征了。但从给出的例子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一个经济角色依据身份或先赋性而分配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是困难的,而依赖于社会流动水平的社会变

<sup>①</sup> 关于概念和理想类型,可参阅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90页(格兰科,伊利诺斯,1949年)。

<sup>②</sup> 关于地位——契约两分法,参见 Herry Sumner Maine 爵士《古化法》载于 Frederik Pollock 爵士编(纽约,1906年)第163—165页。

迁也被严重阻碍了。

相反,如果成就标准对经济角色的分配起主导作用,那么获得某种职业的首要标准就建立在一个人能否完成这种职业所要求的任务的基础上。在实际的运作中,分配经济角色的过程也许会包括真正的考试;如果缺少这种考试,也得规定某些客观的标准——例如一定年限的学校教育,一定的文凭等。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在工业化国家里,纯粹的成就标准也不是到处都通行的——有些时候,经济角色是根据强烈的先赋性标准来分配的。财产的继承,大家族群体的优势——尤其是在上层阶级中——以及阻碍社会流动的一般障碍是使得成就规范不能完全贯彻的一些因素。但是成就规范的理想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即使在那些经济角色实际上是根据先赋性分配的地方,也得制造出成就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假象。这一点可以由许多美国公司的例子证实,虽然公司老板的儿子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成功,但他仍然得通过工作才能升到公司的顶峰。

下一对模式变项是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它们与第一对模式变项是有联系的。它们不规定什么人从事什么角色的规范,而是关心经济角色的甄选规则是否对每一个人都适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把特殊主义的规范运用于经济行为中——在那个社会里,对农民和自由民,对贵族和平民都制定了特殊的(不一样的)规则。特定的市场和特定的交易只限于特定的群体;外来人只有在获得允许的情况下才可能从事那些本来只限于某个封闭群体的活动。与此相反,普遍主义的原则就没有作这种区别。同样的规则适用于所有的人;形式上平等的原则被提高到社会行为的一般规范水平上。

从逻辑上几乎就可以推论,在一个经济角色根据普遍主义的成就标准分配的社会里,角色本身从功能上看是高度特化的。这一要求是成就原则得到严格执行的结果,因为除非一个角色能够清晰地定义和界定,否则成就原则就失去了价值。此外,功能特化也是劳动分工不断增加的结果。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关于制

造大头钉的著名例子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分工带来的经济利益,他指出:

“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必然增加他能够完成的产品数量;而劳动分工通过把每个人的任务简化为某种简单的操作,并使得这种操作成为他生活中唯一的职业,必然大大提高工人的熟练程度。<sup>①</sup>”

斯密明白劳动分工还会产生出其他的利益。但是他很正确地把功能高度特化的发展放在了首位。

功能普化是功能特化的直接对立面。非工业化社会里的农民就是这类工作规范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完成与种植庄稼有关的所有农活,而且建造居房,制造用具,还经常自己制作衣服和其他日用品。如成就—先赋性两分法以及特殊主义——普遍主义两分法的例子一样,我们发现了看来与功能普化通常应该非工业化社会相联系这一判断相抵触的不太典型的例子。例如,在种姓盛行的情况下,劳动的社会分工制度导致了印度这一非工业化的社会也呈现出高度的功能特化特征。另一方面,某些职业,尤其是高层次的管理职业,即使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也是功能普化的。一般而言,在较为简单和不太复杂的工作中,已经更广泛地实行了功能特化,但是商业管理和科学研究中的进一步的专门化表明这一职业分化的过程在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是普遍和强大的。

使用模式变项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把与工业化和技术进步相联系的社会变迁的战略历程置于了明显的中心。普遍主义规范没有必要完全地取代特殊主义规范。然而,经济角色的分配从先赋性取向到成就取向,经济任务的界定从功能普化到功能特化,这两个过程看来已经在所有成功地实行现代化的国家中都发生了。在我们对与这两个转变过程相联系的制度变迁进行考察以前,把用模式变项作出的对工业和非工业社会类型的描述与早期的用民

<sup>①</sup> 亚当·斯密《国富论》,Edwin Cannar 编(纽约,1937年)第7页。

信——都市连续统和社区——社会两分法作出的描述联系起来，是会有好处的。

我们已经知道，民俗社会的特征是经济行为有多重的意义——譬如，它们不仅是生产或交换的行为，而且也是礼仪的行为，它们对于群体价值观有维护作用。换言之，我们可以通过指出民俗社会里经济行为的高度功能普化来描述这个特征。如果某种形式的社会行为在社会行动的几个子系统中都有意义——如果它不是明确地限定于适应子系统，或整合子系统，或者社会行动的其他任何子系统——那么它就必然是普化的。这种社会行为有很多意义；虽然它在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操作可能会被严格地规定，但它的多维性赋予了它功能普化的特征——这一特征有时也使得它对变迁持抵制态度。

同样，我们把小社区看作主要建立于先赋性特征基础上的一套人与人之间的制度化的关系。因为经济角色与先赋性地位联系在一起，因为即使在不同经济角色里特征达到了相当高程度的地方（例如，在印度的村庄中）先赋性的规范也提供了使得来自内部的变迁异常困难的稳定和僵化，所以小社区的凝聚力和紧密度就提高了。只有小社区的解体或外来力量的渗透才可能使得先赋性特征在分配经济角色（以及其他角色，如政治、军事）方面的重要性下降。有时，先赋性规范扩散到较大的社会，但由于缺乏严格规定的群体界限，它们主要只具有象征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意义。

“传统的”民俗性小社区的逐步消亡在经济和技术领域里伴随的是一个经济角色分化的过程以及把这些角色分配给特定人物的规则的松弛。但这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其间会有突发性的事件和震荡。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制度得以发展；而且当每个新的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它就为更进一步的变迁提供了积聚动力的关键支点。如果把处于不同经济现代化水平的社会并列能够为社会制度的比较分析提供典型的个案，那么分析从一个经济成就层次

到另一个经济成就层次的转变就可以看作是在对制度变迁的研究。

现在,我们应该直接考查那些在研究制度变迁过程中已经提出来的主要概念。必须重新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并不是讨论社会或文化变迁的理论,因而不能保证将要讨论的概念必然符合完善的理论构架。然而,我们应该尝试着提供一些线索,以说明已经用来描述技术进步的社会影响的各个主要概念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从更加仔细地考虑制度变迁的过程和相联系的社会转型现象开始。可以认为工业的发展需要实现两个前提条件。否则,在任何较大规模上都不可能开始工业的发展。第一个条件是某种形式物质资本的积聚——例如交通和运输设施;一些货栈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类似设施;教育设施和其他公共建筑。另外一个条件是法律、家庭和驱动力等级等制度化结构的发展。一旦这些新制度创立以后,它们就为自己提供了经济上进一步发展和增长的动力。因此,我们可以把制度的变迁看作是在前工业化或较少工业化社会里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特别是在这样的领域:把一个资本形成和在生产中引进现代技术设备困难的社会转变为一个积累资本和在生产技术与经济组织中接受变革被看作是一般社会进步的“自然的”和确定的产物的社会。

缺少资本、技术工人和企业家,是已经为人们所确认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瓶颈。所以,从工业化的角度看,那些有利于把这些生产因素充分供应障碍消除的制度准备是最重要的。

人们早就意识到储蓄,技术劳力和企业家素质的供应应部分地归功于人口的心理特质。我们可以把储蓄的意愿和倾向与投资创办企业的愿望看作是从技术发达的社会的特有态度中滋长出来的。一些著作对这些态度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它们把这些态度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的心理成分。例如,桑巴特把资本主义精神描述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计算和投机,商人精神和强盗气

质,谨慎与冒险之间的一种紧张<sup>①</sup>,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的要素》一书的主要内容。很明显,桑巴特用这些词描述了两种人格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公认的清教徒节俭和艰苦工作品性的体现;另外一种类型是好梦想的企业家,他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经为桑巴特强调过。现在,我们可以宣称储蓄。努力工作和创新的动机品质是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前提条件;但这些因素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为制度的存在所大大强化的,在这些制度下,前述的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利益的合法化以及对于经济活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社会认同是西方世界支撑这些态度的一些主要制度,在西方社会进入工业化的全过程以前,这两者就已经具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业化和为经济目的而采用的技术革新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动力。<sup>②</sup>

在这些制度不存在或只得到微弱发展的社会,其他的制度就必然取代其位置。亚洲和非洲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计划控制之所以盛行,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或缺少这些制度及找寻不同制度结构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作为经济进步看守人的角度得到了扩张。但在一些“混合经济”中,譬如印度,获取利益与利润最大化作为制度化的规范已经赢得了充分的立足点,足以依靠它们作为动员个人储蓄和鼓励生产性投资的中心。假定有一个理想的环境。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社会制度特征在工业化领域里产生决定性的后果——虽然其他的制度,例如扩大家庭中资源的集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印度,某些社区——如 Marwaris, Bhatias 或 Parsees——在工业化进程中已经扮演了特别具有战略意义的角色。这个事实说明规范的制度化在促进技术革新的经济利用方面

---

① 参阅 Werner Sombart《资本主义的要素》(伦敦,1915年)一书各处,尤其是63—129页。

② 关于尤其为企业家吸引的印度社区,参阅 Helen Lamb《印度商业社区和工业阶级的演化》,载于《太平洋事务》1955年6月第153期101—116页。关于扩展家庭作为工业资本来源的角色问题,参阅 Janes J. Bema 之文《南印度的企业方式》,载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1959年4月第7期343—362页。

并不是平均分配于整个社会中的,在某些社区比在另一些社区要有更强固的根基<sup>①</sup>。

技术革新提供了经济领域中的机会,对于积极捕捉这些机会的条件的考察使得我们向关于企业家能力的研究靠近了一步——在讨论经济发展和技术现代化时,企业家是一个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作用的要素。但是,尽管企业家能力经常能考察,它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有时还被夸大,但有关“企业家能力”的准确含义仍然存在着疑问,而且对于它的社会和心理成分人们仍然知之甚少。关于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的作用,约瑟夫·桑巴特赋予它的意义通常是最高的。在下面的这段著名的话中,桑巴特这样定义企业家:

“我们现在得到了我们要分析的第三个成分,即‘生产工具的新组合’和信用。虽然这三个成分构成一个整体,但第三个成分可以被描述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实现新组合的载体我们称作‘企业’,发挥这一作用的个人我们称作‘企业家’……我们已经用‘创造性’、‘自立性’或者‘预见性’这样的表达方式彻底地说明了企业家类型的普通特征。”

在这段话中,桑巴特明确指出企业家是一个创新者,他把“生产工具的新组合”的实现看作是为一个经济制度跃上更高生产水平提供动力的关键因素。桑巴特在他的著作中详细列举了他称为“新组合”的东西,其中他特别强调:(1)新产品的采用;(2)新生产方法的采用;(3)新市场的开发;(4)对原材料供应的新源泉的控制;(5)任何工业新组织的实现。在这个表中,第一、第三和第四个因素主要适用于商业企业,第二个因素适用于工业企业,第五个因素则适用于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方面的所有种类的企业。结果,企业家的作用在桑巴特那里就扩展到整个经济活动中,而不是只局限于工业企业家本身。

<sup>①</sup> Joseph Schumpeter《经济发展的理论》74—75页(剑桥,马萨诸塞1934年)。

在多数论述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文章中,没有或很少有对这一活动是否在商业、金融业或工业领域呈现差别的探讨。然而,即使是对许多不发达国家商业领袖的表面性的研究,也表明在一些商业和金融企业家发达的国家,工业企业家却没有发挥作用。为什么我们在那么多不发达国家里发现了本国的放债人和商人,却很少发现本国的工业家?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一现象的观点;由于我们对工业化特别感兴趣,这些观点也许会有关系的。

这些观点中的第一个是说那些本国的工业家没有能力与外国人建立的强大的工业企业竞争,在过去的殖民地尤其如此。此观点很难让人信服,因为竞争在商业和银行业也同样地严苛。而且假如我们调查国内企业家建立起来的商业和金融企业的种类,我们会发现它们是对欧洲的大公司操纵的类似活动的补充。国内的商业和金融业在外国大公司未占据的经济系统的隙缝中找到了位置。它们处于大城市中心与农村之间的结合部;它们一方面为小零售商提供货源,另一方面也满足农村地区无力支付银行保证金的那一部分人借贷的需要。

为什么在工业领域没有类似的现象发生呢?显然不可能指望国内的小企业家去与国外的矿业和运输大公司竞争,但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无数的工业分部门,其中看来有建立小的和中等规模工厂的充分机会,同国内商人和金融家与国外批发商和银行家之间的关系一样,这些工厂也可以相应于大的外资企业发挥一定的作用。

工业企业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指导工业企业所需的能力与指导那些成功的商业或金融企业所需的能力不一样。小商人或放债者可以只雇佣几个帮手或者不雇佣任何常年的帮手;而工业企业家(假使他不仅仅是一个手艺人)必须雇佣一群人,他还必须组织和指导他们的劳动。除了具有强烈的追求利润的动机和实施革新的能力外,他还必须有管理能力,最重要的是他还必须具备指挥和组织能力。一个小工业企业家的首要特征不在于他的冒

险精神,也不在于他创造利润的动机,而在于他在共同的事业中领导其他人的能力和他采用技术革新的倾向;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大量的革新是技术性质的,它要求企业家直接的和迅速的参与<sup>①</sup>。

最后,商人或放债者占有的资金要比使用于工业企业的资金周转得快。商人甚至可以在没有获得对经营对象的所有权的情况下就做他的生意。如果他是一个买卖中间人或代理商,他只会从交易中损失掉收益,而不会损失掉投入其中的资本。此外,放债人或银行家经营的是流通最广泛的商品,它为任何人所接受,易于运输或保存,而且如有必要的话,还可以直接用来贿赂官员或有权力的人。与商人或银行家相比,工业企业家的财产通常更多地与他的工厂长期联系在一起;他依靠一个常常并不完善的市场来出售产品;他的财产面临着一系列的危险——被火灾或其他事故毁坏——而这些,商人和放债者都可以避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向工业投入一定量的资本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要比向商业和高利贷投资大得多。

因此,谈起企业家的“良好气候”时,必须认真识别在这个气候中确实兴旺的企业家是属于商业和金融群体,还是属于工业家群体。显然,就工业化的发生和工业企业领袖的产生来说,一个关于企业家本身的良好气候是不够的。我不知道对于把一种商业增长转化为工业增长必须具备的其他条件的调查是否详细到足以提供充分的经验材料,以便我们更准确地识别出企业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实际起到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企业家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它怎么与社会结构中的其他变化,与制度序列和一个社会的规范传统里的变化相适应,却仍然很少有人研究<sup>②</sup>。

---

① Ibid 66页。

② 也许对企业家和他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角色问题最为广泛和系统的探究体现在最近出版的 Arthur H. Cole《社会背景下的商业企业》一书中(剑桥,马萨诸塞,1959年)。尽管此书作者并未宣称这是一个明确的研究,他却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超人的智慧讨论了许多观点,这些观点在战后那些对企业家和他的社会与历史取向有兴趣的学生们中间曾受到关注。

应该提及的工业企业家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他们被普遍看作“新人”。马克思曾经用这类词谈到过进行积累的资本家；最近关于企业家的许多著作已经在企业行为里——尤其是在反对政府支配资源时——发现了一种新的经济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关于企业家是否是“新人”与企业家行为是否是一种新的社会行为模式的论争是依“企业家能力”如何定义而定的。如果我们接受桑巴特的定义，把企业家能力等同于采用革新，我们就会发现企业家一直存在——从史前时期人类首次使用车轮，从事定居农业和养牛到最晚近时期。如果我们像阿瑟·H·科尔(Arthur H. Cole)一样认为企业家能力主要存在于叫作“企业”(它本身也是一组社会制度中的一个单位)的正式组织中，我们就会更加重视企业家表现其行为的社会环境，而不会过多地强调企业家人格的个人心理涵义；这里，我们还发现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环境会变得越来越易于接受企业家能力。

但是如果我们在第二种意义上来解释企业家能力，并把它看作与事务领导能力更一致，那么我们会追溯它在制度化背景中的逐渐发展。因此，运用某些社会学范畴——例如越轨，社会或文化边际性——来分析企业家能力的逐渐演化就有意义了。当然，社会越轨和社会边际性的概念在其他领域也有用处。它们可以运用于下面一些现象中：如科学和技术探究的发展，一个社会里世俗态度的增长，以及其他的很多问题——其中很多现象也许只是与工业化和技术变迁有很微弱的联系。

让我们来简短的讨论一下社会越轨。正如前述，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那些与经济活动和组织有关系的越轨行为类型。既然我们要将越轨这一概念操作化，就不能只把它解释为代表新鲜事物的行为；它必然也意指一系列在某些方面与现存的社会规范或社会认可的行为类型不一致的创新行为。换句话说，越轨总是指对现存秩序构成破坏，并且要么是与现存社会价值系统相对立，要么至少没有积极影响的行为。把这个概念运用于西欧经济历史阶段期间实业家和商人的行为中，我们发现我们可以谈及那个时代和那个社

会里的真正的越轨,当时企业家行为不属于公众认为构成“良好生活”的社会行为类型。直至15世纪,这种情况对于某些种类的金融企业家能力来说还是和过去一样,由于教会对高利贷剥削的正式反对,金融企业家的能力受到了影响。后来,当金融企业家能力完全获得社会声望时,工业企业家能力却变得为人们所看不起,因为他经常弄脏人们的手。绅士不宜于从事商业或工业活动,这种态度在今天的许多不发达国家仍然很流行。这个解释也为实业界不同阶层成员所作出的各种不一样的反应提供了附加的说明。因为阶级成员的资格是与礼仪地位联系在一起,所以越轨行为就在不同阶级中激起了不同的约束方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越轨的意义和解释也因阶级而异。<sup>①</sup>

如果“越轨”指对现存社会规范的破坏,那么深入研究社会阶级或群体是有趣味的,因为正是来自于其中的个人参与了不同类型的越轨行为。显而易见,越轨的期望报酬必须是有吸引力的;越轨者看来有一种强烈的向上爬的意愿(也许是一种强烈的成就动机),或者一定是对现存秩序的某些方面感到不满。简言之,把越轨理论与各种可供选择的社会——心理学假设协调在一处显很有可能的——例如戴维·C.麦克米兰或者埃弗雷特·E.海根的理论——这些社会心理学假设已经被用来解释实业领袖声望的上升<sup>②</sup>。

然而,另一个可能的假设是那些越轨者处在某个文化的边缘或者处于一个受多种文化影响的社会或文化位置。简单地说,我们可以识别出违规与社会边际性相符合的情况。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最早的放债人往往是外国人。在哥特人和伦巴族人统治时期的意大利,放债人是叙利亚人、拜占庭人和犹太人。其后,当意大利人转而致力于大规模的金融企业家解力时,热那亚人、比萨人、色雷

① 见 *ibid* 90—100页。

② 参阅 David C. McClelland《成就动机的若干社会后果》,载于 Marshall Jones 编《关于动机的 Nebraska 座谈之三》(伦敦,1956年)41—72页。以及 Everett E. Hagen《经济发展的过程》,载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1957年4月第5期208—215页。

斯人和佛罗伦萨人——他们都是所谓的“伦巴族人”——就成为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金融企业家。

在很多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各种经济事务中,边际人的作用在今天格外明显了。人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各个东南亚国家的中国人,东亚的印度人和作为商人出现在西非、拉美与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更加分散的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

是什么机制使得边际人扮演如此广泛地被接受的角色呢?罗伯特·E.帕克是这个概念的创始人和社会边际性意义的发现者,他强调指出边际人——正是由于在文化、伦理、语言或社会结构角度方面边际人所处的模糊不清的位置——倾向于在变化的情境中作出创造性的调整,并且倾向于在调整过程中发展创新的社会行为,虽然帕克的非常笼统的命题已经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提炼,但社会边际性理论还不是足够先进,无法为边际人在所有的社会变迁场景中都会发挥作用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即使边际人更倾向于作出创造性的调整,而不是退回到老一套或完全接受新事物,这种记载也根本不是明显的;有一些学者提醒我们,与其他人相比边际人也许更易屈从于社会的反常状况,因而成为导致社会解组而不是创造性变革的载体。

在已经发生了一定量的越轨行为的情况下,这种行为在新制度中的固定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一旦一种越轨行为能够找到一个制度的庇护,它就不再是越轨的了,而成为常规化的行为。而且它还可能表现出受到高度称许的社会行为的所有特征。因此,越轨行为赖以固定的制度就构成了新的越轨可能发生的起点。例如,工业革命以前西欧产生的制度和明治时期以前日本产生的制度已经是始于越轨行为的社会变迁过程的结果;但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这些制度又反过来使得更进一步的经济和技术变迁成为可能。<sup>①</sup>

<sup>①</sup> 见 Robert E Park《种族和文化》(格兰科,伊利诺斯,1950年)345页后,尤其是375—376页。

任何特定的越轨是否都会导致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并且使迄今为止的社会行为模式最终常规化是与几个因素有关系的。社会现存的约束系统可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这些约束可能会内在化,例如它们可能植根于人们的价值和信仰中;这些约束也可以外在化,例如它们可能由权威人物和精英用来反对实际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越轨。在一些社会,两种类型的约束看来都很强。在明治以前的日本内在的约束已经部分地受到损坏,幕府将军的权威也日渐式微;外在的约束已经松弛,不足以阻止新制度的形成,至少不能阻止这些变革开始。

所以,分析社会变迁可能要通过探讨这样的几个方面来进行:越轨的影响——是否由边际人表现——越轨行为的制度化和常规化,以及对越轨约束的范围。这个分析最初大约会在“总体层次”上进行——例如它可能会立刻考虑一个复杂的总体社会。但是,如果我们在分析中分解变量——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我们不考虑从总体上影响一个社会的变迁,只考虑那些影响社会的特殊部门或阶级的变迁——那么我们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就会深化。因为在不同的群体中,越轨、约束和制度化的过程有不同的地位和影响。很明显,在一个先赋性规范很强的社会里,不同的人会依据各自的地位遵从不同的内在化的约束;在一个特殊主义非常盛行的社会,即使是外在的约束也将以相当不同的程度强加给属于不同群体或阶级的人。

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任何社会里发现成为革新传播者的某些重要群体。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群体由边际人构成——特别是在革新从外部传入的情况下。边际人在文化传播或文化接触过程中的作用到现在为止研究得还很不够;但他们突出地渗入了这一过程已经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另一个可能和经常确实扮演重要角色的群体是社会中的精英人物。虽然已经有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精英对现有地位的保持方面,但它在引进组织革新和技术革新方面的影响也许是被低估了。一般来说,社会变迁已被人们发现

是伴随着“精英的循环”，而不是现存的精英有能力重新制定社会的目标并努力实施它们的过程。然而在目前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精英作为革新者的作用是必须承认的，因为那里的许多经济变迁是由政治上的权威领袖组织的。在西方国家，企业家的功能过去主要是由那些通常属于没有完全的选举权，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的独立商人所完成的，而在经济不发达国家，企业家的功能却被官僚们接管了，他们在获得允许并得到政权机构的保护下进行活动。

在某种意义上，国家介入工业化过程肯定是当时存在的现实和期望之间较大差距造成的较大压力的结果。亚历山大·艾柯斯坦(Alexander Eckstein)在一篇富有洞察力的文章中，提出了有可能增强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的几个因素。他指出，在下面几个因素下，国家对经济和工业增长过程的大规模干预的要求将会更强烈，(1)目的的范围大，追求的目标层次高；(2)达到目的所要求的时间短——也就是说，期望的经济增长率高；(3)要素和资源不利；(4)经济变迁和工业化的制度障碍大；(5)经济相对比较落后<sup>①</sup>。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五个条件必然得到公认——原因很简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起步得越晚，相对而言，它就越是落后，但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第一、第二和第四个条件看来也得承认。根据从实际中得出的一条列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国家干预工业化过程的刺激和要求已经不断地增长了。作为这个结论的推论，我们必须假定工业化作为一个方向已经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政策的目的；而且现存的精英，不论他们过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现在已经重新调整了影响全局的目标等级，他们把经济发展放在了一个日益重要的位置上，以图实现目标。然而，政府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中日益增长的兴趣并不只是意味着他们能够控

<sup>①</sup> Alexander Eckstein《经济增长中的个人主义和国家角色》，载于《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1958年2月第6期83页。

制社会的全部资源用来进行经济建设。它也意味着比任何其他机构要有效得多的政府能够通过改变报偿和约束的模式,通过重新分配责任和权利,通过以其他方式对社会结构的干预来影响社会行为的形式。但是,如果一个政府要成功和有益地施展这个影响,并且尽可能地避免意外的副作用,那么就有必要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变迁之间以及经济和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主要在理论层次上提出了一些关键的概念和观点,它们是那些在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被用来分析亚洲、非洲和拉美新兴国家的社会文化变迁的概念的一部分。接下来的文章应该更详细,更集中地探讨包含于社会学研究里的主要范畴和新兴发展中社会向技术变迁过程之间相互作用中的机制。

(卢晖临 译)

W.R.哥尔德夏米德

## 文化因素与新专门技术的获取 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的任务可以说是从一个较远的方面来处理本协会面临的这个问题,以便寻求一种文化何以可能自然而合逻辑地拒斥那些本可以提高它的生产力或使它向我们认为是更好的生活靠近的援助的原因。从落后地区人民的立场出发,我将不可避免地欧洲模式有所批评。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人类学文献中的文化同化研究,所以将以更加原始的民族作为例证。本文也将参考那些受欧洲影响已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的社会。

我的任务具有科学与道德的双重意义,就主题而言更为根本的还是其所面对的道德内涵。一开始,我的见解就可简洁明白地概括出来。我不认为各种文化都同样地好,我也不认为我们文化的任何一种变型都必然是最好的。我相信优秀的文化应该是:(1)满足其成员的生理需求;(2)有能无限地持续这种满足的机制;(3)在自身的价值体系内部为成员的人格调整提供必要的空间,使其余的人或部分不受到身体上或心理上的伤害。我并不以获取这些目标——如上所示,已有例外——的手段,或以我们自己社会里的文化

---

\* 选自霍塞利茨主编的《不发达地区的进步》。

期望作标准来评价一种文化。

我视变化为所有文化系统中内在的因素,也是一种在接触情形下不可避免的因素,文化承担者的道德责任将由此发生引起细微社会裂痕的改变。在实践层面上,这不意味着应急切地将此文化转变为我们西方文化的苍白影像,也不意味着得出文化将要也应该保持不变的盲目假定,而是意味着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假定和受我们影响的落后地区的文化后果作相当仔细的审查。

在此序论里必须引入一种论点,即人群的文化并非是行为特性、知识以及观念的简单聚合,而是一个连锁的系统的整体。这意味着文化里任何一点上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余部分的反应。文化是个宽泛的概念,这点暗示了它是超越了社会科学里的普通规则的、由各种因素系统化而成的整体。这就是说,在经济生产、政治体系、宗教信仰、社会生活,以及那些仅仅得到间接表现的深微趋向和伦理态度之间都存在一种关系。

对我们的目的来说,这意味着文化永远不可能聚在一个点上,相反,它们构成了系统。这也意味着我们既不能抛弃自己的文化背景来引进技术变革,也不能指望技术革新会使社会的别的层面不受影响。对这两点,后者我们将有进一步讨论,而前者则只在此就现成材料作一点简要阐明。

第四点计划建立在进步具有与生俱来的价值这种假设的基础上。总统的讲话以为,如果把“我们技术知识储备所具有的利益”带给那些在落后地区生活的人民,那么他们就能“认识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望”。<sup>①</sup>这证实了有一种信念深深地确立在我们的文化秩序里,这种信念认为进步是自明的善,物质的获得直接导致更美好的生活。虽然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个观念,但是片刻的反思即会使我们认识到它事实上是由我们的很多经验误导而成的文化假设。文化携带者

---

<sup>①</sup> 哈里 S. 杜鲁门:《就职演说,1949年1月20日》,引自《国会记录》(华盛顿特区:政府办公厅,1949)第95卷,第447—447页。

——在此我特指那些引入变化的人——事实上制造了这种文化假设。内政部的报告充斥了这样的内容：人民并不赏识正在为他们做的事，因为即使对由文化获取进程所产生的失序程度打以折扣，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进步”的价值或物质获取的意义。

我们的任务将是探明为何别的民族拒绝由我们的技术知识所能提供的帮助。这样的拒绝采取两种相关联但也有区别的形式。首先，革新引起现存社会秩序的分裂，制造出困难和艰苦。使社会成员的生活变得艰难。这些问题可能甚至还未被认识到，但是最终它们总是要出现。其次，文化革新可能与人民已经确立下来的行为发生冲突，遭遇到那导致它被拒斥的已确定了的的态度和偏见。因此，甚至善意和有益的变革也会因当地社会文化中的某些深层原因而被放弃。

我将在文化的全幅范围内分四大领域讨论文化革新被否弃的问题：(a)生态学的或人与其资源的关系；(b)社会学的或文化成员间的结构关系；(c)意识形态的或已经确立的价值，目标和禁忌体系；(d)心理学的或文化形式的生命取向。

## 生态学领域

任何文化都必须与其环境斗争，这意味着人口受到与当地技术手段有关的环境承载力的限制。当然，限制人口的方式可能极为粗糙，如杀婴、杀老人，以及战争。大体来说，调节人与其环境关系上的失序的努力可能会愈加艰难。

美国西南地区的纳瓦霍族印第安人，提供了一个把技术进步引入他们自己的经济生活而引起极端艰辛的例子。随着牧羊业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被引进，部落人口从1868年估计的9000人增长到现在的60000人还要多<sup>①</sup>。与人口增长相伴的是这些印第安人在过

<sup>①</sup> 美国内务部《纳瓦霍：印第安人事务委员的一个报告》(华盛顿特区, 1948年3月); 克莱德·库鲁克霍恩和多罗西娅·莱顿:《纳瓦霍人》(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1946), 都详细地讨论了经济和资源问题。

去20年前的赤贫。这些印地安人的环境在过去几年也受到了很多的公开注意。这不仅因为那里有现存的贫困问题,也因为滥牧的累积性影响已导致了那个地区承受力的削弱。削减牲畜的计划虽有很大帮助,但对根本减轻现在的滥牧状况却无能为力。

这是直接由于新的专门技术之引进而造成的人与其环境关系的失序。虽然这不是一种如第四点计划一样自觉的努力,但它依然是一种专门技术的引进。

莫尼卡·亨特就南部非洲的畜群报告过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sup>①</sup>。欧洲人为当地畜群建立了消毒系统,所以畜病减少,牲口成倍地增加了。滥牧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削减牲口因而势在必行。然而,对于这些以牲畜数量而非质量来衡量一个人在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削减计划难以接受。

事情可能较此远为微妙。对墨西哥人饮食习惯的一项详细研究表明,任何试图改变当地居民食物结构的企图都要慎重<sup>②</sup>。对其食物习惯的分析表明,“即使没有奶品和肉食,这些食物也可能提供那些墨西哥成年人所需的营养。这样的结果显示墨西哥人的食物结构与美国人很不一致,因此,以美国人为标准来建立墨西哥人的营养方案不可取。”

对墨西哥人来说,有锦葵一类的东西作为其重要的营养来源很有意义。锦葵是一种外形如菠菜,遍布于墨西哥高原的野生植物,它富含钙、铁、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一点锦葵就可提供一半甚至更多的一个成人对这些成分的日常所需量。再说,那里还有龙舌兰和仙人掌酿成的本地龙舌兰酒。我知道有好心人宁愿撤除这道食物,因为按我们的标准来说它是酒精饮料且有渎神圣,然而,它给当地人提供了必要的各种矿物质和维生素,尤其是维他

① 《征服的反响》(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6)。

② 勒内·克雷维托, B. 艾丽丝, E. 洛克哈特, 里士满 K. 安德森, 弗朗西斯科 dep. 米兰达, 罗伯特 S. 哈里斯:《墨西哥传统食品研究》,摘自《营养学报》第14卷,第5号(1945年5月)。

命 C。

既然不存在由当地人自己来认识或感觉到这些生态问题的可能,就要由我们来更多地讨论这种失序的后果。如果技术变革被拒斥,它依据的将是那些深远而不可预见的后果之外的一些理由。行为习惯,饮食口味,已建立了的日常生活规则都很可能作为直接的制止因素而发挥作用。然而所有这些不合逻辑的情况,即使都具有终极意义上的真实性,它们还是会被一个“理性化的”“有效率”的管理机构轻轻地推到一边去。

### 社会学领域

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有组织的实体。这意味着许多被设计用来执行一些为了维持其成员的文化和福利所必须完成之任务的稳定、持久的社会群体的存在,以及在这些活动中作为领导人而据有的那些权威位置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些结构,社会就将不成其为社会,而是个人的沙聚。新技术的应用会破坏此类实体,并且威胁现存体系中领导的地位。

西方文明对土著文化的冲击可归结如下:一种金钱的经济制度和个体化了的社会系统冲击了某种带有群体责任和群体分配模式的家族秩序<sup>①</sup>。这即是说,多数原始的和农业的社会以某种较大的家族单位组织生产活动,在这种单位中家庭纽带占了主导地位,工作是相互的,其成员共同享有物质和情感上的必需品。

就这类经济事业组织自身来说,维持它不能缺少金钱,但它与把人际关系几乎全部转换成金钱关系,具有商业本质的西方文明有冲突。在那个“白人的责任”和无聊的欧洲人优越论的时代,发生了将家族制社会秩序的约束力加以摧毁的直接努力。南部非洲的

---

<sup>①</sup> 这是卡尔·普兰尼的中心任务:《伟大的转变》(纽约:法拉和莱茵哈特,1944)。

格林格雷提案,以及美国印第安人机构的分配体系,这两种把所有权给予个人手中而非保持较大规模协作实体手中的努力,即是以此理论作背景的。

嘲世者可以声称这些措施使得欧洲人对土著人劳动的较早剥削和侵占其土地成为可能,而上述理论和政策毫无疑问地是为这种贪婪服务的。但是,事实是:造成这些毫无自私动因的各种问题的两种组织原则之间存在着功能性对立。

夏普勒描述过金钱经济制度对卡加塔勒人的家族系统所发生的影响;卡加塔勒属贝专纳的班图族<sup>①</sup>。在那里,围绕着婚姻,不仅在夫妻间而且在夫妻所出生的两个家庭间,有一种相互负责的系系统,家庭是经济生产单位。因此,婚姻是长辈安排的。但是,儿子在成为城镇工人后,在经济上摆脱了对父亲的依赖,他们与这种文化自然地分离,他们的婚姻被迫推迟。这三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年轻人能独立地寻找对象,也使父辈的权威被削弱,家庭联合体中的相互依赖因素大大减少。

以上例子中的失序性后果,至少对当地社会中的某些人是显而易见的,对他们来说,接受这些必然发生的变化会有很大阻力。因此,那些失意的老人就不愿意看见年轻人行为不恭,炫耀他们向往的社会角色,而且与强大的宗教感情发生冲突。

另外,上面提及的那些主犯会失去了由家庭背景发散出来的心理慰藉,和共享制所提供的经济保护。现成的例子在非洲的其他地区、美拉尼西亚、美国的印度安人中都可找到。例如,其母系氏族系统交织之紧密一如任何已知的人类学论著所述的霍皮族人,现在也开始察觉到货币雇佣劳动的影响了。任何地方只要采取了这种方式,那里的人们就想夺取家庭领导权,以夫妻为单位建立自己的畜群和农场。极为荒漠的环境绝不容许这种金钱组织带来的放纵、贫困和完全依赖等后果出现。因此,1911年霍皮人放弃了建立

<sup>①</sup> I.夏普勒:《一个非洲部落的婚姻生活》(纽约,谢里丹书屋,1941)。

分配系统的努力<sup>①</sup>。

社会行为的个体化模式不完全依赖于工业化的基础。把奶品制造业引入新西兰的毛里人的经济也在其原有的互助模式和社会生活的满足上引发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后果<sup>②</sup>。霍索恩分析了这种情况,写道:

个体家庭的出现与谋生方式的改变有关联。奶品农场需要规模小而组织好的工作人员,也需要强有力的权威保证日常程序进行,个体家庭这样的经济单位很适合这种需要。相反,对于需要传统的协作技术才能更好地操作的渔业和园艺,家庭就不甚合适了<sup>③</sup>。

奶品制造业的成功运营需要改造乡村经济的所有方面,规则的整一性成为压倒其他一切的需要,而能连续合作的小规模工人团体,一个能时不时进行合作的全村性组织,也成为所需。它进一步要求学习动物饲养的许多新条例,加强权威并使其长久地持续以便适应这些新要求。通过一个自动的无人性的市场体制,报酬可单单用金钱付予。“20年前,很多东西对于那些开始奶品制造的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并且,除开结果,一切都可恶。”<sup>④</sup>这些可恶的事包括休闲时间减少,参观游玩被缩短,庆典与重要会议被干扰。

讨论社会学因素时也必须包括社区中的领导地位和权威问

---

① 劳拉·汤普森对文化的变迁和管理问题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文化危机》(纽约,哈普和布洛斯,1950)另外有一部分资料是现在正投入霍皮人研究的爱德华·托泽尔先生提供的。

② H. B. 霍索恩:《毛里人:关于文化同化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学会纪念集》,第64卷[纽约,1944])。

③ 同上,第57、58页。

④ 同上,第84页。

题,因为任何社会体系都有作出决定和领导事务的权力代表。一群人对领导权威的疏离分化了整个日常生活,并往往成为本文化中不能化解的因素。

说这是确实的,不仅因为社会的连续运转要求作出决定,也因为这些精英代表了文化的价值系统,扮演了作为普通人行为之稳定指南的角色。另外,任何社会中的精英都倾向于抵制外来文化的影响以保护本土文化;这些外来文化经常威胁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个人地位,也威胁他们在其中已有既得利益的本土价值。因此,技术革新的最大障碍之一可能就是当地领导阶层非常理性的反对。

在阿拉斯加内陆的阿萨巴其卡村民中,对领导权威的疏离令人痛惜地明显。1946年我曾在那地方呆过几天。那个极为素朴的社会曾长期受益于几种技术革新,但只有在阿尔干高速公路修通后,西方文明的冲击才得到了充分表现。在传统上,领导权取决于那些经过常年滚打而在追猎和设阱方面有丰富经验的老人。但是年轻的一代被白人的优越地位吸引住,对这些东西不甚在意,因此,他们变得急功近利起来,再不顾及那能使自己在此恶劣环境中更好地生存下去的长远投资了。这不仅是美妇和醇酒之事,而且是诸如合作管理、避免毛皮兽被杀绝一类的纯粹经济考虑。由此,在这种情形中的老人的无望令人难以忘怀。

英国人的间接管理策略在避免这个问题上效果显著。这是一种被称为“寻找领袖”,用当地精英治理其民众的策略<sup>①</sup>。然而,问题的解决远非如此简单,因为这些领袖可能违抗命令而损害大英帝国的利益,也可能过于软弱而失去领袖的意义<sup>②</sup>。

对加拿大平原的布拉德人的一项研究表明了精英在技术革

<sup>①</sup> F.D. 卢干达爵士:《非洲赤道地区英属地的双重统治》(伦敦:布莱克伍德,1929)。

<sup>②</sup> 英政府任命的乌干达首领有“官僚人格”的特征,见露茜 P. 迈尔:《一个非洲人在20世纪》(伦敦,罗特里杰,1934)。

新的接受与否中的作用<sup>①</sup>。在黑脚族的社会体系中,精英们的地位依赖于战功,而主要以马匹来衡量。随着欧洲人的统治和战争的消失,一种大大地改变了其社会组织原则的紧密的阶级体系开始形成了。加拿大政府为使布拉德人转向农业和奶品制造业而作出的早期努力没能成功。失败部分是因为布拉德人的习惯模式,如他们不习惯于长久地负责及不间断地努力,他们还认为体力劳动卑贱。

但是,与此变革无利益关系的精英们的态度也是造成此次失败的重要因素。他们的地位建立在一种过时的然而有文化真实性的大畜群的基础上。并且,慷慨与分配食物的方式使人通过勤劳积累财富并由此提高地位的努力成为不可能。所以,经过近20年的时间,有1400人的布拉德部落只开垦出了300英亩土地。

1894年,加拿大政府以一头换一头的价格以牛换马。富人相对优越的地位得到了保持,所以他们能顺利地接受这项安排;这不令人奇怪。在12年内,牛群总数达到了7500头。

约在1910年,以售现作物而非自给自足为基础的第二次农耕引进获得成功。新技术和红笛麦的推广减少了工作量,提高了收益。然而,“新的农垦计划获得了那些在自己社区里牲畜最少的人的最热烈支持”,这点很有意义;那些人,换个说法,就是穷人和无固定财产者。这次成功在一些习俗上——慷慨的模式,使地位区分有效的社会体系,以及部落内部组织好了的权威行使渠道——付出了的代价。

可能出现的民主制度不是一时潮流的异想天开的结果,我们的商业圈就有效地使黑脚人重新回到了贫困。在20世纪30年代末,以大土地占有为基础的新精英出现了,这些上层人物不再负有领导这种古老的责任。

---

<sup>①</sup> 埃丝特 S. 哥德弗兰克:《在保护时期黑脚氏族社会组织的变化形态》(《有关美国人种学社会的报告》, [纽约, 1954])。

技术革新与文化同化破坏了群体中的联系,削弱了当地的权威体系。它们倾向于以个体化模式取代群体中的联系,以外在的西方的权威体系取代当地的权威体系。与这些变革的对抗因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变化,但新的模式经常不能满足某些感觉性的需要,尤其是个人的安全感需要。后面我们将再回到这点。

### 意识形态领域

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要素是作为其成员目标的已经建立起来的文化价值体系,包括行为模式和环境界说。通常来说,它们是我们可称之为财富的以某些象征形式表现的稳固形式。神话、仪式以及道德训诫精心地保护了这些象征物与人的深层本质的关系。引入变化对这种价值体系造成威胁,所以甚至并非有意识地,人们也会固守他们自己所维护的意识形态。

外来文化威胁本土价值体系,削弱当地人对自身价值体系的依附,以及对这些价值造成不可预料的破坏,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我们已经指出了家畜对纳瓦霍人、布拉德人和班图人的重要性。在这样的例子里,人们都纯粹以数量而非质量来衡量价值;这与西方的价值观冲突了。由于本土的价值观无助于保持其社会系统,它也可能被认为是低劣的;然而,就在这样的每个例子里,人们都极不乐意抛弃那些已确定下来的价值模式。

由人群疏离自身价值观造成的破裂性影响,以及回归旧价值观或寻求新的标准体系的急切努力,在不断出现的本土文化保护运动中都得到了表现<sup>①</sup>。受西方文明的彻底冲击后不久,美洲、非洲、大洋洲都出现了宗教运动。总体上说,这些运动表现了对“古道”的坚决回归,或者说是对他们所误解了的古道的回归,或者

---

<sup>①</sup> 拉尔夫·林顿:《本土文化保护运动》,转引自《美国人类学家》,第45卷(1943年4月),有关这些宗教运动现在已有了很丰富的专题报告。

说是对一种“莫名其妙的希望”的热切期望<sup>①</sup>。这些运动也是渴望一系列因人而有意义且能为人掌握的价值观念的公开表现。这些被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的虚幻性质使这场运动因自身的缺陷而夭折，或者被转换成替代性的有意义的行为了。常常伴随这种狂热运动的幻灭经常留下了伦理的空虚，这种空虚使人萎缩，也使积极价值观念的展开更加困难。

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之圣物的改变会使权威的位置改变。已讨论过的领导权部分对此有所涉及。在此我想在讨论乌干达现代形势下某些因素时回到老话题<sup>②</sup>。这是一个特别的可以增长见识的例子，部分理由是因为已有很好的调查报告，更主要则是因为英国人在此为一系列启蒙政策作了基本实验。它由此显示出了在规范统一时善良意志的局限——我相信那里有足够的善良意志。

乌干达本国的理论认为国王是全部领土的所有者，但是，由于农民能自由地获得足够的生产资源，这点相对来说就没有意义。然而，英国人没将土地给国王，给农民，而是给了3700个中级官员。同时，英国人引入了作为售现农作物的玉米，规定地主可以用钱支付收割费用。因此，玉米种植大大地推广了。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分化出了一个无限制地膨胀其权力的有产者阶级和一个完全依附于他们的劳动阶级，大面积的土地单位实际上不可能提高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反，它使有产者强化了权力。

得到保存然而以新的圣物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官僚体制可进一步对此作出证明。在从前，这些少量的官员由国王从普通民众中任命，他们效忠于国王，受习惯的制约，而农民则有任意迁居的自由。然而，现在，这些官员由英政府赋予的权力的合法性完全外在于本

---

<sup>①</sup> 关于后者及其最新事例，作者引用了雨果·波斯斯的《“曼塞林”的背叛》，引自《美国人类学家》第52卷（1950年10月）。

<sup>②</sup> 布顿·罗斯科描述过巴干达（《巴干达》[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11]），露茜·迈尔（在前所引书及别处），R. L. 布尔（《非洲的土著问题》[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8]）对乌干达的现状作了描述。

族社会体系；这些权力是由西方地主观念的引入固定下来的，因此，总的来说，人们被剥夺了自由，土地权、权力以及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

对一种社会秩序之圣物的破坏，不仅使文化的各层面，而且使社会的整体结构，发出破裂。现代社会学家以疏离和失落来描述这种情形。也许应该将此弄清楚：一种失落了的社会秩序很容易受政治骗局的左右，而这对当地社会的健康，或保持一种被强加的社会秩序，都没有好处。

### 心理学领域

必须加以考虑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文化要素需要处理那些根本性的趋向，个体通过文化的深微蕴涵对此趋向加以实践。前人有很多错误的种类心理学被重新检验，在它背后的真实性意义重大。思考领域在其各种层面中被称为“无意识冲动”、“模式”、“基本的人格结构”、“世界观”、“主题”、“隐蔽文化”<sup>①</sup>。这些抽象术语都指示了这样的事实：任何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个体都分享对世界和人际关系的一般认识，都在一种特殊方式的行为里有某些基本前设，都对宇宙的性质作出某些假定，都遵守某些行为规则。由于这些特性在人的气质里隐藏得如此之深，所以显得就像是人的本质的部分。同时，当变异被发现时，一个外行的观测者又以为这是生物学上的不同。恰恰是缺乏自觉表达的特征的深度，立刻暗示出了

---

<sup>①</sup> 爱德华·萨丕尔：《社会里行为的无意识模式》，引自《爱德华·萨丕尔选集》（大卫·G·曼德鲍姆选编，贝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49）；露茜·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波士顿：霍克顿·米符林公司，1934）；阿伯拉姆·卡迪勒：《个人及其历史》（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9）；艾里克·艾里克逊：《尤罗克人研究：童年时代及其世界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美国考古学和人类学出版物》第45卷[贝克莱，1943]）；M. E. 欧普勒：《我讨厌成为文化的动力》，引自《美国社会学月刊》，第51卷（1945年11月）；克莱德·克拉克霍恩：《隐蔽文化和管理问题》，引自《美国人类学家》第45卷（1943年4月）。每个概念的特定意义之间有着重要差别，但它们都处理与人类行为有关的问题。

它们所代表的文化重构的真正障碍。

关于这些深层结构重要性的最佳例证取自对霍皮和祖尼印第安人的研究。他们的文化要求人抹杀个性,服从群体,抛弃个体化的和竞争性的行为。因此,要在氏族和特殊仪式组织的正常渠道之外提拔一个当地领袖极为困难。体育运动是非竞技性的,参与者并不因此而得到奖励或责备,竞争与成就无关,要找一个工头也有困难<sup>①</sup>。

一切似乎很明显,对世界的这种取向使获取为西方社会里的竞争所必须的那些结构有困难。前面已经指出,这种态度与本地区的生态需要密切相关。人格结构不仅在类型上而且在完整和健康的程度上都会变化。哈罗威尔对奥吉布瓦印第安人的研究表明了在持续不断文化接触和同化进程中发生的人格分裂<sup>②</sup>。这种分裂不是文化同化情形里的个人的表现,而是文化变迁的真正后果。要那些已投身于前面有过描述的本土文化保护运动的人,努力追求一种人格完整的手段,这事似乎根本就不可能。

## 总 结

在文化全部范围的多种领域里,以上讨论显示了因文化变革而发生的两类问题:现存体系里人与社会之整合关系的破裂,以及这个社群里急于避免自己的习惯模式、态度,已经确立了言行范式遭到破坏的成员对此变革的抵制。因此,本文看起来有否定倾向,暗示出对帮助落后地区发展计划的全然不满。

然而,这个结论立不住脚。本文刚开始就对两件事事实作了阐

---

① 见汤普森前引著作。

② A. 伊凡·给罗威尔:《罗夏技术所指示的文化同化过程和人格变化》,引自《罗夏研究交换刊物》第95卷(1942年4月);《奥布吉亚人的人格与文化同化》,引自《文化同化在美国》,索尔·塔克斯编选(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1);《价值论,文化同化与精神健康》,引自《美国心理治疗月刊》第20卷(1950年4月)。

明：变化不可避免。文化交流已经开始。再一个事实也需阐明：即使对那些正遵行它的人来说，本土文化自身也非必然完美。人类学著作既不赞同卢梭有关幸福的未开化的人观念，也不赞同他与此相反的堕落的人类的观念。因此，比如说，我们已经对英国在乌干达的政策所造成的某些不幸后果作了审查，即使如此，如果罗斯科对这块土地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那些旧形制也不会更受欢迎。

在参考了美国印第安人机构近年来奉行的印第阿斯莫政策后，我的一个普韦布洛印第安学生对此作了说明。抱着极大的讽刺态度，他引用了柯尼尔在看到普韦布格的宗教仪式，及在这些印第安人身上表现出来天人合一精神时的诗化感觉<sup>①</sup>；他真是太了解祭司的恐吓手段对这种所谓合一有多大的影响了，他也很清楚许多的参与者是多么的不情愿。从我们的立场出发，这个学生的态度是否在文化接触发生前就存在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今天有这样的态度。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是否应该行动，而是应该如何采取行动。由于技术的进步引起了文化的异化，这些规则应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制定。我举出一些能成功地将我们的技术带给其他民族（连带着“更好的生活”）的原则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1. 新技术的引进必须视当地社会的感情或实物需要，不要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们看起来很有必要。在此我们可以回忆起那以美国人的标准改变墨西哥人的饮食的善意努力。

2. 对任何技术进步都必须分析它会带来的自然律的和社会的后果，采取措施防范那些可能出现的恶果。在此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饲养绵羊和牲口消毒两件事带来的生态问题。这不是说不该作如此引进，而是说应该预料到这样的后果并加以转移。

3. 较新的技术应与当地社会的组织原则相适应。将新的生产技术介绍给那些惯于在牢固家庭团结上生活的人。即使付出几分

---

<sup>①</sup> 可参考《美国的印第安人》（纽约：门特书录）第一章。

效率上的代价,也应该有助于而非破坏这种家族主义。我相信,如果认识到了后者的重要性。就可将奶品制造业引入新西兰而不破坏其社会凝聚力。

4. 然而,这个原则必须有其反命题。对本土文化过于热衷,完全可能使其组织板结硬化,而这是危险的。我们不能忘记所有的社会组织都有动力和伸缩性,弹性对保持其健康是必要的。

5. 以上两个原则也需应用于本土的价值观系统。对本土行为目标的破坏只能引起社会失落,不可能导致对西方价值观的自动接受。反过来,这使不真实的价值观,对不真实目标的行为意向,以及敌对与依赖的模式得以出现。与此同时,由一种价值观出发作出的价值判断,与对一种古老价值观的盲目固守,具有同等破坏性。

班图人和纳瓦霍人以畜群大小作标准的价值观损害了其社会的长远利益,因而必须如现在在美国西南部正开始实行的那样改变其饲养牲口的价值观念;这点认识很重要。

6. 一个健全的社会体系使其普通成员有可能获得其价值观。因此,保护社会领域的进取渠道以及由文化期望而产生的满足感就很重要。我们在此再次提到乌干达的情况。那里权力的定型化切断了个人获取成功的途径。

在已提及的哈洛威尔著述的基础上,我的一个学生就人格变异问题对威斯康星州的默诺默尼人作了研究。他的研究表明,通向西方价值观意义上的成功的可能性——当地的大锯木厂使此成为可能——容许了当地在文化同化后发展出一种完整的人格结构。

7. 最后,如果所有这些原则都得到了满足,那么,对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文化系统,以及由深思熟虑的革新引发的自然律和社会上的后果都做出详细了解,就明显地有必要了。

(张德伟 译,仲夏 校)

罗纳德·多尔

## 对文化和社会变革的思考<sup>\*</sup>

这些“反思”开始于一次研讨会，在那次研讨会上发表了本书所包含的各篇论文。那种会通常是最后一次会议，旨在总结情况，突出重要的见解，让每个人都带着一份满足感和成就感回去。但即便在当时，会议也已严重偏离了那项任务。然而，现在这项任务已经由加里·杰里菲在其导论（本书第一章）中胜任地完成了，因而我觉得我要比当时有资格一些通过对所讨论问题作出高度选择性的评述来补充一些看法。

我想从一个相当乏味的概念问题入手，我想指出，在一个关于“发展战略”的研讨会中，人们对“战略”实际上却很少真正谈及，因为它们已经被隐含地界定好了——战略就是当政策制定者们作出经济决策时，对可能产出的因果序列所作的预测、打算和假定的混合体。这次研讨会的大多数论文撰稿人——罗伯特·韦德（本书第九章）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并不真正想要试图通过历史证据确定那些政策制定者们在某些特定时刻的意图。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对问题没有进行过大量的思考。例如，弗雷德里克·戴约、罗伯特·考夫曼和郑敦仁所撰写的（本书）章节所阐述的主要就是利益集团的压力，这种压力被假定为帮助形成了经济决策。在会议讨论期

---

\* 选自 G. 杰里菲和 D. 怀曼主编的《制造奇迹：拉美和东亚工业化的道路》。

间,人们听到这样的评论:“是汽车公司决定进军巴西呢,还是巴西政府决定巴西需要一个汽车工业?我料想情况大概是前者。”

那些试图用真实的历史证据替代假定和猜想的研究可能颇有价值——这里是指从当前的政府计划和文件,以及政府档案所不能提供的口述史料中寻找的证据。由于绝大多数的政策争论都是围绕政府能做些什么这样的问题,因此了解政府在过去曾经“成功地”做到或未能做到的事情,不妨明确政府在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正在设法要做的事情。

如果有人做到这点,他就能够回答这个绝非乏味的问题:近几十年来,拉丁美洲和东亚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是否真正有意识地奉行了“战略”?或者,把它称之为《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所述的那种情形是否更为恰当——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将军们那样,政府官员们在各种决策之间摸索和踌躇,并对当时的诸多压力和机遇作出实用主义的反应?古斯塔夫·拉尼斯在讨论的某个阶段宣称他的预感是,后者是更为准确的见解。他指出,接连出现的构成“新政”的实用主义的政策选择仅在事后才被称为“新政”。这无疑是事实,然而那些年里所采取的一连串政策一旦加上了“新政”这个名字,它就成为一种抽象的和可以把握的“战略”。它就被当作一种形态(*gestalt*)来思考——即对关于什么政策应当导致什么结果具有一般理论理解的一组理性化的政策原则和工具组合。同样,发展经济学文献和学术会议的讨论则是在事后将发展中国家(地区)近几十年来的经验,总结为诸如贴上进口替代工业化(ISI)和出口导向工业化(EOI)标签的战略组合(尽管这样做会起误导作用!)。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那些国家(地区)的任何规划办公室内,目前都不太可能没有以这种术语思考和谈论的人。但在15或20年以前,在做出将会产生本章节所讨论的后果的决策时,情况也是这样的吗?现在的世界要比凯恩斯的时代变化得更为迅速。他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务实人员”并不是“一些早已过时的经济理论家的受害者”;他们的影响(通常通过像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而具有很大的作用)来自那些将他们在较近

的过去所采用的模式和所得的教训进行提炼(或者为他们的偏见寻求支持)的远为近期的理论概括家。

当然,这种让新的概念“能用于思考”的渐进过程并非仅适用于整体的战略。例如,在这些章节的分析中起到相当大作用的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之间的区分在经济学中就并非那么古老。有关人们在其中具有(或者能够获得)高动态比较优势的工业,以及具有低动态比较优势的工业这个概念就仍然受到人们的蔑视。东亚人出于政策目的而对各个部门及其相应归类所作的思考中,有相当多的类别(其中一些为这些章节所采用)是由日本人发明的,然后再通过共同的表达方式传播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如“重化工业”、“高附加值生产部门”、“信息密集型工业”等等。

## 模 式

类别、概念和一整套战略都源自对过去模式的分析,而且正是这些模式而非战略的本质特性构成这些章节的主要论题。政策制定者们进行思考时所使用的、并且在形成这些模式时起到一定作用的类别和战略框架,可能仅在分配赞扬和责难、将“成功”或“失败”归因时才显得重要。而对于确定政策制定者将来进行思考所使用的类别而言,它们就没有像本书中那些对模式进行事后分析的分析家们所使用的类别那样重要了。

究竟是什么引导分析家们追寻模式,即不可避免地作出武断的决定——要这样进行分类而不是那样分类——比如在对某个模式的具体阐述中要包括汇率,而不包括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用于教育或者研究与开发的支出比例?首先,我猜测,让一个模式具有意义的是它对**重要**目标的相关性。大多数关于发展的讨论都是相当意识形态化的。那些认为利益只能来自,而且只有利益来自市场的解放的人,与那些喜爱用较为结构主义的解释来分析经济动作以及用较为干预主义的药方使经济更好运行的人之间,显然存

在着激烈的意见冲突。即使有人能够说出如果本书的大多数作者不得不推翻这样那样的藩篱,他们最终将走向哪里,这些章节也令人欣喜地摆脱了情绪激烈的党派偏见。这里存在着相当多的共识。但这并不是说只是因为价值观是大家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就是不重要的。例如,较快的经济增长被普遍认为要优于较慢的增长。低基尼系数在这些章节中则被普遍看作是较之高基尼系数更好的或者“更加有利的”收入分配(甚至持有下面这种看法的作者们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无疑要争辩说,如果在他们自己的社会里处理平等的快捷方法开始威胁他们自身的收入时,平等应当服从分配的公正性和刺激)。

那么,这些大家共同持有的假定目标是什么呢?法哈恩西尔维尔(本书第十二章)列出了对国家的表现进行评估的八个层面。无须上升到很高的概括程度,它们也许就能归纳为这样三点:(1) 动态增长伴有在国际的人均收入和技术复杂性等级中地位的不断上升;(2) 收入分配与社会内聚性的相对平等;(3) 国家的完整和独立。这些就是发展研究的团体——即有意义的模式寻求者们的团体内——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念。差别只在于其各自的侧重点:新古典主义右派更多地强调第一点而不是后两点,而且在第一点中较多地注重收入而非技术复杂性尺度;而左派则持大体相反的观点。

人们对这些目标所赋予的重要性有可能影响他们从经济资料和统计年鉴中找到的时间序列趋势线所得出的模式形态。它将决定哪些是人们认为重要的、应当包容在内的东西。区分当地拥有和外部拥有的工业资本是否重要,是否属于某个“模式”或战略组合——或者说对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实际利率和影子利率的离差、或补贴和信贷分配的重视情况——部分取决于其结果的广度(即它们影响其他变量的程度);但它也同样部分取决于哪些政策目标受到重视,以及所讨论变量与这些目标之间直接联系的程度。

当然,其中也存在着声称这类讨论“有用”——对那些确实需要为发展中国家(地区)制定政策的人有用——的观点。早期规划

文献中所设想的抽象的、毫无生气的计划者已经让位于或多或少有些腐败的文职人员,他们过多地专注于眼前的问题而不会对长远的未来考虑很多;他们易受政治主子专断的怪念头的损害,而且会受到利益集团影响,从这边和那边发出的冲击。但是,我们不应当朝另一个方向走得过远。那些在发展中国家(地区)制定政策的人们,除了想要取悦于他们的专制长官,或者解决他们眼前的收支平衡危机,或尽早从办公室离开去打一场网球,或想挣上100万元以外,他们同样也常常急切希望看到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在世界上更受人尊重。只要他们所持有的价值观——以及由这些价值观所引出的目标——与我们也当作出发点的价值观相吻合,那么我们从其中得出的模式和解决办法就能够声称是“有用的”。

这些解决办法只能来自对模式中因果序列的理解,而且本书的这些论文正是在“为什么”而不是在“什么”方面,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思辨性解释。让我们顺便指出,就像任何自由意志或决定论的论争通常总结的那样,这些解释必须停留在思辨领域是一件好事。倘若有可能用拉尼斯的术语(本书第八章)来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巴西和墨西哥或者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之间的差别作出“内源性”解释——即单单用诸如资源条件或国土大小之类的既定初始条件来对它们作出解释,那么政策选择就可能不起作用,对分析家而言也就没有“有用性”的存在可能。

### 有待解释的术语

那么,模式之间[比如东亚和拉美国家(地区)之间]的哪些差异需要加以解释呢?(而且,对此作出解释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在我们所归纳的法哈恩西尔维尔的清单中的所有三个层面——增长动力、平等和内聚力以及国家独立——近年来东亚似乎比拉美做得更为出色。)从这些章节中看,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答案并不是 ISI 模式和 EOI 模式之间的截然对立。

似乎是从这些章节中呈现出来的对照模式的共同特性也许能用最粗的画笔描绘如下：东亚和拉美国家(地区)开始时都是以国(地区)内生产替代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通过初级产品的出口或者向外国借款为这一进程筹措资金,并且利用新兴产业的各种保护主义措施来帮助实现这一进程。但东亚国家(地区)试图逐步摆脱保护,以便使新兴产业能具有世界竞争力,并能开始出口产品以争取外汇用于下个阶段的 ISI——耐用消费品与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然而,拉美国家可能保护的时间持续太长,结果,它们未能达到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水平,因而在制成品出口的增长方面成就不大;在其进一步的工业化努力中,它们强调的是耐用消费品而非资本货物和中间产品,而且他们继续通过初级产品出口和国外借款来为这一进程筹措资金。

### 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的解释

在关于模式之间差异的可能解释中,当然会有他们遵循的是不同的战略这一可能性:研究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是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毕业生,他们信奉道德化的市场主义;而对拉丁美洲的研究则受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ECLA)的结构主义者和那些只是慢慢地才认识到国家干预局限性的依附主义者的支配。但从他们旨在摆脱自给自足以及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不断下降的意义来看,似乎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拉美的政策制定者实际上是反对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在某些时期,印度和中国的政策精英肯定也是这样的。

那么,倘若不是战略,也许就是模型了?法哈恩西尔维尔(本书第十二章)关于日本和美国模型各自影响的看法——前者是一种集体努力征服国外市场并且在国际经济力量的排位顺序中不断上升的模型,后者则是一种鼓励个人努力追求各种消费模式的模型——是相当令人信服的。

拉尼斯的看法(本书第八章)也同样具有说服力,他认为国土大小和资源条件之间的差异必定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东亚模式要求有一个强大的上层采取强硬的行动,通过解除保护逼迫新的工业很快具有竞争力,坚决主张以不断增加储蓄取代向国外借款等等。拉美模式则更像是一种放任自流者的模式,而这些拥有大量自然资源作为支撑的国家更容易经得起放任自流。

但放任自流政府和有目的政府之间的那种差异当然不能只从通过“放任自流就可以过得去”这种能力的角度来加以解释。这里似乎确实存在某种差别,人们可以称之为“发展的意愿”——即在那些担当决策任务的人们的政策目标中突出实现持续增长的目标。中国台湾地区,还有韩国的大多数官员和政治家们可能主要关心解决眼前的麻烦——而在拉美情况则并非完全如此。他们可能主要关注于解决眼前的外汇危机;但在选择处理该问题的各种可行方法时,我认为东亚各政府(当局)更可能考虑的是那些可行方法对经济增长和国家独立以及可能还有内部稳固的长期前景的影响。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在“发展意愿”上的差异。

这两个地域的国家(地区)在这方面为什么竟有差异呢?所提出的一个原因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感到在强者面前需要显示自己的力量。值得记住的是,特别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具有相当了不起的经济增长记录。对于当时摇摇欲坠的韩国政权来说,它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同一时期似乎也有某种迅速发展的前途。

但是制约“发展意愿”的因素可能比上面所说的更为复杂。记得在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论文(1962年)中,他首先探讨了他所谓的“落后的优势”——关于后发展国家(地区)的具体差异特征。这些优势主要有两点。第一,后发展国家(地区)能够从先驱国家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它能够以先驱国家在经历了不那么恰当的安排后很久才找到的优越制度安排作为自己的开始。第二,正是后发展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共同持有的落后意识,为政府调动资源、采取

主动和承担风险的行动提供了特许证。至于为什么这种落后意识和希望迎头赶上的紧迫感在亚洲国家(地区)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中间要比拉丁美洲国家可能更为强烈,则有许许多多的原因。

首先,文化差异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给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带来他们本国(地区)落后于外国这种意识的,往往是他们自己在国际环境中的个人体验。在这类场合,人们——尤其是那些主要通过其国家标志而为人们所知晓,如“我们是浪漫国的代表”而不是“霍奇先生”——身上带有代表他们国家(地区)在国际排位顺序中地位等级的派头。两个世纪以来,一直由欧洲强国或至少以欧洲为中心的强国所主宰的世界中,非欧洲国家(地区)在排位顺序表上低于在根据经济力量或表现所应排的位置。

作者记得,在一本日本杂志上有一则颇能说明问题的故事,它讲的是日本首相三木武夫70年代末在法国朗布依埃出席一次经济峰会的情形。朗布依埃这个地方显然吸引大家进行那种传统的餐桌谈话。瓦莱里·吉期卡尔·德期坦说起峰会国家的某些努力时,说它就像是西西弗斯<sup>①</sup>的苦差事。在场在其他6位领导人有5位都知道关于西西弗斯永无休止地朝山上滚动那些石头的典故,但三木首相不知道。于是会议不得不暂时停顿,以便解释清楚那个倒霉家伙究竟是谁、他推那些石头干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个故事非常重要而且众所周知。据记载,这使首相感到自己完全像一个局外人,于是他决定在出席下次峰会之前一定要找本关于古典神话的书来读读。这只是一个平常的故事,但它的确表明了局外人的感觉能够转变为对自己在国际排位顺序中地位的认识。而且,鉴于“国际社会”的性质,东亚人要这样做就可能会比与主导强国拥有相同的根植于地中海的文化的拉美人更加痛苦——而且后者往往还合情合理

---

<sup>①</sup> 西西弗斯(Sisyphus)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古代暴君,死后坠入地狱,被罚推石上山,石将到达山顶时又滚下山去,西西弗斯只得重新再推,就此循环不息——中文版编者。

地把自己看作是较之邻近的北方国家内一些较粗俗的人更为老练成熟和正宗的这一文化的代表者。

拉丁美洲的工业化起步要早得多,这也是这种对比的一个相关因素。尽管其工业化是在这些社会中较受限制的地域展开,但它的起步方式与工业化先驱国家的工业增长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它是个人出于自身利益而发扬创业精神的结果,而不是政府行为的结果。而且在这些地域中,它已达到了世界水准。在50年代,拉丁美洲拥有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同样出色的心脏外科医师;它也有因其作品完全属于欧洲传统而赢得诺贝尔奖的诗人。从那个意义上说,除了个人在国际环境中的老练和自信以外,拉美人没有什么理由要对他们国家的地位有一种落后的感觉。

拉美与领先的强国保持同步的地域特性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在城市的欧洲化地带与乡村之间,存在着比在亚洲国家(地区)所看到的远为明显的差异——即使在南锥体国家也是如此,更不用说中美洲北部或墨西哥这些种族人口混合的非同质地区了。费利克斯(1986年)近来描绘了这种分割的经济后果之一,并结合了人们习惯所说的“文化依赖性”。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上层消费阶级创造了一个繁荣的手工业部门,以便提供他们本土各种形式的挥霍和奢侈消费,而这种消费仅在后来才得到进口商品的补充,而且是居次要地位的。当工业增长开始产生和培育一个新的中产阶级时,它保留了那些原有生活方式中的大部分。因此,扩大家庭手工业部门所具有的乘数效应(和收入均等化效应)是相当可观的。相比之下,拉丁美洲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则一直是更多地依赖于进口品,而且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展开,情况更是如此。因此,乘数效应越小,则失业和非充分就业就越是加剧,不平等情况也就越严重。

让我们回到“落后意识”和要求赶上的动力这个主题上来,那种区分在国家地位感的发展中同样也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毕竟这种国家地位感对任何有关“某个国家”是落后国家这一感觉来说是一种先决条件。比如,我猜想,许多日本的医生或者甚至是经济

学家同一位日本的农夫晚上同桌饮酒,要比同一位美国医生或经济学家共饮会感到自在得多。相比之下,我想一位墨西哥医生若同一位美国医生同桌,则可能会比同一位“印第安”农民同桌感到舒服得多——而且他会很乐意与他的美国朋友交流有关农民的那些可笑而不可理解的方式的故事,而不会感到有义务保护他的同胞免遭美国人的轻视。换言之,民族纽带相当薄弱,会被职业纽带轻而易举地冲破。

这些因素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会影响经济发展,将成为政策制定者突出考虑的程度,而且还因为它们会影响政府的政策被合法接受的可能性——即要让大家相信那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是让部分利益集团得利的一种密谋。只要是在真正拥有国家利益意识的地方,人们就更有可能痛恨腐败,因而也就更可能抑制腐败的发生。从总体来说,那当然是应被看作是一件好事,即使腐败现象的严重缺乏有时也的确会吓跑外国投资者——以新加坡的官僚机构为例,据称有时它会把外国商人赶向比较随和的马来西亚人的怀抱。

一种共同拥有的压倒一切的国家利益意识,对于政策的有效性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韦德撰写的(本书)那章提出了一些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官僚机构的主动性能够成为促成犹豫不决的私人部门决策的一种有效手段——当官僚机构普遍受人赞誉时,或者如果它被认为比商业公司拥有更多的信息等等。人们也许还会补充说:如果一种共同拥有的民族意识会给予官僚机构和商人一种对国家问题的共同认识——比如说,外汇短缺是他们两者以及所有同胞的一个实际问题,成为他们之间的共同基础。正如考夫曼和郑敦仁所论述的那样(分别见本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在讨论压力集团对拉美政府的要求比对东亚政府(当局)具有大得多的力量这个问题时,通常的解决办法因而是寻求政府与社会的隔离。但是,这种隔离所需的程度取决于那些能对国家机构施加压力的人士与官僚机构人员所共同拥有的目标和认识的程度。

本书的许多章节已经用图表说明了这种隔离层面——利益集团对政府(当局)要求的程度和强度所存在的差别。他们提到了许多显然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国家(地区)的大小和社会/文化上的多样性;社会组织传统宗教基础、军事力量在执行军事管制时的内聚力;大众政治的传统,福利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等等。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可能因素是:官僚和政治家们所享有的相对社会声誉。比方说在英美和日本之间,在这方面就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日本在成为民主国家之前很久就已成为由精英集团统治的社会。两三代人以来,精英官僚们(他们的精英统治是通过他们所经历的严格的教育选择过程得到保证的)在积累了足够的资历和功绩后,逐步地上升到国务活动家一级,只有极短暂的时间——半心半意地——扮演独断专行、工于心计、善于讨价还价和进行诱劝的政治家的角色。而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在成为民主国家——从它们的领导人中培养政治家,从它们的政治家中培养领导人——之前,很久就开始采用精英统治的方法挑选它们的公仆。

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把孔子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传统(日本也是这样)与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获得的现代招聘和培训方法相嫁接,也开始实行了由精英统治的专制主义官僚政治(如果人们把李承晚时代之后当作开始的话,至少韩国的情况是如此),并且只是逐步地趋向民主化。如同在法国那样,那些由于年轻时学有成就而取得正统合法性的官僚们在要求对社会中冲突在利益集团以符合国家(地区)利益的方式作出仲裁时处于比政治家更为有利的地位(虽然在法国,来自政治家们的竞争要强烈得多,时间也长久得多)。确实,官僚们要比军人武夫们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后者只是在每一次周期性的政变之后突然出现,随后便要求接管政权。

### 文化与经济表现

如果人们想得到说明国家(地区)间经济表现差异的令人信服

的解释,那么,这些文化因素正是最难捉摸而且又是最应抓住的要点。由于新教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在追溯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各种增长潜力过程中曾经出现了繁荣的工业。它常常被视为一个在比较宗教学教科书中总结的各种信仰教条与某些经济行为之间寻找逻辑上的一致性的问题。但儒家学说与东亚的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却不是那样。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文化特征的问题:对当权者的态度,在个人生活计划中责任心与享乐主义的平衡,互相面对着的集团的社会凝聚力,以及人际信任程度。它们与职业儒学派所阐明的理论有着松散的联系,正如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一样。

事实上,在本书这些章节中,很少明确地议论文化因素,在讨论会上,人们每每提及文化因素时,总是带着迟疑而且伴有几分歉意的口吻。部分原因或许是“软弱”的社会科学家对他们“强硬”学科的同行们的胆怯。从时间序列或交叉部门预算数据可以得出“储蓄倾向”,而苦行僧式节俭的污名必须从奇闻轶事中去拼凑。

但这也不仅仅是软弱或强硬的问题,经济学家中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范例是有关人类社会的,而该范例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在与本书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所有方面,人在任何地方都是相似的。他们可能在实物资本或人力资本的禀赋上偶有不同,但就动机构成而言,人的本性无论何处却是大致一样的。因此,假定有凭经济指标衡量的相似初始条件,人们所需要的就是正确的(政策)工具和政策(即自由市场的框架),然后,所想要的反应就必然产生。很难想象会有人完全相信那一套,但许多经济学著作却只擅长于诸如此类的假设。

人们不愿谈论文化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害怕被视作种族主义者。谈论儒家文化可能很容易就被看作是在用密码谈论蒙古人的基因。或许基因真的有些影响。但无论人们是否认为接受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容许的,或者是种族主义的,这都与民族文化对经济表现可能产生的影响无关。人们不能把小孩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同样也

不应为了避免种族主义之嫌,而舍弃关于“成就的需要”、“同情”、“对人的信任”、“未来导向”等等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的假设。这些假设在60年代关于现代化的讨论会中,曾进行过认真的探讨。“现代化”,即使不再是像70年代初那样被看作禁忌的字眼的话,也许仍然是个很不时髦的概念,但是,以它的名字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却一直未曾降低。

让我阐明某些价值观和个性特征。它们存在于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或很大一部分中这一事实似乎(以前面提到的条件衡量)有利于取得良好的国家(地区)经济业绩。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些价值观和个性特征似乎是“可取的”。在本书一些章节中已含蓄地假设了许多价值观与个性特征的重要性,但要注意的是,并不要求人人都具备所有可取的个性特征,也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成为敢担风险、并且具有充满灵感的领导才能的企业家。而另外还需要的是能尽职尽责的追随者,而且需要量可能比较大。

有些文化特征通过数字清晰地显现了出来。正如在斯托林斯的文章中已列出的(本书第三章),拉美国家增加而东亚国家(地区)减少外债这一倾向的出现是由于国(地区)内(包括家庭)储蓄的水平和发展趋势不同。延迟享受的能力——不只是指想在下周拿两罐果酱代替今天拿一罐,还有不是听任一时冲动办事,而是计算下周确实能否得到两罐果酱的可能性这种习性——必然与这种解释相关。1986年费利克斯曾剖析了这两个地域之间在消费方式和收入水平对食物和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弹性影响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对这些国家(地区)经济的进口边际倾向有很大影响。它们似乎也源自于价值观的差异,而且,费利克斯认为,还有上层阶级生活方式的历史差异。

其他人们认为同样重要的差异不易从现有的时间序数中推断。例如遵守承诺的责任感——即合同安全可靠至关重要的意识,这是建立鼓励担风险的信任感的前提。如果有为数不少的合同需要靠诉讼来确保其执行,那么经济就不能高效地运行了。这种“责

任感”也与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有关的职业道德和诚实相联系。不论人们对公仆们物色合同人选的能力有何看法,机会落在亲朋好友头上,而不是他们公开宣称他们所选中的潜在成功者头上这种做法总是既省力又收效。在经济补助中,究意是有95%,还是只有50%,按客观标准被投放到重点工业中,当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 技 术

作者记得,在以往有关现代化的文献中还有一个文化特征曾被提及,它可以被描绘成“拆不开黑匣子比什么都难过”——这是一种掌握智力的渴望,它使男人或女人在使用他们不懂其工作原理的机器时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如果唯一懂得并能修理这台机器的人是外国人的话。经济学家关于新兴工业国(地区)供应方能力增长的讨论,大多围绕着资本积累的数量和作为人力资本积累代表的中学、大学入学数字。这两者都有严重的缺陷,但也有确具价值的一方面。让我们先讨论第二点。

技术转让基本上是学习问题,而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代表度量的上大学是衡量学习过程有效性的一种差劲的测量手段。就工业发展而言,真正重要的学习是在工作岗位上的学习。在那些把大学毕业看作学习的一个过程的开始,而不是沾沾自喜地认为是其终结的社会中、工作中学习最为有效。最近对日本技术人员所作的调查包含这样一问题:“你离开大学后多久才意识到你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其实并没多少用处?”平均答案是一年半。或许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对这一问题的前提提出质疑。

技术转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全得或全失的过程。当购买了一个新工厂,并配备了先进技术后,那么学习在日常运转情况下有效地管理工厂是一回事;而能以自身才智维修、保养工厂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而要充分了解工厂,了解其设计所依据的科学原理,从而能复制这个厂那又是一回事;而在复制时能够凭借操作经

验作出重要改进,则更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一个社会中“不容忍黑匣子”综合征患者的密度越高,那么上述的学习过程也就进行得越快。我从有关文献和商界人士的谈话中——或许存在着一些调查数据,但我不知道——得到的印象是:在亚洲大学毕业生中,上述密度较高,而拉美或欧洲的高等学府更注重身份地位,因此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中上述密度就较低。

最后要提一下技术和资本积累——另一个衡量供应方能力增长的重要量度。投资数字需要仔细地分析,然后它们才能开始——而且仅仅是开始——考虑技术复杂性程度的变化。事实上亚洲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决策者们相当关注技术复杂性程度。这表现为频繁地讨论是否需要转向附加值较高的生产部门,例如,新加坡通过增加工资来加速这一进程。这种关切部分是为了在面对拥有工资成本更低这一优势的国家的竞争时,能保住出口市场份额,但部分也是为了国家的荣誉;在一个越来越重视技术的世界里,一个国家宣称自己距离高科技的前沿阵地有多近已成为决定其“国际地位”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且看目前美国人对将被日本人赶上大为神经过敏)。

寻找有意义模式的人们需要设计出新的资本投资的数据分析方法以便抓住这些差异。进出口的数字也应当如此处理。正如近期日本人尽管遭受到猛烈的汇率波动和价格竞争,却依然有能力保持住它在美国的市场所显示的那样,主要对价格敏感的低科技出口产品和主要对质量敏感的高科技出口产品之间的区别,在世界经济中有着日渐显著的重要性。对资源缺乏的东亚出口国家(地区)来说,这点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是在保护主义日益严重的世界中寻求生存战略的。

## 结 论

在结束围绕拉丁美洲与东亚的差别所引出的各种问题的漫谈

时,我提不出任何可以总结的中心主题,除非是下面这种情况:探索这个内在因素或探索那个内在因素。表明在一定的资源条件和历史背景下,为什么这个进口增长、那种投资方式——乃至实行自由化或加强控制的决策——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而且情况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许多人抱着对自由意志的幻想,试着去理解自己国家(地区)的状况。并企图(而且以各种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采取行动)挑选一套政策以期改善国家(地区)状况。任何事物,凡是真正有助于人们概念化地思考其选择,或是能使人们更自觉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选择受到环境与条件的限制,并由此在他们接受、赞同或希望消除的限制与影响中作了选择,是有许多东西可以讨论的。只要像本书一类的书籍做到这一点,它们也就超出了向学术界研究人员提供娱乐的刺激的原始功能,从而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俞新天等 译)

拉尔夫·林顿

## 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和人格因素<sup>\*</sup>

在我讨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时候,我更希望将重点放在文化上而不是人格上,因而我担心我这篇论文的题目可能会引起一些错误的期望。与经济增长有关的人格的作用,仅仅是人格与文化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对这些关系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对已经确定的事实,在与我们现在的问题有关的范围内,我们将作一个简单的综述。

很明显,在一个社会中发现的任何人格构造也会在任何别的社会中出现,在人类学家热衷研究的小型“原始”群体中,所有的人格类型并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出现,但可以相信,任何类型都必将出现。但是不同人格出现的频率在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一个社会中经常出现的人格类型可能在另外一个社会中极为罕见,而具有这种人格的个人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一个人类学家朋友曾告诉我,当他在 Admiralties 的一个村庄居住的时候,当地居民指着他们当中的一位,说他是疯子。当他逐步了解这个人后,他发现这个人不但神志健全而且比其他人更讨人喜爱。这个人之所以被认为是疯子,是因为在一次突发事故中,如一个孩子溺水了,这人应当帮助一个邻居而不应当计较他应该为这种帮助得到

---

<sup>\*</sup> 选自霍塞利茨主编的《不发达地区的进步》。

多少回报。

在小型,文化同质的社会中,大多数成员一般属于同一人格类型,而其他人格类型则是由分散的个人表现出来的。这种基本人格类型与这个社会抚养孩子的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这个社会对成年成员的种种要求有密切的关系。通过对我们自己社会的大量临床研究,我们知道了某些类型的早期经验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在每一个目前已经研究过的“原始”社会中,都存在有可能产生这种基本人格类型的婴儿抚育方式。而且,具有这种类型人格的人发觉他们自己在这个社会的文化中生活得很自在,他们能够接受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承担义务,而且还承担一点点心理障碍。

我们不清楚这个结论是否也适应于大型的、异质的社会,如现代化国家。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通常包括众多的社区和阶级,他们的风俗迥然不同,尽管已出版了一些讨论国民性这一主题的有趣而富有启发性的书籍,但没有一本书涉及所研究国家的在社会中的个人,没有适宜的抽样样本来进行研究。

值得庆幸的是,国民性的问题在我们现在的讨论中并不具有最重要的价值。个人通常按照他们社会的文化要求而行动,因而只要了解这种文化,而无须了解他们的人格结构是什么,你就可以预测他们对大多数情况的反应如何。例如,假定我现在在挪威,身上没有零钱付搬行李的人的小费,我给他一张面值100克朗的钞票,请他给我兑换一下。在了解挪威文化的基础上,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测他会兑换回来,如果我在意大利做这件事,相当有把握地预测我再也不会见到这个搬行李的人。

影响一个社会接纳和融合新思想的大多数因素,用文化术语比用心理术语来描述更为有效。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文化是什么,包括其特定的价值和态度体系,我们就可以在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上预测它的成员中的大多数是欢迎还是抑制某项革新,我们也能预测这个社会的经济或政治体系中的哪一部分将首先受到影响,以及在什么地方由此而引起的解组是最显著的。在任何这类预

测中,革新的背景,如它的来源,采纳它时就受到的外部压力和直接的应用性,都应该加以考虑。一个不能够被简化为精确的术语而且一直影响着精确的预测的变量就是特定个人的本质。

我们对文化变迁过程的研究揭示出革新者个人是极其重要的。革新者就那些因其他原因采纳一种新思想并极力向社会“兜售”这种新思想的人,这些人的动机和人格显得各不相同,但可以毫不冒险地说他们的人格绝不是基本的人格类型。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革新者的是一群同样有魄力的保守分子,他们是对现状满意的人,因为他们从中获得利益,且常常对此毫无意识,属于这两个群体中的一个或另一个的特定个体的社会地位、性格力量以及智力可能对经济增长的形式确实具有某种影响。它们不仅可能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本身,而且也决定经济增长在几种可能的途径中选择哪一种。

伴随着剧烈文化变迁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混乱,除活跃的革新者外,这种混乱也使大多数先行的人发现革新者是可以理解的,并准备开拓这些革新。这种情况在革新与先前存在的文化不相一致的地方比它们所在的地方更容易出现。实际上,这类人大多在他们的社会中适应不良,具有一种非典型的人格。如果革新被接受了,这些先行的不适应者就变成了新的精英,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趋势,会将他们的优势传给他们的后代,从而成为一种新的代代相传的统治集团的创始人,苏联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撇开人格和它的影响这个问题不谈,还有两个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极普遍的。其一,只要经济条件的改善所具有的困难还在人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不需要太多地改变已经形成的行为模式和已经接受的价值观。所有社会和大多数人都会欢迎对他们经济条件的改善,几年前,由社会学家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我们的社会里,几乎人人都以为,只要将他们实际的收入提高三分之一,他们会生活得更加舒适。这种态度不论何种实际收入水平都有。同样地,所有社会也都希望能够提高自己的经济条件,

尽管他们最初为这种改善所设立的标准可能极为不同。只要一个社会不再试图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那么这种态度就可能追溯到过去种种的失败和挫折上去。

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自己的土著印度安人没有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的欲望。政府专家会告诉他们如何饲养奶牛或通过科学的方法获得更好的收成,但他们依然如旧。如果回顾一下印第安人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历史,你就很容易理解这种冷漠的原因。当他们被赶到保留地的时候,一个部落接着一个部落皆竭力模仿白人的方式,他们看到,过去的的生活已经结束,他们在竭尽全力去适应。然而,一旦当一个部落拥有了公有的奶牛群,从而有了宝贵的收入来源,那些垂涎于这片牧场的人就会向华盛顿施加压力,突然之间,这个部落发现他们的牛群已被卖,钱被“存入了安全的地方”。如果一个部落开发了一个灌溉计划,开垦了新的荒地来耕种,立即就有人找到一种借口来征用这片土地,并把这个部落迁移到更边远的地方去。印第安人被变幻的政府政策搞得灰心丧气而又疑惑不解,这种政策只有一个永恒的特征:就是要他们不断地丧失,并最终回到绝望和贫穷之中去。

除非一个社会有过这类痛苦的经历,否则,它的成员就会对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感兴趣。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许多我们希望帮助他们的人有过这种经历。构成许多独立的“落后”国家的人口中的大多数是殖民地的人民、佃户和房客,他们从自己悲惨的经历中看到,他们的收入每增加一次,他们的赋税和租金亦增加一次,在每一次大加渲染的经济发展之后,在经历了使用新技术所带来的困难和摇摆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丝毫的改善。

你也可以发现,由统治者所发起的任何旨在改善农民经济条件的努力,一般农村社区的成员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和不容置疑的,无论这个统治者是国外的帝国主义还是本地的上层阶级,都是如此。农民觉得,由统治者提供的非为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机会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对统治者而不是他们自己更有利可图。既然统治

者在过去一直欺压他,他也假设他们还会在将来也欺压他,谋求经济改善的欲望显然是任何谋求提高经济条件的努力的根本点,关于这种欲望就不必多说了。

与提高经济条件的任何努力有着普遍显著的联系的第二因素是为社会成员的操纵机器的能力。尽管有一些令人发笑的例子,比如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是,当给非洲土著人提供手推车去推土的时候,他们把负重的手推车顶在头上,但大量的事实说明,任何社会的成员都能被教会去使用机器,甚至科学技术。这些技术中的大多数可以在不明白其中的原理的情况下就被人们学会,甚至不需要放弃已在巫术中建立起来的信仰。当T型福特牌汽车正在代替驴子作为中意的交通工具的时候,我在开罗,大多数福特车的水箱盖上都披上了蓝色的大珠子,这些东西原来是由驴子带的,以避免狠毒的目光,当地的司机觉得这种新的交通工具也一样需要这些东西。

为机械技术和技术能力传播作出最大贡献之一的就是汽车。这种机械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着了迷,它渗进了世界许多偏僻的角落,同时带去了新的技术。在这些边远的地方行驶的破车,随时都有可能熄火,这就需要更多的技术才能使汽车跑起来,从我自己的经验看,我确信,玻利尼西亚人和斯瓦希里人的对机械的才智和技能至少有美国汽车修理厂的工人的9/10。

很明显,如果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接受训练,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学会机械技术。在充满机械的环境中长大的人会无意识地学会使用机械,而那些到成年之后才接触机械的人,学会使用机器就有比较多的困难。在具有工艺传统社会中成长的人也比较容易学会机械技术,而在看不起手工艺的社会中成长的人却比较困难。大部分未实现机械化的社会都具有轻视工艺的传统,而在“原始”群体中可能一点也不缺乏。我的一位朋友在北极圈内生活了许多年,他告诉我,如果一辆摩托坏了,他只要去找一个爱斯基摩人,把摩托交给他就行了。这位爱斯基摩人或许以前从未见到一辆摩托,但

他会很高兴有机会把摩托拆散,再装还原,这可能要花费他几天的时间,但只要有什么坏的零件或出毛病的地方,他肯定能够把它找出来。类似地,玻利尼西亚亦具有一种工艺型的文化。在古代,熟练的匠人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今天大部分轮到了机械师的头上。

无须多言,在缺乏技术的社会或熟练的匠人只有很低的社会地位的社会里,机械技术的扩散需要花更长的时间,然而,毕竟还是能够扩散开来的。我们有丰富的证据说明,在智力和学习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不能实行机械化的群体。

不幸的是,工业化带来了另外一个难题,它比技术培训本身的困难还要复杂。如果现代化机器是有利于经济条件的改善,那么就总得有劳动者来操纵它们,于是,尽管天高气爽,鱼儿正在吃食,你还不得不上班。要培养一个有智力的人来诊断和修理机器的故障,是容易的,而要让一个人成天在一条装配线上拧36号螺丝,却不容易。

有一个故事,真假姑且不论,说一个典型的美国佬在墨西哥买了一个木匠带到市场上来卖的椅子,非常喜欢。几天后,他找到这个木匠,要求他按原样再做五把,这个木匠毫不犹豫地把价钱翻了一倍,理由是:把同样的东西做五次,太令人心烦。厌烦可能是效率的致命敌人。如果你读一读欧洲机器化的历史,你就会因为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对劳动者不信任的管理而徒生许多悲哀。只有在不断出现饥饿的威胁下,工人才去工厂上班。在狂欢的星期六夜晚和恢复的星期天,他们才能轻松一下。

现在,在劳动时间已经大大缩短的情况下,欧洲工人才学会了忍受工厂工作的单调乏味。可以很有把握地预测,别的地方的工人亦会被训练成这个样子。同样也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装配线只是现代化技术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一旦用机器拧紧36号螺母的工作比用人工来拧成本更低,机器将替代人的位置。但是,在许多非机器化的社会里,劳动力都是相当廉价的,而且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状况会持续下去。那些训练人们适应工作的单调性就是谋求经济改善的努力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总之,每个社会都希望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而且每一个社会也都有能力来操作机器并遵循科学的程序从而取得这种经济的改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可能促进和阻碍经济增长的文化和社会因素。

这些因素中,第一个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没有限制地生育。它并不比其他的人类行为更多一点或更少一点自然的特性。它与社会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育的控制肯定比橡胶的使用更为古老,分布的范围更为广大,但这种比较人道的控制人口的方法并不起作用,直到现在,社会与它的食物供应之间的平衡仍由周期的饥荒和瘟疫来调节。当科学和博爱介入以防止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请看那伐鹤人的例子。

我第一次访问那伐鹤人是在1912年,当时估计他们大约有2万人。没有什么精确的数据,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社区后面,之后被统计到。今天,他们已超过6万人,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增长的速度会降下来。既然已经有足够多的那伐鹤人编织毛毯,放牧羊群,这些产品已经在美国白人所提供的市场上饱和了,那么,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尚未出现。

不管技术进步的程度如何,在现代医疗技术的保障下,无节制地生育唯一的后果就是不断降低生活水准。这是一种由一阵绝望的大饥荒变为时常存在的麻木的饥饿的痛苦状况,但正是这个时代,绝大多数非机械化的社会仍然在鼓励无节制地生育。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妇女的社会地位依赖于她养了几个儿子,或者男人在来世的幸福与他今世福荫后代的数目成正比关系,那么桑格夫人的最好的演说就可能是充耳不闻。

如何对待人类的生育问题并不仅限于“落后”的社会,因此,让我们讨论那些与经济增长更直接相关的文化因素。既然任何类型的文化变迁都极大地依赖于个人的首创精神,那么,无论在什么社会中,与私人工业和个人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都将是决定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方向的重要因素。如果你走遍世界上各个角落的社

会,你就会发现财产所有、财富分配、商品交换和其它经济活动的神秘而精彩的种种形式。大多数读者也许都听说过西北海岸的“锁门”风俗(potlatches),其中人们通过毁坏自己的财产来污辱对手,或者听说过规定一个澳大利亚猎手在他们的亲戚中分配自己的猎物的复杂而令人惊奇的规则。然而,这种文化畸变与伟大的东方民族毫无关系,它们在今天和明天的世界里都具有最重要的作用。这些民族的文化在许多方面都要比我们自己的文化古老得多,他们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和商业经济,尽管这种经济是建立在一种经济衰退的农业和手工业上。这些民族所需要的是商业技术和科学技术,在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们完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我从未听说过华盛顿提出任何这类的建议,比如,作为四点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应当派一个代表团去亚美尼亚,教导他们如何做生意。

非常幸运地,在我们提出任何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计划之前,中国、东南亚、近东的穆斯林文化、印度以及高度发达的西非本地文化(这一点常常被忽视)都已经完全熟悉于贸易、信贷、银行和私人财产。尤其是在穆斯林国家,你可能为这些形式与中世纪欧洲的形式相类似的程度而震惊。中国在这方面的对一个美国人来说也显得十分熟悉。印度表面上具有一套完全不同于其他社会的价值系统,但只要在那里做生意的任何人都会了解到,对经济收益的漠不关心主要是那些僧侣。

除这些相似点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差异,它们必然会既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向。这些差异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私有与公有之间对立的方式,所有制永远包含着价值冲突,私人的权力与群体的权力的对立。尤其是在辽东,有一些地区,为了使一个村庄里的所有家庭都拥有相同的经济机会,而每隔几年就把村子里的土地重新分配一次。一个家庭从八口人增到十口人,那么它这一次分得的土地一定比上一次多,一个从八口减至五口人的家庭,则分配的土地减少。无论这种做法是否具有社会公平性,它已经使家庭失去了提高他

们正在耕种的土地的肥力的动力。实质上,这是一种不带有任何占有成分而是公社租赁土地的行为。

与这种做法密切相关的,甚至在欧洲的某些地区亦十分流行的做法是,通过继承来分配土地。一个地主死后,他的土地尽可能地均等地分配给他的儿子,因为并非所有的土地都具有同样的价值或用作同样的目的,所以,为了使他的每一个后代分得公平的一份,就不得不将土地化整为零,最后,每个人都发现自己拥有了五六十块散布在几平方英里范围内的小地块,在这种情况下,在个人所有的土地上使用现代化的机械都变得不太经济,实际上,也不可能。

在继续讨论影响农业技术改进可能性的文化因素中,最主要的一个基本障碍是广泛存在的“遥领地主”制。遥领地主的佃户大多是以实物交租的,极少是以租金交租的,东方的地主大多属此。一个佃户若想保持耕地的权力,无论何地一年一般都要缴纳他的收入的 $1/4$ 到一半的地租,甚至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服一个佃户去付出因采纳现代方法而需要的额外劳动,因为他缺乏购买化肥和现代化农具所需的资金。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占有制度,大多数非机械化的文化才有可能采用现代化农业技术。

除土地以外的其它自然资源,尤其是矿藏的占有,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在所讨论的文明中的大多数是政府所有的这种长期确立的形式。开采者租赁矿山权力但从不直接拥有占有权。经常出现的情况中,所讨论的国家没有足够的资金使矿山采取现代化,或培训现代化开采所需要的人才。与此同时,如果政府引进国外的资金和专家,立刻就会有政治活动家站出来叫喊,执政党正在出卖民族的权力。当今伊朗的石油问题就是这种情形的恰当例子。

其他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直接与社会结构有关系。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亲缘权力的范围和本质以及亲缘群体的范围。在所有非机械化的文明中,这类群体都比我们自己的社会中这些群体更为显著,而且功能上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印度

和中国,其理想的家庭是“联合家庭”。这是一个专业术语,表示一个家庭作为一个联合体的存在,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而不用分散家庭财产。这类家庭中,那些不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也要求把他们的部分收入作为家庭基金,作为回报,所有家庭成员都有资格在年老或没有能力时得到赡养和抚育。

在那些家庭结构是这种类型的地方,其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系统的变化一般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但在经济改善的过程中会遇到几个特有的问题。联合家庭一般都是由活着的最年长的男人当家作主,如果他太老了,则由他的下一代的另一个最年长者接任,因此当家的反映出一般都趋于高度保守。亲缘权力在联合家庭中十分强大,以至于新的商业或制造企业成立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把亲缘关系放在实际能力之上。除低下的职位以外的岗位,雇佣外人之前,所有的亲戚都必须被照顾到。这种情况困扰着中国政府,它已经认识到在行政部门这种裙带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它所能够采取的措施是把官员任命到离他们的联合家庭生活的地方尽可能远的省份去。最近,日本人已经在联合家庭的权力和商业效率的调节上做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行动,控制大公司的家庭把他们的女儿嫁给其最有成就的雇员,从而得到这个家庭的姓氏。但是,这种方法并非在任何地方都起作用,即使在日本,有能力的年轻人也不太乐意成为上门女婿,因为这意味着他从自己的家庭群体中分离出来,对自己的妻子也无法控制。

反过来看,经济变化常常对联合家庭体系具有破坏作用。甚至在欧洲也能看到这种情况。早期的罗马和德国的家庭类似于东方的联合家庭。在商业发展的冲击下,个人的机会增加了,这类家庭开始衰落。随着现代机械化的文明兴起,这类家庭彻底崩溃。在美国,我们抵达了亲缘结构崩溃的最低点,它使对我们起作用的亲缘群体减少到初级的,由自然属性决定的仅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家庭。但是,既然许多有技术的行业都通过工会政策变成了遗传性的组织,而且别人的影响对刚踏入一个职业的起点的作用正变得越

来越大,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会有一个对扩展亲缘纽带的重新认识,也会有一个家庭群体持续时间上的增加。如果联合家庭提供社会安全感的功能被政府部门所代替,它保持劳动资本的这个曾经重要的功能被税收和通货膨胀弄得不再有效的时候,联合家庭是否会重新建立起来,这个问题是大可怀疑的。

个人从任何社会—文化环境中取得的经济利益的机会越大,扩大的亲缘纽带就变得越弱,这可以表述为一个定理,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真实的,非机械化的文化的现代化必将削弱甚至摧毁联合家庭类型,因为它为个人扩大了施展才智和独创精神的机会。这反过来又向所在社会提供了一系列的难题,它必须发展新的机制以满足现在由家庭所承担的经济和心理的需要。

与社会阶级结构相联了的社会价值观也可能对经济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各个群体的成员都能学会使用机器,但他们之间学习的热情具有很大的差异。社会之间,甚至同一社会不同阶级的成员之间,可能对贸易和工作的态度截然不同。在大多数非机械化的文化中,包括我们自己的那些不太遥远的祖先,上层阶级一般通过两条途径获取财富:一是拥有土地,剥削土地上的农民,二是优先占有政府要职以及随之而来的薪水和“巧取豪夺”。大多数文化具有这两条生财之道,但一般说来,拥有土地在欧洲更为重要,而当官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更为重要。这是一种神奇而完全未被认识的古老文化类型的延续。它使得西欧和美国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这样一个地方,即在那里,如果一个正直的有才能的人要为政府工作的话,他就不得不接受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世界的其他地方,在政府当官的人也就是那些获取最大收入的人,他们的薪水与工人的工资甚或商人的收入相比差距是巨大的,而且还是被公认和限制的贪污受贿的补助。

无论财富和权力的基础是什么,在所有的非机械化的文明中,人们可以发现,商人和技工在社会地位的排列上都是很低的,农民通常具有一个稍微高一点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当他自己拥有土地

的时候。实际上,农民是所有的人中最受剥削的人。结果,谋求经济改善的企图就进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状态。派遣国外专家来执行这类计划,马上就遭到敌视和怀疑,但又没有足够的本国专家,更缺乏培训他们的机会。上层阶级是唯一能够供他们的儿子到国外接受教育的人,但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儿子在白领职业受到训练,尤其是法律。即使这类人确有涉猎于工程这类领域的,他们还是偏重于理论,而不是实际操作,他们觉得任何类型的手工劳动,甚至作为训练的一部分,都是有失身份的。

可以加上一点,那些不太守旧的上层阶级成员,可以在西方的大学接受技术领域的训练,但当他们的学业完成的时候,很多人都对回到自己的祖国表示强烈的厌恶,那种使这类贵族对自身文明的社会价值观持批判态度的思想,似乎早已把他们置于一个欣赏西方物质舒适的地位。这种不愿意回去的现象也常常可以在那些由政府派遣或教会赞助出国留学的学生中发现。毫无疑问,尽管这种情况最终是会被克服的,但是缺乏受训练的本国人才,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之一。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中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我勉强才提出来的,因为它是无形的东西。每一个亲自研究过几个不同社会的人都知道,文化的整合程度是截然不同的,整合的程度即是组成文化的不同要素之间相互调节,作为一个功能整体的相互依赖的程度。没有一个度量单位能够测量这种差异,甚至很难描述,但它们确实存在。它们对一个社会在稳定的环境和变化的文化中运行的方式有着重大的意义,也对一个社会在变化的条件下的可塑性(resilience)有着重要影响。

有些文化显得像精确调节的钟的运行一样,每一个要求与每一个其他要求的相互连结起来,相互联结的方式能够让英国的功能学派的追随者们感到欢欣鼓舞,价值系统和实际行为模式是一致的,甚至哲学的宇宙论与神话就现状相互解释,相互印证。这种文化常常发现于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的社會

中,只要这些条件仍然保持不变,文化就稳定地起作用,满足社会的每一个需要,满足正常成员的每一个需要,为所有的问题提供答案。

与此相对的另一端是另一种文化,其组织如此松散,理想和行为之间是如此不协调,人们不禁奇怪:它们究意是怎样运行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与一位著名的瑞士经济学家的一次会谈,他是由一个基金会资助来美国研究几个社会问题的,在美国呆了三个月之后,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美国的劳工状况,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在经济的基础结构如此混乱的情况下能够生存下去。这种组织的缺乏绝不仅限于文明的社会,也能在相对简单的社会,诸如美国的印第安人部落,发现这种现象。既然某些其他的印第安人部落具有极端高度一致的文化整合,对每一种类型在白人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种种情况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在紧密套合的文化中,任何新的文化因素的引入,立即产生的后果是一系列明显的“错位”。其它条件不变时,整合得越紧密,错位就越严重愈直接。这些变化是向一种文化引入新的要求所产生社会和心理后果的预演。它们在新的东西还未完全被接受而常常又不能完全拒绝之前,就已经变得很明显。几次这样不幸的经历之后,这种类型的社会就会对所有的变化板起一副冷面孔,而且如果它在政治上是独立的话,它就会发展复杂的技术以保持既存的文化不被触动,抵抗所有的外来的改变它的企图。这种情形可见于这些社会,如美国西南部普韦布洛的印第安村庄 Rio Grande Pueblos 和危地马拉的各种印第安社区。由于社会区环境变化所施加的稳定增加的外部压力下,像修筑公路、建立市场,附立更高层次群体的定居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旧文化依旧在绝望中维持着,终有一天,外界压力实在太大,这一下子就崩溃了,社区再也没有重新整合和调节的基础了,社区变成一群不能够被组织成一个单位运行的松散的个人聚合体,只是因为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对外来者的仇恨才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与此相反,松散整合的社会通常对新思想几乎没有阻力,因为接受新思想的后果有一段时间内并不明显。当它们变得明显的时候,新文化要求已经获得了立足点,再想拒绝它就有相当的不便和得遭受损失。那么,趋势就只能是即兴创作,应急处理,从而及时地变成了具体化的东西。然而,早已习惯于不协调和矛盾的社会,再多一点点矛盾,忍受起来也没有特别大的困难。这种社会具有极端的弹性,印第安部落,如科曼契人,它的文化一直具有这种基本的特征,尽管失败和丧失资源,还是生存下来了,人口有了增加。

在充足的压力下,任何文化都会产生变迁。那些伴随经济基础变更的文化变迁,无论是在生产、分配还是在所有制上的变更,必将具有深远的影响,并导致现存社会体系的瓦解。改良的策划者应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他们还应该认识到,当权派对经济改善计划的反对可能是自私的,但在维护自身的利益上则肯定不是不明智的举动,这类人在现状中受益最多,现状的任何改变对他们来说都意味着社会的通常是经济的损失。

我们知道,在任何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他们的人格特征使其能够在混乱中捞取自己的利益,而混乱是跟在社会经济系统的任何显著变化之后的。当这种变化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形成了新的权力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愈发巩固,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从而接过他们的先行者的声望符号。这个过程,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在欧洲的近期的历史中反复见到了,先是重商主义革命,后是技术革命,而且我们可期望在所有非机械化的文明走向机械化的过程中见到这个过程的发生。从广大人民的角度看,无论新的统治集团是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下进行统治还是在共产主义的体系下进行统治,这都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统治者都将是管理者和技术专家,无论财产的正式所有的控制权是由政府授予的,如在共产主义体系下,还是由无数说不出姓名的股东们所授予的,如我们自己现在所处的资本主义类型,这都没有什

---

么重大区别。经济基础的变迁意味着一场革命,而任何革命,待烟尘消散之后,都意味着一套新的统治,而无产者仍然处于所熟悉的地位——社会经济地位的最底层。

(付卓 译)

R. 本迪克斯

## 工业化、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

### 思想观念的变迁

当英国的工业化开始的时候,一种传统主义的思想观念流行开来。约翰·斯托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称其为“依赖理论”。根据该理论,贫穷的劳动者只是长不大的孩子,必须加以管理,他们不应当允许为自己打算,他们必须顺从并愉快地做分配到的事情,他们必须表现出与其上司之间的差异,并且只有在表现良好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得到上司的庇护以免于生活中的不幸。这种对权威的解释是自我证实和自圆其说的。但它建立了这样一种假设,即穷人的依赖和富人的责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道德规范。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这些观念被逐渐地修正了。随着富人的责任越来越多地被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所反对,穷人的所谓依赖也从必然的命运转向自我负责。就像已经“证明”了如果不减少国家的财富,富人就不可能照顾穷人,那么同样可以证实穷人通过节制和努力也能够改善自己的命运。类似的这些观念,在18世纪得到如此推崇,至于到19世纪中期下层阶级若不仰望上层阶级便会得到人们的赞

---

\* 选自 E. 爱兹奥尼主编的《社会变迁》一书。

扬,原因在于这些观念促进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奋斗进入上层阶级。

在英国,尤其在美国,这种对奋斗的推崇导致到19世纪末人们把通过奋斗求得生存奉若神谕。这种体现贫民区伦理观的富有战斗性的语言也用于描述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富人和穷人的差异仅仅表现在能力和努力程度上。企业主的成功是适者生存的证据,这也证明他应当对其企业有绝对的权力,并且这种权力的拥有只有在绝大部分经营管理权由一人掌握时才有真正的意义。但是随着企业管理中专门知识的应用以及管理职能的分化和专业化,这种观念已日益淡化。不过,企业主对其企业拥有绝对权力的这种观念刚好与为企业主如何行使权力寻求专家建议的“科学管理”运动相映衬。因此,这也许意味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已逐渐失去了魅力,部分原因在于工业上组织管理的变化导致了工业生产中人的面貌的改变。从黄金时代到20世纪20年代,在求生存的奋斗中,工人和管理者都显而易见会失败或者成功,在此过程中他们或者是管理指令的不服从者或者是被激怒的创业者。今天,他们都成为集体中的个人,其技能肯定得到提高并进行了系统地配置,他们的生产能力也肯定因通过对其心理因素的适当关注而得到提高。这样,在过去200年里,英美文明中的管理思想就从“依赖理论”到自由主义,再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后转变到对“人之间关系”的探讨。

在俄国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同样发现有对家长式政权和孩子般依赖的维护,并有大量与英国相似的术语。不过,在俄国这种传统思想与英国有极大不同,这是因为沙皇拥有统治全民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论沙皇给予土地所有者多少特权,也不论沙皇实际上对这些特权的行使和滥用的影响力有多么小,沙皇的这种权力都不会受到丝毫损害。从思想观念方面说,沙皇通过不断宣称对其子民拥有专制权和责任而维护了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利用沙皇的这一点通过不断的请愿和偶尔的反抗来获得对地主和企业主不满的补偿。最后,由于俄国统治者的早期中央集权制,在贵族阶层中的整个财富和等级的分配变成了在宫廷上的争宠斗争,而这无

疑加强了沙皇的无上权力。

19世纪下半叶期间,沙皇的这种独裁体制导致了深远的后果。在企业主们宣称有绝对的权力之后,农奴的解放运动(1861年)和工业的发展促使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并使政府为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做出些许努力。尽管表现上,不偏不倚,可实际上政府还是支持企业主反对工人。这些情况大多都与英国的经历极为相似,不过俄国的历史传统阻碍了上述发生在英国的那种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只要沙皇的独裁统治不变,沙皇及其统治阶层就不会放弃其所谓的职责,工人们谋求独立的要求也不会实现,相反,沙皇及其官员仍继续支持传统的思想。沙皇的官员们始终监控着企业主和工人以缓和或者镇压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官员们帮助和约束企业主权力的行使,其作用如同工人们汇集起不满和组织抗议活动。

沙皇的独裁在俄国1905和1917年的革命中被推翻了。尽管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专制统治的管理思想仍继续存在着,只不过换了种形式。从理论上说,沙皇的官员把企业主和工人均当作沙皇权威下的同等的公民,对沙皇权威的忠贞顺从便是好公民的标志。同样,在理论上列宁认为所有的工人都是工业和政府管理的平等的参与者,他们对共产党的忠贞顺从代表了他们的最大利益并显示了他们的自主愿望。列宁的逻辑与沙皇的做法在于:在一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同一个人或者组织能够并应当既可以行使低级职能也可以行使高级职能。例如,苏联劳动者联盟就赞同如下观点:当号召工人参加工业经营管理时由工人来掌管工业。但这些联盟在谆谆教诲其成员遵守共产党权威指导下的劳动纪律时,它们也同样在行使着管理权力。

从思想观念上说,这一观点的确立是根据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而非个人和宗派的短期利益。在这方面可以看到沙皇无上权威的影子,因为所有智慧及责任都归于一个小团体或者实际上归于一个人掌握,如同沙皇一样,他比平民们更懂得什么对所有人有好处,虽不能实现但也希望人民幸福。不过,还是有一个重要

的区别。俄国革命的领导者面临的任务是,假如一支合适的工业劳动大军是可能的话,他们就要在劳动者之间培养自我约束和积极性。他们试图通过直接或间接地让每个人服从共产党的纪律来反复灌输这些品质。这种政策通过使所有的人变成有组织的操纵者的对象而不是个人奋斗,从而继承了沙皇的传统。不过,它还是比过去有一个突破,即不再限制在个人顺从上了。

### 思想观念变迁的历史意义

对管理思想的这种分析的历史含义是什么?各国的统治集团,包括发展中的工业化社会的统治者,对那些为其权力服务的思想的无论好坏都加以辩护。他们那些自圆其说的观点在学术上恐怕没有什么价值;实际上,整个工业化进程一直伴随着对这类思想观点的理智的拒绝,认为其不值得一提。但事实上所有的工业化又都涉及企业组织管理,在其中少数人发布命令多数人执行。管理思想也仅是极少数人发展起来的,多数人,我认为大概被当作阶级关系变迁的表现,因此可以作为一个线索来理解工业化社会。

从历史角度说,管理思想在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越来越引人注目。企业主们行使的权力被认为与政府的权力有着显著差异。即使在有着从其它惯例中独立出来的先例的西欧,这种过程也是新奇的,因为工业企业家是“新人类”不同于由传统支撑着的统治阶级。这一阶段也是社会学理论开创的时期。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社会被认为是由独立于,或者反对全部正规机构的力量创造的。这类主要思想的早期片断有助于我们看到管理思想的历史意义。

企业主的权力是建立在对财产的契约性的占有上,18世纪的哲学家据说为社会秩序打下了概念基础。根据卢梭(Rousseau)的观点,这种秩序能够并应当建立在事先假定个人都作为社会团体的代理这样一个普遍意志上。在这样的社会里,如乔治·赫伯特·米

德(George Herbert Mead)所指出的:“普通公民制定法律只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他的判断是他承认别人的权利和别人承认他的权利的表现”。<sup>①</sup>这种办法为建立在认可基础上的社会提供了一个模型,因而制定法律的权力就由所有人掌握并为所有的人服务。这个建立在“普遍意志”之上的社会的基础直接与财产制度相联系。正如米德说的:

“假如一个人希望占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并因此把其作为财产而拥有绝对权力,那他一定会认为每个人都希望占有自己的财产并对其行使绝对权力。这就是说,个人希望控制他的财产仅仅是在于他希望每个人都对其财产有相同的控制权。”<sup>②</sup>

这就是说,这种对权力相互认可的思想是特别假定公民作为财产的拥有者是平等的。

这一推断使一些18及19世纪的哲学家们颇费踌躇。他们强调这种建立在契约自由基础之上的财产所有者权力的相互关系不能运用于企业主和工人之间。早在1807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就用一种方式系统阐述了人际关系的未定本质(这种方式勾画出了现代自我心理学),如同卢梭用“普遍意志”来做相互关系的社会分析一样。黑格尔认为人们通过每个人接受别人的自我认识并反过来被他人接受这一过程来达到对他们自己的认识。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自我感觉是建立在他对别人本性的接受及别人对他的接受上。根据黑格尔的理论,这类相互关系缺乏主人和仆人之之间的关系。主人对待他自己与对待仆人不会一样,仆人也不会以对待他人的奴仆方式对待自己。这样一来,相互间的确定就失败了,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单方面的和不平等的了。<sup>③</sup>

---

① George Herbert Mead, *Movements of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6), P. 21.

② Ibid, P. 17.

③ Georg Friedrich Wilhelm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Leipzig: Felix Meiner, 1982), pp. 143, 147.

在西欧,这种雇佣关系的变动正好与传统从属关系思想和风俗的衰落相对应。虽然旧的从属关系的理由不复存在了,新的希望在大多数人心中萌动,但不平等的关系依旧存在着。根据德·托奎维尔(De Tocqueville)的观点,这个问题对主人和仆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内心深处主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但他不会再认为自己对仆人负有关怀的责任,他仍然希望仆人满足于其受奴役地位。实际上,主人希望享受旧的特权而不必承认相应的责任。仆人反抗其受从属的地位,这种从属地位不再是神圣的责任,也不再被认为是具有契约性质的责任。

“那么在每一个居民的住处,在权力及竞争者之间就会继续存在明争暗斗并且互相猜疑。主人脾气暴躁并日益衰落,仆人同样脾气暴躁,难以顺从。一个常常通过不公正的限制来试图回避其保护及付给酬劳的责任,另一个则回避顺从的责任。在他们看来,家庭的控制权在他们之间来回摇摆,由这人或者那人抓住。区分压迫中的权力,许可中的自主,强权中的公理的界线是如此杂乱无章,令人困惑,以至于无人确切知道他自己是什么,可能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这种情况已不是民主了,而是革命了。”<sup>①</sup>

在19世纪,像黑格尔、德·托奎维尔和洛文斯·万·斯坦因(Lorenz Von Stein)等人曾指出,人人平等的思想的传播导致了主仆之间关系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称作愿望危机……作为其后果,大多数欧洲国家出现了“第四阶层”的兴起,该阶层反抗既存的法律责任,寻求基本公民权,尤其是选举权。在有关宪章运动的议会辩论中,迪斯雷利(Disraeli)评论道,这场斗争注入了仅仅是经济或者政治斗争中所通常缺乏的情感因素。这种情感我认为是指工人对其作为公民的平等地位要求公众认可的追求,它是如此迫切以至于成为那场错综复杂的运动的一个共同特征。在获得这种及其它

---

<sup>①</sup>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 Vol. II, P. 195.

公民权利的地方,这种认可对工人们依旧处于社会及经济上的从属地位进行了补偿,由此缓和了愿望危机。并且,这些公民权的政治上的运用导致了基本社会权利的承认,在今天它体现在许多西方民主有社会福利特色的制度中。另一方面,这种初始的愿望危机在公民权不被接受的地方以及对其接受久拖不决的地方继续存在着,或导致最终的革命激变,如沙皇俄国,或导致多多少少的对社会关系的损害,如意大利以及法国。

我的假设是,人们对传统从属关系的突破产生了许多工业化社会中的普遍问题。19世纪欧洲的问题是与下述条件相关联的,即正在经历工业化的社会将会吸纳其新补充进来的工业劳动大军于国家的经济、政治团体中。管理思想由于帮助了每个国家解决这一问题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在英国,工人们若不愿意服从则被邀请做他们自己的工头;在俄国,工人们被告知其从属地位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严重,因为他们的上司同样是至高无上的沙皇的仆人。

### 思想观念、工业官僚政治和极权主义

从18世纪开始,英国、美国和俄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经营管理逐渐兴盛起来,人们像对待工人的生产效率那样对此予以关注。人们有理由将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变迁与从早期到成熟的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大量发展变化相提并论。工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只是众多发展变化之一。经济企业的官僚政治对试图“解释经济企业从属关系中的极权主义形式与非极权主义形式之间的事实与理论的差异”<sup>①</sup>极为重要。由于官僚政治包含了像英国和俄国这样两种如此不同的文明进程并可直接对比,因而它也很适于进行工业中权力关系的比较研究。这种有针对性的选择特意避开了一种综合的社

---

<sup>①</sup> Reinhard Bendix, *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6), P. xx.

会理论以利于挑选问题,该问题如果适合作比较研究的话,将会引发社会结构的分析。因为,如果不同社会的可作对比的组织面对着及最终解决了同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那么对它们的不同解决方案的对比分析将揭示出时代变迁进程中社会结构的差异。<sup>①</sup>

在日益复杂的,正常运作越来越依赖于工作表现的道德水准的经济企业中,对劳动者的系统管理问题就变得突出了。这种道德水平包括稳定的工作干劲,相当的精确性及对一般规则和特殊命令的遵从,这种遵从既不同于盲目服从也不同于不可预测的任性。在非人化的制度取代人工监督的地方,一个组织的效率将随工作操作属性的实现程度而变化,这种实现是经济企业发展中的官僚政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管理把工作环境变成非人化的系统,受雇者力求变更对规章的履行,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及承担的义务(或缺乏义务)均与企业要求的目标相关。众所周知,没有比虽然唯命是从,完全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但却丝毫没有主动性更有效的对企业的损害了。在关于企业的文献材料中,对下级职员自行处置行为的描述已经有一些术语:维勃伦(Veblen)称作“效率回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称其为导向隐秘的官僚政治倾向;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大概称其为“无法接受的领地”。我建议用“自立策略”一词,以和其它有否定含义的术语区分开,因为这种自行其事的行为也可能如同有助于颠覆一样有助于成功,而这正是企业所希望的。

现在,从属的极权与非极权体制的巨大差别存在于对所有权力关系普遍属性的管理方式上。一些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鼓励管理部门假设下属与上级之间存在广泛交流的现实性,这种假设是与成功地处理愿望危机相关的。从18世纪英国的福音教义和一意孤行的自由主义的办法到最近的“人之间关系”的改进措施,管理的重点倾向于对下属充分信任以便利用其合作。这种充分信任是

---

<sup>①</sup> See my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New York: Doubleday, 1960), Ch. 8.

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不过,英国和美国的相当多的工人可能会以一种或其它方式把管理权当作合法的接受下去,即使他们自己对这种管理要求无动于衷或者加以拒绝。在俄国,则是另一种情况,历史传统不鼓励管理部门(沙皇统治下的)假设上级与下属之间有广泛对话的现实性。从彼得大帝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的工业迅速增长时期,俄国管理的重点是放在培养工人对所有权力机关顺从的责任心上。不管工人实际上是否增加了责任感,这种管理均假设他们没有。相应地,官员及经营者们并不依赖对其下属的充分信任,而是试图消除下属的自立策略。

这种管理拒绝对规章、条例或不可预料的判断行为的内在回避是与其特殊的官僚政治相联的,这种官僚政治组成了极权政府的基本理论。在这种政体里,最高党的权力机构的意志完全以其自身的目标为转移。这样的党可能不仅蔑视所有法律已经生效的正式程序,而且蔑视自己以前的统治,在规章因一时兴趣而改变的地方法律的尊严就不复存在了。极权政治同样会摆脱单一权力的限制。不是依靠颁布法律及自上而下的监督执行,极权政体利用党的等级制度通过固定的行政渠道来促进和控制命令在每个环节上的执行。这也可以看作是该政体用来阻止其官员逃避监督的主要办法,用这种方式迫使他们尽心尽力地用其所长来执行命令。因此,极权政府是建立在两个互相联结的权力等级上。每个工厂的车间,每个政府的办公室,每支部队或秘密警察的单位以及每个文化或社会团体都被编制、协调,并由一些政府部门监督。政府本身也在特别的运动中被极权党的一个机构所指导、督促、教训、监视和兼并,该机构对更高的党权力机关单独负责。

双重政府的这种理论理由在马克斯·韦伯的官僚政治分析框架中得到了阐述。在他看来,理想的可操作的官僚政治是解决大规模组织工作的最有效的办法。但这种情况仅仅是在这些任务含有类似于规则的多少稳定的方针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形成规则是为了维护法律制度并达到公正的行政管理。在一个由万能的、激进的

权力机构制度工作计划的情况下这些条件是不存在的。在极权政体的刺激竞争环境下,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均不会长久,尽管每条规则依次都是为持久地取得成功奇迹的基础。作为响应,下属们会倾向于采取隐蔽的办法以达到系统化,虽然是心照不宣的,但却是自立的策略。下属们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方便,而且是由于从专业知识和系统程度的角度看政府对他们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党则通过给每个工人和官员施加最大的压力以迫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所长来阻止这类会导致共同计谋的秘密做法。这是双等级政府的理论基础,它在每个工作车间都安插一个党务工作者以用来阻止秘密行动和施加压力。即使所有的政府和工业关键部门都挤满了党务工作者,这种双等级制度也是需要的。因为一个党务工作者若转为工人或者官员则他仍有责任“超额完成”计划,而新的党务工作者仍然被任命以使该官员处于压力和监视之下。

这样一来,通过在能动主义和党务传统基础上建立新体制,极权政治就代替了旧的层次体系。这种政体赖以存在的工作行为道德不是西方的经百年发展的产物,而是自上而下阻止逃避的物质刺激和政治监视。例如,苏联工业的集体“成交”协议实际上是个人和集体公开保证自己超额完成计划的忠诚宣言,而公开声明的继其之后的组织、控制处于积极分子和其他人之间的各类阶层的机构,集体领导组织的头儿以及更多的方式都力求达到最大工作量和防止“效率回失”。作为个体的下属已几乎被实实在在地包围了。除了通常的刺激外,他还被上级及立于其旁的党务宣传者所控制。党务宣传者和其代理人对下属的同级组织也实施社会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还被“从下面”控制着。这种猜疑体制和理所当然地消灭隐私的做法是基于以下认识而被认为是正当的:党“代表着”大众,是俄国工业化的先锋,并且领导着世界共产主义的事业……

(朱效民 译)

D. 麦克莱兰

## 商业动机和国家成就\*

是什么促进了文明?并不是外部资源(如市场、矿产、商业通道或工厂),而是开发这些资源的创业者精神,这种精神最多体现于商人身上。

在贫穷国家中,是谁最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是经济规划者,也不是政治家,而是那些执行者们,他们是否具有冲力决定了规划者的目标能否完成。

俄罗斯如果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将会于25至30年内在经济上赶超世界最发达国家——美国。为什么它能发展得如此迅速?这并不像苏联所宣称的那样是因为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它不择手段地在执行者中培养起更强的创业者精神,胜于我们今天在美国所做的。

来自国外的援助怎样能在贫穷国家的发展中最有效地发挥作用?不能简单地把钱向他们的政治家和预算规划者一交了事,而应将其用于选拔、鼓励、培养那些富有积极创业者精神或强烈成功欲望的执行者。换句话说:用于投资于人,而不是项目。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话语出自一个大学教授之口,而不是全国制造商协会所说。这并不是一个充满戒备心的资本家的单调的喋

---

\* 选自 E. 爱兹奥尼主编的《社会变迁》一书。

喋不休,而是我,一个严格的学术心理学家,近15年研究的结果,该项研究是调查人类的动机似乎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作用,这最近在我的《成功的社会》一书中有概述。

由于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当我发现我把商人从学术的垃圾堆中救出来,掸掉他们的土,给予他们近50年来难以维持的知识分子名誉时,真是很令我吃惊。因为商人总是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把他描述为贪婪的资本家,社会批评家认为他对30年代的大萧条负有责任,甚至他自己在内心深处,也在谴责自己。

但现在我的研究表明所有这些都错了,商人的动机并不是利润本身,而是强烈的成功欲望,想把工作做好的念头。利润只是衡量工作做得如何的几个因素之一,而非目标本身。

## 一、成功目标

心理学家所说的“成功欲望”的准确含义是什么?他怎么衡量个人的或国家的“成功欲望”?他怎么知道它对经济增长如此重要?拥有该欲望对于商人是否比对于政治家、主教或将军更为重要?在我的书中我对这些问题尽可能科学、准确地作了长篇论述。在此我们只能对有关论据作一概述,并且只对其在商人方面的应用加以深入讨论。

首先,心理学家试图发现当一个人并没有处于思考某件特定事情的压力下时,他会想些什么。当他独自一人或什么事也没干时,他会想什么呢?他会想起他的家人、朋友,想起休息,看电视,或让他的上司别打扰他?还是在计划怎样卖东西给顾客,降低产品成本,或者发明一个更好的防蒸汽阀和牙膏管?

如果一个人花时间想把事业搞好,心理学家就说他有成功的念头,换句话说,他关注成功,否则便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想。如果他在想家人和朋友,则他更关心亲情。如果他考虑老板,他所关注

的是权力,如此等等。我研究的方法和其他心理学家是不同的,我和同伴发现如果简单地追问一个人的动机、兴趣、态度,那收益不会很大。经常,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更关心什么,甚至他会耻于自己的想法而遮遮掩掩。所以我们试图通过让他看图讲故事来获得他正常的想法。

### 1. 故事中的故事

让我们看看一些美国商业经理所写的故事。让这些人大概看一下一张图(图上是一个人坐在办公桌旁,桌上有一张家人的照片),然后根据这个图用5分钟写一个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故事:

工程师在星期六工作。周围很静,他开始胡思乱想。他是照片中两个孩子的父亲,那个女子的丈夫。他的家庭很美满。他想起他们一起外出的美好时光,他期盼着能重温这美好的时刻。他想,明天,星期天下午,应该和家人去作短途旅行。

很显然,当作者想到照片的情景时,没有与成功有关的念头出现,却想到了和家人共度快乐时光,他的想法属于亲情一类。他更关注人际间的关系和与他人共处时的乐趣。事实上,对这张照片而言,这是最典型的反应。但是,现在看看另一个故事:

一个成功的工业计设者,坐在椅子上考虑一个新主意,他正对着照片中的家人说出这主意,家中的某人曾谈起过一个家用小机械的缺点,这个设计者刚刚发现了这主意的商业价值。他从家人那里得到主意,他“告诉”家人这是一个多么棒的主意,因为这主意这么好,他决定秘密地带他们去度一个长假。这个主意会成功的,家庭的自豪感以及相互尊重会加强。

这个故事的对家庭和亲情关系怀有热忱,但是加入了成功的主题。他的家人事实上帮助他革新,他们有一个能成功的主意,帮助他成功。凡涉及到好的新主意(例如新产品,一项发明,或任何一种超群的成就)的故事,都反应了作者对成功的关注,总之,这人的思路更倾向于获得某件事的成功。最后,看一看第三个故事:

这人是一个绘图小组的工程师，照片上是他的家人。他有一个问题，正在思考。天天都有这样的事发生——一件需要考虑的问题。那座桥怎样才能承受住大风的力呢？他将和其他的工程师讨论这个问题以得到正确的答案，他很有能力。

写这故事的人本身是一个副经理的助手，他发现了那张照片，但仅此而已，他的思想集中于工程师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短短的5分钟里，他甚至想到了具体的问题——怎样使桥承受住大风的力。他指出工程师想自己找到好的解决方法，求助于别的专家并最终作出正确决定，以下代表了一个完整的成功顺序的不同方面——限定问题，想解决它，思考解决方法，想到解决中的困难（或是本身的原因或是环境中的原因），想到可以帮助解决困难的人，并且想到成功或失败后，会发生什么事。

在我们的得分系统中，上面这些方面的每一个都可得 + 1分，这样，讲述最后一个故事的人关注成功或成功需要（习惯简称 *n* achievement）的程度为 + 4。同样，第一个人得 - 1分，因为他的故事和成功完全无关，第二个人得 + 2分，他有两个想法涉及到成功。

每个人通常写6个这样的故事，得到整个测试的分数，这种“成功想像”故事的计设很客观，两个独立工作的专业记分员算出的分很少有不同。最近为高速计算设计了程序，能够快速计分，有完全的客观性和相当高的准确性。个人所得分数代表着在没有明确提示的情况下他所随机联想到成功有频率（因为在测试时，他被要求放松，自由快速地想像）。

## 2. 思考产生结果

整天这样思考的人适合于干什么呢？不需要多少想像力就会猜出他们会成为出色的商业经理。这些人耗费很多时间想着成功、发明新的机械，发现需解决的问题，寻找不同的解决途径，找专家寻求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这样做或者是当这些事出现时，更乐意这样做。

当然我意识到这只是需要证据的假设。但是，事情的结果是，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事实依据。在三个代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类型的国家中,经理在思考成功方面的平均分要远高于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学历和背景都是想同的。以两个民主国家为例:

在美国,比较通用电气公司中几对有相同级别、年龄、教育背景、工龄的部门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发现经理在测试中对有关成功的事写得更多。

在意大利,拿不同公司的中层领导和法律、医学、神学的学生作比较,他们的智力水平和社会背景相似,测试的结果和美国的一样。

也可以这样说,不论在美国还是在外国,如意大利,经理都需要关注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经理对成功关注的水平明显低于美国。如稍后我们将指明的那样,这很可能和意大利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和低速率有关。

共产党国家又怎样呢?波兰的数据很有趣。因为,(1)对成功关注的水平和美国几乎相同;(2)即使像波兰这样由国家拥有和运行的商业中,经理仍然比专业技术人员更关注成功。

另一个更令人吃惊的结果是,为美国政府工作的经理和在私营企业工作的经理,他们的平均分数并无差别(前者为9.3,后者为8.9)。很明显,海军部舰艇局的经理思考成功的时间和福特、希尔斯、罗尔布克的经理一样多。政府服务并没有削弱他的创业精神。至于他是否能和在私营企业那样富有效率则是另一回事,在此不涉及。

对不同部门经理关注成功的程度做定量研究,结果和人们预想的完全符合。因此,销售经理比其他经理得分高。

总的说来,更成功的管理者得分也更高,(政府部门除外,那里提升更依靠资历)。在小公司中,这个图很明确,经理比他的助手得分高。在大公司中,现象就复杂一些,低收入阶层(年薪低于20000美元)平均得分最低,第二阶层(年薪20000—25000美元)得分最

高,很显然,对成功的关注有利于使其进入高收入阶层。但随后,趋势衰退。最高收入阶层得分又降下来,对成功的关注减少。可能这些人已做得足够好,可以放松一下了。

## 二、成功的国家

如果以上确定个人成功关注程度试验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对一群个体适用的原理也会适用于国家。对成功的关注程度高会导致国家的强盛吗?我们来看看事实。

对某个国家的一个商人的测试自然不能说明成功关注程度对国家兴盛的影响。但是,我们指出,对过去和现在的流行文学作品进行研究,我们会得到某个国家某个时期对成功的关注程度的大概估算。因此我们从不同时期收集大量的流行想像文学——诗、歌曲、剧目,并且得出它们中的对成功关注程度的分数,就像对个人所写的故事做的那样。

我们把某一时期的作品内每100行中出现的,和成功有关的念头的数目作图,与同一时期的经济指数图比较,会发现两条曲线间有很有趣的相互关系。我们发现通常情况下,当成功关注水平达到高值约50年后,经济的繁荣发展会达到高速率。在古希腊和中世纪后期的西班牙就是这样。而且,在这两例中,一旦对成功的关注水平下降,立即就会发生经济状况的恶化。两条曲线的关系在图1中得到明确的显示,图中标示的是英国从 Tudor 时代到工业革命的300年时间的数据:

在此阶段有两个经济增长,1600年左右一个小增长,1800年附近,工业革命开始时的一个大增长。每个峰前都有一个反映在流行文学中对成功关注水平的峰。1600年经济增长峰前的那个峰也小,工业革命峰前的那个峰也大。

还需要更清晰的证据吗?人们关心什么决定了他们会做什么,而他们所做的决定了历史的结果!

### 1. 当前证实了过去

在现代国家中,这图几乎是一样的。在大量的不同的国家,学校课本中的儿童故事是我们得到的流行文学的最标准形式。事实上,各国用来教育儿童的简单的想像性故事在样式上和我们测试对象写的故事很相像,尤其是二、三、四年级的读本,通常这时政治影响不很重要。这些故事可以很容易利用我们的评分系统评分。

经济增长速度需要从某一可得到的单一曲线估算,还必须可适用于广泛类型的国家,比如电力消耗曲线。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电力消耗可能是当代最能说明国家总收入的单一指数。

不同国家的  $n$  值(关注成功水平)和随后的经济增长速率比较,都惊人地证实了历史研究的发现。1925年左右的儿童读本中成功关注水平越高。随后的经济发展也就越快(22个国家中相关系数为0.53)。而且,在1950年儿童读本中成功关注水平越高,该国在1952—1958经济增长也越快。1950年, $n$ 值(成功关注水平)高于平均值的20个国家中,有13个在1952—1958年经济快速生长,占65%;而19个  $n$  值低的国家,只有5个经济快速生长,占26%。

### 2. 预测可能性

这些发现有什么意义呢,尤其当有人意识到数据的粗糙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越承认数据粗糙,这发现越显得不同寻常。毕竟,这些数据说明人们本可以根据1925年的儿童故事得到不同国家经济未来的消息,尽管有大萧条,世界大战以及一系列其他的政治、经济因素。

我们是否可能正跋涉在预测未来的征途上?利用这样一个近乎可笑的来源,儿童故事,而不是政治家、将军、经济家的庄严宣告。这怎么可能?

对该发现的最好解释像以下所说的这样起作用,故事告诉我们国家中精英人物在想些什么,当这些有影响的人物在最自然的情况下,也可以说是“解除戒备”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他们在想些什么。从这意义上看,这些故事和那些个人所写的

故事是类似的。如果你问一个人他是否希望成功,他更可能说:“那当然!”同样,如果你问国家领导人他是否希望自己的国家进步,他会发现如果答“不”的就太不爱国了,但是,不管领导人对公众说些什么,孩子读本中的故事更能揭示该国人民是更关注成功还是其他的事。

我们来举例说明,一个简单的故事主题是一些小孩在造船。这个主题会被不同的文化借用而出现在不同的读本中,主题润饰的手法不同从而揭示的现象也不同,例如:

在国家 A,一个注重成功的国家,重点放在造船上,使它能工作,不会沉,遇上大风不会翻。

在国家 B,更看重亲情关系,重点在孩子们划船玩时的乐趣。对造船的细节略过,对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写得更多。

在国家 C,故事的中心是权力,描写孩子们怎样组织起来造船,一个孩子会作为领导,协调别人的工作,指导他人工作。

很明显,这些最常出现在作者脑海中的想法,不论是成功、亲情还是权力,都反映了国家的关键人物的想法。这些想法不仅使故事的读者感到亲切自然,而且会导致他们今后的行为。所以,如果故事着重于成功,说明在这片土地上,创业精神很普遍,这说明很多关键人物在没必要的时候也在思考着成功。

在一个国度里,对成功的强烈关注会影响该种族的商业或经济界,如果他们积极地想干好,经济当然会发展更快。所以儿童故事是企业界质量和“驱动力”的象征。

### 3. 上升和衰落中的国家

看看某国的得分,如果能依靠它判断在哪个国家投资,那多有趣!以前,北欧国家,尤其是瑞典和英国,成功关注水平很高,但在50年代,都降到了平均值以下。我们听到这两国的经济停滞或“成熟”,这仅仅是巧合吗?英国目前的困难是由于外部环境还是由于人民缺乏进取精神?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中欧国家、法国、德国、俄国对成功的关注水平在1925年前较低,但到50年代快速增长。

俄国的例子对我们很重要,美国的进取精神和俄国相比处于什么状况?根据历史研究,在美国,对成功的关注水平在1800年到1890年一直稳步增长,但随后开始下降,尽管在近30年下降可能已经停止。在1950年,我们仍高于平均水平,而且和俄国处于相同水平。但我们开始走下坡路而他们却在上升。

从这个分析的观点看,社会主义还是自由计划经济更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争论本身就一直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美国宣称他们的经济成功源于自由计划经济。然后当苏联在太空和其他领域取得成功时,他们又立即宣称,这些经济和科技成果都来自其制度的优越性。

这些争论都是错误的,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都取决于进取心。俄国和经济增长是因为他们对成功关注的增长,就像我们一代人以前一样。当然,在对比这两种制度时,会有其他的要点,但就这点来说,两方都错了。

#### 4. 需要接受的观点

在我们深入前,必须再解答最后一个问题。一个接触现代科技,极有可能提高生活水平的国家,才能提高它的进取心吗?进取心不能从另一个国家吸收来吗?有没有这样的好例子说明,当一个国家越来越强盛时,它的成功关注水平依然上涨?我们是否在用心理学术语描述“繁荣的循环”?

良机当然是故事的一部分,它激发人们行动,但它只激发那些早有成功需要的人。如果要播种,必须有土壤。毕竟,很多国家已有好几代人接触到西方科技,例如地中海周边的伊斯兰国家,但是它们对给予它们的机会反应迟钝。

以尼日利亚为例,很好地说明机会和动机必须相互作用,尼日利亚其实是三个地区的联盟,每一个都是不同的文化群体。其中只有一个群体,Yoruba,对成功的关注水平高。其实,早在 Yoruba 和西方接触之前,就以在商业和区域财政交易上的兴趣的技术闻名,当 Yoruba 面对良机时,他们比其他部族在经济上作出了更强的反应,

这事实说明了成功定理的有效性。例如 Yoruba 运行的地方银行状况要比另两个的好。

机会青睐那些有进取心的人。和另两个成功关注水平高的群体——35岁到45岁的美国犹太人和美国天主教徒一样，Yoruba 当机会来临时，积极地发展经济，而尼日利亚的其他群体和美国的其他群体一样，由于对成功的关注水平低，就没有作出同样积极的反应。

### 三、我们能做些什么？

美国公民的成功关注水平必定要下降吗？我们会像过去的那些文明一样迟早要衰退吗？如果我们知道要发生的并用行动去改变它，那就不会。如果我们迅速果断地影响个人和国家的成功关注水平的来源，那就不会。

那些来源是什么呢？显然，不是种族或天气这些用来解释国家富裕的传统说法。俄国的成功关注水平自1925年以来增幅很大，而瑞典和美国却降了。当然，这段时间他们并没有相应的基因库或天气的巨变。

实际上，外部因素通常并不重要。但偶尔它们也会起作用，比如它们就帮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移民国家产生较高的成功关注水平。这些国家更易于吸引那些成功关注水平的移民。因为：

1. 他们最初人口所来自的国家比拉美人来自国家的成功关注水平高。
2. 他们为许多受迫害的宗教信徒提供了避难所，而这些人成功关注水平较高。
3. 他们不像墨西哥和秘鲁有大量的金银矿藏，能使人迅速致富。

简而言之，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幸运的。移民壁垒很可怕，只有成功关注水平高的人才能爬进来。

历史学家有时宣称美国的西部开发推动了发展。胡说八道，在许多南美国家也曾有而且仍然有大片未开发的蛮荒地，可它们并没有引发同样的反应。美国富有进取心的移民认为西部是待征服的挑战。而不是西部使他们有进取心。机会和蛮荒地一样经常存在，但只有某些人才能看见它们，而且相信可以开发它们。

我们远离欧洲，我们能容忍宗教的少数主义者，我们最初的移民很幸运地来自成功关注水平高的国度，这些都曾保证了我们有更多的成功关注水平高的国民。但最近，我们的移民限制政策大大减少了吸收这种人移民的机会。这些政策继续倾向于北欧国家人口的移民，这些国家的进取心已大大地下降，政策却限制从那些成功关注水平快速增长的国家移民。如果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把曾使我们富强的进取心拒之门外，那将会是历史的可悲嘲讽。

### 成功的源泉

强烈的成功驱动力来自哪里？价值观、信念、意识形态——这些是一个国家对成功强烈关注的真正重要源泉。对家庭研究发现，一个男孩如有高的成功关注水平，三个因素很重要：父母对成功的高标准，温暖和鼓励，一个不权威独断的父亲。这有一个揭示实际的典型例子：

一群男孩被蒙上眼睛，用左手把不规则形状的木块依次堆积，分别问父母他们认为自己的儿子能堆多高，成功关注水平高的孩子的父母都认为他们孩子能做得更好，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值高于成功关注水平低的孩子的父母。他们对孩子鼓励更多，当孩子进行工作时，他们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奖励。最终当成功关注水平高的孩子真正开始堆木块时，他们的父亲们具体指导得少，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孩子们该怎样挪动手，让他们更加使劲，别晃动桌子之类的事讲得更少。

其他的研究表明，父亲必须得到孩子的尊重，但当孩子能独立

完成某件事时,如果要达到高的成功关注水平,他的父亲不能指点孩子的每一步。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些家庭研究将问题带向更远。这些父母的标准是从哪来的?为什么有些父母会强调成功,充满挚爱地奖励自我依靠的行为?因为很简单,他们自己就信奉为家人、政治社会、宗教团体赢得成功。因为不同的原因,他们卷入成功意识的大浪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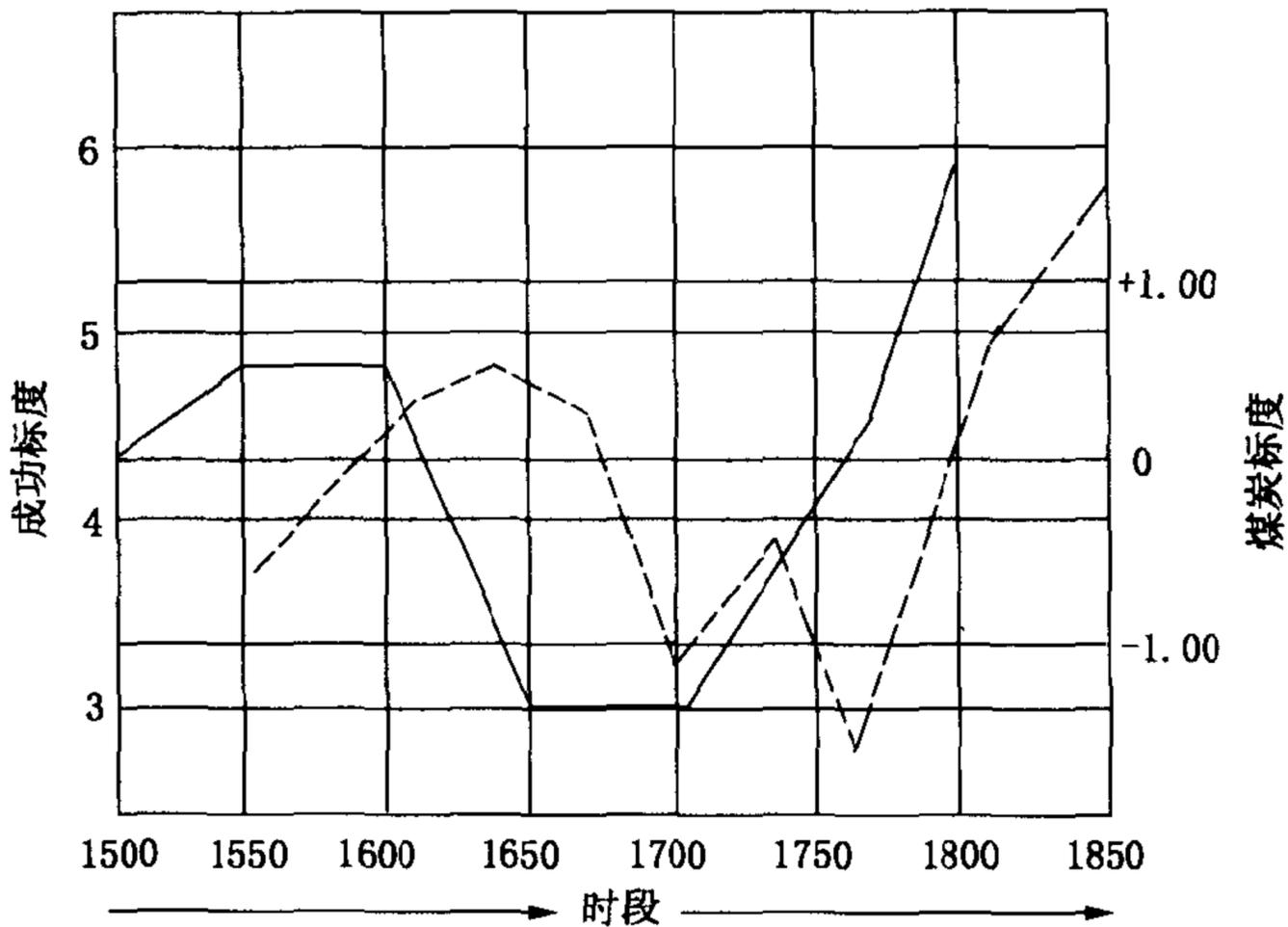
历史上的一个悖论是,最早对成功的关注并不在于商业或经济。例如,在图20-1中,英国历史只对成功关注的两个峰都是和新教改革或复苏关联的,它们的目标很明显不是世俗的,而是严格的宗教的。比如,在英国新教复苏的第二个峰时的卫理公会教徒强调此生的宗教完美性。但即使是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也不无困惑地发现,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善于致富,他认为这是他们达不到宗教完美的障碍。

但现在我们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对此产生的宗教完美性的强烈关注使得教徒及其儿子产生了对成功的企望,这使得孩子转向商业,正如前进,对成功的关注更容易在商业得到满足。在当今时代,世俗的宗教,如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将成功视为重点,并在不发达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产生高的成功关注水平。共产主义自称其优越性可以救世,就像基督教义曾说的一样。不论我们认为这是多么错误,我们必须意识到它会创造浓厚的进取的气氛,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

#### 四、挑战成功

假如我们要在经济领域成功地与俄国竞争,我们就必须培养进取的意识,至少要和他们一样强。如果我们要帮助穷国迅速发展,达到独立,必须意识到首先要培养这些国家的创业意识,不能仅仅提供他们物质资本,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

很奇怪,商人在自己的公司里知道这些道理,他知道在最终的分析中,企业的精神是最关键的,包括经理们的进取精神,以及他们为获取共同目标而共同工作的感情。最终起作用的不是“硬件”,不是厂房的规模和外观,也不是银行里的钱。如果在公司中没有进取精神,这些固定资产都会如骄阳下的雪一样消失无踪。了解这些聪明的经理会有相应的举措。他费心于保持公司进取精神的活跃,他讨论公司的目标,给自己和同伙制定适中的切实可行的目标、分派各人的职责,确定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工作得如何,选拔关注成功水平高的经理或培养人们的成功关注水平。



成功关注(n. Ach.) = 每100行中出现的成功联想的平均数;

工业增长率 = 伦敦煤炭进口收益率,以偏离平均趋势的大小表示(标准平均差单位)。

**附图1 英国文学中表现出的成功关注  
怎样预测50年后有工业增长速率**

对商业正确的道理对国家也正确,但并不被广泛认知。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富有效率的国家,不仅要重视在国内,还要在国外培

养进取精神。美国的外交政策现今主要基于两个策略：(a)提供政治自由；(b)物质援助。都是绝佳的目标，但这是不够的。如果一个公司的主要目标是不被他人干涉和脱贫，那这公司还能维持多久？它需要积极的明确目标，例如，一个更有效的市场计划，或一个严格的削减开支计划。维持一个公司，或国家生存发展，必须要有一些积极的东西。

一次又一次，我们没有吸取教训。即没有强劲的前进动力的政治自由是空洞的、不可持久的。在蒋介石的统治时期，政治上是自由的，可是它缺乏真正的自我牺牲的进取努力，直到共产党改变了它。除此之外我们吸取教训，在穷国，在自由的前提下找到促进进取心的办法，否则共产党会在世界各地提供它。我们可以继续建造维持自由的堤坝，削弱自己去养活、武装那些躲在堤坝后面的人们。但只有当我们在这些国度里培养起创业精神，我们的外交政策才是正确的。那时他们才会看护好自己的堤坝并在经济上达到自足。

拿印度和中国相比。经济专家告诉我们中国要比印度发展快得多（尽管新闻报道说的正好相反）。为什么？是因为西方给印度的物质援助不如共产主义世界给中国的多吗？可能不是。是因为印度的政治自由比中国的少吗？当然不是。但如果我们对外政策的根本就是保证政治自由和经济援助，就发展中的印度来看，这些手段显然不怎么样。俄国显然对中国输出了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激励他们整个国家的进取精神。完全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动力需要和体制以及缺乏人身自由联系起来。美国曾有这种动力，现在还有很多，如果我们真正努力，我们也可更有效地输出它。

如果我从这项研究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外部的困难和压力对历史的形式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重要。人们对这些挑战的反应才是重要的，而他们如何反应取决于他们的进取心。我们的文明会怎样，我们的商业界会怎样，这决定于

我们大家花多少时间去思考成功,思考建立切实可行的目标,冒一定的风险,设想个人的职责,发现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答案是由我们决定的。

(冯冠军 译)

E. 哈根

## 人格与经济增长\*

### 创新人格

#### 创新的特质

当我们说创新以创造为前提时,读者不应将“创造”一词与天才联系起来。创造有各种类型,构思出相对论原理是创造,设想出一种开罐头瓶的工具也是创造。技术进步有赖于各种各样的创造性活动。因此,对创造的讨论不仅涉及到天才这一有限的领域,而且涉及到广义的创造特质。任何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特质。

创造的主要特质有:经验的广泛性,这主要是指一种感知现象的倾向,特别是感知那些生活中能引起个体兴趣的现象的倾向,通过对现象的感知,形成多种心智力量交互作用的系统,从而使个体的行动成为可解释的;创造性想像,其核心是无意识过程代替个体本身暗暗地发挥作用;在面临和占胜问题时,以及在解决混乱与不一致情况时的踌躇满志;责任感或成就感;智力水平;精力状况;最后,与这几个方面相关,个体经常感到世界具有某种程度的威胁性,要战胜这种威胁,必须不断地与之搏斗。受威胁感驱使的创造性人格,有时属于另外一种与上述特征不同的类型。下面,我将首先讨论那种理想的或纯粹的无焦虑型创造性人格,并说明,正是感

---

\* 选自林顿主编的《经济增长》一书。

觉到威胁性这一点,才导致了其他方面特征的存在。

普安卡雷(Poincaré)指出:“感受奇异现象的能力”和卡尔 R. 罗杰斯(Carl R. Rogers)的“经验的广泛性”是构成创造性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我则认为这两点的含义无甚区别,都是一种使个体注意日常现象与期望现象的不同之处并重视这些不同之处之意义的一种无意识选择,都属于这样一种能力,即,能够注意到像物体不管质量大小,如果空气阻力相等,都以同一速度下落这种与该时代科学权威及常识相背离的现象的存在;能够观察到将一些人四肢麻醉就能控制他们,并发现麻醉作用是从某一时刻开始的,在这一时刻,心理反应趋于停止。个体能够发现这些现象,并对自己说:“一定有什么有趣的力在起作用。我要搞清楚这些现象的涵义。”

这种观察特质的基本之点,一是在于坚信自己对于所经历事实的评价,摆脱那种通常认为是理所当然从而忽视与其不一致地方的看法;二是在于总是猜想他能够弄懂所看到的事实这种倾向。有创造力的人还有一种比理性地接受因果联系更深层的感觉,即感觉到世界是有序的;生活中或经验中的各种现象只是这个有序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个系统的运行能够被理解和解释;还感觉到,如果他接近某个他感兴趣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虽然这可能是以复杂的方式作出的,因此,如果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他就能理解这种反应。如果他认为世界是无序的,或者,如果他对自己理解世界秩序的能力不自信,不满意,那么,他就不会无意识地警觉到现象的意外方面,因为那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经验的广泛性与下面这种能力有关,即能够注意到那些可以作为分析起点的现象。创造性想像则属于超过起点联想到别人还未发现的关系这一倾向性,某种意义上,它的确是较高级的天赋智力的产物,是将许多同时出现的现象进行综合考虑和分析的结果。但它远不仅是如此,它还包括两种心智活动。一种是能够将有趣或不满意的情境作为想像力漫游的跳板,以此开始进行显然是不受

控制的间接迂回,在各种相互交叉的小道中前进,折回,再继续,然后或很容易地就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概念,对不满意情境进行重构或转换,或者找到了一种新颖的分析模型来解释所观察到的事实。显意识活动在分析的过程中作用极小,主体并没有有意识地询问这种漫游是否与要解决的问题相关。

另一种就是能够让其纯粹无意识的过程发挥作用,而不需要任何显意识的知觉或对活动的说明,并在显意识里接受无意识活动的结果。主体并不明了他的思维已在活动,而问题的答案已被找出,一条合适的线索,一种解释就会出现。当他从白日梦中醒来,或者偶尔在睡梦中,在放狗时,脑海中就呈现了一种解决问题的图景。“我找到了”,科学家们有时会说,或者“当我的脑海中出现那个问题时,我就知道该怎么解决它了”,接着,他就演示了解决问题的逻辑。答案可能由一系列的逻辑步骤或思维链条的联系组成(还能是别的情况吗?),但这些都是无意识中得出的,或者,用一个更为简明的心理学术语来说,是处于前意识状态。

这种创造性想像常被强调是文学创作或更抽象地说是美学创造的一部分,但在科学家们的传记里也能够看到大量的例子,这证明创造性想像也是科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过,在严格的技术创造领域,这种例子就比较少。但这可以认为是缺少文献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两种创造过程有什么不同。

创造性想像的上述两个方面都包含着这样两个重要因素:其一,个体的无意识过程本质上是有助于产生答案的,其二,个体对自己的无意识过程这毫不或几乎不害怕。在遇到问题时,某些个体的无意识反映由感到手头还没有现成答案的挫折感而引起,为防备这种挫折感,个体就任其思维幻想取得了魔术般的成功,战胜了轻视自己的人,征服了异性,获得了一个足够高的位置使得自己所有愿望都能得到满足,如此等等。即使没有放纵自己的思维,这种幻想的过程也会在其无意识中进行。而另一些个体的无意识过程则对问题的内容或眼前那些使人惊奇的现象作出反应,这有助于

个体在显意识里对问题或现象再进行逻辑的或想像性的分析。在“漂游”时,他的思维大胆地将其早期的思想进行重新组合,然后再联系实际情况,就获得了丰富的成果。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以这两种方式对问题作出反映,而有创造力的人则主要以后一种方式作出反应。作出不现实的幻想反应的人,可能关闭了他的显意识活动,但他还会隐隐地感觉到内心感情的波动,并对他的无意识活动感到惧怕。发现了内心那些所谓罪恶的可鄙的或危险的冲动后,由于害怕它们会显现出来,就不敢使他的无意识过程明朗化。这样,他的无意识过程不仅是空废的,而且即使确实有助于产生答案的,对他来说也是无效的,答案仍不会呈现在他的显意识里。而与此相反,有创造力的人却不害怕他的无意识活动,也不害怕将其活动的结果呈现在显意识里,用心理分析的词语来说,就是他能够“复归自我”。

与他人相比,他更能理解自己的无意识动机。而人们一般认为,是否能够理解自己的无意识动机是艺术尤其是文学创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每个人都只是根据对自身的理解程度来理解并描绘他人。然而,理解自身同样也有助于对物质世界的理解,这一点却很少被人认识到。理解了自己无意识动机的人,就能够将自身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看作是一个因果系统;他进行自我分析,像旁观者一样观察自己的行为。这种理解似乎提供了一种智觉模型,个体以此将外部世界看成是一个可分析的系统,并使自己的经验广泛化,创造性地想像日常现象所以如此的原因。

这种类型的人多少有些超脱自我,也超脱于社会。某种程度上,所有正在进行的事件都是他要从其外部进行观察的对象。这种超然态度似乎是构成创造性的一个必需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世界没有兴趣或不关心,实际上,这一态度通常恰恰与一种道德责任感联系在一起。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内心拥有一种关心社会、关心世界的责任感。后面我们还将讨论到这一点。

这种超然特征可以从科学家们那些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中看

出,就像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所能看到的一样。它还与技术创新有关。我们很难设想,如果一个人不将其周围世界看作是一个外在自身,超脱自身的系统,他怎么能够操纵这个世界,怎么能用一种新的方法将各要素重新组合,以发现一种新的条理;一个补锅匠即使仅仅想修理一下工具,也必须将这工具看作是一个系统以进行分析,而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只是一个工具,如果他想随意改变什么的话。公司管理者一般很少明显地拥有这样超然态度,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管理他人;然而,他们对他人作用的理解也就是在间接地理解他们自身,这也是超然态度的一种表现。

有创造力的人由于首先假定世界对他审慎的行动会作出相应的反应,他对还未解决的情境就不会感到恐惧,他不需求助于别人的判断来安慰自己或减轻自己的不安,他相信自己的看法,他“价值判断的重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并不是说他总是能断定自己是正确的,而仅仅是说他对自已的观察和看法没有什么不安。如果知道别人的看法会提示一种新的解决办法,或给这个尚未解决的复杂问题赋予了一种新的关系,他就会求助于他们,但这仅仅是用作一种帮助,而不是用于安慰。在面临问题,能力受到检验时,对检验将出现的结果充满信心,并勇于去做一尝试。如果答案还未显现,只要问题与他的兴趣相关,那么,他的脑海中就保留着存放答案的空格,他预测到稍后就可能会有答案出现。

因为对问题或世界不害怕,就有耐心去认识那些明显对立或有差别的事实。他不会无意识地或习惯地忽略掉这些事实,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引起了他的警觉。又因为将世界看作是有序的系统,他就猜测到:两个不一致的事实,虽然都确证为真,也并非就真正对立,而只不过是某种更高级的尚未被认识的有序系统之一部分而已。因此,正像任何问题的出现一样,这一不一致对他是个挑战。他乐于去探求那个更高级的有序系统,以使这不一一致的双方达到协调。他感觉到需要将双方置于一种逻辑的或令人满意的关系之中。太简单的排列他不感兴趣,也不满足。这样,他可能更喜欢某种

无序或逻辑矛盾,既然它们预示着他可能会得到一种更高级的排列。

随着经验的扩大和对自身能力自信心的增强,他就会对相对简单的问题失去兴趣,而试图去解决那些越来越困难的问题,有时甚至只愿意解决那些困难的问题。这是两种不同的倾向。前一种倾向从下面这类画家身上可以看出:随着画龄的增长,他们就从追求简单的对称上升到追求复杂的颜色和形式的平衡,以至于所画的作品令初学者感到混乱不清,但却给那些理解力已增强从而能够欣赏他们作品的人带来最大的审美愉悦。后者表现在这样一类画家身上:他们从简单的写实到画印象画,再到表达抽象感觉的象征画,如伦勃朗(Rembrandt)。在其他文学和艺术作品里也可以看出这一变化。在商业活动中,这种变化则像爬楼梯一样,一直爬到责任更大更难应付的位置。

在数学领域,创造性活动的顶峰通常来得较早,几乎所有伟大的数学家都是在30岁以前做出了他们最初的贡献。而在其他一些领域,创造性活动的顶峰来得则要晚一些。这种区别似乎与创造过程所以进行的场所有关。数学中,瞬间的创造活动发生在无意识中,新的概念以一种几乎完备的形式呈现在显意识里。而在其它许多领域,显意识判断却占有相当大比重。或许任何人内心深藏的对世界新颖而伟大的看法都只有一种。在创造活动与复杂的生活细节无关的领域,人们通过单独地抽象出用于组织材料的逻辑联系,就有可能在20多岁时根据已知的逻辑关系得到这新颖的看法。此后,他的思想就转到那些确证能获得成果的领域,并花去一生中所剩的时间来整理思路,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众多小的进展。然而,在现实生活的复杂细节和关系与创造性活动有关的领域,为使判断的基础更加牢固,就需要逐年积累知识,以便为无意识(也包括有意识)活动及创造顶峰随后的到来提供有利的条件。

创新者不仅会感到解决问题的愉快,还会获得成就感的满足。经济创新者们公认的目标或者他们感到有责任去实现的目

的,在不同的社会十分不同,但责任感却都一样。一般说来,这种责任感具有宗教的意义。虽然与创新活动尤其相关的新教异端者特殊的宗教信条已经过时,但是,不同社会观察经济增长的学者们许多都已注意到:创新者在其早年的成长阶段,不管所持的信条到底是什么,似乎都拥有一种共同的可以恰当地看作是具有宗教意义的伦理性格,他们都超脱自己现实的利益考虑感到有责任去改变世界。

除上述几个特质外,还应再加上智力水平和精力状况两个因素。智力能力部分是先天性的。毫无疑问,创新者的天赋能力多半要高于普通人。然而,创新者的智力能力部分也是来自于上面所描述的几个特质。具有一定才智的人越是将世界看作是一个有序的系统,对自己的判断和反应越是自信,在解决问题或处理不一致情况时越是踌躇满志,以及用于压抑内心那种不可接受之冲动的能量越少,就越能有效地使用他的才能。缺乏这种看待世界之态度的人,就不会试图去使用他的智力能力。但这种态度并不是天资高的直接结果,它们主要来源于个体在其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孩童时期所处的环境条件。这些条件与先天能力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变量。

决定精力状况的也是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天生的因素或者概括地说是那些体质的因素,决定了个人的精力状况,正像智力状况也受此决定一样。体质较好的人,精力在一般人之上,作出创造性活动的可能性也比一般人要大。但是,动用精力的能力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对自身的信任与否,依赖于他是否将世界看作是有序的系统,以及是否认为世界对他施予的刺激会作出预料之中的相应反应。情况似乎是,只要不将自己的精力用于内心冲突,就会将其有效地用于处理外部世界的问题。

有创造力的人不一定就是个幸福的人,他在面临问题时所获得的不纯粹是乐趣。相反,大多数有创造力的人正是由于处于不断的焦虑之中,才去进行创造性活动;他们关于世界具有威胁性的认识,促使其一次又一次地独自工作。而其他人的焦虑却往往伴随着

愤怒,并由此激发了他们的无意识过程,使之处于波动和幻想之中;由于害怕暴露所想的内容,他们就压抑自己的无意识过程(这种焦虑也处于无意识之中,如果问他们,他们则否认其存在)。必须区别上述两种类型的人格。

如果一个人在其早年生活中面临过一系列重要事情,而他又不能满意地解决,或者只有在多次尝试后才能满意地解决,但又需要克服一系列困难:饥饿、被迫走动等等,那么,他就会长久地处于焦虑之中。然而,孩童时代这种由于情景刺激而产生的焦虑感则属于另一种类型,与由于对世界的看法而产生的焦虑感是不同的。他可能因面临某个重要人物如他的母亲的潜在伤害而感到不安,如果这样,他的这种不安就会变成对他母亲的愤恨,并幻想怎样复仇;然而,他必须在显意识里压抑这些冲动,因为他的母亲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以致他不能允许自己恨她;于是,他就封锁了自己的无意识过程。这样,他的无意识过程就不可能是有创造性的,或者,创造力受到极大削弱。

然而,如果孩童时期的经验给了他一种稳定而愉快的印象,觉得他的母亲可亲又有教养,那么,这种愉快而轻松的感觉本身同样不能使他取得成就,尽管她希望他取得成就。但随后他会感到是自己本身有缺陷,于是内心也产生了焦虑,担心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终生的焦虑使他决心取得成就,以便重新获得从他母亲的赞扬和爱抚中所得到的那种转瞬即逝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他心中几乎没有什么愤怒和仇恨,他的无意识过程将是有效的,只要具备其他必要的素质,他就会成为一个有焦虑感的创造性人才。

当然,这里所说的感觉是指对于母亲之间的关系。和早年生活中其他重要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感觉。

这类人的经验可能并不像无焦虑感的创造性人物那样广泛,因为他们相比后者更害怕经验。他们能有效地利用自己无意识过程的可能性要略少于后者,既然他们孩提时的紧张已经在其心中产生了恐惧和不可接受感,并不得不永久地将之压抑下去。不过,

这一不足则由于他们眼界的不断扩大而得到补充,也由于拥有充沛的精力而被抵消,因为这种充沛的精力使他们能够不断地战胜不安心理。

的确,创新活动总是对不同程度的焦虑的反应。个人完全不是因为需要摆脱焦虑而去创造,而仅仅是因为可以得到巨大的快乐才去创造,这只是一种理想状况,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创造并不要求个人完全进入无意识状态,对自己的判断绝对自信等等,只是要求比一般人略多地具备上述几方面素质而已;而且,某些类型的创新可能只要求中等水平的创造力再加上顽强的意志或比一般人动力更大即可。上述所描述的创造特质,对经济创新者来说也不例外。不过,在经济创新者身上,这些特质比表面所能看到的要更强烈。这主要是因为,在商业活动中,通常要求掩盖自己的内心世界,使自己显得性格一贯很外向。

### 决定创新的因素

上述的讨论只是涉及到一般意义上的创造力。而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任何个人都不是有创造力的,具体的个人只是在某种或某些特殊的活动中有创造力。因此,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某种活动是创造的一个因素。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能够将自己的创造力导向某一领域的人在如下三个方面显得很有特色:对相关活动的评价,焦虑感或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满意度,以及自己感到安全或满意的活动规模或影响范围。

第一位的因素可能是对任何活动都应保持一种完全超然的态度。某种意义上,个人本身就愿意欣赏像耕种、修理机器或沉思数学问题等的乐趣。其次,个人对与他人的关系会有各种各样的态度。他可以从与他人的竞争中寻找乐趣;可以从向自身和向外界的攻击行为中感到快乐或暂时解除不安;或者,在看到通过自己的逻辑推理或劝说影响了他人时获得一种安全感,在得到某个控制他人的位置时也会生产这种感觉。相反,在和距离较近的人竞争或合

作时,人们会感到不安,转而独自工作。个人的这些特征加上他所处的环境条件,就决定了一个人所能选择的工作岗位。第三,如果一个人具有力图影响或支配别人的特点,那么,他对自己的此类做法就会感到满意;或者相反,只要还存在着一个较大的群体,而他还没有在这个群体中检验自己的能力,他就会觉得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证明或还没有获得安全感。因此,人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群池域(Pond)——这个池域无论从智力、技术或社会角度看对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中满意地工作,或者,也可以力图在自己的行业或整个社会寻求广泛的影响,并改革整个社会。

毫无疑问,技术革新需要人们具备以上各种态度才有可能实现。值得注意的是,(以前或)传统社会中,精英阶级的身份认同使其不可能在与体力者共处时发挥有效的作用。一般说来,传统社会的权威人格是不具有创造力的。如果说精英阶层的某个叛逆者变成了有创造力的人物,那么,只要他仍然保持精英阶级的那种对有兴趣使用体力、简单工具和机器等进行劳动的人的反感,他就依然不能做到技术创新。

简而言之,有创造力的人对新的现象有一种无意识地警觉;他猜测到自己所经验的现象构成一个系统,一个他能够理解和控制的系统。因此,在遇到意外情况时,就会从新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情况,而不是气馁。对于所观察到的新现象,他依靠想像去寻求答案,其大脑的无意识过程对问题的实质作出反应,而不是遇到问题就气馁,通过发怒、攻击性幻想或魔术式的幻想来解决问题。因为对自己的无意识过程不感到惧怕,他的无意识活动的成果就会呈现在显意识里。他以超然的态度观察自己与外界的互动;他关于自身对外界和外界对自身反应的认识建立在这样一种合理的根据之上:他自身是一个系统。或许就是根据这一点,他认定外部较大的世界也是有序的,可以理解的。他自信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因此,解决问题的前景吸引着他;他勇敢地去探索而不是逃避。许多有成效的创新都是个人在生活中遇到深刻不安的压力下做出的;这种不

安不是那种平息后就麻痹松懈的内心矛盾冲突,而是由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这种内心折磨产生的。就是说,他们通过创造成就来暂时逃避自己的不安心理。有成效的创新者还具有一种一定要取得成就的责任感。

### 权威人格

人们只要想一想自己孩童时期的形象,就会理解愿意服从权威的人格即权威人格的大部分特点。儿时的个人不将其周围现象看作是组成系统的元素,没有认识到系统的运行可被分析,是对他早先明智行动的一种反应。他所获得的是另外两种关于外部世界的印象,这些印象对其成年以后的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种是,外部世界被看作是任意的,变幻莫测的和不可分析的,是现象的堆积而不是由因果链条组成网络;另一种是,外部世界被看作不是任意的,偶然的,而是某些远超过自己的力量展现,这种展现有其自身的目的而不受他个人意志的影响,除非他将自己的意志服从于那些力量的安排。我们认为,由于体验这类认识是令人痛苦的,他就将它们排除于显意识之外,但它们却保留在他的无意识之中,从而对他成年以后的行为发生影响。

这些认识使他害怕使用自己的创造精神,不敢保证自己的看法,总是倾向于让别人作决定,以避免挫折和不安,尽管在没有获得这些认识之前,一旦遇到问题他也会产生不安。他不是通过自己的分析来解决物质世界或与他人关系的问题,而是通过遵循父母或早先其他权威人物所传授的传统行为方式来逃避痛苦,通过依靠位于其上的权威人物或权威力量的判断或者意志来逃避痛苦。

受这种认识指导的人他们经验的广泛性不会使其感到快乐,因为控制他们的现象或力量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抵御的,从中不可能得到有益的结论;而且,新颖的现象是让人烦恼的,因为,如果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就会引起他对解决问题的前景感到不安。因此,不管是出于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原因,对于外界的有趣细节,他都视而不见。他发现依靠传统规则或老人、智者与上级的判断更为安

全。

产生这些认识时的痛苦经历一定在其心中又引起了令周围人震惊的憎恨感。我们会看到……这使他既怀疑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又怀疑自己有同性恋倾向和要求。他压抑了自己的恐惧感，把那不可接受的冲动驱逐出显意识之外，并尽可能完全地封闭自己的无意识过程，因为他对自己所想所惧怕的内容感到不安。因此，他的无意识过程对他来说就是不可利用的，是无效的。他不是对所看到的现象作出反应，而是立刻观察到了被面临问题时出现的不安重新刺激起来的，内心那种已压下去的不可接受的冲动和要求。

愤怒和痛苦，尽管多次被压下去，还是一一直在其心中。对于从前任意支配自己的上级权威，他不敢直接表示自己的愤怒，因此，一旦自己变成了社区中的长者，一个父亲或一个长兄，他就对自己在下级面前的支配地位也略感满意。而当他一步一步地沿着权威地位的阶梯不断上升时，他隐隐感到的担心就使他坚持认为：他的权威是不可怀疑的，就像早先自己被迫服从上级的判断和意志一样，他的下级对他也应该这样。这样，传统社会中，每一个成年人都表现出强烈地抵制对权威决策和传统方式的任何怀疑，这种抵制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障碍。

### 有益于经济增长的价值观的出现

如果社会变迁是朝着经济增长方向的，那么，有助于技术创新和其它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活动的价值观，就必须体现在人格特点中。这种价值观在改革者身上出现的可能性比在其他革新者身上要小，因为改革者主要关心的是道德和权力问题，而不是效率问题。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多为非改革者的革新者促成，尽管他们可能会影响到改革者，并通过后者而发挥作用。

前面我已指出了，从某一受尊敬的群体中退出的人在什么条件下才可能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那么，他又怎样才能立刻从根本上拥有一种新的价值观呢？

### 身份认同和寻找新的身份

一般地,我们说儿子像父亲,但这仅仅是一种大概的说法。儿子将其生活中所见的满意的角色形象不断地内在化。通常,父亲的角色正是儿子想像中所满意的。然而,在父亲退出期望地位时,他就塑造了一种与原赞成他的人所满意的形象相冲突的自己满意的形象,同时,这冲突也使他产生不安。儿子在面临父亲所引起的这一冲突时,就需要确定究竟什么是好的形象。

如前所述,第一代或许前几代人在面临这一问题时,除一再压抑与标准相冲突的价值观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从上一代到下一代,他们越来越变成了退却者。但是,当一个有较大创造力尤其是有较高成就需要和自由需要的个人出现时,他的创造力就会促成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

即使是非常自立的儿子,多数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其父亲的价值观得以内在化。父亲在儿子的生活中太重要了,因此,这种内在化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如果这个儿子是有创造力的,他就会在接受父亲价值观的同时,又怀疑这些价值观,因为它们不能在父亲身上协调一致。但他这时还不十分清楚自己究竟该怎么办。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在父亲以外观察到了其它行为模式,并发现它们更能令人满意。这时,他就能将这些模式解释成父亲价值观的某种延伸。这样,他就找到了一种获得恰当生活角色的可望成功的路,不是放弃而是实现了他早先的想法。

如果在其早年生活中就对自由有很高的要求,那么,他接受父亲的价值观,不仅是出于要找到一种更为满意的模式这种一般的感觉,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理由:对他父亲行为的强烈不满和失望。

母亲的教育和劝说以及对父亲动机的直接理解,使他觉得表现出对父亲不满是一种犯罪。他通过将自己的不满看作只是冲着某些似乎不是父亲自身一部分的特征,而不是他本人来解除自己的犯罪感。父亲向儿子表示,他对自己的价值观的某些方面也有些

不安,以此邀请儿子一起来解决问题。同样,稍后,儿子对攻击群体也感到不满,但他不能公然而完全地抛弃这些群体的价值观,因为,如果这样,将使他的社会身份处于一种不完整的参照网络中。如果他能既宣布放弃某些精英阶级的价值观,又能拥有令精英阶级感到满意的生活方式,并可能得到比他父亲所能给予他的更高的地位,那么,他就算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地位。

环顾四周,他可以找到一些并不威胁他的群体或个人,他们拥有权力,或拥有被蔑视他的群体所认可和尊敬的地位,他们的生活角色也并不与他接近。如果他通过采纳这些群体的价值观和某些生活方式来证明实现他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可能性,那么,他就算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如果这种新的价值观被看作是他父亲的人格和他孩童时代模式的某种延伸,只是通过叠加改变了原有的部分价值观而没有舍弃它们,那么,他就算达到了最佳境况:能够避免来自其父亲和攻击群体的贬斥,能够将其不满发泄到他们那些允许攻击的不完善之处,获得了一种新的安全希望,而他为目的采取的行动依然符合社会的一般标准。

的确,如果他很聪明,他就能达到另一目的,即可以与其父亲和攻击群体都保持部分一致,并知道他们与自己也有相一致的地方。他的父亲和攻击群体凭推测对他视为模式的那个群体的价值观表示蔑视,因为他们猜想:如果那种价值观的某些方面与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不相矛盾的话,那么,就不会使他感到满意。如果他现在能放心地舍弃他父亲和社会要求他奉行的价值观,而采纳他们所蔑视的价值观,那么,他就会报复他们,因为这样,他不仅会有毁于自己的身份,而且,由于他对世界的看法与他们部分一致,也就有毁于他们的身份;这属于这样一种常见的现象:一些孩子对其母亲的轻视感到气愤,就通过伤害自身的办法来使其母亲感到内疚。但,如果这样做也能发现一些新有价值观,它既可以是旧有价值观的延伸,又可以允许自己独立并保全自己的身份,那么,他可以放心地去做,否则,他自己也会认为这确会有毁于自身。

我可以断定,新的价值观显然不能通过理性选择的方式被人们接受,孩子是这样,大人也是如此,接受的过程主要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作为对内心需要刺激的反应,无意识过程就去寻找一种确实能满足需要的精神模型。促使个人开始接受新价值观的环境压力不是来自于较大的社会,而是来自于他孩童时期直接遭受的压力情结。我认为,例如,在欠发达国家,没有人仅仅出于理智的判断就决定终生从商,认为只要掌握了西方技术,从事这种职业就会有利可图,就会使他拥的经济权力(他可能认为他的确是以此为根据的做决定的,但我认为这种个人的陈述在此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只有在职业活动本身(不是活动的结果)使他产生一种权力和身份的满足感时,他才会转向这一职业,只是在想到同类追求者的价值意义时,他才会这样做。

#### **技术选择：宗教伦理**

关于怎样寻找一种新的价值标准,这里不再多说什么。由于背离原有受尊敬的地位而遭受压力的群体,会想方设法掌握高超的技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在各种所见的模式中只要有一种模式使之可能得到更为满意的身份感,比其它模式更有可能赢得声望较高的参照群体的关注和尊敬,他们就会按照这种模式去做。地位不再受尊敬的群体在其存在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选择了各种各样的角色,通常是那些能带来社会权力的角色。一旦某种技术进步的模式及其相应的权力模式出现后,许多群体就必然会抛弃原有可尊敬的地位,来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

在日本,被西方世界的勇士当作其军事力量源泉的行业,正好满足了人口中那些感到不满的群体的需要。这些人对地位的期望比德川幕府要高;他们代表了传统武士阶层军事价值观的延伸;公然反抗德川幕府的侵略行为。在哥伦比亚,外国人的高超技能,也很好满足了需要。这种高超的技能是安蒂奥基亚人所从事的体力—技术行业的发展,它的使用贬抑了其他哥伦比亚人的价值观,能够带来高于其他人的经济地位。的确,传统社会中那些不满于受

精英蔑视的群体,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已经很明显地转向了(东西方的)外国人评价较高的生活方式。

新教异端者和苏格兰低地居民似乎还未明显地找到导致技术飞跃进步的模式,手边也还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用。不过,这些人从前曾将他们的宗教信条重新解释成最先为人类寻找依赖感提供了可行的方式,当追求技术进步证明是有吸引力的时候,他们也可能重新解释宗教教义,以为这种行动寻找宗教上的根据。

重新解释宗教教义在俄国也起到了双重作用。尽管老的信徒大多都是旧信仰而非新信仰的保持者,但教会的分裂无疑使他们感到自己应比以前更要对上帝负责。可以合理地认为,正是这种在17世纪让宗教权威们随意解释的教义,启动了后来一系列的人格变迁。

即使宗教变化没有在先发生,找到了新身份的人也会到宗教里去寻找根据,重新解释教义,以为自己新的生活的目的进行辩护。

在日本,变化体现在重新解释天皇的作用方面。虽然这不是以宗教形式出现的,但可以合理地被看作是对宗教伦理的重新解释。在哥伦比亚,既没有出现对宗教传统的任何违犯也没有出现对教义内容进行任何明显的重新解释。但隐约的解释可能已开始,观察家们注意到:许多安蒂基亚人似乎已感到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人生责任。

### **克服两难选择:吃掉蛋糕同时保有它**

在旧的社会秩序还未遭到致命破坏以前,随着经济上的成功,创新者倾向于去获得传统的地位象征,以保护他们经济上的影响力,因为他们还没有放弃社会上对地位价值所抱的普遍看法,只是暂时抛弃了约束他们的旧价值观。哥伦比亚的经济创新者就没有试图去掩盖他们对土地的留恋心事,在工业经济成功允许时,他依然希望“留一只脚在上面”。在英国,对占有土地所带来的地位、名誉头衔和高贵身份的满足感,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商业领导者

及其后代身上,与在旧贵族和绅士身上表现得一样明显。在日本,旧的封建经济体制被革命摧垮了,经济创新者取得了成功,因而,旧体制中相应的可留恋之处也就不存在了,因为体制本身已不存在;但他们多数人在达到社会等级中的某一位置时,依然与老一辈人表现出同样的满意感,虽然在他们的身上已没有了经济—军事的装饰品。

这就是说,有创造力的和革新式的人格可以出现在撤退之时。创新者将技术进步看作是实现目标的希望之途。这种文化氛围影响了新一代的价值观,使其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这样,生产创新随之就会出现。创新人物将根据需要指导制度改革。从而,经济增长就将获得所需要的动力。

(张新梅 译)

W. 摩尔

## 发展的动机\*

在有关经济发展的文献中,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界线分明。这种界线对学科源起而言有着高度预见性。经济学家们的——不愉快科学的代表——对经济增长及其社会后果自然而然地抱乐观态度。而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尤其是它的后果则自然而然地持悲观态度。很可能,这些领域吸引了不同个性类型——狂热的和抑郁的人,但传统的理论和思维习惯似乎更有可能解释这种差异。

### 一、一些可供比较的理论

#### 1. 动机理论

传统的经济理论不太关心态度和动机。人类态度和动机被简单地假定为与理性选择最大化满足有关,一如经济学所定义和衡量的那样。人的欲求被认为是本质上无止境的。且人的本性是极为相近的。假定财政刺激在劳工分配上是卓有成效的,金融市场体系就在生产和报酬分配诸要素之间起协调作用。劳工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被看作是其不同边际生产力的函数,原则上说过程

---

\* 选自 E. 爱兹奥尼主编的《社会变迁》一书。

是由资本化的相对状况、技术及企业决定的。

根据这些假定,经济学家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所持有的悲观主义情绪主要集中于对资本、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的活动的质疑,而非挖掘工人潜力的意愿,由于经济学家对于生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与共有的人类欲望相一致的论点带有偏见,因此他当然对经济增长的后果趋于乐观。

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与这套论点截然不同,态度和动机更被看作是与社会体系中不同阶层有关的变量。人是以适应不同的社会角色的方式被社会化了。群体活动和它的生存禀承适当的价值观,并按以“非理性”和“无理性”作为经济根据的方式行动,因而,欲望被看作是有限且与社会地位相关的东西。社会体系被看作是强烈抵制变化的。部分是因为在复杂的功能网络中第二位的和第三位的变化结果。如果这些思考在社会当中是重要的,那么在它们之间甚至更明显。同经济学家的“相似的人类本能”假设相比,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了“文化的相对性”。他可能更强调在时空上的价值和欲望的差异,并且非常愿意假定西方的经验能被用来指导达荷美、尼泊尔,甚或秘鲁的行动。

根据这些假设,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关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乐观主义的暗示被期望集中于对传统态度和模式的经济刺激和组织的适应性上,特别是集中于潜在劳动力要工作的意愿上。并且既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面包或所有的交易商品及服务。满足人类的价值需求是不充分的观念持有常规的偏见,它一定更倾向于对经济变化的结果抱悲观态度。

当然,这些比较对两个职业群体都是有些不公平的。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研究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以及劳动者行为的经济学家,曾表现出对传统理论假设的强烈的担忧。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特别是那些研究现代经济形式在欠发达地区的实际影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注意到了传统体系的压力和紧张以及在新招募的劳动力当中选择新的职业的成功。

## 2. 组织合作理论

关于经济发展的文献很少包括两个职业群体不相一致的方面的理论。在与参与者的态度和动机相关的商业和工业组织的本质上存在不同的观点。

传统的经济理论很少谈论这一主题,既然劳动力被看作是由市场机制及在原理上同其他经济对比中相同的雇工和雇主之间的关系配置的。劳动力分工的生产效率引起了一致的关注,但是暗含于工厂组织当中的与劳动力的秩序协调相关的问题还没有开发。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及最近的经济理论中才尝试建立在工人运动和管理工会的关系中二者择一的理论,才考虑像权力和群体忠诚这样的变量。

传统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也很少谈及商业和工业组织,部分是因为它们一般更集中于社会的结构,部分是因为经济组织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知识范畴。只是在韦伯及更近些的社会学理论中才尝试将工厂当作一个社会体系来看待。才有了诸如办公室权威、沟通体系以及“正式组织”此类的变量被考虑。

尽管我们比较的这些学科只是新近的,并且至今,仍旧只是对工业组织的外国关注,也能探究到这些学科之间的区别。经济学家强调并夸大的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个人竞争的欲望。同样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强调并夸大是群体合作的欲望。如果经济学家的行为模式是奖励竞争,那么社会学家的模式就是保护蜜蜂。

## 二、一些经验证据

面对经济行为同它的动机来源的对比观点,可以原谅分析者的一些迷惑,允许他们在资料当中寻找避难所。不幸的是,不能以使理论争论得到圆满解决的方式收集和分析证据。然而,在这些问题上通过参照不发达地区在招募和利用劳动力上已有的经验,还是可以获得一些启发。

### 1. 冷漠与反对

大量的证据体系是与人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财政刺激会使劳动力从非工业化向工业化职业转移以及从传统约束中解放出来的潜在劳动力是受欢迎的这些观念背道而驰的。这种证据中的一些能用“理性所为”解释,但不能用经济最大化做出解释。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是最需要放弃在物质和情感上提供给他安全的组织形式和相互责任的传统。任何未工业化的社会里的亲属关系可能构成了个人流动的重要障碍,因为它是一个社会安全体系,因为它是积极的价值和利益的焦点,并且也因为扩展的亲属责任可能减少个人报酬的有效吸引力。在这种扩展的亲属体系中,如果个人身处逆境,他的亲人有责任帮助他。如果他发达了,他也有责任将他的好运同大叔和二侄儿共享。工业化靠地理分离,更主要的是靠社会分离打破了这种单元。

事情的另一面(在它的涵义里的不适当的暗喻)是缺少新的身份体系的赞赏。这可以采取一种相对低的并且非常特别的工资吸引力。经济理论的前古典作者们常常是参照“本国”劳动力,也参照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工人。但这项原则担负扩展。新的职业不能适合传统的声望标准。或者因为他们包含体力劳动,不考虑年龄、亲属关系、等级或其他附属地位的形式。达到此种程度以至于潜在的工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者使用,工薪劳动即使提供高额的报酬但也失去一些“自由”,达到将潜在的工人作为一个手工艺者的等价物的程度。另外工厂职业的变化在劳动与其机器过程的附庸物的区分中可能包括失去了社会承认的工人的技能。

难于否认相当部分的这种冷漠和反对是合情合理的。但同样难于否认的是对此的解释部分存在于由工薪刺激和劳动力配置的工业形式被粗暴地对待的社会价值和标准。

### 2. 环境的力量

如果工薪对非工业人口只有有限的吸引力,并且新的职业被消极评价,工人们更主要是被“推进”而不是“拉进”现代经济活动

形式中的,许多“推进”实际上是外在干涉的盲目结果。降低道德性的成功尝试有使人堕落、减少土地比率、增加农业失业人口和促使没有土地的贫穷的农村居住者去寻找和接受其它的生活方式的效应。廉价的机械制造物的引进较成功地替代了手工工人的位置,使得多余的劳动力可以直接地或通过农业的增加了的独立性获得。甚至商人也被通过大规模分配或简单地通过更有效地建立市场的更有效的组织替代。

饥饿的压制不能分散得到的压力。直接的压制也有扩展的记录,从强迫劳动或间接的税收压制——作为策略被广泛用于非洲殖民地的一个体系。

不是所有的对潜在工人的压力的来源在开始都是明显外在的。任何社会都展示某种程度的紧张和约束,作为不满的一些证据。新选择的出现使得脱离常轨者能避免传统秩序的约束,从不想要的压迫性的控制当中解脱出来。

还难以否认的是暗含于这些行为类型中的态度是合情合理的,并且还同样难以否认的是在刺激和机遇方面不适应对微小差异的高度敏感性的观念。

### 3. 积极诱导的效果

并不是所有的经验证据对工业劳动都持这种消极态度。工薪还是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当他们能被用来形成部分传统的消费模式和传统的关系模式的商品和服务。传统形式是与西方的市场运行概念非常不同的东西。本土的非洲人为付他们的房税长时期在煤矿工作被认为是没有融入市场体系当中。当他用他的薪水花一个新娘的价格买牲口的时候变得稍微融入了些。但这仍是一种很明显的外来味。当他表现出对各种各样的商业化的商品和服务感兴趣时,他的行为就更适合我们的标准概念,但是,当然这时候他可能没有了前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

在一些地方,尽管缺乏财政刺激或与他们经济期待效果相反,其他的工作诱导似乎是可以奏效的。爱国的动机和其他的群体目

标在绝大多数工业社会形成了对工人吸引力的基础。是什么效果是难以准确说出的。当然,在一个值得在一起的企业中的自愿参与感提供了使工人满意的来源。在这里,它可能被当成工会一类的组织的可能的积极角色。当然共产主义者试图在欠发达地区,用新的上层建筑吸纳工人,同时摧毁旧的社会忠诚和权力形式。

### 三、朝向一个可信的理论

关于这个题目的讨论暗含着对两个极端理论地位的拒绝,它们构成了文化当中的二难选择。尽管所有的经济学家绝不会承认,一个极端就是经济学。对传统的经济学家来说,劳动态度简直不成问题的,因为它们完全被纳入到最大化欲望满足的假设中。在同样没有代表性意义上,另一个极端要归于人类学。劳动态度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他们是以变动的文化为条件的。对此没有其他的更一般的陈述是可能的。

这里描述低序理论的基本要素的尝试是依赖于对于欠发达地区给出一个一般性的特征,描述一些现代经济组织的关键性特征并且表明从一种到另一种的转变有重要意义的劳动态度是可能的假设。

#### 1. 欠发达地区的本质

尽管文化的差异是真实的,并且在许多方面,在较高的归纳水准上探究社会组织中的共有的本质变量是可能的。每个社会都有其再生产、青年社会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配置、非人环境的调整、维持秩序的条件和规则。在同源的方向和价值中探究共有的基础也是可能的。所有的社会都鼓励一些物质欲望(尽管没有必然的扩张和竞争),利用环境的一些理性的、技术的方向(尽管没有必然的创新)以及在健康长寿上的一些积极的价值。

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有紧张和约束的内部源泉。圆满的一体化的社会模式是为了许多目的的一个实用分析的虚构。但不应为原

始的或农业社会所迷惑。约束的起源至少可以归结为从一代到一代的社会化、机遇创新以及按照时间、财富和能量(或者情感的忠诚)竞争的角色需求的一系列的的不确定性。

所有的欠发达地区都已以某种形式或某种程度被“外在”的西方模式的影响瓦解了。这种干扰的结果可能或不可能对持续的经济发展有利,这将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根据具体情况所采取的策略,同时也依靠可能的影响效果。

一种消极的归纳在对工业化的劳动态度的含义上也是消极的。基于个人成就之上的变动性一般在欠发达地区表现得不明显,并且一般也不能形成积极的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无论是对个人或对整个体系来讲,持续性可能是重要的价值观念。

## 2. 现代经济组织的本质

现代经济企业依赖于一个复杂的机制体系的想法现在已得到共识。出于简单化的目的,这可被概括为配置生产要素和得到商品和服务分配的金融市场机制。对于非人类的生产因素,这至少包括可转移的财产权和理性费用的报帐,对于人类的生产因素,这包括了为他自己及其依赖者要求必要而适当的商品和服务的媒介放进特殊化的工人手中的工资体制。

尽管部分劳动力的分工是通过非人的市场机制来协调的,生产单位中以工业组织为特点的固定资本和经济规模也暗含了管理协作和权力规模的发展。

如果劳动力能被理性的配置合理地利用,在技术竞争基础上选择,在明确的相互依赖任务关系中协作,联工计酬就显得很重要,这些报酬不需要排除财政的,只有少数是财政的。所有这些报酬暗含了与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密切相关的社会阶层体系。

## 3. 变迁的本质

无论是观察欠发达地区还是高度工业化的地区,能够证明一个基本的理论观点,这个观点是人类的动机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人们有很多原因为某种活动尊崇的价值观念的工作并且为了他的价

价值观而拒绝工作。工业体制强调市场所要求的价值和市场所提供的金融需求的刺激不应阻挡我们分清目的的多样性或者满足方式的多样性。

工薪刺激的有效性是同在形成工人的部分有效需求的市场中能够得到的商品和服务相关的。这是一个本质上有限的共性的静态规则。认识和说明观察者对“非理性”的当地人的一些恼怒是困难的。不发达地区的工人不习惯于期望更不去追求在其消费和社会地位上达到极致。并且有许多欲望不能为市场机制满足,所以我们拥有有限的需求和有限的供给。

将这一规则转变为动态术语,现有的证据表明我们应通过在知识、教育以及发展新价值观方面的需求和在因工业化而进入市场的服务转变中新获得的额外商品的提供上有所期待。

拓展市场导向的观点有益于其理论的重要性。

可供选择的新职业的吸引效果是同能否获得满足需要的报酬相关的。如果物质的甚或财经的兴盛能保持稳定,这个规则仍能适用。潜在的报酬在社会价值的可接受体系中的声望和尊重,也是一个有限的共性静态规则。社会价值的传统体系不包含新的活动以及同后者的竞争或同前者的冲突。变换和选择都趋向于贬值。如果建立了工资同市场之间的一些关系,较高的工资水准可作为对保守的传统的一个主要杠杆,并且这是其历史角色。私有劳动者在这方面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这可能是经济发展中政府政策大显身手的主要场所。

超越时间,我们应期待在愿望和与地位变动、成就评价、选择和开创的真实意义相关的价值观上有所提高,我们也应该期望与这些欲望和价值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和分层的新体制。

同样也受劳动态度影响的经济增长可能为几个恶性循环中的某个延缓或限制。连班工作也借助少出力或更难以察觉的沮丧或冷漠,低工薪和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大量的证据。探究和利用可改变的手工技能的失败,最初没有技能的当地劳动力不能培

训的假说以及作为这些实践的一个极端的和开放性展示的“色带”(colorbar)的采用在短期内将造成浪费,在长期内将造成持续发展的可能失败。

在欠发达地区的潜在工作者中,既没有获得技能又没有适当的态度被认为是很多的,这是证据确凿的。将来,只有那些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正式的教育或教育和培训最迎合工业经济需求的地方的经济增长才是最迅速的,同时也是最可能持续的。现在清楚的是许多殖民地区的教育除了发展了机械和技术技能之外,还唤起了一些东西,但还没有使当地人得到使用这些技能的机遇,新的当地领导人只是一个政治煽动者,而不是一个经济管理者,很少关心殖民的政治和经济政策。

朝向工业化的积极的劳动态度的发展能够通过社会参与感的培养得到提高,也可以通过增大个人机遇和至少同在传统组织中能够得到的休闲和安全条件一样的扩展得到提高。社会参与感即使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也常常被忽视。我们不知道可塑的工业组织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如果经济发展像所发生的那样在社会组织上担负革命性变化,假定工人、管理者或政府官员可能很愿意参与对他们“失根”的部分补偿至少是有一些理论原因。

根据人类动机具有复杂的丰富性观点,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刺激必然为不能持续的有限供给竞争二者在一个非常高的限制中可能同时并且持续地上涨……

(刘晓君 译)

A.英克尔斯

## 有关个人现代性的了解与误解<sup>\*</sup>

### 一、前 言

对于人类在近数百年来重要变迁,我们应可获得相当一致的看法;在大多数人的清单中会包括有民族国家的产生及茁壮、工业的快速膨胀、农业机械化、科学的显赫、科层组织的传布、教育的扩散以及城市的成长等等。虽然我们很容易同意一些分开来的个别项目,但是,就整个社会变迁提出一套普遍的特征就很难得到同意。更大争议的来源是对这些变迁现象所提出的解释。譬如说马克思要求我们集中于讨论生产模式及由此而生的阶级关系,但 Weber 却以为,社会行动的伦理,乃植基于宗教及其他超越性的世界观,由此才对经济行为产生冲击。另外 Sorokin 则断言,我们已经亲睹感性的上层文化体系,取代了理念体系。尽管有关这些概念的争辩仍在继续当中,这些理论所面对的“现象”仍然存在,而且,许多他们已经辨识的潮流,更加深入和快速。

在探讨这个全球性变迁的过程里,这一代的社会学家,已经有了许多显明的选择。其中之一,是采用大的概念架构,并立即运用

---

\* 选自萧新煌主编的《低度发展与发展》。

到正在出现的现象上；另一种方式，乃经由设计新体系以模仿前人，如 Parsons 的“模式变项”(pattern variables)。但是，我们发现，这两者都不太适当。过去的大架构，太过于正统和教条。若干批判性的分析及较具系统的研究，已使我们觉察到，过去已有的观点是多么受到限制。

在60年代，一种较为折衷的、较不具有意识形态的、较能科际交流的新精神，已广为流传。最先，乃由经济学家在所谓“发展”或“成长”的研究中，加以倡导。透过因素分析，他们企图辨识出“先进”国家共同的社会经济特质是什么，并发现导致经济成长的共同道路又是什么(Adelman and Morris, 1971; Kuznets, 1966)。同时，政治学家也开始集中注意力，研究民族国家的发展(Huntington, 1968; Eisenstadt and Rokkan, 1973)。人类学家把该过程视为一种涵化(acculturation)及社区发展(Goodenough, 1963; Halpern, 1967)；人口专家则研究人口的过渡(Goldscheider, 1971)；心理学家描述孕育企业家行为时重要的人格特质(McClelland, 1967; Hagen, 1962)，或测量个人面对快速变迁，所呈现的心理调适(Murphy, 1961; Inkeles and Smith, 1970)。

大约在50年代的十年之间，经济学家在社会变迁的研究领域中，扮演了带头的角色，其“经济发展”的概念，已成为类似研究共遵的成例。但是，当其他学科也开始注意此课题，并把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也纳入探究时，另一个更能够反映此一全球性社会变迁的新名词便出现了。此即“现代化”一词，它已取得普遍接受的地位(Weiner, 1966; Black, 1966; Geiger, 1969; Brode, 1969)。自此，社会及制度可以被称为较多或较少现代化，并就体系内与其成员之间，划分出“现代”与“传统”的两极(Lerner, 1965; Gusfield, 1967)。

整个现代化的研究，环绕在一系列分立的分析焦点上，大多数作品所关切的，乃是制度的层次。研究者所问的是，什么是较发展国家的制度特质？或者，他们研究某个领域(如工业)的变迁，与另一领域(例如教育)的相关有多大(Harbison and Myers, 1964; Meyer, et al., 1973; Adelman and Morris, 1973)。但是，有一小群人，却关心个

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他们研究个人的特质与社会制度特征之间的关系。这种着重于体系与个人间关系的研究，又有几种不同的取向。其中之一，探讨社会变迁的心理过程，以及接触现代制度并参与社会经济及政治角色的个人适应。本文所欲陈述的，也正是指向这个特定的内容。

不少社会学者及社会心理学家，也曾针对该过程，做了许多实证性研究(Brislin, et al., 1973; Berry, 1977)，但有许多基本问题仍未获得解决。研究个人现代性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已经产生许多误解，包括研究者究竟企图做什么？他们发现了什么？以及他们的发现有什么意义？为求减少这种误解，本文将就有关个人现代性研究时常遭遇到的十个问题，提出作者的回复<sup>①</sup>。

## 二、十个问题的澄清

**(一)为什么研究个人？社会体系的性质，不是已经决定了个人的特质吗？**

不管研究个人，或是研究制度和社会体系，都不过是纯然的兴致。对某些人来说，社会变迁多少即是制度和体系的变迁。或许是他们对个人没有兴趣，或许是他们觉得其他学科应会关切变迁过程的个人部分。接受这种立场的人，也就是对社会学范围采用了狭隘的定义，且与社会学传统中有些主要潮流并不吻合。就研究兴致来说，这种立场当然不能加以争辩。

但是，一旦超越了纯粹的学术兴致因素，即断言社会体系必然决定个人性质，这就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而且，我们或许也可接受此一命题，可是却不因此就结束这个讨论。比这命题本身更引人兴趣的是比它更特定的陈述；我们想知道的是，社会体系的那些层面改变了哪

---

<sup>①</sup> 选择这十个问题时，我试着使它与“迈向现代”(Inkeles and Smith, 1974)一书的结论所提出的“议题”及“挑战”的重叠部分尽量减少。该书的结论应视为本文的补充。

些人?个人的哪些面向?以怎样的速度?又在怎样的情况下产生?

事实上,假如社会体系果然决定了位于其中的个人,只要知道社会体系的性质,以及个人在其间的位置,我们便能精确地说出其特性。但是,正如许多社会科学家感到纳闷的,即使他能完全执行,也无法完美地做好<sup>①</sup>。研究个人现代性的基本出发点,即把社会结构与个人属性的关系,视为是有问题的。不管他们强调重点的不同,会研究个人现代性的学者,都有一共同的关切,即对社会体系与个人属性关系的广泛假设(亦即:前者“决定”后者),提出验证。学者所涉及的特别使命,乃指出社会结构与个人属性的具体指标,并就与理论相关的研究设计中的特征,予以测量。同时,为了证实或否证、修订及扩充原有的理论,则必需对研究发现的结果加以诠释。

检视“社会结构决定人格”的意图,或更明确指出该理论运用的范围,并不是为了对它挑战,或是加以拒绝。反之,在我的经验中,采取上述架构的所有学者,大都相信个人所具有的性质,颇能反映出个人所属的社会体系,及个人在该体系中的特定地位(Inkeles, 1960; Inkeles and Smith, 1974: 19-143, 154-164, 302-308)。而且,献身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的个人,也不意味着个人比体系具有全面的、或相对的重要性。事实上,大多数研究个人变迁的学者,也都把个人现代性视为在制度现代化下的产物(而非导致制度的现代性),且在解释社会现代性的不同层次时,他们也常诉诸政治的、经济的、或历史的因素,而不光就现代人格的冲击加以论断。但 McClelland(1961)和 Hagen(1962, 1975)则是例外。

**(二)是“客观”地位特征的改变,抑或是“主观”的人格属性,才**

---

<sup>①</sup> Blau and Duncan(1967)有关地位取得的作品,已被视为现代社会学的里程碑,但他们模型中的个人社会出身因素,对个人第一个职位的变异量也只解释了33%,在教育取得上,只解释了26%的变异量。Sewell and Hauser(1975)的模型发现,就教育取得而言,不过能解释16%的变异量;在职业地位取得的解释力上,则更少只有12%的变异量。在发展中国家中,理论预测力的受限,Nelson(1969)会提出证据:他认为,客观的地位特征(如低收入及边际地位)对政治行动的预测力,通常较原先所假定的为低。

### 是应该注意的焦点?

假如现代人意味着是具有一套特别的社会经济特征的个人,如“在工业而非农业中受雇”或“住在都市而非农村”,则个人现代性,便可以直接从社会经济体系的变迁加以决定。不过,我们仍应确定“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属性的分配与变迁,看其是否与先前“社会体系”的改变相关。在某些例子中,这种测量可指出很重要的论题。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客观的社经类型的特征,只表现在另一种形式中,此种形式我们已经从集合的统计中获知。

因此,另一种更重要的作法,乃将个人现代性完全由心理属性加以定义,如价值、取向、意见及行动倾向等。这种定义方式,可减低建立在个人层次的许多测量之累赘和循环论证。如果一国已是相当的都市化,则至少有50%的公民是“都市居民”。然而,我们很难确定在心理定义下,主要为都市的国家,大多数的公民并不就会有较高的自我能力意识,或是感到更强的疏离感。

把这些假定的现代化过程的结果,纳入个人现代性的定义中,已排除对最重要命题的检验;因此,在 Lerner(1965)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中,对“现代”、“传统”或“过渡”个人的定义及分类,都同时考虑个人的社会特征,及其在同理心(empathy)测验上的得分。这种方式,使人无法精确辨别出“同理心”(视为一种主观结果)是否真的源自客观情况的改变,例如接触教育、居住都市,及接触大众传播。因为这些其他变项,也被视为个人现代性指标的一部分<sup>①</sup>。为了使社会结构与个人性质问题的关系更易检验,许多学者乃将现代个人以心理社会的方式定义。如 Armer and Youtz(1971), Doob(1960), Dawson(1967), Galtung(1971a), Guthrie(1970), Inkeles and

---

<sup>①</sup> 有关现代、过渡及传统类型的建构,见 Lerner(1965:第二章,特别是69~71页)。Lerner 并不是唯一综合客观地位特征及态度价值,以建立量表的人;其他如 Schnaiberg(1970),以及 Rogers(1969)亦以相同的立场去制作量表。企图对现代个人的心理与社会属性作最完全的描述,这个程序是相当合理的;但是,我们很难辨明在因果过程中主观及客观因素的交互影响模式。

Smith(1974), Kahl(1968), Klineberg(1973)及 Stephenson(1968)。

在此,必须再次强调,只是集中于态度、价值、需求及行动模式,我们并未预断何者导致社会地位的变迁,以及社会地位的改变将导致什么结果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领域中大多数的研究,都有一个共通的假设,即地位决定了人格,而非人格决定了地位(Kohn and Schooler,1973)。

### (三)一个现代人,应具有哪些特征?

在决定个人现代化的心理社会特质时,不同学者可能会因不同的理论背景,个人研究的特殊目的,或所搜集的实征证据,而有不同的思路和想法。依循 Durkheim 的分析,我们可能期望“失序”(anomic)的出现;按照 Marx 的思路,则指向疏离;若循着 Freud 的观照,则可引出高度焦虑;如学著 Parsons 的理想,则又会集中在情感中立等特质。Lerner (1965)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的大众传播角色,则以所持有的意见作为主要的个人特质;而 Rogers(1969)由于关切农民的生产力,于是便强调农业生产中的创新与采用新技术的重要性。

仿此,在哈佛的六国研究中,我们也被一种特殊的理论观点所引导。一般说来,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个人是否及如何把制度与角色的特质,纳为个人属性的一部分。为了使这个模式具有较高的明确性,我们以工厂作为现代制度的代表。我们的一般性问题,便是在较未发达国家中农村长大的个人,当一旦移到工厂工作之后,工厂会教给哪些个人特质给个人?

从分析工厂的特征,如使用机械力量、广泛的分工、分配工作时间的体系、技术阶层制等等,我们导出一组可能在工厂中“学习”到的个人属性。例如:个人的效率感、对新经验开放的态度,尊重科学及技术,接受严格划分时间的必要性,对未来计划表示积极的取向等,每一个特征,我们都把它定义为现代人的内涵。

此外,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工业及都市社会里的公民,也有一些特定的角色和特别特征。例如:在政治领域中,现代政体(不管是资本主义民主或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都会期望有个人的参

与；这包括对新闻有兴趣、认同于国家体系、积极投票、竞选活动及聚会等等。我们用相同的分析模式，运用到其他的制度，乃与该制度相结合的角色。例如：在家庭领域，我们把以下特质定义为较现代——坚持自己择偶（而非由父母或其他长辈择取）、喜欢小家庭、愿意实行生育控制并限制家庭大小、而非被动地接受“不管有多少子女，神将会送到”。

此一系列分析的结果，一共得到24个主题，每项都定义某一个层面，都纳为个人现代性的一部分。尽管已经很长，但仍无法穷尽现代性的全面性，然却反映我们所持的理论立场。

对此定义常有的挑战是，它排除检验其他假设的可能性，而这些假设，可能使研究在一个不同的角度下进行。例如：对方会论辩说，我们的定义只强调了现代人的“正面”特质，而没有认识到现代人的疏离心理压力，以及对亲族不尽应尽的义务等。

这种挑战，我们有两种反应，一是，我们可说去检验别人的理论，并不是一名研究者的义务，假如有人相信，现代人亦可能是疏离的、烦忧的与不可靠的，那么检验这个假设，应该是那些人的义务。但是，我们也可有另一种反应，一如我们在哈佛计划中所采用的，我们可以接受挑战，并就此外来的既定假设进行检验。据此原则，我们在访谈中，加入对失序现象、疏离、心理调适，及对亲族表示传统的义务等测量，但并没有加入我们对现代人定义中的那些特质。由此，我们的田野工作，不仅检验了我们自己的假设，也检验了别人的假设。

事实上，定义成现代的个人特质，在不同的研究者中，显出了相当程度的重叠。有关宿命观、同理心、效率、创新、弹性、成就取向、消息灵通及积极的公民角色，都有不同的看法。而研究个人现代性的学者，也常感到有测量心理压力，疏离及失序现象的必要。这种主题的反复出现，可能只是由于扩散及模仿，也许也暗示了后来的研究者缺乏想像力。另外，此现象亦可说是源自差别的取用。亦即只有紧随某个理论观点的人，才会接受这样的看法。但我宁可

把这种观察到的汇流现象看成是对于个人现代性心理社会的定义,已有了一种令人注目的理论化结果,并要求对其中的核心因素加以一再的探究。

(四)有关个人现代性的理念,基本上不正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吗?假如是的话,把它外销到低度发展国家,不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另一形式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某些规则上获得同意,“西方”一词意指着什么。我们所定义的现代人属性,如效率及对新经验的开放态度,都是相当一般性的人类特质,显然可在许多时空中出现。因此,我们切不可把它视同基督教或日耳曼语言般的西方概念。但是,通常说来,西方的文化传统,却较易孕育出我们所辨识的现代特质。就此主张来说,有人会辩称,在黑暗时代,个人现代性的特质,并不在欧洲盛行;实则,从9到12世纪,个人现代性的特质,在伊斯兰教统治的地区反而较为普遍。但是,我们所辨明的性质,在20世纪的欧洲广为盛行。尤其,在最近50—75年之间,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许多个人,也逐渐转变成为所谓的“心理上”的现代人。也许有些人会说这些个人变得“西化”,或者说是比较像西方人,但我宁愿认为他们已变得比较“现代”了。因为我发现现代性的特质,并不是任何一种文化传统下独有的产物;反之,这些特质却展现出一个普遍的模型,所表示的是人类潜能的一种形式,一种在特定社会情况下特定历史时间里,逐渐突出的形式。可是,如果有人硬要说我们的模式是西方的模型;那么,在此论题上多费唇舌,我看也得不到什么结论。个人现代性究竟是不是西方的产物,显然不比究竟它会产生什么后果来得重要。

假如新制度已广为发展中国家所采用,如工厂、学校、现代医院,及大众媒介,这些都被视为西方的;假如与这些制度相关连的社会角色及习惯、态度、价值及行为,也被定义为西方的;那么某种心理上的西化,对找寻制度现代化的国家来说,也是实际上的必要。新制度如果没有那些具有必要特质的人们来充任,以便有效地运作制

度;那么,制度将只是一些空架子而已。更坏的是,它将会变成国家资源的基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应可自由选择普遍被认为现代的制度;或按照原有的方式生活;或借取其他模型;或自己发明整个全新的制度。不管哪一种道路,都将会对人民的心理状态,有其独特的要求。但是,假如某民族选择了现代学校,大量生产,大众传播,科技模式,以及科学管理,那么,我们所说的现代特质,便非常需要,不管它是不是一种西方的输入品。帝国主义可输出可口可乐、牛仔裤、好莱坞电影及资本密集生产,但却无法输出现代性。个人现代性,可视为对先前殖民政策的反应,而且,既然植基于人民的心理,那么它必然是一种本土的产物,不管其根源是否来自外国。

**(五)定义是否使之成真?个人现代性的概念,其实征的地位如何?**

在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的传统中,常常会杜撰人的类型;新近最有名的例子,为 David Riesman 的分类:“内在”、“他人”及“自我”导向的人。虽然这些类型,不过是理论建构,但在社会学的习惯中(至少在过去),常把它们视为宛然存在,甚少有系统的努力,用来检验他们是否能在真实世界里被发现,以及确定他们在不同社会及社会阶层中的分配情况。反而有关现代人的假设建构,则较常在田野研究中,与其他相似的人的“类型”概念,受到同样广泛及有系统的检证<sup>①</sup>。

检证人的类型概念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每一个都可视之为量表建构的方法:其一为外在效标法(external criterion);另一为聚合性分析法(coherence)。

聚合性分析法研究概念模型中的个人特质,是否真的组成一个“类型”而不只是把独立及不相干的特征,聚集在一起。在测量聚合性时,并不需要就该类型出现的频率,存在于社会结构的何处,作任何立场的声明。一个类型的效度,最初必受限于理论或表面效

---

<sup>①</sup> 假如权威人格症状,可视为一个“类型”(正如我们所使用的意义),那么,它显然是被研究的最透彻的类型,有关研究的评述,见 Kirscht and Dillehay(1967)。

度。聚合程度的检验可运用到单一的、独特的性质,如个人效率感;或是一组特质,如检验“现代人”的多层面模型。

外在效标法,顾名思义,乃基于一个或多个外于研究特质的效标。在个人现代性的个案中,切题的效标,即与现代制度及现代社会联结的客观社会地位<sup>①</sup>。为求表明是否能以效率或接受新经验来定义现代性,我们必须证明,这些特质在受过更多正式教育,或在工人(而非农人)中,或在都市居民(而非农村居民)中,是否更常发现。通常是依循某种理论或共同的预期,来选择特殊的效标。效标法对建立定义效度而言,乃是十分有价值的,但却不能直接告诉我们“人的类型”是否存在。易言之,它无法告诉我们一组特质能否有相当程度的聚合,并形成可辨识的症状。

外在效标及连贯法,尽管是分开的,却不是互斥的。一旦某特征已证明存在,我们仍可探讨它与已知的效标之间的关系。同时,一旦某组特质已由效标法辨认出来,我们仍可加以检证,这些特质的聚合程度,以及其能否描绘出一个独特的“类型”。

当然,不管任何研究发现了什么有意义的特征,仍需依赖于一些因素。如果某人的理论,使他企图凑合原来的本质中未联结的事物,那么他根本不可能发现任何连贯。在甲群中聚合的事物,也不见得会在乙群中有同样的聚合<sup>②</sup>。同时,某标准认为是聚合的,在

---

① 观察的行为可当作另一效标。因此,在态度上较为现代的个人,应更常参与组织,或能接受创新的农业技术。使用这些行为指标,以检验现代价值量表效度的例子,可见 Inkeles and Smith(1974,第18章);及 Rogers(1969)。

② 这个事实,使得只基于一个样本的研究所作出来的全面性推论,变得十分危险,例如 Armer and Schnaiberg(1962)。他们怀疑不同现代性量表(包括 OM 量表)所得的区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因为他们发现,现代性与失序,具有更高的相关。实际上,在一个多向度的现代性量表中,认为“无失序”态度不属于现代性量表的一部分,是毫无理论基础的;既有的证据即反驳此点,各样本一再显示,失序与其他现代性向度,并无一致的关系。因此,Almond and Verba(1963)的五国研究,使我们相信,政治现代性和失序的关系,在意大利与墨西哥与在美国多有不同。这种缺乏一致性的现象,在 Inkeles(1969)六国研究中亦获得证明。Armer and Schnaiberg 仅从一个美国城市的一个不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中,取得有关资料,但是,即使他们所观察到的关系,在美国其他样本中也仍然成立。把失序与现代性的关系,只基于一个国家的资料,也将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在提出他们全面性的结论时,Armer and Schnaiberg 忽略了以往全国研究所得到的反面资料。

另一标准看来,也许只是分立因素的混合<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相当多研究,以相当独立的方式执行,并运用到各种母群中,结果都发现,一种基于因素分析及量表信度测验的聚合标准(standards of coherence),与个人现代性特征却相契合<sup>②</sup>。这种结果,不仅在最大与最复杂的研究中是成立的,且在许多小规模的操作里也成立。同时,运用到两性,广泛的国家、职业、教育水平、种族团体年龄,也都有满意的结果<sup>③</sup>。

另一可堪比拟的研究,亦值得注意。它不就多向度的征候的内在聚合性,加以检验,却对被视作较复杂整体的一部分的次主题,施予测试。如同理心、效率感、成就需求及宿命观,都是被施测的概念

---

① 有人会坚持,量表信度必须在0.8或以上;另有人则以0.6或以下为满足。因素负荷量(factor loadings)在某些人看来,0.3就已够适当了,但在他人看来却不足。对检验现代性量表聚合性的不同标准的广泛讨论,见 Inkeles and Smith(1974:第七章,特别是有关技术问题的附注)。另外,不同方法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的聚合性,也必须加以注意;Portes(1973)对现代性的因素结构,也颇为注意。此外,Armer and Schnaiberg(1972)强调区别效度,尽管他们以某种僵化且机械的方式处理该问题。

② 例如:Inkeles and Smith(1974)所使用的主要现人性量表(OM量表),在六国中所得平均信度为0.82;Schnaiberg(1970)使用46个题目的“平均现代主义”量表,测得土耳其妇女样本的信度为0.81。Portes(1973)研究危地马拉的低层阶级,发现他第一个主成分因素(态度、价值和知识),能解释总变异量的19%。这些发现,在其他研究中亦同,但确有某些研究者提出较差的结果。如 Klineberg(1973)的第一个因素,只能解释总变异量(父母现代性)的11%,其结论为“在这些效标中,30个题目的单一向度,已经混合在一起,假如不是负面的话”;但 Klineberg 并未提出 Spearman-Brown 或 Kuder-Richardson 的信度估计,以供比较。

③ 有些关于现代性最精确的研究,只限于男人,如 Kahl(1968)墨西哥及巴西样本,以及 Inkeles and Smith(1974)的六国研究。因此,相同的方法及测量,能否适用于女人,便引起相当的兴趣。供研究女人的现代性最差,或可供两性测量的量表,见 Cunningham(1972),Holsinger(1973),Kahl(1968),Klineberg(1973),Portes(1973),Schnaiberg(1970)及 Stephenson(1968)等等。以相同量表的施测结果,分别对男女加以分析的作品甚少,Suzman(1973)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一般说来,男女现代性定义中的基素,以及量表的内在结构都很近似;而男人得分比女人高,大抵可由所受平均教育及职业经验加以解释。因此,Cunningham(1972)研究波多黎各中学时发现,同级的年轻男子及女子,所得 OM 量表的分数,并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Armer and Youtz, 1971; Galtung, 1971b; Inkeles and Miller, 1971; Kahl, 1968; Klineberg, 1973; Rogers, 1969; Sack, 1973; Suzman, 1973; Williamson, 1970)。坚持这些较小的测量,作为分析单位,具有相当清晰的理论及实证上的理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讨论聚合性时,由这些较小量表所得到的信度水准,通常不比多向度测量来得高;此意味着,强调多向度的征候,并未使我们降低量表的聚合性。

同时,效标法亦具有多面性,例如:效标是否应为已知的地位特征的团体,则并未获得一般性的同意。而且,那些坚持唯有证明量表(或一个问题)能够区分“已知团体”,才能建立效度的人,就必须决定那一团体才是最适当的效标,量表是否具有区别力与辨识力也才能得到肯定。

尽管有这些限制,仍有不少有关个人现代性量表的效标效度产生。例如:在研究哥伦比亚中的五个乡村(包括现代及传统)Rogers (1969)会发现,同理心与农业创新的相关,达0.25; Armer and Youtz (1971)则发现(研究 Kano 的年轻人),未受过教育者,只有37%在现代性量表上得高分,而受过小学以上教育者,则有84%。同样地,在六个开发中国家中,我们也发现,最少接触现代制度者,只有2%表现出现代性;而在前10%接触现代经验者中,有90%表现出现代态度及价值(Inkeles and Smith, 1974: 121—124; Smith and Inkeles, 1975)。并且,可堪比拟的结果,亦可在其他研究中获得,不管大或小,不同学者自己的研究结果,却都显示彼此有相近的结论。

于是,就个人现代性是否存在来说,我们有大量的证据,且都以聚合性分析法及效标法验证过了。在“迈向现代”(Becoming Modern)一书中,我们即如此描述这个特征群:

“现代人的性格,如在我们研究中所示,可总结为四个主要标题。他是一个消息灵通、参与的公民;他拥有相当明显的个人效率感;就他与传统影响力之间的关系来说,他是非常独立且自主的(特别是当他对如何引导私人

事务,作出基本决定时);同时,他对新经验及新理念都易于接受,易言之,他心胸是相当开放的,且在认知上有极大的弹性。

尽管这些是主要的成分,但绝非穷尽了现代性症状的所有特质。现代人在处理时间,私人与社会计划,依赖或隶属于他的人们权利,以及经营事物所使用的形式规则时,与他人也有所不同。换句话说,心理的现代性,以一种相当复杂、多面及多向度的征候出现。”(Inkeles and Smith, 1974: 290-291)

从另一个相关但不同的观点出发, Rogers(1969)总结出现代性的反面(其特定的指涉项,乃农民的次文化);包括(1)人际关系中的相互不信任;(2)可觉察到的有限(perceived limited goods);(3)对政府权威抱有敌意;(4)家族主义;(5)缺乏创新;(6)宿命观;(7)有限的渴求与抱负;(8)缺乏延宕的满足;(9)狭隘的世界观;(10)较低的同理心。

我们假定,在某些母群中,不能发现现代性;而且它在不同母群中也有不同的组合。研究个人现代性的物质(由聚合法及效标法检验),值得注意的是了解原有的定义,与在不同背景的人们身上所观察到的,它们之间可证实的程度如何。巴西的三年级孩童,波多黎各的高中生,奈及利亚的农民,孟加拉的街头小贩,以及智利的工人,都显示出这种特征(Holsinger, 1973; Cunningham, 1972; Inkeles and Smith, 1974)。我们也可用它来区别墨西哥受过不同教育人们的差异,也可比较在哥伦比亚收听新闻广播次数不同的那些人(见 Kahl, 1968; Rogers, 1969)。同时,它也可区分青年与老年,美国的白人与黑人社区,男人与女人,以及智利、阿根廷、印度、孟加拉、奈及利亚和以色列不同宗教及种族团体的差异(Klineberg, 1973; Suzman, 1973; Inkeles, 1976b)。

虽然个人现代性概念有相当普遍的用处,但是,我们仍无法断

言,它在实际运用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许,在古巴等国家,相同的特质并不会与相同的效标,以相同的方式聚合或联结;在这些国家中,不会在其他地方观察到的特质,可能将成为特征群的一部分,如自我疏离,集体主义,或将个人抉择隶属于团体目标之下,都可能是其中的中心特质,尽管这并不是迄今所测得的结果。但是,在古巴等国家中,诸如效率感,对新经验采开放态度,以及献身计划,很可能如同大多数已研究的结果,是与独特的外在效标相互联结的(Inkeles, 1976a)。

#### (六)什么使人具现代性?

至少有五种主要的理论观点,对此提出了答案。

##### 1. 现代性:视为一种天性的倾向

似乎没有人明显地主张此种观点;但是,在对来自相同背景,甚至接触相同现代制度的经验,却有不同程度现代性的人们提出解释时,这种观点却会一再地出现。

若从个人现代性特定的社会内容来看,显然地,在一种严格的意义下,没有人天生是现代的;唯有借着“迈向”现代,经由成熟或社会化,或二者,才能变成现代。然而,假如智力、支配及专断、积极性、好奇或弹性等性质是天生气质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势必也能影响个人的现代性(Buss and Plomin, 1975)。

对早期人格以及稍后“个人现代性”有系统的测量,我还不曾见过。尽管既有的个人发展的研究,可供参考,追溯回到个人早期的特质,则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研究课题。但是这个研究将会面对方法论上的不少难题<sup>①</sup>。

##### 2. 现代性:视为早期家庭气氛的产物

强调这种解释的学者,视学习为现代性的原因,但假定学习主

---

<sup>①</sup> 对此观点的有力铺陈,见 Hagen(1975)。Hagen 的陈述,乃对“迈向现代”一书的挑战,笔者发现,OM 现代性分数中,大约有一半的变异量,可为青少年后的社会化经验所解释。见 Inkeles(1975a)对 Hagen 的回答。

要发生在人生的早期,由于特有的家庭构形所造成;由此所形成的特质,或多或少,在人生中保持固定。

假定家庭环境的差异,乃是造成个人现代性差异的原因,事实上是在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从对家庭环境的了解中,去预测现代性并不比预测其他人格结果来得容易。据我个人阅读这些证据的结果,家庭的主要作用,实为赋予后代社会地位的特征,而非传递出一组预先决定的人格特征。但是,确实有某些证据指出,代与代间人格的传递,在统计上并非不显著。而且,我们也认识到,植基于“决定个人现代性的主要因素,乃早期经验中父母及家人所提供的特殊性格”的假设的研究,亦有其相当的重要性。

Everett Hagen(1962)即强调家庭环境在形成创新型人格时所具有的影响力,尽管他的资料基本上是轶闻,且其结论并不是立足于当代个人的直接研究。McClelland(1961)及其同仁的作品,亦对高成就需求的家庭影响,提出较有系统的证据。Cunningham(1972)在波多黎各,Holsinger(1973)在巴西,Klineberg(1973)在突尼西亚,Pandey(1971)在印度,也都发现双亲的现代性分数,与子女间具有显著相关。其中,Pandey(1971)更就父母对成就、权威及人类关切的社会化,所持不同观点具有的影响,加以叙述。这都意味着,从家庭到子女,有着某种显著的现代性的直接传递作用<sup>①</sup>。但是,很不幸,证据之间并不很一致<sup>②</sup>。而且,在哈佛的六国研究中,有关家庭—学校背景的测量,与个人现代性间只呈弱相关(特别是在其他因

---

① 当然,我们必须虑及另一种解释;亦即子女的现代性,形成了父母的现代性。这种模型,尤其当子女所受教育较父母多,且将此教育所隐含的现代化影响携入家庭时。但是,Holsinger(1973)发现,母亲的现代性分数,在儿童三年级时已有差异;而 Klineberg(1973)则在其男性学童中发现,父母与青少年间的现代性,约有0.42的相关。

② 学业上位居前四分之一的波多黎各中学生,母女现代性间的相关为0.35,且十分显著;但在后四分之一中,相关为负值,且不显著(Cunningham, 1972)。在突尼西亚,男性离校者与双亲现代性的相关,达0.42;反之,继续就学者只有0.06。由回归分析把其他变项纳入控制,也不能消除这项差异。见 Klineberg(1973)。另外,Pandey(1971)的路径分析发现,父母现代性对子女社会化或子女发展的主观影响,并无重要的“直接”效果。

素控制时)(Inkeles and Smith, 1974, ch14, Hagen 1975; Inkeles, 1975a)。总之,家庭环境也许有其重要性,但并不像许多人所假定的那么重要。

### 3. 现代性:视为一种共有的团体文化的表现

我们每个人,都至少携带了一种文化,而来自复杂社会者,也许包容一个或多个独特文化传统的基素。文化乃由其所教诲的价值,其所鼓励的行为,以及其所传递的技术所组成;因此,某些文化也许比较强调现代的特质,来自这些文化的个人,也就比较现代。

Weber 对新教伦理的分析,可说是这种分析模式的原型。Hagen(1962)对哥伦比亚 Antioquenos 及其他团体的叙述,亦可说是该主题的一个变异。McClelland(1967)的研究,对许多社会提供了较具系统的证据,他对文化的叙述,乃植基于儿童读物;但是,他并未就其所评估的不同儿童读物中的个人差异,作进一步的测验;Levine(1966)对 Yoruba 及 Ibo 的比较,便克服了这个难题(尽管结果不是引人注目)。在哈佛的六国研究中,我们也发现,来自某些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及以色列)的人,比来自其他国家(特别是孟加拉)的人更具现代性。可是,由于样本在教育及收入上,有相当大的差异,个人的差异可能是因为“财富”因素,而不是文化所导致。然而,即使我们比较不同国家(选出具有相似的教育及职业特征的国家)的团体,其间的差异仍旧存在;举例言之,来自孟加拉的人民中,只有8%是现代人,而相近水准的阿根廷人,却有30%具有现代性(Inkeles, 1974; Inkeles, 1976b)。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可供跨国研究的现代性量表,这种分析模式,自然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我们可暂时作个结论;某些国家,确实比他国更加现代。而且,因为这种差异在配合教育及职业因素后,仍会继续存在。因此,我们更可如此说,这些差异乃源自特定人民所共有的文化体系。

### 4. 扩散—模仿—依赖理论

假如定义为现代的制度,以及与此联结的情绪及行为,都是西

方独有的文化产物。那么,现代化可视为文化扩散的一种过程中的特例。当然,工业生产、科学管理及大众传播的体系,乃源自西方而往外扩散;同时,我们通常称为“现代”的许多制度,也有类似的根源。

把整个工厂或一所大学加以移植,是相当容易的事;但是,与源自西方的制度相联结的人际关系(包括态度、价值、技术及模型),究竟怎么移植呢?固然,行为可以模仿,态度也可以模拟;然而,大多数的技术必须要达到近乎真实的地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根本而且内蕴的个人气质及心理倾向,其本质似不应来自模仿,而是经过长期学习的缓慢发展中,所产生出来的。

经由扩散,西方以外的国家所取得的现代态度、价值及行为,究竟已经达到怎样的程度,是相当难以精确测知的。可是,如果开发中国家中某个社会阶级与此新文化的国际传送者有直接接触;那么,模仿便能轻易获致。正因为其他阶级没有这种直接接触的机会,因此,大众媒体(特别是电影及电视)在扩散某些西方模型的表面形式时,便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也正依赖理论基本的推理,由此而强调先进(殖民)体系的力量,驱逐本土的文化模式,进而全盘以外国模型取代之。但是,为了解释我们所观察的工厂工人(位于省区,并无外国人在场作模型)所表现的个人特质的深邃变化,我们似乎必须采用另一个理论观点,那就是,“社会学习”的概念。

### 5. 社会学习理论

Marx 声称:“人与生产模式间的关系,形成了人的意识。”由此,个人之所以成为现代,乃因为纳入了其所生活与工作的制度中的组织运作原则所致。

这种一般性的观点,正如我在“工业人”(Inkeles, 1960)一文中所言,影响了 Joseph Kahl(1968)在“现代主义的测量”(The Measurement of Modernism)一书中所采用的研究设计,且在哈佛的六国研究中,予以更明晰的测试(Inkeles and Smith, 1974)。正如该理论所

预测,在工厂工作,在现代科层组织及农业合作社中工作,都使个人效率感,对新经验的开放性,以及对科学与科技的支持程度增加。类似的改变,也在学校经验里显现出来。但是,学校与其他类似的科层体系,并不依恃工厂机械的使用。因此,学校与工厂能够生产相同的结果,应该是因为二者都使个人暴露在某些共同的组织原则,权力及声望的分配过程,酬赏分配及惩罚的模式,以及处理时间的方式所致。由此,个人现代性,乃变成把某些制度环境的特质,纳入自我体系的一种特征。

我相信,以上五种方法,将能解释大多数个人现代性中的变异。而且,我也相信,在五种方法中,社会学习理论最能代表我的立场,该立场已在“迈向现代”一书中,加以阐明。但是,足以确切检验这个假设的研究,尚未做出。同时,究竟是学校与工厂的哪些特质,传授出现代性?这些特质如何达到结果?这些问题,也都尚待分析。

**(七)现代对个人心理调适来说,将会有有什么后果?欲求现代化,是否必然产生心理上的压力**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心须就“调适”一词的定义,以及如何测量的问题,取得相当的了解。而且,有关任何结果的诠释,不仅应考虑受试者当前的感觉,且需虑及在他们接触现代制度前,调适的情况如何。

许多人类学的田野报告,大多指出一旦欧洲带给一些小的孤立文化冲击之后(指那些尚未享用先进科技的文化),将会产生一些不利个人的后果。尽管仍有重要的例外。如 Margaret Mead 所描述的 Manus。但是,这种接触,大多造成了文化崩溃(deculturation)、个人解体、酗酒或其他形式的耽溺、倦怠、沮丧、焦虑、高度攻击性,以及压力等(Stewart, 1952)。

相形之下,本身有高度文化的“非现代社会”的个人,特别当他们属于一个多少自主的民族国家时,接触现代制度后所产生的结果,便相当不同。在六国研究中,我们发现,一般说来,较常在工厂

工作的、居住都市或接触较多大众媒体者,彼此心理调适的差异并不一致(Inkeles and Smith, 1970)。在传统乡村中过农业生活,并不像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所想像的那样令人不满;同时,相对来说,都市化的、受雇于工厂的人,心理状况也不比住在农场的人差。

我们相信,有关现代化对个人调适产生的冲击,我们的成果跟其他有系统的研究比较起来,是相当一致的。但是,这个现象实在太复杂了,还没有任何确定的结论,可以赢得普遍的支持(至少就当前来说)(Muphy, 1961; Inkeles and Smith, 1970)。

**(八)迈向现代,对个人的政治有何影响?疏离必会伴随现代化产生吗?个人现代化会必然与政治的激进主义相对立吗?**

新左派把现代化的概念,视为 Marx 有关资本主义发展定律的对手,或把它视为群众的新鸦片,驱散群众,使他们不从事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中,要想客观讨论“迈向现代”对个人政治角色的意涵,显然十分困难。可是,这个问题又是如此的根本,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必须有一个立场。

当个体在个人现代性的量表中得分愈高时(由客观的地位特征或心理属性加以判断),他经常也是比较消息灵通,主动及参与的公民。个人现代性愈高,投票、参加公共组织及参与公共行动、与政治及公共人物互动、对政治新闻有兴趣及对政治事件保持熟稔等,也都有显着的增加<sup>①</sup>。

而就政治派别上的左或右来说,迈向现代的并生物(至少在大多数开发中国家),似以激进为多;正如许多研究所显示,较现代的个人,也就比较渴望变迁,对新经验采取开放态度,较不相信宿命观,并对权威及既有的传统较少有敬畏之心。

在哈佛的六国现代性研究中,只有阿根廷及智利的当地顾问,

---

<sup>①</sup> 尽管 Almond and Verba(1963)并不想检验个人现代性的理论,他们仍就政治参与及教育增加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证据。由此,相同的反应模型,可在发展中国家发现,且构成参与公民的特征(Inkeles, 1969)。

同意我们测验有并激进主义及保守主义的分数。在这两国中,较现代者都比较“激进”,因为他们支持快速和根本的转变现有的制度(Inkeles, 1969);此点在其他文献中甚少提及,但大抵与我们的结果相契合(Nelson, 1969; Cornelius, 1975)。

正因政治与经济变迁往往很慢,而政治体系常是无法或不愿即时反应;因此,具有变迁取向的现代人,其疏离程度也应较大。但是,这种推论,必须视其政治与社会脉络而定;易言之,在政府有较多反应的社会中(或正从事快速社会变迁的政府)。较现代的个人,反将感到较少的疏离。

可惜的是,在这点上并没有很多的证据支持。有关美国的两个研究,一在芝加哥城内(Armer and Schnaiberg, 1972),另一在波士顿郊区(Suzman, 1973),发现现代性,与缺少疏离感及社会整合经验相关。在我们的六国研究中,孟加拉与智利亦有相同的情形。但在奈及利亚,更现代的个人则感到较多疏离及失序。其他国家,更表现出其他的模式,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下面的结论:

“参与的公民,并不一定就是整合得很好,不敌视,而且满意于政府相反的,我们必须说,它视其国家情况而定——而无疑的,也视我们的研究对象而定。”(Inkeles, 1969)

显然,在下任何稳固的结论之前,我们还必须做更多的研究。但是,参与的公民,似将拥有较多个人现代性,应是一致的结论。另外,疏离与失序表现的不一致(有时与现代性相结合,有时则否),则必须视其国家与社会不同脉络而定(Cornelius, 1975; Verba et al., 1971)。

**(九)个人迈向现代化后,对亲族的影响如何?个人现代性,是否必导致传统人际义务的消失?**

一种广为人知的印象是,现代性(不管它可带给个人多少好

处),将会牺牲了当地社区的原貌,因为它将使人们丧失传统义务,特别是对亲族的义务。这种假定,更由于理论与实证研究建立“现代性”及“传统”的两个对极,而益加强化。由此,便使人以为,支持大多数的现代模式,必然会拒绝所有传统的模式<sup>①</sup>。

这种直接的冲突,在某些领域可能是无可避免的,例如:支持松懈及非正式的时间安排,势将无法遵守学校或工厂的固定时刻。而且,假如“尊敬长辈”便意味着要完全接受他们对自己职业或配偶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可能不会顺从这种行为规范。但是,现代制度是会孕育出某些心理的特质的,但它并不能完全决定生活领域的所有层面。现代人能符合工业科层体系(生产与行政)的最低要求,但在其他行为的表现上有相当大的变异和弹性,并不一定会与我们所定义的现代性标准发生抵触。易言之,个人现代性,事实上可以与许多取向及行为相容共存,而这些取向及行为,在某些分析家眼中,乃是传统主义的一部分<sup>②</sup>。

宗教的领域,即可提供一个重要的说明。就定义上来说,无数有关现代化的概念,常以为现代精神与宗教是相对立的迈向现代,也就意味着放弃个人的宗教传统。但是,即使是片刻的思索,我们亦可找到与此理论互相矛盾的证据。以美国而言,几乎以任何测量都是最现代的国家之一,但仍然拥有相当高的教堂成员,定期礼拜的次数也很高。

---

① 但 Dawson(1968, Dawson et al., 1971)并不把现代性及传统主义视为对立的倾向,他就个人对传统及现代同时接受的情况,均给予特定的分数。另外, Pandey(1971)也从因素旋转(factor rotation)及正准相关(canonical correlation)的使用中,发展出某些复杂的类型。

② 这一点,乃 Eisenstadt(1973)及 Gusfield(1967)现代化一般理论的重要基业; Rudolph 对印度现代化的分析也饶富此意。不幸的是,该论证的力量,必先创立一个稻草人。普通情况下,大多数现代性量表,都给个人一个总分;但是,由于大多数都得到中间分数,且几乎没有人得满分,所以,被分类在“现代”的个人,仍应具有许多理论上视为“传统”的态度。因此,当批评者就名义上的“现代”人捏中坪卡(以为仍有“传统”行为)只不过是每个现代性量表所表现出来的情况重复一次而已。

至于对亲族的义务,在我们的六国研究中发现,迈向现代也并不一定会拒绝或缺乏传统的义务。实则,离开乡村接受工业就业的人,往往更愿意对一名亟需帮助的亲戚,提供财务上的支援。同时,他们也对老人表示尊敬。只因为“年长值得尊敬”这个简单的理由。而且,他们对于传统宗教所必要的基本行为,也都不曾排斥(Inkelds and Smith, 1974, ch7; Bengston et al., 1975)。

为了估计这个看来和平共存现象(现代与传统),是否只是早期现代化的特征,更进一步的研究将是必要的。我的意见是,在后期里,应可发现同样的特征。但要描述出那种共存形式是可能的,就必须有更多的研究,在更广泛的范围加以探讨。

**(十)个人现代性,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这种个人的变迁,真会引起社会的变迁吗?它又能改善其他人的命运吗?**

于此,我们已经绕了一个圆,回到原来的问题,但在此采用一种不同的观点。由于我们所研究的,是个人变迁如何在一个现代化中的社会,或是经由接触现代制度而发生,因此,常有人指控我们认为“个人变迁必先于社会变迁”,或“个人变迁比体系变迁来得重要”。对个人现代性作品的误解,没有比这更广泛的,也没有比此误解更甚。

正像制度对个人的冲击,应视为一个问题;个人对社会体系的冲击,也应视为研究的题材。下面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问题作为澄清争议的背景,但绝不是预断。

(1) 激进的或革命性的基本结构转变,由于涉及整个社会体系,甚少会受国民性格的心理特质,或众趋人格的决定。例如俄国及其他如古巴的政治革命所显示的,社会结构变迁并不是植基于新人格模型的扩散,而是由于权力的突然崩解。可是,即使是较为渐进的变迁,如英、法、德三国的工业化,制度上的改变也并不须依赖先前的个人转变。

(2)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平等的机会下,具有某种独特民族性的人民,将显现出愿意采纳新制度的倾向;且在实地运作这些

制度时,也会有较大的成功率。日本即是一个显明的例子。斯大林统治意图创造“新苏维埃人”,也可指出,当他动员大规模的社会变迁时,他所必须面对的人的特质,却不适合他的目的(Bauer, 1952; Inkeles, Haufmann and Beier, 1958; Inkeles, 1976a)。

只有在当前,我们拥有测量个人现代性平均水平的技术,我们才能就人民心理特征对社会现代化的相对贡献,作一个较客观的估计。测量这些特质,可经加权,连同其他的因素,以评估早期的国家特质如何能预测后来国家的情况。这种方法,正是 McClelland 在“成就的社会”一书中所采用的,但他测量个人特质的方法,不够直接。故结论的信度与效度也都令人怀疑(Inkeles, 1971)。

(3) 某些宗教、种族或其他文化次团体,似乎较能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独特的角色,这些文化特质也使其成员在这些角色的执行上(尤其是企业家)更为出色。

Weber 对新教伦理漂亮的分析、McClelland 对家庭模式产生高度成就需求的研究,以及 Hagen 对创新人格的个案研究,都以此假设为出发点。但他们都只是个案研究,而未建立其一般的效度。即使采自较大样本(企业家)也似乎并未对“该种角色来自独特的家庭气氛”,提供更多证据。

(4) 个人现代性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乃是使个人在其社会中,及其较直接的社会网络中,扮演一个新转型的社会角色。

获致现代性的个人(特别是那种性格尚未形成主要规范的低度发展国家中),一旦与比较不现代的人相比,他们更会采纳了另一种社会角色。他们对自愿性组织比较活跃,且较常参与政治;他们实行生育控制(因此子女较少);他们较易采用农业的新技术,且在工厂中有较高生产力;他们子女的入学年限也长,且鼓励子女接受较技术性的职业;而且,一般来说,他们较积极鼓吹社会变迁。这些行为的特征,可以继续延长下去。尽管这些差异并不一定在所有的团体和所有环境中都出现,但是,他们确曾在许多团体和地方,被详细地记录下来(Inkeles and Smith, 1974, ch18; Rogers, 1969)。

这种行为,可说只是一种较有效的因应手段,对个人及家属有利;但对社会而言,却没有特殊的利益。但当它在许多个人中一直累积,这些现代行为,将可变成一个集体的输入,乃变成任何国家发展计划所必需的条件。即使在转变生产手段拥有权的革命中,也是如此。

在我们的六国研究中,我们问了如下的问题:“对你的国家的未来,什么比较重要?”

有四种选择:

- (1) 人民的努力工作。
- (2) 政府的完善计划。
- (3) 神的帮助。
- (4) 幸运。

较传统的人们,选了后两者;较现代的则选了前两者。在前两者中,较现代的人们最常选择的,不是政府计划,而是“人民的努力工作”。这种选择,是否只是个人自我利益的显现?或是表达了某些基本的集体智慧?

(郭正亮 译)

A. 巴洛齐齐

## 发展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 一、引言

在众多的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理论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这两种观点有时互相补充,但也常常彼此对立。第一种观点从基本的社会结构条件入手考察落后状况与变迁过程的问题。在分析落后状况的原因、特点以及变迁的必要条件时,这种观点着重研究历史、经济、社会因素的作用。相比之下,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人数较少。第二种观点更强调文化价值、信仰、心理倾向这些因素的作用。这种观点认为,文化价值、信仰、心理取向不仅是社会变迁的前提条件,而且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这些因素对变迁过程本身也发挥影响。所以,要理解发展过程,就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尽管部分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文化和心理属性是发展的基本决定因素,但是大多数学者则只是认为全面的发展研究应该考虑到这些主观因素。

在60年代中期,现代化理论正处于兴盛阶段。在一个短时期里,这两种观点看起来似乎相当的协调一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支持。当时,人们认为: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社会流动、大众

---

\* 选自 M. 威勒和 S. 亨廷顿主编的《理解政治发展》一书。

传播等过程呈现代化过程在社会层面上的标志;在个人层面上,移情作用、重视个人效用(efficacy)思想活跃,理性规划,更强烈的社会政治参与倾向这些特点也伴随着那些社会层面上的过程而出现。不仅如此,就像西方国家一个半世纪之前所经历的现代化过程一样,发展中社会的社会结构与心理层次上的变化会使它们沿着类似于西方国家的道路逐渐嬗变。最终,社会结构与心理层面上的变化结合在一起,就是“现代化”的最终状态。当代西方社会的制度安排,社会特征,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就是这种状态的典型形式。

由于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不断增多,两种观点表面上的协调一致也开始出现裂痕。批评主要是针对现代化理论的一些重要前提。例如:现代化理论简单化地把发展过程中的“传统”与“现代”当作对立的两个极端来看待;有些概念起源于相对独特的欧洲历史过程,而现代化理论却用这些概念解释当代非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变迁过程是渐进而且同方向的<sup>①</sup>;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源于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批评。这些批评指责现代化理论忽略了发展过程的广阔国际背景,而着重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这些批评还认为,第三世界现在的落后状态是世界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资本主义政治中心与其落后边缘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是不平等的,掠夺性的,资本主义造成了第三世界的落后状况。所以,不能把发达、落后看成两种彼此无关的状态,而应

---

<sup>①</sup> 对现代化理论进行批评的一些文献有:A. G. 弗兰克《发展社会学与社会学的不发展》。在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不发展或革命》一书中;萨缪尔·P. 亨廷顿《变迁的变迁: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比较政治学》1971年第3期,283页—322页。

D. C. 蒂普斯《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社会研究:一个批评性的视角》,见于《社会历史比较研究》1973年第15期 199页—226页。

A. 波特斯《国家发展的社会学:理论与文献》见于《美国社会学杂志》1976年第十期,55页—85页。

对于战后的政治发展研究和它的理论前提,最近也有一些很有见地,范围很广的批评。如I. L. 金德伊尔的《管理政治变迁:社会科学家与第三世界》西方视点出版社1985年,包德尔。

把它们看作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相关而且不可分割的部分。<sup>①</sup>

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社会结构方面的,但是有些学者对现代化理论中很少运用的文化、心理概念也大加挖苦。下面这段话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理论家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这段话都可以作为此类抨击的一个典型例子:

无疑,非洲人从来没有发明出轮子;无疑,亚洲宗教是宿命论的;无疑,伊斯兰教宣扬恭顺服从;无疑,拉丁美洲人种混杂而且缺少企业家的节俭精神。但现在可以确定的断言,这些缺陷并不是生物性因素造成的,仅仅是文化不同而已。如果落后民族足够聪明,能够像日本人那样产生一种加尔文教派的本土形式;如果能够诱导他们改变儿童的阅读材料内容(当然要在儿童第一次阅读时,就改变其内容);如果在偏远的村庄也能够用上收录机;如果有远见的精英能够在外界的帮助下动员起愚昧的民众;如果……。那么,落后社会也能进入现代化,就像以色列人越过约旦河,来到流着奶和蜜的巴勒斯坦一样。这就

---

① 有关“世界体系”分析方法的文献见 I. 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与十六世纪欧洲的世界经济的起源》,(纽约,学术出版社,1974年)以及其续集《现代世界体系第二集:1600年—1750年的商业化与欧洲世界经济的巩固》(纽约,学术出版社,1980年)。

有关“依附”理论,见 F.H. 卡多索和 E. 法里多的《拉丁洲的依附与发展》,此书由 M.M. 尤贵迪翻译成英文(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9)。

S. 阿明《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发展》(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7年)。

有两篇文章对这两个理论进行了简短,然而很有用的综述,见 T.D. 霍尔的《世界体系理论》,刊载于《社会学评论年刊》第8卷,由 R.H 特纳, J.F 肖特编辑(巴尔阿多,加州,年度评论出版社,1982),81页—106页。

最近,有人试图调和“发展主义者”(现代化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之间的矛盾,见 A. 波特斯《国家发展理论中互相冲突的理论视角之间的差异》,此文在 H.M. 却莱洛克编辑的《社会学理论与研究:一个批评性的评价》一书中(纽约,自由出版社,1980年)。

T. Smith 的《第三世界研究的安魂曲还是新日程?》,见《世界政治》1985年第4期 532页—561页。

是现代化理论家们所描绘的美好前景。

这个希望无疑是一个神话,一个当今时代颇有价值的神话。但事实很清楚地表明:世界主宰们是如何操纵这个神话的。我们承认:这个神话激发了一些专注的,善意的学术活动,也促进了一些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但是现在应该是把这些幼稚的东西放在一边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直面现实<sup>①</sup>。

这些批评对于后来该领域的论文与研究有着重要而且持久的影响。一方面,学者们加强了对发展过程的国际背景、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的研究;另一方面,学者们明显地不太愿意研究与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了。有一些人担心研究文化价值与心理倾向的作用会给经济政治条件的研究带来混乱,由于这些人认为经济、政治条件更确实、更重要,所以他们尤其欢迎研究重点的这种转变。

但是,最近的一些现象、趋势似乎强调了文化与社会心理因素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例如:非西方世界中,各地的宗教复兴运动的兴起;在伊朗,一个重要的“现代化”政体的崩溃以及传统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传统主义革命的好战意识强烈地吸引着伊斯兰世界里的广大民众;是对于种族情感与其它原始情态的执着充当了集体认同与政治运动的基础,而不是经济利益;在另外一个不同的环境中,东亚诸国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成就,而这些国家的经济成就与它们的文化价值之间至少存在着某种联系。上面的几个现象和趋势都表明了文化与社会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当然,针对上述的各种现象,可以提出这种或那种基于社会结构的理论来解释。但是,只要这些理论没有把经济政治变迁的主观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它们的解释力就

---

<sup>①</sup> I.华勒斯坦《现代化》见于L.A.科瑟与O.N.拉森编著的《社会学中争论的用处》一书(纽约,自由出版社,1976年,131—132页)。

总是不充分的,有限的。

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是战后有关非西方社会发展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本文将批判性回顾这一时期该领域内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与基本假设。另外,由于在研究政治变迁与发展时,“传统”与“现代”一直是心理文化方面争论的焦点,所以这两个概念也将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重点所在。

## 二、有关心理学取向的 发展研究的几个例子及其学术背景

在非西方社会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中,学者们只是到最近才开始研究心理学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社会科学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战后三大学术潮流的融合推动了有关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三大学术潮流中的第一个是从30年代开始,并持续了20年的“文化——个性”学派。这个学派受到了心理分析理论的很大影响,它用一种独到而且影响深远的研究方法研究个人与其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研究非西方的前工业化社会时人类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大多用这个学派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就是试用寻找社会成员的个性特征与社会形态、社会变迁之间的联系。这个学派的一个中心命题是:一个社会的社会成员有着一些相同的童年期经历,于是就在社会成员里产生了一种基本的、模式化的个性特征结构。而这种个性结构反过来塑造了这个社会的文化制度(宗教、民间风格、典礼仪式等等),并且通过各自不同的功能把这些文化制度整合成一个整体<sup>①</sup>。

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和战争结束后,由于战争与管理战败国等实际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民族性格”研究。在这些研究

---

<sup>①</sup> R. A. 列文对这一传统做了一些探索性的评论,这些评论是支持这一传统的。见《文化、行为、与个性》第二辑,1—3章(纽约,霍松·阿尔丁出版社,1982年)。

中,学者们用“文化——个性”学派的概念方法分析复杂的现代国家。这些研究的目的是:在不同的民族、社会中,辨别并分析其社会成员主要的心理属性、信仰体系、行为动机的特点,并尽可能地用社会成员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童年期经历解释这些特点。这些研究在群众中很受欢迎。但是它们在学术界却反映不佳。这些研究有时确实很有洞察力,但是它们的研究风格常常像记者一样的肤浅、不深入。而且,这个学派自信能够帮助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交流。所以经常过分地夸大了这些研究对于解决国际冲突的价值。总之,这一系列“民族性格”研究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缺点较优点为多<sup>①</sup>。

50年代后期,整个“文化——个性”学派,包括该学派的“民族性格”研究分支,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作为一种学术活动,这个学派迅速地衰落了,但是,这个学派的主要观点、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非西方社会研究。例如:这个学派认为可以用一种或几种个性特征来概括整个社会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特点,并且可以通过分析这些个性特征来研究这个社会的社会文化制度与政治制度在这个观点影响下,很多后来的非西方社会的研究都试图把个人行为与社会政治背景联系起来考虑。

推动国家发展与政治变迁的心理学方向的研究的第二个学术潮流是战后美国主流心理学的发展。在20世纪初,心理学这个学科正处于形成时期,当时的学者特别关注集体现象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但是,由于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行为动力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学者们渐渐地也就不怎么关心集体现象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了。当时,社会心理学家不仅用个人层面上的理论与机制解释个人行为,甚至在解释集体行为和超越个人的社会过程时也用个人层面上的理论与机制进行解释。可见当时的社会心理学者是多么

---

<sup>①</sup> A. 英克尔斯和 D. J. 列文森的《民族性格:个性类型与社会文化体系的研究》。见 G. 林德齐和 E. 阿容松编写的《社会心理学手册》第二辑,第4卷(马萨诸塞州,雷丁阿迪森-韦斯利出版社,1968),59页。

重视个人层面上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行为研究。另外,由于方法论上的原因,“态度(attitude)这个概念在心理学领域获得了广泛的欢迎。它是“5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中最引人注目,最必不可少的一个概念”。50年代时,在种族关系,住宅区位、投票、国际冲突、和平主义各个领域内,典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都是重点研究个人态度,以及个人态度如何受人际关系、具体环境、制度因素的影响,只有一些实验性质的研究除外。50年代时,“态度”这个概念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其原因在于一个至今仍有相当争议的假设。这个假设认为: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态度”都是理解社会行动的最有效、最可靠的线索。用社会心理学方法研究比较政治与比较发展的早期文献中充斥着大量的公众舆论、态度、价值观的调查,当时的学者们通过这些调查理解政治活动。知道了当时人们对“态度”这一概念的重视程度,文献中的那些调查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推动发展的主观取向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的第三个,也是最强有力的因素,是战后早期决策者与发展研究专家的实用主义倾向。当时的一些发展理论家意识到了制度分析方法的局限,从而转向文化人类学与心理学,试图以此深入地研究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人”的问题。然而,就像研究社会问题时在受害者的身上寻找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一样,没过多久,研究人员就发现:落后状况的很多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本身的价值观、世界观、性格特征等因素。于是,这种把落后国家的文化特征看作发展障碍的观点逐渐融入了50年代的发展理论,并持续了一段时间。<sup>①</sup>

---

<sup>①</sup> L.E.哈里森最近在其著作中表达了这一观点,见《不发展是一种思想状态:拉丁美洲案例》(兰汉姆,Md,美国大学出版社,1985),哈里森作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雇员在中美洲工作了很长时间,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因素能够较好地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比其他国家快得多,或者发展迅速度相仿其余的那些影响国家发展的因素的作用都是很有限的。他所谓的文化,就是一个社会通过不同的社会化机制(家庭、学校、教堂)向个人灌输的价值观与态度。

前面谈到的三个学术趋势(文化——个性学派、主流心理学、实用主义)就是50年代以后发展研究中新的心理学取向研究的背景。这些心理学取向的研究中,有些研究把心理因素看作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的前提条件(自变量),有些把心理因素看作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伴生现象或干扰因素(干扰变量或伴生现象)有些把心理因素看成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过程的后果(应变量)。所以,可以把心理学取向的发展研究分为三大类。<sup>①</sup>第一类研究把心理因素看作前提条件。例如戴维·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关于成就动机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力的研究;鲁西安·派(Lucian Pye)对于缅甸人的不安全感,认同危机以及这两者与缅甸难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的分析;埃维里格·哈根(Ereret Hagens)的关于“创新”品质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的研究。这三个研究的共同点就是都假设心理因素是前提条件,并由此展开分析。

第三研究类把心理因素看成是其它因素的后果。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对于中东现代化的经典研究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sup>②</sup>。勒纳是这样分析的:在现代化社会中,外界情况瞬息万变,一个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渡人”,要想能够更有效地适应外界情况的变化,就必须要有的一种重要的心理特质——移情能力(empathy)。移

---

① 这种分类方法与 P. R. 高德文的分类方法很相似。见高德文的《两个棘手的理论难题:个性特征变量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此文在《发展领域杂志》,1974年1月号的181页—198页。但是,本文把三类研究归入不同领域的分类方法与 P. R. 高德文的方法有一些不同。

对于有关个人取向与宏观社会层面的变迁过程的一些理论问题,H. C. 科尔曼和 D. P. 华威克作了一番概括性的综述,见《社会变迁的微观与宏观方法的沟通:一个社会心理学视角》,此文在 G. 曹特曼编写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与现象》一书中(康涅迪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2年)。

② D. 列纳《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自由出版社,1964年)。

列纳不赞成仅用个人特质或结构因素来解释现代化,他强调:个人与其环境是同时在一起现代化的,否则现代化就会随着另外的方向发展……我们把现代化看成一种参与生活的方式,现代化的一个明显的个性机制就是“移情”。现代化个人与现代化制度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就像鸡生蛋、蛋变鸡一样互相影响。

情能力是指一个人在内心里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考虑问题,并想象自己有限的周围环境之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个人通过这样的考虑问题来使自己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另外,还有一些把心理因素看成后果的学者认为:一个社会发展的突破性的第一步在于机会结构与其他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发展起步以后,政治发展与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使个人行为必须做出某种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因而心理因素就在初始的宏观社会变迁与后来的个人行为调整之间起着关键性的中介作用。所以,现代社会与其政治制度的稳定运行最终取决于有良好心理素质的个人,这些个人必须能够对新的机会、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

令人惊讶的是,在各种心理学取向的发展研究中,属于上面这一类的研究,也就是把心理因素看成是社会结构变迁直接后果的研究非常少。这种观点可能与行为主义理论有关。行为主义认为制度安排是影响社会变迁的首要因素,而心理因素的作用要比制度安排小得多。因而就不怎么重视心理因素的作用。所以,尽管不时有人支持这类研究<sup>①</sup>,(把心理因素看成是其他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过程的后果),但该领域内的学者对这类研究仍然是没有什么兴趣。

50年代后期开始的发展研究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在很多方面与以前的研究都是不同的。第一,这些研究的对象比以前要具体化、可操作化。例如,早期的“民族性格”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而后来的研究就局限于一些很具体有限的问题,例如某种特定的个性特征、价值观与特定的发展过程后果之间的关系这种很具体的问题。第二,在解释经济、政治领域内的个人行为时,后来的研究逐渐把重点从“文化主义”的解释转移到“结构主义”的解释上来。也就是不再用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观、信仰体系来解释

---

<sup>①</sup> J.H.昆克尔《经济发展中的价值观与行为》见《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1965年4月号257—277页。

G.M.古瑟《菲律宾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心理学研究》(马尼拉,安东尼奥·德·马尼拉大学出版社,1970年)。

个人行为,而是强调外界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sup>①</sup>第三,后来的研究实证主义倾向更强,不再仅仅用以前流行的“印象式方法”“坐而论道”式地进行研究,而是依赖系统授集的数据进行研究。可见,后来的研究在研究的问题、解释的模式、运用的方法这几个方面与以前的研究都是大为不同的。

下面,我们将讨论一些有关个人现代化的研究。这些研究把心理变量作为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伴生变量与干扰变量。在各种把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方法用于社会政治发展研究的尝试中,人们认为这种处理方法是成功的。

### 1. 心理现代化

在现代化研究的文献中,经常能够见到“心理现代化”这个概念,它是一个把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上的变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中介概念。“心理现代化”指一系列个人行为倾向(态度价值、认知方式、个性特征等等)。城市生活、学校教育、接触大众传播,在现代企业中工作等经历使个人产生这些个人行为倾向,这些个人行为倾向又使个人行为有利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所以“心理现代化”在个人行为与外界环境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由于这个概念有这种重要的中介功能,所以它的优点就不仅仅在于其操作的可行性与逻辑上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它在社会结构、个人经历这些前提条件与个人行为、社会政治后果之间建立了可以观察的联系。

在发展研究中,还有一些其他把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类似概念。与那些概念相比,“心理现代化”这个概念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以前的研究多少都有一些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而“心理现代化”却较少受这种偏见的影响。早期研究用种族、宗教、或意义含糊的民族文化特征解释不同社会的不同发展过程,这些解释往往是肤浅而令人反感的。而心理现代化却研究同

---

<sup>①</sup> J.S.豪斯曾在他的一篇文章详细地讨论了这一点。见《社会结构与个性》此文在M.罗森伯格和R.H.特纳编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视角》一书中(纽约,基本图书公司,1981年,525—561页)。

—社会内部社会结构因素对于个人的影响,这样就避免了早期研究的那些不足。其次,这个概念假设:个人现代化不局限于童年、青少年时的社会化过程,成年后个人所在的各种社会机构也影响着个人的现代化。再次,由于个人“现代化”是一个连续型变量,而不是一个个差别显著的个性类型,所以就可以分析个人、群体的“心理现代化”的相对水平,不像在分析个性特征时只是简单的有或没有。最后,因为已经有了能够较好地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量表,所以就能够较准确地估计、比较不同的社会背景、个人经历对个人、群体的现代化水平的影响。

自50年代末以来,进行了一系列心理现代化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阿历克斯·英克尔斯与其合作者对现代化的社会文化方面所做的研究无疑是最出色的,他们的研究最广泛、最系统,对概念与结果的处理也是最严格的。<sup>①</sup>其他学者的研究各有特色,但研究所覆盖的地域范围,选取的样本都比较有限。<sup>②</sup>所以,在回顾这个领域的研究时,我们将主要讨论英克尔斯的研究。只是在出于内容或批评的需要,才提到其他学者的研究。

在英克尔斯与其主要合作者戴维·史密斯试图界定个人现代

---

① 这一研究的成果已经体现在6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系列文章、专论之中了。第一本综合、全面地记述这一研究成果的书是 A. 英克尔斯和 D. H. 史密斯合著的《走向现代化:在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

A. 英克尔斯和 D. H. 史密斯接着又写了一本书。作为前一本书时续集,该书对这项研究进行总的概括,书中还介绍了一些有关个人现代化的重要研究的情况。这本书是《个人现代化探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本文中后面所有有关英克尔斯与其合作者的研究的注释、说明都是指上面这两本书,而不是其他文献。

② L. W. 多布《迈向更文明的境界:一个心理学探索》(康涅迪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0年)。

J. L. M. 多森《西非的传统态度与现代态度:一种评估手段的构造、效果和实施》。见《英国社会心理学与临床心理学杂志》1967年第6期,81页—96页。

J. A. 卡尔《现代化的衡量:一项在巴西与墨西哥进行的价值观研究》(得克萨斯州大学出版社1968)。

A. 施耐尔伯格《现代化的衡量:理论与实证的探讨》。见《美国社会学杂志》1970年76卷,399—425页。

M. 阿米尔和 R. 尤兹《非洲社会的正规教育与个人现代化》见《美国社会学杂志》1971年76卷,604—626页。

化的内容时,他们从一个城市化、工业化社会的“理想类型”入手,分析必须有哪些心理属性,社会成员才能以不同的社会角色有效地发挥作用,以维持这个社会的正常动作。英克尔斯认为工厂是现代文明的制度模式的典型<sup>①</sup>,由此他推想:一方面工厂雇佣越来越多的工人,另一方面工厂灌输、培养工人的合理安排时间、合理规划、重视个人效用、接受新事物、尊重科学技术这些观念品质。类似地通过考察现代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英克尔斯列出了其它现代社会的社会成员所应具备的心理素质。在英克尔斯列出的几十个现代化心理素质中,也包括一些现代化在个人层面上的后果。例如其他学者认为不利于现代化的社会失范、社会疏离。

接着,从他们所列出的现代化心理属性着手,英克尔斯与史密斯编制了一系列量表衡量各个生活领域内的现代化水平。经过广泛的试用之后,他们把这一系列量表简化成一个有159个项目的全面现代化综合量表(简称OM量表)。60年代早期,英克尔斯主持了有关个人现代化的一个大型研究。在这个研究中,第一次广泛地运用了OM量表。这个研究的样本是6个发展中国家的5500个18岁至32岁的男子(6个国家是阿根廷、智利、巴基斯坦、东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其中东巴基斯坦是现在的孟加拉,以色列人主要是东方犹太人)。这次研究得到了大量的数据。

“现代人”的形象就从这些数据中逐渐显现出来<sup>②</sup>,而且“现代

<sup>①</sup> 英克尔斯与史密斯:《走向现代化》,5页。

<sup>②</sup> 由于操作上的原因,这次研究只包括了六个国家中的男子,英克尔斯认为如果研究对象包括女人的话,结果也是一样的,他强调说:我们坚信我们所运用的心理指标中的绝大部分,不仅能够辨别出现代化男子,也能够同样有效地辨别现代化的女人。我们十分肯定地说:“那些使男子现代化的因素——诸如教育,在复杂组织中工作,与大众传播的接触——能够同样使女人也现代化”(这段话在英克尔斯的《个人现代化探索》一书的123—124页)。

在巴西进行的一项现代性研究似乎证实了英克尔斯的论断。见B.C.罗森和A.L.拉·莱亚的《女人的现代化:巴西社会变迁的一个指标》,此文在《婚姻家庭杂志》1972年5月号的353—360页。

人”的一些特点在这6国也表现得相当一致。英克尔斯把这些特点归纳如下：

- (1) 易于接受新事物、新交往的人和新的办事方法,如避孕。
- (2) 越来越独立于传统人物(父母、神父)的权威,转而效忠政府、公共事务、商会、公益组织的领导人。
- (3) 相信科学、医药的作用,在困难面前不再持宿命论,也不再消极地忍受。
- (4) 强烈地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能有较好的教育,获得较好工作职位。
- (5) 守时,而且总是预先安排好自己的事情。
- (6) 对国家、社会事务、地方政治有强烈的兴趣并积极地参与。
- (7) 非常关心新发生的事情,对有关体育、宗教、地方事务等方面的国内国际新闻非常关心。<sup>①</sup>

以前的“现代人”形象都是在 OM 量表的基础上勾画出来的,在评价 OM 量表时,至少有三个评价标准。第一个标准是量表的可靠性,也就是 OM 量表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稳定而且一致地衡量心理现代化水平?根据已有的报告,6个国家的可靠性系数大致在0.75~0.85之间,所以 OM 量表是符合行为理论研究所要求的可靠性标准的。<sup>②</sup>

第二个衡量标准是量表的内在一致性,也就是量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内任联系是否紧密,在何种程度上包括了个人现代化的信仰、价值观、个人倾向等各个方面。英克尔斯用因素分析法来评估 OM 量表的内在一致性。他发现在这6个国家中,围绕着一个相同的因素,总有一组相同的价值观,态度倾向出现。更重要的是,它

① 英克尔斯《个人现代化探索》101页。

② 其他的一些心理现代化量表也都有类似的较高的可靠系数。见 M.阿米尔和 A.施耐伯格的《个人现代化的衡量:一个谜》。此文在《美国社会学评论》1972年6月号301—316页。

们基本上与英克尔斯在理论层次上界定个人现代化的那一组个人物质相同。于是英克尔斯得出了下面的结论。这些结论很有说服力,在某些方面也颇令人吃惊:

“我们的观察研究发现:不同的文化中,个人现代化是由同一组个人特质界定的。这一情况表明:从结构上来说,人类的心理确实是一致的;事实上,人类的心理可能确实是一致的。如要在心理结构的基础上讨论人类心理的一致性,我们认为人类个性的自然属性、内在规律显然是基本相似的。也就是说,人的个性是不会——我们认为在相当程度上也不可能——随意变动的,就是连较小的变化也是难以做到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相信人类心理结构上的一致为人类心理事实上的一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只要那些把人塑造成现代人的因素在这个世界广泛存在,人类心理事实上的一致是能够实现的。不仅仅是结构上的一致,而且内容也一致。”<sup>①</sup>

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英克尔斯很自信地把现代化的各个方面组合成一个世界全面现代化指数。但是一些研究人员在用相同或类似的现代化量表研究以后,发现把现代化归纳成某一个方面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那些支持这种做法的论据并无多少说服力。例如,一项研究在检验了5种广泛运用的心理现代化量表之后发现:没有哪一个因素或哪几个因素能够充分地解释 OM 量表的得分差异:

“在描述现在样本的态度与价值观时,现代性这个词应该包括一组态度、行为,这些态度、行为对各种现代化

<sup>①</sup> 英克尔斯《个人现代化探索》102—103页。

因素的反应是不同的。”<sup>①</sup>

第三个评价 OM 量表的标准是“预测有效性”就是当有其他独立的评判标准认为一个人是现代人的时候,OM 量表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准确地判断出这个“现代人”。由于没有一个能够评价个人现代化水平的独立标准,英克尔斯与史密斯只能选择了一种方法论上不甚严格的“外部有效性”方法来评价 OM 量表的这一性质。他们先在这6个国家中确立几个判断组“critiron group”,这几个“判断组”的社会背景是不同的,因而它们的现代化水平也应该是不同的。然后再在这个判断组之间进行统计比较分析,以评价 OM 量表的预测有效性。为了进行比较,英克尔斯挑选了4个主要的评价组。

- (1) 居住在传统乡村社区的农民;
- (2) 不从事工业生产的城市劳动者;
- (3) 刚刚从农村地区迁入城市,尚未融入工业生产的新移民;
- (4) 已经在城市工厂中工作了三四年的正式城市居民。

英克尔斯假定这四组人的现代化水平是由低到高逐渐上升的。

进行统计比较分析之后,结果与英克尔斯预想的完全一样:正规教育、大众传播,在城市工厂工作这些现代化经历对个人的现代化水平确实有很大的影响。有现代化经历的个人 OM 量表得分比没有现代化经历的个人得分要明显地高很多。英克尔斯曾经在理论上预想:某些现代化的社会机构对个人的现代化水平有重要的影响。OM 量表的结果表明,受现代化社会机构影响较多的人中,有76%的人是现代化的,而在那些较少受现代化社会机构影响的个人只有2%是现代化的<sup>②</sup>。

---

① P. A 琼斯《传统——现代态度衡量方法的有效性》。见《跨文化心理学杂志》1977年6月号,216页。

② 英克尔斯与史密斯《走向现代化》7页。

由于 OM 量表能够较好地符合上面的三个标准,所以英克尔斯对 OM 量表很有信心。接着他们就着重考察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试图从中找到心理现代化的原因、前提条件。他们发现:根据国家的不同,有32%~62%(平均为47%)的现代化差异指数可以用十个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社会背景变量解释掉。这些解释变量中,正规教育无疑是个人现代化水平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它对个人现代水平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一个背景变量的影响大2~3倍。大众传播与个人职业经历对个人现代化水平的影响大体相当,仅次于正规教育对个人现代化水平的影响。早期的研究强调教育、城市生活、大众传播是心理现代化的基本决定因素,而英克尔斯的一个研究重点却是职业经历的影响——特别是在现代化工厂工作的经历对个人现代化水平的影响。英克尔斯认为工厂是复杂的、角色分化的、技术管理的工业组织的典型,所以在现代化工厂的工作经历对个人的现代化水平有很大的影响。

在一项补充研究中,英克尔斯估计了一个人的种族背景对其现代化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教育、大众传播、工作经历这些社会背景因素相比,种族因素的作用是相当小的。除去其他社会背景因素所能解释的个人现代化水平差异,种族因素只能解释4%的差异。针对这种情况,有好几种可能的解释。有一种解释认为:这种因种族不同而表现出来的现代化水平差异的原因在于“环境效应”,也就是不同个体所在的不同的社会环境造成了这种由种族不同而表现出来的现代化水平差异。很显然,那些生活在现代化社会、机构中的个人,由于环境的影响,其现代化水平明显是应该相对较高的。英克尔斯也倾向这种解释。所以,在本质上,他并不认为文化、民族特征能够影响个人的现代化水平。<sup>①</sup>

总而言之,英克尔斯与史密斯认为社会结构因素对个人的现

---

<sup>①</sup> 英克尔斯《个人现代化研究》164—183页。

代化水平有重要的影响,而且社会结构因素对个人现代化水平的影响有力地支持了他们的理论预设:

(1) 与现代化机构的广泛接触,特别是与大规模生产性企业的广泛接触,在个人层面上产生了一系列的态度、价值与行为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心理现代化。

(2) 即使在个体成年以后,现代化经历,仍然能够影响个体的现代化水平,而不仅仅局限在童年与少年时期。<sup>①</sup>

(3) 心理现代化的各个基本方面与心理现代化的发生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种族、文化、民族无关的。

OM 量表的主要内容是被访者的态度、意见、价值观,以及被访者所在社会环境的一些情况。这些内容占了量表的90%,其余的内容大多是被访者行为的回溯资料。因此,在评价心理现代化这个概念时,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代化仅仅是一种思想状态吗?也就是说,现代化个人的行为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制度要求是不是一致的?仔细分析起来,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对个人来说,现代化的态度在何种程度上一定会导致现代化的行为?其次,现代人的行为是否显著地有利于经济政治的发展?对这两个问题,英克尔斯与史密斯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

“我们的研究中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界定个人现代化的态度、价值观的改变确实伴随着个人行为的改变。我们相信:这种个人行为的改变意味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也意味着国家的现代化。而且个人行为的改变支持了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sup>②</sup>

---

<sup>①</sup> 英克尔斯曾与史密斯认为这一结论是对广为流行的个性理论的挑战,特别是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挑战。他们写道:“个性发展过程的每一件重要事件都发生在6岁以前,当然也在16岁以前了。”(《走向现代化》第9页)

英克尔斯曾与 E. E. 黑根进行了很有意思的讨论。见 E. E. 黑根的《走向现代化:从预设概念出发的危险的研究》和英克尔斯的《保持正统:对黑根关于〈走向现代化〉的评论的回答》这两篇文章分别在《童年史季刊》1976,第三期的411—421页和422页—435页。

<sup>②</sup> 英克尔斯和史密斯《走向现代化》312页。

但是,也有几个研究的结果不同于英克尔斯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现代化的价值观与现代行为之间的联系是比较模糊的。迈克尔·埃默尔(Michale Armar)和拉瑞·伊萨克(Larry Issac)的一个研究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仔细地考察了现代化的行为方式与心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他们用简化的 OM 量表测量心理现代化水平,以各种现代化研究文献中所描述的现代化行为代表现代化的行为方式。研究表明:在所考察的15种行为中,只有3种行为显著地受被访者的心理现代化水平的影响。(这3种行为是经常读报、经常祈祷、参与政治讨论)。相比之下,诸如教育、年龄、收入这些因素能够解释41.4%的现代化行为指数差异,而被访者的 OM 量表得分只能解释0.9%的现代化行为指数差异。可见,心理现代化与行为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相当不确定的。<sup>①</sup>

因为缺少对于发展的跨国家研究和长时段研究,而且有关的心理因素与社会结构因素的资料也很少,所以心理现代化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有利于经济政治发展仍有相当的争议,只能作一些大致的推测。但是,由于这个领域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把心理现代化看一个中介因素,而不是原因。所以心理现代化对于发展的后果如何并不影响它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价值。<sup>②</sup>下面,我将把“传统”与“现代”作为两个互相竞争的文化体系放在一起加以讨论。为了理解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一次具体的社会变迁,我们将仔细探讨“传统”与“现代”的一些政治后果。

---

① M.阿米尔和L.伊萨克《心理现代化的决定因素与行为后果:哥斯达黎加的实证证据》见《美国社会学评论》,1978年5月号,316—334页。

② 一些现代化研究人员自己却常常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论述做出了相反的理解。例如:“为了摆脱落后社会的过时的、压迫性制度的束缚,首先要求人民精神上的现代化,也就是他们必须把现代人的态度、价值观、行为方式、整合进他们的个性中去。如果没有这一点,无论是外国援助还是国内革命都不能使落后国家进入能够自我维持发展的国家行列中去。”(《走向现代化》315页)尽管偶尔有这样的失误,英克尔斯多次坚定地表示:他认为“个人变迁必须先于社会变迁”是该领域内大多数研究人员对这一观点的最严重的误解(英克尔斯,《个人现代化探索》25页)。

## 2. “传统”与“现代”之争

传统在发展研究中的地位一直是很有争议的。在过去的30年里,对传统的解释也是多种多样。尽管50年代和60年代流行的“传统—现代”两分法中包括了传统因素,但学者们从未重视对传统的研究,只是单方面重视对于现代的研究。当时,人们认为:传统的制度、习惯、思维方式都是社会变迁与发展过程的障碍,这些传统因素将渐渐让位于现代化的制度、习惯、思维方式,并最终被后者取代。这种看法使人们以为传统是某种很神秘的东西,只有古董收藏家与人种学家才会对传统感兴趣。所以,对于关心社会政治变迁的动态过程的人来说,只有发展和发展所导致的现代化,才真正地具有学术吸引力和前途。

传统与现代的不对等关系突出地表现在人们在描述两者内容时所采取不同方法上。在界定现代的特征时,人们从现代化理论的前提导出了现代化的特征。而在界定传统的特征里,人们大多用的是否定性的或说明不足之处的词语。要么在理论上假定与现代化的特征相反的就是传统的象征,要么把那些尚不够现代化的方面当作传统的特征。提起“现代化”这个词,人们就会想起当代西方工业化的自由民主社会的理想形象。而与之相对的传统往往是一个描述性、诊断性的标签,使人想起第三世界的那些民族和社会,他们只有及时赶上现代化步伐才能进入文明之阶段。尽管有所保留,洛伊德(Loyed)和苏珊·鲁道尔夫认为这种传统—现代两分法还是有启发意义的。他们把传统—现代两分法的主要内容归纳为现代化理论的几个主要假设:

(1) 普遍性义务与开放态度取代了地区纽带和狭隘的地域观点。

(2) 日常生活中,实用主义、精于计算、尊重科学取代了感情用事、非理性和对神圣的尊敬。

(3) 个人取代集体成为社会与政治的基本单位。

(4) 人们自己选择所参加的社团,出身条件不再重要。

(5) 人的身份是选择性和获得性的,无须外界的分配和确认。

(6) 工作场所与家庭、住所、社区分离,人们在特定的科层组织中工作。

(7) 年轻人为了承担日后的任务和责任,必须做更多的准备,从而成年期向后推迟了。

(8) 尽管寿命延长了,老人的一部分权威还是转移给了年轻人,同样,男人的一部分权威转移给了女人。

(9) 人们不再重视种族的差异,而承认有普遍的人性。

(10) 政府不再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权力资源控制着,而是建立在参与监督与同意的基础上。<sup>①</sup>

上面这段话把传统描绘成一种保守、稳定的社会力量,这种情况与现代化理论中广泛存在的功能主义倾向是一致的。这种功能主义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共享的规范、价值观能在社会的各种制度、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维持一种均衡状态。在正常的情况下,推动社会变迁的要么是外界因素,要么是内部的个人、集团的活动。由于教育、技能、职业背景、政治形式、价值观等原因,内部的个人集团挣脱了传统的束缚,而充当“变迁因素”。这些个人集团包括企业家、现代化精英,新兴中产阶级军队等等。

这种“传统—现代”对比开始时很受欢迎,但是没过多久就遭到了挑战。60年代后期,发生了萨缪尔·亨廷顿所谓的“小规模修正运动”(“small-scale corrective reaction”),反对当时把传统—现代看成两个相反极端的流行看法。<sup>②</sup>几乎在同时,好几位有影响的批评家都发表文章,强烈地反对单一性、静态和同质性的传统概念,以及那种认

---

<sup>①</sup> L.I.鲁道夫和S.H.鲁道尔夫:《传统的现代化:印度的政治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7年)。

E.希尔斯《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海格:矛盾出版社,1962年)这本书较早地谈到这种二分法的存在,影响较大,也讨论这种二分法对发展研究的影响、意义。

<sup>②</sup> 萨缪尔·亨廷顿《变迁的变迁》293页。

为传统将在现代化过程中消失的看法。<sup>①</sup>这些批评家指出:传统的结构制度有很大的可塑性、灵活性,为现代社会的政治整合、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在所有的文化中,传统与现代都是互相渗透、互相支持的两个方面。

尽管,传统—现代的概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心理学上已过时的“传统人”形象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人们仍然用那老一套的否定性词语描绘传统的倾向、价值观:传统意味着非理性、缺乏独立性和停滞,传统阻碍个人在现代化社会中有效地发挥作用等等。人们用了相当多的精力研究心理现代化,然而传统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个人态度行为,却很少有人注意。《走向现代化》这本书观察方法严格周密,分析巧妙,因而很受学术界的重视。这本书的作者指出:英克尔斯与史密斯只是把“传统人”描写成现代特征的对立面。在研究个人现代化时,英克尔斯只是从他的假设出发研究现代社会制度所要求的个人心理素质,他并没有从观察事实出发考察传统思想、行动的心理动态过程。英克尔斯把传统描述成下面这个样子:

“消极地接受个人命运,普遍的无效率,害怕革新,不信任新事物;对外界事物不感兴趣,并与外界隔绝;依赖于传统的权威;接受老年人、宗教领袖、或习惯上的领袖的经验智慧;只关心个人家庭事务,不愿介入社区事务;只认同当地的狭小的初级群体,对地区国家等更大的实

---

① R. 本迪克斯《传统与现代的再思考》。见《社会历史比较研究》1967年4月号292—346页。

S. N. 艾森塔斯德:《传统变迁与现代》(纽约,威利出版社,1973)。

J. R. 古斯菲尔德《传统与现代:社会变迁研究中错置的两极》。见《美国社会学杂志》1967年1月号351—362页。

R. 科沙瑞《传统与现代的修正》。见《政府与反对者》1968年第3期273—293页。

A. 马自端《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当代现代化理论:对传统的分析》。见《世界政治》,1968年10月号,69—83页。

体心怀恐惧；没有远大目标，有一种小人物的卑微的感激心理；与下属和社会低层的人之间是一种僵硬的、等级制的关系；不重视教育、学习、研究这些与眼前利益无关的事情。”<sup>①</sup>

总的说来，60年代末的“修正运动”影响是很深远的，它改变了人们对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看法。以前人们总是比较重视两者之间的矛盾，现在人们却逐渐地更重视两者之间的一致了。用林哈德·本迪克斯(Rinhard Bendix's)的话来说，这是一次“反意识形态”运动。人们不再把传统制度、惯例看法看作是必须克服的障碍。相反，人们认为，只要社会的成员能够针对变化的环境作出合适的心理、思想上的调整，传统是能够与现代化社会的要求相适应的。一位学者指出：

“在一些新兴国家里，人们既想实现现代化，也希望能够保存传统。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作为意识形态，这两者并不总是互相冲突的，对现代化的追求依赖于传统主义意识形态的勃兴，而且后者也常常支持对于现代化的追求。”<sup>②</sup>

60年代后期的“修正运动”已经过去20年了，今天人们似乎更加重视传统的作用。有些学科以前对传统的看法并不很好，但是由于传统思想制度对于社会动员、社会变迁的巨大潜力，以及传统本身的原因，这些学科现在也对传统作出了较高的评价。爱德华·希

---

① 英克尔斯与史密斯《走向现代化》315页在—项探讨深层次个性与现代性的研究中，M. 苏自曼试图证明：“与传统人相比，现代人更有独立性，异质性，抽象能力更强，自我发展水平更高”见苏自曼的《心理现代化》一文，此文在《国际比较社会学研究》1973年3—4期。

② 古斯菲尔德：《传统与现代》，358页。

尔斯(Edward Shils)最近指出:“显而易见,学术界对传统的看法和人们的评判标准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传统面前,学者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局促不安了。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学术论文中很少谈传统,所以它的意义已经变得含糊不清了。”<sup>①</sup>在第三世界的宗教种族运动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量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传统主义意识形态对现存政府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相比之下,世俗主义意识形态对现存政府的挑战要小得多。

传统主义在这里并不是意味着仅仅回到理想的过去社会的思想方式、行动方式。相反,传统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自觉地接受、利用那些对文化的完整有重要意义的信仰、价值、象征结构,尤其在传统将要被与之竞争的信仰、价值压倒的时候。对于个人与集体的需要,传统主义的思想、行为能够与现代化的思想行为一样的深思熟虑,一样的富于创造性,一样的反应灵敏。阿卜杜拉·劳若( Abdalla Laroui)在他那极富悟性而令人鼓舞的文章中提醒我们:

“发展是由很多社会运动构成的,为了生存和繁荣,传统也需要很多社会运动,只是这些运动的方向与发展的方向相反而已。在社会中,有一个政治文化精英集团努力地保持传统,这些精英的行为不同于其他人,但是他们从中得到的满足感与现代主义者从现代化运动中所得到的满足感是一样的。”<sup>②</sup>

### 3. 传统的回归:伊朗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伊斯兰革命

当代的传统主义运动中,最戏剧性的例子是伊斯兰教的复兴。70年代以后,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世界里,广泛地酝酿

---

① E. 希尔斯《传统》(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E. 霍布斯保和 T. 兰格的《传统的发明》(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② 阿卜杜拉·劳若《阿拉伯知识分子的危机:传统主义还是历史主义?》由 D. 卡美尔翻译成英文(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年)40页。

着伊斯兰复兴主义运动。在中东或者整个伊斯兰世界,各个国家的语言、政治结构和政治内容都明显地受到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影响:强烈地反对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在个人行为上严格遵守伊斯兰法典;用伊斯兰法典取代引进的西方民法;原教旨主义者或激进的伊斯兰社会主义集团的兴起;执政当局为了增加其统治的合法性、争取民众支持,而把其公共政策计划“伊斯兰化”等等。<sup>①</sup>

西方媒体常常把伊斯兰复兴运动描绘成极端的、不合时宜的倒退的运动,这些运动试图使那些已经落后的社会倒退回中世纪的社会秩序中去,使社会失去了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成就:世俗化、理性化、重视科学技术、尊重个人权利。这些国家在大众政治和迅速的社会动员的压力下进行的制度建设过程常常是不稳定而且非常脆弱的,但是其作用又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伊斯兰复兴主义运动的兴起,发展政治学者倾向于把这些运动看成制度建设过程将要崩溃的标志。人们不禁担心制度建设过程崩溃的严重后果:权威——民粹主义政体的复兴,种族、宗教冲突的加剧,政治解体,两败俱伤的内战等等,就像今天黎巴嫩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对于那些在社会——精神上都迷失方向的人来说,这些运动不仅提供了一种

---

① 研究这一问题的一位资深埃及学者说:“70年代末期以前,不管政治体制类型与公开的意识形态有何不同,伊斯兰复兴运动构成了阿拉伯世界中主要的异议意识形态。不管在革命的叙利亚还是亲西方的埃及,不管在伊斯兰取向的沙特阿拉伯还是世俗化的土耳其,大体都是这样的。”见 A. E. 希拉·德索基的《伊斯兰复兴主义运动:资源、动力、含义》此文在他编的《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一书中(纽约,普雷格尔出版社,1982年)。

有关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文献正在迅速地增多,研究范围也很广。下面几篇文献,尤其值得注意。

赛义德·阿米尔·阿琼曼德《从民族主义到革命伊斯兰教》(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4)。

J. R. I. 科勒和 N. R. 科迪编写的《什叶派穆斯林与社会抗议运动》(康涅迪格,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6)。

J. L. 埃丝波希多《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声》(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

J. P. 皮丝卡多里《政治过程中的伊斯兰教》(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

伊曼纽尔·西万《激进伊斯兰:中世纪的神学与现代政治》(康涅迪格,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

这本书主要研究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的激进的逊尼派穆斯林复兴运动。

反抗思想,而且给他们提供了精神庇护所和一种尊严感。<sup>①</sup>

由于归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集团、运动、组织多种多样,差异很大,而且缺乏有关参加者的社会人类学、意识形态、思想倾向、个性特征的可靠资料,所以对于他们的文化、心理动态应该做仔细深入的研究,<sup>②</sup>不能粗枝大叶地简单概括一下就了事。1977—1979年的伊朗革命不一定很典型,但是我们对这场革命的了解比较多,所以简略地考察一下伊斯兰革命的有关方面还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朗革命是唯一使原教旨主义政府上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不仅如此,伊朗当局还在致力于使社会政治生活全面伊斯兰化。<sup>③</sup>

① R. H. 德克米间《革命中的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原教旨主义》(纽约,希拉立丝大学出版社,1985),52页。

I. 希拉格尔丁的《个体认同,集体动力学和伊斯兰复兴运动》,此文在德索基编的《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一书的54—66页。

② 1977年秋天,有人对埃及的两个好战伊斯兰教集团的成员进行实地访谈。基于这次访谈的研究被广为引用。据我所知,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发表的对此类集团的实证研究。见 S. E. 易卜拉欣的《埃及好战伊斯兰集团的剖析:方法论的注释和初步的发现》。此文在《国际中东研究杂志》1980年12月号423—453页。

以及 E. 戴维斯《现代埃及的意识形态·社会阶级和激进伊斯兰主义》F. 卡泽米《法达因伊斯兰教:迷信政治和恐怖》。这两篇文章在阿琼曼德的《从民族主义到革命伊斯兰教》一书的134—157页及158—176页。

S. 马丁《土耳其的青年与暴力》见《欧洲社会学档案》1978年第二期,229—254页。

③ 1977—1979年,伊朗革命的历史背景可参看以下文献。

E. 阿卜拉海米《两次革命之间的伊朗》(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

N. K. 科迪《革命的根源:解说现代伊朗的历史》(康涅迪格,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

S. 巴克哈什《阿亚图拉王朝:伊朗与伊斯兰革命》(纽约,基本图书公司1984年),此书记载了伊朗共和国前五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写得相当好;

S. A. 阿琼曼德的《20世纪伊朗的传统主义》,着重讨论了当前伊朗的社会状况。此文在阿琼曼德的《从民族主义到革命伊斯兰》一书的195—232页;

M. M. J. 责雪,《伊斯兰教与小资产阶级的反抗》见《达达路丝》杂志1982年冬季号101—125页;

A. R. 希克霍勒斯拉米《从宗教宽容到宗教革命: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的改造》。此文见于 A. 巴那兹兹和 M. 威纳编的,《国家、宗教和部族政治: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一书的227—255页(纽约,希拉立兹大学出版社1986年);

M. 特兰尼亚《现代化的祸源:现代化与通讯的辩证法》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0年第二期,247—263页。

在考察伊朗革命的原因、特点时,很多学者都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伊朗有一个比较稳定、现代化的政治制度,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庞大军队和内部保安部队,有着广泛的国际支持。而这样的政治制度却被非暴力、受宗教情绪支配的革命轻易地推翻了,而革命的领导者就是那些试图以伊斯兰神权统治取代现存政治制度的传统阿訇(alima)。对这个矛盾的现象,一种解释认为:穆罕默德·雷扎·沙哈(Mohemod Reza Shah)的过于迅速而又影响深远的现代化计划导致了这次革命。现代化过程中,阿訇(伊斯兰神职人员)、集市商人、小资产阶级、以及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新城市移民们并未从现代化中得到好处,他们的利益被忽略了,甚至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就进行反击,发动了革命。这种解释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把对沙哈的反对等同于对现代化的普遍的防御性的反应却不太合适。这种看法简单化地理解了巴列维王朝统治后期的伊朗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也误解了成功地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群众社会革命的特点与动态过程。

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伊朗确实在经历着广泛的现代化过程。在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上的大规模投资、城市化、识字率提高、正规教育的发展、通讯与大众传播的发展、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性别平等和妇女就业率都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些都是伊朗的现代化进程的标志。但是伊朗的现代化进程是由不断增加的石油收入刺激推动起来的,石油收入为现代化过程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现代化的受益者主要是西方化的城市中上阶层和现代工业部门里迅速成长起来的“劳工贵族”,这就激化了伊朗社会中一直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所以,伊朗的资本主义取向的发展过程是不会一帆风顺地、平稳发展的。在政治上,由于沙哈投靠美国(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臆测),蔑视大众传统的伊斯兰文化,而且腐败无处不在,统治越来越独裁专制,这些因素都使各个阶层对政府越来越不满。沙哈的专制统治甚至使那些从各项社会经济政策中得益甚多的阶层也心怀怨恨。

伊朗现代化精英的西方化的观点、政策和那些世俗主义者使伊朗社会在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产生了一种意义深远的文化鸿沟。一方面是规模较小的现代化集团,主要由受西方教育的精英、世俗主义的知识分子、新兴的中产阶级组成。另外一方面是传统集团,由占人口一半的农民、城市贫民、小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其社会经济条件不尽相同,但都忠于传统伊斯兰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人构成。

对于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传统集团来说,什叶派阿訇是能够最明白地表达他们的不满的政治文化精英。一系列政治文化因素使什叶派阿訇能够承担这一任务。首先,他们积极地参与了历史上几乎全部的重大反抗运动。其次,他们与传统的中下阶层有着长期的、紧密的经济联系与个人交往。再次,由于有宗教税和虔诚信徒的津贴捐赠,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相对独立于国家。最后,他们牢固地控制了影响广泛的清真寺、宗教讲坛、宗教协会,这使他们能够召集、培养追随者,维持与外界的各种联系,表达公众的不满,能够批评政府而较少受到惩罚。<sup>①</sup>由于政府全面控制了大众传播媒介,压制政治上的不同意见,对于那些拒绝服从官方命令的政党、工会集团,政府要么解散它们,要么使之中立,所以阿訇的政治煽动功能是极其重要的。

---

① 有关阿訇在现代伊朗社会的位置与他们和巴列维王朝的关系,可参考下列文献。

S.阿克哈维《当代伊朗的宗教与政治:巴列维时期神职人员与国家的关系》(阿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0年)。

H.阿尔高《20世纪伊朗阿訇的相反角色》,此文见于《学者、圣人苏菲教派1500年以来的中东穆林政治制度》一书,该书由N. R.科迪编写(伯克力,加州大学出版社,231—255页)。

M. M. J. 费雪《伊朗:从宗教纷争到革命》(马萨诸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

W. M. 弗洛《阿訇的革命特征:希望的幻想还是现实?》。

A. 塔巴里《现代伊朗政治中神职人员的作用》,这两篇文章在N. R.科迪编的《伊朗的宗教与政治:从寂静主义到革命的什叶教派》一书的73—97页和47—72页。

伊朗革命后期,神职人员占据了革命的主导地位。革命结束后,神职人员取得对世俗主义者的政治领导权。但是,不能因此错误地认为伊朗革命是由神职人员单独完成的。实际上,伊朗革命的成功依赖于各种社会力量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大联合,而且这种联合的广泛程度在20世纪的革命中是很少有的。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尽管伊斯兰教的象征物与口号占主导地位,但是却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伊斯兰意识形态,而是几个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相安无事。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吸引着某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集团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仅就伊斯兰意识形态而言,就有4个明显不同的分支:

“激进伊斯兰教”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他们试图用现世革命把伊朗改造成一个无阶级的伊斯兰社会。“好战伊斯兰教”是一部分阿訇、小资产阶级、被剥夺者的意识形态,他们想在尘世建立一种“神的统治”,并为以前的损失得到各种形式补偿。“竞争伊斯兰”是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希望一个用非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伊斯兰——民族主义政府,并企图在政府中得到更多的权力。最后“传统主义伊斯兰”是传统社会里的中等阶级表达不满的意识形态,大部分阿訇,小资产阶级对社会变迁感到愤怒,并渴望回到旧秩序中去。<sup>①</sup>

这4个分支中,除了“传统主义伊斯兰”外,都是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的混合物,体现了传统的伊斯兰教思想为了符合特定集团的利益、倾向而作出的调整适应。从这个角度看,伊斯兰教为革命动员以及表达人民的不满,表现出了很大的包容性、整合性、灵活

---

<sup>①</sup> A.阿什拉夫和 A.巴那兹兹《伊朗革命中的国家,社会阶级和动员方式》,见于《国家,文化与社会》1985春季号,40页。

性。可能没有哪一个思想体系能在这个方面比伊斯兰教做得更好了。

除了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作用之外,伊斯教和阿訇对革命联合的广泛性与最终成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宗教组织领导人的地位多么稳固,思想多么保守,对当局是多么温顺甚至服从,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从来都是当局的潜在反对力量。什叶派伊斯兰教戏剧性的宗教仪式,使它成为追求真理与正义、坚定、承受苦难、自我牺牲的象征;它能够非常巧妙地用宗教语言重新定义政治冲突;它的逻辑很大众化;他那把“剥夺者”与“被剥夺者”对立的话语,使它深得人心;它救世主似地声称“潜在的领袖”将会到来,并带来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所有这些都使什叶派伊斯兰教成为一个有很大反抗力量的宗教。<sup>①</sup>霍梅尼创新地提出了 *velyat-e-fagih* (保护法律)这一概念,为历史上什叶派阿訇的第一次直接统治作了理论准备。这个概念使霍梅尼及其追随者不仅有了一种能够鼓舞大众革命的有力意识形态,还使他们有了一个用“伊斯兰政府”取代“腐败的”、“恶魔般”的巴列维王朝的蓝图。

阿訇们对革命最大的贡献可能是他们为革命提供了一个领导者。作为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把自己与群众良好的关系与他自己的克里斯玛以及他们职务的克里斯玛结合在一起,从而能够把许多分散的社会力量组成一个革命联盟。那些世俗主义者,包括自己民族主义者、左派、现代知识分子都逐渐被拉入这个革命联盟,而且错误认为:一旦推翻沙哈政府的共同目标得以实现,他们自己将能够左右将来的国家政治,而不是他们的传统主义伙伴。为了推动革命联盟,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发起一场协调良好的革命动员。他们运

<sup>①</sup> 有关伊朗的宗教隐喻和仪式的独特作用可参考下列文献。

M. 黑格兰《伊朗的仪式与革命》见《政治人类学》卷2《文化与政治变迁》由 M. 阿罗诺夫编(纽·布仁斯威克,交易图书公司,1983),75—100页。

G. 柴丝《宗教符号与社会变迁:侯赛因的戏剧》见于科迪编的《学者圣人和苏菲教派》,349—366页。

用了每一种传统与现代的通讯、煽动与革命宣传手段；避开可能的分歧，压制不同的思想（包括大部分保守、不问政治的阿訇）；把世俗主义者拉进运动领导层的圈子，以使更多的受过教育的西方化的人也支持阿訇（尽管阿訇当时还代表着一种反动的社会力量）。尽管这些神职人员的生活方式、思想、行为都是传统的，但是他们是能干的革命联盟建设者，拥有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灵活的思维。要领导革命和革命联盟，后两者是必不可少的。

讨论了伊朗革命中，传统在发展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作用之后，我们能够得到哪些相关结论呢？第一个结论是：无论是在政治制度过程层面上，还是在有现代化经历的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层面上，伴随着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变迁并不必然带来世俗化。<sup>①</sup>这个结论其实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但是，仅仅简单地指出伊朗革命对世俗化理论的挑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搞清楚在什么条件下，宗教能在革命运动中发挥关键作用。根据上面的材料分析，宗教复兴运动必须与其所在的特定的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联系起来考虑。阿里·德索基（Ali Dessonki）在他的论文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必须把伊斯兰运动与其社会的特定社会变迁过程联系起来考虑，各阶级、集团的地位变化、政治参与、认同危机、政府的稳定性和分配公平这些因素尤其重要。”<sup>②</sup>在伊朗革命这个例子中，人民对政府不满，有强烈西方化倾向的巴列维王朝与过分热心的现代化精英产生了文化的二元结构，对阿訇各方面利益特权的剥夺，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反对派的内在特点以及它能够动员起来的巨大力量，所有这些都是影响伊朗革命的重要因素。

第二，传统主义者在政治舞台上作为革命的领导者、策划者、宣传者、煽动者和干部参加了这场革命。所谓的传统的特征，诸如

---

① C.伯纳德和 Z.卡里扎德《世俗化，工业化和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见于《政治学季刊》1979年夏季卷，229—241页。

② 德索基《伊斯兰复兴运动》，8页。

不重视个人效用、消极宿命、只关心个人家庭,与外界隔绝等等,并未对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有什么不利影响。同样,传统主义思想与现代世俗主义思想一样能够表达社会变迁的需要,一样能够引起激进的集体行动。<sup>①</sup>就这一点来说,什叶派伊斯兰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以色列极端正统的犹太教,拉丁美洲的“自由神学”,与波兰天主教密切相关的工人抵抗运动都表明了传统主义思想能够表达社会的需要并引起社会性运动。

第三,有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只有那些找不到自己在社会里的位置的失范个人(城市贫民、新近从农村来的移民)才会对传统主义的宗教政治运动感兴趣。但是仔细地分析伊朗革命的社会基础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与其他更稳固的境况较好的新老社会阶级相比,城市贫民和新移民在运动中起的作用是相当小的,而且只是在运动的后期起作用。也就是说,和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人相比,那些在文化中有深厚根基的个人参加传统主义宗教运动的热情是同样的,甚至比前者更高。<sup>②</sup>这更进一步表明:在伊朗革命这个例子里,撇开价值观与目标因素,那些受现代化制度广泛影响的个人至少会受到传统主义政治运动强烈感情的影响而参加激进的政治运动。

最后,我们可以从革命后的伊朗社会情况看出一些传统主义运动胜利的后果。1979年革命以后,神职人员领导者强化并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参加革命联盟的其他集团实际上都被消灭了。对于敌人,政府称他们是“伪君子”“违反真主的人”“尘世的腐化者”,还用监禁、折磨、处死这些严厉、凶残的刑罚对付他们。政府还用凶人狂、“真主党卫队”这些手段进行无休止的伊斯兰化运动,控制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做法极大地践踏了人权,尤其

---

① 革命动员中传统价值观、关系的作用见于 C.J. 卡尔霍恩《传统的激进主义,社区力量还是令人尊敬的伪装和借来的语言?》见于《美国社会学杂志》1983年3月号,886—914页。

② 阿什拉夫和巴那兹兹《国家、社会阶级和动员方式》36页。

是妇女和弱小宗教教派成员的人权。对于政府里的教条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主要目标是通过“文化革命”实现伊斯兰教的绝对统治;而对政府里的大多数人来说,目标仅仅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权力。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激进的强烈的再传统化运动能否成功尚不得而知。但是如果那些折磨伊朗的严重经济社会问题,那些逃亡海外的几十万伊朗人和在国内坚持抵抗的伊朗人能说明一点问题的话,“伊斯兰运动”在人力、物力上的代价肯定是非常大的。于是自由主义思想家寄予厚望的传统与现代化对话无情地中断了,而这一切都是在传统的名义下进行的。

(王辉 译,仲夏 校)

巴巴拉·斯托林斯

## 外国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国外资本的作用一直是发展理论和政策中最引起争论的问题之一。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年代吧,在那一时期,第三世界各国政府业已着手制定发展的政策和策略,有关外国资金来源的利弊得失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国外资金究竟是促进发展的主要动力,还是阻碍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三世界政府究竟有没有能力向多国公司讨价还价?还是多国公司只要将它们的条件强加于第三世界国家就行了呢?直接投资较贷款的相对有利之处是什么?究竟谁是外国资本流入的大赢家和输家?

有关外国资本的许多重要问题的论争可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两大类。第一类主要探讨外国资本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将其理论或观点并列出来,即所谓“现代化”和“依附”。<sup>①</sup>第二类涉及到外国参与者和第三世界政府在投资和利润分配决策上的相对权力,它也牵涉到依附理论,但在这点上它是与“中央集

---

\* 选自 G. 杰里菲和 D. 怀曼主编的《制造奇迹:拉美与东亚工业化的道路》一书。

① 相对更广泛的框架或方式而言,人们对“现代化”、“依附”的大量文献算不算真正的理论仍有极大的争议。托马斯·库恩的术语“范型”也是通用的。关于“依附”的文献可参见帕尔马(1978年)。有关东亚经济范型的饶有兴味著述,可参阅优素福和彼得斯(1985年)。

权”理论或观点对立的。<sup>②</sup>

比较拉美和东亚的情况,对于评估上述理论将不无裨益。首先,它可以使我们更多地考察利用外资的不同经验,这比仅局限于一个地域更好一些。当然,正如加里·杰里菲在导论中所言,这些差异也使比较研究更加复杂化。其次,考察这两大地域能拓宽我们理论探索的视野。“现代化—依附”理论主要注重拉美国家,而“中央集权—依附”理论则在分析东亚时更为流行。既然两种观点显然都相当重要,又有内在联系,把两者一起加以考察将是有益的。再次,东亚的专家大凡强调这两种观点的积极面(为现代化和集权论的有效性辩护),而拉美的专家则持相反的观点。比较研究将论证客观事实能否证明各自的立场。

同本书的其他章节一样,本章将集中探讨这些地域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地区):拉美的巴西和墨西哥,东亚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时限定于战后的年代,一般始于50年代中期。本章包括五个部分。第一,概述有关外国资金的两大论点以及本章所要探讨的问题。第二,审阅四个国家(地区)的有关外资的某些数量数据,注重其在一定时期的变化。第三,提出怎样解释国家和区域之间量的差异的问题。第四,审阅有关外资作用的质量数据,集中探讨一个特殊的问题:在两大地域中外资与发展战略的选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五,结论——根据本章的论据重新考察两大论点。

### 有关外资的两种争论

有关“现代化—依附”的争论在拉美已进行了好几十年。起码自从1949年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发表《拉美经济概览》之后,对外资的批评一直占主导地位。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批评尚属温和,

---

<sup>②</sup> 这里所谓的“中央集权”与杰里菲的“依附管理”密切相关,但比后者的含义更广(1989年)。

它主要强调国际贸易阻碍了发展；随后，60年代对外资尤其是对多国公司的抨击就更为激烈了。到70年代初期，所谓的“依附模式”在拉美和美国的拉美研究中占主导地位。依附论分析家所指出的主要问题包括利润外流超过新的资金引进、应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导致新的失业，以及忽视较贫困的地区和收入集团；总之，它认定依附与发展是难以并行不悖的。此派学者的早期论著倾向于把拉美的的问题归咎于美国，不论它是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政治操纵，还是多国公司及其本国的经济操纵。<sup>①</sup>然而，对依附论的广泛接受导致了更精致的学说，这种学说更注重研究国外因素与国内因素的互相作用、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外资对发展正反两方面的影响。<sup>②</sup>

相反，现代化论则注重对外贸易和外国资本的积极方面。如新资源的流入、就业机会的增加、对技术的引进以及打入国外市场，他们强调这些特征表明外资促进了发展。当这种观点在拉美被贬得一无是处之时，它在东亚却很有活力。确实，著名的韩国研究和台湾地区研究（用英语发表）就是在这种范型内完成的。<sup>③</sup>在贸易和资金两方面向国际开放作为一种最佳的政策已为人们接受。问题在于引进什么类型的资本最为有利及如何吸引外资。当然，在东亚也有人对外资引进加以批评，但较之拉美，这种批评往往显得不那么成熟，容易被人驳倒。更多的是针对美国或日本的直接控制、甚至搞阴谋颠覆的理论。在东亚，对外资的批评在许多方

---

① 有关早期依附传统的著名论著有巴兰(1957年)、弗兰克(1967年)和多斯·桑多斯(1970年)。

② 稍后有关拉美研究最重要的论著有卡多索和法莱多(1979年)，该书写于60年代中期，1969年以西班牙语首次发表，其他例子有埃文斯(1979年)，杰里菲(1983年)，纽法默(1985年)，贝内特和夏普(1985年)。

③ 从现代化方式研究东亚最出色的成就要数哈佛国际发展学院和韩国发展学院联合进行的研究，例如克鲁格(1979年)，金光锡和罗默(1979年)，梅森等(1980年)。有关台湾地区的情况，见雅各比(1966年)，盖伦森(1979年)和 Kuo 等(1981年)。有关比较研究的有价值的著作，见盖伦森(1985年)，伯杰(1986年)，这些著作作为这种方式作了全面的辩护。

面类似早期依附论者对拉美的分析。<sup>①</sup>

中央集权—依附论是不久前产生的,正如依附强调外国资本的副作用一样,它也假设第三世界政府没有能力避免这些消极影响。东道国政府面对多国公司、国际银行和外国政府时被描绘得极其软弱无力。人们认为他们没法对投资或利润汇额制订出规则,被迫对外国的投资者提供优惠。最近有人声称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借款高潮中,国际银行家迫使这些政府向他们借贷。有关外资强权的论点在某种程度上已为依附论更为周密的论断所修正,人们越来越注意国(地区)内领导人的作用。然而,外国参与者仍然是研究的中心,新的焦点集中在政府、地方资本和外资是怎样共同导致“依附性发展”的。<sup>②</sup>

然而,在东亚,无论是持何种意识形态的作者,都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地区)内集团而不是国(地区)外的参与者。虽然,他们也指出国(地区)内私有部门的作用,但特别强调政府(当局)在经济中的作用。他们从东亚的观点出发,运用“统制”、“国家主义”和“发展政府(当局)”这些概念来抨击依附理论。对东亚政治、经济的发展,政府(当局)在提供信贷、将投资引入特定的工业,补贴出口产品、保护国(地区)内市场和吸引新技术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远远大于外国资本。人们认为政府(当局)有能力利用外资,而不是相反。<sup>③</sup>

这些观点在这两大地域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要对此作出跨

---

① 有关东亚见朗(1977年),苏努(1978年),兰兹伯格(1979年)。亚洲其他地区相似的趋势由泰纳迈(1985年,第9—12页)作了描述。对这种不成熟的方式最近有两个例外的做法,见戈尔德(1981年)和林玄镇(1982年)。有关东亚对依附理论提供的“教训”的讨论可参阅埃文斯(1987)。

② 特别值得参阅的有卡多索(1973年)和埃文斯(1979年)。贝克尔(1983年)所写的有关拉美的著作与东亚的中央集权经济统制颇为相似。

③ 有关事例可参照阿姆斯特登(1979年)、巴雷特和怀特(1982年)、韦德(1984年)和利德-纽拉斯(1984年)。在解释东亚实例时,或许要数斯蒂芬·哈格德最积极坚持为中央集权论进行全面辩护,而不是为依附论辩护(参阅哈格德,1983年,1986年;哈格德和穆恩,1983年;哈格德和郑敦仁,1987年)。

地域的评估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任务。我将强调这样一个主题,即拉美和东亚的新兴工业国(地区)在利用外资方面,有截然不同的经验。而这些不同的经验又导致不同的解释。为了审视这个总的论题,首先必须检验两个特定的前提。从“中央集权—依附”的辩论看来,其前提是:外资在东亚的重要性不如在拉美;相反,本地资本和政府(当局)则显得更重要。将外资与如国(地区)内总投资这样的总额比较一下,就能对这个前提作出初步的检验。关键的方面将是比率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从“现代化—依附”论点看来,第二个前提是:比较拉美来说,外资在东亚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由于“积极”这一术语显然是个相当规范的词,因此这个前提就更难把握。在本文中,所谓“积极”指两个方面:相对比较容易利用外资和东道国政府(当局)拥有较大的决策自主权。外资的构成和外资在一定时期的变化将成为探讨第二个前提的中心。

### 外 资 的 特 征

在评价这些争论时,有必要首先对四国(地区)的外资特征作一番基本的描述。为了便于初步的讨论,这里“外资”的含义是比较广泛的,它包括外国直接投资、拨款、(双边或多边的)公共机构提供的长期贷款、私人银行的长期贷款以及非官方储备的短期资金。有关国际收支类别,外资的流入或外资的储存等于往来账户减去无报酬的转让。运用后一个定义是为了便于计算,这样就可能对巴西、墨西哥、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外资流入量占其国(地区)内投资总额的百分率进行比较。<sup>①</sup>

图1显示1957—1987年外资净值在国内(地区)投资总额中的百分率及某些地域的相似性。韩国和台湾地区在50年代引入的外

---

<sup>①</sup> 四国(地区)中,外资占国(地区)内生产总值的百分率在整个时期的趋势与外资占国(地区)内投资总数份额的趋势是十分相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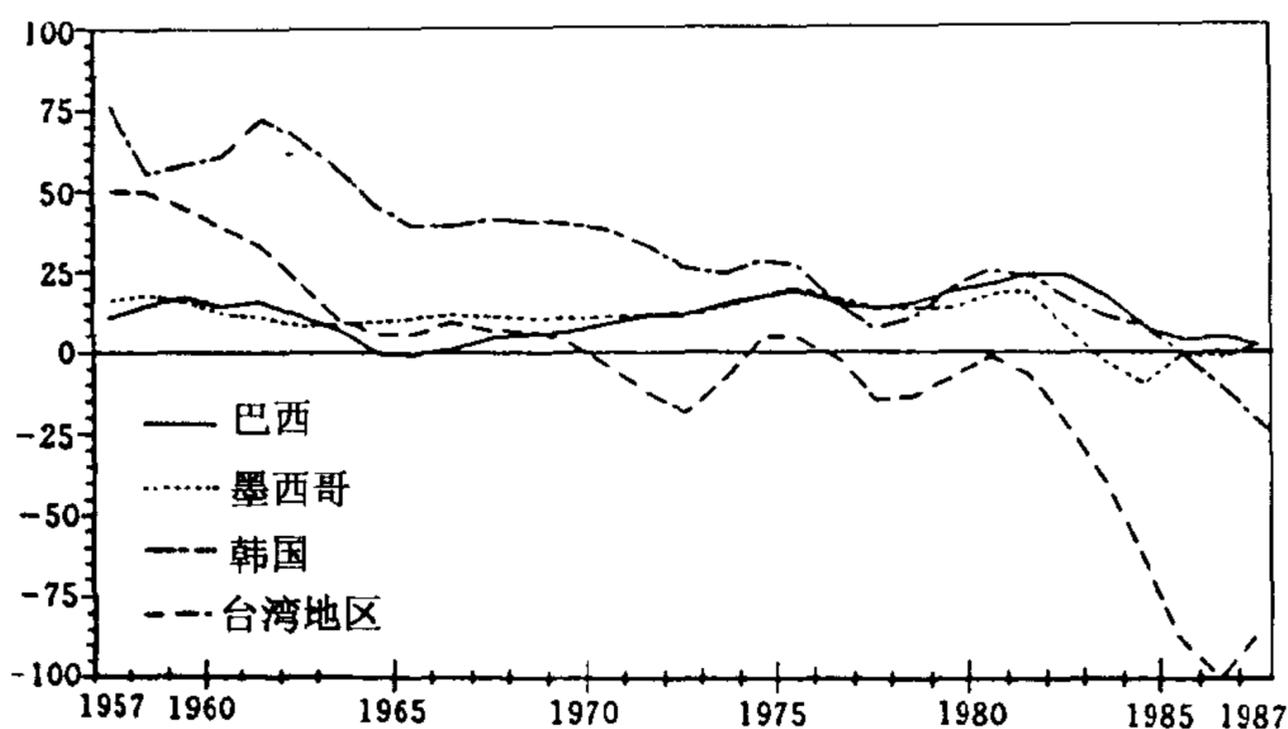


图1 外国资本净值在国(地区)内投资总额的百分率

[1957—1987年(三年流动平均数)]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统计》;《台湾地区统计资料》。

因为我们主要关心长时期的趋势而不是年度的波动,三年为单位的流动平均数要比年度资料统计更为合适。五年流动平均数要比三年的数字更可取,但那样的话,就可能忽略更多的数据。

资比率较高,1956—1960年外资投入平均占国内投资总额的55%。然而,后来外资在这两个东亚国家(地区)的重要性就呈现急骤下降的趋势。相反,巴西和墨西哥一开始外资的比率低,还不到14%。然而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外资的流入在国内投资总额中的百分率逐渐地呈现增长的趋势。

从70年代中期到1982年末国际债务危机的爆发,韩国、巴西和墨西哥外资流入的总量都占国内投资总额的20%—25%左右,而台湾地区则保持自70年代初开始的资本输出的势头(在图1表现为负百分率)。债务危机之后,墨西哥也开始(不自愿地)成为资本输出国,巴西的外资流入量也急骤下降。韩国在1986年由于大量商品过剩轻易地超过利润汇人和利息支付,导致了往来账户的过剩,于是开始效法中国台湾地区的模式。与往来账户过剩相对应的自然是净资本的输出现或储备的积累。

审视了外资在四国(地区)的不同重要性后,我们就可以转而

观察外资来源成分的异同。图2和表1显示了双边公共部门贷款、多边贷款、私人银行贷款和国(地区)外直接投资这四种类型长期资本的大体分类。<sup>①</sup>图2概括了自1961年至1986年的统计资料,而表1则提供了以五年为一阶段的分类数字,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极大的差异。这样就又有可能是辨别拉美和远东模式,但也不应把这种两分法看得太绝对。有趣的是,跨地域的相似性和地域内的差异性都会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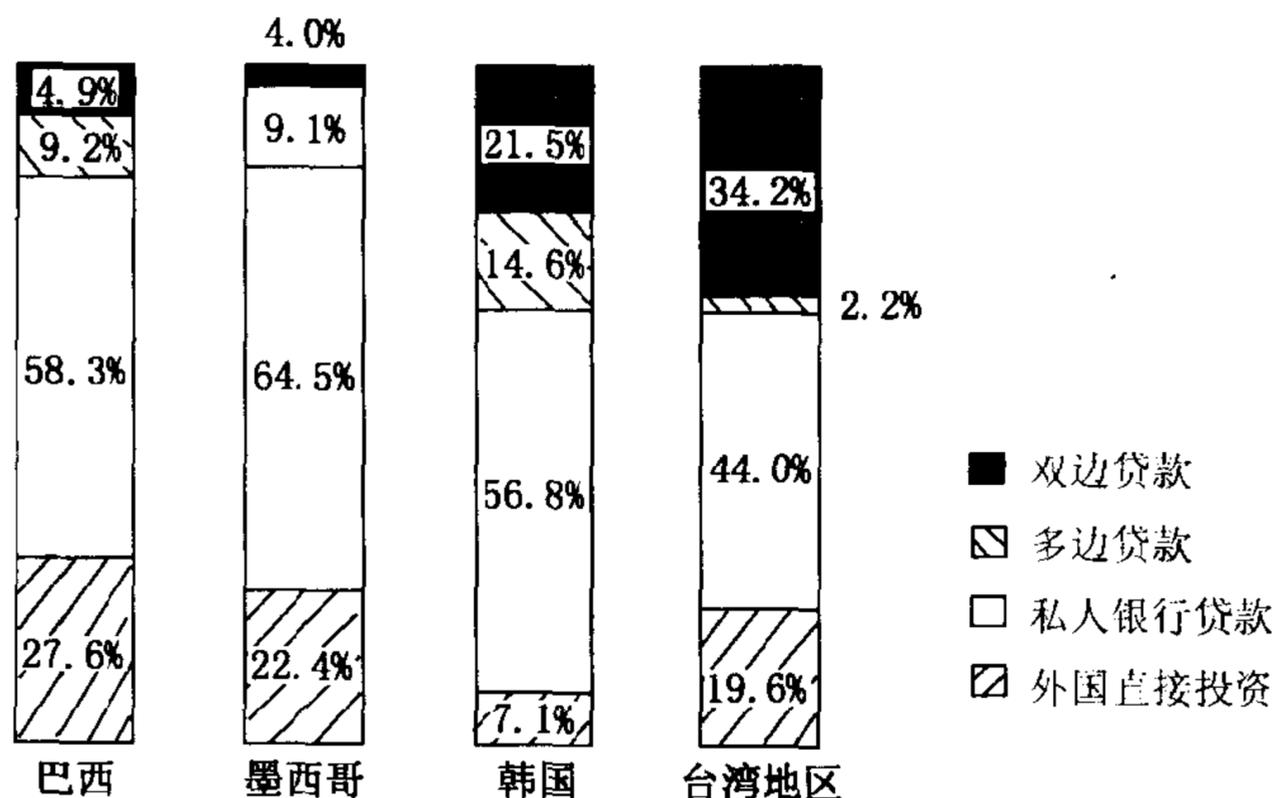


图2 净外国资本的长期类型  
(1961—1986年)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统计》;《台湾地区统计资料》

百分比反映了1961—1986年外资总额的分配,例外的是台湾地区的数据为1961—1983年,因为1984—1986年的偿还模式会大大搅乱百分比。

拉美的外资成分偏重于私有部门的资金,尤其是外国直接投

<sup>①</sup> 在世界银行的《世界债务表》出版以前,这些资料是大致相近的。《世界债务表》从1967年开始发表资料,但世界银行认为,1970年以前的数字不能与此后数字相比。美洲开发银行曾为拉美国家计算过自1961年以来的一系列数据,本章利用了其1961—1969年的资料。有关东亚地区,在此利用了一些综合性的国家(地区)资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年鉴》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流入发展中国家外资的地域分配》。这些数字很可能也包括某些援助款项。

表1 四国(地区)长期净外国资本的类型  
(1961—1986年)

时 期 起迄年份	双边 %	多边 %	私人银行 %	外国直接投资 (%)	平均总额 (百万美元)
巴 西					
1961—1965	57.1	7.8	-3.2	38.3	316.2
1966—1970	15.1	16.2	29.0	39.6	544.8
1971—1975	5.3	8.1	52.0	34.6	2834.4
1976—1980	3.0	4.4	66.7	25.9	6701.0
1981—1982	5.2	6.1	61.2	27.5	8570.3
1983—1986	2.1	20.2	54.9	23.0	5018.0
墨 西 哥					
1961—1965	7.3	14.3	36.4	42.0	352.8
1966—1970	7.4	16.7	34.1	41.8	555.1
1971—1975	3.0	8.1	66.1	22.8	2064.8
1976—1980	1.7	5.5	72.6	20.2	5469.6
1981—1982	4.1	7.3	70.2	18.3	11160.4
1983—1986	11.9	24.7	33.1	30.2	1857.5
韩 国					
1961—1965	84.0	1.8	12.6	1.6	259.7
1966—1970	39.7	1.7	55.1	3.5	369.7
1971—1975	34.9	14.9	38.7	11.5	854.1
1976—1980	18.1	16.3	60.4	5.2	2026.8
1981—1982	19.6	18.0	59.3	3.1	2748.0
1983—1986	6.0	14.6	67.6	11.8	1783.3
台 湾 地 区					
1961—1965	77.8	0.5	8.9	12.8	98.1
1966—1970	23.7	11.1	39.4	25.8	138.0
1971—1975	35.6	16.2	30.2	18.0	287.6
1976—1980	37.9	-3.3	47.2	18.2	581.2
1981—1982	19.1	-3.2	61.3	22.8	757.7
1983—1986	-42.9	-3.6	-97.3	43.8	-580.5

资料来源:《拉美国家的外国资助》;《世界债务表》;《国际收支年鉴》;《流入发展中国家(地区)外资的区域分配》;《韩国经济统计》;《台湾地区统计资料》。

资和私人银行提供的贷款。在巴西,私人资金的流入量占外资总额的86%,在墨西哥占87%。外国直接投资在巴西和墨西哥均占外资总额的1/4左右。可以把公共部门的资金分为双边和多边的来源。在这两个国家,前者占引进外资总量的4%—5%,后者为9%。在巴西和墨西哥,双边资金为非特许的贷款,大多数是从美国进出口银行以及欧洲和日本类似的机构的有担保的出口信贷。

东亚类型非常注重公共部门的基金。在韩国和台湾地区,双边和多边的贷款共占1961—1986年外资流入量1/3以上(36%)。在韩国和台湾地区大部分的公共资金为双边贷款:在韩国,占外资总额的22%,台湾地区为34%。韩国的多边贷款为14%,台湾地区为2%。在60年代有些双边贷款仍是优惠性(“援助”)变种,虽然这比50年代要少。<sup>①</sup>至于私有资本,在东亚的这两个案例中也呈现一些差异。韩国的银行贷款占外资的53%,而台湾地区只有44%。外国直接投资的差异则更为显著。在韩国,外国直接投资占外资总额只有微不足道的7%,而台湾地区则为20%。

下面便是地域内的相似性:在拉美,私人资本集中,银行贷款占主导地位,但外国直接投资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东亚,一般更强调公共资本和贷款(无论是双边的来源或私人银行)。然而,尽管有这些地域差异,两大地域也有相似的地方。在四个案例中有一个相似点,这就是相对来说多边贷款显得微不足道,平均数都低于10%。这与许多非洲国家的情况截然相反;在非洲,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贷款在外资中占主要部分。另一些相似点涉及到三个国家,台湾地区是例外。例如,巴西、墨西哥和韩国半数以上的外资流入

<sup>①</sup> 表1的资料如包括援助款项,那么将会大大增加。美国作为外资提供者和双边贷款来源的作用。从1962年到1976年,尤其是60年代,韩国仍每年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台湾地区每年接受1000万美元。巴西和墨西哥相应的受援款项分别为4000万美元和400万美元。还必须指出,在东亚军事援助是非常重要的。从1962年到1976年,韩国平均每年接受了3.7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台湾地区每年接受1.4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巴西和墨西哥为310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资料来源:《美国海外贷款和资助》,1976年。

形式为私人银行贷款,而台湾地区的私人银行贷款仅占44%。从另一方面比较,台湾地区的双边贷款在外资中占很大的百分比。最后,在四个国家(地区)中,外国直接投资在韩国占很少的比例。

表1提供了有关这些类型的更多的详情。或许,其中最有趣的特征是,在1982年债务危机冲击之前,各种类型有某些趋同的倾向。总的来讲,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私人银行贷款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而外国直接投资和双边贷款的作用却日益减弱。除了韩国以外,多边贷款在这些国家(地区)的作用也变得不那么重要。自1982年以来,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新差异。台湾地区已开始偿还债务,因此只有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仍呈正数。相对来讲,韩国没有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它的外资类型仍保持1982年前的趋势。表格所没有显示的是,韩国在1986年也开始向三种类型的债权人偿还债务。在巴西和墨西哥,1982年以后,私人银行的贷款有所下降,多边贷款则有所增长。在墨西哥、韩国和台湾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有所增长,在巴西却下降,不过只是略有下降。

图3集中反映外国债权人和投资者的国别来源,它说明了总体的差别。由于难以收集比较的资料,只能限于较短的时期(1971—1986年),如果包括更长的时期,最主要的差别是,美国的支配地位就会显得更为突出。<sup>①</sup>主要的地域间差别和地域类型的主要基础牵涉到美国和日本的相对重要性。在东亚的实例中,有双重的外资来源,这反映了美日两国在该地域全面的双重霸权。虽然美国的作用非同小可,但日本足以与之抗衡。事实上,在韩国,日本的资本已超过美国(日本占44%,美国占30%),而在台湾地区,日本资金是美国的3/4(39%和51%)。相反,在拉美两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与美国的优势抗衡。美国资本占墨西哥外资总额的65%,占巴西的41%。这种情况是

---

<sup>①</sup> 直至60年代初期,美国实质上是双边基金的唯一来源。从1953年至1961年,美国政府对四国(地区)以经济援助(贷款和资助款)年平均额如下:韩国为3.22亿美元,台湾地区为1.22亿美元,巴西为3900万美元,墨西哥为500万美元(《美国海外贷款与资助款项》,1976年)。这一时期大部分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来自美国。

与美国在拉美总体上的政治、经济优势相一致的。

尽管地域内有这些相似性——当然，双重霸权问题的重要性在质量上要比数量数字所显示的要大，图3也显示出有趣的跨地域的相似性。例如，墨西哥和台湾地区都特别依赖美国。虽然其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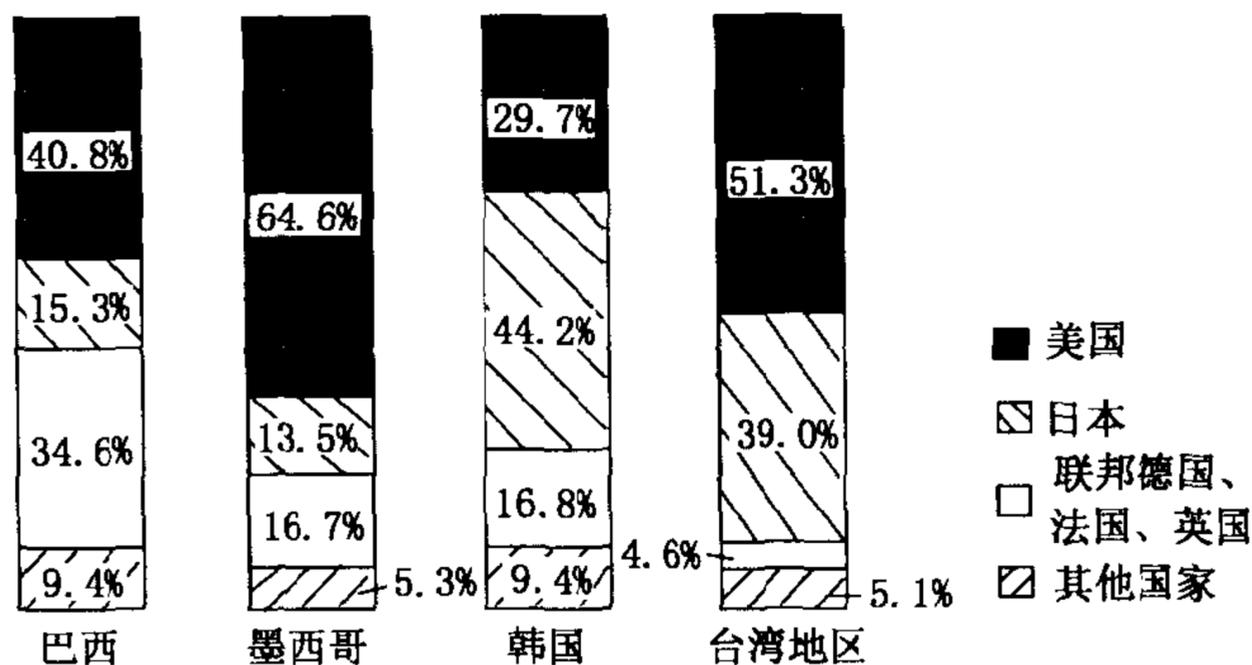


图3 长期净外国资本的来源国别 (1971—1986年)

资料来源：《1973—1988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地区)外资的地域分布》。百分比反映了1978—1988年各提供国在外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

有所不同——墨西哥在地理上靠近美国，台湾地区在国际上处境孤立，在某些方面，墨西哥和台湾之间的相似点大于其同一地域的“伙伴”。巴西和韩国的借贷者和投资者的结构更为多种多样。韩国的多样性基于美国和日本的平衡，但欧洲和其他国家一起几乎占总投资的1/4。需要指出的是多边资金的重要性在韩国也日益增长，这就加剧了它的多样化进程，在巴西，美国资金略少于外资总额的一半，日本和欧洲三国(英国、法国和前联邦德国)占50%。

根据外资在韩国、巴西、墨西哥和中国台湾的特征，可以为前文提到的论点得出如下看法。首先，在韩国和台湾地区，外资的全面重要性已呈下降趋势。虽然外国直接投资仍以适中的速度流入，但事实上，韩国和台湾地区已开始偿还外债。外资下降的趋势实际上已加强了它们摆脱外国经济控制的自主权。在拉美两国，情况恰恰相反，从60年代至80年代，外资的重要性日益增长。1982年以后，

墨西哥外资流入的净值呈负值,巴西的外资流入的净值也极少,这种情况不自觉地支持了那种认为在拉美外资不利于发展的观点。

其次,外资成分的差异至少具有两大含义。一方面,东亚地区较少依赖外国直接投资,而正是这种类型的外资在第三世界国家造成极大的矛盾。另一方面,贷方的多样性使东亚地区具有较优越的偿还条件。东亚大部分的借款来自外国公共部门,与私人借贷者相比,这类贷款利率较低,还期较长。

再次,外国贷方和投资人的国家分布对台湾地区和韩国也有利。美国和日本的双重介入,使东亚地区比拉美(尤其是墨西哥)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由于日本和美国均对东亚有兴趣,它们就可以利用日美的矛盾。巴西和墨西哥也曾效法这种策略,但收效不大。

### 有关外资差异的一些解释

弄清上述差异的缘由十分有助于评价关于外资的两种争论。本节将简要地探讨全面解释的四个方面:(1)1950年至1985年期间有关外资类型的一般供给条件;(2)控制外资者对这四国(地区)作为投资场所的看法;(3)韩国、巴西、墨西哥政府及中国台湾当局对外资的偏好情况;(4)其他可选择的资金来源。

可以通过查阅该时期外资流入所有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情况来估计外资供应的一般条件,不幸,很难找到这些资料。50年代美国是最大的资金输出国,因此表2应用了美国的资料权且代表这一阶段早期的情况。60年代初,欧洲和日本崛起,他们也插足资本输出。同表显示了两种趋势:第一,资金流入总额从1950年的12亿美元猛增到1982年的691亿美元;以(1958年)美元的不变值计算为15亿美元和222亿美元。<sup>①</sup>债务危机之后,急剧下降至1985年的357亿

<sup>①</sup> 1950—1960年期间排除了欧洲和日本,因此这种增长略有夸大,但由于欧洲和日本当时要重建自身的经济,来自这些地区的资金甚少。

美元(相当于1958年的103亿美元)。第二,不同类型的外资的相对重要性变化极大。在50年代和60年代,双边贷款和外国直接投资是外资的主要形式。70年代和80年代初,私人银行占首要的地位。后来的几年里,多边贷款变得比较重要,但从来没有起过主导作用。

第一种解释以总资本流入为依据,这种解释是非常片面的,它仅仅提供了一些公共和私有集团在控制外资来源方面的总的倾向。韩国、巴西、墨西哥和中国台湾无一紧随这种总体的模式。在50年代和60年代,东亚国家(地区)依靠能获得的一种主要来源(双边贷款),拉美则利用另一种形式(外国直接投资)。相反,在70年代,韩国、巴西、墨西哥和中国台湾都跟随了倾向私人银行贷款的总趋势,只是台湾地区不像上述三国那么面广而已。

表2 发展中国家(地区)引进外资的净值  
(1950—1985年)

年 份	双边 %	多边 %	银行 %	外国直接投资 (%)	总 额 (百万美元)
1950 <sup>①</sup>	53.8	9.7	2.7	33.9	1181 (1473) <sup>②</sup>
1955 <sup>①</sup>	51.8	8.3	12.0	27.9	2483 (2732)
1961	31.0	12.2	14.2	42.6	4303 (4114)
1965	35.3	11.3	11.2	42.2	5851 (5276)
1970	30.3	9.0	21.7	39.0	9463 (6999)
1975	23.8	10.6	35.9	29.7	34806 (18514)
1980	19.3	15.9	47.7	17.0	59609 (22367)
1982	15.3	17.3	52.6	14.8	69112 (22240)
1985	13.1	32.0	33.4	21.5	35748 (10305)

资料来源:《当代商务概览》和《世界银行年度报告》(1950—1955年);

《世界债务统计表》和《发展的合作》(1961—1985年)。

[注] ① 仅指美国和世界银行。

② 括号内数字为(1958年)不变值美元。

要弄清楚为什么发生这种脱离总体常规的现象,必须考察资金提供者对个别国家(地区)的观点和外资接受国本身的偏好。就前者而言,双边贷款者——尤其是美国——是适当的起点,在战后初期,那是外资最大的来源。为国家安全起见,美国政府官员乐于向台湾地区和韩国提供大规模的贷款和援助。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打击,台湾地区和韩国没有能力提供它们自己所需的外汇,于是就制订了广泛的援助规划。然而,到60年代初期,台湾地区和韩国在很大程度上已能自立(雅各比,1966年,克鲁格,1979年)。正是在这个时候,通过“进步联盟”对拉美的双边援助势头正旺,巴西是主要受惠国之一。墨西哥利用邻近美国的优势,较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更早地得到私人银行的贷款,这点下面还将论及。至70年代,美国的双边贷款在总体上已逐步结束,由此导致的某些空白被欧洲和日本同类贷款所填补(《流入发展中国家外资的地域分布》,1971—1986年)。

由于在地域上邻近主要投资国和历史传统的因素,在战后初期拉美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看好。自19世纪以来,墨西哥一直尤其是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场所。50年代和60年代的主要变化是投资从矿产、石油和公用事业向工业部门转移(迪亚斯、亚历杭德罗,1970年)。巴西的地理位置使美国的投资者对它较为陌生,但巴西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对投资者吸引力日渐增强。50年代,库比契克政府对外国投资者提供许多优惠政策,从而使外国投资大为增长(斯基德莫尔,1967年;贝尔,1983年)。

亚洲国家(地区)在经济重建和政局稳定之前对外国直接投资者没有多少吸引力。美援的逐步撤走表明已经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从那个时候起,台湾地区开始获得更多外国直接投资,虽然其中大部分来自“华侨”。<sup>①</sup>韩国大致上没有获得多少外国直接投资。对外

---

<sup>①</sup> “海外华人”投资者指不居住在台湾地区的华裔,其中大半来自香港地区。有关海外华人投资的情况可参阅戈尔德(1983年)。

国投资者有关投资障碍的调查说明了外国直接投资过低的一些可能原因。官僚机构办事的种种麻烦和缺乏国内银行的支持(在答复中各占23%)是人们最常提到的问题。接下来是劳动生产率低(17%);国内市场狭小(16%);次要障碍是政局不稳定(9%);社会基础结构不足(7%);文化与交际困难(5%)。<sup>①</sup>外国直接投资在韩国的低水平,也是韩国政府的偏好所致。我们将在后面探讨这个问题。

多边机构在借贷国之间的差异并不像其他形式的外资来源那么大,因为它们受命的任务是向所有的成员国提供资金。但是,那些善于制订周密计划的国家(地区)最有可能从多边机构得到大笔的资金。这一标准适用于在此讨论的韩国、巴西、墨西哥和中国台湾。其中三国——韩国、巴西和墨西哥确实获得了远远大于其人口所能期望的份额。韩国1985年从世界银行得到的贷款份额是其人口份额的4倍,墨西哥为2.8倍,巴西为2.5倍。<sup>②</sup>相反,由于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多边贷款机构中的地位,台湾地区自70年代后期以来没有获得任何多边贷款。加上台湾地区要偿还早期的贷款,因此其多边资金的流入呈负增长。

私人银行一旦开始向第三世界大规模地输出资本,台湾地区、韩国、巴西和墨西哥就成为主要的借贷者,因为正是这些新兴工业地区,对银行最有吸引力。总的来讲,在70年代初之前,私人银行尚未成为主要的贷方,但墨西哥是个例外。早在60年代中期墨西哥就开始从美国的银行获得大量的贷款(格林,1976年)。巴西和韩国在70年代初起而效法。1982年债务危机开始时,这三国就占有私人银行在第三世界贷款总额的41%(根据《1986年世界债务统计》计算)。台湾地区的贷款额较低是因为政府的倾向和选择而不是私人银行不愿借出。台湾地区大部分投资需求能通过不断增长的贸易

<sup>①</sup> 考察的资料见调查的报告(1983年)。1980年进行的该项考察包括了总部在日本、美国和韩国的521个公司的情况。没有提供每个国家的百分比。

<sup>②</sup> 数字是根据《世界银行1986年年度报告》。这些不包括最近成为世界银行成员的中国,因为如包括中国的话会大大影响统计的结果。

顺差满足。人们认为这样做比借贷和将来承担还债义务更为可取。

谈到韩国、巴西和墨西哥政府及中国台湾当局的倾向性,可以对供应学派的解释作些附加的补充。在总体上,四个国家(地区)似乎要求尽可能多的外资。1970年以后,台湾地区开始输出资本,成了一个例外。韩国似乎也正朝这个方向行动。差别在于外资不同的类型和外资如何适应不同的发展战略。在下一节中将用较大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在此先作些简短的介绍将是有益的。由于公共和私有部门的分工对外资的类型有影响,我们的总体考虑是,作为增长与积累的原动力来说,公共部门比私有部门更为重要。

因为大多数贷款是贷给政府的,所以任何类型的贷款——双边的、多边的和私人的——均与公共部门控制的发展战略有特殊的关系。相反,外国直接投资适合私有部门占主导这一状况。<sup>①</sup>这样,从战后初期开始,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中政府(当局)强大的作用就意味着贷款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不论是进口替代还是出口推进占支配地位。在50和60年代期间,拉美十分重视私有部门,这就使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大增。70年代巴西和墨西哥政府不断扩大的经济活动增加了对贷款的需求,这次来源是私人银行。

最后,还需考虑资本的其他来源。表3提供的资料可比较韩国、巴西、墨西哥和中国台湾在动员地区和国内资金方面的能力。<sup>②</sup>最后一栏表明了国(地区)内储蓄总额与国(地区)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如果我们根据1956年至1986年整个阶段简单的未加权平均数先来分析这些数据,就可以发现拉美两国的储蓄比率相差不多,巴

---

① 由于合作投资和政府(当局)能将借来的钱再转借给私营部门,因此区别实际上就不是很明显的了。后者在韩国尤其重要,因为政府与私营的大企业关系十分密切。

② 自然,国(地区)内纯储蓄是贸易平衡中反面的一方,这能从基本的经济性质  $(G - T) + (I - S) = (M - X)$  中看出,  $G$  代表政府(当局)开支,  $T$  代表税收,  $I$  代表投资,  $S$  代表储蓄,  $M$  代表进口,  $X$  代表出口。可见,国(地区)内储蓄(公共的和私有的)的盈余可以通过贸易顺差反映出来,从原则上讲,贸易顺差将使外资成为不必要的。但实际上还有其他因素使人们追求外资,如改变国(地区)内资本的成熟结构,或通过这个途径获取技术。

西为18.8%，墨西哥是18.5%。韩国的平均数略低为17.9%，而台湾地区则高很多，为23.8%。要更精确地探讨这个问题，就得察看逐年比率变化。韩国、巴西、墨西哥和中国台湾在表中所列的30年内储蓄比率均有所增长，这是不奇怪的。而且，它们在70年代都达到顶峰，然而又下降到某种程度。巴西的比率在70年代初达到顶峰，为25%，到80年代初又下降至16%。台湾地区和韩国及墨西哥的储蓄率在70年代后5年达到高峰；墨西哥为23%，韩国为26%，台湾地区为34%。到80年代初均有所下降，但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储蓄又超过了先前的水平。最后，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最近阶段储蓄的状况。近10年的情况表明拉美和东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1976年到1980年，巴西的储蓄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为18%，墨西哥为22%，而韩国为26%，台湾地区为34%。

从表3的第一栏数字可以看出国内储蓄在支持投资方面的作用有相似的类型。从1956年至1986年的平均数来看，拉美两国的国内储蓄占投资的89%（余额来自国外的储蓄）。韩国很低，仅占65%，台湾地区很高，为102%。集中考察最近十年的情况，就使韩国处于较优越的地位，但墨西哥继续保持较高的比率。从某种意义上看，后者是因为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投资的比例不同，在80年代，墨西哥的份额在大幅度下降，韩国的情况却正好相反。

在韩国、巴西、墨西哥和中国台湾，私有部门提供了地区或国内储蓄的大部分。通常为65%—70%的范围。台湾地区尤其成功地促进了家庭储蓄，虽然公司储蓄也很重要。人们认为台湾地区有些潜在的特性促使它鼓励家庭储蓄；缺乏广泛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年度红利的支付、购房需支付大额定金、普遍重视昂贵的高等教育等等。而且，台湾地区实施高利率的政策，这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不同，它们经常会出现负利率。韩国具有与台湾地区相同的结构特征，在某些阶段，它也实行相同的高利率政策（西托夫斯基，1985年；韦德，1985年）。墨西哥鼓励家庭储蓄的尝试集中于认可美元储蓄（指1982年银行国有化之前，当时将美元兑成比索是

表3 国(地区)内外储蓄的作用  
(1956—1986年,百分率)

时 期 起迄年份	国(地区)内总投资额					国(地区)内 总储蓄 ÷ GDP
	国(地区) 内储蓄	公共 储蓄	私人 储蓄	外国 储蓄		
巴 西 <sup>①</sup>						
1956—1960	86.7			13.3		13.5
1961—1965	97.2			2.8		16.9
1966—1970	94.9	(21.2)	(73.7)	5.1		21.9
1971—1975	83.5	(17.0)	(66.5)	16.5		24.6
1976—1980	82.9	(10.8)	(72.1)	17.1		20.1
1981—1982	75.0	(3.2)	(71.8)	25.0		15.9
1983—1986	92.7			7.3		16.5
墨 西 哥						
1956—1960	85.6	(21.6)	(64.0)	14.4		13.5
1961—1965	90.4	(22.8)	(67.6)	9.6		16.2
1966—1970	87.7	(24.2)	(63.5)	12.3		18.2
1971—1975	84.1	(8.6)	(75.5)	15.9		18.7
1976—1980	84.6			15.4		23.1
1981—1982	80.3			19.7		20.6
1983—1986	106.1			-6.1		20.9
韩 国 <sup>②</sup>						
1956—1960	34.8	(-21.7)	(43.5)	65.2		4.2
1961—1965	45.8	(0.0)	(33.3)	54.2		6.4
1966—1970	61.0	(19.5)	(37.7)	39.0		17.4
1971—1975	69.1	(9.3)	(60.3)	30.9		19.0
1976—1980	82.9	(18.3)	(64.5)	17.1		25.9
1981—1982	79.4	(22.6)	(56.9)	20.6		22.4
1983—1986	98.1	(23.5)	(74.6)	1.9		29.1
台 湾 地 区						
1956—1960	54.5	(9.0)	(45.5)	45.5		9.1
1961—1965	85.7	(14.3)	(71.4)	14.3		16.2
1966—1970	96.2	(32.1)	(64.1)	3.8		23.8
1971—1975	97.7	(33.7)	(64.0)	2.3		30.7
1976—1980	106.1	(40.9)	(65.2)	-6.1		33.6
1981—1982	112.1	(40.5)	(71.6)	-12.1		31.1
1983—1986	181.0	(56.6)	(124.4)	-81.0		35.2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统计》;《韩国经济统计年鉴》;《台湾地区统计资料》;《巴西经济及其前景》;菲茨杰拉德(1977年)。

[注] ① 公共企业包括在私人储蓄之中。

② 因为统计上的差异没有增加数字。

银行国有化的部分内容),而巴西的主要发明则是以指数化对付传统的高通货膨胀率(马克斯菲尔德,1986年)。然而,拉美两国在鼓励储蓄方面均没有东亚成功。

国(地区)内储蓄的其他成分是公共部门的储蓄,它与政府(当局)和公共企业当前的结余相等。韩国在大量的预算赤字的初始阶段之后,政府对国内投资的资助自70年代初以来一直稳步增长。这种增长是以牺牲国外而非私人国内储蓄为代价的。台湾地区也发生过同样的趋势,但当局的份额要比韩国大得多。台湾地区公共和私人的储蓄加在一起足以完全排斥对外国储蓄需求,台湾地区储蓄的累积仅次于日本。在巴西和墨西哥,公共储蓄的趋势与台湾地区和韩国相反,公共储蓄下降,预算赤字上升。墨西哥赤字居高不下有三大原因:不愿意或无法提高传统的低税率;决定用公共企业来补贴私有部门以及在某些时候资助政府自身;公共事业和中央政府开支的增长。1982年后曾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收效不大。巴西在消除中央政府赤字方面进行得较好,但公共企业的赤字则依然如故(马克斯菲尔德,1986年)。<sup>①</sup>

对拉美和东亚外资性质的解释尤其涉及到外资的流入取决于谁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不可能从外资流入台湾地区、韩国、巴西和墨西哥的总体类型作出直接的推断,问题在于供求因素在决定变异上何者更为重要。我们将在下一节深入阐明这个问题,不过可以在此先提出几点看法。

---

<sup>①</sup> 除了本书谈及的几点外,还必须指出国外储蓄的影响常受到资本抽逃的限制。也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资本流入可能为资本流出所抵消,这种资本流出常常是非法的。这样,国外资金无助于国内投资,而只是便利了资金的输往国外,摩根保险信托公司发表的数字(《世界金融市场》,1986年3月)揭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本章所论及的国家(地区)中,以墨西哥在这方面的问题最为严重,估计从1976年到1985年约有530亿美元抽逃,而外资净增值为860亿美元。韩国400亿美元外资中有120亿美元抽逃。巴西在这方面比较成功,“仅仅”损失100亿美元,而得到的新资本则有1000亿美元。台湾地区作为一个纯资金输出地区没有包括在这项研究之中。摩根的数字出入往往很大。关于资金外逃及其程度的不同估计,见坎贝和利维奇(1987年)。

第一,尽管资本流入的整体类型与拉美、东亚四国(地区)的外资流入类型并不完全相合,但前者的任一进程都有机构方面的制约。这就是说,金融机构(包括从事直接投资的公司)必须存在,乐意并具有输出资本的能力,以便第三世界政府从它们那里取得资金。这样的话,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私人银行的贷款就不足取了。同样,在60年代初期以前,多边机构优先考虑的是欧洲的重建而不是第三世界的发展。第二,一国的特定时期的客观条件使它不可能吸引某种形式的外资,尤其是来自私有部门的外资。相反,对公共部门而言,这些客观条件可以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得以克服。如50年代的东亚和1982年后的墨西哥,就发生过这种情况。第三,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就可能日益改变客观条件,开辟新的资金来源。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问题。

### 外资与发展战略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外资与第三世界政府(当局)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考察一些具体的历史资料将是有益的。在本节我们审视发展战略选择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类型。这种选择取决于谁?是政府(当局)、外部组织还是参与者?究竟牵涉到什么机构?我们的论述是以本书导言所论的时间顺序为基点的。由于前面提供的资料仅指战后阶段的状况,在此将重点探讨巴西、墨西哥在50年代中期进口替代工业化(ISI)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移,以及后来在70年代初转向鼓励多样化的出口。韩国和台湾地区在60年代初强调出口导向工业化(EOI),在70年代初期扩展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第二阶段(或为重化工业化),在80年代向第二阶段的出口导向工业化交叉地转移。

根据年代顺序,第一个案例是50年代中期墨西哥和巴西的进口替代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移。根据大多数的分析,在拉美大国中第一阶段进口替代始于30年代,到50年代中期已是强弩之末。

这表明鉴于当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状况,基本消费品的生产者不能再依靠迅速增长的需求了(菲什洛,1972年;维拉里尔,1977年)。杰里菲和埃文斯(1981年)指出,1955年是个转折点,当时朝鲜战争给它们带来的景气已渐趋平缓,国内的许多困难,诸如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问题已困扰着两国的经济,“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迹象均表明必须进行发展战略的改变。巴西和墨西哥的决策上层在这个关键时刻决定;以纵向的(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取代横向的(第一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第39页)。

虽然事情不会像事后那样看得那么清楚,但儒塞利诺·库比契克总统的任职期间确实代表了巴西的一个重大转折。库比契克希望加速巴西的工业化,他所面临的问题是:生产高档精品需要的技术和资金,本地却无法提供。于是,他抛弃了热图利奥·瓦加斯限制外资的政策,鼓励多国公司前来投资。1955年初由财政部颁发的113号指令所起的促进作用最为重要。巴西民族主义者沃纳·贝尔指出,该指令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为机械进口提供特殊便利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957年的关税法令加强了对国内工业的保护,包括在巴西从事生产的外国企业(莱夫,1968年;伯格曼,1970年)。

墨西哥也有同样的进程。1954年比索大贬值之后,阿道夫·鲁伊斯·科蒂内斯总统改变了政策,倾向于努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工业部门。他也提供了特殊的优惠政策。1955年,有关新兴和必需工业的法令允许免除某些税务,其关税总则第十四条规定,基本设备的进口关税可享受补贴,同巴西一样,墨西哥也加强保护建在当地的工业(维拉里尔,1977年;韦纳特,1977年;斯托里,1986年)。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巴西外资在国内投资总额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墨西哥保持原状,但外国直接投资在这个时期达到顶峰(见图1和表1),几乎所有的外资均投入制造业。结果,到1972年,两国最大的300家制造业中的一半为外国公司所控制。在最活跃的部

门,如化学制品、交通设备和其他机器制造业,外国公司的成分更高。国内企业唯有在食品和纺织业才是保险的(纽法默和米勒,1975年)。

可见,在50年代中期,经济的或政治的格局造成了某种要求变革的压力。这本来会导向推进出口,但拉美两国大规模的市场和进口替代工业化企业的低效率却不利于这一选择(考夫曼,本书第五章,以便深入探讨为什么没有采取推进出口的政策)。看起来并不是由外资推动才作出选择,但外资毕竟是发展战略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外国直接投资尤其受到欢迎,因此,有关方面制定了政策将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到目标部门。需要大量的外资来实施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这表明那些被选中的机构、多国公司在拉美两国本来已经很强的政治、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当地资本在总体上无法与之竞争,政府也很能控制外国企业。

根据年代顺序,接下来便是东亚国家(地区)在60年代初转向出口导向工业化(EOI)。在这方面外资的影响或许是最大的;现状的极端性证明这种影响的确是罕见的。人们一般认为,若无美国的援助,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在50年代就难免崩溃。可以举出许多数据来论证这个观点。美援占台湾地区总投资的40%,韩国为80%。同样,优惠资本占韩国进口的70%,台湾地区国际收支赤字的85%(雅各比,1966年;科尔,1980年)。甚至为韩国和台湾地区自主决策辩解的学者也承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援”(哈格德和郑敦仁,1987年,第87页)。由于大量的美援不可能无限制地继续下去,美国50年代末宣布削减美援的意向。问题是美援停止后韩国和台湾地区从哪里获取所需的外汇。美国援助官员公然鼓吹一种双向的战略:提高出口的作用,从而取代50年代以后一直奉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对私人资本,尤其是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更开放的政策。

若无详尽的历史研究,就难以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一方面,亚洲问题专家布鲁斯·卡明斯(1984年,第27页)直截了当地说:“是

美国决定了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出口导向计划。”<sup>①</sup>另一方面,斯蒂芬·哈格德和郑敦仁(1987年,第111页)则仅仅提到,来自国际开发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智力灵感”。而且,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趋于同一方向。市场狭小,进口替代在早期阶段就会耗尽元气。转向中间工业将需要大量本已不足的外汇,狭小的市场导致许多问题,也会阻碍它们像巴西和墨西哥那样选择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sup>②</sup>

不管美国官员在决定采取出口导向工业化方面的作用如何,必须要有外资来促使其成功,这是很清楚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必须具备四个起码的条件:大量的不熟练工人、适度的技术、相对少量的资本和进入国外市场的能力。东亚显然能提供劳动力,也能提供相当一部分的资金和技术需求(这与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和技术有很大的不同)。外国的公司在联系国际市场和提供资金与技术方面是十分重要的。作为这一特殊格局的结果,外国资本主要有两大形式:其一为直接投资,通常投资于出口加工区,在出口加工区,只要产品是出口的就可享有税收优惠和进口免征关税(格伦沃尔德和弗兰姆,1985年);另一种形式为销售,典型的是通过与国际零售网建立转包关系(夏普斯顿,1975年)。

韩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均为有力的集权制机构,它们用刺激和控制两手结合的办法来与外资打交道。韩国政府控制更为严密,它对贷款比对外国直接投资更为优惠,因为贷款较易控制。1960年颁布的吸引外资法以及附加条款制定了吸引外国贷款的程序和保证。对外国直接投资虽然也提供税收优惠,但在这个阶段并不真正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弗兰克,1975年,第七章;哈格德和文正仁,

---

① 卡明斯的实例是以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爱德华·梅森和牛津经济学家伊恩·利特尔论著中的摘录为依据的。但取自利特尔的摘引往往有曲解,这就削弱了卡明斯的论点。

② 韩国和台湾地区实际上也经历了短暂的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但这方面的挫折成了它们转向出口导向工业化的部分原因。见郑敦仁撰写的本书第六章。

1983年)。而且,韩国对依附美国这个问题十分敏感,1965年与日本关系的正常化使韩国得以在两个最重要的国际伙伴间纵横捭阖(科尔,1980年)。台湾当局更愿意让外国资本参与经济。这些一开始大多通过出口加工区进行,1965年在高雄建立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但是,当局通过拥有关键的上游工业和银行,以及指定投资方向而保持着实质上的控制权(韦德,1984年;戈尔德,1986年;哈格德和郑敦仁,1987年)。韩国政府和台湾当局都运用其权力控制外国的介入,保护地方企业的利益。

根据年代顺序,第三个案例就要谈到拉美在70年代初期转向“鼓励多样化的出口”。与东亚相比,它虽然显得无足轻重,但就拉美本身而言,这一转变非同小可。例如,从1970年到1980年,巴西和墨西哥的年平均出口率各自上升了22%和49%(根据《1984年国际金融统计年鉴》)。在多样化出口的战略中,重点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虽然初级产品的出口仍占较大比重。从1970年到1980年,巴西的工业品(成品和半成品)出口每年增长38%,从原先的出口总量的24%增加到58%(世界银行,1983年)。墨西哥也以同样的速度开始这一进程,并且由于推行“边界工业化计划”而受益,而“边界工业化计划”在某些方面有点类似东亚的出口加工区(格伦沃尔德和弗兰姆,1985年,第四章)。然而,到70年代末,石油在墨西哥的出口中日益占主导地位。1980年,石油占出口总额的75%以上,由于石油生产主导了经济生活,其他产品就萎缩了(昂格尔,1985年;贝克曼,1986年)。

正如50年代中期那样,经济问题尤其是国际收支促使发展战略发生转变。两次石油危机之后,巴西的这些问题更加严重。问题不是多国公司推动出口,而是如何使它们出口更多的商品。杰里菲和埃文斯的报告(1981年,第42页)说,跨国公司在美国和欧洲利润的减少使它们与拉美国家的合作成为可能,但是这忽视了巴西和墨西哥在7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当两国急于获得私人银行贷款而不是外国直接投资时,多国公司的重要性就大

大降低了。据说用这个方法既能得到外资,政府又能更好地控制资金的使用。

有些银行的贷款确实增加了出口,虽然其中大部分用于深化进口替代工业化。弗里登(1985年)提供了有关拉美两国大债户的资料。在墨西哥,除了国家石油公司皮麦克斯(Pemex)外,主要的借贷者是电力局、各钢铁厂、借款给国内工业企业的发展银行和中央政府本身。巴西主要的借贷者是能源公司、石油企业、各钢铁公司、电信、矿产、铁道企业和银行。70年代,墨西哥和巴西政府似乎看到巨大的机遇在于私人银行而不是多国公司。银行急于贷出,双方利益一致,皆大欢喜,因此两国的债务急剧上升。巴西欠私人银行的长期债务从1970年低于10亿美元上升到1982年的400亿美元;墨西哥则从20亿美元上升到440亿美元(《1986年世界债务统计表》)。

对拉美国家来说,不幸的是70年代的机遇成了80年代的恶梦。债务问题日益严重,因为即使再强调出口,其速度仍跟不上贷款利息的增长和分期偿还的款项。到1982年和1983年,墨西哥和巴西先后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外资行为本身是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表1所示,外资急剧下降,尤其是私人银行的贷款最受影响。虽然也安排了新的贷款,同时调整了老贷款的偿还期,但大部分却为现存债务的偿还所抵消。

债务危机导致的结果是恢复了国外参与者——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但也提高了私人银行家和投资者的影响。在拉美两国,这些组织拥有的决策权仅次于战后初期的东亚的情况。有趣的是再度推行了同样的政策;更多的出口,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更积极的姿态。墨西哥政府急于遵循这些劝告,成功地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为出口而特别设计的边界地区组装工厂吸引外资尤为成功,工业品出口重新有所增长,石油出口退居其次,但这只是部分的成果,总体的经济表现仍令人悲观。巴西的情况更糟,那是因为新的文官政府无法保持稳定的路线,工业品出

口停滞,吸引外资的努力碰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的有政治争议的协议或许是必需的,但仍构不成吸引外资的充分条件(欲进一步探讨70年代以来巴西和墨西哥的情况,见维拉里尔所撰本书第十一章)。

最后,我们将论及东亚发展战略的第二次转向——70年代转向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80年代转向第二阶段出口导向工业化。同上面讨论的其他案例一样,这种转变与世界经济中的部分问题是紧密相关的。<sup>①</sup>对东亚而言,70年代的保护主义成了扩大出口的障碍。来自工资低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国家(地区)的竞争也起了阻碍作用。韩国另一个问题是它的出口产品中有很长的一部分是进口来的,从而导致了国际收支的逆差。解决的方法显然在于使那些在60年代初没有工业化的部门进一步工业化。有许多因素使得这样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第一,国内工业品市场已经扩大。第二,进口替代能疏通已经存在的供应“瓶颈”。第三,国防因素使重工业前景可观。第四,某些重工业已为先进的工业国家淘汰,从而创造了新的贸易机会(郑敦仁,本书第八章)。

作为这些双向推动因素的结果,1973年,韩国和台湾地区发起了所谓重化工业化规划。目标工业包括钢铁、石油化工、炼油、造船、机械、电子和水泥(薛绮,本书第十章)。政府(当局)对这些部门再度加以保护,政府(当局)的财力被用于投资。制定了优惠的税收和金融政策,以吸引私有企业参与这个过程,但这个计划十分依赖国外的资本和技术。韩国仍特别倾向于利用外国贷款而不是外国直接投资。结果,它欠银行的长期债务从1970年的不到2亿美元增至1982年的97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台湾地区的债务从3400万美元上升到21亿美元(《世界债务统计表》,1978年,1986年;经济合作和

---

<sup>①</sup> 这个转变当然与拉美战略方向是一致的,或许也暗示了所有新兴工业国(地区)的最终趋同。这种国家(地区)的一个关键特征可能是在国(地区)内出现完全发达的产业结构,同时又有充分的出口收入来支持它。有关认为发展战略可能趋同的相似评论,见杰里菲(1998年)。

发展组织,1986年)。外国直接投资也参与,不过范围较小,并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外国投资者被迫扩大当地的购买,作为吸引国内资本参与的手段。

韩国向重工业化和化学工业化的转型速度很快,但尽管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还是遇到了麻烦。70年代末,技术和财政的特殊问题造成了经济增长缓慢和通货膨胀。1980年,全斗焕新政府对政策作了修正,更重视提高韩国原已十分出色的高新产业部门。同时,开展了一些自由化和私有化,包括放宽对私人投资的规定。台湾地区的重化工业计划更为明智,当局发挥了更大的组织作用,并对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进行投资。对外国企业实行优惠,以优惠外国企业来打破台湾地区日益严重的孤立状态。事实上,有人认为台湾地区寻求外国直接投资旨在得到政治联盟,但生产高精产品也需要外国企业所能提供的技术(哈格德和郑敦仁,1987年)。

1982年后的债务危机对东亚的影响不大,虽然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影响了出口和经济增长。主要的工业国的经济衰退迫使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更为开放,对货币重新估值。这两点在有限的范围内都做到了。有关的一个现象就是台湾地区和韩国都开始偿还外债。台湾地区于1984年开始还债,韩国在对外贸易大幅度顺差时,也于1986年开始支付外债。尤其在韩国,据说还债的动机是减少对外国的依附,而大笔的外债则意味着受人掣肘(巴拉萨和威廉森,1987年,第40页)。

简要地考察外资与发展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深化了前面有关外资和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相对力量的讨论。简而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政府发展战略的选择决定外资的作用,还是外资决定政府的发展战略。

上述四个案例表明发展战略的选择,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来确定所需外资的形式和数量。在最初选择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工业化时,对比尤为鲜明。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需要大规模的长期投资,也就需要提供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刺激以吸引

外资参与。出口导向工业化接受较低程度的外国参与要容易得多,虽然销售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在70年代,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战略要求大量的外资,而银行也急于出借,这样通常就无需特别的优惠政策。差别就在于还债的能力。韩国和台湾地区率先倾向出口,使它们能够控制债务,而拉美两国则碰到了极大的困难。

然而,发展战略与外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外资对战略的选择也有其影响,问题在于要阐明这种影响的性质。作为个人的集合体的外资,在东亚只是在早期才对决策起过主导作用(虽然在拉美这种影响最近有所加强)。一般地说,国际影响的重要性是间接的。第一,国际经济导致的问题促使经济政策和战略的改变。第二,某种类型外资来源的有效性使某些经济战略行得通,而在其他情况下就不会这样。然而,一旦接受外资,尤其是起关键作用的巨额外资,引进外资的政府战略选择总会受到制约。

## 结 论

在结束讨论时,让我们重新考虑本章开始时介绍的两种观点:其一为“现代化—依附论”,它注重外资的影响,另一种观点为:“中央集权—依附论”,它注重经济决策的控制权问题。本章探讨的基本主题是拉美和东亚对待外资有不同的经验,这在文献中已有所反映。两种特定的假设就是外资的重要性在东亚不如在拉美,它对东亚的影响却比拉美更为积极。

对外资相对重要性的探讨导致了某些潜在的互相矛盾的结果。一方面,战后初期,外资在东亚的主导作用是拉美所无法匹敌的。那时,韩国和台湾地区所有的投资实质上均来自外资,而巴西和墨西哥则依靠国内的基金。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却向与过去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前面论及的时期内,拉美对外资的依赖渐渐增大,而外资在东亚作用却急剧下降。在最近几年里,韩国和台湾地区甚至已开始偿还债务。这一下降的趋势增强了东亚政

府(当局)“控制依附”的能力(杰里菲,1989年),也支持了外资的影响是积极的这个观点。

在讨论外资数量的同时,也必须考察一下外资的构成。战后阶段的平均数值表明,私人资本在拉美占主导地位,公共资本在东亚的作用更大。这些平均数很重要,因为它们影响到外资流入后的偿债能力。特别是,公共部门的出借者的条件不像私有部门出借者那么苛刻。查阅一下债务条款就可看出这种影响。例如,在债务危机的前夕,韩国贷款的平均利率为11.3%,而巴西和墨西哥则分别为12.7%和14.5%。韩国贷款的时限也较长。而且,巴西和墨西哥的债务有70%和77%为浮动利率,韩国只有41%,所以在近十年国际利率上涨时,韩国就受到较少的损失(《世界债务统计表,1986年》)。我们没有台湾地区的有关资料,不过台湾地区外债甚少,这个问题也就不太重要了。

外资的构成在长期趋势上比平均数更为重要,它们在两个地域导致了完全不同的推动力。在50年代和60年代,拉美外资的主要来源是外国直接投资。根据投资的条件,投资者对资产拥有直接控制权。这种控制,一旦与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中外国投资的特别关键作用相结合时,就意味着:相对政府(当局)和地方资本而言,外国资本家拥有更大的经济甚至政治权力。虽然巴西和墨西哥政府试图约束外国投资者的行为,但他们缺乏对投资和国际收支政策实施关键决定的能力。小规模的地方企业如要与庞大的多国公司竞争更是困难重重。

在同一时期,韩国和台湾地区外资的主要来源是美国的双边援助。这笔钱直接到两个当局手中,用来加强它们自身的力量。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和韩国的李承晚以及后来的军人政权从一开始就是高度集权的,通过它们引入的外资强化了这个特征。起先,外资投入初级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后来转入初级推进出口。因为美援开始减少,伴随出口推进的是更多地对外国私有资本开放,但初级推进出口对外资的需求有限,因此政府(当局)能够维持其控

制权,鼓励和保护地方企业。

70年代出现的国际金融市场货币过剩使台湾地区、韩国、巴西和墨西哥都向往这新的外资来源。在每一个案例中,私人银行贷款都是主要的外资来源,但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新发展却是不相同的。一方面,不同的政府(当局)控制外资的能力不同。这包括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避免资金外逃、将贷款限定在可行的数额之内。就控制外资的能力而言,台湾地区最强,墨西哥最差,韩国和巴西介于两者之间。大量的“超额债务”曾发生在巴西和墨西哥,也可能在韩国发生。三国都开始上大项目,但结果成效可疑。资本外逃在墨西哥尤为严重,但在巴西和韩国也发生过这种事。另一方面,偿还贷款的能力也各不相同。东亚地域高水平的出口收入意味着偿债并非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一旦国际条件不利,拉美对进口替代的过分强调就会使它更难还债。偿债率也各不相同。1982年,偿债占出口收益的份额,台湾地区为5.9%,韩国为13.1%,墨西哥为33.9%,巴西为43%(《世界债务统计表,1988年》;经济和合作发展组织,1986年)。

1982年后两大地域的状况对外资不同的历史轨迹提供了戏剧性的结局。东亚经济继续迅速发展,在许多部门将能同先进工业国抗衡。相比之下,拉美则陷入了战后经济衰退的深渊,也不知它什么时候、怎样才能复兴。尽管表现不同,对待外资时的情况似乎是相同的。巴西、墨西哥和韩国似乎都效法台湾地区,追求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以此来结束对外资的需求。<sup>①</sup>然而,表面的相似具有极大的欺骗性。韩国确实走上了台湾地区那样的国际收支平衡的道路,但巴西和墨西哥对外资依赖程度的减少却不是自愿的选择。两国都被迫积累大量的过剩商品以便继续偿还至少是部分的

---

<sup>①</sup> 国际收支赤字不是寻求外资的唯一原因。获取国外技术和进入国际市场是台湾地区和韩国寻求外资的其他因素。确实,有些证据表明在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外资的重要性正在增强——尽管国际收支顺差——因为他们正转向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哈格德和郑敦仁,1987年)。

债务,资金流入的下降是它们经济、政治问题成堆的重要原因。总的说来,过去的8年对台湾地区和韩国是基本有利的(它们迅速发展,开始摆脱从前的那种经济依附关系),而这个时期对巴西和墨西哥却极为不利(它们陷入了衰退的泥沼,目睹了2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外国干预内政)。

东亚对外资需求的减少和控制外资能力的增强,使东亚问题专家对外资的作用的看法比拉美同行更为积极,东亚不同于拉美的长期趋势为他们的看法提供了一整套客观理由(当然,极端乐观将是不明智的)。了解不同经验的关键集中在东道国的自主权问题,这个问题也牵涉到我们所论及的两种观点。直接投资、私人银行贷款或公共部门的信贷,无论什么形式,外资的目的在于提高投资者的利润。东道国的发展充其量不过是个幸运的意外结果,而且只有当东道国拥有足够的自主权和控制权,能保证投资者和受贷者分享利润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在掌握控制权方面,台湾地区和韩国比巴西和墨西哥更为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们包括历史结构的变量,如殖民遗产,国(地区)内政治权力关系,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动员国(地区)内储蓄,促进地方资本,有选择地应用和控制外资,确定发展战略的顺序,这些对政策选择也很重要。

对外资作用的理论有兴趣的学者和决策者的智囊们必须将这些历史的、结构性的特征作为分析研究的中心。如认为同样的理论和同样的政策建议都会在两个地域奏效的话,那么,轻者误入歧途,重者将陷入危险。无视这种区别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某些经济学家认为,拉美如只效法东亚,就能解决问题。没人否认拉美可以从东亚吸取教训,但在不同的历史结构状况下,照搬东亚的政策是难以奏效的。总而言之,任何单向的教训都不可能“速见成效”,只有逐步加深理解才能终将有助于拉美和东亚的进步。

(俞新天等 译)

克里斯托弗·埃里森、加里·杰里菲

## 工业发展战略和类型的解析\*

林林总总的国际和国内力量决定了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本章将作出一些结论,阐明工业发展的战略和类型是如何遵循下列因素发展的,即:初始决定因素,历史事件,外部冲击,政治选择,国内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社会中各自的经济思想和文化传统。这些解释不仅提出了我们对于所探讨的一系列跨地域社会工业化过程的理解,而且为发展政治经济学未来的比较研究,指明了新方向。

本书的研究成果可从两个广泛的方面来概括:第一,作者们所运用的各种解释;第二,由各章推演而来的比较概括的范畴。这里,我们的目的是运用以上两个方面,来更为完整地解释我们对于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发展所知道的一切。

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系统地整理本书使用的各种解释性变量。当人们从探讨发展结果在世界体系和国家(地区)这一层面的结构决定因素,转向探讨在机构和文化这些层面通过社会行为者反映更大程度的选择的更为近似的解释因素时,僵化刻板程度也随之降低。我们将从全球条件、主要历史事件和国内决定因素入手,然后转向国(地区)内政治、社会和经济机构及其网络,最后考察与个人行

---

\* 选自 G. 杰里菲和 D. 怀曼主编的《制造奇迹:拉美和东亚工业化的道路》一书。

为最密切的因素,如当前既定的意识形态、价值、信仰和动机。

这主要是探讨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发展战略和类型的一种启发式的框架。解释的最高概括充当影响政府(当局)精英们对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参数或结构“边界条件”。发展战略由若干套系列工业政策组成,它们决定一国与全球经济的关系,并在国(地区)内各工业和各主要社会集团间分配资源。成功的工业政策必然是对各国的机构和文化联系作出了反应,然后发展战略才在国(地区)内扎了根。适合于某一种经济的政策不能照搬到截然不同的经济中去。而国家(地区)的发展战略则影响它的“发展类型”,包括:国家(地区)的主导工业,主导工业内向或外向的程度,以及实施和支持发展的主要经济力量(杰里菲,本书第一章)。

在勾勒出以上解释性的框架之后,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把各章的研究成果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1)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共同的发展类型;(2)在这两个地域之间有所不同但在每一地域内对新兴工业国(地区)基本相同的发展结果;(3)新兴工业国(地区)发展经验的某些方面,它们对某一国(地区)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或者反映了次地域而不是地域间的不同。

我们最广泛的前提是:那些在国际或某国(地区)特有的“初始条件”分析层面起作用的因素,也对解释新兴工业国(地区)广泛的共同性和某些跨区域变异模式最为有用。这些因素为:全球经济趋势,地缘政治联盟,自然资源和国(地区)内市场规模。另一方面,考虑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国(地区)内机构安排和社会结构,应该描绘出反映国家(地区)工业多样性的更为丰富多采的画面,并帮助我们解释在工业化轨迹上次地域变异的观点。

我们将不是机械地陈述这些概括,而是要通过对大量扎实的论证的评论体现出来,这些论证可在各解释层面内部提出,它们将有助于沟通各个解释层面。这种综合将有助于我们就这两个生机勃勃的地域的发展提出历史的和比较的见解。

### 连接宏观和微观的分析层面

本书进行的比较研究,从它能引出有用的概括的角度看,有若干优势:它研究的是“小数量”品种(也就是几个案例而既不是一个也不是许多案例),作者极其熟悉所考察的国家(地区),案例来自同样有限的背景[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分析都是把对重大社会现象的历史说明和探索更广泛的因果解释结合起来。

然而,与宏观社会比较研究相关的许多其他因素,阻碍我们解析目前所知道的发展模式的复杂因果关系(雷京,1987年,第二章)。第一,社会科学家所感兴趣的各种结果不会出于单一的原因。第二,有关大规模变化的因果论证在性质上通常都是综合性的和(或者)并列性的。换言之,产生出特定的结果的是各种条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叉。几种不同情况的结合,可能会产生相同的现象,所以,对于某种感兴趣的结果,可能并无必要和充足的条件。第三,由于背景不同,某一特定原因可能会产生相反的作用。最后,由于案例数量有限和种类不多,我们的分析就必然模糊不清,因为所有的相关变量,不能像在实验室里做简单的试验那样可以衡量和控制。

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选择了把几种解释结合起来的多层面分析框架:(1)引用包容我们的案例的更大单位的特征的解释(如世界经济);(2)引用我们案例的一般特征的解释[如自然资源、政府(当局)的作用、国家(地区)工业结构];(3)引用我们案例的特殊性质的解释(如儒家文化或西班牙文化,或者台湾地区的大陆人和当地人之间的种族冲突)(雷京,1989年)。我们框架中的四个解释层面是;世界体系层面,国家(地区)层面,机构层面和组织层面。层面这样套叠意思是说,外面(或更宏观)的层面决定跟在它后面的层面,有点像中国的套箱。这一框架是等级体系的,因为因果关系的基本方向是,从国际结构到国家(地区)层面的各种条件,再到次

国家(地区)层面的机构和组织,最后到最直接推动个人行为的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等。然而,所有这些层面,都从属于某种程度的选择和变化,并且经常出现由低层到高层的颠倒的因果关系(虽然不明显,而且暂时滞后)[有关解释政府(当局)战略和发展模式的基础同样广泛的工作,见哈格德,1989年;金锡俊,1989年;夏皮罗和泰勒,1989年]。

在我们“层层相套的等级”中,最外面的一层是世界体系。根据沃勒斯坦(1979年)和其他人的观点,我们将世界体系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世界经济和国家(地区)间体系。世界经济对国家(地区)发展结果的影响,通过着重研究四种跨国(地区)经济联系(TNELS)就可以最清楚地看出这四种联系是:外援,外贸,直接外国投资和外国贷款。跨国(地区)经济联系是用来资助国家(地区)发展的主要外部经济来源。获得跨国(地区)经济联系有利于特定的发展战略的实施,而缺少它则会限制国家(地区)决策者的选择。此外,通过跨国(地区)经济联系,把国家(地区)和世界经济连接起来,可以以各种方式,加强或者削弱国(地区)内的机构(杰里菲和怀曼,1989年)。

国家(地区)间体系在分析的全球层面和地域层面影响国家(地区)的发展。国家(地区)间体系的主要方面是特定时期内占优势的霸权的程度。关于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最重要的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内美国升到了霸主的地位,然后出现了向美国霸权挑战的对抗性的政治经济强国(地区)。美国在冷战时期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反应,是形成美国50年代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政策的关键因素,而近来日本和联邦德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及恢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又在过去20年内改变了新兴工业国(地区)的选择。

在国家(地区)层面,某些条件是相对不变的或静态的,如国家(地区)大小,资源状况和地理位置。长期来经济学家一直争辩说,外贸对小国(地区)要比对大国重要得多。拉美新兴工业国(地区)

由于自然资源丰富和国(地区)内市场广阔,拥有若干结构优势,从而使得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切实可行。另一方面,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却自然资源极少,市场相对狭小,因而限制了它们的选择,促使它们转向出口导向工业。此外,国家(地区)在地理上是否毗邻国外市场、海港或者是军事对手,对独立的发展选择也有强烈的影响。国家(地区)层面的其他因素则比较动态,如内部社会结构(如阶级结构和人口),政治体制(如专制的还是民主的),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虽然这些初始条件不能完全决定政策选择和结果,但却象征着决定一国(地区)与国际经济联系的机会和制约。

本书分析了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机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政府(当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第一,作为一个机构,它制定与实施有助于为国家(地区)经济导航的发展战略和具体的经济政策;第二,作为一个复杂的组织,在它管辖下有各个部、公务人员、技术专家、以及政府(当局)企业。政府(当局)自治问题指的是,作为一个组织的政府(当局)的社会基础如何决定或制约它的行动及政策结果。

除政府(当局)机构之外还有其他经济和社会组织,它们是新兴工业国(地区)发展模式的重要决定因素。本书各章已经探讨了地方私人企业、跨国公司和政府(当局)企业对从国家(地区)出口业绩到政府(当局)实施工业化政策的能力等诸多结果的影响。工会及其他大众阶层组织的存在与否,对拉美和东亚发展战略的实施同样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关的社会组织包括家庭、社区组织和以阶级为基础的协会。

最后,我们的解释框架包括一系列超越世界体系、国家(地区)、机构和组织各层面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网络诸方面。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发展道路受到各种历史事件的影响,例如经济萧条、战争、革命、贸易和投资周期、石油冲击和债务危机。每一次这样的事件都要求新兴工业国(地区)进行大调整。然而,各国

工业化轨迹分道扬镳,这反映了世界体系力量的影响,因为它为两个地域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机会和制约。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在战后出现的地缘政治秩序中的不同地位,决定着地域新兴工业国(地区)获得各种类型的外部资源,主要是美援和外国私人投资的机会。

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东亚得益于和美国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依据的是美国决策者的地缘政治设想,他们把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视为潜在的冷战对峙的重要场所(卡明斯,1984年)。世所公认,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在50年代若无巨额美援便不能生存。两者的内部政治分裂以及与朝鲜和日本的共产党人的持续对抗,提供了长期的借口,借以保持40年代和50年代的政治安全状态的基本框架。在6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都采纳了带有反共特点的经济发展的新重商主义思想,并快速扩大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以便积极地促进出口导向工业化(金锡俊,1989年,第70—79页)。由此,美援对东亚的关键影响是加强了韩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相对于企业、劳工、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的力量。

虽然那时韩国和台湾地区作为反对亚洲共产主义的阵地对于美国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但如此巨额的美援不可能无限止持续。当美国援助官员在50年代后期宣布将削减这种外援时,韩国和台湾地区被迫提出了一旦援助中止,它们将从哪里获得所需的外汇的问题。美国政府利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脆弱地位,坚决地说服它们必须在发展方向作两点变更,以此作为继续给予援助的条件:(1)改变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方法,让出口起更大的作用;(2)对海外直接投资更加开放。美国决策者争辩说,以上步骤能使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利用日益扩张的世界经济所提供的机会,包括进入有利可图的美国市场和获得相对廉价的技术转让(斯托林斯,本书第三章)。

诚然,美国的压力并未立即生效;韩国和台湾地区在转向初级出口导向工业化之前,仍未放弃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思想

(郑敦仁,本书第六章)。然而,地域地缘政治问题和美国于50年代和60年代在世界经济和国家(地区)间体系中的霸权作用,清楚地确定了广泛的坐标,东亚的工业政策只能据此而形成。

世界经济和国家(地区)间体系的动力也决定了拉美工业化的道路,尽管形势和结果截然不同。当5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简易”阶段行将就木时,拉美主要国家领导人至少有三种明确的选择:(1)放弃国内工业化的努力,重新全力增加初级产品出口;(2)制定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3)加强进口替代计划(考夫曼,本书第五章)。在拉美案例中,外部经济和政治环境提供了一系列机会和限制,鼓励决策者们选择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

第一,美国决策者们认为,和东亚的情况不同,美洲的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相当稳固,60年代初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把安全和发展援助主要输给较小的拉美国家,认为那里力量薄弱,容易发生农村暴动。由于拉美大国似乎并未受到活跃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很大影响,因此它们也不可能得到像给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那样的巨额美援。然而,在30年代后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美国的安全考虑放在全球冲突上,墨西哥和巴西加强了自由行动的力度(例如墨西哥于1938年没收英国和美国投资者的财产,成为第一个实施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虽然拉美国家一度以初级产品和采掘工业吸收外资,但在50年代,美国的跨国公司日益在拉美制造业部门寻找投资机会。诸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有着相当大的非耐用消费品国内市场的国家,对这些跨国公司尤其有吸引力。

第三,艾森豪威尔政府鼓励在这一地域投资,呼吁拉美国家领导人保证给美国公司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在50年代,这些呼吁得到巴西和墨西哥的赞成发展的官员们的青睐(杰里菲和埃文斯,1981年)。

总之,关于全球经济和国家(地区)间体系对新兴工业国(地区)发展战略的影响,本书有关各章提出三点结论。第一,世界体系

(地区)反应的有效性却不同,所以只有转入国家(地区)和次国家(地区)分析层面才能理解。

社会文化因素尤为重要,它包括最能决定个人行为的因素,如观念,人们通常认为它包括意识形态,但它也指决策者所采用的各种经济模型;又如刺激,它以某种方式决定个人对行动的成本和利益的估算;再如文化价值;以及以血缘、种族和宗教联系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网络影响经济行为(如分包关系或出口网络)以及政治结果(如组织起来支持或反对某种发展战略的社会联盟)。文化在几种不同的分析层面都有作用。在民族特征层面有着文化类型(法哈恩西尔维尔和多尔,本书第十二、十三章);历史事件的遗产影响政治和经济精英的行为(考夫曼、郑敦仁和拉尼斯,本书第五、六和八章);文化也是大众层面上的一个因素(戴约,本书第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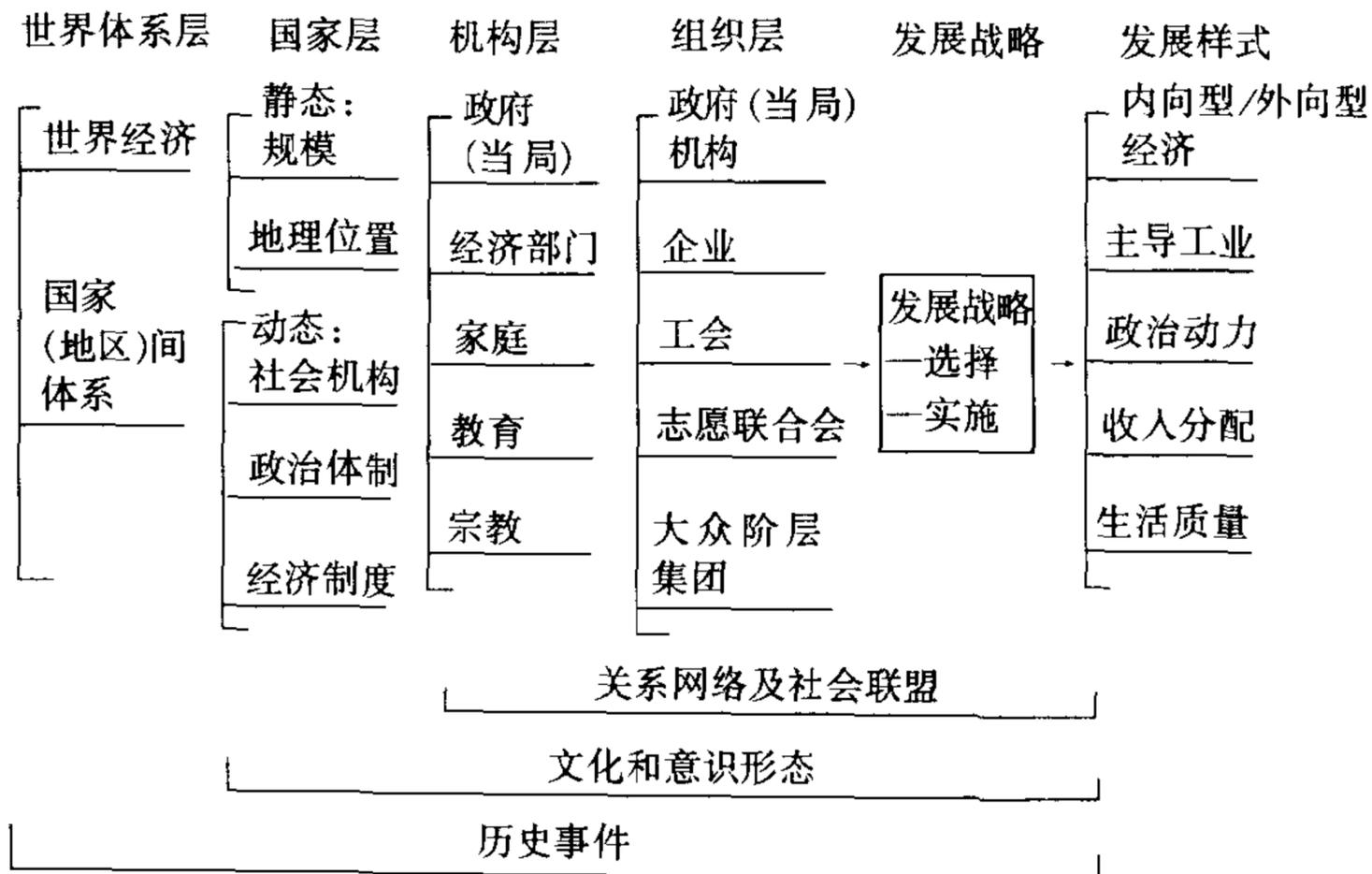


图 1 宏观—微观联系:套叠的等级体系

本章其余部分将运用这一多层面框架来综合本书各位作者的主要结论。我们将阐明,世界体系因素和国家(地区)的特定条件,如

何限制但并不完全决定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决策者的选择。我们侧重说明发展战略的转化或断裂点。这里,区分两个不同过程极为重要:一是工业化的某阶段终止的原因;二是决定随后战略选择的因素。最后我们将强调,一旦发展战略选定,国(地区)内机构、社会联盟、关系网络和文化就决定发展战略逐步实施的方式。

### 世界体系的动力

世界体系分析层面在社会科学中是最具包容性的观点,因为它既包括长期的历史观点,也注意到世界经济和国家(地区)间体系的相互作用(沃勒斯坦,1979年;卡明斯,1989年;阿里吉,1990年)。外部环境影响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工业发展道路的不同方式,仍然是引起激烈争论的题目。本书有几位作者对此问题的复杂性,提出了新见解。

世界体系的动力对新兴工业国(地区)工业化道路的影响可总结如下:这两个地域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最初动力,都是世界体系的深远变化所造成的“紧急形势”的结果,尽管这些紧急形势的性质和时机在拉美和东亚有所不同(哈格德,1989年,第131—133页。)在拉美,30年代的大萧条加速了工业化浪潮。由于出口商品价格太低和缺乏需求,也由于国际贸易紧缩,难于依赖工业国持续供应进口消费品,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再也不是可行的选择了(考夫曼,本书第五章)。

在东亚,外部环境因素也引发了工业发展的浪潮。50年代开始了自主的民族工业化,作为对非殖民化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混乱的反应。整个30年代,台湾地区和韩国都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向日本殖民主义者提供原材料和低级产品。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的胜利,摧毁了这一地域贸易的模式,也使韩国和台湾地区不再能进入有保证的日本市场。

在进口替代“简易”阶段结束后,这两组新兴工业国(地区)的

因素对迫使经济决策者考虑主要的战略转变极为重要(哈格德, 1989年,第132页)。世界体系的因素通过排斥某些发展机会,可使战略转变几乎不可避免(成了一种“紧急形势”)。虽然全球经济和政治进展会使政策选择的坐标更为狭窄,然而决定新发展战略内容的仍然是国(地区)内的机构和联盟。

第二,我们的分析表明,各新兴工业国(地区)与世界体系的联系性质不同。韩国和台湾地区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结合进世界体系在性质上是政治性的,拉美主要国家和它们不同,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金锡俊,1989年,第72页)。第三,地域结合进世界体系中去的方式的基本差异,使各国(地区)的内部机构的自主性和能力大为不同。美援增强了东亚的政府(当局)对于市民社会的力量,而外国直接投资却削弱了拉美新兴工业国(地区)的政府(当局)。当拉美国家大力推进已得到强化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时,持续进口替代工业化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核心,包括外国投资者,它们在当地的企业合伙人和城市工会,便破坏了政府鼓励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出口的能力,实际上在60年代中期前,它们阻碍了工业政策的任何根本转变。

### 资源状况和国家规模

为什么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在初级进口替代工业化之后,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便分道扬镳呢?经济学家的标准答案认为,各国的初始条件不同,如自然资源状况、人口密度和国家(地区)大小是重要原因。可以这么说,在60年代,东亚国家(地区)由于自然资源贫乏,劳动力充足,国(地区)内市场相对狭小,除了进行出口导向工业化外,别无选择。

相反,拉美国家被认为拥有足够大的潜在市场,加之其初级出口商品种类繁多(矿产品、石油和农产品),可以实行第二阶段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所以如此持久,也因为资源丰

富的经济往往推迟能对工业发展作出政治上困难的选择。因此,拉美新兴工业国在整个60年代取得了可观的增长,部分原因是有了出口收入和初级产品出口税收,当时尽管还存在着一大堆削弱工业竞争力的经济条件,如:超值的兑换率,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非农业部门相对较高的工资,较低的实际利率,以及由于滥发货币而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拉尼斯,本书第八章)。

当然,诸如自然资源状况、劳动力资源、国内市场的大小等因素,对一国(地区)工业发展的前景有很大影响。切纳里等人(1986年)所作的计量经济分析指出,大国(人口在2000万以上)的工业变革的模式较为一致:它们一般都较早开始进口替代工业化,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其制造业占国内总产值的比例比小国(地区)高;然后进一步实行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活动;它们的出口和进口占国内总产值的比例可能不到10%,而小国(地区)可能超过50%。另一方面,小国(地区)经济一般更加开放,更注重专业化的适宜的工业战略,而不是依赖国(地区)内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

然而,这些论证不可强调过分。正如巴拉萨(1981年,第2—3页)所指出的,从市场角度来说,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不能算是真正的小国(地区)。巴西和墨西哥虽然人口多得多,但是收入分配高度不均,低工资和近年来缓慢的增长率,大大缩小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使其水平更接近于较小的亚洲国家(地区),而接近的程度也不是单靠人口数字可以说清的。一般地说,经济政策和国家大小之间的相互关系远不是绝对的。小型开放经济和大型内向国家(地区),都可能奉行从统制主义到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布雷德福,本书第二章)。

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地区)的经验迫使我们重审经济学常识,不仅重新认识国家(地区)规模,而且重新考虑自然资源状况和工业发展之间的联系。应当动态地而非静止地看待一国(地区)自然资源的相对优势(或假设的贫乏)。东亚国家(地区)在生产中间货物,如钢和石化产品方面工作十分出色,为它们自己创造了富于

竞争活力的优势,尽管它们本土缺少铁矿砂和原油。70年代,人们曾批评向重化工业转移耗费能源,进口过多,但它为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80年代品种繁多的制成品出口打下了基础(杰里菲,1989年b)。

相反,资源丰富也可能和资源贫乏一样产生许多问题。资源丰富的国家常会患所谓的“荷兰病”(阿尔特,1987年)。几个拉美国家普遍都有的症状(拉尼斯,本书第八章)是:自然资源财富提高了国内消费水平,有利于进口而不是制成品出口,使服务业的收益大于制造业并导致疯狂的通货膨胀和降低了工业竞争能力。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小国的证据证明了那种认为资源丰富是工业贸易竞争不可逾越的障碍的说法不能成立。如芬兰和瑞典,利用其在森林、矿业和寒带海洋资源方面的相对优势,成为在诸如伐木、造纸机械、硬岩钻探、粉碎设备、破冰船、造纸和纸板等方面技术密集型、具有前向和后向联系工业的世界领袖。北海石油的发现,为挪威的高增长率锦上添花,促进了工业出口的成功。拉美新兴工业国若要进行类似的转变,要从富有自然资源转向技术进步,就需要研究和开发新产品所必需的大量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需要建立能促进上述努力的适当机构。新兴工业国(地区)资本增长的关键之一是达到更高水平的国(地区)内诱发的技术进步(法哈恩西尔维尔,本书第十二章)。

### 发展战略的转变

世界体系的动力和国家(地区)特定因素——如资源状况和国(地区)内市场规模——对国家(地区)发展既提供了机会,又有所限制。然而,世界体系和国家(地区)分析层面,更重要的是确定新兴工业国(地区)所不能走的工业化道路,而不是决定其随后的工业转变的方向。换言之,这些外层结构边界条件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某些发展阶段必须终止,但并未解释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新战

略来取代已无活力的旧战略。为了更详细地考察发展战略,必须深入到机构和文化的分析层面。

发展战略之间的转化提出了三个不同的问题:(1)为什么工业化的某一特定阶段趋于结束?(2)在许多可能的选择中,是什么决定了选择某一发展战略?(3)新发展战略是如何实施和继续的?不同的分析层面适宜于上述不同问题。世界体系的限制(政治和经济冲击)对于理解某一特定战略的终止特别重要。国家(地区)初始条件的具体差异,世界体系层面的机会、政府(当局)和有影响的社会行为者的作用、盛行的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都是决定新战略选择的关键因素。最后,机构和文化的分析层面,对于理解发展战略如何实施和继续,极有意义。

在探讨新兴工业国(地区)发展战略和工业转化的关系之前,必须先澄清“发展战略”的概念(杰里菲,本书第一章)。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全面的经济蓝图或工业发展的整体设计。发展中社会的政府(当局)确实制订和公布此类蓝图(例如五年计划),在某些案例中这些蓝图有助于引导发展过程。然而,此类文件往往是为国际组织和多边借贷机构编制的,因为这些组织和机构是工业发展获得外部资金的潜在来源。

正如绝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决策往往是渐进和重实效的,而非战略性的;是应付眼前危机和短期困境,而非为变化制订长期计划和综合规划。因此,发展战略的概念经常是比较有意义的“第二轮”,也就是决策者对以前的反复试验作出了多少是精确的事后的解释并在这一重建的逻辑基础上,提炼出一般原则和具体经验(多尔,本书第十三章)。本书各章支持渐进的决策和事后作出发展战略的观点,并分析了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四次关键性的工业转化:(1)所有新兴工业国(地区)转向初级进口替代工业化;(2)随后拉美转向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和东亚转向初级出口导向工业化;(3)拉美转向多样化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和东亚转向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重化工业

化);(4)80年代两个地域所转向的发展战略有重大的趋同成分。

### 向初级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转化

直到50年代末,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方才产生这一工业“战略”。这两个地域工业化的最初阶段并非事前政策设计的结果,而是由于世界体系的变化,它使得继续靠经济增长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实际上不再可能。因此,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拉美政府官员最为关心的不是促进进口替代工业化,而是防止国际收支危机,保持公众就业和实现类似的短期目标。同样,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东亚决策者的主要目标并非促进出口导向工业化,而是为了获得购买进口品所需的外汇。

然而,这些应付紧急形势的早期手段立刻就让位于一整套连贯而持久的主动行动,明确地实行推动工业发展进程的目标。50年代,拉美进行了20年的“简易”进口替代工业化,为政府引导的广泛的发展努力奠定了基础。政府内的文武精英就已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主要鼓吹者远早于实业家阶级出现之前(考夫曼,本书第五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经济学说对深化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努力,进一步加以理论化和合法化(赫希曼,1961年)。

### 向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拉美)和初级出口导向工业化(东亚)的转化

50年代中期之后,拉美新兴工业国政府工业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因此通过扩大本国产品,把耐用消费品、中间货物和资本货物包括在内的办法来保证经济增长(贝尔,1972年)。巴西和墨西哥政府为此目的虽然有些游移不定,但还是努力争取外国投资于制造业(杰里菲和埃文斯,1981年)。它们对机械和设备进口实行补贴,以鼓励投资于制造业。这种刺激加上高度的保护主义(关税壁垒和严格控制制造业进口产品),维护了本国精英和为国内市场生产的多国公司的利益。在这种环境下,本国制造业上升,进口品占总消费的比例下降,外国投资增加,两国制造工业

日益为外国所控制。大型外国制造厂在将成为拉美新兴工业国活力的新源泉的工业部门,如汽车、电器设备、化学品和重型机械尤为显眼(纽法默和米勒,1975年;埃文斯和杰里菲,1982年)。

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从应付紧急形势到制定战略的转化也是渐进的,不均衡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由于初级进口替代工业化已成强弩之末,韩国政府和台湾当局首先寻求深化进口替代工业化,但未获成功(郑敦仁,本书第六章),而制造业出口却大获成功尤其在韩国,简直是出乎意料(洪源卓,1979年)。60年代初,韩国经济发展计划者几乎完全集中于扩大初级产品出口,显然不理解韩国有些部门在国际体系中具有未曾料及的相对优势。另一方面,台湾地区从60年代初起,在当局计划文件中便明确地规定了一批值得其干预和促进的工业部门(韦德,本书第九章)。因此,至少就台湾地区而言,把发展战略看作事先精心制作的设计这一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当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看好时,台湾地区(1958—1960年)和韩国(1963—1965年)的官员把早期的“充分出口”的规划,转向系统的“出口导向”战略。虽然它们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具体风格大不相同,但在早期出口导向工业化方面却有一些共同特点:减少进口控制,调整货币,对出口工业提供各种刺激(韦德,1989年,第75—77页)。从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两大点:(1)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政府(当局)一系列前后协调的主动行动都是旨在促进有效的生产和有竞争力的出口;(2)台湾地区和韩国当局领导促进工业增长的方式不同;台湾地区更加依靠公共企业或公共研究和服务组织;而韩国则大力推进规模很大的私人企业(郑敦仁和韦德,本书第六、九章)。

关于东亚政府(当局)的作用,郑敦仁和韦德对某些新古典派经济学家提出的政府(当局)起“跟随”作用的说法提出了疑议,但是有关引导的程度,仍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有的政策体现政府(当局)对某一特定工业部门增长的彻底的引导作用,有的政

策只是诱导有保留的私人企业去拨出一些资源(“以影响力量的对比”),我们应当区分以上两种政策(韦德,1989年,第78页)。把这两种情况称为“大”引导和“小”引导。这为未来的研究提出了重要问题:如果对政府(当局)计划者和企业投资者的意向和动机没有更透彻的了解,那就无法解决政府(当局)引导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向多样化出口导向工业化(拉美)和重化工业化(东亚)的转化**

到70年代初,这两组地域新兴工业国(地区)都面临着分别由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初级出口导向工业化固有的局限所造成的困难(杰里菲,1989年,第598—602页)。墨西哥和巴西发现,它们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在60年代末增大了,通货膨胀更为严重。70年代开始时,台湾地区和韩国面临三方面挑战:从下面,新生的新兴工业国在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过去10年中成功地利用过的许多低工资制造业产品出口工业部门与它们进行竞争;从上面,工业出口品的主要市场(美国和西欧国家)日趋严重的保护主义;从内部,劳动力储备收缩,因此工资上升,这在台湾地区尤为严重,韩国还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政治动乱。

当各新兴工业国(地区)试图用结合其他方法的因素的办法,来解决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初级出口导向工业化的问题时,新的严峻形势造成了相对趋同的工业战略(杰里菲,本书第二章)。拉美新兴工业国采纳促进出口产品多样化的战略,但继续深化进口替代工业化。与商品出口模式不同,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出口产品特别是制造业出口产品的多样化,而不是某一种或几种商品的数量增加。在这一时期它们继续努力进行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特别是在中间货物和资本货物部门(维拉里尔,本书第十一章)。

另一方面,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寻求发展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石化产品和重型机械,其部分动机是防务需要(郑敦仁,本书第六章)。在1973—1979年期间,韩国和台湾地区开展“重化工业化”

(HCI)计划,两个主要目标为:(1)发展国地区内这些部门的生产能力;(2)为将来更多样化的出口产品打下基础。另外,韩国和台湾地区的重化工业化运动都是政府(当局)预先周密计划的结果。韩国在70年代初便开始制订计划,而台湾地区在60年代的计划文件中才首次透露这些抱负(韦德,本书第九章)。用东亚经济计划者所使用的相同语言来说,就意味着这一轮重化工业化,尤其在韩国,完全仿照了日本早期的经验(多尔,本书第十三章)。

### 80年代趋同的因素

在80年代,另有一些力量进一步推进上述国家(地区)在工业化道路上的趋同。1978—1980年的石油价格冲击,国际利率上升,发达工业国保护主义的加剧,以上诸因素一起促使拉美和东亚这四个新兴工业国(地区)将它们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类似的调整。特别是在拉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压力下,这些趋势大为明显,它们规定继续获得贷款的条件是采取一揽子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改革或“结构调整”。

各国(地区)由此而作的政策转变可以描述为是促进稳定化、私有化和国际化的努力(杰里菲和怀曼,1989年)。稳定化的措施是通过常规政策手段,即财政紧缩、货币控制和限制工资增长,来寻求减少通货膨胀。私有化意味着四国(地区)都转向以市场为导向来管理经济。它包括进一步放弃特定部门的任意干预,转为间接的认真的·支持(如刺激研究、开发和人力培训),解除外汇控制,自由进口,限制政府(当局)有企业的作用,减少政府对银行和信贷的影响。国际化指四国(地区)通过取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特别是在服务部门(包括银行、保险、旅馆和零售商店)开放国(地区)内市场的措施。

尽管具有这些共同性,在70和80年代,四个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工业化道路仍然表现出各自明显的特点。正如墨西哥和巴西最近的经验证明,即使广义上相同的政策也可产生出不同的结果。在整个拉美,外汇汇率自由化意味着货币急剧贬值。墨西哥调整的结果

果来源于地理上与美国相邻;设在边界沿线的劳动密集型的马奎拉多拉工厂的制造业产品,其出口直线上升,80年代中期外国直接投资量也上升。与墨西哥不同,巴西得益于扩大耐用消费品(如汽车)、钢、资本货物和武器的出口。次地域的差异反映出,70年代后期巴西在持久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第二阶段作了更为一致和成功的努力(赫希曼,1987年,第19—22页;维拉里尔,本书第十一章)。

### 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实施:机构和社会联盟的作用

虽然在全球层面运作的过程,如世界经济的扩张或地缘政治的重建,促进了各新兴工业国(地区)的战略转变,那么本书各章将指出,国(地区)内机构和利益集团对于选择和实施新战略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不受外国控制的政府,尤其是东亚和拉美的专制政府当局,都负责制订和实施工业战略。这些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大企业经常参与政策的实施,但它们在东亚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可能预示着将来在制定战略计划方面的作用会加强。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的大多数成分,特别是大众阶层集团参与决策的渠道却十分有限。然而,社会联盟仍可能影响战略实施的方式。

#### 政府(当局)

发展战略基本上由不受外国控制的政府制订和实施。虽然各种社会团体,从国(地区)内企业家到大众阶层可以明确表达对政策的偏好,但在工业决策的关键领域,政府(当局)结构在对于社会压力的渗透性和接受性方面是不同的。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政府(当局)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它们往往强大、集中和专制,并且深深介入国家(地区)经济。然而,在政府(当局)的自主权干预经济的方式上却大相径庭,因此形成了地域和次地域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差异。

首先,拉美和东亚的专制政体在历史和结构渊源上截然不同。在60年代战略性危机的背景下,拉美南锥体国家出现了极端排外

的政体(科利尔,1979年)。这些政治危机由于平民统治而发生,此时有组织的劳工是平民政府的主要支柱。但墨西哥的形势不同。因为墨西哥精英之间的妥协模式在历史上就与巴西不同,它没有发生巴西式的有组织劳工政治上加入平民联盟的情况(科利尔,1982年)。革命组织党到处渗透的政治优势直到最近仍然阻止着其他集团的产生。

和拉美反民众的专制不同,东亚的政权从日本殖民者那里继承了大的、集中的官僚机构,美国在50年代的活动,帮助它们加强了控制市民社会各个成分的权力。因此当拉美南锥体专制政权野蛮地镇压先前动员起来的大众阶层组织,以便加强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时(奥唐奈,1973年),东亚政权并没有面对生机勃勃的大众阶层,这样,它们从一开始便是排他性的。

在军队扮演范围更广的社会角色方面,地域之间也截然不同(杰里菲和怀曼,1989年)。在拉美,军队为此作出反应的威胁的性质一般都是内部叛乱,而韩国和台湾地区则担心武力统一。因此,虽然在东亚军队较之在拉美更加深入地渗透到市民社会中,但是,韩国和台湾当局的军队的社会政治作用比在拉美有更大的合法性,因为舆论公认经济发展和社会、动员对国家(地区)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多尔,本书第十三章)。

我们早先曾讲到,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快速工业化重新引发了关于政府(当局)在经济中的作用的思想性很强的辩论(韦德,本书第九章)。有影响的解释者争辩说,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快速工业化发展,主要是由于在60年代初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理顺价格”),以及随后的政府(当局)撤出经济领域(巴拉萨,1981年)。然而本书各章坚决反对缩小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政府(当局)作用的解释。布雷德福(本书第二章)提出的发展战略类型学阐明,政府(当局)干预经济与包括出口导向工业化在内的广泛的政策取向是能够相容的。在本书涉及的每一个拉美和东亚国家(地区),政府(当局)显然都发挥了强大的干预作用。

然而,政府(当局)对发展的主动行动的性质在区域之间甚至在区域内部也都截然不同。在两个东亚国家(地区)中,韩国在出口导向工业化初级和第二阶段,都采用更加集中化的方法(琼斯和萨空,1980年,第四章;郑敦仁,本书第六章)。除了基于进口控制,本国(地区)含量要求,入关限制和严格限制外国投资的部门政策以外,韩国政府还对主导企业直接施加压力(韦德,本书第九章)。由于韩国大企业(集团)具有较高的债务资产净值比率以及政府有能力削减优惠贷款和外汇的分配(韦德,1988年),这些压力一般都奏效。

相反,台湾地区采取了相对分散的方法引导工业,它依靠财政刺激,更广泛地促进轻工业,充分然而又谨慎地管理外资的流向(郑敦仁,本书第六章)。为加快需要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生产的部门的发展所作的努力,一般都由当局经营的企业来参与。这种情况在台湾地区的工业政策中比韩国更为突出。韦德(本书第九章)指出,鉴于台湾地区的主导企业平均规模要小得多,当局经营的企业在实施工业政策中的功能和韩国的大企业集团相当。然而,近来台湾当局努力刺激高技术部门的发展,已经把注意力集中于当局资助的研究和开发机构(薛琦,本书第十章)。

在拉美新兴工业国,政府也起了重要的经济作用。国有企业在拉美比在东亚更为突出,特别集中在关键的投入工业(如钢和石化),自然资源部门(如石油和矿产),以及基础设施和服务部门(如交通运输和通讯)。国有企业在巴西比在墨西哥更具优势(纽法墨和米勒,1975年)。除了直接参与生产之外,政府官僚们偶尔发动联合行动,刺激特定工业部门的当地或外国投资者的兴趣,巴西的计算机工业即是一例(埃文斯,1986年),尽管这种行动十分罕见。总的来说,巴西和墨西哥政府没有能力或意向来制定可以在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看到的那种全面的特殊部门工业政策,再者,巴西和墨西哥政府对诸如扩大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不像它们东亚伙伴那样感兴趣。最后,这两个拉美新兴工业国政府也曾竭力想通过下

面将论及的各种战术来对外国资本发挥作用和施加影响。

### 企业

本章表明,各新兴工业国(地区)主导工业的结构在地域之间和地域内部有四个方面的基本不同点:(1)所有制;(2)部门侧重;(3)规模;(4)相对集中性。工业结构的基本模式使政府(当局)在制订和实施国家(地区)产业战略中面临不同的机会和制约(汉密尔顿等,1987年;杰里菲,本书第四章)。

首先,韩国大企业集团的规模及其在韩国经济中所处的中心地位,使它们对实施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70年代重化工业化的全盛时期,情况更是如此,当时政府的“大推进”方法集中在资本货物、中间投入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上,它依据的就是资本空前地集中在大企业的手中。韩国这些主要工业大集团的家长式统制结构,在关键资源供应和贷款方面依赖于政府,缺少次要的团体来淡化政府和地方经济集团之间的联系,这一切造成了一个被收买的大企业家阶级,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通过适应政府的政策目标来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然而到80年代,政府对大企业集团无可争议的统治已大大削弱,这说明,将来大企业在制定和实施主要的政策选择方面可能会有更大的权力(金银美,1988年)。

相反,台湾地区大量中小型家族企业过分兴盛,使该地区工业战略难以顺利实施。韩国的大企业有一套正式的统制系统,而台湾地区的企业则通过灵活的管理政策而运行,其中心是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汉密尔顿和高承恕,1987年;雷丁,1988年)。由于同家庭关系的扩大和个人生活道路的转变方式等有关的各种原因,台湾地区的家族企业往往走向分裂和扩散,而不是通过扩大原企业的规模来发展。而且国民党内大陆人士占支配地位的掌权人物和以台湾当地人为基础的经济精英之间的种族紧张,往往导致国民党不鼓励发展更大的企业。国民党上层偶尔为了促进规模经济生产也鼓励合并(如汽车工业),但终告失败(韦德,本书第九章)。

台湾地区独特的工业结构使得任何工业战略的实施都大成问

题。大量的台湾地区的企业都陷入复杂的家族网络之中,因而不大可能使企业团结一致支持当局的政策。企业相对较小的规模,也阻碍了与韩国大公司竞争的能力。此外,不像韩国的大公司集团,较小的台湾地区制造商缺乏与大贸易公司的联络渠道,不能将其产品输往有利可图的西方市场。台湾当局使用一系列手段来适应其工业结构所造成的困难:(1)用“渐进法”而不是“大推进”来实现重工业化(郑敦仁,本书第六章)和其他大项目;(2)让当局经营的企业和研究机构发挥比韩国更大的作用(薛琦,本书第十章);(3)和外国大买主建立短期分包合同关系(杰里菲,1989年b;杰里菲和科尔曾尼维茨,1990年)。

在拉美新兴工业国,外国投资者的突出地位对于实施政府的工业战略构成了十分不同的背景。多国企业(MNCS)在资本货物和耐用消费品工业中占据统治地位,这大大地削弱了国内资本对这些部门的重要性。结果,政府官员和多国公司代表经常为怎样更好地协调全球合作目标和国家发展目标而讨价还价,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推进的。

一段时期以来,巴西和墨西哥比较成功地促使多国企业帮助实施国家工业战略,巴西是通过贯彻国内含量和出口要求,而墨西哥则是迫使多国企业和当地企业家组成合资企业。但是,多国企业难得欣然满足拉美政府哪怕有限的要求。当今是国际债务和经济自由化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很可能削弱政府在实施推动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战略中与外国投资者讨价还价的力量。

## 社会联盟

任何发展战略都会得到受益者的支持和遭到受害者的反对。例如,拉美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一贯受到强有力的农业和采矿业精英们的支持,但也引起了新兴的制造业利益集团和劳工组成的以城市为中心的联盟的攻击。这些广泛的社会力量联盟的联

合、瓦解和重组的方式,对于制订和实施产业战略具有重大影响。随着国(地区)内的机构安排,这些不断改变的社会联盟是新兴工业国(地区)工业化道路出现地域和次地域差异的重要根源。

政府(当局)在早期进口替代工业化中的财政支持导致了不同的社会联盟的产生,这有助于解释在工业化战略中随之产生的地域性差异。拉美新兴工业国以丰富的资源补贴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决定培育了一个特别持久的支持政府的社会联盟,包括城市工业家、有组织的劳工、中等和较低收入的消费者和瓜分进口替代工业化好处的公务员(考夫曼,本书第五章)。尽管各国的非精英集团很少直接参与产业战略的制订,但是大众阶层建立的“分配联盟”影响着发展政策的实施,特别在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早期平民政权阶段(戴约,本书第七章)。

50年代中期后,最初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联盟重新组合,外国投资者,本国制造业主和政府,组成了“三边联盟”,与熟练工人和买得起本地生产的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和大电器设备的高收入消费者一起共同支持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埃文斯,1979年)。进口替代工业化联盟的力量每一次都削弱了政府(当局)从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收回利益的意愿和能力,尽管这样做在国际竞争中要付出代价。

如上所述,东亚提供进口替代工业化财政支持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5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给它们带来了大量优惠的外援。外援对于它们未来工业化的联盟基础,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首先,由于政治精英享有分配这些关键资源的专断权力,美国援助加强了这些国家(地区)政府(当局)的权威性(斯托林斯,本书第三章)。其次,在台湾地区和韩国,美国帮助当地的统治者先发制人地解散市民社会中那些本来可能组成社会“分配”联盟的团体,特别是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戴约,1987年;郑敦仁,本书第六章)。美国援助官员迫使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和及早在政治上镇压政治左派,这为政治上顺利地转向50年代末和60年

代初兴起的出口导向工业化铺平了道路。

此外,台湾地区和韩国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政府(当局)和各企业之间的不同关系,造成了后来在初级和第二阶段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形成和实施上的差异。台湾地区国民党干部和当地企业家之间最初的种族政治紧张虽然未公开化,但却一直持续着,国民党对韩国式的大企业集团的潜在政治威胁十分敏感,因此,总是偏向于继续让中小型家族企业扩散,虽然这会给实施工业政策造成困难。

相反,60年代初,朴正熙政府立即迫使韩国企业服从于政府的发展目标,威胁那些不合作的企业家,说要控告他们在殖民地时期和日本人合作,以及后来在50年代李承晚统治下的腐败行为(郑敦仁,本书第六章)。韩国的主要大企业集团及其分包商由于服从政府而得益匪浅,以至直到最近仍既无力量又无意向来与政府的产业战略挑战。

虽然社会联盟能给产业战略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但战略实施的结果也可能损害或超越联盟的基础。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最近的两个事态发展为这一正露头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例。第一,早期经济成功的产物——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以及学生知识分子队伍——越来越不愿接受以剥夺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来换取工业增长(郑敦仁,本书第六章)。不同政见在韩国尤为明显,那里有多种因素使政治形势更加复杂:收入不均加剧,经济表现间或不稳定,对南北统一问题上社会观点对立,以及大企业向政府要求自治权的新迹象。

第二,重工业(如钢、石化和耐用消费品)的扩大可能为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劳工动员提供了新机会(戴约,本书第七章)。早期发展的轻工业制造部门(如纺织品、电子产品)主要雇佣年轻未婚女子,她们都是短期工人,居住在临时女宿舍里。相反,大多数重工业工厂雇佣的男工大多居住在固定的市区工人社区。这种环境便于发展真正的阶级文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和大众机构。另外,重工业的劳动组织也有利于持不同政见的工人之间的交往。

然而,由于以下原因,这些劳工趋势在台湾地区的影响没有韩国那么大。第一,和韩国的大推进方法不同,台湾地区采用“渐进”方法实现重工业化,因而重工业的地位不那么突出(郑敦仁,本书第六章)。第二,台湾地区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不同于韩国,中小企业星罗棋布于岛上,使许多工人得以依靠家庭农业收入来补充工厂工资,它可能也保持了保守的乡土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并阻碍持久的工人社区的形成。第三,台湾地区大多数企业为家族所有,充满家长式习气,这往往加强了工人对于公司的忠诚。最后,国民党最初决定只有雇主才能作为职工年老时获得社会保险的担保人,这就为劳工不活跃和就业稳定提供了理论基础(戴约,本书第七章,1984年)。

总之,目前趋势显示出新兴工业国(地区)内的社会联盟、政府(当局)战略和工业化道路之间动态的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每一种布局都具有自身演进的种子,而发展战略的“成功”则很可能损害原来支持这一战略的社会联盟。由于世界体系进程的变化,以及政府(当局)工业政策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实际上造成了战略的周期性改变。然而,国(地区)内机构和社会联盟所提供的机会和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略转变的特点。

## 关 系 网 络

把全球社会结构整体视为一组在多层相互牵制的网络,会强化关于工业化的研究(蒂利,1984年)。这一网络可能与正式的政治边界相连,也可能不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总论,见伯科威茨和韦尔曼,1988年)。本国(地区)和国际机构内部或之间各种类型的交流网络结构,影响了新兴工业国(地区)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实施。在本书作者和其他人最近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的探讨将突出这类关系网络差异显得特别重要的领域:分包和销售联系,与政策相关的知识的流通,技术转让,人和公共部门之间的人际接触,工人阶

级的动员。

所谓关系网络,指的是一组成员(网的结点),由它们之间一种或多种特定类型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虽然网络分析在发展研究中的主要用途是描绘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间的贸易、援助和借贷方式(斯奈德和基克,1979年;尼梅斯和史密斯,1985年),但是,网之结点也同样很可能是工业企业或个人,如决策者或工人。资源(如材料物资、信息)从一个成员向另一个成员的流动对联系作出界定。这些联系在强度(描绘关系特征的资源数量)、持续性(联系存在的时间长度)和对等性(相互交往的程度)等方面可能有所不同。如果对网络本身进行比较,除了其他特点之外,它们因范围(成员的数量)、密度(成员间通过直接联系建立相互联系的程度)、界限(网络边界内所有联系的比例)和同质性(成员具有的相同属性的程度)而有所不同(霍尔和韦尔曼,1985年,第25—28页)。

全球制造业体系中任何商品的生产与销售,都是不同组合交换关系的结果:从供应商那里获得原材料和其他投入,获得资本来资助企业的运转和扩大,与特定企业分包最终商品或零件的设计和制造,将产品销售和发运到用户(杰里菲和科尔曾尼维茨,1990年)。除了这些商品和资本的交换,生产商和销售商可以参与贸易组织或别的网络,以便获得关于生产技术、市场条件和其他问题的信息。这样的网络可能是部门性的,或者甚至只是为了某个产品(科尔曾尼维茨,即将出版)。这些网络的结构特点的不同,例如其界限和种族同质性,可能在某个特定工业内影响供应、生产和销售的可靠性,也可能增加或削弱生产者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作出反应的灵活性(比奥里和萨贝尔,1984年;拉泽森,1988年)。

本书有些文章认为,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企业分包和销售网络结构的差异,有助于说明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出口导向工业化的不同类型(杰里菲,本书第四章)。简而言之,台湾地区众多的中小型企业进入关系网中,由此向后与供应商、向前与用户有了联系(汉密尔顿和比加特,1988年,第83—85页)。这些商业安排也像企

业日常运行一样,置身于一个复杂的、扩大的家族关系网之中(格林哈尔希,1988年;Wog,1988年)。因此建立在互信互惠基础上的个人联系有助于减少不然就会很严重的不稳定性,并有助于企业决策的灵活性。相反,韩国的大企业集团与小得多的企业建立分包关系,或者把这些小企业作为它纵向一体化进程中的组成部分。虽然尚需更多资料证明这一问题,但是看来韩国的非正式关系网远不如台湾地区重要,因为韩国的政府法规和确定价格的权力控制了許多分包关系。

除了内部分包关系网之外,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企业在销售安排上也有所不同。韩国的企业在政府引导下,通过大贸易公司将产品销往国外,而规模小得多的台湾地区的企业,经常直接与西方批发商和零售商建立分包关系,由他们最终来处理产品(杰里菲和科尔曾尼维茨,1990年)。东亚这两个案例的销售模式与拉美新兴工业国主要的销售模式不同,后者在跨国公司的分公司和子公司之间转让材料和资本(杰里菲,1989年b)。

有好几位作者认为,关注经济发展的正式国际组织的兴起和扩大可能促进了计划者和决策者中“世界政治文化”的增强(托马斯和劳德戴尔,1988年)。随着共同价值体系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若干共识:(1)政府介入某种类型的支持发展的活动的适度性;(2)共同的机构和规划对实现国家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领域的目标的价值。

但是,“政策知识”如何在各机构和各国(地区)内部和互相之间流传(哈格德,1989年,第139—140页)?虽然似乎很清楚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特别是韩国,在制订重化工业计划时吸取了早期日本的经验(多尔,本书第十三章),但是新兴工业国(地区)和其他国家决策者赖以收集这类信息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制仍不清楚。以与发展有关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地域集团(如拉美经济合作委员会)为中心的人际网络,通过会议、出版物、出访团和其他方式,在推动讨论和交流信息方面,可能起了主要作

用(赫希曼,1961年)。

双边接触也很重要。美国在50年代建立的教育和培训计划,被认为有助于使韩国企业和政府机构树立起共同的管理意识(汉密尔顿和比加特,1988年,第82页)。关于计划知识和思想的跨国影响,另外两种形式值得一提:(1)非正式的经济计划使团;(2)多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些国家(地区)更直接地施加压力,迫使其实施预定的一揽子政策改革(维拉里尔,本书第十一章)。

人际关系网能为国家(地区)决策者提供至关重要的知识资本来源,同时也影响国(地区)内机构和社会联盟实施工业战略的能力。有三个简单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第一,在高技术工业如电子和电脑的技术转让中,人际关系可能起了主要作用,因为东亚和拉美在西方公司中工作的雇员经常回来为本国(地区)所属的公共企业或私人企业和研究机构工作。

第二,近来的研究探讨了拉美和东亚的企业与政治精英之间非正式关系网的作用。对日本政府机构的研究发现了以教育机构为中心的帮派和非正式人际关系网。此外,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地位之间有一“旋转门”充当联系,通过上级指定任命(amakudari)系统而正式化,它们对于帮助政府机构具有目的意识并在政策问题,以及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人在非正式场合对工业政策达成的协议上取得共识都极为重要(约翰逊,1982年,第二章)。韩国的企业精英中也存在着广泛的非正式关系网,它缘自家族联系、不同家族的联姻、忠于教育的感情以及地区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徐在铨,1988年)。

第三,不同的发展战略助长了新兴工业国(地区)工人阶级社团结构的差异。在拉美以及最近在韩国,与重工业连结在一起的居住区和工作场所的安排,使以男工为主的长期工人的人际关系更加密切和持久。这种关系网充当信息和社会支持的渠道,为劳工的战斗精神提供了有价值的源泉(戴约,1989年;戴约,本书第七章)。

尽管我们的概括论述仍不深透,但它表明,研究生产、分配和信息网络的结构和决定因素,提供了可取的方法,去揭示新兴工业国(工区)和其他国家工业发展的新类型和新趋势。关系网络的概念,是一种有用的考察手段,但它本身不是理论。把关系网分析的概念和方法与已被确认的观点联系起来,未来的研究必能有效地处理与当代工业化有关的广泛问题。

## 文 化

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快速增长,使人们重新考虑文化在国家(地区)发展中的作用,尽管本书只有间接地涉及这一问题。我们在本节中将列举社会科学文献中有关发展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概念。然后讨论文化类型促成跨地域或地域内不同的发展道路的几个方面。本书和其他最近研究的实例证明,需要重审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

根据约定俗成的观念,“文化”意味着抽象的共同价值观的相对静止的“深层结构”,而价值观在不同背景中影响了个人行为和社会组织。例如,在50年代和60年代占突出地位的分析思路,集中注意发展中社会个人态度和民族“形态个性”的作用(英克尔斯,1983年的评论)。

许多社会科学家吸收了韦伯著作中的精粹,把文化和发展的讨论集中在宗教价值观上。若干作者争辩说,儒家学说比其他传统更有益于经济发展。首先,儒家价值观强调节制、教育、成就和相互的社会义务。其次,儒家强调等级从而鼓励了组织内的和谐、合作和忠诚(卡恩,1979年,第122页)。人们认为,这些特点有利于全国(地区)在高速经济增长问题上达到共识,这点在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表现得很明显。由文化派生的合作能力,使得政治精英、工业领袖、工人和其他公民一致同意一个观点,即对整个社会来说首先是实现经济目标,并且使他们对实现目

标的手段也意见一致(约翰逊,1983年,第610页)。

在拉美,以“伊比利亚一天主教”或西班牙传统为基础的一套不同的文化规范被认为阻碍了该地域的经济发展。根据60年代现代化理论家的观点,拉美传统特点的精英文化,崇尚奢侈,轻视劳工和商业,热衷于有归属的社会利益分配标准,以及其他封建社会典型的价值观(见 J.S.巴伦苏埃拉和 A.巴伦苏埃拉1978年对此观点之评论)。最近的一本新书《不发达是一种思想状态》的作者劳伦斯·哈里森对西班牙传统进行了最强烈的攻击:“在拉美,我们见到从传统的西班牙文化派生的文化类型,它是反民主,反社会,反进步,反企业,并且至少在精英中也是反劳动的”(菲什洛,1989年,第118页)。

关于文化对东亚和拉美发展的影响,大多数论证都碰到以下各种问题。首先,正如文化热的倡导者们所承认的(例如伯杰,1986年),地域在文化上并不是同质的;在东亚尤其如此。例如在台湾地区和韩国,道教和佛教与儒教一样信徒众多。再者,东亚某些国家(地区)如韩国,基督教企业家少数派的力量举足轻重(琼斯和萨空,1980年)。即使在儒家学说占主导的地方,在思想和现实间仍有距离,即信仰和实践之间的距离(派伊,1985年)。

更为重要的是,从高速增长的时代来看,儒家学说和伊比利亚一天主教传统已存在许多世纪,而这两个地域,特别是东亚的经济运作的急剧变化,主要是近几十年的事。虽然最近对儒家学说的论述更加成熟了,但是这些发展对庸俗的文化主义论证还是提出了质疑(Leng,1989年)。

此外,就是现在被认为有利于东亚快速工业化的儒家信仰,过去被西方几代学者批评为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汉密尔顿和高承恕,1987年)。再者,许多关于儒家价值观的老一套见解,可能在经验上无法确证。例如,东亚的工业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现在也不是)(戈登,1985年;福姆和 Bae,1988年),而中国雇员对他们的工作机构也没有密切的认同(西林,1976年)。

Ong 认为文化是“源于历史而出现的不断变化和不完整的含义和实践,都在机构和权力的网络中产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或预先决定的机械地影响个人行为的计划(Ong, 1987年,第2页)。此外,对文化随势而变的特性描述认为,文化是通过机构而传播的。因此,文化虽然强调核心社会价值观,但在价值观和独立于机构以及组织背影的个人行为之间,并无直接关系。

本书作者提供了几个例子,说明关于文化的历史或然观潜在的作用。除了“儒家理论”这一热门话题外,其他文化主题也都涉及发展道路的跨地域变异。

第一,观察家们提请注意,对于国家(地区)机构及官员的态度地域之间有显著的差别(多尔,本书第十三章)。拉美的教育体系比较偏重于身份地位,而东亚早就发展了英才教育制度,这部分说明了为什么东亚的官僚更有威望和广泛的合法性,尤其是民选的政治家。

第二,在国际生产、消费和发展政策中,明显表现出文化效应。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工业政策的实质和语言似乎直接照搬日本文件(多尔,本书第十三章)。此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作为地域强国出现,可能鼓励了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模仿它相对简朴的个人消费方式,而拉美新兴工业国的“现代性橱窗”,则更符合美国所特有的注重消费的生活方式(法哈恩西尔维尔,本书第十二章)。

第三,东亚社会,如韩国和日本,相对的民族同质性,资源缺乏,国土狭小以及军事考虑,这些紧迫形势,在提高民族感情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促使大家一心一意地强调经济增长。在这方面,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与它们的拉美各伙伴极为不同,后者的文化总是更加多样(多尔,本书第十三章)。

文化不仅在若干重要方面引起跨地域的差别,而且也导致地域内出现不同的工业发展道路。例如,有些文章侧重探讨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相对的种族同质性,但在地域内部,同质性的程度是

有差别的,而这种差异也会造成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韩国种族同质性很高,而台湾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却沿着一条错误的种族线分配:大陆过来的国民党掌权人物对当地企业领袖发展非党派力量基地的做法仍心存疑虑(郑敦仁,本书第六章)。因此,国民党一直鼓励中小规模企业的扩散,而不鼓励韩国式的大工业集团。

然而,民族政治的分裂并非影响地域内工业结构差异的唯一文化因素。杰里菲(本书第四章)也强调家庭结构和意识形态对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工业公司的规模和行为有重要意义(汉密尔顿、奥鲁和比加特,1987年)。简而言之,韩国大工业集团内的关系建立在社团家长制原则上,这些公司由一个独裁的个人控制,通过雇员来进行管理。这一经济组织原则有利于在政府和私人企业部门间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与韩国盛行的正规统制体系不同,台湾地区企业的特点是分散管理的形式,它建立在家族联系或个人关系(主要是远亲)基础上,其原则是彼此信任,互相忠诚。家庭结构、管理思想和工业组织方面的文化差异,给政治精英谋求指导工业化过程,既提供了机会,也设置了障碍。

如同上述实例说明,要认真地估价文化争论,必须借助于考察历史和特定机构安排的演进。文化变量之所以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也许是因为它勾勒解决发展问题的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不是因为它决定具体的结果,东亚发展的“教益”之一也许如此,地域增长的机构基础之所以有效,恰恰是因为它们对每一个社会的传统力量作出了灵活的反应。

## 结 论

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工业发展的类型和战略难以描述,更无须谈解释。本书试图将世界上两个截然不同地域的发展专家的专长综合起来,以便超越东亚和拉美的范例,寻求具有全球意义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解释。

以为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工业化道路特点分别是内向和外向的陈词滥调起了极其严重的误导作用。对两个地域新兴工业国(地区)经济动力有实质性意义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的交互作用和协同作用(杰里菲, 1989年 b)。片面强调统一运用某种正统经济政策以促进拉美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复苏, 必定是错误地领会东亚的经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去解释, 为什么某一特定战略的运行有好有坏, 或者为什么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会出现某种发展类型。我们的任务是试图确定适合国(地区)内机构和环境的融合进国际政治经济中去的有效方式。

世界体系的动力和国家(地区)特定的“初始条件”, 给国家(地区)发展设置了结构性限制, 但其阻碍的方式在各国并不相同。70年代的石油冲击对大多数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是限制, 但给墨西哥带来了至少是暂时的实惠。墨西哥和巴西的债务危机成了严重问题, 韩国的情况比较和缓, 而台湾地区却取得巨额国际收支盈余。在60年代和70年代, 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利用国际贸易扩张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远比拉美要大, 而后者在为国(地区)内发展目标而利用多国公司方面遇到的困难要多得多。因此, 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对国家(地区)发展可能产生正面的, 也可能产生负面的结果, 它取决于这些联系是如何及何时建立的, 它们与国(地区)内环境的关键因素是否协调。

人们通常认为自然资源状况和国家(地区)规模大小是相当固定的边界条件, 它影响着内向或外向发展计划的成功。事实上新兴工业国(地区)的经验表明, 在这方面也有相当的机动和选择余地。有好几种方法可以回避自然资源的限制。70年代, 台湾地区和韩国大量进口建立重化工业(如钢和石化产品)所需的原材料, 以便自己大量生产国(地区)内下游工业广泛使用的中间货物和机械。巴西试图以替代品而不是进口来解决石油短缺的问题, 实施了以它盛产的糖来加工制造酒精—汽油混合燃料的大项目。某些结构限

制最终确实起到束缚作用,但是新兴工业国(地区)有许多创造性地和灵活地突破其结构边界条件限制的事例。

就政府(当局)选择和实施成功的发展战略的能力来说,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政府(当局)的作用已成为关键因素。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与日本一样,极其巧妙地树立了一种主导的民族意识,即在动荡不定、潜伏敌意的国际环境中,为了国家(地区)安全,首先必须保证经济增长。这一事实是不容忽视的。而拉美新兴工业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基础就狭隘得多,它们通常主要忧虑的是外国的经济(而不是政治)统治。

在发展比较分析中最易忽视而且令人困惑的是文化。我们倡议把文化概念置于历史和制度的基础上,这有助于解释各种现象:例如新兴工业国(地区)各种不同的民族主义,东亚国家(地区)比拉美国家更强烈赞成高储蓄率的原因,台湾地区为何比韩国更反对通货膨胀的因素。从更广的视野出发,文化变量在使解决国家(地区)发展问题的可行方案可以接受的范围合法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各章体现了当前比较发展研究的水平,应该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渗透到关于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地区)工业化的研究中去。有效的概括依赖利用多层面解释框架,这使我们得以理解成功的发展战略对环境的依赖性,以及在不同地域背景下造成形形色色的发展结果的一般限制和机会。如果忽视世界体系的动力和国家(地区)特定的“初始条件”,那就无法理解国家(地区)发展战略的选择和顺序。同样,战略对各种各样工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是由社会内部机构和文化因素作为中介的。只有将各种层面的解释整合在一起的相互作用框架,才能完成分析在不同的地域背景下当代的发展经历的任务。

(俞新天等 译)



# 第三篇

## 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M.列维

## 现代化的后来者\*

现代化是一个包括众多复杂因素的整体性过程。这些因素都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发生的,而是彼此之间形成一种较为固定的逻辑顺序关系。在早发型现代化中,这种逻辑顺序关系表现出相当的普遍性。但在后发型现代化开始的时候,由于早发型现代化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前者现代化开始时所面对的环境和条件与后者已有相当不同。

“内源发展者”(indigenous developers)和“后来者”(late-comers)是我们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所谓内源发展者,就其在当今社会的发展过程来说,是指其现代化结构是在它本身基础上长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即使在18世纪,国际间的接触和关系就已经形成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涉及的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真正是在其固有基础上完成任何事业的。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美国和法国等社会还是可以看作是现代化的“内源发展者”社会。其他社会是“后来者”社会。当然,德国是一个较早的后来者社会,俄国稍晚,日本更晚,中东一些国家比日本还晚。在许多观点中最具重要意义的后来者是当世界其他地方已经高度发达而它实际上还没有进入现代化过程的国家。

---

\* 选自小马里恩·J.列维的《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6年。

## 一、后来者现代化的条件

任何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必须认识到,维持较高水平现代化的必备条件(requisites)并不一定就是获得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prerequisites)。人们不能简单地通过观察现代化社会来发现最适合提高现代化效率的技术(但是现代化的效率可以据此确定),并且试图直接在非现代化社会中使用这些技术的方式。显然,在分析任何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如果有人能够充分地缩小时间的跨度并对充分描述的细枝末节感兴趣,那么,特定状态下必备条件与前提条件之间不一致的可能性就会逐渐减小直至消失殆尽。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维持较高现代化水平的一些必备条件在特定状态下也可能是获得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忽视完全相同的必备条件和前提条件的可能性很小,而主要的困难在于有可能忽略必要条件和前提条件不同的情况。从非现代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的成员的观点来看,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不是高水平现代化的必备条件的说法也许是一种无意义的绕弯子。在充满感情的意见氛围中,无论这种看法在其他方面显得多么理性,它们仍然极可能陷入反责的窘境(recrimination),因而不得不对付在一种社会背景下一类人的尝试剥夺其他人的尝试的情况,以及重新恢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企图。必备条件和前提条件之间的偏离问题很难够得上是一个纯知识问题。即使在这方面能够获得明显的确实性,它也根本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即这些研究结果,尽管站得住脚,能够毫不费力地转化为可实行的政策命令。而且,即使它们能够转化为可实行的政策,但是在许多观点看来它们常常是不合时宜的。

其次,在一种情况下实现现代化状态的前提条件不一定就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实现这种状态的前提条件。在这个概括中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第一个是后来者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前提条件不一定

就是那些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或多或少在其内部实现这种转变的社会的前提条件。正如下面将要现代化进行的一般讨论所指出的，可以称之为现代化过程的“后来者”的社会在已经提出的关于这个过程的知识方面具有某种明显的优势。但是，它们还是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某些特殊问题。因此，在对今天的一个非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仔细考虑的过程中，假定人们似乎能够简单地把美国、法国、不列颠社会历史上所记载的经验转化为所涉及的这种状况下易行的政策，这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关于前提条件在不同情况下的差别问题的第二种特殊形式是，对于一个后来者来说，它实现较高水平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并不一定就是另一个后来者的前提条件。在日本适用的条件在土耳其就不一定适用。对于后来者来说，由于从外部引进的结构在很一般的方面十分一致，例如对普遍标准的专业化和互相依赖的重视提高了，所以不同情况下的前提条件的差别，其最重要的起源可以在完全理解历史的基础上找到。绝大多数关于向现代化社会体制转变的尝试的分析，其注意的焦点最主要放在这个阶段的早期阶段和稍后阶段。而对于向现代化方向转变开始之前最后的稳定或相对稳定的结构形式所给予的注意较少——除非这种结构形式立即出现在面前。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对于这些旧的结构常常有许多混淆。对先前流行的结构进行彻底认识和分析。对于理解任何情况下的转变过程，或者理解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结果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被这种结构在新生力量面前的脆弱性及其被扫除的速度所掩盖。

维持现代化社会的必备条件不一定就是实现现代化社会的前提条件，在一种情况下实现这种水平的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不一定就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实现这种水平的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与这个假设紧密联系的是另一个更为特殊的概括。一种与作为现代化社会的必备条件的社会结构极为相似的社会结构的出现并不是意味着这样的后来者因此就具有成为现代化社会的优越条件。例如，高

度的社会流动和开放的阶级结构是任何现代化社会的必备条件,然而,一个具有封闭的阶级结构特点的社会与一个在观念上和实际上都存在大量社会流动的社会相比,前者也许是更好的快速转变的基础。某种情况下存在的社会流动也许在细节上与现代化社会所必需的社会流动相似,但是这种结构在非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中所处的位置可能会阻碍快速的转变。<sup>①</sup>

## 二、后来者的优势与劣势

对于任何社会,这里对现代化的一般问题所提出的绝大部分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就所涉及的公共事务来说,现代化最突出的问题是必须致力于或者是后来者现代化结构的实现,或者是稳定的社会现代化形式的维持,而不管这种现代化的形式是内发的还是作为后来者所实现的。当然,与那些可以说是长期或多或少内发地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相比,现代化过程的后来者社会在优势和劣势方面都有重要的变化。

后来者首要的优势主要在于其现代化过程不再是像内源发展者所面临的未开发的领域。后来者面对的是不同的问题——许多问题非常不同——但是由于它们对自身社会的状况与现代化社会状况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有所观察和认识,所以后来者所具有的一些要素观念(*conception of elements*)参与到了这种转变过程之中。第二个优势是,对于后来者来说不可避免地存在借鉴的可能

---

<sup>①</sup> 参看我的论文《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因素之比较》(“*Contrasting Factor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第二卷第三期,1953年10月,第161—197页。根据自这篇文章写成以来所做的研究,我要修改其中包括的许多观点。然而,就我而言我仍然坚持这种论点,即由于日本的特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封闭的社会结构,而传统中国在理论上或在某种程度的实际上的特点是开放的阶级结构,所以,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优势至少部分落在了日本人身上。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论点都能够作为在此提出的这个观点的证据。

性,至少是在制定计划的初步知识、资本积累、新原料和机器,普通技术以及组织的连结结构等方面都具有这种可能性。

第三个优势与此紧密相连,即后来者能够跳跃过内源发展者必经的现代化过程的一些早期阶段。后来者处于能够利用最新发明的地位。这种优势——但是并非必然的,尤其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常常由于避免了最初的商品废弃问题而等同于大量的资本形成。但是,并非不重要的是,能够利用社会结构中的最新发明的优势,即使包括创造能力,也没有被无论是借鉴者还是发明者完全利用。例如,没有一个非现代化国家会对一般学校系统和理所当然的公立学校系统的需要一无所知。

后来者的第四个优势还包括对现代化过程的前景的认识。对实现这些变革最感兴趣的非现代化社会至少可以通过指出他们推动的这些变革的成果前景而获得援助和信心支持。实际上他们不一定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思考,他们身体力行并说服其他社会成员,就协调与控制而言,这种实际优势本来就存在。

第五个优势不仅在于后来者处于能够借鉴其他地方发展出来的要素,当然还在于较现代化的社会也处于借出或给予帮助的地位,如果是这样倾斜的话。当然,这是人们能够在开始就分辨出后来者的事实基础上的一个平庸的演绎推理。但是,不平庸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一些较现代化的社会总是被推动着借出或者给予后来者以帮助。有时这种动机并不采取对后来者有吸引力的计算方式,但是无论是否采取类似的方式,从现代化过程的进展观点来看它确实构成一种优势。

后来者的劣势同样是明显的。首先是规模问题。如果要实现向现代化状态转变的前景,诸如教育设施、交通工具等方面的发展必须相当大规模地创建。而且,即使这种转变将不会是顺利和容易的,这些要素也必须以较大规模的方式试建。内源发展者的发展方式过去之后这些要素按部就班的发展已经不大可能。各种问题——其中政治问题并非最小的——将会妨碍在培训其职业角色

所需要的高等教育水平的专业人员方面对其他社会的绝对依赖。不经过初等和中等教育的逐渐发展,培养这些专业人员所必需的教育设施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非现代化社会在未来必须完成的专业化的或非专业化的任务要获得实现的话,初等和中等教育对于大多数这些社会也是必需的。所有的转变问题不仅需要专家,还需要一般文化水平的普通社会成员。如果这些结构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或多或少地内发地发展的话,一般的教育水平就能够逐步地实现,并在一段时期内集中在必需的专业人员系列上。这对于后来者绝无可能。除了像冰岛社会那样不寻常的情况,非现代化社会的特点是必须尽快克服的高文盲率。

实施规模引发出了诸如资本形成和一般的协调与控制的各种问题。另外,规模问题要求的许多因素而不是规模本身的原因妨碍了在非公共基础上的实施。大众传播媒介可想而知能够在私人投资的基础上建立,但是在私人投资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当的教育体制是非常困难的,建立这种教育体制的费用或者由受教育者交纳,或者由教育成果的使用者提供。这些巨大的需要不可避免地必须进行公共管理,即使这种情况能够以最直接的方式避免,也仍然存在一般的协调与控制问题,并且一些公共组织必须关心这些或其他派生出来的问题。

对于后来者来说第二个特殊问题是社会各个层次和部分的相互依赖问题,在这样的社会中现代化的过程必然导致变革的发生。尽管具有借鉴现代化国家的先例的优势,非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整个图景仍然是清晰的。可以预料,虽然它们能够从已知的这方面获得好处,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其社会科学领域非常薄弱,而且甚至总是缺乏交流。除了这个小小的认知上的不幸所包含的因素,还有一个更敏感的问题。非现代化社会尤其或者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或者将要进入这个过程的时候看到了它们之前的现代化过程的许多不同结果。这些结果在不同程度上吸引着它们,并且几乎不可避免地,普通的领导人、有影响的人物或者一般的社会成员都

迷信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能够在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同时抛弃其余的部分。结果可能是在新老因素中引起爆炸性的相互影响。虽然了解现代化的结果是一个优势,而且虽然这只是一个后来者才具有而内源发展者没有的优势,但是后来者所具有的一个特殊劣势在于它们比内源发展者更可能认为它们知道它们在向何处去。正是其计划和结果之间的差异对于它们来说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破坏。

许多相互依赖的关系已经广为人知。关系诸方面中不同重点的转换,传统家庭结构的崩溃,主要以教育为取向的组织的发展,以及一般组织的科层形式等等,对于任何一个阅读此领域中不断增长的文献的人来说,这些都是非常熟悉的例子。在这些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点是一般的相互依赖本身这个事实。还有必要强调的事实是,必须认识到从现代化社会的社会结构中能够轻易进行独立选择的神话本身,是或者已经是——期望的情感与虔诚的情感的混合物。必要的是思想不被诸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等概念所限制。这些词语指的是一些现代化社会以及一些非现代化社会结构中的十分重要的差别。在所有这些社会中只有资本主义是或多或少内发地实现现代化的。这也是实际的情况。但是,在这些发展的现阶段,可以很容易地说,所形成的这些差别或者陈词滥调(不管我们偏爱这一种还是另一种)并不涉及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的战略要素或者非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一般组织自给水平的适当降低,特定组织高度专业化取向的增长,职业角色专业化的扩展,专业角色的发展以及类似的因素比私有制和公有制更能使我们深入到社会结构这个基本问题之中。事实上,就高度的现代化而言,这些范畴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sup>①</sup>

---

<sup>①</sup> 例如美国的许多工会领导人,他们一般被其会员及其他社会成员认为是非常赞成资本主义的,而他们拥有比诸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之类大公司的领导人更大的权力来互解通讯系统。尽管可以考虑由企业家实行政府统治,但是就任何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劳工代表只是偶尔不平等地行使企业组织和政府的权力。

第二点是就后来者而言的特殊的相互依赖的问题——一方面是现代化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结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是一般的管理结构。很少有像日本那样的例外,作为非现代化社会特点的管理结构对于现代化是最脆弱的方面。如果现代化过程将是顺利的、高效的和快速的,它们只是在必要的紧密协调和管理这一点上变得脆弱。无需详细分析,这种管理方法高度依赖对家庭的忠诚,而这种忠诚对一般的现代化来说是非常脆弱的。事实上,绝大多数后来者将面临一个腐败和暴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主要的协调与管理结构遭到破坏而新的稳定的组织形式还没有发展起来。

最后,对于后来者来说还有第三个特殊的劣势。高度现代化社会已经达到的水平与后来者在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而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距必然长期延续下去,这对于后来者来说必将是一个特殊的挫折。即使这种差距在相对意义上正在缩小,但是在绝对意义上,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差距可能在扩大而不是缩小。进行得如此艰苦但是仍然赶不上。这特别影响到后来者的士气。

### 三、后来者在转变过程中遇到的战略问题

变迁过程中最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是控制,资本形成和现代化过程本身带来的矛盾心理。

#### 1. 控制

如果向现代化社会转化的过程顺利和高效的话,对其社会成果的控制和协调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种控制和协调极其重要的时点上,一般的控制结构和尤其就政府而言的控制结构常常被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彻底削弱——即使在制度化的社会结构高度极权的社会里也是这样。在现代化及其伴随过程中,政府组织和集中化控制的加强可能比有关社会在历史上所曾有过的更为重要。现代化过程的集中化程度越高,政府就越重要,并且社会各种组织与

政府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就越强。所有这些共同导致了不易发生的激进变革。如果这些社会的政府结构并不比我们的政府结构更为极权化,那么,对于政府成员来说,如果这种转变顺利的话,结束这项不得不进行的事业是不可能的。

对于后来者来说,前面讨论过的规模问题实际上证明,不是社会的子系统而是国家才能够发挥对于这些目标必需的协调和控制作用。这样的社会如果要进入新的角色,变成新的组织,并且毫不夸张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那么其从先前的控制形式中获得的些微解放可能会使他们以无助于这些发展的方式行动。而且,这些社会并不是现实地面对根本不进入现代化过程的选择。如果缺乏控制,无论极权主义是否妨碍这种转变的顺利进行,可能的选择都不是回到以前的状态,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中间过渡状态而存在。在这种过渡状态中,在现代化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不仅不能得到发挥而且也不可能再回到原先的整合模式。那些其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效率低下的社会更应该受到“同情和嘲笑”。没有谁能够争辩说,即使在政府领导人能够进行现代化的情况下,非极权主义或者极权主义的政府作为一套结构也能够有效,而且能够从这种社会中间状态返回到或者创造出一个较少极权主义的政府模式。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可能的。在整个历史上,这种状态下的动荡和不满常常导致接受高度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而不是接受其他统治形式。

迄今为止,日本是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少数几个后来者之一,而且是在现代化发生的时候与在现代化方面或多或少内源发展起来的国家没有联系的国家。显而易见,日本社会的控制结构能够向现代化模式转变而又不失其效率。但是,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日本的例子是绝无仅有的——不可能被复制或重复。

日本与其他国家一样,其政府形式在现代化过程开始之初都是极权主义的,这个事实当然不足以解释这个结果。社会史提供了许多高度极权主义的政府实例。与日本不同,它们只是在现代化过

程中政府的控制至关重要的时候才受到削弱。无论是极权主义与否,在转变的过程中控制结构绝对地建立在政府基础上并能发挥高效率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在转变过程开始的时候,无论是极权主义与否,建立在政府基础上的控制高度有效是不大可能的。在社会过渡的中间状态时期——这一时期常常导致政府控制效率低下的后果——隐含的东西之一也许是为接受可行的政府控制要素提供途径——政府通常是建立在较为极权主义的或者高度极权主义的基础之上——无论人们是否愿意这样想。

## 2. 资本的形成

在变迁的战略问题中,与控制问题是现代化的政治方面一样,资本的形成问题是现代化的经济方面。任何一个发展过程总包括两种资本形成模式。第一,充足资本的形成必须关心退化(deterioration)和废弃(obsolescence)问题。第二,附加资本的形成必须成为进一步的生产增长的基础。任何社会都要面对第一个问题,任何社会就其正在增长的收入水平或者生产水平而言面对的是第二个问题。而向现代化转变的社会面对的是第二种十分特殊的问题。对于它们来说,不仅必须具备附加资本形成,而且在所涉及实际机构和原料可能构成与先前的机构和原料根本分离的意义上它必须还是“新的”资本形成。在后来者看来,旧的资本形式将不再发挥作用。在较为现代化的社会中,即使生产水平在提高,而资本形成的类型——偶尔伴随着发明的间断——在很大程度是为人们所熟悉的。

在这种关系中,后来者与内源发展者之间存在特殊的对比。后一种情况的社会能够十分直接地把一个发展阶段的原料和技术转向下一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转化的措施数以千计——与任何非现代化社会的绝大部分措施相比,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渐进的。第一台蒸汽机能够由而且正是由能工巧匠用合适的金属制造出来。原料和技术在手工上的这种直接转化对于后来者来说在许多情况下常常不大可能。不仅许多需要形成的新型资本不是能够从现有的

原料中形成的资本,而且一些新的形式也是绝对必要的。<sup>①</sup>

由于旧的原料与技术形式不是直接地转化为必需的新形式,因此后来者是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更深地与其他社会联系在一起。一般地它采取国际贸易中的联系形式。要么后来者改变生产形式以便它们具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能够换取必需的产品和服务的进口,要么它们必须通过借贷或者通过礼物来获得这些进口。在长时期内,如果发展平稳的话,第一种中的一些可能性就必定会实现。当然,这意味着后来者不仅偶尔通过新的资本形式的输入而进行重新定向,而且就旧的较为熟悉的形式而言在生产取向中必定存在重要的替代。这涉及三件事情。第一,存在着对附加资本的需要并且有可能超出先前所表现出来的规模。这就是说,附加资本形成的速度可能在极大程度上超过该社会的成员认为理所当然的先前的速度,如果转变要成功的话。而且,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不能把新增的资本形成看作是指定的一些绝对目标。如果社会将是稳定的,这个过程一旦启动,连续的资本形成的速度必定会增加。在现代化社会的条件下人们不能够简单地通过建造灌溉工程来提高生产力,并且使这种生产力水平成功地保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

第二,必须创造全新的资本形式,而且该社会的成员必须学会运用这些新形式。

第三,——这一点比前两点更经常被忽视——由于缺乏从旧的原料和技术形式向必需的新形式直接转化的能力,所以必须改

---

<sup>①</sup> 这里有一个必需的重要限定。在非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幼稚的错误之一是坚持使用最新观念和最现代化的工具。虽然时常有必要这样做,但是并不总是必须这样做。对于一些这样的社会而言,至少在这个过程的重要部分它们将通过机器与工人的结合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得较大的优势,因为与高度现代化社会的特点不同,这些社会中的机器与工人的结合不是如此节省劳力。因此,假定在一切情况下都绝对必须从这种资本形式尽可能远地向最现代的资本形式跳跃是一个错误。然而,在一切情况下,非现代化社会的原料和技术与现代化过程向前发展所必需的原料与技术之间都将存在差距。这种差距这些社会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是不可能超越的。

变旧形式下的生产取向。有时这包括利用旧方法创造新产品；有时它只包括对出口比以前更大的关注。它几乎不可避免地包括就比以前更为高度专业化的经济取向为主的组织而言对旧的生产力形式的考虑。所有这三个要求都表现在任何从非现代化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所固有的资本形成问题的社会背景中。

对资本形成的这些要求引起了私人与公共成就的复杂问题。它显然与这些社会集中化的控制问题紧密联系，并且因而也与就其成员在转变过程中能有效地运用而言的政府性质问题紧密联系。还有，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个人对于这些成就应该有多少作为对公共地位的抵制而掌握在私人手中抱有不同的看法。除了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偏好之外，还可以提出某些一般的考虑。第一，某些规模问题理所当然要排除对私人成就的单独依赖。社会成员所居住地区的整个通讯网络，实现一般文化水平的教育体系等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如果转变过程要尽快完成，这些都必须十分迅速地实现。在这些社会的绝大多数中，尽管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方式会导致突出的极为富裕的个人的出现，但是并不存在拥有足够的财富来单独实施这些工程的个人或者个人的联合体。一般的社会成员或者政府组织是否希望或者应该希望把一般意义上的事务留给私人控制是一个问题，除此之外，个人的财政力量也是一个问题。无论是否正确，在当今世界形势下，这些领域的公众愿意把如此重要的事务留给私人并严密由私人控制是极为不可能的。

第二，除了规模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几乎理所当然要采取以公众而不是以私人为基础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务的绝大部分。例如，为全体成员提供教育，这样一些较大规模的资本形成所要求的条件，使之极难成为依靠私人建立的事业。在必须受教育的个人中绝大多数没有能够支付其教育费用的财富，即使他们希望这样做也不能够。组织的领导人物或者其他利用学校所提供的教育成果的人在任何确切的意义上都不知道怎样计算教育成就所带来的价值。依靠私人来掌握，我们就难以看到这些工程中有

多少能够使他们为自己支付费用,除非这是通过税收或政府的其它一些形式获得的基金拨款实现的。依靠私人来掌握这些事务的缺点之一也许是在个人的努力中破产和失败的可能性,但是,社会中的成员不能允许清除这些组织,即使它们做的并不像所期望的那样好。而且,在经济上复制充分的设施来创造这些活动领域的竞争状态也是行不通的。

第三,对于这些社会来说,国际贸易所引起的问题可能要求至少在管理形式上相当水平的公共参与。我已经尝试着指出,这些社会不仅面临着全新的经济分配形式问题,而且,如果它们要在国际贸易中最充分地发挥其相对优势以促进这些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形成,那么它们还面临着现有的许多形式的在根本上的重新定向问题。<sup>①</sup>

第四点是一个关于失误的问题。在此,对于以私有而不是公有为基础的事务管理有许多东西可以说。公有基础一般被理解为以政府为基础。如果能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就私有而言排除个人的失误情况比使政府成员停止被证明是错误的行动要容易得多。在

---

<sup>①</sup> 在这种关系中还存在一个特殊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称之为商品化和工业化。鉴于绝大多数这些社会的特点是极端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方式,还有来自国外的被认为是奢侈品的有利可图的市场。这些奢侈品使得进口变得昂贵的同时,而在提高一般生产力水平方面的意义微乎其微。例如,在汽车领域,进口大型豪华私人客车不仅是许多富有的个人的愿望,而且把这些交通工具转向豪华的私人运输的可能性也是极为有限的。其次,通常有一些社会,就交换专家的角色而言,也就是说商人,从观念上来说这种角色最多只是边际角色。交换专家(商人)一般被政府成员划为剥削者。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隐瞒存货比窝藏增加的存货容易,所以这些专家由于存货的可隐瞒性,快速的流通和高额利润而被激励着去进行交易。在这些情况下,为了快速流通而进口奢侈品而不是为内在发展而投资于工厂的要求十分强烈。在这些社会中一般与提高生产力不相干的贵重物品的进口能消耗大量的外汇,而实际上却没有促进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需的新资本的形成或者获得新资本。尤其是在交换专家(商人)在从前的非现代化社会中声望低下的情况下,在贪污腐化已成为政府的特征的情况下,存在着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的情况下,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收入极有可能被挥霍浪费掉,除非政府成员在公有的基础上介入和管理这些事务。

某些情况下私有的个人将被竞争排除出去。这种情况就政府负责人而言将不会发生。另一方面,当对协调的需要产生的时候,假定需要作出高水平的计划,那么在其他情况下可行的对私有基础的失误的容许在这种情况下就行不通了。失误的可挽回性和对创造的刺激也许是私人高水平地参与这些事务的最牢固的基础。但是,在其他需要的背景下,以及在就不断加强的集权化政府组织而言的控制要求的背景下,任何一种后来者能够再次获得具有日本现代化特点的这种高效率过程中的私人参与水平是不可能的。当然,即使是这种情况,其特征也是高度的公共参与与公有或私有成就的独特而又密切的协调。

### 3. 对现代化的矛盾心理

我已经强调过这样一个事实,就现代化而言,对于任何非现代化社会总是存在一些问题。总有一些社会成员反对现代化,这也是事实。但是,对于现代化而言,还有比这更多的问题。一些人开始无疑赞成这个过程而最终却成为最强烈的反对者。一些人也许从来没有对现代化作更多的考虑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成为现代化的反对者。在现代化过程中,这种被激起和反映的感情在某些方面对这个过程是有害的。极端形式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主要的例子。无论外行还是学者都详细地评论过民族主义精神对于转变过程所共有的积极意义。然而,还没有如此详尽地对这种精神阻碍现代化进程的程度加以探讨。民族主义热情对现代化进程的阻碍程度可能与这种热情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程度分不开。个人试图有别于他人并保持其独立的特性所浪费的时间可能就是为某种道德所付出的代价,而这种道德可能是对于如果现代化进程要继续下去所不得不做的事来说是必需的。

对现代事物的热衷也会导致随之而来的过度行为。在前面对资本形成的讨论中我已经指出,最适应某一类转变问题的并不总是最现代化的技术。然而,如果对现代事物的必要追求相近的话,尤其是特定的民族自豪感,任何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某些不是最现

代化的东西的建议几乎都有可能被怀疑为使人民走向倒退的企图。对教育和社会流动性的强调可能已经作为一个重要方面而导致新的势利主义(snobbism)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新的势利主义形式会妨碍进一步的发展。所有投入到现代化进程中的热情可能都对这个进程具有阻碍意义。

还有另外一种矛盾心理——与刚才提到的极为不同——但是它并不排除沿着这条道路已经取得了成就的所有社会的特征。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从某些观点来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总有一些成员会受到伤害或者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另外,直接剥夺对其他成员的伤害不如这样的事实所造成的伤害深,即无论成就如何巨大,它也没有达到一些人们的期望,这些人对于没有像所希望的那样尽快实现所追求的目标心怀不满。在所有国家中,这两种失望迟早会引起原教旨主义的(fundamentalistic)反应。<sup>①</sup>

我把原教旨主义反应定义为这样一个概念,行动者把当前问题的解决当作他们向昔日好时光的回归过程,从中他们觉得与旧时光的告别从来就不应该发生。无论是否理解现代化进程,这些人觉得如果现代化过程从来就没有开始的话所有的人都将过得更好——这种拯救在于向可靠的真正的道路回归。悠久的历史为珍视一个国家提供了上千种办法。特定类型的人其历史背景越悠久,其原教旨主义反应的基础变化越大。美国社会的成员中极少有人回到在他们看来是美好的旧时光的100多年以前。例如,对于一个具有像法国社会那样历史悠久的社会的成员来说,就原教旨主义反应的拥护者(Virtuosi)而言,原教旨主义反应可能集中在与加洛

---

<sup>①</sup> 我对原教旨主义反应这个概念的使用,虽然无疑是修订过的,但仍然无可非议的有两个来源。一个是20多年以前帕森斯对这个概念的使用。见 T. 帕森斯:《法西斯运动的一些社会学方面》,载《社会力量》第21卷第2号,1942年1月,第138—147页,重印在 T. 帕森斯的《社会学论文集》,修订版,1954年,自由出版社,伊利诺伊州,第137页。另一个是维布伦(Veblen)的著作,《德意志帝国》、《不在他主所有制》和《商业企业理论》等等。

林王朝(法兰克王国)一样遥远的时期。

一些对现代化更为极端的矛盾心理号召全部放弃对这一进程的参与。这种极端的形式从来就没有成为已经开始走上这条道路的任何社会的特征。但是,还有一种为许多这样的社会所特有的混合形式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的特征是,怀有这种心理的人,对于现代化而言,只想要它的结果,而不想要这个过程。绝不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头脑中在这方面都有这种或与其相似的矛盾心理,但是,这种矛盾心理主要导致一个道德问题,尤其是在转变的过程中。许多情况下这种矛盾心理主要会造成控制问题。

在现代化过程中还有一种特殊形式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是后来者处于今天的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所具有的特殊特征。虽然这种矛盾心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激起和反映的感情的部分,但是它是由这样的事实引起的,即它对当前的状况表现出某种形式的无知。这是对在许多新的不发达国家中所看到的状况的定义。在这些国家中许多个人着迷于独立、国家主权和自由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就其全部作用而言在今天的国际事务背景中是毫无意义的。独立、自由和主权概念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具有重大意义,当我们所考虑的国家现在已经达到较高程度的时候,在世界人民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增强的背景下,这种自给自足形式的意义就微乎其微了。对于任何国家的代表来说,像一首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做他们想做的事,我不在乎”已经不再可能。面对所有国家的代表的问题是如何创立一种相互依赖的结构,依靠这种结构,规模较小的社会的利益不易成为较大规模社会的反复无常的一时兴致的牺牲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是一个特殊化的有限的平等形式,它并不反映国内社会生活中的平等。这些概念能够应用于国家还是国家的代表,以及用已经提出的全新方式来看这些问题并不确定。但是,绝对肯定的是这种事实,具有由于现代化过程已经推广到全世界而表现出来的观点的人不能非常坚决地认为他们所处的状态必定就是与现代化还没有充分发

---

达之前其他国家所接近的状态。现代化的发展不会使一种类型的社会状态的形成成为可能,而这种类型的社会状态被现代化的发展所摧毁和暴露,就像摧毁它先前已经接近的状态一样。

(黄东友 译)

亚历山大·格申科伦

##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落后\*

### 导 言

用历史的方法研究当今的问题可能需要一些解释。现代的历史学家们与他们的许多前辈不同,不再宣称世界一定会发生什么,或至少理想地应发生什么。我们变得谦虚了。预言的热情必定与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一些极其简单和普通的历史规律决定的因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一天真想法一起消失。在塞涅卡的我们的过去知识的绝对确定性的论断与歌德的历史是七道封印下的一部书的描述之间;在一边是全知与一边是无知之间,现代的历史相对主义谨慎地发展着。现代的历史家们的着重点、兴趣和观点不断地变化着。对历史的研究不再把人类历史确定为与星球的演变过程一样是唯一的,一成不变的过程。人们已经摒弃了历史过程的铁一样的必然性。但是它与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称作的“先前的奴役状态”一起摧毁了曾在19世纪人们心中安全、有信心通过的架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伟大桥梁。

这是否意味着历史对了解当今的问题毫无用处?历史研究本

---

\* 选自霍塞利茨主编的《欠发达地区的进步》,1952年。

质上应用经验地产生不同假设判断的经验材料,测试结果的相近性,希望以这种方式弄清某些一致性,某些典型的情形以及在这些情形下个体因素间某些典型的关系。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容易用于推断。所能做的只是从过去大量的明智问题库中提取能应用于当今材料的一些方法。不应夸大这种贡献的重要性,但也不应低估它。因为我们对当今问题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参考框架的广度。褊狭性限制了我们的理解。但是思想的褊狭性并不是任一地区特有的。此外,这不仅是空间方面的问题,也是时间方面的问题。在经济政策上的所有决定实质上是许多相关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而历史学家们的贡献在于指出潜在的相关因素和它们之间潜在的意义的结合,这种结合在更有限的经验范围内是不容易察觉的。这些就是问题。然而答案本身是另外的事情。无论是多么丰富的过去的经验和多么全面的历史研究都不能使当代的人们在开创性的任务面前不必寻找各自的答案,不必建构他们的未来。所以,以下的论述只是提出过去存在的一些关系。对它们的考虑或许对当今的讨论有些用处。

### 落后的要素

我们对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大部分想法——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大马克思主义的论断的统治,即发达或确立的工业国家的历史为较落后国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工业发达的国家为较不发达的国家展现了其将来的图画。”<sup>①</sup>从广义上讲,很少有人怀疑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指出,德国从上个世纪中叶到上个世纪末遵循的是英国先前的道路。但是人们应当意识到他们过于全心全意地接受这样一个论断了。因为这一论断所包含的一半真理掩盖了它的另一半,即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一个落后国家的发展能

<sup>①</sup>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第一卷,前言。

够借助于它落后的优势,其倾向与一个先进国家的经济根本不同。

本文中主要的提法是在许多重要的历史实例中,工业化过程最终在一个落后国家发生时,与较先进国家相比,显示出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发展的速度上(即工业增长率),而且也表现在那些过程中出现的工业生产和组织结构上。此外,这些工业发展的速度和特点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应用制度化手段的结果。这些制度化手段在已确立的工业国家里很少有或没有对应物。此外,先进和落后国家之间,工业化所进行的知识氛围,即它的“精神”或“思想体系”,有很大差别。最后,这些落后因素在各国起作用的程度直接随着落后程度的不同和该国自然的工业潜力的不同而变化。

让我们首先以对所能得到的有关从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段时期欧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材料进行综合的方式,来对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要素用一般的术语加以描述。因此,在具体例子的基础上,将更多地提及所谓的“相对落后”对各国工业发展过程的影响。

重要的工业化过程开始之前,一个落后国家的典型情况可被描述为:以这个国家中实际的经济活动状况与工业发展存在的现有阻力为一方,这种发展所固有的巨大允诺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为特征。工业化呈现的机会的程度,当然随着各个国家自然资源的不同而变化。此外,只要保留某种可怕的制度障碍(比如,农奴制度或严重缺乏政治上的统一),似乎就不可能进行工业化,当然也就不存在“紧张”。假设给予了充足的可用资源,并假定消除了工业化的巨大障碍,可以说工业化的机会直接随着国家的落后程度的不同而变化。落后国家能够从较先进国家引进的技术储备越大,工业化似乎就越有前途。正如魏伯伦(Veblen)多次正确地强调的,借来的技术是确保一个落后国家在进入工业化阶段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因而总是存在着嘲笑落后国家缺乏独创性的不可避免的倾向。德国16世纪的矿业工程师总是指责英国只会机械地模仿德国的方法,而英国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很好地回敬

了这些指责。在我们的时代,人们谈到苏俄在工业发展上完全地模仿,而俄国人提出特别的,过分的论点进行反驳。但所有这些表面现象趋于抹煞一些基本事实:大量进口外国机器和外国技能的可能性,以及在落后国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拓宽经济潜力与经济现状之间的距离进行快速工业化的机会。

一个不发达国家的前景经常用作为资本性商品的劳动力的廉价,以及用匮乏的资本代替充足的劳动力最终产生的困难进行正向或逆向判断。有时正好相反,一个落后国家的劳动力的廉价据说对工业化进程有很大帮助。然而,实际的情形比基于简单的模型产生的现象复杂得多。实际上,条件随着工业部门的不同以及国家的不同而变化。但是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事实是切断了与土地相联系的脐带并适用于工厂的稳定、可信,有纪律的劳动力在一个落后国家不是充足而是匮乏。创造一支真正可称作工业劳动力的队伍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方面,俄国的工业史提供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子。在19世纪,德国的工业劳动者是在可能使他们更愿意服从工厂严格的规章制度的一个容克庄园的严格纪律下成长起来的。然而,困难仍很大。人们可以回忆19世纪末德国作家们,如舒尔茨·加文尼兹以赞美、羡慕的口吻不断感叹英吉利海峡那边的英国工人为“未来的人,是为机器出生和受教育的,在过去找不到能与他们相媲美的”。如今,来自印度工业的报道,在劳动力供给方面,更夸张地重复了过去欧洲工业化的困难。

在这些条件下,可以冒险作出这样一个论断,即在落后国家里工业化发生的程度主要依靠采用最先进、有效的技术获得成功,特别是当它们的工业化是面临先进国家的竞争时。应用技术尖端的设备所具有的优势并不与它节省劳力的效果相抵消,而是加强了这一效果。这似乎解释了为什么落后国家在它们工业化早期致力于一些能使最近的技术进步十分迅速的工业活动的改进;而为什么较先进国家懒于不情愿要求或强加一个大的投资项目的潜在的损失,并且对它们的工厂持续现代化更为犹豫。显然,对这样的一

个政策是有限制的。其中之一即是一个落后国家不能把限制扩展到需要特殊技巧的输出线上。落后国家(虽然不是美国)吸收现代机器工具生产的技术比较缓慢。但是一个行业,如钢铁的生产提供了一个引进最新式革新的倾向的清晰的例子,研究诸如德国的高炉如何很快就优于英国的高炉,以及在本世纪初期高炉技术仍相对落后的俄国(南部)如何在设备上超过了它们的德国对手是有启发的。相反,在19世纪,英国棉纺织品产量上的优势从未受到德国或其它任何国家的挑战。

在很大程度上(如上述的高炉的例子),对所需的现代技术的应用,在19世纪条件下,扩大了工厂的平均规模。在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历史中可以找到这种意义上的对大规模的强调。但是欧洲的落后国家的工业化显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趋势。“工业革命”一词的应用招致了许多正当的责难。但是,如果工业革命只被看作工业增长率的突然的、大量的增长,那么无疑在一些重要的实例中,工业发展确是以这样一种突然的、爆发式的,即革命的方式开始的。

间断性并不是偶然的。只有当工业化运动能够沿着一个宽广的阵线,沿着许多经济活动线同时开始,萧条时期(在重农主义意义上增长率低的时期)才能够终止,工业化过程才能开始。这部分是由于在经济程度中存在互补性和不可分性的结果。除非同时开采煤矿,否则无法修筑铁路;如果一个内陆中心要与一个港口城市相连,修一半铁路是不行的。在某些行业里工业进步的成果被当作其它工业领域的外部经济,而这些工业领域的进步反过来又对前者有益。纵观欧洲19世纪的经济史,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只有当工业发展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开始时,才能使前工业化的条件与期望从工业化中得来的利益之间的紧张变得足够强大以克服存在的障碍和解放能够促进工业进步的力量。

这个发展方面可用汤因比的挑战与反应之间的关系来表达。汤因比的一般见解是小的挑战经常不发生任何反应,而当挑战增大时,反应量开始迅速增长(至少增长到某一点),这一规律在此似

乎非常适用。在工业发展方面一个反应成为事实之前,挑战,即“张力”必须相当大。

先前的概述主要是列举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形势具有历史的特殊性以及与同较先进国家相比落后国家较高速度的增长和不同的工业生产结构有关的一些基本因素。然而,在落后国家,应用某种制度化手段和接受某些特殊的工业化意识形态,大大地加强了这些因素的作用。下面将讨论这些特殊因素中的几个因素,以及它们在不同落后水平中起作用的方式。

## 银 行

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历史为这些过程提供了一些相当显著的例子。拿破仑三世的登基结束了始于波旁王朝复辟的经济相对萧条的一个漫长时期。在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这个萧条时期是拿破仑一世采取的工业政策的结果。通过在1860年的哥布登—歇佛利耶条约中达到高潮的减少关税和取消禁止进口的政策,法国政府摧毁了法国工业几十年所在的温室,把工业暴露在国际竞争的激励环境下。在萧条的煤炭和铁的生产中取消垄断利润,法国工业最终有益地获得了基本的工业原材料。

在一定程度上,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法国精细工业的发展要归功于在解除束缚法国经济的紧身衣方面所做的决定性努力,但是伴随这些基本的(虽然不是排外的)消极的政府的政策,法国工业从一个不同的方面获得强大的动力。下面参考一下拿破仑三世时期工业银行的发展。

人们很少能充分意识到工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性。也没有人正确理解这一发展源于一个相对落后经济的一些特殊条件。特别地,皮埃尔兄弟创建的动产贷款(Credit Mobilier)银行的故事经常被认为富有戏剧性,但总的说来是相当无关紧要的插曲。例如在爱弥尔·左拉有影响的小说中,这一发展的实际意义完全被对伴随它们

的投机的热衷、腐败、不道德的描述所掩盖。似乎应当更符合事实地谈及那一时期投资银行对法国及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史的真正重要的作用。

谈到这一点,在人们的心目中,当然会立即想到设计用来修筑几千英里铁路,开采矿山,设立工厂,挖掘隧道,建设港口以及使城市现代化的金融组织创建的直接影响。这些都是皮埃尔们和少数其他人的冒险在法国以及法国以外从西班牙到俄国的广阔领域上做的。经济领域里的这一巨大变化发生在七月政权的一个伟大的政客兼历史家所保证的短短几年后。他保证国家不需要减少铁的税收,因为受保护的法国铁的生产完全能够满足铁路对铁的需求。这一判断建立在他估计的每年铁路可能增加15到20英里的基础上。

但是几位富有魄力的伟大企业家的实际经济成就与他们对环境的影响同样重要。动产贷款银行从一开始就与代表法国银行界“旧富”的银行,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卢歇尔银行,有着剧烈的冲突。正是这一冲突侵蚀了国家制度力量并对它在1867年的覆灭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人们很少意识到在这个冲突过程中“新富”成功地迫使“旧富”采取它对手的政策。旧富在国债筹款和外币汇总方面的银行政策的局限性在新的竞争对手面前无法保留。卢歇尔们能够成功地阻止皮埃尔们建立奥地利 Credit Anstalt 是因为他们自己愿意建立一个动产贷款银行,即一个对国家铁路化和工业化作贡献的银行,而不是把它建成一个旧式的银行。

旧富转而遵循新富的纲领是动产贷款银行最深远的影响。那种投机也曾偶然出现在比利时、德国以及法国自身。但是皮埃尔们的巨大的、爆炸式的影响从19世纪下半叶起深远地影响了欧洲大陆银行史。各国打有皮埃尔银行烙印的银行的数目相当可观。但比机械地模仿它们更重要的是创造性地应用皮埃尔们的基本思想和合并新型银行。这种银行在德国和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成为银行的主导形式。在当时先进的工业国家(即英国),动产贷款银行与商业银行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英国实质上设计用作短期资本的源泉

的银行与设计用来资助经济上长期投资项目需要的银行之间有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作为通用银行的德国银行成功地把动产贷款银行的基本思路与商业银行的短期行为结合了起来。

它们是比较动产贷款银行更加无限健全的金融制度的产物。它们有着膨胀的、远远超过其资本的工业有价证券并且依赖于证券交易所的健康发展继续它们的行为,但是,德国的银行以及奥地利、意大利的银行与工业企业建立了最紧密的联系。一个德国银行据说陪伴着一个工业企业从出生到灭亡,从创建到资本清算的全部存在历程。通过正式的短期信用贷款但实际上是长期的往来信用贷款帐户的手段和通过董事局制度向联合组织内部最强有力机构职位的发展,银行获得了对工业企业相当可怕的支配权。这一支配权远远超出了金融领域,控制了企业家和经理们的决定。

本文无意探讨这一发展的细节。所需的只是把它的起源和影响与我们讨论的主题联系起来。英国进行工业化时,用于长期投资的银行业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应用。工业化过程渐进的特征越多,资本积累就越多。这些资本先是来源于商业的利润和农业现代化,后是来源于工业本身。资本积累消除了发展任何特别的制度手段以便向工业提供长期资本的压力。相反,在一个资金匮乏、分散的相对落后国家,对工业活动非常不信任。最终由于工业化运动的范围,大于平均规模的工厂以及工业化过程集中于资本与产品比率相对高的行业里而使工业化过程扩张的压力较大。此外,还由于落后国家的企业家缺乏才能。

正是这些状况的压力与英国不同,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银行业的发展实质上多种多样,欧洲大陆在工业投资银行业的实践可看作是一个落后国家特殊的工业化手段。这实质上是对银行筹钱行为强制性的存款过程赋予一个中心作用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历史的、地理的所在地。然而马上就能显示这种手段的使用是特殊的,适用于那些落后程度不超过某一界限的国家,而不是通用于所有落后国家。即使是这些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仅仅是积聚和分散银行主要

经营的可用基金。当然这一情况并没有贬低在工业化早期严重缺乏进行工业投机的资金时银行的这些活动至上的重要性。

这些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落后国家工业发展中固有的基本趋势被银行的审慎态度强调和夸大了。从这一演变开始,银行主要致力于某些行业的生产而忽略了另一些行业的生产。在德国直到一战爆发,基本上,煤矿、钢铁制造、电子和一般工程以及重化学产品成为德国银行关注的主要领域。纺织业、皮革业和粮食生产业位于银行感兴趣的边缘。用现代术语来说,银行的注意力集中在重工业而不是轻工业。

此外,这些影响并不只局限于工业的生产结构。它们延伸到工业的组织结构。银行业的快速集中运动发生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实际上,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这一过程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着。但是在英国,由于银行和工业之间的关系性质不同,工业上设有相似的发展伴随银行的这一过程。

在德国情形就不大一样。德国工业的卡特尔化运动的势头除了当作德国银行合并的自然产物之外,得不到充分的解释。银行业领域的合并者不断把银行放在控制竞争企业的位置上。银行拒绝忍受它们的孩子之间 fractricidal 斗争。从中央控制的优越地位,它们能随时、快速地察觉卡特尔化和工业企业合并的有利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中等规模的工厂不断增大。同时银行的兴趣和协助比它们致力于控制充满卡特尔化机会的那些工业领域之前大得多。

因此,德国充分发挥了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即被英国领先的优势。但结果是德国的工业经济,由于在赶超过程中采取特殊方式,而沿着与英国有显著不同的道路发展。

## 政 府

可以概括德国的经验。奥地利,或不如说奥匈帝国西部地区,意大利、瑞士、法国、比利时和其它一些国家都有类似的发展,尽管

各国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但是显然不能把欧洲大陆作为整体概括。原因有两点：(1)由于某些落后国家的存在，在这些国家找不到工业发展相似的特征；(2)由于这样一些国家的存在，在这些国家里落后的基本要素呈现出一种被强调的形式使得实质上采用不同的工业化手段。

对第一类国家只需要很少的解释。丹麦的工业发展是个很恰当的例子。显然，丹麦在刚进入19世纪下半叶时还非常落后。然而，看不到类似的工业化的突然爆发和对重工业的特别强调。其理由一方面是国家自然资源的贫乏，另一方面是与英国市场近似的、固有的农业进步的巨大机遇。由于缺乏挑战，特有的反应没有实现。

俄国可看作第二类国家的典型例子。俄国经济条件的特点不仅是现代工业化爆发于80年代中期，即比德国开始快速工业化晚了30多年，而且更重要的事实是俄国经济发展的起始水平远远低于德国或奥地利等国。

俄国经济远远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农奴制的保留。直到1861年，俄国才解救了农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事实产生了经济落后的奇特机制的作用。这需要一些解释。几个世纪以来在把莫斯科的小小公爵领地转变为现代俄国特大土地群的领土扩张运动的过程中，这个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有着越来越多的军事冲突。这种冲突的卷入表明在同时期词语的意义上，“现代”俄国政府的职责与作为军事政策基础的国家无望落后经济之间奇特的内部冲突。结果是，俄国的经济发展在一些重要的关头，被假定有一个特别序列的形式：(1)基本事实是被军事利益所推动的政府，行使着推动国家经济进步的主要代理人的职能；(2)经济发展因而事实上变为军事需要的一个结果，因此发展过程有着特别急切的特点，每当军事需要迫切时就发展迅速，而当军事压力松弛时发展就缓慢；(3)这种配合的跳动的经济进步模式暗含着，每当要求经济活动大量高涨时，非常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生活的年代与高速发展时期相一致

的那一代人的肩上；(4)为了有效地强求它所需要的巨大牺牲，政府使不情愿的人们服从一系列严厉的压制措施以免他们逃到东南和东部边境地区，逃避压在他们肩上的担子；(5)恰恰因为政府的强求，快速发展时期很可能让位给漫长的萧条时期。因为巨大的努力已经超出了人们身体的承受能力，漫长的萧条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上面的序列以纲要的形式描述了俄国过去几个世纪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最适合彼得大帝统治下的大改革时期，但它的适用性并不只限于那个时期。

这一发展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是它奇特的反论过程。当俄国在彼得大帝统治下企图采用西方技术以提高产品水平和人们的技能，使它们更接近西方的水平时，俄国通过这一努力却远远背离了西方。广义上说，把农奴制的枷锁套在俄国农民身上可被理解为西化的正向过程。彼得大帝在俄国没有实行农奴制，但他可能比任何其他其他人更成功地使它有效。在随后的几个时期里，部分是由于上述(2)，部分是由于上述(5)，政府不再对经济发展积极促进，而贵族从他们服务于政府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割断了农奴制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曾经是贵族们对政府的间接义务如今变成了纯粹的义务，因而成为俄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滞后因素。

汤因比的读者们可能希望把以解放农民告终的这个过程，看作一个“撤回且返回”序列的表现。或者他们可能有理由更愿意把这个过程放在“被抑制的文明”标题下。无论如何，挑战—反应机制在考虑那种性质的序列时肯定是有用的。然而应当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不单单是一种挑战量与反应量之间的一种“数量”关系。关键的一点是挑战量改变了反应的质量。并且，这种行为给经济过程注入了强有力的滞后因素，而且更可能导致许多不良的非经济结果。这一方面与当今落后国家工业化问题密切相关，我们将在结束语里再次提及。

再回到19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俄国的工业化。可以说在某种

意义上,即关于政府在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上,它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先前模式的重复。这一点把俄国的工业化类型与它的对手德国或奥地利明显区分开来。

农民的解放,尽管有许多不足,是工业化绝对先决条件,它本身是政府设计来消除早期由政府自身创造的障碍的消极行为。在这种意义上它与先前提到的诸如德国的农业改革或拿破仑三世的政策是完全相似的。同样地,60年代伟大的司法和行政改革为工业发展创造了合适的框架,而不是直接地促进了工业发展。

本文主要感兴趣的是,与西欧的情形不同,这种行为本身在俄国没有导致个体活动的高涨。在农奴解放后的几乎四分之一世纪里,工业增长率仍较低。从80年代中期起,当国家的铁路建设呈现前所未有的比例并且成为快速工业化政策的一个主要杠杆时,伟大的工业高潮到来了。通过多种措施,诸如优先订购国产铁路材料、高价格、津贴、贷款以及对新工业企业的利润保证,一直到19世纪末,政府成功地保持了一个高的增长率,实际上是不断增加的增长率。俄国随之整顿税务制度。当卢布的稳定和黄金标准的引进确保外国参与俄国工业发展时,税务制度提供了工业化政策的筹措资金。

总之,俄国90年代与德国50年代的落后经济的基本要素是相同的。但数量上的区别是显著的。在俄国资金如此匮乏以至于没有一个银行制度能成功筹得足够的基金来资助一个大规模的工业化;企业诚实标准如此低下,大众普遍的不信任程度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一个银行能有希望筹得即使非常少量的资本基金。并且在欺诈性的破产几乎上升到企业普遍实践级别的经济里,没有一个银行能成功地执行长期贷款政策。应工业化需求提供资金需要政府强制的机构。这一机构通过它的税收政策,成功指导从消费到投资的收入。无疑政府作为工业化的推动主体以远不是完美有效的方式发挥了它的作用。官僚非常无能和腐败。伴随这一过程的浪费的数量是惊人的。但是当所有的都说了、做了的时候,维计涅哥

内斯基和威特领导下的政策的巨大成功是不可否认的。且与本文的观点主要相关的是,俄国政府的政策不仅在起源上而且在影响上的相似性。90年代的俄国政府对“轻工业”毫无兴趣。它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基本原材料的生产和机器的生产上。像德国的银行一样,俄国的官僚主要对大规模的企业,对合并以及对他支持或帮助创立的工业企业间联合的政策感兴趣。显然,政府对工业化的大部分兴趣以它的军事政策为基础。但是这些政策只是增强和强调了在经济落后条件下工业化的基本趋势。

没有一个国家像在同一个政体的两个地区采取两种政策的奥匈帝国那样,更强调这种情形下的那些基本一致性和实际制度手段的采用依赖国家的落后程度。该帝国的奥地利部分与德国等国家相比是落后的。但是它一直比匈牙利部分发达。相应地,在奥地利部分,银行成功地对工业活动的促进作出贡献。但是雷莎山脉那边的匈牙利,银行的活动并不完全充分。在世纪之交,匈牙利政府着手制订强有力的工业化政策。起初,政府对该地区纺织工业的发展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观察该国在法国人爱称作“事情的逻辑”的压力下,基本一致性如何支持它们自己,以及政府高涨的热情如何从纺织业越来越转向“重工业”的发展是有启发的。

### 落后的等级

再回到基本的德国—俄国的例子:先前的描述并没有详尽地论述平行的模式。问题仍旧是成功的工业化,即落后逐渐减少所产生的影响。

在世纪之交,如果不是更早,德国银行与德国工业之间的关系有显著变化。当从前的幼小工业发展到壮年时,银行比工业企业起初所占的绝对优势已不复存在了。工业从几十年的监护时期解放出来的过程是多种多样的。工业企业与单个银行的联系日益转变为与多个银行的合作。当先前的工业保护体经济上独立后,它们就

着手制订关于与银行改变联盟的政策。只能在银行的帮助和银行家的胆识下发展起来的许多工业,如电机工程工业,开始建立它自己的银行。德国银行归因于历史位置的资金匮乏的条件不复存在了。德国已成为发达的工业国家。但是在落后条件下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特征还保留着。银行和工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一样保留着,即使主仆关系已变为平等的合作关系,或者甚至有时这种关系颠倒过来。

在俄国,90年代工业发展的辉煌时期被1900年的萧条、随后几年的战争和内乱截断了。但是,当俄国结束了1905—1906年革命的年代后,1907—1914年间又达到了很高的工业增长率,工业化的特征大大改变了。政府继续修建铁路,但是限制在绝对较小且与增长的工业产量相比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军费的一定增长不能弥补修筑铁路意义的减少。结论必定是在一个前革命政府统治下,政府的意义在工业化的最后时期大大减少了。

与此同时,俄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幸好没有消亡。政府活动的减少并没有带来萧条而是持续的工业增长。俄国工业已到了能够丢掉政府的支持而独立发展的阶段——然而独立程度远低于同时期的德国,因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减弱的政府的作用由银行所取代了。

自从解放以来的50年当中后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立起了商业银行。因为是政府执行着工业银行的职能,俄国的银行,正是由于国家的落后,组织成“存款银行”。它与英国的银行类型相似。但是当工业迅速发展且这一发展的结果是资金积累增多时,商业行为的标准越来越西化。不信任的瘫痪的氛围开始消失,为另一种不同银行的出现打下了基础。逐渐地,莫斯科的“存款”银行被以有着德国银行而不是英国银行的特点的原则作指导的圣彼银行的发展夺去了声势。总之,在俄国的经济落后程度被政府倡议的工业化降低后,一种不同的适用于新的“落后阶段”的工业化手段的采用变得可行。

## 延迟工业化的意识形态

在下一一般结论之前,还应提一下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工业化最后一个特别的方面。到目前为止,在工业发展的特征和它的制度工具方面的重要区别只是与落后的条件和程度相联结。还需简单介绍一下进行这种工业化时的意识形态环境。

我们可以再回到法国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工业化的例子。大部分处于对拿破仑的登基有影响的经济和财政高位的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们是相当界定好的一群人。他们不是波拿巴主义者,而是圣西门社会主义者。一个人,如对法国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传播贡献非常大,可能远大于任何一个人的伊撒克·皮埃尔,可能曾经是——并一直到他死——一个狂热的圣西门主义的崇拜者的事实表面上是很奇怪的。但如果考虑一些相关的关系,这一事实就不那么奇怪了。

可以论证圣西门实际上远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以他的眼界,在一个工业社会里很难分清劳动者和雇主;在他的理想社会里他认为正确的政权形式是某种合作国家。在那里,“工业领袖们”执行着主要的政治职能。但那种论证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圣西门对他曾经称作的“最大多数和最受苦难的阶级”有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圣西门主义,被他的追随者们(特别是巴扎赫)所拓宽和重新定义,合并成一个具有许多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其中包括废除世袭和建立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指导和发展国家经济。皮埃尔所接受的就是对圣西门主义的这种阐释。

应当指出圣西门和他的追随者们强调工业和银行作为经济的组织和发展的工具的重大任务,这无疑迎合了动产贷款银行的创立者。他们愿意把他们的银行当作一个具有“较高权力的银行”且把他们自己当作“志愿者”而不是银行家。圣西门关于银行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的强调展示了一个真正神奇的——完全“非乌托邦

的”——对发展问题的见识。它与圣西门的思想对法国国内外经济事件的过程有着重大影响这一事实一样真实。但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观点却罩上社会主义的外衣?且为什么伟大的法国资本主义企业家非常愿意接受具有社会主义形式的观点?答案似乎仍需从落后的基本条件中得出,圣西门是J·B·塞伊的朋友。他从没有远离自由放任政策的观点。歇伯里叶,开创欧洲自由贸易伟大时期的1860年法英商务条约的起草人之一,曾是狂热的圣西门主义者。而在法国条件下,自由放任思想作为工业化方案的指导思想是远远不够的。

在一个落后国家,为了冲破萧条的障碍,点燃人们的想象力,以及把他们的热情投入到经济发展中,需要比更好地配置资源或面包较低的均衡价格的许诺更强有力的思想药剂。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是商人,即使是真正勇敢的、改革的企业家,也需要比高利润的前景更有力的刺激。搬走常规和偏见的大山所需要的是信仰——用圣西门的话来说,是黄金时代并没有远去而在人类前方的信仰。圣西门在他临终前几年投身到新教条的“基督教新教”的制定并不是一无所成。且因为这一对“真正科学的背叛”,遭受了奥古斯特·孔德与他的决裂。在英国盛行的,在法国却不盛行。

圣西门在他去世前不久强烈要求卢勒·德·利斯莱——年迈的《马赛曲》的作者创作一首新歌《工业马赛曲》。卢勒·德·利斯莱创作了一首。在这首新歌里,被一度称作“祖国的孩子”并与暴君和他们的唯利是图的大臣们无情地作战的人称自己为“工业的孩子”——“真正的贵族”——通过工业艺术的推广和使世界遵从和平的“工业规律”保证“全人类的幸福”。

人们不知道李加图曾叫何人把“上帝保佑国王”改成“上帝保佑工业”。没有人会愿意贬低约翰·布莱特的热情话的力量。但是在一个发达国家里,赞成工业化政策的理性的论断并不需要被半宗教热情所取代。当巴科在他《历史》一书的著名的一段里把英国公众的意见转而描述成为自由贸易是由颠扑不破的逻辑力量达成的

时候,他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在一个落后国家巨大而突然的工业化的努力在感情上需要一个新政。那些进行伟大转变的人以及感觉重担在肩的人,被马修·阿诺德描写成:

……扫清一个  
充满古旧思想的时期  
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现象,最终,并没有像最初的印象那样令人惊奇。相似地,弗里德里希的工业化理论可看作是一个与圣西门主义者有很强的个人联系的一个人把圣西门主义的激励启示翻译为在德国环境下可以接受的一种语言的尝试。在德国既缺少一场先前的政治革命也缺少把民族主义感情当作比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更适合的工业化思想的一种民族的统一。

经过上面的论述,可能对1890年代俄国的工业化中,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起着相似的作用就不奇怪了。没有比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历史发展必然规律之结果的一个思想体系更能使俄国的知识分子顺从资本主义的到来,正是这种联系很好地解释了俄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力量何以影响了像斯特拉夫这样的人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了米历俄科夫。他的思想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完全不同。在俄国“绝对”落后的条件下,又一次需要比法国或德国更有力的思想体系润滑工业化的智力和情感的轮子。落后的制度等级似乎与人们关于落后的想法和如何消除落后的方法相匹配。

### 结 束 语

从19世纪欧洲工业化的例子中得出的一些结论,似乎可以为当今的问题有所借鉴。

1. 如果把上个世纪欧洲大陆的工业化类似于爆发的特征看作是落后国家里特殊的前工业化形势的结果,并且如果懂得高速工业化的压力是那些形势固有的,就应当比较容易正确评价那些国家的政府在这个方面经常表达的愿望。像“工厂快!”这样的口号在国际贸易组织的相关部分的讨论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就显得比较合理了。

2. 相似地,落后国家集中注意力引进最先进和昂贵技术的趋势,把大型企业作为重点,以及发展投资商品工业的兴趣不必当作是信誉和经济自大狂要求的主要结果。

3. 一个发达国家对不如它幸运的伙伴的工业化政策很难作出正确评价的原因是,在每一个工业化例子中对先进国家的模仿与本国的不同决定相结合这一事实。如果对发达国家来说不易承认前者,那么它们更难默许后者。特别是在应用制度化手段进行工业发展的情况下,这种态度是千真万确的。而对相伴的“思想体系”更是如此。在历史回顾中能够得到在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本国因素意义更大的观点。

对上个世纪历程的回顾,可通过粉碎伯德·卢塞尔曾经称作的“不旅行的教条主义”,帮助形成对相关问题更广泛,更有启发的观点,以及用一种更灵活、更相对主义的方法代替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绝对观点。

当然,本文并不是暗示落后地区的当今政策应在19世纪普通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而不用考虑各国自然资源赋予的程度、气候的影响,对工业化的制度障碍的强度,对外贸易的形式以及其它相关因素。但是从本文的观点来看,更重要的是,像19世纪那样有用的“教训”,如果不能对以多种方式对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添加许多新的、重要方面的当今世纪的气候加以正确理解,就不能得到正确的应用。

因为当今的落后地区工业化的问题大多涉及非欧洲国家,它们的特殊的前工业化的文化发展对它们的工业化潜力的影响仍是

个问题。对这些文化模式人类学研究倾向于在这个方面作出相当悲观的结论。但是可能这种结论过分缺乏动态的眼光。无论如何,人们不是根据它们特殊的可变性来处理各自所涉及的因素。同时,俄国过去的经验没有显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一种强烈反对工业价值且倾向于把非农业经济行为当作反自然和罪恶的生活方式如何迅速地改变态度。尤其是,具有农奴背景的本国企业家的迅速出现,使那些特别强调在落后文明中缺乏企业家素质的人默不作声了。然而,还有其它问题。

在某些广大的落后地区,长期滞后的工业发展造成的实际情况与技术进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一起也成为工业化的巨大障碍。工业进步是艰巨的、代价高昂的过程;医学的进步是相对廉价的、容易完成的过程。在后者比前者领先一大段时间并导致可怕的人口过剩的情形下,工业革命可以被马尔萨斯的反革命击败。

与上述密切相关但是影响更重大的是工业化的严重滞后使社会紧张有时间发展并且呈现不祥的比例。墨西哥的情况可当作一个温和的例子。在墨西哥,银行曾勉强与它们不相信的具有激进色彩的政府所保护的工业化活动合作。但是在广度和重要性方面使其它任何一件事儿蒙上阴影的真正例子当然是苏联。

如果上面几页所论述的是正确的,苏联的工业化无疑包含着19世纪落后国家的工业化普遍具有的所有基本因素。对重工业和巨型企业的强调决不是苏联特有的。但是在苏联那些工业化过程的共同特征真的被全部夸大和扭曲了。

这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苏维埃政府可被正确地描述为国家经济落后的产物。如果农奴制曾被卡瑟琳女皇废除,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时,农民的不满——俄国革命胜利的推动力量和保证——将永远不会呈现灾难性的比例,而国家的经济发展会以更渐进的形式进行。“有根据的历史假设”只能是:滞后的工业革命对一个权力落入大多数人反对的独裁政府的政治革命负有责任。这样的政府可以在严重危机时刻取得政权,但是

要长期保持这个政权并不容易。不管这样的政府的手中军队的力量如何,秘密警察分布的广度如何,相信有对肉体进行压迫的制度就足够了的那些想法是天真的。只有当它成功地使人民相信,唯有它才能行使不能被免除的重要的社会职能时,这样的政府才能持续掌权。

对苏联政府来说,工业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职能。国家形势的所有基本因素都把重点转向工业化。通过转变曾限制在长期的旧时代里的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集体化取代农奴制,通过促使投资率上升到人民忍耐限度内的最高点,苏联政府依靠被统治者的赞同做到了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做到的事情。不可否认这些政策经过一个猛烈的斗争时期后,引起了政府与人民之间永久的日常摩擦。但是,似乎听起来有些矛盾,这些政策同时获得了人民的广泛默认。如果人民的全部力量都能致力于工业化过程,并且如果这场工业化能够用后代子孙的幸福、富足的许诺——并且更重要的是——用境外军事侵略的威胁来辩护的话,独裁政府将发现它的权力是永远受不到挑战的。像它最后五年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很容易证明一场战争即将来临。在苏联,经济落后,快速工业化,独裁政权的无情实践和战争的危险无可解决地交织在一起。

这不是对苏联的这个方面作进一步阐述的地方。手中的问题不是苏联而是对落后国家工业化的态度问题。苏联的经验教训是它显示了我们的时代经济落后的存在所固有的可怕的危险。没有四车道公路穿过工业进步的花园。这条路可以从落后走向独裁并从独裁走向战争。在一个“两极世界”里,这种可怕的顺序由其它一些落后国家有意模仿苏联的政策以及自愿非自愿地并入苏联的轨道而改变和增加。

因而,可从两个世纪的历史经验下结论。20世纪的主要教训是落后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它们自己独有的。发达国家的问题和它们一样多。不仅是俄国,而且是全世界都为解放俄国农民和在早期着手工业化政策时的错误付出代价。发达国家不能忽视经

济落后。

但是19世纪的教训是如果忽略了经济落后的基本特点,对落后国家的政策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只有坦率地承认它们的存在和力量以及试图全面发展而不是抑制科恩曾称作的“事情的可能性”,才能把19世纪的经验用于防止它的后继者所表现出的危险。

(崔艳泉 译,仲夏 校)

沙尔玛

## 几个国家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印度、英国、俄国、土耳其和日本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国。但这些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却各不相同。恰如他们的历史背景所具有的明显差异一样。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现代化启动的时间,还是刺激现代化启动的源泉,都是不一样的。其中印度是唯一的一个通过殖民主义开始现代化的进程,而且由外国统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配过的国家。相反,英国则通过殖民主义形成了对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支配地位,这其中也包括印度。英国也是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并为其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建立了模式。

英国过去是一个在封建关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是一个封建王国,贵族分成不同的等次,君主处于最高的位置上。宗教虽然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但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相重叠。

俄国社会则以惯例和宗教为支撑,其居民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在中亚,俄国奉行一种扩张和殖民主义政策。沙俄帝国在中亚的大部分领土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如哥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俄国成为一个实行君主制的、有着异质性人口的封建政治国家。在俄国,有大小民族172个。

19世纪的土耳其是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帝国。这个帝国维持了

---

\* 选自[印]K.沙尔玛《印度的政治现代化》,1982年。

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8世纪才开始逐步解体。这个帝国缺少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同质性,因此,它是一个扩散性的、多种族的、多语言的社会。与英国和日本不同,土耳其帝国没有自然世界,也没有对国家的认同感。其政治体制是专制的,苏丹位于这个体制的中心。它也是一个伴随着习惯价值系统的传统主义社会。在土耳其,主要的宗教是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是一种最难适应世俗社会规范的信仰体系。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说这里的全部社会生活都要处于宗教法律(即 The Shariah,意为伊斯兰的神圣法典)。土耳其从未丧失过自己的独立地位,因此,在1923年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实际上是奥斯曼长达7个世纪的政治统治传统的直接继承者。

日本是一个列约王国,其社会有着明显的同质性,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日本是一个与宗教系统有密切关系的传统主义社会。日本的宗教是独特的,即神道教、儒教和佛教的混合物。这里不存在不同宗教间的严重对立。社会组织是分等级的,而且不存在社会流动。朴实而勤劳的农民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日本的政府是一个有效能的专制系统,又是处在其顶端,人们一般将其称之为集权化的封建制。日本有自然形成的边界,自古以来就有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强调团结的传统。

从经济上来看,在这五个国家中,英国是最富有的,有着发达的经济体系。英国也是第一个走上工业化的道路的。相反,俄国在当时则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资源丰富但并没有加以开发。在许多个世纪中,俄国都是一个农业国家,而且是一种很原始的农业。土耳其虽不富裕,但却有相当的潜力。但在共和政府夺取了政权的时候,这些资源还没有探明。当时土耳其总人口中的82%是农业人口,但耕种的土地则是与可耕地的13.8%。日本的经济是相当发达的,它也是较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之一。

英国、俄国、土耳其和日本都实行集权式的君主制,而印度的中央权威则是很弱的,在整个殖民征服的时代,整个印度的领土上则分布着许多各自分离的小国。

英国的现代化是一个逐步的进化过程。英国在不断实现自己的发展,直到有一天发展的结果被人们称之为是“现代的”。这个社会转变的源泉完全是来自于内部。在其他的国家形成自己的现代化之前,英国的现代化成为其他一些社会现代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特别是体现在法国和美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正是在英国形成了现代议会的政治形式,使议会民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议会制政府曾经是保障自由的最重要的机构,也是英国对政治现代化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

在俄国、日本和土耳其这三个国家中,现代化的刺激都是来自于国际环境。正是由于发达文明入侵所造成的震荡,才启动了他们的现代化进程。这种现代化基本上是一种防御型现代化。在俄国,正是与欧洲文明的遭遇,才使得彼得大帝去启动这种变迁过程。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谢里姆三世的时代到1908年革命这一段时间里,所面对的主要政治问题也是防御型现代化。在与欧洲不断增长的力量相遇时,奥斯曼试图通过首先引进欧洲的军事训练方法,然后再引进欧洲的公共财政和行政、教育以及立法来使帝国起死回生。在18世纪后期,谢里姆三世对苏丹及国家领导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以期改造土耳其社会,以应付日益增长的外部力量和内部分离主义力量。在日本,正是佩里准将的到来使日本的传统政治制度终于认识到自己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此后日本的政治领导集团便义无反顾地在自己的国家中按照西方的方式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可见,正是对外国干涉和压迫的担心,成为政治现代化的强有力刺激。

完全依赖内部源泉启动这个过程的,只有英国这一个国家。它经历了历时几个世纪的逐步进化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到许多不同的方面。政治、社会、经济等,并且是依次进行。在所有其他国家,这个过程都是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努力的结果,推动这个过程的或是统治精英或领导人,或是知识精英、感召型领袖和政党。在英国,这个过程是在内部启动的,而在其他国家这个过程则是由外力引发的,也就是说,

对现代化的推动来自某些外部事件的影响。印度是处在殖民主义的影响之下,而土耳其、俄国和日本则属于防御型现代化。

像印度一样,在其余4个国家中,西方化也都是现代化的主要中介和手段,但在不同的国家,西方化的程度并不相同。由于土耳其领导人,特别是阿塔图克的现代化努力,土耳其的西方化程度是最高的。“阿塔图克以民族为基础用西方化的方式对土耳其进行的重建建立了一种模式,许多国家都想模仿这种模式,但却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仿效得成功。”<sup>①</sup>

日本也采纳了西方的文化和文明,但却没有丧失本国的文化特质。在俄国,正是通过统治精英(君主)使国家西方化的努力而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但不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便成为一种新的发展基础。

就我们所关心的现代化的驱动因素和手段而言,这几个国家也都是不同的。印度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文化和教育,英国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技术,俄国是意识形态,土耳其是西方化,日本的主要驱动因素则是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所有这些因素都成为政治现代化的最初动因。

在印度,主要的手段是政党。虽然在印度现代化的过程中领导人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些领导人本来是经由政党组织出现的。在英国,由于现代化并不是一种有指导的过程,因此,这种手段的重要性并不明显。在自然进化的现代化过程中,政党和政治领导人都不是这个过程的原因,而是过程的结果。他们都是因变数,而不是自变数。在俄国,首先是沙皇,然后是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领导人和共产党成为现代化的手段。在土耳其,现代化的手段首先是西方化的知识分子,然后是军事领导人,最后是政党。在土耳其,强有力的专制主义领导人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则是传统制度,包括天皇和传统寡头使自己适应现代价值,成为本国政治现代化过程的

<sup>①</sup> R. 艾默森《从帝国到国家》,Scientific Book Agency Calcutta,1970,p.201。

手段。在一些人看来,日本政治的这种特征是独一无二的,“日本可能是唯一的一个由独裁的寡头……来启动现代化的实例”。<sup>①</sup>

下面我们再来比较这几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性质、途径和模式。

印度政治的性质是自由民主制,俄国政治的性质则是极权专制主义。日本政治的性质从形式上看是民主的。但在整个日本的政治体制中都潜伏着专制主义。土耳其的政治在形式上也是民主的,但实际上也时不时地出现一党专制。“同盟进步委员”和“凯末尔主义运动”在革命胜利后便淘汰了其竞争对手。但宪政的传统建立起来了。从1965年开始,这里形成了明确的两党制。英国政治是一种较为彻底的民主制,这是自不待言的。

印度现代化的途径是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综合与协调。苏联的途径则完全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但它并不是以人权和自由的忠诚倡导者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而是以列宁和斯大林的意识形态为基础。日本的途径是民主制,但旧的制度也被保存下来了。土耳其现代化的途径也是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混合物。英国的途径是民主并辅之以国家社会主义。

按希尔斯的分析,英国和印度的模式是政治民主制,土耳其是临护型民主制,日本是现代化寡头制,俄国是极权寡头制。<sup>②</sup>

根据阿普特的分析,俄国的现代化模式是总体性的“神圣化集体主义”模式。这种“神圣化的集体主义模式是以一种新的道德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而这种意识形态则由进行马克思主义式的批评形成的”。<sup>③</sup>在这种模式中,合法性原则是潜在的,所强调的是发展。

英国的政治模式则是“世俗化的自由主义”。在这种模式中,不

① 艾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Eastern Economy Edition, p. 76。

② E. 希尔斯《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二卷第3号第265—292页。

③ 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27页。

存在对政治权力的基础,权力应该是分散的,各种体制的目的是确保这种分散性。“在实现现代化的力量方面,世俗化的集体主义模式强调是人民的一致性而不是他们的差异。它依赖于将人们的思想集中到某些政治和经济目标上,而不是依赖于思想自由。”<sup>①</sup>在英国,不仅容忍思想自由和差异,甚至鼓励用政党、利益群体和压力群体的形式将这些思想组织化。

印度的模式基本上属于“世俗化的自由主义”,但也有一些与之并不相悖的“神圣化集体主义”的价值与目标。

日本和土耳其的模式也属于“神圣化的集体主义”。在日本和土耳其开始现代化的时候,都引进了更具有弹性的“新宗教”,以代替既有的宗教。在土耳其,伊斯兰教为“凯末尔主义”所代替,它也具有宗教象征的合法性作用。在促使大部分土耳其人成为土耳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凯末尔主义者,简单地说成为“革命者”,而不是成为伊斯兰的信徒上,这种宗教具有很高的价值,并具有中心象征的作用。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意识形态运动在性质上主要是政治上的,并以现代化为目标——这种意识形态也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就制度模式来说,英国是议会民主的诞生地。印度的议会民主是在殖民时代移植过来的。土耳其、日本和俄国也采纳了不同的或经过改造的议会民主制度。这些国家都有成文宪法,对公民的权利有明确的规定。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完全的世俗国家。

英国、日本和土耳其都是统一的国家,而俄国则不得不用联邦制来解决它面对的不同文化和语言共同体的问题。像俄国一样,印度也是联邦制。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将不同的民族整合为一个共同的政治框架,并使其在主观上产生一种一个整体感的问题。

印度形成的是一种持续增长的模式,没有经历挫折。即在日本和土耳其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几经倒退、退步和挫折。英国是逐步

<sup>①</sup> 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27页。

进化的,也不存在挫折和倒退的问题。

这意味着,在英国之后,只有印度在现代化的同时实现了制度化。但在其他国家,则缺少制度化,以致出现现代化过程的挫折。

而且也只有印度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在日本,暴力冲突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主要是由于这个国家奉行的扩张政策,并卷入世界大战。在俄国和土耳其,都发生过明显的暴力冲突。在土耳其,政变和反政变是经常发生的。在俄国,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成功地用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甚至英国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暴力冲突。查理一世的被处死使在这个过程上印上了伤痕。甘地则将政治与道德和非暴力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对印度,而且也是对整个世界的独特贡献。

俄国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都是同过去完全决裂的。他们都抛弃了自己的传统制度。相反,英国和日本则在整个过程中保持了连续性,他们都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制度。他们的政治现代化战略的基础是,将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制度保存下来,加以改造,以适应现代化的目标。“在至关重要的19世纪70年代,日本领导人则表明了另一种态度。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他们的选择是保护遗产而不是创新”。<sup>①</sup>印度在政治领域中是与过去决裂的,但采取的是渐进的、和平转变的方式。与此同时,在文化领域中则保持着连续性。如印度过去的“村庄五人长老会”(village-panchayat)制度就保存下来了。

就民主化而言,西方已经成为一种参与社会,这是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地理、社会和心理缓慢的动员过程的结果。其间经历了探险时代、文艺复兴时代、改革时代、工业革命时代,最后才是民主政治的形成。但在印度,工业增长和社会现代化都是在民主政治即参与社会的框架内实现的。

(孙立平 译)

<sup>①</sup> R. 华德《现代日本的政治发展》,普林斯顿,1973年,第581页。

伯纳德·E·布朗

## 法国现代化的道路\*

本文对流行的现代化概念提出了批评,同时又对分析早期现代化社会向发达的工业化社会转变过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法国的实践比美国、英国更有典型意义,因为它同新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现代化过程中,领导人没有得到社会基本制度的支持。

现在,相信“进步的理想”的理论家已寥寥无几。但是,如果说过去一些年中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受到过一些指导的话,那么实际上现在的所有政治研究者都相信“现代化”这一概念。现代化理论试图通过对比传统与现代社会,分析个别政治系统的进化过程,在一个或几个政治家系统中评价政治制度的有效性问题。但是,所有这些政治科学的研究主题与问题都应按照一些现代化的概念加以重新检验。

通常认为,19世纪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给政治系统带来了一些基本的变化。最近,大多数研究成果从四个维度对比了“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情况——经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价值。从这些要素分析现代化的变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在传统经济中,绝大多数民众从事的是各种农业和畜牧业生产,而现代经济则是以在生产中使用科学技术为特征的;(2)传统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家

---

\* 选自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一书,1976年。

庭是主要的社会单元,面对面互动关系(通过部落、家族、封建准则),是整个社会的基础,而现代社会是复杂的、科层化和高度分化的,个人分属于各种特殊的社团之中,如商会、商业群体、体育社团、宗教组织等;(3)传统的政权类似于大家庭,而现代政权类似于特殊的社团,现代国家的政治功能,同社会功能的执行一样分属不同的集团,公民政治的建立,使结构更加合理,统治集团的权力不再靠家庭关系,而是依赖于知识;(4)传统社会价值为家庭取向,强调个人性的孝忠和子女的孝顺,他们对宇宙的认识是神秘主义的、宗教的、不可知的,所有这些构成的神话把社会系统紧密联在一起,得到社会结构和准则的承认。而现代价值是科学主义的,政治制度取决于理性原则,不是取决于对神的祈祷或世袭。

现代化暗含着至少上面提到的一种情况发生特殊的变化,引发其它方面的相应的变化。社会系统有其内在逻辑,因为不同的部门对其它部门而言都是必需的。这样,祖先崇拜并且由巫师们做出权威性论断的社会,不可能保持大量的工业经济,相反,一旦工业化得以实现,社会的思想习惯,科学习惯和机器准则都与封建社会结构相抵触。但桑斯坦·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在一次讨论会上指出,技术的变革不能立即带来相应的社会变迁,这点常被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们所忽视。新的社会阶级竭力效仿比他们更好的价值和准则,这种倾向导致了一种不和谐。<sup>①</sup>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松弛的,但这种关系毕竟存在。如果不存在这种关系也就无从探讨现代化过程了。

以前研究文献中存在的明显的问题是为了使两种类型的社会对比更强烈,而把“传统”模式描绘成过于远古,以致这一模式试用于部落社会或史前欧洲社会。例如,从各种标准来看,现代之前的

---

<sup>①</sup> 见《有闲阶级论》(1899)和《商为企业论》(1904)。在后一部书中,韦伯伦的《机器的准则》一文精彩地论述了技术对社会和政治价值的影响。W.莫尔在《社会变迁》(1963)一文中则强调了社会结构的松散状态。

西欧北美的传统社会都是相当复杂的,实际上这些社会也许更接近于“现代性”,而不是传统主义的理想型。这种极端的类型学抹杀了传统社会之间的差异——阿里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对法、英、美的研究中充分阐明了这一点。理想型作为一种两极对比的方法,对观察者发现问题,或者直接观察社会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有分析意义。类型学的缺点是固步自封,研究者可能花费其全部精力去研究与现实无关的类型学的抽象逻辑,而不是用类型学的方法去掌握政治系统的内在逻辑。

不管类型学在数学和逻辑上多么完善,但政治学者一般总是对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有研究兴趣。现代化理论对更深刻地理解现代政治生活有帮助吗?与组织研究有什么区别?它有没有解释的力量?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也许是最好的方法——实际是将其理论应用到一个政治系统之中。在本文中,我们将法国政治系统作为一个个案进行研究,当然没有必要去争论法国在欧洲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及法国对19世纪工业和科技革命的贡献。我们将首先讨论几种重要的现代化理论在法国的适用性问题——C. E. 布莱克(Black),萨缪尔·P·亨廷顿和斯坦利·霍夫曼(Samuel P Huntington and Stanley Ho Hemar)。<sup>①</sup>他们的观念都为理解法国从国家建立到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的实践提供了角度,然后我们回头讨论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政治中的实用性与有效性。

关于法国现代化的三种观点:

C. E. 布莱克的《现代化动力》一书是论述这一主题的最好著作。布莱克教授运用自如地从理论论述到实践,又返回到理论。他论及了政治现代化的四个领域。

“(1)现代性的挑战——一个社会在传统的知识框架内面对着

---

<sup>①</sup> C. E. 布莱克,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纽约, 1966年; 亨廷顿,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merica vs Europe*, 《世界政治》第17期, 1966年4月, 第378—414页; 霍夫曼, *Paradoxes of the French Political Community*, 载霍夫曼所编《法国研究》(Cambridge, Mass), 1966年, 第1—117页。

新出现的现代思想与制度及现代性的倡导者；(2)现代化领导的巩固——在几个世代历经痛苦的暴力革命过程中权力从传统向现代领导者转变的过程；(3)经济和社会改造——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实现由农村向城市，由农业生活方式向工业生活方式的转变；(4)社会的整合——经济和社会变迁导致的全社会的社会结构基础的重组。”<sup>①</sup>

布莱克的政治现代化的类型学主要包括：现代政治领导巩固的时间(是早，还是晚)、现代性对传统制度的挑战(内部与外部)、现代区域领土和人口的连续性、国家的独立和依附状况，国家向现代化过渡时政治制度的稳固性。七种模式中的第一种是英法两国，在这两个国家中，通过暴力革命巩固政治政权的时间比其它国家早(1649—1832年的英国和1789—1848年的法国)，主要现代性挑战来自内部，现代化时期领土和人口呈现了不寻常的连续性，国家进入现代时代后政治制度比较稳定。布莱克教授认为英国1832—1945年是英国经济和社会转变时间，1848—1945年是法国的转变时期，1945年后，两个国家都开始了整合。

这个分析强调了英法现代化的共性，主要的区别是英国现代领导权力的较早确立和工业化的较早实现。布莱克承认法国从未实现像英国那样的政治集权，他认为直到1802年拿破仑宪章制订时，现代机构的框架才得以确立，法国才获得有秩序发展的基础。即使是明显的政治不稳定，“法国还是在许多代训练有素的政府公务员的努力下，在行政层次上相对还渐而稳定地实现了转变。”<sup>②</sup>

布莱克的七种模式类型对比和评价了世界上一般的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但他关于法国的论述却引发一些问题。法国的现代化领导是最早于1789年确立与巩固的吗？布莱克的这种论述暗含着英国比法国早一个世纪确立了现代化的政治领导。没有人会忽视英国内

<sup>①</sup> 布莱克,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第67—68页。

<sup>②</sup> 同上, 第109页。

战和法国大革命对改变两国政治历史的重要性,但是很难相信英法两国在所有方面都如此相近,却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相差了一个世纪。英法两国在17世纪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能力也不希望维持不断扩大的君主政体的负担。当时,法国君主政体结构复杂、适应性强,这使它经受住了革命风暴的考验。虽然英国17世纪出现了骚乱,法国的革新者取得了胜利,但这两个国家在17、18世纪还是出现了相似的发展。例如托克维尔在他的《古老政体和法兰西革命》一书中指出,法国在大革命前政治、行政和社会结构都已发生了变化。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他写道:“虽然革命使世界感到震惊,但当时除了革命外别无选择。因为几代人长期酝酿的结果必然导致激烈的暴力革命。即使革命没有爆发,旧结构也迟早要崩溃。”<sup>①</sup>毋庸置疑,新的政治领导在1789年得以显现出来,但新的社会力量在这之前很早就已出现并参与到了政治系统之中。

另一方面,布莱克教授夸大了英法两国的相似性,他认为在两国都是“相对有条理的、和平的,由传统制度向现代功能的适应过程”。在感觉上当然可以这么讲。法国现在和英国一样非常“现代”,不容怀疑地说他的制度是有适应性的(至少在大革命时代和拿破仑时代),但这种观点对理解法国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呢?的确,现代化已经实现了,但法国现代化创造出的新的社会力量进入政治系统的步骤,在进一步现代化过程中政府担当的角色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虽然政体的争吵已经表面化,但是大众(*grands corps*)是否真正在领导法国一直是人人争论的古老的题目,决策过程的研究显示,由于法国议会系统的复杂性,公务员制度本身就带有政治性,多数有利益集团都有特殊的通向文官制度和议会制度的通道,这样造成了政治系统权力和影响的混乱和复杂。例如关于平息甜菜生产者和酒精制造者冲突问题时,法国议会产生了分裂,农业大臣

---

<sup>①</sup> 阿里克西斯·德·托克维尔,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Garden City, M. Y., 1955年,第20页。

主张平息,财政大臣反对,这两派观点存在对立,从而形成了两个联盟,包括公务员、利益群体、下院议员和政党领袖。法国文官制度过去令人欣慰地保持了接纳新成员的宽容性,但它既未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也没有解决政治平等问题。法国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英国和其它国家相对照的体系,因为法国没有像其它国家那样,对基本的政治价值和制度有普遍共识。<sup>①</sup>

萨缪尔·P·亨廷顿研究欧美现代化,特别关注革命时期。他认为,现代化包括三方面:理性权威(代替传统政治的单一的、世俗的国家权威)、特殊政治结构执行特殊功能的发展、大众参与政治系统。亨廷顿论述道:“17世纪理性权威和结构分化是(欧洲)大陆的主要趋向。”他认为 Richelien、Mazarin、Louis XIV, Colbert 和 Louvois 是“伟大的、集权主义的和现代主义者”。<sup>②</sup>另外,17世纪国家科层制和常备军的理性主义都在增长。在这两个重要条件下,到1700年,欧洲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了。经过长期的准备,新的政治领导体制在1789年取得了政权。

神权和世袭君主被认为是现代化力量好像很奇怪,但亨廷顿解释说,人相信有目的具有效果的变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准备。传统社会相信不变的风俗和法律。16世纪欧洲大陆的现代化起始就提出了权威的新概念,认为存在一个能做出决定的君主。“这种观念在16世纪晚期发展成一种新的理论,即君主的神圣权力。这样,宗教的传统形式用于了现代目的。”因为公共参政是后来的现象,所以,17世纪现代化的发展表现为绝对的君权。“用现代化的观念来看,17世纪的君权和20世纪的政党执行着同样的功能”。<sup>③</sup>

---

① 例如:Jean Meynaud 的著作, *Novvelles études sur les groups de pression en France*, 巴黎, 1962年, 第249—250, 279页。Aline Coutrot, *La loiscolaire de décembre 1959*, 载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1963年, 第352—388页, 和 Gaston Rimareix and Yves Tavemier, *L'élaboration et le vote de la loi complémentaire à la loi d'orientation agricole*, 第389—425页。

② 亨廷顿,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merica vs Europe*, 《世界政治》第17期, 第379页。

③ 同上, 第384页, 386页。

亨廷顿关于欧洲大陆发展的观点是对原来观念的有用而必要的修正。许多研究者迷恋于革命,忽视了旧秩序的现代化变革。但认为在法国君主处于现代化的领导地位的看法是过于简单了。绝对君权既推动了现代化,又阻碍了现代化,它对现代化的贡献是打破了地方贵族的统治;它阻碍现代化的方面是宣扬非理性价值,保持古老的社会结构和对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法国革命前的现代化力量也包括社会反对派,那些要求议会控制行政的人或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历史新纪元的人。

并不是拥护传统法律就是反对现代化。的确,一些传统主义者试图通过这些保护他们的特权;另一方面,一些具有现代意识的人通过呼吁法律高于君主意志来试图安全地参与到政治系统中去。法国同美国一样,一些更高的法律准则应于政治目的,其中包括颁布理性的合法性准则。

斯坦利·霍夫曼的《法国政治社区论》一文研究了法国工业化的后半期。他以人们熟悉的两种维度——封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为开端分析了法国的现代化。他认为法国的“共和主义的合成”(Republican Synthesis)在大革命之后一个世纪中才逐渐显现出来,并于1879—1914年间形成。“共和主义的合成”的基础是两种模式的混合物——“旧的农业社会和工业化各占一半”,不是单独的哪一方面。法国经济同时存在着传统与现代两重性,工业化出现了,但没有工业革命。商业阶级接受了许多被取代的贵族统治者的价值,尤其是强调家庭背景和社会声望胜过强调生产效率。农业更是广泛保留了传统倾向。工业的缓慢增长使资产阶级很少向工人阶级让步,并将其视为“社会中的犹太区”(被排斥的人, Socid ghetto)。霍夫曼论述道:“一个多世纪法国的政治问题是如何使政治系统适应僵化的社会。”<sup>①</sup>

第三共和国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组织集中而有效率

<sup>①</sup> 霍夫曼, Paradoxes of the French Political Community, 《法国研究》, 第12页。

的,经过严格限制的科层制体系,政治变成一种游戏,分裂的议会阻止建立有效的行政结构。“但是由于这种游戏仅存在于政治阶级范围内,所以,社会基本平衡在全法国并没有发生变化。”<sup>①</sup>然而,共和制在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中得以建立。经济萧条和纳粹德国的崛起使法国坚信这种政权不能倒下去。霍夫曼在1962年写道:“僵持着的社会结束了”——虽然许多旧的倾向依然存在。二战期间及二战后法国社会的变化消灭了原来的混合体建立了全部的工业态度,国家在计划经济发展中担当积极角色,商业阶级重建价值取向,工人阶级结构发生变化。

但是,理想型设计不该应用于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而实际上只有在第五共和国时期才存在,第三、第四共和国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周期性,例如:1896年至1914年间经济迅速发展,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后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建立了完整的现代经济的基础——包括铁路网,隧道和现代通讯,它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建立了普遍性的、自由的、非宗教性(世俗的)教育系统,这可能不是最合乎需要的(desirable)引发现代化的方式,但确实是一种方式,在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社会力量和经济成分的平衡迅速被打破。法兰西社会过去是,现在依旧是传统成分与现代因素的混合物,但很难说是独特的。所有的工业社会都存在传统与现代成分。法国也不是仅有的被批评家断言为“无条理性的”(in coherent)国家。如果说法国现代化道路有自己的特色,那么就会发现,现代化危机在时间选择和现代化与大众固执的疏远(persistent alienation)这两点是特殊的,直到现在这种与大众的疏远还依旧存在。

很显然,现代化理论不是一个能解决任何问题的魔杖,人们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建立一般性的框架。不过现代化理论是组织研究的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有效地对比了政治系统。为了进一步对

<sup>①</sup> 霍夫曼,Paradoxes of the French Political Community,《法国研究》,第16页。

现代化进行对比研究,我们采用下列标准研究法国的道路。

1. 法国传统社会形态是封建主义的。但法国封建社会是比部落社会相对发达的。封建主义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现代性”因素,所以,法国现代化进程是漫长而复杂的,至少这一过程应从11世纪算起,或追溯到罗马统治时代。

2. 在大革命前的一个世纪内,法国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靠世袭取得特权的系统在少部分地被富于财产和个人能力的系统所代替。法国大革命使长期的社会变迁达到顶点,使变迁步伐加快。

3. 在旧政体中,封建主义和绝对君主失去了广泛的基础,大革命带来的政治权威的理性主义倾向导致了一个逻辑结论:就是在今后几个世纪中谋求发展。

4. 尽管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但现代性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还是在19世纪的法国得以奠定,在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不再是一个停滞的社会,而具备了所有现代社会的特征。

我们将对以上的特点进行详细的讨论。

### 1. 传统社会

封建主义的人与人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政治关系带有很强的人格性。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封建地主拥有政治权力,政府通过封建地主来完成许多功能,这是封建主义有别于其它类型组织的明显特点。”<sup>①</sup>封建主义是任何一项研究的传统社会模式。在传统社会中大多数人从事农业、畜牧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为家庭,社会的基本价值为忠诚、孝顺和信心,国家只是一个更大的家庭组织,拥有更大的权力。封建主义系统主要建构于人们对直接人际关系的责任与权力。土地权是结构的基础。

---

<sup>①</sup> Joseph R. Strayer, “Feudalism in Western Europe”, 摘自 Rushton Coulborn 所编的 *Feudalism in history* 一书,普林斯顿,1956年,第16页。关于法国的封建主义见 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 芝加哥,1961年; A. Tilley 所编 *Medieval France*, 纽约,1964年;还有 J. Touchard et al, *Histoire des idées politiques*, 巴黎,1959年,第一卷,第155—163页。

如果用类型学的方法对比封建主义和当代法国社会,那么实际上可以建构一个完整的模式,但历史进程如此之复杂,并不能被缩简成这仅有的方面。研究法国历史发展之时,我们就会发现封建主义在很多方面不是传统模式。第一,欧洲封建主义的出现是对高度组织的罗马帝国衰落的反应。直到10世纪,高卢地区的罗马生活方式依然盛行,公民拥有土地和奴隶,但受控于国家。随着帝国的解体,西欧没有出现集中的权威,用以保护其免受萨克逊人和斯堪的那维亚人的不断入侵。在这种新形势下,罗马帝国的集权打算已不能实现,防御与安全不可避免地成为地主的责任。这样的封建主义自然不同于原来的部落社会,只能看作是文明社会的衰落。这种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封建主义之下,过去集权权威的印记依然存在。一个法国历史学家认为法国中世纪根本没有封建制度,只有君主是合法的。行政管理、招募军队和征税是公认的君主的权力,但被封建力量给篡夺了。<sup>①</sup>当战争条件和技术发生变化时,国王才有可能重建社会和国家的精神,维持统一。从权力衰落中重建权威与直接创造集权的政治进程有着本质的区别。

更重要的是,11世纪封建主义的兴起伴随着城市的复活,而这种发展削弱了封建系统。法国最近似于传统社会模式的时期是5世纪左右,在实行封建主义之前,而不是封建时期本身。从6世纪到11世纪,法国人口几乎全部从事生存农业,这个时期的工匠离开了城市,回到农村,商业衰退,城市衰落,城市自治不复存在。19世纪城市化进程重新开始,城市生活的复兴是许多因素促成的,包括:希望为公社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创造条件;运输业制造业的技术革新为商人和工匠回返城市带来了经济利益,部分商人希望结束他们的流浪式的生存方式,减少对地方地主的经济依赖。

---

<sup>①</sup> Ferdinand Lot 和 Rolert Fantier, *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francaises an moyen âge*, 巴黎, 1957年, 卷 I, 第 VIII 页和第9页的评论“the only political regime France had in the Middle Ages was the monarchy”卷 II 分析了君权的增长。

在法国境内,城市市民脱离了封建主的限制,获得了自由,这为城市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也更便于那些唯利是图的人进入城市。士绅们认识到城市的必要性,认识到城市能为他们带来利益,所以,他们对城市格外宽容,结果使城市摆脱了封建责任。许多公社建立在现代基础之上,而不是理论上的传统统治形式。部分城市定居者创造了“共同的誓言”(Common oath)——以平等为基础,而不是以等级为基础。这种“飞地城市”(Consular Cities)喜欢完全的地方自治,公民选举代表成立委员会决定重大的财政事务和行政权力。

资产阶级不能归属于封建结构之中,商人和工匠在他们的城市里工作、赚钱,对地主没有责任,并且接受新观念。市镇照样支持君主权力,但市镇只利用自己的资源,保障安全。中世纪的市镇是新价值和意识形态得以孕育的土壤,对传统宗教提出了挑战,培养了对现存秩序的怀疑论倾向,显扬了知识、解放和工作的价值。<sup>①</sup>

这是一个不平稳但又不可避免地要从传统向现代的进步。各种力量的平衡经常被打破,尤其是14世纪的经济停滞时期,中间阶级衰落,牧师和地主的权力与特权相应增加,世俗的倾向从服从于军事诸侯,转变为服从于名誉的贵族,将对应的层次变为人民和君主之间。总的来说,到13世纪,法国中世纪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价值已经包含了一些主要的“现代性”因素。

## 2. 传统社会的解体

戏剧般的革命使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到了17、18世纪的剧烈社会变迁之上。旧政体中任何一个等级,不管是牧师、贵族,还是第三等级均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使封建特权的脆弱的平衡永远消失了。<sup>②</sup>

---

① 关于中世纪都市化问题,见 Roland Mousnier, *Les XVI et XVII siècles*, 巴黎,1965年;H. Van. Werveke“市镇的增长”编入,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剑桥,1963年;L. Halphen“工业与商业”编入 A. Tilley, *Medieval France*;关于资产阶级支持君主制, Robert Fawtier, *The Capetian Kings of France*, 伦敦,1964年,第199—215页。

② 关于这个时期的社会与政治分析,参见 Georges Dupeux,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789—1960*, 巴黎,1964年,第59—102页;Gordon Wright, *France in Modern Times*, 芝加哥,1960年,第一、二章。

同其他前工业社会一样,中世纪的法国靠宗教价值维持,牧师们传播与散布的价值维系着封建政体,他们也因此而得到了“第一等级”的特权地位。教堂通过征收什一税和其他款项取得了大约13%的国家收入(必须加上大量的教堂所有土地的收入),教会也执行着许多必不可少的功能,包括维持福利网络和教育机构的生存。

但牧师的权力削弱了,教士的生活受到知识分子的严厉攻击和讽刺。社会尊重是教士阶级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现在不复存在了。人们广泛关注什一税体系中的浪费和非理性问题。进而,牧师分化成一小部分富裕的大主教和大部分穷教士。当革命爆发时,分化的教士阶级没有全部支持旧政体。

在革命时期,贵族的地位同样发生了变化。贵族的构成有所改变,不再完全是世袭。新生力量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取得贵族称号。君主有权为有功的平民授予贵族称号(通常是巨富、公务员和军事将领)。但不管其来源如何,他们总喜欢扩大自己的特权,反对来自农民、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君主的压力。1750年以后,贵族和中间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权力同时增长。正如古往·怀特(Gordon Wright)所说:“18世纪,贵族非常希望打破现状,心怀不满的贵族的革命目标是使社会回到半神话的中世纪,回到据说是被绝对君权和市镇撕毁的未成文的章程中去。”<sup>①</sup>

其余98%的人口为第三等级。19世纪,资产阶级的兴起是社会结构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工业(如 Decretot、VanRolais、Oberkampt、Réveillion 和 Dietrich 等大企业)、商业(尤其是 Havre、Bordeaux 和 Marseilles 公司的销售利益)、金融业为城市带来运气。大约有10%的市民能完全靠借贷和投资生活,可以不从事任何劳动。资产阶级获得了财富,便更倾向于购买土地,因此在中间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又建立了一条界限。据估算,到1789年,法国25%—30%的可耕

<sup>①</sup> Gordon Wright, 第18页。

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多数小资产阶级 (*petite bourgeoisie*) 从事贸易或技术工作,通常建立行会。

农民也发生了变化。1779年,少数地区残留的农奴制被彻底废除,农民获得了自由,掌握着40%—45%的土地,但他们个人拥有量很少。只有少数农民生活富裕。农村地区,无地农民和季节性工人的人数高于拥有土地的农民。<sup>①</sup>

这些社会的趋势意义重大。第一,他们与旧政体的基本假设发生了对立。旧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农民和中间阶级在最底层,贵族次之,君主高于一切。科本(Cobban)谈道:“把全国划分为贵族、教士、资产阶级和农民几个阶层实际上简化了真实的法国社会的复杂性。每个阶级内部实际均有进一步的划分,使他们不能成为一个利益集团。”旧的封建政治系统在这样的社会中基本上不能生存下去。成功的新准则变为财富、能力、天资和职业角色。一个新生儿具有贵族称号已不再那么有用。从长远上看,如果强烈依靠贵族称号会削弱社会的效率。正如 R. R. 派勒默(Palmer)指出的那样:“18世纪的西欧已经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府机构、工业、贸易、金融、科学研究、教会事务及教育领域内的机构都由简单变为复杂。人们在这些部门的分布成为社会身份和声望的基础,这必然阻碍,甚至破坏这些机构设计时的目标(有人认为只有教堂、部分大学、政府及其下属分支才起到的作用)。旧封建时代已经结束,地主不再可能把地方利益先于人们的需要。坚持甚至强调贵族的观点是欧洲社会的问题,也是个人和阶级的问题。”<sup>②</sup>

资产阶级的兴起并不是必然意味着中间阶级和贵族阶级的斗争,有一些不同的解决方式:中间阶级轻视贵族价值,贵族停止执行政治权力;或者贵族改变其称号的获得途径,接纳新成员,逐渐

<sup>①</sup> Georges Dupeux, 第72—73页。

<sup>②</sup> Alfred Cobba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法国君权神授观念的衰落”, 剑桥, 1957年, 第7页, 第235页; 和 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普林斯顿, 1959年, 第68页。

吸收先进分子,创造一个更大的新统治阶级。但是和平解决的时间已经没有了。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间的关系异常恶化。贵族忽视中间阶级的要求,企图抑制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18世纪的法国政治系统已不能解决现代化的问题。

### 3. 原因与革命

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是社会日益复杂,合法化政治权威的价值日益理性化。或者认为,随着工业化增长和社会复杂程度的提高,权威也随着日益理性化,这体现为一种因果关系。以1789年大革命为分界线,这种假定被法国的实践所证实。合法化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采用了更加理性的形式。但近期研究证明,法国大革命不是创造了权力理性化,而是加强了权威的理性化,旧政体的法国社会中包含了一部分现代化的世俗倾向。

亨廷顿认为君主的现代化角色意义是打破了封建社会,因此,君权神授理论比封建社会更理性,也更现代化。他评论道:“欧洲大陆始于16世纪和英国始于17世纪的现代化要求新的权威概念,最有效的是君权观念,用伯丁(Bodin)的话来讲是‘超越公民和主体,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这种概念是一种新理论,即欧洲在16世纪晚期发展出的君权神授观念。实际上,在这里是用宗教的和传统的形式进行现代化。”<sup>①</sup>

亨廷顿的观点给了我们一个有用的提示:理想型对历史联系之外的东西几乎没有研究能力。统治着按神的委任行使职权这种观点是传统社会的特点。然而17世纪的欧洲又恰恰是传统向现代的突破口(break through)。即使这样,我们也要谨防历史简单化倾向。君权神授观念不是一个新理论。在征服之前的法兰克人中,把世袭和选举结合了起来。勇士会议(Assembly of Warriors)在Merovingian家族所有成员中选举国王,假借与神的联系。当法兰克人取得统治之后,Merovingian家族成员想摆脱议会,但只取得了部

<sup>①</sup> Huntington,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merica vs Europe,《世界政治》第17期,第384页。

分成功。崛起的 Carolingian 人和 Capetian 人的王朝重新强化了选举。因为世袭制在王朝争霸时代会践踏合法性准则。当 Capetian 人牢固掌握政权之时,他们又重建了神授权力准则——在13世纪被逐渐接受——虽然14世纪也有少数几次议会确定君主的情况。神授权力和奉祭仪式是古老的统治理论,被封建主义弱化,后又随着法国社会集权战胜封建主义的过程而重新恢复。在路易十四统治时,绝对君权代替了弱小的封建君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又回复到了前封建时代的神授权力准则上去。<sup>①</sup>

绝对君权是现代化动力的命题也可以认为是错的,也许这样更有效。H. R. Trevor-Roper 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17世纪绝对君权给欧洲社会带来的危机。他认为,16世纪城市的发展使国家得以复兴,但在君权强大的军事和行政控制之下,一个个大城市衰落了。君权带来了国家统一,但一旦复兴,就变成了一个完全非经济性的寄生的机构。经过检验的商业和工业准则被浮夸和浪费所代替。君权负担太大,不能全部消灭寄生阶级的生活方式,无法回到使中世纪城市得以繁荣的生产性生活方式中去。在英国,皇权受到排斥而最终被消灭,而法国的君主都允许 Richelieu 减少宫廷开支,支持重商主义政策,给旧政体一个暂缓(灭亡)的机会。按照 Trevor-Roper 的观点,“到17世纪,复兴的宫廷变得越来越庞大、浪费严重,向社会不断榨取资源,这只能存在于一段有限的的时间里,到一定时期,也能出现繁荣,但一旦繁荣消失,畸形的寄生也将受到动摇”。<sup>②</sup>

这不是忽视君权的重要性,尤其是朝廷行政管理作为革新实

---

① 关于封建时期选举准则和字教原则部分,参看 Ch. Petit. Dutailis, *The Feodal Monarchy in France and England*, 伦敦,1936年,第28页; Rolert Fawtier, *The Capetiom Kings of France*, 第48—49页; Maurice Davauger, *Les corstitutions do la France*, 巴黎,1950年,第11—17页。

② H. R. Trevor-Roper, “十七世纪的一般危机”, 编入 T. Aston,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纽约,1965年,第95页, Roland Mousnier 论述了君主制作为一支进步力量的问题,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Oictatorship and Pemocracy*, 波士顿,1967年。Alfred Cobban, “The Decline of Divine Right Monarchy in France”, 第239页。

践的一部分这一点。但中世纪君权不能简单地用理想类型方法加以理解,也不能认为它是现代化的灵魂,绝对君权的兴起与法国社会现代化是同时发展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反对绝对君权。

对比君权神授与基本法概念也是一种错误倾向,好像后者代表传统社会,而前者代表变迁的原则,实际上,法国情况很混乱。对基本法,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是“传统的”,因为基本法认为上帝创造历史,超越了甚至是君主的能力问题,但第二种观点认为,基本法由人民制定,服务于人民,这种观点,抛弃了社会对比的教条,比神授权力和世袭君主的理论更适合于描述现代化的进程。正如 Rushton Coulborn 认为的,神授权力理论是一种“笨拙的想法”、“暂时的认识”,仅是一个“标语、不是一种观点”。他得出结论:“对原来特殊的社会契约内容的研究标志着人们开始重新而严肃思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sup>①</sup>

社会契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旧政体“基本法”内容的扩展。18世纪政治斗争都困扰着基本法是否要限制君权这个问题。在旧政体中人们普遍认为不能改变王位继承传统,不能改变领土,也不能改变天主教的地位。一些第三等级议员主张议会拥有权审议所有新税收,像基本法准则所要求的那样。基本法认为人民享有最高权力,并把它委托给统治者。但是,国王准备挫败这种努力。

我们还有必要再一次强调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到18世纪,人们普遍接受了一些观念:人是有无限可能性的动物,基本上是理性的,政治机构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发挥人的能力。正如 Gordon Wright 所说:“启蒙概念远非其倡导者所认为的那样有破坏性,人们很少重新认识旧政体的主要概念。18世纪法国的机构依旧基于权威和传统,而不是基于理性和功利原则。旧的组织化社会的理想没有被新的自主的个体组成的原子论社会思想所代替。”<sup>②</sup>

<sup>①</sup> Rushton Coulborn, 第311—312页; M. Duverger, 第31—37页。

<sup>②</sup> Gordon Wright, 第31页。

启蒙思想削弱了两种主要的权力争夺者的基础,引发了大革命。议会企图限制君主权力,主要是限制世袭贵族的权力,取得了一些成果。国王通过宣称最高权力属于他个人而得到信任,路易十五在1766年出版的 *Séance de la flagellation* 一书中谈道:“总体上的公共秩序源出于我本人。一些人要建立的、独立于君权之外的国家权力和利益,必须有我的加入,也只能掌管于我的手中。”无论是对绝对君权的宣称,还是重建贵族特权的企图都是与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感情不相符合的。按照理性和启蒙思想的标准,最高权力源出于君主这种观点是荒谬的;而也只有认为世袭贵族控制的议会是代表国家的。人也寥寥无几到历史舞台的大幕落下之时,争夺权力的两个主角——君主与世袭贵族都发现自己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sup>①</sup>

新权威本质上是理性的,他们适应君主立宪制,又适合议会共和制,这必然导致绝对君权和封建主义的破产。八月颁布的 Fennis Gart Oath 废除了封建主义,《人权宣言》标志着全新的政治合法性准则的建立,与此相对的是路易十五在 *Séance de la flagellation* 中宣称的观点,他的观点在1776年5月遭到巴黎议会的抗议,在1789年更变成了明确而且是暴力的革命,制定了《人权宣言》。“这个宣言针对于所有的社会成员,随时随地唤起他们的权利和责任,法律和行政权力的实施,都是为了政治制度的目标,因此,受到了更多的尊重……”1791年10月3日的宪法“废除了限制解放和平等权利的制度,士绅不再存在,贵族不再存在,世袭特权、法律特权和封建政体也都不存在了……在国家任何一块土地上都永远地消失了,任何个人的特权,任何在全体法国人的共同法律之外的东西都不再存在”。

<sup>①</sup> 关于国王和议会冲突问题,见 Palmer, 第86—99页; René Rémond, *la vie politique an France, 1789—1848*, 巴黎, 1965年, 第31—40页。关于摆脱偏见方面, 见 Gordon Wright 第28—39页; 最好的综合, 见 Jean Touchard and others, 第二卷, 383—449页。

革命的合法性准则没有被保守派接受,革命者内部发生了分化,结果是长时期的政局不稳,虽然法国“一夜之间”步入了现代社会,建立了官员合法性准则,但并没有在基础制度上达成广泛的一致。法国社会还在继续发生变化,但是克服现代化危机的方法受到政局不稳的影响,在现代化的压力下,政体不断进化。

#### 4. 现代化与和谐

科学技术影响着所有现代化社会的政治,工业的发展必然带来经济人口的重新分布。农业人口比例减小,但没有因为人口减少而降低产量,工业、服务业和管理部门人口增多,新的社会群体重组着政治系统。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些人是资本主义者和商人——管理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工业化的后期,科学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人数增加使他们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同其他国家一样,法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新社会群体进入政治系统带来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首要任务是重新认识法国的社会。法国劳动力分布在三个基础产业之中,第一产业(农业、林业、渔业)、第二产业(工业、矿业、建筑、能源)和第三产业(所有其他的,包括管理、个人服务)。一个世纪之前,农业是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几乎两个以上的农民对一个工人和一个第三产业劳动者;到1964年,农业变成最次要的产业,农业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其它两个产业人口增加,下表反映了这种趋势。<sup>①</sup>

年 份	1851	1881	1901	1921	1931	1936	1954	1962	1964
第一产业 %	53	48	42	43	37	37	28	21	18
第二产业 %	25	27	31	29	33	30	36	38	42
第三产业 %	22	25	27	28	30	33	36	41	40

当代法国社会变迁异常迅速,1954—1964这10年间,农业人口减少了几近40%,其它两个产业增加15%,这种趋势的政治影

<sup>①</sup> 表基于 Georges Dupeux,第33页;Talleaux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巴黎,1966年,第48页;Atlas historiqu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巴黎,1966年,第45页。

响也很明显。农民现在变成了最小的社会群体,作为少数派,他们对政治系统施加影响,不再是寻求建立政党,而是通过利益集团而寻求多数。虽然工人人数增加,但他们依旧不是大多数,只有通过农民或中产阶级形成联盟,才能成为多数。中产阶级,包括商人、有产阶级、管理者和专业群体,不仅由于其完成的社会功能而显得重要,而且也因为他们与产业工人一样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当今法国产业结构上与其它工业国很相似。1964年,法国农业人口为18%,比意大利(25%)、日本(26%)、苏联(34%)要少,比德国(12%)、美国(80%)、英国(40%)要多;第三产业法国为41%,而美国为50%、英国为45%、日本为42%、德国为30%、意大利为32%、苏联为32%。<sup>①</sup>

在其它方面,法国也具备了现代化的一些特征,大量人口涌入城市。1864年,在2000人以上社区内居住的人口为24%,在5000人以上社区居住的人口为17%,而1962年,分别为62%和55%,尤其是巴黎成为工业和管理中心,几乎20%的人口工作、生活在巴黎,而一个世纪之前只有3%。<sup>②</sup>

虽然法国的社会结构与其它多数工业化国家相似,但其发展过程是特殊的。法国工业化从1815年开始缓慢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与英国情况相似。工业化通过革命得以实现,打破了封建壁垒,建立了巨大的市场。法国的活力主要来源于共和国的防御和拿破仑的扩张。工业革命并没有从1815年开始,甚至可以说是停滞的。

由于关税保护主义,法国资产阶级重视金融业胜过工业,贵族价值在革命后的法国又重新沉积下来。当成功的资本家寻求适合其地位的生活方式时,他们实际上已不再是一支经济力量。戴维斯·S·兰迪斯(David. S. Landes)对比了18世纪英、法两国企业阶级:

① 所有数字来自 Tableaux, 第48页。

② 都市化的数字来自 Dupeax, 第20—27页, 23—26页。

“英国经济……对金钱机会异常敏感而有责任感,这是一个追求富裕与商业的民族。”法国资产阶级受到他们自认为的体面生活的吸引而使发展受阻,兰迪斯称其为“心理和制度上的反现代化的病毒。”<sup>①</sup>

法国现代化是延迟了,不是失败了。1815—1848年其间其生产有规则地增长。煤炭和钢铁出口上升,冶金业和化学工业及铁路建设都开始起步。可以发现,法国经济发展都依据了英国的模式,只是步伐缓慢,缺乏活力。

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经济得到发展。1852—1870年,其工业产值翻了一番。路易·拿破仑政府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取得了进展,银行系统得到调整,适应了工业经济的需要,为公共和企业提供了联系渠道。这段时期也是法国企业界冒险实验期,他们创造了许多新的商业领域(包括专业商店)和现代化冶金、纺织工业,同时一个广泛的铁路网建立起来。在缓慢的起步之后,法国开始走上赶超英国的道路,到1870年,法国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经过50年的发展,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1870年,法国被普鲁士击败后,建立了第三共和,经历了一个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长期,直到19世纪90年代。这是因为受到战败的影响。正如J.H. 克兰范姆所说:“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普鲁士胜利而告终,法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阴暗和丧失信心的时期。而如果丧失自信,没有哪个国家能创造出伟大的工作,即使在工业建设上也是这样。1870年以后的一代人,开始对政府共和制的价值产生怀疑,对他们的命运也产生怀疑。他们没有自信,更不用说自我满意了,而这些(自信和自我满意)正是1860年的英国、1875年的德国的

---

<sup>①</sup> David S. Landes, “技术变迁和西欧发展”, 编入 H. J. Habakkuk 和 M. Rost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After, IV of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第298, 463页。法国早期工业化, 见 J. H. 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剑桥, 1955年; Georges Dupeux, 第35—48页; Gordon Wright, 第196—209, 343—353页。

思想骨架,更是美国从来都具备的思想框架。”<sup>①</sup>

接下来,从189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经济比第二帝国时期又有了更大的发展。从1870年至1914年,工业产值增长了三倍,实际工资增加了50%。巨大的洛林铁矿的发现与开发刺激了法国工业化,同时,保护农业政策的实行使农民得以应付竞争的挑战。正是在这个时期,“两个法国”——一个是现代的和有生气的法国和一个前工业化的静态法国的对比才明显显现出来。1924—1930年,法国经济迅速增长,平均每年增长40%,然后经历了经济萧条的打击。二战后经过几年的重建,回复到战前水平。从1950年开始,法国经济又迅速增长,每年递增6%,比其它任何一个时期都好。从1949—1965年,年产钢由900万吨上升到2000万吨;汽车由286000辆上升到1600000辆;年产农业拖拉机由17000台增加到90000台;户数由51000增加到412000户;年税收翻了一番,工业产值增长了三倍。<sup>②</sup>

从这些主要的指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经济增长包括1815—1848年(七月君主制)、1851—1870年(第二帝国)、1895—1914年、1924—1930年(第三共和国)、1950年至今(第四、第五共和国),也就是说,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有停滞期,也都有发展时期;(2) 直到现在,相对于英、德、美等国,法国还大量存在非工业和前工业时期的经济;(3) 直到1950年,法国商人和知识分子才真正完成了向现代化观念的转变。前工业道德崇尚个体及家庭企业,这为科学、技术和工业进步提供了广泛的发展前景,但这些发展对政治的影响依旧模糊不清。第四共和国在引人注目的8年的经济增长后被推翻,第五共和国受到同期性危机的困扰,其制度也受到反对党挑战。1950年以来的迅速现代化没有带来清晰可辨的政

<sup>①</sup> Clapham, 第233页。

<sup>②</sup> 法国晚期工业化,见 Gordon wright 第453—463, 548—567页; Charles. P. Kindleberger, *Economic Growth in France and Britain*, 剑桥, 1964年。

治系统基本价值和制度。

法国现代化过程提醒人们注意危机的时序问题和新社会群体进入政治系统的态度。革命带来了一系列公众态度的变化,使法国很难建立稳固的政治制度。贵族不接受共和制,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在君主制下坐立不安。即使是建立了妥协的第三共和国的政体,但反对力量依旧继续散布共和国应重新构造的观点。简而言之,由于法国没有稳定的政治系统的利益,所以要不时面对动荡问题。无论工业化如何发生,政体都独立地在这一进程中起作用。

适当的工业化为新产生的社会群体的领导提出许多问题。与其他国家一样,法国现代化的政治危机最先表现为新兴资产阶级和管理者阶级与拥有土地的贵族的矛盾。这种矛盾关系表现为部分贵族的敌意和部分商业因素缺乏强有力的目的。即使是中间阶级采用了较优越的生活方式,这两个社会群体还是没有趋向融合,而是相互不信任。这种模式也在第二个现代化政治危机关系中表现出来——商业阶级和有生产权、有政治意识的无产阶级的关系,同样,他们相互敌视而且不信任,对新建立的传统,排斥多于参与,抵制多于接受。<sup>①</sup>

现在的法国比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同时有了更迅速的变化。最显著的变化是知识分子、管理者和高技术工人作为一种专业精英的兴起。最终的现代化能带来一种新的政治精神吗?新兴起的群体能从早期面对的排斥、抑制和相互敌视的传统中走出来吗?这是 Gaullists 长期以来希望建立的注重实效而非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进程。但 Gaullist 政体没有为多数社会群体提供有意义的参与政治系统的机会。大量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并不愿意纳入新的工业社会之中,他们否定政体、教育系统,甚至社会本身。法国现代化总是煽

---

<sup>①</sup> Gordon Wright 第210—226页,第354—365页; Georges Dupeux, 第104—164, 171—218, 240—278页; shepard B Clough“社会结构、社会价值与经济增长”编入 E. M. Acomb and M. L. Brown 编“French Society and Culture Since the old Regime, 纽约, 1966年, 第66—84页。

动起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正像共和制一样,现代化的敌人既来自左派,也来自右派。不管现代共和制能否在已经是分裂的社会中存在和发展,人们主要关心的还是法国政治的潜在的悲剧。

亚、非、拉美的现代化更接近于法国的情况,而不是英、美两国。当今大多数追求议会民主的发展中国家,与过去的法国一样,没有在国家基本制度上达成一致,同时,一些政治精英决心尽可能快地实现现代化。但前工业化的态度主宰着社会,商业阶级缺乏企业家的活力,公务员制和军事制度有相对较高的组织性,倾向于插手国家目标。共产主义和其它革命运动使工人和知识分子与国家疏远。现在许多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是在严重的社会对抗和不稳定的议会制的情况下发展的。为了比较研究,我认为在民主工业社会的众多模式中,法国是最有用的模式。

(刘德寰 译)

**R. 莱克曼**

## **16、17 世纪英法两国的精英 冲突与国家形成\***

近来,社会学家们提出“将国家因素纳入分析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将国家作为“要求对特定地域和人口施加控制的组织”来加以分析。他们认为,利用这些组织的能力的精英们则力图“形成和追逐那些并不是社会群体、阶层和社会的要求和利益简单反应的目标”(Skocpol, 1985, p. 9)。这种对国家自主性的倡导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其中既包括理论的一般方面,也包括国家的活动领域和功能,以及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将国家管理者的行动归结为出于自身的利益。这种观点已经受到一些理论的挑战,这些理论将国家看作是市民社会中的阶级的产物。本文将对这些对立的假设加以具体分析和检验,然后提出一个替代性的理论,这种理论所强调的是精英中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可以说明16和17世纪时英国和法国早期专制主义国家的至关重要的发展。

从定义上说,专制主义是与分权制的政治权力形式相对的,而后者则是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特征。在专制主义国家建立和巩固之前,军事力量和立法权威都是由独立自主的贵族、教士、城市和地方的组合体行使的,他们拥有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内向农民征

---

\* 选自《美国社会科学评论》1989年4月号。

收他们的一部分产品的世袭性权利。在16和17世纪,在专制主义国家日益垄断其国土上的军事力量的时候,这种封建的权力受到了损害。历史学家用下述标准来衡量专制主义国家的力量:(a)国家通过税收得到的资源与贵族通过封建租金得到的剩余产品的比例;(b)国家官员确定产权和强制执行法律的能力,并由此取代个体贵族的土地财产所有权和他们在法律方面的权威的能力;(c)在政治和军事上,君主及其同盟者面对内部反抗力量时占有何种程度的优势。

作为第一批民族国家,对各种国家形成理论进行检验的最基本的基础就是专制主义的君主。而对英国和法国又特别适于作出这种比较:在1500年时,两个国家都是较弱的,而到17世纪中期,英法两国的君主都在他们的国家中建立了军事统治,并且能够从民间社会中抽取相当的资源。这两个国家都遇到内部造反的挑战,但其结果却不同。在1640—1646年的英国革命和内战中,英国的君主制被推翻,而法国的王室则在1648—1653年击败了投石党人(Fron-des)。如果一种理论是有足够解释力的话,就应该不仅能解释1500年到17世纪40年代这两个国家在其能力增长方面的相似性,而且也能说明这些君主在应对内部武装挑战的能力上的差异。

研究这两个国家专制主义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分析的材料,大部分是有关16和17世纪在地方、地区和中央一级所发生的冲突中的对立因素。但问题的关键是冲突的背景。与特定的冲突有关的那些对立的群体的突出的特征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与君主结盟而另外一些人却反对君主?这篇文章将首先依据人们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答案,将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和历史学家的具体看法加以分类。并比较这些理论观点各自所强调的和所忽视的材料是什么。同时还要说明,从专制主义的君主的胜利或失败中,哪些人会得到好处,哪些人会身受其害。

本文的主要部分是用来比较16和17世纪英法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那些冲突及其主角,并对内战和投石党运动的结果作出解释。这

就需要辨认出这两个国家的国家精英,他们与各阶级的关系,以及他们在何种程度上获得了行动的自主性。这种比较表明,精英的自主性与国家机构内外派系分裂的关系要强于国家科层系统的能力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每一部分精英所具有的力量,更多地是取决于他们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结构是以何种方式削弱作为对手的那些精英的,其次才是他们自身的相对或绝对的能力。

### 一、关于市民社会与专制国家的理论

研究专制主义的学者们有一种共同的想法,即在16和17世纪时,英法两国的军事力量、法律权威和财政收入都有所增长。这些权力和资源是如何集中起来的,专制主义的君主制是在封建贵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还是以牺牲封建贵族为代价而建立起来的,对此形成了三种一般性的假设。一种理论认为,农民对封建剥削提出了挑战,这迫使贵族认识到应将他们的强制性权力集中到集权化的国家机构之手。这样,国家可以为贵族服务,国家为他们提供的安全感和他们分享农民的产品的分量都要超过由在地方一级进行斗争所能获得的。第二种理论则认为,在16世纪,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已经与贵族不相上下。当时,统治阶级的两个部分之间处于一种少见的平衡与对峙的状态,由此,国家的管理者获得了一种超越于这两个部分的相对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损害了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击败贵族并将国家置于自己的绝对利益之下的资产阶级。第三种理论认为,国家的权力和自主性是不断积累并自我维持生长的。一旦自我保护的国家精英获得财政收入,他们就会将这些资源投资于军队和科层系统,这使得他们可以攻城掠地,并进一步从“公民”那里抽取收入。这就构成了国家形成的过程。

无论是将专制国家看作是贵族的代表,还是将其看作是相对自主的,或是将其看作自治性是不发展的,在所有这些理论之中,都要引进一些概念,以解释国家官员和阶级是在什么时候,以

什么样的方式从事这些活动。这一部分将探讨那些隐含在这些假设中的概念,并找出有利或不利于某一种理论的证据。

### 马克思主义的几种理论

P.安德森代表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阶级之间为世俗问题而进行的斗争只有在社会的政治——而不是经济或文化——层面上才能得以最终解决”。<sup>①</sup>他认为,在封建主义时期,贵族和农民在政治上是如此的强有力,以致他们能够起强化或削弱国家的作用。安德森将专制主义国家的形成追溯到14和15世纪封建制度的危机,这种危机损害了以地方为基础的,具有独立性的贵族压迫农民的能力。专制主义就是贵族们对这种危机所做出的反应,“对封建统治机器重新进行调整并重新装备,以使农民退回到传统的社会地位中去。……结果就是由集权化的、军事化的最高首脑机构——专制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政治的与法律上的强制。在乡村一级的权力被削弱的同时,权力却在国家一级上集中起来”。<sup>②</sup>

安德森着重强调的是贵族与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他认为,在专制主义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贵族派系间的冲突并不起重要作用,尽管他也承认“对于许多贵族个人来说”,专制主义“在镇压他们的叛乱时或是使他们蒙受耻辱或是使他们走向灭亡。”<sup>③</sup>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并不能阻挡专制主义的成功,而使者则是在整个大洲为创造历史性的必备条件所做的一种努力,甚至要冒使自己同归于尽的风险;实际上,也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人赢得了完全的胜利。”<sup>④</sup>结果就是像投石党这样的以地方或派系为基础的反叛均告失败,原因之一就是专制主义的君主所具有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但更重要的则是贵族如果要继续向农民抽取资源,除了向专制主义的君

① P.安德森《专制主义国家世系》,伦敦,新左派出版社,1974年,第11页。

② 同上,第18—19页。

③ 同上,第47页。

④ 同上,第54页。

主表示效忠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他们的权力和法律上的合法性都要依赖于君主。

君主制国家中贵族的特点还进一步表现在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上。安德森认为,“在专制主义国家的性质和纲领与商业和制造业资本的运作之间存在一种潜在的互容空间”,<sup>①</sup>国家和资本发展起来了,他们从税收和现金的货币化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同时,在国内和海外殖民地都形成了自我保护性的垄断,但尽管如此,按照他的观点来看,在对待专制主义国家各种政策的问题上,资产阶级仍然是服从于贵族的。

要使安德森的这种观点得到支持,就应当证明在资产阶级从属于贵族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不可能在反对专制主义的叛乱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只要贵族还是统治阶级,专制主义君主就不可能受到任何挑战的损害。因此,在安德森看来,投石党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贵族不愿推翻专制主义,而资产阶级又无力推翻专制主义。英国内战(civil wars)是17世纪反国家叛乱中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这次胜利是一个标志,它表明“商业化的绅士、资本主义的城市、普通的手工业者和自由民”在此之前就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具备了向贵族国家提出挑战并将其击败的力量。要证明这种看法,安德森还需要说明资产阶级的利益与领导以前叛乱的贵族不满分子的利益是不同的,也需要解释新的资产阶级是如何在封建制度的限制下发展起来。

其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不太相信专制主义的贵族性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作为贵族压制农民和农奴的机构的封建国家”与“在互相对立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起平衡作用的……专制君主”区别开来。<sup>②</sup>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发现了“等级没有完全发展为阶级的国家中……国家的独

① P. 安德森《专制主义国家世系》,伦敦,新左派出版社,1974年,第41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纽约,国际出版社,1972年,第231页。

立性……在这样的国家中,人口中的任何部分都没有获得对其他部分的统治权”。<sup>①</sup>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专制国家并不是贵族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像安德森所认为的是失去霸权的贵族创造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是新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而不是来自农民的不断增长的挑战,使得君主们能将曾经由贵族们控制的封建国家转变为专制主义统治的工具,在这种国家机构中,资产阶级用自己的经济实力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被国王出售的官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专制主义国家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为一旦资产阶级获得了对生产的控制权,国家马上就会从属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不考虑转型时期组织的能力及将资源集中在国家精英手中的问题。<sup>②</sup>

### 国家中心论

第三种理论将自主的国家精英看作是社会变迁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并且认为,他们的行为可以说明欧洲专制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的同时形成。梯利曾将欧洲的君主与黑手党首领进行过比较,后者使用暴力来威胁人们,如果不为“保护措施”付费就要使用武力。国内和国家间的战争也提高了国家收集财富的能力,反过来,国家又用这些财富去建立更强大的军事力量。曼也针对英国的情况提出了类似的看法。<sup>③</sup>这些可以指挥国家的军队和税收组织的精英们有自己的利益。

梯利和曼将国家建立看作是一个过程:一旦国家精英在财政—行政能力和军事—强制能力之间建立了互相强化的关系,不断增多的国家官员就会要求越来越多的权力和对国民收入分享的份额,而这是以牺牲贵族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梯利和曼将资产阶级看作

①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纽约,国际出版社,1970年,第80页。

② 梯利(C. Tilly)《作为有组织犯罪的战争和国家形成》,见伊文斯等编《将国家重新引入分析之中》,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③ 曼(M. Mann)《国家与社会,1130—1815:英国财政分析》,收在吉特林编《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JAI出版社,1980年;《社会权力的源泉》,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

是国家形成过程中并非有意造成的一种副产品。国家税收将资源集中到国家的层次上,这就为资产阶级的企业创造了最初的市场(主要通过军事行为实现的)。在梯利看来,更重要的是国家税收需求对法国农业的影响。纳税额提高使农民更需要现金,这迫使他们进入市场以出卖他们增产的产品,同时也往往还要出售他们的劳动力。在农民得不到足够现金的情况下,他们就要借款,最后可能会陷入破产状态,并将他们的土地出卖给资产阶级。通过剥夺农民,国家间接地将土地提供给资本,并随之建立了劳动市场。<sup>①</sup>

国家的扩张也改变了阶级动员和政治冲突的性质。君主使用他们手中大量的资源从而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官员和财政工作者阶层,他们反过来以自己的长处服务于国家以作为回报。<sup>②</sup>当君主怂恿或迫使贵族、城市商人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地区富豪与农民间长期结成的联盟就被打破了。从梯利的观点来看,国王在投石党运动中所取得的胜利证明了贵族对保护国家财富的兴趣要大于对保护本地区某些人的特权的兴趣。

梯利认为,法国内部冲突中行动者和围绕的问题的变化是国家形成的程度及其结果的指标。国家官员和纳税者取代了地主和农民而成为农村冲突中主要的手。叛乱及其较次重形式的反抗更多地是指向国家有关税收和粮食征集的法令以及征兵的法令,而不是针对收租的地主或封建劳役。<sup>③</sup>可以为梯利的观点找到进一步的证据,即贵族和资产阶级内部都不很融洽的,他认为,他们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掌握着官职,垄断权和契约以及某些挂名的职务,因此他们是支持国家的。另一个阵营则是贵族和商人,他们反对专制主义,因为他们并不能从专制主义那里得到好处。

① 梯利《当社会学与历史相遇的时候》,纽约,学术出版社,1981年。

② 梯利《爱好争辩的法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32页。

③ 同上,第119—161页。

也有一些学者力图将国家中心研究法用于研究英国专制主义的发展。曼将国王财富的增加以及依赖国家支持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人数的增多看作是国家形成的标志。但他并不认为国家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①</sup>这种观点是很难加以证实的,因为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要远快于法国。曼还认为,英国的国家机构几乎完全是一个国家舞台上的军事行动者,它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资产阶级,“而只是促使这个阶级形成一种国家层次上的组织形式”。<sup>②</sup>曼认为,国家行动者和社会阶级分属于军事和经济两个不同的领域,并认为,只有在前者的税收要求妨碍后者的发展或前者帮助后者扩展国外市场时,两者之间才产生互动。其结果就是,曼无法发现反对君主的1640年革命的背景,实际上,在曼对英国国家机构发展的研究中几乎完全忽视了革命和内战这样的事件。

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和斯通则将英国内战看作是“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冲突,前者由有自己独立利益的国家官员组成,后者则被迫负担着越来越沉重的税赋。<sup>③</sup>他们认为,朝廷与地方的分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分析的阶级分裂并不是一致的。确切地说,尊王派是对政府官员及其提供的庇护感兴趣。内战中的议会一方虽然受到阶级和地区的分野的损害,但他们在反抗朝廷的要求方面是一致的。<sup>④</sup>这些历史学家们与梯利和曼不同,他们将内战和投石党运动看作是反抗“新兴的国家”的不合情理的要求和腐败行为的反叛运动。特雷弗·罗珀认为,不管17世纪中叶反叛运动的结果如何,获胜的法国国王和复辟的英国君主都制定了重商主义

---

① 曼《国家与社会,1130—1815:英国财政分析》。

② 同上,第203页。

③ 特雷弗·罗珀(H. Trevor-Roper)《17世纪的总危机》,见阿斯坦编《欧洲的危机:1560—1660》,伦敦,1965,第59—95页。

④ 斯通(L. Stone)《英国革命》,贝福斯特等编《现代欧洲初期革命的先决条件》,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70,第55—108页。

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臣民的负担,并最终起到了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sup>①</sup>

### 横向专制主义与纵向专制主义

由于上述各种理论界定国家形成过程的特有方式,他们都无法解决反专制主义革命这样的政治学问题。可以将这三种观点合并为有关专制主义的两种形式——横向专制主义与纵向专制主义——的理论。横向专制主义的特征在于国王有能力协调整个国家层次上的两个主要对手——一个是大贵族,有些历史学者将其称之为“富豪”,本文也采用这种称呼,他们能够拥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以及处于从属地位的小地主,另一个是组成全国性宗教组织的僧侣。因此,只有当国王能垄断武装力量并能支配全国性的教会的情况下,横向专制主义才能存在下去。历史学家所描述的于16和17世纪发展起来的英国专制主义就很适合于这个模式。在新教改革期间英国的天主教教会已被置于从属地位,在一些新教君主失去了对自己国家中改革后的教会的控制权的同时(如符腾堡),另外一些国家的君主则赢得了对保留下来的天主教教会的控制(如奥地利帝国和波兰)。横向专制主义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国民议会与国王的关系。在有些国家(主要是在东欧),国民议会仍然是贵族和僧侣的代表大会,横向的专制政体必须使这些议会从属于国王。但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表明的,在英国,国王从议会中清除了大部分富豪和僧侣。因此,议会由一个拥有国家权力的议会转变成为一个代表地方利益的代表大会,当他们找到他们团结的共同基础的时候,这个议会成为英国横向专制主义的一种新的反对力量。

如果国王无力淘汰作为对手的富豪或无力控制国家一级的教会,就会形成专制主义的第二种形式。作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策略,统治者会与以地方为基础的官员和官员集团建立直接联系的纽带,因此可以将其称之为“纵向专制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

<sup>①</sup> 特雷弗·罗珀《17世纪的总危机》,第88—94页。

移,成功建立起来的纵向专制主义会创造出一个官位拥有者团体。在获取财富及对司法和军事组织进行控制方面,他们与神职人员和富豪们进行竞争。然后,与国王进行竞争的贵族们开始试图利用纵向专制主义的权力和益处,他们或是用钱购买或是被任命为可以带来巨大利益的高级官职。这样一来,强有力的纵向专制主义就建立了横向专制主义的手段,以前独立的富豪和教士就成了官位拥有者。我之所以将这种专制主义,特别是法国的专制主义称之为纵向专制主义而没将其叫做纵向与横向的结合物,意在强调这两种不同形式的专制主义的不同起点和不同的发展轨迹,从而能使人看到在由这两种不同形式的专制主义所形成的社会中,富豪与国王之间以及富豪与地主和官位拥有者之间的关系有何差异。

表1 关于专制主义国家的四种理论

	阶级分析	相对自主性	国家中心	精英冲突
国家代表的利益	贵族	国家管理者	国家管理者	横向专制主义代表国家管理者而纵向专制主义代表贵族
引起发展的原因	农民的反抗	贵族与资产阶级间形成的均势	先前的国家能力	君主实现纵向或横行联合的能力
专制主义对资产阶级的影响	限制其发展	无特定影响	支持其形成	横向专制主义支持其发展,纵向专制主义阻碍其发展
英国反国家的造反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	不担任国家官职的领主	以地方为基础的领主
君主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	资产阶级的成长	资产阶级的成长	未做解释	地方士绅脱离横向专制主义
法国反国家造反	地方贵族因素	贵族	不担任官职的人	对立的派系
投石党运动中君主胜利的原因	贵族在专制主义国家中的利益	国家与软弱的资产阶级结盟	现有的国家能力	贵族与纵向专制主义的联系

我的看法是,君主是横向专制主义的还是纵向专制主义的,依赖于这两个社会精英中既有的关系结构。上述的所有三种观点都倾向于将贵族看作为一个阶级,将其论题局限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贵族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作为对手的农民、资本家阶级以及国家的关系。因此,他们看不清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是以何种方式存在于横向或纵向专制主义之中的。其结果就是,这些理论家都无法解释在内战和投石党运动中,贵族们为什么会分裂为保皇与反叛两派。因此可以说,以前对阶级间或阶级与国家间的联盟所做的研究中,对17世纪英国和法国内部结盟与冲突现象的注意是不够的。

## 二、16世纪英法两国的社会结构

现在我将为检验我的精英冲突模式做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这个模式是与阶级模式、相对自主性模式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因为这种模式能够解释英法两国横向与纵向专制主义国家的形成以及对王权的挑战所造成的结果。首先,我将对精英给出定义,这个定义将表明精英并不同于阶级或官员,然后,将比较不同的分析范畴在描述16世纪早期英法两国社会力量中的利益和关系上的有用性。

对于行动者是如何认识和实现他们的利益的,不同理论的理解是不同的,而不同的术语则代表着不同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对封建社会进行阶级分析时强调贵族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区别。前一个阶级包括所有从后一个阶级那里抽取剩余产品的人。在安德森看来,地主和国家官僚都是贵族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在剥削农民这一点上有共同的利益。安德森确实认为,反专制主义的暴动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贵族们逐步认识到了他们与国家官员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

持相对自主性观点的学者和持国家中心论观点的学者则认

为,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国家官员都必然拥有与贵族或资产阶级相同的阶级利益。这些研究方法的倡导者们使用的是国家精英这个概念,以使人们注意到国家官员会使用国家的行政和军事手段从其他阶级和农民中抽取税收并使他们承担某些义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国家官员的利益是政治性的,因为他们依赖于阶级力量的平衡,而不是依赖于他们的行政能力。相对自主性理论和国家中心论都同意这种看法,即国家官员的行动往往是与各种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力和收入并不是依赖于某个单一的阶级或单一的生产方式。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国家官员就成为独立于任何阶级的精英。

我把精英定义为这样一种群体,即他们共同控制着一个能从属下的阶级那里抽取资源的组织,并能防止与其对立的精英或属下的阶级接近这些资源。我使用精英而不使用阶级派别这个术语的目的,是想表明,在封建社会中,统治群体间的差异是表现在他们用以获取资源的组织与意识形态机制上,而不是表现在对某一种生产过程所拥有的权威上。阶级派别这个术语则会使人们注意于生产领域,从而忽略了造成封建精英间差异的组织基础。从我们这里的目标来看,我们现在就可以确定我的精英模式是否可以比其他理论更好地预测两个国家在专制主义时代的主要冲突阵营。我的模式预测了在依跨越国界的天主教教会组织起来的神职人员,以富豪为首领的按地区动员起来的世俗庄园主以及以国家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由国王作为头领的官员集团之间的冲突。

所有这些理论研究方法都认为利益是产生于封建社会中各种力量获取资源的方式。为了检验这些理论,人们可以考察一下从16世纪初的英法两国中占生产者大多数的农民中抽取资源所采取的方式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资源抽取者都由于要维护他们对农民的统治关系而互相联系在一起,这样,阶级分析的模式就可以得到支持。如果地租收集者和收税者间的冲突使他们在剥削农民方面不存在共同利益,国家中心论似乎也得到了证明。相对自

主性理论也预见到国家官员的独立的利益,只不过认为这种利益是过渡性的。如果不能把这些利益还原为阶级和国家的利益,而是可以将其看作是根植于制度多元性之中的,每一种利益都既控制同时又超越于某一个生产场合,精英结构模式就是适用的了。在解释16世纪早期英法两国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历史学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描述农民对各种资源抽取者所承担的义务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上,并致力于考察不同的个人和团体是如何使用法律的、武力的和其他的手段以保护和扩大他们对资源的要求的。下面,我将考察这些解释,以确认抽取者间团结和冲突的基础,并由此确定不同理论的可信度。

英国和法国的农民除了要用实物或现金的方式向庄园主上缴其劳动所得并提供劳役之外,还要向教会和王室承担义务。天主教教会有权在所有城乡的教区中收取农产品的什一税。教区的牧师、修道院和其他教会机构都有获取这种收入的权利,有时甚至包括某些世俗人士。国王则有权在其所控制的地区中依财富和生产收税。有时,有些大贵族也会分享或与国王争夺这种权力,他们除在自己的封地中收取税赋之外,还能在其所控制的地区中从较小的庄园主、市镇和农民那里获取财富,以充财政和军事之需。

这三种类型的抽取者——庄园主、由向教会交缴的农产品什一税而领取薪金的人以及收税者——都维持着独立的司法与行政机构,以保护他们从农业中获得收入,并防止竞争者对他们权力的侵犯和农民的反抗。贵族的特点在于,他们可以在他们的领地中行使司法权。当庄园主和农民在土地所有权和赋税义务上产生争执时,要由领主法庭来加以处理,而英法两国的国王干预领主法庭的能力是不同的,甚至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时代,这种干预能力也不尽一样。

王室控制领主司法权的主要障碍在于处在王室直接控制下的法官的缺乏。在英国,从国王那里领取薪金并解答地方法官的种种吁请的法官只有12人。“王室”司法的主要工作是由1000多名治安

官来运作的,他们负责实施涉及地产争端的法律。虽然治安官是由王室任命的,但王室的作用只限于在每个郡的大地主中挑选治安官。由于庄园主和治安官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有着相似的利益,如果国王想通过解雇某个治安官并从同一个庄园那里新任命一个治安官的办法来影响司法决定,其结果往往是徒劳无益的。

法国国王为大理院任命法官时也受到类似的限制,在省高等法院中也是如此。几乎在整个15世纪以及16世纪的早期,所任命的法官都是庄园主本身,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处于支配一个省的大贵族的庇护之下。其结果就是,大理院的法官不可能有效执行那些限制庄园主对农民的权力的王室敕令。

从根本上说,英法两国的国王与他们任命的法官的关系的区别是在于,英国的治安官是不领薪的,而法国的大理院法官则可以从他们的职务中得到报酬。结果就是,法国的贵族竞相用钱来购买官位,而法国的法官也越来越明确地捍卫国王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自己的权威和他们的官职的价值这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法国的国王能够利用拥有官位的贵族和不拥有官位的贵族之间的分裂,来达到控制和出售有一级的司法官职的目的。相反,英国的领主们则保持着全国性的团结,以阻止国王出售由他们全体享有的官职。

两个国家的神职人员都操纵着教会法庭系统,在涉及教会的什一税的范围内,教会法庭有权处理地产和城市商业中的有关问题。但是,在维护他们的职权的独立性及其财政权不受侵犯方面,英国教职人员所做的要比他们的法国同事更为成功。法国的国王和贵族控制着大部分教职的任命权,他们可以利用这种任命权从教会的什一税收入中获取财富。王室支持这样一种合法的伎俩,即大理院的法官们设法侵犯教会法官在处理庄园地产和家庭关系方面的权威。相反,英国的神职人员则能够阻止国王对教职的控制。英国的国王可以任命大主教,但所有其他的任命权都在教会内部。其结果就是,英国的神职人员在保护教会的经济利益上有很强的

独立性。

上述讨论表明了国王、神职人员和世俗领主在强化自己的超经济抽取能力时是如何受到其对手的司法机构的限制的。在这两个国家中,每一方精英的武装力量也是用来防止来自国内或国外的对手军队。

在省一级军事力量的对峙迫使英法两国的君主与贵族及其团体进行协商,以便能从财政和军事上创造对外战争的条件,以打败侵略者或分离主义者。在16世纪初,英国的君主就曾在由贵族、僧侣和商人组成的国民议会中进行过这样的磋商。税员在各郡县的分配以及贵族的纳税义务,都是由这种磋商决定的。在财政区的农民中收集税收时,法国的君主做得要比他的英国同事更为成功,因为那里没有省一级的庄园。而在存在省一级庄园的庄园纳税区,他的成功就要差得多。无论是在哪种类型的省份中,法国的国王都得被迫同意贵族完全免税。法国的国王通常也不能将三级会议中的贵族聚拢在自己的周围,这样,他也就不能将庄园纳税区的税收提高到财政区的水平。

到16世纪初,“去掉对集权而好战的权力顶峰的限制”使军事力量在地区或集团那里集中起来,这种军事力量已不再掌握在国家的君主的手中。贵族并不使他们的财政和军事资源隶属于遥远的国王。相反,他们在大贵族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这些大贵族都是一省或一郡的最富的贵族,他们已经能号令军队,并控制了战略要地。在16世纪的法国,贵族与市民和天主教基督教联盟进行竞争,后者已经组建了自己的雇佣军,而在英国,此时的军队仍掌握在贵族手中。

上述对历史的讨论表明,在16世纪初的英国和法国,只能在很宽泛的意义上将各种不同的抽取者看作是一个阶级。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国王、官僚、领主、僧侣以及其他的一些团体都是从农民那里获得自己的收入的,在镇压农民的反抗这一点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各种不同的力量,特别是国王和僧侣都力图

限制对手对农民的榨取,从而保障使自己能得到农民的资源。并非团结一致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分裂不能简单归结为收取地租的贵族和收税的国王之间的对立。曼(Micheal Mann)的关于“权力的四种来源的组织”——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的理论<sup>①</sup>并不能揭示这两个国家中的权力基础。这三类主要的精英都行使着类似于阶级同时又类似于国家的权威。国王、以地方为基础的贵族和罗马天主教会中的每一方都在从广大的地域中抽取资源并发挥影响,都配备了独立的司法机构,而且除了教会之外,还都投入了军事力量以保护自己在那些地盘中的财政、司法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

下面我们将集中讨论分布在三种精英中的统治权是如何集中起来的,以及这种集中在内容和组成部分上的差异。我将再次考察历史上的资料,以便将我的精英冲突模式与其他的观点进行比较,目的则在于发现在两个国家不同形式的专制主义形成的过程中,哪些社会力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三、专制主义的横向与纵向策略

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英法两国国家形成的不同方向不能从某一群体的能量来解释,而应从那些释放出这些能量的群体间的结盟与冲突所造成的结果中求得解释。战略目标与群体的能力之间的不相称可以由英法两国宗教改革的不同结果得到证明。在《隐修院解散法》中,具有较高自主性的英国国家教会失去了它的财富和权威,而法国的僧侣则保留了自己的行政和财政组织。持各种观点的英国历史学家都将宗教改革看作是后来英国专制主义发展的关键步骤,并使英国的政治局面迥然相异于法国。然而上述三种观点

---

<sup>①</sup> 米切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卷第20—30页。

的理论家都不太重视僧侣和宗教改革这个因素。下面我们将说为什么英国的僧侣臣服于君主,而法国的僧侣却并不臣服于君主,然后我们将考察教会的不同命运为两国君主所提供的不同的策略机会。接着我们将评价与我的精英模式不同的三种理论,看看这些理论是否具有解释冲突与结盟的模式。

英国教会机构自主性的强度问题体现了英国僧侣在英国政治中所处地位上的弱点。由于世俗庄园主无法影响教职的任命权,并在地产争端中屡受教会法庭的反抗,他们并不愿保持教会的权威和财产。相反,法国的贵族则控制着教会的任免权以及教职的收入,因而他们愿意使教会拥有抵制王室侵犯的形式上的自主性。在弗兰西斯一世(1514—1547年)王朝期间被任命的129名主教中,有93人是佩剑贵族,他们拥有土地,并掌握着独立于王室的军队。大部分主教职位都是由来自贵族家庭的人占据着,而在职的主教事实上都拥有任命继任者的权力。其结果就是,当国王向全国主教会议提出财政和法律要求的时候,僧侣与各省贵族间的牢固纽带使得他们可以抵制王室对他们利益的威胁。由于僧侣受到贵族亲属关系的庇护,这使他们可以免于王室对他们财产的侵犯。

英国的教会是独立于郡里的庄园主的,这就形成了一种可能性,即君主只需控制僧侣等级结构最上层的几十个人物就可以了。教会的等级制,在基层僧侣和世俗庄园主之间联系的缺少,以及亨利八世对主教的支配权,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亨利八世能得到议会的批准,以将教会的收入和财产转移到王室。通过《隐修院解散法》,君主拥有了过去由教会控制的庄园的三分之一。再加上他在改革前所拥有的皇家庄园的地产,亨利八世每年能得到20万英镑的收入。这使得在和平时期,王室的财政完全可以独立于贵族和议会,并使得王室有足够的资源建立皇家官僚系统。

由于宗教改革改变了君主专制主义策略的内容,皇室已经不能从那些新的采邑中得到已经答应提供的收入。王室仍然需要得到世俗庄园主的支持,以镇压对宗教改革的反抗,并进行从1539年

开始的一系列战争。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到这一王朝的末期,即1547年,亨利八世已经放弃或出售了他在《隐修院解散法》期间得到的财富的三分之二。由于他无法得到议会的同意,以增加税收,从而支持战争,不得不出售王室的财产以支付战争的费用,而这笔费用是非常巨大的,而在那个时代,几乎欧洲所有的国王都需要支付这个代价。在《隐修院解散法》之后,大部分僧侣领主失去了其在议会中的席位,这样亨利对议会的控制也就被削弱了。世俗庄园主拒绝王室可以重新将主教任命为议会的成员。简而言之,王室对主教的控制已不再意味着在议会中得到足够的票数。这就使得世俗庄园主可以控制议会,并迫使亨利利用出售财产而不是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支付战争费用。

王室对以前寺院的土地的占有和出售,与其说是为了增加王室的收入,倒不如说是为了赢得世俗领主的支持。在1536年的求恩巡礼<sup>①</sup>中,政治上的考虑已成为第一位的。亨利八世通过任命各郡的领主为监守者,让他们管理王室新得到的庄园的办法,促使他们支持宗教改革。但是,由于王室没有完善的科层系统,就很难对这些监守者进行控制,这就使得监守者们可以将庄园主的土地向自己出租,并在缴纳租金时结成联盟,从而将庄园剩余产品的大部分据为己有。王室想改变这种状况,但遭到了抵制,最后不得不承认已有的租佃关系。

亨利八世的后继者,即著名的伊丽莎白一世竭力将以前寺院的财产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以诱使富豪们脱离农业而进入资本世界,并重新确立皇室对议会的控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专制主义的第一个步骤是解散隐修院,这为第二个步骤,即消除富豪的影响才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皇家庇护的诱饵足以使贵族们依附于王室,这就使伊丽莎白一世有可能获得对军队的控制权,以打击那些

---

<sup>①</sup> 这是一场由被排斥于王室庇护之外的教士、农民和地方势力发动的叛乱,他们试图清除宗教改革的影响。——译者注

拒绝拆除设在农村的防御工事并拒不解散武装的富豪们。这样,到16世纪末,王室就获得了对在英格兰境内的武装力量的控制权。

王室对隐修院解散期间获得的资源的利用,也改变了世俗领主内部的关系。在宗教改革之前,世俗领主是由富豪领导的政治阵营的成员。富豪向王室的靠拢,富豪的私人军队的被解散,瓦解了富豪在乡村中的统治地位。富豪实际上是被吸收到王室精英中去了,成了宫廷的侍从,成了国王在议会中的俯首帖耳的同盟者。残存下来的世俗领主成为历史学家们所称之为的“士绅”。在宗教改革后的一个世纪中,许多郡中的士绅的数目都增长了约两倍,原因在于,这些新的家族可以购买以前寺院和王室的地产。

由于富豪领袖的消失,以郡为基础的士绅的力量也被削弱了,在以前,富豪们是可以借助士绅的力量向王室施加压力的。英国的君主在郡一级创立了一种新的政治动力系统,并阻止了省一级的政治强人的重新出现,其手段是,收回已经割让给富豪们的治安官的任命权。君主将对郡治安委员会的任命权作为与士绅家族建立直接纽带的手段。王室还通过鼓励士绅组成不同的派系以争夺对治安委员会的控制权的方式来防止士绅形成内部的团结。

士绅的新的权力的主要来源是王室和僧侣不再干预他们与农民的关系。在宗教改革之后,教会法庭就失去了控制农民的土地财产的权力。王室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努力也受到王室直接控制的法官数量很少以及佃户无力提供王室法庭为推翻治安官的决定所需的费用这两个因素的限制。其结果就是,由士绅控制的郡治安委员会拥有了一种不受制约的控制农民的地产所有权的权力,并可以决定无地农民的居住地和收入。

法国并没有对隐修院加以解散,这就意味着16世纪的法国君主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消除大贵族的影响力,没有办法使其脱离在地方的基础。由于没有能力对作为对手的富豪以及他们在全国一级形成的类似于国家的组织提出挑战,法国的国王力图在地方上找到合作者,以抗衡在省一级已经存在的权力派系。许多省只

是在15世纪才成为法国的组成部分,其结果就是,这些省继续保留着他们独立时或从属于其他王国时所建立的庄园、教会机构、城市组织和司法机构。王室用牺牲个别富豪的办法来增强团体的权力,主要的做法就是向这些团体的成员提供有利可图的官职。

这种做法无论对君主的利益还是对官位拥有者的利益都是有好处的。但牺牲的是以税赋的形式来支撑这些官职的人。在设立了这些有利可图的官职之后,王室赋予这些官位的拥有者以收集税赋和杂费的权力,这就对官位拥有者在购买官位时的“投资”给予一种回报。由于贵族和僧侣几乎完全不用纳税,他们并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现在贵族和僧侣的不利之处是在于,他们以前对资源和司法权的垄断现在受到了唯利是图的官位拥有者的侵犯。

王室在朝廷和以地方为基础的官位拥有者之间建立纵向专制主义的策略扩大了王室的收入。在16世纪,出售官职的收入数额已经超过了借债的款项而成为王室额外收入的主要来源,王室全部收入的一半是来自于出售有利可图的官职,以及由鲍莱敕令所得到的收入(根据这项敕令,几任官者,如果每年向王室缴纳官职定价的1/6的款项,在他临终时,可将自己的官职出售或遗赠他人,不必归还王室——译者注)。这两项收入加在一起,在1639年高达3000万列弗尔。

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虽然通过出售官职增加了法国君主的收入,但由唯利是图的官位所有者收集来的税收所占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为了使出售有利可图的官职对潜在的购买者更有吸引力,以及为了得到这些官位拥有者的效忠,王室被迫允许唯利是图的税收者和司法官员在为王室收集的财富中提取“佣金”。这些佣金在17世纪初的时候为17%到25%,到17世纪40年代的投石党运动时期提高到40%。

王室对已经购买了有利可图的官职的贵族的有限的政治控制产生了矛盾的结果:出售官职增加了收入,但代价是由被任命的唯利是图的官员收集到的税收却减少了。王室大规模地出售有利可

图的官职为地方贵族疏远控制着各个省份的大贵族提供了财政和社会基础。通过在全省中形成唯利是图的官位拥有者集团,法国的国王成功地消除了大贵族动员较次要的精英向王室提出挑战的能力,但同时,也损害了王室从税赋中得到正常收入的能力。一旦封建领主聚集在唯利是图的官员的周围,他们就在反对设立新的官职上有了共同的利益,因为新的官职的设立将分割原来属于他们的收入和权力。这样,在王室用设立有利可图的官职的方法来形成责任和依附性的同时,它的支持者也限制了他这种做法。

设立有利可图的官职虽然使省一级的贵族不再依赖于大贵族,但并没有使他们自动地与法国的王室建立联盟。英国的君主用出售寺院财产得到的收入来引诱大富豪们依赖于王室,而16世纪法国的国王却没有这笔财富以将贵族吸收到朝廷中。相反,王室用自己的政治权力造就了一种非庄园式的收入形式,这种做法为王室获得了可观的收入。法国的国王用经济强迫的方式既使自己成为唯利是图的官员的庇护人,也成为他们的竞争者。

16世纪的法国经历了连续不断的宗教战争。基督教贵族与天主教贵族为控制省一级的机构、宗教什一税和城市中的政府而不断发生冲突,法国的国王则从这种冲突中获益匪浅,他一会儿支持这一派,一会儿支持那一派,不断变化王室的联盟,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失败一方所丧失的资源。在城镇,不同的派系往往有着同样的宗教取向,要争夺的不过是对政治权力和市镇收入的控制权。省里和城市里的冲突虽然常常用宗教的口号来表达,或是声称要保护省的共同体和历史悠久的权利,但实际上往往是由于王室要赋予某个派系更多的征税和控制以前由对立派系控制的资源的权力而引发的。

在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往往要在国内或国外寻找同盟者。与16世纪英国的情形相反,法国的国王经常面对着由外国军队支持的政治上的敌人。法国“国家”的弱点就表现在,它频繁地对国内的对手做出让步,以避免外部的干涉。通过威胁要与外国的基督教力

量结成联盟,天主教贵族和大理院的法官们联合起来迫使王室在1614年召开全国三级会议,这个会议限制了国王设立新的有利可图的官职的权力。

16世纪的大部分冲突都只局限于法国国内。各派系都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以保护自己的特权不受王室以及王室与唯利是图的官员的联盟的侵犯。法国的君主虽然成功地削弱了大贵族发动军事挑战的能力,但唯利是图的官员却创造出进行武装反抗的机会。梯利所列举的许多“反国家”的叛乱,大多是由贵族和官位拥有者们煽动挑起的,即使王室将有利可图的特权转让给他们的下一代。

对16世纪英法两国专制主义的最初发展,我们在导言中提到的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都可以提供某些启示。安德森将专制主义看作是“对集权而好战的权力顶峰的政治法律限制被取代”,在法国情况确实如此。在法国,对剩余产品的抽取越来越多地是用税收的形式而不是用地租的形式,连不拥有官职的领主也越来越依赖于王室的救命,大理院决定提高农民的地租并使这些土地直接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在16世纪,大部分庄园和富豪的法庭被废除。但对于认识英格兰的专制主义,安德森的看法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英国国家的发展是由剥夺僧侣的财富和权力造成的。英国的宗教改革于无意之中强化了领主剥夺农民的财富和调节农业生产的能力。

马克思、恩格斯、杜伯、波尔克尼夫以及鲁布林斯卡娅都强调,资产阶级是国家官职的购买者,是与贵族相抗衡的,这种看法在我的分析中只能得到很有限的证明。在法国,不仅城市中的商人,包括贵族在内都是国家官职的购买者,在英国,他们所购买的则是以前属于僧侣的财产。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即英国和法国的君主都通过刺激土地与官职交易市场而促成了资产阶级利益的发展,而恩格斯所设想的因果关系恰好相反。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都通过赋予资产阶级在贸易和制造业方面的垄断权而使资产阶级的队伍壮大起来。但是,也有许多垄断权是为贵族把持的,另外一些人

则试图与贵族家庭联姻。下面的分析还将表明,这两个国家的商人都曾与贵族结盟,以保护他们的特权。

最后,梯利和曼所强调的则是国家军事和财政能力的增强,但这就会忽视两个国家存在有至关重要的区别。英国王室从隐修院的解散中获得并增加了自己的财富。但如果没有议会和士绅收税人的合作,它就不能建立一个能有效收集赋税的科层系统。英国的君主通过解除作为对手的富豪的武装而获得了军事上的安全感。相反,16世纪法国的国王却没有能在军事上支配国内对手。虽然在16世纪的时候法国这个“国家”戏剧性地增加了自己收入,但大部分收入是由唯利是图的官员收集来的,他们截留了相当一部分,而他们的利益常常是与王室的利益相对立的。

这三种观点的理论家在描述英法两国专制主义时所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对精英中的冲突给予足够的注意,没有注意到这两个国家中僧侣的不同命运。精英间的关系为英国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可能,而在法国却恰好相反。英国的君主之所以能建立一种横向的专制主义,在于英国的僧侣无论在绝对的意义上还是在相对的意义上都弱于贵族,而不在于王室的能力。

法国的国王则没有能力消除国内对手,或购买他们,这迫使他们只能进行渐进式的努力,即通过建立和操纵唯利是图的官位拥有者来形成互相强化的财政与军事能力。但是,这就使法国国王只成为国家权力的仲裁人而不是操作者。“有利可图的官职的设立将专制主义与过去的封建联系在一起了,因为这种做法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对公共权威的私人所有权,它使得富有的和有影响的国民——贵族或资本家——能分享国家的利益的威望。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即如果没有最强有力的国民的支持,国王就没有能力控制社会。”<sup>①</sup>有利可图的官职的设立并没有为自主的,科层化的国家的建立提供基础。相反,它使得过去由专制主义结构中各个单一机

<sup>①</sup> 贝克《17世纪法国的专制主义与社会》,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3页。

构代表的精英利益聚合到一起了,也就使国家置身于精英冲突之中,而精英的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

如将国家看作是某一阶级利益的代表,或将其看作是国家精英的代表,也会遇到问题,这在下一部分中将会看到,在下一部分中我将分析在英国内战和法国投石党人运动中与每一方合作的都是哪些力量。就对英法两国君主的支持而言,国家精英的成员是分裂的。内战和投石党运动检验了英国的横向专制主义和法国的纵向专制主义在遇到挑战时各自的脆弱性程度。

#### 四、国家的权力与阶级的抵抗

在17世纪初,英国国王的统治权基本上未受到挑战,尽管其实施法律和抽取资源的能力无论是在全国一级还是在地方层次上都是很有限的。他们在16世纪为建立和增强横向统治权的努力排除了实施后一种策略的可能性,后一种策略实际上是使政府能渗透于郡里的士绅组织。通过制服僧侣、摧毁富豪以及他们的地方基础,王室为士绅提供了强化其土地所有权和在地方的政治权威的条件。王室所建造的是这样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之中,士绅并不参与全国一级的政治,因此他们对在郡里支持王室的利益也不感兴趣。庄园从僧侣和王室转移到士绅手中这一事实意味着,向王室提供的剩余产品意味着要士绅作出牺牲,这种剩余产品也有一小部分是来自城市商人,因为他们往往同时也是领主,有的则与农村的士绅家庭联姻。因此,对士绅来说,朝廷并不是庇护和地位的来源,而是对他们的收入和财富的威胁。

16世纪僧侣,贵族和王室间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是使英国建立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专制主义。其他国家的君主都没有这种能消除处于国家一级的对手的机会。其结果就是,只有英国的王室才处在这样一个很难接近地方庄园的财产和权威的位置上。也只有在英国,才使国家权力与地方领主的封建性关系能完好地得以保存。

由此,英国的王室逐步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这个国家实际上是一个与控制着生产的士绅相分离并最终还要依赖于士绅的政治机构。

士绅成为一个远离王室的阶级,而且他们毋需与王室、僧侣和富豪分享对耕地和劳动力的控制权。其结果就是,士绅能够在全国一级向王室的权威提出挑战,而且不用担心在地方层次上丧失对农民的权威。为什么在英国革命和法国的投石党运动中都伴随着频繁的农民造反,而造反对领主的影响在两个国家却不相同?原因就在这里。在法国,领主们继续与人分享对农民的控制权,实际上,在向他们的佃农抽取收入时,他们越来越依赖于王室属下的官员。因此,由精英发动的反对王室的投石党运动的结果则是削弱了官员和庄园主共同拥有的对农民的权威。英国的国王在1640年丧失了自己的权威,查理一世的继任者则在内战中利用了士绅中的某些派别,但这并没有摧毁在地方层次上士绅统治佃农的机制。在英国内战期间,农民的造反并不是很多,在受到几次镇压之后,也就缓和下来了,这种情况进一步证明英国国王在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相对于士绅阶级的统治来说都处于一个相对不重要的地位。

反过来看,一旦耗尽了从僧侣那里得到的财产,王室就不得不依赖于士绅,这样才能获得为支付战争费用而需要的资源。在1634到1639年间,王室为支付战争费用而在税收上所做的努力即是一个标志。当税款用来装备海军的时候,士绅承担了收税和纳税的义务,因为他们支持这项政策。但是,当查理进行战争的时候,士绅们就开始拒绝收税。事实证明,商人也拥有在议会中阻止王室1608年提出的增加收入的企图的能力。王室并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到1640年时,王室和附属的僧侣只拥有英国庄园的10%,而在隐修院解散之前,他们则拥有40%。

查理一世努力打破由上一世纪的专制主义策略所造成的结构性限制。他试图用提供庇护的方式在郡一级寻找同盟者,但在查理

一世统治时期,领主们发现他们失去的财产要超过他们由于受到庇护而得到的财富。查理用控制垄断和贸易特权来增加收入的做法在伦敦的商人中造成了离心力。尽管查理一世在治理国家的艺术上不如其前任,但由以前的君主所创立的横向专制主义还是为查理在政策制订上提供了一种选择权,即是根据议会和郡里士绅的希望来制订政策,还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政策并从而引发革命。反对王室要求的士绅自由民和商人的动员,以及君主在内战中的失败,都是由王室在建立全国一级专制主义时所造成的精英结构所决定的。

由于无力消除掌握地方权力的富豪,法国的君主只能接近直接负责收集租税的小领主。设立有利可图的官职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策略,目的是与强有力的富豪和僧侣争夺有地方基础的庄园主的效忠。由于不能充分地制服僧侣和富豪,王室只能用向作为对手和各省富豪和作为竞争者的城市旧寡头出售军事、司法和荣誉头衔的方式来获得收入。

在17世纪的前十年中,法国国王为增加新的税收和设立新的官职而付出的政治代价急剧加大,因为这个时期军事冲突急剧增加,法国不断陷入国内和国与国的战争之中。在1600—1609年之间,王室的军费开支为每年500万列弗尔,17世纪20年代上升到1600万列弗尔,1635年增加到3200万列弗尔,1640年达到3800万。王室用出售新设立的有利可图的官职以及要求有关的官员和团体增加他们向王室提供款项的数额的方法来筹集这些费用。收入的增加曾一度对财政压力起到了缓解的作用,但城市和各省的官员用抗税的方式迫使国王不再设立可供出售的有利可图的官职。其结果就是,虽然在1639年出售有利可图的官职的收入达到3000万列弗尔,但在随后的20年中,王室从这方面得到的收入却急剧下降了,到1661年时这项收入只有80万列弗尔。

17世纪初的法国国王“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征税,也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开支,地方精英仍拥有很大的对(财政)系统实际运作

的支配权”。<sup>①</sup>但是,与英国君主不同的是,随着富豪力量的被消除,英国的君主也失去了对士绅—治安官的控制权,而法国国王却是无力调动省一级的大贵族。法国的君主发现,如果他们要从各省较小的贵族那里进一步抽取资源,就必须与最强有力的省一级的贵族结成联盟。从这些大贵族中任命的省督就成为在那个时代执行王室政策的主要工具。

从制止各自省份中发生财政和军事上的反抗的意义上说,最成功的省督往往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是由较小的领主和省里的官员组成的,省督则向他们提供保护。总督利用关系网阻止设立新的具有竞争的有利可图的职位,同时也就保证使现有官职的收入和市场价格能大幅度上升。省督还可以利用日益减少的新职位或空缺的任命权,对他的关系网给予回报。此外,省督还设法使他们在唯利是图的官员中的同盟者控制大理院,下级法庭和市镇委员会。

省督们发现,要获得自己在政治和财政上的利益,最好是使自己成为王室与省里利益间的中介人。当省督能阻止王室职位的出售和增税措施时,他就赢得了城市和各省的官员的效忠,因为后者正受到王室增加收入的要求的威胁。省督们用交替使用的手法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控制,他们先是支持王室增税的要求,然后再将新增税收的大部分以收税手续费的形式返还给同盟者,作为他们的回扣。这也使得省督们可以用不向不驯从的官员提供这种好处的办法对他们加以惩罚。一旦省督们可以用这种收买的方式获得大部分大理院法官、低等法庭、庄园和市镇委员会的效忠,他们就可以防止省里各团体团结一致的反抗。

通过省督的作用,法国的君主解决了在17世纪一直困扰着英国国王的那个问题,即如何控制那些直接接近资源的地方官员。法国的国王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消除已经稳固

<sup>①</sup> 丁·科林斯《财政对专制主义的限制》,加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地控制着各省的富豪的影响力。但是,法国的王室为了与各省的官员和平共处花费了高昂的经济代价。且不说出售有利可图的官职所花费的代价,就是王室直接获得的税款也赶不上投石党运动发生前的几十年的通货膨胀的速度。尽管名义上的直接税款由1610年的1000万里拉急剧增加到1635年的3600万里拉,但其中的大部分是用来支付官员们的回扣和王室的债权人的利息,或是由省督在各省中安排开支了。虽然省督所使用的税款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王室所赞同的各省的军事和行政活动,但国王并不能将这些款项改用于省督们并不支持的项目,或在其他省份使用这些款项。在1635年时,国王得到或能控制的款项达到了顶点,之后,这种收入就急剧下降了,原因就在于农民的抗税、官员们不愿收集新税或其他新增的派款以及官员们在税款中提取越来越多的手续费。

军费开支的增加和税收的减少造成了财政危机,王室对此所作出的反应是敦促省督们更有效地对各省的收税人进行监督的管理。省督们并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任命地方行政长官来管理税收,或削减由各省精英所控制的资源,因为这样就会与他们在各省的关系网发生对抗,王室采取种种措施设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提高财政收入的措施引起了贵族的反应。吉特林在对参与投石党运动的大理院法官和仍效忠于王室的大理院法官进行比较时发现,法官发生叛乱的主要是这样的一些省份,那或是省督与地方行政官结成联盟,或是省督无力阻止王室建立新的有利可图的法庭,因为这能减少他们的收入。<sup>①</sup>

投石党运动的目标是限制王室设立新的官职和颁布有损于现有的有利可图的官员的权力的法令的能力。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废除地方行政官员。巴黎法院清楚地表达了投石党人的这种情绪,它要求法官应保留决定是否通过和修改王室的法令的权力。各省

---

<sup>①</sup> S. 吉特林《司法人员参与投石党运动之原因》,《加拿大历史杂志》,第17卷,第275—306页。

的法院也齐声附和,要求拥有同样的权力。法官的这种要求得到了各省和城市中各种各样群体的支持。由于省督和地方行政官员在努力增加王室的收入,有利可图的官员们的利益便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成为投石党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也有些最强有力的省督们与他们的关系网站在一起,反对王室在各省中设立地方行政官的政策,但这就削弱了省督们的权威基础。

尽管有利可图的官位拥有者们都想限制王室的权力,但投石党人并不能团结一致地维持一场叛乱。虽然他们发动叛乱时拥有军事力量和策略上的优势,但他们还是被打败了,原因就在于国王与某些反对派达成了妥协,促使了反对派的分化,然后击败了残余的投石党人。曼在解释英国内战和法国投石党运动的不同结果时犯了一个错误,他强调的是在此之前君主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他认为,法国的国王能够指挥其军队反对内部和外部的敌人,而英国的君主则为了适应一个岛国的需求而将军费集中于海军。实际上,无论是查理一世还是议会都有能力募集军队,就像投石党运动的双方,即法国国王和富豪及其他团体都能募集军队一样。要说明为什么有些省的精英能同其贵族追随者决裂并服从于国王的统治,并由此提供给王室以必需的军队和财政资源,从而在较量中战胜投石党的军队,只考察君主此前的军事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投石党内部的结盟与冲突。

法国的世俗领主如果不通过竞争性的封建精英作为中介,就不可能建立起对农民的直接统治。法国的农村阶级关系保留着独特的多极精英的封建形式,这些精英控制着农业生产并从这种生产中获利。法国君主的专制主义策略削弱了僧侣和富豪对土地财产的控制权,但同时,也增强了大法官和下等法官干预领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的权力。在英国,领主是一个单一的阶级,相反,法国的精英却为争夺从农民那里收取租税的权利而斗争。在王室实现了对各省精英的控制的一个半世纪以后,也就是在掌握在唯利是图的官员手中的贵族权力经过重组之后,每一部分精英的权威都越

来越依赖于王室所特许的“特权,对这些特权可以有多种解释,但解释权是在国王那里”。<sup>①</sup>

一旦投石党人拒绝王室对王室特许的特权的控制,省里的精英们就需重新划分他们的管辖权。其结果就是,投石党人联盟在与省里的精英竞争时处于很不利的地位,甚至还不如他们臣属于国王的时候。那些占用国王不久前新设立的官职的官员和贵族以及不受投石党领导人庇护或与之结成联盟的人,并不很愿意参加投石党运动,有的很快就脱离了叛乱统一战线。投石党人不但热衷于与王室作战,而且也热衷于自己内部的竞争。虽然王室设立有利可图的官职的做法并没有能安抚住省里的精英,但却防止了反对王室的贵族形成统一战线。

法国各省的贵族为争夺特权而发生相互间的冲突,表明了他们没有能力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这一点也表现在他们没有能成功地镇压投石党运动期间发生的大规模的农民造反。王室设立有利可图的官职的做法削弱了封建领主收租的能力,也削弱了他们使用军队统治农民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由唯利是图的官员来收税,国家成了税收的中介。其结果就是,当农民们在投石党人精英的保护之下向王室抗税的时候,投石党人从收税中能提取的收入也就减少了。投石党人的现金储备很少,不足以维持一支为击败王室和农民叛乱而必须的私人军队。相反,君主却可以从投资于王室的大金融家那里得到资金,这些金融家希望王室能获得对各省的控制,从而形成还债能力。金融家们提供了足够的资源以使王室能与投石党人较量,并最终战而胜之。

投石党人没有能力维持反对王室的军队以及没有能力击败农民的造反的原因,就在于王室设立了有利可图的官职并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意味着将各种不同精英的权力融入一种单一的国家结构。“统治者决不能将自己的统治范围缩小为大政体中的一小

<sup>①</sup> W. 贝克《17世纪法国的专制主义与社会》,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19页。

块,因为他们的权威是以一套权力分享和特权赋予的制度为基础的,君主是其中的主持人。如果没有国王,就不会有权威的等级,也不会有权威中的劳动分工。但是,完全由王室接管也是不行的,因为国王要依赖于他与各省的社会联盟。”<sup>①</sup>17世纪的财政危机表明国王对各省贵族的控制是有限的,相反,投石党运动也证明,贵族和唯利是图的官员也不可能在专制主义国家之外形成一个阶级。投石党运动之后所获得的政治和解,并不意味着君主对贵族的胜利,也不是国家官僚对市民社会的胜利,而是以前独立的封建精英对单一的国家结构的适应。

## 五、结论:精英冲突与国家形成

研究专制主义的学者间的争论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在16和17世纪的英法两国,谁从民族国家的形成中获益,又是谁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损害。这三种观点都认为,专制主义的受益者也就是这个过程的推进者。在安德森看来,贵族用国家权力集权化的方式来反对农民和资产阶级。国家中心论和相对自主性理论的倡导者则认为,国家官员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阶级中分离出来,并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形成一种国家能力。相对自主性理论认为,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国家官员得到两个主要阶级——贵族和资本家——中的弱者的支持,以反对更强有力的阶级,因为这些弱者可以得到强有力的国家的帮助。我的历史分析则表明,不能简单地按照阶级或国家来界定利益和行动者。我认为,有关的行动者是精英,他们是按照不同的组织基础组织起来的。我现在再重新回顾一下我的历史依据,以表明我的集中于精英的模式可以在哪些地方有助于澄清两个社会中冲突的基础,并对这些冲突的结果加以解释。

在16世纪末叶,世俗领主、僧侣、君主及其官僚机构都组织起

<sup>①</sup> 贝克《17世纪法国的专制主义与社会》,第219页。

来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对方和农民反抗运动的侵害,从而履行对各自的精英的义务。有时,精英们会保护农民免受作为对手的精英的侵害,此时后者正通过抽取额外的农业资源来扩展自己的权力。这种冲突使得人们很难将这三种精英看作是一个单一的阶级。

在16世纪,这三种精英内部以及与农民的关系的主要力量就在于每一种类型的精英都千方百计地强化自己的组织以反对对方的组织。在这两个国家,有一种类型的精英扩展自己的组织权威并削弱对手的组织权威的能力是有差异的,这导致了两种不同模式的专制主义。我们将英国的称之为横向专制主义,强调的是君主有能力割断僧侣和一些贵族与农民的联系,同时将这两部分精英中的头面人物吸收入统一的朝廷中去。王室的这些“胜利”造成了两种孤立的政治权力,即国家层次上孤立的君主和在地方层次上的统一的士绅,后者无须与其他精英分享接近农业生产的渠道。

只与农民和资本主义的士绅保持间接的寄生性关系的国家精英,是专制主义造成的结果而不是专制主义的创立者。国家精英被国家中心论和相对自主性理论看作是专制主义的建立者,实际上不过是英国国家形成过程的产物。王室割断作为对手的僧侣和贵族与农业基础的联系的过程创造了一类新的精英,即君主及其追随者。从对农业生产的支配权和国家组织的角度看,16世纪初期的英国君主不过是三种精英之一,但一个世纪过后,王室已经用在国家层次上垄断军事和政治权威的方式将作为对手的僧侣和富豪吸纳进单一的组织形式之中。然而使三种精英融入一个国家机构的冲突也使他们丧失了对农业经济的直接控制权,从而形成国家中心论者所讲的国家精英,与此同时,被专制主义国家排斥于权力位置和庇护网之外的封建领主却在王室权力已不复存在的地方一级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士绅。

英国革命实际上是国家精英与士绅阶级的冲突,他们的利益涉及到重新形成对农业生产的控制权。在这场对抗中,国家中心论者所强调的行政和军事能力的作用远不如士绅追逐剥夺农民的利

益的能力那样重要,皇室的国家机构所特许的权威并不起太大的作用。即使是在内战中议会和士绅分裂为不同的派系的时候,查理一世也不能在士绅、伦敦的商人和各郡的自由民中找到足够的同盟者。国王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同盟者,因为对任何精英的经济权力的维持和扩展来说,他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国王缺少为维持庇护网络从而支配全国政治所必需的资源,王室的胜利损害了本来可能支持王室的士绅、自由民和商人。

相反,法国的投石党运动就不完全是收集税赋的国家官员与付税的国家的臣民间的斗争。法国的王室没有能力实现对对手的横向统治,这迫使它将统治权割让给现在由其他精英控制的机构。法国的王室只有通过创立更多的主权制度,如新的唯利是图的精英,才能削弱作为对手的精英。投石党人的失败与其说是王室使用军队的能力的结果,不如说是由按纵向组织的国家中不同精英利益分布的结果。反国家的叛乱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大部分精英都置身于国家机构之中,而且只有通过国家才能表达自己的利益。

安德森将专制主义国家看作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重新安排,就这一点而言,他是正确的。但是,在考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农民和领主间的斗争的时候,他就无法解释两国专制主义形成时的差别了。无论是安德森的阶级分析,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自主性理论,都会将我们引入歧途,从而将资产阶级看作是处于专制主义之外,尽管有时它也会依赖于这个专制主义国家。按我的分析来看,资产阶级的产生过程是有差异的。英法两国保护和组织自己利益的不同方式,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自主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由精英冲突的不同阵营和专制主义形成的不同道路所造成的可能性的结果。在英国,精英冲突造成了士绅阶级的统治结构,这个结构是外在于专制主义的,并从而增强了摧毁专制主义的能力,这就为伦敦的商人反对国王提供了机会。在法国,纵向专制主义只为资本拥有者创造了买官或向国家放债的狭窄机会,这就防止了官位拥

有者与反对王室的领主们结成广泛的联盟。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性质迫使它在投石党运动中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以地主为基础的英国士绅则脱离了国家,这两个国家中资产阶级的不同表现,是由不同阶级在结构中的位置决定的,而不是由自身的绝对力量和成熟程度决定的。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发展的可能性,是精英间冲突的产物。

应该将国家纳入到对英法两国近代史初期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去。但不应将其作为行动者或一种利益,而应将其看作是各种行动者中长期冲突的结果。要获得对专制主义的理解,就应考虑到专制主义的不同形式,并将其纳入封建精英是如何改造自己并形成他们的统治并在其中发生斗争的新结构的研究中去。

(孙立平 译)

P.F. 苏加

## 土耳其的经济与政治现代化\*

### 一、导 论

自1946年以来,有许多优秀的学者致力于研究“不发达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使用像“西方化”或“现代化”这样的名词,这些名词都有进步的含义。在经济学中,增长和工业化这样的概念也常常使用,这些名词也常常具有进步的含义。有时候,像工业化、西方化、现代化这些术语,往往被作为同义语。

这些术语本身都没有错。使用这些术语的著作和以这些术语作为基础的理论对我们认识社会中的变迁过程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同时也遗留下许多问题。我们怎样来定义和量度现代化、西方化和进步这些概念?在面对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时候所使用的标准往往是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和历史经验中派生出来的。然而,除了少数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东欧、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不发达”国家所继承的都是另外的传统,许多国家都极力反对西方的价值观。而且即使发展中社会愿意在某些方面按照西方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标准来衡量进步,这也不见得是正确的。

---

\* 选自 R. 华德和 D. 拉斯托主编的《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1964年。

如果我们能够计算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稳定方面为经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就不会那样乐观了。很可能情况是,量的(技术上的)进步必然导致质的(文化上的)退步。

这表明,用“发展”这个词来表达社会变迁要比“进步”这个词更为合适。无论何种变迁,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抑或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发生的,都体现了“发展”。因此这个词是中性的。

考察一下世界不同地区的经济与政治发展,我们可以较容易地做出如下的区分:有些国家的发展是“有机的”(organically),而另外一些国家的发展则是“引进的”(induced)。这两种类型的国家是分别由于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时间里、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变迁的。

在西欧,一个所谓现代的或西方的社会是“有机地”发展起来的。在中世纪的后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商业和城市生活的复兴以及制造业的增长,这个过程开始了。这种发展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力量,即公民或城市居民,他们从自己的经济活动中获取了政治上的权力。资本家需要有自由和保障,以从事他们的商业活动,于是,他们对能为他们提供这些东西的人——统治者——给予支持。现代国家就是从这种联盟中产生出来的。但统治者与公民的关系总不时处于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在18世纪末达到高峰,最终则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这种有机的发展开始于经济活动中的变迁,并导致了社会中新的力量,即资产阶级的形成,然后通过新的利益集团与统治者的合作建立了一种集权化的国家。虽然统治者的目标与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目标并不一致,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统治者将是软弱无力的,统治者通过提供特许权和特权从而保证那些人及其经济活动的自由而买到了这种支持。几个世纪以后,当资产阶级想以统治者的进一步让步来扩展自己的权力的时候,他们成功地进行了革命,并最终建立了立宪政府。这种政府最终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他们迫切需要的东西:有秩序的但又是个人主义的社会。

其整个发展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西欧的优势在于它有很长的从容的时间完全按照自己的路子发展,并在最后的几次大移

民之后,提供了发展的榜样。而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由于来自外部的干预,他们没有足够从容的时间来形成独立的、与前者不同的政策,或按照适合本地条件的方式发展,而且他们也无法获得像西方世界那样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信念。在15世纪之后,社会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力量差距日趋扩大,这最初使非西方国家为了生存不得不模仿西方国家。

所有最近的“引进”型的发展——从彼得大帝到纳赛尔、毛和恩克鲁玛——都把获得类似西方的那种力量作为自己的直接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想西方化的人都是反西方的:他们想在他们的国家和地区中将西方国家的现实的和想象的影响清除掉。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引进”型发展的大量例证,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他一些重要特征。西方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脱离那种为大多数人所习惯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所珍惜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模式。因此,发展是被某个或某些“领袖”引进来的,他们感到自己的社会是软弱无力的,并且他们认为自己能够迫使社会发生变化。但在这些领袖开始自己的事业之前,他们必须拥有某些迫使人们这样做的手段。通常的手段就是一个科层系统,这个系统主要并不是以以前的行政机构为基础的,因而愿意促进变革。

总起来说,那些想赶超的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从政治结构的改造开始,这是与西欧国家“有机”发展不同的。在这样的国家,最初发生的只是权力的内部转移,而不是改变他们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中的权力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第二步的也是更彻底的变革。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开始于领导人在新的科层系统的支持下打破本地区的政治稳态;人们可以发现,甚至当新的政治领导人说经济变革是唯一的目標的时候,这种变化就开始发生了。他们甚至也可能宣布,所要进行的改革是为维护社会中旧的价值观念。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人们经常听到这种声音,这也是今天的阿拉伯领导人经常使用的一种理性化的措施。现代理性化的特征之一,就是披着传统外衣的新的经济民族主义。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种人为促进的发展,就可以再一次发现,是先有政治变革然后才有经济变革,而且这种经济变革至少是部分地由政府启动的。在这种经济成为本社会的“有机”部分之前究竟要耗费多少时间,这取决于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在技术和经济方面所具有的能力,也取决于那些可以对重大的经济决策有影响的人的能力。虽然也会有个别例外,但在大部分情况下,随着新的经济的“成形”,会出现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有时这个中产阶级会在新的经济成形之前几年的时间里形成。下一步的国家发展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而且有关的环境因素是极为复杂的,我们无法在这里进行分析。我们已经收集了一些例子,包括门德列斯政权后期的土耳其,这些例子中的中产阶级都是反对政府的。但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冲突都是如何解决的。

在这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中,我们不需要过多考虑赋予每一种发展努力以个性的那些差异。只要我们想象一下像纳赛尔、毛以及恩克鲁玛这些完全不同的人物,其差异就不言而喻了。让我们概括一下,一种“引进”型的发展在时间顺序上包括:(1)外部刺激,通常是以强权的形式出现;(2)一个(或一些)想使自己的国家具有同样力量的领导人的出现;(3)新的科层系统的形式,政治结构发生变革;(4)由中央政府规划的、并部分地是由中央政府管理的经济变革;(5)由于集体经济利益表达的多样化,中产阶级出现。

从表面上看,这个顺序明显不同于有机发展社会所呈现的顺序。

我们现在可以更进一步地追溯一下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史——这一段历史发端于谢里姆三世王朝(1789—1807),而到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

## 二、奥斯曼改革:1789—1877

在用改革的方式来挽救权力平衡的国家中,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奥斯曼是靠征战发展和繁荣起来的,在16世纪后期和17

世纪的时候,它能够蔑视一切困难,因为这些困难并没有预示着会带来一场军事上的灾难。在卡罗维茨和平协议签订(1699)整整90年之后,第一位改革者谢里姆三世出现了,这个条约是1402年安卡拉战役之后奥斯曼第一次承认战败,这也是奥斯曼变得保守的一个标志。

毫无疑问,谢里姆三世是一个老派的统治者。他的目的是想恢复这个国家的军事优势,以重新占领丧失了的领土,并为穆斯林征服新的领地;他向西方采借军事知识,然后再反过来反对西方。但他很明智地认识到,这种采借不可能只限于购买军火和采用其军事训练方法。他的计划中还包括建立军械、军事指挥以及其他一些专门化的学校。<sup>①</sup>他要尽可能地寻求独立的手段,至少就军事而言是如此。但19世纪的奥斯曼社会却不能容忍这些并非根本性的革新,他为他的改革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我们讲奥斯曼社会的时候,我们是指在其人口中只占少数的上层人,他们通过他们拥有的文化、教育和地位而成为奥斯曼的精英。他们或是充任朝廷的顾问,或是任职于科层系统和军队,有的则是属于在帝国的宗教—法律机构中任职的乌里玛(有学问的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所拥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使他们成为可以用奥斯曼这个名称来称呼自己的唯一一批人。<sup>②</sup>

---

<sup>①</sup> 目的在于进行军事改革的第一所学校是苏丹马哈茂德一世(1730—1754)时期于1734年由法国的邦纳瓦尔建立的几何学校,或称亨代塞汉埃。在穆斯塔法二世时期(1757—1774),由另一个叫托特的法国人建立了一个数学学校以培训海军军官。因此在谢里姆三世为军队建立专门学校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些先例可循。对他及马哈茂德二世所创建的学校,见B.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1961年,第58、82—85页。

<sup>②</sup> 在这篇论文中,我所说的这个群体是指职业穆斯林。穆斯林是帝国中唯一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只是很少的一群人,祖先并不一定是土耳其人,他们或是出生于这个群体之中,或是从其他的穆斯林或非穆斯林人口中补充进来的。无论他们是否拥有官职,他们都具有下述特征:受过特别的教育、懂得官方语言、遵守穆斯林的正统传统、效忠于苏丹。此外,这个阶层还具有其他的一些相同的特征。而另外的一些迹象则表明老年奥斯曼、青年奥斯曼和青年土耳其人越来越不同于旧的职业奥斯曼阶层。服务于马哈茂德二世并在坦志麦特早期表现很优秀的老年奥斯曼成为推进改革的官员。他们代表了从职业奥斯曼的保守主义到青年奥斯曼的激进主义之间的过渡。后来,一个更有名的群体即官员中的左翼促成1876年宪法的制定,同时也是他们发起了著名的青年土耳其运动,这个运动于1908年夺取了权力。在下面还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些群体。

正是由于这个事实以及他们作为奥斯曼的团体感使这个阶级的成员有资格进入帝国行政的各个机构。而晋升则要依据虽不成文但却相当严格的规则。每一个行政机构都有自己的权利与特权,苏丹尽管在理论上是至高无上的,但他也不能侵犯这些权力和特权。如果说帝国中作为一个整体的奥斯曼只是代表着少数寡头的话,那么在这个阶层的内部我们却可以发现存在着某些类似于制衡的东西——很接近于一种有限的立宪主义,因为每个人的职权以及他们的集体权利是为苏丹所尊重的,尽管私人的权利并不包括在内。

谢里姆的改革侵犯了军人特别是乌里玛的权利,而且,对旧秩序中的某个因素的侮辱也就是对整个旧秩序的侮辱。尽管谢里姆也声称自己是正统的,但当他转向西方模式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承认奥斯曼的价值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这种缺乏对奥斯曼的自我尊重的态度还是可以被容忍的,被包容于他的宗教之中,而且反映了他整个一生的风格。

谢里姆的麻烦出在他缺少一个保护自己并推进改革的机器。他的后继者马哈茂德二世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但原因并不相同。他是统治家族中最后去世的一个男性成员,他有很强的政治感,也有很强的耐心。他的目标实际上也就是他的堂兄和教师的目标:使帝国恢复已经丧失的权力地位。但谢里姆的命运给了他以教训,他认识到他不可能使用现存的国家机器来实现这个目的。他不得不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并用自己能控制的政府机构取而代之。用技术性的术语来说,他是用专制主义取代了寡头立宪主义。特别是将自己的官员与在军队中的追随者组织起来,以在关键的岗位上取代旧的人物,并努力瓦解使统治制度具有传统的独立性的那些内在的纽带。

马哈茂德王朝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形成追随者队伍方面,直接用于改革的只有从1826年到1839年这十几年的时间,即在瓦解了禁卫军之后。禁卫军曾是奥斯曼军队的中坚,到18世纪

末期的时候已经成为一支世袭型的军事力量,并与极端保守的力量结成联盟,他们在首都和各省实行恐怖统治。汤因比将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努力看作是“将土耳其民族从崩溃的奥斯曼帝国中解救出来,他想通过一种极权主义的方式使世袭的伊斯兰转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这个国家的根基”。<sup>①</sup>在这个对阿塔图克的简短的评论中,汤因比实际上是评价了开始于马哈茂德二世的整个发展。谢里姆成为伊斯兰—奥斯曼传统的牺牲品,这个传统在理论上是专制主义的,但实际上却是有限君主制。马哈茂德二世摧毁了这个社会的政治框架,但却不能建立自己的整个权力系统。在最后的90年的时间里,马哈茂德播下的种子结出了果实,土耳其在阿卜杜勒哈密德和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专制主义统治下生存了下来。

从1789年到禁卫军的解体这一时期的土耳其历史代表了“引进”型现代化的前两个阶段:首先是外部威胁的出现,然后是准备应付这种挑战的领导人的出现。1826年开始了第二个时期,相当于第三和第四两个发展阶段,先是政治的转变,后是经济的转变。我们认为,在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互相作用的关系。政治变迁之所以首先发生,是为了向国家提供必需的文职和军事服务人员。

马哈茂德死后紧跟着一个坦志麦特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伸到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之前。在1878年,阿卜杜勒哈密德宣布暂停实行1876年宪法,第二年建立了他的王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部宪法使坦志麦特达到顶峰。历史学家在争论:坦志麦特改革是代表了改进国家和人民状况的真诚的努力呢,还是为了粉饰门面以取悦于奥斯曼为了与俄国相抗衡而不得不依赖的西方呢?大部分权威人士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尽管如此,所发生的变革还是使回到过去

<sup>①</sup> 《观众》卷CLXI,第5760号,1939年11月18日,第580页。

不再可能。旧的帝国已经一去不返了。特别重要的是,在将近 40 年的时间里,政府已经变得越来越集权化,权力集中在日益发展的科层系统中的一些人手中,而能拥有这种权力的人在数量上越来越少。

这个科层系统明显不同于马哈茂德摧毁的那个科层系统。这个系统不再拥有同样的地位和特权,这个系统中原来的晋升渠道也不复存在。晋升的最可靠的渠道是西式教育,至少也要懂法语或其他西方语言。但这个科层系统的成员都是来自于奥斯曼阶级,他们持有这个阶级的价值观。人们用坦志麦特来称呼这个新的科层系统统治的时期,就表明了一种很强的怀旧情绪,因为坦志麦特有革新、修理和重新建立秩序的意思。虽然使用了一些新的手段,但帝国还是按原来的形式重建起来了;它并不是以欧洲为模式的。作为法律和教育领域中的改革者的哈米德·杰夫代特帕夏(1822—1895)在使奥斯曼帝国西方化方面所做的工作要远远超过政治家所做的各种努力,但他也是一个老派的奥斯曼,被培养成为一个阿里姆(乌里玛中的一员)。

坦志麦特的第一代官员努力在法律、教育、军事和政治方面进行改革,但在 19 世纪中期以前,经济发展问题并没有受到官员们的重视。甚至在第二代坦志麦特人之中,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对经济问题真正懂行或真正对经济感兴趣的人。奥斯曼的传统教育中并不包括有关经济的内容,经济活动主要是由这个国家中的天主教和犹太教居民来干的——他们都是次等公民,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奥斯曼的生活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当然也有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在耕种土地、放牧和从事手工业的工作。但精英们是很看不起他们的。在 19 世纪,即使是在下层的穆斯林中,也没有多少人从事商业活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看,这里都没有形成一个穆斯林中产阶级,从而使科层系统能够从他们之中聘用经济官员。穆斯林—奥斯曼中产阶级以及后来的土耳其的中产阶级的缺乏——他们

本来是应在商业、制造业和交通业中谋生的——以及专业人员的缺少,便成为经济增长的严重障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共和国的初期。

上面这些职业都是由少数民族来从事的,他们提供了许多的服务,但却不拥有中央政府中的权力。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直到19世纪中期,少数民族中这个在经济上极为重要的部分一直在拒绝任何形式的行政任命。他们努力逃避他们国家的管辖,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即“莱凡丁”。

莱凡丁的出现是一系列的投降条约所造成的结果。这里我们毋需更详尽地去追溯这些条约的历史。与此有关的第一个重要条约就是1740年由马哈茂德一世与法国签订的。随后与法国和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都是以这个条约为蓝本的。在这些条约中向西方赋予的特权包括宗教及宗教运动的自由、个人以居住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免税、领事裁判权、将关税限制在奥斯曼帝国进口商品价格的3%以内。只是在1838年与英国签订的投降条约中(主要是针对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将免税的规定从苏丹控制的层次扩大到省督控制的层次。

在穆罕默德二世和苏莱曼一世签署对西方国家的投降协定的时候,这些条约既符合西方的惯例也符合奥斯曼的惯例。欧洲的封建法都是个人法而不是地域法,相反,奥斯曼的惯例则是每个米勒特都有自己特殊的法规。奥斯曼帝国中的少数民族最初只是一些少数宗教的拥护者,后来他们组成米勒特,他们拥有支配自己生活的广泛权利。在早期的苏丹看来,签订投降条约不过是将米勒特制度扩大到外国人而已。到18世纪的时候,西欧在法律方面的情形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在奥斯曼帝国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奥斯曼对先例的笃信以及其政府的懦弱使西方国家能在这些一些现代的条约中获得单方面的权利,而在较早的一些条约中,特权都是互相提供的。也正是由于

他们的实力,西方国家可以将他们所获得的特权扩大到条约所规定的范围之外。比如,我们在这些条约文本中既见不到有关建立外国邮局的规定,也没有规定允许他们可以参与创造出一个莱凡丁群体。

由于奥斯曼无法阻止列强随意扩大自己的特权,莱凡丁出现了。最初的时候,条约的规定所涉及的只是外国的公民。特权和豁免权首先扩大到为外国使馆和领事馆工作的非穆斯林的奥斯曼国民,然后扩大到一些寺庙和宗教社区,最后扩大到本国内一些被外国使馆和领事馆保护的贝拉特证持有者。贝拉特证是由外方机构向有关人员发放的一种证书,以保证他们受到外国外交机构的保护。当贝拉特证持有者所享有的豁免权变成世袭的时候,莱凡丁阶级就形成了。贝拉特证授予的范围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证明。在18世纪末期,在摩尔多瓦有20000名奥地利人,在瓦拉吉亚有60000名奥地利人,当俄国在这些公国的势力占据支配地位时,所有这些人都会将他们的奥地利贝拉特证卖给了俄国人。

投降协定也引起了帝国的许多经济问题,甚至在共和国时期也深受其害。但投降条约在早期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至少到19世纪中期为止,这些条约并没有妨碍经济增长,因为这些外国人和少数群体成员对商业和金融感兴趣,他们在条约保护下从事的这些活动在其他条件下也可以进行。由于将经济上的特权与治外法权联系在一起,这些条约使少数民族中在经济上最活跃的那部分人成为外国的被保护者,他们并不效忠于帝国政府,在有关经济的知识和经验方面也与帝国不同。总而言之,通过条约的疏离作用,在帝国中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

奥斯曼对投降条约最初进行的抗争目的主要不是在于条约中那些有关经济的条款,而是贝拉特证的发放很滥。在1836年,西方列强最终同意限制发放这种保护证件的数量,但仍坚

持认为,那些已经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居民家庭仍可保持他们的权利。但实际上在那时之后,滥发证件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在1869年政府颁布了一个法令,其中规定想要改变国籍的奥斯曼人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并不得重新返回。虽然对外国权力的这种限制使奥斯曼人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感,但并无助于奥斯曼人与贝拉特证持有者进行竞争——后者被人们认为是最好的目标。

虽然在坦志麦特下半期权威们开始认识到经济进步的重要性,但帝国实际的经济发展仍是微不足道的,经济的发展只限于外国人开办的企业和政府拥有的企业。在土耳其本土,发展只限于伊斯坦布尔的公用事业,而这些事业都是由外国人创办的,政府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不得不对企业家做出让步,并赋予其特权。不恰当的财政管理,过时的税收结构,以及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1861—1876)的无度挥霍,奥斯曼帝国很快就感到财政上的困难,这些财政上的困难阻碍了其经济活动。结果是对国家进行改革的要求日益增加。

正如人们都知道的,这些困难导致了不断向外国举债,债台日渐高筑,最后终于在1881年建立了奥斯曼公债行政委员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这个行政机关管理着7.16亿美元的债务。法国是最大的债权人(占总数的60%),其次是德国(占20%)和英国(占15%)。在1911—1912财政年度,奥斯曼帝国预算的30.7%是属于公债行政委员会用来支付债务的。一方面要还债,另一方面则要继续借债,因为只有举借新债才能弥补预算中的赤字,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王朝(1876—1909)时期,每年举借的新债平均为1300万美元。

这些数字虽然有限,但可足以说明奥斯曼政府面对的经济问题之严重,足以说明为什么经济进步的速度是如此之慢,因为这种经济进步要依赖于政府的投资。甚至在1881年公债行政委员会建立和公债大量增加之前,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新

的收入来源,以平衡预算和付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实行了多种国家垄断措施,并努力修改关税的税率。概括地说,造就了莱凡丁群体的投降协议与公债一起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这种障碍是坦志麦特时期的国务活动家及其后继者难以逾越的。而没有任何奥斯曼的官员直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之所以决意废除发放贝拉特证制度,主要是为了满足反对莱凡丁这种较为原始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要求提高关税税率也只是出于充实国库的考虑。

在1826年掌握着权力的职业奥斯曼人对经济问题既不感兴趣也不懂行。但在从1826年到1877年这一时期,土耳其的统治者至少已经多少认识到经济是总体国力中的一个因素。在1831年,马哈茂德二世废除了蒂马尔(Timars)这种封建的占有制度,在摧毁了禁卫军之后,又将埃夫卡弗的财产(穆斯林宗教制度的财产)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这些改革的目的是削弱苏丹的支持者,即地主和乌里玛的力量。但不幸的是,所获得的收入并没有用于经济改革。农民仍像几百年前那样生活和工作,只不过他们现在是向土地包租人纳税,而不是向宗教或世俗的地主纳税。

青年土耳其对经济看法具有明显的进步性,虽然他们是职业奥斯曼的子孙,但他们受过西方教育,并准备将他们的帝国改造成一个欧洲式的国家。但只是在一段很短暂且又充满各种麻烦的时间里(1876—1877)他们才拥有真正的权力手段,当时,米哈特帕夏担任大维齐,上层阶级对经济事务持有一种明确的观点,这与青年土耳其的某些观点是相一致的。

### 三、哈米德与青年土耳其时期

在谢里姆三世继位到坦志麦特时期结束这一段时间里发生的变化为其后帝国的维持提供了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为共和国

提供了模式。不断扩大的科层系统变得越来越集权化,行使这种权力的是这个科层系统中那些在数量上不断减少的人。在整个国家的生活中数量不断减少的权力精英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尽管如此,它却无法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传统的价值体系以及由投降协议派生的困难也阻碍着这些问题的解决——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阻碍作用越来越小。最终,政府深受缺乏经济领导权之苦,而穆斯林—奥斯曼人并不能产生出一个企业家阶级。在整个哈米德和青年土耳其时期,这种状况一直是存在的,对此我们不准备进行过多的讨论。

在坦志麦特时期以后,对关税税率进行了一系列修改。税率首先从3%提高到5%,然后增加到8%,最后在1907年提高到11%。但是增加的收入并没有缓和政府在财政上的窘境,因为关税收入和国家垄断企业的收入(1874年主要是烟草,1875年主要是火药)都要交给公债行政委员会。垄断企业制度的引进表明奥斯曼帝国采取了某些欧洲的财政措施。但是,在税收改革上它却没有模仿西方,本来这个措施所能获得的收入将超过由其他措施获得收入的总和。大部分埃夫卡弗收入和农业收入已经由国家控制了。有能力纳税的企业所纳税额之高,常常达到损害作为税收来源的企业进一步发展的能力的程度,而且在整个经济活动处于停滞状态的国家中,要创立新的企业也往往是不可能的。奥斯曼帝国所形成的资本,无论是由外国人形成的,还是莱凡丁和穆斯林形成的,都大多或是直接流入国外,或是通过购买外国商品而流到国外。其余能留在帝国中的部分,也是被用来在首都或周围的农村地区建筑住房或别墅。但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国家还是努力增加自己的收入,这些收入基本被用来维持哈米德的日益庞大的专制机器。

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王朝时期,还是在某些方面获得了经济的发展。除了公用事业之外,主要是港口和铁路的修建。在铁路方面,除了在经济上并没有多大价值的西加兹线之外,其余的铁路都

是由外国人修建并管理的,他们在这方面获得了特许权,<sup>①</sup>他们修建的每一公里铁路都从奥斯曼国库中得到巨额报酬,而且他们还常常通过铺设弯道人为地加长铁路的长度。筑路公司也要求沿线的资源开发权。筑建铁路所得到的好处又一次流到国外。

在阿卜杜勒哈密德王朝时期所获得的经济发展中,只有铁路的修建有实际的重要意义。但同一时期所发生的政治变迁则是更重要的。在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时期,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专制主义统治,从而使从谢里姆三世时期开始的集权化过程推到了顶峰。阿卜杜勒哈密德是一个爱国者,因为他想改善他的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但他却不喜欢坦志麦特时期所使用的变革方式以及后来的青年奥斯曼和青年土耳其所倡导的变革方式。甚至连传

① 据安卡拉出版的《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1934年10月)提供的数字,共和国继承到2455英里(4083公里)的铁路。下面的数字是根据拉芬达尔《土耳其:商业与工业手册》(美国商业部内外贸易局编的贸易促进丛书第28号,1926年,第46—53页)整理的。

1. 奥斯曼修建的:

海达帕夏——伊兹米特\* 56英里 1871年开工

2. 英国建设并管理的:

伊兹米特——艾登 } 1866年开工

伊斯米特——卡萨巴 } 1866年开工

卡萨巴——阿拉谢希尔 } 664英里 1875年开工

梅尔辛——阿达纳\*\* 1886年开工

马尼萨——阿菲尔卡拉希萨尔 } 1890—1912

3. 法国建设和管理的:

牡丹亚——布尔萨 26英里 1892年开工

4. 德国建设并管理的:\*\*\*

科尼亚——阿勒泊(主要在土耳其) 650英里 1904—1918

5. 跨国公司(主要为法国资本):

伊斯坦布尔——吕勒布尔加兹 174英里 1888年开工

伊兹米特——安卡拉 303英里 1892年开工

埃斯基谢希尔——科尼亚 276英里 1896年开工

\* 1880年归英国人管理。

\*\* 1896年转归法国管理,1908年转归德国管理。

\*\*\* 法国资本也参加了这条铁路的修建。

统的老年奥斯曼也对他的个人统治感到担忧,在某些方面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利,从而怀着一种怀旧的情绪过着退休生活,对此德怀特(H. Dwight)在《斯坦波尔之夜》中做了很好的描述。青年奥斯曼则过着被流放的生活。为苏丹工作的机会主义者的人数是很少的。

这些机会主义者与一个新的群体一起掌握着行政机构,这个新的群体虽不一定是土耳其人,但一定要是穆斯林,他们并不参与制定政策,只是执行阿卜杜勒哈密德的命令。这些无根基且又是封闭性的群体甚至与数量极为有限的上层阶级也没有什么联系,他们是被囚禁在官位上的囚徒,就如同阿卜杜勒哈密德是伊尔地兹宫中的囚徒一样。坦志麦特时期的国务活动家们虽然由于他们的创新行为而没有得到公众的拥护,但他们的出身、地位和人格所具有的威望还是使他们受到尊重。而阿卜杜勒哈密德的官员则为人们所深恶痛绝。狡猾的苏丹很了解其官员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在1908年青年土耳其运动发生时,他很快就投降了。在阿卜杜勒哈密德的警察国家中,有几百年历史的旧的奥斯曼行政机构最终灭亡了,并为青年土耳其和共和国领导下进行的新的实验开通了道路。

青年土耳其是一个新的领袖集团。“土耳其”这个名词赋予他们一种民族主义的含义,就像我们讲“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样。虽然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国家,但他们是高度西方化的,这使得他们有可能倡导少数民族也拥有同等的权力,至少在1911年以前是如此。但他们对西方的津津乐道并不适宜,在阿卜杜勒哈密德的阴谋、与意大利的战争、巴尔干战争的压力之下,其中的有些人不得不披上旧奥斯曼和哈密德的外衣。阿卜杜勒哈密德的专制统治被青年土耳其恩维尔帕夏、杰马勒帕夏和塔拉特帕夏三驾马车的专制统治代替了,少数民族又一次被排斥于权力之外,虽然其名义是泛土耳其主义而不是泛奥斯曼主义。科层系统仍是消极地执行命令。

如果说在政治上青年土耳其不久就转回到“奥斯曼”或“哈米德”的风格,但他们对经济的看法与其前任则是不同的。他们知道经济是国家力量的基础,并认识到,国家应在经济发展中起领导作用,而不应仅仅是采取一些财政措施。在对私营经济的看法方面,他们认为从欧洲进口工业品将剥夺本地的手工业者的谋生手段,并会迫使他们转向农业。能维持下来的工业企业数量很少,而且所有权几乎都属于外国人,用以出口的只要农产品和原材料。设在奥斯曼帝国的外国银行也只向事业性项目和由公债行政委员会经营的项目投资。

于是青年土耳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规划,并对这些规划项目加以实施。为了刺激经济企业的发展,他们在1909年通过了《工业鼓励法》,在1915年又进行了重新修订。到1915年的时候,他们自我夸耀说,已经在7个最大的城市中建立了282个雇佣工人达5人以上的工业企业,劳动力总人数达到14060人。这些企业中的55%是在伊斯坦布尔,88%是私人所有的。在战争期间,战争虽然使政府可以用有差异的特殊税率来代替投降协议所规定的关税税率,但工业生产(除酿酒业和鱼罐头加工业之外)还是急剧下降了,因为“任何有关对经济的考虑都会被他们(战时的国家领导人)斥之为危险的情绪”。<sup>①</sup>但是政府的内部,却发生了一种重要的进展。在战争年代里,规划和控制经济的机构不断完善起来——这种机构在共和国时期也是非常重要的。

青年土耳其如此容易地转向专制主义并不奇怪。虽然他们本身并不是老式的奥斯曼人,但他们是在仍然保留着旧价值的学校中接受教育的。在他们执掌政权的10年时间里,他们面对着革命运动并经历了4次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实行强有力的集权化领导。青年土耳其——他们本身主要是军人,受过特殊的训练——认为应当实行这种类型的领导。虽然取得的成就有限,但毕竟还是取

<sup>①</sup> A.埃明《世界大战时的土耳其》,New Haven,1930,第107页。

得一些成就。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批对工业进行立法并认识到经济对政治有重要影响的统治者。他们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策,以抛弃奥斯曼—穆斯林式的政治,采纳了土耳其民族主义。他们这种真诚而并非完全无效的努力肯定有助于后来阿塔图克——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的不朽的事业的实现。

#### 四、从帝国到共和国

我们不再仔细考察从 1918 年 10 月 30 日穆德洛斯停战协定到 1923 年 7 月 24 日洛桑和约这几年时间。在战争、内战和不同的政府互相争夺的年代里,我们很难发现明显的经济发展——在土耳其确实没有发现。

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政治领域中的重要变化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在 1912 年 1 月,革命的国民议会宣布了国家的独立,1922 年宣布苏丹制结束。洛桑和约使这个国家得以重新进入国际社会,在洛桑和约签订之后的 3 个月,国民议会宣布建立共和国。对于这些事件我们记住就是了,用不着进行更详尽的考察。

在 1918 年到 1922 年间支持苏丹的旧奥斯曼社会的残余或是失去了影响力、或是干脆从共和国的生活中消失了。然而,在新的行政机构取代了旧的行政机构的时候,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仍大多是旧面孔。对于朴素的安纳托利亚人来说,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看起来是人们相当熟悉的。这个政府是由一个英雄领导的,尽管这不是一个世袭型的英雄。农民们看到,围绕在他周围的人似乎仍是他们过去的领导人:乌里玛的成员、官员和军人。<sup>①</sup> 大多数朴素的公民很难感到这是一个新国家。

---

<sup>①</sup> 在 1920 年 4 月召开的国会议会中,我们发现其代表有 92 个是刚刚被解散的奥斯曼最后一届议会的议员。代表中 125 人是文职人员,13 人是市政官员,53 人是军人,53 人属于乌里玛,还有 5 人是酋长。见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 360 页,其资料引自 T. 汤纳雅《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权力基础及政治特点》,伊斯坦布尔,翻印版,第 5 页。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些人是对的;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他们则是错的。他们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共和国政府的结构和构成并不完全是新的,这个政府仍然保持着铁板一块和专横的特点。他们之所以是错的,是因为他们将新的专制主义等同于旧的专制主义,并将新的军人—官员精英等同于他们的前任。对于共和国的政府来说,他们不是想进行一场防御型的变革,而是要对国家的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进行一次总体性的改造——包括清除专断的权力本身。这种目标标志着一种真正重要的政治发展,而目标的变化也表明统治精英特征的变化。我们已经讨论了帝国的科层系统为了与自己承担的新任务相一致是如何逐步改变自己的性质和基础的。在青年土耳其统治和战争的年代里,这种改造进一步加快了,因为青年土耳其主要是军官,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在 1908 年之后,特别是 1922 年之后——他们就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官员们。

在帝国中,最好的学校、教师和设备都是为官员们提供的。因此,官员团体是最早西方化的。每一次新的改革都削弱了过去一直控制着军队的人对军队的控制权;军队规模的扩大以及所加上的新的服务项目需要更多的人充实到军队中去,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旧的军事阶级所能提供的数量;这种职业具有相当的威望,而那些并非出身于“体面”家庭而又有抱负的青年人进入这种职业也并不困难。穆斯塔法·凯末尔本人就是在奥斯曼帝国中被提升到显赫地位的第一代官员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父亲是一个很不错的官员,后来成为一个木材商,其祖父则是一位学校教师。这些人只忠于自己的职业以及从他们读书的学校中继承下来的很有限的价值观。在从 1908 年到 1924 年这一段时间里,他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他们也对统治精英中普遍发生的社会革命产生了影响。如果他们要继续拥有土耳其官员的那种优越感,他们就必须拥有比他们的前任更为理性的支持他们的威望的手段。

实际上并不只是在精英中而是在所有社会群体中都在发生变化。在西方占领伊斯坦布尔时期,那个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居民自1863年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成为外国公民的机会。而生活在希腊人占据区的人们也大多支持侵略者,他们长期被压抑的对土耳其人的敌意猛烈地爆发出来。这些人的行为使所有的少数民族人在安卡拉人的眼中都成为不可靠的和危险的人物,这也导致了1923年到1930年间的人口交换,并对仍留下来的人加以限制。

如果这个国家中的穆斯林人口可能对新的领导人的特点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那么这些领导人对他们的公民却没有抱任何幻想。穆斯塔法·凯末尔在他的讲话中对土耳其人特别是对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大加赞扬,但在实际上却没有对他们抱任何幻想。他对富裕的土地所有者的自私自利特点的判断与对农民的保守性的判断同样正确。人们不知如何去赞扬他:他对他自己从1924年到去世时所拥有的几乎无限的权力加以限制;他的按照农民能被迫接受的速度推进他的改革的能力。他很早就认识到,他的唯一潜在严重的反对派是乌里玛,必须将其摧毁——但实现这个任务要比废除君主制还要困难,因为苏丹的地位已经被一系列的因素所削弱,这些因素包括青年土耳其的议会制,战争,战后他的奴颜卑膝的行为,因此,在废除哈里发制的同时废除苏丹的职位是符合人们的要求的。

但如果不废除哈里发制,乌里玛的影响就不可能被消除。许多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追随者都或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或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反对这样做。在政府废除苏丹制的时候也许诺要保留哈里发制。因此,尽管是在这个变革的世纪中,由于这个制度获得了人们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忠诚,它的威望并没有降低。他为未来设计的时间表是非常聪明的。当公众对哈里发和谢伊赫于尔伊斯兰(帝国中重要的宗教代表人物)在希腊战争期间的“叛逆”行为还记忆犹新的时候,他开始动手了,这有助于强化他的行动的正义性。根据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请求,议会于1924年3月

3日罢免了最后一个哈里发。由于考察到伊斯兰作为国教,以及考虑到宗教机构的“重组”问题,对宗教的打击有所缓和。谢伊赫于尔伊斯兰的职位以及宗教事务部被撤销,代之以宗教事务委员会,教产的管理委托给教产基金管理总局。这样一来,政府控制了所有的宗教事务。在1928年,宪法中取消了国教的观念,尽管在人们的心中并没有取消。从最后的结束来看,宗教革命要比政治革命进行得更为顺利。

到1924年,所有传统的效忠对象都消失了。这样,穆斯塔法·凯末尔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人们都知道他,大多数人都尊重他,但大多数人也都害怕他。面对着这个将要垮台的国家,他发出的命令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就如同他在战争期间他对那支士气低落的军队行使领导权一样。尽管我们现在对新建立的古塞尔—伊诺努政权进行评价还为时过早,但我们还是可以说,在土耳其,个人统治——无论是总统的个人统治还是首相的个人统治——一直是存在着的。

## 五、土耳其共和国

新的共和国政府具有旧帝国的某些特征,包括对经济事务的忽视。然而由军人和官员组成的共和政体确实是实诚地想建立一个独立而进步的国家,以使国家强大到能抵制外国对它的事务的干涉。苏丹制和哈里发制以及这些制度所代表的那些现象正在被废除,那些为国家作决策的人毋需再用某些无关的标准来为自己决策的正当性寻找根据,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政治上的强盛、经济的发展以及完全的独立这样的目标。但穆斯塔法·凯末尔以及他的朋友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目标也可能是互相排斥的。

凯末尔主义者对西方列强的误解也影响到经济。签订投降条约的经历,一直持续到1928年的不利的关税税率,都促使新的土耳其领导人去追求一种自足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虽然他们有

关经济的概念是极为模糊不清的,但凯末尔主义者认识到,没有现代的工业经济,土耳其就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因此,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

在1924年,土耳其的经济状况是极为糟糕的。在13年的几乎是持续不断的战争之后,国家处于解组状态,实际上是处于崩溃状态。1916年已经国有化的那些项目需要开发。私人资本则掌握在持不合作态度的穆斯林地主、莱凡丁和外国人手中。许多有经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属于依据人口交换协定开始移居国外的人口。安那托利亚的土耳其人往往是愚昧的、没有受过教育的,而且在生活上是极为懒散的。当他们知道工业和商业需要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又回过头来怀念战争的时代。尽管政府并没有有意地去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但它不能对经济视而不见。然而政府所面对的是一种极为困难的情形。

我们已经看到土耳其的交通和工业设施是如何的有限。那种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加以改革的税收制度所能提供的收入是很少的,这种税收“并不是以原则为基础,而是能收多少是多少,……制度限制了人们从不愿纳税的人口中收税的积极性”。<sup>①</sup> 根据洛桑协议,4年时间里关税的收入也是很少的。虽然收入很少,土耳其却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包袱。根据1926年4月设在洛桑的仲裁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土耳其要偿付401195247美元,占旧奥斯曼公债的62.25%。同时它还负担大约925万美元的内债,还另有4800万美元的债券要兑现,并有8250万美元的纸币在流通。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直到1947年,奥斯曼的公债被全部免除之前,土耳其每年要拿出1025万美元来偿付旧帝国的债务,而政府在1928年的全部收入只有10550万美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财政上所面临的真正困难。

几乎没有有什么办法可以获得资本。这个国家只有一个重要的

<sup>①</sup> M.托恩伯格《土耳其:经济评估》,纽约,1949年,第174页。

国内银行,即吉拉特(农业)银行,这个银行是作为省督的米哈特帕夏于 1863 年开始进行的实验的一个成果,建于 1889 年。这个银行从来也没有能成为一个商业银行。包括奥斯曼银行(建于 1856 年)和塞龙尼克银行(建于 1888 年)在内的所有其他金融机构都是由外国人控制的,他们对共和国政府持一种怀疑态度,就如同共和国政府对他们所持的怀疑态度一样。为各种各样的项目寻求资本成为凯末尔政府的一个最大问题。与它的邻居苏联不同,土耳其不愿用强制性的手段从农民那里得到所需的资金,但其所采取的方法——最大限度提高最终产品的利润,主要是在官方的纺织业中——从来也没有能提供足够的资金。在土耳其共和国中,资本形成问题从没有能得很好解决过。

虽然土耳其是一个有丰富潜力的国家,但在共和国政府执政的时候,所利用的资源是很有限的。82%的人口依靠农业生存,但开垦的土地只有 13.8%。在整个国家中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7.9 人,但在已开垦的土地上则达到每平方公里 175 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首先努力去创造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在 1925 年,政府废除了农产品的什一税制度(这种制度从奥斯曼初期起一直是农业税收的基础);在 1926 年,政府按照现代化的原则修改了有关地产的法规;在 1923 年和 1929 年,分别颁布了有关的法律以指导农民的土地分配。此外,在 1945 年和 1950 年曾两次进行土地改革(今天仍在讨论有关的改革措施),但是,所有权的分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向工业发展迈出的第一步,是在 1924 年建立了埃斯(劳动或工作)银行,这是一家公认的全国最大的私人商业银行。接着,在 1927 年制定了向工业提供优惠税率和其他刺激的法律,这项法律有助于促成新工厂的建立。令人感兴趣的是,按这项法律,只有 342 家工厂——1927 年的人口普查的数字是:从事商品制造的工厂总数为 59245 家——被确认为属于“工业”的;这些工厂的雇员为 17000 人。到 1933 年,“工业”企业的数量达到 1473 家,资金总额为 3480 万美

元,雇员总数 62000 人。新建立的企业平均雇员人数只有 40 人左右,这样的规模并不适应政府想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要求。在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之前,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就是铁路的修筑和 1930 年建立的中央银行。到 1933 年,铁路建设完成了 897 英里(1405 公里),还有 483 英里(778 公里)正在施工。到 1949 年年底,铁路线的总里程达到 4723 英里(7600 公里)。

在大萧条发生的 1929 年,土耳其第一次成为自己经济的真正的主人。在整个世界上,经济不分化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土耳其也不例外。在经济和财政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土耳其政府对经济情况的干预加强了,并制定了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政策。由于在传统上政府认为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这样一来,其对经济的干预也就要比其他政府来得更为彻底和激烈。

凯末尔主义者的决定虽然有些天真,但却是合乎逻辑的。他们认为,地方的企业共同体所持的是一种不合作的态度,经济发展的速度很缓慢,正是在土耳其不能有效运转的自由企业制度造成了这场世界性的危机。

另一方面,由国家在经济进行规划并加以控制的苏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而且并没有受大萧条的影响。因此可以合乎逻辑地假定,苏联找到了既能获得发展又能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的方法。在 1930 年伊斯米特(伊诺努)首相的一次讲话暗示了即将发生的变化,他强调国家要介入经济活动。穆斯塔法·凯末尔本人在 1931 年 4 月 21 日的讲话中谈到党和国家的“基本和守恒”的原则时,将国家在这方面的活动称之为“戴夫莱特吉利克”,通常译为国家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的职责之一就是参与国家的经济生活,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实现经济的繁荣。

在这种环境下,土耳其努力改变它与苏联的关系就毫不奇怪了。莫斯科与安卡拉之间互访的次数不断增加,在 1932 年,伊斯米特首相从苏联那里得到了共和国的第一笔贷款,共 800 万美元。

此时,按苏联计划建设的开塞利纺织联合企业业已竣工,为此,土耳其欠下了苏联 1800 万美元的债务。1934 年 1 月,土耳其公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按这个计划,国家要更多地介入经济活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下列工厂置于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之下:(1)使用土耳其的原材料并为国内市场生产产品的工厂;(2)使用国内原料为出口生产成品或半成品的工厂;(3)使用进口原材料但产品主要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工厂。第一批为国家控制的产业有化工、制陶、钢铁、造纸和化纤、硫磺与铜矿的开采、棉花、木材、大麻与海绵。

为了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了两个银行,这两家银行都是国家持股的公司。旨在促进工业发展的苏梅尔银行建立于 1934 年,有 3400 万土耳其镑的资本。它接管了几个原来由协约加以控制的军火企业,后来还建立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工厂。埃梯银行主要面对采掘业,建立于 1935 年,有 2000 万土耳其镑的资本,它的业务对象为所有国有的矿山以及后来开发的或国有化的矿山。与吉拉特和埃斯银行一起,这些金融机构成为国家经济计划的执行者。如果我再加上国家垄断的企业(盐业、烟草、酿酒、火柴和炸药),政府所有的发电厂和铁路,以及 1937 年被置于国家森林开采管理局管理下的森林,我们就可以看到政府是如何对经济进行彻底控制的。

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土耳其的劳动力也是由政府加以严格控制的。1936 年的法律为劳动者提供了通行的那些保障和权利。在 1952 年之前,并没有全国性的劳工联盟,也不存在有效而合法的劳工运动。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里的罢工并不是合法的,尽管对这个问题人们正在进行讨论。

在农业方面,国家的干预时断时续。在村庄中建立了对农民进行培训的机构,贮藏和分配设施也得了改进。但除了大规模的国有示范农场之外,其生产方式和工具仍然是很原始的。

有关土耳其国家社会主义的文献是很多的。对其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用土耳其出版的大量而又较为可靠的统计资料以及

西方出版物的许多资料加以评论。但我们现在感兴趣的不是资料,而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这是土耳其对计划经济的特殊贡献——以及它与政治的关系。

土耳其的特点是它在建立国家银行上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尽管在 1935 年之后德国取代苏俄成为向土耳其提供计划和专家的主要国家,土耳其也没有照搬纳粹德国的模式。虽然有些银行的资本是来自于国家预算,有些是来自于中央银行的贷款,还有些是来自于国库的临时余额的存款,但这些银行越来越多依靠于自己以及自己开办的企业的收益。“苏梅尔银行和埃斯银行的这种资金来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可以使国营企业能自己确定投资计划。可以使他们在额外的投资得到纯利润,因而控股公司银行有足够的财力实现自我发展”<sup>①</sup>。这样使银行和工厂的管理者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并在不久之后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土耳其管理人员、经理和企业家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离开国营单位,开办了自己的企业。在缓慢成长起来的土耳其中产阶级中,这些人曾经起过并在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引进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以西方为模式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现代的而又是独立的国家。他并不想建立一个垄断型的国家。国家所有,对工业和分配手段的控制,本身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一种手段。私人企业并没有受到干扰,尽管它们很难与国营的工厂进行竞争。

在阿塔图克作出决定将外国资本排斥在外之后,无论是国营经济还是私营经济都深受资本短缺之苦。除了上面所提及的苏联的贷款之外,他只接受了英国的一笔 1300 万英镑的贷款,以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并建设卡拉比克的钢铁厂,在他去世之前,还接受了德国 1.5 亿帝国马克的一笔贷款,以用于煤矿开发计划。托恩

<sup>①</sup> R. 科尔文《土耳其的国家社会主义》,见 A. 休弗编《国家与经济增长》,纽约,1959 年,第 242 页。

伯格说,其结果是这“看起来并不像一种有计划的经济,而是像一种由政府提供大部分资本而又管理得很差的资本主义经济”<sup>①</sup>。管理的状况很差是不能否认的。铁路从没有形成一种很有效的网络。在50年代之前,大规模公路修筑计划并没有付诸实施。卡拉比克工厂就是这种低效率计划的非常典型的例子。由于军队提出的安全方面的理由,工厂建在4000英尺高的山顶上,距海很远,离宗古尔达克煤矿45英里。距迪维里吉铁矿600英里。土耳其需要铁轨、建筑用钢材和其他的小部件的钢材,但生产的产品都是很大很沉的钢板,直径都在1/2标尺竿(rods)以上。它的各个部分也是很配套的。在工厂投入生产以后,它能生产35万吨生铁,但炼钢能力只有15万吨,而轧钢厂则只有4—5万吨的生产成品的能力。“由于在这个国家中没有其他的炼钢厂,其结果就是,即使轧钢厂完全实现其生产能力,炼钢厂也只能利用其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一,鼓风炉则只能利用其生产能力的六分之一。在有些国家中,这样的资金浪费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对土耳其来说,这意味着是对本来就稀缺的资源的可怕的浪费。”<sup>②</sup>

还可以罗列出其他的一些事例,以证明托恩伯格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会造成浪费的观点。但这也代表着一种刺激经济发展的艰巨的努力,而这种发展是人们所迫切需要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出版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土耳其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如果仍然处在本国的私人企业之下,加上奥斯曼传统的障碍,这段时期之内是否能取得同样的成就,是很有疑问的。”<sup>③</sup>这种判断可以补充托恩伯格的苛刻评价。如果这些工作是由有经验的商人和经济规划专家来做而不是由拥有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军人和官员来做,犯错误的次数可能会少一些,进步也可能

① 托恩伯格《土耳其:经济评估》,第39页。

② 同上,第107页。

③ 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土耳其的经济:关于发展计划的分析与建议》,巴尔的摩,1951年,第9页。也见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82页。

会更快一些。从凯末尔主义的观点来看,只要食品的供应还是可以的,农业改革就不是首要的先决条件,重型的钢材、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工业动力工厂,也要比 T 型钢、在经济上有重要意义的铁路网以及农村电力化更为重要。国家社会主义过去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一种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混合物,创建这种制度的人了解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只是将其作为国家力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并不懂得经济计划的技术方面。根据从谢里姆三世开始的整个改革时期的哲学,特别是按照阿塔图克的目标来看,他们强调那些因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一直伴随我们到今天,尽管在形式上做了一些修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在 50 年代初期的时候,土耳其政府曾对新的经济发展道路提出过一些设想。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战时土耳其对经济的控制有所放松。1942 年通过的“瓦勒克·韦吉西”(Varlık Vergisi,征收资本税法)在理论上的理由是,政府要维持国防和中立地位,但国库却空空如也。实际上,征收资本税是晚期奥斯曼人反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一些负责任的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外国朋友们认为,这是由处在窘境中的以前的帕夏们造成的一种隔代返祖的现象,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使他们陷入窘境的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大约 8 年以后,由于联合国和西方民主所造成的压力下开始第一次真正的全国选举的时候,他们才发现 1950 年人们所讲的征收资本税法的“奇迹”的真相。他们指出——自从共和国建立后他们第一次这样成功地施加压力——征收资本税法是在外国外力下撤销的,这是对经济和财政危机所做的一次铤而走险的反应,它第一次确凿地表明国家计划经济中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同样的外部压力并没有导致经济改革吗?这里不存在一些经济变迁的迹象吗?早在 1946 年,政府就开始将战时置于政府管理之下的一些经济活动重新交给私人控制,首先是开始于面粉加工业和小麦的销售。两年之后,报纸被允许报道美国的批评以及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全国经济代表会议对国家社会主

义制度的指责。由于第四点计划和马歇尔计划,美国的压力在逐步增强。最终,在1950年,政府创建了土耳其工业发展银行,目的在于为私营企业提供工业信贷。执政的共和人民党也许诺,如果能在大选中获胜,将结束国家社会主义,而只保留国家对采矿、电力生产、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交通和通讯以及食品包装和制糖业的控制。这个党还进一步邀请国内外的资本家和企业家在国家不再加以控制的经济领域中投资。

现在看来,放弃国家社会主义只是临时的,而且是局部性的,目的只是要取悦于土耳其人口中的某一个部分。B.刘易斯教授对这部分人口发表了下述看法:“亲民主党阵营中还有另一种十分不同的成员,那就是过去几十年内在土耳其成长起来的新兴工商业中产阶级。这些人,在人民党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越来越感到不能忍耐,于是这时便借民主和自由企业的名义,起来反抗人民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抗国家社会主义,正好表明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功;因为正是由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推动,加上世界大战时期6年中立所造成的机会,才导致了这个土耳其的新阶级的产生。”<sup>①</sup>

这个新的阶级在1946年就开始支持反对党,共和党人也想重新得到他们的选票,总之这个阶级的产生可以解释1946—1950年间的经济措施和在经济方面所做的许诺。1951年和1954年由民主政府所颁布的法律也符合这个群体和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改变了阿塔图克有关外国资本的政策)。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重要的一点是保证了他们撤资的权利,包括撤出他们最初投资的货币以及他们带到这个国家作为资本的一切和他们的所得。对投资的规定包括:(1)输入的外币资本;(2)机器设备的价值;(3)商标和专利以及受保护的工艺的价值。

同时,科亚尔—门德列斯政权不久就变得如同已经消失的政

<sup>①</sup> 见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11页。

权同样独断专行,并在实践上继续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尽管他们更加强调的是以前被忽视的部门(公路、农业机械化等),之所以强调这些部门,目的是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很不幸的是,民主党政府的计划过于雄心勃勃了,财政政策制订得很草率,而对外国和国内资本的使用则几乎没有什么监督。其结果就是新的经济危机的发生,而经济危机又孕育了最终导致政府垮台的动乱。

没有人期望 1960 年春掌握权力的军政权能进行经济改革。而且很明显,最近刚刚就职的文官政府也无意于放弃国家社会主义。我们从 1962 年初的《土耳其新闻》<sup>①</sup>上看到,“伊诺努首相强调详细的经济计划的重要性,他说每一个政府机构都要将实现这一年开始的 5 年发展计划放在首位。他认为国家计划组织是从临时军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极有价值的遗产,他还认为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资源,……在工业方面,伊诺努宣布无论是国营工业还是私营工业都要按照一种协调计划发展……”在 1934 年的时候,我们也曾听到过这样的看法。私营工业必须纳入“协调计划”,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并不鼓励发展私营企业。由政府控制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现在看来仍是土耳其权威者的政策。

据我们所知,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至晚是在土耳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行的,而不再实行这个原则的时间则推迟了。这时的土耳其已经进入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所提出的发展过程的第 5 个阶段。刘易斯教授所称的土耳其的新的资产阶级不能允许自己的企业受到的关照少于国营企业以及受 1954 年法律保护的外国企业。土耳其的中产阶级他们现在所拥有的力量有多大。他们用和平的方式赢得了 1950 年的胜利,10 年以后,又赢得了一次不太顺利的胜利。他们于 1951 年阻止了已经下台的人(伊诺努首相)重新掌权,在 1960 年再次阻止了一位已经下台的人重新上台(古尔塞勒)。

在简单地考察一下土耳其社会中的这股新力量之后,我们将

---

<sup>①</sup> 1962 年 1 月第 15 卷第 4 号。

结束我们的讨论。用“资产阶级”这个词并不足以概括这个在土耳其社会中以金可利克(青年)著称的群体。土耳其人的这种表述也是不对的。除非这些年轻人都是出身于这个群体。这个阶级既包括青年人也包括老年人,也不在于他们的职业和居住地——甚至那些经营有方的农民也逐渐萌发了他们的政治意识。虽然他们的领导人是人数较少但很团结的真正的中产阶级的成员——专业人员、商人和制造业者、学生和青年军官——它实际上包括每一个受过某种教育或受到某种启蒙的土耳其人。

公民们受到的“教育”来自许多方面:国营银行和工厂,作为全国信息和宣传中心的人民议会或人民会议;不断扩大的土耳其教育事业;农民与周围城市的接触;小规模而成功的商业经营或美国军士对土耳其新兵的忠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战争年代也提供了这样的教育,因为战时各种人都要比以前更加努力工作,更加依靠于自己的能力;它也表明凯末尔主义最终成功地在人心涣散的人民中灌输了自信和自力更生的思想。无论是什么原因使土耳其人感到他们是金可利克的一部分,总之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依赖本阶级的传统价值的程度越来越低,越来越认可土耳其社会中那些新的或西式的事物。

虽然按西方的标准来说这种新的土耳其人还是很土的,但他们也要求西方人所享有的尊严和行动自由。在10年的时间里,强人领袖领导下的一党制统治两次被推翻。现在土耳其已经有了一部宪法,一种新的多党制政府以及立法机构。无论回溯谢里姆三世或阿卜杜勒哈密德的时代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个国家在政治上所发生的变迁是多么的迅速,多么的重要。

政府的经济政策对目前这种变迁起的作用并不是很重要,它所遵循的基本上还是1931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金可利克的出现,以及1934年后经济的显著发展,人们有理由推测,政府可能会修改它的政策。当政策发生变化的时候,政治发展将会对经济和社会变迁起更大的作用,这样一

来,一直在土耳其近代史上起作用的因果关系也会发生倒转。

## 六、结 论

我们已经回溯了土耳其这个国家的发展过程,在这种发展中所发生的变迁都是“引进”型的,或者说基本上是被迫发生的,这种变迁不是一种“有机的”变迁。我们已经看到,外部刺激是如何首先带来各种政治变革的;然后,在坦志麦特时期,精英们的意识中如何萌发了有关经济的考虑;接着在青年土耳其时期的决策者的心目中,经济具有了同政治同样重要的分量。我们更进一步地探讨了大萧条的影响是如何使共和国政府引进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并且从那个时候起,使自己深深地卷入了国家的经济生活。在这一段时间里,城市中产阶级有了相当的发展,在 50 年代的时候,这个阶级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门德列斯政权的被推翻使土耳其进入我们提出的发展史的最后阶段。

我们无法预测这个国家今后会转向一种什么方向。但无论向哪里发展,现在的土耳其所面对的经济基础曾远远好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时代。Z.赫斯莱哥的《土耳其:转变中的经济》<sup>①</sup>对这个国家的经济进步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下面的概述就是以该书的资料为基础的。

尽管实行了国家社会主义,但对经济并不是按国家的利益进行管理的。虽然在 1929 年到 1938 年间国家的收入增加了 44% (按 1938 年价格计算),在 1938 年到 1955 年间又增加了 71%,但同期的预算赤字分别增加了 807.9% 和 346.6%。同时,政府使这两个时期中的前一个时期的人均收入增长了 30.1%,后一个时期增长 20.3%。国家管理下的煤炭生产到 1938 年为止增长了 132%,在 1938 年到 1955 年间又增长了 42.6%。工业也取得了更

<sup>①</sup> 海牙,1958 年。

明显的进步。

这个国家目前仍是农业占据主导地位,但对土地的压力已大大减轻。开垦的面积增加了 62.4%。其结果就是,每平方公里的居民数下降了 53.2%(从 175 人减少到 82 人),尽管同时整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增长了 70.3%(从 17.9 人增加到 30.5 人)。同一时期(1936—1956 年)每公顷的经济作物的产量也有所增长。比如,每公顷甜菜的产量增长了 44.1%;棉花增长了 17.7%;马铃薯增长 220.5%;洋葱增长 123.5%。农民购买力有了增长,土耳其工业所需的国内市场不断扩大。

所有这些数字都表明,土耳其的经济地位较以前已大大提高。上一次大战结束后新兴中产阶级力量的形成以及他们表现出的独立精神则是政治状况改善的一个标志。国家进步的最后一个一般标志是土耳其经济与土耳其政治之间关系的日益密切和复杂——可以认为,这个国家正在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其变革将主要是有机的。

(孙立平 译)

W.W.洛克伍德

## 日本的经济与政治现代化\*

日本经济发展对其政治制度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其近代史的下述三个明显特征上：(1)1868年后强有力的民族国家的形成；(2)随之而来的对东亚的扩张；(3)国内更加开放的、竞争性政治的虽然缓慢但却持续不断的成长，在1931—1945年的巨大危机中，这个过程被打断。

对于与非西方世界新形成的国家相类似的那些方面，这里不再加以强调。民族自治的时代产生了非洲、南亚和中东的那些政体，但这些政体都缺乏足够的力量在国内维持秩序，并在面对外部力量时保护自己。那么，任何类型的经济发展都足以能巩固他们的权威吗？或者说，他们的经济问题会使他们处于不稳定和非道德化状态吗？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工业革命对发展中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和倾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将“不发达地区”的进步与世界和平联系起来。然而，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却不断受到一个自身已经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的远东国家的骚扰。结果是灾难性的战争。在使日本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上经济起了什么作用？人们会如何看待日本在亚洲的未来？

---

\* 选自 R. 华德和 B. 拉斯托主编的《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1964 年。

最后,民主化与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一起成为建立国家的首要目标之一。甚至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人民共和”政体也将这一点挂在嘴边。西方民主国家在扩大他们对独立国家的援助,希望他们的经济发展不只能提高他们防御直接的颠覆性威胁的能力,而且也有助于他们以自由制度为基础来建立一种稳定的秩序。虽然这种希望是似是而非的,但现在我们却没有一种关于经济进步与政治变迁的关系的完整理论。

没有人会认为,在不同的时代或社会中,他们的经历会是相似的。日本是相当独特的。日本开始现代化时所面对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舞台已经消失。但作为亚洲唯一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它对当代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和民主这些巨大力量所做的反应,仍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些力量在其他地方是如何运作的。

## 一、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

### 国家力量的资源

1850年后西方力量对日本锁国政策的冲击构成了对其政治领导人的多方面的挑战。他们面对着一种对国家独立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是来自于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的世界力量,这种力量使亚洲不断处于西方的征服之下,他们认识到现代工业技术的力量,但要获得这些技术就必须付出掌握这些技术的人以报酬。而且他们还面对着民主意识形态的挑战,而且事实很快就表明,这具有一种毁坏东方传统的权威结构的潜能。明治维新代表了日本对这些力量的第一次综合性反应。

最初,对这些技术是有选择地引进的,以满足明治政权的某些直接要求。这个政府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军事力量,因为这是为在国内控制反叛分子和在外部尽可能有效抵制敌对势力所必需的。军事力量意味着军队和现代的通讯技术,而这对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国家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军备和运输要求一系列的条

件,包括现代国家的行政机构、税收的收入以使国家不再滥印纸币、为获得支付进口的费用的出口并以此防止硬通货的枯竭、造船厂、出售机器的商店、技术教育学校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创新。

明治初期统治者为满足现代国家这些基本需求所做的努力是众所周知的。尽管他们缺少一般性的蓝图,新的内阁还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在1871年,藩的建制被废除,以有利于将政治权威集中于东京。在1873年,进行了意义深远的土地税改革,从而使来自农业的收入固定化了,在40年的时间里,这一直是政府的主要收入。在银行和货币领域中进行的实验最后导致了80年代的松为正义改革,从而为收入的稳定增长铺平了道路。随着西方设备的引入和西方技术专家的建设,发展工业的理由也就形成了。经过目标并不明确的开端,必经1874—1877年的军事叛乱和不断发生的财政危机的破坏之后,这些努力的结果越来越依稀可见了。

同时,新的安全和自由也形成了一种私人企业能得以发展的气氛。私人金融家建立了新的联合的形式,从而成为财阀的雏形,他们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以前由国家承担的管理现代工业的责任。在1880年之后,为了满足扩充海军对资金的需求,政府卖掉了大部分不能赢利的工业企业。但后来,它又建立了大规模的三幡制铁所,并实行铁路、电话和电报的国有化;政府还保留了某些兵工厂和码头;最后,政府还保留了使资本(其中大部分是私人资本)能纳入工业发展轨道的权力。除此之外,对那些对国家安全来说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贸易和殖民地企业,政府只是加以监督并提供财政资助。这些必需的控制的实施,有赖于税收和购买倾向等通常使用的手段,也依赖于它的储蓄制度、一些大规模的半官方的银行,这些银行也有私人资本参股。

这样,就在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形成了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利益联盟,这种联盟又造就了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国家工业发展的潜力,并导致了政治中心中的意义深远的变迁。

然而经济增长并不只是限于大规模的现代企业。当然大企业

的发展形成了经济的基本结构,并为整个经济增长提供了许多基本的手段。但是,国家全部产值中的大部分是来自于工业、服务业和农业中的大量的小企业。这些企业对来自市场扩大和新技术的刺激作出了反应。从1880年到1913年,农业产值增长了三分之二以上,而在此期间,可耕地数量的增加则微乎其微。工业产值增长了5倍,国民收入翻了一番多。同时,人口只从3700万增加到5200万。虽然一半以上的家庭仍是从农业中讨生活,但很明显,经济结构中根本性的变迁正在发生。

这些发展有着重要的政治含义。从内部来说,这些发展扩大了国家权力的范围、提高了其效能,即不再像以前那样只靠军队和警察来运用这种权力,而是按照某种政治利益通过其全部机构来动员资源。慢慢的,在全国范围内按照现代流动方式实现商品、资本甚至劳动力流动的基础形成了。这种新型的流动打破了乡村社会的乡土观念,并将人们日益纳入到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治之中。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来自任何方面的武装反叛问题都已不存在了。

在外部事务中,工业的进步也由于稳步地增强了其军事力量而赋予新秩序以权威。对于外部征服的担忧减少了,接着便提出要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曾规定对关税加以限制,并向外国人提供治外法权。在日本于1895年赢得对中国的战争之后,这个目标很快就实现了。简而言之,当时日本的新式军事力量对李鸿章在满洲里腐朽的军队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其舰队葬身于黄海之中。

日本能在世界政治中崭露头角几乎完全依赖于他的资源。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前,日本从没有向西方金融市场借过大宗的债款。日本也不欢迎西方企业家到日本来办厂,除非这些西方人的活动完全限于贸易,并只起辅助性的作用;它从一开始就注意保护自己经济的独立性。从这方面来看,日本与奥斯曼和中国这样的地方是截然不同的,在19世纪的奥斯曼和中国,西方企业家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政府则对外国的债主们感恩不尽,国家的主权由此受到严重损害。

在我们做出上述判断的时候,不能由此走进一个误区,即将这上百年的时间不恰当地过分浓缩了。日本在政策上的成功长达25年以上,而不是5年或10年。在新的政府的根基稳固之前,内战和通货膨胀几乎毁灭了新的政权。在这里,也不存在长期稳定的一贯性计划,在今天的某些政权中,往往将这种计划作为体面的遮羞布。但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个政府一旦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后对待错误的方式,即他们探索着建立一种制度,使这种制度能从基础上支持必不可少的增长和稳定。

这个临时拼凑起来的明治政府所关注的全部事情就是朝着始终如一的方向迈步。他们从不曾轻易地背离原来的轨道,而将国家拖入超过自己能力的海外冒险中去。与许多现代国家的政策不同,他们对福利和权力这两方面目标的追逐也不是互相矛盾的。这很类似于欧洲17世纪的重商主义。这样,商业和工业进步在政治上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巩固了民族国家的中央权威,同时将自己武装起来,以对抗海外的对手。这种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爱国主义与追逐利润的混合物,这预示着日本“金钱与武力”的联盟。

### 寡头政治的扩展

工业化武装了国家,使国家可以更有效率地运用自己的权威。这就进一步赢得了政治精英的支持,促进了实业家和职业阶级的产生,而他们对发展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大体说来,新秩序不仅为那些来自旧秩序但在新形势下还有一定影响力的贵族所接受,而且也为那些出自于平民但现在拥有权力的人所接受。武士的被取代是一个较为麻烦的问题,政府也没有能成功地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找到就业机会。但在最初10年的不稳定平安度过之后,来自这个方面的严重威胁便不复存在了。

最初的时候,权力是高度垄断的,特别是对权力的基础。这种情况导致了政治阴谋的产生和来自两个方面的不满,这种不满一方面来自于处于体制外而又想进入体制的人,另一方面来自反对权力垄断的自由主义者。但经济的增长减轻了这种不满的程度,因

为经济增长慢慢扩大了人们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机会,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在影响力和财富方面能不断向上爬。国家实力的明显增长也是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的原因之一。

对新的工业加以控制的方式是高度独裁的,但除了上层之外,这种独裁并不是很彻底的。在基本目标不变的前提下,精英们对地位和权力的竞争在缓慢地扩展。国家处于绝对的地位上,但国家本身也不是磐石一块。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并不是掌握在同样一些人手中。在政府和企业界内部以及有时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争论。与日本特有的传统相一致,即使是在这两方面达成一致意见的外表之下,也常常隐含着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反映着公共的利益,而且也反映着各方面的利益。

对国家的忠诚是强有力的,这既是有意培养的结果,也是由“帝国神话”的神圣性造成的。正是这种忠诚使日本团结起来,但后来也是这样的一种忠诚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但是,仅仅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是很难说明明治时期企业和政治的生命力的。公共决策与私人性的目标有着密切的联系。像所有成功的组织一样,明治政权部分地通过向个人的首创性提供机会而实现了自身的稳定。其基本精神是实用主义的,甚至借用传统权威的象征符号来建立现代化的合法性。特别是在经济事务中,它鼓励以成就为基础的领导力量的形成。由于它是独裁的而又有志于变迁,这使它成功地维持了秩序。

### 实业与权力

在另外的地方,或在其他时代,同样的努力也许会产生相当不同的结果。明治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是相当快的,而且由于下面两个原因,这样经济增长拓宽了而不是缩小了自由的范围。

第一,整个环境使国家需求与试图使用新技术的军人、官员和实业家的个人抱负相一致。但也有许多人的利益,如佃农和童工的利益,却很少得到保护。原来一些加以优先考虑的问题要让位于国家的富强和经济增长速度,与后来的时代相比,在那个时候,对三

井或军队参谋部有益的事情,也就是对日本有益的。

第二,现代商业企业的出现,并与他们的盟友一起创造了使不同的利益保持平衡的基础,如果政府完全忽视了其中的某些利益,就有可能被推翻。如果有时出现了僵局,特别是像一些历史悠久的派别背离了这些规矩,它也可以使政府避免独裁政权很容易犯的那些错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灾难发生之前,日本很少受到既不能在海外采取明智政策又不能对国内事务做出明智判断的军事领导人的损害,而在许多其他国家中,军队往往基本上控制着现代化的主动权。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职业军人的作用基本上限于海外的军事行动,这一方面是由于寡头制中的民间力量起了抵消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来自下层的革命威胁较弱。民间力量能在权力分享方面进行竞争,并不断取得成功,但这并不构成对国家政策基础的挑战。在20年代和30年代,当这种挑战发生的时候,作为其对手的日本军人已在其他地方进行自己的活动了。但尽管如此,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维持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在对领导权进行竞争的各群体中所形成的冲突和共识的双重过程。

日本由此避免了在专制主义政权中普遍存在的停滞以及不受限制的极权主义政权强加给它的人民的巨大灾难。日本有着很高程度的团结和纪律,正因为如此,它能够避免许多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面对的困境,即会破坏社会秩序并切断合法性来源的内部分裂。除了由残暴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偶尔搞的暗杀事件之外,它令人惊异地避免了这种错误。或者说,在1877年至1931年间,避免了用公开的暴力来决定政治上的胜负的做法。

### 老百姓

只是到了较晚的时候,老百姓才开始分享进步的成果。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大多数老百姓仍然是农民,每个家庭只有1—3英亩土地。谷物的耕作技术与人口的增长结合在一起,使这里无法像欧洲工业革命时期那样对农业进行重组。现在农民们发现,在封建地租

废除后,他们所承担的沉重的土地税提供了国家岁入的一半以上,一直到1888年以前都是如此。许多人为此而负了债或成为佃农,尽管农业生产率和收入都有了可观的提高。到上个世纪与本世纪之交时,人口的增长成为一种无情的压力。现在大约有45%的农田被租佃,每4个农民中就有一个完全没有土地。<sup>①</sup>

后来,将劳动力吸入工业和服务业的渠道形成了,这两种行业当时的增加速度都是很快的。在城市中,这些人用做小买卖的方式勉强维持着他们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些小买卖在现代工厂的周围像雨后春笋一样生长出来。在农村地区,制造业和其他可以雇佣劳动力的行业在农村的商人和土地的领导下发展起来——最有名的就是养蚕业。虽然农业人口仍然保持在大约550万户,但这些辅助性的就业机会使农户的货币收入能得以稳步增长。

从政治上来看,工业化对劳动力中增加的部分的吸收,对维持农村社会和农村政治的相对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今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对于日本战前人口平均每年增1.2%的速度来说,其人口增长速度要快于日本两三倍,这就注定了这些国家在生育率得到控制之前,将会有更密集的人口拥挤在土地上。在大约三代人的时间里,大多数日本人的物质生活都是很贫困的。然而并没有发生饥荒。个人自由和法律平等已经在法律中明文规定。在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方面,在不断得到改善;比如,在1897年到1914年间,工业中的实际工资大约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且,公共教育的扩展,城市的增长,都为年轻的一代提供了比他们的先人更多的机会。

同样重要的是,在公共的期望中并没有发生可以给明治时期的统治者带来麻烦或使其决策面对更为错综复杂情况的革命。一般的情绪是“创造性的服从”。其原因是大家都熟悉的:在长期的专制传统中养成的社会的纪律与团结;老百姓缺少与更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接触;对寡头控制能力的坚信;更重要的是当时所处的是

<sup>①</sup> 《日本普遍统计资料》,东京,1933,第682、689页。

1880年到1910年的世界,而不是19世纪60年代的世界。用诸曼的话来说,农民是将工业化的负担背在自己身上的忍辱负重的阿特拉斯(Atlas)。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可以说明形成在那个时代权威可以发挥作用的一般框架的有利条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工业革命才导致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 渐进主义与合法性

这里还应当补充两种分析。肯尼斯曾经说过:“这里不存在可以推翻现有的社会基础的明显而有效的方式。”在日本1877年至1881年的通货膨胀之后,以及1881年至1885年的通货紧缩之后发生的金融混乱都被控制在可以容忍的界限之内。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短时期的情况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并没有发生大多数人因为银根紧缩而发生贫困化的现象,以及由此导致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政府像过去那样,主要用税收来维持自己的生存。金融机制的运转以保证一个好政府所需的基本条件为标准。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如果说明治时期的政治活动家们除了向农民提供一些简陋的技术服务之外没有对农民的福利给予多少注意,那么,不能否认他们至少为农民提供了公共秩序和政治安全。他们并没有使用现代极权主义的方式迫使农民脱离他们所珍惜的生活方式,以有利于工业化。虽然渐进主义的农业政策也长期不承认农民的民主权利,但它保持了日本乡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甚至也可以说是维持了日本社会的保守主义基础。

这样的结论实际上也可以适用于日本的整个发展过程。当然,从政治上来看,维新意味着与过去的决裂,使权力转移到统治阶级中那部分有着令人鼓舞的新目标和能力的人的手中。它导致了一场结构变革,并由此形成了现代化的框架。但在此之后,发展政策都是渐进式的。他们强化了私人财产的所有权而不是削弱这种所有权。虽然对于使用国家资源来促进工业化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们的做法大部分是与已有的惯例相一致的。在哲学方面,政府的权威

中也保留着悠久的传统和实践。由于它在刺激经济增长上获得了成功,它并不鼓励提出脱离民族传统的激进要求,就像中国在本世纪初所发生的情况一样。由此,它赢得了新旧两个集团的支持。在涉及技术进步与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的关系时,日本人显示出他们特有的能力,即进行大规模的变迁,而又不造成社会秩序的崩溃。

概括地说,经济增长的维持强化了社会秩序。首先,其所获得的增长是为使国家能抵御外来威胁并维持国内稳定所必需的。第二,它遵循着经济启动的模式,由经济唤起新的动力,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如此。第三,它造就了一批精英,这些精英的数量逐步增多,并且精英之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但他们同时也保持着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使得他们能够解决内部的冲突问题。最后一点,虽然大多数人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具有从事政治活动的的能力,但大多数人都获得了经济上的利益,这种情况足以加强支持权威结构的传统准则。

简而言之,日本早期国家建设的策略是在坚决制止社会失序的同时,用变迁和增长来维持稳定。

## 二、经济发展与政治扩张

虽然在早期工业化促进了国内新的政治秩序的稳定,但没有很长时间,工业化便对太平洋地区的政治产生了明显的瓦解作用。

在进入一个掠夺性的世界的时候,日本便依照西方帝国主义的方式行事了。日本的第一次侵略是对朝鲜的侵略,当时的一些偶发事件为日本进行挑衅并打击中国提供了机会。被军事参谋部煽动起来的社会上的爱国主义情绪为帝国主义政策火上浇油。战争爆发于1894年,结果是天皇的军队取得节节胜利。当由于三国干涉迫使日本退还它占据的辽东半岛时,日本将目标转向了俄国。在大约10年时间里,日本的军人和爱国主义群体不断在中国的北部省

份制造紧张状态。由于共同建立了新的联盟,日本便毫无顾忌地在1904年在亚洲打击它的竞争者,并再次赢得了胜利,控制了朝鲜,在满洲里建立了自己的立脚点。到1914年时,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帝国,它拥有一个海外王国,而这个海外王国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它自己的那个岛国。

欧洲的自相残杀为日本的扩张提供了新的机会。对山东的强行占领、二十一条的提出以及西伯利亚远征这三次远距离的突袭证明了军人的没有止境的欲望。

不久,机会又一次出现了,萧条与幻灭对20世纪的自由力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年轻军人中的激进派在满洲里发动攻势,并迫使东京政权逐步强行占据中国东部省份。此后,这些事件进一步导致了太平洋战争。在帝国灭亡之前,帝国的版图从库页岛一直延伸到苏门答腊。

这种国家政策延续了长达四代人之久,不可能与经济发展没有关系。但是,它们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 战争与经济增长

这种关系最明显地表现在整个战争状态以及战争准备对经济准备产生的影响。军备的生产、对殖民地的占领和发展、国际竞争的较量,这些因素对国内政治的反弹——所有这一切从一开始就对日本的工业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军事机器的建立使日本避免了西方对日本的控制,从而使日本获得政治上的自由。这种最初的成就对其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在军事中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组织,从而对民间工业和职业产生了间接的积极影响。而这些因素都为现代化提供了动力,并为社会流动提供了新的阶梯;而且,正是通过征兵,军队为一代农民子弟提供一种机会,使他们第一次看到了现代世界及现代世界的运行方式。

第三,国际上的紧张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有利于

经济发展的气氛。在明治时期,外部威胁意识的存在加强了国家的团结并强化了专制主义的领导,这些也许都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有益的影响。但在1918年以后,这些因素则导致了相反的趋势。对于对外政策的分歧使国内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在独裁政府的支持下形成的军国主义导致了政治中的分裂和行政的分裂。在20年代,经济增长处于停滞状态,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上层政治的不稳定和僵持不下的局面,这也导致了政府无法解决农业问题以及经济中处于落后状态的部分的问题。

最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也对经济产生一些直接的影响,其中有些是有利的,有些是不利的。军事工业成为促进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也促进了对国家资源的更充分的利用,特别是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以及1932年至1936年的再次通货膨胀期间就更是如此。它还曾经有一次在战场上获得可观的财富——在1895年它从中国得到3800万英镑的战争赔款,朝鲜、“福摩萨”(指中国台湾,下同,译者注),还有后来的满洲里,都为日本提供了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他们都形成了对日本工业品有利的保护性市场。到30年代中期,日本出口的40%是倾销在帝国控制下的地方,而从这些地方进口的则只占进口总额的30%,其中进口的粮食占其需求量的15%。除了占领军之外,还有200万的国民居住于海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事的是实业经营和专业性的工作。

造成的损失也可相当严重的。在1895至1935年间,每年军费开支占国民预算的40%,这就挤占了国家发展所需的资金。资源和技术也被大量耗费在代价昂贵的殖民扩张中,耗费在资助非经济性工业中,耗费在像1915年向中国的贪官们的贷款上。对西伯利亚的干涉毫无目的地耗费了10亿日元。在受到保护的战略性产业中,垄断和腐败现象是广泛存在的,这对议会政治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就战争本身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基本上是有利的,因为那时日本还只是一个旁观者,此时,它增加了那些交战国和类似

的中立国的出口,并承担了他们之间的许多运输业务。与中国和俄国之间发生的有限的战争也没有导致资源的严重耗竭。因此从早期来看,这个帝国没有花费多大代价就建立起来了。

但是,在1931年以后,日本耗费了大量的财富以期在东亚建立一个由它控制的王国,而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益的。人们很难相信,即使他们的这种努力获得成功,就会对他们的经济利益有什么好处,或者说,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对外贸易是否无法为其经济前景带来任何希望,以致它不得不选择战争,此外没有别的选择。实际上,战争浪费了它的经济,破坏了亚洲邻国对共产主义极权政体的抵抗,也给世界贸易和世界权力带来巨大的灾难,而对于没有什么保护的和依附性的日本这个民族来说,这种贸易和权力是特别重要的。<sup>①</sup>

### 扩张的经济手段

纯经济因素在促进这种政治扩张中所起的作用是很难确定的。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应当将作为保证国家和帝国权力的手段的工业因素与作为利益的创造者的工业因素区别开来,战争和帝国主义可以服务于后者——也就是说后者实际上是一种推动力。

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现代工业技术可以造成世界各国间日益增强的密切联系。但它也会产生广泛的权力差异。在日本成为亚洲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国的时候,它为上述两个结论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证。

从国内情况来看,工业化转向武器制造业和为支付从海外购买军火的开支而进行的出口。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它也建立了一套支持重工业,支持公共行政、税收、金融、通讯的结构。由于实业家

---

<sup>①</sup> 可以支持这种看法的证据可见《日本的经济的发展》第50—53、290—291、378—404、533—539、577—578页。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专家认为,对日本的经济来说,还有一些远比殖民地更重要的东西。

和官员结成了更紧密的联盟,便促进了领导权方面的默契。最后,它也将财富迅速地创造出来,从而使帝国能在不过分降低全国生活标准的前提不得以建立。

从海外来看,工业化也为其扩展政治控制提供了手段和机会。一方面,它使得潜在对手对日本正在上升的力量的警觉不断加强。到1919年的时候,日本已在西太平洋拥有一支令人生畏的舰队。对外贸易的利益之所在要求日本要投下一笔赌注,阻止任何人对它所进行的报复。人们可以回想一下甚至在30年代日本的侵略已经发生时中国商人还对日本人感兴趣的这样一种非常暧昧的态度。当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敌对性目标已经很明显的时候,美国人仍在毫不犹豫地石油、废金属和飞机卖给日本。

日本在东亚进行渗透的最方便的经济手段就是日本商业利益网的不断扩展。南满铁路、东方发展公司都被作为出谋划策和发挥影响的机构。在1931年之后,Chosen 银行则成为关东军的财政机构;它们帮助将鸦片和白银走私入中国的北部;它们也为向傀儡政府进行贿赂提供资金;这就使得它们可以为右翼的军国主义的军人所利用。那些纯粹的私人公司也与推行海外扩张政策的官员、政治家和爱国主义社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由于在官员和大实业家之间存在着这种密切的联系,采取行动就容易得多。在所有这些方面,工业化都成为支持帝国的因素。

### 帝国主义的经济动因

与帝国主义有关的经济因素包括动机、目标和手段,问题是,是否日本各个群体和阶级的经济利益都体现在军备和帝国的建立上;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是否就是作为军事扩张价值的主要力量。<sup>①</sup>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看一下历史就可以知道,明

---

<sup>①</sup> 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从小熊彼特的经典性著作《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一书中借用过来的,见该书牛津1951年版,第45页。

治政府从一开始就非常关心在海外寻找商业机会。到1910年时,在其海外控制的地区中所进行的贸易就已占了日本海外贸易的10%。在此之后,殖民地日益成为它的市场和资源供应地,在经过了一代人的时间以后,在这里进行的贸易已经占其贸易的三分之一。通过像南满铁路这样半官方的公司,政府与私人企业携起手来对殖民地进行不断升级的剥削。在30年代通货膨胀爆发时,整个剥削过程达到了顶峰。

由于在1931年以后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批评日益增加,官方发言人越来越强调生存空间的信条。日本是一个穷国,但人口却在不断增长。它进入世界舞台,只是要寻找适宜的机会。由于没有进行海外移民,它的人民目前已经面对着会阻碍和平贸易的关税上升问题。极端主义者很容易从这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日本要么进行侵略,要么就是灭亡。

人们当然可以对这种看法的内容和结论提出不同的看法。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看法是在日本贸易最繁荣的时候流行开来的。从1930年到1936年,其出口额翻了一番,并使国民生产总值提高50%。然而,正是在1936年的夏天,即在2月26日的军人政变之后,这些驱使日本走上发动战争道路的因素开始起作用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日本都是在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中获得自己的经济增长的。帝国的建立对其工业化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确切地说,问题在于其他方面。但尽管如此,在1936年的时候,那些认为建立“东亚共荣圈”是经济的迫切需要的人确是非常真诚的,因为他们当中不仅包括像桥本那样的蓄意煽动者,也包括许多具有自由主义信念的商人和学者。

无论他们关于国家利益的确切看法是什么,问题是各种各样的群体现在都发现他们的命运是与军队和帝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相信,从比较彻底的意义来说,帝国主义所体现的并不是某一个阶级的利益。某些商人得到了好处,他们主要是从事军火贸易的,或是在殖民地进行贸易和投资的。廉价的朝鲜和“福摩萨”大

米对城市工人来说也是利益相关的。但帝国的发展对有些群体则没有什么影响,或者甚至有相反的影响,因为帝国主义的冒险消耗着税收和储蓄资源以及其他可以在国内使用的资源。然而,一旦这个过程向前推进了,海外扩张就成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帝国主义的行为。一个叫张伯伦的老资格的美国记者写道:“在日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中人们都可以看到封闭性的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看到其所获利益的精华。”

能否在这样的物质利益中找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动力,更是令人怀疑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条并不相符,与拉斯基、穆恩等人著作中对经济动机的强调也不相一致。在工业对海外扩张提出迫切需求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形成了。对朝鲜的骚扰、与中国的战争、对“福摩萨”的占领、对俄战争的胜利、早期对满洲的侵入、对山东的强占,所有这一切没有一个是经济利益为主要动因的,尽管这种因素也不是不存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商人在政治当中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并由此对官员和党派政治家产生影响。而有重要意义的20年代,则是以更多的国际合作和努力裁减军备为特征的。商业领导人现在与日本用武力得到的殖民地特别是其在中国的地位有了直接的利害关系。但他们也与西方有重要的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会由于发生冲突而受到损害。由于军事冒险会带来他人的鄙视,他们不得不考虑对此加以平衡。他们对于由大量的军费造成的沉重纳税负担感到不满。另一方面,他们仍然有赖于官方的庇护,他们的社会身份仍处于从属地位,其对直接利益的考虑也并不一致。虽然他们只是追随而不是领导。但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以从用武力赢得的机会中捞取好处,特别是在政府赞成这种冒险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在1931年以后所做的重要决策中,财阀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像三井这样老资格的金融团体对随军队进入满洲的态度是很勉强的。其利益之所在也似乎是含糊不清的,特别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有关发展的事情都被紧紧抓在军官们的手中。计划的制定者只有与像这样的团体联手的方式,才能排除他们在建立新的军备工程上所遇到的障碍。在1936年的时候,大部分日本商界领导人都对在中国可能走进死胡同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担忧。他们担心在国际上受到孤立,并在国内导致军阀割据。当1937年7月芦沟桥冲突发生时,他们曾多少有所保留地催促解决长城以南的问题。在此之后,随着战争动员,他们便对战争坚信无疑;他们的合作是不可缺少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发了横财,但在后来军事上的灾难中,这些财富又都毁于一旦,而他们也在导致这场灾祸发生的过程中起了作用。<sup>①</sup>

### 担忧、脸面与挫折

人们还曾经提出了一些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关的因素。尽管很难确定这些因素起作用的程度,但这些因素都是可以明确地辨认出来的。

首先是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不是指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而是指在互相冲突的主权国家中存在的不稳定的权力平衡的内在逻辑。在近代史的初期,日本所面临的危机助长了好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10年之前,对国家安全的关心似乎是这种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动因,而对日本进入列强行列所带来的荣耀的关心,则对之起了进一步强化的作用。

安全是一个很难捉摸的概念。对安全的寻求会促使一个国家采取可能会威胁他人安全的行动,这样就会导致它想避免的危险。说日本在面对这个大洲中的那些强大的邻国时会产生一种担忧,并不是为日本征服东亚的企图辩护。日本在中国的政策一直认为

---

<sup>①</sup> 在日本学者中,如何看待资本家在昭和时代帝国主义形成中的作用,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人坚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发生在中国的战争看作是资本家的需求和竞争的结果。另一些人则认为日本的军人起了主要作用,而财阀对他们的政策则持一种不很明确的反对态度。这些观点详见《太平洋战争的起因》,东京,1953年,第179—230、515—571页。

“未来比现在重要”。那么,如果中国能在东亚立足,并发挥它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作用,情况又会怎么样?就俄国而言,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在1932年写了《占据着满洲的庞大俄国熊》。他认为,自从三国干涉的时候起,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他们在满洲的“命运”将迫使他们与俄国发生战争。即使是在今天,由于在北方四岛的苏联人、在冲绳的美国人的存在,以及中国在亚洲所占的支配地位的恢复,日本政治中仍然存在这种担忧。

然而也有一些国家,他们同样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也同样使他们的经济工业化了,但他们却尽可能地与邻国和平共处。因此,日本的帝国主义也是其传统和环境中的某些因素的反映,首先就是日本社会中存在的尚武的心理倾向以及这种倾向在日本社会中所占有的地位。虽然强有力的军队本身决不一定会使一个国家进行领土扩张,但在日本,它对其他因素起了强化作用,并最终导致了那种结局。寻求安全的想法最终导致了对国家的力量、威望和价值的渴望,这种对国家地位的自豪意识绝不亚于对个人地位的自豪。日本早期的现代化使它与周围的邻国相比而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经济上的刺激,使它要使用自己的力量。由于要有意识地增强自己的实力,军队就促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倾向,即增强国家的实力,并让军队在国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日本的社会心理和军事官僚的地位中都体现着日本的封建性因素,这些因素在国内支持着独裁统治,并支持在海外的侵略。

虽然军队是自我指定的国家政治的保护者,但在其他阶层中也渗透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当官僚专制主义唤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之后,民主运动经济受到破坏,有时被镇压。与此同时,像这样的爱国主义社团掀起了极端主义的浪潮,他们一方面得到军事参谋部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商人的兴趣。

一个更进一步的经济事实是与此有关的。T.凡布伦在其1919年写的《日本的机会》这一有名的论文中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一种

暂时的现象。<sup>①</sup>其原因在于工业技术是与“高度成熟的封建效忠和骑士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作为一种封建军国主义的遗物,它将不可避免地被现代工业社会的更理性、更宽容、更物质主义的价值所淹没。

当然,凡布伦的预见是错的。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因。他低估了他所称的“封建主义精神”的生存能力,也低估了这些“封建主义精神”能够与现代民族主义融合的程度。他并没有预见到工业化本身会给日本带来紧张与焦虑,这种紧张和焦虑可以转变为帝国主义。

让我们简单地考察一下工业化的作用,不是从它武装了这个国家,或是产生了在海外建立市场的愿望的角度,而是从它在日本社会中带来广泛的骚动的角度来考虑。

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开始经历现代工业国家普遍存在的不适应状态。在日本,特别是在城市中,新的价值开始侵蚀旧的忠诚与团结。一种新的阶级意识在造成社会不稳定,这种意识对有关秩序的旧的专制主义观念提出怀疑。由于这一切是与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出现和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俄国力量在远东的出现同时发生的,这种内部秩序对日本传统的保护者的困扰就显得更为严重。

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了通胀性失调的遗产,这种失调在10年时间里一直折磨着日本的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增长速度与以前相比大大放慢。工业无法为日益增加的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世界性的萧条实际上也给了日本以沉重的打击。农村中的破产现象普遍发生。农民的收入减少了一半。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对政党政府的不信任,而这个政府与财阀结成了大富豪的联盟。

军队的成员,首先是狂热的青年官员,然后是更具有保守色彩的年纪较大的军人,开始利用这些挫折与不满,试图影响国家的走向。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的,随之而来的军事扩张具有工业

<sup>①</sup> 《我们正在变化的秩序论文集》,纽约,1934年,第248—266页。

方面的动机,而且也使用着工业所提供的手段。但在这方面,它也代表着一种怀旧情绪。代表着对日本的工业革命以及工业革命为日本社会带来的种种变化的否定。

我们并不认为大部分日本人都接受像“埋葬卖国的大富豪”和“实现土地国有化”这样的口号。但问题是,他们认识到军队有枪。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这些口号都不可能有利于经济和社会改革。甚至在伪满洲国,在那里军队中制订计划的人有较大的自由以建立一种国家社会主义,但所做的一切都是偷工减料式的。伪满洲国只是日本战争经济中的一个附件。

在这个危机发生期间,政治领导人可怕的愚蠢不仅表现在他们造成了一种既害怕又仇视外国人的意识,而且也表现几乎完全没有责任感。甚至那些并不头脑发热的高级文职官员和军官,也对战争随声附和。在后来进行的自我辩护中,他们只能用无能为力作为借口,或者只能辞职。一位教授在对战犯的证词进行分析时,将日本领导人与德国纳粹领导人进行了比较,德国纳粹领导人至少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而且对发生的一切毫不抱怨。<sup>①</sup>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正如明治维新一样,决定性的动因是存在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之中,经济领域的原因只是第二位的。但是很不幸的是,30年代的“具有两面性的爱国者们”虽然有时保持着沉默,但却完全缺少明治时期领导人的那种冷静和精明的实用主义。

### 三、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

从历史上来看,现代民主制度只有在具有希伯来—基督教思想和古希腊—罗马思想遗产的地方才得以建立,其间的中介就是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以及西欧的政治革命。

然而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在当今的时代里,经济进步的趋势

<sup>①</sup> 《军事统治者的心态》,第4卷,第5号,第15—37页。

会创造出有利于开放性的、竞争性的政治系统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至少在这种经济进步不是在极权主义保护下取得的地方,这种经济进步就会产生这种影响。这种假设形成了一种广为流行的看法,即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就会促进民主制度在那些不想搞民主政治的国家中扩展,尽管在那里存在着极权主义的传统。

迄今为止,日本是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唯一一个非西方国家。日本的这种经历已经延续了近一个世纪之久。因此,它可以充当一种例证,看它是否可以证明上面的命题是否有根据。

### 自由主义的产生与衰落

如果只看日本自1868年以来政治历史中的那些表面现象,人们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得出明确的结论来。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所遵循的是一种在西欧司空见惯的进化模式。在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由专制官僚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它们获得了王权的准宗教式的赞同。虽然每一次出现的政治反对派都带有自由主义的特点,但这些政治反对派却主要是由要求分享权力的以前的武士领导的。在初期,商业利益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小于西欧。但没有多长时间,他们就通过与各种政治力量结盟来提出维护他们的利益的要求。

很久以来,寡头就在被迫作出一系列让步,在1889年的宪法中,这种让步达到顶点。在此之后,拥有有限立法权的新议会已经具有了对专制独裁者施加限制的能力。最后,随着选举权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促成了一个较为强有力的负责的内阁政府。除了其发展的速度要比西方更快之外,在所有这些方面,日本都没有什么特殊的。

在20年代后期的鼎盛时期,日本的立宪政府代表着一种精英主义因素的正在发生变化的平衡。那些对内阁中的权力的争夺基本上不受公共的控制。在其最上层,是多元化的,甚至在这里存在着一种无头头的权力结构,而现在,虽然军人,文职官员

和贵族团聚在王权的周围,而商人的利益也可以得到有限的表达。在1925年,普通成年男人的选举权开始行使,在此后的6年时间里,国会中的多数党大体上控制着内阁。虽然一般地说,并不是选举的结果在决定着政府的去留,但它在各种寡头力量中实现了一种平衡。但是,随着世界性大萧条的到来,危机发生了,日本自由主义缺少大众的支持,这使它无法抵抗军国主义者这股反革命力量的冲击。

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过程的连续性被彻底打断了。首先,这里出现了一个战时政权,接着是战败的灾难,再接着是战后占领。在1945年至1952年间,由同盟国所进行的改革用强制性的手段排除了国到议会政治的障碍,同时引进了一些变革,以实现基本权力结构的民主化。所进行的这些改革,使日本在1952年占领结束后进入了一个长达10年的史无前例的经济进步和政治稳定的阶段。但是,由于这些改革是从外部自上而下强加的,在政治中起作用的力量都是来自于外部。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很难说50年代的民主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过20年代,也很难说它在60年代会保持如此的稳定。

### 政治参与的经济先决条件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经济发展对政治过程的具体影响,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命题:

1. 首先,急剧的工业化会通过为集中权力提供新的手段来加强专制主义统治。然后,如果这种工业化是在非极权主义政权的保护下进行的,它会造成一种动态的趋势,使得像有限的独立精英这样新的因素能分享政府中的权力,使政府能越来越多地考虑到更广泛而多样化的利益。

2. 但是,由于环境在政治发展过程中起着作用,在工业进步和向政治民主迈进两个因素之间并不存在直线性的关系。工业化本身虽然有助于减轻由旧秩序那里继承下来的不平等的程度,但它也会形成财富和权力之间新的矛盾。

3. 在少数寡头统治被推翻的初期,会出现一个政治不稳定的时期,这种寡头统治是被进入政治领域的新的群体推翻的,他们具有推翻寡头统治的要求和能力,但是在更富裕的、多元化的、更平等的社会建立之前,民主的手段会促进社会的统一。在今天的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政治不稳定时期——但与日本相比,通常是发生在国家发展的更早阶段上。

有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加到150美元时,这个国家便会进入这个关键性的时期,在达到300美元时,政治不稳定现象便可能出现。但如果结论是如此肯定,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一种经济决定论,从历史上看,并不存在可以证明这种看法的根据。

让我们更集中地考察一下日本的情况。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日本的工业革命对巩固明治时期的国家起了重要作用。精明强干的政界精英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增强国家权力的资源,以保护这个政权免受内部和外部的威胁。所要求的一些新的手段,比如武装力量,都牢牢地抓在政府手中。其他的一些手段,如银行和造船公司,越来越多地控制在大金融家的手中,他们属于正在上升的商人阶级,而政府对他们的目标和能力都是信任的。新的独裁者们由于对增强国家的力量做出了贡献,并向商人们提供了经济和社会机会而为这些商人们所接受。

紧接着这个发展过程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参与政治的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先决条件。当工业化过程继续实现着对社会的改造时,这个过程仍在进行。实际上,几十年的时间过去,经济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明治精英们那些最大胆的预期。在1875年至1935年间,人均收入至少增加了3倍,到1961年又增加了80%。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已经使自己摆脱了东方传统的贫困状态,尽管在这个时期人口增长,军备造成了浪费,而财富分配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

在今天,日本作为一个东方的富裕社会,其消费水平已在10年

前就赶上了意大利,并超过土耳其和墨西哥。按目前的汇率,日本1961年的人均收入是399美元,而实际购买力将近600美元;当时美国的人均收入是2400美元,日本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sup>①</sup>

工业化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同样明显的。非农业雇佣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由1930年的45%提高到1962年的75%。在1900年以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也相当之快。用德国的克拉凡的话来说,“数字表明,整个国家在跑向城镇中去”。在1920年之后,农村人口便完全不再增长。在今天,每三个日本人中就有两个人是住在2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大多数农民都住在距工业中心不超过50英里的地方,交通也相当方便。日本在这一点上明显不同于土耳其,特别是不同于亚洲的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这两个国家中,数以十万计的村庄很少受城市的影响。

在整个国家中,由此所导致的变迁是不平衡的,有时也是时断时续的。从城市中,特别是从城市的工业和职业中产生出新的动力。农业和内地贸易对此做出的反应则是滞后的,特别是在南方和北方的天高皇帝远的地区就更是如此,这就在日本的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明显的二元结构。但尽管如此,这种变迁过程也还是缓慢地渗透到整个农村。在中部的本州岛,工业化沿着沿海的平原地区获得迅速的进展,以至于那里的农民将自己称为城市农民。在这里,烟囱林立,输电线通向各个角落,学校也已建立起来。不断增加的职业流动和社会流动将新的技能和期望传播开来,使传统与现代化的差距逐步缩小。在人际关系方面,从过去的等级制中继承下来的先赋性标准逐步被抛弃,而代之以用个人的成就作为判断的标准。

教育的扩展也对这种转变起了促进的作用。到1890年,青年儿

---

<sup>①</sup> 以上数字以经济计划署的粗略估计为基础,在1959年,日元的消费者购买力与美元相比是204,而按官方汇率是360。见《日本经济概览》(1959—1960),东京,1960,第205页。

童总数的50%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教育,这要归功于政府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发展普通的公共教育。在1908年,实行了义务六年制教育,并且是强制性的,这时入学率上升到90%。<sup>①</sup>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的金字塔式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也已建立起来。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教育是被用来灌输政治上的正统思想,但同时它也有助于通过将首创精神、技能和财富在数以百万计的小商人和农民中传播开来的方式,促进增长与变迁。在今天,实际上所有25岁以上的日本人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教育,其中有28%的人完成了初中教育。除了西方世界以外,只有以色列取得了这样的教育上的成就。

同时,一些大众传播媒介提供了一种沟通网络,这在非西方社会中也独一无二的。在日本的农村,家庭用的收音机很早就不再是新鲜的东西,农民订阅杂志这样的事情也已司空见惯,这与其他东方国家农村中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到1961年时,一半的农村家庭已经有了电视机。日本的报纸每年超过2600万份,平均每四个人有一份报纸,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美国。在日本,由现代化所形成的城市精英与老百姓之间的鸿沟要小于今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早期的文化传播。为了有利于像富裕的农民、商人、工头和教师这样的中层精英的形成,大众传播尽可能地在不同的阶级之间进行沟通,同时也将一种更大的强力加于社会结构之上,使社会结构不得不承担这种紧张状态。

与工业化相伴随的这些社会方面的变化都有利于政治的民主化,尽管这个政治体系还是专制主义的。旧秩序的僵硬程度在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拥有财产处置权、技能和经济剩余,以参加政治活动。自愿团体成为表达工业化社区中各种利益的形式。从这些利益中形成的政治竞争呼唤着政党和议会的建立。最后,旧的下层阶级也与政治秩序形成了一种利害关系,以前的特权阶级虽

<sup>①</sup> 《教育体制80年史》,东京,1954,第1036—1037页,表一。

然带有几分担心但也不得不容忍他们拥有的政治权力,特别是在他们被允许保持某种地位象征的时候就更是如此。<sup>①</sup>

在日本社会中,所有这些趋势都是很明显的。在1890年后,现代商业精英得以分享政治权力;在一代人之后,“大正民主”的时代到来了。在1890年时,只有45万富有的纳税人拥有选举权,在1919年时拥有选举权的人数达到300万,到1925年时,所有的成年男人都拥有了选举权。更重要的是,统治着日本的寡头越来越分化,并且更加注意公众的需求和态度。在整个日本社会,用多尔的话来说,“在下等阶层驯从的意识在普遍丧失”,这一点有很深的政治含义。

### 两次大战之间的危机

在向政治民主的进步与工业和社会变迁之间并不存在直线性的相关关系。经济上的富裕通常是成功的民主的必需条件,但经济的富裕并不会自动地带来民主。

在日本的现代史上,有两个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在今天的许多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中,民众在国家发展的最初阶段上就要求参与政治的权利,而且这种要求往往会得到准许。而在日本,这种要求则出现得较晚。

第二,在面对30年代的反革命力量时,民粹主义运动往往遭到镇压,或是被扭曲,因此这种运动很难拥有较强大的力量。但情况在发生变化,历史演变到了这一步:如果要维持合法性的来源,最好的方式是将那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分别开来加以解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若干年中,主要有三个大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造成日本社会的分裂。其中的每个问题也许都可以用较为和缓的方式加以解决,但这三个问题却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会困难得多。

---

<sup>①</sup> 见 S. M. 李普赛《民主的若干社会先决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美国政治学评论》,卷 LIII, 第1号, 1959年5月, 第69—105页。

第一个问题是文职权威与军人权威关系中存在的危机,这一危机在20年代后期变得越来越突出。日本宪法多少有些模糊不清地将最终的权力赋予军队和天皇之下的文职政权。但是年长的政治活动家们缺少控制军人的权力和勇气,而他们还劝告天皇不要用自己的威信做赌注卷入这场斗争。这就只好用强权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军队则拥有大量的强权手段。

第二个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财富和福利方面所造成的不平等。巨大的联合体高居于小商人之上。富裕的地主要求警察帮助他们镇压佃农的斗争。在国会中支配着民政党等团体的一批新财阀,坚决抵制那些旨在改善大量的贫民窟居民和工厂工人生活条件的努力。需要解决的社会不满还有许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继承下来的财政失序,造成了一浪又一浪的工业兼并浪潮,从而促进了经济控制的集中。甚至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的打击发生之前,工业的理性化就已经限制了城市中的就业机会。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农业增长的速度放慢了。

上述两个问题导致了第三个危机的发生,即大众要求在政治中拥有发言权。在1918年的稻农暴动之后,保守的政治家们勉强同意实行普遍选举权,希望以此来延缓那些更激进的要求。现在,民众的力量是想用一种明治寡头们永远也无法理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了,而这些寡头的继任者们则不得不勉强地表示让步。

在西方,在无产阶级对社会公正的要求变得很急迫之前,谁应当参与政治的问题就在开始加以解决。典型的情况是,由文职力量支配封建军事力量的原则在很久之前就确立了,但在日本,这几方面的斗争是结合在一起的,至少是互相交叉的。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削弱了对立宪政府的支持,而这个时候,恰恰是军人中的激进派决定要求自己的权利,而军人中的激进派实际上也受到这几方面斗争的影响。在他们于1932年暗杀了犬养毅首相之后,他们便很容易地获得了权力。在他们掌握了权力之后,便将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边,而去追求国家安全,其结果是将国家拖

人战争。

### 战后的均衡：经济进步与政治共识

在以后的年代中这些冲突是否得到解决是需要进行探讨的。毁灭与战败似乎打破了既有的社会结构。然而在1952年占领结束之后的头十年中，日本却表现出一种令人意外的逻辑。

战争及其所带来的灾难性的结果至少使一代人对军人的野心和军人的领导持一种不信任态度。然而这并没有导致用激进的方式来推翻现有的社会与政治秩序。战败使日本丧失了对海外殖民地的占领，同时也就卸下了国家要扩军备战这个沉重的包袱，这使它有可能将公共基金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经济增长。

首先，战争也给富人的私人财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同时由此开始了战后的通货膨胀和完善税收的过程。在1954年至1959年间，付给个人的租金和利润只占国民收入的8%，而在战前则为18%。由于财产收入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的主要根源，那么上面这个比重的下降就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促进了财富方面的平等趋势。

第二，同盟国的占领也不可避免地将新的平等标准引进日本，并使首创性和责任感在整个社会中扩散开来。1947年的民主宪法，政治清肃，以及为自由和负责任的统治所设计的其他手段都促进了将政治权威转移到国会之中，特别是转移到多数党的领导人手中。

对新的民主制度同样重要的，就是经济与社会改革。土地改革实际上是要剥夺那些本身不是农民的地主，而有利于佃农。经过土地改革，租佃的土地占可耕地的比重由46%降低到9%。“瓦格纳法规”则使商会合法化。现在，800万工人在用集体的形式、有组织地讨价还价，并多少带有感情地表达他们的政治要求。打破商人垄断的企图没有得到日本人足够的支持，因而也进行得很不彻底，但即使是这样，其所取得的进展还是足以使得日本的经济变得更为开放，更具有竞争的特点。在今天，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复杂性程

度的日益提高,已经使得像战前那样将权力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变得不可能,除非人们要求政府权威这样做。

在1952年之后,从占领期间所进行的改革向后倒退是很困难的,尽管在像地方政府、教育和工业竞争领域中对改革进行了某些修改。创新维持的时间越长,这种创新成果就会变得越牢固。可以说,占领所进行的只是一种冲击,而要完成这种变革,则需要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斗争。

第三,近年来的史无前例的经济进步也有力地强化了新的政治秩序。<sup>①</sup>在1952年到1961年间,国民收入翻了一番,弥补了前十年造成的差距。生活水平每年提高6%,比战前的水平提高40%。随这种增长而来的是个人机会的平等化。商业界变得更为多样化,也更具有弹性。社会保障和福利同盟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不平等的,但在某些方面,已经扩大到4800万工人之中。在小工业中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和低效率现象,也由于对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现象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得到改善。<sup>②</sup>农民阶级很明显地富裕起来,这要归功于土地改革、价格扶持、技术进步以及年轻人脱离农业而进入工业生活。如今,日本家庭收入的分配很类似于美国。工人家庭家庭的储蓄大约占他们收入的8%—9%,在银行中存款或加入保险是很普遍的。

在政治领域中,经济的繁荣在广大的选民中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满意情绪。在一次接一次的选举中,大多数选民自愿地将权力赋予保守的自由民主党,以此作为回报。一个党在10年之中使国民收

---

① 见作者《日本的“新资本主义”》一文,收在《日本的国家与经济企业》,即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虽然一般性的工资差异仍然存在,但在1962年时,一个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工人能够要求从小企业中得到与大企业一样的工资。但地区间的工资差异确实扩大了,因为在条件有利的地区工业要更为繁荣。结果是人们潮水般涌入发达地区,在1955年到1960年间,7个低收入县的人口减少了250万人。东京就吸收了100万,使那里变得更为拥挤。经济计划署《日本经济概览》(1960—1961),东京,1961,第51、315页。

人翻了一番,它赢得了10年前任何一个政党所能赢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要击败这个党是很困难的。

但具有更根本意义的是,利益的有组织的多样化使他们能在政治中拥有自己的发言权。工会、左派和中间派主要支持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政党,虽然也有些工人同商人和农民一起投保守派的票。当政党因竞争而需要小商人的选票时,小商人开始日益认识到自己的权利。通过合作社和其他团体表达的农民的愿望对诸如谷物和化肥的价格等问题施加影响。甚至家庭主妇和儿童保护协会也以组织的形式对诸如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薪水被地方议员巧取豪夺、造成儿童伤亡的交通事故等问题表示抗议。对这类具体问题,公民们也要比以前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对像对外政策、最低限度工资等这样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一般老百姓仍然让那样会涉及其利益的人或左派和右派这些从事意识形态的人去做决定。那些很少具有能与其他权力相抗衡的力量,遇事凭他人做主的群体,仍然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

军人的作用已经被取代,文职服务人员主要向国会负责,商人共同体则通过其在政党和内阁中的影响力而成为日本最有权力的阶级。尽管情况有时也在发生变化,尽管商人内部也在分化,但总的说,商人是自由民主党的主要依靠力量,他们在国会中占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对经济政策有着非常重要影响。

自由民主党为商人共同体和官僚精英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手段。它的许多领导人都曾有官宦生涯,在战后转入了政党政治。然而,虽然保守派联盟在最上层占据支配地位,但自由民主党的支配地位是以它支持许多广泛的社会主义的福利事业为条件的。在今天,它所受到的来自左派的抨击的压力远远超过了从前。

就政党的角度而言,社会主义政党仍然是少数派。在历次选举中,他们都没有在国会中拥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之所以如此,下述原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派系之争,缺少资金,不愿放弃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以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虽然他们拥

有的力量还不足以同保守派对抗,但他们有时也甚至用多少有些无理取闹的方式试图对立法过程施加超过他们拥有的选票数量的影响。他们从下面这种思想中获得自己的信心,即随着新一代的成长,他们虽然不会具有比富裕的中产阶级更强的革命性,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会投老左派的票。

如果放眼未来,有三个问题是令有头脑的日本人担忧的。其中之一是经济的前景。经济能继续按照目前的方式增长从而能化解工业冲突造成的紧张状态、确保两党之间的较高度度的共识并满足日本年轻一代不断提高的物质期望吗?那些大的利益群体会不会专注于立法斗争,并且越来越摆脱理性与良知的制约,重新把专制主义统治请回来?

制约经济前景的因素是国际上的威胁、政治与经济。在这些导致右派和左派分野的问题中,没有比外交问题更容易引起暴力行为的了。正是日美安全条约导致了1960年的叛乱。导致军人对宪法修正案义愤填膺的是宪法的第11条。如同过去一样,今天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主要的忧虑仍在于对外关系领域中。

最后,人们还不禁要问,形式上对民主的认同是否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当社会主义政党决定从议会政治过程中退出,或在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中爆发报复性的暴力事件时,普通民众在感情上无动于衷。人们可以想象到,一般对民主国家所具有的只是一种极不稳定的责任感。有些“群众斗争”的鼓动者们将他们看作是民主时代到来的标志,另外一些人则将他们看作是极权主义的不祥之兆。许多老一代人感叹现在背离了“知道什么是对国家有益的”的寡头们的原则,对于用没有不适宜的暴力或多数选票解决问题的方式感到不理解。

简而言之,问题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战前日本议会政府没能解决的那些问题。然而民主力量的壮大已经明显超过了一代人以前的时候。我们可以预期,明治时期内寡头们所获得的政治稳定,

会更坚实地扎根于被统治者的共识之中。要赢得这个结局,日本需要生存在一个有利于保持文职统治的完整性并将追求和平目标放在首位的世界秩序之中。

(孙立平 译)

鲁道夫·哈曼

## 欧洲工业革命是发展中 国家效法的模式吗？\*

### 1. 有关现代化理论的问题

“当代发展援助的问题激起社会史学家、注重历史的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注目于他们本国的历史，并考察那些激发和维持‘工业革命’的力量。当然，这项工作不能在观点上利用匆忙作出的类推作为基础，借以预测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相反，正是有关我们欧洲的工业化及其多种多样地方性、地区性以及民族性的表现形式的历史知识，防止得出错误的类比，同时防止制订出不现实的以及过去那样机械性的工业发展模式。”1966年，经济史学家博恰德在其担任曼海姆大学校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探讨了欧洲经济史是否可以给发展中国家作为模式的问题。他最重要的结论如下：

——土生土长的一次工业革命只发生在英格兰。这里第一次以事实说明在不受农业支配的格局内有可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这是一项直至那时为止未受东西方一切

---

\* 选自德国《经济学》杂志英文版第27卷，1983年。

文化影响的成就。这一推动为大陆欧洲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尽管各个国家在解决其面临的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拿破仑战败后,普鲁士德国仿效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并输入英国的技术效率。通过使用当时仿制的英国式机器,训练了未来的“工业骨干”,从而弥合了与英国在技术上的差距。德国商品上的“德国制造”字样,原是英国人用来诋毁其经济对手所具品质的,却迅速变成了质量可靠的标志。

——经济增长带来社会变化。西方文化的共同遗产大大有助于各种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相互渗透。一项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是人口出生率的管理,那是按结婚次数和夫妇年龄决定的,有助于根据人们的身份地位而保证其营养。

即使是这样概括性的描述,也使博恰德得以表明,历史是不会照原样重现的。当今发展中国家拉下的技术差距,较之18、19世纪英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便大得不成比例了。而工业革命后在欧洲出现的人口爆炸,又使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陷于广泛的停滞状态。

我们可以从欧洲经济史中学到哪些与第三世界相关的教训呢?经济史学家博恰德对此提供的答案是非常谨慎而深思熟虑的:历史可能“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问题,提出恰当的疑问,以及形成含义动人的答案。有些糟糕的方法是寻找构成假说的灵感而不是观察历史”。对当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寻求自己的解答的创造性任务,照博恰德的恰当说法,是一项历史不能使各门社会科学与它脱离的任务。

当然,社会科学家只在特殊事例中采取了这种区别对待的方法,而且通常只强调一个变项,利用欧洲历史作为他们现代化战略的蓝本。既然工业革命由此被赋予模式的地位,则现代化研究就

“面临着确立此项过程的历史独特性和系统性两方面的困难任务”。因此毫不足怪，有关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研究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社会变化的完整理论，但最佳的结果可以给我们提供各种模式和解释纲要，在这里纳入了各种描述性和解释性的变项，是在经验性概括和理想化抽象的基础上探查这个基本变化的原因的。

在大多数所谓“单因素理论”中，人们喜欢用一种变项来解释现代化进程。本文将用举例说明的方法讨论其中两项最著名的理论，以揭示这些解释的弱点来自直接排列，对历史的和系统的分析的简单罗列。

代表一种经济因素的方法，最著名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人物，无疑是分阶段描述通向现代性的社会发展的罗斯托。据罗斯托所述，每个社会通向工业化必须经历五个阶段，我们只对其中两个感兴趣：一是助跑阶段，具有根本性的经济增长前提条件，二是起飞阶段。对于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罗斯托列有现代科学发现在工农业中的利用、食品产量的提高、敢冒风险进行投资的企业家的出现，以及中央统治的国家政权的发展。过渡时期历时长短，多半取决于“国家自有的人才、能源和商品供应，在对国内工业的服务中，可以相对于其他可能有的全国性目标而加以利用的程度。这样引导活动方向必须成为政治领导人的主要责任……”

起飞阶段是这样一个时期：传统生产方法被更换了，持续增长的前途日益明朗。在这个阶段，有效投资和储蓄的份额从国民收入的5%上升到10%或更多。新兴工业的增长伴随着对新的劳动力和服务迅速增长的需求。“经济推进的起点通常可以归因于某种特别强大的刺激。这种刺激可以采取政治革命的形式，由此直接影响社会上现存的社会均衡和价值观、经济制度的性质、收入分配、投资方式以及实际上已有发明的比例。”

虽然罗斯托并未以描述方式处理通向现代化的各个阶段，而是把它们用作一种有力的生产理论的分析框架，他的模式的理论体系还是不完整的。一方面，他以分阶段模式区分和勾勒不同的发

展阶段,并未达到预定目标;另一方面,这个模式假定发展是自动进行的,从而忽略了不同国家历史上的特殊条件。库兹涅茨和格尔申克隆曾作论证,认为罗斯托用来支持其论点的各国统计数字,并不显示出投资定额或经济增长的突然上升,而且认为,不同国家往往是沿着多种多样大不相同的道路赢得现代化的。

罗斯托当然看出了总体的社会价值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并未在他的分析中列作独立的变项。把宗教作用立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居主导地位的价值系统,这个隐含巨大吸引力的尝试是由帕森斯的学生贝拉提出的,他分析了传统的价值观在日本通向现代性的途径上所起的作用。据贝拉的见解,1868年明治维新后,存在于德川统治年代的某些宗教形态助长了一种思想体系的发展,由此推动政府引导的经济变革走向工业化。这种新生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就是武士阶层,他们虽然在德川时代丧失了军事贵族的地位,却仍然恪守传统的武士道,而这种道德在1868年之后对成就取向的发展特别有利,并被接受为普遍的价值观。因此,19世纪的日本从那种与新生结构条件协调的传统价值观中发展出一种本质上属于新型的经济取向,由此为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贝拉的方法是将马克斯·韦伯的加尔文教文加资本主义的理论转用于唯一成功地推行了现代化进程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并力图寻见新教伦理的功能性等价物的一种尝试。然而,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学著作表明,他的兴趣不在于就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建立一种积极关系,而在于揭示其他宗教缺乏新教伦理。不过,韦伯为解释经济变化而研制出来的特殊方法,不能作为一种在现代化研究中具有预示能力的通用模式没有限制地加以使用。贝拉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用一种对具有独特的动机和制度成分、类似新教运动的宗教运动加以鉴定的观点,对亚洲进行研究,事实证明是不切实际的。新教改革在韦伯整个著作中是社会和文化结构根本变革的一个象征性代表,具有最激进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很明显,对亚洲的合适类比,不应是这种或那种动机或制度成分,而应是改革本身。”

当然,这并未阻止将韦伯的论点运用于各种非基督教宗教的进一步尝试。这样将韦伯运用于现代化理论,却又进一步证明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关系脆弱,对此大都未考虑到。韦伯有兴趣将向现代性的突破作为一项独特的事件,而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中,这事件转化成为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如果把‘现代性’看成为独特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假想模式。在西北欧精心制作,并在不断拓展的范围上加以贯彻的一个可由其他社会效法的模式,那么它对这些社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是可以估价的。然而,如果它被一般化为一个不变的社会结构现象,由此不再服从于社会变化,那么它就变成一种老生常谈的神话,一种推行合法化的‘陈腐教条’:‘现代性’就成为人类发展的终点了。”在对19世纪欧洲和当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进行比较分析时,有必要考察一下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

## 2. 从方法论看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关系

作为方法论的问题,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没有充分阐明。正如莱普西乌斯一度指出的,这两门学科都具有需要从外部得到关于社会结构和变迁的解释的特征。这种解释性功能说明了历史学在19世纪大为流行的原因,当时它将哲学从人文学科的领袖位置上排挤出去了。作为启蒙时代哲学的遗产,历史学被看作不断向人性进步的一种目的论过程,而各种历史性过程具有内在意义则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在20世纪,历史学中的发展概念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理论著作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方法:与历史哲学合作,而不设法阻止后者从后门溜出,不闯入别的学科而闯入社会学,在那里它完成了将社会作为整体解释其各种发展现象的作用。

在今天的社会学上,我们可以区别柯尼希称为“社会学的理论”和“社会的理论”的两个基本范畴:“社会学的理论涉及可以互

相区别的各个问题,可以引申或驳斥现存知识的问题;社会的理论涉及解释社会思想的全体。”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实证科学,力求构成具有时空的解释价值的理论,因而是非历史的,其发掘潜力非常小,特别是在所得的知识引申到小集体关系范围之外的時候。第二个范畴是提供有关社会发展的全面解释系统的,是哲学遗产的一项成果,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学。虽然德国社会学的吸引力往往远远超出其解释能力,但它为解释社会世界提供了极好的意识形态背景。弗雷耶关于当今时代的理论,盖伦论技术时代的精神,或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第四种人的理论,都是典型地运用历史哲学作解释的尝试,在这里,技术的发展被描述为在历史发展后面的决定性动力和历史进步的量尺。

尽管今天的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独特性和非确定性,关于社会的许多理论公开宣布其意图为确认社会的发展规律,即历史和社会哲学的前提,对此可以用下列四点特征加以说明。这些特征是现象学的,因为它们主要根据直觉,所以缺乏主体意识的控制;它们宣称有一个无所不包的解释目标,但其解释大多归结于一个变项;它们是历史目的论的,因为它们预言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并且由于这个终极阶段符合拟定的理想社会,所以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道德特性。所有这些标准都适用于大多数现代化理论,因而历史学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将这些有关社会变化的理论作为历史哲学加以发展。“现代世界历史学家与他们的先辈不同,并不预言什么必然会发生或什么在理想状态下应该发生。寻找根本规律的任务已被放弃——这种规律不可变更地和独一无二地决定历史进程,犹如自然规律决定行星的运转。在历史进程中,不容变更的必然性的概念不再是合理的了。”

社会变化并不遵守合理性原则和因果关系原则。尽管人们可能在一定的社会结构框架内创造历史,而历史却告诉我们,偶然性的作用或个人的行动是能够决定性地影响社会变化的方向和强度的。在另一方面,结构—功能理论往往将社会变化理解为与增长过

程相类似。行为能力的积累性增长,社会增强了的控制自身事务的能力,学习和适应的能力,以及规则和功能的明确说明,都是典型的观念。犹如形态分类在斯宾塞的进化理论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那样,一种确认了发展和复杂性即结构差异的理论,结合了环境适应性和功能互相依赖性作为社会的重要发展原则。

然而,发展是一个具有目的取向的概念,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始终是规范性的。根据许多现代化理论家的假设,工业社会是发展的样板,而工业革命则是发展的道路。因此,他们的方法就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一句话是紧密相关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任何偏离这条道路的做法都被理解为发展的缺点或错误的发展,由此忽视了或排除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不同的历史条件。

社会学家经常冒着这样的风险,即将历史首先看作为一个采石场,从这里提取合适的材料,为他们的理论准备实证基础。然而,另有一项更重要的功能被他们忽略了,即“从过去时代的巨大仓库里提取明智的问题,即那种可以引向主题材料的问题”。鉴于历史不仅使人们自己的社会处于过去时代,而且还处于其他文化之中,所以历史学家能够指出其中蕴藏着的重要因素和重要格局。“历史的重要性在于提出人类存在中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组织形式,以供更密切的检查,由此引申出一批参考事物,使我们得以审查和判断现在。”

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条件本身能够发生根本的改变,社会学也是对这个发现的一种反应。而作为对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反应,社会学首先将自身视为一门批判性对立的科学,其目的是解释和改变社会结构。不过,从方法论的立足点来说,早期社会学家的综合性历史概念是妨碍社会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包袱。从孔德到马克思等许多思想家,试图把过去纳入一张令人信服的透视图,此举显然使社会学建立于历史哲学之上了。他们所创造的关于世界的一些概念,在韦伯论证价值判断取得成功

之后,失去了其正确性。“减少经典的世界理论的可信性的,是马克斯·韦伯在他论客观性的文章末尾所说的那种感觉,即觉得伟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投射得更远了。从这些理论的根本设想来认识未来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从过去推知未来的努力不再令人信服了。”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这一点看来,关于社会进程的无所不包的理论概念必然还是多半属于推测性质的。社会学不再是幸福未来的指引者了。

非常引人注意的是,这个发现即“价值自主”和“中程”理论,其理论含义,在现代化理论中不曾得到回响。进步的信念和历史哲学的种种假设,披着进化论概念的外衣从后门溜了进来,同时发达的工业社会,因其为发展中国家起了模式作用,其本身就变成了一种价值。

将工业化和现代性非历史地加以等同,不仅意味着欧洲的工业革命作为独一无二的发展过程的高潮这一点被忽略了,而且还意味着这个根本性的社会变化次要的负面效应也被全部排除了。此外,它更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只有积极的一面。韦伯对铁的樊笼的悲观态度,在现代化理论中被转化成了毫无疑义的乐观信念。

按狭义理解的工业革命,尤其是作为无数技术发明成果的生产方法的革命,对提供了工业革命的典型性解释的马克思和韦伯来说,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最后阶段。对工业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并不是1760—1860年这100年间的技术变革,而是新的理性行为,这种行为最初局限于小型群体,到启蒙运动为群众接受后就遍及各地了。从人类历史的最早期以来,技术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只在遇到演进的特殊挑战存在的领域才有效力,例如武器技术。在持久的基础上武装自己以对抗实际的或潜在的敌人的必要性,导致了武器技术不断的改进与发明。

在管理制度保证按人们的身份或地位提供食物的情况下,这个必要性并不存在于工作领域,只是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

动和启蒙运动在积累性的、但又各自相异的演变过程撤除了大体普遍的制度之后，技术才渗透到工作领域。为新教工作道德所激发的少数人启动了社会—经济变革。但在18世纪，当对待经济—技术革新的态度有了根本上的变化，而发明节省劳力的机器不再有任何阻碍时，那种新的行为就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了。新的技术不仅是效率的产物，而且反过来又产生效率。“世界非神秘化”的过程既出现在上述过程之前，又与之相伴随。当效率原则支配了工作领域，因而又支配了人的自我形象之后，西方世界当时存在的有组织社会受到了强制性的改变。

英国社会历史学家哈特维尔曾经编录了工业革命文献，其中提出作为决定性因素的所有因素，分成五组变项列述如下：

1. 资本积累
  - 农业生产率
  - 商业中增长的储蓄
  - 增长工业利润的再投资
  - 低利率
2. 创新
  - 新式机器
  - 新能源
  - 工业上的组织变革
3. 天赋有利因素
  - 煤铁供应
  - 短途运输
  - 大量的劳动力供应
  - 经营企业和创新人材的储备
4. 放任主义
  - 现世主义
  - 理性主义

——经济个人主义

### 5. 市场扩张

——持续扩张

——人口增长

——需求增长

对工业革命的完整理解,必须考虑上列所有因素,它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当马克思和韦伯力求对过渡到现代性提出更精确的说明,在其用心集中注意于分析现实和理想因素的相互关系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都熟知工业革命复杂的前提条件,也都知道欧洲在实现向现代阶段的突破之前,在许多方面都与其他国家不同,因为他们两人都既是历史学家又是社会学家。

## 3. 作为后继者的发展中国家

大量的发展理论将现代化视为在适应和引导自己事务的能力方面的一种积累性增长,假定正在现代化的社会所采纳的目的和道路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在他们就向现代性过渡的分析中,现代化理论家通常对发生在英国的首次历史性过渡的特征、欧洲过渡的特征以及每一次过渡的特征之间的特征没有加以区别。此外,效率原则被视为社会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结果压制了或阻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价值观。

然而,历史的回顾表明,这种种族中心主义的,决定论的进化论并不与历史真实相符合。过去只是可能实现的许多客观可能性中的一个可能性。具体事件总是特定的构造条件和人类的决定共同产生的结果。社会过程只能在特定的限度内按照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的意义加以预测。偶然性的作用,不曾预见的事件,各国传统不同程度的灵活性,这些都能够给予社会变化的方向、速度和激进程度以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要求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可选择的发展模式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响亮。几年来,这要求一直与要求分离的计划在一起,其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范围内促进生产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停滞的原因,在这些现代化战略的拥护者们看来,是在工业国家都市化经济和第三世界国家边缘性资本主义经济之间不相对称的分工。后者有以下一些结构性缺陷的特性:

- 农业部门出口导向的生产力日益上升,导致本国人民食品供应的匮乏;
- 为少数上层阶级生产的奢侈品挤掉了大众消费品的生产;
- 由于技术上依赖工业国家,无法发展一个独立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

尽管工业国家从工业革命以来逐步得到发展,并使其社会—经济结构规范化,发展中国家却以其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异质性为特征。然而,结构异质性不能像现代化理论家所提出的那样,解释为从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变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是由外因决定的一种发展的结果。作为加速工业化手段的现代技术转让,不可避免地导致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第三世界的大量失业和大批人口脱离社会发展进程,其原因只不过是这种方式的现代化不是独立自主地发展生产的结果。

自主性发展的宗旨,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国内市场和满足人民大众基本需要,以避免边缘经济的结构性缺陷。自主性发展被看作是延长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各方面决定过程的结果。求助于工业国家的历史经验,只有“在具有一种自身原有的能力,能批判地加工运用这经验,即尽可能没有盲目模仿的时候”才是合理的。这种现代化战略的一个决定性要点,是几项过程同时启动。

- 第一产业增加食品生产;
- 调动和利用本地资源;
- 工业部门的发展趋向于生产工具的生产;

——进一步发展和发明适用的技术；

——大众消费品的工业生产。

重要的是逐渐但是稳步地在农业部门将农业和乡村工业与技术相结合,同时将地区性的或全国性的轻重工业与经济区的发展相结合。经济动员需要在居民中作对应的政治动员。大众参与被视为抵制过度的官僚统治的经常威胁的纠正手段,而这种威胁是有学问的上层政治人物指导下的现代化进程常见的一部分。除了确立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掌握社会上的种种变化之外,虽有各种独立经营的意图,却必须保证与世界市场相结合。这是通过选择性的专业分工而获得的,由此第三世界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有了竞争力,日本在1868年以后分阶段结合到世界市场的方法被视为样板。

据森哈斯所说,现代化只有在如下所有变项能同时受到检验时才能成功。“在过去三百年的历史中,不是只有单独的一个例子说明自主性发展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如果互相配合便有成效:1.个人、集体和整个政治文化的特性都得到顺利的发展。2.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自律及自我引导能力增强。3.在所有主要部门中生产资源的分头发展:农业、生产资料工业、技术的发明和提供、大众消费品工业、私人和公共服务行业。4.与境外社会单位之间互惠交换,最初设法按严格的集体方式进行,以求在日后的发展阶段能有更大的扩展。”

独立经营论者所强调的各种发展过程的互相依赖是有启示作用的,但在实践上不能实现,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其所具条件与那些工业国家在起步时的条件不相同。由于东西方冲突日益支配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所以看来要发展一种可选择的发展模式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与新的国际军事秩序相抵触,这一点已由森哈斯在其书中另一处地方作了广泛的研究。对军队在第三世界所起作用的调查发现,发展中国家仿效欧洲的发展过程,其结果大不相同。

#### 4. 军队在第三世界的作用

军队一直是其所在国主权的象征。因此，第三世界国家自然要通过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强调其独立性。然而，它们的技术落后意味着必须依赖工业国的武器供应，结果由它们自身的军事力量所证明的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独立了。1975年输送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武器第一次超过500亿西德马克。因此，如今有可能谈论第三世界中军事对政治系统的渗透了。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紧张状态，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文职上层缺乏成功地应付危机的能力，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军队不是自己把持权力，就是控制文职政府。文职当局和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始终以政治为第一，这是欧洲国家的特点，但在第三世界国家则是闻所未闻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的军事化，在社会科学文献中称为“军事执政官制”（praetorianism）。军事执政官制用以指称缺乏大众普遍接受的权力结构的现象，是政治衰败的一种典型特征。军事执政官制差不多总是发生在试图转变至欧洲法制模式而告失败的时候。一般而言，这种转变过程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是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关联的，而发展中国家则正缺乏这类条件，例如工业化、城市化和知识化。军事人员不可避免地卷入未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争议，并被文职利益集团奉为有吸引力的伙伴。这些集团受到实际事务的影响愈深，若有需求，其需求满足愈少，那么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就愈大。珀尔穆特指出，军人执政有两种类型：摄政者和独裁者。军人若扮演独裁者的角色，与文职上层人物一起演出各种各样的共生戏，他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合作利益而不是擅自为他们担负责任；作为摄政者，则不能满足于控制权力，而是在实际上行使权力。

60年代初，社会科学曾较多地注意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政变现象，那时一般意见都同情派伊对军队在发展进程中所起作用的积

极评价,这是他于1957年在圣莫尼卡由兰德公司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提出的观点。据派伊所说,发展中国家的军队完全模仿西方范式,表现出工业化国家所特有的那种现代组织形式。军队领导组织所需的管理职能,是系统地进行传授的,同时,军队上层人员由于接触现代技术,对于他们自己国家经济上和技术上的落后状况特别敏感。据派伊说,在发展中国家,军队组织有三点比其他组织有利之处:

1. 随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迫使他们跟上技术创新,并把眼光放到国界以外。
2. 为使装备尽可能具有效率,而这在和平时期又是个无法用数量表示的因素,所以军队必须比其他组织少作让步。
3. 军队部分地参与社会,这意味着他们有能力适应工业国家的规范,胜过适应自己国家的疑难问题。

派伊得出结论说:“这使我们断定:欠发达国家的军方能对从根本上加强行政管理功能作出重大贡献。”

在卡默洛特争议之后,紧接着美国社会学重定方向,特别是詹诺维茨尖锐地批判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军方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起作用的乐观评价,并得出恰恰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军队的发展水平没有多大的重要性。据他所见,这些军队是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步兵队伍的模式组织的,其所获得的技能,只属于中等管理水平,不足以应用于大规模的计划工作和组织工作。为有效行使政治权力,必须具备其他长处,如谈判技巧、交际能力、随机让步的本领——所有这些技能,军官在其特殊的职业社会化过程中都未曾学到。相反,一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的极度不信任却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反政治倾向是军人专家政治思想的一种表现,作为军人,他们倾向于相信任何问题都可以取得一个简单直接的解决办

法。”

这些理解的矛盾性质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军队职能的两面性。作为赋有用武力强制执行的垄断权的机构，军队原本可以在危机时期承担权力，但又很明显地不宜因其特殊的职业社会化而行使权力。由于军队行动的倾向只是在压制而不是化解社会上的各种冲突或者根据一套既定的规则处理这些冲突，所以那些穿制服的独裁者所保证的稳定局面不过是虚幻而已。这种发展非常靠不住，因为军事统治一般只能由军队加以推翻，或者，在由文官集团策划推翻的场合他们也依靠军人集团的支持，就像1973年的泰国和一年后希腊发生的事变所显示的那样。

军官集团作为一批相对同质的上层分子，只能在传统尚未分化的社会里，在命令和服从的基础上施行统治。这类社会恰恰就是缺乏现代化基础条件的社会。在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复杂化的过渡社会里，军事权力往往是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如果没有为协调、管理和解决冲突及问题的中央政治机构——而军人政府又往往采取行动取得控制权力，以解散政党、工会和其他利益集团——军方就自动地变成许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了。

作为整个组织的范例，军方可以起动技术和组织技能，以应付危机和促进现代化，这种能力是以减少复杂性作为代价的。军队的技术能力，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应用到了民用事业的发展上：筑路、灌溉工程以及其他用以改进基础结构的种种措施。其中也包括全面的训练计划，例如对新兵通过周密的学校教育推行文化运动以及对他们进行使用武器和机器的训练。第三世界的士兵训练趋向于产生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也可应用于平民生活中。

军人统治能更快地作出决策，而他们机动动作的余地显然比文官当局大得多，这都是毫无疑问的。1966年加纳实施的紧缩政策，巴基斯坦和秘鲁的土地改革，巴西对通货膨胀的严酷战斗，都是军方在危机时刻作出决断的结果。这样一种决断排除了文官政府所有繁琐的制衡制度，以贯彻只对极少数人不方便的方法。

另一方面,运用这类无可置疑的能力是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军人把政治首先看作一项组织问题,但作为一个官僚组织,其本身是不能革新的,而是要求一套独立的政治系统。特别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意识形态,军人不能调动大批政党取得自身的合法性和制度化。由于军人知道文官政府所执行的人民主权原则,所以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应无可回避地证实他们有能力取得成功,因为文官政府就是在这首要一点上的失败导致了政变。事实上,军方在许多事例中未得成功,这是因为军人对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估计不足。缺乏行政管理能力和没有政治全局概念,加上以敌友分类作指导的军事哲学思想,把政治理解为一场你胜我负的赌赛,并相信一定有简单的办法解决一切问题。如果预期中的成功没有成为现实,军人政权就必须估计到将面临往昔被压制者的反对,由此又引起军人一方面的压迫。“具有决断力的独裁主义政权结构上的优势,由于政治上层人物和知识阶层很大一部分结构允许利益可以明确提出,可以进行积累,并可以得到满足,结果造成潜在冲突,这样就成了功能上的劣势。”如勒纳简明地指出的:“搞暴力的专家”可以驱逐“搞买卖的专家”,但是不能代替他们。军事执政官制综合征意味着军队的干预成为可能。如果穿制服的上层人物不欲永久卷入政治,那么他们就应当除去军事执政官制的根源,这样一种努力按照规律总是会大大增强其力量的。

从东西方之间军事对抗的全球观点来说,第三世界的军事冲突并不是发生在边缘地区的孤立事件,而是几乎自然地牵涉到联盟大国的国际冲突,在这里明白地存在着某种类似国际军事秩序的情况。“按照这个与新的经济秩序的结构相对立的新的国际军事秩序说来,在边缘地区要求选择这样一个发展模式是不现实的:要求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和国家的独立,而不予军事部门以适当的选择,不发展一种独创性的学说。因为,根据传统来说,威胁不仅对于创建现代化武器系统是一种刺激,而且提供了一种非常容易操纵的辩护工具,以便在政治上为维持现存经济制度而贯彻

社会控制的必要机制。”因此，现代化战略如果除去军人，就注定要失败。

## 5. “迟到的现代化”问题

因此，独立发展看来正像简单模仿欧洲工业化一样，无助于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条件，在许多方面不同于18、19世纪的欧洲。下列是四个最重要的因素：

1. 第三世界各国的国际纠葛意味着他们不能独立自己的问题，这对这些年轻国家的自我意识和身份地位来说，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两难困境。在发展中国家或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每次发生政治危机，总有一条长长的阴影——第三世界国家不能由此逃避——因殖民地的过去和目前的冲突而投射到北半球上。

2. 第二个因素可以称为非同时性问题的同时性。这意思是：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在工业化国家是前后相继地发生的，因而容易把握。例如：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早期工业化阶段是以大部分人民的巨大苦难和悲惨生活为代价取得的，社会不安定则被独裁政权或极权统治所制服。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几乎不存在民主的权力形式。在今天，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以及人的尊严和民主，当然是作为具有同等地位的价值进行宣传了，可是没有坦率地指出的是：为使这些原则发挥功效，不能把专属于西方的一套标准直接移植到其他国家。英国试图强加议会民主制于过去的一些殖民地而告失败，就是很好的例子。这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轰轰烈烈如工业革命那样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其有关国家社会政治的不安定，作为对危机的反应，这种变革必然引发一种比民主更有魅力的领导力量，而这种领导力量的持久存在具有风险。

3. 第三个因素是民族自决权的削弱使日益增大的技术差距变得越来越难以弥合。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迟到的现代化”的假说

得到最清晰的证明。当年的欧洲国家要弥合与英国蒸汽机的差距,比起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要适应电子计算机时代来,是容易得多了。从这一点来说,第三世界国家是落伍的国家,他们所处落后的位置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日甚一日地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工业国家的技术转让。特别是生产技术被大型跨国公司所垄断,它们凭着复杂的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决定性地影响着当前世界市场的发展,并决定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困难的窘境。一方面,它们无力发明合适的技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并不面向大众消费;另一方面,第三世界中先进国家是否对适宜的技术感兴趣,抑或这种兴趣只是出于维护声誉的动机,还是有疑问的,如巴西对现代技术的权利要求所提示的那样。国家主权和自治权作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价值,可能因为依赖外国技术而遭到破坏。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至少150年前所说的评语可以恰当地在这里加以引用:“自从特洛伊人从希腊人那里接受了一匹木马的时候起,某些国家接受其他国家礼物的事就变得不可靠了。”

4. 第四个因素是自主性的削弱,其特征可以见于发展目标的表面设计。科学家和政治家都毫无疑问地臆断,发展中国家的唯一前景是成为工业化国家。这个被工业国家所宣扬而为第三世界所接受的目标所伴随的实现方案,充其量不过是对欧洲经济史上运转有效的各种变项功能上的等值物的探究。然而,由于工业社会的危险信号如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以及军备竞赛等日益紧迫,必须允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是否有权将我们的发展方式强加于那些国家,这种强加在许多方面相当于第二次文化上的殖民化。谁赋予我们权力去决定具有许多世纪传统的外国文化的前途,并将它们送上未经质疑的进步观念的祭坛呢?此外,伊朗的一些事态表明,现代化和工业化必须在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上扎根,如果计划中的社会变革不欲制造无法预见其后果的认同危机的话。

## 6. 历史学在比较社会研究中的作用

对欧洲和第三世界不同条件的对比研究引导我们回到这样的问题：历史学能在比较社会研究的领域上对社会学作出什么贡献？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的分析，历史学能在下列三方面发挥作用。

1. 对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进行研究，可以提供有关传统的灵活性的信息。现代化理论在比较的意义上运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两分概念，这里使用“传统的”这个术语，或者是作为残余种类，意思是“非现代”，或者是作为统计变项，其中没有社会变化的意思。这意味着有关传统社会和过渡社会不同发展潜力的问题被先验地排除了。这样一个问题可以允许对过去的主导价值和规范系统不同程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及它们在危机时期的稳定功能进行分析，而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地要与向现代性的过渡相关联的。伊朗的历史是最好的例子。很明显，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复兴是一次认同危机造成的，而此次认同危机则导源于近来这些年操之过急的现代化。伊斯兰教是否可以作为现代化过程的思想基础这个热门问题，是遭到法国社会学家和东方学家罗丹松否定的，因为宗教把中心问题从人类所争取的最高价值转移到来世去了，由此就无法提供社会行为的基础模式。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个宗教在阿拉伯国家所起的保护和稳定权力的作用。许多与现代化相抵触的传统，并不一定是穆罕默德传下来的，只不过为伊斯兰教所圣化了。伊朗现代化的溃败猛然使我们注意到，传统在决定社会行为作为文化价值的场合，在社会变革的理论中起到主要变项的作用，这一点也可以从历史本身观察到。

2. 在原则上，比较社会研究有如下三个方法。历史的相对研究：由于规定时空条件而减少了理论的适用性，这意味着实际上有效地阻塞了通向更复杂的解释的路径。分析的相对研究：改变某种

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论,以基于所有社会现实都得到解释,此时那理论就失去其经验主义的意义而变成累赘的事。结构的相对研究:提供经验上可证实的条件,从而可以出现社会现实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个方法在今天受到青睐,因为它设法避免其他两种方法——就是目前称为历史决定论和趋同论的缺点。

具体地说,这里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过程的问题是:同样的制度是否能完成不同的功能?或者,是否必需用其他制度完成这些同样的功能,即所谓功能等值物?在这里,对于获得现代化成功的各种不同的道路,工业化世界提供了充分的经验证明。

如果把欧洲工业革命的历史视为长期的积累性过程的结果,那么个体特性的作用往往就被过分忽略了。俗语说的“人创造历史”,当然是一个简单化的说法,但是把社会变化作为自律过程的理念也是如此。当然,历史变项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无法预测的,但是它对社会变化的重要性却是毫无疑问的。哥策在他对古巴、加纳和印度尼西亚出现具有魅力的领导人所作的比较研究中表明,这三个国家都经历了两种前后不同的政治体制,两者均有制度性缺陷的特点。

3. 信念领域相对自主性的发现与社会生活的结构方面相比较,使我们想到社会学和历史学合作的第三种可能性。文化上的解释不能合法地成为价值无涉论,但它却是独立于其他文化的价值系统之外的,不过,为了避免错误解释的危险,要求有高度的自我反省。与社会科学家相反,历史学家更早地认识到,他们对外国文化历史的印象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现代化理论中的社会学概括。社会变化的理论假如没有历史层面,就是空虚的,但对第三世界发展进程的历史的重新解释,意味着重新考虑我们欧洲的经验,我们的研究从这里取得了许许多多尚未意识到的和意识到的东西。为了减少我们可能提出的不恰当问题的数量,现在我们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正在利用社会学史以传统的工具分析过去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问,大多数第三世

界国家是否能在工业化的方向上有任何真实的发展机会？或者，它们过去的社会文化是否提供了其他存在形式，而我们从西方文化的观点看来，认为这是陈旧的，或者是对现代性的障碍，因而加以拒绝？传统社会也能在西方现代化的影响下发生改变，并且发展出特殊的稳定机制作为过渡社会，而未达到现代化理论所设想的终极阶段，如泰国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意味着否定了趋同理论的基本前提。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设法解释向现代性突破的现象。他们研究的主题和取得新发现的兴趣，是与一个可以认知的价值体系相关联的。问题在于那些价值是否仍然决定我们社会的自我形象，并且因之决定社会科学。在马克斯·韦伯论客观性的文章接近末尾的地方，我们看到一句最常被引用的话，乍看似乎平庸，但却已明确地认识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把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投射得更远些，“那么科学就准备改变它的位置和概念架构，并从哲学抽象的无上高度俯瞰纷纭事物。科学追随着那些能对它的工作赋予意义和目标的星座。”就研究发展中国家来说，改变位置和概念架构的时候确实已经到了。

（李喻喻 译）

S. 艾森斯塔德

## 发展中地区 and 新兴国家中的 科层系统形成问题\*

—

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科层系统都趋于急剧地发展起来,并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当前殖民地的新国家获得自己的独立的时候,当一些较老的国家(如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大规模地开始现代化并扩展国家的活动范围的时候,他们接管了许多从以前的时候遗留下来的公共行政机构;同时扩展了这些机构的活动范围;并创立了一些新的机构。每一个机构都成为这些国家政治框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大部分这样的国家当中,由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科层系统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科层系统的活动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与速度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怎样的?科层系统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它是否有助于形成一种有生命力的现代政治体系?或者说,它是否会导致形成一种不稳定的、充满紧张状态的、低效率的政治结构?科层系统的结构是怎样的?在这些社会中科层系统

---

\* 选自 B. 霍塞利茨和 W. 莫尔主编的《工业化与社会》,1963 年。

所起的作用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它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和不同于西方的科层组织?科层系统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效地实现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最后,它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过程的——是促进还是妨碍?

## 二

发展中地区科层系统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在大部分这样的地区中,并不是存在一个而是存在两个或三个科层系统——或者说在科层组织和结构中至少存在不同的层次。首先,这里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前现代”或“前发展”层次,这个层次是在独立之前或现代化开始之前形成的。一般地说,第二个层次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这个层次是由独立与现代化的实现和确立新的社会、政治和目标的双重影响造成的。

在前殖民地的新兴国家中,“旧”的殖民时代的文职服务机构大都保存下来了,以维护人事结构、组织结构和传统。这种旧文职服务机构的组织和结构为独立实现后科层行政机构的扩大和发展提供了框架。

在这些社会中,最早形成的科层系统是基于殖民者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以及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要求。这种科层系统是建立在宗主国的全面政治控制的基础上的;行政机构参与社区内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是很低的。这就必须限制它的活动,使其能服从于基本的行政服务机构。这也表明了科层系统的某些结构性特征,如很高程度的集权,忠于法律的规定与规则,以及较低程度的内部分化。因此,独立之前的科层系统有助于形成现代的、普遍主义的法律和行政的活动框架和组织框架。在另一方面,这些科层系统又是高度非政治化的,它们坚持在政治上处于中立地位的服务机构的理想。它们之所以是非政治性的,还在于他们从不参与他们所服务的国家中内部政治生活。这种有限的目标是由殖民

者规定的,它们并不对其统治的国家中的政治群体和舆论负责。在调节“殖民地”人口内部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活动方面,以及在形成和凝聚那些人口的政治利益方面,它并不起重要作用。<sup>①</sup>无论所承担的“内部”政治活动是什么,都必须采取行政指令和法律强制的形式。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像印度这样的实行“直接统治”的国家中,殖民当局文职服务机构活动的范围和影响都要远远超过按“间接统治”的原则进行治理的国家,在后一类国家中,都或多或少地为本地人管理自己的事务进行管理的余地,特别是在地方一级就更是如此。

新兴国家科层系统中的第二个层次主要是由独立实现后形成的部门和机构构成。这些新形成的文职服务机构在人事、目标、机构和活动上都是“新的”。这一层次所录用的也是新的职员——他们所受的教育往往是不够的,他们能担任这些职务的主要理由是他们先前参加了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这些新的科层机构有自己新的目标,如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发展教育及社区发展。

与“殖民当局”的服务机构的成员不同,新补充进来的官员大多具有明确而清晰的政治取向,具有政治责任感。他们常常将自己看作是自己的运动、政党和派别的代表。因此,他们常常认为他们主要应该履行政治的职能——或是实现某种政治目标,或是代表、宣传和调节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政治利益。

旧的科层系统和新的机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特别是在独立初期,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会对旧的殖民当局的服务机构残余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在有些地方,这将导致完全摧毁旧的机构。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会在旧的机构和新的机构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或者是新的或者是旧的占据支配地位;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会更加强调实现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目标,在政治过程中的投

---

<sup>①</sup> 这里所使用的术语参见 G. 阿尔蒙德《研究比较政治的功能方法》,见 G. 阿尔蒙德和 J. 科尔曼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普林斯顿,1960年,第26—58页。

人也会大大超过以前。

在大部分新国家中,通常会形成具有较明显政治取向的科层系统。这种类型的科层系统往往是由不同“政党”的官员组成的,这些政党是在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并逐步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政党,如印度国大党、加纳的人民大会党、突尼斯的新宪政党等。这些党的科层系统都主要希望的是控制人民中的各个群体,以及形成对新政权的政治支持和效忠,而不是促进形成普遍主义的范围,发展公共服务机构或创建新的公共行政服务机构。在人事和整个政治监督方面,政党的科层系统与政府科层系统中的新的机构是很相似的,有时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时,他们主要是通过总理和内阁部长的活动来起作用的。但政党科层系统成员的活动模式和取向却是与政府科层系统截然不同的,有时甚至是互相冲突的。<sup>①</sup>

### 三

曾经受过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的科层系统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尽管这些模式之间并非完全没有相似之处。首先,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存在一个传统的科层系统——或者是“王权”(如在中东国家),或者是“寡头共和制”(如在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科层系统通常都支持着政治舞台。在这些科层系统中,某些传统因素往往是与较现代的因素混合在一起的。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新的因素都是从欧洲国家那里照搬过来的——比如,在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中,法国模式就有重要影响。

这些行政机构通常都关心如何维护统治寡头们的利益,他们注重实现的社会经济目标是相当有限的。无论已经在什么方面出现了现代化的趋势——比如在军事领域或教育领域中——他们在

---

<sup>①</sup> 见 D.阿普特和 R.利斯达特《科层制、政党和立宪民主》,见 G.卡特和 W.布朗编《处在转变中的非洲》,波士顿,1958。

政治上的主要目标都是要将现代化限制在尽可能少的领域中,使这些领域中的现代化能有助于维护现存体制。<sup>①</sup>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入,随着内部民主化的影响的增多以及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形成,这些科层系统不得不扩大其活动范围,并要录用新人。但旧的模式仍会在新的机构和部门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如在行政培训、组织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在社会与政治取向上。只有在像墨西哥这样的少数旧国家中,有广泛影响的,有较完善组织的准革命性政党成功地推翻了寡头制,并建立了一种稳定的、有生命力的现代政治框架。在这些国家中,形成了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的科层组织模式,这些模式与新兴国家中的模式也并不是完全不同的。

在大部分这样的旧国家中,政党科层系统通常没有新兴国家那么重要。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国家中,在政治机构中寡头及君主作用要更强一些,同时,一些重要的制度型的利益群体——如军队——形成了,他们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要参与者,并往往成为政治活动的场所和有影响的压力群体。

无论是在前殖民地社会中还是在有着长时间独立的历史的社会中,都会出现另一种独特的科层组织,即大的经济或商业公司。在旧国家中,这些公司更多地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在新兴国家中,更多地是集中在公共机构和混合型机构手中。但在所有这些社会中,公司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 四

因此,我们在每一个新形成的国家中都可以看到,科层系统的

---

<sup>①</sup> 见 G. 阿尔蒙德和 J. 科尔曼前引书中所收 G. 布兰科斯坦的文章和 D. 拉斯托的文章。也见 W. 西芬编《公共行政比较研究》中 W. 夏普(论埃及)、A. 利保斯基(论玻利维亚)、F. 海迪(论菲律宾)、J. 莫尔(论泰国)的文章, Bloomington, 1957。

发展模式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完全相同的。科层系统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是在多少有些不同的条件下形成的,并对不同类型的需求和压力作出反应。只是在独立之后,或在现代化的目标和计划形成之后,这些部分才开始被纳入共同的框架,才发现要做出某种妥协以实现它们所承担的任务。

所有科层系统所面对的最重要的普遍性问题也许就是它必须适应由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和多样化所导致的新的活动目标和领域,适应社会中各种群体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以及新的社会和政治目标的形成等情况。在力图使自己适应这一切的过程中,这些处在形成过程中的科层系统会形成一些自己独有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主要是受各自不同的形成原因以及他们所处的条件的影响。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科层系统发展成为一种韦伯所说的法理型组织这种“经典型”的类型,或者完全成为一种中性的服务机构。确实,在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和加纳,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原来的法国统治的国家——这种关于服务机构的理想还有人接受,在建立科层系统时还有人坚持,但即使是在这些国家中,也会发生一些使科层系统的重要取向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件。同样,这些科层系统的结构特征和活动模式也在不同程度上相异于西方流行的模式。

这些科层系统在社会和政治取向上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他们深深地卷入各自国家中的政治过程。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比如,在许多此种类型的国家中,科层系统往往不只是处于立法机构监督之下的行政管理机构;它也是一种带有情感倾向的执行机构,在形成、确定和实现政治目标和较重要的政策方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许多国家中,除了行政首脑之外,科层系统是能够制定明确的政治和行政目标的主要或唯一的团体。

科层系统卷入政治过程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它想使自己成为

一种调节政治活动的主要手段——即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主要场所,并由此使各种利益能得到调节和“凝聚”——在这方面的政治过程中,科层系统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占支配地位的。在有些国家,如在某些拉丁美洲国家中,科层系统本身会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压力群体和利益群体,并与其他寡头群体结成牢固的联盟。

因此,在所有这样的国家中,科层系统往往都执行着不同的政治功能——既像政党,也像立法机构或执行机构——政党往往成为各种政治活动的中心。虽然通过这些活动可以建立起一些现代政治的基本框架,但它也可能降低不同类型的政治角色和活动的分化程度。在后一种情况下,这将会在很大情况下阻碍独立的、分化的政治活动、组织和取向的发展。

正在形成的科层系统在社会取向上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这些科层系统也是在自己的国家中促进社会变迁和政治社会化的工具。

这些科层组织至少在其初期都是以有关官员的角色和其下属的角色的普遍主义和功能专门化的规定为基础的。但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人口所特有的取向是与此不同的。在社会生活中,传统的取向与结构——如扩大家庭——占据着支配地位。在这样的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角色关系都是在传统的群体中形成的;其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个人关系加以规定的。在此之前,科层组织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更少。

因此,公众与政府组织之间所形成的默契就为内容更为广泛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提供了框架。公共对新的政治结构的适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这些默契中所学会的东西。这就经常迫使科层系统超越他们的专门化的角色,承担起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领导和监护的角色——否则他们就无法影响大部分人口中的行为变迁。促进变迁的需求常常使官员们活动范围扩大到超出他们的专门化的角色的地方,使他们进入各种阶层人口的家庭、亲属以及

社区生活中。

## 五

那么,引起科层系统结构的这些发展的原因是什么?这将对政治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一般地说,这些原因包括两种类型。一种在文献中经常被提到的原因,是在发展中地区的一般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背景与作为“现代”科层组织发源地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背景之间存在的差异。普雷瑟斯形象地说明了这些问题。

总的说来,占支配地位的教育哲学往往蔑视实际能力的培训,这会成为科层制发展的一个障碍。中东的青年人愿意成为白领而不愿成为蓝领。这种不恰当的价值会对技术与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这种价值使熟练技术人员的造就变得很困难。在大学中,像统计学和研究方法这样的课程往往受到抵制,因为这些课程会损害已有的关于学习的理论和课程安排。这样的教育信念不承认科层组织所要求的准确性、专业化和科学方法。<sup>①</sup>

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的,是主观的政治价值重于科层系统对技能和经验的客观要求。

在官员的录用和官员忠诚的对象方面,人们都知道,在中东国家中,主观的、特殊主义的考虑强烈地与任命和决定政策方面的客观性标准相抗衡。在效忠对象主要是家庭成员和个人的朋友的社会中,西方关于事本主义和技术优越性的普遍主义观念以及对

---

<sup>①</sup> R. 普雷瑟斯《科层组织的社会基础》,《社会力量》第38卷,第2号,第103—109页。

像“公共利益”等这样抽象的事务效忠的观念还远没有被人们所接受。一位研究埃及文职服务机构的学者认为,近来的人民在某些场合中还不习惯于用事本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他人。他们往往把他人看作是与特定的家庭、朋友和社区相联系的个人;在最近由于变革而建立了正式机构的领域中,也存在这样的趋势。

这些一般性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背景毫无疑问会影响到新兴国家中行政机构以及人们的行为的性质,因此在分析中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文化特质可以对许多我们上面已注意到的科层行为的不同模式做出解释。但是,就其本身来说,这些因素既无法解释科层系统所具有的共同的基本政治问题,也无法解释这些社会内部在行政机构和行为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

似乎可以说,只注意到这些一般性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背景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分析这些社会政治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那些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社会方面。

## 六

这些过程是指什么?也许这个问题中最有共性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及其领导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及他们在从事这方面活动时所必然形成的矛盾。

在这方面首先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虽然新的统治精英努力建立一种现代政治的框架,并且已经形成了新的政治目标,而且在努力寻找实现这些任务的手段——但在政治过程中普遍参与的程度是较低的。能参与现代化过程的群体和阶层很少,他们也很难按一种现代化的、分化的方式使自己的政治利益明晰化。

仍然存在着许多先赋性的公社的、部族的和私种姓的群体。他们的基本政治取向是传统的,只限于消极的乞求和请愿,或是只限于旧式的宫廷政治。

在另一方面,这里也存在着许多少数人的各不相同的利益,如

小商人群体的利益,他们无法使自己的政治利益明晰化并得到凝聚。在有些国家中,如在拉丁美洲和中东,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制度型的利益群体(教会和军队),他们垄断着大部分政治职位,阻碍着现代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成长。

一般地说,在所有这样的社会中,对政治活动和利益的调节权都集中在统治精英的手中——即旧的民族主义(或军事)运动的领导人的手中。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是集中于某一个重要的政党之中,从而使这个政党能形成一种统一的现代政体的框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们则是分散在不同的小规模政党之中,无法定型为稳定的模式。

随着独立的实现以及现代化的深入,这些精英们在政治组织方面面对着一些必须完成的任务。他们不可能将政治参与局限在以前的水平上;他们必须将政治参与扩大到那些在政治上比较冷漠而且要求并不明晰的群体中去,从他们那里获得新的政治盟友、政治参与和效忠。如果只是与殖民时代时占支配地位的消极的盟友结成联盟,这种新的政权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因为他们所做的种种事情正在损害那种盟友。通过强调政府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作用,他们能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各种社会阶层中去。无论如何,他们也要促进新的社会与政治动机和参与的发育。他们制订了各种有关社区发展、工农业组织以及农业改革的这种方案——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新的取向、新的刺激并要形成许多新的动机模式。

但是,在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新的政治统治者们发现他们处在一系列新的窘境之中。

在我们所讨论的大部分国家中,在统治精英的活动中和在他们促使各阶层的人参与共同的集体目标的努力中形成了一种双重的矛盾。首先,这表现为传统势力与相对现代的“自由流动”的资源的形式及某些职业、经济、文化群体的矛盾。其次,这表现为较现代的力量想联起手来以形成一种较独立自主的权力中心的趋势与统治精英要尽可能控制这些力量和中心的目标的矛盾。

这样,精英们就会自然地面对着另一种问题或矛盾。他们所宣称的新目标都或明或暗地包含着对公众的许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就更是如此。各种社会群体都会拿出这些账单来要求精英们兑现,特别是在精英们需要支持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在这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将其控制的产品和服务分配给自己的支持者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并努力控制其他社会力量。但是,精英们会由此走进一个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社会目标的实现以及他们自己对合法性的要求都会受到严重的妨碍,因为他们将许多资源付给了支持者以作为他们的报酬。精英们要控制传统力量,特别是要控制现代力量的需求,以及他们对待这些力量的矛盾态度,使这个问题不断严重化。

## 七

这些矛盾所造成的重要影响之一——也是政治精英与官员们合作的结果——就是政治精英和官员加强对权力和威望的垄断的内在趋势不断强化。这种趋势往往是与独立后的社会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趋势表现在:(1)努力按照政治权力形成一种严格的等级系统;(2)努力将各种社会流动过程置于政治精英的控制之下;(3)努力将大量的经济、专业和文化活动置于政治精英的控制之下。

政治精英和官员们都倾向于努力降低纯粹的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和效能,压制经济群体对社会自主性的要求。他们往往将超经济标准置于经济标准和经济活动的承担者之上——这并非仅仅是根据广泛的、一般性的“社会目标”,而且也是通过对这些活动的日常调节和指导实现的。因此,政治精英有时会阻止独立的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文化与职业精英的发展,将他们的地位完全与行政命令联系起来。

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他们力图支配和控制所有地方流动的主要渠道。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维持他们对潜在的权力中心的控

制,并控制这些权力中心的发展。但这些努力也常常是自相矛盾的:由科层系统所实施的牢固控制会损害发展经济的努力;想进入新职位的人远远超过职位的数量,这样官员本身也处在了一种没有保障的地位之中。

在没有殖民地经历的国家中,这个过程会朝向多少有些不同的方向发展。广泛群体和阶层的政治意向的清晰度和组织化程度很低,其他方面的情形也有所不同。在这些国家中,在旧的寡头与某些新兴的群体和政党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

但是,某些现代的政治框架也是存在的——尽管是由相对有限的寡头们创立的。这些政治框架是政治活动和调节政治活动的主要机构,这些机构的存在会妨碍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意向的明晰化及更进一步的现代化。因此,这些群体在政治上所占的支配地位常常会妨碍科层系统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扩张,并会妨碍科层系统的效能和结构理性化。

## 八

新兴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特征对科层系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最至关重要的事实是,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精英促进的;政治运动以及后来建立的国家在打破传统社会的框架和促进社会经济分化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使得很少有其他群体能独立地参与这个过程并有助于实现新的目标。这些因素必然会使科层系统在这些社会的政治过程和社会结构中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由于这种科层系统成为促进变革的机构,因此这种科层系统必然会创造出新型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活动,它也必须承担许多凝聚政治要求和使之明晰化的功能。

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中的科层系统会陷入一种很类似于新兴统治者所面对的进退两难的窘境。有效地实现他们的目标以及建立有生命力的现代政治制度框架,都有赖于政治稳定以及新型

的政治与行政态度和活动的形成。但同样的一些条件也会对以科层系统名义进行的活动产生某种压力,这种压力很容易损害科层系统的效能和它实现自己的目标并提供服务的能力,而这时的科层系统还要尽量抵制许多潜在的政治支持者所提出的种种要求。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对这些国家中的经济过程与科层系统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这些国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科层系统成为经济社会流动的主要通道。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另一个原因是,在这样的国家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白领工作享有很高的威望——这种威望是由政治发展以及政治精英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等原因促成的。第三个原因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影响,同时也由于统治者需要满足人们的流动期望并将人们的不满降到最低限度,人们对流动的期望大大提高。第四个因素是教育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对劳动力和职业选择结构的影响,因为这种教育强调的是识文断字而不是教育。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便形成了对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中的职业的很大压力。这种压力必然会反过来对经济和政治发展造成影响。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这种要求和期望会很容易造成技术岗位缺乏充足的人手,普遍有白领失业或就业不充分。从政治上来看,这些趋势会产生许多压力与紧张状态。因此,这些问题会削弱科层系统的效能,因为这会使科层系统成为一种人浮于事的机构,工作的保障与实绩很少有联系,某些附加的(政治的或个人的)标准会成为录用与升迁的主要决定因素。如果将这些政治压力与经济压力联系起来看,我们就可以找到这种科层系统中广泛存在的腐败现象的原因。

## 九

所有这些因素——在这些社会中广泛流行的文化取向,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压力——都必然会反过来影响到科层系统的结构以

及它实现自己的政治社会目标并为公众不断提供服务的能力。

人们已经注意到的较重要的结构性问题有如下方面:(1)行政结构的密度较低,或者说官员数量与人口和任务不成比例;(2)缺少完全称职的职员;(3)功能多样化的程度较低,其结果是不同组织之间的互相重叠;(4)不同的层次和部门之间缺少沟通;(5)过分集权化,合作很差,官员们缺少独立性和首创性。

里格斯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很精当的概括,这些概括特别适合于早就获得了独立的那些国家:

妨碍个人认同计划目标的那些因素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确定不同官员的工作渠道和责任的方式上,也就是说,是表现在“组织与管理”上。这些因素往往使得一个人在得不到其他人赞同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实施某种建设性的计划,这样一来,许多人都拥有阻止别人的工作的权利。其结果就是,哪怕是较次要的争论也要拿到各部、内阁或行政首脑那里去解决。最高层的行政官员被卷入到机构间的接连不断的冲突之中,在等待上峰的决定时,下属便无所事事。由于许多人不是从事执行的工作而卷入决策领域,而问题又往往是提供给对之很少有兴趣的人来解决,因此要确定执行的责任是很困难的,而最后的决定也只能取决于那些只是间接地关心这些问题的个人内部的权力斗争。<sup>①</sup>

在有些国家中,精心设计的部长职位多是由多面手来承担,他们在中央和地区之间忙个不停,在部长与执行部门之间也需要进行很多的沟通工作。结果就是,部长们经常要考虑那些在正常情况下是分派给各部门的工作。我们可以援引一位印度著名的前任文职官

<sup>①</sup> F.里格斯《公共行政——一个在经济发展中受到忽视的因素》,《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年鉴》,1956年9月,第70—81页。

员的话来分析这种状况的结果：

各部门的头头完全丧失了首创精神，也不关心自己工作的进展，他们的大量时间是花费在准备毫无必要的报告上，报告只是要解释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属于这个部，然后等待与自己的职权范围有关的指示。

由于过分集权并缺少协调，那些与某个行动目标直接有关的人很难与其他部门中能直接影响这项工作的人进行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工作获得进展，一般就要设立新的机构，以避免既有的结构的障碍，使工作得以进行。但这种新的机构会强化科层系统内部的冲突与竞争，而且对于担任最高职务的人来说，进行协调的负担也加重了。<sup>①</sup>

这些问题中每个问题的重要性如何，在不同的国家中是不同的。在前殖民地国家，最关键的问题似乎是缺少称职的工作人员、过分集权化和多样化的程度很低。在早就独立的国家中，最重要的问题则是过分的控制、僵硬性、官员缺少首创精神以及官员们将自己的职务看作是可以只领钱不干活的。这些不同的结构性问题有许多是互相重叠的。除这些因素之外，科层系统的腐败和无能是经常时隐时现的两个幽灵。

## 十

发展中地区科层系统的活动、组织模式和政治社会取向都是与西方国家是明显不同的。但是，只是强调新出现的科层系统与西

---

<sup>①</sup> 见 A. 戈瓦拉《公共行政报告》，新德里，1951年，第39页。也见 P. 阿卜莱比《印度的公共行政：研究报告》，新德里，1953年，第二部分，特别是第21页。

方国家早就有的科层系统的区别,或只是指出前者在结构上的缺陷和问题,还是远远不够的。除了那些上面所勾画的共有特征之外,还应注意到的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中,科层系统形成的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对政治与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评价科层系统对政治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时,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科层系统是促进社会与政治变革的重要机构,必须考察其对这种变迁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一般地说,在发展中地区,科层系统对变革与发展可能会产生两种重要的而又可能是互相交叉的影响。

首先的一种可能性是,较为有效的现代行政框架的形成;法律规范和规则的确立,维持基本的服务,尽管往往是通过科层系统对许多政治功能的垄断做到这一点的;科层系统活动范围的扩大;官员担任社会、政治方面的许多领导角色。通过建立新的政治框架和上述活动的扩展,科层系统能在中央和地方两级上创立许多新的社会组织并开展活动,这有助于建立有生命力的政治框架并形成能刺激经济发展的条件。

科层系统这种类型的取向和活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下述两个条件:(1)存在着某些基本的、统一的政治框架,相对团结的政治精英以及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识;(2)纯粹的制度型利益群体(军队和教会)相对弱于区位阶层(ecological strata)和功能群体。

精英们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克服由很高的消费期望所产生的压力,以及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广泛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而为技术性工作提供合格的人才,这也会减轻对白领职业的压力。

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科层系统的结构和活动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古典”的科层组织。但是,由于其活动范围是比较广泛的,而且这些活动又是与坚定的政治取向相联系的,加之拥有较强的政治共识,会有利于维持稳定性和连续性,对新型的经济企业家的形成会起刺激作用,同时在地方和中央两级导致专业性的活

动和政治领导的形成。因此,科层系统也会有助于形成功能群体的多样化、独立的公共舆论和领导。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会存在一种相对强有力的政党科层系统。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政党科层系统与文职服务机构会存在矛盾,但如果从一开始就存在统一的政治框架并在其中存在功能的多样化的话,将会有助于促进变迁和经济发展。

科层系统发展的第二种重要的可能性是科层系统会造成里格斯所称的“消极发展”。<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科层系统会垄断主要的政治功能,并成为一个重要的利益群体,它通常与某些制度型利益群体和寡头阶层结成牢固的同盟。由于这种联盟的作用,科层系统往往成为吸引人们想成为“白领”的中心,并由此导致机构超员。在另一方面,它又往往成为一种“狭隘”的利益群体,千方百计扼制各种独立的政治活动的发展。这很容易妨碍经济发展方案的实施,因为这妨碍他人收入的增加并威胁到他人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科层系统常常会卷入狭隘的经济政治斗争中去。腐败现象迅速蔓延开来;基本服务机构、普遍主义的法律和经济活动的稳定性将会受到破坏。在不存在统一的政治框架和共识、传统精英与现代精英之间存在较大的裂痕或现代精英内部缺少共识以及像教会和军队这样的制度型利益群体和其他狭隘的寡头群体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就很可能会出现上述过程。

正如上面所表明的,发展中地区科层系统的这两种发展的可能性源于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某些具体情况下,这些趋势可能会互相重叠,但科层系统本身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种发展的具体结果,发挥这种影响的手段就是科层系统对共同的政治目标的支持以及所制订的教育政策。

(孙立平 译)

---

<sup>①</sup> F.里格斯《经济发展与地方行政》,《菲律宾公共行政杂志》第三卷第1号(1959年1月),第86—146页。

费尔南多·法哈恩西尔维尔

## 作为工业化模式的美国和日本\*

本章旨在对地域发展的经历和当前有关工业化选择和发展战略的争论作一番批判性的回顾。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适度努力,本文分析拉美三个国家——阿根廷、巴西、墨西哥<sup>①</sup>——和东亚韩国的发展经历。这里,主要目的在于确证构成各不相同的地域发展样式的结构性特征。

首先应当阐明“发展样式”这个概念的含义,以及这个概念与“发展战略”之间的区别。前一个概念设定每一个国家都存在一种复杂的发展过程,它导致社会组织、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分配的独特民族结构。这些民族条件的目的是解决有关物质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的问题(平托,1976年;格拉夏雷纳,1976年;森克尔1981年)。而“发展战略”则指“为导致特定的经济后果所制定的政府政策”(杰里菲,本书第一章)。

战略时常影响发展样式的形成,但仅仅分析战略并不足以解

---

\* 选自《制造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一书。本章阐述的都是作者本人的解释和观点,并不一定反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或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看法。感谢杜克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埃里森在编辑本章时所给予的帮助。

① 拉丁美洲人口的约64%,集中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这三个国家占该地域72%的国内生产总值和77%的工业产品。另外,在该区域与科技有关的开支中,它们共占了80%,而在区域汽车工业生产中,它们则总共占83%。

释一个特定国家或区域的经济现实。经验式调查所面临的问题是有意制定的战略的确切作用,因为这些作用在各国是不同的。例如,战略对发展样式的决定作用在日本要比美国更为突出,在韩国要比拉美更为突出,在巴西要比阿根廷更为突出。可见,这里所作的发展样式的比较只能对发展战略问题作一点介绍。

而且,来自经济学领域的见解在描述发展样式特征方面,可能要比解释发展样式更为有用。正如这里所显示的,当来自不同“文化领域”的发展经历有着悬殊差别,而讨论仅集中于经济行为和后果时,解释的范围和分析的规范潜力必然受到限制。本书其他章节对发展样式的历史、政治和社会决定因素已有所论述,这里的主要任务是对发展经历的跨民族、跨地域比较构筑一个简要的框架。

在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中盛行的各种发展样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差异,不仅要考虑新兴工业国(地区)本身,还得探讨一下那些仍被视为其“典范”的发展经历。60年代后韩国发展政策的主要灵感来源是日本。而拉美的精英则以美国作为主要的参照对象。因此,对美国和日本的发展样式作一简明的比较将有助于阐明当代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发展经历。

本章将对其余的篇幅作如下的安排。首先,有必要对美国和日本的发展样式(和历史经验)作出系统的比较。本节集中论述一整套可行的设想,这些设想构成了更广泛的、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的基础。然而,更重要的是它为随后的拉美和东亚发展样式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背景性材料。本章在结束时将对拉美新兴工业国的精英在工业化道路上所面临的根本性的发展挑战和政策选择作一些思考。

### 比较发展样式:美国与日本

可以把韩国和拉美发展样式的主要方面视为它们各自努力效法美国和日本的派生物。简言之,东亚各国(地区)一般重视战略上

的工业化,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占领”主要市场,包括占领美国的市场。拉美国家则主要追求在精英阶层再造“美国生活方式”。除了其他重要特点外,由此产生的发展样式具有如下的特征:(1)消费趋势严重倾斜,即以牺牲农村和大多数低收入阶层为代价,照顾城市精英集团的利益;(2)生产结构使生产向国内而不是向国际市场倾斜。

可见,对美国和日本的发展样式的若干基本特征加以界定将是恰当的。

表1所列举的内容虽然既不是非常具体的,也未能面面俱到,但它毕竟为这些“典范”各自的发展经历提供了讨论的基点。

表1 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样式

日 本	美 国
对经济事务具有战略的长期方针。	对经济事务具有战术的、短期的方针。
具有明显的高水平储蓄倾向。	具有明显的高水平消费倾向。
自然资源的缺乏要求发展工业。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陆经济”使其得以在经济部门间不偏不倚。
企业取向为“占领”国际市场。	企业集中于庞大可靠的国内市场。
因缺乏自然资源,将教育体系视为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项。	把教育体系视为对人力资源的投资,要受到成本—效益的评估。
有关技术性的职业(如机械)具有相对的优势。	有关法律和金融机构的职业最为热门。
对统治精英取得政治上合法性而言,社会的一体化至关重要。	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建筑在市场力量的动作上。

两种发展样式之所以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至少部分地源于美国和日本各不相同的当代历史,以及这些经历所产生的国际态势和自我形象。日本带着更新的民族目的意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渐渐崛起。日本政治领导层的合法性与成功地恢复民族尊严有不可分离的联系。作为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小岛国,日本通过精心制定的部门战略和长期计划来构筑其经济能力。由此产生的强有力增长样式巩固了日本的政治领导层和现存体制的合法地位。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里,美国已习惯于充当世界头号强国的角色。凭借其语言的流行,货币的坚挺,富裕生活方式的吸引力,以及富有成效的大陆经济,美国一直充当别的国家的样板。然而,尽管在表面上美国具有令人羡慕的国际地位,但后来它的增长相对缓慢,工业生产率提高迟缓,国际竞争力衰退,政治和经济政策多变,而且一贯忽视部门计划选择(总统直辖工业竞争力委员会,1985年)。

有以下一系列因素可以说明为什么美国资本形成率比较低,乃至经济增长率较慢:(1)较低的家庭储蓄率;(2)高额财政赤字;(3)生产部门所需的相对较高的资本成本;(4)税制中鼓励消费甚于投资的明显倾向。

与日本所奉行的紧缩消费相反,美国曾拥有更多的某些基本消费品,例如汽车。这些消费品在国内外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重要象征。一项特别有启迪作用的统计似乎总结了美国和日本对待消费与投资的根本差异。1981年,日本的汽车相对密度是美国的三分之一,而日本的人均收入却是美国的四分之三强(世界银行,1985年;总统直辖工业竞争力委员会,1985年),有关其他社会指标的比较资料参见表2。

表2 消费样式:不同的指标

	美 国	日 本
消费/国内生产总值(1986年)	85%	68%
储蓄/国内生产总值(1986年)	15%	32%
储蓄/可支配收入(1984年)	5.2%	22.5%
固定的国内资本形式/国内生产总值(1986年)	18%	28%
汽车/1000人(1983年)	540	221
1人/住房	0.5	1.0
配有浴室的住房	5.2%	65.5%
能源消费/1人(1986年)(每公升汽油)	7193.0	3186.0
每日热量/需要(1983年)	137%	113%

资料来源: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和技术司,资料依据《总统直辖工业竞争力委员会(1985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8年。

表3 美国—日本:经济活动部门的贸易差额  
(百万美元)

		1970	1975	1981	1983	1985	1986	1987	1988
农 业 <sup>①</sup>	美国	+ 631	+ 12069	+ 25344	+ 16518	+ 3659	- 320	+ 3813	14953
	日本	- 5292	- 13931	- 24929	- 23301	24264	- 27892	- 34787	-
制 造 业 <sup>②</sup>	美国	+ 4154	+ 21196	+ 13369	- 28925	- 107566	- 138626	- 146010	- 139723
	日本	+ 13180	+ 42393	+ 119152	+ 113403	+ 137550	+ 162311	+ 167254	-
能 源 <sup>③</sup>	美国	- 1480	- 21922	- 73974	- 50349	- 45759	- 31652	- 39014	- 35896
	日本	- 3858	- 25432	- 72091	- 58636	- 55319	- 36565	- 38779	-
矿 产 <sup>④</sup>	美国	- 863	- 1295	- 5183	- 5298	+ 1302	- 6087	- 5440	- 5915
	日本	- 3698	- 5734	- 11223	- 10055	- 9662	- 8657	- 10962	-
其他部门 <sup>⑤</sup>	美国	+ 196	+ 640	758	- 1268	- 245	- 3961	+ 7963	+ 14749
	日本	+ 105	+ 594	- 2168	- 877	- 1992	- 6454	- 3020	-
总 计	美国	+ 2638	+ 10688	- 39686	- 69322	- 148609	- 180646	- 178688	- 151832
	日本	+ 437	- 2110	+ 8741	+ 20534	46362	82743	+ 79706	-

资料来源: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和技术司;以联合国多年的商品贸易统计和有关统计文件为依据。

- [注]①包括: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0,1,2,4项,27,28次项  
 ②包括: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5至8项,68(有色金属)次项  
 ③包括: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3项。  
 ④包括: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27,28,68次项。  
 ⑤包括: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9项

比较美国来说,制造业部门在日本显得更为重要。1987年日本的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而美国仅占20%(世界银行,1989年)。表3指出日本的制造业部门所赚取的外汇足以平衡所有自然资源部门的赤字。例如,1987年日本的制造业有1670亿美元的盈余。而美国像许多拉美国家一样,唯一不断产生盈余的是农业部门。美日之间的这些差异并不反映其不同的发展观念,而是由日本缺乏自然资源所致。日本成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力的增值,而它的国民可以通过制造业部门来实现这一增值。

当代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衰弱简直富于戏剧性。尽管1975年制造业有210亿美元的盈余,但到1987年却已衰落到有了1460亿美元的赤字。这种竞争力的丧失不仅涉及到“低技术”部门(如纺织、造船业),还涉及到“中等技术”部门(如汽车、电视机)和“高技术”部门(如计算机设备)(美国商业部,1986年)。至于国际竞争力的其他说明指数,可参见表4。

表4 国际竞争力:不同指标

	美 国	日 本
公民 R + D/国民生产总值(1985年)	1.9	2.6 <sup>①</sup>
制成品出口增长 (1965—1986年)	11.1	16.9
机械出口/制成品出口 (1986年)	59.0	72.0
机械出口/世界机械出口 (1963—1986年)	61.0	515.0
机械出口/机械进口 1963年	408.0	266.0
1986年	64.0	1317.0
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sup>②</sup> 1965—1973年	2.8	11.0
1975—1981年	1.7	8.7
1980—1986年	3.7	5.4
制造业出口/制造业进口 (1984—1986年)	57.0	518.0

资料来源: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和技术司,资料依据总统直辖工业竞争力委员会(1985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8年》;联合国:《有关机械产品世界贸易的统计公报,1986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1986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最新国际科技资料(1986)》。

〔注〕①1984年。

②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1988年6月)。

对衰退的解释通常集中归咎于70年代石油价格的暴涨。假定制造业从1975年到1983年损失的500亿美元正好与美国能源费用上涨的280亿美元相吻合,这样的计算表面上似乎言之有理。然而,石油危机的冲击虽然可能导致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衰退,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从1975—1983年用于石油的支出高达340亿美元,而其制造业却盈利710亿美元。1987年,美国和日本在石油贸易中均亏损了390亿美元,但日本以其制造业杰出的业绩为基础,却在总体贸易中盈余800亿美元。而美国则因制造业的亏损达到了最严重的1460亿美元(参见表3),总体贸易赤字达到将近1800亿美元。由此可见,将美国国际竞争力的衰退归咎于石油价格的上涨的观点在经验上是缺乏可信性的。相反,导致竞争力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美国在公民技术上的支出所占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sup>①</sup>

鉴于后面的解释,有必要提一下美、日两国在教育制度上的不同导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仅有两大事件激起美国要求加强技术教育的呼声,一是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二是日本制成品在70年代打入世界市场。美国对机械技术领域的轻视与日本在这些领域显而易见的重视适成对比,1982年,日本的工科学生是美国的两倍。日本大企业的管理人员中有60%是工程师,而美国大企业的管理人员60%则为律师和商业专家。律师在两国的密度也能说明问题,美国每400人中有一个律师,而日本1万人中仅一人为律师。可见,美国律师的密度为日本的25倍。

两国的社会一体化的类型也截然不同。日本的社会与企业是按准家族模式构想和组织的,而美国的社会则明显地反映了“市场的力量”。尽管收入分配的数字有其局限性,但比较一下

---

<sup>①</sup> 美国经济学家对制造业部门国际竞争力的忽视程度令人吃惊。例如,近年分析美国工业结构的一篇最为重要的论文(费尔德斯坦,1980年),就完全没有提到国际竞争力这一课题。类似的忽略也存在于美国工业经济学家编的教科书中(谢勒,1970年)。

美、日两国在这方面的资料也颇能说明问题。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显示了最高水平的公平分配,而美国和法国的特征则是收入最为不平等(世界银行,1989年)。

为了便于对美、日两国的情况作出简明的比较,本章提请读者注意它们各自发展样式的四大结构性特点:

1. 消费(用汽车的密度来评估)。
2. 收入分配(通过40%的低收入和10%最高收入之间的关系来加以衡量)。①
3. 国际竞争力(用机械工业的进出口比率来衡量)。②
4. 长期的活力(用1960—1979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

对这些方面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确证发展样式的重要差异(见图1和表5)。这里所强调的美、日两国的差异类似拉美主要国家与韩国之间的差异。

表5 美国—日本:综合比较指标——“发展样式”

	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率	平均收入分配 40%最低 10%最高	居民千人 拥有小汽车数	出口机械产品/ 进口机械产品 1979—1980年系数
美国	2.5	0.75(1980年)	548	1.41
日本	6.6	0.98(1979年)	196	9.00

资料来源:联合国(1980年);世界银行(1985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83年 a);拉美经济委员会(1984年)。

① 与衡量美国收入分配相关的方法论问题的全面分析,可见布林德等(1980年)。

② 机械部门的“技术密集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工业部门,因此,机械部门的相对竞争力反映了“智力增值”的相对程度。

可以看到,美国的消费水平要高于日本;但是,日本在活力、国际竞争力、分配公平等方面要超过美国,尽管一般人认为增长和公平涉及平衡问题,日本在各方面的相对成功显然是相互促进的。简言之,图1的两组数字指出了不同的发展样式:(1)有战略眼光、以工业为中心、有竞争力、有社会一体化倾向的(日本)样式;(2)重视短期计划、消费、国内市场社会一体化水平较低的(美国)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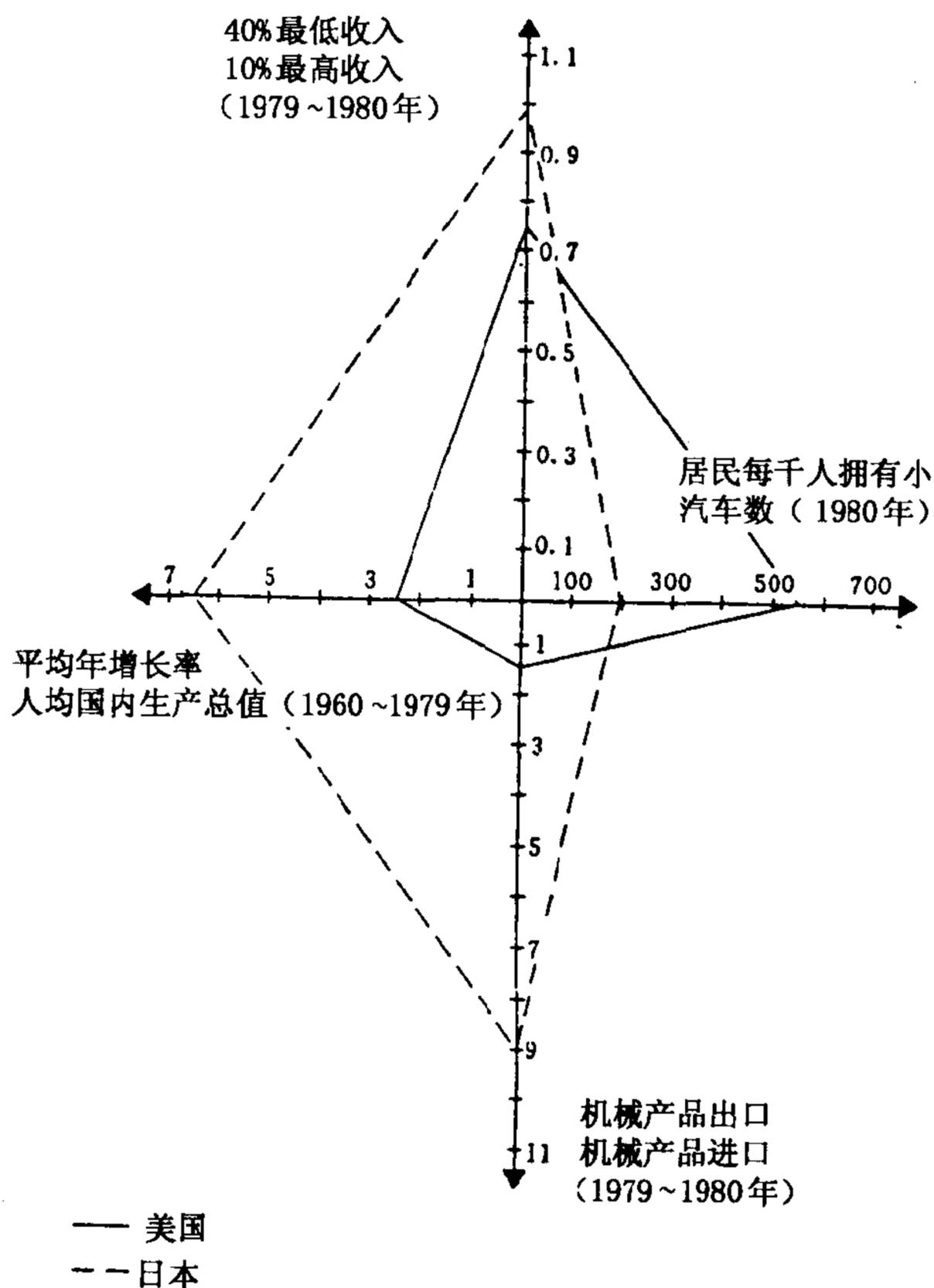


图1 战略形象：美国—日本

资料来源：表5。

## 美国和日本有关“再工业化”的争论

日本经济的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的相对衰弱,引起美国的学术界和政治界,就国家工业化政策的必要性及其未来的轮廓展开了广泛的争论。虽然这些争论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其多种原因,但对拉美和东亚主要国家(地区)的意义却尤为重要。主要经济大国的工业政策有助于世界经济发展道路的形成,为其他国家提供新的机会和制约。可见,美国或日本经济政策的变化将会决定哪种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混合物”对新兴工业国(地区)最为有利。

在美国所进行的有关国家产业政策的争论带有重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在对日本经济成功的解释上,“保守的”和“进步的”两种立场的分歧尤为显著。每一方的支持者都强调日本经验的某些特征,他们提出了这些重要特征对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在含义。

总之,保守派的评论家强调当代日本的发展至少有四个特征是有益的:(1)企业部门的经济领导权和霸主地位;(2)日本企业内部相对和谐的人际关系;(3)公众几乎不参与社会规划;(4)国内市场公开而激烈的竞争。

与这种对日本经验的理解相反,进步派的分析强调非常不同的特点。首先,这些观察家着重指出,日本政府有能力根据国际市场走势的预测,来确定国家的战略选择和长期的重点部门。其次,他们也注意到在形成工业政策时,工业部门的领导作用和金融利益的附属作用。最后,在支持国内企业利益胜过国外利益方面,进步派的解释强调了公共部门作用的三个方面:(1)政府政策对外国投资所起的制约作用;(2)对日本企业在国内市场的优惠;(3)政府对国内企业试图进入世界市场的高度支持。

对日本经济发展情况的见解分歧竟如此之大,无怪乎对美国再工业化政策的期望值、可行性和形式的观点有一大堆了。不过,

可以把这些观点分成两大问题:(1)美国工业部门国际竞争力衰退的可预见程度;(2)相对服务部门来说工业部门的重要性。

表6描述了最近争论的概况。同所有的归类一样,表格把复杂的情况作了简化,解读时必须审慎地加以引用。尤其是表中每一个栏目的作者可能对某些未被双轴线所包括的问题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表6 美国“再工业化”论争:各种观点**

	工业部门必须 恢复其领导地位	转入以服务为导向的 经济是可行的和可取的
美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已严重衰退	A	C
美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对衰落并非结构性问题	B	D

表中的 A 代表工业政策的主要支持者。这些作者认为美国正在经历非工业化进程,赞同制定全国性的战略来逆转工业衰退的主趋势(赖克,1983年;瑟罗,1986年;斯科特,1984年)。与此相反,表中的 D 代表了里根政府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认为美国并没有真正发生非工业化的过程,没有必要采取抵消政策(美国政府,1984年)。

表中其余两部分代表了中间派的立场。C 所代表的争论方承认美国的工业领导地位在国内外的衰落。但是,他们把这一趋势解释为是可取的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化的证据(贝尔,1979年;伯奇,1981年)。在他们看来,服务部门必须取代制造业传统的领导地位,因而不必采取重视工业的政策。

表中的 B 所代表的争论方,承认工业部门内在的衰退,但是,他们认为可以通过现存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来使其实现内部恢复。这些分析家对在美国采取全国性的工业政策的必要性和制度上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巴达拉科和约菲,1983年)。

这些争论将导致什么结果尚不确定,但是,其结果可能形成对

其他国家极为有用的发展战略,因此,对这些争论的更全面的探讨超越了本章的范围,它们是进一步的考查和讨论的很有希望的领域。

### 拉美和东亚:玻璃橱窗式对内源性的现代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经济发展领域中一直充当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模式。本章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拉美主要国家和韩国的各具特色的发展样式源于对美国经验的不同阐释和内在化。

同日本一样,韩国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内经济潜力和完成内部确定的社会目标等方面就是以美国为榜样的。韩国实施了一种自觉的战略,要在国际市场尤其是在美国那样的世界领先的经济大国的市场中获得引人注目的份额。虽然在某些方面,韩国再造了一种与美国相同的“生活方式”,但它又驾驭了经济发展的各种势力,使之实现内源性的现代性。

拉美的发展样式与这种情况截然不同。拉美的政治精英并不像东亚的精英那样追求大胆的计划,他们满足于在资源所能允许的限度内再造美国的消费模式。由于缺乏明确的国家战略,拉美的进程经常不能保护在政治上、经济上被排斥的那部分人的利益。这样的发展模式可称之为玻璃橱窗式现代性。

该地域的主要国家都呈现出玻璃橱窗式现代性,而每一个国家发展经历的特点则源于若干历史决定的条件。在此略举数例:(1)特殊的社会结构特征;(2)国内社会和文化一体化的不同程度;(3)生产要素的变量;(4)地理条件;(5)人口动态与迁移模式的变量;(6)内部的政治结构及其动态。

尽管有这种种不同,但仍可在拉美新兴工业国的发展经历中找出一系列共同特点。这些相同性反映出拉美的精英们毫无批判地力图再造美国发展模式的方方面面。

本章着重探讨八个可以量化的方面来评估拉美和韩国的发展经历:(1)活力;(2)社会一体化;(3)消费模式;(4)国际竞争力和技术发展;(5)生产结构和国际贸易;(6)外债;(7)资本外流;(8)企业领导样式。讨论这些发展方面,可以对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韩国流行的样式进行“综合比较”。

### 活力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力会导致一系列重大的后果。经济快速增长的样式使政治体制合法化,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经济增长与政治体制合法化联系在一起。经济增长的经历——以及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可以缓解分化各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其次,有经济活力的环境也可以减少群众对压迫性的政治结构的不满(即所谓的民主怀旧病)。而且,不断扩大的经济馅饼常常使刚露苗头的贫富悬殊更易被人接受(赫希曼,1973年)。

总之,经济活力的经历支持那种广泛传播的信念,即解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冲突,不是通过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而是通过不断的经济扩张。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本身既成了最高目标,也成了人们反思和探讨的基本焦点。

然而,考察拉美的发展经过就可看出,利益的冲突仅仅得到暂时的延缓,因为经济无节制的增长是以社会、文化与经济脱节和排斥整个社会部门为基础的,这种利益冲突随后就会再度激化。通过利用有价值的自然资源来提高收入,或由于国际金融体系宽容的特性实现的这种“痉挛性”增长,足以使拉美实质上转入玻璃橱窗式的现代性。然而,如此的发展样式无助于:(1)改善国内经济和社会组织;(2)使拉美国家牢固地跻身于国际经济秩序。

考虑到这些因素,审视一下新兴工业国(地区)“增长的节奏”将不无益处。这些国家的经济具有可比性,事实上我们在此讨论的四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相似的——约2000美元。但是,这些国家所经历的经济活力水平却大不相同。在拉美新兴工业国中,巴西的经济最具活力,而阿根廷实际上正处于经济停滞状态。然而,虽然

韩国全部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低(约占巴西的五分之二,墨西哥的二分之一,最近才略高于阿根廷),但韩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速度要远远快于拉美任何一国。

### 社会一体化

一体化概念和与其相反的概念——“解体”——指两个方面:(1)国内生产体系的结构;(2)社会的、空间的乃至文化方面的发展。这些概念对区别发达国家、东亚国家(地区)和拉美新兴工业国的生产结构是十分重要的。

发达国家得益于渐进的一体化进程,拉美新兴工业国却经历了根本不同的发展活力。简言之,矿业中心和土地结构(地产和农场)通常是附加在结构和起源不同的农民共同体上的。这个历史事实导致了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殊消费品和设备的需求样式。拉美的需求结构表明它无力刺激大规模生产基本的、标准化的产品,结果,乡村农业与城市工业需求之间自我维持的联系,虽曾促进发达国家的平衡与一体化发展,但未在拉美的案例中出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采取的技术选择源于发达国家自身的社会经济环境。拉美精英们的技术选择则强化了它们生产结构的双重特征(如需深入探讨可见法哈恩西尔维尔,1986年)。

这种独特的发展经历导致了什么结果呢?首先,拉美的工业化不是自给的发展,而是旨在追求适合发达国家的那些精英消费样式。但是,这种工业增长并没给拉美的大多数人民带来多少好处。于是,需求的乘数效益就转向了国外。

其次,发达国家通过市场机制(如美国),或通过政府干预和计划(如日本),在工业企业的各种成分曾取得的明显增长,并没有在拉美发生,仅出现的是这类工业结构零敲碎打的“移植”,而重要的功能却都分配给了如跨国公司之类的外部势力。

四大指标反映了社会解体各个方面:(1)收入分配;(2)农业雇佣劳动力的百分比;(3)“贫困”的水平;(4)中高级教育的普及率。在拉美新兴工业国中,阿根廷的收入分配方式最为平等,巴西的收

人最为不平等。这样,一项地域的比较表明,经济活力与公平可能是逆向联系的。这样一种观察表面上支持了在拉美广泛流传的观点,即分配不均<sup>①</sup>是经济高度发展的一种暂时的(和必要的)代价。

然而,考虑到韩国的情况,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韩国在社会公平上超过阿根廷,在经济活力上的成就超过巴西。<sup>①</sup>可见,韩国在这些方面要比拉美新兴工业国更为“优越”,就像日本比美国优越一样。这两个东亚国家的增长与公平的水准均高于它们西方的同类国家。

关于上述其他社会指标,阿根廷和韩国的成就要比巴西和墨西哥远为引人注目。例如,这两个国家的教育普及率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阿根廷在高等教育方面较为出色,而韩国在中等教育方面的成就则更值得一提。在所有的社会公平指标上,巴西和墨西哥均远远落后于上述两个新兴工业国。

### 消费样式

这里,比较的重点仍放在新兴工业国的三个消费指标上:(1)小汽车的密度;(2)国内消费主食品供应情况;(3)全部食物的摄取方式。小汽车密度是揭示全国消费方式的特别有用的指标。理由如下:首先,正如世界各地所描绘的,小汽车象征着“现代性”和“美国生活方式”。而且,汽车制造部门可能影响更为广泛的国家发展样式。例如,小汽车的突出作用影响到家庭储蓄的分配。其次,汽车部门的兴盛影响到有关供应物质基础结构的公共政策,也决定了全国能量消耗的方式。最后,汽车部门是先进技术的重要采用者和传播者,它与销售、金融和大众媒介等各类服务部门关系密切(关于其他社会结构的比较数据,见表2)。

现存的资料表明,拉美与韩国汽车密度的水平差异极大(联合

---

<sup>①</sup> 鉴于韩国的农业人口实际上高于巴西,它的成就显然更引人注目。这些国家的财产结构截然不同:1960年,韩国5公顷以下的地产100%是可耕地。日本的同比为84%,在巴西低于5公顷地产中,可耕地仅占1%,44%的土地为1000公顷以上的地产所拥有。

国跨国公司中心,1983年 a)。特别是韩国在成为汽车产品的主要出口国的同时,它国内的小汽车密度仅等于具有同样经济规模的拉美新兴工业国的十分之一至十五分之一。

审查其他指标也揭示了有趣的可比样式。巴西和墨西哥显然忽视国内市场的主食品产量。前10年,这两个国家均以牺牲国内消费为代价,大量增加了供出口的农产品产量。例如,巴西以增加蔗糖的产量来缓解石油产量下降的困境。在同一时期,人均谷物的产量却有实质性的下降。巴西和墨西哥谷物进口系数均稳步上升,至80年代初,增加了近20%。

与此相反,阿根廷和韩国却基本解决了国内消费所需的主食品的产量问题。阿根廷人均摄入热量与美国相同,高于日本和西欧多数国家。这一统计数字主要反映了阿根廷人享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韩国政府的计划者高度重视国内粮食自给自足,从而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虽然所有新兴工业国的热量和蛋白质摄入总量是类似的,其一般饮食的成分结构却大为不同。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与粮食和农业组织提供的数据,区分了拉美和韩国这些国家食物成分的差异。韩国的主食为谷物和鱼,与此相反,拉美消费的肉食比例相对较高。韩国充分发掘潜力,努力做到自给自足和分配的公平来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而拉美主要国家的高收入集团却效仿美国的食物消费方式。因此,拉美城市中上层阶级的食物消费样式与美国中产阶级相同,而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蛋白质消费水平则低得多(例如:奶制品和肉类)。

地域性食物消费的方式也会根据其能量效率而各异。<sup>①</sup>例如,拉美新兴工业国效仿美国的食物消费方式。分析一下美国的食物消费体系,就能揭示出从植物蛋白转化到肉类蛋白造成的无效结果。具体地说,实际提供给消费者的每一热卡需要9热卡的“无效”

<sup>①</sup> 指一个普通消费者消费的每一热卡单位所需的生物能量(或商业能量)。

表7 生产结构:贸易平衡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全体部门	农业	制造业 <sup>①</sup>	能源	矿业	其他
阿 根 廷						
1970	78	1257	- 988	- 73	- 199	- 1
1975	- 985	1777	- 1938	- 504	- 316	- 4
1981	- 280	5771	- 5566	- 402	- 86	3
1983	3332	5703	- 2132	- 129	- 111	1
1985	4581	5576	- 1113	151	- 34	1
1986	2129	4219	- 1646	- 262	- 184	2
1987	543	3598	- 2297	- 571	- 187	—
巴 西						
1970	- 111	1700	- 1556	- 363	109	- 1
1975	- 5049	3989	- 6235	- 3289	505	- 19
1981	- 1499	8072	- 245	- 10842	1354	162
1983	4577	8084	2816	- 7977	1677	- 23
1985	11265	8567	5791	- 4901	1822	- 14
1986	6825	5546	2903	- 3467	1670	173
1987	9648	7629	4498	- 4446	1770	190
墨 西 哥						
1970	- 1256	294	- 1594	- 40	84	—
1975	- 3579	96	- 3934	102	157	—
1981	- 3543	- 1598	- 16439	14012	486	- 4
1983	13574	- 438	- 2752	15974	792	- 2
1985	9197	- 209	- 5092	14049	455	- 6
1986	4323	1255	- 3053	5716	480	- 75
1987	7771	755	- 1544	8038	592	- 70

续表

年份	全体部门	农业	制造业 <sup>①</sup>	能源	矿业	其他
拉美总和						
1970	-464	4963	-9020	1657	1938	-2
1975	-8723	8664	-23943	4060	2475	21
1981	-7744	15080	-49570	19872	6632	242
1983 <sup>②</sup>	28937	17141	-15926	21985	5783	-46
1985 <sup>③</sup>	34541	19372	-13649	22593	6282	-57
1986 <sup>④</sup>	15675	18236	-17061	9661	4732	107
韩 国						
1970	-1148	-507	-446	-127	-67	-1
1975	-2190	-1097	452	-1283	-273	11
1981	-4798	-3875	7865	-7603	-1254	69
1983	-1797	-2947	8867	-6419	-1184	-64
1985	-853	-2763	10067	-6442	-1451	-264
1986	3131	-2668	12025	-4424	-1724	-78
1987	6247	-3490	17448	-5273	-2380	-58

资料来源: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和技术司,根据商品贸易统计,统计文件:各年。

[注]①见表3对这些部门的界定。

②不包括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③不包括巴拿马、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危地马拉。

能量(谢特曼,1985年)。

比较而言,日本和韩国的食物消费方式显得更为有效。高度不平等的食物分配消费模式盛行于拉美地区,因此精英阶层才如此无效利用资源(森克尔,1981年;谢特曼,1985年)。虽然日本和韩国也在小汽车、食物和能源方面有效仿美国消费的倾向,但东亚国家(地区)更注重经济活力与社会的一体化。

### 国际竞争力

对拉美各国和韩国的国际竞争力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出重要的差异。韩国出口的相对重要性和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要大大高于拉美新兴工业国。而且,虽然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等于拉美国家的15%,它的制成品出口却超过拉美国家的总和。

各种原因导致了国际竞争力的这种差异。本文将着重讨论科技领域研究和开发的突出地位。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在主要工科领域,包括化学和电子方面的应用。跨国的比较强调了在体现高水平技术进步领域内研究与开发的差异的重要性。在机械工业方面,韩国引以自豪的是,它在进出口方面的系数远远高于任何拉美国家(见表10)。

尽管巴西出口系数也较低,它在拉美国家中却具有最强的国际竞争力。巴西的制成品出口占该区域各国总量的一半。而且,巴西投入与生产部门的科技资源的绝对水平是其他两个拉美新兴工业国总和的两倍。在80年代初期,国内市场发生危机时,巴西有能力通过扩大出口来挽回损失,显示了它超常的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方面强大的潜力。1984年,美国进口增长26%,巴西至美国的出口量却剧增了54%。这一成就与同期的东亚出口国(地区)相比也毫不逊色。

### 生产结构和国际贸易

比较分析特殊生产部门对外贸平衡的作用,有助于进一步区分一系列发展样式(见表7)。首先,自然资源形成了拉美国家国际贸易的基石。农业对于阿根廷是至关重要的。巴西则以农业和采矿业为主。自70年代中期以来,石油为墨西哥带来了重要的外汇。其次,韩国以高水平的制成品出口来弥补与自然资源有关的实际上是所有部门的亏损。可见,韩国同日本一样,以增加制成品出口来抵消石油价格的暴涨,结果,这又成了进一步增长的动力。

第三,80年代早期拉美各国的国内市场均遭到严重的衰退,唯有巴西在制造业部门有贸易盈余。由于巴西在70年代末努力

实行进口替代(赫希曼,1987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制造业部门不可能成为对外部门的负担。

第四,巴西在农业和工业部门同时改善贸易平衡,以此来弥补恶化的能源状况,而阿根廷在能源的矿产方面相对得以自给,农业的盈余足以补偿工业部门产生的亏损。

第五,与其他区域新兴工业国非常有利的业绩相反,墨西哥在工业结构停滞的同时,农业和矿业部门也大为衰退。70年代,墨西哥大举外债,总额将近300亿美元,这些钱主要流入石油生产部门,而不是用于技术与产业升级。

### 外债

在外债方面,上述四国也显示出相似点和差异处。1981年,各国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接近30%。然而,在三个主要方面,这些国家却有实质性的差异:(1)外债的相对压力;(2)外部震荡的影响(如高利率和贸易条件的恶化);(3)外国资金的应用(如用于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投资在各部门的分配)。

拉美与韩国在这个领域的经历的主要差异,或许牵涉到与出口有关的外债的相对压力。拉美新兴工业国的外债与出口的比率为3:1,韩国则低于1:1。虽然缺乏有关外债用途的精确数据,但是,某些部门显然得到外来资金的最大份额。以墨西哥为例,这些资金大部分流入石油部门,小部分用于制造业部门和增加进口消费品。阿根廷也增加了消费品的进口。不过,在巴西和韩国,外借资金直接用于制造业部门。可见,尽管拉美工业国和韩国在外债水平上表面相似,但各国使用这些资金的不同对它们长期发展样式和工业增长能力却具有非同小可的含义。

### 资本外流

阿根廷和墨西哥的资本外流,有时相当严重,但巴西和韩国却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类事件。经济政策的不同方面(例如外汇管理和利率)固然可能导致或防止资本外流,但政府与企业界关系的差异却起着关键的作用。

尽管巴西和韩国的历史背景明显不同,但两国的公共和私有部分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战略关系,即企业界的行为是为了完成精心制定的国家目标。然而,提到“为国家负责”的观念,阿根廷和墨西哥的企业界精英却一向抱有反感。墨西哥在这方面尤其成问题,资本广泛外流是由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信任全面崩溃,而与美国邻近这一事实使这种状况更为恶化。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需要深入探讨,但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此作出更全面的分析(斯托林斯,本书第三章)。

### 企业领导样式

比较一下韩国和拉美新兴工业国企业界的领导样式,就可揭示出四方面的差异。首先,韩国多少类似日本,得益于政府与全国性联合大企业有影响集团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大多数主要企业从事的行业类型繁多,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联系对韩国制造业最为重要。韩国十大联合企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46个主要企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拉美地区的私营全国性联合大企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要少得多,它们与政府机关的关系也和韩国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有一种说法:80年代初,韩国的金融体制基本上是政府意愿的产物。除了地方银行和外国银行的分行,金融机构不是政府创办和所有的,便是由政府通过控股来加以控制(亚洲开发银行,1984年)。拉美的公共开发银行虽然也具有相对的重要性,但更强大的私人金融机构与之并存,它远远强于韩国的私人银行。拉美的这些私人金融机构在短期中介业务中起着主要的作用。

还有两大不同之处值得一提。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拉美的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它把重点放在国内市场。与之相比,在韩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跨国公司的全面作用要小得多。

最后,第四方面,新兴工业国在公共企业参与投资方面也各不相同。就石油部门对发展样式的巨大影响而言,那么,如墨西哥石

油公司这样的公共企业在本国也许是最为重要的。然而,这类企业在韩国要比巴西和阿根廷更广泛地参与工业活动。

总之,关于企业领导样式可以确定若干区域性的差异(见表8和9)。韩国政府部门干预规划并同一小部分实力强大的全国性联合大企业进行密切的协商,从而为自足的经济增长的努力扫清了道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工业领导权方面的影响仅限于极少数以出口为导向的部门。

表8 不同类型企业的相对重要性

	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	韩国
外国直接投资:股本 (70年代后期)(百 万美元)	5489 (1983年)	13000	3868	737
生产总值中跨国公 司所占份额(制造 业)	31% (1972年)	44% (1977年)	39% (1970年)	11% (1975年)
跨国公司参预的成 品出口	30+ % (1969年)	43% (1969年)	34% (1974年)	27% (1978年)
公共企业:总固定投 资中的份额	20% (1978—1980年)	23% (1980年)	29% (1978年)	25% (1974—1977年)
全国性私营联合大 企业对国民生产 总值的贡献(1978 年):				
十大企业	无资料	无资料	无资料	23%
46家大企业	无资料	无资料	无资料	43%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83年b);萨克斯(1985年);Kim(1985年);拉美经济委员会(1986年)。

然而,拉美新兴工业国都缺乏这样“有机”的制度上的结合。相反,拉美工业职能的分配允许跨国公司在许多最有活力的经济部门起着领导作用。拉美的公共企业承担基础结构建设,而私有全国性企业则常常局限于较少活力、非尖端性的部门,局限于服务性生

表9 政府、私有和外国企业股份的百分比:总销售量,1983年

	阿 根 廷			巴 西			韩 国		
	政府企业	私营企业	跨国公司	政府企业	私营企业	跨国公司	政府企业	私营企业	跨国公司
十大企业	45.1	7.1	47.8	59.3	11.2	29.5	83.7	14.2	2.1
50家大企业	37.1	24.5	38.4	47.4	20.8	31.8	65.9	24.5	9.6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83年b);拉美经济委员会(1986年)。

表10 新兴工业国经济与社会指标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率 1960—1979年 <sup>①</sup>	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40%最低收入 10%最高收入	居民每千人 拥有汽车数 1980年	机械产品: 出口/进口 1979—1980年
阿 根 廷	2.5	0.40(1970年)	109	0.35
巴 西	6.3 <sup>②</sup>	0.14(1972年)	68	0.58
墨 西 哥	2.8	0.24(1977年)	56	0.10
韩 国	7.2	0.61(1976年)	6	0.7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5年);拉美经济委员会(1984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83年b);联合国(1980年)。

[注]①用最小二乘法,通过指数函数的校正来评估。

②1965—1979年。

产,包括中介性的金融机构。

### 发展样式的综合比较

为了对拉美国家和韩国作一番比较简要的比较,我们把重点放在其发展经历的四个方面。这些方面相同于先前对日本与美国发展样式所作的比较:(1)消费样式;(2)分配公平的程度;(3)经济发展的样式;(4)国际竞争力的水平(见表4)。我们能从拉美与韩国发展样式的评介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图2显示出韩国的特征与日本非常相似:高度的经济活力;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高度的竞争力;节制的消费。与此相反,图2显示出阿根廷与美国非常相似:较低的增长水平和竞争力;较差的公平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纵情的”全国性消费。巴西和墨西哥像阿根廷一样,也比东亚的新兴工业国(地区)具有较高的消费水平。另外,虽然巴西和墨西哥与阿根廷均有分配非常不均的经历,但它们经济增长率也大大高于南方的邻国。但是,尽管其收入水平相对公平,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却使拉美新兴工业国相形见绌。韩国在国际竞争力方面也领先于拉美国家,只有巴西在这方面的成就与它略为接近。

从这些发展样式的确认和探讨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美国的经历为拉美的精英提供了“样板”,它为拉美地区不同的国家所“移植”和吸收。尽管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与韩国相比,拉美所有的主要国家都表现出高消费水平(以小汽车的密度来衡量),并都伴随着为国内市场生产的倾向。确实,巴西经济的特征是开放程度低于美国。经济活力和分配公平性在地域内部有差异的原因为:(1)国内市场规模不同;(2)各自独特的社会历史进程形成了不同程度的“社会结构”。

有趣的是,在70年代末,巴西和墨西哥的经济计划制订者都曾参照日本的发展经验,试图重新制定它们的工业战略。巴西第二个

国家发展计划和墨西哥工业发展计划反映了这些努力的成果。当两国的政策制定者企图“完成”日本式的生产结构时，他们却无法再现对日本经历至关重要的两大要素：(1)普遍的社会经济公平；(2)由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日本企业家的领导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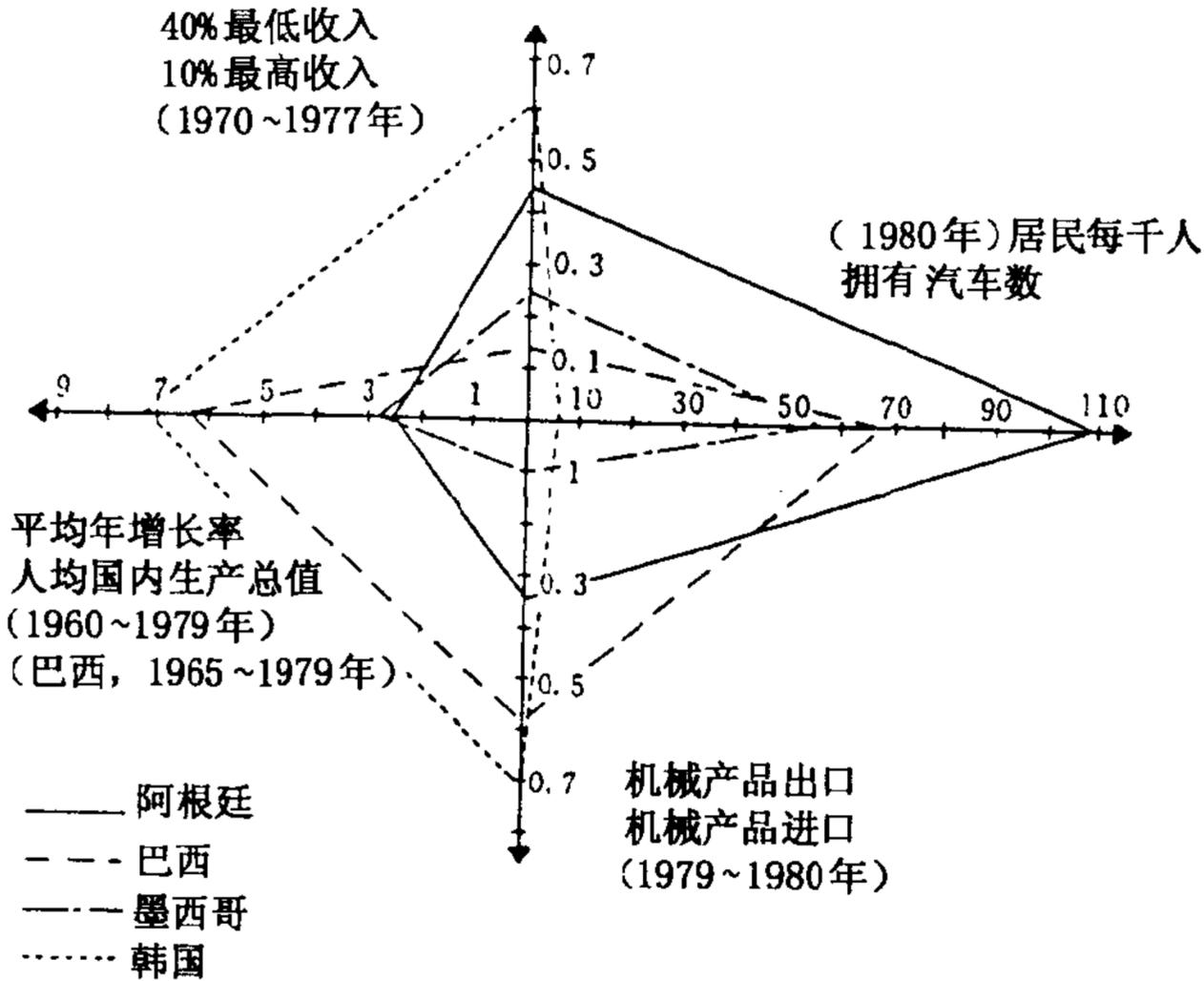


图2 战略形象：阿根廷、巴西、韩国和墨西哥

资料来源：表10。

最后，对1980年到1985年这一阶段的分析表明，图表中经济活力、公平性和竞争力的轴线上，拉美地区都呈下降的态势。这些趋势的唯一例外是巴西，近年来它的国际竞争力已得到相对的提高。

## 结 论

当然，在经济活力水平、社会经济结构、可用的自然资源、国内市场的规模、农业部门的组织和其相对重要性以及工业化进程的遗产这些方面，拉美各国的情况也很不相同。虽然区域内部存在着

这种差异,本文还是确定了拉美各国共同的、单一的发展样式。它有四大重要特征:(1)持续的“铺张”消费样式;(2)工业部门主要倾向于国内市场;(3)通过出口自然资源使民族经济跻身于国际体系;(4)民族工业的领导作用不甚明确。

关键是抓住一个要点:这四大特征都是相互联系,并互为影响的。因此,人们若不同时考虑民族企业部门的弱点,就无法理解现存的和一再出现的所谓“玻璃橱窗式现代性”以及倾向国内市场的系统化导向,反之亦然。另一方面,这三大条件的结合也有助于说明一个事实,即使在几十年工业化之后,拉美经济跻身国际市场仍以出口自然资源为主要基础。

因此,制定新的工业化战略的任何企图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的相互依存关系,并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对待。例如,实施只强调需打开国内市场的政策就可能无意中加剧玻璃橱窗式现代性的影响,进一步削弱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国内企业部门,并提高了自然资源在拉美对外经济联系方面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加强民族企业部门的努力可能会通过私有化或国有化的手段,将重点放在把现存的企业资产转移给其他经济角色。但是,这种战略可能会支持那种与经济增长不相符合的全国性的消费方式。鉴于资本逆向流动现阶段在该区域是共同现象,那么,这一战略将会导致无法预见但极为重要的严重后果。

总之,拉美各国和其他国家的经历表明,成功的发展战略必须同时致力于两个相关的问题:(1)国内社会与经济的关系;(2)国家进入国际经济秩序的方式。有些观点认为,可以通过排斥部分社会集团和地区来加强进入国际经济秩序的力度,这种看法仅仅使幻想长存。这种战略导致的潜在的社会冲突,造成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可能危及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成就。

然而,只注重国内关系和分配问题,而忽视更广泛地进入国际经济的努力,事实证明也是有害无益的。由于大众物质期望值的增长,这种政策导向也会加剧政治冲突。而且,生活水平的改善,要求

与之相配的物质资源,而这只有通过提高生产力才能得到。只有吸收先进技术,才能导致经济增长,也只有通过有效地打入世界经济体系,才能促进技术进步。

拉美当代新兴工业国特有的工业化样式反映了“技术活力内源性核心”的弱点(法哈恩西尔维尔,1986年)。要改进拉美盛行的“玻璃橱窗式现代性”样式,必须使这种“技术活力内源性核心”有所加强并结合成整体,其组成部分——商品和服务子系统也同样如此(法哈恩西尔维尔,1983年)。

如上所述,对当前存在于整个拉美地区的“玻璃橱窗式现代性”样式的各种表现,源于其共同特征的综合因素,即高消费、生产面向国内市场、通过自然资源打入国际市场、虚弱的民族企业部门,加上各不相同的民族社会和工业特征。可见,要创造任何成功的发展政策,必须考虑这些共同的特征和许多各不相同的民族特性。

图2显示,拉美新兴工业国面临着扩大各自的曲线所包含的领域的共同的挑战。不过,各国均可通过着重解决已成为特别紧迫的问题的那些领域来对付挑战。例如,阿根廷可以致力于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活力,巴西却可将重点放在与公平有关的问题。墨西哥的政策制定者在公平、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活力方面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但是,对该区域每一个新兴工业国来说,一个更注重节省的消费样式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sup>①</sup>

本文也论证了东亚国家(地区)在经济增长水平和分配公平程度均高于拉美同类国家。承认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地区)表现各异,这已在拉美各国引起热烈的讨论。拉美国家有关发展政策的讨论已经“意识形态化”。这与前述最近在美国展开的“再工业化”的讨论如出一辙。

---

<sup>①</sup> 人们应当承认,这些建议与最近的趋势是不相协调的。在80年代前5年,主要拉美国家的经济复苏中,唯一显示其非凡活力的工业部门恰恰是汽车生产部门。

然而,形成地域发展样式的一系列结构特征的相互关联的特点表明,任何企图在拉美“再现”东亚经历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对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和分配公平是重要的目标,拉美新兴工业国试图在其政治民主化的机构框架内来完成这些社会经济目标。拉美国家力图在经济目标和民主政治的复苏之间协调一致,其重要性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的。

所以,本文对盛行的发展样式进行分析的目的不是要拉美国家不加批判地模仿东亚的战略政策,相反,上述的跨地域比较是为了促进对拉美发展现实的思考。拉美主要国家所积累的社会需求和经济潜力(如技术活力内源性核心)的独特本质表明了形成地域特有的发展样板的重要性。

(俞新天等 译)

萧新煌

## 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索<sup>\*</sup>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的发展经历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界所注意的一个焦点，尤其是那些对发展研究感兴趣的团体。巨大的注意力集中于叙述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历，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不言而喻，日本的经济活力自60年代以来就已在发展和现代化专家中获得了声誉。此外，发达世界及发展中世界的实践家和决策者们，同样更急于在东亚成功经历的背后找到构成其活力的各种要素，以便与之抗衡或竞争。许多著作首先从经济业绩方面介绍了以上所述国家和地区的成功。

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惊人经济成就较为近期的研究，可以在各种经济刊物和不同的国际或地区会议的文献中找到。撇开用于评价或比较的各种指标不谈，看来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绩没有什么争议。人们多次尝试解释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怎样成功的，并在较小的范围内解释其原因。<sup>①</sup>所有这些言论中有一个非常有趣之处，就是学者们和实践家们都同样急于

---

\* 选自彼得·伯格编《探索东亚发展模式》英文版，1988年。

① 罗伯特·韦德和戈登·怀特合编的《东亚的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见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特刊，第15卷第2期，1984年；并见罗伊·霍夫海因茨和肯特·考尔德：《东亚优势》（纽约，1982年）。

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以某种方式传输到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地方。新近的两个会议说明了这一点：一个是由纽约州卡内基伦理和国际事务会社于1984年9月25—29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亚洲发展模式与加勒比海地区主动精神”讨论会；另一个是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美国—墨西哥研究中心主办的，于1984年12月13—15日在拉霍拉召开的“拉美和东亚发展的政治经济”专题讨论会。

上述两次会议有一个不言而喻的意图，就是对于东亚发展模式，如果不是全盘照搬的话，也要确定采纳某些特点的可能性，以便将这些特点运用于发展工作遇到困难和亟需援助的加勒比海地区或拉丁美洲。得到最大关注的各项政策效果和制度因素，显然被看作是使东亚发展模式获得成功的重要变项，不过这一点并不排除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看看两次会议上所发表的那些论文的标题，人们得到的印象是，政府的作用最广泛地被称为领导东亚发展工作的关键力量，由此产生各种具体政策，以鼓励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包括土地改革、农业政策、工业战略、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政策以及劳工政策。会上有许多好的论述，分析出成功的政策因素，可供拉美或加勒比海地区的决策者们加以利用。

这样的政策讨论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具有真实性。在讨论政府的特定政策对不同经济部门的影响时，也清楚地注意到原因和效果的问题。总的说来，宏观政治、经济过程的讨论，始终是围绕着政府的具体行动和总的成绩。会上共同认为，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决不能按照冈纳尔·米达尔在1960年指称南亚的那种意义，描述为“软性的”。<sup>①</sup>这些政府对东亚经济和市场领域的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成效，已逐渐被发展问题专家们看清了。一个新的词语可以用于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发展型国家

<sup>①</sup> 冈纳尔·米达尔：《亚洲戏剧：对各国贫困的研究》（纽约，1968年）。

或地区”。它可以有其他称呼,但不是“软性的”、“消极的”或“最低姿态的”。<sup>①</sup>

在中国台湾和韩国,政府对农业部门的相对控制是千真万确的。<sup>②</sup>新加坡决不是一个消极型国家,甚至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也不能称为软性的行政机体。最惊人的成就表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各项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政策中,这些政策被认为是在一二十年内确实革新了六千多万人(包括其中最贫穷者)的生活的迅速工业化的原动力。<sup>③</sup>I. M. D. 利特尔所持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力“可以归因于良好的政策和人民”的看法,大体上得到了从事世界发展研究的严肃的观察家们和学者们的同意。<sup>④</sup>但如上所述,“良好的政策”只限于国内政策,而“人民因素”也只是作为“人力资源”而提到的。东亚各地政府在战后年代被迫应付的更广泛的全球性政治—经济背景,或多或少地被看成是特定的,而不加以认真的分析。这就在世界体系的动力同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之间留下了一个分析的真空。对于人的因素主要作为静态的人类天赋问题来考虑,又过于简单化了。它很少洞察到东亚人民如何并为何能够真正被动员起来遵从各种发展政策的问题。在东亚发展活力背后的各种文化—心理力量,至今未曾得到深入的探讨,尽管有许多文章把这些力量作为某种尚未解释的残余因素而加以提及。甚至那些企图从社会文化观点来解释东亚成功经历的严肃的文化学家们,或者是由于他们作了过分理论性的考察而没

---

① 米克·摩尔:“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农业:政府是无所作为的吗?”见前引罗伯特·韦德和戈登合编的《东亚的发展型国家》,第57—64页;以及罗伯特·韦德:“韩国的农业发展:消极型国家的神话”,见《太平洋观点》1983年5月号,第11—28页。

② 萧新煌:《中国台湾和韩国政府的农业战略:宏观社会学的评价》(台北,1980年);萧新煌:《再次参观东亚的土地改革: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成分》,见约翰·泰西托里和苏珊·伍尔夫森合编的《东亚发展模式研究》,第149—159页。

③ I. M. D. 利特尔:“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迅速的劳动密集型发展的经验和原因,以及模仿的可能性”,见《国际劳工组织工作报告》11—1,1979年。

④ 见前引 I. M. D. 利特尔所著文。

有得到经验性评价的支持,或者是由于他们的只把社区或村庄而不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狭窄眼界,结果没有拿出十分令人信服的东西。彼得·伯格提倡一种经济—文化观点,试图把驱使东亚人民行动的各种文化力量纳入关于这个地区自6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动力的分析,结果获得了成效。<sup>①</sup>不过,还非常需要做许多切实可靠的经验性实证工作。

在本文中,我想提出可以指望给探索东亚发展模式的重要任务定调子的一连串经验性问题,将其运用于全球性经济活力与国内政策制订之间,并用以沟通受文化约束的社会行为范式与国家一级的经济活力之间的隔阂。我不想作出任何经验性的结论;而只想指出什么是已认识的和什么是尚未认识的,以便使东亚发展模式的研究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富有成果。

### 全球性政治—经济背景

有一点真正的共识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活力是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尤其是制造品出口的迅速繁荣的结果。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贸易和出口中令人难忘的成就,说明它们靠制订各种最可行的发展战略,包括利用世界市场作为增值产品更好出路的政策,从而克服了有限自然资源的约束。这种战略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各个工业先进国家的市场经历过高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品出口是容易接受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而利用有效的世界市场的各种途径,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先是进口替代工业化(ISI),然后是出口导向工业化(EOI),这个顺序特别值得注意。东亚新兴

---

<sup>①</sup> 彼得·L·伯格:“有东亚发展模式吗?”《经济新闻》(台北),1984年9月,第17—23页;以及彼得·L·伯格:“加勒比海地区能学习东亚吗?”《加勒比海评论》第13卷第2期,1984年2月,第6—9页。

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60年代中后期进行了工业化战略的重要转变,当时世界经济特别有利于贸易和出口。在某种意义上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确实受惠于有利的时机,它们充分地利用了这样的时机进行迅速的工业化起飞。

日本是跻身于工业化世界的第一个亚洲“后进国”,最初专门搞劳动密集型制造品的出口。香港接着按照日本的步子跟上去。当日本在60年代中期因为劳动力成本的压力而放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时,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开始了它们的出口扩张,还是大量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品。这个“四小龙”或“四人帮”从历史形成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转移中,十分幸运地得益于世界经济的时机;并且,作为“后到的后来者”,它们确实靠填补“后来者”日本所留下的空缺而适时地“打进了这个市场”。

以上的分析显然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怎样获得成功的问题提供了有用的见解,但还有两个重要的经验性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世界经济的时机问题,即这一时机怎样有利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二是为什么工业化偏偏在东亚获得成功。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问题尚未广泛讨论,只有一些零星的论述可供参考。

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承认,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有它自己的动力规律或时机。但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进入世界市场的时机以及它们确有能力从结合于其中而“获益”的问题,应该看作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尤其从经验的意义上来说是这样。在这里,了解一下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逻辑和动力规律(用沃勒斯坦的术语,即“周期性节奏”)可能是有用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在世界体系正在进行扩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得到巨大的全面经济增长的时候进入世界市场的。美国作为战后资本主义体系单一中心的核心而出现,这一点可以看作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所进入的战后世界体系最独特的特征。只有一个霸权核心国的控制和核心大国之间缺少重大的竞争,才把东亚的“依附”地位同拉丁美洲的“依附”地位区别开来。美国市

场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品的经济需要,以及美国在这个地区对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冷战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为美国的东亚盟友诸如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以至在较小程度上还有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的活动建立了一个“外在界限”。只要不打破这个外在界限(即只要搞资本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这些盟友便可自由地寻求那些能被东亚民族主义者视为“民族利益”和“自主权”的东西,即使这些活动到将来可能会破坏美国国内的工业利益或劳工利益。

因此,东亚国家和地区结合进由美国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时机确实是机会难得的。在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前提:在战后年代从尝试过程中出现的美国霸权的性质,对这些边缘国家和地区可能格外开放,使其摆脱依附论学者在拉美所见到的那种典型的依附地位。因此,必须实证地考察美国在东亚所起作用的真正性质。

另一个有关的实证性问题是,为什么东亚能够从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那里得到这样的自由以追求其利益?地缘政治的补偿在此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遏制政策中,把东亚看作是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一个堡垒,这个事实帮助我们理解该地区一些资本主义倾向的政府,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从美国得到的多方面的支持。如上所述,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在界限,在国家意识形态方面是反对共产主义,在发展方面是奉行资本主义。一旦建立了这个外部联系,一种交易过程就发生了。那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看来把这个联系当作机会和“施惠”,并不看作不可逃脱的死亡陷阱,尽管事实上它们仍然是依附美国的。

正如高棣民所指出的,东亚执行统治的上层分子把全球性经济看作一种挑战,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资源贫乏,人口过剩,处于不完全的形势中,并且不能自力更生。<sup>①</sup>他们还认识到,给予出现于这个地区的

---

<sup>①</sup> 高棣民为萧新煌编的《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台北,1985年)所作的序言。

美国势力以政治支持,可以从战后的政治现实中得到好处。完全忽视东亚各国各地区及其精英们老谋深算的能力,是不可理解的,假使这些有限的选择在当时对他们原是可以达到的话。

另外,对东亚执行统治的上层分子计算他们自己在战后世界政治经济背景中的处境的方法,也需要认真地作一番实证性的研究。他们在应付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时所作的妥协必须用书面加以说明。由这样的妥协可能引起的政府机构和地方居统治地位的上层分子内部的潜在冲突,以及这些机构和人员在消除冲突上最终达到的解决办法,也很值得加以注意。换句话说,我并非提倡“全面专制”(tyranny of the whole)的研究方法,像托尼·史密斯在他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批判中所作的那样。<sup>①</sup>相反,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处境应该从更广阔的历史、政治和经济框架来进行考察,通过这个框架,这些国家和地区及其外部联系的演进情况可以得到更好的鉴别。外部的和内部的各种联系必须认真处理,这样的认识已逐渐得到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研究者的注意。战后世界经济时机的独特性、新出现的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地位以及东亚地缘政治的补偿,这种种因素一起组成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

指出这样一个广阔的世界政治—经济观点的重要性,并不是给前面提出的问题提供答案。需要按照这一方法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不过,这种独特的世界体系的时机,确实是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历史性要素。

## 国家结构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如我在本文的开头所简要论述的,政府在东亚发展过程中所

---

<sup>①</sup> 托尼·史密斯:“发展文献的低度发展:依附论问题”,见《世界政治》1979年,第31期,第247—288页。

起的作用业已得到充分的注意。不管用什么词语描述这些东亚的政府,所有的学者都承认,政府的性质在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中都起到积极的和领导的作用。东亚各政府无论是在同美国的外部联系上还是同地方上层分子的内部联系上,相对说来是“自主的”和“坚强的”。上文的讨论约略涉及到东亚诸政府得以在美国霸权面前享有一定程度的相对自主权的原因。外在界限受到了东亚诸政府谨慎而灵巧的尊重,反过来又利用来自美国的外部资本甚至军事支持,这些政府取得了更好的讨价还价的地位和更大的力量用以促进某些经济部门或扶持某些阶级或社会成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外依附并没有减弱国家的自主性。相反,它在事实上提高了国家对国内各阶级和上层分子的自主权。

在这个问题上,还必须考察到战后时代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性质。应该注意到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在战前都有同样的殖民地历史,而殖民地历史对殖民地独立后的国家结构具有深刻的影响。从以前的殖民列强(日本和英国)继承来的和为统治本地人民而创立的“过分发展的”政府官僚作风,可能是导致平民大众顺从政府统制的一份遗产。

此外,东方的(更具体地说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即把国家看作不止是一种政治控制力量的观念,也渗透到了东亚人民的道德态度之中;这种观念甚至持续到近些年。儒家有关国家的道德定义,强调领导者或国家当局的仁政。东亚传统长期以来一直使人民社会化而尊重“权威”,而这种“权威”在现代的代表就是国家官僚体制。具有这样一种政治文化,那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自然能够更自主地动员各种资源,而不会太多地受到来自社会各方的反对。

当然,不能幼稚地断言这种政治文化是使那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强盛和活跃的唯一因素。如果没有有利的世界经济条件和美国的支持,那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也许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上不能得到这样的自主权和力量。此外,在台湾地区和韩国,如果没有成功地实行土地改革,从而大大地削弱了地主阶级潜在的反对工业化

的力量,同时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如果没有当地企业家赞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态度,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许不能以如此组织良好的方式来动员各种资源以求得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

在以上分析中,我力图避免简化法的危险。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确实提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例子,其国家结构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能仅仅用世界体系的简化法或支配阶级关系的简化法来解释。复杂的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在历史上一直相互作用着,这样的相互作用导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其独特的相对自主的特征。

同样重要的是需要对国家结构和阶级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在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由于政府在60年代追求资本主义工业化,因而产生了某些新的阶级。人们已经看到,自70年代中期起,新出现的工人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给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政府增加了压力。变化不已的政府与社会的种种关系和联合行动,可能是我们今后实证性研究的又一个成果累累的领域。这种政府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的性质与发展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未来调整其资本主义发展管理的方式。

关于东亚那几个国家和地区在过去40年间如何成功地处理外部和内部的压力及资产以保证其“民族生存”的问题,显然已写得很多了。尽管如此,仍有许多实证性研究工作有待完成。

## 文化因素

东亚成功经历中的一个最激动人心却又研究得最少的领域,是对其在某些方面不同于传统亚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恰当鉴别。到目前为止,对这个主题已有一些有趣而富于启发性的讨论,尽管都只是一般性的和理论性的论述。然而,相当大一部分文献集中于日本的公司文化及其对企业或组织的管理和

行为的影响上,很少有人有经验的高度上真正把文化问题同宏观的区域性经济活力联系起来。

如果完全否认由这个地区人民的集体努力所达到的宏观经济活力与其共同持有的文化因素的关系,便是不可理解的。各种文化因素,诸如劳动伦理、节俭、勤奋、对教育成就的尊敬、在社会关系上避免公开的冲突、对统治集团和权威的忠诚、强调秩序及和谐(只列举一小部分),应当对工人、农民、企业家、公务人员甚至决策者所采取的能动性经济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认为文化因素是这个地区获得成功的唯一原因,同样是不明智的。换句话说,无论是主张东亚成功仅仅是由于“正确”政策那种执拗的“政策论点”,或者是把这个巨大成功的因素只归于文化品质那种彻底的“文化论点”,都不能现实主义地勾勒出东亚成功的全貌。

即使我们心里怀有这一想法,并认为它是可以获得赞同的,我们仍然会遇到一些实证性问题。首先,简单地说文化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应当同经济发展有某种关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是,如果把能够在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提供某种“比较优势”的东亚文化特定品质或因素描绘出来,却有极大的重要性。正如彼得·伯格所指出的,把文化作为一种比较优势,在这里是有用的。<sup>①</sup>换句话说,现代亚洲资本主义的特殊文化根源还有待于发掘。在前些年,有个非常流行的名称叫“后儒教”,后来伯格称为“世俗儒教”,它的含义是:普通人民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所实践的儒家伦理可能是解释东亚经济活力的重要变项。来源于儒家的关于工作、家庭和组织权威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与我们的讨论最有关系。在普林斯顿大学,吉尔伯特·罗兹曼正组织一批学者研究传统的社会文化行为在现代东亚的影响,而且他们的注意力正好集中在上述来源于“世俗儒教”的社会因素上。

<sup>①</sup> 见前引彼得·L·伯格所著文。

研究这些儒家道德观和价值观如何表现在战后东亚社会的两种方法,是集中研究两个重要领域:家庭和劳动组织。其他重要的文化特征包括佛教、民间宗教和基督教。

第二个实证性的问题是,为求理解和正确评价作为复杂的文化和经济相互关系的一部分的那种谨慎的“文化论点”,文化因素不应解释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本身的社会行为。相反,应把文化因素看作社会高度上的一系列有秩序、制度化的文化上的布置。只有在这个高度上,才能把文化行为同宏观经济活动联系起来。另外,不要渴望在这些文化领域中找到经济发展的“原因”;不过可以期望在这里寻找东亚发展的“契机”。那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政治和经济条件的支撑,文化因素不能单独起作用。还可以进一步说,这个问题不是鉴定文化特征本身,而是鉴定这些文化因素能够使经济活动具有生气和活力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森岛通夫论述日本儒家伦理观对日本资本主义所起作用的著作与此有关。<sup>①</sup>他指出了意识形态在一个国家的历史过程中被利用的方式,并指出那种意识形态(儒教)的内容对于帮助指导日常经济活动的各种可能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罗伊·霍夫海因茨和肯特·考尔德看来低估了似乎恒定不变的东亚文化因素在容许这个地区过去几十年爆发性经济增长上的“契机”功能。他们只注意到,“文化提供一种价值观的背景,用以加强对权威的尊敬,促进教育和奖赏勤奋”。<sup>②</sup>它确实是一个背景,并且是一个必要的背景,因为文化不是一种静态的媒介物,而是一个真正的、能动的契机。无疑,必须有更多的思考,使这样一种见解更为有理,并在实证上更见正确。

第三个实证性问题是微观(文化行为)和宏观(国家的决策)之间的联系,这个问题同样重要。又要涉及“正确政策”的问题。在过

① 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

② 见前引罗伊·霍夫海因茨和肯特·考尔德所著书。

去几十年中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各项政策,是政府为了提供可能而合理的“机会”而提出的,也被人民,特别是企业家阶级,作为这样的机会而加以接受。由于受到政府战略的鼓舞,企业家阶级当时愿意努力工作,以使这些政策获得成功。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可能计算到,他们在既定的外部和内部结构面前没有许多的选择,他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另一方面,倘若没有人民的集体服从,那政策就可能不成为“正确的”。人民愿意遵从政府的政策,可能是由于前面所列举的文化因素的原因。对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来说,投机碰运气也许不是完美的解释。但是,一个社会科学家能够十分肯定地认为,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同此种未说明的机会因素绝对无关吗?

最后要提到一点是东亚人民在现代对“民族生存”问题所显示的共同情感。东亚人常把民族的生存看作他们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遇到现代西方社会提出挑战的时候。西方人,特别是在现代,一般没有体验到这种民族情感,这种情感在东亚是文化自尊感与政治自卑感的混合物。这些态度也可能对推动人民在民族思想指导下朝着民族富强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具有某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 结 论

正如我在本文的开头所说的,今日世界最令人激动的地区是东亚,近几十年来东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巨大进步是有目共睹的。难怪有如此之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现象上。社会科学家们为理解东亚取得偌大成功的原因所作的努力,同样令人激动。

我已试行对近年来东亚发展问题的研究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要的实证性概述。这里所提到的主要有三点:东亚在战后年代的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更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世界经济体系和它的结构变化,特别是东亚结合进战后美国控制的世界体系的

时机,这和美国在战后行使其霸权的方式一样确实是独特的;地缘政治的补偿,它给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依附的范围内提供某些纵横捭阖的余地,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东亚和世界政治经济之间的各种关系。

在由世界经济的时机和美国对这个地区施行控制的独特性质所造成的各种约束下,这个地区的国家结构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同发展中世界其他部分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政府经济发展政策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战略转移是很平稳的。此外,通过工业化而造成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这些相对自主和坚实的东亚国家和地区,这比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成功,而且发展工作也没有遇到地方统治阶级的激烈反对。

最受赞扬的“正确”政策是由于有效地动员了地方和国外资源而有可能实施的。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也可能大量地得利于某些作为“比较优势”而起作用的文化因素,使得经济能在恰当的时刻起飞。必须正确评价文化因素在东亚发展过程中的“契机”功能。

人类历史充满着不确定性。探求对过去历史的解释更是如此。正如中国一句古语所说,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无不决定于三个条件:天时,地利,人和。东亚的发展模式按照大家的描绘,事实上也可能包括有同样的三个成分,然而却是独特的成分:世界体系的时机,地缘政治的补偿,以及文化因素。虽然这像是具有宿命论色彩,但若对东亚发展历史作个现实主义的总的观察,却可能迫使我们正好有这样的感觉。至于这三个成分相互关系的程度及其重要性的先后次序如何,则是有待于严肃的社会科学家们加以解决的一项严肃的任务。

(尹保云 译)

乌尔里希·门泽尔

##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帝国主义影响的延续还是迎头赶上的实例？\*

### 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来，由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一概念的提出而加强了关于发展理论的研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一词，根据不断增长的人均收入、工业增长的速度、出口品中制成品所占的比重，或者根据社会发展指标，如平均预期寿命、识字水平、收入分配、劳动力中非农业劳动者所占比例等等，应用于接近工业社会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然而，迄今为止，这一术语仍无一致公认的定义。这是由于不同的学者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各自提出一系列不同的特征以及由此所确定的一系列国家和地区，所以分别打上研究者所采用的特殊方法的印记。不过，每张清单上至少都有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即使所提解释各有不同，但有一点不谋而合，即所列国家和地区在过去20年里都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工业化。虽然人们讨论时对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北三省注意较少，但这两个国家和地区肯定达到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大部分标准。即使承

---

\* 选自 W.J. 蒙森和 J. 澳斯特哈默编的《帝国主义和后帝国主义》。

认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两处条件特殊,例如无农业问题和占有国际金融中心和服务业中心的重要地位,一项引人注目的事实仍然是,东亚显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集中地区。除了首先要解释新兴工业化国家现象的一般问题外,还要解释一个特殊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一现象以如此集中的形式出现于东亚。这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要论述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其社会制度迥然有异,发展战略也各不相同。一方面,韩国和中国台湾可视为紧密整合于世界市场并给私人企业以广阔天地从而实现工业化的范例。另一方面,就朝鲜和中国满洲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它们和世界市场严重隔绝,而代之以国内资源和技能的使用(“自力更生”)以及由国家实施的经济计划。因此朝鲜和韩国自然地被视为在各自的背景下赶上工业化上的“典型例子”。

若把该地区其他国家囊括进去加以比较,那么这个特殊问题可以表述得更为清楚。这里有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和老挝)和资本主义国家(东南亚联盟国家);有密切结合于世界市场的国家(印尼)和在很大程度上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的国家(缅甸)。上述国家不管哪一种类型,都看不出有类似的工业化过程。所以,不管实施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采取与世界市场联系或脱钩的战略,其本身都不能为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提供恰如其分的解释。不过,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有其共同之处,那就是,在过去,它们都是殖民地;在目前,它们都有某种程度的出口专业化和跨国公司的渗入(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除外)。批判的发展理论的支持者们一般都把上面两个现象视为阻碍发展和越来越欠发达的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的考察,可以提出如下理论问题:

(1) 如何解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一现象?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作者都倾向于从下列三种观点中择取其一。新古典派作者的解释是,首先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可资利用的生产要素的基础上导向于世界市场;其次,依托于一项适当的经济政策,充分利用相对的国际优势。这些国家和地区鉴于自身缺乏自然资源,缺少资

本,国内市场狭小,但有大量相对有技术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低,所以认为专门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供应出口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乃是显而易见的、唯一可能成功的战略。本地区没有而又必需的生产要素是进口的。这样,在工业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基本上可以归因于用密集劳动加工进口原料和半制成品与在国际市场上由于单位劳动工资低而带来的竞争优势这两者的结合。依此论证,这里就明显地有一个同过去的殖民地时代的历史性决裂了。

与此相反,依附论者——或外国资本主义理论派的学者则从根本上反对那种认为上述战略可以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任何真实意义上的迎头赶上的观点。依此说法,第三世界、特别是东亚的工业化,只不过是国际分工转移的表现。现在看来,这种分工不再仅仅是用原料交换制成品,而且也是制成品之间的交换,这些制成品在生产中所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集中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在工业化国家,由于工资支出增长和环境限制,结果使劳动密集的、特别是污染严重的精加工工序转移到第三世界,而其唯一目的则是将这些产品重新出口返销到这些工业国家。此项加工的代理者主要是跨国公司,它们在利用不同地区的国际优势方面处于最有利的地位。然而,由于这种制造过程是不完整的,且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经济特区(工业区或自由生产区),所以唯一的结果是工业飞地的出现,这种飞地就像昔日的种植园和矿山一样,不能整合于国内经济体系。结果产生了一种畸形的工业化;一旦国际气候变化,或精加工转移到其他国家,这里的工业化就会萎缩下去。这便导致边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像工业国家那样有内在关联和自我持续增长力的经济。依此说法,昔日殖民地区的正式依附关系只是简单地代之以非正式的依附关系,构成于不平衡的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的种种活动,在某些情况下,并构成于类似世界银行那样的国际组织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所以,这解释的根据是一种对过去的殖民地时代有历史延续性的信念。

对比之下,第三种观点则倾向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否认

宗主国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与著名的列宁主义观点相反，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还远远没有耗尽它的潜在能量。相反，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际上被认为是第三世界早期资本化的明显表现。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看到了英国统治印度的积极方面，因为他认为，这统治可摧毁亚洲专制主义的基础。依此推理，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最后还有跨国公司，都被认为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因为它导致资本主义植入第三世界。所以，这种观点也强调了历史的延续性，但和前面所述的观点不同，它欢迎这种延续性。

(2) 关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论争导出第二个也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否可以作为证据，证明一个按照罗斯托和勒纳<sup>①</sup>所说的连续现代化的过程，如今扩展到了过去的殖民地区域呢？这是不是意味着那些从根本上怀疑欠发达国家有可能迎头赶上的依附论者所提出的论点被驳倒了呢？现代化理论家和增长阶段论者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其他部分还在继续遭受经济停滞或越来越重的贫困化，而没有按照发展西方民主的意义出现政治现代化的迹象呢？另一方面，依附论的支持者也面临着认识论上的问题：一种自称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在它被视为不可信之前，到底能容纳多少例外呢？沃勒斯坦用“半外围”<sup>②</sup>这个术语对原先的范例所作的延伸（他将其看作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关键部分），确实必须看作是挽救旧理论同时又吸收最新研讨成果的一项尝试。

这里所提到的一切解释工作和全球性理论必须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现象特别集中于东亚？说到底，在整个第三世界可以看到廉价劳动力、出口导向、资本输入以

<sup>①</sup> W. W. 罗斯托：《世界经济：历史与前景》（伦敦，1978年）；D. 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伊利诺伊州格伦科，1958年）。

<sup>②</sup> I. 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论文集》（剑桥，1979年）。

及跨国公司的影响,而在其他任何地区,却不见这些因素导致类似的增长率和有效的工业化。

(3) 这就把我们引导到下面要讨论的中心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发现东亚存在而他处完全或多半不存在的特殊条件,由此弄清帝国主义影响延续与否的问题?特殊条件之一,无疑是这样的事实,即就韩国和中国台湾(还有朝鲜和中国满洲)来说,我们讲的是旧时日本帝国的核心地区——即从1895年起就遭受日本为时最长和最强大统治的地区。相比之下,其邻近地区,大致相当于今日的东盟国家,则有一段欧洲国家或美国的殖民史,只在1941年以后很短一段时间经受过日本统治。

第二个特殊条件是:东亚地区从1945年初以来就成为东西方冲突的一个主要场所。两个超级大国深入干预这个地区的事务,附庸国家所受影响如何?自从60年代以来,两种制度的全球性冲突已从军事方面转入经济方面,这是产生新的依附国家的重要因素,那么这个冲突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两个超级大国向这里提供大量资本和专家咨询,从而为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动力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新近插手于其从前的势力范围,可以解释为它在美国支持下承担了代理人的角色,为的是减轻美国的经济负担。

最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有高水平的教育,人民受到强烈的激发,勇于进取,具有上进的机动性,用米达尔的话来说,达到了“强大状态”,还有一套有效率的行政机构——所有这些都追溯到共同的儒家传统。本文对此不作具体深入的论述,但它依然是我们进行全面评估时必不可少的。现在我们将联系韩国的具体例子,对上述一些问题进行考察,有时兼及其他事例。

### 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性

1895—1945年这段时间的日本帝国主义,和标准的帝国主义列强为期长得多的扩张活动相比,具有多大的典型性呢?在19世纪

的第三个25年间,日本本身还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猎物。从1845年起,它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只是在明治维新期间利用了国内的政治资源,并因其孤立的和经济上不那么使人感兴趣的地理政治位置,日本才有可能避免了其邻国中国的命运。<sup>①</sup>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日本是个后来者,又遭受自然资源缺乏之苦。直到进入20世纪,它一直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要和它确信为工业化取得原料基地所必需的那些地区进行战斗;另一方面,要和那些老牌的列强作斗争,那些老牌列强或者不信任新来者,或者是争夺尚可殖民的地区的劲敌。这一特殊情况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两个特征:首先,军事扩张总是先于经济掠夺(贸易紧跟国旗);第二,日本不像其他殖民列强,它不把自己限制于榨取掠夺物、商业渗透或者至多发展边缘飞地;相反,它作出巨大努力,有计划地迫使依附地区承担其派定的费用。虽然在殖民地也进行私人活动、追逐私人利益,但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组织的“合资经营”的长期发展计划,其中或由军队、或由政府局部地或全部地掌管的企业,作为财阀的伙伴从事经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了解依附地区有目的而又迅速有效的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私人公司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排除在外的。

在朝鲜,自1910年设置总督之后,由于内政部门和警察制度的设置,一套基本的行政和政治体系便建立起来了。1918年完成的全国地籍和土地普查,标志着为农业建立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走了第一步,也是增加稻米产量的长远计划的基础。东洋拓植公司代表了日本政府,其伙伴后来扩展到了中国的满洲、华北和蒙古。它和传统的朝鲜地主在一起,成了该地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虽然有计划安置日本农民所得成绩有限,只得雇佣朝鲜佃农来代替,但在农业上用于将耕地从450万公顷扩至500万公顷(1938年)的投资,以

---

<sup>①</sup> 参见 F. V. 莫尔德:《日本、中国和现代世界经济:对约1600年至约1918年东亚发展的重新理解》(剑桥,1977年);J. 哈里迪:《日本资本主义政治史》(纽约,1975年)。

及用于修建灌溉工程和生产商业肥料的投资,都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1910—1935年间,稻米产量从2500万公石(1公石=1市石——译者注)上升到3200万公石,到1940年,增至3900万公石;同时,稻米出口从400万公石(1915—1916年)上升到1400万公石(1930—1936年)。由于增产部分都被出口到日本,所以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相反,由于30年代日本国内稻米供应开始改善,日本稻米生产者遭到来自朝鲜、中国台湾稻米出口的竞争压力,所以在朝鲜就中止了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措施。从那时起,要增加稻米出口,只有以牺牲国内消费为代价才能达到,而这就导致稻米供应的迅速恶化,并导致转向生产低质量的谷物。

在矿业上,第一步是有系统的地质勘探。到1923年,已发到115种矿物和黏土,但工业化本身,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直到30年代日本出现新的工业繁荣、需要增加原料进口(例如煤和铁矿石)时方才发展起来。此外,30年代日本的扩充军备计划需要大量的轻重金属,用以制造飞机和装甲板,并供化学品生产使用,而朝鲜正好能供应这些原料。在1929—1940年间,朝鲜的工业产值从3.5亿日元增加到18亿日元。其中重工业占55%,化学工业(人造肥料和炸药)占37%。1940年前后,国民生产总值中矿业和制造业的比重早已超过农业,而1910年时农业比重还占近90%,1933年时也还占67%之多。

由于原先有了基础设施,才有这个发展的可能;而这些基础设施,用殖民者的眼光看来,是惊人地完美的。到1940年,朝鲜已修建了5670公里铁路(当时中国满洲铁路的长度约为此数的两倍),大部分由北向南,由此把中国满洲和朝鲜南部港口连为一体,有助于向日本运送货物,此外,还有许金公路、港口、通讯网,以及建造在朝鲜北部的水力发电站,向中国满洲提供能源。

1919年初,朝鲜部分地受到十月革命和威尔逊“十四点”纲领的促动,掀起了反对日本统治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此后在20年代,日本开始推行了较为“自由”的制度,只是在30年代初期朝鲜经济

转入军工生产轨道时，才加强了压制手段。禁止朝鲜人进行一切形式的政治和新闻活动，使朝鲜人“日本化”的努力有时达到歇斯底里的地步：不仅用日语作为官方语言，而且强迫朝鲜人接受日本名字，甚至在家里也禁止说朝鲜语。虽然从日本大规模移民的计划没有实现，但殖民政权确实实行了一种严厉的种族隔离政策，包括为日本人保留几乎每一个负责职位。这种严酷的政治压迫和每况愈下的生活条件造成30年代的大规模人口外流。除了在日本的矿山和兵工厂有70万强迫劳动的朝鲜人之外，还有约330万朝鲜人移居中国华北、东北和西伯利亚、日本，而朝鲜的总人口为2500万。

朝鲜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以适应生产和出口农产和矿产原料及重工业中间产品的，而1933年以后伪满洲国<sup>①</sup>的工业化则侧重于重工业。日本把当地的铁矿、煤矿、冶炼、金属加工以及发动机和机动车制造的发展连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伪满洲国按其分担的任务，向华北和朝鲜输送机器。安置日本农民到大部分属于蛮荒的地区去的计划遭到了失败，因为需要大量人力去当兵和到兵工厂当工人，从而限制了可能移居者的数量。另外，日本农民对移居伪满洲国也缺乏热情。

在台湾地区，日本人的活动集中于建立以农业为主的基础设施，借此生产稻米和甘蔗，以满足日本的需要。在华北，日本人占领的时间最短，投资活动相应较少：这里的主要产品是纺织品原料如羊毛和棉花，此外还有煤。

在1940—1942年间，日元集团达到了有效程度的最高峰，它要求所有成员国遵循一项由战争经济的需要指导的长远计划。目的是使整个日元集团在内部分工的基础上实现高度的自给自足。日本国内原料稀少，因而按照自己的需要指导此项分工。指导工作包括制造工业和决策中心两方面。朝鲜除了提供强制劳工之外，还从南部提供稻米，从北部提供煤、铁矿石和有色金属。在朝鲜设立的

---

<sup>①</sup>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建立的傀儡政权。——译者

制造业,只有能源集中型的化学工业和金属加工业。设立这些工业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北部丰富的水力发电资源。伪满洲国的贡献在于提供大豆、羊毛、重工业原料以及精选的机器和机动车产品。华北主要提供煤和日本纺织工业所需要的羊毛和棉花。日元集团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进口以弥补不足的主要产品,是石油、橡胶和棉花。在日本统治扩张至南亚之前,美国继续是这些产品最重要的供应者。

整个体系是由一个铁路线、港口和联运站构成的稠密网络支持的(虽然战争后期清楚地表明,这条锁链的最后环节即与日本本身的联系实际上是脆弱的)。三个依附地区的进出口,几乎毫不例外地用来满足以日本为中心的日元集团的需要。只有帝国中心才能和第三国进行贸易。

如果我们编制一张日本帝国主义对依附地区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那么应该指出,虽然增长率十分引人注目,但依附经济的片面发展和专业化的发展意味着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可能独自生存,因为与日本或其他日元集团成员国的投入——产出关系对于维持这个体系的运转是必不可少的。再有一点,由于种族隔离的种种规定,对土著劳工的教育成效可能很有限,因为管理和工程方面的技术性职位大部分为日本人所占据。不过,应该强调的是,1945年以后在改变了的政治环境下,那些原为日本利益而建设的铁路、港口、矿山等等就有可能转化为朝鲜和中国的积极的资产。在那之后,它们便有了自己所能支配的工业,并确实还具有重工业的生产能力,这在第三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而在中国满洲和朝鲜,至今仍是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农业的发展也有一段非典型的殖民地经历,其中日本人的利益集中于生产稻米、大豆、羊毛和棉花上,换句话说,集中于粮食和纺织品原料上,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构成满足当地人民需要的基础。如果日本当时把中国台湾变成第二个古巴,只种植供世界市场出售的甘蔗,那么,这张资产负债表将是另一个样子了。从日本的遗产这一点来说,50年代台湾地区的发展是同农业

和出口农产品加工工业相联的，朝鲜和中国满洲的重工业后来进一步得到扩展，两者看来都不是纯粹的巧合。1945年以后各个地区采取各自不同的发展战略，由此清楚地显示出和殖民地时代有延续性的迹象。

### 东亚作为东西方冲突的场地

东亚发展成为东西方冲突的场地，几乎是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场战争原来是如日中天的强国日本同老牌强国美国间争夺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恶战。日本作为一个工业上的后来者和经济上较弱的国家，力求建立一个完全供自己利用的经济范围，以确保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而经济上的超级强国美国则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维持在1899年的门户开放原则中业已清楚表明的一种无形渗透的政策。

1942年夏季中途岛战役之后，战争的优势转到美国一边。不过，日本在太平洋岛屿上的顽强抵抗表明，要占领日本本土，非牺牲大量美国人的生命不可。若采用尽可能地调动物质资源而不是人力资源来进行这场战争的战略，则有赖于苏联的军事支持，虽然这在政治上说来是不可取的。《雅尔塔协定》秘密附件规定的苏联加入亚洲战争的代价是将1905年以前属于沙俄的满洲土地和权利仍归苏联。苏联的推进也将威胁到把朝鲜并入其势力范围。这样一来，苏联将成为东亚的一个主要强国。中国成了超级大国分别交易的牺牲品，据估计将通过一项中苏条约以追认方式取得其同意。作为形势发展的结果，战后日本的地位早在战时就成为美国国内讨论的中心议题了。由于当时还不知道最后将由哪一方掌管中国，所以这个讨论格外热烈。本来早有可能预测到，中国的真空不会由美国的盟友蒋介石来填补，而是由和苏联结盟的毛泽东。早在1943年底，这一前景业已导致人们考虑到日本的未来地位以及两个敌对国家重新接近的可能性。问题是一个被打垮的日本不仅在军事上，

而且在经济上(不复有日元集团)都必定衰弱下来了。所以,从逻辑上说来,不但必须给予日本以重建援助,而且还应按照美国人对于世界规模自由经济秩序的想法,给予日本一块地盘,以便日本能够取得原料和销售其制成品。

1945年6月原子弹试验成功意味着东亚政府特征的根本性变化。<sup>①</sup>美国用空投原子弹的办法,能够迫使日本迅速投降了。意味更深的是,现在美国可以甩开苏联的帮助了。另一方面,苏联在日本投降前一星期出兵中国满洲,成功地夺得了战略优势。大国之间的谈判产生了沿北纬38°分裂朝鲜的临时协议。东亚地区作为东西方冲突的地理前线和未来的势力范围,就这样在一周时间内奠定了。

美国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和日本签订了停火协议,同时,尽管谈判时有英国人出席,美国却在事实上单独占领了日本,并由此决定日本的未来。苏联占领了满洲地区和分界线以北的朝鲜,从而重新取得了沙皇在1905年失去的地位。

谁应对后来愈演愈烈的东西方冲突承担责任?这个问题在保守派和修正派史学家之间引起了一场生动的争论。美国首先决定反对在朝鲜的长期军事占领,并在事实上试图在日本实行高度的非军事化、民主化并瓦解财阀,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然而,早在1947年5月,就做出了不拆除设备和索取赔款的决定。到1948年4月,整肃财阀也停止了。不过,在1948年,美苏军队都履行协议从朝鲜撤走。当内战之火在中国再度燃起时,局势表明共产党很可能获得胜利(虽然苏联对国民党几乎支持到最后)。此事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最后导致美国重新制订其东亚政策。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决定用联合国的名义对朝鲜进行军事干预,支持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战争,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台湾。这个决定确立了到今天仍然有效的东亚军事因素。1951年9月8日,不顾苏联的抗议和亚洲的强烈反对,在旧金山签订了对

<sup>①</sup> 参见 G.阿尔佩洛维奇:《原子外交:广岛和波茨坦》(纽约,1966年)。

日和约；同一天签订了美日军事条约（即《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译者）。1954年9月1日和1954年12月2日，美国分别和韩国及中国台湾签订了类似的军事条约，构成了美军继续驻在东亚和对韩国、中国台湾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及经济援助的基础。苏联和中国及朝鲜签订了类似的协定。<sup>①</sup>

### 出口战略的实施

1953年夏，在双方遭受大量伤亡之后，朝鲜战争在签订停火协定之后停下来了，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领土状态。不过，战争使南方至少在财政和军事上严重依赖其保护者。结果，1948年重新取得的主权又成了问题。不仅美国军队留驻在韩国，而且现在韩国的军队也是靠美国的援助建立和装备起来的。此外，美国为使这个国家的经济保持活力，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样，从1945年起，大约有7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4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流入韩国。在1953—1960年间，援助并转运的物资平均达到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sup>②</sup>

由于有了这些捐助，就有可能重建战争期间遭毁坏的、后来又部分收归国有的旧日本工厂，所以到1957年，韩国的经济已接近于殖民时代的最高水平。不过与此同时，基本消费品的进口替代政策开始耗尽其潜力。1958年以后，经济增长率迅速下降，到1960年，人均收入的增长按不变价值计算大约为负2%。国民生产总值中制造业的比重徘徊在12%的水平上下，人均收入低于100美元。这使韩国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考虑到这些趋向，美国顾问越来越

---

<sup>①</sup> U. 门泽尔：《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对集中要发展计划的贡献》（奥普拉登，1978年），第245页；《朝鲜经济：结构和发展》（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74年）。

<sup>②</sup> 全面的叙述见 E. S. 梅森等编：《韩国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80年）；U. 门泽尔：《仿效欧洲——东亚迅速发展国家中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集中发展》（慕尼黑，1985年）。

怀疑单靠进口替代战略的前景；这种战略在其他国家也明显地进入了死胡同。

这时李承晚政府和美国政府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鉴于李承晚想用美国的援助按照日本模式发动基层工业化——换句话说，进入进口替代政策的第二阶段，美国政府便向他施加压力，迫其将韩国经济向世界市场开放。这其中有几点考虑。首先，50年代朝鲜经济增长率高于韩国，但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原因，那种方式是不能接受的。第二，实行更多趋向出口的工业化，有希望重新达到飞速增长，从而可能使韩国经济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这样便可减轻美国预算的负担。第三，韩国经济的开放也可使日本经济受益，这长期以来就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全球性目标的一个方面。美国强迫韩国经济按其自身意愿改变方向所用的杠杆，是大量削减财政援助。

美国的战略遭到李承晚的反对，李的主要目标是政治目标。对他来说，与日本保持距离几乎和统一同样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有一种认为美国在幕后操纵的草率论点也许难以证实，但是5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到1960—1961年发展成为政治危机，最终完全按照美国的条件加以解决，却是确凿无疑的。对李承晚独裁政权的潜在反对于1960年4月19日爆发成为学生暴动。由于美国军队始终不动，李承晚被迫于1960年4月27日辞职下台。接着的选举结果是民主党占了多数，张勉当选为总统。虽然新政府早在1960年9月就向美国靠拢，答应进行经济改革，努力实现和日本关系正常化，但1961年5月16日大约250名军官在朴正熙领导下举行起义时，美国没有作出任何阻止的行动。直接诱因是从1960年11月起迅猛发展的一个南北统一运动，这运动已征集500万人的签名，号召朝鲜南北两方在联合国的保证下实行中立化。5月初，宣布在月底召开一次大规模的统一代表大会。当时展望的前景是，中立化可使经济重新结合于西方，以日本为取向，而这就是当时美国军队不去阻止起义的原因。不管怎样，由曾在日军服役和曾在日本军事学校受训的军官组

成的朴正熙军政府，看来是满足美国利益的最好保证。朴正熙为他的所谓“革命”提出的主要理由，实际上是以经济需要为依据的。

虽然反对共产主义继续被用来使政治压迫和社会军事化披上合法外衣，但两种制度的竞争现在已转移到经济领域上来了。第一项措施是1962年1月颁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因这个计划仍反映了李承晚的广泛工业化的思想，所以立刻遭到美国的批评。

新的统治者们自执政第一年起就面临经济困境。1963年和1964年粮食收成欠佳，政府和美国经过几次艰难的谈判之后，被迫开始执行一项稳定方案，以求得到美国输送其所急需的谷物。直到1965年，方才可以说韩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有了转折点。就外交政策而言，美国继续向韩国施加压力，以促其实现和日本关系正常化，并允许日本资本进入韩国经济。由于日益卷入越南战争，美国人不得不设法取得其盟友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以减轻其在亚洲其他地方的财政负担。为了这个原因，美国打算使韩国像台湾地区那样，能在经济上有活力，开始推行那种以出口为基础的工业化，由此取得唯一的成功机会。这一进程将由日本资本越来越多地进行援助——它不仅意味着日本的愿望直接得到接纳，而且也意味着给日本一个遵循美国政治和经济目标而扮演代理人角色的机会。同时，美国有意让韩国直接加入越南战争。美国为韩国参加战争而支付补偿，韩国就可以利用这笔钱来为其工业化提供资金。60年代日本经济上升，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因此日本人对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发生兴趣。劳动力短缺的结果是工资的提高，因此只有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尤其是地理上方便的近邻韩国和台湾地区，希望由此消除困难。虽然韩国和台湾地区两地存在着源于过去殖民地时代的对日本的政治对立，人们都认为这是个障碍，但在美国的斡旋下，这个障碍克服了。朴正熙政府既然是过去和日本的合作者组成的，那么它就是日本在韩国最合适的伙伴了。

1965年6月和7月，韩国和日本签订了几个协定，乍看起来似乎

意在解决一切问题。1965年6月22日,韩国和日本缔结了关系正常化条约,而且在国会遭到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得到批准。直接后果是日本承诺提供数额达8亿美元之巨的资本援助,其中3亿美元是赠款(实际上是赔偿的一种形式),2亿美元是国家贷款,3亿美元是私人贷款。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信贷和其他商业信贷也订了协议。另外一些协议(包括和台湾签订的一项)规定了自由生产区,并允许日本直接向韩国投资。1965年7月29日,朴正熙同意美国要求派韩国军队去越南。这批部队于10月出发。从1966年到1973年,有5万韩国军队在越南活动,由美国向韩国支付了10亿美元,韩国的经济政策是在美国经济顾问的指导下制订的,它坚定不移地实施了以出口为基础的工业化。第二个五年计划(1967—1971年)和所有以后的计划很大程度上都是美国专家工作的结果。到1980年,从日本、美国和世界银行输入这个国家的长期贷款和直接投资达到了大约190亿美元。

接着就是一个迅速增长时期。大约在1965年以后,韩国经济主要以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工业)为基础,而农业则相对地受到忽视。为了保证低生活费用和低工资,甚至压低农产品价格。在1962年到1982年之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8.3%,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为16%。这和国民生产总值构成和职业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迅速的城市化过程是同时并行的。1982年,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43.7%,而第一产业则降至18%。1982年的人均收入大约是1670美元。重要的一点是以出口为基础的工业化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从来没有中断过。不同于早期的是,70年代的工业向生产高价值的消费品(娱乐用的电子产品和汽车)和生产性物品(船舶、钢铁、人造化肥和水泥)方向转移。同时,由于利用了出口部门带来的联系,因而加强了国内经济的一体化。

如果官方宣传的说法或为数众多的国际商业刊物的评论可信的话,那么,无疑这是一项显然从日本模式中得到启发的发展战略的胜利。不过,也有许多理由足以提出某种程度的怀疑:

(1) 强化出口运动并没有成功地阻止进口的更迅速增长,因为这些出口货物除了需要进口必不可少的资本货物外,还需要大量进口原料和半制成品。所以出口产品的实际价值大大低于其货款数值。特别是石油(能源和纤维工业所需要的)代价不均衡地提高,不断产生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后果。

(2) 年复一年的贸易逆差和巨额外国贷款已导致大量的和日益沉重的债务。

(3) 韩国的出口战略不断地从两方面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例如,世界纺织品协定和造船工业补贴所表明的主要消费国家日益增强的保护主义,正在把这一战略推向危险境地。其他低工资国家也构成越来越剧烈的竞争,例如近几年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竞争,中国可对同等劳动生产率水平付给更低的工资。

(4) 许多大胆地建立和规划的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和造船工业,由于世界性衰退而被迫开工不足,造成单位成本增高。当苏伊士运河的重新开放导致世界超级油轮市场崩溃时,事实强烈地表明,一种完全导向世界市场的经济是多么脆弱不可靠(因为韩国专长于制造超级油轮)。

(5) 因为农业增长尽管从国际标准来看相当可观,但还是大大低于工业的增长,所以各社会、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差异看来在日益扩大而不是缩小。

(6) 实际工资和农业收入虽有增长,但和整个经济增长率相比,那增长是缓慢的。考虑到业已成为现实的工业潜力,这情况可能大大地限制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拓。

(7) 不过,最重要的异议是,从总体情况可以看出,社会冲突的暗流正在日益增长。工业化取得无可非议的成功,而人民大众受益极小,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别是由于政府的现代化意识使人民期望甚高,然而得到满足又极小,所以这个对照更为鲜明。此外,各社会集团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即使和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也是如此,这增强了反对派鼓动各部分人民的能力。最重要的情况大概

是,一方面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缺少参与政治和参加工会的机会,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形式上的总统制和议会制以及“黄色”工会的存在,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政府规定的低工资、长工作日、工作中完全没有法律保护、禁止罢工和独立工会,而这些正是给韩国的出口工业以巨大的当地优势的因素。放松压制性的政治制度可能在国内方面动摇出口战略。官方的阐述和国外特别是世界银行所作的有利于官方的调查,自然地说明这个制度是令人遗憾的,但又是60年代以来经济成功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前提。

## 结 论

草拟一张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在东亚所起作用的资产负债表,其出发点也许应是本文开始时所作的观察:如果把日本过去规划的“大东亚共荣圈”分为内圈和外圈,前者包括1932年以前臣服日本的地区,后者包括1942年以前被征服的地区,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基本上只有内圈(韩国、朝鲜、中国满洲和台湾)呈现出新兴工业化地区的特点——另外那两个国家和地区可略而不论。相比之下,外圈(大致相当于华东、华南和今天的东盟国家)仍表现出许多欠发达的征象。

上文阐述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殊形式意味着内圈经受到一种深远的现代化动力,这动力尽管有其消极的方面,但在结束日本的殖民统治之后,有可能转化为发展的潜力。外圈或完全地或部分地没有这种动力,因为日本在这里的正式统治只持续了一段短时间,其性质是趋向于掠夺而不是有计划地殖民化。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欧洲殖民主义一直是只导致在飞地上实行局部现代化的决定力量。

中国和朝鲜的社会动荡导致资本和企业及专业人才逃至各自的非社会主义地区。这大概可以部分地说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历史。中国台湾和韩国在东西方之间和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全

球利益之间所居的突出地位造成了国际资本和顾问人员麇集于此,这是为这两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战略提供资金和加以实行的主要先决条件。

所以,总括起来说,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很大程度上应把目前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地位归因于双重的外部介入。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它们有可能抓住民族独立所带来的机会,有可能从工业化国家取得资源。所以,这些事例说明,前殖民地原则上有可能迎头赶上,也表明受限制的政治主权和大量引进资本不应从本质上与发展的障碍划上等号。

即使这并不意味着依附理论完全被驳倒,这些事例也确实说明,依附论宣称要为发达和欠发达的原因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解释的说法就不一定能有立足之地了。至少在东亚,国际形势是如此,允许朝鲜和中国台湾迎头赶上看来是符合中心大国的利益的。朝鲜和中国台湾的传统制度是坚强而有效的,足以把这种新的非正式渗透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也足以利用一项根据世界市场发展国内经济的战略所提供的机会。然而,由于这些特殊条件在第三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很难找到,因此就不能下结论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开创了一种世界动向。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不是事物的外露部分,而是整个事物的全貌。

(钟伟云 译)

R. 霍夫汉 K. 卡尔德

## 东亚优势的源泉<sup>\*</sup>

与现今的西方相比,东亚具有一种优势,因为它是以与西方不同的方式来思维并且组织起来的。这些思维和行为的方式深深地植根于当地的历史之中。它们难以输出,因此也不易为我们模仿。但是,如果我们要与其竞争,就必须从理解它们的主要原因开始。

我们了解的许多模式(patterns)也许可以称作“儒家的”,它源出于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一个大哲学家。<sup>①</sup>由于东亚的哲学传统至少与我们自己的一样悠久和复杂,“儒家”显然是一个使用不当的名称。我们可以同样不费力气地将欧洲的传统称作“柏拉图式的”或“亚里斯多德式的”,它们发端于我们自己的一些大思想家。事实上近代东亚的许多哲学基础是由法家或道家这些非儒家学说所决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东亚崛起的行为和组织模式是由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具有的。这里,我们只能择其要点论述。

一个世纪以前,初次到东亚的西方人很容易把它看成一个没有差异的整体,因为他们对于中国和日本,朝鲜和越南之间的差别

---

\* 选自 R. 霍夫汉、K. 卡尔德《东亚之锋》,纽约,1982。

① 关于儒家思想的简要介绍,请参阅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编译的《孔子文选》(伦敦:乔治·艾伦和艾尔温,1938)。

知之甚少。他们继英国人之后,把东亚叫作“远东”——英国人认为这个地区是他们的帝国通过苏伊士运河向东扩展达到的极限。在西方人看来,东亚人有着“离奇古怪”的传统,“令人费解”的节制品行以及“神秘”的来世宗教。这许多共同的特征都被用来形成偏见。英国人过去轻蔑地谈及“中东人”(wogs)——它是“西方化的中东绅士”的简称。<sup>①</sup>美国人大谈“黄祸”(Yellow Peril)而且,在利用“廉价的东方劳动力”修建铁路达一代之久后,立法禁止任何的东亚人移居美国。

专家们细致分析了这个地区的文化和历史,如今,每一个国家都形象突出个性鲜明。下面,让我们作些努力来回顾东亚人共同具有的特征。

#### 基本的类似点(Basic Similarities)

最明显的一点是东亚人看起来很像。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说根本不同的语言,但他们具有共同的体质特征。也许中国北方人身材略高,日本人面貌要纤巧些,但是所有的东亚人都起源于一万五千年前最后的大冰纪共同生活在中亚的同一祖先。东亚人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体质上的同源性,特别是近年来外国人出现以后。今天,东亚人发现将那些具有不同体质特征的人排除在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之外是一件容易的事。

东亚的另一共同特征是书面语言。访问中国的日本人受到欢迎时常看到一条标语,意思是,“我们在书面语言和种族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所有的文字体系都建筑在借用古代书面汉语的基础上,就日本而言是开始于公元5世纪,朝鲜则要晚几百年。这种语言的精髓是表意文字,就是说书写符号表示的不是发音而是意义和概念。在日语中,一个表意文字可以发三种或更多的音,但其意义却起源于最初的汉语。朝鲜语和日语都使用字母符号,分别以韩字(hangul)和平假名(hiragana)来表示语音并帮助表意文字的发音

<sup>①</sup> “中东人”英语是 wog,它是 westernized Oriental Gentleman 的缩写。——译者

和理解。但是,这两种语言,连同越南语都广泛地借用了汉语中表达概念和观念的词汇。一个不会说任何东亚语言的人常常只是因为懂得所运用的表意文字的意义就能把握一段话的要旨,人们也经常在全东亚各地看到游人以及商人起劲地在纸片上走笔如飞,互相交换纸条却不发言。概念和书面文字的这一共同宝库不可能保证在全东亚范围内的完全准确的交流,但它确实使学习变得容易多了。毫无疑问,最近中国人已经转而向日本学习现代技术,正如他们在20世纪早期所作的一样。

第三个共同的特征是共享的结论。虽然在20世纪以前,中国、朝鲜和日本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别,但它们都共同具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以农为本的家庭和家族组织。这里我们只能论及这一传统的一些重要特征。

传统的东亚是一片特别适合于农民的土地。即便在今天,东亚的庄稼种植仍然与园艺更相类似,而与美国的机械化农业很不一样。如同最细心的园丁培养他心爱的花一样,农夫们给予播种,插秧,灌溉和收割同样悉心的照顾。在东亚,稻米和小麦是主要的粮食产品,它们现在还是人们的主食。由于土地匮乏,农业劳动直到如今还很廉价。现代化将人们从土地上吸引到了工厂和城市,这些被转移出来的农民遵守纪律而且精力充沛。例如,现今台湾地区一些最有效率的装配线工人都是农村的姑娘,仅仅10年以前,她们还只是一些经验丰富的,细心的插秧能手。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从事农业的经历教会了东亚人节约、勤劳、独立和财产所有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是“现代”观念的关键。

东亚社会植根于牢固的家庭之中。祖先崇拜已经融进儒教里,它教导人们孝顺长辈是一切德行之本。家庭意识使得中国的工厂为退休工人的儿子保留职位。在日本,父母把对孩子的教育看作是为他们家庭将来的声望和财富而进行的投资。在许多东南亚国家,华裔的家族企业占据了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婚姻关系在巩固大的群体或者小集团的团结方面也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日本,与老

板女儿结婚的人常常接受她家族的姓。在其他的无数方面,东亚的家庭制度继续在证明着它的力量。

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教育在东亚早就成为决定个人成功的主要途径。划分成士、农、工、商的阶级结构反映了对于学习的重视。在近代以前(*premodern*)的中国和朝鲜,一个地位卑下的小商贩家庭也可以渴望通过受教育取得功名。士农工商这些种类与印度传统的种姓不一样,因为他们并不会因为出身就固定不变,通过努力他们可以求得变更。教育制度在东亚有着很深的根基,在个人指导下的小书院为人们提供了广泛的私人教育。在近代早期,东亚采用了由政府资助的近代教育,在军事和科学领域尤其如此。今天,从日本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尽管日本书面语言很难学,但日本的识字率比美国都要高。在中国,接受教育被看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应该怎样被决定的争端诱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造成了1966年后将近十年的混乱局面。虽然,东亚所有的国家在教育方面都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譬如教学靠死记硬背而不是理解,但雇主们仍然能够从热切的、受过良好教育而且目的非常明确的工作申请人中作出选择。一旦就职,东亚工人总是很快领悟工作要求,而且表现得忠诚又勤奋。英国人在伊顿公学的竞技场上培养他们的首相,而东亚人早就明白了教育是一项重要的财富,不能只把它留给贵族。

自由散漫的美国人从他们历史经验的一开始就不信任政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东亚人却将政府和官僚制当作一件完美的艺术加以接受。古代中国人把公用事业看成一种道义责任的思想,对礼仪作为社会凝聚力的一贯强调以及由品衔和大量的书面规章划定的官员队伍的严格等级——所有这些古代的特征在当前东亚经济复兴的核心中都可以体现出来。在东亚,共产党人对于他们的组织极端忠诚。尽管中国有强烈的求平等的趋向,官员们对于礼仪和等级仍然有着很强的意识。与此相类似,日本的公务员只要资历相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

作者 = B E X P

S S 号 =

加密地址 =

下载位置 = <http://hn4.5read.com/300-42/diskbap/bap66/12/!00001.pdg>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